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Владимир КАРПОВ

ГЕНЕРАЛИССИМУС

〔俄〕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 著



大元帅斯大林

M. G. Amu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大元帅斯大林



〔俄〕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 著
何宏江 等译
何宏江 李京洲 校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GENE
RAL
ISSIM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元帅斯大林/[俄]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著;何宏江等
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9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ISBN 7-80190-701-9

I. 大... II. ①弗... ②何... III. 斯大林, J. V.
(1879~1953)-生平事迹 IV. A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2361 号

Владимир Карлов

Генералиссимус Сталин

©Вече, 2002г.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ече, 2004г.

©Владимир Карпов, 2004г.

本书根据维切出版社 2004 年俄文版译出。

本书通过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取得中文版专有出版权,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独家出版。

作者的话

我在经过长期思考和犹豫之后开始写作这本书。斯大林经历的事件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作为一个人十分复杂、矛盾而多面。

因此首先请读者注意两点。一点是在斯大林生前的几十年中人们对许多事的评价往往过高，过分夸大、渲染了他的功绩；另一点是在斯大林去世后他这个历史人物以及与他相关的一切开始“声名狼藉”和“威信扫地”，这一过程至今仍在继续，其表现是把一切都说成一团漆黑，一无是处。

究竟真相如何呢？

为此不得不翻阅成堆的评价截然相反，大部分不客观、不公正的书籍、文章和研究著作。

在一些著作中斯大林是伟大的领袖、各族人民的父亲、英明的国务活动家，在另一些著作中他是嗜血成性的恶棍、有妄想狂心理的罪犯。

关于这些“传记”要指出的第一点是，所有无论是赞扬斯大林还是给他抹黑的人的做法，都是出于其意识形态的党性立场或派别信念。有些人无非是想通过谈“热点话题”来捞取钱财，只要有人付钱，他们可以从任何角度来加以描绘。他们昨天还在写“关于发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学位论文，今天却急急忙忙地大肆吹捧“自由经营活动”的好处。当年领袖的指示对于他们来说永远是指导一切的准则，而现在他们却断言，他没有任何理论和哲学，所做的只有镇压一件事。

应该对这一切加以分析。

我不打算分析、评价和描述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整个一生和全部活动，只尝试阐述他的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

我在写作《统帅》一书，特别是关于朱可夫元帅的三部曲时，仿佛是在为写作关于斯大林的书作准备。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的作用在涉及战争进程、做出进行重大战役的决策的各个战略问题上是最重要的。他的决策是对还是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他的意见和命令是决定性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我把我关于朱可夫元帅的三卷本著作中涉及敌人行动的某些章节纳



入本书中，而且多数情况下未作改动，事实上只补充了斯大林对敌人同一行动的反应。我认为没有必要对这些章节作彻底的改写。

我在写作那几本书的过程中积累了关于斯大林军事活动的一些材料和思考；此外，许多重要的将领同我的谈话以及数以百计的读者来信都不断建议我考虑着手写作关于斯大林的书。许多人认为，我以往的工作、所受的军事教育以及对档案的熟悉程度都使我做好了写作这本书的准备。赋予我力量的，不仅是我掌握了必要的材料，而且是因为我有着从1947~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在总参谋部工作的经历。

我并没有亲自接触过他，但多次见到过他，听过他讲话。我要告诉不了解我生平的人说：1941年我还是塔什干军校学员时因所谓的反苏鼓动和宣传被捕并被中亚军区军事法庭判刑（苏联刑法第58条第10款）。

侦查员问我的主要问题是：

“是谁给你诬蔑各族人民的领袖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任务的？”

我犯了这样的“罪行”，是因为我说过：

“不少人把列宁忘了，总是说斯大林、斯大林，而他在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里是次于列宁的第二位人物。”

侦查员说：

“你在军人中用这样的谈话散布怀疑情绪，破坏各族人民领袖的威信。”

在战前年代这是骇人听闻的刑事犯罪，许多人因这样的谈话而被处决。我还算走运，军事法庭“发了慈悲”，让我活了下来。

后来我去了塔夫达劳改营，伐过木，还去了远北，我几乎在那里葬送了性命。后来（1942年10月）我在给加里宁写信请求奔赴前线后去了惩戒连。大家都知道，在惩戒连里要用鲜血来赎罪。我在几次肉搏中活了下来，当时惩戒连只活下来几个人。接着是加里宁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决定：

“……鉴于红军战士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卡尔波夫在与德国侵略者的战斗中表现出色，取消其由中亚军区军事法庭判处的刑期……1943年2月20日”

总之，我完全有根据感到因斯大林所受的委屈。但是……

我此前的几本书都是实话实说，在这本关于大元帅的书中我也不改变这一作风。我不以为斯大林辩护或谴责斯大林为目的。我将一如既往，客观地阐述一切。

关于本书的风格和结构简单说一下。

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有严格的文献根据。也许有人以为文献和引文引用得太多，但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大部分读者不可能亲自阅读许多现有的、所谓的普通人难以弄懂的第一手材料。至于我同斯大林身边的人（朋友和敌人）的谈话，这些谈话记录（包括录音材料）是绝无仅有的，因为我的这些对话人已经离开了人世。

我对可能产生的认为引文和从各种著作中转引的材料太多的意见预先表示同意，我要说明的是，我想写一本比较全面的关于斯大林的书，因此收入了为老一代读者熟知而新一代读者不了解的斯大林生平和活动中的细节。

这种体裁的特点是什么呢？我并不追求史诗般的画面，因为这本书不是长篇小说或中篇小说，它是用由我和其他著名或不著名作者搜集到的斯大林事迹创作出的镶嵌画。我最关心的是创作出我们这位极为著名的同时代人生平尽可能全面的画面。

许多战争的参加者知道我在写作关于大元帅的书，于是给我寄来了他们的愿望和建议，告诉了我有关斯大林生平的一些细节。我满怀感激之情利用了这一切。

镶嵌画和其他体裁一样都有存在的权利。在这方面支持我的是别林斯基的一个看法：“在作家受史料和事实束缚、只需要设法尽可能忠实地再现这些事实的地方，似乎艺术（在艺术性方面）难有作为。但问题是，光是知识渊博不可能忠实地再现事实，这里还需要有想像力。史料中包含的历史事实无非是砖头和石块，只有艺术家才能用这些材料建造起优美的建筑物。”

我作为斯大林的同时代人，亲自经历过这些历史事件，因此完全有根据对事件参加者的所作所为进行判断。在由几乎近百年的大量文献、事实、人物及其行为构成的这幅扑朔迷离的镶嵌画里，我认为我应该是一个指点迷津的“向导”，一个对话者。

有些地方我详细地讲述了寻找文献的过程、目击者的叙述、事件的酝酿阶段或者我作的评论，这一切都是镶嵌画必要的氛围，它像空气一样填充在整个事件中间，不留下一点含糊不清、言犹未尽和模棱两可的地方。

我修改手稿用了五年时间，可以而且应该再花上一番力气，精炼语言，删去一些，补充一些。但是……根据读过这一手稿的朋友们的建议和好评我最终决定发表它。许多比我年轻的战友和作家先后离开了人世，而我也已经度过80年十分艰难的岁月，令人悲伤的意外也许会和我期而遇。我非常希望（我不隐瞒这一点）能拿着这本书（我创作中最有分量的一本），在静静的书房里翻看，再一次同读者们一起走过



不仅斯大林生活和工作过，而且我们老一辈也生活和工作过的 20 世纪最严酷、艰难和欢乐的年月。这也就是我们的生活。

还有最后一点。

我们在前线投入肉搏战，激励我们迎着子弹和死神冲向血肉横飞的战斗的不仅是“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的口号，鼓舞我们每一个人奋起的还有亘古以来的一个俄语词：“应该”！

我心中对自己说了“应该”这个沉甸甸的词，写作《大元帅》一本书时我充分懂得自己对读者和对历史背负了多么复杂和沉重的责任。



目 录

作者的话	825
第一章 革命家们	141
一 最初的经历(不加评论的事实)	13
二 国内战争。察里津保卫战	26
三 在西方面军。粉碎邓尼金	13
四 1920年的苏波战争	18
五 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人	24
六 主要的政敌(最初的经历)	32
七 重要的警告	45
八 斯大林和俄国正教会	53
九 关于战略	69
十 争夺军队的斗争	76
十一 农业集体化	80
十二 背后一击	93
十三 基洛夫遇害	98
十四 军事阴谋	108
十五 关于镇压	131
第二章 战争的达摩克利斯剑	145
一 与德国接近。秘密条约(1939年8~9月)	147
二 和平的日子	169
三 苏芬战争(1939年秋~1940年初)	184
四 欧洲的战争(法国战败:1940年5~6月。 英德战争)	191
五 清除托洛茨基	198
六 精神因素	205
七 比萨拉比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	221

目 录

- 228 八 莫斯科—柏林。1940 年
- 241 九 培养统帅
- 244 十 战略计划
- 252 十一 希特勒的计划
- 257 十二 斯大林揭开帷幕
- 267 **第三章 伟大的抵抗**
- 269 一 一切是这样开始的
- 287 二 最初的几天
- 294 三 在莫斯科(处决巴甫洛夫)
- 305 四 斯摩棱斯克战役
- 309 五 组建波兰军队
- 311 六 斯大林个人的不幸
- 322 七 在敌人一方(1941 年 7~8 月)
- 328 八 西南方面军是“阿喀琉斯的脚踵”
- 340 九 斯大林与朱可夫的冲突(叶利尼亚战役)
- 344 十 战略外交
- 348 十一 列宁格勒防御
- 355 十二 “台风”威胁
- 358 十三 莫斯科会战
- 381 十四 誓死抵抗
- 389 **第四章 1942 年的严峻考验**
- 391 一 反攻(对喘息时机的试探)
- 399 二 弗拉索夫
- 403 三 挑选能干的战友
- 410 四 1942 年的冬季战局
- 422 五 高加索会战
- 432 六 事事关心

目 录

第五章 战略转折	447
一 伏尔加河畔的大决战	449
二 在敌人一方(在斯大林格勒会战的日子里)	462
三 “指环”战役	467
四 让宗教为祖国服务	475
五 突破对列宁格勒的封锁	481
六 沃罗涅日交战	484
七 库尔斯克突出部	490
八 向第聂伯河进军!	501
九 德黑兰会议	507
十 国歌	513
十一 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合围	517
十二 在敌人一方……	529
十三 普罗斯库罗夫-切尔诺维策战役	533
十四 在敌人一方……	536
第六章 彻底歼灭	541
一 在“巴格拉季昂”战役之前	543
二 第二战场	546
三 “巴格拉季昂”战役	552
四 同保加利亚的和平之战	559
五 南斯拉夫之结	561
六 斯大林为什么饶了希特勒一命	573
七 华沙起义	577
八 克里米亚会议	585
九 最后的战局	592
十 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	599
十一 在敌人一方(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期间)	607
十二 胜利前夕	612

目 录

621	十三 在敌巢里	寇舞都城 章正策
623	十四 子虚乌有的运动	如... ..
633	十五 攻克柏林
644	十六 受降。胜利!	“... ..”
652	十七 几位胜利者的速写
659	第七章 伟大的强国
661	一 初见和平(秘密行动)
674	二 会见霍普金斯
677	三 胜利阅兵式
687	四 波茨坦会议
693	五 斯大林怎样使美国的原子“裂变”
708	六 击败日本
722	七 斯大林的错误
726	八 朱可夫遭贬黜
732	九 复兴
737	十 对左翼的关注
742	十一 探索新战略
750	十二 斯大林殒命
774	十三 “历史”公案
782	十四 个人崇拜
792	十五 总结(附言)
797	作者简历
798	参考书目

第一章

革命家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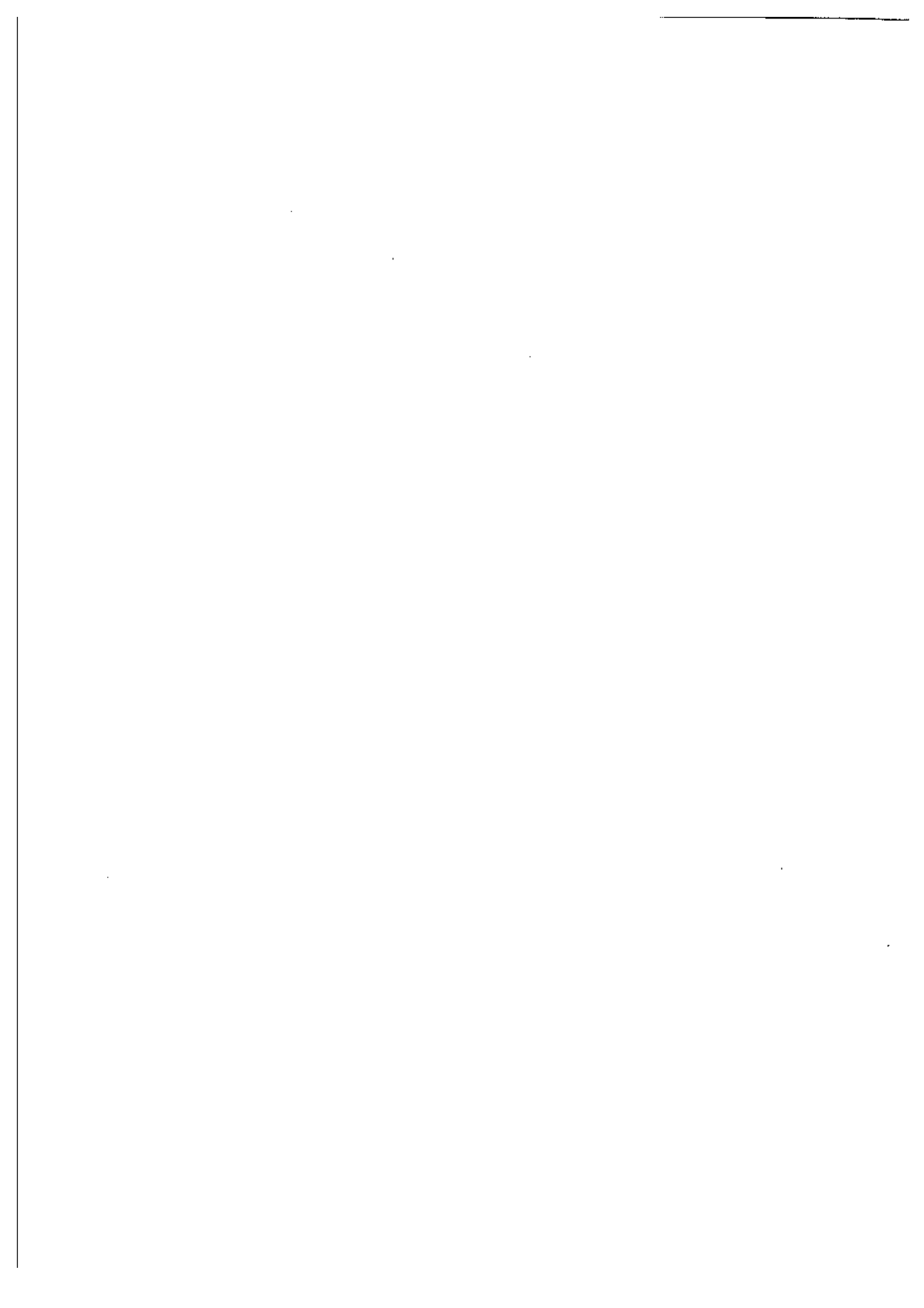


对阶级和政党来说，都不能只根据它们自己说的、根据它们当时提出的口号来作出判断……归根结底，一切矛盾都归结为争夺权力的斗争。

列·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分子和苏维埃政府之间的斗争不是争夺权力的斗争，而是两个纲领的斗争，其中一个纲领符合革命的利益并得到人民的支持，而另一个纲领与革命的利益相抵触并遭到人民的唾弃。

约·斯大林



一 最初的经历

(不加评论的事实)

任何人都不是天生的恶棍或正人君子。我以为我们如果从这一客观的立场出发开始了解斯大林就做对了。

不得不绕着弯来说，因为没有这样的“前提”就不能懂得未来的大元帅的个性和能力是如何形成的。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1879年12月21日出生在第比利斯省小城哥里的鞋匠朱加施维里夫妇（丈夫维萨里昂·伊万诺维奇和妻子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的家中。他在正教教会中受洗。1888年他进哥里正教小学读书，1894年正教小学毕业后进梯弗利斯正教中学学习，因成绩优异而获“奖学金”。他准备当神父，但是阅读当时时髦的革命书籍使他着了迷，他开始参加马克思主义小组。不久他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小组的积极分子，因此1899年5月27日（在上五年级时）被正教中学开除。

此后他就职于梯弗利斯观象台，任测量员，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他很勇敢，有着高加索人火爆的性格，他不满足于书本上的革命，还参加了剥夺行动。大约正是在这些行动中首先表现出了他坚决果断的优秀品质。

但是他“战斗活动”的时间并不长，因为他明白应该教育和发动劳动者起来投入争取美好未来的斗争。

1902年4月5日，斯大林因在工人中发表革命言论和在秘密的《斗争报》上发表文章而第一次被捕，并被投入巴统监狱，1903年秋天被流放东西伯利亚三年，居住在伊尔库茨克省新乌达村。他在这里收到了列宁寄来的第一封信。1904年1月5日他从流放地逃跑，回到高加索，并在这里组织了出版大量秘密传单、报纸、小册子、书籍的工作，成了列宁在反对孟什维克斗争中的志同道合者。

1905年12月他代表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参加了在塔墨尔福斯（芬兰）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全国代表会议，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列宁。1906年4月他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



会，并在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上积极参加了列宁战胜孟什维克的斗争。之后他重又返回高加索。

斯大林关于这一时期回忆说：“在石油工人中间的三年革命工作，把我锻炼成了一个实际的战士和实际的地方工作者……这样，就在那里，在巴库，我受到了第二次战斗的革命洗礼。”^①

1908年3月25日斯大林第二次被捕，在监狱中被关了八个月后被流放沃洛格达省。1909年6月24日他从流放地逃跑，返回巴库。

1910年3月23日他再度被捕，在狱中被囚禁半年后流放索利维切戈茨克。1911年9月6日他秘密前往彼得堡，但9月22日即被押往流放地沃洛格达。

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受列宁的委托来到沃洛格达，向斯大林通报了他被布拉格代表会议缺席增补为中央委员。

1912年2月斯大林又一次从流放地逃跑。

1912年5月5日，根据列宁的指示《真理报》创刊号出版，这份报纸是斯大林和他的同志们在俄国国内筹划出版的。

1912年4月22日斯大林被捕并被流放纳雷姆边疆区，期限为三年。但同年9月1日他就从纳雷姆逃走了。

斯大林在彼得堡处于地下状态时仍继续领导出版《真理报》，筹划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活动，写了《彼得堡工人给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托书》。列宁对委托书评价很高，他建议报纸“一定要把这份给彼得堡工人杜马代表的委托书用大号字登载在显著的位置”。^②选举取得了胜利，工人推荐的候选人当选为杜马代表。

列宁在同斯大林的通信中赞扬了他。1912年11月和12月斯大林去克拉科夫列宁处参加中央会议。

斯大林在国外撰写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列宁写信告诉高尔基说：“我们这里有一位非常好的格鲁吉亚人正在埋头给《启蒙》杂志写一篇大文章，他搜集了一切奥国的和其他国家的材料……”^③

1913年2月23日斯大林在彼得堡被捕。这次当局考虑到他多次逃跑，把他流放到遥远的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北极圈内的库雷卡村，斯大林在这里一直居住到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

1917年3月12日他回到彼得堡，在这里成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①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55页。——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第176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243页。——译者注

中央俄国局和《真理报》编辑部成员。

1917年4月2日列宁越过俄芬边界，斯大林、加米涅夫、柯伦泰、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别洛奥斯特罗夫车站迎接列宁。

4月4日列宁在塔夫利达宫发表了他历史性的《四月提纲》——立即行动的纲领。斯大林在他的身边。

1917年4月24日斯大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的还有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维尔德洛夫、诺根、斯米尔加、费多罗夫。

6月4日，在克伦斯基下令枪杀和平示威者后，党转入地下，斯大林负责保卫列宁安全的工作。

斯大林经常在拉兹利夫和列宁见面，筹划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由于列宁缺席，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政治形势和武装起义方针的主报告。

10月25日举行武装起义，列宁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

十月革命成功了，26日晚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斯大林被任命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在这些日子里许多共产党员不得不成了军人，于是为斯大林提供了众多的机会。

10月16日的中央会议根据列宁的提议成立了“军事革命总部”，由斯维尔德洛夫、乌里茨基、捷尔任斯基、布勃诺夫和斯大林五人组成。

总的来说，当时有两个领导中心：彼得堡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和全俄的“军事革命总部”。

全国的起义由列宁领导，而彼得堡的起义由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领导。

第一版的《列宁全集》说：“在彼得堡苏维埃转入布尔什维克手中之后，托洛茨基当选为彼得堡苏维埃主席，组织并领导了10月25日的起义。”

革命后，斯大林在1918年的一篇纪念文章中谈到托洛茨基时说：“实际组织起义的整个工作是由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领导的。可以有把握地说，卫戍部队迅速站到苏维埃一边以及军事革命委员会工作组织得出色，党应首先和主要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安东诺夫和波德沃伊斯基同志是托洛茨基同志的主要助手。”

因此，在20世纪初的两个最重大的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中斯大林并不是有些卖力的传记作者所说的只是一个二流角



色，而是布尔什维克革命家领导班子中的一员。

他是接近列宁的志同道合者中的一员、中央委员、“军事革命总部”成员，但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在这一时期的作用还不突出。斯大林这时只是投射出列宁点燃的“篝火”的反光。

斯大林最初的经历真相就是如此。我不打算贬低也不打算拔高他，只是恰如其分地列举了一些事实。

一、国内战争。察里津保卫战

斯大林的军事才能是在哪里、怎样发展起来的？他又是在什么时候、怎样积累起战斗经验的呢？

斯大林不仅参与而且发挥了领导作用的第一个战略性事件发生在1918年察里津城下。只不过他开始参与这一场大战役时还不是一个将领，而只是一个粮食委员。

应该指出，彼得格勒当时四面被包围，与向首都供应粮食和其他食品的各省的联系都被切断了。饥荒不仅开始扼杀这个大城市的居民，而且开始扼杀革命本身。这时需要采取紧急措施安排好粮食供应。措施之一就是中央决定派斯大林作为粮食委员前往察里津，通过察里津可以绕开占领乌克兰和广袤的顿河产粮区的邓尼金部队，从伏尔加河地区和北高加索运送粮食。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懂得并强调指出这一措施的重要意义，他签署了特别的委托书：

“人民委员会任命人民委员会委员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为南俄粮务特命全权总领导者。各地方各区域人民委员会、工兵代表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各司令部和各部队长官、各铁路机关和车站站长、各内河和海上商船的组织、各地邮电局和粮食机构、所有专员和代表均须执行斯大林同志的命令。”

人们在描写历史人物的活动时，往往忽略了他们个人生活中的一些细节。这样做是不应该的，因为有时生活中的、纯粹个人的一些因素会对历史人物的行为，因而也会对事态的进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我以为在这里应该提一下斯大林生平中一件鲜为人知的事实。这件事无疑对斯大林在察里津的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心理影响。斯大林在1917年从流放地归来后住在老朋友阿利卢耶夫家中。阿利卢耶夫一家已经接待过斯大林一回，那是在1915年他从流放地逃跑之后。二月革



命后他再次把阿利卢耶夫的家当作秘密居住点，后来，在十月革命轰轰烈烈进行之际，他顾不上去找住所仍住在他们家中。

但有根据，而且有相当令人信服的根据可以认为，斯大林留在阿利卢耶夫家中不仅是因为自己没有住所。原来阿利卢耶夫家的一个女儿娜坚卡^①长大了，这时她17岁。她在一个革命者的家庭中接受教育，具有纯洁而热情的天性，认为到父亲家中来的党内同志都是富有浪漫色彩的英雄，她十分喜欢他们，幻想着能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现在家中突然住进了这样的一个传奇式的英雄，他多次从流放地逃跑过，而且还一度躲藏在他们家中。

她清楚地记得这一切，因此心房剧烈地跳动，用欣喜若狂的目光注视着这个神秘的黑头发的斯大林。

38岁的“革命家叔叔”不可能不发现这一切。事情一发而不可收拾，尽管年龄差距很大，但斯大林仍然不顾党内同志的看法，带娜佳^②去了察里津。斯大林大概想在年轻的爱人面前展示自己的分量，因此带她坐专列的包厢，他可以想像得到娜佳会如何看待他带着列宁本人签署的委任状去办的大事。

1918年6月6日斯大林到达察里津。他仍然住在由他带来的彼得格勒赤卫队员守卫的专列包厢里。斯大林作为特命全权委员开始不仅召见地方党和苏维埃政权机关的领导人，而且召见军队领导人，听取他们的报告。军队领导人起先不明白一个文职的粮食委员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不太服从他，仍然干自己的事。

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前沙皇军队的斯涅萨列夫中将出色地领导着他手下部队的作战行动，为察里津建立了可靠的防御阵地。安德烈·叶夫根耶维奇是一个作战经验丰富的将军，战前毕业于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斯涅萨列夫在莫斯科大学上学时就思想进步，因此决定献身革命，志愿加入了红军。他对革命十分有用。列宁高度评价这样的人，建议各个方面军都起用精通业务的前军官——“军事专家”，而为了防止其中某些人的叛变，又为军事专家配置了政委。

斯大林对从前的军官持十分怀疑的态度，他认为他们是阴谋分子。在这一点上他同列宁关于利用军事专家的意见是不一致的。斯大林在察里津发现军人对他很冷淡，便给中央委员会列宁发去电报，要求授予他干预军务的权力，因为他发现这方面极为混乱。

中央委员会起先并没有授予斯大林这样的权力，认为他应该做派他

① 这都是娜捷施达·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的昵称。——译者注

② 同注①。

去做的主要工作——抓粮食工作。

斯大林向遭受饥荒的彼得堡运去了几列车的粮食，为革命立了大功。

但是6月末敌人转入进攻。克拉斯诺夫将军打算用哥萨克军队占领察里津并与发动叛乱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及乌拉尔和奥伦堡的哥萨克白卫分子会师。反革命势力要是联合起来，就会切断俄罗斯北方与向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运送粮食的南方的联系。察里津失守将是一场难以挽回的大灾难。

白军切断察里津与北高加索的联系，就使斯大林无法完成派他来这里执行的主要任务，即动员粮食资源并运往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粮食还在南方，但与南方隔断的察里津本身并没有粮食。斯大林竭尽全力来完成中央和列宁委托的任务：

“我在督促并责骂所有该督促和该责骂的人，相信很快就可以恢复。尽可放心，我们不宽恕任何人，不论自己或别人，粮食总会送去。如果我们的军事‘专家们’（饭桶！）不蒙头睡觉、游手好闲，线路就不会被切断；如果线路恢复，那也不是多亏了军事专家，而是由于反对了他们……”

至于歇斯底里的人，请放心，我们的手绝不发抖，我们将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付敌人。”^①

1918年7月11日斯大林致电列宁：

“由于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完全不善于适应同反革命斗争的条件，致使问题复杂化。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的‘专家’在心理上没有能力与反革命坚决作战，而且还因为他们作为‘司令部’工作人员，只会‘画画图’，提出改编计划，对作战行动绝对无动于衷……总的说来感到自己是外人，是客人。政委不能填补空白……”

我认为我无权对这一切漠然置之。我将就地纠正这些缺点和其他许多缺点，我采取并将采取一系列措施，直至撤换坏事的官员和指挥员，尽管在形式上有一些困难，必要时我将加以排除。而且我无疑将对一切上级机关承担全部责任。”

给全国中心的粮食供应中断了。列宁告诉斯大林说：“……关于粮食，应该说，今天彼得格勒或莫斯科都一点也发不出了。情况很糟。请告诉我，

① 参看《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106页。——译者注

能否采取一些紧急措施，因为除了您那里，再也没有其他来源了……”^①

斯大林回答说：“铁路恢复前，粮食不可能运到……近日内还不能支援你们粮食。大约再过10天铁路可望修复……”^②但是不是几天，而是几个月过去了，情况仍在继续恶化。

不仅前线，而且后方局势也异常紧张，在彼得格勒，社会革命党人发动暴动，行刺列宁。察里津聚集了很多敌视新政权的人：社会革命党人、恐怖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君主派分子、前军官。那里存在着一个有组织的反革命地下组织。

我以为，从一个当时事件的参与者、前集团军作战处处长诺索维奇上校所说的情况中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斯大林在同国内反革命的斗争中的作用。诺索维奇上校投奔白军并于1919年2月3日在白卫杂志《顿河浪》上撰文说：

“斯大林的主要作用是向北方各省供应粮食，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拥有无限的权力……

格里亚齐-察里津一线已被彻底切断。在北方只有一个获得粮食和保持联系的可能，那就是伏尔加河。在南方，在‘志愿军’占领季霍列茨卡亚后，局势也变得摇摇欲坠。对于完全从斯塔夫罗波尔省获取粮食的斯大林来说，这种形势近乎说明他在南方的使命彻底失败。像斯大林这样的人绝不会放弃他业已开始的事情。应该说句公道话，任何一个旧的行政管理人员都该羡慕他的精力，而许多人都该学习他处理事务和应付情势的能力。

斯大林随着无事可干，确切些说，是随着他直接任务的缩小，逐渐开始插手城市各管理部门的工作，主要是保卫察里津以至整个高加索方面军广泛的工作。

这时察里津的气氛十分紧张。察里津肃反委员会开足马力，几乎每天都在看来十分可靠的地方发现各种阴谋活动。城市的监狱人满为患……

前线的斗争异常激烈……

从7月20日起斯大林成了一切事务的主要推动者和主要主宰者。通过直达线路与中央简单谈一下目前地区管理机构不便于和不适合于工作，莫斯科就下令由斯大林领导整个军事和民事管理工作……”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8卷第251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252页。——译者注

诺索维奇接着承认镇压是有根据的。他关于察里津的反革命组织是这样说的：

“这时拥护立宪会议纲领的当地反革命组织已相当强大，它们收到从莫斯科寄来的经费，准备积极行动起来支援顿河哥萨克夺取察里津。

十分遗憾的是，从莫斯科来的这一组织的领导人，工程师阿列克谢耶夫及其两个儿子对当前形势很不了解，由于计划错误（指望吸收属于肃反委员会的塞尔维亚营积极参与行动），这个组织暴露了……

斯大林的批示很简短：‘枪决’。阿列克谢耶夫工程师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及相当数量的军官（其中一部分确实参加了该组织，另一部分则被怀疑同情这一组织）被肃反委员会逮捕并不经任何审判立即处决。”

诺索维奇关于肃清白卫分子一事写道：

“这次清理的特点是斯大林对来自中央的指导性电报的态度。当托洛茨基担心他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军区管理机关会遭到破坏而发电报要求务必让司令部和政委保持原有的条件，给他们提供工作可能时，斯大林在电报上断然批了意味深长的几个字：‘不予理睬！’

于是对这份电报不予理睬，整个军械部和司令部部分机关人员继续被关在察里津的一条驳船上。”

斯大林则致电莫斯科：

“……从工作利益着想，我必须拥有军事全权。这一点我过去提过，但是没有得到答复。好吧。在这种情况下，我将自己作主，不经形式手续把那些损害工作的集团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撤职。工作的利益要我这样做，当然，我绝不因为没有托洛茨基的公文而不去行动。”^①

斯大林说的“没有公文”是指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

① 《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108-109页。——译者注

基没有授予他干预军事指挥事务的权力。

斯大林确实没有因为没有“合法”权力而“不去行动”，根据他的命令斯涅萨列夫以及司令部中几乎所有的旧军官遭到了逮捕。一些被捕的军官被关在一条驳船上，由卫兵看押。

关于这些军官的命运，更确切些说是关于斯大林采取的这类严厉措施，不断有人向莫斯科报告，因为有人从驳船上带走并枪杀了几批军官，而且还打算凿沉这条驳船。于是以阿·伊·奥库洛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被派往察里津调查这件事。

委员会查明了对被捕者的指控，大多数人被释放，其中包括斯涅萨列夫将军。为了分开斯涅萨列夫和斯大林，前者被任命为西方面军司令。

但当委员会到来之际，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及其他的亲信已在真正的意义上消灭了罪证。

长期以来传说委员会当时并没有了解到全部情况。例如，1939年我在军校学习时曾听一些年长的指挥员说还凿沉过另一条驳船。

1918年秋天白军前出至察里津的接近地，在一些地方直抵伏尔加河畔。1919年1月形势极为危急，克拉斯诺夫将军投入新的兵力，突破了红军的防线，向察里津挺进。这时刚组建的南方面军司令瑟京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大林手中却没有一点预备队来进行反攻。

斯大林在这一十分复杂的局势中没有张皇失措，他坚定沉着，终于找到了办法。在这件事上他第一次显示出从战役战略上思考的能力。

当时与斯大林一起呆在专列包厢里的人回忆说，斯大林比平时更兴奋，几乎不停地抽烟斗，但说话平和而坚定，从而稳住了周围的人。

斯大林明白，既然他很快把一切领导权都集中在自己的手里，那么失败的责任也将由他承担。但是怎么办呢？没有预备队，敌人几乎毫无阻拦地将要拿下察里津。

斯大林估计克拉斯诺夫将军的部队大概已经准备庆祝胜利了。这从来会使人失去警惕性。历史上有过不少例子说明，过早的胜利导致丧失战斗中得来的成果。

“现在克拉斯诺夫将军会怎样指挥呢？”斯大林并不具体针对哪一个人地问道。在场的人都静了下来。方面军司令部的一个代表报告说：

“他们正准备进入察里津，主力在杜博夫卡地区列成纵队。前面是一支人数不多的前卫部队，用来打击我们部队的残余力量。”

斯大林狠狠地用烟斗敲击了一下桌子：

“好极了！放过前卫部队，在我们的纵深地区再收拾他们。”

“但这样做意味着也给敌人的主力敞开了道路……”

“完全正确。”斯大林说。他很自信，因为找到了摆脱绝境的出路。斯大林甚至笑了一下，说：“敌人的主力不是走进城里，而是走向毁灭。”

“但是谁……”

“炮兵指挥员库利克同志，你在杜博夫卡地区有几门炮？”

“我这里一门也没有……”库利克开始表白说。

“那么整个方面军有多少门？”斯大林不耐烦地打断他说。

“大约有一百来门……”

“一分钟都不要耽误，立即把这些炮全部集中到杜博夫卡。派可靠的人去炮兵连。使劲督促所有的人！要在一个晚上全都集中到杜博夫卡。还要往那里运送所有的炮弹。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敌人正得意忘形。胜利冲昏了他们的头脑。我们就要用所有的大炮敲打这些愚蠢的脑袋！而杜缅科的混成骑兵师也要往这里集中，到杜博夫卡去。他的任务是——一旦炮兵击溃敌人后，打击和追击他们！”

全部炮兵一夜之间转移并占据了杜博夫卡附近的火力点。杜缅科的师也到达指定地区。斯大林对敌人的心理分析完全符合实际。克拉斯诺夫将军的部队列成纵队跟随前卫部队前进。炮兵也在队列中，沿着大路前进。装备笨重的大军密集地开赴察里津。

炮兵的炮击如此密集，数量之多前所未见，而且射速极快，不仅出乎敌人的预料，更给了他们毁灭性的打击。炮弹在人堆里爆炸，几分钟里一大片地上躺满了尸体，士兵们向四下里逃窜。杜缅科的师在布琼尼指挥下（杜缅科病了）拼命追击撤退的敌人。方面军的其他部队也转入进攻。克拉斯诺夫的部队被迫从察里津后撤。

这一光辉的胜利加强了斯大林的威信。城市保住了，白军被赶跑了。这一切是由谁领导的？是斯大林！还有一个人帮了大忙，他就是库利克。这是正常的，因为在这场战斗中炮兵起了决定性作用，炮兵被创造性地以前所未见的方式集中在主要方向密集开火。而指挥炮兵的是谁呢？是库利克！库利克在这一仗后威名远扬，持续了好多年。

但是斯大林与方面军领导的关系依然紧张，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性格。更确切些说，他依然故我，不用另外的方式行事。

如上所述，1918年9月帕维尔·巴甫洛维奇·瑟京被任命为新组建的南方面军司令，他也是前沙皇军队的将军、总参谋部的军官，也是于1918年1月志愿加入红军的。

斯大林从一开始起就和新司令瑟京发生冲突，他甚至擅自解除了瑟京对方面军的领导。而且斯大林以此来拒绝服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关于不要干预方面军司令作战指示的命令。全俄中央执行



委员会主席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给在察里津的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发电报说：“（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决定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来说都是务必执行的。没有服从，就没有统一的军队……不应发生任何冲突。”但斯大林不理睬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示，继续按自己的决断行事。

中央委员会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不得不把斯大林召回莫斯科。瑟京仍然担任方面军的司令。

我们在总结斯大林第一次独立接触军事战略的情况时，应该指出他的睿智、顽强、坚决、果断，尤其是在复杂形势下更是如此。这些都是一个军事领导人的优秀品质。斯大林获得了组织和进行大规模军队作战的经验。他熟悉了司令部的活动，但是他对司令部的作用显然并不理解。此外，斯大林使用广泛的权力时并非总能合乎分寸，这也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一点使中央委员会和党内的同志有理由产生警惕。但是在国内战争紧张时期顾不上这一点。而有些人认为在当时形势下这不是缺点，而是优点，更何况实际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点：斯大林保卫住了察里津。对胜利者不作审判，而察里津的胜利确实具有战略意义。

三 在西方面军。粉碎邓尼金

1919年5月尤登尼奇的部队转入进攻，彼得格勒岌岌可危。党中央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派斯大林前往彼得格勒方面军。这一任命并不是随便做出的，而是因为考虑到了他的军事才能和以往在前线表现出的行动果断的作风。列宁告诫斯大林说：“白卫分子向彼得格勒进攻的种种情况使人不能不推测，在我们后方，也可能就在前线，存在着有组织的叛变活动……请密切注意这些情况，采取紧急措施揭露阴谋。”^①

列宁没有料错，1919年6月13日在红丘炮台和灰马炮台爆发了反革命叛乱。斯大林再次表现出英勇果断的作风，他明白不能让叛乱蔓延，因为英国舰队正准备入侵。三天之内叛乱就被镇压下去了。

斯大林报告列宁说：

“继红丘炮台之后又占领了灰马炮台。两个炮台的炮都完整无损。现在正迅速检查全部炮台和要塞。

海军专家们硬说，从海上攻占红丘炮台是违背海军科学的……红丘炮台之所以能被迅速占领，是由于我和一些非军事人员极‘粗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8卷第644页。——译者注

暴’地干预了作战事务，粗暴到撤销海军和陆军的命令，强迫执行自己的命令的程度。

我认为有责任声明，我今后将继续这样行动，虽然我非常敬重科学。”^①

在他的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胜利者得意洋洋之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毫无谦逊之意。考虑到在战斗后的兴奋情绪，我们可以对此不作计较。但是应该指出的不仅是这一点。斯大林表现得很有远见，懂得时间因素的作用，不让叛乱蔓延。在这种形势下如此迅速地攻占强大的要塞固定炮台是要有能力的。斯大林的骄傲是可以理解的。

一旦叛乱分子与英国舰队联合作战，叛乱可能会给革命的共和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但是英国人在得知叛乱遭到镇压的消息后，最终也不敢开始大规模的作战行动。

1919年7月5日，斯大林被任命为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他抵达方面军在斯摩棱斯克的司令部，很快向列宁报告说：“目前明斯克前线的形势不大好……集团军司令毫不中用，只能坏事。”^②

过了一段时间斯大林又和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阿·伊·奥库洛夫发生冲突。这个奥库洛夫就是曾作为调查军事专家被捕事件委员会主席前往察里津的人。斯大林甚至并不试图掩饰他的不快，要求把奥库洛夫调离。

列宁不得不告诫斯大林说：

“……我以为您应该帮助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集团军……应该使与奥库洛夫的冲突不致越演越烈。请好好考虑一下，因为不能干脆把他调离。”

但是斯大林再一次不听列宁很有分寸的请求，坚决要求撤换妨碍他的人，终于使奥库洛夫调走了。形势要求这样做，但其结果证明斯大林的看法是对的。敌人的进攻被打退了。西方面军依靠斯大林认为必须留下的人挺住了。

1919年9月27日，斯大林被任命为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南方面军正在同邓尼金的部队作战。斯大林在南方面军参加了一个大战局，而不是战役。

①：《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32页。——译者注

②：《列宁全集》第2版第49卷第30页。——译者注

在斯大林抵达南方面军之前，总司令加米涅夫为了消除邓尼金部队进攻对我国中部地区构成的危险，按照托洛茨基在莫斯科制定的计划，命令东南方面军司令绍林在察里津—新罗西斯克实施突击，即挺进到邓尼金部队的后方去。这一意图从军事观点来看是十分有作用的，但显然没有考虑到政治形势。红军部队为了从伏尔加河到新罗西斯克实施突击，不得不通过辽阔的顿河地区行动，而那里大部分地方都居住着敌视革命的哥萨克。哥萨克为了保卫自己的土地会作出强烈的反抗，而这会使进攻遭到失败。

南方面军的新司令叶戈罗夫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大林不同意这一计划，建议采取另一个方案：从沃罗涅日方面向哈尔科夫、顿巴斯、罗斯托夫实施突击，在这些地方预期可得到构成这些工业区多数居民的无产阶级的支持。

10月9日凌晨3时，南方面军司令叶戈罗夫收到总司令加米涅夫的指令，总司令表示同意新的计划，提出沿库尔斯克铁路往顿巴斯方向进攻并实施主要突击的任务，这样做可以分割开顿河军和邓尼金部队，并歼灭它们。

同一天，确切些说是同一个夜里，即10月9日5时25分，方面军司令发布第10726号作战指令，为了执行总司令的指令（和他自己此前作出的并报总司令批准的决定）给各兵团下达了具体任务。

签署这一指令的是南方面军司令叶戈罗夫、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大林和拉舍维奇、南方面军参谋长普涅夫斯基。

在我的案头放着《粉碎邓尼金（1919年）》一书。这是前南方面军司令亚·伊·叶戈罗夫1931年出版的一本很有价值的研究著作。这本230页的书配有图表，列有准确数字，一个阶段接一个阶段，逐日详尽地分析了粉碎邓尼金部队战役的准备和实施情况。这本书的序言引用了伏罗希洛夫一篇文章中的话，其中说：

“斯大林同志了解了情况后，立即作出决定。他断然否定了原来的计划，提出了新的建议并在……报告中呈报给了列宁。”

伏罗希洛夫的这段话以及其中提到的“报告”后来被一些阿谀奉承的人吹嘘成“粉碎邓尼金的天才计划”。

我在上面列出了发布这一文件的日期甚至钟点不是毫无缘故的。从中可以看出，南方面军司令叶戈罗夫和斯大林、拉舍维奇以及参谋长普涅夫斯基一起部署了粉碎邓尼金的战役并向总司令作了报告，得到了总司令的批准。总司令给南方面军的指令是1919年10月9日凌晨3时到



达的，方面军司令给部队的指令是同一天凌晨5时25分签发的，而斯大林的“报告”是在1919年10月15日起草的！斯大林在报告中向列宁阐述了他大概在南方面军司令部制定计划时说过的内容。也许他在同叶戈罗夫事先的谈话中也谈过这些想法，但如我们所看到的，并没有什么斯大林关于粉碎邓尼金的“天才计划”。但是斯大林在“报告”中阐述的有关战略战役问题的论断十分内行，令人信服地表明斯大林的军事知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下面就是这份“报告”的全文：

列宁同志：

大约两个月以前，总司令在原则上是不反对经过顿巴斯从西向东实施主要突击的。但他之所以终究没有进行这样的突击，是因为他拿南线军队夏季退却后留下来的“遗产”为借口，即借口目前东南战线地域的军队部署已经自发地形成，要变更部署就会浪费很多时间，会对邓尼金有利。仅仅因为这一点，我才没有反对已经正式确定的突击方向。但是，目前的情况和与之有关联的兵力部署发生了根本变化：第八集团军（过去南方战线的基本兵力）转到南方战线地域并直指顿巴斯；布琼尼的骑兵军（另一个基本兵力）也转到南方战线地域；增加了新力量——拉脱维亚师，这个师经过一个月的休整后，又会成为令邓尼金望而生畏的力量。

可见旧的部署（“遗产”）已经不存在了。究竟是什么东西使总司令（大本营）坚持旧计划的呢？显然，只是一种固执，也可以说，就是派别成见，最愚蠢和对共和国最危险的派别成见，这种派别成见是斗鸡式的“战略家”古谢夫在总司令部里培植起来的。前几天总司令给绍林下令，要他从察里津地域经顿河草原向新罗西斯克进攻，这条路线对我们的飞行员也许是方便的，但是我们的步兵和炮兵根本无法通过。用不着证明，这种在无视我们的环境，在完全无路可行的条件下的荒谬的（预定进行的）进军，使我们有完全瓦解的危险。不难了解，这种向哥萨克村镇的进军，正像不久以前的实践所证明的那样，只能使哥萨克人为了保卫自己的村镇而团结在邓尼金周围来反对我们，只能使邓尼金显得像顿河区的救星，只能给邓尼金建立哥萨克军队，就是说，只能加强邓尼金的力量。

正因为如此，必须毫不迟缓地改变已经被实践摒弃的旧计划，用从沃罗涅日地域经哈尔科夫—顿巴斯向罗斯托夫进行主要突击的计划来代替它。第一，这里我们遇到的将不是敌视我们的环境，相反地，是同情我们的环境，这会便于我们向前推进。第二，我们将

获得最重要的铁路网（顿巴斯铁路网）和邓尼金军队得到补给的主要命脉即沃罗涅日—罗斯托夫铁路（没有这条铁路，哥萨克军队冬季就得不到补给，因为顿河军队的补给线——顿河将要封冻，而东部顿巴斯的利哈亚—察里津铁路将被切断）。第三，我军这样推进能把邓尼金的军队切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志愿军，把它留给马赫诺去吃掉；另一部分是哥萨克军队，使它受到后路被抄的威胁。第四，我们将有可能使哥萨克和邓尼金发生纠纷，因为邓尼金在我们顺利推进的情况下一定会极力设法把哥萨克部队向西移动，而大多数哥萨克是不会同意的，当然，如果那时我们向哥萨克提出和平问题，提出和平谈判等问题的话。第五，我们会得到煤，而邓尼金却得不到煤了。

采取这个计划是刻不容缓的，因为总司令的调动和分配团队的计划有使我们最近在南方战线的胜利化为乌有的危险。更不用说大本营根本不理睬党中央和政府最近通过的“一切为了南方战线”的决议，实际上这个决议已经被它取消了。

简单地说，已经被实际生活摒弃的旧计划无论如何不应当再采用了——这样对共和国是危险的，这样一定会使邓尼金的状况改善。应当用另一个计划来代替它。情况和条件不仅已经成熟到可以这样做，而且无条件地要求这种代替。到那时团队的分配也要按照新方式来进行了。

不这样做，我在南方战线的工作就成为毫无意义的、罪恶的、不必要的工作了，这就给我权利，或者更确切些说，这就要我随便到什么地方去，甚至到魔鬼那里去，只是不要留在南方战线。

你的 斯大林

1919年10月15日于谢尔普霍夫^①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斯大林的判断是在行的、令人信服和十分有益的。他大概在南方面军指挥班子和司令部制定粉碎邓尼金的计划中谈过这些想法，但不能把这个文件当作独立的“天才计划”。从写作日期（10月15日）来看，它也是事后反映情况的：到这一天南方面军的部队已经执行“报告”中拟定的新进攻方案有一个星期了。

我们由于不想美化或丑化斯大林，简单总结如下：斯大林在粉碎邓尼金军队一事上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表现出他是一个对战略问题十分在

^① 《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44—246页。——译者注

行的政治家和组织者。他在实施十分重大的集团军和方面军战役，在敌人占优势、自己的部队保障很不充足的复杂条件下实际领导部队作战行动方面获得了新的重大经验。斯大林确实参与了制定新的、更合理的计划并同南方面军的其他领导人一起成功地实施了这一计划。

四 1920 年的苏波战争

邓尼金被击溃了，他的部队在战斗中伤亡惨重，而由于瓦解和开小差造成的减员更多。他的一部分部队退到克里木，与弗兰格尔男爵的部队合并。1920年4月4日邓尼金下台，弗兰格尔成了白军总司令。他的司令部里有英、法、美、日等国司令部的代表。协约国没有放弃消灭革命共和国的意图，因为它们以为革命共和国使资本主义世界不稳定，有点燃世界烈火的危险。“我们为葬送一切资产者将燃起全世界的大火！”人们不仅这样唱着，而且几乎所有共产党人讲话结束时都号召：“世界革命万岁！”列宁在第六次全俄非常代表大会上讲话时说：“……我们不是为俄国革命而是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去进行最后的决战！”^①

托洛茨基写道：“至于战争……将以波兰爆发工人革命结束，对于这一点不容置疑，但同时没有根据认为战争将以这样的革命开始……”也就是说应该开始对波兰的战争，使波兰的工人革命爆发并取得胜利。这个意图是从更加全局的角度考虑的，因为托洛茨基认为波兰是整个欧洲革命的导火索。在德国、奥匈帝国、法国无产阶级运动已经如火如荼。

1920年夏天，波兰军队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失利，向西方后撤。7月20日，总司令加米涅夫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下令从不同的方向——由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的西方面军和由叶戈罗夫指挥、斯大林任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西南方面军——向华沙发起进攻。

西南方面军执行这一指令，转入进攻，解放了基辅，进逼利沃夫。

图哈切夫斯基的西方面军抵达华沙城下，但接着发生了一场意外的灾难。

批判斯大林的人连篇累牍地谈论这件事，证明斯大林是造成这一阶段苏波战争失利的主要责任人。

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评传》是这样写的：

“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西南方面军的战线与主要的西方面军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149页。——译者注

战线成直角分头挺进。在图哈切夫斯基的方面军向华沙前进时，斯大林所在的西南方面军向伦贝格运动。斯大林在打自己的仗，他想方设法要进入利沃夫，而斯米尔加和图哈切夫斯基要进入华沙。总司令部在最终发现华沙城下将实施反突击时，命令西南方面军司令叶戈罗夫断然改变方向，以从翼侧打击华沙城下的波兰军队，从侧面支援图哈切夫斯基。但得到斯大林恫吓的西南方面军司令部却继续向西运动：难道自己攻克利沃夫不比帮‘别人’攻占华沙更重要吗？大本营在三四天之中没能使命令得到执行。只是由于三令五申并不断警告，西南方面军司令部才改变了方向。但几天的拖延起了致命的作用。”

是谁说得对呢？为了查明真相，我们不得不自己复原当时的局势和事态的进程，为此我们要从苏波战争爆发之初说起。

波兰成了协约国再一次进行武装干涉最后的跳板。为了奖励波兰沙文主义者，协约国许诺给它大片苏维埃的土地，这符合它自古以来建立“从海洋到海洋的大波兰”的愿望。从1919年末起协约国开始训练波兰军队，准备对苏维埃国家发动大规模进攻。

协约国的援助使波兰政府在1920年春天之前组建起一支兵力达73.8万人的军队。法国教官负责对波兰军队进行培训。根据法国元帅福煦的指示，在法国驻华沙使团团长昂利将军的直接领导下波兰制定了进攻俄国的计划。4月25日，波兰军队以五倍于苏俄西南方面军部队的兵力同佩特留拉分子一起发动进攻。4月26日，波军占领日托米尔和科罗斯坚，5月6日，攻占基辅，前出至第聂伯河左岸。但是敌人未能击溃第12集团军。5月中旬，战线稳定在基辅以南—扬波尔—一线。

4月24日^①，红军转入反攻，成功地进行了几个战役，解放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进入波兰境内。

总司令部正是在这一进攻高潮时决定进行华沙战役，击溃波兰军队并“用刺刀给欧洲带来革命”。

读者即使不是战略家，也不难发现，红军在长时间作战（基辅战役、诺夫哥罗德—沃伦战役、罗夫诺战役等）后大量减员，许多部队兵力枯竭，而又远离后方，给养和弹药耗尽。在短时间里无法恢复这一切。

总的来说，实施华沙战役的实际兵力不足。“阶级因素”、“无产阶

^① 原文如此，有误。应为6月底，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314页。——译者注



级团结精神”不起作用，波兰无产者拿起武器，去打击“俄国侵略者”。由于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图哈切夫斯基对形势和敌人兵力判断错误，这一战役注定要失败。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为了让他提拔的图哈切夫斯基戴上胜利者的桂冠（而且他本人的功劳也是显而易见的），便说服列宁和总司令加米涅夫，要他们相信必须撤销西南方面军（叶戈罗夫、斯大林），把西南方面军的部队交给西方面军（图哈切夫斯基），以使他能独立击溃波兰军队。不难看出托洛茨基摆脱斯大林的愿望，因为他同斯大林冲突不断，他还想不让斯大林在对波战争取得胜利、革命向西发展时立功。

1920年8月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把与波兰作战的各支部队并入西方面军（司令米·图哈切夫斯基）的决定，同时决定组建独立的南方面军，建议斯大林组建新的方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为此列宁致电斯大林说：

“急 密码 致斯大林 刚才政治局通过了划分战线的决定，以便由您专门对付弗兰格尔。由于有些地区发生暴乱，特别是库班，其次是西伯利亚，弗兰格尔对我们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中央内部愈来愈倾向于立即同资产阶级波兰媾和。我请您非常认真地考虑一下弗兰格尔的情况并提出您的意见。”^①

同时总司令谢·谢·加米涅夫根据中央的指令建议把西南方面军骑兵第1集团军和第12集团军交西方面军指挥，以加强主要的华沙方向上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

不难理解斯大林的处境：攻克利沃夫指日可待，为了几乎要到手的胜利花费了许多力量，突然全都化为泡影。斯大林越过总司令加米涅夫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直接致电列宁。他的电报表明他为他以及整个方面军的功绩没有被充分估计、事情还没有做完却说要同波兰媾和而生气。“收到了您的关于划分战线的短信，政治局本来不该讨论这些琐事。我最多还能在前线工作两个星期，需要休息一下，请物色一个代替我的人。总司令的诺言我一点也不相信，他的这些诺言只能让人上当。至于谈到中央内部的倾向同波兰媾和的情绪，不能不指出，我们的外交有时非常成功地破坏了我们军事上的胜利成果。”^②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9卷第481页。——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9卷第755页注371。——译者注

列宁不再劝说斯大林留任并请他挑选代替他的人。而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坚持自己原来的决定：“西方面军着手实施坚决打击，击溃敌人并攻占华沙地区。因此现在你们的方面军只好暂时不立即攻占利沃夫地区。”

但斯大林和叶戈罗夫置这一命令于不顾。相反，他们命令骑兵第1集团军“在最短期间内大力打击并消灭布格河右岸的敌人，强渡布格河，咬住逃窜的波兰第3集团军和第6集团军残部并攻占利沃夫城。”

骑兵第1集团军未能执行这一命令。

而这时图哈切夫斯基的西方面军的兵力完全消耗殆尽，弹尽粮绝，远离后方，战线过长，成了一盘散沙，难于指挥。

相反，波军司令部把后撤的部队像弹簧一样压得紧紧的。协约国支援他们装备和武器，波军进行了补充动员，兵员得到了充实。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热火朝天的沙文主义宣传——抵御“俄国奴役者”的思想压倒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思想。

波兰军队的反击势不可挡，图哈切夫斯基的战线简直崩溃了。被打垮了的部队纷纷逃命，两个师撤到普鲁士，在那里被扣留了。

列宁在分析失利原因时指出：“当我们逼近华沙城下时，我军已经疲惫不堪，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乘胜前进了；可是，波兰军队在华沙城中爱国主义热潮的鼓舞下，感到自己是在本国作战而得到了支持，有了重新进攻的可能。结果是：战争虽然使我们几乎有可能把波兰彻底击溃，但是在决定性的关头我们的力量不够了。”^①

托洛茨基和图哈切夫斯基认为西方面军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叶戈罗夫和斯大林没有执行把骑兵第1集团军和第12集团军用于打击挤压图哈切夫斯基部队的波军翼侧的命令，但应该公道地指出，骑兵第1集团军离已经后撤的西方面军部队还有300公里，来不及驰援他们，加之骑兵本身陷在利沃夫城下打不赢的战斗中不能脱身。

斯大林说的疲劳和多病是有根据的，战斗中的神经紧张加上极度的体力疲惫，因为西南方面军在很大的一个地区展开，实际上由两条战线构成：一条战线对付波兰，另一条在南方的战线对付弗兰格尔。斯大林简直就在这两条战线之间疲于奔命。

在图哈切夫斯基前线失利之时，弗兰格尔的部队从克里木出击，已经占领大片土地，准备夺取顿巴斯并同顿河和库班地区暴动的哥萨克会师。

斯大林十分重视克里木战线。他不止一次奔赴弗兰格尔战线的重要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315页。——译者注



地段开展工作。6月24日~7月3日，他在锡涅利尼科沃；7月7~11日，他在莫斯科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处与总司令和野战司令部参谋长开会谈调部队增援西南方面军克里木地段的问题；7月14日，他到达位于克里木战线左翼的沃尔诺瓦哈车站；过了一天（16日）他前往马里乌波尔，就地了解亚速海舰队的状况；他还两次（7月19日和31日）去正在激战的洛佐瓦亚车站；8月9~14日，他巡视了西南方面军的克里木地段。

请注意这些日期，它们与西线激战的日期相吻合。还应该注意到，斯大林在很短的时间内（当时还没有飞机）走了这么远的路。

在这次出行时做的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是组建骑兵第2集团军，这支骑兵集团军在后来的战斗中作用巨大。斯大林在这件事上的功劳是显而易见的。

托洛茨基打算安插亲信来取代叶戈罗夫，斯大林保护了西南方面军司令叶戈罗夫。

莫斯科 俄共中央 致托洛茨基

我坚决反对用乌博列维奇或科尔克来取代叶戈罗夫，乌博列维奇对于这样的职位还不成熟，而科尔克不适合担任方面军司令。叶戈罗夫和总司令一起坐失了克里木，因为在弗兰格尔发动进攻前两个星期总司令在哈尔科夫，他没有发现克里木集团军在土崩瓦解就返回了莫斯科。如果必须处分的话，那就应该两个人都处分。我认为，我们眼下找不到比叶戈罗夫更优秀的人选。倒是应该撤换总司令，他在极端乐观主义和极端悲观主义之间来回折腾，自己颠三倒四，还要把方面军司令搞糊涂，不会做一点好事。

斯大林

1920年6月14日

由此可见，斯大林当时的威信极高，他甚至可以提出撤换总司令的建议。

斯大林在图哈切夫斯基的西方面军遭到惨败后收到中央书记处的电报，其中说：

“您和总司令之间的摩擦已发展到……必须当面一起讨论后作出解释，因此请您尽快返回莫斯科。”

8月17日，斯大林回到莫斯科。在中央的谈话看来对他不利，他提出了解除他军事工作的请求。

列宁这一次没有支持斯大林，在党的第九次代表会议上他为总司令和托洛茨基的行动辩护，而谴责了斯大林的行为。

但波兰战线这件不快的事并未动摇斯大林的威信。列宁仍然高度评价他的毅力和果断精神。下面只引用几个文件。

1920年10月29日，他给在巴库的斯大林的电报说：“……协约国一定会进攻巴库。请立即考虑并采取加强通往巴库的水陆要道的工事、调派重炮等措施。请把您的决定告诉我。”^①

1920年11月13日，他给在巴库的斯大林的电报说：“剿匪情况怎样？……您是否认为有可能和平调整我们同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关系？以什么为基础？……加强通往巴库的各条道路的守备工作是否在十分认真地进行？关于土耳其和波斯的情况，也请来电简略报告……”^②

斯大林向列宁报告了关于打击反革命斗争取得胜利、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和亚美尼亚达什纳克党人的阴谋的消息，请求增援。11月他和列宁通过直达线路交换了电报，回答了列宁关于外高加索、波斯和土耳其局势，垂涎阿塞拜疆石油资源的英国人积极活动的问题，再次请求增调援军。列宁就这一请求写信给托洛茨基说：“托洛茨基同志：请立即下令抓紧和加快部队调动……”^③他对斯大林则要他立即提出具体建议并提交政治局审议，要求斯大林赶快返回莫斯科。

当时中央正在为清洗莫斯科和地方机关的工作做准备，列宁指示说：“等斯大林来后再对此事作决定。”

1921年9月1日，列宁给莫洛托夫的信说：“这些问题……应当由政治局迅速全部解决……我想，你们三人（莫洛托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就够了，就可以解决了！”^④

列宁对斯大林这个优秀工作者和志同道合者评价很高，他很关心他，甚至为他的私事操心。

1921年7月4日，他给在梯弗利斯的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说：“您中断了斯大林的休养，使我感到惊讶。斯大林本来还应当至少休养四个或六个星期……”^⑤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9卷第626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50卷第14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27页。——译者注

④ 同上，第51卷第257页。——译者注

⑤ 同上，第20页。——译者注

列宁1921年7月17日给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说：“第一，请告诉我斯大林的健康状况及医生的诊断。”^①

1921年11月，他给阿·萨·叶努基泽的电报说：“叶努基泽同志：拟给斯大林的住房能不能快些腾出来？……”^②

1922年2月13日，他给阿·萨·叶努基泽写信说：“……斯大林的住房。究竟什么时候解决？真是拖拉！……”^③

现在来总结一下斯大林参与国内战争的情况。可以毫不牵强也不夸大地指出，他在许多大战役中正确地估计了形势，坚决对战斗行动的进程施加影响，使战斗因此取得了胜利。

至于夸大或抹黑斯大林在国内战争时期活动的做法，那就听凭这些作者去胡说八道吧，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往常有这样的情况），历史的风将会去伪存真。

五 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人

1922年12月30日，列宁不顾医生的禁令，开始向值班秘书口授《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

接着他断断续续地口授了他在即将于1923年春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后来这些口授的内容被以《给代表大会的信》为题合在一起。由于列宁在这里评价了他最亲密的战友并考虑了谁能取代他的问题，这封信被称作他的“遗嘱”。

列宁尤其准确和深刻地评价了斯大林这个人，因为当时出现了更换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问题。列宁遇刺以及他的患病，迫使他考虑接班人的问题。

为什么列宁在挑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时选中了斯大林呢？

首先应该指出，到1922年时他最亲密的战友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他们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在国内战争年代和已经开始的战后时期干劲十足，能力非凡。

在政治局委员中托洛茨基是列宁接班人的第一人选。他担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主管军事问题，在党内有着“杰出革命家”、“红色拿破仑”的名声，他在军队中有许多战友和被提拔的部下。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1卷第75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52卷第83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271页。——译者注

但是列宁很了解托洛茨基这个孟什维克中派分子革命前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见风使舵的整个活动，加之托洛茨基十分自大，列宁谈到托洛茨基时指出：“他个人大概是现在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①

而托洛茨基公开地迫不及待地想要掌权。因此尽管他积极性很高，很有才能，善于表现自己，善于慷慨陈辞，列宁却不能推荐他当自己的接班人。而且托洛茨基和列宁的私人关系从来不亲密，下面的一个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当列宁去世时，托洛茨基在苏呼米休养。尽管列宁的葬礼定于1月27日，即他去世后过五天才举行，托洛茨基却没有返回莫斯科向党的领袖表达最后的敬意。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关系也不是同志式的。这两个人不止一次地发生冲突，他们不是同心协力地工作，而是要求互不干预对方的事务。

当彼尔姆失陷，东方面军出现灾难性形势时，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前去整顿秩序，而不让对前线失利负有责任的托洛茨基插手。当南方面军与邓尼金的斗争形势恶化时，被派往那里的是斯大林和其他中央委员，他们又一次提出了要托洛茨基这位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不插手南方面军事务的问题。

从一切方面都可以看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相互不能容忍。他们之间一直暗中进行着较量，但列宁缓和了、有时压制了这场较量，这才使这场较量没有达到异常激烈的程度。列宁不是毫无缘由地写道：“……我想，从这个角度（对纯粹个人特性的一些看法）看，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②

季诺维也夫在其革命活动中与列宁最接近。列宁本人指出过这一点。但是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起在1917年向资产阶级透露了筹划武装起义的情况后，列宁直截了当地声明说，他不再把他们两人当作同志。

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一样强烈希望能发挥党的领袖的作用。革命前他把自己置于列宁身边、和他平起平坐的地位，而1919年他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后，不止一次地试图把自己当成世界革命的领袖。他交给列宁各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任务，强调了独立性，把自己和党对立起来。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39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338~339页。——译者注

至于加米涅夫，列宁认为这个人尽管有非凡的能力和组织才能，却并不适合担任党内的最高职务。他在斗争的激烈关头有可能丧失原则，发生动摇，成为工贼。列宁写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①

加米涅夫在革命后重又获得列宁的信任，列宁在晚年委托他完成一系列重要任务。但是他是一个已经玷污过一次自己名声的人，因此列宁不能托付加米涅夫来继续进行他的事业。

所以在政治局委员中，除了斯大林，没有一个列宁可以信赖、让其担任党的领袖的人。也有一些年轻的党中央委员才能和精力过人，但列宁也不把他们看作自己的接班人，只认为他们将来有这种可能性。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口授说：

“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我想就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谈几句。依我看，他们是最杰出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对他们应当注意下列情况：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繁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

其次是皮达可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人，但是太热衷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以致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指靠他的。

当然，我对两人作这样的评语是仅就现时情况来说的，而且还假定这两位杰出而忠诚的工作人员得不到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并改变自己的片面性。”^②

也许作出这样结论的原因是列宁身边的中央委员人数相当少（一共15人）。中央委员会人数少是当时党的领导层的弱点之一。稍后列宁指出了这一弱点，甚至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100人，而中央监察委员会人数增加至几百人，但这已经是1922年的事了，当时列宁已卧病在床，不能对干部的挑选和配置施加应有的影响。

列宁力求保证他事业的继承性和共产主义革命思想不可动摇，防止他的学说遭到歪曲和修正。而这方面的直接威胁首先来自托洛茨基以及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39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339~340页。——译者注

紧随其后的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

斯大林比其他人更适合当接班人，因为他从来没有提出过自己的理论，保持忠于列宁的思想，坚定地追随列宁，即使犯了错误，也迅速纠正，不错上加错。可以指望他不会背离列宁的革命道路。

列宁认为斯大林是可以捍卫自己，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不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让步的人。列宁认为斯大林是“十分忠诚和活动能力很强的革命者”，是一个勇敢坚定的人。斯大林天资聪慧，记忆力好，意志坚强，有组织才能并且干劲很足。但是……

12月22日，克鲁普斯卡娅和斯大林发生争吵。斯大林受政治局委托负责监督执行列宁的治疗制度。斯大林发现克鲁普斯卡娅无视医生的禁令允许列宁口授文章，便对她提出意见。她对他的回答措辞相当激烈。斯大林指出，她不仅是列宁的妻子，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她如果违反纪律，监察委员会将追究她的责任。

据列宁的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说，克鲁普斯卡娅很生斯大林的气，在家里歇斯底里地发作起来，“大哭一场，在地板上打滚”。

第二天克鲁普斯卡娅给加米涅夫写信说：

“列夫·波里索维奇：由于我记录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医生许可口授的一封信，斯大林昨天竟然对我极其粗暴无礼。我入党不是一天了，30年来从未听见任何一位同志对我说过一句粗话，我珍视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并不亚于斯大林。现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什么可以同伊里奇讲，什么不可以讲，我至少比斯大林清楚。我求助于您和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这两位最亲密的同志，请保护我，不要让人粗暴地干涉我的私人生活，无端辱骂和威胁我。斯大林竟然以监察委员会威胁我，我并不怀疑监察委员会会作出一致的决定，但是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闹这种愚蠢的纠纷。我也是一个活人，我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点。”^①

3月5日克鲁普斯卡娅把她与斯大林发生争吵一事告诉了列宁。

列宁马上口授了标有“绝密”字样的信，并抄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尽管地向您表示同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703页注619。——译者注

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顺致敬意！

列宁^①

在事件发生后过去了两个月，克鲁普斯卡娅的气愤平息了，她担心列宁同斯大林决裂，请求秘书沃洛季切娃不要把这封信寄给斯大林。但秘书不愿违背列宁的请求，还是把信寄给了斯大林。

1923年2月1日斯大林就请求政治局解除他“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同志规定的制度”的权力。斯大林收到列宁严厉的来信后于3月7日口授了回信。他解释说，发生了误会，如果需要，他可以收回说过的话，但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我错在哪里，究竟要我干什么”。

列宁没有读到斯大林的回信，他已经顾不上，他的病情恶化了。列宁的病情十分严重，以致他请求结束他难以忍受的痛苦，给他服用氰化钾。

1923年3月21日，斯大林致信政治局：

“绝密

致政治局委员们

3月17日（星期六）乌里扬诺娃（娜·康·）同志以绝密的方式转告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斯大林的请求’，要我，斯大林，负责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弄到并给他一份氰化钾。娜·康·在同我的谈话中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忍受着极度的痛苦’，‘再也无法活下去’，她一再坚决要求‘不要拒绝伊里奇的请求’。鉴于娜·康·特别坚持，鉴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我同意（在娜·康·同我谈话时弗·伊·两次把她叫去，激动地要求“斯大林同意”），我认为不能加以拒绝，因此说：‘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放心，相信在需要时我会毫不犹豫地满足他的要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真的放心了。

但是我不得不声明，我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完成弗拉基米尔·伊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55页。——译者注

里奇请求，不得不拒绝这一任务，不管它多么人道多么必要，为此特告知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

约·斯大林

1923年3月21日”

政治局委员们对这封信的反应如下：

“已阅。我认为斯大林的‘犹豫不决’是正确的。应该在严格的政治局委员范围内交换意见。不要秘书（技术秘书）参加。托姆斯基。

已阅，格·季诺维也夫。莫洛托夫。已阅，尼·布哈林。托洛茨基。列·加米涅夫。”

斯大林看来在同一天又写了一封信：

“绝密

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

刚才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来电话，以秘密的方式告诉我说伊里奇状况‘很糟’，他要氰化钾，务必给他。她说，她想给他一些钾，但‘缺乏毅力’，因此要求‘斯大林支持’。

斯大林”

“无论如何不能给。费尔斯特能提供希望——怎么可以呢？即使没有这个希望也不行！不能，不能，不能！”

格·季诺维也夫、列·加米涅夫”

大家知道，列宁于1924年1月24日去世^①。关于他的死因有正式的医学结论。

但是托洛茨基出于对斯大林的仇恨而昏了头，于1940年10月^②给美国《生活》杂志写了一篇文章，歪曲了以上事实，再一次表明了他冒险家的本性。他在文中说斯大林“加速了领袖的死亡”，暗示斯大林下了毒。连对苏联并不友好的《生活》杂志也“因为没有确凿的事实”

① 原文如此，有误，应为1924年1月21日。——译者注

② 原文如此，似有误，托洛茨基于1940年8月20日遇刺去世。——译者注

而拒绝刊登这篇“造谣文章”。其他著名的美国杂志也拒绝发表这篇文章。但托洛茨基还是在1940年8月在一本不出名的小杂志《自由》上发表了 this 捏造的谎言。

托洛茨基出于揭发的狂热歪曲事实说：“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没有把列宁对他的请求告诉克鲁普斯卡娅和列宁的妹妹玛丽亚。她们俩在病人的病榻前操劳，如果列宁确实请求过斯大林，如果他确实想报告执行病人请求的情况，那么首先他该告诉病人的妻子和妹妹。事实上她们俩都是在列宁去世后才知道这件事的。”（托洛茨基，列·达·：《斯大林评传》第2卷第256~257页）

如上所述，正是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把列宁这个非常的请求转告斯大林的。托洛茨基的谎言昭然若揭。

斯大林不仅为列宁的治疗做了可能做的一切，而且在领袖去世后尽力维护他的英名。正是斯大林建议保存人们现在在陵墓中看到的列宁的遗体。

在政治局小范围的会议讨论列宁葬礼时，意见发生了分歧。斯大林坚决反对火葬。

“应该对列宁的遗体作防腐处理。这方面现在有最新的方法，因此列宁的遗体可以保存许多年。这样做与俄罗斯古老的习俗也不抵触。可以把他的遗体放在专门的墓室内。”

托洛茨基曾大力摧毁俄国教堂和宗教信仰，他马上对这个建议表示强烈反对：

“对列宁遗体作防腐处理，这意味着打着共产党的旗号恢复俄国东正教崇拜圣尸的做法！”

布哈林支持他的看法说：“把列宁做成木乃伊，是对他的亵渎，这违背了他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加米涅夫建议说：

“我以为，如果我们以几百万册的印数出版列宁的著作集，这将对最好的纪念。我反对对遗体作防腐处理，这是神父习气的余风。”

这次会议对这件事没有作出具体的决定，只有将它留待代表大会处理。

1月26日斯大林在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代表党发表了广为人知的忠于列宁的誓言。斯大林在结束讲话时说：

“这几天你们已经看见有几万几十万劳动者来拜谒列宁同志的灵柩，过一些时候你们会看见有几百万劳动者的代表们来拜谒列宁同志的陵墓。用不着怀疑，在几百万劳动者的代表们后面，一定会有全世界各地几千万、几万万劳动者的代表们接踵而至，以证实列

宁不仅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领袖，不仅是欧洲工人的领袖，不仅是殖民地东方的领袖，而且是全球整个劳动世界的领袖。”^①

代表大会采纳了斯大林的建议：把彼得格勒改称为列宁格勒，在莫斯科红场上为子孙后代修建安置列宁遗体的陵墓，并在各加盟共和国的首都、列宁格勒和塔什干建造纪念像。

列宁在去世前不久发现，从各方面来看，他对斯大林优缺点的评价有误。克鲁普斯卡娅由于她与斯大林争吵并向列宁告了斯大林的状，起了不好的作用。列宁受这次告状的影响，写了《对1922年9月^②24日一信的补充》，他在其中建议解除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并任命另一个人取代他。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就可以，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③

列宁在建议取代斯大林时，并没有提出另一个人选，1924年5月《给代表大会的信》全文向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宣读后，列宁的建议未被采纳。

各代表团，而不是大会讨论了这封信。代表大会代表们明白，主要问题是不让托洛茨基掌权，因为托洛茨基在列宁在世时就公开向列宁的中央委员会宣战，指责列宁的近卫军蜕化变质。

有谁能对抗托洛茨基呢？只有具有钢铁意志、绝不调和的性格、忠于列宁主义的人才能。当时斯大林正是这样的人，在中央委员中没有另一个人。列宁的意见对每一个党员来说都是神圣的，但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考虑了国内和党内的形势，决定让斯大林留任总书记。正像列宁预见的那样，在他去世后党内右派和左派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斗争。反对派主要打击斯大林领导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集团。

在党的第十二次和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后，斯大林在党中央全会上—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73页。——译者注

② 原文如此，有误，应为“12月”。——译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40页。——译者注



再提出关于解除他总书记职务的问题，但是多数中央委员不同意这样做，再次选举他为总书记。他们需要斯大林的坚强意志来对付追逐权力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进攻。

六 主要的政敌

(最初的经历)

下面要多谈一下斯大林在争夺权力斗争中的主要对手托洛茨基。因此我现在像在本书开头介绍斯大林的经历时一样，必须简单地谈一谈斯大林主要政敌的情况。

莱布·达维多维奇·勃朗施坦^①1879年生于乌克兰赫尔松省亚诺夫卡村一个土地承租人的家庭里。他受过中等教育，在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读过书。他天赋很高，记忆力出色，擅长讲演，希望成为一个著作家，因此寻求与敖德萨的浪荡派人士的接近。他那时穿着浅蓝色的短上衣，戴着时髦的草帽，手里拿着一根小手杖。当时阅读革命书籍、议论关于自由和人民的问题是件时髦的事，托洛茨基也热衷于赶这样的时髦，因此1898年1月（在他17岁时）他和一批从事革命活动的人一起被捕。当时他就表现出喜欢自我吹嘘和搞冒险主义：他竟然在布特尔监狱里举行了由拉比主持的按宗教仪式进行的婚礼。他与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结了婚，婚后索科洛夫斯卡娅跟随他去了流放地，在流放地她在六年中生两个孩子。但是托洛茨基天性好动，不愿在流放地生活下去，他丢下妻子和孩子逃到国外去了。

托洛茨基在法国同有钱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关系密切。他精力充沛，聪明过人，能说会道，他的讲话博得了躲在幕后的政治大鳄的好感，他们在他身上押了赌注。

托洛茨基再次结婚，这一次娶了百万富翁日沃托夫斯基的女儿为妻。日沃托夫斯基和银行家瓦尔堡、希夫一起为俄国的革命动乱提供资助。

下面引一段当时和后来都是托洛茨基最亲密的志同道合者之一——拉柯夫斯基说的话，以证明我这样说不是毫无根据的：

“我亲自参与了这一切。但我还可以告诉你们更多的情况。你们知道是谁资助十月革命的吗？‘他们’（拉柯夫斯基说的“他们”是指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人。——本书作者注）资助了十月革命，

^① 托洛茨基的原姓名。——译者注

特别是通过资助过1905年革命的银行家，即雅科夫·希夫和瓦尔堡兄弟，也就是说通过银行界巨星，通过五家银行之一——联邦储备银行成员——‘库恩-列布’银行进行的，其他的美国和欧洲的银行家，如胡根、施瑞埃尔、布赖顿、阿斯贝格以及来自斯德哥尔摩的‘尼阿银行’也参与了这件事。我去过斯德哥尔摩，参与了转移资金。在托洛茨基没有来到之前，我是革命方面惟一的中间人……

……不为人知的托洛茨基通过什么方式一举获得了比最老的最有影响的革命家更大的权力呢？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很简单，他结了婚。他的妻子谢多娃与他一起回到俄国。你们知道她是怎样的人吗？她是日沃托夫斯基的女儿，而日沃托夫斯基是银行家瓦尔堡兄弟、雅科夫·希夫的股东和亲戚的合伙人，即我说过的曾资助过1905年革命的财团的合伙人。这就是为什么托洛茨基一举成了革命领导人的原因。这才是了解他这个人真正面貌的关键。”

财务上的赞助人——得知1905年俄国即将爆发革命的消息，马上让托洛茨基回到俄国，命令他们的犹太复国主义的“第五纵队”支持和服从他。托洛茨基在他的《我的一生》一书中对这一情况作了略有不同的解释：

“1905年2月我回到俄国。其他侨居国外的领导人直到10月和11月才回来。在俄国国内的同志中没有一个我可以向之学习的人。相反，我不得不亲自承担起导师的角色……我以为，1905年事件显示出我的革命直觉，在我后来的生活中能够依靠这一直觉强有力的帮助……我十分负责地说，我在分析整个政治形势及其革命前景方面没有犯过重大的判断错误。”

正如有些爱开玩笑的人所说的，这样的人不会死于谦虚。但上面引用的是托洛茨基本人说的话，没有必要去驳斥他目空一切自我评价。

1905年革命中托洛茨基担任当时成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1905年革命失败后他流亡国外。在国外他的赞助者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们”得出结论，要继续支持托洛茨基这个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并千方百计诋毁托洛茨基的主要竞争者列宁的声誉。

为了提高托洛茨基的声望，他们组织托洛茨基在欧洲旅行和讲演，目的是从社会党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一切“左”倾分子中吸收拥护者。“他们”为未来的革命培养自己的领袖并慷慨地资助托洛

茨基的司令部和活动。

托洛茨基在回到俄国之前的一切讲话和文章都在涉及革命运动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上同列宁进行争论，他不断挑起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论战。

1913年托洛茨基在谈到列宁时是这样写的：“目前列宁主义的大厦整个建筑在谎言和伪证之上，包含着自身腐败的有毒因素。”“列宁是俄国工人运动中一切落后现象的职业得利者。”

1916年战争仍在进行，托洛茨基作为失败主义者的言行是具有刑事犯罪性质的，因此他被强制驱逐出法国——俄国的同盟国。“老板们”决定利用这件事，把他们的“宠儿”介绍给美国同行。托洛茨基在美国也受到喜爱，他开始出版《新世界报》。用谁的钱办的呢？当然是用他同族的银行家的钱。顺便提一下，当时另一个反对列宁的人——布哈林——也开始与托洛茨基合作。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美国一直干到俄国二月革命爆发，二月革命后“他们”立即命令托洛茨基迅速返回俄国，掌握革命领导权，以便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意图。

途中发生了意外：托洛茨基在加拿大被捕。“他们”立即采取措施，由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亲自出面请求，托洛茨基才获释。这有力地表明，克伦斯基和托洛茨基的主子是同一些人。

托洛茨基在彼得堡开始从与他一起归国的“侨民”和各种极左分子中组建自己的党。但不久他确信布尔什维克控制了革命形势，便忘掉了多年来同列宁的分歧，申请加入俄共（布）。

列宁努力把一切政党和政治派别在为建立苏维埃政府的斗争中联合成统一战线。许多观点（和血统）相同的人支持托洛茨基，他不仅被接纳入党，而且甚至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拉柯夫斯基关于这个问题极其露骨的证词十分有意思，他说：“托洛茨基有可能‘以难以察觉的方式’占领整个国家机关。多么奇怪的盲目无知！这就是被如此歌颂的十月革命中的实际情况。布尔什维克拿了‘他们’交给他们的一切。”

此后精力充沛、能说会道、粗野无礼、很爱面子、不择手段的托洛茨基开始了令人头晕目眩的飞黄腾达（仍然得到了同一血统的弟兄们的支持，这一点不应忘记）。他很快当上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实际上是共和国一切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我们不去分析国内战争时期各个战场上的战斗行动，托洛茨基打过胜仗也吃过败仗。总的来说，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站稳了脚跟，击退了国内外众多的敌人，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在这方面无疑也有功劳。

他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目击者证明说，托洛茨基以其浑厚洪亮的

噪音、动听的语言、燃烧的热情和令人折服的革命逻辑简直吸引和迷住了听众。连几分钟前反对他的人都在他的讲话影响下转变了，决心跟着他去赴汤蹈火。

“自己人”对他敬若神明，而且也不能不敬若神明，因为他在集会上冲动时十分坦率地喊出了诅咒沙皇俄国的话：

“如果我们赢得革命，粉碎俄国的话，那么我们将在俄国墓穴的废墟上强化政权，成为让全世界都为之下跪的强大力量。我们表明什么才是真正的政权。我们将通过恐怖本能地血洗一切……而我们穿着皮上衣的青年——教德萨和奥尔沙、戈梅利和文尼察钟表匠的儿子们——能十分出色、十分了不起地复仇！他们以极大的乐趣从肉体上消灭俄国知识分子——军官、工程师、教师、神父、将军、农学家、院士和作家！”

托洛茨基在津津乐道“钟表匠的儿子们”凶恶地枪杀军官时指的不就是雅科布松吗？正是雅科布松毫无缘由地枪杀了前杰出的军官、俄国天才的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雅科布松亲自判处古米廖夫死刑时并不是法官，而只是个侦查员。他在四次简短的讯问时并没有查明古米廖夫的任何罪行，但却写了：“结论：……我认为必须对尼古拉·斯坦尼斯拉沃维奇·古米廖夫（雅科布松太匆忙了，连古米廖夫的父名都弄错了，把“斯捷潘诺维奇”写成了“斯坦尼斯拉沃维奇”）这个人民和工农革命公然的敌人处以极刑——枪决。”

于是古米廖夫被处死了。

在这里我要提到许多国家形成的传统：在一个伟大历史人物统治时代终结或走下政治舞台后，过一段时间便开始有各种回忆录或揭露不久前事件和人物的作品出版。现在这些书不必再因揭露了过去幕后事件的种种秘闻以及以前保密的手段和动因而担心受到惩罚或伤害。

通常这些都是相当真实的文献。我这样说是为了不加证明和论证地引用这些回忆录中的几段话。

广为人知的英国间谍布卢斯·洛克哈特因策划反苏阴谋被揭露并被驱逐出俄国，他在他的《英国间谍》一书中写道：“……英国间谍机关打算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托洛茨基和列宁的意见分歧。”

洛克哈特与托洛茨基建立了经常的联系，他常常直接在托洛茨基的办公室里与他见面（托洛茨基当时是外交人民委员），从他那里获得“关于政府情况和对各种问题决定的第一手信息”。洛克哈特在他的书中不加掩饰地谈到他“想和托洛茨基一起组织大规模叛乱”。



1918年3月，英法情报部门策划派军队在摩尔曼斯克登陆，由英国陆海军武官克罗米领导这一行动。行动计划预定在摩尔曼斯克集结相当数量的白卫分子并把捷克斯洛伐克军调到那里去。这个军当时在乌克兰，应通过西伯利亚和远东运往欧洲。这个军共有5万人。密谋分子想把捷克人用于暴动。

洛克哈特为了实现这个计划而请托洛茨基帮助，据洛克哈特说，托洛茨基“同意把捷克军派往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托洛茨基表明有决心同协约国合作……他一贯向我们提供我们要的东西，想方设法在摩尔曼斯克与协约国更好地合作。”

这一切对苏维埃共和国有可能造成事态严重恶化的危险。捷克斯洛伐克军当时已经准备好发动反苏维埃叛乱，可能打到莫斯科和彼得格勒附近。

列宁坚决禁止把捷克斯洛伐克军调往摩尔曼斯克，从而防止了托洛茨基和洛克哈特实施他们的图谋。

1918年夏，捷克斯洛伐克官兵在途经西伯利亚时发动叛乱，占领了许多十分重要的城市。他们回师西进，占领了乌拉尔和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城市，占领了萨马拉和塞兹兰。

由于托洛茨基的“帮助”，这一切本来可能是在离彼得堡不远的摩尔曼斯克发生的（本来就是这样打算的）。

1918年7月6日，社会革命党人布柳姆金刺杀了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为了重新挑起与德国的战争）。这次行刺成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的开始。他们逮捕了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准备冲进正在举行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大剧院。

但是列宁抢先一步，下令逮捕所有在大剧院里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阴谋失败了。全俄肃反委员会逮捕了許多人。但应该指出某些细节：萨文柯夫策划叛乱用的是洛克哈特和赖利、法国大使努兰斯和捷克民族主义者马萨里克的钱。

托洛茨基在谈到是谁杀害了米尔巴赫并从而发动了大规模反革命行动时说的话很有意思：“……他是我秘书处的成员，亲自与我保持联系……他是左派社会革命党反对派的成员，参与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叛乱。是他杀死了德国大使米尔巴赫……每当我需要有勇敢的人时，布柳姆金总是由我调遣。”

但是这也不是洛克哈特所说的他“想和托洛茨基”一起搞的阴谋。

后来这件事被称作“大使们的阴谋”，由洛克哈特和赖利策划。顺便提一下，赖利（罗森布吕姆）是敖德萨人，一个爱尔兰船员和敖德

萨犹太人的儿子。他是英国间谍、经验丰富的情报人员，会使用七种语言。正是赖利制定了“大规模叛乱的计划”。

这个计划大胆而实际，它预计1918年8月28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大剧院举行非常会议（确切的日期是从什么地方知道的呢？这可是要由政治局决定的！）时，赖利将让用200万卢布收买的克里姆林宫警卫队长派拉脱维亚步兵（得到相应指示的）守住各个门口。那时这些“警卫”会根据一定的信号关上各道门，把武器瞄准会议的参加者。预定由赖利领导的特别行动队将冲上舞台，逮捕党的领导人，当场杀死列宁。同时为叛乱作好准备的6万军官将在全城开始行动，而协约国军队和尤登尼奇的队伍将扑向彼得堡。

计划考虑得很周到，做了细致准备，还考虑了社会革命党人6月叛乱失败的教训。

这一回赖利、洛克哈特和其他的间谍干得十分卖力。赖利有一个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证件，他可以到处出入。他的间谍可以混入克里姆林宫、红军司令部，为他掌握必要而充分的信息。

但叛乱失败了。捷尔任斯基比英国阴谋分子棋高一着，把他们全都逮捕了，并举行了审判，洛克哈特和其他英国间谍都被投入监狱。后来捷尔任斯基用他们换回了被英国逮捕的布尔什维克（其中包括未来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马·李维诺夫）。

洛克哈特很生托洛茨基的气。在他的那本书《英国间谍》中在阴谋计划失败后对托洛茨基作出的最后评价是：“托洛茨基根本不能同列宁相提并论，就像跳蚤不能同大象相提并论一样。”

还需要对这番话再加另外的评论吗？

我们暂时不给托洛茨基戴上令他难堪的叛徒的帽子。我们要根据最可靠的论据——事实——来对他作出最后定评。

老实说，他不平凡的、多方面的政治活动中的许多事情并没有给他带来光彩。就拿布列斯特和约来说吧。

在苏维埃共和国十分危急的关头，列宁看到出路只有一条：为了拯救苏维埃共和国，应该同德国签订和约。中央委员会多次讨论议和问题。当时季诺维也夫、索柯里尼柯夫、斯大林、阿尔乔姆（谢尔盖耶夫）都坚决支持列宁的观点，而托洛茨基、布哈林、乌里茨基则主张进行革命斗争，而且呼吁世界革命的支持。斯大林在论证必须单独媾和时说：“西方没有革命运动，没有事实，只有潜在的可能，而对潜在的可能不能加以考虑的。”他说得对，虽然列宁不同意他后半部分的表述。

以托洛茨基为首的苏维埃代表团来到德军霍夫曼将军大本营驻地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托洛茨基有中央委员会和列宁关于无论如

何都要签订和约的指示。但他不仅拒绝签订停战协定，反而别有用心地吓唬德国人，号召欧洲无产阶级发动反对本国政府的革命。托洛茨基认为签订和约是对世界革命的背叛。他提出了“不战不和”的口号，宣布复员军队，从而为德国军队长驱直入、进入俄国纵深地带彼得格勒和乌克兰敞开了道路。列宁把“犹杜什卡·托洛茨基”的行径称为发疯。他的背信弃义使国家损失巨大：德国人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全线转入进攻。

列宁带领代表团到达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被迫签订了屈辱性的布列斯特和约，把波兰、乌克兰、芬兰、高加索割让给德国人，并且赔偿了大量黄金、石油、煤炭、粮食及其他天然资源。

莱布·勃朗施坦究竟在干什么？我们在这里直呼他的真名，因为他在这次背叛中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他同那些以一目了然的代词“他们”掩饰起来的人沆瀣一气，执行这些人的指示。

为什么列宁、中央委员会和党没有追究托洛茨基的责任呢？列宁也许出于他的修养不愿表现出是在报复托洛茨基入党前多年对他的侮辱。

托洛茨基还有一个可靠的救生圈——他与许多志同道合者有着血缘关系，他们一致为托洛茨基辩护，又一次侈谈世界革命。持反对派立场的同伙布哈林甚至说：“我们认为，为了世界革命丧失现在已成了纯形式的苏维埃政权可能是合理的。”

但托洛茨基还是被解除了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他公开承认错误，并保证与列宁无保留地合作。总之，他脱了身。当时形势紧张，必须制止德国人的进攻。似乎是为了让托洛茨基改正错误，他被任命为陆军人民委员、革命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作为军事活动家的功绩被大大夸大了。“他们”很操心这一点。全世界都知道托洛茨基，他在外国报刊上是第一号人物，他被称作“红色拿破仑”。叶戈罗夫、伏龙芝、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和其他红色统帅在战斗中取得的胜利全都算作托洛茨基的功劳。

但应该客观地说，托洛茨基绝对是一个平民。他本人就承认说：“我一向认为作家、记者、画家是只有天才可以进入的更具魅力的世界。”要不是有了革命，他大概不会在这魅力无穷的世界里度过一生，而且也不会由于具有不容置疑的才能而取得不小的成就。

但是……我简单地讲一讲这个“但是”之前发生的事情。托洛茨基接着脱下平民的外衣，换上长襟军大衣和刷得光洁鉴人的皮靴，在皮带上挂上“毛瑟枪”，开始对军队发号施令。他坐在舒适的铁甲列车里，由“穿着皮上衣的男孩”、“敖德萨钟表匠的儿子们”组成的许多警卫保护着他。他对战略战术等军事问题一窍不通。

各国各大洲与托洛茨基血缘相同的人对他在国内战争战线上取得的胜利大吹大擂，因为他们当时掌握着各种报刊。

档案文件说明了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十分简短地分析一下国内战争中的主要战局。

1919年夏天，当高尔察克向伏尔加河挺进时，托洛茨基说，高尔察克并不危险，应该从东方调部队来打击邓尼金。党中央、列宁不同意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意见，他们否定了他的计划，指出这样做会为高尔察克敞开从伏尔加河地区通向莫斯科的道路。托洛茨基被解除了对东方面军作战的领导。大家都知道（我不去详谈），是斯大林扭转了察里津地区的形势。

1919年秋天，托洛茨基关于穿越不忠于苏维埃政权的顿河和库班哥萨克地区对新罗西斯克实施突击、进攻邓尼金的计划也被否定了。

党中央又一次把自己的人——叶戈罗夫和斯大林派往南方面军，他们带去了新的计划，取得了胜利。中央解除了托洛茨基对南方面军战役的领导。

1920年托洛茨基和他的宠儿图哈切夫斯基在波兰战线上发动的战役失败了，造成了人力、物力和领土的损失巨大。但托洛茨基不是去关心预备力量，而是更多举行群众集会，声称红军要用刺刀给欧洲带来革命。

托洛茨基本人证明我们上面说的话是客观的，他说：

“当代的历史研究著作常常说，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没有执行列宁的指示、托洛茨基在南方面军违背了列宁的指令、托洛茨基在东方面军与列宁的意见背道而驰等等。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列宁不可能亲自给我指示，当时党内的关系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们两个人都是中央委员，一切意见分歧都由中央委员会解决。如果我和列宁之间产生某一意见分歧（这样的意见分歧发生过多次），问题便自动交由政治局讨论，政治局作出决定。因此，从形式上看这方面根本不存在我违背列宁指令的问题。没有一个人敢说 I 违背了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我们再一次请读者注意托洛茨基的“谦虚”，但主要的是请大家注意他并不否认重大失利的事实。

沙皇军队上校瓦采季斯是托洛茨基最亲密的助手之一。他曾担任过托洛茨基属下的总司令一职。苏维埃肃反工作者查明，瓦采季斯参与了反对红军司令部的阴谋，因此他被撤了职。



如果继续引用上面已引过的托洛茨基《我的一生》中的话，那就可以看出托洛茨基的话里“不易察觉的”讥讽。他说：“瓦采季斯在灵感来时下发命令，因此，仿佛人民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都不存在了……”

托洛茨基领导各个方面军，拥有巨大权力和声望，他实际上是仅次于列宁的第二号人物。但这样高的地位也不能使他满足，因为他回到（被派到）俄国来不是为了充当第二号人物的。此时他离国家元首的地位只有一步之遥，但在这条道路上有两个人让他无法实现朝思暮想的计划，他们是列宁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列宁作为党和革命的领袖、政府首脑，得到了全俄国和全世界的公认，他拥有党内罕见的威望和人民的爱戴。托洛茨基在同列宁的公开竞争中获胜的机会很少，因此决定用久经检验的可靠办法来“收拾掉列宁”。这当然得做得十分小心，为的是不损害未来党的领袖和国家元首的声誉。托洛茨基只是下达命令，而执行者用社会革命党人的政治行动来掩饰对列宁的刺杀，据说是社会革命党人把手枪交给了这个党的党员范妮·卡普兰的。

行刺只成功了一半：列宁还活着，但作为全国党务和国务领导人却几乎失去了工作能力。托洛茨基获得了更多的权力。

斯大林当时并没有被看成是竞争者，他的总书记职务只被看作是党的办公厅的总管。政治局中多数人支持托洛茨基，他认为不难让斯大林下台，但只要列宁还活着就不能这样做，因为是列宁提拔斯大林担任这个职务的，他会保护他。

在托洛茨基走向独揽俄国大权的道路上另一个同样重大的障碍是沙皇。沙皇已经被关了起来，正在叶卡捷琳堡，当时正进行国内战争，白军包围了年轻的共和国。一旦白军取胜，专制制度及其象征尼古拉二世将要复辟，尼古拉二世是国家的合法元首，他将重登皇位。

因此，应该“收拾掉沙皇尼古拉”。于是托洛茨基下达了秘密命令（1935~1938年的法庭审判揭露并证实卡普兰行刺列宁和杀害沙皇全家都是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进行的）。

执行托洛茨基枪杀沙皇全家命令的，是可以信赖的人，即他的志同道合者。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亚诺什·索洛蒙·莫夫舍维奇（即斯维尔德洛夫）下达了命令。执行者是扬克利·魏斯巴特（他也叫别洛博罗多夫，是乌拉尔苏维埃主席）、雅科夫·莫夫舍维奇·尤罗夫斯基（他亲手枪杀沙皇）、沙亚·伊萨科维奇（他也叫戈洛晓金）、京库斯·拉扎列维奇·魏纳等人。

1918年7月12日，乌拉尔苏维埃在别洛博罗多夫（魏斯巴特）主持下决定：不经审判处死罗曼诺夫全家。7月16日深夜，沙皇全家被

处决。1918年7月18日，别洛博罗多夫把既成事实报告了斯维尔德洛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称赞了乌拉尔苏维埃的行动。

托洛茨基没有忘记别洛博罗多夫的这个功劳，1919年3月“提升”了他，他当选为中央委员。1919年4月别洛博罗多夫和斯维尔德洛夫一起，得到托洛茨基的赞同，实施了“没收富农的土地和财产”的行动。他在顿河地区镇压了韦申斯卡亚的暴乱，杀戮哥萨克，因为他持有授予他无限权力的委托书，委托书中让他“尽快镇压这一暴乱”，把他认为应该惩处的人“撤职并交革命法庭审判”。

托洛茨基不断提拔他的心腹：1921年起别洛博罗多夫任俄罗斯联邦内务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1923~1927年任内务人民委员。

因此，这个托洛茨基分子应对那一时期镇压俄罗斯人的行动负责。

B. 西罗特金的文章《再谈空白点》（1989年《星期》杂志第24、25期）引用了格·雅·索柯里尼柯夫给尼·尼·克列斯廷斯基信中的一段话：“别洛博罗多夫在捷尔任斯基不在时……试图像在叶卡捷琳堡那样行事。”这暗示什么呢？西罗特金教授明确地说：“‘别洛博罗多夫的全班人马’都来了，开始源源不断地炮制起诉党内持不同意见者的案件。”

别洛博罗多夫认为当时什么人是持不同意见者呢？这从改革时期撰写的并于1995年发表在B. 涅克拉索夫《13个“钢铁般的”人民委员》一书中的别洛博罗多夫传记中可以看出。

“亚·格·别洛博罗多夫在担任内务人民委员期间在政治上较多支持托洛茨基的观点而不是斯大林的立场。1923年10月他和其他著名的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一起签署了托洛茨基派的‘46人声明’，这一声明反对‘党内派别专政体制’即反对斯大林的拥护者。

1927年亚·格·别洛博罗多夫还签署了两个托洛茨基派纲领：夏天签署了‘83人’纲领，1927年12月3日签署了托洛茨基反对派121人声明。两个纲领在党和国家十分重大的问题上都不同意斯大林的立场。

有一个事实说明亚·格·别洛博罗多夫同列·达·托洛茨基关系密切，这就是托洛茨基在其自传《我的一生》中提到的1927年的一件事：‘我已经不在克里姆林宫里居住，而住在我的朋友别洛博罗多夫的住所里，他仍担任内务人民委员。’”

因此，杀害沙皇一家的凶手自觉地为托洛茨基扫清了夺取权力的道

路，是他亲密的战友。

既然我很快就谈到了托洛茨基信任的战友，那么再添上几笔，勾画一下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肖像。他也是精力十分充沛、精明能干的人，列宁对他评价很高，甚至把他称作“革命的发动机”。应该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是极为复杂和麻烦的，在当时要组织执行政治局、政府、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决议，其困难是难以想像的，而斯维尔德洛夫却完全能胜任，赢得了普遍的尊敬。但工作使他心力交瘁，他于1919年死于肺结核。另一种说法是，一个工人因为他处决了沙皇一家而在莫斯科刺杀了他。至今仍能见到有关这一话题的研究文章和文献。

要是托洛茨基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没有毒害斯维尔德洛夫的话，一切都很好，斯维尔德洛夫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个忠诚的革命者和杰出的组织家。

托洛茨基说：“要用烧红的铁来扑灭顿河地区的暴动，不仅要无情地消灭叛乱者，而且要无情地消灭哥萨克村镇的居民……”

斯维尔德洛夫如常言所说那样遵命照办，坚决贯彻执行这一指示。

1918年9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实行针对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大规模的红色恐怖（似乎是为了回报对列宁的行刺）。俄罗斯的军官、神父、官员、学者、作家纷纷被杀害。

只能把执行犹太复国主义关于从俄国土地上清洗俄罗斯人的命令，肉体上消灭、处决哥萨克人的行为称作为种族灭绝。

请看斯维尔德洛夫（亚诺什·索洛蒙·莫夫舍维奇）亲笔写下的东西：“对富裕的哥萨克实行大规模恐怖，一律格杀不论，对直接参与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哥萨克一律实行无情的大规模恐怖……凡在上交武器期限之后仍被发现藏有武器的人，一律枪决。”

签署这一实质上是恐怖主义的野蛮法令（称作《1919年1月2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局决议》）的是：斯维尔德洛夫、他的妻子诺夫哥罗德采娃、沃洛达斯基（戈尔德施泰因）、克列斯廷斯基。

当时处决了几万名哥萨克、妇女、孩子和老人。

执行这一任务的是托洛茨基的禁卫兵，也就是托洛茨基为之骄傲和十分欣赏的那些穿皮上衣、拿毛瑟枪的“钟表匠的儿子们”。

此后不久，在克里木，作为预防措施，根据托洛茨基直接下达的命令，不经侦查和审判枪杀了1万名俄罗斯军官，以防止他们加入白卫运动。托洛茨基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行动，他说：“我们没有时间寻找我们真正的积极的敌人。我们不得不从肉体上消灭一切有可能出现反对我们政权的人的居民群体。”

……天哪，在描写这类恶行时，我怎么能客观地叙述呢?!能做到吗?!我不去形容这类罪行，让读者自己去作出判断。我只指出一点：为了节省篇幅我删掉了许多内容，没有加以叙述（例如在队列前每五个人或十个人枪杀一个，根据捏造的罪名杀害很有才能的俄罗斯将领杜缅科、米罗诺夫）。

这些恶行的倡导者内心深处也明白，他们在犯下可怕的罪行，而且可能要为此负责。为了逃避责任，他们为倒霉时准备了退路。在雅柯夫·斯维尔德洛夫死后，在他的保险柜里发现了七本办好的外国护照和七份空白护照登记表，另外还有一大笔可观的资金——沙皇时代铸造的金币 108 525 卢布和 705 件带有宝石的金制品。

应该指出，斯维尔德洛夫的妻子克·季·诺夫哥罗德采娃是政治局钻石储备的秘密保管者（藏在她的住所里）。这笔储备的用途是，“一旦政权垮台，保证政治局委员们的生活和继续进行革命活动所需的经费”。

我认为，不必解释是哪些政治局委员了。斯大林及其亲信当然不在此列。

总之，托洛茨基在其一生的各个阶段（革命前和参加布尔什维克党之后）都是反对派分子，都为夺取党和国家的权力，确切些说是为夺取俄罗斯而斗争。托洛茨基的整个活动清楚地显示了他直接听命于豢养他的犹太复国主义的财政上和政治上的主子。而且连托洛茨基关于世界革命的理论（由其犹太骨干实施）也是和犹太复国主义控制俄罗斯的意图直接连结在一起的。在这方面二者之间可以画上一个大大的等号。

1920 年纽约出版了一个题为《是谁在统治俄罗斯》的小册子，其中列出了 1920 年“工农社会主义俄国”领导机关的名单。

请看托洛茨基是如何组建由他负责的陆军人民委员部的：

陆海军人民委员——勃朗施坦-托洛茨基	犹太人
北方集团军革命司令部主席——菲什曼	犹太人
第 12 集团军法委员——罗姆	犹太人
第 12 集团军政治委员——梅奇克	犹太人
第 4 集团军司令部政治委员——利文松	犹太人
西方面军集团军委员会主席——波泽尔恩	犹太人
莫斯科军区政治委员——古别尔曼-雅罗斯拉夫斯基	犹太人
维捷布斯克军区政治委员——杰布	犹太人
斯卢茨克城军事征用机关委员——卡利马诺维奇	拉脱维亚人

萨马拉师政治委员——格卢兹曼	犹太人
萨马拉师军事委员——贝克曼	犹太人
莫斯科军区征用队委员——祖兹马诺维奇	犹太人
莫斯科总军事委员会主席——勃朗施坦-托洛茨基 其助手	犹太人
吉尔什费利特	犹太人
斯克良斯基	犹太人
总军事委员会委员	
绍罗多克	犹太人
佩奇	犹太人
莫斯科省军事委员——施泰因加特	德意志人
其助手——杜利斯	拉脱维亚人
边防警卫队学校委员——格莱泽尔	拉脱维亚人
苏维埃第15师政治委员	
泽尼斯	犹太人
波隆斯基	拉脱维亚人
高加索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列赫季涅尔	犹太人
东方面军特命委员	
布鲁诺	犹太人
舒尔曼	犹太人
高加索军事委员会委员	
罗森霍尔茨	犹太人
梅戈夫	犹太人
纳津戈利茨	犹太人
雅罗斯拉夫尔红军司令——黑格尔	犹太人
彼得格勒军事委员部领导人——奈格尔	犹太人
彼得格勒军区政治委员——蔡格尔	犹太人
彼得格勒军区政治委员——吉季斯	犹太人
抗击捷克斯洛伐克的西方面军司令——瓦采季斯	拉脱维亚人
军事公社委员会委员——纳济梅尔	犹太人
军事公社领导人——前奥地利军官科尔曼	犹太人
莫斯科军区参谋长——比齐斯	拉脱维亚人
莫斯科军区军事委员——梅特卡斯	犹太人
克里木防卫部队参谋长——扎克	犹太人
库尔斯克方面军司令——斯卢津	犹太人
其副手——西伯尔曼	犹太人

罗马尼亚方面军政治委员——斯尼罗	犹太人
对德和谈特派员——达维多维奇	犹太人
陆军人民委员部候补委员——希苏尔	拉脱维亚人
陆军人民委员部委员——斯米多维奇	犹太人
合计：43人中俄罗斯人0人，拉脱维亚人8人，德意志人1人，犹太人34人。	

还需要评论吗？请读者自己作出判断。^①

七 重要的警告

在谈苏联30年代发生的不幸事件之前，有必要指出，我从来不是反犹太主义者。我从来没有过这一情结，我认为不能根据个别人物的民族出身先入为主地来评价他们的行为和事件。反犹太主义和仇俄倾向、厌恶高加索民族及其他民族的情绪一样，都是有害的。

同时我还要说明，我严格区分反犹太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联合国大会1975年11月第3379号决议谴责了德国法西斯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认为两者都是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形式，两者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犹太复国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不过是犹太极端分子取代德国人觊觎统治世界。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仇视人类的理论和实践的变种，是其支持者在种族方面置于一切民族之上，力图通过种族灭绝、残杀一个个民族来实现对世界的统治。

犹太复国主义是“神选民族”臆想出来加以实施的，为的是证明他们对其他“较低级的种族”的统治是正确的。

① 为了让我们的判断绝对客观，我们用第三方的意见来加以印证。而且这个意见是温斯顿·丘吉尔的，他在当时全力以赴（协约国的进攻）要消灭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世界上最出色的情报机关在为丘吉尔工作，他十分清楚俄国的情况。

下面是1919年11月5日温斯顿·丘吉尔在伦敦的下议院讲话的片断：

“没有必要夸大犹太国际主义无神论者在缔造布尔什维主义和真正参加俄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不仅如此，主要的鼓舞力量和动力来自犹太族的领袖们。在苏维埃机关中犹太人多得出奇。在肃反委员会实行的恐怖体制中犹太人（某些情况下还有女犹太人）起了主要作用……”

以中止进步、愤世嫉俗和毫无意义的平等原则为基础的颠覆文化和改造社会的世界阴谋越演越烈。这一阴谋是19世纪一切破坏运动的主要动因，现在这帮欧美大城市中的怪人、渣滓抓住了俄罗斯人民的头发，控制了他们，实际上成了这一大帝国主宰一切的主人。不必夸大这些国际主义的、大部分是不敬上帝的犹太人在缔造布尔什维主义和实施俄国革命中的作用。他们的作用无疑很大，大概大大超出了其他任何人的作用。”（《温斯顿·丘吉尔言论全集（1887~1963）》，1~8卷，纽约盖姆斯出版社1974年版）——本书作者注

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极端分子的垄断，但成千上万其他民族的代表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服务，确切些说是侍奉他们，是他们忠实的帮凶，因此获得奖励，能在政府机关和商业机构、媒体、影视界、文学界、戏剧界和电台担任高级职务。

这一切在20世纪30~40年代表现得充分，在苏联改革和后改革时期更是得到犹太复国主义者不遗余力地推行。我以为，不必说服读者相信这一点，也不必证明上述说法是正确的，因为耳聪目明的人都能看见和听到，今天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切就是最鲜明的例证。

在谈具体事件之前，还必须指出犹太复国主义者用以伪装的很重要的一点，虽然这不是他们独家的发明，而是社会各阶层都在用的。我指的是他们改变民族成分、改名换姓的做法。演员、作家为了更有影响往往选用响亮的、漂亮的名字作艺名和笔名；刑事犯罪分子通常编造几个姓，以便隐瞒前科；职业革命家为了保密使用不同的姓氏。在各种情况下，人使用化名都是为了隐瞒自己真实的面目和历史。

犹太姓氏在十月革命前并未引起人们的反感，相反，犹太人作为部分受沙皇政府压制的群体，得到了进步人士的同情。形势迫使革命者使用另外的姓氏，于是出现了列宁（乌里扬诺夫）、斯大林（朱加施维里）、托洛茨基（勃朗施坦）、季诺维也夫（阿普费尔包姆）、加米涅夫（罗森费尔德）、斯维尔德洛夫（豪赫曼）、马尔托夫（策杰尔包姆）、雅罗斯拉夫斯基（古别尔曼）、莫洛托夫（斯克里亚宾）等等。

为什么革命胜利后他们不恢复真姓氏呢？这是因为，这些姓氏已经在生活中扎根，并且已经家喻户晓了。只有列宁在签署文件时在化名后面加的括号内写上真姓“乌里扬诺夫”。

如果其他一些党的工作者愿意继续使用化名，只是因为化名已经流行的话，本来可以不必去谈论这件事。但某些党员的活动中还暴露出“另一层问题”，也就是他们必须掩盖自己的两面性。犹太复国主义者使用俄罗斯化名能更放心地伪装，从而更好地把自己的思想变成反党行动。而从姓氏可以看出真正的民族属性，这会使犹太复国主义者显出原形，使人们对他们保持警觉，让他们无法再保住秘密，因为大家知道，任何一个犹太人都可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于是他们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的姓氏，至今还在急急忙忙地要求从护照和其他登记表中删去“第五项”——民族属性一栏。

我再一次重复一下：我尽管十分尊重犹太人，但不得不谈到犹太复国主义，但这并非在每一个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画等号。犹太人是民族概念，是天生的，与俄罗斯人、鞑靼人或楚科奇人一样；犹太



复国主义者则是一个政治范畴，与希特勒纳粹分子、车臣民族主义恐怖分子、美国三K党党徒一样。因此我再次请读者注意我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解释（总的来说是官方的解释）和评价，请犹太人不要把涉及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反面意见都算在自己的名下。

犹太复国主义因其关于犹太人优秀、优于其他民族、是“神选”的、有权主宰世界等种族主义思想而首先败坏了犹太民族的声誉。这种对比侮辱了其他种族，引起了它们对犹太人的仇恨。反犹太主义是犹太复国主义者错误理论和实践造成的后果。

犹太复国主义者把许多犹太人的才能、干劲和精明用来为其种族主义的、仇恨人类的意向服务。

但是……请大家回忆一下希特勒的纪录片——德国人在野兽般吼叫“希特勒万岁！”时扭曲的脸。他们盲目相信自己优越。不仅法西斯分子和兵痞在吼叫，整个德意志民族因为受到为“神选”来统治世界思想的毒害也在这样吼叫。他们杀害了千千万万的人，其中包括600万犹太人（也许因为犹太人是与他们竞争统治世界的对手而格外仇恨犹太人？）。

大家知道这样做的结局是什么。德国人为了迷恋种族主义理论和实践、指望依靠剥削其他民族来建立自己富裕的生活的愿望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今天他们提起自己的法西斯狂热仍感到万分羞愧。

最终等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无疑是同样的下场。他们用自己罪恶的思想毒害了千千万万犹太人。他们似乎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正在实现他们统治世界，包括统治俄罗斯的计划。

但是希特勒分子也控制过欧洲，一直挺进到伏尔加河畔。犹太复国主义今天人类的癌肿。从今天俄罗斯发生的一切可以清楚地看出犹太复国主义给人们带来的是什么：工业和文化崩溃、居民灭绝、饥荒、疾病、堕落。

早在十月革命前，在沙皇时代犹太复国主义就开始向俄罗斯渗透，当时他们就以控制辽阔的欧亚大陆为目标。犹太复国主义向包括共产党即布尔什维克党在内的各个政党和政治运动派出了密使，当时的共产主义的革命事业和改造中都加入了可以明显察觉到的犹太复国主义腔调，托洛茨基分子和斯大林分子争夺权力的斗争就带有这种性质。

例如，有人指责列宁勾结德国军方，说他和他的同志返回俄国是为了从后方瓦解沙皇的国家和军队，从而保证德国人取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

同样可以这样有把握地指责托洛茨基，说他是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



的代理人，因为1917年他从美国归国，而在美国时他与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交往，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必要的指示和资金。托洛茨基与列宁以及后来与斯大林争夺权力的斗争进行得很顺利，包括贯彻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意图。

我为了让读者明白明显的民族改头换面的行为，在描述事件时有时在化名之后列出真姓氏。

读者应该发现，这不仅是在评价一个有两个姓氏的人物的行为，而且是在评价一个有两面性的、有双层底的人的行为，也就是这个人既在公开的日常工作中是布尔什维克（用化名），又为了达到往往与犹太复国主义理想相结合的机会主义目的而从事秘密活动。

于是我怀着对犹太人——我们的诚实劳动并与苏联各民族同甘共苦的同胞——的十分尊重，怀着对犹太人——我在前线的战友和在和平年代的同事——特别的爱，同时怀着对犹太复国主义强烈的憎恨，回过来谈谈20年代。

* * *

在苏维埃国家的历史上有过一个决定许多重大悲惨后果的历史时刻。最令人奇怪的是，有人把这一左右命运的事件变得令人不易察觉，花了大力气向人民甚至向党员隐瞒真相。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时期团体和政党林立，其中有一个犹太共产党。它单独活动，与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孟什维克和其他努力改造和造福俄国的政党各行其道。犹太共产党不同任何人联合和结盟，说明这个党有着自己特殊的、与其他革命纲领不同的目标。更确切些应该说，这个党虽然叫作犹太共产党，在其正式的党纲党章中有着相应的表述，但在事实上却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组织，其明确的任务是，乘革命政党林立、混乱不堪之机浑水摸鱼，掌握政权，实现犹太复国主义者千百年来梦想，控制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俄国。

但事态发展的结果是布尔什维克在10月取得了胜利。犹太共产党几年中没有管事；布尔什维克不仅掌握了政权，而且掌握了俄国各民族思想和希望。

但是犹太共产党地位不明的情况并不太久。海外的主人即“他们”为它找到了一条有利的出路，让犹太共产党加入俄共（布），更何况俄共（布）本身就有许多犹太人，即使他们不全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但他们自古以来不可违背的准则（甚至是法则）是互相帮助，互相提携，因此可以预计犹太裔布尔什维克将忠于“血缘关系”并促成犹太共产党加入俄共（布）。

但是列宁以其特有的洞察力明白共产党人——犹太复国主义者想做什么，这一合并会产生什么后果。列宁断然拒绝了犹太共产党和他的某些提出这一问题的战友的要求，而且不止一次驳斥了类似的意图。

但是当列宁重病在身、时日不多时，托洛茨基（勃朗施坦）、季诺维也夫（阿普费尔包姆）、加米涅夫（罗森费尔德）还是把犹太共产党拉进了俄共（布）。而且他们有意在列宁一息尚存时这样做，以便将来可以依据这一点说明合并是在列宁在世时经他同意进行的。可是实际上列宁由于患病早已不过问事务，对这件事一无所知。甚至连总书记斯大林也不知就里。

1923年俄共（布）中央一月全会除了讨论其他问题，还听取了斯大林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作的关于书记处工作的例行报告。按照列宁执政时确定的传统，政府首脑加米涅夫（罗森费尔德）主持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会议。

加米涅夫（罗森费尔德）出乎与会者的意料突然说：

“政治局认为首先不是听取斯大林同志的报告，而是听取关于与我们关系友好的犹太共产党情况的通报。同志们，现在不要再官僚主义地拖拖拉拉，该接收全体犹太共产党员为我们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了。”

中央委员们保持沉默。斯大林甚至有点不知所措，因为加米涅夫说他代表政治局讲话，但斯大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上却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这就是说，可能开过一个非常的秘密会议，也许，连这样的会议也没有开过。

沉默持续了一段时间。斯大林明白，公开出来反对会招致要被拉入党内的人和党内给他们帮助的人的憎恨，但又不能沉默，因为沉默就表示同意。

斯大林请求发言。他以他在危急时刻特有的机智说道：

“我不反接受几千名犹太共产党党员加入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但是吸收入党不应违背党章，也就是说应该是一个个单独吸收入党。根据党章，所有新入党者应有我们党五个有五年党龄的党员介绍。我这样说，是因为犹太共产党纲领说犹太人是负有领导整个国际犹太工人运动使命的神的民族。犹太共产党只吸收犹太人。加入我们的人和整个犹太共产党必须在其代表大会上公开放弃他们纲领中的犹太复国主义任务。”

托洛茨基简直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以他特有的表情，明确而大声地指责斯大林说：

“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斯大林说的事情实际上已经做了。1922年



犹太共产党十二月中央全会作出决议，放弃党的犹太复国主义纲领，请求全党一起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我以为不能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从不信任开始我们的合作，这是对人的侮辱。”

紧跟着托洛茨基（勃朗施坦）发言的是季诺维也夫（拉多梅斯尔斯基-阿普费尔包姆），他不仅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和政治局委员，而且还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季诺维也夫论证说：“由于犹太共产党在其中央全会上放弃了犹太复国主义纲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研究了犹太共产党的申请，建议犹太共产党根据俄共（布）的纲领和章程并入俄共（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了相应的决议。我来读一下这个决议。”季诺维也夫读完这个决议后评论说：“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了决议，而这一决议是俄共（布）必须执行的。斯大林同志想使这个问题复杂化是毫无道理的。”

斯大林知道，他和他的支持者处于少数地位，如果他坚持己见，托洛茨基分子就会收拾他，甚至撤掉他总书记的职务。但他还是说：

“应该委托古比雪夫（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制定接受犹太党组织加入俄共（布）的条件。”

会议主持人加米涅夫（罗森费尔德）认为问题已经解决，建议转而讨论下一个问题：

“现在听取斯大林同志关于政治局办公厅工作的报告。”

加米涅夫像以往一样以此来再一次强调指出斯大林不过是“办公厅”的领导人。

1923年3月9日，《真理报》用很小的字体在不显著的位置上发表了由中央书记瓦·古比雪夫签署的俄共（布）中央关于犹太共产党及其党员加入俄共（布）的决定。

列宁始终不知道这个决定。人们努力很快忘掉这个决定，后来从来不提起这个决定，也没有将它收入党的文件汇编中。但是这个表面上不重要的事件对党和俄罗斯后来的经历意义特别重大。几万名新加入的“共产党员”成了托洛茨基及其志同道合者在夺取权力的斗争中忠实可靠的战友。他们依仗同一血缘的兄弟们的帮助在职务上很快飞黄腾达，过了一两年就成了各区、各州、各共和国及党中央委员会、苏维埃政权机关、各部各机关、检察院、法院、军队甚至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领导干部。

但是正直的犹太人不能对此视而不见，他们在1923年在柏林出版了一本值得注意的文集《俄国和犹太人》。他们在《致各国犹太人！》的呼吁书中指出，在俄国人民的心目中“苏维埃政权等同于犹太人政

权，对布尔什维克的刻骨仇恨变成了对犹太人的刻骨仇恨。现在犹太人遍布各个地方各级政权机关中。俄罗斯人看到犹太人领导着首都莫斯科，领导着涅瓦河畔的首都，领导着红军……他们看到，圣弗拉基米尔大街现在以纳希姆松光辉的名字相称，历史性的利季约大街现在改称沃洛达斯基大街，而巴甫洛夫斯克改称斯卢茨克。俄罗斯人现在认为犹太人既是法官又是刽子手”；“而全体犹太人……都把希望寄托在革命上，把自己和革命混为一谈，以至一向决心把与革命为敌的犹太人宣布为人民的敌人。”（约·梅·比克尔曼）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文集的作者们把布尔什维克犹太人当作出卖俄国和犹太人利益的叛徒，与他们划清界限。他们警告说，共产主义制度迟早要垮台，这将给犹太人带来悲惨的后果：“布尔什维克犹太人异常卖力地参与压迫和破坏俄罗斯，是会带来报复的罪行。”因此“犹太人必然……在将来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托洛茨基分子无处不在。他们推行统一的中伤斯大林及其志同道合者的方针。他的下场似乎已经注定，不久他将被撤职。但风云突变，斯大林出乎托洛茨基分子的预料，突然在党内获得了更新更高的威望。他是一个战略家，不去公开地争斗。

十分奇怪的是，列宁的去世加强了斯大林的地位。

以下的情况都对斯大林有利：托洛茨基没有参加列宁的葬礼，他在苏呼米疗养。如果他在莫斯科的话，他在追悼大会上将是常言所说的第一小提琴手，会造成对他本人积极的影响，因为他能说会道，一向有着演说家的激情。

托洛茨基没有回来参加葬礼，是他策略上的一个大失误。首先，人们会把他的缺席当作（事实也是如此）对列宁的不敬，是高傲和刻意突出自己伟大的表现。其次，不是他，而是斯大林成了与党的领袖告别仪式上的第一人。虽然在此之前托洛茨基比斯大林更有声望，是更有权势的党的领导人。

斯大林在一天之中，通过一次讲话，就从托洛茨基手中夺得了主动权。通常人们以为，斯大林是在列宁的灵柩旁发表誓言的，其实并非如此。

列宁于1924年1月21日18时50分在哥尔克逝世。

1月26日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追悼大会上斯大林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发表了史称“誓言”的著名讲话。1924年1月30日《真理报》发表了这一讲话，这个讲话成了独特的党的纲领性文献和斯大林毕生的个人誓言。斯大林在这次讲话前在党内被看作是中央的一个领导干部，而广大人民群众对他的活动知之不多。关于列宁去世的讲话的发表

触动了每一个人——党员、非党员、朋友和敌人。全国都了解了斯大林，了解了他的政治观点和意向。斯大林的声誉和威望一下子就比从前提高了许多。列宁的拥护者把斯大林看作是同托洛茨基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斗争中的领袖。

斯大林是精明的战略家，他抓住了有利于他本人和党的形势，根据他的倡议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了《告全党和全体劳动人民书》，号召“车床旁的工人，无产阶级革命坚定的支持者，都来参加俄共！无产者们！加入优秀的、先进的、正直的和勇敢的战士的党的队伍！”

没有感染托洛茨基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年轻的新生力量加入了党。这是党史上被称作“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运动”。在1924年总数为73.5万党员中有241 591人是在这一运动中加入党的。

我以为，这一运动更确切地应称作“为斯大林而吸收党员的运动”，因为这个主意是斯大林出的，新增加的力量成了斯大林今后工作和与机会主义分子（实质上是反俄分子）斗争中可靠的支柱。新增加的力量足以抗衡在列宁生前就与之斗争的老托洛茨基分子和他们在革命后拉入党内的人——犹太共产党（崩得）党员、改头换面的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等等。

在5月23~31日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由于取得了战略性胜利而十分自信，在讨论计划和实施例行的国民经济任务方面得到了与会代表中新的拥护者的支持。反对派在发言中对此表示怀疑和不信任，推说要实现总书记提出的计划资金不足。此外，他们还试图在老党员中中伤斯大林，说列宁的遗嘱被藏了起来，至今未宣读，而列宁在遗嘱中对斯大林的评价很不好。

代表大会代表们支持必须宣读这一遗嘱的建议。为了让代表大会代表详细地阅读列宁的信，让更多的人能说出自己的看法（在全体大会上无法这样做），也为了保密，代表大会决定由各代表团在秘密会议上分别讨论这封信。托洛茨基分子与此也有利害关系，因为列宁在信中对他们中的几个人也作了很不好的评定。

斯大林提交了辞职报告。

代表们阅读和讨论了“遗嘱”，对作为总书记的斯大林的工作作了积极的评价，代表大会责成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继续工作，防止党的分裂。斯大林及其支持者执行了代表大会的这些决定。

到1925年底，恢复时期基本上结束，400多个大型企业恢复生产，建成了近10座电站，生产量达到战前1913年水平的四分之三。不妨看一看，列宁在1921年第十次代表大会是如何难过地说的：“在战争结束



的时候，俄国就像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①

成绩是明摆着的，生活要求巩固成绩，扩大成绩。

八 斯大林和俄国正教会

同宗教的斗争是托洛茨基分子把布尔什维克党纲某些条款推到荒谬地步的大行动之一。大家知道，共产党纲领谈了党的无神论观点，党必须教育人民、使人们摆脱君主们为了使信徒顺从而加以利用的古老的思想残余。

规定通过教育、鼓动、解释及其他党的思想工作形式来进行反宗教的斗争。

托洛茨基利用同宗教作斗争这一公设，使之达到荒谬的地步，想引起正教信徒的不满，使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发生争执。

这是怎样进行的呢？今天我们都已知道进行了怎样的秘密活动，有些什么文献。

托洛茨基分子（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用血腥而激烈的国内战争，试图通过“革命打击”即通过肃反委员会来消灭正教会和神职人员。

俄罗斯人（受过洗的）加里宁能签署这样对待俄罗斯正教神职人员的野蛮文件吗？发号施令式的断然口气——“无情地普遍枪杀。尽可能多。”这不是加里宁的文风。读者通过我下面的叙述会相信，加里宁不是这封信的作者，他十分厚道的品质与这样残忍的嗜血行为是不相符的。他作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签署过几百个文件，其语气与此完全不一样。加里宁一贯非常善良，因此博得人们的尊敬，人们称他为“全联盟的班长”。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 1919年5月1日

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 绝密

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致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费·埃·捷尔任斯基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

第 1866672 号

指示

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决议，必须尽快消灭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60页。——译者注

神父和教会。

应把神父作为反革命分子和暗中破坏者予以逮捕，无情地普遍枪杀。尽可能多。

教堂应予关闭。查封寺庙并使之变成仓库。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米·加里宁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但我们看到的文件是由加里宁签署的。一切都很规范。只是其中隐藏着党的一个巨大的秘密。这是因为政治局决定加里宁必须签署由托洛茨基起草的一切文件。由犹太复国主义者出面下令消灭正教会和神职人员会引起人民的愤怒，其结局将会很糟，因此才把受人尊敬的俄罗斯人加里宁当作挡箭牌，以便掩护真正的野蛮的暴徒。

这一文件无疑是托洛茨基起草的。在国内战争时期他下达了几百个这类枪杀人的命令——这是他的风格，他的无情作风。

请注意署名排列的位置，因为通常职务高或地位高的人先签名。在这份文件上列宁的签名在加里宁之后，虽然按这里标明的职务列宁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要高于作为执行机构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①主席。

为什么签名这样排列呢？合理的推测是列宁的签名是后来加上去的，用的是签名章——在中央机关工作中常常这样做。很有分量的两卷本学术著作《1922~1925年间政治局与教会》（克里姆林宫档案）的第1卷第5页在描述文献时写道：“……在鉴定真迹时发现在个别情况下政治局委员在原件上的签名是由他们的技术秘书、办事员代签的，有时对笔迹摹仿得很像；有时还有一些政治局委员代另一些政治局委员签名。”

这个文件是否也是这种情况呢？在1918年8月30日列宁被刺后，在他患病期间，也许是别人乘此机会盖了他的签名章？

但也不排除是列宁本人签署了这个骇人听闻的文件的。下面将引用列宁的一封信，这封信证实了这一推测以及加里宁被迫签署这一“命令”及其他许多由托洛茨基起草的文件的原因。

在战后经济破坏时期全国遭到了可怕的歉收，饥荒无情地使人们大批死亡。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中央赈济饥民委员会，立法机构的首脑米·伊·加里宁领导这个委员会的工作。

①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是1917~1937年俄罗斯联邦最高立法、管理和监督的国家权力机关，由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职权。人民委员会是1917~1946年苏联国家权力的最高执行机关，1946年3月改为部长会议。——译者注

1921年8月22日东正教大牧首吉洪发布《赈济饥民》呼吁书，号召人们进行慈善捐献。

托洛茨基写信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建议成立秘密委员会来没收莫斯科教堂的珍宝，以此来为饥民从国外购买粮食。

人民委员会任命托洛茨基为“人民委员会负责登记和集中珍宝的特派员”。

托洛茨基把赈济饥民扩大为通过没收教会的珍宝、摧毁教堂和镇压神父进行的反对教会的斗争。

列宁从来考虑问题全面，他建议利用正在形成的艰难局势不仅赈济饥民，而且做更多的事。

引发这样做的由头是舒亚城对没收珍宝行动的反抗。

列宁就舒亚事件和对教会政策 给政治局各委员的信

1922年3月19日

绝密

致莫洛托夫同志

并转政治局各委员

请绝对不要复制抄件，由政治局每一位委员（加里宁同志也一样）在此件上直接写上自己的意见。列宁

我认为，鉴于舒亚发生的事件（此事已提交政治局讨论）必须马上根据这方面总的斗争计划作出坚定不移的决定。由于我担心不能亲自出席3月20日的政治局会议，因此用书面写出我的想法……

我们务必用最坚决最迅速的方式去没收教会的珍宝，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几亿金卢布的基金（应该记得某些修道院和大寺院的巨大财富）。没有这笔基金，任何国家工作，尤其是经济建设都完全不可能进行，要在热那亚坚持我们的立场也是完全不能设想的。我们无论如何必须掌握几亿金卢布（也许是几十亿金卢布）的基金。而这一点只有现在才能做到。各种考虑都表明，以后我们再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除了极为严重的饥荒，任何别的因素都不会使广大农民群众产生同情我们的情绪，或者至少会使这些群众保持中立。

……我设想实施这一计划的运动如下：

采取任何措施都只应由加里宁同志代表官方发布，托洛茨基同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或者向公众发表讲话……

我建议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就此问题举行秘密会议，由全体代表或几乎全体代表以及国家政治保卫局、司法人民委员部和革命法庭的主要工作人员参加。在这个会议上通过代表大会的秘密决定，确认没收珍宝，特别是没收最富有的大寺院、修道院和教堂的珍宝应坚决无情、一无例外、毫不手软，并在最短期间内实现……

为了监督最迅速最成功地实施这些措施，应在代表大会上，也就是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立即任命一个专门委员会，托洛茨基同志和加里宁同志必须参加该委员会，但关于该委员会不发布任何消息，目的是要保证实施由该委员会指挥的一切行动，并且这些行动不以该委员会的名义进行，而是以全苏维埃、全党的名义进行……^①

托洛茨基为列宁提到的代表大会代表的秘密会议起草了篇幅很长的“绝密的”报告《关于对教会的政策》。托洛茨基在其中以他固有的特点（表现他知识渊博）描述了欧洲和沙皇俄国自古以来教会的活动，揭露了教会资产阶级妥协主义的实质。

彻头彻尾坚持农奴制度、官僚制度倾向的教会还来不及进行资产阶级改革，现在就直接面对无产阶级革命。它今后会有怎样的下场呢？这里存在两个派别：一个是坚持黑帮君主派思想的公然反革命派，另一个是“苏维埃”派。“苏维埃”神职人员的思想看来近似于路标转换派的思想，即资产阶级妥协主义的思想。

当时，除了镇压宗教，国家政治保卫局还执行从内部瓦解教会的秘密方针，尝试“分裂”教会，建立能与苏维埃政权合作的革新教会。托洛茨基把这样的教会称作“路标转换派”教会。

这一措施并没有使托洛茨基感到满意，他根本不要正教会存在。托洛茨基建议作为策略手段暂时利用“路标转换派”：

“……如果缓慢形成的教会资产阶级妥协主义的路标转换派一翼得以发展和巩固，那么它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将比目前形式的教会危险得多。这是因为‘先进的’神职人员采取了‘苏维埃的’保护色，能向构成并应构成我们支柱的劳动者先进阶层中

^① 《列宁全集补遗》第1卷第642~646页。——译者注

渗透。

6. 因此应把路标转换派神职人员看作未来十分危险的敌人，但也正是‘未来的’，而今天应打倒实际控制教会的反革命神职人员。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应依靠路标转换派神职人员，但是政治上，尤其是原则上不与其同流合污（党的报纸的社论可耻地说什么“圣母更喜欢吃饱了的孩子的祈祷，而不是没有生命的石头”，如此等等）。

7. 路标转换派一翼与黑帮一翼的决裂越是坚决、断然、剧烈和具有强制性质，我们的立场就越有利。如上所述，在‘苏维埃的’旗帜下正教会正在尝试实现资产阶级的改革。正教会为了实现这一迟来的改革需要时间。我们就不给它这个时间，加速事态的发展，不让路标转换派的领袖们醒悟过来。

8. 关于饥荒的运动对此极为有利，因为它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如何处理教会的珍宝。首先，我们应该迫使路标转换派神父完全并公开把自己的命运与没收珍宝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其次，迫使他们在教会内部开展这一运动，直至与黑帮僧侣在组织上完全决裂，建立自己的新的大堂并选出新的各级机构。

9. 我们在这一运动中应让路标转换派神父公开地以确定的精神发表意见。反对派神父是最疯狂的抨击者。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就当着我们的面揭露主教搞鸡奸等等。我以为应该允许他们，甚至告诉他们必须有自己的刊物，如周刊，以便筹备在一定时间内召集大堂，因此，我们将获得十分珍贵的鼓动材料，甚至也许可以在全国各地出版几个这样的刊物。我们在完成没收珍宝之前集中全力抓这一实际任务仍然是完全站在赈济饥民的角度，同时要用肃反工作者的办法来镇压对舒亚等事件负有责任的反革命神父。

10. 在召集大堂之前，我们应为针对革新教会的理论运动和宣传运动作好准备。教会不能干脆越过资产阶级改革，所以，应使这场改革流产。为此首先应用关于正教会命运和它与国家、阶级及无产阶级革命关系的历史理论观点武装全党。

11. 现在就应布置写一本纲领性的理论小册子，也许可以请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做这件事，只要他有一点可能的话……”

政治局委员们最先阅读了这个报告，他们的意见很耐人寻味：“赞成——莫洛托夫，赞成——季诺维也夫，赞成——加里宁”。

斯大林没说“赞成”，也没说“反对”。

1922年4月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了《没收珍宝的实际



建议》。

再一次要指出的是，政治局是为赈济饥民而采取没收教会珍宝的措施，托洛茨基则把这一措施变为同整个教会作斗争，既消灭旧教会，也消灭（以后）“路标转换派的”革新教会。这就把反宗教斗争（根据党纲是和平的鼓动斗争）推向荒谬的地步，即以超共产主义的论断为掩护，引起信徒和神职人员（新派和旧派的）的不满，从而使人民和神职人员与政府对立。而政府又不得不镇压这一反抗，即消灭教徒。

几万个被吸收加入俄共（布）、只是形式上声明放弃其犹太复国主义主张的前犹太共产党党员以他们特有的干劲和良好组织性着手贯彻托洛茨基的指令。

不需要放大镜，也可以看出上述一切中的犹太复国主义意图：（1）消灭阻碍他们前进的正教信仰；（2）使人民仇恨布尔什维克，似乎是布尔什维克在实行这一反宗教的恐怖政策。

根据托洛茨基的建议，为了实现他的反宗教的纲领，创办了《无神论者报》和《战斗的无神论者》杂志及《战斗的无神论者联盟中央委员会》杂志，后面一本杂志的人员构成（其编委会及积极撰稿的作者）使人毫不怀疑他们具有托洛茨基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倾向。他们时时刻刻广泛攻击正教信仰。谎言、挑拨、粗暴侮辱教徒的感情、侮辱神职人员——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运动。

在 H. A. 克里沃娃深刻的学术研究著作《1922 ~ 1925 年间的政权和教会》（莫斯科“20 世纪俄国社会研究者联合会”出版社，1997）中说：

“任命官方的苏维埃政权最高机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米·伊·加里宁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用‘合法的’权力机关掩盖党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独裁的主意。

在托洛茨基的计划中，在全国开展运动的主力应是各地盘根错节的秘密筹备委员会的网络，同时为了掩护已成立的正式的委员会……建立了特别保密的双层系统，在苏维埃政权正式委员会的背后活动的是以托洛茨基的党和肃反委员会秘密委员会形式出现的没收教会珍宝的实际机制。

计划研究了组织鼓动工作的方法，非正式地、不加宣布即进行这项工作，并吸收优秀的鼓动工作者参加。这项工作的主要目标是进行反对宗教和教会的斗争……

…… 1922 年 3 月 22 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列·

达·托洛茨基关于夺取珍宝措施的一系列建议，这是有关围绕教会开展宣传运动的指示，其实际是掩饰开展运动的真正目的。从鼓动上进行掩护……

应启动并迷惑人的第一个措施是把钱款直接发放给饥民。托洛茨基建议‘立即从没收的教会珍宝中拨出100万卢布为饥民购买粮食’，并把这第一笔拨款郑重地广为宣布。

为了装出神职人员参与登记教会财富工作的样子，托洛茨基责成加里宁吸收效忠的主教安东宁（格拉诺夫斯基）作为‘专家’参加，并同样广为宣传这件事。托洛茨基分子有意挑选的这位主教很合适，他是一个极其喜好虚荣、阴险奸诈、心理阴暗、病态十足的人……

接着托洛茨基肆无忌惮地口授了加里宁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向报刊谈的六条意见。加里宁的主要任务是证实官方传播的观点，即没收珍宝并不是反对宗教和教会的斗争。

托洛茨基追求并试图借加里宁之手加以实现的下一个目标涉及分化问题。按照托洛茨基的意图，加里宁应公开宣布，神职人员在没收珍宝问题上分成了两派。一派忠于当局，认为必须用教会的钱来赈济饥民，因为教会财富是人民创造的，当然也属于人民。而另一派是‘公然反人民的、贪得无厌和掠夺成性的’人。他们‘对饥饿的农民持敌对立场，从而对苏维埃政权也持敌对态度’。托洛茨基指望通过污蔑俄国神职人员拒绝救济饥民、宣布他们犯有反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鼓动罪行来加剧教会分裂并挑起本来支持教会反抗实施没收法令的人民群众反对神职人员，并使这部分人参加效忠的‘革新’教会。

此外，加里宁还应告诉发生饥荒各省的农民、广大非党群众和红军战士，‘没收珍宝的法令是根据他们的倡议提出的’。现在尽管全国强烈反对没收，‘四面八方的千百万群众却要求坚决全面地实施这个法令’。

党的报刊马上发表了一批文章。1922年3月25日晚《消息报》、《工人报》、《共产党人报》、《贫苦农民报》、《工人莫斯科报》编辑部收到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谈话’的副本，对各报的‘请求’是1922年3月26日就发表这一谈话。‘谈话’的调子与托洛茨基的直接指示相吻合，即对神职人员采取强硬态度，尽管虚伪地否认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消灭教会，却号召公开进行反对教会的斗争。

操控一切的是‘开展摧毁俄国正教会的广泛运动的主要发动机

列·达·托洛茨基’”（《克里姆林宫的档案》，莫斯科，1997）。

由于列宁患病，托洛茨基主宰政治局，他制止任何微小的反抗消灭俄罗斯正教会行动的尝试。以下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

根据托洛茨基（和列宁）的指示革命法庭在舒亚审判了24名神职人员，其中4人被判处死刑。

为了证明我的叙述是客观的，以下我引用H. A. 克里沃娃的研究著作《1922-1925年间的政权和教会》中的一段话：“加里宁得知判决后第二天，即1922年4月26日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名义发‘急’电，要求法庭中止执行死刑判决。这件事非同寻常，尽管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无疑拥有赦免权。加里宁无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方针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指令，竟敢违抗并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的身份出面采取行动。”

托洛茨基因为加里宁不听命令而气得发疯，在政治局中提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问题，指责他不守纪律，不执行政治局先前关于他必须签署并执行托洛茨基在反对正教会斗争中下达的一切命令的决定。

政治局研究了这个问题，谴责了加里宁的行为，威胁要处分他，并批准了革命法庭的判决。

下面就是政治局这次会议记录的片断：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对教会的政策和
关于执行死刑判决中“不可容忍的拖延”的决议
（摘自政治局会议记录第8号，第11项）
（1922年5月26日）**

绝密

11. 关于教会

（托洛茨基同志的建议）

（1）接受托洛茨基同志的建议（见中央委员会的材料）。

（2）指出加里宁同志和叶努基泽同志在贯彻政治局今年5月18日决议（记录第7号第13项）时不可容忍的拖延，建议他们今天就加以执行。

中央书记

加里宁看来知道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分子镇压教会持否定态度（读者再读几页就能确信这一点），因此请求斯大林保护他。

加里宁给俄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关于各地不
执行俄共（布）中央关于对待宗教团体的指示信的信

1924年7月8日

俄共中央

斯大林同志

俄共中央1923年8月16日的通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有关指示及司法人民委员部第五局的一系列指令都不能使各地平静地处理教会问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每天收到的来信证明了这一点……

斯大林同志，我希望您能读一下这些文件，以中央的名义严令务必执行中央的指令。

顺便指出，现在夺取越来越多教堂的倾向正日趋激烈，反过来反抗力量也日益强大，广大教徒的愤慨也在加剧。

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

附上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报告和极为重要的来自共产党员的匿名文件。

米·加里宁

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分子反宗教的行动持否定态度，这一点从加里宁的信中可以看出，斯大林试图为镇压降温。但当时斯大林的权力还不小，不足以公开反对当时大权在握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

全国掀起了针对反对没收教会珍宝的神职人员和教徒的恐怖浪潮。

莫斯科（两次）、斯摩棱斯克、彼得格勒、喀山、阿斯特拉罕、察里津等地相继举行审判。1922年一年就举行了250次审判，1923年超过300次，两年中有1万人被判刑，其中五分之一被判处枪决。

加里宁继续反抗，他不仅拒不签署枪决判决书，而且出面要求撤销这些判决。托洛茨基则继续对不听话的加里宁施压，下面这个文件证明了这一点：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

书记处

致加里宁

1922年8月2日

绝密

记录第3号第5项

俄共中央全会 1922 年 8 月 2 日会议

第 3 号

决议：

5. (1) 驳回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重新研究中央关于神父问题指令的请求。

6. 认为加里宁同志有必要就我们的教会问题政策回答报刊的提问。回答的文本责成托洛茨基、加里宁和布勃诺夫三同志的小组起草。

中央书记

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在谈到各地局势时谴责了反宗教斗争中粗暴的镇压手段，认为这与党纲不相符。

斯大林依据代表们的意见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发表了：

俄共（布）中央“关于对宗教团体的态度”的指令信，第 30 号

1923 年 8 月 16 日

绝 密
第 份

俄共中央

致各省委、州委、边疆区委、
各民族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和
中央委员会常务局的指令信

第 30 号

（关于对宗教团体的态度）

中央委员会请各级党组织十分重视某些组织在反宗教宣传以至对教徒及其崇拜的态度方面所犯的一系列严重违法违纪行为。

党纲指出：“必须注意避免伤害信教者的感情，因为伤害他们的感情只会加强狂热的宗教情绪。”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反宗教鼓动宣传的决议断定，“中央和各地经常采取的蓄意粗暴的手段，对信仰和崇拜物不认真分析和解释而肆意嘲弄，都不会加快劳动群众摆脱宗教偏见，反而阻碍了这一进程。”

可是我们地方组织的有些人一贯违反党纲和党代表大会这些明确的指示……

斯大林接着列举了粗暴侮辱正教教堂和镇压神职人员的许多事例：

“这些以及类似的许多例子非常明确地表明党的某些地方组织和地方政权机关对宗教信仰自由这样重大问题很不谨慎，很不严肃，轻举妄动。这些党组织和政权机关看来不懂得他们对占居民中绝大多数的教徒粗暴而没有分寸的行为给苏维埃政权造成了极大危害，有断送党在瓦解教会方面取得的成绩、有利于反革命的危险。

中央委员会因此决定：

(1) 禁止以不执行关于登记的行政命令为由关闭教堂和祈祷场所……如果已关闭则立即撤销此类命令；

(2) 禁止通过有非教徒或与签订房屋租约的教徒无关人员参加的大会投票表决来取缔祈祷场所；

(3) 禁止因未纳税而取缔祈祷场所，因为此类取缔与1918年司法人民委员部指示第二项不十分相符；

(4) 禁止‘宗教性质’的逮捕，因为此类逮捕与‘教会人士’和教徒的公然反革命行为无关；

(5) 在把场所交宗教团体使用并确定租金时应严格遵守1923年3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

(6) 告诉党员，我们在瓦解教会和根除宗教偏见方面的成绩不取决于对教徒的迫害（迫害只能加强宗教偏见），而取决于对教徒合乎分寸的态度，要耐心地、周密地批评宗教偏见，要认真地从历史上来说明上帝、崇拜和宗教等思想；

(7) 本指令由各省委、州委、州常务局、各民族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和边疆区委亲自负责贯彻。

中央同时提醒，对教会和教徒持这样的态度，绝不应削弱我们各级组织的警惕性，即仔细监督、不让教会和宗教团体将宗教变成反革命的工具。

中央书记 约·斯大林
1923年8月16日”

这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直接对抗，是对正教会的保护。

代表大会和斯大林都没有指出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对已暴露的缺点和背离党纲行为的个人责任，因为所有的指示都是以全俄中央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和政治局的名义发表的，而众所周知，所有迫害俄国教会的实际责任人的姓名都以“为避免沙文主义的攻击”为名而被加以保密，隐瞒了起来。

托洛茨基及其志同道合者全面实施了反对俄罗斯正教会的行动，他们败坏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教徒中的声誉，镇压了数以千计的神职人员，拆毁数以百计的教堂或将其变为仓库，在教会人士中制造分裂，建立新的、“路标转换派的”教会的各级领导。

托洛茨基分子无耻又无情地抢掠教会和教徒。截至1922年11月1日没收的珍宝数量如下：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饥荒善后委员会中央委员会
关于没收教会珍宝数量统计表**

(1922年11月4日)

已收集教会珍宝数量的统计表

(截至1922年11月1日)

一、根据各地没收教会珍宝委员会的电报提供的材料，共没收

1. 黄金	33 普特 32 俄磅
2. 白银	23 997 普特 23 俄磅
3. 钻石	35 670 颗
4. 其他宝石	71 762 颗
5. 珍珠	14 普特 32 俄磅
6. 金币	3 115 卢布
7. 银币	19 155 卢布
8. 各种贵重物品	52 普特 30 俄磅

根据概略统计共没收折合金额为 4 650 810 卢布 67 戈比

除上述教会珍宝外还没收古董 964 件，对其将另行估价。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饥荒善后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亚·维诺库罗夫)

所有以赈济灾民为名没收的珍宝实际上都用于其他方面了。其中一定比例给了托洛茨基，政治局决定已经指明：“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即从珍宝中获得 250 万卢布……这笔款项用于动员储备，不计税，在确定军事预算时也不计算在内。”从这项所得中还给了托洛茨基大笔资金用于实现他的主要梦想——推动世界革命。

他在1922年3月23日给列宁、克拉辛和莫洛托夫的信中要求立即给他钱：“……为了在欧洲，哪怕是在一个大国里无产阶级革命发动进攻，我们在1922~1923年得到5 000万珍宝，比1923~1924年能指望

得到7 500万更重要……”

在托洛茨基亲自严格监督下，最贵重的古董在没收后送交国家博物馆。多么令人感动的对俄罗斯艺术珍品关心！但当读者得知国家博物馆是由托洛茨基的妻子托洛茨基夫人（谢多娃）领导时，就会明白这种关心另外的含意了。

布尔什维克在1920年初没收了帝国的黄金储备后并不需要“教会珍宝”；托洛茨基分子搞这个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反对上帝，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得到列宁预期的“几亿”或“几十亿”金卢布，只得到了其中的千分之一，因为教会已经一无所有。

此外，“布尔什维克”颁布了关于俄国一切财产收归国有和不仅没收教会的，而且没收资产阶级、官员、侨民的财产、黄金和贵重物品的法令（1920年4月16日法令）。如萨顿教授所说的那样，俄国的珍宝一船一船地运往国外。至今只有关于掠夺俄国财富幕后情况的不完全的材料得以发表，很明显，在主张犹太复国主义的托洛茨基分子手中有着俄国积累的大量财富。

例如，《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在1921年头八个月就运走了价值4.6亿美元的黄金，其中10 290万美元给了希夫创办的“库恩-列布”公司。

请读者注意，正是这位犹太复国主义大亨资助托洛茨基前往美国干革命。现在希夫、瓦尔堡等出资人收到红利了。

美国报纸（和萨顿教授一样）不止一次地描述了将掠夺来的黄金“洗白”的机制：黄金先在斯堪的纳维亚回炉，打上新的印记后再运往美国。例如，有报道说，“瑞典铸币厂厂长称，今年（即1921年1月1日~4月22日）他们回炉了价值近4 200万美元的70吨黄金，其中大部分运往美国。回炉后的黄金上打上了瑞典铸币厂的标记。目前储存在斯德哥尔摩银行里的‘布尔什维克’黄金价值超过12 000万美元。”

正是在1921年，《纽约时报》在头版上以《金银化验局里的黄金洪流》为题报道说：“由于从世界各地不断运来黄金，金银化验局的保险柜里装满了金砖、金条和金币……金银化验局因此不得不暂停接收，对银行家准备交由它熔炼和鉴定的黄金数量感到无能为力。”

从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给政治局的报告中可以看出，珍宝是如何在国外出售的：

“现在这件事不值一评。通常这个商品交给共产国际中的同志，这样做绝对荒唐，因为委托出售商品的人在本国大多处于非法状态，与此类交易毫不相干，而即使合法的职业商人在目前条件下做

这种交易也很容易失败。

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交易通过偶然认识的朋友稀里糊涂地进行，价格大大低于在比较在行的销售下可能的出价。为出售目前由国库收集的更大批量的黄金，这种老掉牙的方法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是非常危险的。”

因此，没收教会珍宝时所宣称的对饥民的关怀已退居末位。

大笔资金用于托洛茨基领导的宣传鼓动工作（卢那察尔斯基）及秘密和公开的分裂并摧毁俄国正教会的运动。

《大恐怖》一书作者罗伯特·孔克韦斯特十分敌视苏联和共产党，尤其是斯大林，他在这本书中对那一时期托洛茨基的评价十分有意思，他说：

“托洛茨基同其他政治局委员一起阻挠患病的列宁‘从病榻上’对日常事务施加影响的尝试。托洛茨基在后来的阴谋中表现出他绝不是一个襟怀坦荡、始终如一的好人，而是一个见风使舵、畏首畏尾的人。西方研究那一时期的著名研究者、哈佛大学教授亚当·乌拉姆说，托洛茨基本人对事件的叙述，是‘可怜的半真半假，试图无视事实’。”

孔克韦斯特又说：

“托洛茨基为了政治上的利益从不放过任何隐瞒事实或歪曲事实的机会。从托洛茨基指责斯大林毒杀了列宁一事可以看出他的著作总的来说可靠程度如何。这一指责没有丝毫证据，而且托洛茨基是在1939年才提出的，也就是在列宁去世、他被放逐国外许多年后才提出的。”

这是在同策划进攻苏联的战争的希特勒分子的合作。

孔克韦斯特接着说：

“当人们说托洛茨基很有魅力时，主要是指他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他言词尖刻的著作、他的社会力量。可是托洛茨基的虚荣心和不负责任使许多人感到讨厌，他喜欢提出‘出色的’构想，要求别人不顾一切地去实现。

托洛茨基的虚荣心不同于斯大林的虚荣心，他更为肤浅。托洛

茨基身上有装腔作势的特点。在国内战争时期他表现得十分残酷，杀的人比斯大林杀的多。即使在这件事上托洛茨基也表现出一个做作而出色地履行历史残酷意志的伟大革命家装腔作势的特点。如果托洛茨基掌了权，那么他无疑会无情地实行统治，人对于他来说不过是实现其自负而虚荣目的的材料而已。”

斯大林在这几年中的表现可以说是具有远见的，他不能公开地与托洛茨基及其志同道合者对抗；斯大林的策略是等待时机，保存自己和他在党的领导层中暂时为数不多的拥护者，以便日后进行斗争。斯大林在宗教事务中的战略意图在后来才表露出来。

斯大林很尊重列宁，因此他试图调和列宁尖锐的反宗教的指示。

绝 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793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中央委员会

1940年4月12日

特别卷宗

指示

所有与列宁同志指示（1919年5月1日第13666/3号）有关的中央委员会文件一律存放在特别全宗中，没有斯大林同志本人的指示不能交给任何人。

中央档案馆馆长（签名）

后来，斯大林在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在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一再战胜反对派后，开始发布保护正教的文件：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绝 密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中央委员会

第1037/9号

致维·鲁·明仁斯基同志

1933年9月12日

1933年9月12日

在1920至1930年间在莫斯科及其相邻地区完全拆毁了150个教堂。在剩下的教堂中有300个改为工厂车间、俱乐部、集体宿

舍、监狱、隔离所及少年和流浪儿教养院。

建筑设计预计要拆除 500 多座剩下的教堂建筑。

中央委员会根据上述情况认为不能通过破坏教堂规划来设计建筑，应把这些教堂看作是古俄罗斯建筑文物。

苏维埃政权机关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农民警机关应采取措施（直至追究党纪法纪责任）保护古俄罗斯建筑文物。

中央书记 约·斯大林

因此，改革时期报刊提出的指责斯大林对教会和神职人员实行恐怖的罪名都是无的放矢。这些罪名应该加在托洛茨基及其犹太复国主义的战友头上。

下面是为斯大林彻底恢复这方面名誉的文件：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绝 密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中央委员会

第 1697/13 号

1939 年 11 月 11 日

致拉·巴·贝利亚同志

摘自 1939 年 11 月 11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98 号记录

1939 年 11 月 11 日决议

宗教问题

关于如何对待宗教问题、俄罗斯正教人士及正教徒的问题，中央委员会决议如下：

(1) 认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俄罗斯正教会人士、迫害教徒的做法今后不再合适。

(2) 撤销乌里扬诺夫（列宁）同志 1919 年 5 月 1 日给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仁斯基同志的第 13666 - 2 号《关于同神父和宗教作斗争》的指示以及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切涉及迫害俄罗斯正教人士和正教徒的相应指示。

(3)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应检查因与宗教活动有关的案件被捕和判刑的公民的问题。释放由于上述原因被判刑的公民或代之以不剥夺自由的处罚，只要这些公民的活动不曾给苏维埃政权带来危害。

(4) 关于对在押的或入狱的其他信仰的信徒处理的问题，中

央委员会另作决定。

中央书记 约·斯大林

既然批评斯大林的人说，他是独裁者，专断地统治国家，那么我们要指出成千上万由托洛茨基（在他被驱逐出国后由他的志同道合者）投入监狱的神职人员和教徒获得释放是斯大林本人的功劳。请看另一个文件：

秘 密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 1939年12月22日

1939年12月22日
第1227“B”号
莫斯科市

致约·维·斯大林同志
224989

报告

为执行1939年1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第1697/13号决议，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劳改营中释放了12 860名在不同时间被法院判刑的人。11 223名在押者获释。中止有关他们的刑事案件。有5万多人因其活动给苏维埃政权造成重大危害而继续服刑。

对这些公民的案件将重新审理。预计还有近15 000人将被释放。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拉·贝利亚

1939年12月22日

这就是可以撤销对斯大林本人镇压俄国教会和神职人员指控的事实真相。在下面有关章节中还要谈到在卫国战争中他与教会接近的情况。

九 关于战略

下面我们将较详细地研究战略问题，因此，为了统一认识，必须确定战略是什么。

常常在报刊上看到有些作者在议论战略时对他们所议论问题的实质和范围一窍不通。例如，在车臣作战时报上的通讯报道说：“我军夺取

了……村镇地区的战略高地（桥梁）”。而且说得十分自信，断然决然。总而言之，“每一个旁观战斗的人，都自以为是战略家”。

我曾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和总参谋部高级学习班听过战略课；我在写本书时又读了一遍拿破仑，毛奇，克劳塞维茨，施利芬以及俄罗斯第一个战略学教授（他在19世纪讲授战略和军事史）、炮兵将军梅杰姆男爵，还有亚·安·斯韦钦（沙皇军队和苏联军队的将军，也曾在总参谋部学院讲授战略课的苏联时期军事学者和理论家）的著作（有关战略的章节）；当然还又一次钻研了沙波什尼科夫元帅的三卷本《军队的大脑》等。

《苏联百科词典》对战略作了如下解释：

“军事战略是军事艺术的最高领域，包括武装力量战争准备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战争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研究战争规律，制定战略战役准备以及实施的方法和形式，确定方面军、舰队和集团军的作战目的和任务，按战区和战略方向配置兵力。军事战略与国家政治有密切联系，它是根据军事学说的要求制定的。政治为军事战略规定任务，军事战略则保证完成规定的任务。军事战略与经济相联系并依赖于社会的经济制度、生产发展水平和人民的精神潜力……”

可以非常简化地说：统帅（或国务活动家）的艺术表现为认定作战目标和指出达到这一目标途径的能力。从战略上论证这一点的能力恰恰表现为得到知识充实和天才点拨的战略思维的远度、广度和深度，因为战略思维的能力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的，而是相当少见的。

斯韦钦教授说：“不可能从教科书中研究出领袖的艺术……只有生活本身或它在历史上的反映才是政治家或战略家的导师。”

我以为，这些话对我们很合适，将准确指引我们进一步的思路。

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确实如斯韦钦所说建造了一个可以看到“遥远地平线”的“理想的奠基石”；他显然完全独立进行宏伟的战略设计（理论及其实施），因为他领导全国和全军走的是一条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道路。

上面已经指出，我不去描述斯大林丰富多彩的活动，只打算叙述最终导致他获得大元帅崇高称号的事和问题。

在和平建设时期的理论和实践上就表现出斯大林的战略思维。我们只指出两个伟大成就——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没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将孤立无援，在希特勒进攻之前就已被击溃

摧毁，因为它在军事上是一个没有自卫能力的地区。手持步枪的红军步兵和手持马刀的红军骑兵无法击退装备了无数现代化武器的协约国军队（和其他兵团）的又一次十字军东征。

在几个五年计划时期实现的工业化使苏联能建立起国防工业和现代化武器装备——这是斯大林的战略预计和他目光远大的先见之明。

斯大林在1925年4月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说，苏联拥有实现列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纲领所必需的一切。

大多数党组织在讨论斯大林的讲话时都支持他的战略纲领，但托洛茨基分子立即就投入了论战，他们主要的反对意见是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

斯大林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探讨了反对派提出的可能的国民经济发展路线：

“两条总路线：一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我们还应该在长期内保留为一个农业国，应该输出农产品而输入设备，并且应该坚持这条道路，今后也应当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下去。这条路线实际上是要求收缩我国的工业……这条路线将使我国永远或者差不多永远不能实现真正的工业化，将使我国客观上必然由依靠国内市场的独立的经济单位变成资本主义总体系的附属品。这条路线就是要离开我国建设方面的各种任务。

这不是我们的路线。

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更生生产出必要设备的工业国，这才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①

斯大林认为这才是我国国防能力可靠的支持，“否则我们会被打垮”。对他的战略远见不需要再作评论。

斯大林说，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现有的矛盾应予解决，也必将解决：

“谁不相信这一点，谁就是取消社会主义者，谁就是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能够克服这些矛盾，并且我们已经在克服这些矛盾……但是如果没有外援，我们也不会垂头丧气，不会喊救命，不会抛弃自己的工作，也不会惧怕困难。谁疲倦了，谁被困难吓倒了，谁失掉了理智，那就请他让路给那些保持勇气和坚定性的人。

① 参看《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46~247页。——译者注

我们不是怕困难的人。我们既然是布尔什维克，我们既然受过列宁主义的锻炼，也就不会逃避困难，而会面向困难并去克服困难。”
(喊声：“对！”鼓掌)^①

季诺维也夫的副报告颠三倒四，基本上是由胡乱摘引的语录拼凑而成的，其中没有提出正面的纲领。有人在座位上喊起来，说他的报告“舍本求末”。

加米涅夫的发言长达两个多小时。他对党和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的指责，直到讲话快结束时他才公开了反对派的主要意图：希望改变党的领导机构，首先是撤掉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

代表们在座位上喊了起来。

“我得把话讲完。正因为我不仅一次告诉过斯大林同志本人，正因为我不仅一次告诉过一批列宁主义者同志，我要在大会上再重复一下：我确信斯大林同志不能履行团结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作用……”

会场上闹了起来，代表们喊道：“不对！”“胡说！”“原来如此！”“摊牌了！”只有列宁格勒代表团为加米涅夫鼓掌，但是整个会场的人起立为斯大林欢呼。

伏罗希洛夫请求发言，他说：

“斯大林同志是总书记，当然是书记处成员，同时又是政治局委员。很遗憾，同志们都没有参加过，哪怕是参加过一次书记处会议、组织局和政治局会议，也就是按加米涅夫同志设想应高于实际执行我党决议的一切机关的会议。同志们，政策是政治局而不是斯大林一个人决定的。”

斯大林在总结发言时没有为自己辩护，他说：

“……我不打算重复那些个人的攻击和各种纯粹带个人成分的狂言，因为我认为代表大会拥有充分的材料来审查这些攻击的动机和内幕……党要求统一。如果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也愿意这样，党就和他们一起去达到这种统一；如果他们不愿意，党没有他们也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89页。——译者注

要达到这种统一。”（呼喊声：“说得对！”鼓掌）

斯大林继续说道：

“我们应该有统一，只要党，只要党代表大会显示出刚强性而不怕恐吓，就一定会有统一。（喊声：“我们是不怕恐吓的，这里都是些久经战斗的人。”）如果我们中间有人想肆意妄为，那人们就会来制止我们——这是必需的。离开集体来领导党是办不到的。在伊里奇逝世以后，谁要幻想这点，那是愚蠢的，（鼓掌）谁要讲到这点，那也是愚蠢的。”^①

列宁格勒代表团团长季诺维也夫在他对斯大林的攻击没有得到支持后，同加米涅夫一起建议代表大会移到列宁格勒去开会。代表们识破了这一诡计。代表大会谴责了派别分子的分裂活动。对此季诺维也夫带领列宁格勒代表团退出会场。他们回到列宁格勒后蒙骗了当地的许多同志，竟促使省委作出了一个闻所未闻、没有先例的决议——禁止各级党组织讨论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材料。反对派阻挠《真理报》在列宁格勒的发行。《列宁格勒真理报》成了反对派的思想喉舌。12月25日《列宁格勒真理报》的社论号召不服从党代表大会的决议。

对此代表大会于12月28日通过了《致列宁格勒党组织全体党员的呼吁书》，对反对派的挑拨活动作出了原则性评价。

在秘密投票选举新的党中央委员会时，三分之一的代表大会代表投票反对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季诺维也夫（拉多梅斯尔斯基）说：“党代表大会上的选举好像是按民族特征进行的。”

斯大林再一次当选为总书记，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担任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会议的主席并主持了开幕式（在这次会议前，根据列宁时代确立的传统，政治局会议都是由人民委员会主席^②加米涅夫主持）。

斯大林没有浪费时间。在代表大会闭幕后过了两个星期，1926年1月18日列宁格勒的权力从季诺维也夫手中转到斯大林的朋友和志同道合者谢尔盖·米龙诺维奇·基洛夫的手中，季诺维也夫被撤销一切职务。不久在莫斯科加米涅夫也被撤销一切职务。

反对派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在各种媒体上群起攻击斯大林。托洛茨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92、327~328页。——译者注

^② 原文如此，有误。列宁在世时，列宁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去世后由李可夫继任。加米涅夫只担任过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译者注

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自发的群众集会上试图破坏党的领导司令部的工作，硬要这个司令部成员参加没完没了的一次又一次的争论，他们举行秘密会议，成立地下小组，散发派别性文件。

1926年6月6日在莫斯科城郊树林中反对派分子举行了会议。他们采用了接头暗号、放哨和其他保密手段。季诺维也夫参与组织这次会议，而候补中央委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拉舍维奇在会上号召与中央委员会作斗争。

5月底斯大林去了格鲁吉亚。6月2日他去视察外高加索第一个水利设施泽莫-阿夫恰拉水电站。斯大林在视察水电站后在贵宾簿上用格鲁吉亚文题辞说：“我们参加这一建设工作的工人、技师和工程师万岁！”

6月3日晚斯大林观看了梯弗利斯国立芭蕾舞剧院的演出。他在幕间休息时和作曲家巴兰奇瓦泽谈了他的歌剧《塔马尔·茨比也利》以及整个格鲁吉亚歌剧音乐。斯大林指出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对格鲁吉亚作曲家创作的影响很明显，这是格鲁吉亚音乐最正确、最有成效的途径。

6月8日斯大林在梯弗利斯铁路总工厂工人大会上作关于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报告，斯大林是在这个工厂里开始他的革命活动的。

7月4日斯大林回到莫斯科。在这里有许多重要事务等着他。

7月14~23日反对派分子在中央全会上再一次发言攻击斯大林。斯大林在7月22日的讲话中驳斥了季诺维也夫撤销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的要求，指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方针与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要求派别活动自由就等于使党丧失领导全国政治经济生活的可能性。斯大林强调指出：

“党可以而且应该容许党内开展批评和意见交锋。但党不能容许破坏党的决议，破坏党的约束，破坏统一的基础……”

反对派分子又提出“列宁遗嘱”问题。他们试图利用这封信中对斯大林性格特点的批评来破坏他的威信。

派别分子散发列宁“遗嘱”（他们把这封信称作“遗嘱”），但删去了信中提到有关托洛茨基的非布尔什维主义以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17年10月的背叛行径的文字。

斯大林受政治局委托在中央全会上宣读了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全文。

全会进行了长时间的热烈讨论。谢·米·基洛夫、维·米·莫洛托

夫、格·康·奥尔忠尼启则、扬·埃·鲁祖塔克等许多人纷纷发言揭露反对派分子。反对派分子受到严重警告：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政治局、拉舍维奇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被解除了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其他参加莫斯科城郊林中秘密会议的人受到警告。

1926年10月11日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说：

“无疑地，反对派是惨败了。同样很明显的是，在党的队伍里对反对派的愤慨正在增长。”^①

中央全会在10月底认为季诺维也夫不能在共产国际中继续工作，而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不能继续留在政治局中。

这在布尔什维克党史上第一次产生了著名的“犹太人问题”，这是因为在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中大多数为犹太人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处事谨慎的斯大林立即就此作了说明：“我们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是因为他们是反对派分子。”但斯大林仍然被指责搞反犹太主义。

他作为在正教文化环境中长大的人，作为消息灵通的人，不能不知道、不明白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的作用。但这与诬蔑他搞的肤浅的反犹太主义完全不是一回事。如果斯大林是反犹太主义者，他就不会容忍他十分尊重和重视的卡冈诺维奇和梅赫利斯长期呆在他的身边。斯大林的许多战友娶了犹太人为妻，他要是反犹太主义者的话，凭他的权势，完全可以禁止他们这样做。例如，莫洛托夫的妻子热姆丘任娜、伏罗希洛夫的妻子戈尔布曼、加里宁的妻子洛尔别格、基洛夫的妻子马库斯、古比雪夫的妻子科甘、加米涅夫的妻子勃朗施坦（托洛茨基的妹妹）、苏斯洛夫的妻子苏济米尔斯卡娅以及其他一些国务活动家和军队领导人的妻子都是犹太人。

不断有人说，“耶和華的女儿”嫁给有权势的人为妻不是偶然的，对此是有考虑周密、组织巧妙的计划的，这个计划是由被我们称之为“他们”的犹太复国主义统一中心制定和实施的。

我们由于没有这方面的文件作证（除了生活中的事实），因而不去深入谈论这个微妙的但又明显的话题。

斯大林对生活在俄罗斯的各民族、尤其是对俄罗斯民族、对历史的伟大功绩，是他发现了、明白了以“世界革命”为旗号的犹太复国主义的进攻，并且敢于与之作斗争。

①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87页。——译者注

斯大林的战略天才表现为忍耐和坚毅，当他还没有拥有决定性权力（这时这个权力由托洛茨基及其志同道合者掌握）时，便同反对派分子进行论战，逐步加强自己的权力，挑选战友，赢得党和人民的信任。

斯大林在达到既定目标（建设社会主义）上的坚定和果断，表现在他与公开的和隐蔽的敌人作无情的斗争，甚至对积极的密谋分子采取恐怖行动。

斯大林拯救了国家，打退了犹太复国主义的进攻，而犹太复国主义的代理人正渗透进党和国家机关、惩罚机关、工会和创作团体的各个领域。他的这一胜利可以与战胜1941~1945年德国入侵的胜利等量齐观。

犹太复国主义者永远忘不了斯大林使他们遭到的失败。今天和今后他们将永远辱骂斯大林，给他抹黑，向他发泄怒火，因为他使他们失去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几乎已达到的神圣目标——通过控制俄罗斯来统治世界。

斯大林使他们不能摧毁俄国并在其版图内建立起自己的“乐土”。

十 争夺军队的斗争

斯大林在逐步加强他在党内的地位时，十分担心军队的状况，因为托洛茨基完全控制了军队，他是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在国内战争时期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和权力，几乎所有的指挥部门和政工部门的领导职务他都派忠于他的人去担任。

军人们知道斯大林是一位党的领导人，他在军队中的影响很小。

军队在托洛茨基派和斯大林派的斗争中可以成为决定性的力量，这一点斯大林很清楚。1923年他第一次尝试削弱托洛茨基的地位。例行的中央全会建议让几位中央委员参加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之下设立一个由中央委员（包括斯大林）参加的执行机构。

托洛茨基断然反对这些建议，甚至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写信，指责以斯大林为首的党的机关不是要对革命军事委员会进行改革，而是在搞对他托洛茨基本人的阴谋，斯大林在经济政策和军事政策上犯了许多严重错误。

反对派对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的行动推波助澜，给政治局寄去了“46人声明”。46名身居要职的军事和党务活动家在声明中支持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翻印了这封信，并把它寄发给各级党组织和部队，在其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斯大林还没有得到军人的广泛支持，他在地区组织中影响较大。他

在1923年10月召开了俄共（布）中央全会，在会上指出已发生的矛盾的实质是托洛茨基试图在党内制造危机，破坏党的统一。中央全会支持了斯大林，谴责了派别分子以及“46人声明”。

斯大林在1924年1月举行的俄共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巩固了他的胜利，代表会议的决议不仅谴责了派别分子，而且要求“对他们严加惩处”。

但是托洛茨基本人仍一如既往担任军队的领导职务。斯大林开始在军人中寻找削弱托洛茨基影响的机会。由托洛茨基的忠实战友安东诺夫-奥弗申柯领导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是托洛茨基手中的强大武器，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号召军队中的共产党员表示对中央委员会的不信任，实质上是对中央委员会和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嗤之以鼻。斯大林依据这些决议解除了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这个派别分子的职务。

出现的问题是：由谁来担任这个重要的负责职务呢？斯大林同他的志同道合者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商量。

“也许可以任命布勃诺夫？”伏罗希洛夫问道。

“他可是签署了‘46人声明’的。”斯大林表示不同意。

布琼尼说：“他签了名，但他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在国内战争期间很了解他，他是我们的人。”

“他好几次支持过反对派分子。”斯大林坚持自己的看法。

伏罗希洛夫支持布琼尼的意见，说：

“我也知道布勃诺夫是一位正直的共产党员，我不止一次同他开诚布公地谈过。他在列宁去世后坚定地站在我们这一边。他过去和托洛茨基分子来往，这更好，托洛茨基因此不会反对任命他。”

后来斯大林同布勃诺夫见了面，确信他是忠诚的。为了加强新的总政治部主任的地位，斯大林任命了一个中央的委员会，其任务是研究军队的状况。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安·安·安德列耶夫（主席）、安·谢·布勃诺夫、克·叶·伏罗希洛夫、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米·瓦·伏龙芝和尼·米·什维尔尼克。

斯大林的拥护者们对武装力量进行了深入的、甚至可以说是寻根究底的调查，1924年中央二月全会讨论了调查的结论，这个结论简直是毁灭性的，决议指出了“导致军队瓦解的”缺点，提出了实施健全和加强武装力量广泛措施的方针。

全会责成被任命为托洛茨基副手（此前由托洛茨基的支持者斯克良斯基担任）的伏龙芝贯彻这些决议。伏龙芝还兼任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和军事学院院长。托洛茨基仍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但斯大林让自己的支持者（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布勃诺夫、奥尔忠尼启则）进入苏联革

命军事委员会。不久斯大林通过新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撤换了莫斯科军区司令——任命伏罗希洛夫取代托洛茨基分子穆拉洛夫。

布勃诺夫加强了斯大林一派的地位，他干得十分积极，很有成效。1924年5月成立了由他担任主席的委员会，清洗了各军事院校的教师队伍。

但是军队的主力——兵团和部队——仍然由托洛茨基的支持者领导，在部队的指挥员中有很多托洛茨基分子。应该找到一个摆脱军队中这群势力强大的人的办法。斯大林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合法的、据说是实践提出的借口。他收到了由14名高级指挥员写来的报告，这些人中有国内战争的英雄德宾科、费季科、沃斯特列佐夫、法布里齐乌斯、加伊等。他们建议立即在红军中实行一长制，即废除政治委员制度。他们说之所以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政治委员当年履行的是政治领导人的使命，而现在经验丰富的指挥员大都是共产党员，不再需要受人监护。更何况政治委员勾心斗角，打小报告，日常生活中常常挑起无谓的争吵。

从这封信适时地出现、内容与斯大林的意图吻合、信的签名者的构成（其中没有一个托洛茨基分子）来看，可以推测这封信是总书记本人授意写的。这一推测得到支持，还因为斯大林本人并不采取措施，而是把这个报告转给总政治部布勃诺夫处，请他谈谈自己的考虑。

我不知道，布勃诺夫是和斯大林商量过（为了麻痹托洛茨基），还是出于自己的主动（出于同样的目的），起先并不同意军事指挥员们的建议。他的理由是，1923年托洛茨基本人也曾采取过类似措施，他的第511号命令甚至容许党外指挥员身边也不设政治委员。当时这个命令被认为是错误的，被撤销了。因此布勃诺夫问道：“我们现在会不会歪曲党的路线？”他担心立即撤销政治委员会牵涉到很多人，会引起不满的爆发，所以建议逐步实行一长制。

但这其实是在玩弄文字游戏，布勃诺夫实际上并不反对14人的报告，而是更加坚决地执行斯大林的路线，因为他建议切实地从政治上培养一长制的指挥员，这实际上就是不让托洛茨基分子进入其中。

1924年6月成立了由布勃诺夫任主席的俄共（布）中央组织局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拥有特殊权力可以来判定一长制指挥员和整个陆海军军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这个委员会和它的分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方法是亲自接触部队和机关的军人（不相信履历表和文件），而且通过报纸广泛开展解释工作，让不持托洛茨基立场的指挥员和政治委员不必担心自己的前途，因为他们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一长制首长。

与这个清洗工作同时进行的是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部队里取下了宣扬托洛茨基是“红军领袖”的标语和宣传画，改变了政治学习的内



容（不再说“托洛茨基是红军的领袖”，而是说“红军的领袖是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来这又改为“党的领导”）。布勃诺夫的小册子《军队纪律和党的组织》作出了应有的结论，肯定了党组织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

1924年11月，陆海军政治机关（经过革新和清洗后的）领导人举行会议，会议决议谴责了托洛茨基主义及其使军队脱离党的领导的阴谋，建议在中央全会上提出撤掉托洛茨基担任的重要职务。1925年1月中央全会研究了这一得到莫斯科、明斯克、基辅、第比利斯、巴库等地党组织支持的建议，免去了托洛茨基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的职务。米·瓦·伏龙芝被任命为这一职务，而克·叶·伏罗希洛夫被任命为他的副手。

斯大林把自己的路线贯彻到底：把总政治部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编制中取消，成立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其权力相当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一个部；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当选为中央书记；军队组织与地方党委的联系一律取消。从此军队党的机关由中央委员会及其总书记斯大林直接领导。

应该承认，斯大林在托洛茨基及以其为首反对派在陆海军中占优势这种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所做的这一工作十分艰巨。只是由于斯大林及其支持者的策略精明而且贯彻始终，他们才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斯大林从此之后直至他去世都是红军，后来是苏军的一长制首长，成了它的大元帅。

正如《国际歌》中所唱的，他完成这一切“全靠……自己”。他的行动实在坚强有力！

但是党在克服对托洛茨基的崇拜后，并没有摆脱这一毛病，此后逐渐演变成了对斯大林的崇拜。实事求是，不能也不应否认这一点。1930年发表的伏罗希洛夫的文章《斯大林和红军》开始了夸大斯大林的军事功勋。文章不顾事实，硬说斯大林在组建红军中起了领导作用。把斯大林在国内战争中参与各方面军的活动吹捧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主要事件。

梅赫利斯继续干这件坏事（归根结底不是抬高了斯大林，而是败坏了他的名声），他在担任《真理报》主编时，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年复一年地助长歌功颂德的狂热。

斯大林在同作家和记者谈话时对这些毫无分寸地吹捧他的奉承话不屑一顾，但他并没有及时采取坚决措施制止越演越烈的个人崇拜，因此后来受到了十分公正的责备和谴责。

十一 农业集体化

在我的桌上放着四卷本的《托洛茨基收藏文件集》，其中收集了1923~1927年关于“苏联共产党反对派”的文件。托洛茨基曾把这些文件带出我国，在1940年8月卖给了哈佛大学。

这四卷收入了托洛茨基收藏的大量档案材料中的政治局决议的复印件、托洛茨基的各种“呼吁书”和给他的来信，这些材料都涉及30年代苏联领导层中争夺权力的斗争。

这些文件提出了某些问题或者否定了中央全会和代表会议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实际上这导致了没完没了的争论，搅乱、妨碍了工作。人们全都厌倦于毫无益处的争论，但托洛茨基主张继续进行派别斗争。1926年10月3日他专门写了冗长的文章《是否需要争论?》。下面是文章的片断（作了大量删节）：

“现在党内自上而下疯狂地反对一切争论。《真理报》在文章中论证说争论是有害的和危险的。但没有一个人指出该如何来解决争论的问题……”

《真理报》和反对争论的演说家们说，所有这些问题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都已解决。但实质上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已经过去了一个月。”

接着托洛茨基完全无视党章关于全体党员必须执行而不是讨论代表大会（在集体讨论后）作出的决议的规定，用两页篇幅又列举和提出了已经谈论得过了头的问题。

托洛茨基并没有忘记党内是有一定纪律的，他说：

“可以说中央委员会少数应该服从多数，这毫无疑问；可以说某某中央委员违反了纪律，因此应该给他们处分。但这并没有取消关于党代表大会的问题，问题是应该让党能够从新事实、新经验的角度来检验它的旧决议。

糟糕的是，某些同志，甚至是《真理报》编辑部以为有人可以抛开党作出的决定。他们说，争论是有害的和危险的。但是这样说太随便了，党讨论争论的问题竟然是有害的和危险的。那么有意见分歧时该怎么办呢？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对我们作出回答。应该采取一切措施来保证正确的党的争论方针，但想绕开争论的人，就是

想绕开党。任何人都不能代替党作出解决问题的决定。要争论的不是是否要进行争论，而是迫切的主要问题，我国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取决于这些问题。

列·托洛茨基

1926年10月”

这篇文章即使经过删节后也能使人看出托洛茨基确实是一个论战高手。争论在继续。托洛茨基给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则写信，提出了苏联的国防问题。他要求撤换党的领导人，因为国内的热月开始了。

热月不是指法国共和历史上的一个月（7月19日~8月18日），而是特指推翻了罗伯斯庇尔专政政变的那个月。这是法国政治斗争的转折点，其结果是推翻了专制制度。

托洛茨基继续指责斯大林攫取了专制权力，坚持要为了拯救党而发动热月政变，即解除斯大林的领导职务。

托洛茨基在其两卷本的《斯大林评传》中用了大量篇幅来证明斯大林就其能力来说是一个“庸人”，他由于文化水平不高而且俄语掌握不好是一个蹩脚的演说家。

我以为应该不是空口无凭地反驳托洛茨基的这个说法，而应引用斯大林当时的一次讲话片断。

当时斯大林使用谚语，开着玩笑，对他的论敌冷嘲热讽。请看他是如何评论加米涅夫在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的：

“加米涅夫担当一种‘工作’，就是要证明列宁的一篇论述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重要文章（1915年）似乎与俄国无关，证明列宁在讲到这种可能的时候，指的并不是俄国而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可见加米涅夫担当起这种可疑的‘工作’就是为了给托洛茨基打扫道路，因为托洛茨基的‘公式’已经被列宁在1915年所写的论文驳倒，而且不会不被驳倒。

说得粗一点，加米涅夫是在扮演给托洛茨基当打扫道路的清道夫的角色。（笑声）当然，看到列宁研究院院长给托洛茨基当清道夫是可悲的，这倒不是因为清道夫的工作有什么不好，而是因为加米涅夫无疑是一个高明的人，我以为他可以从事其他更高明一点的工作。（笑声）但是，他甘愿担当这个角色，当然，他完全有权这样做，这是没有办法的……”^①

①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83~284页。——译者注

斯大林接着十分严肃、不开玩笑地用事实和列宁的著作来证明“清道夫”加米涅夫和“主人”托洛茨基的意图十分荒谬。

他在结束讲话时说：

“季诺维也夫有一个时候夸口说，他会把耳朵贴在地上，（笑声）当他把耳朵贴在地上的时候，他就听到历史的脚步声。很可能事实上真是这样。但有一点还是应当承认的，会把耳朵贴在地上并听到历史脚步声的季诺维也夫，有时却听不到某些‘小事’。也许反对派确实会把耳朵贴在地上并听到像历史脚步声那样了不起的东西。但是不能不承认，反对派能听到了不起的东西，却听不到‘小事’：党早已不理睬反对派了，反对派已一筹莫展了。这一点他们却没有听到。（喊声：“对！”）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是反对派的耳朵大概有毛病。（笑声）

因此，我们要奉劝可敬的反对派分子，治一治你们的耳朵吧！”
（热烈鼓掌多时）^①

反对派分子不去完成国民经济任务，不去执行代表大会关于工业化的决议，却继续破坏党的统一，挑起各种争论，中伤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1927年9月他们向联共（布）中央提出了“13人纲领”。这个纲领称作“13人纲领”，是因为它是由包括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等13个托洛茨基分子签署的。这个纲领是一个篇幅很长的文件，它的正式名称叫《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向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交的纲领草案（党的危机及克服危机的途径）》。纲领用近100页分12章详细阐述了国际问题、国民经济问题、党的问题和主要的一点：争夺权力的斗争和撤换斯大林。

纲领的逻辑十分混乱，把正确的党的论点和托洛茨基派观点混淆在一起。纲领颠倒是非，谎话连篇，目的只是为了在代表大会召开前拉着广大党员跟着他们走。

例如，为了中伤斯大林，把与他格格不入的农村改造的方法硬说成是他的（引自《托洛茨基收藏文件集》第4卷第125页）：

农业问题和社会主义建设

“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

^①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19~320页。——译者注

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4页）不是无产阶级国家依靠高度发达的工业，在大生产和集体化的原则基础上把千百万小农户和极小农户组织起来，从而克服他们技术上的落后，就是资本主义在农村中得到加强，将损害城里的社会主义基础……

引证列宁的话的目的是为了把共产党员拉到反对派一边来。至于斯大林正是遵循了列宁的这一教导，反对派却绝口不提。相反，下面的几段文字把斯大林说成是明目张胆的反对列宁分子和布哈林的同谋。

“斯大林—布哈林集团从以下几个方面修正农业问题上的列宁主义：

1. 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论点，即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能帮助农民依靠集体主义原则改造农业。（而斯大林正是这样主张的。——本书作者注）

2. 对作为农村中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基础的雇农和贫农估计不足。（斯大林就是这么说的！——本书作者注）

3. 在农业中依靠所谓的‘殷实’农民即实质上的富农。（斯大林从来没有这样讲过！——本书作者注）

4. 无视或干脆否认农民所有制和农业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这意味着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走向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

5. 对目前农村资本主义发展因素估计不足，抹杀农民的分化。

6. 建立使人丧失警惕的理论，说‘富农和富农组织反正走投无路，因为在我国总的发展框架是由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早就规定的’。（这是布哈林说的，见他的《走向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第49页，托洛茨基派却又把这一点硬说是斯大林说的。——本书作者注）

7. 持‘富农合作族’长入‘我们的制度’的方针。（见布哈林：同上，第49页。——本书作者注）把问题说成是，应该取消对富裕农民、富农经营条件的限制。（斯大林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本书作者注）”

其他章节中也隐藏着这样的对斯大林赤裸裸的污蔑。机会主义分子要求发表他们的纲领以开展代表大会前的争论。

他们的要求被拒绝了，于是他们在莫斯科、哈尔科夫、列宁格勒建立了地下印刷所，自己开始印刷这个纲领和其他材料。因此，反对派分



子不仅违背了党的纪律，而且破坏了苏维埃法制。在莫斯科查获了由姆拉奇科夫斯基建立的秘密印刷所，他被捕了，托洛茨基开始为他们辩护，公开声援搞地下活动的人，吹捧他们，把他们叫做正直的斗士。

10月21~23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研究了反对派的问题。全会听取了关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派别活动的报告并进行了讨论，让反对派分子说出自己的看法。反对派老调重弹，指责党及其领导人。

斯大林在全会上讲话时说：

“首先谈个人的问题。你们在这里都听到反对派分子多么不惜气力地使劲谩骂斯大林。同志们，这并不使我感到奇怪。他们的主要攻击之所以针对斯大林，是因为斯大林也许比我们某些同志更清楚地知道反对派的一切诈骗勾当，要欺蒙他恐怕不那么容易，于是他们就首先打击斯大林了。那又有什么呢，任凭他们去骂吧……”

不仅如此，反对派把自己的全部仇恨都集中在斯大林身上，我还认为对我是件光荣的事情。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以为如果蓄意破坏党的反对派竟恭维起保卫列宁党性原则的斯大林来，那才奇怪，那简直是一种侮辱……”^①

反对派分子又一次提出了隐瞒“遗嘱”和列宁对斯大林的批评的问题。斯大林证明根本不可能对党“隐瞒”列宁的这封信，他说：

“有人说，由于斯大林‘粗暴’，列宁同志在这个‘遗嘱’里建议代表大会考虑由其他同志接替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的问题。一点不错。是的，同志们，我对待那些粗暴而阴险地破坏并分裂党的人是粗暴的。这一点，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掩饰过。也许对待分裂分子要有某种温和态度，但是这个我做不来。我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后的中央全会第一次会议上就请求中央全会解除我的总书记职务，代表大会本身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每一个代表团都讨论过这个问题，所有代表团，连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在内都一致责令斯大林留在自己的岗位上。

我有什么办法呢？从岗位上溜掉吗？这不合我的性格，我从来没有从任何岗位上溜掉过，也没有权利溜掉，因为这样做就是逃兵行为。我这个人，以前已经说过，是个不由自主的人，只要党责令

^①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48~149页。——译者注

我，我必定服从……”^①

全会研究了关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地下派别活动的问题，决定把他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但他们不仅继续争论，而且开始公开行动。1927年11月7日，在十月革命10周年的那天，反对派分子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组织了自己的反示威游行。民警救了反对派分子，使他们不致受到愤怒工人的攻击，否则他们要被揍得半死。

1927年12月2日举行了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在报告中谈了主要的一点：工业化计划执行得很顺利，建立了国家的煤炭冶金基地，正在建设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第聂伯河国家建设工程、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建设工程、库兹涅斯克建设工程、罗斯托夫农业机器制造厂、萨拉托夫联合收割机厂、高尔基和莫斯科的汽车制造厂、突厥斯坦—西伯利亚铁路，还有许多其他规模较小的建设项目。而这一切建设没有依靠一点外国贷款，尽管困难重重：工人吃不饱、睡不够、住在工棚里，但是人们热情高涨，相信斯大林，赞同他的政策。

斯大林指出农业落后于工业的现状，确定了摆脱这一危及国民经济局面的出路。

斯大林说：

“出路就在于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以公共耕种制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就在于转变到以高度的新技术为基础的集体耕种制。出路就在于逐步地然而一往直前地不用强迫手段而用示范和说服的方法把小的以至最小的农户联合为以公共的互助的集体的耕种制为基础、利用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采用集约耕作的科学方法的大农庄。

别的出路是没有的。”^②

请注意，反对派分子在上面引用的《托洛茨基收藏文件集》中的材料硬加给斯大林在农业问题上的罪名。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大力开展农业集体化的决议。代表大会同时指示要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斯大林就是在热火朝天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提出了新的宏伟任务——农业集体化。

^①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51~152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261页。——译者注




斯大林的报告中有一章叫《党和反对派》。下面摘引自大会的速记记录，从中可以看出对代表大会前争论的总结和代表们的态度。

“你们要问：为什么我们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呢？因为我们不愿党内有贵族存在，因为我们党内只有一种法律，并且全体党员的权利都是平等的。（呼喊声：“对！”鼓掌多时）

如果反对派希望留在党内，那他们就必须无附带条件地毫不含糊地服从党的意志、党的法律、党的指示。如果他们不愿意这样做，那就让他们到他们认为比较自由的地方去吧。（喊声：“对！”鼓掌）我们不愿意而且绝不会为反对派制定一些优待他们的新法律。（鼓掌）

有人问到条件。我们的条件只有一个：反对派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组织上都必须完完全全解除武装。（呼喊声：“对！”鼓掌多时）

他们必须在全世界面前老实地放弃自己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观点。（呼喊声：“对！”鼓掌多时）^①



斯大林关于集体化和高压方法写了不少文章和著作。实事求是地说，不能否认他采取过高压政策、强制措施，甚至逮捕和流放过人，在建立集体农庄时几十万人吃了强硬措施的苦。但是有另一条道路吗？是谁在实行高压政策？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斯大林记得我们的国家，尤其是军队在国内战争期间由于缺粮而遭受了多大的、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困难。年轻的共和国不止一次遇到过能不能生存下去的问题。向个体农民收集粮食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因为余粮收集制、税收、一切强力的税赋使农民远离党，而党的政策的基础是工农联盟这一公设。当城里的“盟友”拿了枪到农村去收粮，这还算什么联盟呢？

在“战时共产主义”年代这还可以解释，而在和平时期，尤其是将来，应该寻找另一条道路。斯大林及其战友找到了这条道路，这就是农业集体化，因为农业集体化采用了技术设备、肥料，又有高度的劳动组织，可以提高产量，尤其重要的是一旦某些地区歉收，可以有计划地分配和再分配谷物和其他食品。我还是要强调指出斯大林的战略远见，因为有计划地、集中搞农业，将建立起战略储备，一旦爆发战争，可以不间断地向军队供应口粮。斯大林经常提起资本主义的包围和战争的

^①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01~302页。——译者注

威胁。

现在来回答第二个问题。

实际上集体化进行得很痛苦，因为千百年来与自己的土地紧密相连的农民不愿意联合成集体农庄。如果说贫农在稍作犹豫后开始与别人联合（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那么中农，尤其是富农，则拒绝使自己的产业集体化。于是出现了高压政策，偏离了原来预定的自愿加入集体农庄的计划。

今天人们习惯于把集体化时期的一切过火行为和高压手段都说成是斯大林搞的，但是文件和事实并没有证明这一点。斯大林的讲话没有一次号召过采取极端行为和强制手段，相反，倒是有斯大林写的或他参与制定的不少文件证明情况恰恰相反。

例如，1930年1月30日中央给我国产粮区联共（布）边疆区委和州委下发了由斯大林签署的指令，警告地方工作人员说：“地方来的材料说明，有一些地方的组织不抓集体化工作，却集中精力去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和土地，中央指出，这样的政策是根本错误的。中央指出，党的政策不是一味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和土地，而是发展集体化运动，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和土地只是这一运动的结果和一部分。中央要求不要脱离集体农庄运动的壮大来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和土地。我们的工作重心应该放在依靠真正的贫农和中农的群众运动上，建设新的集体农庄。中央提醒说，这样的方针才能保证党的政策能得到正确的执行。”

1930年3月2日发表了斯大林的著名文章《胜利冲昏头脑》，严厉批判了已犯的错误和过火行为。

为什么各地出现了许多的偏差呢？为什么集体化会给人们留下这样令人反感的负面印象呢？

我们该再来看看淹没在水下的冰山底部。表面上共产党员说该说的话，宣传集体农庄。但实际情况经常告诉我们，事实上共产党员并非全都是一模一样的。集体化时期的反对派与以前一样，采取了通过把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中央的指示推向荒谬地步的办法来败坏布尔什维克的声誉。反对派分子散布谣言，编造了种种骇人听闻的胡说。说集体农庄中的一切都是公共的，连妻子也要凭证或凭卡临时享用；集体农庄庄员睡觉要合盖一条被子；连家禽和小牲口也实行集体化等等。这一切使人反感，使人不愿加入集体农庄，而这正是反对派分子想要达到的目的。

超革命的过火行为以及制造不信任情绪和悲观情绪，达到了荒唐的程度。斯大林发现了反对派分子的两面派行为，在1928年11全会上



他说：

“例如右派说，‘不应该建设第聂伯河建筑工程’，相反地，‘左派’反对说，‘一个第聂伯河建筑工程对我们来说算什么，我们要每年建设一个第聂伯河建筑工程’，（笑声）——应当承认，这里显然是有差别的。

右派说，‘不要碰富农，让他们自由发展吧’，相反地，‘左派’反对说，‘不仅要打击富农，而且还要打击中农，因为中农也和富农一样是私有者’，——应当承认，这里显然是有差别的。

右派说，‘困难来了，还不是屈服的时候吗’，相反地，‘左派’反对说，‘困难对我们来说算什么，你们所说的困难我们根本不放在眼里——我们要开足马力向前飞奔’，（笑声）——应当承认，这里显然是有差别的。”^①

后来发现，反对派分子在集体化时期采取了积极的反革命行动。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等利用富农和部分中农的不满，力图通过组织暴动来挑起国内战争。李可夫在法庭审判时谈到了这一点。

“李可夫：我和布哈林有过公开言论，关于其他人，我不能说他们是否公开支持过右派的纲领。

在这一所谓的公开斗争时期，除了合法的公开斗争，还立即形成了右派的秘密中心，成员有我、布哈林和托姆斯基。中心是自发形成的，因为我们三个人都参加了政治局。我们领导了斗争。这个中心保存了下来，直到最近还在进行反革命活动。

秘密工作的内容是，在那个时期（1928~1930年）在全苏联范围内开始建立这样的小组。

托姆斯基及其工会工作者、布哈林和他的关系，尤其是他的学生、他那‘学派’以及我和我的许多支持者，乌格拉诺夫及其在莫斯科的支持者，成了莫斯科反革命组织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下子就构成了右派组织。1930年前这个组织积蓄力量，利用公开行动来招募支持者并建立组织的一定声誉。为了这一目的，为了反对党的斗争，我们利用了工会代表大会。在工会代表大会上投票支持托姆斯基、反对党的93个人，几乎都加入了我们的反革命组织。当党代表大会作出决议，指出右派的观点与党员的身份不符后，我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100页。——译者注

们完全转入秘密状态。

因此，从1930年起反革命组织百分之百是秘密的，它的活动建立在欺骗党的基础上。

维辛斯基：这么说，欺骗党是你们广泛采用的办法吗？

李可夫：是的，当然是的，这是广泛采用的办法。

（如李可夫所说，托洛茨基分子在口头争吵中没有取胜后，就转而采取积极行动。）

李可夫：右派中心格外重视北高加索，不仅由于那里哥萨克和富裕农民占的比例大，有着特殊的传统，而且由于北高加索的政治经济作用，它是与乌克兰接壤、有着很多民族共和国并提供大量粮食的地区。

1932年埃斯蒙特特地去了那里，目的是为我们参与组织富农运动，因为那里的富农运动如火如荼。埃斯蒙特去那里我是知道的，他动身之前就和我谈过，此行的目的，如我已经说的，是大力激化北高加索的富农运动，促使这一运动扩展开去。此后他告诉我说，他和皮沃瓦罗夫取得了联系，除了埃斯蒙特，还派了布哈林组织的重要成员之一斯列普科夫去了那里。

维辛斯基：布哈林知道吗？

李可夫：我以为，是他主动提出的，布哈林不会否认这一点。我派了埃斯蒙特和斯米尔诺夫，而他派了斯列普科夫。

维辛斯基：斯列普科夫去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李可夫：详细的任务是布哈林布置的，但基本任务，如我所说，是大力激化富农的不满，直至发动各种公开的行动。

维辛斯基：换句话说，是为了组织富农行动、富农暴动吗？

李可夫：当然。我已经说过。只有在没有武装行动的条件时，才组织非武装行动。

维辛斯基：布哈林下达任务吗？

李可夫：布哈林下达任务我们是知道的，因此我认为我对此完全负有责任。

维辛斯基：被告布哈林，您想说什么？

布哈林：我肯定李可夫刚才在这里说的话。斯列普科夫被派往北高加索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维辛斯基：关于‘起义方针’的问题。‘起义方针’是什么？

布哈林：这就是说，在任何一个方向都有战略、策略、组织等等。起义队伍是一个组织范畴，而不是战略范畴，甚至不是策略范畴。我在使用术语时通常作这样的区分，因为我以为，可以作这样

的区分……

维辛斯基：当然可以。但我要问：在您的活动中有起义运动的方针吗？您是将其称之为‘起义方针’的吗？

布哈林：是的。是策略。

维辛斯基：而起义队伍的组织来自这一策略？

布哈林：对，这一组织来自……”

西方报刊推测说，被告供认自己的罪行是由于施加心理手段甚至使用药物的影响所致，被告看上去情绪沮丧。这与实际情况不符。请看布哈林的回答是何等的斩钉截铁。

“**维辛斯基：**这一点伊万诺夫说过了，您没说您给伊万诺夫下达过直接的指令，可是您却有‘起义方针’。

布哈林：完全可以理解，对于实际执行的人来说从这个方针中可以得出相应的结论。如果我采取这样的方针，那么我就对我虽然没有说过的结论负责。因此，从犯罪的角度看，我请求判定我两方面都有罪，我负责。

维辛斯基：您不请求我们也会判的。

布哈林：很对，不用我请求。我不认为这个地点和时间十分合适于说俏皮话。我也会说俏皮话的……

维辛斯基：我不想说俏皮话，也不在这种地方同您较量。我只想说，您的请求毫无意义，因为不管您是否请求都要判您的罪。

布哈林：检察员公民，这一点不作令人信服的解释我也懂。

维辛斯基：既然您懂，那这些话都是多余的。我问您另一个问题：这么说，您承认伊万诺夫在起义运动方针问题上的供认是准确的？

布哈林：是的，检察员公民。

维辛斯基：您以什么形式向伊万诺夫提出您的起义计划的？

布哈林：我仅仅以战略和策略的形式向伊万诺夫提出方针。

维辛斯基：要是您说的时候没有讲‘战略’、‘策略’这些词呢？

布哈林：我说，现在开始了必须采取群众性策略、支持富农起义运动等等的时期。

维辛斯基：我想明确的就是这一点。您承认，您和伊万诺夫说过，应该支持起义运动以至一切富农运动吗？

布哈林：我承认。



维辛斯基：这么说，1932年春天您地下工作中的一个最亲密的同谋斯列普科夫为了如李可夫所说全力组织富农行动，根据中心的直接指派，尤其是李可夫和布哈林的指派，去了北高加索。是这样的吗？

布哈林：我已经说过，我肯定李可夫在这里说过的每一句话。

维辛斯基：这么说，您派斯列普科夫去组织北高加索的富农暴动？

布哈林：是的，是我派他去发动暴动的。

维辛斯基：现在可以谈谈西伯利亚了……”

在西伯利亚反对派分子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反对派分子除了组织大规模暴动外，还在农民中开展挑起不满的广泛运动。托洛茨基分子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妨想一下加入俄共（布）的犹太共产党员，他们现在已经是市委、区委书记，检察官，法官〕似乎遵循党关于集体化的决议，并在这方面表现得十分卖力（实际上，他们又把事情搞到荒谬的地步），指望教唆各族人民，激起他们对布尔什维克，尤其是对斯大林的愤怒；托洛茨基分子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仅镇压富农，而且还镇压中农和贫农，只要他们一不小心表示了对集体化或对歪曲了党好心创举的过火行为的不满。

托洛茨基分子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全国各地的居民实行了种族灭绝。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鞑靼人和其他民族的人被投入监狱和劳改营。几乎每一个农村家庭的人至今提起集体化仍极为气愤，而这应该由反对派分子负责。

下面是应对大规模镇压农民负责的人员的不完全名单。我只列出反对派分子的上层领导人员，至于更广的各地的刽子手则要留待其他研究者去发现和披露。

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人民委员	亚戈达，亨·格·
其助手	阿格拉诺夫，雅·绍·（索连宗）
民警总局局长	别利斯基，Л. Н.
劳改营和流放点管理总局局长	贝尔曼，М. Д.
其副手	拉波波特，С. Г.
白海劳改营负责人	科甘，Л. И.
白海—波罗的海劳改营负责人	菲林，С. Г.
监狱管理总局局长	阿佩捷尔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派员

阿塞拜疆	普林斯
文尼察州	索科林斯基
远东边疆区	杰里巴斯, 捷·德·
西部地区	布拉特
哈萨克斯坦	佐林
基辅州	巴利茨基, 弗·阿·
列宁格勒州	扎科夫斯基
莫斯科州	雷登斯
奥伦堡州	赖斯基
北高加索边疆区	弗里德贝格
斯摩棱斯克州	纳尔克
中亚	皮列尔
斯大林边疆区	拉波波特
塔吉克斯坦	索洛尼岑
乌兹别克斯坦	克鲁科夫斯基
哈尔科夫州	卡尔松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重要工作人员

阿布拉莫维奇, A. A.	约翰松, E. Г.
阿布拉姆波利斯基, Г. Я.	卡茨, Ф. М.
鲍姆加特, B. C.	卡兹涅尔松, 济·波·
贝尔曼, M. Д.	克拉多夫斯基, Г. П.
瓦因施泰因, A. M.	库德里克, Л. М.
魏茨曼, И. Г.	库林, M. C.
魏茨曼, M. M.	库尔明, Ф. M.
沃达尔斯基, E. A.	勒贝尔, M. И.
沃尔夫宗, Я. Ф.	迈耶尔, Л. Н.
武尔, Л. Д.	明金, A. Г.
金丁, C. Г.	佩特, M. Л.
金兹堡, B. B.	普季利克, И. B.
戈尔德施泰因, K. A.	罗森贝格, C. A.
戈斯金, M. Ф.	雷布金, A. И.
格罗季斯, Г. B.	先克维奇, Э. И.
多尔夫曼, A. P.	索特尼科夫, Ф. И.
德门特, Я. M.	特里利塞尔, 梅·阿·

蔡德曼，В. Я.

蔡德曼，Д. Я.

扎林，Л. А.

伊万诺夫，И. И.

叶祖伊托夫，М. С.

福尔迈斯特尔，А. Р.

弗伦克尔，Н. А.

夏皮罗，А. Л.

施皮格尔曼，Л. И.

尤辛，И. Ф.

还可以列出法院，检察院，中央、州和区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类似名单。

因此，在实施集体化的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犯下的错误应由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来分担。何况斯大林的意图和所做的事中有正面的措施——自愿、说服；而相反，托洛茨基分子只有负面的镇压行动，以致破坏和败坏了集体化，这一点他们在法庭审理时都已供认不讳。

十二 背后一击

1932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胜利15周年，根据传统，红场上举行了阅兵式和劳动者的游行。

斯大林在他的战友们簇拥下站在列宁墓的主席台上，他的妻子娜捷施达·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随着工业学院的游行队伍走过主席台。她因为节日而十分快乐，她向丈夫挥手致意，同其他人一起高呼：“乌拉！”

她走过列宁墓后，和同志们告别，转身登上党的领导人妻子们的观礼台。

大家都兴高采烈，喜气洋洋。

当晚克里姆林宫里举行正式招待会，来宾们互相碰杯祝贺，著名演员表演了节目。

阿利卢耶娃和丈夫呆在一起，有时走到一边去和朋友们交谈。

没有一点发生不幸的征兆。

招待会后（第二天凌晨）伏罗希洛夫请亲密的朋友们去他家作客。斯大林夫妇也去了。

正是在这里发生了难以挽回的不幸事件。

关于这件事有很多传说，包括一些居心不良的人专门编造的谣言。

我以为，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所说的事件经过最确凿可靠。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妈妈的姐姐）说，在妈妈学院快毕业的最后一个星期里，她打算去哈尔科夫姐姐处……在那里找到符

合自己专业的工作，并在那里居住。安娜·谢尔盖耶夫娜不断反复地说，妈妈这个想法很执著，她很想摆脱使她感到难受的‘高级地位’。这个说法很接近事实。妈妈不是讲求实惠的女人，‘给’她的‘地位’对她毫无意义。

……妈妈不好意思坐轿车去学院，不好意思说出她是谁（许多人长时间里都不知道她是谁的妻子）。而那个时代生活要简单得多——父亲还像大家一样在大街上步行（不错，他从来更喜欢坐轿车）。这与其他人相比显得过分突出。她真诚地相信党内规定党员生活要朴素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她努力奉行这样的准则，因为对她本人、她的家人、父母以及她接受的教育来说这样做更合心意。

……问题在于妈妈有她执著坚守的生活观。她的性格中从来没有妥协，她属于革命年轻的一代——头几个五年计划时期干劲十足的劳动者，他们是信念坚定的新生活的建设者，是新人，虔诚地相信因革命而摆脱了市侩习气及以往一切缺点的人的新理想。妈妈以强烈的革命理想主义相信这一切，当时她的周围有着许多以自己的行为肯定这一理想的人。有一段时间父亲在她眼里是所有人中最崇高理想的新人。他在这个年轻的女中学生眼里就是这样的人，那时他是刚从西伯利亚归来的‘不屈不挠的革命者’，是她父母的朋友。他在地眼中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的人，但并不是永远如此……

我以为，正因为她聪明、内心格外真诚，终于明白了父亲并不是她年轻时以为的那种新人，她因此产生了可怕的、令人心如死灰的绝望……”

在工业学院里讲课的教授大都是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他们一天到晚恶意攻击斯大林所做的一切，指责他搞独裁。

1927年11月外交官越飞自杀。他身患绝症，再也无法忍受痛苦。但他是积极的托洛茨基分子，他的志同道合者们决定利用他的死来做文章，说越飞结束生命是为了抗议斯大林的政策。

于是葬礼变成了反对派的集会，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相继讲话，谴责斯大林，说他是越飞的死和全国的种种灾难的罪魁祸首。斯大林的妻子参加了葬礼，听了他们的讲话。这些讲话本就已使她心烦意乱，她的好友布哈林又常常火上浇油。

斯大林的妻子在工业学院上学时，一个狡猾的乡下人——学院党委书记（这说明他与托洛茨基有勾结）尼基塔·赫鲁晓夫成了与她有密切接触的人。阿利卢耶娃请他去家中作客。赫鲁晓夫性格开朗，善于钻

营，表面上看很老实。斯大林记住了他。斯大林在妻子去世后感到自己有责任，因此支持妻子的朋友赫鲁晓夫，提拔他担任区委和市委的职务。

赫鲁晓夫则有时在别墅里饮酒时为斯大林的客人打趣，逗他们开心，他弹着巴拉莱卡琴蹲下身子跳舞，唱粗俗不堪的四句头。

我们再回过来看斯韦塔兰娜对那不幸一天的叙述。

“我的保姆告诉我说，妈妈在去世前的一段时间里心情非常忧郁，容易发脾气。她中学的同学波林娜·谢苗诺夫娜·佩尔（她就是热姆丘任娜，莫洛托夫的妻子）常来她的家中作客。她们坐在我的儿童室（那里一向是“妈妈的客厅”）里谈话，保姆听到妈妈一再说‘一切都令人厌烦’、‘一切都叫人乏味’、‘什么都不能使人高兴’；而她的朋友问她：‘那么孩子呢？’‘连孩子也一样。’妈妈一再说。我的保姆明白了，既然如此，生活的确使她厌倦了……

遗憾的是，在1932年那个秋天亲人中没有一个人在莫斯科。帕夫卢沙和斯瓦尼泽一家在柏林，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和丈夫在哈尔科夫，外公在索契。妈妈学院快毕业了，她已十分劳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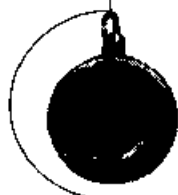
人们说她‘严厉’、‘严肃’得与年龄不相称，她看上去比自己的年龄大，因为她异常克制，务实，不喜欢‘散漫’。

……这种克制，这种可怕的内心的自制和紧张，这种不满和火气被强压在心中，在心里像弹簧一样越压越紧，最终必然爆发，弹簧将以可怕的力量反弹起来……

终于发生了这样的事。由头本身并不大，并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仿佛是‘没有什么由头’。不过是在庆祝十月革命15周年的宴会上的一次小争吵。‘不过是’父亲跟她说：‘喂，你喝吧！’而她‘不过是’突然喊叫起来：‘我就不给你，喂！’她站起身来，当着所有客人的面离席而去……”

波林娜·谢苗诺夫娜·热姆丘任娜跟着阿利卢耶娃走了出来。她们很长时间沿着克里姆林宫的小路走着。莫洛托夫的妻子是阿利卢耶娃最好的朋友，革命后她们有好几年住在一个住所里。波林娜·谢苗诺夫娜安慰阿利卢耶娃，把她送回了家。但是看来积累的情绪即斯韦特兰娜所说的那根弹簧已经到了极限：阿利卢耶娃开枪自杀了。

“我的保姆在去世前不久，感到她已不久于人世，有一次开始告诉我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她不想把这一切带走，她要净化心



灵，要作忏悔。我们坐在离别墅不远的小林子里，就是我现在写作的地方，她开始讲了起来。

卡罗利娜·瓦西里耶夫娜·蒂尔，我们的女管家，每天早上总是唤醒独自睡在自己房间里的妈妈。父亲睡在自己的书房里或餐厅旁的一间有电话的小房间里。那个晚上他也睡在那里，他从宴会上回来时已经很晚，而妈妈早就回来了。

这些房间离办公室很远，去那里要经过我们的儿童室旁的一条小走廊。出餐厅往左是父亲睡的房间，而进妈妈的房间要从餐厅往右拐，还要穿过这条小走廊。她的房间的窗户朝着亚历山大花园，门向着特罗伊茨基。

一大清早，卡罗利娜·瓦西里耶夫娜像往常那样，在厨房里准备早餐，然后去叫妈妈。突然，她浑身发抖地跑进了我们的儿童室，把保姆叫了进来，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们一起出去了，妈妈浑身是血，躺在自己床的附近，手里拿着帕夫卢沙有一次从柏林给她带回来的‘瓦尔特牌’小手枪。手枪开枪的声音很轻，家里的人都没有听到。她已经手脚冰凉了。两个女人担心父亲马上会进来，她们把遗体抬上了床，收拾了一下。后来，她们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惊慌失措地去给她们认为重要的人物打电话，打给警卫队长、阿韦尔·萨夫罗诺维奇·叶努基泽、妈妈的好朋友波林娜·谢苗诺夫娜·莫洛托娃。

很快他们全都跑来了，而那时父亲还在餐厅左边的他的小房间里睡觉。大家全都震惊了，不能相信发生的事……

父亲终于进了餐厅。‘约瑟夫，娜佳再也不能跟我们在一起了。’人们对他说。

保姆告诉我的情况就是如此。我比相信任何一个人更相信她。首先，因为她是绝对诚实的人；其次，因为她的讲述是对我的忏悔，而一个普通的女人，真正的基督徒在这个时候绝不会撒谎……”

为什么斯韦特兰娜要强调保姆说的经过是实情呢？为什么说她这个基督徒不会撒谎呢？

因为在阿利卢耶娃自杀后斯大林的敌人（正如后来基洛夫遇害后一样）散布谣言，目的是中伤斯大林，他们说斯大林杀害了自己的妻子，因为她和他的政治观点不一致。这个谎言至今有时还在被“民主派”传媒炒作。

斯韦特兰娜完全推翻了这些诽谤：

“……父亲被发生的事情所震惊。他感到震惊，是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会给他背后如此沉重的一击？他很聪明，知道自杀的人总是想‘惩罚’某个人——‘瞧吧’、‘活该’、‘你该明白了！’这一点他懂，但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惩罚他呢？”

他问了身边所有的人：难道他不关心她吗？难道他不爱她，不尊重她这个妻子，这个人吗？难道他不能和她多去一次剧院有这么重要吗？难道这重要吗？

开头几天他感到震惊。他说他也不想活了（这是帕夫卢沙舅舅的妻子告诉我的，她和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在开头几天日夜守候在我们家里）。大家怕把父亲一个人留在家中，他的情绪很坏。有时候他突然生起气来，变得很狂躁。这是因为妈妈给他留下了一封信。

看来她是那个夜里写的这封信。我当然从来没有看到过这封信，它大概当时就被烧掉了，但这封信是存在的，看到过这封信的人告诉了我。这封信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它充斥着指责和责怪。这不是一封私人信件，这封信某种程度上是一封政治信件。父亲读过之后会以为，妈妈只是表面上和他生活在一起，而实际上她却和当时的反对派站在一起。（托洛茨基分子在这方面也干了坏事！——本书作者注）

他因此感到震惊，怒火中烧，当他参加追悼会时，刚一走近灵柩，就用双手推开，转身离去了。他没有去参加葬礼……”

斯韦特兰娜·斯大林娜写下这些文字时已经成人，经历过坎坷的生活道路，她完全有根据说出自己的评价，得出一定的结论。

她的书告诉了我们她母亲个性的演变：一个爱上斯大林的17岁女中学生，前线的女战友，志同道合者，女布尔什维克革命者，忠实的妻子，两个孩子的母亲，谨言慎行，总担心不要因为提出某些物质要求而败坏了斯大林的声誉（家中的家具、陈设十分简朴，坐电车到工业学院去上学）。

刚开始一切都如同一个和谐家庭中该发生的那样。但后来开始出现外来的影响，她在工业学院中整天受到托洛茨基分子的包围，使她一点一点地（他们很会这么干），起先对丈夫的立场产生怀疑，然后对他们的立场产生好感，最后终于完全同反对派分子看法一致了。

请看一看斯韦特兰娜在谈到“可怕的信”时说的话吧：“自杀的人总是想‘惩罚’某个人——‘瞧吧’、‘活该’”，这是“背后沉重的



一击”。

在同意斯韦特兰娜所说的“背后一击”时，我不禁想问，是谁的一击？是对谁进行的打击？

如女儿所说，阿利卢耶娃“以爱情专一的人始终一贯的操行爱着他（丈夫），尽管她的理智在反抗，但她的心却永远是顺从的。此外她还是一个很顾家的人。对她来说，丈夫、家庭、孩子，她对他们的义务意义太大了”。

反对派分子又一次把阿利卢耶娃最后的信作为依据，把她的自杀说成含有政治意义。不过这一行为中的政治含义并不是他们硬要人民相信的那样的含义。

我以为，没有必要做任何推测，答案是明确的，它就明摆着：反对派分子——犹太复国主义者是摆布人的心理、观点和行为，制造阴谋的行家。这肯定是他们精心策划、导演的政治行动。他们通过爱人——娜捷施达·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的手从背后给斯大林以打击。这就是这件事的主要政治含义。

尽管这一打击十分沉重，但斯大林挺住了。只不过这一打击给他敏锐的记忆造成了深深的创伤，一旦有机会，他会让某些“无辜的恐怖受害者”知道他心中的痛楚。

十三 基洛夫遇害

这件事发生在1934年12月1日的列宁格勒。关于这件事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有关私生活的说法：基洛夫追求尼古拉耶夫的妻子米尔达·德劳列，尼古拉耶夫醋意大发，杀了基洛夫。凶手本人在侦查开始时就坚持这个说法。另一种是政治性质的说法，确切些说是完全政治化了的说法：斯大林担心基洛夫是党的总书记职务的竞争者而组织杀害了他。基洛夫是优秀的组织者和演说家，威信很高，据说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党的领导机关时他得到的票和斯大林得的一样多，因此有人传言要用基洛夫来取代斯大林。于是斯大林策划了这个卑鄙的勾当——收拾掉竞争对手。

这两种说法都是胡编乱造的。第一种说法是由这一政治行动真正的策划者——反对派分子编造的，目的是掩盖罪行的真正动机并把视线从真正的凶手身上引开。第二种说法的目的是败坏斯大林的声誉和解除他的权力。这就暴露了真正的刺杀策划者，他们许多年来一直在设法用自己的领导人来取代斯大林掌握国家大权。任何正常的逻辑、事实、文件、被告的口供，都不能证实对斯大林的指控，这一指控完全是反对斯

大林的人凭空捏造出来的政治诽谤。

但正是这个连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也加以利用的说法至今仍在流行，并受到大肆渲染。

还有一个真实的、不可推翻的第三种说法，它被反对派分子精心掩饰，他们的追随者——当代的“民主派”对此也讳莫如深。用不着去寻找，没有任何秘密，一切都一目了然。刺杀的策划者和执行者本人在侦查和公开的审讯时都已当众承认：“是的，是我们杀了基洛夫！”不需要再去寻找什么线索，也不需要再去揭露什么人。

请看1936年8月在法庭公开审判时他们的供认：

被告叶夫多基莫夫在谈到策划谋杀基洛夫的事实时说，1934年夏天在莫斯科加米涅夫的住所举行会议，参加的人有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叶夫多基莫夫、索柯里尼柯夫、捷尔-瓦加尼扬、赖因霍尔德和巴卡耶夫。会上决定加快刺杀基洛夫的行动。

“维辛斯基：这样直截了当地说：‘加快刺杀基洛夫’吗？”

叶夫多基莫夫：是的，是这样说的。为了这个目的，1934年秋天巴卡耶夫去列宁格勒检查列宁格勒恐怖分子策划对谢尔盖·米龙诺维奇·基洛夫实施恐怖活动的进展情况。这些恐怖分子小组跟踪基洛夫，等候合适的时机实施恐怖行动。

维辛斯基：杀害谢尔盖·米龙诺维奇·基洛夫的行动是由中心策划的吗？

叶夫多基莫夫：是的。

维辛斯基：您本人参与了策划？

叶夫多基莫夫：是的。

维辛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您一起参与了策划？

叶夫多基莫夫：是的。

维辛斯基：巴卡耶夫是根据中心的委托去列宁格勒就地检查策划的进展情况的吗？

叶夫多基莫夫：是的。”

（维辛斯基接着问了一些问题，确定巴卡耶夫在去列宁格勒期间会见了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巴卡耶夫同他谈了策划杀害的问题。）

“维辛斯基（向巴卡耶夫提问）：您在列宁格勒见到了尼古拉耶夫吗？”

巴卡耶夫：是的。

维辛斯基：你们就刺杀基洛夫问题谈妥了吗？

巴卡耶夫：我不需要商谈，因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已经下令刺杀他。

维辛斯基：但尼古拉耶夫告诉您说，他决定刺杀基洛夫吗？

巴卡耶夫：他和其他的恐怖分子——列文、曼德尔施塔姆、科托雷诺夫、鲁缅采夫——都说过。

维辛斯基：是谈刺杀基洛夫吗？

巴卡耶夫：是的。

维辛斯基：他表示了决心。那您对这件事是什么态度呢？

巴卡耶夫：我是肯定的。”

(从维辛斯基接着问巴卡耶夫的问题中可以了解到，巴卡耶夫在列宁格勒之行后向叶夫多基莫夫和加米涅夫汇报了策划刺杀基洛夫的进展情况。被告加米涅夫对维辛斯基问他巴卡耶夫是否确实向他汇报过的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

“维辛斯基（向加米涅夫提问）：他对您说了什么？

加米涅夫：他说实施刺杀的行动已经准备好了，刺杀即将实施。

维辛斯基：您对这件事持什么态度？

加米涅夫：刺杀是根据中心的决定策划的，我是中心的成员，我把这件事看作是执行我们自己提出的任务。”

(接着季诺维也夫回答了维辛斯基的提问。)

“维辛斯基：被告季诺维也夫，您是杀害基洛夫同志的组织者吗？

季诺维也夫：我以为，巴卡耶夫说得对，恶毒杀害基洛夫的真正的和主要的罪人首先是我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因为我们组织了联合的恐怖主义中心。巴卡耶夫在其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维辛斯基：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您、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被告加米涅夫，您是否同意季诺维也夫所说，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是主要组织者，而巴卡耶夫起了实际组织者的作用。

加米涅夫：是的。”

（加米涅夫为策划恐怖行动补充了如下事实：“1934年6月我亲自去列宁格勒，在那里责成积极的季诺维也夫分子雅科夫列夫与尼古拉耶夫-科托雷诺夫小组同时策划刺杀基洛夫的行动。1934年初我从巴卡耶夫的报告中得知尼古拉耶夫小组策划刺杀基洛夫的详细情况。”）

“维辛斯基：刺杀基洛夫是您干的？”

加米涅夫：是的。”

还需要什么证据呢？但是对斯大林不怀好意的人组织发表了大批文章，挑起对被告供词和法庭审判本身的怀疑，说这一切全都是在刑讯逼供或某些精神药剂的作用下招供的。

托洛茨基在他的《斯大林的罪行》（莫斯科，1994）一书中用300页的篇幅试图来证明这一怀疑审判和被告供词的话题。

托洛茨基以他固有的逻辑推理能力在谈到基洛夫被杀害一事时说：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不可能组织杀害基洛夫，因为这个行动毫无政治意义。基洛夫是个二等角色，没有独立的作用。真正的恐怖分子当然应该从斯大林开始下手。被告中有中央委员和政府成员，他们到处可以自由出入，因此杀害斯大林对他们来说毫无困难。”

这段话有说服力吗？很有说服力。但是我要再一次引用哈佛大学教授亚当·乌拉姆的话，他说，托洛茨基搞阴谋时有时并不是直截了当、前后一贯的，而是见机行事，十分怯懦的。如这位教授所说，托洛茨基本人对事件的叙述是“可怜的半真半假，试图无视事实”。

而事实说明，阴谋分子和托洛茨基本人在策划恐怖行动时并不仅是针对“二等人物”基洛夫的。例如，季诺维也夫在接受侦查时就供认：

“我还承认，我曾以联合中心的名义责成组织成员巴卡耶夫和卡列夫组织在莫斯科针对斯大林和在列宁格勒针对基洛夫的恐怖行动。这个任务我是1932年秋天在伊利因斯科耶布置的。”（季诺维也夫1936年7月23~25日的审讯笔录）

联合中心另一个领导人加米涅夫在回答侦查员关于他是否知道中心杀害斯大林同志和基洛夫同志的决定的问题时说：

“是的，我得承认，早在伊利因斯科耶会议前季诺维也夫就告诉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中心拟议中的策划针对斯大林和基洛夫的恐怖行动的决定。同时他告诉我说，托洛茨基分子在联盟中心的代表——斯米尔诺夫、姆拉奇科斯基和捷尔-瓦加尼扬——强烈坚决要求作出这一决定，因为托洛茨基在这件事上对他们有直接指令，他们要求为了实施构成联盟基础的原则，应切实采取这一措施。我赞同这一决定，因为我对此完全同意。”（加米涅夫1936年7月23-24日的审讯笔录）

皮克尔说：

“巴卡耶夫不仅领导总的意义上的恐怖行动的准备工作的，而且亲自去监视点，检查工作并给人们打气。1934年夏天我有一次去找赖因霍尔德，赖因霍尔德告诉我说，对斯大林的监视取得了好结果，巴卡耶夫同一批恐怖分子今天坐汽车去执行杀害斯大林的任务。这时赖因霍尔德坐立不安，因为他们长时间没有返回。当天傍晚我又一次同赖因霍尔德见面，他告诉我说，斯大林的警卫们阻碍了恐怖行动的实施，他们如他所说把行动参与者吓坏了。”（皮克尔1936年7月22日的审讯笔录）

托洛茨基人在国外，但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被捕后千方百计加快杀害斯大林的行动，一再催促全苏联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尽快完成任务。他有步骤地通过自己的代理人下达指令和关于组织暗杀的实际指示。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成员、当年曾任托洛茨基贴身保镖、与他很接近的E. A. 德雷采尔在接受侦查时供认，1934年他收到托洛茨基关于策划针对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恐怖行动的书面指示。

他说：

“我是从我的常年居住在华沙的姐姐斯塔洛维茨卡娅那里收到这个指令的，1934年9月底我姐姐来莫斯科。托洛茨基信的内容很简短。信的开头写道：

‘亲爱的朋友：请传达，今天我们有以下主要任务：一是收拾掉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二是在军队中开展组织分支机构的工作，三是一旦爆发战争，利用失利和惊慌争取领导权。’”（德雷采尔

1936年7月23日的审讯笔录)

另一个重要的托洛茨基分子姆拉奇科夫斯基也证实了这一指令的内容，他供认说：

“埃斯特曼转交给我德雷采尔的一个信封，我当着埃斯特曼的面拆开了信封，看到托洛茨基给德雷采尔写的一封信。托洛茨基在这封信中指示杀死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姆拉奇科夫斯基1936年7月4日的审讯笔录）

托洛茨基的代理人——B. 奥利别格被派到苏联来组织恐怖行动。他供认说：

“我直接与托洛茨基联系，我同他和列夫·谢多夫保持经常的联系，谢多夫曾交给我一系列组织方面的任务，特别是与苏联进行秘密联系。我在被捕前一直是托洛茨基派驻苏联的特使。我为了在苏联进行托洛茨基反革命活动和组织对斯大林的恐怖活动，秘密地来到苏联。”（B. 奥利别格1936年2月13日的审讯笔录）

为了保密，奥利别格到达苏联后不是在莫斯科，而是在高尔基市的托洛茨基分子中组织了一个恐怖活动小组，然后把他们派往莫斯科暗杀斯大林。计划在1936年5月1日庆祝活动中实施暗杀。因此，高尔基市托洛茨基组织的领导人、高尔基师范学院院长И. К. 费多托夫以师范学院学习优秀生的名义把恐怖分子派往莫斯科，从而保证他们能参加红场上的游行。

几乎与奥利别格同时，托洛茨基派出了他另一个代理人贝尔曼-尤林。托洛茨基命令贝尔曼-尤林组织实施对斯大林的恐怖行动，并特别强调指出，这次刺杀不是秘密地悄悄进行的，而是公开地在一次中央全会或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进行的。

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弗里茨-达维德同贝尔曼-尤林一起参与准备针对斯大林的恐怖行动。弗里茨-达维德也是受托洛茨基亲自委派于1933年5月来苏联的。贝尔曼-尤林和弗里茨-达维德相互之间建立了组织联系，准备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实施针对斯大林的恐怖行动。

贝尔曼-尤林在接受侦查时供认说：

“托洛茨基在同我谈话时公开告诉我说，在反对斯大林的斗争中不惜采取极端手段，应该从肉体上消灭斯大林。他以令人难以置信的仇恨谈到斯大林。他这时像个丧失理智的人。谈话时托洛茨基站了起来，在房间里神经质地踱来踱去。他内心的仇恨十分强烈，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我当时以为，这个人信念异常坚定。我离开他时像受了催眠术似的。”（贝尔曼-尤林 1936 年 7 月 21 日的审讯笔录）

托洛茨基不限于只组织杀害斯大林一个人，他还把同时杀害党的其他领导人——基洛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日丹诺夫——作为自己的任务。他预计，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乌克兰同时杀害一系列党的领导人，会引起全国的恐慌，使他托洛茨基以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能掌握权力。

又是权力！请看这些事件的当事人莫洛托夫是怎样说的：“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政治斗争就是争夺权力的搏斗。”

我们不去谈托洛茨基的狡诈和他对事实的歪曲，他是一个政治家，而政治从来就是肮脏的。

* * *

斯大林从国内战争时期起就和基洛夫结下友谊，当时基洛夫组织从北高加索向察里津运送粮食，而斯大林在察里津收到粮食后再转运到别处，运到闹饥荒的彼得格勒。

在和平的日子里斯大林和基洛夫的友好往来十分密切，谢尔盖·米龙诺维奇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办事，他从不住在宾馆里，而是住在斯大林的家里。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和女儿斯韦特兰娜把他当作亲人对待。基洛夫通常与斯大林一起休假。基洛夫在遇害的那一年也是和斯大林一起在索契休假，他们一起玩击木游戏，打台球，一起洗蒸气浴。基洛夫在遭到致命枪击前三个星期才离开斯大林处。

斯大林为又一个忠实的朋友遇害而感到十分难过，他瘦了，变得内向了，因为伤心而闷闷不乐，神情忧郁。有一天晚上在孔采沃别墅里他在长久沉默后说：

“我完全孤苦伶仃了。”

玛丽亚·阿尼西莫夫娜·斯瓦尼泽（斯大林前妻的兄弟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斯瓦尼泽的妻子）在她的日记中详细描述了基洛夫的葬礼。下面是摘自她的日记中的一段话：

“我得描述一下我和亚历山大一起参加的葬礼，更确切地说是

和谢·米·基洛夫最后的告别。

12月5日

我们有进入圆柱大厅的通行证，基洛夫的遗体安放在那里供大家瞻仰。5日晚10时禁止入内，只有治丧委员会批准（警卫队长保克尔签字）才能进去。我们走进了平时演出时的演员室。这里排列着仪仗队，聚集着手持通行证的人们，他们可以呆到10时以后，在火化前跟基洛夫进行最后的告别。告别的人群中以妇女居多，有妻子，姐妹们，亲密的同志，她们坐在灵柩旁。雷登斯安排我们（阿利卢耶娃一家、我和阿廖沙）加入一批亲密的朋友的行列中，我们走进了大厅。在大厅后部，头朝着左侧休息厅和包厢（从舞台上看）安放着一具普通的鲜红色的棺木，脚头放着红绒布带折的罩布。死者的脸是黄绿色的，鼻子尖尖的，嘴唇紧闭着，前额和面颊上有深深的皱纹，嘴唇的两角痛苦地下垂着。在左太阳穴和颧骨上有摔倒时留下的青斑。灵柩四周放着许多花圈，红色缎带上写着各个组织和同志的名字。灵柩的右侧椅子上坐着基洛夫可怜的遗孀、她的两个姐妹和基洛夫的两个姐妹。

在那里坐着的还有列宁的妹妹玛丽娅·伊里尼奇娜，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叶卡捷琳娜·达维多夫娜·伏罗希洛娃，纽拉·杰登斯，季娜·奥尔忠尼启则，列宁的弟弟，玛丽娅·普拉托诺夫娜·奥拉赫拉什维利，我们也坐到这群人的旁边。

周围安放着拍电影用的聚光灯。拿着‘莱卡’相机的摄影师和警卫员挤在一起，舞台上大剧院的乐队在施泰因贝格的指挥下不断演奏着乐曲。尽管灯火通明，但透过泪眼看到的仿佛漆黑一片，令人伤心难过……

从10时起群众禁止入内。大厅里只有数量有限的人。大家都穿好了大衣（我们也去很快穿好了大衣），紧张地等待着……终于听到了一群人坚定的脚步声。在过世的基洛夫头部那一端（大家都是从另一端进入的）出现了约瑟夫，在他的周围是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卡冈诺维奇、日丹诺夫、米高扬、波斯特舍夫、彼得罗夫斯基等人。在另一侧已经站着科尔克、叶戈罗夫，还有几个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分站在两边的仪仗队里。约瑟夫站在头旁，我不记得其他人站在哪里。现场奏起了肖邦的葬礼曲，闪光灯咔嚓作响，照相机忙个不停，摄像机也在转动着。这一切持续了几分钟，但给人的印象都是长得令人不安。

聚光灯暗下去了，乐曲停止了，拿着红色索带和棺木盖上的螺钉的卫队已经排列整齐，人们已经准备好抬起花圈，马上结束这最



后的仪式。

约瑟夫站到灵柩边的踏板上，他的面容悲戚，他俯下身去，亲吻着已故的谢尔盖·米龙诺维奇的前额。这景象让人撕心裂肺，大家都明白他们是何等亲密，整个大厅里哭声震天，我透过自己的哭声听到男人们也在呜咽不已。他的亲密战友谢尔戈也是这样凄恻地哭着告别；然后登上踏板的是脸色苍白、没有一点血色的莫洛托夫；胖胖的日丹诺夫令人发笑地爬了上去；卡冈诺维奇俯下了身，但并没有亲吻；在另一侧，米高扬张开双手，靠着灵柩俯下身去。告别结束了。停顿了几秒钟，谁也不知道亲近的女人们是否去告别，但玛丽亚·利沃夫娜感到不舒服，医生们围着她，给她打针，大家都在照顾她。领导人都走了。灵柩安上了盖子，抬走了花圈，大家准备好要跟在灵柩后面走出去。

我和怀孕的纽拉慢慢地走着，在大门口等着护送灵柩的队伍等了好几分钟。灵柩被放上点缀着鲜花的卡车，人们放好花圈，灵车沿着奥霍特内大街和莫霍瓦亚大街疾驰，后面跟着许多轿车，向着火葬场而去。仪式结束了，警卫撤走了，大家都回家了。到清晨时，谢尔盖·米龙诺维奇只剩下一堆骨灰了，而全体人民心中永远怀念他，怀念他的事业，并充满了对敌人的刻骨仇恨……

第二天，我们由于没有进入红场的通行证，便于11时去了城外，从广播中收听了葬礼的过程。6日举行葬礼，而7日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的院子里罗森霍尔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举办晚会，达官显贵们为欢迎在丧礼期间不适当地访问苏联的莫尔尚多（法国商务部长）而通宵手舞足蹈。这些马屁鬼不会展示自我，展示真正的苏联人既强大又独立的形象，有分寸地守丧节哀，却大跳特跳起来。

难道这是经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同意的吗？真是骇人听闻。难道我们这样伟大的国家，刚刚不幸地失去自己的英雄，就不能在法国客人在场时哀悼他吗……

第二天法国大使馆设宴答谢，但没有舞会，他们比我们的部长们更有分寸。”

玛丽亚·阿尼西莫夫娜应该为罗森霍尔茨的轻率感到气愤，她还不知道基洛夫遇害的真正原因！当时还流传着反对派分子编造、亚戈达传播的谣言，说尼古拉耶夫出于醋意才杀害了基洛夫。

后来，当针对基洛夫的恐怖行动的原因和细节被揭露之后，才暴露出罗森霍尔茨举行招待会的另一面。

从斯瓦尼泽的日记可以看出，政治局委员和斯大林的亲信中没有一个人参加招待会。因此，以欢迎法国部长为借口，按照特别名单邀请参加招待会的全是反对派阴谋分子——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他们手舞足蹈（正是如玛丽亚·阿尼西莫夫娜所说的“手舞足蹈”，而不是“跳舞”）事出有因。他们跳的大概不是“芭勒娘舞”，而是自己的“肖勒姆舞”和“七索罗卡舞”。这是为成功实施恐怖行动而举行的真正的庆祝会。他们庆祝开始成功打倒“斯大林匪帮”，因为杀害基洛夫是他们策划的一系列恐怖行动中的第一步。

他们用这个庆祝会向自己和托洛茨基表明，他们如何忠于他，他们何等强大，什么人什么事都不怕，他们对基督教和公认的葬礼期间的行为准则不屑一顾。他们为干下的事感到欣喜若狂，不能自己。对外贸易人民委员罗森霍尔茨及其同案犯 1937 年在圆柱大厅接受审判时的供词证明了这一点。

罗森霍尔茨：在审判皮达可夫后托洛茨基就来信，提出图哈切夫斯基必须加快发动军事政变。因此在我的住所举行了会议。

维辛斯基：这是什么样的信，能详细谈一谈吗？

罗森霍尔茨：托洛茨基在这封信中提出了几个问题。首先他指出，如果迟迟不行动，那么反革命势力将被各个击破。由于骨干力量遭到很大破坏，因此必须加快进行一系列可能的行动。

维辛斯基：能举个例子说吗？

罗森霍尔茨：主要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以恐怖行动来回答对皮达可夫一案的判决。

维辛斯基：是法院的判决吗？

罗森霍尔茨：提出组织恐怖行动的问题来回答法院对皮达可夫处以死刑的判决。

维辛斯基：对谁？

罗森霍尔茨：对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还有尽快发动军事政变的问题。

维辛斯基：现在请克列斯廷斯基回答。（对克列斯廷斯基提问：）您能证实这一点吗？

克列斯廷斯基：是的，我证实。这次会议在罗森霍尔茨处举行，是在 4 月初。我们在这次会上谈到了逮捕亚戈达的问题，并把这一逮捕当作事实。我 4 月 2~3 日就知道亚戈达被捕了。因此，这发生在 4 月。

维辛斯基：您知道亚戈达参与了阴谋吗？



克列斯廷斯基：是的，我昨天就谈过这一点。

维辛斯基：请坐下。被告罗森霍尔茨，请继续说。

罗森霍尔茨：这时提出了恐怖行动的问题。我和克列斯廷斯基讨论了可以对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实施恐怖行动的问题。

维辛斯基：被告克列斯廷斯基，你们讨论过对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实施恐怖行动的问题吗？

克列斯廷斯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从更广泛的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

维辛斯基：这个问题你们讨论过吗？

克列斯廷斯基：我们谈到有必要恢复在皮达可夫死后中断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恐怖活动，我和罗森霍尔茨及加马尔尼克谈过这一话题，谈过必须对党和政府领导人采取恐怖行动。

维辛斯基：具体针对谁呢？

克列斯廷斯基：提到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

维辛斯基：被告罗森霍尔茨，您本人是否有对苏联政府领导人中某一个人实施恐怖行动的罪恶意图呢？

罗森霍尔茨：我对这一点已作了供认，我可以肯定。

维辛斯基：您准备亲自实施恐怖行动吗？

罗森霍尔茨：是的。

维辛斯基：您也许能说出针对谁？

罗森霍尔茨：针对……正如我在预审时供认的是针对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

因此，已经查明，杀害基洛夫是为夺取权力而进行的一系列恐怖行动的开始。托洛茨基分子散布的关于基洛夫是斯大林的竞争对手才被杀害的谣言是假情报，是掩盖密谋分子罪恶意图的烟幕，现在已经完全被揭穿了。

十四 军事阴谋

1990年我写了《被处决的元帅们》一书，其中有一篇是写米·尼·图哈切夫斯基的。这篇文章是用“为他无罪辩护”的基调写成的，因为这符合当时报刊文章的调子和我也被卷入的平反狂热。

我在写作《大元帅》一书时依据在改革年代解密的新的档案文献更深入地分析了镇压的原因，因此，对“图哈切夫斯基案件”作出了与我此前所作的不同评价，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请读者不要见怪。

我在收集和 research 有关 1937 年这一轰动一时的“案件”的材料时，同过去一样力求找到第一手材料——与事件和被告直接有关的人提供的材料。

莫洛托夫是这件事为数不多的见证人之一，他与阴谋分子长期一起共事，从国内战争时期起就认识他们。因此我在同他谈话时多次详细问过他，甚至谈到了我当时的想法：

“这些十分著名的军事领导人在国内战争中建立了这么多的战功。您熟悉他们，您当时对他们的‘敌对活动’没有怀疑吗？”

莫洛托夫坚定地，我甚至可以说是强硬地回答说：

“对这些军事活动家我当时没有丝毫怀疑，我知道他们是托洛茨基安插的人，是他的骨干。他扶植他们是有着很长远的目标的，当时他本人还瞄上了国家元首的职务。幸亏我们在战前就解决了这些阴谋分子，否则的话，战争的后果就难说了，伤亡就要超过 2 000 万了，对这一点我是毫不怀疑的。我一向认为图哈切夫斯基是个危险人物……”

托洛茨基在他的《斯大林评传》一书中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是用第三人称说的）很有意思，他说：

“在斯大林时期领导红军的人——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布柳赫尔、亚基尔、乌博列维奇、德宾科、费季科——当年都是在托洛茨基领导军事部门时被提拔担任军事负责职务的，多数是在他本人视察各方面军、直接观察他们的军事工作时提拔的。不错，几乎国内战争的所有统帅和军事建设者后来都成了‘叛徒’和‘间谍’。但这并不改变事情本身。正是他们捍卫了革命和国家。如果在 1933 年发现，是斯大林而不是别人建设了红军，那么似乎他对挑选这样的指挥人员也负有责任，官方历史学家要摆脱这一矛盾不无困难，但还是成功了：把任命叛徒担任指挥职务的责任全部推给托洛茨基；可是这些叛徒取得的胜利却完全归功于斯大林。”

应该承认，托洛茨基的说法合乎逻辑。但对莫洛托夫关于这些人都是他的骨干的说法，托洛茨基事实上也加以肯定了：他选择、任命并培养了他们。

我花了大力气来阅读有关所谓“图哈切夫斯基阴谋”案的审判和侦查材料。这很不容易，我去的地方都客气地拒绝了我。连对我很友好的苏联最高法院院长弗·伊·捷列比洛夫（我们都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也意味深长地举起手指指着天花板说：“只有那里才能批准。”但我最终还是达到了目的。我翻阅格式严谨的正式材料：

“速记记录。

苏联最高法院审理图哈切夫斯基，米·尼·；亚基尔，约·埃·；乌博列维奇，伊·彼·；科尔克，阿·伊·；埃德曼，罗·彼·；费尔德曼，B. M.；普里马科夫，维·马·；普特纳，维·卡·一案的特别法庭会议。

1937年6月11日上午9时法庭会议。

听取关于背叛祖国、进行间谍活动和策划恐怖行动的案件……”

接着又列出了所有被告的姓名。

案件由秘密法庭审理……

向被告宣布了法庭组成人员：

“审判长——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庭庭长、军法官乌尔里希，瓦·瓦·同志。法庭成员：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工农红军空军司令、集团军级阿尔克斯尼斯，雅·伊·同志；苏联元帅布琼尼，谢·米·同志；苏联元帅布柳赫尔，瓦·康·同志；工农红军总参谋长、一级集团军级沙波什尼科夫，鲍·米·同志；白俄罗斯军区司令、一级集团军级别洛夫，伊·潘·同志；列宁格勒军区司令、二级集团军级德宾科，帕·叶·同志；北高加索军区司令、二级集团军级卡希林，尼·德·同志和斯大林哥萨克骑兵第6军军长、师级戈里亚切夫，E. H. 同志……”

被告们被告知：案件按1934年12月1日法律规定的程序审理（这表明法庭审判中不准辩护人参加，判决为终审判决，不准上诉）。

被告们看到这样一份法庭组成人员名单，也许会很高兴，因为这些人全都是他们在国内战争中的战友，这些人很清楚他们的战斗业绩，战后仍与他们保持着友好关系。但是……判决是无情的、毫不含糊的。甚至简短的速记记录也可以看出，过去的战友们要求被告们作出供认。看来，这是因为在审判开始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让法官们看了

盖世太保炮制的假材料。他们读了看上去绝对真实的图哈切夫斯基叙述推翻现行政权的阴谋计划的信件，相信了这些假材料。

从速记记录可以看出，情报中提出的材料在法庭上并未出示。事实上也没有这些材料，因为根据反间谍机关的准则这些材料是不能解密的。

这么说被告都是无罪的吗？

我倾向于认为对间谍活动的指控是凭空捏造的。被告们不是德国或日本的间谍。出主意编造诬陷图哈切夫斯基的黑材料的人之一是政治情报部门的头头瓦尔特·舍伦贝格，他在他的回忆录《迷宫》（俄罗斯出版，1991）中写道：

“当时有人说，海德里希为了把图哈切夫斯基牵扯进来而收集的材料大部分是有意炮制的文件。事实上伪造的东西并不多，不多于填补某些空白的需要。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如下事实：厚厚的一大摞档案都是在短短的四天中准备好送呈希特勒的。

当时决定由党卫军旗队长贝姆领导的一个德国外交间谍、侨居在布拉格的德国侨民来同斯大林建立接触。贝姆通过他同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贝奈斯博士的密友建立联系。贝奈斯博士马上给斯大林本人写了信，斯大林通过同一渠道答复海德里希，建议与苏联驻柏林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取得联系。我们这样做了，于是上面提到的俄罗斯人马上飞回莫斯科，伴随他回来的是持有当时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的叶若夫授予全权的斯大林的密使。

斯大林询问我们对收集的材料要多少价钱。希特勒和海德里希没有料想到竟会涉及金钱问题。但是海德里希不露声色地要了300万金卢布，斯大林的特使在匆匆看过文件后马上付了这笔钱。

诬陷图哈切夫斯基的材料于1937年5月中旬交给了俄国人。”

应该指出，这段话中有几个疑点。第一，斯大林未必会亲自“询问”价钱并就“材料”讨价还价。第二，黑材料转交的时间是“1937年5月中旬”，说明这份材料迟到了，因为从各种根据看“图哈切夫斯基案”在5月就已立案，这位元帅于5月22日被捕，5月25日就已供认不讳。

那么假材料没有起作用吗？或者也许并不存在什么阴谋？

文件和被告本人就这一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阴谋是有的，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有某个组织的会员证，他们的会议作过记录。

那么究竟有什么呢？



有过“宫廷政变”、清除斯大林及其战友的具体阴谋活动和计划。权力！权力！图哈切夫斯基不是平白无故地被称作“红色拿破仑”的。请看1938年公开审判速记记录中列出的事实：

“维辛斯基：据我所知，按照你们的设想，在这个罪恶意图中你们主要的希望寄托在图哈切夫斯基集团身上。是这样的吗？”

罗森霍尔茨：是的。

维辛斯基：由谁同这个集团直接联系？

罗森霍尔茨：由克列斯廷斯基。

维辛斯基：因此，他作为联盟成员在一定程度上组织了这个集团的活动。我这样理解对吗？

罗森霍尔茨：当然。

维辛斯基：因此，在这件事上他起了一个重要作用？

罗森霍尔茨：他不断催促图哈切夫斯基……

维辛斯基：您在预审时说，克列斯廷斯基在亚戈达被捕后或者更早，在皮达可夫被捕后特别强烈地向图哈切夫斯基提出问题，事实上是这样的吗？这说明当时克列斯廷斯基在这个问题上花了多大的力气？

罗森霍尔茨：我不愿意也没有根据特别突出克列斯廷斯基……

维辛斯基：您没有，而我却有根据。我问您，是因为您同克列斯廷斯基一起策划了一个卑鄙的阴谋……被告罗森霍尔茨，请往下讲。

罗森霍尔茨：我刚才讲到有图哈切夫斯基参加的会议。会议是在3月底召开的。克列斯廷斯基在对质时纠正说，会议是在4月初召开的，但这个分歧不是实质性的。反正同图哈切夫斯基开过会。

维辛斯基：这次会议是在哪里开的？

罗森霍尔茨：在我的住所开的。

维辛斯基：在您的住所同谁一起开会？

罗森霍尔茨：同图哈切夫斯基和克列斯廷斯基一起开会。

维辛斯基：什么时候开的会？请说出确切的时间。

罗森霍尔茨：这是在1937年3月底。

维辛斯基：请往下讲。

罗森霍尔茨：在这次会上图哈切夫斯基说，他坚决相信政变能成功，并提出了日期，他认为在5月15日前，即5月上半月里他能成功实施这次军事政变。

维辛斯基：这个反革命行动的计划包括什么内容？



罗森霍尔茨：图哈切夫斯基有几个方案。他认为最有把握的方案之一是可以以某种借口在他住所里召集一群支持他的军人，潜入克里姆林宫，夺取克里姆林宫电话局，杀死党和政府的领导人。

维辛斯基：这是他的计划还是你们共同的计划？

罗森霍尔茨：我们没有讨论过他的这个计划。他只是把这个计划作为方案之一告诉了我们，他对这个方案寄予很大希望……这时我们提出了对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实施恐怖行动的问题。

维辛斯基：被告克列斯廷斯基，你们讨论过对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实施恐怖行动的问题吗？

克列斯廷斯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从更广泛的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

维辛斯基：具体针对谁呢？

克列斯廷斯基：提到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但专门针对莫洛托夫的恐怖行动我们没有详细讨论过……

维辛斯基：这么说，图哈切夫斯基说，他要在5月上半月发动暴动？

克列斯廷斯基：是的，他说过。

维辛斯基：您对你们同加马尔尼克的会见能说些什么？

罗森霍尔茨：我肯定我在预审时供认的一切。

维辛斯基：具体是什么？

罗森霍尔茨：关于加马尔尼克，主要一点是加马尔尼克谈了他看来同图哈切夫斯基商量过的一个推测，认为在军事政变时可以占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大楼。而且加马尔尼克预计，可以直接由他指挥的一部分军队来实施进攻，因为他认为他在军队中有足够的党内威望、政治威望。他估计，某些特别勇猛的指挥员会在这件事上帮助他。

维辛斯基：这么说，除了图哈切夫斯基给你们谈了他的罪恶阴谋计划，加马尔尼克也给你们谈了这个计划？

罗森霍尔茨：是的。”

我再举一个很有意思的“生活场景”，它很鲜明地表明了阴谋分子是有罪的，他们在自己一伙人聚会时是如何直言不讳的。

图哈切夫斯基的亲戚利季娅·诺德在巴黎出版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一书。她当年常去图哈切夫斯基家，听他同他的志同道合者乌博利维奇、亚基尔、费尔德曼等人的谈话。她很欣赏他们谈到斯大林、伏罗希洛夫时说的俏皮话和讽刺话。她公开写道，他们打算“收拾”这些

“正统派”。读者可以从利季娅·诺德书的下面一段话中判断出这些谈话的调子和方向：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说：‘我一点也不明白斯大林崇拜德国的态度。起先我以为他只是表面上对德国有好感，为的是表示“自己有学识”……但是现在我发现，他是希特勒暗中的狂热崇拜者。我不是开玩笑。这是离爱恋只有一步之遥的仇恨……只要希特勒向斯大林走近一步，我们的领袖就会张开双手扑上去拥抱法西斯领袖。昨天，我们私下里谈过，斯大林认为希特勒镇压犹太人有道理，他说希特勒在清除妨碍他达到目的的一切，从希特勒的想法看他是对的。希特勒的成功给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只要仔细看一，就会发现他有许多东西是照搬德国元首的。我以为，对德国领袖光环的妒忌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不管怎么说，希特勒的“官阶”要高一些，他毕竟还当过上等兵，而我们这一位连士兵都不是。前者想爬上统帅的位子的努力是有道理的，因为“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而那位过去的正教中学学生想表明他不次于毛奇，这就十分可笑，在目前情况下还十分可悲。更可悲的是，竟有人不去制止他，反而装出欣喜万状的样子，望着他的嘴巴，等着他说出天才的思想……’”

但是我们土生土长的“民主派”无视这一切，像又聋又哑的人一样在报刊上写文章，出书，在电视屏幕上喋喋不休大谈对阴谋分子的暴力，为他们的无辜受迫害鸣冤叫屈。

若实际事态和事实还不能证实这些谎言，就请看图哈切夫斯基在接受第一次审问时亲笔写下的文字原件！

致内务人民委员尼·伊·叶若夫

我于5月22日被捕，24日抵达莫斯科，25日第一次受审，今天，25日，我声明，我承认存在反苏的托洛茨基军事阴谋，我是这个阴谋的领导人。我保证独立地向侦查部门讲清有关阴谋的一切情况，绝不隐瞒任何一个阴谋参加者以及有关事实和文件。

阴谋开始于1932年前。参加阴谋的有：费尔德曼、阿拉富佐夫、普里马科夫、普特纳等人，有关情况另行详细交待。

图哈切夫斯基

1937年5月26日

有什么刑讯逼供？有什么残酷拷打？图哈切夫斯基写道：“……25日第一次受审，今天，25日，我声明，我承认存在反苏的托洛茨基军事阴谋，我是这个阴谋的领导人。”

侦查员乌沙科夫（乌沙米尔斯基，济诺维·马尔科维奇）承办图哈切夫斯基一案，后来他本人也被捕了，他说：“我没有动过他一根指头，我感到惊讶的是，这样一个肉体上和精神上强壮的人（元帅、战争英雄）会马上承认一切。”乌沙米尔斯基对此解释说，他把他掌握的材料，包括同案犯的供词，全交给了图哈切夫斯基，他自己读了以后明白了，他无法脱身。

5月25日在第一次审问图哈切夫斯基（这位元帅是5月25日从古比雪夫被押到卢比扬卡的）时与同案犯进行了对质。在这次对质时图哈切夫斯基起先当然否认他参与阴谋。

而揭发他的费尔德曼后来说：“我猜准图哈切夫斯基被捕了，但我认为他到了侦查部门会自己交待出一切，哪怕用这样的行动来稍微赎回对国家的严重罪行，但在对质时我看到了他，听到他否认一切，说都是我捏造的……”

还有一份图哈切夫斯基的声明，同样写于1937年5月25日，谈的是同普里马科夫、普特纳和费尔德曼的对质：“（他们）让我同普里马科夫、普特纳和费尔德曼进行了对质。他们指责我是反苏托洛茨基军事阴谋的领导人。请再给我看一下这一阴谋参加者同样对我作这一指控的一些供词。我保证老实交代。”

图哈切夫斯基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他们再一次让图哈切夫斯基与其同案犯进行了对质，同案犯交代了实情，于是图哈切夫斯基当天写下了前面引述的简短供认。但由于这一天他很不轻松，看来累极了，就作保证说：“我保证独立地向侦查部门讲清有关阴谋的一切情况……”这位元帅履行了他的保证。在后来的审讯时他供出了几十名阴谋参与者。这些人全部被捕并被处决。

在不久前的改革时期有人费尽心机去寻找对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刑讯逼供的证据。1997年《军事史杂志》第1期发表了其中的一个证据（片断）：

“有一些材料揭露了图哈切夫斯基被迫作伪供的原因。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苏共党员武尔1956年说：

‘我亲眼在2号楼走廊里见到图哈切夫斯基，他正被押往列普列夫斯基处接受审讯。他穿着质量很好的灰色套装，外面套了一件粗呢囚服，脚上穿的是树皮鞋。据我的理解，让图哈切夫斯基这样



装束是为了羞辱他。对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案件的侦查很快结束了……除了肉刑，侦查员们的说服对取得他的供认起了一定的作用。”

估且肯定给他穿了“囚服”，图哈切夫斯基应该穿这种内部监狱在押犯的服装，但并没有人让元帅脱下“质量很好的灰色套装”，而“树皮鞋”一说显然全要凭武尔的良心了。武尔本来还可以想出什么更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例如，铁镣或木枷。总的说来，为了从“精神上”摧垮图哈切夫斯基这位无疑坚强的人，这些是否还少了一点呢？如我们所看到的，对他没有采用其他的“肉刑”。为什么要用这种对他怯懦的怀疑来羞辱这位元帅呢？他是一个精神和肉体上都坚强的人。

军级将领费尔德曼就是这种情况（他曾是工农红军干部管理局局长）。他于1937年5月15日作为图哈切夫斯基策划“宫廷政变”的同谋之一被捕。费尔德曼在被捕的前一天马上就给侦查员乌沙科夫（乌沙米尔斯基）写信说：

“您和特别部部长列普列夫斯基同志（他也和我谈了话）指控我参与了托洛茨基反苏军事组织，要我真诚悔过。请让我看一下揭露我参与该组织的事实。这样就比较容易弄清这个问题。”

侦查员向费尔德曼出示了所有的文件和罪证。他在1937年5月16日第一次接受审讯时就供认，是普里马科夫在1934年吸收他参加托洛茨基军事组织的，这个托洛茨基军事组织由图哈切夫斯基领导。

过了几天，费尔德曼同图哈切夫斯基对质时已经对这位元帅没有为减轻罪责而马上认罪感到惋惜。而从他同侦查员乌沙米尔斯基的个人关系看也不像会对他进行刑讯逼供和拷打。请看费尔德曼给乌沙科夫（乌沙米尔斯基）的一封信：

“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第五部部长助理乌沙科夫同志 济诺维·马尔科维奇：声明的开头和结尾我是按自己的判断写的。我相信您会叫我去您那里并给我指出，重抄时间不会长……谢谢您的关心和照顾，29日我收到了饼干、苹果、香烟，今天又收到香烟，从哪里、由谁送来的，没有告诉我，但我知道是谁送的。费尔德曼1937年5月31日”。

“苹果和饼干”不可能是军级将领费尔德曼为之出卖阴谋的30个

银币。他的表现虽然有些低三下四，却很像是一个追悔莫及、寻求宽恕的人的表现。

这里应该指出，费尔德曼在镇压组织中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在侦查时表明（上面已提到），托洛茨基分子把党和国家的许多措施都推向荒谬的地步，指望以此来引起苏联人民的不满。他们在剥夺富农财产时这样做，在镇压时也采取同样的策略。

正是费尔德曼在担任工农红军干部管理局局长时，制订了关于特别登记的指令。有文件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点，例如，1964年4月苏联国防部干部局的秘密报告《关于在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对指挥人员、政工人员和领导干部方面违反法制的情况》。报告附有《被撤销追究刑事责任的前旅级以上军人的名单》，这是我现在见到过的最全的一份名单，共274页。

从报告名称可以看出，这些文件是在赫鲁晓夫揭露“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编写的。很可能是根据“揭露者”的指示写的，因此带有一定的倾向性。

但同一报告引用的真实文件却说明了相反的情况。请看同一个费尔德曼在这些文件中的作用。

例如，干部局的报告说：

“对苏联军队和海军领导干部莫须有的镇压、出于政治原因的大规模解除军职和逮捕，是从1935年谢·米·基洛夫遇害后开始的。

许多指挥员和领导干部由于检查党内证件（从1935年5月至1936年2月）而被开除出党和解除军职。例如，前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党领导机关部部长、军政治委员级B. Y. 特罗扬克尔1935年12月10日给工农红军总政治部部长、一级集团军政治委员级扬·鲍·加马尔尼克的报告说，到1935年12月1日因检查党内证件有2948人被开除出党，其中60%~70%是指挥人员和领导干部（没有政工人员）。1936年10月前干部管理局局长、军级B. И. 费尔德曼向国防人民委员报告说，各军区司令提出将指挥人员大批解除军职。主要原因是：托洛茨基主义或与托洛茨基分子勾结。检查发现，提出的许多要求没有根据。”

也就是说他很担心逮捕“托洛茨基分子”并解除他们的军职，公开为他们辩护，说：“检查发现，提出的许多要求没有根据。”

这就是所谓的台面上的话。而上不了台面的是，据费尔德曼本人被



捕后供认说，他想方设法使与他志同道合的托洛茨基分子逃避打击，把这一点向军事阴谋的领导人之一——加马尔尼克——报告，加马尔尼克当然支持这个想法。

这种将党和政府的决定在贯彻时推向荒谬地步的做法以及这样的保护措施，都是用格外卖力执行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关于从军队中清除出在基洛夫遇害后发现的敌人和不可靠分子的指示作掩护的。

下面是一个文件的原文：

“秘密

致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一级集团军政治委员级

1937年1月14日

扬·鲍·加马尔尼克同志

为执行您关于对因政治道德原因被解除军职的领导干部使用代号的指示，特报告如下：

最可行而又不违背工农红军指挥领导干部服役条例的方案是，命令上使用特别编号。在命令的编号后加上字母‘O. Y.’（特别登记）。命令的格式在其他方面与普通的人事命令毫无区别。

这些命令表面上的格式如下：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关于军队人事的命令 第115/OY号

莫斯科市

解除第……步兵团排长谢苗诺夫·伊万·谢苗诺维奇中尉的职务，根据《工农红军指挥领导干部服役条例》第43条第2款将他列入工农红军预备役，为预备役中尉。’

对根据国防人民委员部有这一代号的命令被解除军职的人将作特别登记，他们将不被登记在战斗部队中，也不列入地方民兵的非固定人员，不被征召入工农红军执行个别任务，在战争初期也不参加部队。

这一措施经您批准后，我将向各军区（舰队）司令下达相应指示。

干部管理局局长

费尔德曼”

有几千个军官根据“有费尔德曼代号”的命令被解除军职，他们一到达居住地点，只要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地机关看见他们的文件上有代号“O. Y.”，就立即逮捕他们，因为这个代号其实就是逮捕的信号。代号“O. Y.”对于拉脱维亚人、波兰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芬兰人、朝鲜人、中国人和当时未纳入苏联版图的其他民族的人是一个可怕

的“印记”。

此外，这个命令还说：“查清一切出生、居住在德国、波兰或其他外国及在这些国家中有亲戚并与之有联系的人。”

凡带有“O. Y.”代号的指挥员，不管他的忠诚程度、工作经验、党性如何，是否参加过国内战争，是否在保卫祖国方面表现突出，都一律被解除红军职务。这些被解除军职、进入预备役的军官的名单被送交内务人民委员部。不难猜出他们此后的命运——内务人民委员部由以人民委员亚戈达为首的费尔曼德的志同道合者“掌舵”。

例如，在众多的带有“O. Y.”印记的被解除军职者中，有朱可夫高度评价的塞尔维亚人、师级将领丹尼洛·谢尔季奇。谢尔季奇指挥过一个师，在国内战争中表现得异常英勇，曾获两枚红旗勋章和荣誉武器。在十月革命时他指挥彼得格勒赤卫军的混成支队，是革命十分积极的参加者。他是各方面都很杰出的人。但他是塞尔维亚族人，这一点就足以解除他的军职。而他刚带着倒霉的代号“O. Y.”离开军队，马上就被捕并被处死。

波兰族人、旅级将领罗科索夫斯基也因“O. Y.”印记而被捕。

前俄罗斯联邦司法部长 B. 科瓦廖夫的《斯大林的两个人民委员》一书（莫斯科乌尼韦尔斯出版社，1995）中这样的例子也很有意思。这位“民主派”部长的这本书有着恶毒的反斯大林倾向。照科瓦廖夫的估计，这本书本应揭露斯大林及其助手所进行的残酷镇压。

疯狂的镇压确实很快就变得失控。“三人小组”和“两人小组”仿佛在比试谁的作用更大，它们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决定着人们的命运。被判处极刑的人数飞速上升，执行死刑的军人忙个不停，甚至产生了杀人方法工业化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许多年后，从已解密的前内务人民委员部莫斯科州内务局行政管理处处长伊赛·达维多维奇·贝格的刑事案件材料中可以了解到这方面的具体情况。B. 科瓦廖夫的书是这样说的：

“贝格当时是内务人民委员部莫斯科州内务局执行‘三人小组’决定的行动组组长。在他参与下建造了所谓的毒气杀人汽车。用这些汽车来运送被判处死刑的被捕者，在去执行地点的途中就用煤气把他们毒死。”

贝格供认，他组织了使用毒气杀人汽车来执行判决，他解释说，他是在执行内务人民委员部莫斯科州内务局领导的指示，不使用毒气杀人汽车无法执行由三个‘三人小组’同时判处的数量如

此庞大的处决命令。从贝格在受审时的交代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莫斯科州内务局工作人员的议论中可以了解到，由贝格组织的执行判决的程序性质极其恶劣：先将被判处死刑的被捕者剥光衣服，捆住手脚，塞上嘴巴，然后投入汽车中，在贝格的指挥下把在押者的财物抢掠一空。

我们不去详细探讨伊·达·贝格的案件，因为这不是我们的话题。只需指出，在执行死刑判决的行动分队中类似他这样的‘发明者’和‘能人’不少。”

这位部长毫无道理地不愿意“详细讨论”，如果他这样做了，他会发现伊·贝格的同事加马尔尼克、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阴谋分子是一丘之貉。可以证明这一点的还有如下事实：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挺身而出，为被费尔德曼送进镇压绞肉机的成千上万国内战争时的战友中任何人抱过不平。这是他们的共同事业：消灭“列宁的近卫军”，激起军队和人民的不满，中伤斯大林的政策。

清党和清洗军队在当时是需要的，这是斯大林推行的，事情很清楚，不必为他辩解。但是另一个事实也不容否认，这就是：托洛茨基分子和反对派分子在这件事上抓住了党的清洗方针，同过去许多事情一样，把这个方针歪曲到荒谬的地步，使清洗变成了真正的血腥疯狂的行动。

在20~30年代执行托洛茨基反对派路线的一个人作了另一个有意思的文字证明。他叫米哈伊尔·施赖德尔。他写了一本题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幕。一个肃反工作者的札记》（莫斯科，1995）的书。施赖德尔在肃反委员会中一级一级往上爬，确实了解其中的“内幕”。

他温情脉脉地缅怀往事，回忆起惩罚机构中的“同志”：雅·阿格拉诺夫（索连宗）、监狱管理总局局长阿佩捷尔、劳改营管理总局局长M. 贝尔曼及其副手拉波波特、白海劳改营负责人Л. 科甘、民警总局局长Л. 别利斯基、白海-波罗的海劳改营负责人菲林及其他类似姓氏的人（作者本人列举的）。

施赖德尔同他们一起剥夺哥萨克财产、剥夺富农财产，消灭基督教神职人员，共涉及60万俄罗斯人（沙皇军官、神父和有俄罗斯姓氏的富农）。施赖德尔不无骄傲地说：“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监狱和劳改营中的秩序是模范的。”

另一些作者（Л. 戈登、Э. 克洛波夫）在《发生了什么？》一书（莫斯科，1989）中说：

“在集体化初期，1929年末至1930年上半年，被作为富农剥夺财产和土地的超过32万个家庭……（每个家庭以3人计，则已达100万！——本书作者注）在集体化的第二个阶段，1930年秋至1931年夏，又有几十万个家庭遭镇压……因此，只是在1929~1931年间被作为富农剥夺土地和财产的就将近60万个家庭……可以断定，在集体化头几年被捕、被流放或遭受其他迫害的人数达到400~500万人。”

施赖德尔和他上述同事所推行的就是这样的“模范秩序”，而已经查明，托洛茨基是他们主要的组织者、鼓舞者和监护者。

于是出现了一个问题：斯大林与这件事有什么相干？为什么至今仍把20~30年代几百万人被镇压一事记在他的账上？

至于军事阴谋，那些对这一阴谋仍存疑问的人不妨再读一读上面引用的审讯速记记录的片断。整个审讯过程并没有任何刑讯逼供，只有平静的对话。并没有诬陷图哈切夫斯基的意图，只有对情况实事求是的叙述：存在“宫廷政变”的计划，规定了政变的日期和实施政变的力量，确定了最先要杀死谁。

问题是，斯大林是什么时候了解到这一切的：是侦查时、审判时还是更早的时候？

可以推测，这些情况及另外的情况（在住所内的谈话）在会见和开会（包括讨论反革命暴动计划的会议）后斯大林马上就知道了。窃听部门一直在不间断地工作，各种情报提供者一直在积极活动。

斯大林甚至还耽搁了一下：5月22日图哈切夫斯基被捕，而25日才被押往卢比扬卡。斯大林冒险了，太冒险了。据一个阴谋分子供认，图哈切夫斯基在一次秘密集会上用拳头敲着桌子喊道：“我再也等不及了。你们想让我们像皮达可夫和季诺维也夫一样被抓起来枪毙吗？”

斯大林无疑连这件事也知道，但逮捕元帅还是按规定办了手续——由政治局作出决定，经总检察长批准。

今天有人却一味鼓噪说：“斯大林是红色恶魔，消灭了千千万万的无辜者，使红军失去了领导人，他杀死了4万个指挥员。”

阴谋分子认了罪，请求法院宽恕，而现在有人却否认了他们的罪行，疯狂地满世界叫喊说：“没有这样的事，他们是被刑讯逼供的，这一切都是强加于他们的，胡编乱造的！”怎么会这样呢？

不过，刑讯逼供是存在的，大规模的非法定捕和处决也是存在的，但那是由托洛茨基分子、反对派分子、阴谋分子构成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法院、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干的，顺便提一下，是贝利亚揭露了这些



人并使他们再也不能为非作歹。他们本人承认了在侦查时使用“肉刑”。

镇压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30年代中期之前（托洛茨基阶段），第二个阶段在基洛夫遇害后（斯大林阶段）。

已经查明，在圆柱大厅公开审判被告和图哈切夫斯基阴谋分子时没有采用过刑讯逼供。有人说，斯大林本人盯着这些审判的进程。事实证明了一点。他不仅盯着，还根据某些被告的请求，根据他们写的回忆过去友情、表示认罪悔过的信，同他们见了面。

最近几年的报刊多次提到被镇压的4万指挥员，而且说他们不只是被镇压了，而且是统统被处决了，还断言在整个斯大林时期这类杀人的行动一直没有间断过。但是文件和事实不能证明这项指控。大镇压发生在30年代，当时是费尔德曼、加马尔尼克及其军事阴谋的同谋者杀死了几万名指挥员。

1938年，斯大林本人都为托洛茨基分子所干的过火行为大吃一惊。当时联共（布）中央全会作出专门决定并第一次点出了人数——被镇压者达4万名。这个文件是这样说的：

“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指出，1937~1938年间，在党的领导下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做了大量的工作，打击了人民的敌人，在苏联清洗掉由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白卫分子、白色哥萨克和刑事犯罪分子构成的众多的间谍、恐怖分子、破坏分子和暗害分子的骨干，他们是国外情报部门，尤其是日本、德国、波兰、英国和法国情报部门在苏联的有力支持。

在1937~1938年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进行的打击和挖掘敌对分子的大规模行动，由于侦查和审判简单化，不能不导致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和检察院工作中产生一系列重大的缺点和扭曲现象……”

接着列举了破坏法制的具体事例，并指出了大恐怖的原因之一是：

“钻进中央和各地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和检察院的人民敌人往往巧妙地利用了这类对侦查作业不负责任的态度和严重破坏法律规定的诉讼准则的行为。他们蓄意歪曲苏联法律，弄虚作假，捏造侦查文件，根据微不足道的理由，甚至毫无理由地追究人的刑事责



任，胡乱抓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对无辜者炮制‘案件’，同时千方百计要保护自己反苏罪恶活动的同谋者，并使他们逃避打击。中央和各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都存在这类事实……

为了坚决消除上述缺点并切实组织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和检察院的侦查工作，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

1. 禁止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和检察院开展任何逮捕和强制迁移的大规模行动。

根据苏联宪法第127条只有经法院决定或检察院批准才能逮捕人。

2. 撤销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命令组建的审判三人小组以及各州、边疆区以及加盟共和国警察局所属的三人小组。

今后所有案件都严格按照现行关于审判管辖的法律交法院或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审理……

规定应对每一次错误逮捕负责的，除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还有批准逮捕的检察员……”

下面是斯大林在一次中央全会上讲话的片断：

“在及时和正确清洗钻进我们武装力量的外国间谍的过程中，伏罗希洛夫同志及其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副手们显然过分卖力了。他们相信了前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提供的‘情报’，解除了近千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员的军职，据说是因为他们政治上不可靠。大部分人被解除军职的借口是现在流行的口号：由于勾结人民的敌人或由于丧失警惕性。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只要确认，军人的熟人或日常工作有交往的人中有人被揭发是外国情报部门的间谍（这一点他当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就立即解除这样的指挥员的军职。（请想一想费尔德曼的“O.Y”。——本书作者注）

当然可以理解伏罗希洛夫同志。丧失警惕性是一件异常危险的事，因为在前线进攻要取得胜利，需要几十万战士英勇作战，而要使进攻失败，只要总参谋部出两三个该死的叛徒。但是不管如何为4万名指挥员被解除军职辩解，这项措施不仅过了头，而且在各方面都极其有害。党中央委员会纠正了伏罗希洛夫同志的错误。

到1938年1月，有1.1万名被解除军职的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员重新回到陆海军中。我们国外的敌人出于别有用心目的散布谣言说，苏联大肆枪决人，他们为被我们揭露并处决的间谍，为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亚基尔之流流下了鳄鱼的眼泪。他们说，苏



联揭露了外国间谍会使苏联武装力量的战斗力下降，而苏联被处决的人数几乎超过100万。这是别有用心诽谤。1937年法院因反革命罪判处了841人有罪，其中121人被枪决。1938年内务人民委员部根据关于反革命罪的条款逮捕了52372人，经法院审理有2731人被判有罪，其中89人被处决，49641人被宣告无罪。这样大数量的无罪判决证明前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没有充分根据就逮捕了許多人，背着党中央胡作非为，因此他于1939年4月10日被捕，1940年4月4日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庭的判决，内奸叶若夫及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副手弗里诺夫斯基被枪决。至于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营管理局系统劳改营中的大多数在押人员，他们是出于对苏联人民安全考虑不能使之自由的普通刑事犯罪分子。

我们消灭了一贯策划并挑起反苏行动的外国间谍。同志们，我们清除了武装力量中的阴谋分子和叛徒，清除了我们国内的外国间谍，这是共产党为苏联人民立下的大功。不这样做，就无法使全国作好防御准备，因为已被处决的人民敌人的主要任务是推翻苏维埃制度，恢复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苏联的政权，他们一旦得逞，苏联就会变成西方的原料附庸国，而苏联人民就会变成世界帝国主义的可怜的奴隶。人民敌人的计划中重要的一点是破坏苏联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协助外国侵略者进攻苏联，为苏联军事上的失败准备条件……”

这是斯大林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前说的话。不难预料，托洛茨基分子（组织严密的）在实施其协助希特勒和日本军队的计划时，将会犯下多少罪行。

斯大林接着谈了托洛茨基分子的计划，这一计划与80~90年代我国发生的事件十分相似。斯大林的战略洞察力不能不令人感到惊讶。

“这些卑鄙可怜的叛徒在依靠他们武装起来的反革命败类、刑事犯罪分子和丧失阶级特性分子夺取政权并在我国建立波拿巴制度后，首先试图放弃社会主义所有制，把我国经济上重要的经营项目出卖给资本主义分子，成为他们的私人财产；以亏损为借口撤销国营农场并解散集体农庄；把拖拉机和复杂的其他农业机器交给被称作农场主的个体农民，以在农村中恢复富农制度；通过获取外国贷款使我们遭受奴役；把对帝国主义国家十分重要的我国工业企业租让他们；把萨哈林的石油给日本，把乌克兰给德国。与此同时，被判处有罪的人民敌人千方百计想破坏苏联武装力量的战斗力。

例如，反苏阴谋积极参加者之一的索柯里尼柯夫在受审时谈到人民敌人的计划时说：“……我们明白，我们的纲领性方针是要回到资本主义去，提出资本主义纲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依靠我国的某些阶层，培养出小资本主义阶层、小商人、小资产阶级。”

这伙人、这一匪帮的根子应该到收买他们、豢养他们、为他们忠实的奴才表现付了大价钱的外国情报机关的密室中去找。

外国间谍不倦地活动，寻找并令人遗憾地在我国找到了盟友，在敌视苏维埃制度的腐化堕落分子中找到了助手。

由于被揭露和被处决的人民敌人的目标是为外国敌人、侵略者打开大门，及时揭露并消灭他们是我们为成功防御作好准备的工作中十分重要的措施之一。”

无须再说斯大林是一个性格坚定的人。他发现敌人的阴谋诡计后，采取了他认为必要的国家措施，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里进行了“健全机构的”清洗。

斯大林还记得犹太共产党中有几万个犹太复国主义者违背了他的意愿被吸纳入联共（布）。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各种机会主义者沆瀣一气，势力很大；他们在托洛茨基领导下窃据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检察院、法院、劳改营和党的机关中的高级职务。

斯大林记得许多人的名字（名单还保留着）。他始终记得他们干下的卑鄙勾当，是他们把党的决议推向荒谬的地步，败坏真正布尔什维克良好创举的名声。斯大林记得这一切。于是他们为此付出了代价。

我们在结束对1922~1938年苏联产生大规模镇压的原因及大规模实施过程的研究时，必须再提一个藏在冰山下及水下冰山底部的文件，这个文件大概没有人看过。这个文件内容由于记录了几十万人的死亡而十分骇人！

绝密

致斯大林同志 报告

1919~1930年时期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枪决了近250万人民的敌人、反革命分子、暗中破坏分子等。

1930~1940年时期被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和被法庭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58条判处有罪的人民敌人共1300949人，其中根据法院判决被处决的为

892 985人。有 407 964 人仍在服刑。其中：

反革命分子，走上反革命道路的前列宁党的领导人中，被判刑的有 937 110 人，被枪决的有 686 271 人，仍在服刑的有 250 839 人；

走上反革命和破坏活动道路的共产国际成员中，被判刑的有 180 300 人，被枪决的有 95 854 人，仍在服刑的有 84 446 人；

因破坏分子—医生一案被判刑的有 3 959 人，被枪决的有 1 780 人，仍在服刑的有 2 066 人；

因“人道主义者”作家一案被判刑的有 39 870 人，被枪决的有 33 000 人，仍在服刑的有 6 870 人；

在工农红军的军人和雇员中因背叛祖国、间谍和人民敌人罪被判刑的有 76 634 人，被枪决的有 35 000 人，仍在服刑的有 37 568 人；

在被揭露出为人民敌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中被判刑的有 63 079 人，被枪决的有 41 080 人，仍在服刑的有 22 319 人。

在所有被判刑的人民敌人中，90% 是犹太族人。

这些数字不包括在劳改营中死亡的人数。

附件：苏联各地区的材料，统计表，共两页，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保密局局长巴什塔科夫同志的报告，共两页。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拉·贝利亚）

很清楚，不是斯大林一个人干下这些可怕的事的。他的忠诚而殷勤的战友伏罗希洛夫、叶若夫、贝利亚、梅赫利斯、乌尔里希以及反对派分子托洛茨基、亚戈达、贝尔曼、阿佩捷尔、费尔德曼等许多人在这件事上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常言说，事实胜于雄辩。这可不是居心不良的研究者凭空捏造的关于 1937~1938 年审判的文章。而最近这些年中这类货色不计其数。炮制并散布这类文章同无聊的谣言一样有着一定的目的——引起对这些审判是否合法产生怀疑。这种“著作”的作者大都没有直接接触过被告和侦查材料。改革时期的狂热使他们开了窍，他们写的东西都是转述各种推测，不惜任何代价为阴谋分子开脱，把他们说成是不幸的受害者。事实并非如此，审判的直接参加者（被告本人以及数以百计、在莫斯科市中心最大的大厅参加公开审判的记者和外交官）证明了这一点。

所有的被告在回答审判长乌尔里希的问题（他们是否认罪）时都无一例外地作了肯定的回答。首先，我们来确定一下，审判是否在演

戏，被告是否受过肉刑或心理上的影响。

著名外国作家莱昂·福伊希特万格在他在西方、后来在苏联出版的《莫斯科，1937年》一书（现在我们这里闭口不提这本书）中写道：

“当我在欧洲时，我觉得无法相信在审判季诺维也夫时对他提出的指控。我以为是通过某种秘密的手段迫使被告作出历史性的供认的，我认为整个审判是用异常令人厌恶的极端的艺术手段排演的一场戏。

但是，当我在莫斯科参加第二个审判，看到和听到皮达可夫、拉狄克及其朋友的供认时，我感到我的怀疑在直接感受被告的供认和他们的供认态度影响下像盐溶于水一样都一一消解了……

审判基本上首先是针对最大的人物——缺席的被告托洛茨基的。对审判主要的反对意见是，对托洛茨基提出的指控不可信。

反对者们气愤地说：‘托洛茨基是苏维埃国家缔造者之一，列宁的朋友，他怎么可能亲自下令阻挠建设他缔造的国家，挑起反苏战争并促使苏联在这场战争中失败呢？难道有这种可能吗？难道这可以设想吗？’

在经过仔细核实后发现，指控托洛茨基所干的事不仅有可能，而且甚至是符合他的内心世界、他惟一能干出来的事。

托洛茨基无数次宣泄他对斯大林的刻骨仇恨和鄙视。他能这样说，这样写，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干呢？他自认为是惟一真正的革命领袖，不择手段来推翻靠计谋取代他的‘假救世主’，难道真的不可能吗？我以为这是很可能的。

我还以为，这个人既然被仇恨迷了心窍，再也看不到公认的苏联经济建设的成功和军队的实力，就很可能发现不了他使用的手段毫无用处，并开始选择明显错误的道路。

……他是一个大赌徒。他的一生就是一连串的冒险行动，因为他往往能办成有风险的事。

托洛茨基从来不是俄罗斯的爱国的……托洛茨基过去和现在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呢？那就是不惜任何代价回国，重新掌权。”

这位熟知西方政治形势的作家接着说，托洛茨基不仅要他在苏联的支持者积极行动起来，甚至采取恐怖手段，从肉体上消灭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同法西斯分子合作，而且同他们一起扶植“第五纵队”，为的是在战前削弱苏联，而在战争爆发后在后方对苏联实施打击。

福伊希特万格接着写道：



“至于第二次审判时受审的皮达可夫、索柯里尼柯夫和拉狄克，对他们的问题有以下不同意见（是作家本人的不同意见。——本书作者注）：有着如此级别和影响的人不可能反对国家，因为他们的地位和职务都是国家给的……我以为只从这些人的地位和影响来看他们是错误的。皮达可夫和索柯里尼柯夫不仅是大官，拉狄克不仅是《消息报》主编和斯大林最亲密的顾问之一，这些被告大都首先是地下工作者、革命者、造反者和政变分子——这是他们的使命……加之他们信任诱导力巨大的托洛茨基，他们同他们的导师一起认为‘斯大林的国家’歪曲了他们本人所致力塑造的形象，并认为自己最高的目标是对这种歪曲作出修正。

还不应该忘记被告们在政变中有着个人利益。这些人的虚荣心和权力欲都没有得到满足。他们身居高位，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担任他们认为有权担任的一个最高职位，例如，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进入政治局。不错，他们重又得到赏识，但当年他们作为托洛茨基分子受过审判，因此再也没有机会出人头地。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受贬了，而拉狄克说：‘没有人比被摘了肩章的军官更危险。’”

福伊希特万格提到外国报刊说被告被施以催眠术，服用了特殊的麻醉药等等。有人问他说：“你看到被告，听到了他们说话，您是否产生他们是被迫供认的印象？”

作家回答说：

“我确实没有产生过这样的印象。绝不能说受审的人是被折磨得死去活来、面对刽子手心如死灰的人。总的来说不应认为这次审判带有某种作假的性质，甚至是得意的、煽情的性质。

审判席和旁听席没有隔开。被告席不像被告席，隔离被告的隔板更像是包厢座的边饰。被告本人保养得很好，衣着得体，举止缓慢而从容不迫。他们喝着茶，口袋里插着报纸，常常往旁听席上看……要是这场审判是交给一个导演排演的，那么这个导演要花上好几年，彩排好多次，才能使被告们如此配合默契……十分遗憾的是，苏联法庭上禁止照相和录音。如果世界舆论不仅得知被告说的话，而且知道他们说话的神态、语调和表情，那我认为不相信的人会少得多。

他们都认罪了，但方式各不相同：有的语气猥琐；有的雄赳赳气昂昂，像（托洛茨基军队的）战士一样；有的内心抵触，百般狡辩；有的像真诚悔过的学生；有的还在教训人。但他们所有人的

语气、表情、手势都是真实的。”

作家接着对审判参加者的表现一一作了评述。他强调指出审判员、检察官一次也没有提高嗓音，表现得极其彬彬有礼。

福伊希特万格否认检察官（或法官）有过打断被告的话、不让他们说话、骂骂咧咧、大喊大叫、毫无礼貌地剥夺被告的发言权等表现。福伊希特万格代表持怀疑态度的人提出一个问题：被告们不为自己辩护，不试图用可以减轻罪责的情节来为自己开脱，这是为什么？

“被告认罪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在预审时已被证词和文件彻底揭露，否认对他们来说已毫无用处。

……1935年被告们面对苏联越来越欣欣向荣，不得不承认托洛茨基主义已经破产。由于这一点……被告的认罪听上去好像出于无奈的对斯大林制度的歌颂。这些托洛茨基分子……已经无法捍卫他们所做的一切，因为事实已经彻底驳倒了他们的托洛茨基主义信念，明眼人再也不会相信他们。在他们站到错误的一方后，他们还能怎么办呢？……他们在临死前最后一次讲话中承认：社会主义不能通过我们所走的道路来加以实现……只能通过别的道路——斯大林提出的道路来实现。

但是即使抛开意识形态的动因，只看表面情况，也可以认为被告们完全是被迫认罪的。在看到揭露他们罪行的极有分量的侦查材料后，他们该怎么办呢？不管是否认罪，都是死路一条……简而言之，他们不认罪就注定百分之百地死，他们认罪就注定百分之九十九地死……从他们最后陈述中可以看出，确实有这类考虑。”

布哈林的辩护士和指责审判不公的人们，请听听布哈林实际上在“阴间”是如何说的：

“我认为，当西欧和美国部分知识分子对苏联进行的审判产生各种怀疑和动摇时，首先是因为这些人不明白在我国敌人同时有着自相矛盾的双重意识这个根本特点，我以为首先应该懂得这一点。

我谈这些问题，是因为我同国外这些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学者有着很多联系，我该告诉他们，在苏联每一个少先队员都明白的道理。

常常有人用像西藏药粉之类种种荒唐的东西来解释悔过的原因。我暗自说，我在关押我近一年的狱中一直在工作，保持了清醒



的头脑。这是事实对各种胡说和反革命的无稽之谈的驳斥。

有人提到催眠术。但我在法庭上为自己作司法辩护，当场核实情况，同公诉人辩论，任何人，即使是对相关医学科目不太了解的人，也该承认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催眠术……”

如此等等。在据说是布哈林直接写给现在的“护法斗士”的“布哈林最后的话”中的最后一句说：“我武断地推测，托洛茨基和我的罪行的同谋者以及第二国际将为我们，尤其是为我辩护。我拒绝这样的辩护，因为我向祖国、向党、向人民下跪，我的罪行罄竹难书……”

还可以举出其他被告类似的袒露心迹的话，但为了简短起见，我们只引用公开的审判中最主要的被告（虽然他没有坐在被告席上）托洛茨基的表白。

他在他的《斯大林的罪行》一书中是这样说的：

“党内斗争的进程驱散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关于很快重新掌权的幻想。他们作出了与我截然不同的结论。加米涅夫说：‘既然不可能从目前统治集团手中夺得权力，那只有——一条道：重新齐心协力地去干。’季诺维也夫尽管很动摇，但也作出了相同的结论。

在此后的十年中我不断抨击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投降行为。

1928年5月26日我从阿拉木图（中亚）写信给朋友们说：‘不，党还十分十分需要我们。不必担心“没有我们什么都干成了”，不要使自己和别人心烦意乱，要学会等待时机，心明眼亮，绝不让个人对诽谤者和歹徒们的气愤侵蚀了自己的政治路线——这就是我们应该采取的作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想法是我的政治活动的主要动机。”

阴谋分子的罪行有目共睹，因此根本没有是否相信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该相信哪一个人？是相信毫无根据、只凭自己的倾向性（和中毒程度）来表示怀疑和提出指责的人，还是相信这些审判的直接参与者和证人？

同样不能用不信任来玷污那些被处决的人。他们在离开人世前一定想给人民说清真相。

从1937~1938年的审判速记记录中，从右派的政治纲领中，从他们的战略策略中可以发现这一切与目前俄国的改革派的政策和实践完全吻合。但是如果说阴谋分子这一切只停留在理论上，那么我国的改革派

——“民主派”已经将这一切付诸实践。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托洛茨基分子、反对派分子、阴谋分子的继承人。

正因为如此，他们才首先为1937~1938年审判中被判有罪的“人民敌人”平反，成了他们异父同母的兄弟和志同道合者。

对于斯大林，对于当时苏联实行的法律来说，托洛茨基分子在法律上和实践中都是确凿无疑的罪犯，他们自己也没有否认这一点。

因此，镇压是对托洛茨基分子、反革命分子、军事阴谋分子的罪行和敌对活动正常的反应。

十五 关于镇压

赫鲁晓夫及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由他操纵的报刊断言，斯大林搞镇压完全由于他狂妄自大，想在历史上成为仅次于列宁的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领导人，而在列宁去世后则是第一位历史人物、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他们说斯大林为达到这个目的无情地消灭从前的革命家，只要他们在某种形式上不支持他这个愿望、了解他实际上当时并非居党和革命中最重要地位的真相的话。

“妄自尊大、残酷无情和缺乏远见”，在改革时期掌权的“民主派”这样来解释斯大林的镇压。为了证明这个说法，他们使用了一切大众媒体，把斯大林说成“刽子手、恶魔、无原则的独裁者”。

这一切还只是冰山看得见的、水面上的一部分，叫作对俄罗斯的政治入侵。这座冰山的水下部分是更大的一部分，其主要底部广大的人们是看不到的。外来人和形形色色土生土长的揭露斯大林的人精心地掩饰这水下的部分。

智者说，比较出真知灼见。我们不妨照着这个好主意去做，尽量不带偏见地去看看真实的文件和事实。

一切革命和起义都进行镇压。这已被认为是合乎规律的：新的势力执掌政权，便收拾掉正在反抗的从前的统治者及其亲信。在俄国革命后清洗旧制度代表的工作持续了好几年。在作为可能反对革命改造的敌人被镇压的人中有“资产者”、前军官、宪兵、富农和神职人员。但我还要再提一下，政治活动家以及此后的历史学家把这一切看作是十分正常的革命现象，能引起异议的只是规模大小的问题。

这里要谈的是和平时期进行的镇压，对于革命来说是一种独特的反常现象。情况令人费解，因为镇压的不仅是旧的沙皇制度的代表，还有革命者，即开始杀戮曾和自己一起推翻沙皇、在国内战争各条战线上保卫年轻共和国的革命战友。



不是所有的人一下子都能明白，为什么革命者会分成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并最终互相从肉体上加以消灭的两派。当革命者还处于地下时，好像是一个统一的党，但当时党内就在纲领问题和策略问题上出现分歧，开始了分裂。党分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

双方对这一分裂的解释都是一样的：为了更快地使人民自由幸福，因此才开始了革命斗争。

纷争的真正原因不是没完没了的争论和论战，而是从来危害一切运动、起义和革命的东西，即领导层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对统治的野心，表面上看统治是集团式的，实际上是个人的、利己的。这个病症叫作领袖至上。这个病症从来都被精心掩饰起来。谁都不承认害了这个病，覬覦领袖地位的人不让周围的人、甚至不让自己发现这个病症。但是如果彻底解开这一团政治矛盾，就会发现其中正是存在这一致命的领袖至上杆菌。大家知道，对事实可以随心所欲地作各种解释，从中得出想要的结论。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加者的回忆录和历史学家的著作对各大战役的描述取决于他站在哪一边打仗，对谁有好感。对镇压的描述和解释同样由于政治信念不同而各不相同，尽管依据的是同一些事实。

20世纪下半叶（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和国外报刊写得最多的（至今仍然如此）是镇压。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我从斯大林最亲密的战友和志同道合者莫洛托夫那里好像听到了进行镇压的客观原因。在莫洛托夫生命的最后十年中我常去他家，多次和他谈到了这一话题。

还是顺着次序来说。

有一次莫洛托夫详细地谈了我认为是主要的问题——镇压问题，他说：

“您首先要明白，镇压是夺权斗争和消灭变成敌人间谍的托洛茨基分子的结果。革命前党就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思想分歧不仅导致为某些纲领和决议的提法进行的口头交锋，还为争夺在党的中央机关中的领导地位而进行斗争。

革命后党内仍然有在新条件下继续斗争的两派，归根结底是争夺权力，我指的是列宁派和托洛茨基派。

斯大林得到了一份沉重的遗产：经验丰富、很有才能的托洛茨基及其强大的组织（托洛茨基的志同道合者占据了许多党和国家的要职）。斯大林为了对付他们，必须依靠能支持他的人。

在30年代斯大林还没有总书记所必需的威望，因此他在做事



和讲话时总一再强调，他是列宁事业的继承者。列宁的威望成了他的支柱。列宁派团结在斯大林的周围同托洛茨基分子斗争。

不应该忽视的是，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在当时是抵御托洛茨基分子攻击的一方。

托洛茨基精力充沛、行动果断、学识渊博，斯大林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斗争中处境十分困难。起先只是口头交锋，后来斯大林作为一个严厉果断的人，除了清谈和论战，开始使用权力。您知道，权力是十分强大的武器。斯大林打倒了托洛茨基本人，把他驱逐出境，并着手铲除他的支持者。他们为数众多！而且他们不放下武器。托洛茨基在国外继续领导他的反对派。他们的任务不仅是推翻斯大林及其战友，而且是从肉体上对他们加以消灭。托洛茨基分子首先采用恐怖手段——杀害基洛夫成了他们卑劣勾当的极点。但斯大林在基洛夫遇害后也十分严厉，甚至十分严酷！

今天的报刊编造说斯大林插手杀害基洛夫，这全都是谎话，是为托洛茨基分子涂脂抹粉。斯大林和基洛夫是真正的朋友，斯大林对他评价很高。

可是后来就收不住了，像雪球越滚越大。斯大林在中央消灭自己的敌人，而地方上讨好逢迎他的人为了得到总书记的赏识，开始在各共和国各州里寻找敌人。而同时，还‘收拾’不合地方当局心意的眼中钉……”

这是莫洛托夫的解释。我问他说：

“难道您没有产生过怀疑，逮捕的人中不是有您早在革命前和国内战争中就很熟悉他们事迹的人吗？”

“怀疑是有过的，有一次我跟斯大林说过，他回答说：‘您去卢比扬卡，同伏罗希洛夫一起去亲自核实一下。’当时伏罗希洛夫也在场。于是我们去了。当时我们正好对波斯特舍夫被捕产生了疑惑，就去找叶若夫。他下令拿来波斯特舍夫的案卷。我们看了审讯笔录，波斯特舍夫在其中认了罪。我对叶若夫说：‘我想和波斯特舍夫本人谈谈。’波斯特舍夫被带来了。他脸色苍白，消瘦了许多，看上去神情沮丧。我问他说：‘审讯笔录中您的供词记录得正确吗？’他回答说：‘正确。’我又问他说：‘那么说，您认罪了？’他回答说：‘既然我签了字，那就是说我认了，还有什么可说的……’事情就是这样。既然本人认罪了，我们还能不相信吗……”

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一次讲话中谈了镇压的原因。他指出第一个原因是莫洛托夫在谈话中跟我谈到的那个原因。“在我国两个不可调和的纲领像对立的你死我活的敌人一样在斗争着。两个纲领，两个阵营。一方面是脱离人民、敌视人民的、成了外国情报机关间谍的一小撮人（托洛茨基分子。——本书作者注），另一方面是建设能保证自由而丰衣足食生活的光明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斯大林派。——本书作者注）。”

斯大林认为镇压扩大化的另一个原因是：

“……在共产党员中存在着尚未被揭露的个别利欲熏心的人，他们靠开除党员、镇压党员来表现自己、得到提拔，尽力设法通过不分青红皂白地镇压党员来避免被指责为丧失警惕性。

这类利欲熏心的共产党员以为，既然有人揭发这个党员，即使揭发是错的，是别有用心的，那么这个党员对于组织来说也是危险的，应该尽快摆脱他，表明自己有警惕性。因此他认为不必客观地分析对党员提出的罪名，事先就决定必须把他开除出党。

中央全会因此要求各州委、边疆区委、各民族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解除不执行联共（布）中央指令、不经认真核实材料就开除党员和预备党员、对党员恣意妄为的党的领导人的党内职务并追究他们的党内责任。”

根据这一点，不分青红皂白全往斯大林身上推的罪责中，有一部分大概应归咎于阿谀奉承、留有后手、常言说“实力过头”的人。

在任何时候，国家领导人和军事统帅在战争迫在眉睫时都不仅培训军队，而且清除潜伏在后方的间谍和不可靠分子，因为他们在战斗开始时可能给本国军队造成巨大危害并帮助敌人。

且举历史上的一个例子。

俄国军队在赶走拿破仑后进逼巴黎。拿破仑的主力不向首都撤，却去了南方的曼德，打算从翼侧打击因进攻巴黎而暴露了翼侧的联军。

哥萨克抓住了法国一名从巴黎带了几封信去见拿破仑的信使。信被呈交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其中一封信说，巴黎有一批有势力的人公开敌视拿破仑皇帝，决心当敌人逼近首都时成为异常危险的力量。（这些势力与我国的托洛茨基分子相似，他们在为拿破仑服务的同时，暗中打算复辟革命前的旧制度。）

亚历山大一世在这之前就收到过情报，而且反对派也派来过特使，但他对此并不相信。现在他从截获的信件中确信确实存在能帮助进攻一

方的敌对势力，亚历山大一世决定联军不与法国皇帝的主力决战就进攻巴黎。攻克巴黎就意味着战争的结束。拿破仑本人惊呼说：“要是敌人打到巴黎，那帝国就完蛋了！”

保皇派—反对派分子（像托洛茨基分子一样）担任许多国家要职，如塔列兰是宫廷侍卫长——像我国的政府主席（加米涅夫）一样。巴黎的保皇派分子破坏拿破仑保卫首都的部署，散布谣言说，俄国皇帝保证法国人人格和财产不受侵犯，“俄国皇帝把巴黎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塔列兰（像我国的两面派一样）组织政变，向俄国沙皇报告说，参议院剥夺了拿破仑的皇位，组成了新政府。亚历山大一世及其盟友后来就同这个政府进行和谈。接着参议院宣布路易十八为国王。总之，反革命成功了。这个例子证明，要是不及时收拾掉反对派（第五纵队），它就可能取胜，导致十分悲惨的后果。

斯大林无疑熟知历史，他让全国作好防御的准备，肃清国内的敌对势力，他了解国内反对派和潜入苏联的外国间谍的行动。

不过，莱昂·福伊希特万格虽然不是军事家，却在他的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可以说，迫使苏联领导人在许多扬声器下举行这一审判的主要原因，是战争的直接威胁。过去托洛茨基分子危险要小一些，可以宽恕他们，最多流放他们……现在，战争迫在眉睫，不能这样心肠软。分裂、派性在和平的环境下并没有严重的意义，在战争条件下却可能成为巨大危险。”

有一位来自外国、就其地位来说绝不能算作苏联朋友的人的话，令人信服地为斯大林对敌人的镇压行动作了辩解。我指的是前美国驻苏联大使约瑟夫·戴维斯。请看他1941年在《星期日快报》上写的文章。在德国进攻苏联后，有人问他说：“您对俄国的‘第五纵队’成员有什么看法？”他回答说：“他们那里没有这样的人，他们把这些人枪决了。”戴维斯接着说：“全世界相当多的人当时认为，1935~1938年著名的对叛徒的审判和清洗是令人愤慨的粗暴、恶劣的实例，是歇斯底里的表现。但是目前开始明白，这证明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有惊人的远见。”

戴维斯在详细阐述了布哈林及其同伙——托洛茨基分子——的计划后说：“简而言之，这个计划是要同德国全面合作。为了奖励阴谋的参加者，将允许他们留在一个技术上独立的小小的苏维埃国家中，这个国家应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割让给德国，把沿海地区和萨哈林的石油企业



交给日本。”

戴维斯还说：“如果斯大林及其战友没有收拾掉叛徒分子，我们现在目击的（1941年的战斗。——本书作者注）‘苏联的抵抗’将毫无意义。”

托洛茨基分子在总结“斯大林镇压”时争论说：斯大林消灭了“列宁的近卫军”。

是这样一回事吗？不妨回忆一下，列宁本人关于斯大林镇压的“近卫军”说过些什么。例如，早在1917年列宁就因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背叛行为把他们称作“政治娼妓”，而在“遗嘱”中说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因此，列宁预见到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一贯反党。

列宁关于布哈林，除了说他有才能，还指出：“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繁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

列宁关于皮达可夫写道：“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指望他的。”^①他还谈到“犹杜什卡·托洛茨基”本人及列宁所说的他的“非布尔什维主义”，“他反对中央的斗争”，“过分自信”和“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不止一次地背叛。首先，这是靠了托洛茨基分子的努力加入联共（布）的具有犹太复国主义实质的、人数众多的犹太共产党——改头换面的社会革命党人、崩得分子等，他们也成了“斯大林的镇压”的对象。难道可以把这些人都称作“列宁近卫军”吗？大概把这些钻进布尔什维克党的人叫作“托洛茨基的犹太复国主义近卫军”来得更贴切些。

既然如此（正是如此），那么“斯大林的镇压”就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和方向，因为斯大林不得不保卫国家和党，不让反对派阴谋分子的敌对行动得逞。他长时间地在论战和争论中保卫党和国家。而当出现关于“宫廷政变”和消灭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问题时，斯大林才采取时势所要求的坚决措施。

因此，斯大林及其志同道合者在同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分子多年的斗争中是自卫的一方，镇压是为了击溃反对派分子而采取的迫不得已的极端措施，是他们首先采取极端措施——对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实施恐怖行动、消灭苏联及其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建立自己反人民的统治制度。

斯大林镇压的结果是粉碎了托洛茨基主义以及其他一切反苏反俄的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39-340页。——译者注

集团和反对派，这是斯大林的主要胜利，就其规模来说这是历史性的战略胜利，实际上这是粉碎了苏联境内的犹太复国主义。斯大林取得了战胜犹太复国主义的胜利后，使居住在苏联的各民族避免遭受其危险不亚于希特勒法西斯侵略的奴役。要是托洛茨基分子在20~30年代的“政治战争”中取胜的话，那我国的历史进程将马上变成基本居民遭到真正奴役和灭绝的过程，如同我国90年代起发生的一切那样。举例来说，上面提到的托洛茨基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俄罗斯正教会的摧残就是这方面的鲜明例证。

阴谋分子和叛徒们要对苏维埃国家的各个民族的许多痛苦、不幸和困难负责。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新社会的建设和人们的生活无疑会更顺利、更少痛苦、更有成效；不会有因托洛茨基分子歪曲和强行推行集体化而造成的俄国基本居民（基本上是俄罗斯人）的大规模灭绝；富农这个阶级也就不会灭绝；革命的参加者，尤其是年轻的共产党员就不会在没完没了的争论中面对别有用心地对斯大林及其支持者的种种指责而晕头转向；许多人就不会因为反苏言论而纷纷被捕。由于托洛茨基分子制造的这些大逮捕，人们就需要对告密、举报、揭发、诬告等卑鄙勾当进行自卫。

20年代和30年代前五年监狱和劳改营人满为患是反对派分子活动的后果。他们自己制造“犯罪”浪潮，又自己加以惩处，因为他们掌握着内务人民委员部、检察院、法院和劳改营的大权。

* * *

读者们大概很想知道斯大林本人对阴谋分子的勾当和1937~1938年审判是怎样想的、怎样评价的。在斯大林的个人收藏材料中保存了他在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一次讲话的速记记录。这份记录未经校正，在保险柜里放了半个世纪，1994年才由《史料》杂志第3期首次发表。由于看过这个记录的人不多，我加以大量删节后引用于后，让读者扼要地看到追究阴谋分子责任是有合法根据的，不是如许多恶意中伤者所说是出于“暴君”和“独裁者”的“随心所欲”。

斯大林在讲话中举出了许多具体罪行的事实及犯罪分子的姓名。我为了从简把这些都一一略去，只留下斯大林认为这些人走上罪恶的背叛道路的原因部分。

斯大林：同志们，我相信，现在没有人会怀疑确实存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军事政治阴谋。事实、罪犯本人的大量供词以及地方上工作的同志们从旁的观察都表明无疑存在着由德国法西斯分子煽动和资助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军事政治阴谋。

人们骂一些人是坏蛋，骂另一些人是怪人，还骂有一些人是地主。

但是辱骂本身不解决问题。为了连根铲除这一祸害，制止这一祸害，必须对此加以研究，心平气和地研究，研究其根源，揭示和确定防止今后在我国和我们身边这类乱七八糟的事重演的手段。

我恰恰想就这样的问题简单说几句。

首先，请大家注意，军事政治阴谋是由什么人领导的。托洛茨基、李可夫、布哈林，可以说是政治上的领导人。我还可以加上一个鲁祖塔克，他也是领头的，干得很狡猾，他把一切都搅乱了，可是仍然是德国的间谍；还有卡拉汉，叶努基泽。还有：亚戈达、图哈切夫斯基——军队那条线上，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科尔克、埃德曼、加马尔尼克——一共13个人。这是些什么人呢？我很想知道这一点。

据说，图哈切夫斯基是地主，另一个人是牧师的儿子。同志们，这样的方法一点也不能解决问题，绝对解决不了问题。当人们提到贵族这个劳动人民的敌对阶级时，是指一个阶级、阶层，但这并不是说贵族中某些个别的人不能为工人阶级服务。列宁是贵族出身，大家知道吗？

喊声：知道。

斯大林：恩格斯是工厂主的儿子，总归是非无产者。恩格斯本人管理自己的工厂，以此来接济马克思。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神父的儿子——是一个不坏的人。与此相反，谢列布里亚科夫是工人，可是大家知道他是一个大坏蛋。利夫希茨是一个工人，识字不多的工人，却是一个间谍。

因此总的尺度不是是谁的儿子，这是老的尺度，对一些人不合适。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

我们还有另一个同样错误的流行观点。人们往往说：1922年某人投票支持过托洛茨基。这同样是错误的。一个人有年轻的时候，分不清是非，喜欢惹事。捷尔任斯基投票支持过托洛茨基，不仅投票，还当着列宁的面公开支持托洛茨基反对列宁。大家知道这件事吗？他从来不是在某件事上消极旁观的人。他是个十分积极的托洛茨基分子，甚至想发动整个国家政治保卫局来保护托洛茨基。这一点他没有做到。还有安德列耶夫在1921年也是十分积极的托洛茨基分子。

这是在你们中以至全党十分流行的第二个观点，它同样是错误的。我想说，这个观点不总是正确的，它往往让人上当。

因此，我在对这一核心及其成员评价时也不采用这个错误的观点。

在评价这个阴谋核心的领导人时需要采用第三个观点。这是根据这些人许多年来的所作所为对他们作出评价的观点。

我现在就来谈。我列举了13个人。我再重复一遍：托洛茨基、李可夫、布哈林、叶努基泽、卡拉汉、鲁祖塔克、亚戈达、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科尔克、埃德曼、加马尔尼克。其中有10个人是间谍。托洛茨基组织了这个集团，直接训练、培养他们，要他们给德国人提供情报，让德国人相信我托洛茨基是有人的。要他们搞破坏活动、颠覆活动，让日本人和德国人相信我托洛茨基是有势力的。

我们没有材料表明李可夫本人给德国人提供过情报，但他鼓励通过他的人提供情报。叶努基泽和卡拉汉同他保持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两个人都是间谍。卡拉汉和叶努基泽都是从1927年起成了间谍的。我们知道，他们通过什么人获得秘密情报，又通过什么人送出这些情报——通过德国驻莫斯科使馆的某个人。我们是知道的。李可夫这一切全知道。我们没有材料表明他本人是间谍。

我们没有材料表明布哈林本人提供过情报，但叶努基泽、卡拉汉、鲁祖塔克同他保持十分紧密的联系，他建议他们提供情报，但自己不提供。

我们没有材料表明加马尔尼克本人提供过情报，但他的朋友，好友乌博列维奇，尤其是亚基尔、图哈切夫斯基一贯向德国总参谋部提供情报。

其他的人——叶努基泽、卡拉汉，我已经说过。亚戈达是间谍，他在他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中罪大恶极。他派这样的肃反工作者去国外休养。德国情报部门就抓住有这些罪恶的人，招募了他们，他们回国时就被招募了。亚戈达对他们说：我知道德国人招募了你们，随你们的便，或者你们成为我个人的人，照我的意愿盲从地干，或者我把你们交给中央委员会，说你们是德国间谍。他对德国间谍沃洛维奇和日本间谍加伊就是这么干的，这一点他自己供认了，这些人都供认了。他对早在1923年起就是德国间谍的保克尔也是这么干的。这是亚戈达。然后是图哈切夫斯基。大家读过他的供词了。

喊声：对，读过了。

斯大林：他把作战计划，我们最保密的作战计划交给了德国国防军。他同德国国防军代表见过面。是间谍吗？是间谍。亚基尔一

贯向德军司令部提供情报。他编造自己患了肝病。也许他是编造自己患了这个病，也许他确实患了这个病。他就去那里治病。乌博列维奇不仅同朋友、同志一起，还单独提供情报。卡拉汉是德国间谍，埃德曼是德国间谍，卡拉汉从他在担任驻德武官起就向德军司令部提供情报，还有鲁祖塔克。10个是确定的间谍，3个是为德国国防军干间谍活动的组织者和纵容者。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当然会有人问，这些人昨天还是共产党员，怎么会突然成了德国间谍部门赤裸裸的工具呢？是因为他们被招募了。今天他们被要求提供情报，不提供的话，我们有你受招募的签字画押的条子，我们就加以公布。他们害怕被揭露就提供情报。明天又要求他们说，这些还太少，要多提供一些，收下钱，签上名。在这之后就要求他们开始策划阴谋。

组成核心的是10个地道的间谍和3个地道的间谍教唆者。很明显，这些人的逻辑本身取决于德国国防军。要是他们执行德国国防军的命令，国防军显然会把这些人往这儿推。这就是阴谋的内幕，这是军事政治阴谋，是德国国防军亲手干的杰作。我以为这些人是国防军手中的傀儡和玩偶，国防军想在我们这里搞阴谋，于是这些先生就一贯地向他们提供军事秘密。国防军想推翻、打倒现政府，他们就动手干了起来，但没有成功。国防军想在爆发战争时一切准备就绪，想让军队采取破坏活动，而不是作好防御准备，国防军想这么干，于是他们就在策划这件事。

图哈切夫斯基格外突出，他装扮成很高贵、很有教养、不会干卑鄙勾当的样子。我问过他：您怎么能在3个月中把一个师的兵员变成7000人？这是怎么一回事？7000人的师算什么？这不是没有炮兵的师，就是有炮兵但没有掩护的师。总的来说，这不是师，而是丢人现眼的东西。师怎么会成这个样子的呢？我问图哈切夫斯基说，您自称精通军事，怎么会坚持要把一个师的兵员减到7000人，同时要求一个师只有60……40门榴弹炮和20门大炮，要求我们有若干坦克装备、若干炮兵，若干迫击炮呢？在这一点上非此即彼：不是您得把这些装备都送去见鬼，只剩下清一色的步兵，就是您得提供装备。他对我说：“斯大林同志，这是爱好。”这不是爱好，这是根据德国国防军的要求进行的破坏活动。

请看同一个加马尔尼克。要知道，如果他自始至终都是反革命分子的话，那他就不会这么干，因为我要是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分子的话，我会先请求见见斯大林，先把他打死，再自杀。反革命分子是这么干的。而这些人都是德国国防军的奴隶，是被招募



的间谍，这些奴隶不得不在阴谋的道路上，在间谍活动的道路上，在出让列宁格勒、乌克兰等等的道路上往下滚。国防军是强大的力量，把意志薄弱的人抓来当奴隶，而意志薄弱的人不得不照命令行动。奴隶就是奴隶。

那些人发号施令，而这些人干得汗流满面。这些傻瓜以为我们是瞎子，什么也看不见。要知道他们想逮捕克里姆林宫里的政府，结果是我们发现了问题。他们想在莫斯科卫戍部队里有自己的人，甚至想发动部队起事，他们以为谁也不会发现什么，结果是我们发现了问题。

于是这些德国国防军的奴隶现在呆在监狱里哭泣。政治家们！领导者们！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先生能如此轻而易举地招募到人？我们逮捕了300~400个军人，其中有好人。他们是如何被招募的？

我不能说这些人是能干的、有才能的人。他们多少次公开起来反对列宁，在列宁在世时和去世后反对党，但每一次都被击退。现在他们又掀起了大运动，也失败了。不太有才能的人，从1921年起直到1937年止经常失败。不太有才能，不太英明。

他们怎么能这样轻而易举地招募到人呢？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我以为他们在这方面是通过另外的途径活动的——如果一个人对什么事情不满，例如不满于他因为从前是托洛茨基分子或季诺维也夫分子而很不容易得到提拔，或者不满于他由于能力不强、不会办事而降了职，而他却自认为很能干。人有时以为自己是个天才，因此在没有得到提拔时感到委屈。

从小事开始，从思想小集团开始，然后往下干。他们这样谈论：小伙子们，有如此这般一件事。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掌握了亚戈达，掌握了克里姆林宫，因为彼得松跟我们在一起，莫斯科军区、科尔克和戈尔巴乔夫也跟我们在一起。全都在我们这一边。不是现在就出人头地，就是明天我们掌权后落得个一场空。许多意志薄弱、不坚定的人以为这是件现实的事，见鬼去吧，这甚至是件有利可图的事。要是错过了，人们逮捕了政府，拿下了莫斯科卫戍部队等等，你就处境狼狈了。（大厅里听众开心地活跃起来）

第三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会如此奇怪地误了这件事？警告是有过的。2月开过中央全会。不管怎么说，这件事还是缠上了，还是给误了，我们自己很少揭露出军队中的人。这是怎么一回事？也许我们才能不够或者完全瞎了眼？这方面有一个总的原因。军队当然



脱离不开国家，脱离不开党，而大家知道，党内多少由于胜利冲昏了头脑；当每天取得成绩，超额完成计划，生活改善了，政治局势好像不坏，我国的国际地位无疑在提高，军队本身在基层和中层、部分在上层是十分健康的巨大的力量，一切在前进时，我们不由自主地放松了，目光不再敏锐，人们开始以为：还要干什么呢？还有什么不满足吗？难道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人想干反革命吗？我们的头脑中有了这样的想法。但总的形势是，我们的力量在增长，军队中、国家里、党里都在不断增长，这一切使我们放松了政治警惕性，使我们的目光多少有点不够敏锐。

全是成绩。成绩，这是件很大的事，我们全都努力去取得成绩，但成绩也有它的反面——自满使人盲目。于是有人谈到警告，警告过了。我应该指出，地方上警告得很不够，很不够。如果更多一些警告，如果我们一切都按列宁的意愿去办，那么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非党员都会认为自己有义务对发现的缺点写出自己的意见。他是这样希望的，但在这里我们没有把整个事情全都看清楚。有人以为中央应该了解一切，看清一切。不，中央没有全看清，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有一个真正检验的手段——这就是在工作中，根据工作效率来检验人。只有地方上的人才能看到。这是关于警告。

还有一个缺点，是在自上而下对人的审查。我们没有进行审查。我们为什么成立总参谋部？为了让它审查各军区司令。而它在干什么？我没有听说总参谋部审查过人，没有听说总参谋部发现了乌博列维奇什么问题，揭露了他的阴谋诡计。

这样的做法不行。当然人们有时不喜欢钱毛抚摩，但这不是布尔什维主义；有时也是因为不愿意得罪军区司令，这是错的，这是十分有害的做法。总参谋部之所以成立，是为了经常审查人，给他们建议，对错误加以纠正。因此我们应该认真审查。

这些高明勾当因此才会出现：乌克兰有亚基尔，白俄罗斯有乌博列维奇。

总的来说，我们并不完全了解他们的勾当，因为这些人只听自己的，天知道他们在那里干些什么！

总参谋部要是愿意真正切实领导工作的话，应该了解一切。我没有发现总参谋部胜任选拔人工作的征兆。

还有，我以为人们对军队指挥人员的任命重视不够。大家看看现在搞成了什么样子。如何配置干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人们对这件事袖手旁观。对加尔卡维、萨维茨基、费尔德曼、叶菲莫夫许多年呆在指挥岗位上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他们使了什

么计谋？要选派武官，他们提出七个人选，六个傻瓜和一个自己人，他在傻瓜堆中显得很聪明。（笑声）这六个人的手续退回去了，因为他们不合适，而第七个人便被派出去了。他们有很多机会。当提出的人选是六个傻瓜和一个聪明人时，不由得签字派他。对这件事应特别重视。

阴谋分子的主要弱点是什么？我们的主要力量是什么？这些先生受雇去当德国破坏活动部门的奴隶。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在耍阴谋、出卖苏联的道路上往下滑。不问他们的意见，只给他们下达指令，他们必须执行。

他们的弱点是什么？是没有同人民的联系。他们害怕人民，尽力自上而下地贯彻：那里安上一个点，这里夺取一个领导职位，那里再夺取另一个，那里挂上一个落后的人，挂上一个不满的人。他们不指望自己的力量，而指望德国人的力量，以为德国人会支持他们，而德国人却不愿意支持。他们想：你去煮粥，而我们看看再说。他们害怕人民——要是你们读过他们夺取克里姆林宫、欺骗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计划的活。他们想欺骗一些人，把他们往一个地方塞，把另一些人往另一个地方塞，把第三部分人往第三个地方塞，并让他们守卫克里姆林宫，说要保卫克里姆林宫，而在克里姆林宫里他们要逮捕政府人员。逮捕当然在白天进行好，但白天怎么干呢？

这些意志薄弱的倒霉蛋脱离人民群众，得不到人民和军队的支持，害怕军队，躲避军队和人民。他们指望德国人和自己的种种阴谋诡计：怎样哄骗克里姆林宫里的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怎样哄骗保卫部门，在卫戍部队中闹事。他们不指望军队，这就是他们的弱点。这就是我们的力量。

有人问，怎么会这么多的指挥人员报废了。我发现有人对如何取代他们感到为难。

喊声：没事，好人有得是。

斯大林：我们军队中有才能的人多得很。在我们国家里，在我们党里，在我们军队里有才能的人多得很。不应该害怕提拔人，要大胆地自下而上地提拔。

伏罗希洛夫：就是这位费尔德曼先生，我在几年中要求他给我可以提拔的150个左右的人。他给司令写了，等了两年半，近三年。如今这张名单在什么地方，应该找一找。

布琼尼：我见过这张名单，那里全是托洛茨基分子，有些人已被捕，另一些人有嫌疑。



[不妨回忆一下费尔德曼给加马尔尼克的报告，报告说他根据他想出来的“O. Y.”（特别登记）镇压无辜的指挥员，从而拯救了托洛茨基分子。——本书作者注]

斯大林：由于其中半数已经被捕，所以这张名单不必看了……

因此既然好人有，那就应该寻找和培养。提一个冒昧的问题。我以为在我们的人中，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中，有一些同志是偶然牵涉进去的。有人给他说了些什么，想拉他进去，吓唬他，讹诈他。最好这么办：让这样的人自己来把一切说出来——然后宽恕他。这样的人有吗？

喊声：毫无疑问有。对。

斯大林：有人偶然被牵涉了。有人在等待时机，应该告诉这些等待时机的人说，事情失败了。对这样的人要帮助，以便宽恕他们。就像从前只要盗匪交出武器投降，就宽恕他们一样。（笑声）

这些人没有武器，也许他们知道敌人，但没有报告。

伏罗希洛夫：不过他们的处境不妙，要告诉他们，应该说出来，现在不是这个人，就是那个人，或第三个人，反正都会说出来，最好是自己来说。

斯大林：应该宽恕。我们保证宽恕，坚决保证。



第二章

战争的达摩克利斯剑^①

如果对1931~1941年初的外交活动作一总结的话，那么主要的是，尽管英美帝国主义耍弄阴谋，苏联仍得以避免卷入对德战争。否则1939年夏天我们就得单独在两线作战：在西方对法西斯德国，在东方对日本……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从我方来说是正确的政治步骤。这个条约给了我们为全国更好地作好防御准备以必要的喘息时机……形势日益紧张，我们很可能遭到法西斯德国的突然进攻。

约·斯大林

^① 达摩克利斯是希腊传说中叙拉古暴君狄奥尼修斯的宠臣。狄奥尼修斯因达摩克利斯羡慕帝王幸福而请他坐在君王的宝座上，并用一根马鬃将一把利剑悬在他的头上，使他知道帝王的忧患。后来“达摩克利斯之剑”便成了“大祸临头”的同义语。——译者注

一 与德国接近。秘密条约

(1939年8~9月)

国际联盟高级特派员布尔克哈特呆在但泽城，他的任务是监督但泽自由城地位的实施。布尔克哈特长年住在瑞士，职业是历史学家，观点是支持第三帝国所发生的一切。他后来写的回忆录中有如下情节：

1939年8月10日当地法西斯分子头目福斯特给布尔克哈特家中打电话说：

“元首希望明天四点在上萨尔茨堡的住所里见您。”

“这办不到！我的情况……何况这么短的时间里我怎么能去那里呢？”

“全都考虑好了。元首把私人飞机给您……今天半夜就封锁机场。任何人都不会知道您的出行……”

布尔克哈特当然向伦敦和巴黎报告了这一邀请。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请布尔克哈特好好同希特勒谈一谈，明显地暗示他打听希特勒的近期实际计划。

布尔克哈特在预定的时间飞抵上萨尔茨堡，在那里有一辆轿车在等他，他乘了轿车沿着蜿蜒的山路去希特勒的官邸“贝格霍夫”——高高的山崖上的一座别墅。

希特勒一开始就指责波兰说：

“波兰在威胁但泽！波兰报纸说，这正是该同我交谈用的语言！要是再发生一个小事件，我就不经警告粉碎波兰人，让他们片瓦不留！”

“这将意味爆发全面战争。”布尔克哈特说。

“就算是吧！既然我注定要开战，那我认为今天我50岁时打要比60岁时打来得好！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德国需要谷物和森林。我为了得到谷物需要东方的土地，而为了森林需要殖民地，只要一块殖民地。其他的都不值一提。我现在和将来对西方都没有要求，永远没有要求！那些强加于我的东西全是编造出来的。但我需要在东方放开手脚干。我再重复一遍：问题只涉及谷物和森林。”

希特勒终于直截了当地说：

“我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针对俄国的。我要乌克兰，这样就不能



像上次战争中那样饿死我们。”

他一再反复谈这个想法，仿佛是要让布尔克哈特更好地记住，更确切地转告这次谈话的内容。希特勒在与布尔克哈特告别时说：

“我希望同英国和睦相处。我决心保证英国在全世界的属地，同英国签订关于最终解决的公约。”

他甚至同意为此与英国一位领导人会晤。

布尔克哈特在会见后立即飞抵巴塞尔，在秘密谈话时向英法外交部代表转达了希特勒诱人的建议，而且他和他的谈话伙伴都没有怀疑这是元首为掩盖对波兰实施突击而采取的措施，是为了把波兰和西方盟国隔开，用自己的诺言束缚住西方的手脚！

正是在这时西方大国的军事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希特勒担心英法与苏联就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达成协议，于是决定向西方盟国保证，他永远不同他们作战，他对西方绝对没有任何意图。

为了让读者清楚地看到希特勒的狡猾奸诈，我要请读者注意几个事实和日期。上面谈到的同布尔克哈特的谈话是8月11日进行的，这时对波作战计划已经完全制定好，所有的有关文件都已签署，部队处于战斗准备状态。8月5日，即这次谈话前六天，安全部门首脑海德里希把秘密间谍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召到他在柏林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道的官邸中，瑙约克斯参与了炮制图哈切夫斯基及其他苏联军事领导人案的伪证。海德里希给瑙约克斯下达任务，要他策划和实施其实是发动进攻波兰的行动。这一嫁祸于人的行动已经广为人知，对此有过许多介绍，因此我只大致谈一下。

德国情报人员穿上波兰军服袭击自己在格莱维茨城的无线电台，摧毁电台后扔下一些波兰文件和一具早已运来的也穿了波兰军装的刑事犯的尸体。

德国电台立即播发了关于“波兰人”挑衅性进攻的消息，1939年9月1日凌晨4时45分德军在整个边界上入侵波兰。世界史把这一天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日子。后来，在战后，瑙约克斯（曾作为战犯之一在纽伦堡受审）写了《开始战争的人》一书，他在其中承认了嫁祸于人的事实，他说：“……需要一个策划事端，即所谓扣动扳机的人。我就是这个人……”

布尔克哈特与希特勒的谈话是8月11日进行的，而8月12日在莫斯科苏、英、法军事代表团开始谈判。

斯大林担心德国在欧洲的侵略行动，他掌握了关于德国策划进攻苏联的情报，试图与英法政府就共同努力反对侵略者达成一致。但是英法某些领导人仍指望希特勒将打击矛头指向东方，打击苏联，从而在这场

战争中脱不了身，使得力量大为削弱，这样德国将变得容易妥协些，至少对英法没有什么危险。

英法政府指望以同苏联结盟来吓唬希特勒，建议苏联领导人举行谈判，其结果是这几个国家签订了条约草案。但这只是冠冕堂皇的一面。实际上这更像是促使德国进攻苏联的手段。他们明白，希特勒会使尽一切手段来阻挠签订这样的条约，因为帝国倘若两线作战（东线对苏联，西线对英法），就等于死路一条。

英法为自己的军事代表团作好了准备。从代表团的组成人员、人员集合所花费的时间以及给代表团下达的指示（现在都已清楚了）可以看出，谈判是为了拖延时间。这场谈判可以使我们明白当时欧洲主要国家的力量配置和利益。我举几个能加深我们对这段历史理解的事实。

苏联驻伦敦大使伊·马伊斯基设早餐招待前往莫斯科的英法代表团。大使作为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在早餐会上想摸清，哪怕是大致摸清代表团的情绪和意图。原来英国代表团团长由老迈的德雷克斯海军上将担任。德雷克斯只是朴茨茅斯要塞司令，在军队中毫无影响，领导这样的代表团不起什么作用。

马伊斯基在同德雷克斯谈话时问道：

“海军上将，请问您什么时候去莫斯科？”

“还没有最后决定，但是在最近这几天。”

“您当然是坐飞机去？”

“不，我们两个代表团、连同工作人员，将近40个人，还有很多行李……坐飞机不方便。”

“也许您坐你们的一艘快速巡洋舰去苏联？这将给人以强烈深刻的印象：军事代表团坐着军舰……而且从伦敦到列宁格勒花不了多少时间。”

“不，巡洋舰不行。得把20来个军官搬出船舱，占据他们的舱位……为什么要搞得人家不方便呢？不，不！我们不乘巡洋舰。”

后来才知道，代表团在花了10天时间集合后，到8月5日才乘上了低速的“埃克塞特城”号客货商轮。代表团未来的工作遵循如下指令：“英国政府不希望承担任何具体义务，以免在某种情况下手脚受到束缚，因此应力争使军事协议的提法尽可能笼统。某种协商一致的政治声明最符合这一目标。”这个指令中还有一个可以说十分令人奇怪的指示：“代表团应十分缓慢地、随着政治事态进程进行谈判。”

法国代表团成员博夫尔将军后来写道：“可以认为，英国人对这一谈判不抱任何幻想，他们首先争取赢得时间。这与舆论所期望的相去甚远。”



苏联代表团由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领导，成员有总参谋长、一级集团军级鲍·米·沙波什尼科夫，海军人民委员、二级舰队级尼·格·库兹涅佐夫，空军司令、二级集团军级亚·德·洛克季奥诺夫和副总参谋长、军级И.В.斯莫罗季诺夫。这个代表团组成清楚地表明，最重要的军队领导人都已参加代表团，苏方准备作出最严肃的决定。

在第一次会议上英国代表团团长想就合作的目标和总原则挑起争论，即按照给他的指令行事。但是伏罗希洛夫相当强硬地设法把谈话纳入具体轨道。他说：

“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现在要谈如何制定达到这一目标的计划，我建议这样谈。”

于是双方开始讨论一旦对法西斯德国的战争爆发，英、法、苏应如何共同行动。在德国进攻法国、英国或其盟国时，为了支援它们，是否让苏军过境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问题成了试金石。谈判表明，英法代表团不能提出有关这方面的任何确定的计划，他们拒绝在相关方向向波兰和罗马尼亚施加影响，而苏联和这些国家又没有任何条约。

军事代表团的工作8月12日在莫斯科开始，但到8月14日就已清楚，这场谈判不会有任何结果，因此苏联军事代表团很快作了如下声明：“苏联军事代表团对于英国和法国军事代表团对苏联武装力量过境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问题不作确切回答表示遗憾。苏联军事代表团认为，这一问题得不到肯定解决，一切开始的关于签订军事协定的工作……都预先注定要失败。”接着又说：“……鉴于上述情况，拖延军事谈判以及谈判中断的责任自然应由法方和英方负责。”

从一切可以看出，谈判的三方都对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没有充分理解。英、法的立场无疑是这样的，而苏联代表团也远没有为制止法西斯侵略做了一切能做的。伏罗希洛夫没有外交经验，对话过于直来直去，实质上并没有寻求妥协。

与此同时伦敦在采取各种措施以找到与法西斯德国达成协议的途径，即使不能促使希特勒对苏联开战，也要引诱它结成联盟，与英法一起来实施这一切。英国政界亲德集团认为，希特勒尽管轻举妄动，但仍将作出他们认为的正确选择，不愿两线作战，而愿与西方大国达成协议。8月1日德国使馆参赞科尔特向柏林外交部呈送了关于此前在伦敦举行的各种紧张谈判的总结报告。

他写道，英方在这一谈判中承认，“德国和英国领导人应设法通过谈判，排除舆论的参与，找到摆脱难以忍受的现状的出路……”“英国表示决心同德国签订关于划分利益范围的协定……”“承诺完全尊重德



国在东欧和东南欧的利益范围。其结果是，英国放弃它对德国利益范围内某些国家的保证……英国承诺致力于使法国废除与苏联的同盟、放弃在东南欧的各种联系。英国承诺停止目前正在进行的同苏联签订条约的谈判……”

从这份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英国统治集团出卖波兰的决心。一旦德国进攻，英国决心放弃“对德国利益范围内某些国家的”援助保证并在这方面对法国施加影响，这里的某些国家就是指波兰。承诺召回正在苏联的代表，再一次证明英国只是借助这一代表团来吓唬德国，引诱它和自己站在一起。

希特勒不相信英国的建议，他看到英法同苏联已经在莫斯科进行谈判，决定采取有力措施来阻止它们之间达成协议。他害怕这个联盟，因为到那时与希特勒对抗的将是一个强大的同盟，他的侵略计划在欧洲必将失败。

德国外交界开始加紧试探与苏联接近的可能性，而斯大林由于未能与英法达成协议，并不拒绝这一接近。由于同苏联驻柏林使馆参赞Г.阿斯塔霍夫的交谈以及德国驻苏大使冯·舒伦堡同莫洛托夫的几次交谈，原则上达成了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访问莫斯科的协议。

在大使和部长级谈判后，希特勒和斯大林互致电报。下面是1939年8月20日希特勒的电报（莫斯科8月21日收到）：

“致斯大林先生 莫斯科

1. 我衷心地欢迎新的德苏贸易协定的签订，认为它是改造德苏关系的第一步。

2. 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对我来说意味着确立德国的长期政策，因此德国重新实行过去几世纪中有利于两国的政治路线。在这种情况下帝国政府决定完全按照这样的深刻变化来行动。

3. 我收到贵国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先生转交的互不侵犯条约草案，但我认为迫切需要尽快澄清与之相关的问题。

4. 我确信，苏联政府所希望的补充议定书可以尽快制定，只要德国负责的国务活动家能亲自赴莫斯科谈判的话。否则帝国政府不知道如何在短期内商定和制定补充议定书。

5. 德国与波兰之间的紧张关系已变得无法容忍。波兰如此对待一个大国，随时都可能引发危机。德国面对这种可能性，在任何情况下都决心以它拥有的一切手段来保卫国家的利益。

6. 我认为，既然两国均有意在彼此间建立新关系，就不宜浪费时间。因此我再次建议您于星期二（8月22日）接见我的外交



部长，至迟于星期三（8月23日）接见。帝国外交部长有全权制定和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议定书。考虑到国际形势，帝国外交部长在莫斯科逗留不能超过一两天时间。我将很高兴很快收到您的答复。

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很清楚，英法代表团在拖延谈判，没有权力签订条约。他不是毫无缘由地强调指出，他的帝国部长在莫斯科只能逗留一两天，他有全权制定协议文本并毫不拖延地签订条约。希特勒在加快事态的发展。

同一天，即1939年8月21日，斯大林给希特勒回电说：

“致德国总理阿·希特勒先生

感谢您的来信。

希望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将会创造一个大大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的转机。

我们两国人民需要彼此和平相处。德国政府同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将为消除政治紧张状态和确立我们两国之间的和平与合作奠定基础。

苏联政府委托我通知您，它同意里宾特洛甫先生于8月23日前来莫斯科。

约·斯大林”

两个独裁者私人之间复杂的政治“游戏”就这样开始了。通常在这类行动中说的和写的是一套，而实际上掩盖了完全不同的另一套。不妨再看一看希特勒在给斯大林写信前九天与布尔克哈特谈话时是如何说的：

“我希望同英国和睦相处。我决心保证英国在全世界的属地……我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针对俄国的。”

我们有可能不是通过转述，而是通过希特勒本人来了解这几天里他的秘密意图。希特勒在收到斯大林来信的第二天，即1939年8月22日，便在上萨尔茨堡同德国武装力量各军种司令进行了谈话。这位元首十分坦率，因为他是在同将实施他意图的人谈话。

在帝国外交部的材料中发现了这次谈话的记录。其中说：

“从1939年秋天起……我决定和斯大林一起前进……斯大林和我是仅有的只注视未来的两个人。例如，我在不久后的几个星期中将在德苏边境向斯大林伸出手去，同他一起重新瓜分世界……布劳希奇上将向我保证在几个星期内结束对波战争。要是他向我报告说为此需要一年甚至两年的话，那我就不会下令进攻，就不是同俄国，而是同英国签订条约了。我们不能长期作战。我在慕尼黑就了解达拉第和张伯伦这两个可怜虫，他们太胆怯了，不敢进攻我们。他们不能封锁我们，相反，我们有我们的自给自足政策和俄国的原料。波兰将成为废墟，由德意志人居住。我同波兰的条约只是为赢得时间。先生们，总之，我在波兰干的将在俄国重演。斯大林重病在身，在他死后我们将摧毁苏俄。到那时德国统治世界的太阳将要升起。

……此后我们将在远东和阿拉伯制造动乱。我们是主人，最多把这些民族看成是想尝尝鞭子味道的打扮了的猴子。

对我们来说形势前所未有的好。我只担心张伯伦或别的什么恶棍来找我建议进行调停。他要摔大跟斗……不，这已经晚了。星期天清早开始进攻和消灭波兰。

我派几个穿波兰军装的连去上西里西亚和保护地。世界是否相信，对我来说无所谓。世界只相信胜利……

我确信斯大林永远不会接受英国人的建议。俄国与保存波兰并无利害关系，斯大林知道他的政府完蛋并不取决于他的士兵在战争中打赢还是打败，撤换李维诺夫起了决定性作用。我正在逐步实现同俄国关系的改变。我们由于贸易条约进入政治谈判，我们建议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接着俄方提出了多方面的建议。四天前我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以至昨天俄国回答说准备签订条约。我已确定了同斯大林本人接触。前天里宾特洛甫签署了条约。现在波兰已处在我要让它处的境地。”

实际上希特勒做的和在公开关系中说的是完全不同的一套。

1939年8月23日，里宾特洛甫到了莫斯科，他一到达就在德国大使冯·舒伦堡陪同下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谈了三个小时。当天深夜举行第二次会谈，最终签订了名声不佳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

里宾特洛甫同斯大林会谈时，除了德苏关系外，还讨论了两国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

80年代初我在同莫洛托夫谈话时问过他条约讨论和签订的经过。他的这些谈话以及德国译员所作的会谈速记记录能使我们了解到那天傍晚和深夜克里姆林宫里究竟谈了些什么。

除了其他话题外，会谈涉及日本。里宾特洛甫说：

“德日友好并不针对苏联。不仅如此，我们由于同日本关系良好，能为调解苏日分歧作出贡献。如果斯大林先生有这个愿望的话，我准备在这方面采取行动并相应地利用自己对日本政府的影响，让苏联驻柏林代表知道事态的变化。”

斯大林略加考虑后回答说：

“苏联政府确实愿意改善同日本的关系，但我们对日本挑衅的耐性是有限度的。要是日本想打仗，它可以如愿以偿。苏联不怕战争，准备打仗。要是日本想和平，这当然很好！德国在改善苏日关系方面的帮助当然很有好处。但我不希望给日本人造成是苏联主动提出的印象。”

里宾特洛甫说：“一切当然都会如您希望的那样去办。我将继续与日本驻柏林大使就改善苏日关系进行会谈。在这个问题上无论贵方还是我方都不将采取新的主动行动。”

里宾特洛甫在回答斯大林关于德国同土耳其的关系问题时说：

“我们有情报表明英国花了500万英镑在土耳其开展反德宣传。”

斯大林就此指出说：

“根据我的情报，英国用于收买土耳其政治家的钱大大多于500万英镑。总之英国政府的行径令人感到十分奇怪。您知道，不久前我们同英国代表团开始谈判，可是在这场谈判中英国代表团始终没有告诉苏联政府，它事实上能做些什么，想做些什么。”

里宾特洛甫说：“英国过去和现在一贯试图破坏德苏良好关系的发展。英国很虚弱，想别人支持他统治世界的狂妄野心。”

斯大林表示同意，说：“英国军队很弱，英国舰队不再享有以往的声誉。英国空军在扩大，但英国缺乏飞行员。如果说英国尽管如此仍在统治世界的话，那只是因为别的国家愚蠢，总是受它的骗。例如，总共几百个英国人就统治了印度，这十分可笑。”

里宾特洛甫同意斯大林的这个看法，他略微压低了声音——仿佛为了强调他的话是机密的——对斯大林说：

“这几天英国不无愧意地重提1914年，来再次试探虚实。这是英国典型的愚蠢手腕。我建议元首告诉英国人，一旦德波爆发冲突，对英国任何敌对行动的答复都将是轰炸伦敦。”

斯大林说：

“英国尽管虚弱，但却能够巧妙而固执地进行战争。如果考虑到它

同法国结盟，那应该记得法国有一支值得重视的军队。”

里宾特洛甫回答说：

“法国军队人数少于德国军队。我国军队每年能征 30 万士兵，而法国军队每年只能招到 15 万新兵。加上我国的西部壁垒比马其诺防线强四倍，要是法国试图对德开战，它肯定要被打败……”

这里应补充一点，里宾特洛甫在谈到西部壁垒即齐格菲防线时言过其实：齐格菲防线当时大部分只存在于纸上，因为刚在开始修筑。

在谈到了反共产国际条约问题时，里宾特洛甫说：

“总的来说，反共产国际条约并不是针对苏联，而是针对西方民主派的。而且我们从俄国报刊的调子看出苏联政府完全明白这一点。”

斯大林说：

“反共产国际条约主要吓坏了伦敦的商业中心区和英国的小商人。”

里宾特洛甫同意斯大林的看法，甚至开玩笑说：

“斯大林先生，您对反共产国际条约当然不如伦敦商业中心区和英国商人害怕。我国的柏林人中广为流传一个笑话：‘斯大林还要参加反共产国际条约呢。’”

在座的人听了这个话都笑了，而里宾特洛甫继续说：“德国人民，尤其是普通人，热烈赞成同苏联达成谅解。人民感到，德苏现在的利益在任何地方自然都没有发生冲突，只是外国，尤其是英国的阴谋过去妨碍了这一良好关系的发展。”

斯大林说：“我相信这一点，德国人希望和平，因此欢迎德苏友好关系……”

里宾特洛甫忍不住打断斯大林的话说：

“德国人民无疑希望和平，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德国人对波兰已怒火中烧，所有人无一例外地决心打仗。德国人民绝不再容忍波兰的挑衅。”

斯大林出人意料地提议为元首祝酒，说：

“我知道德国人热爱自己的领袖，因此我想为他的健康干杯！”

接着大家为帝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和大使冯·舒伦堡伯爵的健康干杯。莫洛托夫举杯祝斯大林健康，里宾特洛甫也提议为斯大林干杯，为德苏关系的良好发展干杯。

斯大林在临别时对里宾特洛甫说：

“苏联政府十分严肃地对待新条约。我可以保证苏联永远不出卖自己的伙伴。”

* * *

8月3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特别会议批准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莫



洛托夫在讲话中谈到：

“……大家知道，近六年来在国家社会党执政后，德苏政治关系是紧张的。大家还知道，尽管世界观和政治制度不同，但苏联政府还是努力保持同德国正常的商务和政治关系。现在没有必要重提近几年来这一关系中的某些情况，而且代表同志们，不提你们也很清楚。但是应该提一下几个月前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对我国外交政策的阐述……斯大林同志警告过要警惕为了自己的利益想使我国卷入与别国冲突中的战争挑拨者。斯大林同志在揭露英法和北美报刊就德国夺取苏维埃乌克兰‘计划’掀起的喧嚣时就说：‘看来这一令人疑的喧嚣的目的是激起苏联对德国的怒火，毒化空气和毫无根据地挑起同德国的冲突。’

大家看到，斯大林同志击中要害，揭露了西欧政治家力图挑拨德国和苏联的阴谋。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表明，斯大林同志历史性的远见得到了出色的证实。”（暴风雨般地向斯大林欢呼）

后来人们发现，互不侵犯条约和希特勒及其外交官的整个政策都只是掩盖正在策划的战争的手段。希特勒在这一烟幕下聚集力量，以便极其沉重地打击苏联。今天许多人撰文说，斯大林什么都不明白，什么都没有猜到，对一切信以为真，但是我们还是不要急于下结论。

* * *

我以为这里必须谈一谈作为所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补充的秘密协议。国外早已公布了这些协议，全世界也都知道，而且这些协议成了苏联尤其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共和国注视的焦点。苏联报刊不发表这些文件，是因为当时只见到文件的影印件，但是后来事态的发展使得政府无法对这些协议的存在产生怀疑。事实上这些协议规定的一切都已实施。

我以为该是说出这些协议真相的时候了。我们总不能为此再等上半个世纪吧？

1989年6月在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①上成立了对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作出政治评价和法理评价的专门委员会。

米·谢·戈尔巴乔夫在作出成立委员会的决议前说：“这个问题早已存在，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有关部门一直在讨论和研究。应该说，在我们某些部门从学术角度对其进行讨论时，所有的文件，包括这个条

^① 我当时是代表，这一切亲眼见到，亲耳听到。——本书作者注

约的秘密附件在内，到处都已发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报刊把这一切全都发表了。但是找到秘密条约原件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我们早就在研究这个问题。原件没有，只有复制件，但是按照什么复制的不清楚，尽管有签名，但尤其令我们怀疑的是，莫洛托夫的签名用的是德文字母……”

看来，米·谢·戈尔巴乔夫得到的情况不确切。这些文件的影印件上莫洛托夫的签名是正常的，是用俄文签的，我可以断定这些签名和莫洛托夫在赠给我的相片上的签名是相似的。伪造签名当然并不难，请想一想图哈切夫斯基被伪造的签名。但不妨提一个问题：是谁，又是为什么需要在一些据说“不存在的”秘密条约的文本上来伪造签名呢？

至于用德文字母写的莫洛托夫签名，也是可能有的。条约和议定书是用两种文字印制的，莫洛托夫可以在俄文文本上用俄文签，在德文文本上用德文签，以显示他通晓德语，虽然在议定书上对这一点未作规定。

下面是作为已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补充的秘密议定书：

秘密补充议定书

在签订德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互不侵犯条约时，双方下列签名的代表在严格保密下讨论了在东欧划分双方利益范围的问题。讨论结果如下：

1. 一旦属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地区进行领土和政治重组时，立陶宛北部边界同时是德国和苏联利益范围的分界线。同时立陶宛对维尔诺地区的利益得到双方的承认。

2. 一旦属于波兰国的地区进行领土和政治重组时，德国和苏联利益范围分界线接近纳雷夫河、维斯瓦河和桑河一线。

关于保留独立的波兰国及该国的边界是否符合双方利益的问题只有随着今后的政治发展才能彻底澄清。

在任何情况下，两国政府都将通过双方友好协商来解决这一问题。

3. 至于东南欧，苏方强调苏联在比萨拉比亚的利益。德方声明它对该地区完全没有政治上的利害关系。

4. 本议定书双方应严格保密。

1939年8月23日于莫斯科

由苏联代表签署的同法西斯德国赤裸裸地瓜分势力范围的内容就是如此。遗憾的是，这一政治冒险行动无法勾销，在历史上也抹不掉。

莫洛托夫8月31日在已经提到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意味着欧洲发展中的转折，向着两个欧洲最大国家关系改善的方向转变。这个条约不仅消除了德国对我们战争的威胁，还限制了欧洲发生军事冲突的范围，因此，有利于普遍和平的事业……”

《真理报》印刷厂还在排印这些文字时，9月1日夜德国的炸弹已经扔向波兰的城市，法西斯分子的机械化纵队已经在波兰的道路上飞驰。

1939年9月2日《真理报》发表了塔斯社消息：

“柏林9月1日（塔斯社）

据德国新闻局报道，今天早晨德军根据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在不同地点越过德波边界。德国空军编队也出发轰炸波兰的军事目标。”

对邻国遭到灾难的报道竟然如此不动声色。

报刊在正式场合保持中立，但幕后则是另一番景象。

9月9日莫洛托夫给里宾特洛甫打电话（当然经斯大林同意）说：

“您关于德军进入华沙的通知已收到。请向德意志帝国政府转达我的祝贺。

莫洛托夫”

希特勒匪徒告知德军已“进入华沙”，是想促使苏军加快开始进攻议定书商定的波兰领土。他们没有食言，但华沙彻底投降是在9月27日。因此莫洛托夫9月14日不无缘由地请求（在祝贺之后）“尽量精确地告诉他估计什么时候可以占领华沙”。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就此向德国外交部报告说：

“急！绝密！1939年9月14日18时0分发

莫洛托夫今天16时召见我说，红军比预期的更快进入准备状态。因此苏联的行动可以早于他（莫洛托夫）在最近一次谈话中确定的时间开始。考虑到为苏联行动找到政治上的根据（波兰陷落和保护俄罗斯“少数民族”），苏联在波兰的行政中心——华沙

——失陷前绝不开始行动。因此莫洛托夫请求尽量精确地告诉他估计什么时候可以占领华沙……我想请你们注意今天《真理报》的一篇文章，明天《真理报》还要发表类似的文章。这些文章在为莫洛托夫提到的苏联军事干涉寻找政治上的根据。

舒伦堡”

当红军开始行动的时候，斯大林邀请舒伦堡去克里姆林宫，对他发表了声明，于是德国大使马上电告柏林：

“火急！秘密！1939年9月17日

斯大林在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陪同下于午夜2时接见了，并声称，红军将于早晨6时越过从波洛茨克到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的整个苏联边界。斯大林为防止发生事端，紧急要求我们密切注意德军飞机从今日起不再飞入比亚韦斯托克-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伦贝格一线以东地区。苏联飞机今天开始轰炸伦贝格以东地区。

苏联的一个委员会明天，至迟后天抵达比亚韦斯托克。

斯大林向我宣读了今天夜间已递交给波兰大使的照会，照会的副本将于一天内分发给各使团并于公布。照会为苏联的行动作了辩解。给我宣读的草案中有三点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斯大林针对我的异议，以极大的决心修改照会文本，现在的照会令我们十分满意。斯大林声称，关于发表德苏公报的问题在最近两三天内不能进行研究。

今后发生的一切军事问题均应由克斯特林中将直接与伏罗希洛夫交涉查清。

舒伦堡”

我以为，这里必须引用一下分发给与苏联有外交关系的各国大使和公使、为苏联对波兰的行动作出解释和辩解的政府照会。

“1939年9月17日

大使先生：

波德战争显示出波兰国内在的无能。在10天的战斗中波兰失去了全部工业区和文化中心，华沙作为波兰首都不再存在，波兰政

府土崩瓦解，不再有生命征兆。这意味着波兰国及其政府事实上不再存在，苏联和波兰签订的条约因此不再起作用。无人照管、失去领导的波兰变成了产生可能给苏联造成威胁的种种偶然事件和意外事件的合适土壤，因此迄今保持中立的苏联政府对于这些事实不能无动于衷。

苏联政府不能对居住在波兰境内、听凭命运摆布的同族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失去保护漠不关心。

鉴于这一形势，苏联政府指示红军总司令部下令部队越过边界，承担起保护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居民生命和财产的责任。

同时苏联政府决定采取一切措施帮助波兰人民摆脱其不明智的领导人使他们卷入的不幸的战争，使波兰人民可以过上和平的生活。

大使先生，此致
崇高的敬意！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维·莫洛托夫”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又一次（不知多少次了）竟然在向全世界颁发的官方文件中昧着良心编造谎言，尤其是说他们保证“帮助波兰人民摆脱不幸的战争”并让他们“可以过上和平的生活”。

现在我们看到的文件（上面已经说过，这是德国外交部的文件）表明事实完全是另一个样的。请看1939年9月25日德国驻莫斯科大使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

“绝密！急！”

今天20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请我前往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声明如下：在彻底解决波兰问题时应避免引起德国和苏联今后发生摩擦的一切做法。他从这个角度认为让波兰国剩余部分独立是错误的。他建议如下：从分界线以东的土地中整个卢布林省和到布格河为止的那部分华沙省应补充划给我们（德国）。我们因此放弃对立陶宛的要求。

斯大林指出这个建议是未来与帝国外交部谈判的内容，并补充说，如果我们同意的话，苏联立即按照8月23日的议定书解决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问题，期望在这件事上得到德国政府的完全支持。斯大林特别指出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但没有提到芬兰。

我回答斯大林说，将向本国政府报告。

舒伦堡”

9月27日里宾特洛甫再次飞抵莫斯科，9月28日他和莫洛托夫签署了新的“德苏友好和德苏边界条约”。这一条约正式从法律上确定了德国和苏联瓜分波兰领土的事实，条约附有标明新分界线的相关地图，地图由斯大林和里宾特洛甫签署。

这一条约附有两份秘密补充议定书。其中的一份议定书规定了斯大林此前谈到的领土划界上的变动，即卢布林省和部分华沙省划归德国势力范围，而把整个立陶宛领土交给苏联。

米·谢·戈尔巴乔夫就成立前面提到的委员会作说明时说：

“秘密议定书目前没有，我们不能对它作出评价。我想，总的来说这样的委员会应该设立，我确实同意这样做。委员会应对这一互不侵犯条约作出政治上和法理上的评价。不提秘密议定书，是因为我们翻遍所有档案，没有结果。我要说，虽然历史学家知道并能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但两支强大的军队迎头推进，却在某个分界线上这一所谓的靠拢完全停止了，这其中总有些什么。但目前这全都是议论，因此这方面需要研究，分析所有的文件，分析当时发生的形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既然问题存在，我认为不应该回避，躲开……让我们来着手研究……”

米·谢·戈尔巴乔夫建议不要回避。既然研究问题需要文件，那么下面不妨引用美国发表的第二个秘密议定书的文本，来独立地尝试对形势作出评价。

秘密补充议定书

下面签名的代表在签订苏德关于分界线和友好条约时确认如下默契：
双方不允许波兰在本国领土上对对方领土进行鼓动。他们消灭本国领土上此类鼓动的苗头，并就为此采取的适宜措施相互通报。

受苏联政府委托 维·莫洛托夫
代表德国政府 乔·里宾特洛甫
1939年9月28日于莫斯科

这是白纸黑字记录下的同德国政府关于采取一致行动阻挠为复兴波兰进行宣传鼓动的协议，是表明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完全丧失国际主义原则的协议。（不过不应忘记，斯大林是为了什么接受这一协议的。）

为了在今天来说尽可能明确地结束这一话题，这里摘引一段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以及我自己找到的对这一研究的补充。

为什么我说“在今天来说”呢？因为有关当时国际关系的文件目前只看到德国的和苏联的文件。至于英美方的文件，英国宣布2017年前文件不开放，而美国则根本不说明限制的期限。

德方和苏方根据达成的协议（尽管他们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战争）严格保守了秘密协议的秘密。

纽伦堡审判第一次公开提到存在议定书，当时坐在被告席上的战犯试图推翻对他们的指控，依据秘密条约来证明签署这些协议的苏联领导人是不相上下的侵略参与者。

在法庭讯问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魏茨泽克时，赫斯的辩护人向他提出了关于秘密议定书的问题。魏茨泽克肯定了存在这样的文件并详细地转述了议定书的内容。

审判长问道：

“证人，您见过这一秘密协议的原件吗？”

魏茨泽克回答说：

“是的，我见过这个协议的影印件，也许我还看过原件，但至少我手里有影印件。有一份影印件锁在我的保险柜里。”

在宣布休庭时苏联的首席起诉人鲁坚科对关于秘密条约的辩论提出抗议，因为在审判开始前各战胜国的首席起诉人已商定不涉及被告能为胜诉加以利用的问题。苏方提出的问题中就有不应讨论“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与此有关的问题”。

起诉委员会支持鲁坚科。因此法庭拒绝了蔡特尔辩护人的要求，决定从他的辩护词中删去对苏联的指控并不将这段话纳入记录。但是被告里宾特洛甫在其最后陈述中仍涉及这一话题：

“当我1939年去莫斯科见斯大林元帅时，他与我讨论的不是和平解决德波冲突的可能性……而是让我明白，只要他得不到一半波兰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各国、还有立陶宛及利巴瓦港的话，我可以马上回国。”

于是存在议定书的问题被公之于众。德国原件收藏的简单经过如

下：当德国各个战场战斗行动进展顺利时，条约和秘密议定书保存在德国外交部的保险柜里。但当战争显然将要失败，大批档案很难运走和藏匿时，里宾特洛甫下令对最重要的文件用胶卷制成缩微件。

1945年春德国政府下令销毁文件。参赞卡尔·冯·列特在执行这一命令时销毁了文件，但在铁盒里藏起了缩微胶卷（20个，其中翻拍了9725页文件），他将铁盒用油布包好，埋在图林根的勋伯格城堡公园里——当时档案都运到了这里。1945年5月12日冯·列特向英军罗伯特·汤姆森中校谈了文件的事。汤姆森向美国盟军作了通报。5月14日铁盒被挖了出来，5月19日运往伦敦，美国人在这复制了全部缩微胶卷。我引用的即全世界现在都知道的影印件就是用这些缩微胶卷制作的。

德方原件问题得到了澄清，但是我们苏方的原件到哪里去了呢？

不久前了解到，我方的秘密议定书保存在莫洛托夫的私人保险柜里。除了出席签字仪式的人以外，没有人知道代表国家签字的这份议定书。党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最高苏维埃都不知道这一文件。

1945年5月23日（《圣路易快邮报》）首次发表了议定书的内容，后来许多文件集都收入这一议定书。

苏联报刊不仅不提议定书，甚至只要国外一报道，就否认其存在。1989年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我参加了这次大会）责成由亚·尼·雅科夫列夫任主席的委员会“对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作出政治评价和法理评价”。委员会查阅了外交部、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总局、苏共中央总务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档案，并通过联邦德国使馆查询了德国的文本，但秘密议定书原件就是没有找到。

下面引用这个委员会对认定议定书虽然没有原件、但仍可能存在的论证：

“在苏联档案和西方档案中确实都未找到议定书原件。但委员会认为可以承认1939年8月23日的秘密补充议定书是存在的。

第一，苏联外交部有一个报告，说明1946年4月莫洛托夫的助手斯米尔诺夫向莫洛托夫的另一个助手波采罗布移交了秘密议定书的原件。因此，我们有过原件，但后来消失了，委员会及任何人都不知道它的下落。

第二，找到了俄文议定书经校对无误的打字稿副本。经鉴定表明，这些副本是由莫洛托夫时代苏联外交部制作的。

第三，刑事侦查学家对莫洛托夫在互不侵犯条约原件（大家知

道，这一原件我们是有的）和秘密议定书的影印件上的签名作了鉴定。鉴定专家的结论是这两个签名是完全一致的。

第四，发现西德影印件翻印的议定书与苏联外交部档案中保存的条约原件是用同一架打字机打印的。大家知道，这样的巧合是不会有的。

最后，存在着划界地图。地图由斯大林盖章签字，完全按议定书划分领土。

而且上面有斯大林的两个签字，一处是同里宾特洛甫一起签的，另一处斯大林用红铅笔作了有利于我方的修改并在修改处又签了一次名。

因此，亲爱的同志们，这些想法不会引起对存在这样的议定书产生丝毫怀疑。”

委员会的结论就是这样的。

1993年3月11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的文章对这些议定书作出了结论。前苏联总统办公厅领导人瓦列里·博尔金在文章中彻底揭去了关于议定书秘密的伪装，有人问他：“有一种说法，而且是官方的说法，说只存在秘密议定书的副本。您还记得戈尔巴乔夫说甚至还查询过德方，但那里也没有发现原件吗？……”博尔金对此回答说：

“他很会故弄玄虚，这已不是什么秘密。至少在1987年秘密议定书和地图已放在他的桌上。他摊开了地图并长时间加以研究。这是大比例尺的地图，用德文标有居民点、河流等。他研究了商定的分界线。据我记得，上面有斯大林和里宾特洛甫的两个签名。后来戈尔巴乔夫还看了议定书，一个不长的文件，我记得一共两页，他注意到莫洛托夫的签名用的是拉丁字母。这是把大家都搞糊涂了又解释不清的主要的谜。戈尔巴乔夫长时间研究了文件，然后说：‘拿走，放得远远的！’

过了一段时间，突然这些议定书开始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法林和雅科夫列夫都在查问议定书。我把这件事报告了戈尔巴乔夫，他说：‘任何人任何东西都不要给。需要告诉的人，我自己来告诉。’

他在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声称，‘找到秘密条约原件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了什么？……在此后不久他要我去他那里，好像不经意地问我，我是否销毁了这些文件。我回答说，我不能这样做，这样做需要经特别批准。他说：

‘你要明白，这个文件现在意味着什么。’但是在他向全世界声称他没有见过这些文件之后，我想对他来说这是个很尴尬的话题，他想尽快摆脱它，忘掉它，但要办到却不太容易。”

高级委员会就是这么工作的。苏联最高苏维埃试图弄清这个问题，而国家元首戈尔巴乔夫（再一次表现出他的不负责任）却把文件的原件藏起来，不让本国人民和全世界知道！

现在来谈谈依我看同样令人信服地证明议定书存在的补充材料。我感到惊讶的是，委员会中竟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利用如此可靠的依据。

我在翻阅有关这些遥远岁月的材料，反复阅读条约文本，仔细辨认条约上的签名，研究纽伦堡审判的照片时，想到事件的当事人——斯大林、希特勒、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戈林、赫斯等人都已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中谁也不能再说出事情的真相和经过。但是我突然想了起来，还有一个经常与这些人在一起、不仅听过他们谈话、而且还帮助他们表白的人还活着，他就是翻译巴甫洛夫·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

我推开一切事务，马上开始搜寻巴甫洛夫的电话和住址。是的，是“搜寻”，因为在莫斯科要找到想要找的人谈何容易。

终于我到了巴甫洛夫那里。接待我的是他的妻子，一位善于交际，但一下子可以看出又是喜欢摆布一切的女人。她马上告诉我说，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不接受采访，不写回忆录，同我谈话是出于对我这位作家的尊敬。她把我充当笔记本的小录音机拿到走廊里去，说：

“谈话时不用它……”

巴甫洛夫走进客厅，他与我在许多照片上见到的样子不同：照片上他个子不高，很瘦削，可以说并不突出，总是站在他为之翻译的人的旁边或背后。现在他发福了，天生的浅黄色头发变得更浅了，甚至不是白头发，而像是褪了色的头发。他已80开外，身体不太好，但记忆力很好。看来出于职业习惯他不主动说话，只是回答问题。他的夫人能说会道，给他帮忙。

我一见面就请巴甫洛夫介绍一下自己。下面是谈话的片断：

“我从来没有打算当翻译，我从动力学院毕业，从事科研工作，希望能够提高涡轮叶片的强度，而语言只是个人的爱好，就是今天说的业余爱好。我喜欢语言，掌握起来也很容易，看来这是天赋，我能自如地掌握德文、英文，后来还掌握了法文和西班牙文。1939年联共（布）中央召见我。您能想像吗？我只不过是一个预备党员。在党中央委员会里有两个人在中央委员会一个干部的陪同下用

德文同我交谈。后来我知道，他们是要了解我通晓语言的程度。他们了解后说：‘他的德语比我们强。’于是我得到命令，让我去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同志处。他刚刚取代李维诺夫担任外交人民委员，他在改组机关。

这一切如同在梦里一样，我不想当外交官，我才24岁，我一心想搞科学研究。我在同莫洛托夫第一次谈话时就老老实实在把这些想法告诉了他。但是他简短明确地回绝了我，说：‘您是共产党员，应该在更需要您的地方工作。’

于是我成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助理。我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每次会见里宾特洛甫时担任翻译，还跟着莫洛托夫会见过希特勒。我担任过外交人民委员部中欧司司长，在战争年代举行的各次会议——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上都担任翻译。从1974年起以特命全权大使的级别退休。”

“请详细谈谈有关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情况。”

“是的，我当时翻译了斯大林、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的谈话。”

“现在有许多人的文章和讲话谈到条约的秘密附加议定书，甚至连雅科夫列夫给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在列举了证明议定书存在的种种间接证据后还是说没有原件。既然您在签署条约和这个秘密附件时在场，那么您今天是1939年8月23日那天发生事件的惟一见证人。请明确干脆地说：是否有秘密议定书？”

“是的，是有的。我还要补充一个今天人们根本难以相信的细节：倡议草拟和签署秘密议定书的不是德方，而是我方。”

“这确实非常出人意料。”

“毫不奇怪。秘密议定书今天遭到谴责，但在当时，在那个国际环境中，它却被看成是斯大林的英明之举。希特勒需要一个安定的后方，他急于签署条约，当时离进攻波兰只剩下几天了，后来便是进攻法国。不在东线开辟第二战场，保证后方的安全是希特勒梦寐以求的事情。里宾特洛甫只带来基本条约的文本，斯大林、莫洛托夫讨论了它，作了修改。斯大林突然说：‘这个条约要有一个补充协议，我们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不会公布这个协议。’斯大林明白希特勒为了后方安定能作出一切让步，于是提出了补充条件：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和芬兰将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此外，斯大林还表明对收回比萨拉比亚以及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并入各自共和国版图有利害关系。

里宾特洛甫对这个出乎意料的问题不知所措，他说他本人不能

解决这些问题，应该得到元首的批准。斯大林说：事不宜迟，这里有电话，您就打电话吧。里宾特洛甫经同意后就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同希特勒通了电话，把斯大林的愿望告诉了他。元首授权里宾特洛甫签署补充议定书。他不可能不同意。他的部队已经集中，再过一个星期战争将爆发，他决心作出任何承诺，因为他清楚，一旦有必要，这些承诺都将被违背，不会得到兑现。[顺便提一下，前德国外交部法律司司长弗里德里希·豪斯在纽伦堡审判时证实了这次谈话，他说：‘部长就这几点（指议定书）同希特勒通了电话……希特勒授权里宾特洛甫赞同苏方的观点。’——本书作者注]

在同希特勒通话后，双方就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草拟了秘密附加议定书。经过润色、打印后签署了这份议定书。这一切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是我翻译了谈判双方的谈话。斯大林有好几次强调指出，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不应说出这个十分秘密的协定。”

我在里宾特洛甫本人在纽伦堡审判时的供词中找到了对巴甫洛夫叙述的证实。

我认为，我在本章中已经引用过的里宾特洛甫在纽伦堡审判时最后陈述的片断十分有说服力地证明了巴甫洛夫的叙述是可以相信的。

这里不再引用我与巴甫洛夫谈话的其他细节，这次谈话十分有意思，但我关于条约的论述已经过于冗长了。我这样做，只是因为这一切与斯大林的活动有关，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是谁“赢了”谁：元首欺骗了斯大林，使他放松了警惕性，从而保证了占领波兰、击溃法国的有利条件，但斯大林在这件事上表明他是比希特勒有远见的战略家。

斯大林在少数几个政治局委员中容光焕发，得意洋洋，他认为取得了大胜利（他是的）。德国成了友好国家，而英法却与德国开战。因此，斯大林把战火从苏联边境推向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手持武器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苏联平平安安地呆在一边，并且在作反击德国侵略（它是知道的）的准备。

连居心叵测的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谈到当时的情况时都说：“斯大林把这个条约当作巨大的成功。他趾高气扬，洋洋自得，简直是在说：‘我骗过了希特勒，骗过了希特勒！’”

许多人撰文证明斯大林缺乏远见，说他作为外交家和政治家早在战争爆发前就输给了希特勒。但这都是空话。想中伤斯大林的愿望使许多人不惜撒谎，歪曲事实。

斯大林和希特勒在战前的决斗中至少是打成“平局”。希特勒得到

了他要的东西——在解决自己在欧洲的问题（尤其是与法国的关系）时避免了开辟第二战场的危险；斯大林则想竭力推迟战争的爆发，“哪怕推后两年”，以便全国和全军作好反击侵略的准备，斯大林做到了这一点。

因此显然双方“打了个平手”。但这还不是全部！除了上述的一切外，斯大林还实现了规模巨大的战略决策：他解放了西白俄罗斯、西乌克兰和比萨拉比亚，把苏联的西部国界向西推移了几百公里。斯大林把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共和国并入苏联，使希特勒失去了有利的桥头堡，就此可以随心所欲地写文章（和叫喊！）——使用“占领”、“抢占”这样的字眼（虽然新闻纪录片表明，苏军在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都受到热烈欢迎，人民向苏军献鲜花）。不管今天怎么议论，斯大林确实使希特勒匪徒失去了他们本可以在第一个月就用发起进攻的战略军队集团“劈开”苏联领土、直抵伏尔加河的战略桥头堡。从里加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正是近在咫尺，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道路很好，又有机场，可以从海上运送部队和装备，要是“巴巴罗萨”计划的突击集团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桥头堡展开，法西斯德国军队的有生力量就能马上拿下苏联首都，因为我们没有部队可以用来保卫它（主力在西南边界），莫斯科城郊没有一点防御工事。那么一个星期后希特勒匪徒就可以到达苏联首都城下，而强大的坦克可以夹击斯大林格勒，它们可以马上渡过伏尔加河，因为在我们纵深地带没有能遏制它们的兵力。要是把远东的部队运往伏尔加河一线，那么靠惟一的一条铁路在短期内无法集中部队。不知道这个第一次突击会带来什么结果，也许我们不得不进行车里雅宾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新西伯利亚保卫战。

但由于斯大林的战略远见（既然常说他是独自一个决定一切的），德国人失去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桥头堡，不得不通过利沃夫、明斯克、斯摩棱斯克以及基什尼奥夫、基辅、奥廖尔长途跋涉来进攻莫斯科，他们在这一片广袤的土地上丧失了近一半的兵员和装备。由于斯大林的战略洞察力，希特勒匪徒在1941年没有能实施他们的“闪击”战。可以说，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结局。不错，斯大林的行动也有负面——违背了国际主义原则，同潜在的敌人谈判（甚至勾结），但这些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拯救国家及其国土上居住的各民族。既然早已众所周知，外交和政治是肮脏的勾当，那么为什么斯大林在同政治流氓们打交道时应该手脚干净呢？

斯大林能迅速考虑好如何从希特勒想保证自己后方的愿望中取得好处，说明了他的远见、机智和坚决果断。斯大林在几分钟之内就提出（并当场拟好）了秘密协定（因此这个协定才由莫洛托夫领导的外交部

用打字机打印)。斯大林不失时机地迫使里宾特洛甫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给希特勒打电话，取得他对签署补充条件的同意，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些条件使希特勒本人失去了最有利的进攻出发阵地。

不，不管论敌们想出了斯大林在战前犯了多少过错，事实却说明了另一点：斯大林起先死死抓住里宾特洛甫，后来死死抓住希特勒不撒手——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战略远见不一定表现在武装斗争中，有时也表现于为了未来的胜利而巧妙地暂时放弃使用武力使得祖国平安。著名统帅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所作所为就是这方面的鲜明例证（也是对斯大林行为的辩护）。

俄罗斯由于蒙古入侵已经虚弱不堪，四分五裂，而光荣的涅夫斯基没有力量来回击蒙古人。卡拉姆津在他的《俄罗斯国家史》写道，拔都听说他（涅夫斯基）人格高尚，就命令他说：“诺夫哥罗德公！你知道上天为我征服了许多民族。你一个人能独立吗？但要是你想安安稳稳地统治的话，那你马上来我的帐篷里，来了解一下蒙古人的力量和伟大。”涅夫斯基爱祖国胜过爱王公的权力，他不想因为高傲地拒绝而使祖国蒙受新的灾难，于是不顾个人的安危和虚荣心，跟着兄弟安德烈一起去了蒙古大营（他的父亲也是被可汗召去死在大营里的）。

涅夫斯基在敌人的大营里吃尽苦头，拔都逼他长途跋涉去朝见大可汗。这种丧失尊严的顺从持续了不止一年。但涅夫斯基以其战略的睿智拯救了俄罗斯，使它得以喘息，积聚力量，站立起来，最终赶走了蒙古人。

难道情势不是很像吗？当时斯大林还没有训练有素的军队，而敌人又要求和平合作，这时难道不是应该接受这一建议，并把战争推迟几年，以便赢得胜利吗？

斯大林在鼓励军队建立功勋时，在讲话中显然不是平白无故地提到了伟大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形象的。

总之，明眼人能看到，耳聪人能听到，而对于对真理视而不见的人来说，再相似的类比也是白说。

二 和平的日子

斯大林在同反对派斗争时期，希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于是请了当时担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副院长的哲学专家斯滕给他上课。斯滕在教学大纲中收入了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费希特、谢林、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沃尔科戈诺夫说，教师在每周两次的课上“耐心地给身居高位的学生讲解黑格尔关于实体、异化、存在和思维的同—



性——把现实世界理解为观念的表现——等概念。而抽象的概念使斯大林很恼火，但他克制自己，继续听着斯滕单调的嗓音，时而用不满的反问打断他：“这对搞阶级斗争有什么用？”“谁在实践中用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斯大林最终也“没能掌握辩证否定、对立统一的实质……不能掌握关于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的统一的论点”。

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斯大林不懂辩证法，怎么能如此成功地实现自己的意图，十分有效地采取行动呢？他又靠什么战胜政治对手的呢？首先是如何战胜托洛茨基的呢？因为托洛茨基的智力“更敏锐、更出众和更丰富”，除此之外他还有着“活跃的思想、渊博的知识和扎实的欧洲文化修养”（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语）。

黑格尔的辩证法也许根本与现实生活不相容，不了解或“不懂”黑格尔的辩证法也许办起事来更有成效？马基雅弗利的辩证法也许比黑格尔的抽象说教更有智慧更有生命力？斯大林在他的实践活动中每次根据具体情势重新发现辩证法规律并据此行动时也许表现为一个自发的辩证论者？那么他还要斯滕的那套“辩证法”干什么呢？总的来说，关于他“不懂”辩证法的议论要达到什么目的？是否只是为了说他一些坏话？

斯大林是按照马克思对哲学家们的号召行动的：从解释世界走向改造世界。

现在我们从常情来看斯大林的哲学学习。一个是无数具体事务缠身、进行着紧张的政治斗争、十分关心寻找国家今后正确发展方向的国家的元首，另一个是生活方式不慌不忙、从容不迫，一点没有杂务负担的正襟危坐的哲学家，他对这个徒然想从哲学学习中取得具体好处的不懂“纯”哲学的学生不屑一顾。

斯大林的问题（“这有什么用？”“这能提供什么？”）显然是一个聪明务实的人提出的问题。而斯滕的回答（“这总的来说有用”、“这是每个有学养的人都需要懂的”）在这种情况下却显得幼稚。他一头钻进自己的专业里，而不考虑学生的学习动机、个人的水平和国内的情势。换句话说，斯滕没有一点起码的常识。

应该指出，常识是体现生活过程本身的各种正常的现实的联系和关系在心理上的长期反映。

大多数心理学家有意无意地把学者、哲学家以至一切理论家的工作当作惟一的脑力工作形式。可是生活中不光理论家在思考，任何一个组织者、行政管理者、生产者等的工作中每个小时都在产生需要紧张思考的问题，实际的脑力工作直接进入实践活动中，受到实践活动的不断考验，而理论思维工作只有其最终结果才受到这样的检验。因此实际思维

才有了这样独特的责任，硬性的时间条件是实际思维活动最大的特点之一。以上看法足以对以为科学、哲学、艺术的理论家对思维能力提出了最高要求这一十分流行的想法产生怀疑。黑格尔认为哲学学习是理智活动的最高阶段，20世纪初的心理学家通常把学者的工作看作是智力活动的最高表现。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理论思维能力都被看作是最高的智力表现形式，而实际思维能力，即使在其最高阶段（政治家、国务活动家、统帅的思维能力）从这一角度也都被看作是起码的、容易的、专业水平较低的智力活动形式。

这种看法十分错误。“从智力任务的多样性以及内在的矛盾性来看，还有从脑力工作所处的硬性条件来看，最高形式的实践活动都应占据首要地位。严格地说，科学家的脑力工作要比政治活动家或统帅的脑力工作简单、明确和从容（并不是说必然容易）。”（鲍·米·捷普洛夫语）真是金玉良言！

斯大林具有非凡的记忆力，加上出色的感知事态或信息的针对性、倾向性，这意味着什么？这对现在和未来有益还是有害？需要记的就永远记住，没有用的就加以剔除，不去记无用的东西。

记忆力、注意力、对现实实际的感知，这一切综合的表现就被称作思维能力。每个人的思维能力各不相同。斯大林的思维能力是怎样的呢？它有哪些表现呢？

斯大林的思维能力首先表现为力求简单、明确及达到这一目的的能力。

必须把能使形式上复杂的东西归结为实质上简单的东西的能力同歪曲总的现实图景的简单化区分开来。如果两个人表达同一内容的繁简程度不同，那么其中阐述得更简单的人更聪明。

斯大林在他的政治活动中要面向工人、职员、集体农庄庄员、党的积极分子这些普通人。号召所有的人都去领悟“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存关系”完全是自命不凡的装腔作势，难道他们从领袖的讲话中只要弄清“世界是复杂的和多样的”吗？那么往哪里去呢？“当前的任务”是什么？！

为了证明我的论断是正确的，下面引用一段令人不能不表示赞同的话：“托洛茨基讲话动听，争论时随机应变，还会说俏皮的笑话；而斯大林回答问题时语句简单，不断地自问自答……托洛茨基最终让大家相信他聪明过人，仅此而已；而斯大林面对人群，要说服他们相信他的思想是正确的，因此他才说得简单，因此才自己提出问题……托洛茨基以为他说得很聪明，而斯大林说得明白易懂。大多数人听了托洛茨基的讲话后得到的印象是自己很笨，而托洛茨基的目的仍不为人理解……”

他们为了自己的工作必须了解头头想要什么，必须明白和看出这确实有益于国家，而不是‘世界革命’之类的又一次冒险行动。因此以斯大林为首的实践家们不能不从思想上战胜理论家们。”（Ю. И. 穆欣语）

但真是谢天谢地，在粉碎了托洛茨基分子和阴谋分子后，消耗无数精力、体力和时间的讲坛上的论战结束了。斯大林终于有可能更充分、有效和目的明确地把自己的智慧和能力用于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在花费巨大努力实施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后，国防问题和团结各族人民去克服即将爆发的战争中的困难问题被提到了首位。这些问题等待斯大林作出战略思考和决策。

* * *

斯大林在解决与国防有关的问题时，往往会深入研究通常只有专家们才感兴趣的细节。

1935年6月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试验场里陈列了新式火炮。斯大林、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在预定的时间来到这里，他们察看每一门炮，听取设计师的报告，提出问题。

格拉宾就他的Φ-22作了报告（这-76毫米口径的炮是黄颜色的），接着领导人们走到马哈诺夫的半高平两用炮K-25跟前，斯大林听了解说后，突然转回去，又走到Φ-22跟前。接着格拉宾回忆说：

“斯大林走到写着有关我们这门黄炮的数据的小木板跟前，站住了，仔细读了起来。我走到他的身旁。斯大林继续看着木板上写的数字，然后向我提问题。他感兴趣的是射程、各种型号炮弹对目标的作用、穿甲率、快速性、炮的重量、炮班的人数以及炮班在发射阵位能否操作等等许多问题。我对此一一作了简短的回答，我以为说得很清楚了。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最后斯大林说：

‘炮很漂亮，真让人喜欢。它威力大、重量轻，这很好……’”

视察持续了很长时间，然后开始试射。格拉宾的炮没让设计者丢脸，可是马哈诺夫的高平两用炮却让炮班忙活了一阵。试射结束后，斯大林从避弹所出来，一边走一边在出声地思考着说：

“炮很好，但应该多一点，今天就要有很多，而有些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应该尽快解决，而且不要出错。我们有了自己的骨干，这很好，当然骨干还年轻，但已经有了。应该使他们不断增长。有了能制造任何炮的工厂，但它们不能只会制造一种炮，要制造许多……”

格拉宾和马哈诺夫在他的身边。

然后他站住了。对设计师们说：

“你们来认识一下。”

他们回答说，彼此早已认识。

斯大林说：“我知道，但是你们当着我的面认识一下。”

格拉宾继续回忆道：

“马哈诺夫愉快地笑着看了我一眼，于是我们相互握了握手。

斯大林说：‘好，你们当着我的面认识了，这很好。’

我一点都不明白。

斯大林拥抱了我们俩，我们朝着我们的大炮走去。走了几步，斯大林站住了。

他对马哈诺夫说：

‘马哈诺夫同志，请批评一下格拉宾的炮。’

我们俩都没有料到这一点。马哈诺夫想了想说：

‘我说不出格拉宾炮的缺点。’

我料不到他会这样回答，感到很惊讶。于是斯大林对我说：

‘格拉宾同志，请批评一下马哈诺夫的炮。’

我想了想说，两用炮有三个有机的缺点。我列举之后作出结论说：

‘其中每一个缺点都会使这种炮不经根本改造就不能供军队使用。’

我说完就不作声了。斯大林和马哈诺夫也沉默着。我不知道他们对我的话怎么看，感到心里有点紧张，但我并不为自己说的话感到后悔。我在想：不问我，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但既然问我的话……

斯大林稍微沉默了一下，说：‘那现在请你批评一下自己的炮。’

这更是出乎我的意料……”

格拉宾描述了自己炮的缺点。斯大林听了很高兴，当场命令把Φ-22送往列宁格勒，到支持两用炮的人那里去做试验！

第二天，6月15日，在克里姆林宫里举行会议，会议由莫洛托夫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许多军人和非军人。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建议装备两用炮，只有几个人发言赞成使用格拉宾的炮。会议开了很久，有的人发了几次言。斯大林走动看，提出问题，考虑自己的意见。最后大家都谈完了。莫洛托夫问，是否还有人想发言。

格拉宾接着叙述说：

“大厅里安静了下来。斯大林走到莫洛托夫的桌旁。

‘我想讲几句。’

许多人站了起来，往斯大林身边靠拢。我学他们的样，虽然我本来就坐得很近。我感兴趣的是，他对已经争论了好几年的如此专业的问题会说些什么。

对斯大林不慌不忙、轻声说话的习惯已经有许多人描写过了。他仿佛在脑海里斟酌着每一个词，然后再说出来。他说，应该停止研究高平两用炮。他又补充说：

‘这是有害的。’

我想读者能明白，这些话在我的胸中掀起了多大的欢乐的波澜。

接着他补充说，高平两用炮不能把所有的问题解决得一样好。需要专门用途的师属火炮。

‘今后您，格拉宾同志，研究师属用炮；而您，马哈诺夫同志，研究高射炮。对格拉宾的炮要赶快试验。’

讲话极其明确简洁……苏联政府发展炮兵的路线十分正确。到30年代末苏联炮兵成了拥有各种类型的现代式样大炮的强大力量。”

在战争前夜苏联极为重视炮兵装备的生产。斯大林在1938年的一次会上说：

“尽管出现了新的极其重要的战斗技术装备类型（空军、坦克），炮兵仍然是战争中强大的决定性的因素……对炮兵应给予格外的重视……”

在战前年代研制了后来著名的“喀秋莎”这一火箭炮试验样机。1941年6月斯大林和政府成员视察了火箭炮样机，对它作了肯定。

工农红军的炮兵装备是世界上最出色的。苏联团属76毫米口径炮要大大优于德国人的75毫米口径炮；德国人150毫米口径的重炮及不上苏联相应的大炮。苏联的炮兵师和炮兵军还有山炮都要比德国的完善。

* * *

斯大林关心各兵种的发展，他尤其喜爱空军。人们把飞行员称作“斯大林的雄鹰”，飞行员以此自豪。

1932年在莫斯科中央机场举行的航空装备展览上大家都为时速达280公里的歼击机И-5的飞行性能惊叹不已。斯大林在参观展览后说：

“这还不错，但我们要的不是这种飞机，应该让飞机的时速达到400公里……”

1933~1934年在尼·尼·波利卡尔波夫的带领下苏联制造了起落架能收起、时速达480公里的单翼歼击机И-16……

斯大林在解决与空军有关的问题（以至一切与技术有关的事务）时，总要召集专家们来开会。

1933年8月5日伊柳辛应邀来到斯大林的别墅。在场的有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航空工业总局局长彼·约·巴拉诺夫、工农红军空军司令雅·伊·阿尔克斯尼斯、飞机设计师安·尼·图波列夫。

6时开始午餐。但这是一个工作午餐，斯大林开始提出一些令伊柳辛感到惊讶的问题：总书记怎么这样熟悉空军？话题涉及空气冷却的大功率发动机。

斯大林说：“我们需要有好的发动机，空气冷却的。看来我们还没有搞成……”

巴拉诺夫建议向外国公司购买专利使用许可证。斯大林询问了在座的人的意见，当了解到在座的人意见一致的时候，他马上确定了去购买许可证的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并且说：

“委员会买不到许可证就别回来……”

1935年5月2日在中央机场的飞行场上空军进行检阅时，斯大林在歼击机И-16旁驻足不前。契卡洛夫回答了关于飞机的问题。斯大林早就听人说过这位飞行员，他认真地听完了他的话，问道：

“那么为什么您当时不使用降落伞呢？”

契卡洛夫回答说：“我飞的是十分珍贵的试验用样机，要千方百计加以保护，所以设法驶向机场，尽量救下这架飞机。”

斯大林严肃地说：

“您的生命对我们来说比任何一架飞机都宝贵。有必要时一定要用降落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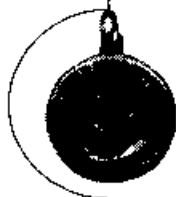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上拿了一杯酒走到契卡洛夫坐的桌子跟前。

“我想为您的健康干杯，瓦列里·巴甫洛维奇！”

“谢谢，我本来就很健康，”契卡洛夫不慌不忙地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还是为您的健康干杯吧！”

在斯大林拿的小高脚酒杯里，从杯壁的气泡可以看出装的是“博尔若米”或“纳尔赞”矿泉水。契卡洛夫倒了两大酒杯伏特加酒，拿过斯大林的小酒杯，递给他一个大酒杯，说：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们来喝一杯结谊酒吧！”



斯大林抿了一小口，契卡洛夫则喝光了一杯酒，并拥抱了斯大林，这引起警卫们很大的不安……

* * *

在战前的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开始开辟北方航线。1932年12月14日政治局听取了奥·尤施米特的报告，他曾领导“西比里亚科夫号”在一个通航期中走完北方航线的考察活动。斯大林问道：

“哪些船可以在北方航线通行？雷击舰行吗？潜艇呢？我们是否可以向北方的金矿供应必需品？”

党和政府的其他领导人也提了许多问题。然后斯大林简单地作了小结：

“我国很长一段国界沿着北冰洋。这是我们的海，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阻碍我们在这里航行。这是惟一保证我们与远东保持联系的海路，加上我们有着无数宝藏、尚未开发的北方地区等待开发……”

人民委员会作出决定成立北方航线总管理局。开发北方进展得快了起来。从北极地区不断传来令人浮想联翩的惊人消息。

老一辈人还记得“切柳斯金号”船的光辉事迹。这艘由弗·伊·沃罗宁任船长的轮船1933年7月14日载着由奥·尤·施米特领导的考察队启航，在航行了几个月后，1934年2月13日“切柳斯金号”船沉没，但考察队员（101人，其中有10名妇女和2个孩子）登上了冰面。全国都关注着从施米特营地传来的消息。

苏联政府为救援“切柳斯金号”上的人，派出了优秀的飞行员：阿纳托利·利亚皮杰夫斯基、西吉斯蒙德·列瓦涅夫斯基、瓦西里·莫洛科夫、尼古拉·卡马宁、马夫里基·斯列普尼奥夫、米哈伊尔·沃多皮亚诺夫、伊万·多罗宁。飞行员们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于4月13日从冰上救出了“切柳斯金号”船所有的人。每一个飞行员都因救援北极考察队员的英勇行为被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

苏联飞行员一再打破飞行记录，其中的一些人怀着最大胆的冒险想法。

1936年6月初联共（布）中央召开会议，研究空军事故多的原因。在会议休息时瓦·帕·契卡洛夫、格·菲·拜杜科夫和亚·瓦·别利亚科夫去找奥尔忠尼启则，请求他帮助获得经北极飞行去美国的批准。

“你们坐不住了。”谢尔戈大笑起来，领着飞行员去找斯大林。

斯大林很感兴趣地问道：“为什么一定要飞北极呢？飞行员似乎什么都不怕，习惯冒险了。”

契卡洛夫很坚决地请求说：

“斯大林同志，风险很小，飞机很出色，发动机也好。”

斯大林笑了笑说：

“在飞美洲前要很好地详细研究一切。我们国家大，飞行的地点有得是。”他想了想又补充说：“有一条航线可以飞：莫斯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堪察加。”

1936年7月19日这三个勇敢的人成功地完成了这次飞行。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在莫斯科机场上迎接他们。斯大林问契卡洛夫，他还想干什么。

契卡洛夫的回答是：“再飞一次……飞到更远的地方去。”

契卡洛夫一再请求批准他飞越北极。1936年秋天米·伊·加里宁带了契卡洛夫、拜杜科夫、别利亚科夫和他们的妻子去斯大林在索契的别墅。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在大门口欢迎他们。主人发现客人们有些拘束，就建议他们一起去散散步，并向他们介绍园中种植的树，尤其是详细地介绍了桉树及其防治疟疾的性能，还请他们吃柠檬。当话题涉及到飞越北极时，斯大林说在北极圈地区必须有气象站。

1937年5月米·瓦·沃多皮亚诺夫和И.Т. 斯皮林把四个勇敢的人：伊·德·帕帕宁、恩·特·克伦克尔、叶·康·费奥多罗夫、彼·彼·希尔绍夫放到了北极圈地区的冰上。他们在北冰洋的冰面上漂流了274天。

契卡洛夫、拜杜科夫和别利亚科夫靠了气象站的帮助飞越了北极，到达美国。

过了几个月，米·米·格罗莫夫、安·鲍·尤马舍夫和谢·阿·丹尼林也飞了同一条航线。

斯大林在又一次接见契卡洛夫时问他，他还想干什么，契卡洛夫十分向往地叹口气说：

“最好能绕地球飞一圈！……”

苏联空军在30年代中期取得的成就似乎可以使我们心安理得。但是在西班牙内战时苏军发现自己的歼击机И-5和И-16落后于德国歼击机，轰炸机的情况也不太妙。这使斯大林感到不安。

设计师亚·谢·雅科夫列夫的回忆录详细谈到政治局如何“认真、全面地”研究加快设计新型飞机并投入批量生产的决定。

1939年4月党中央召见雅科夫列夫。斯大林问雅科夫列夫对德、英、法空军比较水平的看法。雅科夫列夫对斯大林情况熟悉感到惊讶，因为总书记像专家一样地和他交谈。他特别着重谈了飞机的装备问题，他问道：

“为什么英国人在‘喷火’歼击机上不装炮而装机枪？”

“他们没有航空机关炮。”雅科夫列夫回答说。



“对，对，”斯大林感到满意，因为他的情报得到了证实，“但有了炮还不够，要发动机能适应于安装机关炮……”

“英国人也没有这样的发动机。”

“您知道克利莫夫的飞机发动机吗？靠了它可以安装什皮塔利内的航空机关炮。”

雅科夫列夫回答说了解克利莫夫的工作。于是斯大林问道：

“您能着手设计出使用克利莫夫的发动机和什皮塔利内的机关炮的歼击机吗？”

这位飞机设计师请求给他些时间考虑，因为此前他没有设计过歼击机。他得到允许可以考虑一段时间。

政府成员还同其他的飞机制造工作者进行了这类谈话。不久克里姆林宫召集飞机制造老专家和年轻的设计师一起开会。政府成员也来到斯大林的办公室，他们分别接见了每一个与会者。

轮到接见雅科夫列夫了。斯大林问雅科夫列夫是否考虑过了，雅科夫列夫回答说收到了克利莫夫的资料，他的设计组仔细研究了建议，可以着手设计歼击机。

“歼击机有什么装备？”斯大林问道。

“一门20毫米口径机关炮和两挺速射机枪。”

斯大林表示赞同，说政府同时要几个设计师设计歼击机，他们的任务是不仅要研究飞行和作战性能最好的歼击机，还要尽快制造出来并投入批量生产。

“飞机应该在新的一年即1941年前制造出来。行吗？”

“美国人制造新歼击机花了两年时间……”

“美国人！而你们要表明年轻的俄罗斯设计师能干出什么来。你们表明了，我请你们喝茶。”斯大林笑着说。

政府为新飞机的设计师创造了一切工作条件，给予了包括物质帮助在内的一切帮助。只要工作出现一点停顿，斯大林本人就进行干预。

斯大林不仅组织设计和生产现代化的飞机，还亲自进行对可能对手的空军真正的侦察。为此他派出最内行的专家去德国。

1939年10月，以伊·费·捷沃相为团长的商务代表团被派往德国。代表团中包括设计师雅科夫列夫，他的任务是了解德国的航空技术。

1940年3月，斯大林又一次派代表团去德国。雅科夫列夫又是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斯大林亲自给他交代了任务。这位设计师在回忆录中谈到这项任务的实质时是这样说的：

“……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向德国购买我们最感兴趣的航空技术，既为了比较我们和德国的飞机水平，又为了研究整个航空业中的新技术。

谈话明确了除了正常程序提供的款项外，还要拨出一笔外汇用于直接的计划外的采购。

‘您需要多少外汇？’斯大林问道。

‘大约10万~20万。’

斯大林拿起话筒，与外贸人民委员米高扬通话。

‘应该拨100万给代表团支配，如果花完了，再拨100万。’

他和米高扬谈完后，又对雅科夫列夫说：

‘如果发生困难，可以直接来找我。约定的收件地址是：莫斯科伊万诺夫收。’”

结果雅科夫列夫真的得求助于斯大林了。雅科夫列夫是这样说的：

“在参观了工厂和会见了梅塞施米特、海因克尔和谭克之后，航空代表团成员有了非常明确的看法：必须购买‘梅塞施米特-109’和‘亨克尔-100’歼击机、‘容克-88’和‘道尼尔-215’轰炸机。

但是由于商务代表处机关官僚主义的拖拉作风，我们不能迅速有效地完成交给我们的任务，即就地决定该采购飞机的型号和数量。我发现了这个情况，试着按‘莫斯科伊万诺夫收’的地址发了一份电报。商务代表处的领导人扣住了电报，不允许发往莫斯科。我告诉捷沃相，斯大林预见到会发生困难并考虑到任务十分重要，允许为完成我们的使命直接找他并为此目的给了我保密的收报地址：‘莫斯科伊万诺夫收’。在我作了这番解释后捷沃相同意了，并下令不要阻拦。

只过了两天，就收到了回电，授权我们不经与莫斯科商量即就地确定采购飞机的型号和数量。对我的密电如此快速的反应简直把商务代表处的官员们震惊了。工作开始变得非常容易，交给我们的政府任务也出色地完成了。

总之，第二次德国之行同第一次一样十分有意思也十分有益，也许更有意思一些，因为第一次是熟悉情况，第二次实际办事：我们挑选和购买了我们感兴趣的航空技术。

在从德国返回莫斯科的当天晚上，斯大林召见了，在场的有莫洛托夫、米高扬、马林科夫和沙胡林。他们和我详细谈了很长时

间，起先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后来去斯大林的住所吃晚饭。

斯大林对什么都感兴趣：德国人卖给我们的是否是旧货？他们有没有重型轰炸机？谁的（德国的还是英国的）歼击机更好？如何组织航空工业？德国空军和工业的相互关系如何？等等。

参加谈话的人最感兴趣的自然是：德国人是否真的向我们展示和出售了他们装备的所有东西；他们有没有欺骗我们的委员会，他们是否把用旧了的航空技术装备塞给了我们。

我说，我们委员会也有过怀疑，尤其是第一次德国之行时，但现在对这一点的看法不存在分歧了。我们相信，我们挑选的技术装备符合德国空军当前的发展水平。

斯大林让我递交一份关于此行成果的详细报告，我照办了。”

斯大林还第三次派雅科夫列夫去执行他亲自交办的任务。这发生在1940年10月：

“‘克里姆林宫请您马上去莫洛托夫处。’

克里姆林宫里空空荡荡的，政府机关因为过节都没有上班，人民委员会的走廊上也没有什么人。

莫洛托夫马上接见了，告诉我说，我被纳入赴德国的政府代表团。

‘明天晚上9时您要到白俄罗斯车站，我们一起去柏林。这是斯大林同志的指示。’

我感到惊讶，问道：‘怎么是明天呢？我还没有出国护照，根本没有作好出国的准备。’

‘不必担心，一切都会有的。装换洗衣服的小箱子有吧？……其他您什么都不要拿。总之，明天8时整在白俄罗斯车站……’”

（关于莫洛托夫和希特勒的谈判，关于斯大林如何领导谈判，谈判带来什么好处，在另一章中再谈。）

当莫洛托夫在执行他的政治使命时，设计师雅科夫列夫不失时机地在完成他的特殊工作。对于斯大林来说，这项工作十分重要，因此在雅科夫列夫从柏林返回的当天斯大林就把他请去了。

设计师回忆说：

“一回到莫斯科，几乎就在车站上，我被召到了克里姆林宫里。莫洛托夫在会客室里与我打过招呼后笑着说：

‘啊，德国人！现在来折腾我们俩了。’

‘为什么？’

‘怎么啦？同希特勒共进过午餐吗？共进过。向希特勒问过好吗？问过！得忏悔忏悔了。’

这个晚上我们讨论了许多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多与空军无关，但斯大林还是不放我走，不时问我这一回在德国又看到了什么新东西。斯大林同以往一样很感兴趣的是，德国人在出售航空技术设备时是否欺骗了我们。我报告说，现在，这次即第三次德国之行后我已经坚定地确信（虽然还没有全弄明白原因），德国人展示了他们航空技术的真正水平。我们购买的这些技术的样机——‘梅塞施米特-109’、‘亨克尔-100’、‘容克-88’、‘道尼尔-215’等飞机反映了德国当代空军装备的现状。

事实上后来战争表明，除了我们拥有的上述飞机外，前线只出现过一种新歼击机——‘福克-武尔夫-190’，而且这种飞机的表现也不如预期。

我谈了自己的想法，认为希特勒匪徒为征服欧洲取得的胜利昏了头，没有想到俄罗斯人会和他们竞争。他们很相信自己的军事优势和技术优势，在展示本国空军秘密时，只想使我们更吃惊，震撼我们，吓唬我们。

深夜，在放我们回家前，斯大林说：

‘组织我们的人研究德国飞机。把他们的飞机同我们的比较一下。要学会打击他们。’

在战争爆发整一年前，莫斯科收到了5架‘梅塞施米特-109’、2架‘容克-88’轰炸机、2架‘道尼尔-215’轰炸机以及1架最新的‘亨克尔-100’歼击机。在这时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具有竞争力的拉格、雅克、米格歼击机、伊尔和佩-2强击机和轰炸机。”

赢得时间对苏联空军格外宝贵，由于斯大林的远见和精明，苏联在1939~1940年制造出了新的、十分现代化的战斗机型并在1941年前投入批量生产。

* * *

斯大林同样十分执著地、专注地和要求严格地对待坦克制造工作。

1938年8月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研究了坦克工业的发展前景。

苏联坦克制造专家们设计并在1939年下半年就制造出了第一批结构独特的坦克试验样车：由米·伊·科什金、亚·亚·莫罗佐夫和H. A. 库



切连科领导的集体制造了当时最精良并在此后许多年中站在前列的中型坦克 T-34。约·雅·科京的设计局研制了崭新型号的重型坦克。

斯大林一贯关心坦克制造工作并了解这项工作的一切细节。

米·伊·科什金回忆说：

“伏罗希洛夫手里拿着由国防委员会起草的决议草案在作报告，斯大林走到他跟前，拿起了草案。他读完后向汽车装甲坦克部部长雅·克·费多连科问道：

‘新的炮塔有哪些战术技术优点？’

费多连科说，浇铸的炮塔可以在铸造车间制造，而生产旧式炮塔时零件都要用大功率冲床冲压。

‘我问您的是，新炮塔有哪些战术技术优点，而您却给我讲工艺上的优点。你们那里谁在研究军事技术？’

费多连科说是 I. A. 列别杰夫将军。

‘他在这里吗？’

列别杰夫将军站了起来。斯大林又重复了一遍问题。列别杰夫有些迟疑，实际上又重复了费多连科说过的话。

斯大林皱起眉头，气冲冲地问道：

‘您在哪里工作，是在军队里还是工业部门里？我问了三遍，新炮塔有什么战术技术优点，而您却谈工业能做到些什么。也许您转业去搞工业更好些？’

将军默不作声。我感觉到可能不会作出关于炮塔改为浇铸的决定了，于是举起手来请求发言。斯大林朝着我说：

‘我问的是战术技术优点。’

‘我正是要讲这个问题，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您是军人吗？’

‘不是。’

‘您想说什么？’斯大林恶狠狠地问我。

我从文件夹中取出了写着射击结果的卡片，走到斯大林身边。

‘用零件焊接成的旧炮塔有一个弱点——焊缝。新炮塔是一个强度相同的整体。这是在靶场上射击后两个类型炮塔的检验结果。’

斯大林看了看卡片，还给我说：

‘这个看法很重要。’

他走到了房间的另一端。

‘请问，改用新炮塔后坦克的重心有什么变化？坦克设计师在这里吗？’

设计师站了起来。

‘斯大林同志，即使有改变，也微不足道。’

‘微不足道，这不是工程技术术语。你们计算过吗？’

‘没有，没有计算过。’

‘为什么？要知道这是军事技术。’斯大林盯着设计师问他，坦克前轴的载荷有什么变化。

设计师低声说：

‘微不足道。’

‘您一股劲总是说“微不足道”、“微不足道”，请问你们计算过没有？’

‘没有。’设计师低声回答说。

‘为什么？’

设计师不作声。

斯大林把决议草案放在桌子上说：

‘我建议不通过这个决议草案，因为它不成熟。告诉同志们，今后不要拿这样的草案来政治局。为了起草新决议成立一个委员会，其中包括费多连科、他（斯大林指着汽车拖拉机工业人民委员斯·阿·阿科波夫）和他（斯大林点着我）。’”

1940年6月，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关于1940年T-34坦克的生产》。很大一批工厂参加生产新坦克，因此到1941年夏天苏联坦克制造的生产能力比德国坦克工业的生产能力高50%。但是组织和工艺方面的麻烦限制了新坦克的生产。1940年生产了246辆KB和115辆T-34；1941年上半年新坦克产量增加了：生产了393辆KB和1110辆T-34。但这样数量的坦克还不足以重新装备装甲坦克部队。同空军一样，红军装甲坦克部队在进入伟大卫国战争时还处于重组阶段。

这是苏军在战争头几个月失利的原因之一。要是斯大林没有运用各种外交力量推迟德国的进攻并利用这一延缓的时机来用现代化武器技术装备军队的话，这些失利可能要更加致命。

* * *

斯大林也没有忘记海军。但是由于斯大林完全专注于陆上事务，在海军工作中犯了错误。但这是一个所谓的好心犯的错误。

斯大林在同海军将领谈话时坚持要建造大型舰艇，尤其是战列舰。

海军人民委员库兹涅佐夫反对说：

“波罗的海对大型舰艇来说太窄小，这些舰艇可能会遭水雷袭



去。这样的舰艇造价太高。”

斯大林从桌旁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把烟丝装进烟斗里。

“我们一戈比一戈比地积累钱，但一定要建造。”他严厉地盯着库兹涅佐夫说。

1937~1938年苏联以异常快的速度设计和建造舰艇。1939年建造的规模更大，几百家工厂为海军生产。一艘大型舰船下水需要三年甚至五年的时间，需要许多钱、材料和劳力。可是西方已经爆发战争，到处需要钱。1939年斯大林决定削减在建的战列舰和重型巡洋舰的数量，集中力量建造驱逐舰、潜艇和鱼雷艇。1941年7月初战列舰的建造完全停止了。斯大林终于以某种方式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 * *

加强国防能力由斯大林的忠实战友克·叶·伏罗希洛夫、格·康·奥尔忠尼启则、谢·米·基洛夫、安·亚·日丹诺夫直接领导。但在这方面斯大林对国防事业的关心和专注占据着特殊的地位。

他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说，苏联希望和平，苏联政府将千方百计实行和平政策，但是覬覦别人领土的人应该明白：

“别人的土地我们一寸也不要……自己的土地一寸也不给别人。”^①

当我在伏龙芝学院学习时，迎接学员们的是在我们宏伟大厦的大门口墙上的这句话，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话已经不见了。

三 苏芬战争

(1939年秋~1940年初)

斯大林起初想通过和平途径改善列宁格勒的战略地位。国界离这座城市不远，一旦爆发战争，固定阵地上的芬兰大口径炮就可以打到列宁格勒。赖提领导的芬兰政府对苏联采取了不友好政策。

1979年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写道：“芬兰反动统治集团借助于帝国主义国家将其国土变成了进犯苏联的桥头堡。在德、英、法、比的军事专家参与下，在英、法、瑞（典）、德、美的财政援助下，他们沿边境地区，主要在离列宁格勒32公里的卡累利阿地峡构筑了坚固

^①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27页。——译者注

设防的永备工事配系（见“曼纳林防线”）。”^①

如果深入思考的话，对芬兰可能侵略苏联的这一解释仍不能令人信服。不错，许多国家与苏芬冲突有利害关系，说明进攻性侵略学说的应是完全不同的备战方法，而不是建设长期的防线。发动进攻只需要准备好普通的地形，在此集中部队，在成立突击集团后开始战斗行动。花费巨大劳力和几十亿资金，而且还要拉上如此众多的国家来建设一条强大的防线用于所谓的进攻，从军事角度看，这简直是缺乏基本知识，连不懂军事学术的人也明白这种解释很幼稚。芬兰人修筑曼纳林防线当然是为了保卫小小的芬兰不受苏联这个可怕邻国的侵略。但是“好心的盟国”出钱也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1939年夏天，德军总参谋长哈尔德来到芬兰，他格外关注列宁格勒战略方向和摩尔曼斯克战略方向。乌·吉科宁后来写道：“在30年代末希特勒的阴影笼罩在我们的头上，芬兰整个社会不能拒绝它对之相当有好感的東西。”

1931~1937年，芬兰的总统佩·斯温胡武德声称：“俄国的任何敌人都永远是芬兰的朋友。”1939年芬兰在自己的领土上依靠德国专家的帮助修筑能容纳比芬兰空军拥有的许许多多倍的飞机的机场。在卡累利阿地峡曼纳林防线从芬兰湾延伸到拉多加湖，它拥有纵深几乎达90公里的三条筑垒地带。

1939年10~11月，苏联和芬兰就相互安全问题进行谈判。但是芬兰政府受其西方同情者的唆使，不愿结成防御同盟。德国以及英、法，甚至美国，都承诺给芬兰人支持。德国要芬兰代表相信，芬兰人一旦与苏联开战，只会赢得好处（德国人没有公开他们的计划，但看来暗示了他们决定进攻苏联）。他们甚至保证今后帮助芬兰补偿可能的领土损失。再一次请读者注意第三帝国领导人背信弃义的行为：很明显，他们在向友好的芬兰作出这样的保证时，已经签署了秘密的补充议定书，其中向苏联承诺不干预苏联可能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甚至与芬兰发生的任何冲突！事实上，苏芬战争爆发后，德国确实在形式上保持了中立。

起初人们以为不会发生军事冲突，芬兰将接受苏联的建议。这个建议是芬兰人和平地让给我们一部分卡累利阿地峡，作为交换他们取得我国北方的一部分领土。但是交换明显是不等值的，因为在卡累利阿地峡有可以保证掩护国界的强大的筑垒地带，而我们提出交换的是没有任何

^① 《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第5卷第919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3。——译者注



经济价值和军事价值的地方。芬兰政府拒绝了这样的交换。

斯大林由于有与希特勒的秘密约定，于是决定利用这一点，把国界从列宁格勒推移到更远处，更何况伏罗希洛夫要斯大林相信，一旦发生军事冲突，红军几天之中就能收拾掉芬兰军队。

1939年秋天召开总军事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对芬兰的军事行动计划。这个计划是由总参谋长鲍·米·沙波什尼科夫领导制定的。沙波什尼科夫了解芬兰边界上筑垒地带的性质，在计划中考虑了由于必须突破芬兰筑垒地带必然产生的实际困难，因此计划调动大批军队。斯大林受伏罗希洛夫关于胜利轻而易举的想法的影响，严厉批评了这一计划，并责成列宁格勒军区司令部制定新的计划。这样的计划制订出来了，依据的是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的看法，即战争打了不多久，我们流血不多就能取胜。因此计划甚至没有规定要集中必要的预备队。

以为战争将在几天之内结束的信念十分强烈，以致关于战争爆发的消息连总参谋长都不告知，因为沙波什尼科夫这时正在休假。

芬兰政府公开向德国求救，芬兰公使武奥里马给德国外交部长的信表明了这一点。他写道：“有根据认为，俄国有意向芬兰提出类似于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提出的要求。”并问道：“德国对俄国在这一地区的推进是否仍无动于衷，如果可以证明并非如此的话，那么德国打算采取什么立场？”

我们已经知道德国在这种情况下是如何表现的。

苏方根据既定计划寻找挑起军事冲突的借口。11月26日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约请芬兰公使伊里耶·科斯基宁去他那里，交给他苏联政府的照会，指责集结在卡累利阿地峡的芬兰部队挑衅性地向苏军射击。

请看这个照会（略有删节）是这样说的：

“公使先生：

据红军总参谋部报告，今天，即11月26日，15时45分我驻卡累利阿地峡苏芬边界迈尼洛村附近的部队突然遭到来自芬兰境内的炮火袭击。共发射7炮，打死3名列兵和1名下级军官，打伤7名列兵和2名指挥官。苏军因有关于不回应挑衅的严格命令，未曾回击……苏联政府不得不认为芬兰部队在列宁格勒附近集结不仅对列宁格勒构成威胁，而且实际上是针对苏联的导致进攻苏军、造成伤亡的敌对行动。

有鉴于此，苏联政府在坚决抗议这一事件的同时，建议芬兰政府立即把本国部队从卡累利阿地峡的边界线调开，后撤20~25公里，从而防止挑衅行为再次发生。

公使先生，此致
崇高的敬意！

外交人民委员
维·莫洛托夫
1939年11月26日”

把在卡累利阿地峡上的部队后撤20~25公里，这意味着在出现入侵的现实威胁（芬兰政府无疑有关于苏军集结的情报）时放弃曼纳林防线强大的筑垒地带。很难期待芬兰（任何其他国家都一样）会作出这种自杀式的同意。

11月29日芬兰政府作出了回答。下面是这份照会的片断：

“芬兰政府对破坏边界一事作了紧急调查。调查确认来信提及的炮击并非来自芬兰一方。相反，调查材料表明，上述炮击是苏联时间11月26日15时45分至16时06分从来信提到的迈尼洛村附近苏方边界线一侧发出的。”

照会还建议，苏联边防部队政治委员会同芬兰军官一起就地根据弹坑和其他材料认定遭到炮击的正是他们的领土。照会接着说，芬兰同意后撤部队，但应双方同时后撤。

基·阿·梅列茨科夫元帅在回忆录中写道：

“1939年6月底斯大林召见了。我在他的办公室里遇到了共产国际工作人员、著名的联共（布）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奥·威·库西宁……他给我详细地谈了总的政治形势和我国领导人对芬兰政府反苏路线的担心……”

基·阿·梅列茨科夫接着阐述了那个著名的观点，即芬兰“很容易成为两个主要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集团（德国集团和英法美集团）中任何一方反苏行动的桥头堡”，从而可能变为“被唆使对我们发动一场大战的人”。因此他建议梅列茨科夫起草一份报告，并提出“一旦芬兰一方进行军事挑衅时，保卫边界、防止芬兰武装力量侵略并给予反击的计划”。

如此看来，斯大林只告诉了梅列茨科夫芬兰一方可能进行侵略，却不提小小的芬兰很少有可能进攻苏联这样的巨人，显然掩盖了他本人打

算首先实施突击的意图。因此他在建议梅列茨科夫起草关于保护边界不受侵略和反击可能的侵略行为的报告的同时，看来还是下令部队作好战斗行动的准备——秘密地、不引起周围人的怀疑。

梅列茨科夫接着写道：

“7月下半月，我又一次应召去莫斯科。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听取了 my 报告。他们批准了关于芬兰进攻苏联时保卫边界和对芬兰反击的计划，建议要在尽短的时间内实施反击。当我说到集结的力量对于如此规模的战役不够时，他们对我说，我不应只从列宁格勒军区的条件出发，而应该估计到整个苏联的力量。我试图再发表一个不同意见，即其他国家也可能和芬兰一起参加反苏的挑衅行动。他们回答我说，考虑这个问题的不光是我一个人，他们要我在初秋再次报告如何实施防御措施计划。”

梅列茨科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似乎还有其他的反突击方案。斯大林不是把它们都拿到总军事委员会一起讨论，而是同一批人分别研究，而每一次参加研究的人都不同。”这些方案中有一个是上面提到的沙波什尼科夫的计划。

梅列茨科夫证实说：“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认为对芬兰实施反突击并不简单，在帝国主义大国没有直接卷入冲突的条件下也需要好几个月紧张而艰难地作战。”

于是在曼纳林事件发生后，经过苏联和芬兰交换照会，11月30日上午8时红军部队转入进攻。

苏芬战争中还有一个细节。承认这一点当然不是滋味，因为这类事实不会给苏联历史增添光彩，但真理高于一切。

1939年11月30日，在作战行动开始当天，《真理报》发表消息说，据“无线电截听”得知，芬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芬兰人民发出呼吁，号召成立左派力量的政府。

1939年12月1日，在苏军占领的芬兰的一个小地方泰里约基成立了以芬兰共产党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奥·威·库西宁为首的这样的政府（也是据“无线电截听”得知）。这个政府宣布自己是芬兰民主共和国临时人民政府。

同一天苏联政府承认库西宁政府，同芬兰民主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12月2日苏联和芬兰民主共和国签订了互助友好条约。

所谓“无线电截听”之说是用来制造苏联领导人与成立库西宁政府无关的假象的。

但是……“芬兰政府”文件的副本（苏联外交档案馆保存）揭开了这个烟幕。这些文件都经过莫洛托夫亲手修改和校订，这表明这些文件在“无线电截听”之前就放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桌子上。

对此作任何说明都是多余的。

我方统帅部在苏芬边界全线集中了四个集团军对付芬兰。在主要方向即卡累利阿地峡的是第7集团军，共七个步兵师，一个坦克军，三个坦克旅，加上大量炮兵和空军。波罗的海舰队也支援第7集团军。

苏联统帅部面对漫长的战线（整个苏芬边界），掌握着四个集团军，认为最明智的做法是打击坚固的、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坚固的工事——曼纳林防线。在12天进攻中，到12月12日，军队克服了巨大的困难，付出了惨重的伤亡，只攻占了一条强大的保障地带，没能在进攻中插入曼纳林防线的主要阵地。军队损兵折将，不能继续进攻。

在北方，第14集团军深入芬兰领土150~200公里，在它的左侧第9集团军插入45公里的纵深地带，而第8集团军深入50~80公里。

芬兰军队虽然力量大大不如苏军，但在巨大的爱国主义热潮的鼓舞下，芬兰顽强而成功地进行抵抗。它使苏联部队遭到巨大损失。

世界舆论强烈反对苏联的行动。国际联盟开除苏联并号召世界各国支援芬兰；英法政府的一些人指望这场冲突能发展为大战；德国支援芬兰，也许希特勒甚至认为这是打击苏联的合适时机。

苏联统帅部震惊于小国出乎意料地顽强抵抗，不得不停止作战行动，在卡累利阿地峡再组建一个新的集团军并成立由一级集团军级谢·康·铁木辛哥，军事委员会委员安·亚·日丹诺夫，参谋长、二级集团军级И.В.斯莫罗季诺夫指挥的西北方面军。因此，在卡累利阿地峡的军事力量除得到了补充的第9集团军各师之外，又加上了包括9个师、大量炮兵和坦克的第13集团军。

新成立的西北方面军司令部仍然没有掌握更灵活的军事艺术方式，继续正面进攻曼纳林防线。两个集团军相邻的翼侧实施主要突击。据参加战斗的人说，在卡累利阿地峡炮兵多得连安放火炮的地方都不够了，火炮几乎紧紧挨在一起。差不多苏联所有的炮兵都集中在这里，对主要方向实施突击。

在新一轮进攻中血肉横飞的三天战斗之后，苏军伤亡惨重，突破了曼纳林防线的第一道防御地带，但未能插入第二道防御地带。

减员的各师在得到了补充后，又开始为下一轮突击作准备。2月11日苏联部队恢复进攻，司令部终于利用机会从封冻的维堡湾的冰面上包抄敌军的右翼。我军进入维堡筑垒地区的后方，切断了维堡—赫尔辛基的公路。到3月12日曼纳林防线全线被突破。



在这场十分艰苦、血流成河和红军最不光彩的战争结束后，1940年3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伏罗希洛夫在会上作了对芬战争的总结。这次会议建议召开有战争参加者出席的总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建议被实施了。1940年4月14~17日，总军事委员会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会议，斯大林在会上讲了话。他谈到指挥人员务必研究当代战争的特点，盲目崇拜国内战争的经验会妨碍我军指挥人员进行改革。

总军事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改进装备和供应、总结战斗经验的一系列决定和加强红军战斗力的其他措施。

斯大林在苏芬战争结束和总军事委员会分析战争结果后，确信苏军力量薄弱，它的指挥人员素质不高，装备陈旧，这样的军队无法抵抗希特勒的军队。

此外还要提一下斯大林还洞察了另一个问题。他确信他最亲密的战友、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在军事上已经落后，很不在行，需要找人来代替他。突破曼纳林防线是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的功劳，他被授予苏联英雄和苏联元帅的称号。

如果考虑到芬兰人口只有300多万，而红军当时大致也有这么多人，而且苏军损失惨重，可以说这是一场皮洛士的胜利^①。

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说：

“对芬战争表明我们在培养高级指挥干部方面的弱点和部队纪律性大幅下降，而这一切都是在伏罗希洛夫同志领导下发生的。现在他很难在短期内改正这些重大问题，而时不我待，因为希特勒在欧洲已经发动了战争。我建议用另一个人取代伏罗希洛夫同志，因此任命铁木辛哥同志为国防人民委员。”

铁木辛哥开始表示拒绝，推说他没有必要的能力和担任如此高级负责职务的睿智。他还谈到他不配取代伏罗希洛夫同志，因为不仅军队，而且全体人民都熟悉和热爱伏罗希洛夫。

斯大林说：“说得都对。但人民不知道，伏罗希洛夫同志不够果断。而现在处理一切事情都格外需要果断，而您果断。我们要首先抓纪律，抓干部培养，至于治国睿智，这是可以努力做到的。需要时我们会帮助您。”

于是谢·康·铁木辛哥被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而伏罗希洛夫担任了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这个地位很高的职务。

由于本书提到铁木辛哥的地方相当多，这里介绍一下他的简历：

^① 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于公元前280年率兵同罗马交战，付出了惨重伤亡后取得胜利，后人称之为“皮洛士的胜利”，即得不偿失的胜利。——译者注

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生于1895年，45岁时被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开始从军经历。1915年他被征召加入沙皇军队，毕业于机枪学校，参加了西方面军的战斗，从革命一开始起他就手执武器保卫革命。1917年他参与平息科尔尼洛夫叛乱，后来又参与镇压卡列金叛乱，还参加过保卫察里津的战斗。他先后担任过排长、连长、团长等职务，1919年10月起任布琼尼骑兵第1集团军骑兵第6师师长，被授予两枚红旗勋章。从1925年起任骑兵第3军军长。

他没有受过坚实的教育，只是1922年和1927年毕业于高级速成班，1930年毕业于列宁政治学院一长制指挥员训练班。先后担任基辅军区、北高加索军区和哈尔科夫军区司令。1939年9月任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完成了对西乌克兰的进军。

朱可夫在与康·米·西蒙诺夫的一次谈话中对铁木辛哥作了如下评价：

“有些著作对铁木辛哥的评价是完全错误的，把他说成是没有魄力、巴结斯大林的人。这是胡说。铁木辛哥是老资格的经验丰富的军人，他意志坚定，性格刚强，既有战术素养又有战役素养。总之，他当人民委员要比伏罗希洛夫强得多，在他不长的任职期间，军队的某些工作比以前有了改进。”

我再谈一点这场失败的战争造成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心理后果，大概不会谈错。如上面所说，斯大林发现红军准备程度低下后，不得不与希特勒德国接近，并作出某些让步，而这时希特勒德国已表明他能闪击式地摧毁十分强大的敌人。斯大林需要时间来克服本国军队的弱点。

总结一下。斯大林对保证列宁格勒安全的战略考虑是有道理的，但缺乏远见的将领们在实施这一意图时采取的具体措施十分笨拙，他们在敌人兵力和本国军队潜力上误导斯大林。对芬兰战争是斯大林军事活动中的一个失败。但这场战争有助于发现许多缺点，这些缺点后来被及时克服了。

四 欧洲战争

(法国战败：1940年5~6月。英德战争)

德国占领波兰后，希特勒面临的问题是进攻苏联还是先击败法国和英国。如果希特勒挥师向东，攻占他公开谈到过的十分重要的地区，那德国将得到加强，英法无法与之对抗。英法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很可能会在西线发动一场真正的而不是“奇怪的”战争，即战争会在两条战



线爆发，而这样的局面是德国所有的战略家都害怕的，他们都提醒元首要防止这种局面的出现。因此起码的逻辑告诉希特勒，应该先清除西线的敌人。但法国与希特勒1939年前轻而易举地侵占的其他欧洲国家不同。德国过去与法国打了许多年的仗，而且势均力敌，有时法国武装力量取胜，有时德国武装力量取胜。法国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对手，而且它有着英国这样强大的盟国。

到1939年10月9日，希特勒的大本营制定了《西线作战备忘录和指导性指示》。这个绝密文件希特勒起先只给了四个人，即武装力量的三军总司令和最高统帅部的参谋长。这一“备忘录”分析了一旦德国进攻法国，各欧洲国家可能作出的反应，阐述了对法军事行动的方案。方案基本意图是经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领土，绕过法国在法德边境上修筑的永备防线，以避免重大伤亡和持久作战。然后坦克和机械化部队迅速突击，插入法国领土，首先摧毁敌人抵抗的意志，包围并消灭法军主力 and 英国远征部队。

总参谋部和总司令们根据希特勒的指示开始制定作战计划，其结果是采纳了代号为“黄色”的入侵法国的最后计划。

1940年5月10日，德国法西斯军队经荷兰和比利时领土从翼侧迂回法国马奇诺防线发动进攻，依靠空降兵占领了许多重要地区、机场和桥梁。5月14日荷兰军队投降，比利时部队后撤至马斯河，英法部队也向这一地区推进。但德军突破了盟军的薄弱防线，于5月20日直抵河边。克莱斯特的坦克集群起了特殊的作用，把盟军挤压到海边。在这里进行了惨烈的敦刻尔克战役，英法联军伤亡惨重，被迫撤退。

希特勒匪徒迅速变更军队部署，6月5日发动第二个进攻战役——“罗特”战役，共140个师参加了这个战役，这一战役的任务是击败法国武装力量，使法国彻底退出战争。

法国政府和司令部士气低落，6月14日根据魏刚的命令不经战斗即放弃了巴黎。希特勒军队未遇阻拦便长驱直入。6月17日贝当元帅取代完全束手无策的政府，马上向德军司令部请求停战。

希特勒为取得的胜利踌躇满志，他希望法国在1919年6月18日签署凡尔赛和约的那节车厢里签署投降书。车厢找到了，收拾一新后被拉到康边森林中1919年它停留过的老地方，1940年6月22日在这里签署了投降书。

因此，从5月10日至6月22日，44天内法国军队及其盟军——英、荷、比的军队——被击败。

盟军司令部没有组织起抵抗，虽然它拥有用于积极防御的足够兵力。德方实施“黄色”战役的有140个师、2580辆坦克、3824架飞

机、7 378 门火炮，而盟军共有 147 个师，其中有 230 个坦克师和机械化师、3 100 辆坦克、3 800 架战斗机和超过 14 500 门火炮。不难发现，盟军的兵力超过希特勒德国的兵力。

依我看，法军速败的原因法国人自己说得最准确。戴高乐关于这一点是这样说的：

“……指挥骨干没有得到政府有步骤有计划的领导，完全墨守成规。军队中占统治地位的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持有的观念。军队领导人年迈体弱，依然抱着过时的观点不放，更使这种状况加剧……阵地战的思想构成了指导未来战争的战略基础。这一思想决定了部队的组织、训练、装备和整个军事学说。”

因此，造成法军和盟国军队速败的不仅是德军的力量及其将领的才能，也是盟国司令部及其军队本身的无能。至于德国进攻法国的计划，它并不是军事学术中的新发明，只是坦克集团的强大突击使这次进攻有别于德军在其他对法战争中的行动。例如，曼施泰因关于这个计划是这样说的：

“战役意图基本上与 1914 年著名的施利芬计划相似。我感到相当沉重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竟想不出什么新东西，只能重弹老调，哪怕这出自于施利芬这种人的手中。如果从保险柜中取出敌人已经跟我们在一起仔细琢磨过一次、他们已为再次使用作好了准备的军事计划的话，能会有什么结果呢。”

“B”集团军群司令冯·博克上将也对“黄色”计划中许多冒险的论点感到忧心忡忡。他甚至为此在 1940 年 4 月给陆军司令冯·布劳希奇上将写了正式报告。这个报告是这样考虑的：

“您的作战计划使我感到不安。您知道，我主张大胆作战，但现在这只能说已超过了理智的界限：突击一翼在离马奇诺防线 15 公里处越过防线挺进，却以为法国人会对此无动于衷！您把大量坦克集中在崎岖不平的阿登高原的几条路上，仿佛不存在空军！……您指望在绵延 300 公里的南翼不设防的情况下实施战役，打到海边，而法国军队在这里驻有大批兵力！要是法国人故意让我们分批渡过马斯河，然后用主力对我们南翼反攻，您该怎么办……您在孤注一掷！”

的确，如果以法国司令部为首的盟国军队哪怕能如冯·博克所预见的那样去做的话，德国对法国的进攻也会受挫。但如上面所说，法英军队司令部不能用他们掌握的大量兵力组织起抵抗。

我要强调指出，上面所提到的行动都是我国军事领导人亲眼所见，可是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得出应有的结论，没有组织培训高级指挥人员和红军部队来对抗希特勒军队的这种战术。

* * *

希特勒及其战略家们在法国惨败后期待英国也会签订停战协定，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英国在继续作战。因此希特勒开始寻找解决英国问题的办法。在法、英和苏联这一串国家中，德国如我们所知最后要对付苏联了。法国已失败，如果英国保持中立的话，就可以实现主要的目标——占领东方的广大地区，换句话说，对苏联开战。

希特勒领导集团通过政治阴谋和压力寻找使英国退出游戏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成功。关于这个问题有过许多议论，开过许多会议，提出过各种方案，希特勒最终倾向于约德尔将军的意见。后者在1940年6月30日写的备忘录《今后对英作战的意见》中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最合适的能保证取胜的战略方案是：

- ① 围攻——用海军和空军阻止英国进出口货物，打击英国空军和英国军事经济实力资源。
- ② 对英国城市进行造成恐慌的空袭。
- ③ 登陆兵登陆，占领英国。

他认为只有在德国空军完全夺得制空权和搞乱了英国经济生活后才能入侵英国。登陆英国被看作是最后的致命一击。但是希特勒甚至在下令制定这一被称作“海狮”的战役计划时，还没有失去对与英国妥协媾和的希望。但是，希特勒匪徒尽管在政治上外交上作了许多努力，“第五纵队”活动频繁，使用了种种宣传伎俩，却仍未能与英国达成停战协定。6月4日和18日丘吉尔在下议院声明，英国将把战争进行到底，即使只剩下它一个国家也在所不惜。现在希特勒司令部只能用武力对付英国了。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在衡量了各种入侵英国的方案后做了大量的、可以说是研究性的工作。大家都清楚，这件事不简单，要如此前在陆地战场上那样取得闪击式胜利，未必会成功。

希特勒1940年7月16日在举行多次会议反复考虑后签署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第16号指令《关于部队登陆英国战役的准备工作》。指令说：

“由于英国无视其军事态势无望，仍未表现出任何愿意相互理

解的迹象，我决定为登陆英国战役作准备，如有必要就付诸实施。这一战役的目的是清除英国本土这个继续对德作战的基地，如果必要，则完全加以占领。”

如我们所见，连这个总方针中也没有在陆地战场行动时指令那么坚决明确：“如有必要就付诸实施”、“如果必要……”以及许许多多这一类的“如果”。

“海狮”战役的准备工作拟于8月中旬结束。希特勒及总参谋部对此前的军事行动都作了精心考虑，而这一回，到已经下令准备作战时希特勒还没有任何确定不移的计划，因此他征求他的军事战略家们的看法。起初希特勒支持约德尔6月30日备忘录谈的想法，并且试图付诸实施。同时希特勒还是期待英国会签订和约。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本人和他的许多顾问都指望通过海空封锁来使英国屈服。但不久希特勒得出结论，通过潜艇战和空中封锁取得决定性胜利至少得花上一两年时间，而这绝对不符合他的速胜论。失去时间对德国不利，这一点希特勒很清楚。

5月中旬柏林因希特勒纳粹党领导层中的第一副手鲁道夫·赫斯突然飞往英国的消息而闹翻了天。赫斯5月10日亲自驾驶“梅塞施米特-100”飞机从奥格斯堡（德国南部）起飞，飞往多恩盖弗卡斯尔——他认识的汉密尔顿勋爵的苏格兰领地。但是赫斯计算燃料失误，离目的地还有14公里就跳伞，被当地农民逮住交给当局。英国政府对这一事件好几天保持沉默，柏林也对此不作任何报道。直到英国政府公布了这个消息，德国政府才明白赫斯承担的秘密使命失败了。于是希特勒在贝格霍夫的大本营才决定告诉世人，把赫斯之行说成是他精神错乱的表现。关于“赫斯事件”的正式公报说：

“党员赫斯看来精神错乱，以为靠他的个人行动仍能取得德英的相互理解。”

希特勒明白，赫斯之行失败给他和他的政府造成的精神损失有多大。他为了消灭痕迹，下令逮捕了赫斯的亲信，撤销了赫斯的一切职务，并下令赫斯一旦回国即予枪决。当时还任命马丁·博尔曼为希特勒在纳粹党中的副手。但是希特勒分子无疑对赫斯之行寄予过很大的期望，希特勒以为他能将德国的敌人首先是英国拉到反苏进军中去。

从纽伦堡审判文件和希特勒德国战败后公布的其他材料中可以知道，从1940年夏天起赫斯就和英国重要的慕尼黑分子保持通信联系。

帮助他维持这一通信联系的是温莎公爵——前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他由于爱上了一个离了婚的美国妇女而不得不放弃王位。当时他居住在西班牙。赫斯利用自己的联系，预先讲好了他要访问英国。（很说明问题的是，迄今关于他英国之行的文件尚未解密。）

希特勒司令部很不愿意直接入侵英国，但在赫斯之行失败后直接入侵成了解决问题的惟一手段。

但是在研究各种入侵方案时，海军总司令部得出结论，认为当年不应进行这一战役，而再过一年，也只有在德国空军夺取制空权后它才能使必要数量的部队登陆。

此外，希特勒还得到报告说，对英作战的军事工业准备需要好几年时间，如果考虑到为了即将进行的远征东方，陆军必须进一步发展的话，这一准备工作是德国无法胜任的。

希特勒明白，他无法实施“海狮”战役，他几次变动实施这一战役的时间反映了他的犹豫不决。

6月30日希特勒终于作出决定进行德国空军对英国大轰炸的准备工作。希特勒在8月1日的第17号指令中说：“为了为彻底击败英国创造前提，我准备以比迄今为止更激烈的形式进行对英的海空作战。为此我命令：德国空军以其所掌握的一切手段尽快击败英国空军。”

8月2日的指令要求德国空军在四天中夺得英国南部的制空权。在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希特勒闪击式地实施自己计划的意图。但是天有不测风云，由于气象条件恶劣，直到月中才开始了全面的空战。8月15日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密集袭击，共有801架轰炸机和1149架歼击机参加。

希特勒领导部门除了轰炸还对英国人发动了最大规模的宣传攻势，指望不仅通过轰炸，而且通过德国即将入侵英国的威胁来使英国居民丧失斗志，从而迫使英国人签订和约。

从9月5日起德国空军格外重视对伦敦的轰炸，这也不仅是炸弹的压力，而且还是心理的压力。但希特勒匪徒始终没有取得制空权，也没能摧毁英国的士气。9月14日希特勒在大本营总司令会议上沮丧地表示：“尽管取得了不少胜利，但进行‘海狮’战役的前提条件尚不具备。”

希特勒匪徒低估了英国的歼击航空兵，德国空军在空袭中损失惨重。因此，1940年9月就已可以看出，和约没有签成，海上封锁德国又力不能及，对英国全面的空中进攻失败了。

只有多次讨论过的所谓的周边战略还没有尝试过。1940年8月12日，希特勒下令把坦克部队投入北非进攻苏伊士运河。地中海阵地对于

英国来说当然意义重大，英国通过这里与印度、远东、澳大利亚、东非和北非保持联系。苏伊士运河起了重要的战略交通线的作用，英国军队通过这条运河获得供应，近东的石油供应也取道于此。因此失去地中海交通线是对英国的严重打击。

1941年2月12日，隆美尔军团登陆非洲海岸。4月德国占领希腊。希特勒还打算占领直布罗陀，从西班牙派遣军队去那里，但佛朗哥持观望态度，不愿卷入与大国的斗争。希特勒向墨索里尼建议派一个坦克军去利比亚支援意大利部队，但这位领袖也迟迟不作答复，最后很不情愿地才表示了同意。

在巴尔干和地中海地区的所有这一切行动的目的不仅是削弱英国，而且还是对希特勒及其总参谋部策划的最主要、最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即进攻苏联的准备工作的掩护。希特勒明白，现在欧洲已经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建立或组织开辟反德国的第二战场的同盟，而海峡对面的英国在这一点上也不构成现实威胁。现在希特勒有了安定的后方（过去德国统帅们梦寐以求的愿望），他已经放开了手脚。希特勒总参谋部用准备实施“海狮”战役的消息吓唬英国，而主要的是用虚拟情报迷惑整个欧洲首先是苏联，与此同时开始制订“巴巴罗萨”计划。

1940年6月30日，在法国停火后的第五天，哈尔德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主要注意东方……”这位总参谋长把日记放在私人保险柜里，绝对相信，永远也不会有人来翻看他的日记，因此可以把他的日记看作十分真实可信的文件。这段话是当时的最大秘密之一，表明了希特勒的真实计划，他当然同总参谋长谈过这样的计划。凯特尔将军在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7月2日《关于开始计划对英登陆战役》的命令中也写道：“进行一切准备工作时应考虑到，入侵本身只是一个计划，而入侵的决定尚未作出。”

关于“海狮”战役的一切措施都变成了掩盖侵略苏联准备工作的幌子。这一伪装做得很能迷惑人，因为登陆计划不断在制定、修改之中，一直在议论横渡拉芒什海峡，好像真的就要进行了。只有很少几个人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假象。为了更迷惑人，希特勒在海岸地区甚至进行了以下的活动（引自B.克赖佩的回忆录）：“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港口里塞满了各种舰艇。不断进行登陆兵上船和登陆的操练。为了这些操练，集中了德国无数军舰和潜艇以及掩护这些操练的炮兵和空军。”

上面说的侵略苏联的计划当时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秘密。但希特勒及其总参谋部实施主要意图的行动贯彻始终，因此斯大林对此无须加以猜测。可以说希特勒在他用世界各种语言出版和一再再版的《我的奋斗》一书中阐述了他一生的主要目的。书中是这样说的：“如果我们今

天谈论欧洲的新土地和新领土的话，那么我们首先就会把目光投向俄罗斯以及与之相邻、从属于它的各国……东方这片广袤的地区该毁灭了……我们被命运选择来目击这场大灾难，它将最有分量地证明种族理论正确无比。”

五 清除托洛茨基

著名的苏联情报员和反间谍工作者帕维尔·阿纳托利耶维奇·苏多普拉托夫在他的书《情报工作和克里姆林宫》中详细谈到了关于这件事的真相，他给我读了这本书的校样，在出版后又签名赠我。

关于苏多普拉托夫可以谈得很多很久，对他的遭遇感兴趣的人可以读一读这本《情报工作和克里姆林宫》。书中阐述了策划和实施清除托洛茨基的一切细节。我转述这些材料，因为任何人都不会比直接组织这一危险复杂行动的人更清楚各种详情。

我坚持为本书寻找和利用最确凿可靠的资料来源，而不是仅仅满足于苏多普拉托夫的叙述，于是我亲自去了墨西哥科约阿坎。我详细地参观了托洛茨基的别墅，进了每一个房间，拍摄了许多照片。

我在本书中收入关于清除托洛茨基的这一章，不是为了用惊险复杂的情节来引人入胜，而是因为托洛茨基一生的结局是他和斯大林之间多年来争夺权力斗争的终结。

斯大林在这场决斗中取胜了。他也是这一复杂行动的组织者，因此不能对未来的大元师生平中这一重大事件避而不提，不加叙述。

我认为有必要强调指出我认为十分重要的一点，请读者加以注意。清除托洛茨基不是今天有人说的斯大林报复性重和嗜血成性的结果。必须采取这一行动是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未来爆发战争时托洛茨基可能积极参与的前景决定的。

托洛茨基在离开苏联后一度在土耳其、挪威和法国居住过。他组建了第四国际并在国外积极开展分裂共产主义运动、控制共产国际的活动，最主要的是，他继续领导和左右苏联国内反对派的反苏活动，尤其是消灭斯大林及其志同道合者的活动。1937年轰动一时的政治审判揭露了托洛茨基是一切地下反苏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托洛茨基在此之后担心斯大林的报复，决定远走高飞，到更安全的地方去。1937年他在墨西哥首都近郊的科约阿坎定居，他在这里买了一幢别墅，继续领导涉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治斗争。

他的儿子，随母亲姓的列夫·谢多夫指导托洛茨基分子在欧洲的活动。他不仅进行反苏宣传，而且与德国情报机构、盖世太保积极合作。

一切都在紧张地进行之中，国外的托洛茨基分子为希特勒的阿伯韦尔^①和盖世太保的招募工作推荐自己在苏联的同伙。请看如下一个例子（摘自1938年公开审判的速记记录）：

“切尔诺夫：我告诉（李可夫）我去德国，问他有没有什么任务。李可夫知道我是老孟什维克，问我在德国能不能见到唐恩^②，同他建立联系并代表右派中心给他布置任务。我回答李可夫说，我有这种可能，我认为我提到过的孟什维克党的一个同志基布里克在这方面可以向我提供帮助。于是李可夫要我与唐恩建立联系并代表右派中心给他布置任务。

维辛斯基：什么任务？

切尔诺夫：我忘了说，在我这次同李可夫谈话时托姆斯基也在场。任务是：通过第二国际各党制造资本主义各国反对苏联政府的舆论，通过第二国际的领袖们争取资产阶级政府强化对苏联的敌视态度，取得第二国际以及通过第二国际领导人取得资产阶级政府在右派夺得国内政权时给予支持的保证。关于这一点我对李可夫说，只向唐恩布置这些任务还不够。唐恩无疑要问右派组织的力量有多大，右派组织在掌权后将怎么办。对此李可夫说：‘您要让唐恩相信，我们在国内有足够的力量推翻现行政权并夺取这一政权。’他还特别指出，我们拥有这些力量，包括著名的负责的军事干部在内。其次，他指出，我可以告诉唐恩，右派掌权后建立政府时将考虑第二国际和资产阶级政府的要求，并同资产阶级政府在经济问题上、必要时也在领土问题上达成协议。

维辛斯基：被告李可夫，在切尔诺夫去柏林前您见过他吗？

李可夫：见过。

维辛斯基：您同切尔诺夫谈话时托姆斯基在场吗？还是你们单独谈的？

李可夫：托姆斯基在场。

维辛斯基：您交代切尔诺夫要在柏林与唐恩建立联系吗？

李可夫：是的。

切尔诺夫：我抵达柏林后给基布里克打了电话，我们约定在‘法特兰’饭店巴伐利亚厅见面。我就在那里见到了他。

维辛斯基：见到了吗？

① 法西斯德国的侦察和反侦察机构。——译者注

② 唐恩是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本书作者注



切尔诺夫：是的，我现在来详细谈谈。我们约定由基布里克安排我会见唐恩，我们见面了。我向唐恩转达了由李可夫代表右派中心下达的任务……唐恩在我提到过的基布里克家中谈过话后就走了，我和基布里克一起吃了晚饭。晚饭后我本该去火车站，但在吃晚饭时我们喝多了。基布里克推说特别忙，不能送我去火车站，他把我送上公共汽车，我就动身返回柯尼施泰因。

维辛斯基：到了火车站吗？

切尔诺夫：没有，没有去成，去了警察总监公署。在我乘坐的公共汽车上有几个德国人缠住了我。其中一个人推了我一下，我也推了他一下……我在警察总监公署提出抗议并要求释放我。他们对我说我得呆到早上等长官来。我在那里过了一夜。早上来了一个官员，他俄文说得很流利，我马上向他提出了抗议。他说他得向上司报告。过了一段时间又来了一个人，他自称是奥别尔蒙兹上校。他取出了一份记录，给我作了翻译，说我应为把德国人打残废了表示歉意，我为此应负刑事责任，此外，他对我说，这份记录的副本将送给我国全权代表处，他又立即要我为德国保安处、德国情报机关干事。我拒绝了。于是奥别尔蒙兹说，我知道您在德国干的事情。我问我干了什么，他回答说，您会见了唐恩。他还给我看了几张我在柯尼施泰因和柏林同唐恩见面时的照片。此外，他还简单转述了同唐恩谈话的内容。

维辛斯基：谁同唐恩的谈话？

切尔诺夫：我同唐恩的谈话。而且他在转述中明确地重复了唐恩说过的话。这时我才恍然大悟，组织在德国抓我的德国情报机关得到了唐恩本人的完全协助和参与，唐恩本人无疑是德国情报机关的间谍，基布里克同样如此……

维辛斯基：这么说，警察局的官员能够从唐恩那里了解到谈话的内容？

切尔诺夫：是的，是的，否则他转述不了。我在这之后表示同意并成了德国间谍。

维辛斯基：这么说，您自己也成了间谍？

切尔诺夫：是的。之后开始办手续——填履历表，签字。奥别尔蒙兹指导我如何在苏联为德国工作。而且他发现我很激动时说：您不必激动。您为反对苏维埃政权而斗争，我们也为反对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不久我们的斗争方式大概也会是一样的。

维辛斯基：您同德国情报部门的合作表现在哪些方面？

切尔诺夫：我担任……我记不清了……副商业人民委员还是商

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接着切尔诺夫详细交代了他从事的间谍活动。

许多托洛茨基分子除了间谍活动，还根据国外的指示和自己的策略实施恐怖行动。李可夫说“右派托洛茨基联盟”转而采取恐怖手段的原因是：“右派反革命组织具有秘密的密谋性质，在失去了通过其他途径掌握政权的希望后，中心认为，采取恐怖行动和发动‘宫廷政变’有一定的希望。”

布哈林在接受侦查时承认早在1932年“右派托洛茨基联盟”就走上了恐怖活动的道路，他供认说：

“1932年我在同皮达可夫见面和谈话时了解到，他见过列·谢多夫（托洛茨基的儿子。——本书作者注）并从谢多夫那里得到了托洛茨基关于对党和苏维埃政权领导人实施恐怖行动的直接指令。我还应该承认，其实我们当时就与恐怖分子谈妥了，我同皮达可夫的谈话就是协调我们与托洛茨基强行推翻党和苏维埃政权领导人的行动的协议。”

密谋集团遵照这方面已作出的决定，根据托洛茨基的指令广泛开展了组织恐怖活动小组和实际准备实施针对联共（布）和苏联政府领导人恐怖行动的工作。

李可夫就此供认说：

“这时我们已经把恐怖活动当作我们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方式之一……我们的这一立场表现在我们的具体活动中，尤其是表现在我策划针对政治局委员、党和政府领导人，首先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的恐怖行动的活动中。1934年我给我建立的阿尔乔缅科恐怖活动小组布置任务，要他们监视党和政府领导人乘坐的汽车。”

侦查部门查明，1934年12月1日由列宁格勒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活动中心杀害谢·米·基洛夫的行动也是根据“右派托洛茨基联盟”的决定实施的。

斯大林考虑到托洛茨基分子活动日益猖獗并采取恐怖手段，决定对国外的托洛茨基组织也进行打击。他责成贝利亚制定清除托洛茨基的计划并挑选执行人。

下面是苏多普拉托夫谈斯大林接见他的情景：

“斯大林在听对话者说话时聚精会神、全神贯注、心态平和，他仔细考虑他听到的每一个词。斯大林非常专注地听取了贝利亚的看法。贝利亚认为，国外的左翼运动由于托洛茨基分子控制这一运动的图谋而处于严重混乱之中。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从而向苏联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他们力图剥夺苏联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导者的地位。贝利亚建议对国外托洛茨基运动的中心实施坚决打击，任命我负责这一行动。我的任务是利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切条件清除托洛茨基。沉默了一阵，斯大林接着说：

‘托洛茨基运动中除了托洛茨基本人外没有什么重要的政治人物。如果收拾掉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威胁就将解除了。’

斯大林开始不慌不忙地谈他对情报活动的不满。他认为，情报活动缺乏应有的积极性。他强调指出，1937年曾责成施皮格尔格拉斯清除托洛茨基，但他把这个重要的政府任务搞糟了。

然后斯大林变得严厉起来，他仿佛下达命令似地一词一句地说：

‘在一年之中，在不可避免的战争爆发之前，应该清除掉托洛茨基。如西班牙经验表明的那样，托洛茨基不清除掉，一旦帝国主义者进攻苏联，我们对我们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盟友的支援就没有把握。他们很难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来骚扰敌人的后方，开展游击战。’

斯大林在对国际形势和即将爆发的欧洲战争作了评价后，转而谈到与我直接有关的问题。我应该领导一个清除这时正流亡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行动的战斗小组。

我请求批准吸收西班牙内战时搞破坏活动的老战士参加这一行动。

‘这是您的责任和党的义务——找到和选拔合适可靠的人员来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您将得到一切帮助和支援。请直接向贝利亚同志报告，对其他任何人都不要说。有关行动的报告只用手写的形式呈报。’

接见结束了，我们告别后走出了办公室。

贝利亚说：

‘埃廷贡是合适的人选，今天晚上我等你们两个人，给你们谈一些建议。’

我对埃廷贡谈了这次墨西哥行动的意图……



我起初的计划是利用埃廷贡在西欧特别是在西班牙托洛茨基分子中招募的间谍。根据我们的计划必须建立两个独立小组。第一个小组‘马’由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领导，他是墨西哥画家，又是西班牙内战的老战士，斯大林本人也认识他。他已移居墨西哥，成了墨西哥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另一个小组即所谓的‘母亲’小组，由卡里达德·梅尔卡德尔领导。

1938年前居住在巴黎的拉蒙和他的母亲卡里达德保证与苏联情报部门合作。9月拉蒙在鲁安兄弟引见下认识了当时正在巴黎的西尔维娅·阿格洛夫和与托洛茨基一家关系密切的罗兹梅尔夫妇。拉蒙根据埃廷贡的指示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贝利亚指示我与埃廷贡一起去巴黎对出发去墨西哥的小组作出评价。

我们是乘火车去巴黎的。在巴黎我会见了拉蒙和卡里达德·梅尔卡德尔，然后又分别会见了西凯罗斯小组的成员。这两个小组互不相接触，也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1939年10月埃廷贡抵达纽约，在布鲁克林创办了一个进出口公司，我们利用这个公司作为我们的联络中心。最重要的是，这个公司向拉蒙·梅尔卡德尔提供了‘栖身之地’，拉蒙·梅尔卡德尔现在化名弗兰克·杰克逊，用加拿大假护照住在墨西哥。现在他可以经常来纽约找埃廷贡，埃廷贡给他提供经费。

西凯罗斯小组在墨西哥也逐渐找到了掩护。埃廷贡制定了潜入托洛茨基在科约阿坎的家中的方案。西凯罗斯小组计划强行攻占托洛茨基的住所，而拉蒙并不知道西凯罗斯小组的存在，他的主要目标是利用他和西尔维娅·阿格洛夫的恋爱关系接近托洛茨基身边的人。

拉蒙长得像法国电影明星阿兰·德隆，西尔维娅在巴黎时就被他独特的魅力迷住了。她常和拉蒙一起去纽约。

拉蒙在托洛茨基的圈子里特立独行，不试图用‘对共同事业表示好感’来博得他们的信任。他继续扮演‘由于性格怪僻而支持托洛茨基’的实业家，而不是他的忠诚的追随者。

1940年5月24日西凯罗斯小组闯入托洛茨基的住所。他们用自动步枪扫射托洛茨基所在的房间。但由于他们是隔着关上的门射击的，射击的结果未经核实，藏在桌子下面角落里的托洛茨基得以幸免。

暗杀失败还因为这个袭击小组没有为具体行动进行专业培训。埃廷贡出于保密的考虑没有参加这次袭击。



我和贝利亚去了斯大林的近郊别墅。我报告了西凯罗斯清除托洛茨基行动的失败。

斯大林并不为刺杀托洛茨基失败而怒火万丈。即使他生气，也掩饰得很好。表面上他看起来心平气和，决心把消灭对手的行动进行到底……

斯大林肯定了他以往的决定，说：

‘针对托洛茨基的行动将意味着托洛茨基运动的破产，我们就再也不用花钱来同他们以及他们破坏共产国际和我们与国外左翼人士的联系的尝试作斗争了。西凯罗斯失败了，请你们执行另一个取代计划，给埃廷贡发电报去，表示我们完全信任他。’”

现在我们有难得的机会听听拉蒙·梅尔卡德尔本人的说法——1940年8月20日他是如何完成最后阶段的“清除”行动的。下面是1969年他在文学家大楼餐厅对苏多普拉托夫说的话：

“我在墨西哥秘密接头的住宅与母亲和埃廷贡见面时，埃廷贡提出如下方案：当我在托洛茨基的住所里时，埃廷贡本人、卡里达德和由五人组成的战斗小组设法闯入这个别墅。在他们与保镖交火时，由我来清除托洛茨基。

我不同意这个计划，要他相信我一个人能执行死刑判决。我像自己人一样去了别墅。托洛茨基在平常的问候后坐在书桌前看我写的为他辩护的文章。当我准备用冰镐击打托洛茨基的时候，他稍微转了一下头，这改变了冰镐打击的方向，削弱了打击的力量。因此托洛茨基没有马上死去，并喊了起来求救。我慌了手脚，虽然身上有刀，却不能刺杀他。托洛茨基的呼救声简直使我失去了行动能力。

托洛茨基的妻子和保镖跑进房间来，把我打倒在地，我也来不及用手枪了。但是后来发现没有这个必要了——托洛茨基第二天死在医院里。

托洛茨基的一个保镖用手枪把我打倒，后来我的律师利用这件事来证明我不是职业杀手。我则坚持说我受对西尔维娅的爱的左右，托洛茨基分子花我捐给他们运动的钱，试图拉我加入恐怖活动。我没有背离早先商定的说法：我的行动纯粹出于个人的动机……”

梅尔卡德尔作为加拿大实业家弗兰克·杰克逊被捕，当局在六年中



不知道他的真姓名。

特工部门只是在西班牙共产党的一个重要活动家投奔西方后才知道了梅尔卡德尔的真实情况，那位西班牙共产党的活动家在逃跑前一直住在莫斯科。

苏多普拉托夫继续说：

“当墨西哥收到西班牙警方档案馆送来的梅尔卡德尔的案卷后，才查明了他的身份，他再抵赖已毫无意义。弗兰克·杰克逊在不可辩驳的证据面前承认他其实是拉蒙·梅尔卡德尔，出身于西班牙的富人家庭。但他始终不承认是奉苏联情报机关的命令杀死托洛茨基的。梅尔卡德尔在一切公开声明中总是强调这次暗杀是出于个人动机。

在狱中看管拉蒙的女人爱上了他。后来他与她结了婚并在1960年8月20日出狱后把她带到了莫斯科，他在狱中呆了20年。

1960年前拉蒙从未到过莫斯科。在莫斯科，克格勃主席谢列平接见了梅尔卡德尔，授予他苏联英雄的金星奖章。

梅尔卡德尔是个职业革命家，他为自己为在共产主义理想的斗争中的作用而感到骄傲。他对杀死托洛茨基并不感到后悔，他说：

‘要是重新回到40年代，我还是要做做过的事。’

70年代中期梅尔卡德尔从莫斯科去了古巴，担任卡斯特罗的顾问。1978年他去世，他的遗体被秘密运回莫斯科。梅尔卡德尔被安葬在库采夫斯科耶公墓。在他的墓碑上写的是：苏联英雄拉蒙·伊万诺维奇·洛佩斯。”

苏多普拉托夫总结说：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相互对抗，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使用一切极端的方法，但区别是托洛茨基在流亡中不仅对抗斯大林，而且对抗苏联。这一对抗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

六 精神因素

历史学家和军事学术研究者十分重视并花了大力气来分析斯大林是如何使苏联武装力量作好抗击希特勒侵略的准备工作。例如，他们一致认为，斯大林同德国签订了条约和秘密协定，从而很有把握地推迟了

德国的进攻。他赢得了两年时间，但对于军队的充分备战，尤其是军队装备各种新式武器来说还是时间不够。

但是（简直令人惊讶）至今学者们仍然没有注意到斯大林实施的十分重大的战略“措施”，这一措施取得了极好的效果，为赢得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同样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于精神因素人们谈了不少，也写了不少文章，说政工干部、党团组织在战前如何关心军队的士气，这一切反过来又起了巨大的动员作用。

但我指的是斯大林所做的更广泛的政治教育工作——团结全国和全体人民、用新的精神教育人民。不仅是为了在战争年代坚强不屈，而且是为了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

斯大林看到人们关系疏远，即当时所谓的阶级对抗由于国内战争中所流的鲜血而更趋激烈。他每天都感受到白热化的党内斗争、各种反对派和派别的震荡在人为地把党和人民分裂成对抗的势力。斯大林明白，为了完成眼前的任务，尤其是为了未来，需要有一个思想一致、追求一致的团结的党，统一的人民，否则就无法完成既定的历史改造任务。正如他的活动所表明的，他在许多年里花费大量精力和脑力来倡导、加强和培养新的全民族的爱国主义品质。其中的第一个是各民族的友谊（这里不加详述），斯大林成功地使加入苏联的各民族都具有这样的品质。第二个是斯大林认为一个苏维埃人、社会主义新社会建设者应具有的高尚的精神道德品质。

斯大林做了巨大的工作，他改造文学、电影、戏剧、绘画等各种艺术以至一切能影响人的个性在精神和道德上成长的东西，并使之重新定位。各种艺术的代表们都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目标。

这是斯大林取得的十分伟大的胜利，他在这方面确实是真正的领袖。不管现在那些居心不良的人对此如何恣意嘲笑，但正是“领袖”这个概念最适合于本章要谈的这位杰出的领导人。

斯大林长期关注着人民的精神道德状态、关注团结或分裂人民的种种原因。他确信，除了政治教育措施，艺术起了巨大的作用，甚至主要的作用。他倾听知识分子的声音，倾听他们在大庭广众中大声疾呼的言论以及在自己人圈内的窃窃私语，确定推动文化工作者生命的力量、杠杆和方法。他只有在了解了形成全国精神生活、精神上坚如磐石的机制后，才着手影响这一进程，引导它的发展，他认为这才能保证培养出有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者所必备的崇高精神道德品质的苏维埃新人。

列宁在1905年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说，党应当组

织写作事业，使之为人民服务。^①在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立即着手抓这一件事。它的任务是“给工人阶级以引导集体意志和思维的完整教育”。“养成独立的精神文化”要求拒绝旧遗产；普希金、果戈理、陀斯妥耶夫斯基及其他的俄罗斯古典作家都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情调的作家”。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为建立摆脱了一切小资产阶级影响的特殊形式的工人新文化而斗争。

不出所料，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及其“革命”冒进思想可耻地垮台了。1925年“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取代了它，拉普多少继承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传统，例如，它的任务是：“无产阶级应在文化和文学建设战线上夺取领导作用。”拉普的领导人是瓦尔金、阿韦尔巴赫、列列维奇。

斯大林曾对伊拉里翁·瓦尔金（这是他的笔名，他的真姓是姆格拉泽）很有好感。瓦尔金1906年入党，在高加索开始革命活动。在国内战争中他是布琼尼骑兵集团军的政治部主任，而大家知道斯大林同这支骑兵集团军的组建有着直接的关系。

瓦尔金任何时候都可以去找总书记。斯大林通过他不仅了解了拉普活动中的—切细节，而且了解了整个文学界的情况。后来斯大林对瓦尔金的态度变得冷淡了，因为他和取代他的极其粗鲁的阿韦尔巴赫投入了（也许早就参加了）托洛茨基分子的阵营并开始积极参与夺权斗争。拉普主张独揽对苏维埃文学思想和政治上的控制大权。

斯大林起初支持过拉普分子，虽然他也曾批评过他们的政治错误和过火行为。

叶夫根尼·格罗莫夫写了一本很有分量的书《斯大林、权力和艺术》（莫斯科，1998）。不光篇幅有分量——459页，而且内容也有分量。这位作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可惜的是，他堕落到了“民主派”习气的水平，使用了诸如“克里姆林宫的主宰者”、“暴君”、“克里姆林宫的批评家”等等修饰语。这种不与人为善的态度降低了这本书确凿无疑的科学价值。但是这位作者引用了许多原件，我也将借用其中的一部分。我和他作的解释不完全一致，但文件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而解释只是表明各人的倾向性。格罗莫夫有时也是客观的。例如，他在谈到拉普和斯大林时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大权在握的斯大林不干脆下令驱逐拉普分子、不准对此开展任何争论呢？他没有这样做，主人本人不惜花上许多时间来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92~97页。——译者注

倾听并无悔意的拉普领导人的意见，同他们进行争论，说服他们。他暂时还容忍那位阿韦尔巴赫，常常接见他。当然高尔基积极支持这位前拉普领导人在这方面也起了作用；但这毕竟不完全是高尔基的关系。

对手挖苦阿韦尔巴赫，把他叫作‘克里姆林宫的小少爷’。他早就在不成文的苏维埃权力结构等级制度中地位稳固。他与雅·斯维尔德洛夫和亨·亚戈达两家都有亲戚关系，因此他起先在共青团中，后来在文学界才急速地飞黄腾达起来。阿韦尔巴赫娶了列宁的战友邦契-布鲁耶维奇的女儿为妻，这也有助于他经常和许多身居高位的老布尔什维克有着良好的交往。主要的是，拉普分子在近10年中一直处于文化生活的中心，在文学界担任越来越高的领导职务。他们在文学界的支持者不少，但在政界（中央委员会、各州委、区委、国家管理机关、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媒体、高等院校，当然还有共青团、工人预科青年学员）的支持者也许更多。

斯大林贯彻文化政策以至整个国内政策不光依靠行政命令手段。他通常用耐心说服的方法来补充（或掩盖）行政命令手段，要人们相信已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领袖本人及其助手们、各级下属们不倦地解释决定的内容。对斯大林的威权主义不应该简单化，但也不应该人为地复杂化。”

到1932年，斯大林确信拉普不是党贯彻文学艺术政策所需要的组织，于是1932年4月23日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解散了拉普。

斯大林通过解散拉普这一行动就在真正的创作界知识分子中赢得了巨大的威信。苏联作家们被此前的镇压和整人运动吓坏了，他们把斯大林看作是创作上得到理解和改善生活的惟一希望。他们的心向着领袖。这种向往往往还有着很深刻的动因。不少文学家，包括十分有才能的文学家，当时都真诚地相信社会主义思想。他们认为，拉普代表的是粗暴的意识形态上的过火行为和对列宁党性原则庸俗化的歪曲。而现在真理和正义终于胜利了。

斯大林多年来与高尔基保持了友好关系，这确实是真正的友谊，而不是普通的工作关系。斯大林尊重高尔基。高尔基同样尊重斯大林，虽然他有时并不同意斯大林的看法并公开跟他谈这方面的意见。高尔基常去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住所和在索契的别墅，斯大林也经常去拜访高尔基在尼基塔门附近的住宅。在这里他也会见其他的作家。斯大林与他们平等相处（他在革命前的一份履历表的职业一栏中填的是“著作

家”)。他学识渊博(在几次流放时有足够的时间读书),思想开阔,常参加文学家们的争论,知道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斯大林就成立作家协会的设想同高尔基交换了看法,征询他的建议,请求他的帮助。为了更好地了解作家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了解他们的情绪、需要和愿望,斯大林请高尔基多邀请些客人到他家里去“喝茶”。

1932年10月19日斯大林在高尔基的住宅里举行了第一次同作家的大会见。参加会见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布哈林和波斯特舍夫。关于这次会见的详情几乎无人知晓。第二次会见在10月26日举行。代表当局出席的还是那几个人,只是卡冈诺维奇取代了布哈林。和第一次会见一样,这一次会见也没有作速记记录,主要是根据目击者的回忆才了解了这次会见的情况。泽林斯基作了详细的记录。他后来把这个记录送给克里姆林宫请求准予发布,没有得到批准,但当局也没有批评他。现在这份材料发表了。我在转述记录的内容时略作删节。这位目击者描写的经过真实客观,很吸引人。

参加会见的有近50人。参加会见的邀请蒙上了一点神秘色彩:用电话邀请去高尔基家中参加晚会。对什么目的未加说明。关于斯大林可能会来也根本不提。

参加者的名单由阿韦尔巴赫和叶尔米洛夫拟定,这两个拉普分子虽然已经是前拉普分子了,但看来并未放弃自己的立场。他们,尤其是阿韦尔巴赫和基尔松得到了高尔基的庇护,虽然当初这些“狂热者”也恶毒中伤过他。

高尔基主持了会见。他在开场白中指责了拉普分子,但相当克制。

阿韦尔巴赫发了言。总书记公开表态说,他觉得阿韦尔巴赫的讲话没意思。高尔基则为他庇护的人“感到心痛”……

谢夫林娜的发言慷慨激昂。“同志们,我对你们又想把三个拉普分子拉进组织委员会感到绝望……我们终于喘了口气,重新有机会写作。要知道我们这里把有些作家整得什么都看不见了。”

会场上闹了起来,有人喊道:“撒谎!”卡达耶夫试图打断发言者的话。看来不是所有的与会者都是反对拉普分子的。但是斯大林明显对谢夫林娜有好感,他建议延长她的发言时间。他表示相信,“其他人也是这样想的”,只是没敢说出来。他们对拉普分子的恐惧还很严重。

斯大林参加了争论,他说:

“‘制造恐惧’、排斥人很容易,而把人吸引过来很难。我们为什么撤销拉普?正是因为拉普脱离党外群众,不再在文学界做党的工作。他们只是‘制造恐惧’……应该‘制造信任’……这就是我们决定清除



文学界中一切派别活动的原因。”

接着他谈了新的作家协会面临的创作任务，特别谈了戏剧问题。他谈到了未来协会的物质基础（这一点与会者听得格外专注）：“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将要以您的名字建一所文学所，还要建一个作家城，有宾馆、餐厅和图书馆……”

泽林斯基对会议的后半段的观察特别有意思。

这类会见中通常供应烈性酒。有的作家不清楚自己的酒量，总书记逐渐充当起主持人的角色，他不制止任何人饮酒，更多地是鼓励他们，这符合格鲁吉亚酒宴的习惯。此外，斯大林知道，酒后吐真言。他在会见作家时“拼命地”给同席的人斟满一大杯一大杯的伏特加酒和白兰地酒。据泽林斯基观察，他本人喝了四分之三瓶的酒，但没有醉。

诗人弗·卢戈夫斯科依提议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突然喝得酩酊大醉的格·尼基福罗夫站起来对全场喊道（真是不喝酒时心里想，喝醉酒时嘴上说）：

“讨厌！为斯大林的健康干了1 147 000次的杯！也许他连听这种话都感到厌烦了……”

斯大林也站了起来。他隔着桌子向尼基福罗夫伸过手去，握了握说：

“谢谢，尼基福罗夫，说得对。这太讨厌了。”

大厅里甚至在斯大林讲话时也人声鼎沸。我还要指出，大家的心都向着他。在会议休息时大家包围着他提问题，同他进行争论。所有的人都欣喜若狂地碰杯，一起唱歌，讨论生活中的问题。列·列昂诺夫要领袖为他张罗别墅，因为他没有地方休养和写作。总书记对这种谈话不太满意，但不无讥讽地建议他去占加米涅夫的别墅。如果相信泽林斯基的记录的话，列昂诺夫对这种可能的前景感到高兴。为什么不相信泽林斯基呢？当巴别尔一被捕他的别墅“腾出来”后，作家协会马上提出由谁、什么时候住进这座别墅里去的问题……

法捷耶夫可能感到对肖洛霍夫有些不好意思，因此在这次会见时对他十分“巴结”。法捷耶夫提议“为最谦虚的作家米沙·肖洛霍夫”干杯。斯大林也为他干了杯。

仿佛顺便非正式地谈到了创作方法。斯大林在这方面似乎持比拉普分子，尤其是比基尔松自由化得多的立场。我国这位首席马克思主义者简直说出了大逆不道的想法：“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也可以成为好的艺术家。有过这样的艺术家。例如，莎士比亚。”“还有普希金。”尼基福罗夫补充说。

阿韦尔巴赫大声说：“不错，但是，斯大林同志，我们要创造社会

主义艺术。”尼库林说：“瞧，瞧，还没有把他放进组织委员会里去，他就在大喊大叫了，冲着斯大林大喊大叫。”大家全都笑了。但是斯大林仍心平气和地继续说：“我以为，一个人要是很好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话，就不会去写诗，他会成为经济管理人员或者想进入中央委员会。现在全都想进入中央委员会……但是我们不应该把提纲塞满艺术家的脑袋里。艺术家应该真实地表现生活。他要是将真实地表现生活，就不能不发现，不能不表现引导生活走向社会主义的东西。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顺便提一下，斯大林正是在这次会见时把作家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

阿韦尔巴赫同领袖进行争论，维护的不仅是某个理论公理，而是整个拉普。“狂热者们”热衷于艺术创作中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没有人知道这具体指什么，但拉普分子能够把任何一个不合他们心意的作者排除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因为他们试图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而现在领袖实际上拒绝承认他们的主张。这个打击是致命的。

因此，是斯大林第一个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术语引入苏联的文学生活中的。后来斯大林在同高尔基的谈话中更详细地论证了这个概念：

“我们不必特别强调苏联文学艺术的无产阶级性质，这无助于创作力量的统一。不应该冒进，提出‘共产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术语，现在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谦虚也更准确。这个说法的优点，首先是简洁（只有两个词），其次是好懂，第三是表明文学发展中的继承性（资产阶级民主社会运动阶段产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阶段转变、发展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

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研究作家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工作时，也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拉普分子又一次为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辩护。发言次数之多表明了争论是自由而激烈的。基尔松发言15次，阿菲诺根诺夫发言4次，斯大林发言超过10次。

这次会议最终作出决定，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规定了党在文学问题上的立场。

* * *

我的作家经历一帆风顺。我在80~90年代处在文学社会生活的中心：担任了最优秀的杂志《新世界》的主编六年，当时重要的作家列昂诺夫、索尔任尼琴、拉普斯京、卡达耶夫、邦达列夫、格拉宁、艾特

马托夫、马里埃塔·莎吉娘、沃兹涅先斯基、叶夫图申科、加姆扎托夫等许多人都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作品。我第一个读他们的手稿，并同他们交谈，有时提出自己的和编委（他们也是非常著名的作家）的希望。意见通常涉及表现手法或者删节（杂志有时无法容纳篇幅很大的长篇小说）。

没有一次谈话提到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的许多对话者还健在，他们可以证明这一点。

1986年7月在克里姆林宫里举行的第八次作家代表大会选举我为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书记。由于命运的嘲弄，我成了最后一任的第一书记（1986~1991年），在这之后苏联被搞垮了，苏联作家协会也不再存在。它分裂成（被拆成）几个互相敌视（不知道为什么）的小派别协会，它们失去了大作家协会的一切社会和物质优势：出版社、创作之家（在我国风景优美的地方有20多所）、近100种“大厚本”杂志（包括各加盟国的在内）。更不提这些杂志的印数了。例如，我把《新世界》交给谢·扎雷金时印数超过50万份，而今天它只有1万份！苏联作家协会不接受国家一戈比的补贴，却向国家预算上交了8亿卢布（当时修建一座中学的带体育馆和运动场的综合建筑要花100万卢布）。

我插叙了这一段话不仅是出于怀旧（我不否认有怀旧情绪），主要是因为我想向读者表明，我谈这些问题时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一个行内人。

* * *

回过头来再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请读者注意决议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党的立场”。在80~90年代“民主派”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变成了吓唬人的东西，似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作家必须按某种强加的教规来写作。他们把创作说成是这样的：作家坐在桌子前，面前放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模板，然后按这个模板进行创作。如果他不遵循这个方法，斯大林就把他投入监狱或者就地正法。

现在的媒体谈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表现出的愚蠢和浅薄更是令人匪夷所思！至于镇压，前几章已经详细谈过。作家并不例外，他们被投入监狱，是由于他们的政治活动、托洛茨基主义阴谋活动、反苏谰言，而不是由于他们在创作中背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没有一个作家会干出这样的蠢事：坐下来创作时跟自己说：“我将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只有对创作一窍不通的人或打算把苏联时代一切统统抹黑、昧着良心撒谎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作家用他们愿意的方式写他们愿意写的东西，可是党在评价他们的作品时有自己的原则，即这本书是否符合党培养苏联人高尚思想道德品质的政策。不必编造和叫喊什么威权主义和禁忌，这全都是宣传泼的脏水。在任何时代，任何制度下，沙皇、国王、政府总是珍视、亲近和奖励忠诚的人（不一定是忠于他们本人的人）。历来如此。即使是遥远的“前作家”时代，大贵族也会从身上脱下皮袄赠送给讲故事的人、小丑、画家、百戏艺人，奖励他们的艺术。

为什么“民主派”要剥夺国家元首的评判权和鼓励权呢？

斯大林完全可以有这个权力，他也广泛地运用了这个权力。但斯大林记住了他的导师列宁的看法：艺术应该为人民服务，而苏联各族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发挥列宁的思想，艺术应该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不应该忘记，斯大林是贯彻党的纲领的职业革命家。

新冒出来的批评家们断言，斯大林扼杀、压制、严格限定了一切，这不过是受制于一定之规（贬低苏联的一切事物）的人的政治吃语。斯大林任何时候在任何问题上都不是这样浅薄的。即使对他毫无好感的批评家（这个人上面已经提及）在归纳斯大林在艺术领域的活动时也说：

“必须看到，斯大林抓文艺政策问题有时并不比抓十分重要的军事或经济问题少，但他抓这件事不是偶一为之的，而是始终如一、有条不紊的……”

斯大林对整个苏联艺术文化留下了不能抹杀的印记，不管我们是否喜欢，都应该承认这个结论。”

贯穿联共（布）中央关于文学艺术的一切决定的是一个思想：应该创作出关于当代的有才气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太少。我国文学作品的主人公是新生活的积极建设者……苏联文学应该善于表现我们的英雄，应该善于看到我们的明天。

首先要用概括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英雄形象来教育苏联人民。可以把这一点看成是斯大林和党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因。

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建成伟大强国并保卫它、击退法西斯入侵的一代正直劳动者是通过正面的（甚至反面的）事例成长起来的。难道由电视和封面上画着杀手和妓女的口袋本图书日夜灌输的刑事犯罪、杀人越货、性变态教育成长起来的改革的一代更好吗？

我记得，在战前，我们在中学毕业回答想干什么的问题时说，想当

工程师、医生、飞行员、农艺师。今天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脸颊红红的纯洁又年轻的女中学毕业生不假思索地回答这个问题说：“我想当挣外汇的‘夜蝴蝶’^①，干这行挣得多。”

老实说，用正面事例进行教育更容易为孩子、父母以至全体人民和国家领导人所接受，国家领导人有责任贯彻他们的教育政策。但是“民主派”思想家们却对这种倾向破口大骂，他们认为用正面现象和事例教育青年是斯大林要歌颂他和他的时代的愿望，总之，是“个人崇拜”而已。“尊敬的”文艺学家叶·格罗莫夫是这样论证的：“很显然，斯大林一贯希望直接歌颂‘他的’时代。日丹诺夫知道老板的情绪，不止一次地下令创作界知识分子要面向社会主义现实。”

斯大林、党的官方的批评支持描写真实的作家，即使他们的作品中出现主人公死亡的悲惨情节，如法捷耶夫的《毁灭》、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以及后来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和卡扎凯维奇的《星》。

不错，对出现正面人物的有才气的作品要格外重视，但为什么批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人因此要暴跳如雷呢？从什么时候起不能宣传好人好事了呢？为什么要对此加以谴责、说这叫粉饰生活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不得不走出纯创作的圈子。是谁不愿意提高苏维埃人的精神道德品质呢？是谁不喜欢这一点呢？

正是在这里，肮脏的政治，确切些说是政治反对派，更确切些说是托洛茨基犹太复国主义的怪物暴露了自己卑劣的嘴脸。

他们在攻击谁？攻击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肖洛霍夫、布尔加科夫和其他伟大的俄罗斯作家。

是谁在批评，在有组织地进行攻击呢？“同情”斯大林的格罗莫夫对此作了十分有意思的回答：

“形形色色的‘狂热者’、‘列夫’分子、梅耶霍德一伙的戏剧批评家、在报刊和管理机构中身居要职的党的重要作家纷纷提出直接的、往往是粗暴的政治指控，甚至庸俗下流的攻击，在有计划的严厉谴责声中‘人动’地团结了起来。我们只要提几个人的名字，他们是：阿韦尔巴赫、基尔松、皮克尔、拉斯科尔尼科夫、别济缅斯基、比利-别洛采尔科夫斯基、列列维奇、勃鲁姆、什克洛夫斯基、阿尔佩斯、巴切利斯、米·科利佐夫、佩尔谢、卢那察尔斯基……”

^① 指妓女。——译者注

布尔加科夫统计过：10年之中发表了3篇赞扬他的评论和298篇“敌视谩骂的”评论。斯大林保护了这位有才气的“白卫”作者。斯大林不止一次在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看过他的剧本的演出——看过《土尔宾一家的命运》，后来又看了《逃亡》。斯大林解释他喜爱布尔加科夫作品的原因时说：“布尔加科夫抓得好！他逆着毛抓！我喜欢这一点。”

他帮助安排布尔加科夫在艺术剧院工作。他不止一次和他交谈过，打电话去鼓励他。他亲自对此解释说：

“我们现在最需要剧本。话剧更通俗易懂。我们的工人很忙，他们在工厂里干八小时活，家里有一大家人、孩子，他们哪里有时间坐下来读厚厚的长篇小说……话剧现在是我们最需要的艺术形式。工人很容易看完话剧，通过话剧很容易使我们的思想变成人民的思想，使这些思想深入人民之中。共产党员剧作家写的剧本不好，他们应该向杰出的职业作家布尔加科夫、这位《土尔宾一家的命运》的作者学习学习。”

斯大林安抚流亡国外的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伯爵，请他回国，帮助他改造成苏联作家。

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库普林在国外侨居17年，他在巴黎写了对苏维埃政权不恭的作品。但是20年代中期他脱离了政治，1937年春天回到祖国。

* * *

斯大林特别重视电影。他认为电影对广大群众心理影响的力度是无与伦比的，因此应该把电影当作加强社会主义新道德事业中十分有效的教育手段。克里姆林宫中从前的冬季花园被改建成舒适的电影院，斯大林在这里有时一连看两三部影片，还通常邀请政治局委员晚上下班后前来观看。他们在这里或休息，或继续工作，交换对影片、导演和演员的看法。

斯大林非常喜欢导演瓦西里耶夫兄弟的电影《恰巴耶夫》，电影演员巴博奇金出色的演技吸引了他。这部影片征服斯大林的不仅是高超的艺术性，还有它强大的教育作用，斯大林作为有一定纲领的党的领导人追求的就是这种教育作用。

他利用这一经验，请当时主要的导演之一多夫任科创作一部类似《恰巴耶夫》的关于乌克兰的恰巴耶夫——邵尔斯的影片。斯大林想用历史的类比来促进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大民族更加接近。

在现在那些诠释斯大林活动的人看来，这件事最简单不过了：“独裁者”叫来导演多夫任科，下令拍摄关于邵尔斯的影片。但事实上斯大林对待任何一种艺术的工作者都十分有礼貌，讲究分寸，珍视天才，关心创作（当然他也不会忘记，这一关心会有回报，会给他贯彻的教育政策带来好处）。

导演多夫任科回忆斯大林在建议他考虑拍摄关于邵尔斯的影片时说：“不管是我说的话，还是报上的文章都不能勉强您去做什么。您是自由的人。您想拍《邵尔斯》，那就去拍，如果您有别的计划，那就拍别的。请不要不好意思。”

多夫任科由衷地尊敬斯大林，他同意拍摄这部影片。领袖读了电影剧本，提出了意见。多夫任科并不完全同意这些意见。此外，那些嫉贤妒能的人和机会主义者（到处有这样的人，电影真是被“一个”民族把持了，而多夫任科是斯拉夫人，“一簇毛”^①）尽在捣乱，给他暗中使坏。电影业的头头杜克利斯基派马涅维奇去基辅带着偏见看已拍摄的《邵尔斯》的样片。

多夫任科这部影片拍了四年。斯大林在观看这部电影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没有提出一点意见。他邀请多夫任科去他的别墅，他们俩长时间“喝酒祝贺”这部影片。影片获得了斯大林奖。

党也支持其他的有才能的电影工作者，例如，除了颁发奖金和勋章，1935年还奖给谢·爱森斯坦、谢·和格·瓦西里耶夫兄弟、弗·普多夫金、亚·多夫任科、弗·埃尔姆列尔、格·科津采夫、列·特拉乌贝尔格等个人轿车。

斯大林不是缺乏感情的人，他喜爱喜剧片，例如，亚历山德罗夫的《快乐的人们》。批评家们为影片的“美式风格”而责骂它，甚至指责影片抄袭了好莱坞的经验。而斯大林看了影片说：“很好！我仿佛休了一个月的假。”

斯大林在导演米·罗姆和电影编剧阿·卡普列尔在创作《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弗·埃尔姆列尔在创作《伟大的公民》时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他在给埃尔姆列尔提的意见中对反对反对派的斗争的实质所作的界定很值得注意，他说：

“应该这样拍，不要使托洛茨基分子和苏联政府的斗争看上去像两个政党在争夺政权的斗争，其中一个政党在这场斗争中‘走运’，而另一个‘不走运’，这将对现实的严重歪曲；而是要使

^① 旧时对乌克兰男人的一种称呼。——译者注

这场斗争看上去像两个纲领的斗争，其中一个纲领符合革命的利益，得到人民的支持，而另一个纲领违反革命的利益，遭到人民的唾弃。”

在战前年代考虑到人们将要手执武器去保卫祖国，因此电影工作者非常重视通过电影表达各民族的团结、加强各民族的友谊、气节和士气。当时拍摄了一系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所谓国防片：《假如明天战争》、《彼得大帝》、《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得》、《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米宁和波扎尔斯基》、《苏沃洛夫》、《阿尔森》。

1941年3月有6部散文作品获得了斯大林奖，其中包括阿·托尔斯泰的《彼得大帝》、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谢尔盖耶夫-倩斯基的《塞瓦斯托波尔激战》；而给25部影片发了奖，其中包括上面提到的爱国主义历史片。

顺便提一下斯大林奖。那些大骂“个人崇拜”的人对这件事极尽挖苦嘲弄的能事！真做得出——用自己的姓命名！把列宁给忘了！一点不谦虚！

这一切全都出于中伤斯大林的偏见（或任务）。列宁奖已经有了，1925年6月23日由苏联人民委员会设立，不错，头几年这个奖授予科学活动的成果，但后来它的授奖范围扩大到文学及其他门类的艺术。

这项奖是根据政治局的决定才叫作斯大林奖的，斯大林本人曾设法要另外取个名称。但这项奖是“他的心血”，他制定了条例，参与委员会的工作，阅读候选作品（一昼夜读500页），观看所有的电影、话剧、纪念碑、绘画、建筑物。这是巨大的工作（不应该忘记他还有主要的国务活动）。总的来说，他好像什么都来得及干。

斯大林奖于1939年12月20日由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设立，1966年9月9日改称国家奖。

我在这里又得再插叙一段话。这是因为（又是命运使然）我有幸担任国家颁发列宁奖和国家奖的评审委员会的最后一任主席。根据传统，主席通常由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书记——法捷耶夫、马尔科夫——担任。我当了几年马尔科夫的副手，马尔科夫之后著名的画家乌加洛夫院士担任了不长一段时间的主席，但由于他突然去世，根据部长会议的决定由我担任主席。我领导这个委员会直至苏联解体为止。

应该说，斯大林并不像现在有些舆论经常胡说的那样一个人说了算，随心所欲地发奖。参加国家评审委员会的有75位最著名的艺术家。角逐国家奖的人选由各创作协会、生产集体、出版社提名，并在报刊上进行广泛地讨论。委员会的机构（它每种艺术门类——文学、绘画、电



影、建筑、戏剧——的分委员会)为委员会委员和报刊准备了参考材料和评论文章。

最后委员会的委员们开会讨论。他们都是工作繁忙的著名人士,但75个人全都来参加会议!这说明他们中每一个人都在为本门类艺术的同仁说话,要把他“塞进去”。经过挑选后每个艺术门类还有30~40名角逐者,而部长会议只给每个艺术门类颁发2~3个奖。

竞争持续很多天,十分紧张,直到最后对2~3个最应获奖的人达成一致意见为止。我至今还欣喜地记起那些最最著名的天才的作家、演员、画家、建筑师慷慨激昂的发言、热情燃烧的眼睛、冲动急促的手势,他们满腔热情地为自己提名的人争取得奖。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年事已高,白发苍苍,但在会上却变成了不顾一切的年轻斗士。真是燃烧着莎士比亚般的激情。

我至今有时在特维尔大街上散步时能遇到熟人。如果他举起帽子,笑着说:“您好,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的话,那么这个人肯定是得了奖的;如果他转过身去(大概还在心里骂娘)的话,那么这个人肯定没有得奖。

斯大林对奖本身并不重视,他只是想用奖来吸引艺术工作者站到党的一边来。这是某种“从大贵族身上脱下的皮袄”。奖金吸引有才能的人去创作党培养高尚的、有学识的、意志坚强的苏联人尤其是青年所需要的题材。

获奖作品在报刊、广播、军队的政治工作(每个连有列宁室,每个团有图书馆)中得到广泛宣传。艺术,尤其是电影和文学在达到教育目的方面的作用因此得到加强。

人们确实精神上变得高尚了,没有现在这样泛滥成灾的犯罪行为,每个人都可以接受无偿教育,直至在高等学校里接受高等教育。电影和艺术中禁止表现兽欲、色情和野狗交配一般的性欲,而这一切目前却充斥在我们的屏幕和书架上。

在“改革派”看来,任何对这种乱七八糟的事的限止和禁止都是“威权主义、书报检查的肆虐、对自由人权的扼杀”。

人的理智简直无法理解,一个精神上和物质上健康的社会成长壮大有什么不好呢?

有人说,这一切全都是为斯大林歌功颂德,为“个人崇拜”推波助澜,这种说法是一贯谩骂斯大林的人借助谎言、歪曲、欺骗采取的策略手段。

斯大林是生活和工作中谦虚和正派的典范。他日夜工作,几年穿一双鞋和一套衣服,住在国家提供的住宅和别墅里,而且是对大国元首来

说相当普通的住宅和别墅，他在银行里没有存款。他的妻子给他写信说：“约瑟夫，要是可能，请给我寄50卢布来，工业学院要9月15日才会给我发钱，而我现在身无分文。”她说的“如果可能”，证明了她们的家庭是多么的简朴。

这种情况是一贯的：在斯大林去世那天，在他的床头柜里（也许是在存折上，我记不清了）只发现了当月的工资。

关于“女芭蕾舞演员”、“女演员”的种种议论，同样是胡编乱造的恶毒攻击。虽然按现在的民主派尺度，这种行为算不上什么罪过。

全体人民都知道斯大林简朴。各种门类的艺术工作者都尊敬他，由衷地爱戴他，从未想到过搞什么“崇拜”。

作家们撰文抒发自己对他的感情，而且是一些真正的才华横溢的作家，没有人会怀疑他们是在拍马。

1936年4月22日楚科夫斯基同帕斯捷尔纳克一起出席了共青团第十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们一起登上了主席台。楚科夫斯基写道：“会场沸腾了！而他站在那里，略为有些疲惫，神情肃穆，若有所思，显得非常习惯于行使权力，令人感到力量，同时又有一种温柔的、随和的东西。我往四下里看：大家的神情都是爱意横溢、温情脉脉、神采飞扬和笑逐颜开的。见到他——只要见到他——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就是幸福。杰姆琴科不断在给他说着什么。我们全都妒忌她、羡慕她，她是多么幸福啊！人们怀着景仰的心情看着他的每一个手势。我甚至从来没有认为自己会有这样的感情。当与会者向他鼓掌时，他取出了手表（银表），面带动人的笑容向会场展示手表——我们全都低声地说：‘表，表，他拿手表出来了。’后来散会时，已经走到衣帽间了还在提这只表。帕斯捷尔纳克不断悄悄地给我说着激动的话语，我也这样给他讲，我们俩同时说：‘唉，这个杰姆琴科把他挡住了！……’我和帕斯捷尔纳克一起回家，两个人全都沉浸在欢乐之中……”

大家知道，楚科夫斯基不仅是儿童文学作家，而且还是文艺学家、批评家，是学识渊博的人。他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良心。

至于帕斯捷尔纳克，有关他受压制、受迫害的说法全是谎言。我要说，斯大林和帕斯捷尔纳克相互尊重。而且斯大林对诗人的尊重甚至比诗人对他的尊重更强烈。斯大林不止一次解救帕斯捷尔纳克，使他躲过批评家和党的官员对他的攻击。

特瓦尔多夫斯基这位十分纯洁、心胸开阔的诗人发自内心地热爱斯大林。高傲的、女皇般的安娜·阿赫马托娃同样热爱斯大林。

肖洛霍夫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最充分地表达了作家们的共同态度：



“同志们，过去如此，今后还是如此，我们在欢乐和痛苦时都会想到他，想到这位新生活的创造者。尽管斯大林同志极其谦逊，他还是得容忍我们倾诉对他的爱和忠诚，因为不仅在他领导下生活和工作的我们，而且全体劳动人民都把对人类光辉未来的全部希望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反对派分子许多年来一直攻击肖洛霍夫，至今仍在这样做，他们借助阴谋和诽谤不止一次地把他推向镇压的刀口，但是斯大林救了他，使他没有被捕。

当然也有仇恨斯大林，并且在口头和文章中说出这一仇恨的人，例如，曼德尔施塔姆。

谁都会因无故遭辱骂而生气，为什么斯大林就不能有自尊呢？他也会生气，但他还是保护了曼德尔施塔姆，因为他珍视他的才能。他甚至责怪曼德尔施塔姆的朋友们，因为他们没有为他出力相助。下面引用广为人知的帕斯捷尔纳克同斯大林的一次谈话。

帕斯捷尔纳克说：

“记得是在下午4时响起了长长的电话铃声。要‘帕斯捷尔纳克同志’听电话。一个年轻的男子没有问候就说：

‘斯大林同志要和您通话。’

‘胡说什么！不可能！不要胡扯！’

年轻人说：‘我再说一遍，斯大林同志要和您通话。’

‘别胡闹！不要骗我！’

年轻人说：‘我给您电话号码。您自己拨电话！’帕斯捷尔纳克脸色苍白地开始拨电话。

斯大林说：‘我是斯大林。您为您的朋友曼德尔施塔姆求情吗？’

‘老实说，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友谊。情况恰恰相反。我为同他的交往感到苦恼。但同您谈话，是我一直向往的事。’

斯大林说：‘我们老布尔什维克从来不抛弃自己的朋友。而我没有必要同您谈无关的话。’

谈话至此中断了。”

这段短短的对话表明斯大林比他的对话者更正派，他显然不喜欢诗人的作为，因为诗人试图与他受到惩罚的朋友划清界限。

除了对艺术工作者个人的关注，在斯大林的赞同和参与下还搞了

“民族文化日”和“民族文化旬”。这是盛大的节日，到莫斯科来的有几百个演员、作家、音乐家，整个剧团、合唱团、歌舞团。剧院、音乐厅、公园无偿地展示某一个加盟共和国的成就。

这样的“民族文化旬”是民族文化的节日，是兄弟民族艺术、各民族友谊和斯大林文化政策的胜利。

战前由于斯大林的努力各民族结下了坚如磐石的友好情谊。他们精神上的团结一致是粉碎法西斯侵略者匪帮的“经常性因素”。

不管如何诽谤说各民族的友谊是“人为的”、“标语牌上的”，我仍是这一友谊实际上起着使全国生活和我们每一个人更趋完美作用的活着的见证人。我不是站在上面提及的我担任过的职务的立场上，而是站在普通战士、同一战壕的战友的立场上声明：我们曾经像一个战斗家庭一样生活和战斗过，我们一起冲锋肉搏，不考虑在我的身侧是什么人——是哈萨克人、乌克兰人、犹太人还是鞑靼人——我们都是在一起战斗的弟兄。我们互相关爱、互相救助、互相支持，我们还一起被葬在一个叫作公墓的坟墓里——俄罗斯人、吉尔吉斯人、白俄罗斯人、摩尔达维亚人、土库曼人没有棺木，只裹上披风，躺在公墓里。

当我读到或看到那些骗子写的文章或做的电视节目时，不由得对他们极其鄙视和厌恶，仿佛接触到了极为恶劣齜齜的东西，因为这些骗子对前线战士的生活一无所知，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只有两点：一是（如他们自己用罪犯的黑话说的）“绿票子”即美元，二是奴才般讨好、巴结大洋彼岸的指挥，与他们同声相应的愿望。

无须加以证明的结论是：斯大林成功地缔造了苏联各民族真正牢不可破的友谊，这是苏联尤其是在战时坚定强大的组成部分；由于这种坚定我们在战时捍卫住了国家，后来用很短的时间恢复了国民经济。

七 比萨拉比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

大家还记得，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附件——秘密议定书——中有如下一段文字：“至于东南欧，苏方强调苏联在比萨拉比亚的利益。德方声明它对该地区完全没有政治上的利害关系。”

大约过了一年，即1940年6月斯大林着手将条约中的这一点付诸实施。他当然想通过和平的途径来实现这一计划，但由于对罗马尼亚自愿同意归还这部分领土没有把握，军队作好了准备。

斯大林在军区指挥机关的基础上组建了南方面军野战领率机关。编入这一方面军的除了基辅军区的部队，还有敖德萨军区的许多部队。朱可夫被任命为南方面军司令。

步兵第49军代参谋长И. И. 巴拉诺夫在同我的谈话中告诉我说：

“1940年6月我们军在卡编涅茨—波多利斯克地区集中，任务是：为重新合并1918~1920年被罗马尼亚大贵族政府侵占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处于准备状态。命令中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这样表述的。我们知道，这几天在莫斯科正在与罗马尼亚代表团谈判和平解放比萨拉比亚的问题。因此我们有指示不越过边界和不对罗马尼亚军队采取任何行动。但是军指挥机关以可能采取战斗行动为目标，进行了现地勘察，为部队一旦要使用武器完成任务进行准备……”

这几天在莫斯科莫洛托夫和德国大使冯·舒伦堡正在秘密谈判。6月23日莫洛托夫又一次会见舒伦堡。这位德国大使在1940年6月23日给柏林的电报中关于这次会见是这样报告的：

“急！”

莫洛托夫今天对我作如下声明。比萨拉比亚问题的解决已刻不容缓。苏联政府仍努力通过和平途径解决问题，但是，如果罗马尼亚政府拒绝和平协议，苏联政府准备使用武力。苏联的要求还扩大到居住乌克兰人的布科维纳……”

里宾特洛甫于1940年6月25日电复舒伦堡说：

“请拜访莫洛托夫，对他声明如下：

1. 德国仍恪守莫斯科协定，因此德国对比萨拉比亚问题不感兴趣。但在这些地方居住着大约10万德意志族人，德国自然不会对他们的命运无动于衷，德国希望他们的未来将会得到保障……

2. 苏联政府对布科维纳的要求是新提出的。布科维纳是奥地利王国的领地，居住着很多德意志人。德国同样极为关心这些德意志族人的命运……

3. 帝国政府完全同情对比萨拉比亚问题的解决，同时希望苏联按照莫斯科协定同罗马尼亚政府合作，通过和平途径解决这一问题。如有必要，帝国政府愿意根据莫斯科协定的精神建议罗马尼亚友好解决比萨拉比亚的问题以满足俄罗斯的要求。

请再一次向莫洛托夫先生强调指出我们十分关心罗马尼亚会不会成为战场……”

不要以为最后一句话是出于人道的考虑。这是因为德国从罗马尼亚获得石油和农产品，这方面的利害关系很大，因此德国担心一旦发生军事行动，这一原材料产地会受到损害。

舒伦堡执行本国外交部长的指示，会见了莫洛托夫，并于1940年6月25日致电报告说：

“急！”

指示已执行，今天晚上9时会见了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对德国政府的理解和支持苏联要求的决心表示感谢。莫洛托夫称，苏联政府同样希望和平解决问题，但他再一次强调问题异常紧迫，不容一再拖延。

我向莫洛托夫指出，布科维纳从来不属于俄国，即使是沙皇俄国，如苏联放弃布科维纳，将非常有助于和平解决。莫洛托夫反驳说，布科维纳是统一的乌克兰所缺的最后部分领土，苏联政府因此认为这一问题与比萨拉比亚问题同时解决十分重要。莫洛托夫承诺会本着对我们最有利的精神来考虑我们在罗马尼亚的经济利益……”

斯大林急不可待。德国大使还没有收到对他关于这次谈话的电报的回答，就又被请至克里姆林宫。舒伦堡6月26日致电里宾特洛甫说：

“十分紧急！”

莫洛托夫今天白天约见我说，苏联政府基于他（莫洛托夫）昨天同我的谈话，决定只对布科维纳北部和切尔诺维策（切尔诺夫策）城提出要求。根据苏方的意见边界应……（接着提到了边界经过的各个地点。——本书作者注）莫洛托夫补充说，苏联政府期待德国对苏联这些要求的支持。

我说，如果苏联政府向罗马尼亚归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保存在莫斯科的罗马尼亚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的话，这个问题很容易得到和平解决。莫洛托夫对此声称根本没有这种可能，因为罗马尼亚在相当长的时间对比萨拉比亚进行了剥削。”

应该谈一下罗马尼亚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问题。战时这批黄金被运到了莫斯科，因为罗马尼亚担心敌人会抢走这批黄金。但是革命后罗马尼亚军队占领了比萨拉比亚，苏联政府扣押了这批黄金并声称，只有在罗马尼亚交回比萨拉比亚后才能把这批黄金还给罗马尼亚。但是从莫洛



托夫 1940 年对德国大使的声明看出，斯大林认为罗马尼亚直到 1940 年还占领着比萨拉比亚，因此已经获利很多，根本不能还给罗马尼亚黄金。很久以后，即 1948 年当罗马尼亚和苏联的军队齐心协力把希特勒匪徒赶出罗马尼亚后，斯大林把这批黄金储备还给了这时的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

莫洛托夫在 6 月 26 日的谈话中给舒伦堡谈了如下想法：苏联政府在最近几天中通过罗马尼亚驻莫斯科的公使向罗马尼亚政府提出要求，并期待德国立即建议罗马尼亚政府接受苏联的要求，否则战争将不可避免。

斯大林又一次迫不及待。莫洛托夫对舒伦堡说的几天还没有过，就在当天，即 6 月 26 日，他就约见罗马尼亚公使 Γ. 达维代斯库，向他作如下声明：

“1918 年罗马尼亚利用俄国军事上的虚弱，强行抢占了苏联（俄国）的部分领土——比萨拉比亚……苏联从未容忍比萨拉比亚被强行抢占这一事实，苏联政府为此不止一次向全世界公开声明过。现在苏联军事上已不再虚弱，而当前的国际形势要求迅速解决过去悬而未决的问题，以最终奠定各国间持久和平的基础。苏联认为为了申张正义必须及时与罗马尼亚一起立即解决将比萨拉比亚归还苏联的问题。苏联政府认为，归还比萨拉比亚的问题与交给苏联部分布科维纳土地的问题有着有机的联系，在那部分布科维纳土地上生活的居民极大多数与苏维埃乌克兰有着共同的历史命运、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民族构成。”

莫洛托夫要求不迟于第二天，即 6 月 27 日，作出答复。

莫洛托夫在同罗马尼亚公使谈话后立即把谈话内容和苏联政府对罗马尼亚的要求向舒伦堡作了通报。舒伦堡将这件事马上电告里宾特洛甫。里宾特洛甫则立即打电话给在布加勒斯特的德国公使，并指示他说：

“您应立即拜访外交部长，向他作如下通报：

苏联政府告知我国，它要求罗马尼亚政府把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交给苏联。我们为避免罗马尼亚和苏联开战只能建议罗马尼亚政府对苏联政府的要求作出让步……”

大家知道，比萨拉比亚的归还没有发生流血冲突。罗马尼亚军队接到本国政府关于不进行战斗、有组织地撤退的命令。但看来由于解放比萨拉比亚是苏联领导人和希特勒商定的结果，任何报刊都没有报导解放

进军的详情，似乎不该报导和谈论这件事。连朱可夫的回忆录手稿中也删去了有关他亲自参加这次不流血行动经过的部分（前几版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朱可夫回忆录手稿是这样说的：

“……国防人民委员谢·康·铁木辛哥给在基辅的我打电话，传达了政府关于组建由三个集团军组成的南方面军，以便从罗马尼亚占领下解放北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任命我兼任方面军司令。

编入方面军的有基辅军区的两个集团军：由Ф. А. 帕鲁西诺夫少将指挥的第12集团军和由瓦·菲·格拉西缅科中将指挥的第5集团军；第三个集团军是来自敖德萨军区的由伊·瓦·博尔金中将指挥的集团军……”

朱可夫接着写到为避免发生冲突我方和罗马尼亚方面的司令部商定了部队移动的时间和地区：

“同时罗马尼亚保证完好无损地保存铁路、工厂设备和物资储备。

但我们得知，罗马尼亚政府和司令部未履行承诺，开始紧急从被解放的土地上将可能运走的东西都运往罗马尼亚。”

朱可夫以他固有的坚决果断和出奇制胜的手段立即采取措施制止违背承诺的行为。这些措施出其不意，非常有效，罗马尼亚领导人在十分慌乱中只能向斯大林申诉。

朱可夫描写了他和斯大林的谈话：

“这件事发生后的第二天，斯大林给我打了高频电话。斯大林问道：

‘你们那里发生了什么？罗马尼亚大使申诉说，苏军司令部违背已达成的条约，向普鲁特河地区投放伞兵，切断了后撤的道路。还说你们从飞机上运去坦克，驱散了罗马尼亚部队。’

我回答说：‘侦察部门查明罗马尼亚严重违背条约，违反约定从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运走铁路和工厂设备。因此我下令派出两个空降旅，截击经过普鲁特河的各铁路线，并派两个坦克旅进行支援，坦克旅与空降兵同时抵达指定的地区。’

‘您从飞机上运了哪些坦克去普鲁特河？’斯大林问道。

我回答说：‘我们没有从空中投放坦克，而且也不可能投放，



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飞机。显然是撤退的军队由于惊恐以为坦克是从天而降的……’

斯大林笑了起来，说：

‘把扔掉的武器收集起来，整理好。至于工厂设备和铁路设施要加以保护。我马上指示外交人民委员向罗马尼亚政府提出抗议。’”

这件事鲜明地证实了，斯大林即使在和平的不流血的行动中也继续实施自己的战略意图，不让德国有适合于进攻苏联的桥头堡。

为什么斯大林急于要收回比萨拉比亚呢？在法国投降后，在欧洲大陆上不再有一个英国士兵，欧洲的战事显然已经结束，实际上希特勒在欧洲已经没有对手。因此斯大林心急如焚，他明白在欧洲战事结束后，德国进攻苏联的可能性越来越成为现实，虽然条约已经签订。斯大林想尽快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把国界往西推移。

有关比萨拉比亚的解决，是在很短时间里实现的。如前面所述，秘密补充议定书还规定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这一条是这样说的：

“一旦属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地区进行领土和政治重组时，立陶宛北部边界同时是德国和苏联利益范围的分界线。同时立陶宛对维尔诺地区的利益得到双方的承认。”

冯·舒伦堡大使在他 1940 年 7 月 11 日给外交部的信中谈到：

“莫斯科的政治利益现在完全集中体现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事态以及与土耳其和伊朗的关系上。

多数西方外交家认为，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将被改造成完全从属于莫斯科的机体，即纳入苏联的版图。这些国家驻莫斯科的外交使团将如预期那样在短期内解散并消失……”

斯大林对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战略上的担心，是因为一旦爆发战争它们的领土将成为适于入侵我国的广大桥头堡。而且不能不考虑到，在 1919 年反革命势力推翻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苏维埃政权后，20 年中那里的政府执行的是敌视苏联的政策。在这些国家里的亲

法西斯势力坚持与德国、尤其是希特勒掌权后的德国接近的方针。

1939年9月苏联建议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政府订立互助条约。1939年9月和10月在莫斯科签订了这样的条约。根据这一条约，苏方向上述国家承诺，一旦某一欧洲大国进攻或威胁进攻它们，将采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手段支援它们。苏联为履行这一义务，有权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部署自己的部队并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海军和空军基地。

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当然并不想使自己的国家进一步苏维埃化，他们作了一切努力要摆脱苏联的监护：外交部长们秘密聚会，总参谋部制订与苏联军队发生军事冲突时的行动计划，亲法西斯团体对驻扎在这些国家领土上的苏军战士进行挑衅。

1940年2月末立陶宛总统安·斯梅托纳派内务部国家安全机关首脑A.波维莱季斯率领一个秘密使团前往柏林——要求德国同意将立陶宛变成其保护国，从政治上加以监护。德国政府承诺在1940年秋天，西方军事行动结束后实施这一计划。总之，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当局对苏联驻军的态度至少是不友好的。

同时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的共产党和进步人士进行了大规模的鼓动工作，终于在这些国家里确立了苏维埃政权：1940年7月21日新选出的拉脱维亚、立陶宛人民议会和爱沙尼亚的国家杜马分别宣布本国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通过了加入苏联的宣言。

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前政府的大使向德国求助，他们向外交部发照会，请求保护，表达愤怒，称已发生的一切为非法行动。但是，如我们所知，由相应的秘密议定书确定的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约定已经存在，德国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没有进行援助。德国外交部代表1940年7月24日以德国外交部的名义告知这些大使。他在信中说：

“今天我友好地将关于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加入苏联的照会退回给这两国的大使，并声明，我们只能接受大使们以本国政府名义发来的照会……”

爱沙尼亚公使今天也想向我递交类似的照会，我请他不要这样做，向他指出了上述原因……”

因此，柏林官方告诉他们不久前的朋友们说，他们其实并不代表任何政府。

德国和苏联继续在幕后解决自己的问题。

八 莫斯科—柏林。1940年

到1940年底，德国占领了欧洲主要的国家，实际上采取了打一场主要大仗——对苏战争的准备措施。这方面最后一个十分重要的行动是缔结柏林—罗马—东京公约，这个公约联合了反苏势力，将苏联置于受到东西夹击的威胁之中。

希特勒坚持其策略——政治上和外交上预先作好准备，开始了（当然是悄悄地）新的行动阶段。他为了掩盖突击的方向，必须采取转移苏联政府注意力的坚决措施。希特勒正是通过他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开始了这样的游戏。1940年10月13日里宾特洛甫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冗长的信。信中说：

“亲爱的斯大林先生：

一年前经您和元首决定重新审视了德国和苏维埃俄国的关系，并将其置于绝对崭新的基础之上。我以为，这一找到共同语言的决定给两国带来了好处，从承认两国的生活空间可以和睦地比邻相处起，到实际划定势力范围止，这就导致签订德苏友好和边界公约……”

里宾特洛甫接着回顾了一年来的事态。他要斯大林相信，柏林—罗马—东京公约完全不是针对苏联的。

“三个国家同样坚持认为，这一公约绝不是针对苏联的，相反，三个国家同苏联的友好关系和它们同苏联订立的条约绝不应受到这一协定的影响……”

里宾特洛甫说出了他写这封长信的主要思想：

“最后我想完全按照元首的意见声明，四个国家的历史任务是协调各自长期的政治目标，划分在世界上的利益范围，沿着正确的道路引导各自民族的未来……”

如果用非外交语言直截了当地说的话，德国是要苏联与构成柏林—罗马—东京三角关系的国家结成同盟，从而把三角关系变成四角关系，商定全世界的势力范围的划分——即使不是全世界的，至少也是欧亚大

陆的。

里宾特洛甫接着说：

“如果莫洛托夫先生能访问柏林，进一步澄清对我们两国人民的前途有着决定意义的问题并具体进行讨论的话，我们将感到非常高兴……此外，他的来访将使元首能亲自向莫洛托夫先生表明我们对两国未来关系的性质的看法……如果此后我能为协调我们共同的政策而努力（我对此十分有信心），我将荣幸地再次亲自访问莫斯科，以便与您，亲爱的斯大林先生，对交换意见作出总结，也许还将与日本和意大利的代表一起讨论能使我们大家获得实际利益的政策的基本原则。致以

最良好的祝愿！

忠实于您的 里宾特洛甫”

舒伦堡把这封信交给了莫洛托夫，因此受到了里宾特洛甫的严厉斥责，里宾特洛甫气不打一处来：为什么舒伦堡把给斯大林亲收的信件交给了莫洛托夫？！舒伦堡向外交部长作了辩解，我认为他的某些论据很耐人寻味，下面摘引他电报中的一段话：

“我把给斯大林的信交给了莫洛托夫，是因为我对此间的事务关系和个人关系很清楚……如果我要求把信直接交给斯大林，会引起莫洛托夫先生的强烈气愤。我以为必须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莫洛托夫是斯大林最亲近信赖的人，而我们将来在各种重大政治问题上还要同他打交道……”

信之所以在10月17日交去，是由于航班误点，我不能在10月15日傍晚之前到达莫斯科。在交信前我们还得先把信译成俄文，因为我们根据经验知道，苏联翻译的译文质量差，通篇错误。考虑到这封信政治上异常重要，必须把毫无瑕疵的信件译文交给斯大林，绝不让信件内容中有任何不确切的地方。即使尽最大的努力，也无法在更短的时间内把这封长信译成俄文并用俄文打字机打印出最后的定稿。”

莫洛托夫确实把这封信转交给了斯大林，如他所答应的那样，10月22日他把封好口的斯大林的回信交给了舒伦堡。莫洛托夫处留下了这封信的副本。全信如下：



“亲爱的里宾特洛甫先生：

来信收到。衷心地感谢您对我的信任以及来信对不久前事态很有价值的分析。

我同意您的看法，我们两国关系进一步的改善无疑只能置于划分相互长期利益的坚实基础之上。莫洛托夫先生同意回访柏林，因此他接受您的邀请。

我们尚需商定他抵达柏林的时间。莫洛托夫先生最方便的时间是11月10~12日。如果德国政府也认为合适，这个问题就可以认为是解决了。

我欢迎您表示的再次访问莫斯科，对去年开始的就两国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进行总结的愿望，我希望在莫洛托夫先生柏林之行后这一愿望将能实现。

至于同日本和意大利一起讨论一系列的问题，我原则上不反对，认为对这个问题应预先加以研究。致以

最高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斯大林”

* * *

下面我将介绍我在同莫洛托夫交谈时了解到的他同希特勒会面和签订条约的情况。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获得所谓的第一手材料，即绝密谈判两个参与者之一提供的材料，是莫大的幸运。我在这方面确实很走运，我为得到关于这次绝密会见同样十分重要的消息来源而高兴。莫洛托夫的随员中参与会见的翻译瓦连京·米哈伊洛维奇·别列日科夫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家和有才华的著作家。他在他写的书中详细讲述了他多年的外交工作，包括1940年11月他和莫洛托夫的柏林之行。我多次见过别列日科夫，询问了他有关这次柏林之行的许多详情。

莫洛托夫出发前同斯大林谈了很长时间。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得到详细的指示：谈什么，了解什么，可以同意什么。我对这些问题不去详细交代，因为这些问题在谈判过程中都能清楚。莫洛托夫一天向斯大林报告几次，并从他那里得到必要的建议。

1940年11月9日，在规定的时间内从白俄罗斯车站的站台旁驶出一列由几节西欧式样车厢组成的不同寻常的标出字母的列车。乘坐这列火车的是苏联政府代表团成员和工作人员。

火车还没有驶出10米，突然猛地一下停住了。怎么回事？过了几分钟火车又开动了。火车还没驶出月台，又第二次更猛地刹住了。铁路

员工纷纷跑过来，乱作一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德国大使冯·舒伦堡伯爵也乘坐这列火车。是他两次使用紧急制动阀停住了火车，只是因为火车开出时大使馆还没有给他送来他准备在柏林走出车厢时穿的礼服。

最终火车没有等礼服送来就驶走了。

装着冯·舒伦堡衣箱的轿车被禁止进入车站广场，因为这辆车没有特别通行证。当有关方面了解到德国大使的礼服事件后，派出了两辆小汽车去追火车。汽车应追上火车，并在一个中间车站上装上伯爵的行李。

这一切发生在晚秋结薄冰的天气里。小汽车在莫扎伊斯克公路上疾驰，一辆装着行李，另一辆备用。途中，在戈利齐诺或库宾卡区，第一辆车出了车祸。但在维亚济马礼服终于顺利地交到了焦躁不安的大使手中……

旅途的时间相当长，有三天，莫洛托夫随行的秘书、顾问、技术人员像平常在莫斯科一样工作。他们通过无线电进行联络，编写关于国际事态的简报和综述，研究报刊对即将举行的会见的反响——这次会见已经正式宣布了。

11月12日早上火车抵达柏林安加尔车站。欢迎式是最高规格的，有仪仗队和军乐队。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和凯特尔陆军元帅前来迎接莫洛托夫。代表团下榻在接待政府贵宾的古老的皇宫里的“贝尔维”宾馆。

莫洛托夫第一天接待了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有关情况马上向斯大林作了报告。

1940年11月12日

致斯大林

16时40分发出

18时20分通过电话收到

同里宾特洛甫第一次谈了两个多小时。由于马上要去与希特勒会谈，先简短地报告同里宾特洛甫谈话的内容。他详细地重复了给斯大林的信的内容，补充说德国的利益在东非和西非，意大利的利益在东北非，日本的利益在南方，而苏联的利益也在南方——波斯湾和阿拉伯海。我只能简短地回答说，里宾特洛甫的想法很有意思，值得在柏林讨论，然后与他一起在莫斯科讨论，我需要他先澄清有关三国公约的一系列问题，原则上四国行动是可行的，我认为去年的德苏协定除芬兰问题外各种问题已得到全面解决，我还有与

德、意、日相互关系的其他一些问题。

莫洛托夫

1940年11月12日

过了几个小时就收到回电。请注意斯大林提法的明确及他对一些看来不重要的细节的含意的深刻了解。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0年11月12日

22时50分发出

你关于同里宾特洛甫谈话的密电中有一处表述不确切，即与德国协定除芬兰问题外其他问题已全面解决。这个表述不确切。应该说，互不侵犯条约的附加议定书已全面解决，而不是协定，因为德国人可能把“协定全面解决”理解为互不侵犯条约全面解决。这当然是不正确的。等待你关于同希特勒会谈的报告。

第二天莫洛托夫同希特勒举行第一次会谈。

我对他们会谈中纯属人的、心理的方面感兴趣。我请莫洛托夫描写元首的外貌、他的手势、说话的神态。莫洛托夫说：

“在这几次会见中可以说不是对话，而是独白。希特勒已经习惯于别人听他说，他是领袖，他已经习惯了滔滔不绝地说话。他在第一次会见时关于他的计划谈了很久，表现了他思想的广度，自由地瓜分世界，支配各国和各民族。”

我问莫洛托夫，这次谈判的主要意义是什么。

“主要的是，德国想把我们拉进军事公约中去。即把所谓的柏林—罗马—东京的三角关系变成四角关系，苏联成为第四方。希特勒坦率地建议划分势力范围，他把欧洲留给自己，把远东和大洋洲的岛屿给日本，把地中海各国给意大利，他建议苏联要集中注意力于南方，即通过有关国家的领土寻找通往波斯湾和印度洋的出口。”

我问道：

“要是我们同意这样的走势，那也许伟大的卫国战争就不会爆发了？”

莫洛托夫眯起眼睛，笑着看看我，不无讥讽地说：

“一下子就可以看出，您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外交家。难道我们苏维埃国家可以同帝国主义者这样勾结，瓜分世界，并以武力进一步侵占世

界吗？我们和我们所说的国际主义在各国人民眼里会成什么样子呢？不，我们不能这样勾结，尽管希特勒还向我们提出了很有利的补充建议，例如，我们将拥有连结黑海和地中海的海峡。但希特勒的主要秘密意图之一，是把我们拉进他们同英国的斗争中去，拉进他们当时进行的战争中去……”

当时我不知道莫洛托夫签署的有关波兰及其他国家的秘密议定书，因此我不能反驳他。我也不知道莫洛托夫和希特勒的会议速记记录，而莫洛托夫如此斩钉截铁地表明他的国际主义观点，显然以为这些文件不可能有朝一日为广大舆论知悉。

莫洛托夫和希特勒的第一次会谈在帝国办公厅的新楼里进行。这座楼建了不久，是在希特勒时代建成的，带有宏伟庄严、一丝不苟的军用风格。希特勒的办公室很大，墙上挂着巨大的壁毯，地板上铺着厚厚的地毯，左侧角落里放着一张同样巨大的写字桌，上面放着一个有乌木底座的地球仪，就是那个后来记者们谈到希特勒统治世界的野心时许多次描写过的地球仪。

当莫洛托夫和陪同他参加第一次会谈的译员巴甫洛夫走进时，办公室里只有希特勒一个人，他坐在书桌旁。他站起身来，快步迎着莫洛托夫走到办公室中间。

元首在这间大房间里显得很渺小，他穿着不带肩章的军上衣，胸口别着铁十字章，袖子上套着有白圈黑卐字的宽阔的红袖标。

与此同时从侧门里进来了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希利格尔和希特勒的私人译员施米特。希特勒请大家坐到桌旁的沙发上——办公室的一角像是会客室的地方。希特勒隔着桌子坐在莫洛托夫的对面。

希特勒谈话时不用准备好了的稿子，一句一句说得很清楚，不时停下来让译员翻译。施米特打开了装有横格纸的大公文夹，为谈话作速记记录。

莫洛托夫和希特勒作了两次长谈。我们大概感兴趣的是莫洛托夫向斯大林和政治局报告的内容。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谈。先跟着他到柏林，看看他和里宾特洛甫的最后一次谈话的情景。这次谈话是11月13日21时40分在威廉大街外交部进行的。靠了别列日科夫的帮助，我们来还原这次谈话的细节。

外交部长的办公室比希特勒的小得多，但是陈设豪华。镶木拼花地板闪亮发光，像镜子一样映出各种物件。墙上挂着古老的油画，窗上挂着贵重的手工织的窗帘，沿墙摆放着有底座的青铜雕像和瓷雕像。里宾特洛甫在希特勒在场时一直很低调，而现在完全变了一个人。他装出一



副达官显贵的样子，但他的举止与其说是雍容华贵，不如说是肆无忌惮。他被许多随从和摄影师包围着，他面对摄影师很乐意摆姿势。在相互问好和持续几分钟的泛泛交谈时，里宾特洛甫站在房间中央，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脑袋高高昂起。最后他对随从和记者们说：

“先生们，你们得离开了。我们还有重要的事情。请原谅……”

所有的人纷纷告辞，很快离开了房间。里宾特洛甫请会谈参加者坐到办公室一角的圆桌旁，当大家坐下后，他说，根据元首的愿望，最好能对谈判作一总结并原则上商定一些问题。然后他从他的灰绿色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叠成四下的纸，慢慢地打开后说：

“这里草拟了德国政府的几点建议……”

里宾特洛甫拿着这张纸，开始读这几条建议。这是关于苏联加入柏林-罗马-东京公约的条约草案和关于划分势力范围的秘密议定书的草案。

我认为读者更愿意读这个文件的原文，而不是听关于这个文件的转述。下面引用能反映文件主要意思的部分：

“草案。秘密议定书第1号

鉴于我们之间已签订的协定，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苏联的代表声明如下：

(1) 德国声明，除了欧洲签订和约后发生的领土变动，德国的主要领土利益在中非。

(2) 意大利声明，除了欧洲签订和约后发生的领土变动，意大利的主要领土利益在北非和东北非。

(3) 日本声明，它的主要领土利益在日本帝国以南的东亚地区。

(4) 苏联声明，它的主要领土利益在苏联版图以南的印度洋方向。

四国声明，他们在保留调整个别不重要的问题权利的同时，将相互尊重彼此的领土利益，不会为其实现设置障碍……”

莫洛托夫听了条约和秘密议定书（秘密议定书有两个，第二个涉及海峡）的草案后说，现在不必就此话题重新讨论，但是能不能拿到刚才读了的文本？里宾特洛甫回答说，他只有一份，他没有考虑提供书面的建议，并急忙把纸藏进口袋里。

尊敬的读者们，请注意，我向你们介绍的是里宾特洛甫藏进口袋里的那张纸上的部分内容，这张纸的副本连莫洛托夫都没有给！……这

当然是开玩笑——这些草案当时是巨大的秘密，后来国外和我国都已公布了。

突然响起了防空警报。所有的人互相对看了一眼，不再说话。附近什么地方发出了沉闷的打击声，办公厅长窗的玻璃在抖动。

里宾特洛甫说：“留在这里不安全。还是下去，到我的地下掩体去。那里安全些……”

在一座地下建筑中里宾特洛甫有个地下办公室，在光滑的写字桌上放着几部电话，在一边有一个小圆桌和几把高背的软圈椅。

当谈话重新开始后，里宾特洛甫又滔滔不绝地谈起研究关于划分世界势力范围问题的必要性来。他补充说，完全有根据认为，英国事实上已经被打败。

当我向莫洛托夫问起这次谈话时，他笑着说：

“我挖苦里宾特洛甫，问他说：‘要是英国被打败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呆在这个防空洞里呢？’里宾特洛甫明显感到有点尴尬。我始终想要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解决现时更迫切的问题，而不是夸夸其谈地说什么改变欧洲和亚洲的地图。”

我直截了当地问莫洛托夫：

“您晚些时候也许会签署这些条约草案？”

“瞧您说的，难道我们国际主义者可以进行这种反对其他民族的勾结吗！”莫洛托夫坚定地说。

这个老政治家在撒谎！冷静地反映了谈话内容的速记记录没有证实他的话。莫洛托夫没有同意加入公约，但也没有拒绝这一建议。里宾特洛甫在谈话结束时又一次提起德国建议“在消灭不列颠帝国的事业中合作”。

他说：

“正如元首明确声明的那样，苏联和德国的利益要求伙伴不是面对面，而是背靠背地站着来互相支持彼此的追求。与这些主要的大问题相比，其他的问题是绝对微不足道的，在共同的约定达到之后马上都会自行解决。”

他最后想提请莫洛托夫先生注意，莫洛托夫先生应该回答关于获得通向印度洋出口的想法原则上是否吸引苏联的问题。

莫洛托夫在作回答时说，德国人认为对英战争已经打赢。因此（他仿佛是在谈另一个话题），既然德国在对英国决一死战，那么他只能预测，德国将“生”，而英国将“死”。他完全赞同合作的想法，但条件是双方应该相互完全理解。斯大林的信已经表明了这个问题。对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也应作周密考虑。但是他，莫洛托夫，现在对这个问题还



不能明确表态，因为他不知道斯大林及他在莫斯科的其他朋友的看法。但他应该声明，这些明天的大问题都不能与今天的问题和履行既有协议的问题分开。在着手解决新问题之前，应该结束已经开始的问题。他，莫洛托夫，在柏林进行的会谈无疑十分有益。他认为今后通过外交渠道双方交换信件来讨论这些问题是合适的。

如我们所看到的，莫洛托夫为苏方保留了讨论和有可能参加实施秘密议定书规定的全球侵略意图的权利。

别列日科夫谈到一个证实这一看法的很有意思的情节：

“希特勒在最后会见后同莫洛托夫沿着帝国办公厅的列厅走向大门口。我紧紧跟着他们，好为泛泛性质的交谈作翻译。其他的随员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希特勒在同苏联客人告别前说：

‘我认为斯大林是杰出的历史人物。我本人也打算进入历史。因此我们这样两个政治家当然要亲自会面。莫洛托夫先生，请您向斯大林先生转达我的问候和我关于不久的将来会见的建议……’

莫洛托夫表示感谢并答应向斯大林转达。”

现在已经清楚，关于会见的建议的目的是要迷惑斯大林。

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说的话也表现出与柏林进一步合作的精神，他说：“我们始终认为，强大的德国是欧洲持久和平的必要条件……德国处于力图尽快结束战争、走向和平的国家的地位，而英国和法国主张继续进行战争。”

斯大林继续推行采取一切手段延缓战争爆发的政策。

* * *

现在来谈谈莫洛托夫在与希特勒会谈时不了解的情况。

1940年11月12日，在苏联代表团抵达的当天，希特勒下令说：“澄清俄国近期立场的政治谈判即将开始。不管谈判结局如何，应继续进行此前规定的对东方的准备工作。对这方面的进一步指示待我批准作战计划基本要点后下达。”

因此希特勒与莫洛托夫的会谈、秘密条约和公开条约的草案、关于划分势力范围的建议——这一切全都是用来麻痹苏联领导人尤其是斯大林警惕性的烟幕。

有千百篇文章和书籍绘声绘影地描写了斯大林如何上了希特勒的当，说他是缺乏远见的政治家，根本不是战略家，由于斯大林的无知苏联遭了多大的灾难！

我有意使用了“绘声绘影地描写”这个说法，因为对斯大林的这

类指控都是编造出来的——在纸上绘声绘影（众所周知，纸上什么都可以写）。

我不为斯大林辩解，不列举证据和文件，他不需要辩解。斯大林本人比任何人都更有力地回答和驳倒了对他的这些荒唐指控。

我只是请读者注意日期——1940年11月18日。现在让我们悄无声息地隐身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莫洛托夫作关于柏林谈判的报告。

我引用作为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出席这次会议、有责任作记录的恰达耶夫的记录。我们很幸运，雅科夫·叶梅利亚诺维奇很久以后在同库马涅夫院士谈话时对干巴巴的记录补充了自己的观察和评论。

莫洛托夫详细报告了他同希特勒会见的结果。

他说：“会谈一开始，希特勒作了长长的独白。应该给予希特勒应有的评价，他能说会道。也许他有准备好的稿子，但他没有用。他的话很流畅，没有停顿。他像一个充分了解角色的演员，清楚地一句接一句地说，只是为了翻译才停下来。希特勒的想法是，英国已经战败，它的彻底投降已指日可待。希特勒说，英国不久将从空中被消灭。接着他简单介绍了军事态势，强调指出，德意志帝国现在已经控制了整个西欧大陆。德军同意大利盟军正在非洲成功地作战，英国人不久将被完全赶出非洲。希特勒总结说，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轴心国’的胜利已成定局。他继续说，因此现在该考虑胜利后如何组织世界的问题。希特勒这时发挥了这样的想法：由于英国必然失败，就剩下了它‘失去控制的遗产’——帝国分散在全世界的残余领地。他说，应该掌握这些‘无主的’产业。希特勒说，德国政府已经与意大利和日本政府交换了意见，现在想听取苏联政府的考虑。他打算稍晚些时候对此提出更具体的建议。”

莫洛托夫停顿了一会儿，又继续说：

“当希特勒结束了连翻译将近一小时的讲话后，轮到我讲了。我没有去讨论希特勒的建议，而是指出应该讨论更具体的实际问题。例如，总理能否对德国驻罗马尼亚的军事使团的行为作出解释，它为什么不与苏联政府磋商就被派往那里？因为1939年订立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规定在涉及双方利益的重大问题上要进行磋商。苏联政府还想了解德国军队派往芬兰出于什么目的？为什么采取这一重大步骤也不与莫斯科磋商？”

这些话仿佛给希特勒泼了一盆冷水。他整个身子甚至似乎蜷缩了起来，刹那间脸上也出现了惊慌失措的表情。但是演员的才能还是占了上风，他戏剧性地交叉着十指，昂起头看着天花板。然后蜷在圈椅中急速地说，德国军事使团是应安东内斯库政府的邀请去罗马尼亚训练罗马尼

亚军队的。至于芬兰，德军根本不打算在那里呆久，它们只是假道芬兰领土前去挪威（但事实表明恰恰相反：德国人长期驻扎在芬苏边境上。——本书作者注）。

莫洛托夫接着报告说：“元首的解释不能使苏联代表团感到满意。苏联政府根据自己在芬兰和罗马尼亚的代表的情报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驻扎在芬兰南部的部队并未作任何移动，看来将长期驻守在这里。罗马尼亚不只是一个军事使团的问题，越来越多的新部队抵达该国，这对于一个使团来说人太多了。这些部队的调动真实的目的是什么？这类行动不能不引起莫斯科的不安，德国政府应该作出明确的回答。”

希特勒推说他不清楚情况（这是行之有效的外交手腕），答应关心一下这些问题。他又开始夸夸其谈，推销他的瓜分世界的计划，指出苏联可能会对其国界以南印度洋方向的土地感兴趣。希特勒说，苏联应该拥有通向波斯湾的通道，而为此应夺取伊朗西部和英国人在伊朗的油田。

斯大林插话说：“苏联当然不会上这个当。要知道他们是我们的邻国，应该同他们保持亲切的良好关系。”

莫洛托夫继续说：“我只好打断希特勒的话说，我们认为讨论这类计谋毫无意义。苏联关注保证直接与其接壤的地区的平静和安全。这时希特勒朝里宾特洛甫点了一下头，里宾特洛甫就建议研究关于苏联加入德、意、日军事同盟的议定书草案。我们很清楚，议定书的矛头是对着苏联的，苏联代表团理所当然地坚决拒绝了这一建议。”

斯大林生气地插话说：“对。”

莫洛托夫介绍了在柏林第二天继续进行的与头一天大致相同的谈判内容。

他最后总结说：“苏联代表团全体成员在离开法西斯德国时确信，德方主动要求的会晤只是一个表面文章，主要的事件还在后面。我国代表团尽最大的可能破坏了法西斯德国的图谋，绝不让他们在国际舞台上束缚住我们的手脚，使我们与西方隔绝，也绝不让他们能放开手脚大干，同英国订立停战协定。代表团全体成员还一致相信，德国侵略苏联的必然性越来越大，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发生。”

在莫洛托夫回答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问题后斯大林讲了话。他说：

“在过去几个月柏林和莫斯科交换信件时暗示最好能由两国高级代表参加讨论迫切的问题。德国的一封来信直接指出，从里宾特洛甫最后一次访问莫斯科以来欧洲和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因

此希望苏联的全权代表团能赴柏林谈判。苏联政府一贯主张和平解决国际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答应了德国关于今年11月在柏林举行会谈的建议。因此苏联代表团的柏林之行是德国主动提出的。据我们所知，希特勒在我国代表团抵达柏林后立即大声叫喊说：‘德俄关系已彻底确立！’但我们十分清楚这种说法的价值。我们在同希特勒会晤之前就已清楚，他不愿意尊重苏联涉及国家安全要求的正当利益。我们把柏林会谈看作是摸清德国政府立场的现实机会。希特勒在这次谈判中的立场，尤其是他坚决不愿尊重苏联正当的安全利益、坚决拒绝停止对芬兰和罗马尼亚的事实上的占领表明，尽管他蛊惑人心地声明不会损害苏联的‘全球利益’，实际上却在为进攻我国作准备。纳粹元首要害柏林会谈是在设法掩盖他的真实意图。

有一点很清楚：希特勒在耍两面派。他在准备侵略苏联的同时，竭力要赢得时间，使苏联政府产生他似乎愿意讨论德苏关系今后和平发展问题的印象。”

斯大林接着谈了希特勒高层对苏联两面三刀的做法以及英法在1939年夏莫斯科谈判时期的立场，当时英法打算挑唆德国进攻苏联。

斯大林强调指出：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成功地制止了法西斯德国的进攻。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这当然只是暂时的喘息时机，武装侵略我国的直接威胁只是略微减少了，但并未完全排除。在德国，这方面有强大的势力在活动，德国统治集团不想把进攻苏联的问题从议事日程上拿下。相反，他们加强了敌视我们的行动，似乎在强调进攻苏联的问题已经决定了。

不禁要问，元首侈谈进一步与苏联合作的计划有什么意义呢？希特勒可能有朝一日放弃他的《我的奋斗》宣布的侵略苏联的计划吗？”

斯大林坚定地说：

“当然不会。”

他接着简单地评价了希特勒，他说：

“历史上还没有过希特勒这样的人物。希特勒的行动中没有目标明确的统一的方针，他的政策不断在调整，往往是截然对立的。法西斯主义的理论观点过去和现在都混乱不堪。希特勒分子自己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但他们实际上是帝国主义者政党，而且是最贪婪、最强盗成性的帝国主义者。‘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只是希特勒分子用来欺骗人民、愚弄傻瓜和掩盖其强盗本质的遮羞布。他们用种族理论作为思想武器。这是奴役和压迫各民族的仇视人类的理论……”

希特勒一贯声称他爱好和平，但他的政策的主要原则是背信弃义。他同奥地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和荷兰都订有条约，但他对其中任何一个条约都不予理睬，不打算遵守，一旦需要就背信弃义地加以破坏。希特勒为与我们订立的条约也准备了这样的下场。但是我们在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已经赢得了一年多的时间来为坚决与希特勒主义决一死战作好准备。我们当然不能依靠苏德条约建立我国可靠安全的基础，加强我国武装力量才是建立持久和平的保证。同时我们将继续履行我们为争取和平和各族人民友谊而斗争的使命……”

希特勒现在为自己的胜利洋洋自得。他的部队以闪击式的突击摧毁了六个欧洲国家，迫使它们投降，我们不得不把这一事实看作法西斯德国巨大的战略胜利，因为欧洲再也没有能制止希特勒帝国侵略的力量了。现在希特勒的目标是收拾英国，逼它投降，为此加强了对英伦三岛的轰炸，大张旗鼓地准备登陆作战。但这不是希特勒主要想干的事，他主要想干的，是进攻苏联。”

斯大林低声但坚定地说：

“我们始终应当牢记这一点，加强准备反击法西斯侵略。我们的党除了进一步加强我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外，还应该广泛地向劳动者说明国际局势出现的危险，不断揭露希特勒侵略者，加强苏联人民作好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准备。国家安全问题现在更加突出。现在当我国的边界往西方推移，需要沿着边界有强大的屏障和在邻近的……但不是最近的后方的军队各战役集团作好战斗准备。”

我们应该尽快同日本签订保持中立的条约。德国和日本在其大国野心方面有着共同的语言，日本承认德国有权干预各国的内部事务。所以我们应该让它保持中立，同时应该加强对中国人民的军事经济援助。我们必须设法削弱希特勒的同盟，把受希特勒德国影响

并依附于它的附庸国争取到我们这边来。”

我再说一遍：请注意这是斯大林在1940年11月中旬说的话！

在看了这一讲话后还需要另外什么证据来证明他的洞察力、他强有力的战略思维以及对国家和人民福祉的无限关心吗？

九 培养统帅

1940年12月底，斯大林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与会的有各军区和集团军的司令和参谋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各军事学院院长、教授、总参谋部领导成员。一些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也参加了会议。

总参谋长基·阿·梅列茨科夫大将就红军战斗训练和战役训练的一般问题作了报告。他特别指出了高级指挥人员和各级司令部素养不高的状况。

朱可夫作了题为《现代进攻战役的特点》的主报告。

德·格·巴甫洛夫上将所作《关于机械化兵团在现代进攻战役中的使用》的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当时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不仅有红军领导人，还有世界许多国家军队的总参谋部和统帅部。巴甫洛夫根据他在西班牙战场上的经验，正确评价和介绍了坦克兵团和机械化兵团的能力，但同时也指出它们容易遭到炮兵尤其是空军火力的攻击。

红军空军司令帕·瓦·雷恰戈夫中将在西班牙战争中同样战功卓著并获得苏联英雄称号，他作了题为《进攻战役中和争夺制空权战斗中的空军》的内容极其丰富的报告。

围绕这些报告及其他报告所进行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大多数人都认为必须用现代技术装备军队，发展装甲部队和机械化部队，并借鉴西方现代战争的作战经验。

会议是根据斯大林的提议筹备和进行的。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斯大林召见了铁木辛哥，指责他没有征求自己对国防人民委员闭幕词的意见就结束了会议。对此铁木辛哥回答说：

“我把我的讲话稿送给了您，我以为您已经看过了，既然没提意见，就表明没有问题。”

这证明，斯大林本来打算出席会议闭幕式，但由于某些重要情况而没有到会。

第二天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导演，铁木辛哥向斯大林作了汇报。斯大林问道：

“演习双方的指挥官是谁？”



铁木辛哥回答说：

“指挥‘蓝方’（西方）的是朱可夫大将，指挥‘红方’（东方）的是巴甫洛夫上将。”

“那好，”斯大林说道，“你们就演习吧，但结束时指挥官不要走。”

军事导演是在地图上进行的，领导军事导演的是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和总参谋长梅列茨科夫。他们调动“蓝方”和“红方”，但整个军事战略态势是针对德国拥有的兵力和德国在进攻苏联时可能采取的方式，即针对从苏联侦察机关情报中已经了解的东西而设计的。此外演习是在地图上展开的，上面的地形是苏联实际的边界和领土，德军和苏联各边境军区都有可能在这里集结兵力。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演习总结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斯大林出席了这次总结会。

总参谋长梅列茨科夫大将介绍了演习的经过。当他列举双方的兵力并说“蓝军”在演习开始阶段在坦克和空军方面占有优势时，这一天心绪不佳的斯大林有些焦躁不安，因为根据对双方行动的客观评价，在演习中占上风的是“蓝军”而不是“红军”。他打断梅列茨科夫的话说道：

“不要忘记，在战争中重要的不仅是数量上的优势，还有指挥员和部队的作战艺术。”

随后发言的是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他评价了演习双方的行动，还谈到了高级指挥人员战役战术素养的提高。

在铁木辛哥之后发言的是巴甫洛夫上将。斯大林马上问道：

“‘红方’部队行动失利的原因是什么？”

巴甫洛夫试图开个玩笑支吾过去，他说：

“军事演习中这是常事。”

但斯大林不爱听这个玩笑，他指出：

“军区司令应当掌握军事学术，善于在任何情况下作出正确的决策，而在你们进行的演习中没有体现出这一点。”

朱可夫在巴甫洛夫之后发言。他说：

“为了提高军区和集团军司令和参谋人员的军事素养，必须在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部的领导下开始演练大规模配备通讯器材的首长司令部野战演习。”朱可夫还谈到他所担心的事情：“我认为，白俄罗斯的筑垒地区距离边界太近，并且它们的布局，特别是在比亚韦斯托克突出部，在作战中非常不利。敌人可以从布列斯特和苏瓦乌基地域突击我整个白俄罗斯军队集团的后方。此外，由于筑垒地区的纵深很小，难以长久坚持，因为敌人的炮火可以达到全部纵深。我认为应在较深远的地方

构筑筑垒地区。”

朱可夫说这些话根据的是刚刚进行的演习，他作为演习的进攻一方，发现了边界筑垒地区的这些缺陷。但这些筑垒地区建在白俄罗斯军区的辖区内，因此巴甫洛夫听后不高兴地说：

“那乌克兰的筑垒地区的位置是否合适？”

“在乌克兰选择构筑筑垒地区位置的不是我，”朱可夫回答说，“但我认为，在乌克兰也应当在距边界较远的地方构筑筑垒地区。”

“筑垒地域应根据总军事委员会批准的计划构筑，而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副国防人民委员沙波什尼科夫元帅。”伏罗希洛夫严厉地反驳道。

朱可夫不再争论，坐到了自己的位子上。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还有库利克元帅，他主张使用马力牵引的大炮，根本不懂得机械化部队和坦克部队的作用。

“目前还不宜开始组建坦克军和机械化军。”库利克说道。

对此铁木辛哥反驳说：

“军队领导干部都十分清楚部队尽快机械化的必要性。只有库利克对这些问题还不清楚。”

斯大林插话说：

“哪一方的坦克多，部队的摩托化程度高，哪一方就将取得战争的胜利。”

会后第二天，斯大林把朱可夫召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稍作寒暄后说：

“政治局决定解除梅列茨科夫的总参谋长职务，任命您接任这一职务。”

对于朱可夫来说，这是完全没有想到的，这不仅是因为他不是参谋人员，而且还因为总参谋长这样高的职务弄得他不知所措，他沉默了很久，而后说道：

“我从没有做过参谋工作。我一直在部队中工作。我干不了总参谋长。”

“政治局决定任命您。”斯大林说道，并特别强调“决定”一词。

朱可夫知道，对政治局的决定，特别是由斯大林亲口说出的决定表示异议是没有用的，于是回答说：

“好吧，要是发现我这个总参谋长不称职，我将请求重返部队。”

斯大林笑了笑说：

“就这样定了！明天宣布中央的决定。”

叶廖缅科元帅在196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对斯大林如何使用高级将



领的问题得出了一个新奇的结论，他说：“斯大林远离部队，他不愿意倾听将领们的意见。这方面的一个有说服力的事实是，这位未来的最高统帅从不参加审议和讨论我国军事学说基本问题的军事委员会会议。”

叶廖缅科在斯大林生前是他的“爱将”，最高统帅对这位未来的元帅在指挥战役方面的许多错误和失败都未加追究（单是叶廖缅科1942年在同古德里安的对决中遭到的可耻失败就够受的了）。战后叶廖缅科在他的文章和著作中立即对“各个时代和各族人民的伟大统帅”大唱赞歌，但在对斯大林怀恨在心的新总书记赫鲁晓夫上台后，叶廖缅科却揭露出这样的怪事！辩证法不是说一切都在运动、一切都在变化吗？不是一切。难怪人们说：随着时间的流逝人将失去健康、美貌、虚荣心，只有愚蠢不会与人告别。

十 战略计划

从远古时代起，每位统帅或每位国家元首在考虑可能爆发的战争或在计划对某个目标发动进攻时，总是先要计算一下自己的兵力和潜力以及要面对的敌方兵力。在古代，这些计划也许只存在于统帅的头脑中，但毕竟还是有的。预先不进行计划和计算，根本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这是每一个拿起武器的人都知道的。随着时间的流逝，由于军队的增加和交战规模的扩大，必须制订详尽的计划，而这些计划脑子是根本记不住的。考虑到指挥不断壮大的军队的不是一位统帅，而是许多高、中、低级助手，而且必须使所有人对即将采取的行动认识一致，于是开始编制书面计划。这些计划每一个国家都有，因此未来的对手们在得知存在这些计划后，自然要想方设法地看到它们，也就是展开侦察并完全地或部分地把这些计划弄到手。19世纪，军队的规模越来越大，卷入战争的已经不是军队，而是整个民族，战前特别是战时参加对抗的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对于这样的战争必须预先进行全面的策划。

我们过去有过这样的计划吗？当然有。在我国军事科学基础上制订的计划也具有相应的水平。但后来查明，制订的计划不符合当时的政治形势，特别是希特勒匪徒在欧洲已经爆发的战争中采用的作战形式和手段。

用不着作深入分析就能了解出现这种不幸的原因。如果说领导制订国防计划和与潜在敌人作战计划的主要人物、总参谋长叶戈罗夫元帅是“外国间谍”，中央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以及差不多所有军区的司令也是“外国特务”，那么自然可以认定，他们制订的计划已经被“我们的敌人所知晓”，应当对这

些计划立即进行“修改”。而且，应当进行彻底修改，使这些计划与敌人已经知道的计划不一样。既然如此，那么谁要是试图保留原有计划中的某些合理想法，就有可能被怀疑是与“人民的敌人”关系密切。

30年代不仅出现了编制双份计划的理论，而且已付诸实施。一份计划是动员计划，其中规定在动员性展开武装力量、将经济和各个国家机关转到战时条件下运转体制方面采取各种措施的办法和期限。不仅整个武装力量，而且各军团、兵团、部队以及机关和工业企业，都要制订这样的计划。按照这一计划，在宣布动员后适龄者能立即应召入伍，工厂能立即转产军工产品。

此外，总参谋部还要制订战略性展开武装力量的计划。计划规定：将兵力集中到选定的方向上，建立必要的军队集团，将部队调到指定地域，转移空军基地，安排好后方和技术保障设备，各兵团和部队进入出发地域、地区和发射阵地——所有这一切都是根据总的战略意图进行的。

领导总参谋部的从1928~1931年是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而从1931~1937年为经验同样丰富、革命前就是军官的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叶戈罗夫被捕后，从1937~1940年8月，沙波什尼科夫重又出任总参谋长。1940年5月他被授予元帅军衔。

发生变化的不只是总参谋部的领导层，与此同时政治形势也出现了变化。1939年秋和1940年春，苏联的欧洲国界西移了几百公里，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红军中配备最新技术装备和武器的兵团数量迅速增长。因此应当再次对战略性展开武装力量的计划进行修改，这一工作从1939年秋起由总参谋部主持。第一个方案到1940年7月制订完毕。

这里我要稍微插叙一点：关于制订动员计划和战略展开计划的情况属于最高国家秘密和军事秘密，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即使战胜法西斯德国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高级将领和国务活动家在回忆录中也只是笼统地提到这些计划。

战争前夕在制订国防计划时提出（根据欧洲的现状），最有可能成为苏联敌人的是与意大利、罗马尼亚、芬兰和匈牙利结盟的法西斯德国。同时还提出，土耳其在希特勒匪徒的压力下有可能公开反对苏联；第二个现实的敌人是日本，它有可能与德国同时在远东发动军事行动。因此总参谋部制订了两个方向的国防计划，但主要方向都是西线，总参谋部认为必须把苏联武装力量的主力集结在那里。

尽管希特勒匪徒已经表明其用训练有素、动员待命的军队发动突然进攻的闪击战战略和战术，我国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仍在继续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队动员的经验进行计算（当然也考虑到由于铁路网、

公路网以及航空网更加四通八达而使展开的速度更快)。据预测,德国把兵力集中到苏联边界需要10~15天,罗马尼亚需要15~20天,芬兰以及开赴芬兰的德国部队需要20~25天。这是一个重大的失误。

当时预计,德国及其盟国将在我国西部边界展开233个师,配备10550辆坦克、13900架飞机和大约18000门野战炮。

我国总参谋部拟定要在西部边界集中146个步兵师(其中23个师要用15~30天作好战斗准备)、18个摩托化师、16个坦克师和10个骑兵师、14个坦克旅、172个航空兵团。

根据苏联的军事学说,我国部队在击退敌人的第一次进攻后应转入进攻,消灭东普鲁士和华沙地域的敌军部队并前出至维斯瓦河下游。同时在战线的左翼应当对伊万哥罗德实施辅助突击,以歼灭敌卢布林集团并随后前出至维瓦斯河中游。

计划详细描述了突击方向、集中地域、部队数量和任务以及各舰队、空军的任务等。

参与计划制订的是总参谋长鲍·米·沙波什尼科夫、作战部部长尼·费·瓦图京中将与作战部副部长格·卡·马兰金少将。但由于计划草案只要一份,直接起草人是作战部副部长亚·米·华西列夫斯基少将。第一个方案未经国防人民委员签署,是由总参谋长鲍·米·沙波什尼科夫签署的。这份苏联国防计划着重对当时的战略态势、可能的敌军集团及其侵略行动作了仔细的有说服力的分析,基本准确地确定了最危险的战争区和苏联武装力量主力的主要方向。

这份计划当然也存在一些缺陷。除了时间上的失误,其中的主要缺陷是总共只制订了一个方案,而通常这样的计划对敌我双方的行动都要提出几种方案。

亚·米·华西列夫斯基在回忆录中谈到这份计划的制订时写道:

“1940年9月,当面向斯大林汇报了这份关于红军部队战略展开的草案和计划,在场的还有几位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人民委员谢·康·铁木辛哥、总参谋长基·阿·梅列茨科夫和第一副总参谋长尼·费·瓦图京代表国防人民委员部对计划作了说明。我和A.Φ.阿尼索夫将军把计划送到了克里姆林宫,在对计划进行审议的几个小时里我们一直呆在斯大林秘书处的办公室内。我在讲述后来事态的发展之前要指出为什么在向党中央提交极其重要的作战文件时文件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和文件主要构思的提出者没有在场的原由。这是因为1940年8月任命基·阿·梅列茨科夫大将为总参谋长,取代了鲍·米·沙波什尼科夫。

至于鲍·米·沙波什尼科夫离职之前发生的事情，我是听沙波什尼科夫本人说的。据他说，斯大林为此专门召见了，与他谈话时十分客气，十分尊重。他说，苏芬武装冲突发生后我们调动了伏罗希洛夫的工作并任命铁木辛哥为国防人民委员。在芬兰问题上您的意见是对的：情况正如您所预料的那样。但这只有我们知道。其实大家都明白，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长并肩工作，共同领导武装力量。特别是我们不能不考虑在目前复杂局势下尤为重要的国际舆论。如果我们的调动仅仅限于国防人民委员一人，我们将得不到理解。此外，世界应当知道，与芬兰冲突的教训得到了充分重视。这对于给我们的敌人留下应有的印象，让帝国主义者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是很重要的，领导人正式的重新配置追求的正是这一目的。

‘您有什么意见？’斯大林问道。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是一个严守纪律的人，他回答说任命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不久他受命领导建设防御工事，担任了副国防人民委员并分管军事工程总局建设筑垒地域的工作。

对于我们总参谋部工作人员来说，鲍·米·沙波什尼科夫调任其他职务的原因成了不解之谜。老实说，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遗憾。”

这样一来，向斯大林报告新计划草案的就是新任总参谋长基·阿·梅列茨科夫大將了。

斯大林不同意总参谋部关于敌人可能的主要突击方向在西北部的意见。斯大林显然还记着“自己”粉碎邓尼金的计划（他的考虑是，顿巴斯、乌克兰南部是强大的无产阶级工业经济地区），但没有考虑到时过境迁，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仍然倾向于这一南部地区并下令按照主要交战将发生在南方的基调制订计划。因此方向完全变了，即把我们主力从西北方向转到了西南方向。

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现在一些战争回忆录的作者认定，战前我们没有武装力量动员计划和战役战略展开计划。事实上总参谋部当然制订了武装力量作战和动员计划。这些计划的制订和修改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计划修订之后立即向国家领导人上报，批准之后马上下达各个军区……”

早在1940年秋天，总参谋部就对原先的作战计划进行了重大的修改，使之更符合一旦遭到进攻时必须完成的任务。但计划中存在战略错误，这是由一个错误的论点造成的……”



斯大林认定，希特勒匪徒在对苏战争中将首先力图占领乌克兰和顿涅茨煤田，以夺取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地区，掠夺乌克兰的粮食、顿涅茨的煤以及高加索的石油。斯大林在1941年春天审议作战计划时说：‘没有这些至关重要的资源，法西斯德国就不可能进行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

斯大林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去怀疑他的意见和对形势的分析。然而在对敌主要突击方向的判断上斯大林确实犯了错误。”

当时情报部门获得的信息似乎也证实了斯大林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在1941年4月初向斯大林报告说：

“……德国已最终决定进攻苏联并在不久之后付诸实施。进攻的作战计划规定向乌克兰发动闪击式突击并进一步向东推进……”

极力迎合斯大林、希望获得他的赏识的心理在这份文件中暴露无遗。顺便说一句，希特勒匪徒在制订战争计划时曾有过一个南方方案，但在梅尔库洛夫报告时（1941年4月）这个方案早已被放弃，总参谋部的军事情报部门早已获得了更准确的情报并向斯大林作了汇报。对此朱可夫写道：

“1941年3月23日，情报部长菲·伊·戈利科夫将军向领导人送上了一个报告，其中有十分重要的情报。

这个文件讲到德国法西斯军队进攻苏联时可能的突击方向的几个方案。后来查明，这些方案依次反映了希特勒统帅部‘巴巴罗萨’计划的制订过程，而其中的一个方案实际上反映了这一计划的基本内容。

报告说：从最有可能的对苏军事行动中，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第三方案……根据1941年2月的情报：

报告写道：‘……为了进攻苏联，将建立三个集团军群：第1集团军群由莱布元帅指挥，向列宁格勒方向实施突击；第2集团军群由博克元帅指挥，向莫斯科方向实施突击；第3集团军群由龙德施泰特元帅指挥，向基辅方向实施突击。开始进攻苏联的时间，大约在5月20日。’”

不愿意失宠的戈利科夫将军深知斯大林推迟战争爆发的意见和愿望，于是作出了与情报完全不符的结论：

“1. 根据上述言论和今春可能的作战方案，我认为，发动对苏战争最可能的时间，是在战胜英国之后或在德国缔结光荣的对英和约之后。

2. 应当把关于今春对苏战争不可避免的传言和文件看作是由英国情报机关甚至可能是德国情报机关散布的假情报。”

1941年5月6日，海军人民委员尼·格·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给斯大林的一份报告写道：

“驻柏林海军武官沃龙佐夫海军上校的报告称，据希特勒大本营的一名德国军官说，德军准备在5月14日借道芬兰、波罗的海沿岸和罗马尼亚入侵苏联。同时计划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实施猛烈的空袭，并派伞兵在边境中心城市实施空降……”

这份文件提供的资料同样有极重要的价值。历史学家（包括库兹涅佐夫本人）指出这份报告是海军上将的功劳。然而尼·格·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向领导人提出的结论却与他列举的事实不符：“我认为，情报是假的，是专门用来试探苏联对此作出的反应的。”（这些结论在回忆录中没有提到）而斯大林在听取类似的“两面光报告”时，肯定会信以为真。

在进攻开始前的最后几天，情报人员、外交官（苏联的和外国的）、国际上的好心人、投诚者发出的战争即将爆发的警告特别多。但另一个方面，贝利亚这个得到斯大林无限信任的最亲近的人，却在1941年6月21日报告说：

“我再一次要求召回和处分我国驻柏林大使杰卡诺佐夫，他依然用希特勒已做好进攻苏联的准备的‘烟幕’来骚扰我。他说这一进攻明天开始。驻柏林武官瓦·伊·图皮科夫少将也一再电告类似情况。这位愚蠢的将军根据柏林间谍的话认定，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三个集团军群将进攻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

1941年6月16日，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弗·尼·梅尔库洛夫送来的柏林发回的情报摆到了总书记的办公桌上：

“在德军空军司令部工作的提供消息的人士称：

1. 德国对苏武装行动的一切军事准备措施均已完成，突击随时有可能实施。”

接下去列举了许多证明这一结论的具体事实。斯大林被消息最灵通的亲信们相互矛盾的报告弄得晕头转向。

我国驻法国武官苏斯洛帕罗夫将军报告称，据可靠消息，进攻定在6月22日。6月21日，斯大林在这份报告上批示：“这一消息是英国人的反间计。查明这一消息的始作俑者并加以惩处。”

贝利亚处罚了那些提供真实消息的情报人员，根本没有料到斯大林对同希特勒签订的条约深信不疑，已落入德国精心策划的虚拟情报的圈套。

下面是贝利亚1941年6月21日在一份综合情报上作的一个批示：

“最近许多工作人员被卑鄙的挑拨所迷惑并散布恐慌情绪。‘雅斯特列布’、‘卡门’、‘韦尔内’的秘密特工是企图离间我们与德国关系的国际挑拨者的帮凶，他们不断散布虚拟情报，应被送进劳改营化为齑粉。对其余人应提出严重警告。”

斯大林、贝利亚及当时的其他许多领导人为什么执迷不悟，不愿意正视实际情况呢？当然不能认为他们心怀叵测。他们不可能希望自己的国家和军队倒霉和失败。他们犯了错误？

可以说，这是对他们行为最合适的评判，甚至是对他们的某种开脱。原因是，我们今天在评判侦察情报时，已经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而在进攻发生之前的时期，相互矛盾的情报像潮水一样涌向斯大林；此外，政治家、将领、外交官的评论将人们弄得晕头转向，他们每个人都竭力要你相信，只有他的论据和判断才是正确的。

说实话，斯大林要搞清这混乱的信息并非易事。尽管如此，他仍然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一切材料都看，所有人的话都听，但内心深处却坚信，他不仅同希特勒达成了协议，而且骗过了他。

除了情报混乱不堪、自相矛盾以外，德国人还精心策划和实施了散布虚拟情报的行动。

为了说明希特勒匪徒散布虚拟情报的手段，下面从文件中摘引几小段话。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给军事侦察和反侦察局的指示

近几个星期部队在东部的集中大大加强……我军在俄国边境

的重新部署绝不能给人造成我们准备进攻东方的印象……为了侦察工作本身，也为了可能要对俄国情报机关的质询作出答复，应当遵循下述基本原则：

1. 掩饰德军在东部的总人数，方法是尽可能地散布这一地区的兵团正在加紧轮换的传言和消息。要把军队的调动说成是把它们调往训练营地，是改编……

2. 制造假象，说我军调动的主要方向已转到南方总督管辖地区……部队在北部的集中相对较少……”

接下去是许多这一类的措施。

我们知道，希特勒匪徒成功地散布了这一虚拟情报。斯大林不相信德军的集中是为了发动战争。而即使采取了措施，那么我们也如德军所希望的那样，认为主要突击将指向南方。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参谋长 1941 年 5 月 12 日关于开展第二阶段对敌虚拟情报以保守对苏集中兵力的秘密的指示

1. 对敌虚拟情报的第二阶段于 5 月 22 日开始，届时将实行最密集的列车运行时刻表。在这一时刻，为误导敌人，各高级司令部和和其他参与制造虚拟情报的机关应当竭尽全力把为‘巴巴罗萨’战役集中兵力的行动说成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机动。由于这一原因，必须特别加紧继续做好进攻英国的准备……

2. 如果德军^①得知即将举行进攻的确切情况并把这一信息扩散到全国，那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将付之东流……应当统一为所有的武装力量制定关于这个问题的指示。

……不久将向一些部委下达进行对英国的佯动的任务……”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可见，希特勒统帅部对自己的部队也没有亮出底牌。希特勒在法国沿海全力进行“海狮”战役的准备。当“巴巴罗萨”计划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后，正像德国将军齐默尔曼所写的那样，“6月初陆军总参谋长的代表来到德国西线军队总司令部大本营并告诉来开会的军官们说，所做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只不过是迷惑敌人而采取的必要措施，现在可以停止这些工作了……所有这些准备工作只是为了掩饰策划中的东方战局，当时这一战局对于最高统帅来说已是定案了。”

^① 原文如此，似有误 ——译者注

德国领导人在制造虚拟情报方面显示了高超的专业技能。但苏联情报机关尤其是军队情报机关的本领也毫不逊色。苏联情报机关获得了相当可靠的信息，足以使苏联领导人对形势作出正确的评价并击退德国的进攻。

然而斯大林相信他与希特勒签订的协议，不允许任何人劝说他怀疑他所希望的这种秘密伙伴关系。再说也不能不相信——希特勒一丝不苟地履行了协议的条件：瓜分波兰，在苏芬战争中保持中立，默认波罗的海沿岸各国、西白俄罗斯、西乌克兰、比萨拉比亚加入苏联……

最主要的是斯大林坚信，希特勒不会这么愚蠢，在对英战争没有结束、自己还没有腾出手来的情况下进攻苏联，从而同时在两条战线作战。

对斯大林在战前最后几个月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形势下采取的行动进行总结和评价时可以断定，斯大林在战术上即在确定进攻的具体时间方面（尽管希特勒不止一次地变更这一时间）犯了错误，但斯大林在战略计算上是正确的：他推迟了战争的爆发，更新了（尽管不是全部）军队的装备，改造了工业，使人民有了思想准备。

十一 希特勒的计划

我们先说好，不要去理睬我国宣传部门长期以来丑化和中伤希特勒的种种说法，如说“元首精神不正常”，是一个患精神分裂症的“上等兵”等等。这一切让我国的政客们去负责吧。按照他们的意见，嘲弄和羞辱可以使敌人名誉扫地，身败名裂。这种短视和非理性的宣传只会使人们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上等兵就把我们赶到了伏尔加河，那我们算什么人呢？

不，希特勒是一个杰出的组织者——他在从1933年到1939年的6年中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几乎攫取了整个欧洲。他还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战略家。至于他在政治上打错了算盘并过于冒险，这是另一回事。

在战时（和战前）由于命运的安排希特勒成了斯大林的主要对头，因此我认为，不时看看“对方”，了解那里发生的情况，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和有益的。不仅如此，对方发生的所有事件都在某种程度上对斯大林作出某些决策产生了影响。

不同的学者和历史学家争论的一个问题是，希特勒究竟是什么时候决定进攻苏联的。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什么重要的细节，至少不是原则性问题。希特勒迟早都要率领他的武装力量进攻俄罗斯，这在他政治生涯的初期就已定下来了。我已经引用过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所说

的话。还可以援引许多言论，所有这些言论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不仅他本人认为可以通过夺取苏联的土地来扩大德意志帝国的版图，而且国内外的反动势力也都怂恿他这样干。

希特勒本人也讲过他的这一决策是怎样酝酿成熟的。他在1939年11月23日有将军们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叙述了这一决策。

“我们会见的目的是想让你们对我现在坚持的全部思想有所了解，让你们知道我的决策……我是在1933年取得政权的。在这之后进行了长时期的艰苦奋斗。我接手的一切都已破产，我必须对一切重新改造，从人民到军队。首先进行内部改造，消除分裂和失败主义现象……在这之后我下令进行武装。对此有许多人预言不会成功，相信的人非常少。1935年实行了全国征兵制，在这之后重新武装莱茵州——又是一个没有人认为能成功的战役。相信我的人寥寥无几。随后开始在全国修建工事，首先在西部。

一年之后奥地利问题提上日程。许多人对这一行动持怀疑态度，然而这一行动使国防军得到极大增强。下一个行动是——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波兰……

但这时我仍然不知道，我是应该先突击东方而后再突击西方呢还是相反。毛奇当时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事态发展的结果是先从波兰下手……

也许会有人指责我说：除了斗争还是斗争。但我认为斗争是整个生物界的本质。谁都不能回避斗争，如果他不想灭亡的话。人口数量不断增长，而这需要扩大生存空间。我的目的就是建立人口数量与生存空间之间的合理比例。为此必须进行战争。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回避这个课题，否则它就会灭亡。这是历史的教训……

我犹豫了很久，不知从何下手——从西方还是从东方。然而我建立军队的目的不是让它不实施突击，我的内心始终在准备打仗。结果我们首先成功地对东方发动了突击。迅速结束对波战争的原因在于我国军队的优势，这是我国历史上光荣的一页。我们在人员和装备方面的损失出奇地少。现在我们在东方战线只需保持几个师的兵力。现在形成了我们原先认为不可能的局面：在西方敌人缩在工事后面，无法对他们进行攻击。

现在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能维持这种局面多久。俄国目前没有危害，它由于国内一系列事件而遭到削弱，而除此以外，我们同它签订有条约。但条约只有在合适遵守的情况下才会得到遵守……

我们只有在西方腾出手之后才能进攻俄国。”

1940年在击溃法军后，希特勒及其战友们认为实施他们的侵略意图的绝好时机来到了。

元首不愿意浪费时间。1940年6月22日，法国宣布投降，这一天哈尔德接到了希特勒和布劳希奇关于制订入侵苏联计划的指示。

我的面前放着一些纸张已发黄的过时文件。曾几何时，这些文件的内容是最高机密。一开始这些文件是手写的，为的是不让打字员知道内情。而后，即使翻印，也只是印几份，每一份都专门进行了登记。这些文件在传阅时必须当面交接或通过专职军官，而且公函用专门的印记和巧妙的装置封好，不让收件人之外的任何人了解文件的内容。每个阅件人都被列入专门的名单，一旦消息泄露，可以确定究竟是谁泄露或出卖了秘密……

如今制订这些可怕计划的人和他们图谋反对的人都已长眠地下，秘密已经不再是秘密——现在这些文件，确切说是文件的复制件，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现在它们也摆上了我的案头。但文件开头的警语似乎仍然在发出警示：“绝密”，“仅供首长传阅”，“必须通过军官传递”。

每一份文件的制订通常都要许多时间，文件起草前先由希特勒作指示，然后搞出几种方案，由总参谋部制订出草案，而后在高层进行讨论，最后产生最终训令，军队据此开始行动。

希特勒匪徒给自己的计划冠以各种代号：“奥托”、“韦斯”、“格律恩”、“格尔布”、“海狮”等等。这些代号不仅体现了骑士时代的某种气息（希特勒匪徒是在卖弄本国的传统），而且反映了参谋人员的专业技能：不用作过多的解释，仅凭一个词就能明白指的是什么：“格律恩”指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韦斯”指与波兰开战，“格尔布”指与法国开战……

还应当记住，这些计划是在外交活动的掩护下，在用报刊、电台、口头方式等各种可能的手段进行广泛宣传和反宣传的同时产生的。而且所有这一切的一个主要任务是转移视线，进行伪装，简单地说就是欺骗其他国家及其政府和人民。这方面还包括强大的、精心保密的情报机关和反间谍机关网，这些机关无处不在，用它们看不见的网控制准备进攻的那个国家，刺探这些国家的机密并散布流言，一方面转移人们对侵略者真实意图的注意，另一方面是预先制造对其强大实力的恐惧。

希特勒用腓特烈一世的名字巴巴罗萨命名的“巴巴罗萨”计划，是一个周密策划、精心制订的对苏战争计划，希特勒为此作了多年的努力，他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在欧洲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

“巴巴罗萨”计划我看过许多遍，说老实话，如果暂且不提这一计划无耻而阴险的侵略性质，我每一次都对计划制订者高超的军事参谋技能感到惊讶和叹服。也许这是我作为一名总参谋部参谋特殊的感受，但我知道，指令性文件中的每一句话都分量沉重且意义巨大，为了把丰富的思想用几个词或几句话表达出来，也为了让阅读和执行命令的人能正确地领会其意图，需要做过细的工作，需要具备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否则执行者的协同动作就会不协调，而这样的执行者多达数百人，由于不理解和不协调，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有可能丧失生命。

……总之，希特勒作了详尽的指示，这些指示成了未来计划的基础。在哈尔德的领导下制订了两份各自独立的计划方案。其中一个方案是由约德尔及其副手瓦尔利蒙特将军在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制订的。这个方案的代号是“洛斯堡计划”，该方案于9月15日制订完毕，它与另一个方案——马克斯将军的方案的不同之处是，它将主要突击定在战线的北段。

希特勒在作出最后决策时赞同约德尔的看法。

顺便说一句，早在制订“巴巴罗萨”计划时希特勒就表明他在某些方面比他的将领们更有远见，后来这些人指责他作出的决策没有根据，而把自己说成是清醒的、理智的和谨慎的人。当谈起提出的目标时，布劳希奇声称，“北方”集团军群的最近目标是普斯科夫和列宁格勒，“中央”集团军群的目标是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南方”集团军群的目标是基辅。换句话说，他提出了一个极其冒险的建议，要求三个集团军群一鼓作气地从边界一下子打到上述城市并加以占领。希特勒则指示把战役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歼灭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敌人，从而为随后对莫斯科实施翼侧冲击建立可靠的基地。这些从军事角度来看完全合理的指示在最终计划中得到了反映。

当这些方案制订出来之后，保卢斯将军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他的任务是把所有计划汇总起来并充分考虑元首在各种会议上发表的看法。

命运跟保卢斯将军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正是他这个制订进攻苏联的最终计划的人成了德国元帅中被俘的第一人。当时他的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附近被围并被歼灭，而他本人则当了俘虏。

顺便说一句，保卢斯元帅被俘后就一些问题写了一些回忆录和札记，其中包括关于制订“巴巴罗萨”计划经过的札记。我认为，侵略计划制订者之一的这份证明将引起读者的兴趣，因为他无疑比其他人更了解希特勒的意图。

真是无巧不成书，历史上往往有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雷同：1940年12月末和1941年1月初，在莫斯科召开了党的领导人和高级将领会



议并进行了一系列战役导演，而稍早时候在柏林进行了类似的军事导演并召开了军队和纳粹领导人会议，讨论并制订了“巴巴罗萨”计划。这次军事导演是在保卢斯将军的领导下进行的。

我们有可能了解到德方军事导演的经过。保卢斯元帅本人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了这次军事导演：

“1940年12月中在我的指挥下在佐森的陆军司令部大本营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巴巴罗萨’战役的预备导演……

今天，当名为进军东方的战役的真实进程已经成为历史后，了解当时的想法和当时对可行性的评价对于关心军事问题的人来说很有好处：下面我叙述一下司令部军事导演的基本观点——当然不能把讨论的所有细节都一一涉及。

……主要目标是莫斯科。要实现这一目标并消除来自北方的威胁，必须歼灭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的俄军。随后计划占领列宁格勒和克琅施塔得，使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失去基地。在南方，第一个目标是乌克兰及顿巴斯，而下一步则是高加索及其油井。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计划认为占领莫斯科具有特殊的意义。然而应当在占领莫斯科之前先占领列宁格勒。占领列宁格勒可以达到几个军事目的：摧毁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的主要基地，破坏列宁格勒的军事工业，使其不能成为对进攻莫斯科的德军进行反攻的集结地。

当我谈到当时作出的决策时，我并不是想以此说明，重要的指挥官和参谋的意见完全一致。当时许多人一是担心整个战役的可行性，二是担心达到既定目标将遇到许多困难。另一方面，尽管说的人不多，但仍有人提出，完全可以预料苏联的抵抗将由于国内的政治上、组织上和物质上的困难，由于所谓的泥足巨人的弱点而迅速瓦解……”

对保卢斯的回忆录先引用到这里，现在谈一谈事态进一步的发展。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在讨论这次军事导演时说：

“战役将要进行的地域被普里皮亚季的沼泽分为南北两半。南半部道路极差，最好的公路和铁路位于华沙—莫斯科一线。因此北半部调动大量部队的条件比南半部优越，此外，在俄军的部署方面预计将会在俄德分界线方向集结大量军队。应当认为，离原俄波边界不远处有一个由野战工事隐蔽起来的供应基地。第聂伯河和西德

维纳河是俄军被迫交战的最东部地区。如果他们继续退却，就无法保卫自己的工业区。因此，我们的意图应当是，通过坦克楔入阻止俄国人在这两条河以西构筑绵亘防御正面。特别是大突击集团应当从华沙地域向莫斯科进攻。在上述三个集团军群中必须把北方集团军群派往列宁格勒，而南方集团军群则应对基辅实施主要突击。战役的最终目标是伏尔加河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域。总共需要投入105个步兵师、32个坦克和摩托化师，其中大量部队（两个集团军）在开始时应作为第二梯队。”

希特勒参加了军事导演，他赞同上述战役意图并就此指出：

“十分重要的目标是不让俄军在后撤时保持战线的完整。进攻应当尽量向东深入，使俄国空军无法对德军所在地域进行袭击，另一方面使德国空军能够对俄国军事工业区实施空中突击。为此必须歼灭俄国武装力量并阻止其重建。第一轮突击就应投入重兵，以期能够歼灭敌大量部队。因此应当在将要实施主要突击的两个北方集团军群的相邻两翼投入快速部队。在北方必须包围驻扎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敌部队。为此将要进攻莫斯科的集团军群应拥有足够的兵力，以便能够把相当多的部队转到北方。在普里皮亚季沼泽以南进攻的集团军群应当晚些出动，通过从北方包抄将大量敌军包围在乌克兰……实施整个战役预计需要130~140个师的兵力。”

1940年12月18日，希特勒签署了制订完毕的“巴巴罗萨”计划。

十二 斯大林揭开帷幕

斯大林面对杂乱无章、错综复杂的侦察材料，始终不渝地贯彻自己的主要战略意图：尽量推迟战争的爆发，使军队做好反击德军突击的准备。1941年5月，斯大林意识到战争的爆发已不可避免。他的“不受人挑拨”的努力已告结束，应从推迟战争爆发的战略转而采取与新形势相适应的新战略。

1941年5月5日，斯大林第一次说出了他一直以来的意图。他是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军校毕业生时做这番表白的。

这一天斯大林谁都没有接见，一直在认真准备将要发表的讲话。他只与日丹诺夫谈了话，日丹诺夫由于被任命为苏共中央书记而从列宁格勒赶来。

为什么斯大林偏偏在5月初公开提出改变战略呢？因为3~4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盟友”希特勒已经彻底置与斯大林签订的协议于不顾，转而公开在东方采取进攻行动。

那时发生了下述事件：1941年3月25日，南斯拉夫（在希特勒“第五纵队”的帮助下）加入德国-意大利-日本“轴心”。英国人对这一事件立即作出反应（也是在其“第五纵队”的帮助下），3月26日夜在南斯拉夫发动政变，扶持亲英的瓦西莫诺维奇政府上台。

斯大林也采取措施阻止德国向南推进：1941年4月6日，苏联和南斯拉夫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

几个小时之后，希特勒就以公开进攻对“盟友”斯大林的这一举动作出反应——希特勒的部队向南斯拉夫和希腊挺进并占领了这两个国家。

希特勒不可能采取别的行动，因为在后方出现一个敌对的南斯拉夫不仅使他失去原料，而且最可怕的是南斯拉夫实质上会取代被打垮的法国，在德国向苏联进攻时成为第二个潜在的西战场。

对于德国来说，两条战线作战意味着死亡，历史不止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希特勒没有丝毫犹豫，没有让新政权站稳脚跟，没有玩弄外交手腕和政治把戏，立即用武力摧毁了英国人与新政府的打算。希特勒在与其心腹的谈话中愤怒地指出，“苏南条约是一个明显针对德国的战线”，这背离了友好条约，总之他有情报表明，苏联在从波罗的海到里海的整个战线上做了大规模军事准备。

盟友关系实际上已经破裂，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双手在友好拥抱之后拿起了武器。斯大林决定在国内进行秘密的局部动员并向西部边界再重新部署5个集团军。5月4日，政治局秘密决定任命斯大林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仍然担任中央第一书记，但由于今后他的工作将转向军事问题，为帮助他处理党务和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政治局从列宁格勒召来了日丹诺夫。显然，5月5日斯大林在接见如今的亲密战友时向他讲了战略意图。

斯大林与日丹诺夫谈话之后，在晚6时之前准备了重要讲话。6时前聚集在大克里姆林宫的有16所军校和一些普通高校9个系的毕业生、教授和教师，来到这里的还有工农红军和中央机关的高级领导人。

斯大林在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陪同下来到会场。

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元帅宣布大会开始。第一个发言的是工农红军院校管理局局长伊·卡·斯米尔诺夫中将。在他之后“全联盟的班长”米·伊·加里宁向毕业生们致祝词。第三个登上讲台的是斯大林。

他的讲话由于极其保密，没有作速记记录，广播也没有加以转播。



这篇讲话的内容长时间里没有作为文件存档。后来根据提纲和与会者的回忆对斯大林的讲话作了复原。

斯大林首先祝贺毕业生们完成了学业，然后转入正题：

“同志们，你们在三四年前告别了军队，如今将重返部队，而军队将使你们感到陌生。红军已经不是几年前的样子了……”

我们改造了我们的军队，用现代化军事技术装备武装了它。但首先应当指出，从军事经验的角度来看，许多同志夸大了哈桑湖和哈拉哈河事件的意义。当时我们遇到的不是一支现代化军队，而是一支旧军队。不向大家讲清这一点，就是欺骗大家。当然，哈桑湖和哈拉哈河起了积极的作用。其积极作用在于，我们在这两次都战胜了日军。但我们是从俄芬战争和西方当代战争中获得了改造我国军队的经验的。

我说过，我们拥有一支用最新技术装备武装起来的现代化军队。我们的军队如今的情况如何呢？

原先红军有120个师，现在我们的军队有300个师。师的规模稍有缩小，但快速性更强。原先每个师有18 000~20 000人，现在减为15 000人。

在所有的师中，三分之一为机械化师。这一点没人谈过，但你们应当知道。在这100个师中三分之二为坦克师，三分之一为机械化师。今年我军将拥有5万辆拖拉机和卡车。

我军的坦克面貌一新。原先所有的坦克都是薄钢板的，现在这是不够的，现在需要厚度增加两三倍的钢板。我们拥有一线坦克，它们将撕开敌战线。我们拥有二三线坦克，这是掩护步兵的坦克。坦克的火力增强了……”

接着斯大林对现代化炮兵、空军、机械化部队作了评述。

现在发现斯大林在第一部分讲话中所讲的与军队的实际情况有些出入。例如，当时还没有300个师，更谈不上其中“三分之一”为机械化师，“100个师中三分之二为坦克师”。

斯大林说有这样的战备实力，显然是希望消息泄露出去，想以此吓唬一下希特勒，使其再一次推迟进攻。

但从这一计算中可以看出斯大林最近打算实现的目标。他在1939年说过，需要用两年时间重新装备军队并使其做好准备。现在两年过去了，斯大林即使没有完全也是基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军队确实已经今非昔比。需要、非常需要再花不长的时间使武装力量达到必要的现代



化水平，而斯大林甚至在这篇讲话中除了吓唬希特勒外，正是想要悄悄地达到这个目的。

接着斯大林在讲话中说道，为了管理新的技术装备、新的军队“需要精通现代军事学术的指挥人员”。

“我本不想谈这个问题，但我国的军事院校落后于当代军队。我国的军事院校落后于红军的增长。

斯米尔诺夫同志在这里作报告时谈到了毕业生，谈到用新的军事经验教育毕业生的问题。我不同意他的意见。我国的军事学校还落后于军队，它们仍在用旧技术装备进行教学。有人跟我说，炮兵学院用三英寸口径火炮进行教学。炮兵同志们，是吗？（问炮兵）

我有一个熟人（斯大林指的是他的儿子雅科夫。——本书作者注）在炮兵学院学习。我翻阅了他的课程提要，发现大量时间用于学习1916年就已不再使用的火炮。他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不能容忍的。”

当斯大林说到这个地方时，“自尊心”受到伤害的炮兵学院院长西夫科夫中将插了一句话说：

“也学习现代炮兵学。”

“请不要打断我，”斯大林严厉地回绝道，“我知道我说什么！我自己看过你们学院的课程提要。”

接着斯大林对用老式飞机训练飞行员提出批评。在这个问题上他利用的是从他在飞行学校学习的小儿子瓦西里那里得到的信息。

斯大林在他的讲话的后半部分谈了政治和国际问题。由于这一部分说明了斯大林过去和将来的许多行为并极其明确地表明了他的战略原则，我认为必须更详尽地援引他讲话中的有关段落：

“你们从首都去部队，红军战士和指挥员会向你们提出问题：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在军事学院学习，你们在那里离首长们更近，请谈谈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法国战败了？为什么英国遭到失败，而德国却取得胜利？难道德国军队真的是不可战胜吗？指挥员不仅要指挥下命令，这是不够的，还应当善于与士兵谈话，向他们解释发生的事件，与他们谈心。我国的伟大统帅们一向与士兵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应当像苏沃洛夫那样去做。

人们会问你们原因何在，为什么欧洲彻底变了样，为什么法国遭到失败，为什么德国取得胜利，为什么德军最强大。事实是德军

在技术装备和组织方面都最强大。这是什么原因呢？

列宁说过，战败的军队会很好地学习。列宁的这一思想也适用于民族。战败的民族也会很好地学习。德军在1918年被打败后很好地进行了学习。

德国人对自己被打败的原因进行了反思，找到了更好地组织、训练和武装自己军队的途径。德军的军事思想在向前发展，军队用最新技术装备武装起来，学习了新的作战方式。

总的来说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拥有精良的技术装备、组织还不够，还需要拥有更多的盟友。正是由于战败的军队会很好地学习，德国才汲取了过去的经验。

1870年德国人打败了法国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一条战线上作战。

德国人在1916~1917年间遭到了失败。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两条战线上作战。

为什么法国人从过去的1914~1918年的战争中没有汲取任何教训？列宁教导说：如果无视自己的缺点，沾沾自喜于自己取得的成绩，躺在过去的辉煌上睡大觉，被胜利冲昏头脑，这样的党和国家就会灭亡。

法国人由于胜利、由于自满而昏了头脑。法国人有眼无珠，失去了盟友，德国人将他们的盟友夺走了。法国躺在成绩上睡大觉，法军的军事思想没有向前发展，它还停留在1918年的水平上。法国对军队不关心，军队得不到道义上的支持，出现了瓦解军队的新观念，对军人瞧不起，开始把军官看作倒霉鬼、看作无法从事工厂、银行、商店等职业而不得不从军的无能之辈，姑娘们甚至不愿意嫁给军人。正是在这种瞧不起军队的情况下军事机关才会落入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加默兰之流和阿兰赛德之流的手中。英国人对军人也持这种态度。

军队理应得到人民和政府的格外关心和爱戴——这是军队巨大道义力量之所在。军队需要爱护。当一个国家出现上述的观念时，就不会有强大的和有战斗力的军队。法国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为了做好战争准备，不仅需要有现代化的军队，还要从政治上备战。

什么叫从政治上备战呢？从政治上备战，就是说要在中立国家中找到相当数量的可靠的盟友。德国在开战时完成了这一任务，而英国和法国没有完成这一任务。

这就是法国失败而德国胜利的政治和军事原因。”

斯大林回顾历史后，开始分析和评价面对的敌人，显然他是想让军人对自己的力量树立信心，打破已到家门口的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德军真的是不可战胜的吗？不是。在世界上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不可战胜的军队。军队只有优秀的、好的和差的之分。德国发动了战争，在第一个时期打的旗号是摆脱凡尔赛和约的压迫。这个口号风行一时，得到了受凡尔赛和约压制的所有人的支持和赞同。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德军又打出了另外的旗号。他们把摆脱凡尔赛和约的口号变成了侵略性口号。

德军打着侵略战争的旗号不可能取得胜利。这是危险的口号。

拿破仑一世在打着摆脱农奴制的旗号进行战争时，得到了支持，获得了盟友，取得了胜利。他在转而进行侵略战争时，遇到了许多敌人，结果遭到了失败。

由于德军打着征服其他国家、德国奴役其他民族的旗号进行战争，这种口号的变化不会使他们取得胜利。从军事角度来看，德军在坦克、炮兵和空军方面并无特别之处。

相当部分的德军失去了战争初期的昂扬斗志。此外，德军中出现了自吹自擂、骄傲自满的情绪。德国的军事思想没有向前发展，军事技术装备不仅落后于我国，而且德国的空军开始被美国赶超。

为什么会出现德国不断取得胜利的局面呢？

德国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其战败的军队进行了学习和改组，对旧的价值观念作了反思。

这是因为英国和法国在上次战争中获胜之后没有探索新的途径，也没有进行学习。法军曾经是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军队。

这就是德国在一定时期走上坡路的原因。

但德国如今已经打着征服其他民族的旗号进行战争。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旧口号将对凡尔赛和约不满的人联合在一起，而德国的新口号则使他们分离。

从军事继续发展的意义上来说，德军失去了进一步改进军事技术装备的兴趣。德国人认为，他们的军队是最理想、最优秀、最不可战胜的军队。这是对的。

必须日复一日地改进军队。

任何一个骄傲自满的政治家、活动家都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像法国遇到灾难一样。

再一次向你们表示祝贺并祝你们取得进步。”



斯大林的讲话长达40分钟，整个庆祝仪式用了一个小时。19时在乔治厅、弗拉基米尔厅、小厅和新厅以及多棱宫设宴招待大家。出席宴会的有2000人。席间众人频频举杯，其中包括为斯大林的健康干杯。斯大林则提议为军事学院的领导干部和教师干杯；为“现代战争之神——炮兵”干杯；为“有装甲钢板保护的移动炮兵”——坦克兵干杯。但斯大林这一天整个讲话的高潮和精华是他的第三次发言。

事情是这样的：

炮兵学院院长西夫科夫将军为自己在斯大林讲话时不得体地插话而感到不安，决定缓和一下局面，于是建议“为和平，为斯大林的和平政策，为这一政策的创造者，为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干杯”。

斯大林非常气愤，不是为貌似诚恳的祝酒词，而是为这些话贬低了这之前对毕业生的整个讲话的意义。斯大林生气地说道：

“这位将军什么都不懂。他什么都不明白！请允许我加以修正。

和平政策保证了我国的和平。和平政策是一件好事情。我们过去始终奉行防御的方针，直到重新装备我国的军队、为军队提供现代化斗争手段为止。

而现在，当我们已对我国军队进行了改造，提供了现代战争技术装备之后，当我们变得强大之后，现在应当从防御转为进攻。

我们应当以进攻的方式从事我国的防御，应当从防御转向采取进攻性行动的军事政策。我们必须以进攻的精神来改造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宣传鼓动、我们的报刊。红军是现代化的军队，而现代化的军队是进攻的军队。”

斯大林向军事院校毕业生发表的讲话到此结束。但正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这篇讲话（收入1998年出版的文件集《20世纪的俄罗斯。1941年》）是根据参加会见的人的回忆和提纲整理而成的。为了不给可能的对手留下口实，这篇讲话不仅作了改写，而且经过了“润色”。进行的修改是实质性的。我在与这次毕业典礼的一些参加者交谈之后对此深信不疑。这些人中有前突厥斯坦军区司令利亚先科大将，我和他是塔什干列宁军事学校的同学，当然，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毕业于这所学校的时间比我早10年（他还镇压过巴斯马奇分子）。60年代我在他的军区任团长，但当我们俩人退休定居莫斯科之后，我们交往甚密，尽管军衔相差很大。

1998年7月，我打电话给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并去找他，以



核实斯大林讲话的内容并澄清几个细节。我略去其他谈话内容，直接转入正题。

“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您是1941年的毕业生并聆听过斯大林的讲话。听说斯大林在纠正西夫科夫说法的第三次祝酒时说了一些正式发表的文本中所没有的话，即：‘目前主要威胁来自德国。我们只有在对德战争中取得胜利才能拯救祖国。因此我提议为战争，为战争中的进攻，为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干杯。苏维埃国家积极的进攻政策万岁！’”

年事已高的利亚先科依然充满激情，他高声说道：

“我不仅记得斯大林说过这些话，而且要跟你说一说我因为这些话差点惹祸上身。当时我被任命为副团长，上任不久师政治部主任指示我召开座谈会，向指挥人员传达斯大林的讲话。于是我根据记忆转述了一切。我发现首长们边听边皱起眉头，似乎我讲了不该讲的东西。政治部主任甚至问我说：

‘斯大林同志的话您记得准确吗？’

‘准确，这样的话是不会忘记的。’

晚上我被叫到了特别处。

‘您根据什么散布有可能同德国开战的传言？’

‘根据斯大林同志的讲话。’

‘即便他这样讲过，这也是军事秘密，他是向你们发表的秘密讲话。您难道不看报纸吗？我们与德国关系友好。’

‘我准确地记得，斯大林同志就是这样说的：我们很快就要同德国开战。你们要做好准备。我们将开展进攻战。’

特别处人员向莫斯科进行核实，结果得到了证实，于是他们不再来打扰我了。但一位特别处人员对我侧目而视，不止一次地嘱咐我：‘不许乱说。’当6月22日炮声响起之后，所有人立刻明白了斯大林的警告。”

斯大林关于“进攻”策略的话后来特别是在近几年，被人说成是苏联蓄意首先向德国发动进攻，而希特勒是在获知这一情况后不得进行进攻的。

希特勒以他的政治生涯开始后的所有言论和他的主要理论著作《我的奋斗》证实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和肤浅无知的。他的言论和著作认为

夺取“东方土地”即俄罗斯可以扩大德国的领土并保证德国人民的幸福。“东进”是一切德国征服者亘古以来的梦想。

斯大林战略的进攻性在于从向侵略者让步（为推迟其进攻）转向积极的、独立自主的政策，这一政策不仅需要微笑和随机应变，而且要展示实力。

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是整个鼓动宣传工作以及所有大众传媒的变化，大众传媒开始根据1941年5月8~9日和5月14~15日会议上俄共（布）中央的指示行动。

斯大林5月5日对军事院校毕业生的讲话的内容没有在任何地方发表过，但斯大林从消极政策转向积极的“进攻”政策——仅仅是政策，而不是军事行动——的新战略则公之于世，并开始为这一战略的实施大力进行宣传鼓动。但这一工作是按照秘密的补充指示进行的，没有大肆宣扬与德国人的关系趋于冷淡，这一工作的进行要“得体”，“不要得罪人”。至于说到党特别是军队的内部生活，那么这里遵循的原则是：“必须赋予整个党的教育工作以战斗的、进攻的性质。”

应当坦率地说，斯大林新的战略构想——赋予政策特别是军队的精神以进攻性——提出得有些晚了，因为离德国的进攻只剩下了一个月，而在这段时间内要扭转整个国家机器，尤其是扭转原先以和平、与德国友好为指向的人民和军队的思想情绪——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是不可能的。尽管中央发出了指示，政治机关开展了积极的活动，但和平主义情绪由于惯性而仍然存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宣传员们仍在各地鼓吹和平。甚至连主管整个思想工作的日丹诺夫也感到转向新战略困难重重，他在谈到行动迟缓时说：“像蜗牛在爬行！”他竭尽全力驱赶这只“蜗牛”前行。有关部门正在酝酿起草“关于目前政治宣传任务”的指示。该指示的主要思想是，使红军全体指战员对“无坚不摧的进攻战”做好准备。但指示的草案最终也未修改好，因为德国的进攻抢在了前面。

海军人民委员尼·格·库兹涅佐夫写道：

“沿着不相信希特勒会发动进攻的轨道运行的国家机器不得不停了下来，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茫然失措之后，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近几年来常常有人援引朱可夫1941年5月15日关于对集结在苏联边境的德军实施先发制人的突击的建议，以证明斯大林有侵略意图，这当然谈不上任何侵略意图——这纯粹是总参谋部对斯大林5月5日提出

的新的“进攻战略”的本能反应。

军人作为最雷厉风行的人“说干就干”，10天之后（也许斯大林在这之前与他们说过自己的想法）就提出了“进攻性行动方案”。如果斯大林真的有侵略计划，他肯定会同意总参谋部的建议。但问题是，“进攻”思想不是要求首先进攻，而是发展了过去的“通过在敌人的领土上发动反击来打击敌人”的学说。进攻应主要理解为宣传、外交和政策上的，是试图吓唬已经准备发动进攻（这是尽人皆知的）的希特勒，使其有所顾忌。

塔斯社1941年6月14日的声明鲜明地证实了这一推测，这一声明是避免遭到突击的最后尝试，甚至采取了对不可避免的危险视而不见的方式。

戈培尔是一个搞宣传的老手，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斯大林和他的人完全无所事事。他们吓呆了，就像兔子面对蟒蛇。”

这些话表明德国领导人对于斯大林在使国家和军队做好反击德国袭击方面开展的坚决有力的进攻性活动知之甚少，但也揭穿了戈培尔的宣传，后来又揭穿了一些人以戈培尔的宣传材料为依据的叫嚣，他们说斯大林、苏联首先准备对德国开战：蟒蛇确实准备首先扑上来，只是“兔子”不再是兔子，而是一头凶猛的熊。

塔斯社1941年5月14日的声明不是斯大林的错误，不是他的“短视”，相反，是斯大林的远见，因为这一声明向全世界昭示了苏联热爱和平的政策，表明了制止战争的愿望，因此当希特勒驱动他的军队进攻苏联时，整个世界开始明白谁是真正的侵略者。塔斯社的这一声明加速了反希特勒同盟的建立。这一声明粉碎了德国（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分析家们）指责苏联蓄谋首先开战的宣传，使其不攻自破。



第三章

伟大的抵抗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敌人将被消灭。
胜利将属于我们！

约·斯大林
维·莫洛托夫
1941年6月22日

一 一切是这样开始的

6月21日晚上，铁木辛哥和朱可夫来到斯大林处并报告说：

“有一个德军司务长向我边防部队投诚，说他是我们的朋友和同情者，因此告诉我们说，德军正在进入出发地域，将在6月22日早晨发动进攻。”

斯大林问道：

“这个投诚者会不会是德国将军为了挑起冲突而派来的？”

斯大林尽全力试图推迟战争的发生，他好几个月没有批准在西部边界采取任何有可能激怒德国人的措施，不给德国人以开始军事行动的借口。

斯大林在那些日子里的谨慎行事以及他的所有做法，都被认为是惟一正确的，所有人都相信他是绝对不会错的，不仅反对他、就连不支持他、不同意他相信或打算相信的东西，都是不能允许的。但这一次情况极其紧急，因此铁木辛哥决心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坚决地回答：

“不，我认为投诚者说的是实话。”

斯大林命令波斯克列贝舍夫把政治局委员们请来。他们陆续走进办公室，每个人都心照不宣地默默坐到属于自己的那张椅子上。斯大林向政治局委员们简要讲了一下国防人民委员报告的情况并立即问道：

“我们该怎么办？”

大家一言不发。铁木辛哥回答说：

“应当立即命令边境军区的所有部队做好充分战斗准备。”

“把训令读一下。”斯大林吩咐道，他确信训令已经拟好。

铁木辛哥看了一眼朱可夫，朱可夫打开文件夹，念了训令草案。斯大林听完之后提出异议：

“现在下达这样的训令为时尚早，问题也许还可以和平解决……”

斯大林仍然觉得，如果他不相信情报机关的例行报告，那么进攻就不会发生，况且以前关于将要发动进攻的报告已经多次落空。

“训令要简短，指出袭击可能从德军的挑衅行动开始。各边境军区



部队不要受任何挑衅的影响，以免问题复杂化。”

朱可夫和瓦图京到接待室去，按照斯大林的指示迅速拟好训令草稿，然后回到办公室。

朱可夫把新的训令稿读了一遍。斯大林拿过训令又看了一遍，作了几处修改，递给了国防人民委员：

“请签署吧。”

这第一份训令是这样说的：

“列宁格勒军区、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西部特别军区、基辅特别军区、敖德萨军区军事委员会

抄送：海军人民委员

1. 1941年6月22~23日德军可能在列宁格勒军区、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西部特别军区、基辅特别军区、敖德萨军区正面发动突然袭击。袭击可能从挑衅行动开始。

2. 我军的任务是不受任何挑衅行为的影响，以免使问题复杂化。

与此同时，列宁格勒、波罗的海、西部、基辅和敖德萨各军区部队应做好充分战斗准备，以防德军及其盟军可能的突击。

3. 兹命令：

(1) 1941年6月21日夜间，隐蔽占领国境筑垒地域各火力点；

(2) 1941年6月22日拂晓前，将全部飞机、包括部队航空兵的飞机，分散到各野战机场，并加以周密伪装；

(3) 所有部队进入战斗准备，部队应分散和伪装；

(4) 防空部队不待补充兵员到达，立即进入战斗准备，城市和目标地区应采取灯火管制的一切措施；

(5) 没有特别命令不得采取任何其他措施。

铁木辛哥、朱可夫

1941年6月21日”

在斯大林对训令表示同意并由铁木辛哥和朱可夫签署之后，瓦图京回到总参谋部，马上把训令发给各军区。政治局委员们各自回家。斯大林回到别墅。

只有国防人民委员坐在他办公室里。和他在一起的是总参谋长，他们在检查训令是否已发给各军区，各军区是否迅速将训令译出，各部队是否已着手执行这一训令，边境情况如何。

3时7分部队电话开始响个不停。黑海舰队司令奥克佳布里斯基海军上将报告说：

“舰队的对空情报部门报告，大批来历不明的飞机正向我岸边接近。”

这时另一部电话又响了起来，西部军区参谋长克利莫夫斯基赫报告说：

“德国飞机轰炸白俄罗斯的城市。”

随后基辅军区参谋长普尔卡耶夫将军报告说：

“敌空军轰炸乌克兰的城市。”

3时40分，波罗的海沿岸军区司令库兹涅佐夫将军报告说：

“敌空军轰炸波罗的海沿岸的考纳斯和其他城市……”

每当提起斯大林在得知德国进攻消息后的反应，通常都会援引朱可夫元帅回忆录中的说法；我在文学作品和文献中都没有看到过其他说法，因此只能把人所共知的东西再说一遍。

铁木辛哥听完这些电话之后，沉着脸一言不发，过了一会斩钉截铁地说：

“你给斯大林打电话。”

朱可夫拨通了斯大林别墅的电话。好长时间没有人来接，朱可夫又不断地拨，终于听到了斯大林的卫队长弗拉西克将军的声音。

“请立即给我接通斯大林同志的电话。”朱可夫说道。

弗拉西克沉默了许久，他对朱可夫的要求感到吃惊，将军在长期工作中还不曾遇到过有人敢在凌晨打扰斯大林。

将军似乎尽量不想惊醒斯大林，小声地回答说：

“斯大林同志在睡觉。”

“请马上叫醒他，因为德国人正轰炸我们的城市！”朱可夫说道。

几分钟之后斯大林来到电话机旁，声音低沉地说：

“喂……”

“斯大林同志，德国空军轰炸我们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城市。请准许进行回击。”

斯大林沉默了许久，朱可夫只听得见话筒里斯大林的呼吸声。斯大林这么长时间不说话，朱可夫以为斯大林没听清他说的话，于是问道：

“您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但听筒中仍然是沉默。终于斯大林问道：

“国防人民委员在哪里？”

“国防人民委员在与基辅军区通电话。”

“请您和铁木辛哥到克里姆林宫来。告诉波斯克列贝舍夫，让他请



全体政治局委员到克里姆林宫来。”

6月22日4时30分，全体政治局委员来到斯大林的办公室。朱可夫和国防人民委员在接待室里等着。不久他们也被请进办公室。当朱可夫和国防人民委员走进办公室后，斯大林转向莫洛托夫说道：

“应当立即给德国大使馆打个电话。”

莫洛托夫当场就在办公室里打了电话。谈话不长，一会儿他告诉所有在场的人：

“德国大使冯·舒伦堡伯爵请求接见，说有急事通报。”

“你去见他，然后马上回来。”斯大林说道。

* * *

莫洛托夫作为外交人民委员在他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接见了德国大使冯·舒伦堡。几个小时之前，即晚21时30分他们在这里见过面。而且当时舒伦堡是应莫洛托夫的邀请来的。星期六这么晚把他叫来，他感到很惊讶或装出很惊讶的样子。这不符合当时外交交往的惯例。莫洛托夫当时告诉德国大使说，苏联政府通过苏联驻柏林全权代表向德国政府提出了一份普通照会，但里宾特洛甫没有接见苏联全权代表，只由副部长出面谈话。因此，莫洛托夫请舒伦堡与本国政府联系并转达这份普通照会的内容。照会指出，德军飞机日益频繁地侵犯苏联领空，仅从1941年4月19日至6月19日飞越苏联边界的就达180次，而且飞机深入苏联境内达100~150多公里。德国政府对于苏联多次声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甚至认为用不着对这份普通照会作出回答。在这之后莫洛托夫似乎已转入非正式谈话，他问冯·舒伦堡伯爵说：

“说实在的，德国对苏联到底有什么要求？最近一段时间有关德苏有可能开战的传闻满天飞。苏联政府试图从自己方面对这些传闻作出反应。例如，塔斯社在6月14日的报道中说这些传闻是错误的，但德国政府对这些传闻从来没有进行过驳斥。这是什么原因呢？”

冯·舒伦堡耸了耸肩，面露愧色，但未作任何具体回答。

现在离上次会见仅仅几个小时，但站在莫洛托夫面前的舒伦堡完全像换了一个人，他显然很兴奋，双手在发抖。舒伦堡是在参赞希尔格的陪同下前来的。他说：

“我必须非常遗憾地声明，先生们，昨天晚上，当你们接见我时，我还一无所知。今天夜里收到柏林的来电，德国政府责成我向苏联政府提出如下照会：

‘鉴于红军武装力量的集中和备战对德国东部边界造成不可继续容忍的威胁，德国政府认为必须立即采取军事对抗措施。

相应的照会同时将在柏林向杰卡诺佐夫提出。’”

舒伦堡自己补充道：

“我无法表达由于我国政府行为不当产生的沉重心情。我已尽了全力来建立与苏联的和平与友谊。”

“这份照会意味着什么？”莫洛托夫问道。

舒伦堡回答：

“这是战争的爆发。”

“红军部队并没有在苏德边界集中，”莫洛托夫反驳道，“进行的是每年都进行的常规演习，如果说出进行演习的地点不适宜的原因，那么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我不得不代表苏联政府声明，德国政府直到最后一刻都没有向我们提出任何要求。德国不顾苏联热爱和平的立场向苏联发动了袭击，法西斯德国因此成了侵略一方。凌晨4时，德军无缘无故地袭击苏联。我认为，德方寻找袭击苏联的借口的任何尝试都是谎言和挑衅。袭击的事实就摆在那里。”

“我无法对我得到的指示作任何补充，”舒伦堡说道，“我没有得到有关撤退使馆工作人员和德国公司和机构代表办法的指示。请您允许德国公民经伊朗撤离苏联。经西部边界撤离是不可能的，因为罗马尼亚和芬兰将会同德国一起行动。我请求对德国公民的撤离给予尽可能的配合。苏联使馆和苏联驻德机构工作人员的撤离也将得到德国政府最好的配合。请告知将由谁负责撤离工作的实施。”

“既然对苏联使馆和苏联驻德机构工作人员的撤离将持配合态度，这是我所希望的，那么对德国公民也将持这样的态度。我将派有关人员实施撤离工作。”

莫洛托夫沉思片刻后问道：

“既然德国如此轻易撕毁了互不侵犯条约，那当初为什么签订它呢？”

“我对我说过的话无法作任何补充。我在六年时间里始终努力促成苏德友好关系，但我无法与命运作任何抗争……”

冯·舒伦堡还提到，他一直是苏维埃俄国的朋友，他对于未能防止这样不幸的决策深感遗憾，但莫洛托夫似乎没有听到这些话。在他的脑海中只翻腾着一个词：战争，战争，战争……

莫洛托夫沿着克里姆林宫走廊大步流星地走着，几乎是在跑。他推开斯大林办公室的门，进门就大声喊起来：

“德国政府已向我国宣战！”

接着是长时间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哑场。政治局委员们沉默不语，斯大林也一言不发。第一个打破长时间沉默的是朱可夫，他说道：

“请批准各边境军区立即动用所有兵力猛烈还击突入的敌军，制止他们继续推进。”



铁木辛哥元帅显然是想缓和一下沉重的气氛，他斩钉截铁地补充道：

“不是制止，而是歼灭！”

斯大林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坚定地说道：

“下命令吧。”

正如上面已经说过的那样，苏联的作战计划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根据多次宣布的学说制订的，即如果敌人进攻苏维埃国家，那么他将被驱逐出苏联国土并在其本国境内被歼灭，同时战争流血将很少，而在敌人后方我们将得到阶级兄弟的帮助。这一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斯大林的观点：“别人的土地我们一寸也不要……自己的土地一寸也不给别人。”^①

6月22日7时15分，国防人民委员部给各部队下达了国防人民委员的第2号训令。其中命令：

“1. 各部队使用一切力量及手段猛烈打击敌军并将其歼灭在他所侵犯苏联边界的地域。在得到特别命令之前地面部队不得越过边界。

2. 用侦察机和战斗机确定敌空军的集结地和敌地面部队的部署情况。通过轰炸机和强击机强有力的突击摧毁敌机场上的飞机，轰炸敌地面部队主要集团。对纵深100~150公里的德国领土实施空中突击，轰炸柯尼斯堡和梅梅尔。在得到特别指示之前不得袭击芬兰和罗马尼亚领土。”

斯大林和国防人民委员部领导人在向部队发布这样的命令时都不知道各边境军区正在发生的事态。只要看看这一训令提出的任务如何不切实际就可以明白了。当时大批苏联飞机在机场就已被炸毁，因此它们不仅不能空袭柯尼斯堡和梅梅尔，而且无法完成支持地面部队战斗行动的有限任务。

部队还来不及执行6月21日的第一个训令，这个训令要求部队占领国境上筑垒地域的火力点。训令很晚才下达到部队：6月22日拂晓前西部各边境军区与部队的有线通信被破坏，各军区和集团军司令部无法迅速下达命令。德国人事先派到苏联境内的破坏小组破坏有线通信，杀害通信员，攻击指挥员。各边境军区大部分部队还没有配备无线电通信设备。

①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2页。——译者注

由于总参谋部及其下属各司令部的命令姗姗来迟，部队于6月22日早晨4~6时开始向国境进发，此时敌空军已掌握了制空权，向行进中的苏军纵队肆无忌惮地进行轰炸。

国防人民委员的第2号训令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也没有得到执行。在战争的第一天，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斯大林本人其实都未能在行地指挥部队的战斗行动。

6月22日早晨6时之前，总参谋部工作人员尽管作了一切努力，但始终未能弄清国境线上的具体情况。上午9时30分，斯大林再次接见了铁木辛哥和朱可夫，他审阅了呈送给他的关于进行动员的命令草案，作了一些修改，部分压缩了动员的范围（他始终不相信大战已经爆发），然后叫来波斯克列贝舍夫，将这份命令交给他，要求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加以批准。

在这次会见时铁木辛哥向斯大林送上了建立总统帅部大本营的草案。斯大林没有马上签署这个草案，说政治局将加以讨论。第二天即6月23日宣布了大本营组成人员名单。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决定大本营组成人员为：国防人民委员谢·康·铁木辛哥（主席。而此前提出的草案建议由约·维·斯大林担任主席）、总参谋长格·康·朱可夫大将、约·维·斯大林、维·米·莫洛托夫、克·叶·伏罗希洛夫元帅和谢·米·布琼尼元帅、海军人民委员尼·阿·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

6月22日12时，莫洛托夫发表了广播讲话。

莫洛托夫在一次谈话时向我讲了准备这次讲话的过程：

“在那个可怕的、心乱如麻的日子里，议论纷纷，命令迭出，电话不断，这时有一个人提出应当发表广播讲话，告诉人民发生的事情，号召抗击敌人。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看着斯大林。我说，当然应当由斯大林向人民和全国发表讲话。政治局委员们默不作声，看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对此将说些什么。斯大林很长时间没有说话，像往常一样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然后对这个建议作了否定的回答。他认为，他第一天就发表讲话为时过早，以后还有其他机会，今天先由莫洛托夫发表讲话。斯大林说完这些话之后开始在办公室内走来走去，似乎是在自言自语地评述着发生的事情。”

莫洛托夫接着说道，他开始在纸上作一些标记，打算在准备讲话稿时用上斯大林说过的话。斯大林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经过权衡和分析，千方百计地表明我们的和平意愿和对德国的友好态度，我



们不折不扣地全面恪守了条约义务，我们没有给德国人任何怀疑我们政策和外交诚意的口实。然后他抱怨道：

“我们的时间不够用，我们正是在时间的计算上失误了，没来得及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反击敌人。”他停顿片刻，在办公室内走了一圈后又补充说：“我们恪守条约义务，而他们德国人、希特勒，却对我们背信弃义，撕毁条约。对他们能抱什么希望呢？他们对正派和诚实有自己的理解。我们曾认为他们是诚实的人，因此我们又失算了，他们原来是阴险狡诈之徒。不过没关系，为此希特勒将受到严厉惩罚！我们将告诉他，他大错特错了！我们一定要消灭他！”

斯大林还说，赫斯飞往英国无疑是要与丘吉尔勾结，如果他能够得到英国人的某些保证，那么英国人就不会在西方开辟第二战场，从而使希特勒放开手脚在东方行动。但即使这样的勾结能够实现，我们仍然可以在西方找到其他盟友，英国并不是全部。随后，斯大林像总结自己的想法似地说道：

“我们的处境将是困难的，非常困难，但必须要挺住，我们没有别的出路。”

莫洛托夫就在这里即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准备自己的讲话，而且参与准备的还有其他政治局委员，斯大林也加了几句话。莫洛托夫根据这些意见和斯大林在办公室踱步时说的话最终完成了他的讲话稿。

苏联政府的这第一份正式讲话有几句话后来成了整个伟大卫国战争的口号，这些话是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口授的：“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敌人将被消灭。胜利将属于我们！”

在我和莫洛托夫谈话时他还回忆说：

“我发表广播讲话后，回到斯大林的办公室，他说：‘你看，讲得非常好，今天由你讲话是对的。我刚才给各方面军司令打了电话，他们甚至不知道确切的态势，所以我今天根本就不能讲话，时间和机会还会有，我将要不止一次地讲话。我们这些司令在那里，在前面，显然是慌了手脚……真奇怪，这么高级的将领，突然慌了手脚，不知道他们该干什么。他们有各自明确的职责，他们应当履行这些职责，而不必等待我们的命令。即使没有得到我们的任何训令，他们也应当自行反击敌人，这才是他们和军队的责任。’”

大约在6月22日中午斯大林打电话给朱可夫说：“我们各个方面军司令缺乏足够的指挥部队战斗行动的经验，看来有点发慌。政治局决定

派您去西南方面军担任总统帅部大本营的代表，还要派沙波什尼科夫和库利克去西方面军。我把他们叫来并给了他们相应的指示。您必须立即飞往基辅并从那里与赫鲁晓夫一起赶往设在捷尔诺波尔的方面军司令部。”

对于斯大林来说，1941年6月22日这一天就是这样开始和结束的。

* * *

在伟大卫国战争最初的日子里斯大林未能控制住局势。红军统帅部对态势了解不够，对部队控制不力。在这方面希特勒军队开始挥师向东时颇像在西欧的闪击式突击，那里的各国领导人由于遭到突然的猛烈袭击而趋于瘫痪，未能组织起应有的反击，尽管他们拥有的兵力往往足以进行相当长期的抵抗，例如法国就是这样。

现在在苏联的土地上，国家领导人由于通讯不畅、信息不灵、部队失控而重蹈覆辙，陷于休克。

某些政治局委员看来长时间保留了对这一惊慌失措的深刻印象，因为他们多年之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把造成这一休克的原因推到了斯大林的身上。

我认为必须援引一些文件来证明斯大林并没有惊慌失措。我们应当说话公允，他有什么错、有什么罪过应当承认，但没有错也不要凭空杜撰。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极尽诬蔑之能事，尽管他本人在那些日子里并没有和斯大林一起呆在克里姆林宫里。赫鲁晓夫根据贝利亚的话散布谣言，说“斯大林惊慌失措，一连几天放弃领导，躲在孔采沃别墅里”。赫鲁晓夫在谈到这一时期时说道：

“贝利亚讲了以下的情况。当战争爆发后，政治局委员们来到了斯大林那里。斯大林当时情绪低落，他大致作了如下表示：‘战争爆发了，战争的进展情况是灾难性的。列宁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国家，而我们却让它受到欺侮。’用贝利亚的话来说，他就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不再领导’，说完就走了，坐上汽车驶往近郊的别墅。”

此外，赫鲁晓夫还援引了贝利亚的话说：

“在斯大林作出这种举动之后过去了好几天。我们决定去见斯大林，劝他恢复工作，以使用他的名义和能力来组织国家的防御工作。”

我们抵达之后，我从斯大林的表情看出他很害怕。他也许认为我们是要逮捕他，理由是他拒绝发挥自己的作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组织反击德国的侵犯。

我们开始说服他，说我们国家幅员辽阔，我们还有可能组织起来，动员工业和人，总之，可以尽一切努力来动员和发动人民反对希特勒，直到这时斯大林似乎才回过神来。”

请注意：是谁要如此丑化斯大林？是两位政治局委员：贝利亚（如果他果真对赫鲁晓夫说过这些话）和赫鲁晓夫本人。这两个人被认为是斯大林的志同道合者，而暗地里却仇恨斯大林。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承认了这一点，而贝利亚也在1953年的争夺权力（也许是争取生存）的斗争中对此供认不讳。是这两个“战友”对斯大林进行诽谤，一些极其可靠的文件也揭穿了他们的谎言。

为了弄清真相，这里引用一份现在尽人皆知的文件。我指的是来客登记簿，这是斯大林接待室值班员每分钟作出的登记，而且正是在赫鲁晓夫所说的斯大林情绪低落、不理国事的日子。

值班秘书所作的1941年6月21~28日斯大林接待来访者的记录

1941年6月21日

	来到	离去
1. 莫洛托夫同志	18:27	23:00
2. 伏罗希洛夫同志	19:05	23:00
3. 贝利亚同志	19:05	23:00 ^①
4. 沃兹涅先斯基同志	19:05	20:15
5. 马林科夫同志	19:05	22:20
6. 库兹涅佐夫同志	19:05	20:15
7. 铁木辛哥同志	19:05	20:15
8. 萨福诺夫同志	19:05	20:15
9. 铁木辛哥同志	20:50	22:20
10. 朱可夫同志	20:50	22:20
11. 布琼尼同志	20:50	22:20
12. 梅赫利斯同志	21:55	22:20

① 原文如此，疑有误。——译者注

13. 贝利亚同志 22:40 23:00
最后几人离去时间为 23:00。

1941 年 6 月 22 日

	来到	离去
1. 莫洛托夫同志	5:45	12:05
2. 贝利亚同志	5:45	9:20
3. 铁木辛哥同志	5:45	8:30
4. 梅赫利斯同志	5:45	8:30
5. 朱可夫同志	5:45	8:30
6. 马林科夫同志	7:30	9:20
7. 米高扬同志	7:55	9:30
8. 拉·莫·卡冈诺维奇同志	8:00	9:35
9. 伏罗希洛夫同志	8:00	10:15
10. 维辛斯基同志	7:30	10:40
11. 库兹涅佐夫同志	8:15	8:30
12. 季米特洛夫同志	8:40	10:40
13. 曼努伊尔斯基同志	8:40	10:40
14. 库兹涅佐夫同志	8:40	10:20
15. 米高扬同志	9:50	10:30
16. 莫洛托夫同志	12:25	16:45
17. 伏罗希洛夫同志	11:40	12:05
18. 贝利亚同志	11:30	12:00
19. 马林科夫同志	11:30	12:00
20. 伏罗希洛夫同志	12:30	16:45
21. 米高扬同志	12:30	14:30
22. 维辛斯基同志	13:05	15:25
23. 沙波什尼科夫同志	13:15	16:00
24. 铁木辛哥同志	14:00	16:00
25. 朱可夫同志	14:00	16:00
26. 瓦图京同志	14:00	16:00
27. 库兹涅佐夫同志	15:20	15:45
28. 库利克同志	15:30	16:00
29. 贝利亚同志	16:25	16:45

最后几人离去时间为 16:45。

1941年6月23日

	来到	离去
1. 莫洛托夫同志	3:20	6:25
2. 伏罗希洛夫同志	3:25	6:25
3. 贝利亚同志	3:25	6:25
4. 铁木辛哥同志	3:30	6:10
5. 瓦图京同志	3:30	6:10
6. 库兹涅佐夫同志	3:45	5:25
7. 卡冈诺维奇同志	4:30	5:20
8. 日加列夫同志	4:35	6:10

1941年6月23日

	来到	离去
1. 莫洛托夫同志	18:45	1:25
2. 日加列夫同志	18:25	20:25
3. 铁木辛哥同志	18:50	20:45
4. 梅尔库洛夫同志	19:10	19:25
5. 伏罗希洛夫同志	20:00	1:25
6. 沃兹涅先斯基同志	20:50	1:25
7. 梅赫利斯同志	20:55	22:40
8. 卡冈诺维奇同志	23:15	1:10
9. 瓦图京同志	23:55	0:55
10. 铁木辛哥同志	23:55	0:55
11. 库兹涅佐夫同志	23:55	0:50
12. 贝利亚同志	24:00	1:25
13. 弗拉西克同志	0:50	0:55

最后几人离去时间为1941年6月24日1:25

1941年6月24日

	来到	离去
1. 马雷舍夫同志	16:20	17:00
2. 沃兹涅先斯基同志	16:20	17:05
3. 库兹涅佐夫同志	16:20	17:05

4. 基扎科夫同志 (列宁格勒)	16:20	17:05
5. 扎尔茨曼同志	16:20	17:05
6. 波波夫同志	16:20	17:05
7. 库兹涅佐夫同志 (红海军)	16:45	17:00
8. 贝利亚同志	16:50	20:25
9. 莫洛托夫同志	17:05	21:30
10. 伏罗希洛夫同志	17:30	21:10
11. 铁木辛哥同志	17:30	20:55
12. 瓦图京同志	17:30	20:55
13. 沙胡林同志	20:00	21:15
14. 彼得罗夫同志	20:00	21:15
15. 日加列夫同志	20:00	21:15
16. 戈列科夫同志	20:00	21:20
17. 谢尔巴科夫同志	18:45	20:55
18. 卡冈诺维奇同志	19:00	20:35
19. 苏普伦同志	20:15	20:35
20. 日丹诺夫同志	21:05	21:30

最后几人离去时间为 21:30。

1941 年 6 月 25 日

	来到	离去
1. 莫洛托夫同志	1:00	5:50
2. 谢尔巴科夫同志	1:05	4:30
3. 佩列瑟普金同志	1:07	1:40
4. 卡冈诺维奇同志	1:10	2:30
5. 贝利亚同志	1:15	5:25
6. 梅尔库洛夫同志	1:35	1:40
7. 铁木辛哥同志	1:40	5:50
8. 库兹涅佐夫同志	1:40	5:50
9. 瓦图京同志	1:40	5:50
10. 米高扬同志	2:10	5:30
11. 梅赫利斯同志	1:20	5:20

最后几人离去时间为 5:50



1941年6月25日

	来到	离去
1. 莫洛托夫同志	19:40	1:15
2. 伏罗希洛夫同志	19:40	1:15
3. 马雷舍夫同志	20:05	21:10
4. 贝利亚同志	20:10	21:10
5. 索科洛夫同志	20:10	20:55
6. 铁木辛哥同志	20:20	24:00
7. 瓦图京同志	20:20	21:10
8. 沃兹涅先斯基同志	20:25	21:10
9. 库兹涅佐夫同志	20:30	21:40
10. 费多连科同志	21:15	24:00
11. 卡冈诺维奇同志	21:45	24:00
12. 库兹涅佐夫同志	21:50	24:00
13. 瓦图京同志	22:10	24:00
14. 谢尔巴科夫同志	23:00	23:50
15. 梅赫利斯同志	20:10	24:00
16. 贝利亚同志	00:25	1:15
17. 沃兹涅先斯基同志	00:25	1:00
18. 维辛斯基同志	00:35	1:00

最后几人离去时间为1:00。

1941年6月26日

	来到	离去
1. 卡冈诺维奇同志	12:10	16:45
2. 马林科夫同志	12:40	16:10
3. 布琼尼同志	12:40	16:10
4. 日加列夫同志	12:40	16:10
5. 伏罗希洛夫同志	12:40	16:30
6. 莫洛托夫同志	12:50	16:50
7. 瓦图京同志	13:00	16:10
8. 彼得罗夫同志	13:15	16:10
9. 科瓦廖夫同志	14:00	14:10
10. 费多连科同志	14:10	15:30

11. 库兹涅佐夫同志	14:50	16:10
12. 朱可夫同志	15:00	16:10
13. 贝利亚同志	15:10	16:20
14. 雅科夫列夫同志	15:15	16:00
15. 铁木辛哥同志	13:00	16:10
16. 伏罗希洛夫同志	17:45	18:25
17. 贝利亚同志	17:45	19:20
18. 米高扬同志	17:50	18:20
19. 维辛斯基同志	18:00	18:10
20. 莫洛托夫同志	19:00	23:20
21. 朱可夫同志	21:00	22:00
22. 瓦图京同志	21:00	22:00
23. 铁木辛哥同志	21:00	22:00
24. 伏罗希洛夫同志	21:00	22:00
25. 贝利亚同志	21:00	22:30
26. 卡冈诺维奇同志	21:05	22:45
27. 谢尔巴科夫同志	22:00	22:10
28. 库兹涅佐夫同志	22:00	22:20

最后几人离去时间为 23:20。

1941 年 6 月 27 日

	来到	离去
1. 沃兹涅先斯基同志	16:30	16:40
2. 莫洛托夫同志	17:30	18:00
3. 米高扬同志	17:45	18:00
4. 莫洛托夫同志	19:35	19:45
5. 米高扬同志	19:35	19:45
6. 莫洛托夫同志	21:25	24:00
7. 米高扬同志	21:25	2:35
8. 贝利亚同志	21:25	23:00
9. 马林科夫同志	21:30	00:47
10. 铁木辛哥同志	21:30	23:00
11. 朱可夫同志	21:30	23:50
12. 瓦图京同志	21:30	23:50
13. 库兹涅佐夫同志	21:30	23:30

14. 日加列夫同志	22:05	0:45
15. 彼得罗夫同志	22:05	0:45
16. —	22:05	0:45
17. 扎罗夫同志	22:05	0:45
18. 尼基京同志	22:05	0:45
19. 季托夫同志	22:05	0:45
20. 沃兹涅先斯基同志	22:15	23:40
21. 沙胡林同志	22:30	23:10
22. 杰缅季耶夫同志	22:30	23:10
23. 谢尔巴科夫同志	23:25	24:00
24. 沙胡林同志	0:40	0:50
25. 梅尔库洛夫同志	1:00	1:30
26. 卡冈诺维奇同志	1:10	1:35
27. 铁木辛哥同志	1:30	2:35
28. 戈利科夫同志	1:30	2:35
29. 贝利亚同志	1:30	2:35
30. 库兹涅佐夫同志	1:30	2:35

最后几人离去时间为 24:00。

1941 年 6 月 28 日

	来到	离去
1. 莫洛托夫同志	19:35	00:50
2. 马林科夫同志	19:35	23:10
3. 布琼尼同志	19:35	19:50
4. 梅尔库洛夫同志	19:45	20:05
5. 布尔加宁同志	20:15	20:20
6. 日加列夫同志	20:20	22:10
7. 彼得罗夫同志	20:20	22:10
8. 布尔加宁同志	20:40	20:45
9. 铁木辛哥同志	21:30	23:10
10. 朱可夫同志	21:30	23:10
11. 戈利科夫同志	21:30	22:55
12. 库兹涅佐夫同志	21:50	23:10
13. 卡巴诺夫同志	22:00	22:10
14. 斯特凡诺夫斯基同志	22:00	22:10

15. 苏普伦同志	22:00	22:10
16. 贝利亚同志	22:40	00:50
17. 乌斯季诺夫同志	22:55	23:10
18. 雅科夫列夫同志 (国防人民委员部军械总部)	22:55	23:10
19. 谢尔巴科夫同志	22:10	23:30
20. 米高扬同志	23:30	00:50
21. 梅尔库洛夫同志	24:00	00:15

最后几人离去时间为00:50。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二局副局长德·尼·沙德林关于为 斯大林及其身边的人安排临时防空掩蔽部的回忆录摘录

“……9时(6月22日)之前没有得到任何指示。后来电话铃响了:‘去斯大林那里!’我和谢罗夫一起到了那里。

贝利亚和莫洛托夫也在斯大林那里。斯大林说:

‘应当找一个既能躲避轰炸又能工作的地方。’

贝利亚回答说:

‘沙德林同志对莫斯科了如指掌,他能找到。’

我和谢罗夫走了。谢罗夫问道:

‘我们去哪儿?’

‘去基洛夫大街,那里有一个司令部,房子很大,旁边有一幢小楼。’

我们走了过去,到处看了看,随后我和谢罗夫走进了司令部。我知道他们挖了一条直接通往地铁‘基洛夫站’站台的地下通道,但我们走在里面很费劲。我对副参谋长说:

‘到16时之前把一切都清理干净!让整个通道畅通无阻!’

到下午4时一切都清理干净了。我打电话给贝利亚说:‘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您可以来看看,一切都准备好了。’地铁在这里已不再停车:我到达这里之后,我们立即停止了列车的停靠。

贝利亚很高兴:‘又近又好!好一个隐蔽所,可以很好地安排工作。’他随即开始下达命令:

‘在这里,在柱子之间(在通往‘基洛夫站’通道的尽头,两根圆柱在这一面,两根在另一面)作斯大林的办公室和接待室。’

我们又来到上面,来到那幢小楼里。贝利亚命令说:

‘这里给斯大林作办公室。这里是莫洛托夫的办公室,这里是

我的，而这里，沿着走廊，是可容纳50人左右的接待室，摆上桌子。给你四天时间！’

‘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四天怎么能够呢？今天一天已经过去了，还剩下三天。怎么能办到呢？有多少活要干！’

四天之后贝利亚给斯大林打电话说：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可以来看看。’

斯大林问：‘在哪儿？’别人告诉他，警卫知道。

斯大林来了。他四处看了看，很满意。于是德国空军空袭时他就在这里工作。

后来，到1941年末，开始在克里姆林宫为斯大林修建掩蔽部。掩蔽部修得很好，很大，任何炸弹都对它无可奈何。这以后他就不在‘基洛夫站’办公了。”

我并非随便援引来访者登记簿和沙德林的回忆录的。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数字计算：沙德林是在6月22日9时之后接到准备掩蔽部的指示的。掩蔽部准备工作进行了四天。根据值班员的登记来看，这几天（和以后）斯大林一直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中工作。四天之后斯大林来到新的办公地点视察。如何看待上面贝利亚和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惊慌失措、“逃到”孔采沃别墅的说法呢？

我以为，对于他们的谎言应当嗤之以鼻，就像对待任何卑鄙的诽谤一样。

* * *

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东正教教会呼吁并祝福人民与侵略者作斗争。

莫斯科和科洛缅斯科耶都主教、俄罗斯东正教教会 首脑谢尔吉告“基督东正教会牧师和教徒”书

1941年6月22日

最近几年，我们俄罗斯居民一直希望几乎燃遍整个世界的战火不要烧到我国来，但是只信奉赤裸裸的武力和一贯嘲弄崇高的尊严与道德要求的法西斯主义，这一次又暴露了他们的真面目。法西斯强盗侵犯了我们的祖国。他们践踏所有的条约和诺言，向我们发起突然袭击，现在和平公民的鲜血已经把祖国的土地染红。拔都、德国骑士、瑞典国王查理、拿破仑的时代再次出现。东正教敌人卑鄙的后代试图再一次使我国人民向谬误屈膝，用赤裸裸的暴力迫使其牺牲祖国的福祉与完整，牺牲热爱祖国这一深厚的传统。

然而俄罗斯人民并不是第一次经受这样的考验。上帝保佑，这

一次俄罗斯人民也将彻底肃清法西斯敌人的势力。我们的祖先在最困难的形势下也从未丧失过信心，因为他们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安危利害，而是自己对祖国和信仰的神圣义务，他们终于取得了胜利。

我们这些东正教徒与他们不仅血脉相通而且信仰一致，绝不会使他们的英名遭到玷污。祖国要靠武器和全民的功勋来保卫，每个人在严峻的考验时刻都要准备好各尽所能地为祖国服务。这是工人、农民、科学家和男女老幼的事业，每个人都可以并应当为全民的功勋献出自己的一份劳动、关怀和技能。

让我们铭记那些为人民和祖国操心的俄罗斯人民的神圣领袖，如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和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当然这样做的不只是领袖，让我们铭记千千万万个普通东正教战士，俄罗斯人民把他们无人知晓的姓名记入了关于伊里亚·穆罗梅茨、多勃雷尼亚·尼基季奇和阿廖沙·波波维奇等将强盗索洛韦伊打得落花流水的英雄史诗中。

我们东正教教会永远与人民共命运。东正教教会既与人民共同经受过考验，也为人民的胜利而欢欣鼓舞。东正教教会现在也不会置本国人民于不顾，它将为眼前的全民功勋祝福。

我们作为教会的牧师，在祖国号召大家建立功勋的时刻，不能仅仅默默地注视周围发生的一切，我们要给怯懦的人以鼓励，给伤心的人以安慰，提醒动摇的人牢记自己的义务和上帝的意志。我们将与我们的教民一起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们千千万万个东正教战士前赴后继，在我们的祖国遭到敌人侵略的时刻为祖国和信仰而献身。他们在弥留之际想的不是荣誉，他们想到的是祖国需要他们作出牺牲，于是义无反顾地献出了一切直至自己的生命。

基督教会为一切奋起保卫我们祖国神圣边界的东正教徒祝福。

上帝赐予我们胜利。

代理牧首、莫斯科和科洛缅斯科耶都主教

恭顺的 谢尔吉

二 最初的几天

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最高统帅部在开动了庞大的战争机器并确信坦克大军及紧随其后的野战部队已开始横扫前进道路上的一切之后，从柏林搬到了新的大本营。这座大本营是为指挥对苏战役而专门修建的。大本营座落于东普鲁士，距拉斯廷堡市不远，毗邻马祖里湖泊群。希特勒

统帅部力图避开这些天来一直加紧轰炸德国城市的英国空军。大本营的建设早在1940年就已开始，选择了一处宽阔的林间空地，修筑了道路，建起了办公和生活用房，敷设了空袭炸不毁的大功率的地下通信枢纽。建设时期当地居民没有一个敢接近这个地方，因为他们知道这里在修建某个军事项目，但具体是什么谁也不知道。而且居住在周围庄园里的地主、市民都是循规蹈矩、小心谨慎和一贯不多管闲事的人。

大本营分为若干个区，所有的区都用铁丝网和地雷场围了起来，只有沿着特定的道路，经过几个检查站的检查，才能进入大本营。大本营敷设了通往森林的铁路支线，在这条支线上运行的是专用列车，这些小型军用列车挂有几节专用沙龙车厢或专用公务车厢。

在林地的北部，距最高统帅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面积不大但十分重要的区，这就是希特勒的秘密专用区。住在区内的除希特勒外，只有几位最可信赖的国务活动家——戈林、希姆莱，高级将领住在这里的只有凯特尔和约德尔。希特勒的混凝土地下掩体的墙有6米厚，上面建有带会议室的长长的房间，小型俱乐部、通信枢纽也设在这里。

整个这个区，特别是希特勒的专用区，由最精锐的元首私人警卫营的党卫军负责保卫。该营营长同时担任大营警备长，负责指挥整个出入检查站系统和日夜布防在许多地方的岗哨系统。

掩映在密密的树林中的房屋涂上了像德国军服一样的灰绿色，这个寂静的、与整个世界隔绝的区显得相当阴森可怖。希特勒本人把这个地方称为“狼穴”。其他任何人看来都不敢这样称呼战争指挥中心，但由于这个称呼是元首本人提出来的，加之它确实符合这个地方的外貌和用途，因此这个称呼不胫而走，从此与这个地方分不开了。

应当指出，在整个战争期间（除了极少数为最高统帅部工作的人外）没有一个人知道“狼穴”的存在。德国人善于保守秘密，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人民、军队和所有机构都确信，希特勒和最高军事统帅部是在首都柏林或是在离柏林不远的佐森指挥战争，而在佐森确实驻有陆军总参谋部的管理机关。住在“狼穴”的只有最高领导人和一些日常工作离不开的人。

希特勒抵达新的大本营后，听取了凯特尔关于西战场、北非、巴尔干和地中海地域态势的汇报。随后他听取了关于对苏战斗行动的报告，当天晚上他们又向他汇报了一天之中发生的变化，谈了随后几天有可能出现的情况。从第一天开始确定的这种程序（早晚报告）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没有改变，一直以德国式的刻板态度执行着。通信枢纽的工作井井有条，领导人掌握了全面准确的情报，这些情报来自各个战场，来自欧洲、非洲和亚洲的各作战地域。

最高军事领导人的代表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向希特勒报告了什么呢？我们从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的日记中可以准确地弄清这一点。

我想告诉读者的是，哈尔德记日记时记的只是当天最重要的事件，简明扼要，提纲挈领，但具有总参谋部高级将领精确可靠、一丝不苟的特点。可以认为这本日记是一份可靠的文献，因为哈尔德并未打算将其发表；而如果他有朝一日想要撰写回忆录，那么他也只会将这本日记作为素材加以利用，因此他所记下的一切都是他个人的真实看法，在我看来，没有任何宣传或应景的成分。日记中当然也有对战争或双方行动过高或过低的估计，这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由于观点和信念不同都是正常的，但我再说一遍，哈尔德日记中的记载完全是真实和可靠的。下面我将多次引用这些记载。

哈尔德在下面几段话中记载了自己的印象以及在“狼穴”会议上向希特勒报告的情况：

“进攻第二天总的情况如下：

德军的进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敌人的战斗队形战术上不适于防御。边境地带的敌部队分散在广阔区域内，被束缚在其驻扎地域上。边境的守卫总的来看是薄弱的。

战术上的出其不意使得边境地带敌人的抵抗软弱无力、缺乏组织性，我们因此在各个地方都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横跨水上天险的桥梁，突破了边境纵深筑垒地带（野战工事）。

敌人起初被出其不意的袭击打得‘呆若木鸡’，但很快就采取了积极行动。敌方无疑进行过战术退却，尽管混乱不堪；但没有发现敌军战役退却的迹象。完全有可能的是，敌军根本就无法组织这样的退却。敌各级指挥机关，例如在比亚韦斯托克（第10集团军司令部），对情况一无所知，因此在前线的许多地段部队的行动几乎得不到上级司令部的指挥。

但即使与此无关，由于被打得‘呆若木鸡’，也未必能指望俄军统帅部在战斗的第一天就能对态势一清二楚，能作出根本性决策。

看来，俄国统帅部由于反应迟钝，在近期内根本无力组织起对我们进攻的战役抵抗。俄军不得不按照他们在我们进攻之初的部署应战。”

接着哈尔德按地段讲述了各集团军群——“北方”集团军群、“中央”集团军群、“南方”集团军群——的状况并得出如下结论：“各集



团军群的任务不变。没有任何理由对作战计划作任何改变。陆军总司令部甚至没有必要下达任何补充命令。”

请看，我们一片混乱，而我们的敌人甚至没有任何必要作任何修正。尽管对我军和统帅部行动的这种评价令人难堪，但它却客观地反映了前线和司令部发生的事情，没什么可反驳的，相反，我要请大家注意其措辞的准确和对总的情况描述的精确。

在哈尔德写于战争第一天的日记中还有这样的词句：“空军司令部报告，称今天击毁敌 850 架飞机……”我援引的这段话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哈尔德日记的客观性，因为据我们统计，战争第一天希特勒匪徒击毁了 1 200 架飞机，而日记说是 850 架，可见与实际被击毁飞机的数量相比还说少了。

哈尔德 6 月 23 日的日记令人关注，他认为，坦克集群的突击最好更集中地对准一个地方，从而保证高度的密集，如果霍特继续前进而且向北偏一些、而古德里安再坚持一下并稍向南前进，那么“这种危险就应该加以重视，再说正是俄国人首先提出了集中快速兵团的思想……”

我下面还将谈到由苏联军事战略家提出的这一思想。

哈尔德在总结 6 月 24 日前的战斗行动时写道：“不过我怀疑的是，敌统帅部是否真的保持着对作战部队的统一而有计划的指挥。地面部队和空军的就地调动极为可能是被迫的，是在我军推进的威胁下采取的，而不是带有战役目的的有组织的退却。到目前为止这种有组织的退却似乎还谈不上。”

尽管承认这一点十分痛苦，但我们必须再一次指出哈尔德目光的敏锐和思维的准确，他的日记准确记录了我军统帅部当时的状况。

6 月 24 日，哈尔德在描述各个地段的战斗行动时作了如下记载：“我军占领了维尔纽斯、考纳斯和克伊达内。”（据历史资料记载拿破仑占领维尔纽斯和考纳斯也是在 6 月 24 日。）

这个类比使我联想起拿破仑的战友之一德德姆关于战争第一天的记载。他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走到一群住在皇帝主营地中的将军身边。他们中间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预示着苦涩的绝望。我斗胆讲了一个笑话，但科兰古将军……对我说道：‘这时不会有人笑的，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同时他用手指了指右岸，似乎想补充说：‘那里是我们的坟墓。’”

战败之后，许多希特勒将军都承认他们有过这样的预感。有一个人甚至在入侵开始那一天写道：“这是我们灭亡的开始。”但他们所有人都为轻而易举、出其不意地战胜波兰、法国和其他国家冲昏了头脑，得

意洋洋，“该元首走运”这种催眠作用使他们失去理智，他们就像1812年的法国人一样，在那一天走向的不是俄罗斯而是深渊。

戈培尔的宣传系统大造舆论，不仅说战争是“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十字军远征”，而且说是“全欧洲的解放战争”。这显然是希望赢得对德国袭击苏联的同情，掩盖德国真正的侵略计划。希特勒就此对其周围的人公开说过：“不应当把全欧洲争取自由的战争理解为德国为欧洲而战。这场战争的好处只能由德国人独享。”

接着哈尔德写道，比亚韦斯托克以东的包围圈马上就要合拢，正在合围的还有霍特和古德里安的坦克集群在明斯克以东形成的包围圈。哈尔德还注意到下面的情况：“应当指出，一些俄国兵团在战斗中非常顽强。有时一些土木火力点的守备部队宁愿把自己和火力点一起炸掉，也不愿意作俘虏。”

哈尔德在总结6月24日的情况时详细记载了各个战线的胜利行动，又一次特别指出了各部队的行动：“在‘南方’集团军群战线交战还没有达到白热化程度，还将持续几天。克莱斯特坦克集群经过顽强战斗占领了杜布诺。卢茨克以西的坦克战仍在继续。”

我们看到，朱可夫和基尔波诺斯在组织反突击方面采取的有力行动，即使只动用了他们可以调动的不多的兵力，但仍然取得了成功。我再援引哈尔德6月26日的一篇日记作为总的评价，或更确切些说，是对在这样复杂的和对我国不利的态势下指挥能力的承认。

“‘南方’集团军群推进速度缓慢，而且令人遗憾的是，还遭受了相当的伤亡。与‘南方’集团军群对峙的敌军拥有坚定有力的指挥。敌军不断从纵深调集新的有生力量对抗我军坦克的楔形攻势。”

我认为，这些话对朱可夫和基尔波诺斯及其司令部的卓有成效的行动作了客观和公正的评价，因为上面援引的这段话指的不仅是杜布诺和卢茨克（朱可夫当时在那里）附近的行动，而是广泛得多的行动，因为这段话谈到调动预备队，谈到更广泛的战斗行动。

哈尔德作为总参谋长，想的和记的当然都是宏观的东西，有些细节他或是不知道，或是认为用不着记下来。

哈尔德的日记不止一次指出，我国最高统帅部的第3号训令引起人民的嘲笑和惊讶。这一训令提出进行反攻，要我进攻部队前出至卢布林，进入敌境内。

朱可夫就此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大本营在提出反攻任务时并不了解6月22日结束时的实际情况，各方面军首长也不了解真实的情况。总统帅部作出决策时不是

依据对实际情况的分析和可靠的计算，而是从一种不问部队能力但求积极行动的直感和意愿出发，这种做法在武装斗争的严重关头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允许的。

根据当时的情况，惟一正确的做法只能是使用机械化军对敌人坦克集团形成的楔子实施反突击。反突击虽已实施，但大多数组织得不好，缺少应有的协同动作，因而没有达到目的。”

我再补充几句，机械化军由于驻地远离边界而没有准备好实施反突击，他们不得不长途远征，在途中技术装备不仅由于轰炸，而且由于技术原因出了故障，因此机械化军在投入战斗时力量大大削弱。由此可见，我各边境军区部队部署时没有想到可以对敌装甲坦克集团楔形攻势的底部实施突击。而预见到敌人的这种行动并使自己的部队做好这种应对准备的可能性当时是存在的，因为希特勒匪徒在波兰、法国的行动和策略早已人所共知。但遗憾的是，苏军没有进行这种训练，未在边境地区进行必要的部署。对此应当负责的是我们的高级将领（而不是斯大林），这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到6月22日中午，西南方面军司令部已经意识到，边境上发生的事件不是莫斯科一再警告的挑衅行为，而是不折不扣的大规模进攻即战争。在敌空军的狂轰滥炸下到处火光冲天，房倒屋塌，在战斗警报声中部队集中起来并打开了保存在各个司令部的开战时用的绝密文件。在这些文件中有关于什么人在什么时候该干什么的命令。为执行这些指示，部队开赴边境或指定的集结地区。

部队途中遭到密集轰炸，于是走下大路分散行动，然后集中起来，列成纵队继续向边境方向移动，在这一过程中部队遭到巨大伤亡并浪费了许多时间。

西南方面军第6、第5和第26集团军尽一切努力来阻止敌军在我国境内的推进，但敌兵力强大，进攻迅猛，尽管我军指挥员奋不顾身，英勇抗击，仍未能阻止敌人前进。6月22日晚10时许，西南方面军司令部收到新的训令。其中命令：“固守苏匈边界，向卢布林发动集中突击，集中第5和第6集团军的兵力（不少于5个机械化军和方面军全部空军）包围和歼灭在弗拉基米尔-沃伦、克雷斯特诺波尔一线进攻的敌军集团，到6月24日结束时占领卢布林地区……”

在莫斯科，斯大林和总参谋部由于得不到可靠的信息，对西部边境发生的事情显然是不了解的。他们在提及各集团军和军的番号时并不知道这些兵团实际的状况，他们提出了占领位于苏联境外的卢布林的任

在了，它遭到了巨大的损失。

正像巴格拉米扬元帅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西南方面军指挥员在收到这样的训令后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命令就是命令，必须执行。

朱可夫大将和被任命为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赫鲁晓夫来到了西南方面军司令部。

斯大林命令朱可夫立即前往前线。大概读者即使不是军人也会产生疑问：总参谋长在这样的紧要关头离开军队指挥中心合适吗？就像这一下天下过的其他许多命令一样，这个命令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一次可以对斯大林的决定作如下解释（尽管不太有说服力）：他仍然相信与德国签订的条约，认为（确切些说，他非常希望真是如此）爆发的战斗是好战的德国将军的蓄意挑衅，就像哈桑湖事件或哈拉哈河事件一样。于是朱可夫立即动身前往该方面军整顿秩序。

6月25日早晨，第8和第15机械化军实施了由方面军司令部和朱可夫组织的反突击。这一突击出乎敌人的预料。敌人原以为，守卫边境的红军部队在他们的快速攻击之后将军心涣散。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第8机械化军在短时间内击溃了护卫克莱斯特集群第48机械化军翼侧的第57步兵师。克莱斯特坦克集群的处境岌岌可危，因此他不得不把自己的预备队调到这里。这次反突击给人印象深刻，甚至对德国最高统帅部造成了影响。请看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在其工作日志中所作的记载：“与‘南方’集团军群对峙的敌方面军指挥若定。敌人不断从纵深调来一批批有生力量抵抗我坦克的楔形攻势……正如所预料的那样，敌人用相当多的坦克部队对第1坦克集群的南翼发起进攻。在个别地段有所推进。”

让我们回顾一下德国总参谋长在战争第一天记下的话：“……与‘南方’集团军群对峙的……拥有坚定的指挥。”

在反突击之后应扩大这一战果，当时即使不能切断克莱斯特坦克集群插入的楔子，至少也可以将其长时间拖在一个地区。但当时没有扩大战果所需要的兵力。

敌人集中了相当多的空军部队对付实施反冲击的各军，给我部队造成了巨大伤亡，从而削弱了、后来又制止了苏军的反突击。

朱可夫为了利用已显现的战果并集中驻在这一地域的部队的兵力，命令里亚贝舍夫军掉转队伍，对杜布诺方向实施突击。向杜布诺逼近的还有意欲对这一方向实施突击的我第15机械化军、第63步兵军和第19机械化军。

6月27日，这些兵团给了希特勒匪徒以沉重打击，迫使“南方”



集团军群司令龙德施泰特集中其全部空军进行反击并将其预备队——第55步兵军调往这里，说实在的，这才使克莱斯特的坦克楔子没有被歼灭。

已经开始的交战直到6月28日仍在继续。我空军在这里顽强奋战，它在摆脱战争第一天所处的可以说是休克状态之后，以少数兵力与占优势的敌空军在空中展开了殊死战斗。

敌我双方都遭受了巨大伤亡。6月29日，敌人为了挽救局面，被迫将部队从其他方向撤回，派往杜布诺地域。

这是对入侵的希特勒部队给予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反突击。它表明，如果在方面军其他地段能够组织起这样的反突击，那么敌人的推进就不会如此迅速。

我想提请读者们注意的是，这次反突击是在战争的最初几天实施的，当时敌军突然袭击的得手似乎完全（哪怕是暂时地）打垮了我军的士气，使我们的部队失去抵抗能力。但我们看到，正是这个最危急的时刻，这一地段的方面军没有张皇失措，在坐镇指挥的朱可夫坚强意志的鼓舞下实施了反突击，在占优势的敌空军的狂轰滥炸下集中几个军的兵力在杜布诺地区实施反突击绝非易事，但最终还是如愿以偿。

德国第3坦克集群司令霍特将军写道：“‘南方’集团军群的处境最为艰难。……敌部队被从边境击退，但很快就在遭到突然袭击后稳住阵脚，并通过预备队和部署在纵深的坦克部队的反冲击制止了德军部队的推进。配属于第6集团军的第1坦克集群的战役突破直到6月28日仍没有实现。敌军有力的反突击成了德国部队进攻道路上的巨大障碍。”

这位希特勒将军对“南方”集团军群的艰难处境作了正确估计，由于这种艰难处境，在战争初期的乌克兰敌军迅速突入基辅的计划没有实现。同时我要指出，在霍特率领他的集群发动进攻的北方，希特勒部队没有遇到这样的抵抗，在占领明斯克之后，6月28日完成了第一个合围，苏军许多部队落入包围圈。基尔波诺斯和朱可夫组织的成功的反突击在这些日子里实际上挽救了基辅，使希特勒匪徒未能在第聂伯河西包围我军——我军在这里又进行了长时间战斗，不让敌军继续推进。

三 在莫斯科

（处决巴甫洛夫）

斯大林很快意识到他派总参谋长去前线是错误的。这些天对军队的指挥没有了章法，从战斗部队传来的消息不仅不能令人快慰，而且简直是灾难性的。有消息说，在罗斯拉夫利附近有两个集团军被围，明斯克

附近的包围圈也将合拢，又有几个集团军被围在里面。

6月26日斯大林打电话给西南方面军在捷尔诺波尔的指挥所，叫朱可夫接电话：

“西方面军情况严重。敌军逼近明斯克。我不明白巴甫洛夫出了什么事。库利克元帅不知道在哪里，沙波什尼科夫元帅病了。您能不能立即飞回莫斯科？”

“我马上同基尔波诺斯和普尔卡耶夫商讨下一步行动，然后去机场。”朱可夫回答说。

6月26日深夜，朱可夫飞抵莫斯科，直接从机场去了斯大林那里。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和第一副总参谋长瓦图京中将笔直地站着。

两个人面色苍白，身体消瘦，由于失眠眼睛充满血丝。

在朱可夫到来之前这里进行了通常所说的重要谈话。斯大林点点头算是同朱可夫打了招呼，然后立即愤怒地说道：

“我无法理解国防人民委员和您的副手语无伦次的建议。你们一起商量一下然后告诉我，可以做些什么。”

斯大林说这些话时指了指摊在桌子上的地图，那上面标明了西方面军的态势。最高统帅心绪恶劣，这时谈话不会得出任何有用的东西，应当让他冷静下来，然后再跟他谈事情。因此朱可夫竭力表现出平静的样子，似乎要求斯大林也这样做，说道：

“我大约需要用40分钟来弄清态势。”

“好吧，40分钟以后向我汇报！”斯大林依然气冲冲地答道。

朱可夫、铁木辛哥和瓦图京来到旁边的一间屋子里。他们没有拖延，只是就发生在斯大林办公室中的事情交换了一下会意的目光，就开始分析西方面军的态势。

西方面军第3和第10集团军的余部在明斯克以西被围并在包围圈中战斗，第4集团军余部退到普里皮亚季森林中，遭到巨大伤亡的其余部队退向别列津纳河。所有这些兵力疲弱、队伍不整的方面军部队均遭到强大的敌军集团的进攻。

半小时后三位将领回到斯大林的办公室，建议使用第13、第19、第20、第21和第22集团军，立即在西德维纳—波洛茨克—维捷布斯克—奥尔沙—莫吉廖夫—莫济里一线占领防御。除此之外，应使用大本营预备队的第24和第28集团军，立即着手在后方地区沿谢利扎罗沃—斯摩棱斯克—罗斯拉夫利—戈梅利一线构筑防御。立即由莫斯科民兵师再组建2~3个集团军。

斯大林批准了所有这些建议并命令立即传达到各部队。



6月29日，有消息说，我军放弃了明斯克。斯大林打电话给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并问道：

“明斯克怎么样？情况如何？”

铁木辛哥不敢把放弃明斯克的消息报告斯大林，他仍然希望局势能得到恢复，因此含糊地说道：

“我现在无法向您报告，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不等铁木辛哥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说：

“而您，铁木辛哥同志，应当时刻了解所有详情，并让我们对事情有所了解。”

斯大林放下电话，他不想再说下去。

这时呆在斯大林办公室里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在经过一段时间令人难堪的沉默之后，斯大林说道：

“我不喜欢他们的这种做法。要不我们现在就去总参谋部，亲自看看地图和各方面军的报告？”

从克里姆林宫到国防人民委员部沿着伏龙芝大街走只有几分钟的车程。当政治局委员们走进那厚重的大门时，哨兵看见斯大林和跟在他后面的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吓得手足无措，甚至连通行证也没有要求出示，也没有说点儿别的什么。政治局委员们默默地从哨兵身边走过，来到国防人民委员办公室所在的二楼。此时在办公室里的有铁木辛哥、朱可夫、瓦图京及总参谋部的将军和军官们，他们站在几张大桌子旁边，上面铺着标明各方面军态势的地图。

斯大林及其他政治局委员的出现令在场的所有人深感意外，他们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铁木辛哥甚至变得脸色煞白，然而他作为一名老军人，很快就平静了下来并走到斯大林身边，作了在这种场合下的例行报告：

“斯大林同志，国防人民委员部领导人和总参谋部正在研究各方面军的态势并制定相应的决策。”

斯大林听了报告，没有作任何回答，慢慢地走到了放着地图的桌子旁边。与此同时总参谋部的参谋们踮起脚尖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办公室。留下来的有铁木辛哥、朱可夫和瓦图京。

斯大林在西方面军地图前站了相当长的时间并看得很仔细，然后他转向将军们，明显强压着怒火，尽量平静地说：

“好吧，我们等着，请你们报告和解释态势吧。”

铁木辛哥非常了解斯大林，不仅尊敬他，而且有点怕他。他知道，斯大林内心万分焦急，否则就不会突然来到这里。铁木辛哥由于不指望会有什么好事，便开始前言不搭后语地报告说：

“斯大林同志，我们还没来得及汇总上报的材料。许多情况还不清楚……有一些互相矛盾的情报……我还没有准备好报告。”

斯大林一听就炸了：

“你们就是害怕告诉我真相。你们丢了白俄罗斯，现在又想让我们面对新的失败吗？！乌克兰发生了什么事情？波罗的海沿岸呢？是你们在指挥各个方面军还是总参谋部只管登记损失？！”

朱可夫为了稍微缓和一下气氛并帮助铁木辛哥，对斯大林说：

“请允许我们继续工作。”

这时贝利亚突然挖苦地问道：

“也许是我们妨碍了你们？”

“各个方面军的态势万分危急，大家在等待我们的指示。”朱可夫尽力保持平静，不针对什么人地说道。但随后他紧盯着贝利亚的眼睛，以某种挑战的口气问道：

“也许您可以给些指示？”

“如果党责成我，我就给。”贝利亚斩钉截铁地说。

“您说的是如果党责成！”朱可夫坚决反驳道，“但现在是责成我们办这件事。”

朱可夫转过身对着斯大林，再一次尽力保持平静地说：

“斯大林同志，请原谅我太急躁，我们搞清楚情况后马上去克里姆林宫……”

所有人都默不作声，等待斯大林作出决定和发表意见。但铁木辛哥也不愿意让他的总参谋长在困难时刻孤立无援，他试图给他提供帮助，于是说道：

“斯大林同志，我们应当首先多考虑一下如何帮助各个方面军，然后再向您报告……”

铁木辛哥缓和局面的努力变成了引火烧身。斯大林再一次爆发：

“第一，你们犯了个大错误，试图把自己同我们分开！第二，现在我们应当共同考虑帮助各个方面军和控制态势的问题。”斯大林沉默片刻，看来他已认定，在目前形势下最好还是让军人们能真正集中思想考虑问题，于是便向他的随行人员说道：“同志们，我们走吧，看来我们来得确实不是时候……”

政治局委员们向门口走去，就像几分钟之前来的时候那样，没有一个人陪同便离开了。

6月30日，斯大林把巴甫洛夫召回莫斯科。这一天叶廖缅科将军来到巴甫洛夫的司令部，带来了他被任命为西方面军司令的命令。巴甫洛夫第二天飞抵莫斯科，他去找的第一个人就是朱可夫。据朱可夫回忆



说，他没有认出巴甫洛夫，因为开战这八天来他消瘦得不成样子。谈话进行得并不轻松。巴甫洛夫十分激动，他不仅从敌军兵力上而且从上级指挥失误上寻找失利的原因。他的意见是对的，但他的命运却已经注定了，不仅是因为任命了新的司令取代了他。叶廖缅科担任这个职务总共只有几天，斯大林又改变了自己的决定，任命铁木辛哥元帅为西方面军司令，梅赫利斯则被任命为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而且斯大林在梅赫利斯赴任前对他说：

“您去西方面军，要在那里查明情况，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确定除巴甫洛夫之外还有谁对严重的错误负有责任。”

梅赫利斯一走出斯大林的办公室就把这句简短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他没有按照斯大林的要求着手调查情况，弄清犯错误的原因。他有自己的明确的立场和行动计划：巴甫洛夫有责任，应当再找出其他“犯严重错误”的责任人。梅赫利斯在到达西方面军司令部后，竭尽所能利用他在大镇压年代表现突出的经验来给高级将领们抹黑。为了处决西方面军指挥员，必须找到和提出有分量的罪名。梅赫利斯终于找到了。他指控巴甫洛夫及其战友们“贪生怕死”、“无所作为”、“指挥混乱”、“向敌人缴械”、“擅自放弃战斗阵地”及其他许多战时的犯罪行为。

所有这些说法都列入了《苏联国防委员会 1941 年 7 月 16 日决定》中。根据这个决定，被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并根据其判决被枪决的有：

- ① 西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大将；
- ② 西方面军参谋长克利莫夫斯基赫少将；
- ③ 西方面军通信主任格里戈里耶夫少将；
- ④ 西方面军第 4 集团军司令科罗布科夫少将；
- ⑤ 西方面军第 41 步兵军军长科苏布茨基少将；
- ⑥ 南方面军第 60 山地步兵师师长谢利霍夫少将；
- ⑦ 南方面军第 60 山地步兵师副师长、团政委级库罗奇金。

斯大林亲自签署了这个决定，他大概是认为形势需要铁腕。这个决定向全体武装力量和为前线生产所需产品的工业企业宣读了，而当时所有人都在为军队工作。

最简单的做法当然是指责斯大林行事过分残酷。在我们非战时的太平生活中很容易出现这种看法，但我们不应忘记当时的危急形势。

尽管我们十分尊重斯大林，理解他对国家和军队命运所承担的责任，但仍要直言不讳地指出：在这种形势下没有必要采取这种非常的、严酷的措施。这一次斯大林过分相信梅赫利斯，“做得过火了”。

我只提出一个问题：在战争的第一个星期里方面军的哪一个人、哪一个地段没有发生像巴甫洛夫（6月30日巴甫洛夫已被解职）那样的灾难呢？可以对纷纷后撤、失去指挥和丢失武器的许多人提出这样的指控。

现在无辜被枪决的人“由于缺少犯罪要素”而被恢复了名誉。尽管如此，他们的身上仍然留下了梅赫利斯和侦查员们炮制的谎言的阴影。

我收到了巴甫洛夫将军的女儿阿达·德米特里耶夫娜从明斯克写来的信，她请求维护父亲的英名。她举了报刊上的几个例子（1988年5月9日《消息报》，1988年7月17日《莫斯科新闻》及其他出版物），这些文章还在重复战时的指控，尽管巴甫洛夫早在1957年就得到了彻底平反。坏惯性的力量大得惊人！要是好事能记得这么牢就好了。

现在让我们来缅怀德米特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巴甫洛夫的事迹。诽谤者贬低他的才能，甚至说他是一个在几年中连跳几级的暴发户。但巴甫洛夫并不是“一日成名的司令”，他也并不缺少天赋。巴甫洛夫的工作做得并不比其他方面军司令差，而且他的学识甚至超过其中的某些人。

请大家自己来判断一下，能否把有以下履历和工作经历的人说成是“暴发户”。巴甫洛夫的年龄（生于1897年）与其他元帅相仿（梅列茨科夫—1897年，华西列夫斯基—1895年，马利诺夫斯基—1898年，巴格拉米扬—1897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一名普通士兵，自愿加入红军，在南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和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参加作战，从排长一直当到了副团长。巴甫洛夫1922年毕业于鄂木斯克高级骑兵学校，1928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931年毕业于军事技术学院速成班。1934~1936年巴甫洛夫任机械化旅旅长，他率领的旅受到表彰，他本人被授予列宁勋章。在赴西班牙前夕巴甫洛夫被任命为军长，在德国进攻之前他经历了三次现代战争：西班牙战争、苏芬战争和哈拉哈河战役。在西班牙他获得苏联英雄的称号，当时他担任共和国军队坦克和机械化部队使用方面的顾问，参与制定大的作战计划。他作为军事长官得到了多洛雷斯·伊巴露丽的极高评价，她称他是七位“杰出的苏联军事活动家”之一。

1937年巴甫洛夫从西班牙回国后被授予军级军衔。他成为工农红军装甲坦克部部长和总军事委员会委员（总共11人），斯大林也位列其中。巴甫洛夫为建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精良的坦克——T-34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才能。在1941年的战略军事导演中巴甫洛夫为主要报告人之一。所有关于他对坦克和机械化部队指挥艺术了解肤浅的议论均为

不实之词。巴甫洛夫是关于在现代战争中使用这些部队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之一，我国没有比他在机械化部队使用的战略战术问题上更有经验的将领。正因为如此巴甫洛夫大将于1940年被派往德军有可能发动突击的主要方向担任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司令。

如果悲剧在战争的第一个星期没有降临到巴甫洛夫的头上，那么他无疑会成为最著名的将领之一，将会赢得许多胜利并成为苏联元帅。

* * *

现在很少有人还能清楚记得斯大林1941年7月3日的讲话，而年龄小一些的人大概根本没有看过这篇讲话。但当时全国人民都在期待着斯大林的讲话，他的讲话热烈号召苏联人对敌人奋起反击，动员全国一切力量去夺取胜利。

斯大林指出，苏联政府与法西斯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没有错。他解释说：

“我们同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得到了些什么呢？我们保证我国获得了一年半的和平，使我国有可能准备好自己的力量，在法西斯德国胆敢冒险违反条约进攻我国的情况下予以反击。这肯定是我们有所得，即法西斯德国有所失。

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地撕毁条约，进攻苏联，得到了些什么，又失去了些什么？这使它的军队在短期内取得了某种有利的地位，可是它在政治上却输了，它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自己是血腥的侵略者。毫无疑问，德国在军事上暂时有所得，只是偶然因素，而苏联在政治上大有所得，却是重大的长久的因素，在这个基础上，红军在反法西斯德国的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胜利必将日益扩大。”^①

接着斯大林谈到必须消除祖国面临的危险，要认识到危险的严重程度，克服漠不关心的心理。我们的队伍中不应有怕死鬼、惊慌失措分子和怨天尤人之徒。应当按照战时的方式改造全部工作，捍卫每一寸苏联的国土，在不得不撤退时带走一切可以带走的东西，把一切无法带走的东西统统销毁，在战争中组织游击队。

总之，这是一场大规模战争完整的纲领。

在斯大林的讲话中有不少地方是用来提高军队和人民的士气的，而且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但也有一些明显的错误之处，例如，他在第

^① 《斯大林文集》第290页。——译者注

一段中说：“敌人的精锐师和精锐空军部队已被击溃，被埋葬在战场上……”^①这当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而且今天也不难加以核实，即便是根据哈尔德将军的日记也可以验证，他在7月3日写道：“伤亡情况：从6月22日至6月30日我军伤亡总数为41 087人——占现有人员的1.64%（部队人数为250万）。524名军官和8 362名士官和士兵阵亡；966名军官和28 528名士官和士兵受伤。”

如我们所看到的，对于这样大规模的战争来说，如此伤亡并不算大，而且至少这不是斯大林所说的被击溃的“精锐师”。

**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国家安全局
就居民对斯大林讲话的反应给联共（布）
莫斯科市委员会和莫斯科州委员会
第一书记亚·谢·谢尔巴科夫的特别报告**

1941年7月3日

国防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同志的广播讲话在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劳动者中激发了新的爱国主义热潮，人民对战胜法西斯充满力量与信心。

劳动者在集会上发言，决心保卫祖国并组织后方民兵队伍。

“领袖的讲话言简意赅，热情洋溢。他说的‘兄弟姐妹们’这句话说到了每个人的心坎里。为了回报他的讲话，应当更努力地工作，把全部力量和精力都献给亲爱的祖国。”（塑料厂工人拉斯卡佐夫）

“领袖的号召用爱国主义的激情团结起所有的人，全体人民万众一心奋起保卫祖国。敌人将被击溃，他们的目的不可能实现。”（女职员亨金斯）

“我们深信，斯大林同志的讲话将成为整个战争的转折点，不久我们的部队将制止住德军的进攻并转入反攻。”（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波波夫）

“领袖的号召得到了我们最广泛的支持，其表现就是生产率提高了两倍，生产保卫祖国所需要的武器。”（试验厂工人扎盖内）

“领袖并不讳言，我们的部队被迫退却。他不掩饰我国人民所面临的困难。听过他的讲话之后应当更努力地工作，讲话激励我们去建树功勋。”（塑料厂工人希巴耶夫）

^① 《斯大林文集》第288页。——译者注

“后方工人团结一致地完成前方的任务。敌人的阴谋伎俩必将在万众一心消灭敌人的人民的团结一致和良好组织面前碰得粉碎。我们要求在业余时间派我们去兵工厂劳动，以增加武器的生产。”（“工人莫斯科”联合工厂工长马克西莫夫）

“领袖的讲话使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去消灭敌人。现在不分男女老少，每个人都要参加民兵保卫祖国。”（“女布尔什维克”工厂车间主任叶菲莫夫）

“讲话对形势和敌人的力量作了完全正确的评价。对胜利的坚定信心感染了我们。这一讲话可望赢得我们的盟国英美的同情，这无疑具有国际意义。”（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学院教师福斯）

“讲话好极了，简洁明了，朴实无华。斯大林同志不掩饰我们正在后退，但他告诉人民要取得胜利应当怎么办。有这样的领袖我国人民一定会胜利。”（交通人民委员部职员多罗欣）

“听了斯大林同志的讲话之后我决心竭尽全力做好工作。我将学会生产中的男子职业技能，以顶替上前线的人。”（女工杰米多娃）

“全民皆兵——这是绝望的举动，惊慌失措的表现。”（世界文学研究所学术工作者希夫曼）

“我国政府没有重视德国在战争第一天的进攻，结果导致后来的失败和飞机及人员的巨大损失。斯大林所号召开展的游击运动是根本不起作用的斗争形式。这是绝望的表现。希望得到英美的援助是不明智的。苏联落入了包围之中，看不到摆脱的出路。”（法律顾问伊兹拉耶利特）

“所有这些讲话——动员人民、组织后方民兵等，均表明前线情况非常糟糕，而且也扭转不了形势。德国人显然很快就会占领莫斯科，苏维埃政权将会垮台。”（工程师佩列尔曼）

“斯大林同志讲话之后人民的情绪高涨，我国人民相信自己的领袖。既然斯大林同志说胜利是有把握的，那就是说，我们必将取得胜利。”（莫斯科汽化器厂工人韦普林采夫）

“为响应斯大林同志的讲话我志愿加入红军，我将奋不顾身地消灭法西斯恶徒。我请求将我的工资纳入国防基金。”（电车场工人伊瓦努什金）

“一切都完了。前线的情况毫无希望。克里姆林宫发出了筹建地下组织的指示，莫斯科将被放弃。形势极其危急，以致党中央作出了全民皆兵的决定。事情弄到这一步，红军的英勇精神到哪里去了。”



“前线的情况比斯大林说的更严重。希特勒大获全胜，德军兵临莫斯科。所有这些关于全民皆兵的议论纯属幼稚的笑谈。它们没有多大的作用。

今天，我们在发生决定性事件的前夕，仍像往常一样不遗余力地为苏联做表面文章。”（“体育与旅游”出版社编辑迈泽尔）

“当德国人已经兵临莫斯科时，说什么志愿兵为时已晚，号召人民也为时已晚。”（女职员科兹洛娃）

“失败不可避免，莫斯科的陷落不可避免。我们在25年中所建设的一切都将化为乌有。斯大林的讲话，他的绝望的号召反映了这一失败。”（职员卡拉西克）

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国家安全局局长、
三级国家安全政治委员级 库巴特金

俄罗斯联邦联邦通信委员会档案馆
核对无误的副本

今天有可能用朱可夫的话来对斯大林的讲话作出解释。下面我援引朱可夫关于战争头几天的几段话，这些话是许多年之后康·西蒙诺夫在与元帅谈话时记录下来的。这是独一无二的材料——是这位非常接近斯大林的人亲口讲述的。这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极有价值的，因此我作了长篇引述。而朱可夫本人的书中或者对此一字不提或者记得有所不同。

“最终要正视现实，不要不好意思，要谈它的本来面貌。必须正确评价从战争一开始我们便与之作战的德国军队。我们不是在一群疯子面前，而是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面前后撤了上千公里。应当明确地说，在战争开始时，德国军队在训练、技能、装备、作战心理准备方面都优于我军，它是在这种情况下投入战争的。它有作战经验，而且是打胜仗的经验，这一点起了很大作用。也必须承认，那时德军总参谋部和各级司令部的工作比我军总参谋部和各级司令部的工作做得好，德军的司令官们在那个时期比我军的司令员们考虑问题更胜一筹，更深刻。我们是在战争进程中学习并且学会了战争，于是开始打击德军的，然而这个过程是漫长的，而且这个过程开始时，德军在各个方面都已占有优势。

我们不好意思写我军在战争开始阶段不稳定的表现。而军队当时是不稳定的，不仅仅是退却，而且是逃跑，是张皇失措。不愿意

承认这一点反映了一种倾向：说什么人民没有过错，只有领导才有过错。总的来说这是对的，的确是这样，但是具体地说，战争初期我们不仅上边打得不好，下边打得也不好。我们有两个师并肩作战，有一个师打得好，打得顽强，而友邻师在受到敌人同样的打击时却逃跑了，这种情况并不是秘密。有各种表现不同的指挥员，各种表现不同的师和不同程度的顽强精神。

这一切情况都应当说，都应当写……”

“对突然性的解释，不论是现在的解释，还是斯大林过去在讲话中的解释，都是不完整的和不正确的。当我们谈论上述规模的行动时，突然性意味着什么？这不仅仅是突然越过国境线，不仅仅是突然发动进攻。突然越过国境线本身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突然性的主要危险不在于德军突然越过国境线，而在于德军的突击力量对我们是突然的，在于在决定性的方向上他们占有六倍和八倍的兵力优势对我们是突然的，还在于集中军队的规模和军队的突击力对我们是突然的。这也是决定战争第一阶段我们受到的损失的主要问题，而不仅仅和不单纯是突然越过国境线。”

“谈论斯大林的过错和责任，特别是谈到战前情况和战争初期的时候，通常都是如此。一方面这种说法是对的，而另一方面，我认为不能把一切问题都归结到他一个人身上，这是不对的。作为当时事件的目击者和参与者，应当说还有其他人，其中包括他的亲密战友——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要与斯大林分担责任。我不说贝利亚。他是一个想干什么、想在什么时候干、想用什么手段干都可以的人。因此才需要这种人。所以关于他的问题是个特殊问题，在现在的情况下我谈其他的人。

我补充说明，伏罗希洛夫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尽管1940年已免去他的国防人民委员职务，但直到战争开始时他仍然是国防委员会主席。一部分责任要由我们军人承担，党和国家的其他一些人也要承担责任。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在他那里讨论一系列问题时，我参加过多次，有机会看到争论和争吵的情况，看到在某些问题上争执不下，特别是莫洛托夫坚持己见；有时事情发展到斯大林提高嗓门讲话，甚至发脾气，而莫洛托夫笑着从桌旁站起来，照旧坚持自己的观点……

如果认为斯大林周围从来没有一个人就国家和经济的问题同他进行过争论，那是不正确的。然而同时，斯大林周围的大多数人支持他在战前形成的那些政治估价，首先是支持他的如下信念，即如果我们不去挑斗，不采取某种错误的措施，那么希特勒就不敢撕毁

条约和向我国进攻。

不论是马林科夫还是卡冈诺维奇在这个问题上同斯大林都一直是一致的，特别积极支持这一观点的是莫洛托夫。

我记得，有我在场时，斯大林的亲密战友中只有一个人对德国人是否可能发动进攻持不同观点，那就是日丹诺夫。他一直用十分尖锐的语气谈论德国人并且断言根本不能相信希特勒。

斯大林过高估计了希特勒忙于西方事务的程度，认为他已陷入处理西方事务之中，近期内不可能对我国作战。斯大林把这一点当作进行一切预测的基础，所以在法国被击溃以后显然就没有能力再度过高估计形势了。”

“回顾战前时期，应当说，我们没有努力坚持要军队做好战斗准备和尽快采取一系列应付战争的必要措施，这当然是我们军人的责任。显然我们应当比已经做的要做得更加果断。即使你不顾斯大林的不容置疑的威信，在内心深处产生了不安的疑虑，感到了德军进攻的危险，但是应当现实地设想一下，当时在估价总的政治形势方面和斯大林对立意味着什么。前几年的情况大家都还记得：公开声明斯大林是不正确的，说他犯了错误，这在当时意味着，不客气地说，你还没走出大楼，就得去贝利亚那儿报到。

这一切仅仅是真实情况的一个方面，而我应当谈谈全面的情况。在当时，即在战前，我没有感到我比斯大林更聪明，更有远见，判断情况比他更高明，知道的事情比他多。我没有自认为更正确的对事件的判断可以用来同斯大林的判断相比较。我没有这个想法。相反，我很信任斯大林，相信他的政治头脑，相信他的远见和摆脱最困难的处境的能力。在当时的情况下，相信他有能力避开战争，推迟战争。虽然心中感到担忧，但是，相信斯大林，相信最终一切都会像他所设想的那样，这种信任更占上风。而且，不管现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是真实的想法……”

作家西蒙诺夫凭借职业技能使元帅作了开诚布公的谈话，从而为历史留下了有关斯大林肖像真实而可靠的文字。

四 斯摩棱斯克战役

我军在边境地区的战斗行动节节失利，许多兵团陷入大小包围圈，没有足够的兵力来构筑统一的战线。

6月28日，即战争的第六天，希特勒机械化部队的钳形攻势在明



斯克地域合围，白俄罗斯首都被占领。在明斯克以西被围的还有一个庞大的苏军集团。

在白俄罗斯战场以南“中央”集团军群顺利向前推进，其坦克楔形攻势直逼第聂伯河。

斯大林决定沿西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的流向建立第二战略防御梯次配置，以阻止敌军向莫斯科推进。为实现这一任务斯大林从他的战略预备队中抽出第22、第19、第20、第16和第21集团军并将它们编入铁木辛哥元帅指挥的西方面军。

但这些集团军还没来得及在上述地区构筑牢固的防御，德军就强渡第聂伯河，尽管他们的野战集团军落在了远远突前的坦克兵团的后面。

第2坦克集群司令古德里安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步兵不会在两个星期之内到达。在这段时间内俄军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加强他们的防御。此外，令人怀疑的是，步兵是否能够突破沿河地段组织严密的防御并重新进行运动战……”

我完全意识到作出决策的困难。我考虑到敌军对暴露的翼侧进行强大的反突击的危险性，这些翼侧在强渡第聂伯河后将部署我的三个坦克军。尽管如此，我深刻体会到我所面临的任务的重要性，相信这一任务是可以完成的，同时坚信我军不可遏止的强大威力和进攻力，因此我立即下令强渡第聂伯河并继续向斯摩棱斯克推进。”

7月10日和11日，古德里安的部队强渡第聂伯河并扑向斯摩棱斯克，这样在作战地图上就出现了斯摩棱斯克方向。而7月16日、19日和20日，我几个集团军在斯摩棱斯克以西陷入战役包围中。

古德里安是一位有经验的将军，他担心翼侧遭到突击是正确的，因为坦克集群的翼侧没有得到掩护，他的部队沿着公路冲到了前边。我三个集团军落到了进攻敌人的后方，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军事理论还是简单的逻辑都提示实施侧面突击是可能的。但我军将领没有实施这种突击——他们沿着希特勒部队向前推进的公路一个劲地后撤，而希特勒部队则始终力图赶到前面去并在他们前面构筑绵亘正面。

是的，对军队进行运动战的素养差负有责任的不光是斯大林，因为我们的将领没有教会自己的军队按现代方式作战。

在斯摩棱斯克战役的第一阶段，敌快速部队突入纵深，将我部队包围在莫吉廖夫地域，占领了奥尔沙、叶利尼亚和克里切夫。霍特的坦克集群占领了维捷布斯克。

7月16日，古德里安部队的第29摩托化师占领了斯摩棱斯克的部分地区。

斯摩棱斯克的陷落使斯大林心情沉重。他指示苏联新闻局在未接到专门指示之前不得将放弃斯摩棱斯克一事向全国报导，并要求铁木辛哥不惜任何代价夺回该市。但最高统帅的这个要求在当时的形势下没有能够完成，因为斯摩棱斯克附近的许多部队被包围，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战斗。夺回斯摩棱斯克一时无法实现。

西方面军司令铁木辛哥元帅被召回莫斯科。

在斯大林的办公室中围桌而坐的有政治局委员们、铁木辛哥元帅和总参谋长朱可夫。斯大林在结束关于西方面军态势的不愉快话题时说道：

“政治局讨论了铁木辛哥担任西方面军司令期间的工作，认为他没有完成交给他的在斯摩棱斯克地域的任务。我们的结论是，应当派朱可夫担任西方面军司令。”

斯大林沉默片刻后，转向铁木辛哥问道：“您有什么意见？”

铁木辛哥没有回答。再说他对这个正确的指责能说些什么呢？

朱可夫试图为铁木辛哥说情：“斯大林同志，频繁更换方面军司令会严重影响到战役的进程。司令们还没有来得及熟悉情况，就不得不指挥艰巨的战役。铁木辛哥元帅指挥方面军总共只有四个星期，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中他熟悉了部队，了解了他们的能力，他做了处在他的地位所能做的一切，使敌军被阻在斯摩棱斯克地域将近一个月。我认为，任何别人也无法做更多的事。部队信任铁木辛哥，而这是主要的一条。我认为，现在解除他的方面军司令的职务是不公正的，也是极其危险的。”

加里宁附和说：

“是啊，朱可夫说得对。”

斯大林点燃了烟斗，看了看政治局委员们问道：

“也许我们应当同意朱可夫的意见？”

莫洛托夫坚定地表示：

“铁木辛哥能够扭转局势。”

其余的人同意他的看法。

斯大林命令铁木辛哥说：

“立即返回方面军，尽力扭转局势。”

在走廊里铁木辛哥对朱可夫说道：

“你不该劝斯大林。他的指责我已经听累了。”

“没关系，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战争结束后我们好好休息，而现在要尽快返回方面军。”朱可夫鼓励道。



* * *

冯·博克元帅对边境附近的战斗作了总结。

“‘中央’集团
军群司令

1941年7月8日
于总司令部

命令

比亚韦斯托克-明斯克地域的交战已经结束。集团军群部队与俄方四个集团军进行了交战，俄军包括大约32个步兵师、8个坦克师、6个摩托机械化旅和3个骑兵师。其中被歼灭的有：22个步兵师、7个坦克师、6个摩托机械化旅和3个骑兵师。

其余突围的兵团的作战能力也遭到极大削弱。敌有生力量伤亡惨重。

截至今天对俘虏和战利品的清点表明：俘敌287704人，其中有数名军长和师长，缴获或击毁坦克2585辆、火炮1449门、飞机246架、大量轻武器、弹药、运输工具、粮库和燃料库。

我们的伤亡没有超过我英勇部队的预期。

我们在同拼死抵抗的强敌的战斗中取得这样巨大的胜利应当归功于你们的信仰和你们的英勇精神。我谨向集团军群各部队和各级司令部以及所有运输部队和工兵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孜孜不倦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和取得的辉煌成就。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的战友——空军部队。现在主要任务是利用已经取得的胜利，我相信，集团军群各部队将一如既往地做他们所能做的一切：不取得最后的胜利绝不罢休！

元首万岁！

冯·博克元帅”

斯大林下令组建后备方面军，编入其中的有第29、第30、第28、第24集团军和罗科索夫斯基集团军，其任务是：这五个集团军沿会交方向实施反突击，被围的第16和第20集团军采取积极行动，以歼灭斯摩棱斯克以南的敌军集团。

但这些血战没有取得胜利。

从8月8日至21日，德军再次发动进攻，尽管付出巨大伤亡，但仍未能突破通往莫斯科的接近地。

9月1日，斯大林再次敦促铁木辛哥的西方面军的第30、第19、第16、第20集团军发动进攻，然而这一次仍没有取得胜利，只有后备方面军的第24集团军歼灭了叶利尼亚附近的敌军集团。

9月10日，斯大林下令西方面军、后备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部队在所在地区转入顽强的防御。

斯摩棱斯克战役是在正面达650公里、纵深达250公里的地区进行的，这一战役粉碎了希特勒统帅部不间断地迅速向莫斯科推进的计划。德军第一次被迫放弃进攻并转入防御。这使得苏联统帅部有可能在直接通往莫斯科的接近地建立防御区，并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首都保卫战未来的胜利。

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中苏军表现出崇高的勇敢精神，对此斯大林提出授予近卫军这一荣誉称号以资表彰。

获得近卫第1师称号的是由伊·尼·卢西扬诺夫将军指挥的原第100步兵师（斯大林1941年9月18日第308号令）。

应当给予斯大林应有的评价：在艰难的几个月里斯大林坚定地指挥军队，动员军队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中和在莫斯科方向反击敌人的猛攻。

五 组建波兰军队

1941年7月30日，苏联恢复了与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的外交关系。这一关系曾由于在苏德签订划分势力范围的秘密议定书后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而中断。

关系虽然恢复了，但波兰人当然还是怀恨在心。而且怎么能不怀恨呢？因为莫洛托夫1939年10月31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提出了所谓“波兰国不复存在”这一肆意侮辱的正式说法。

波兰军官在卡廷被屠杀的悲惨事件使这一关系蒙上了浓重的阴影（迄今为止仍未弄清是谁实施了这一暴行——是德国人还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

但战争在进行，斯大林决定集中力量恢复波兰并击退希特勒对苏维埃国家的侵犯。1941年8月1日，开始在莫斯科举行谈判。苏方代表为华西列夫斯基将军，波方代表为希什科-博古什将军。双方制定了“关于组建波兰军队与苏联和其他盟国军队共同反击德国”的协定。协定规定了波兰部队的国家主权、波兰军队的军服、效忠波兰共和国的誓词、在作战时对苏联最高统帅部的作战隶属，战争结束后军队返回波兰。

安德尔斯中将被任命为该军队司令，他刚从苏联战俘营被释放出来，他是在1939年指挥一个旅同红军作战时被俘并被关进战俘营的。

安德尔斯出身于波罗的海地主家庭，毕业于彼得堡贵胄军官学校、总参谋部学院，先后在沙皇军队和波兰军队中服役。

波兰军队是通过征兵和招募居住在苏联境内或关在战俘营中的波兰志愿者组建起来的。武器、装备、安置、给养供应均由苏方贷给，条件是战争结束后由波兰偿还。

兵力部署如下：军队司令部驻奥伦堡州希祖卢克市，第5步兵师驻塔季谢夫兵营，第6步兵师驻托茨基兵营。拨500万卢布作为启动经费。

安德尔斯将军提出了一份高级指挥员名单，上面列有每人拟担任的职务：3位将军，8位上校，8位中校。到1941年9月，从战俘营释放并征召了15 127名前波兰军人，其中有1 841名军官。9月17日，波军部队投入训练。

关于组建波兰军队的一切措施都定期向斯大林报告。

1941年11月，波兰政府首脑弗·西科尔斯基抵达莫斯科。12月3日斯大林接见了他和安德尔斯将军。

从第一次会见起，西科尔斯基就不谈波兰部队与红军共同作战，而是说要挑选波兰飞行员和20 000~25 000名其他军人并将他们送往英国以充实在近东的波兰部队。

斯大林不喜欢客人的这种态度，于是他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道：

“如果波兰人不愿意在这里作战，那么就请直说，愿意还是不愿意。我认为，部队在哪里组建，就应当留在哪里并参加作战。你们不愿意吗？没有你们我们也可。我们可以交还所有的人，我们自己可以应对。我们可以夺回波兰并把它还给你们，但人们对此会说什么呢？战后人们会如何看待你们呢？如果英国人借你们的手解决其在近东的利益，你们算是什么祖国解放者呢？与我国军队共同实施战斗行动有助于加强苏波关系，我们比邻而居，我们是邻居。英国的利益对你们更重要吗？”

“那就让军队暂时留在贵国，”西科尔斯基表示同意说，“但应增加其兵员，再组建一个师。”

“好吧，”斯大林赞同道，“我们可以把军队扩大到7个师，但那时你们要争取让英国和美国参与部队的供给。你们知道，我们现在前线的情况极其困难。”

西科尔斯基说道：“在贵国还有许多波兰人被关在劳改营内。可以用他们组建新的部队。”

西科尔斯基将名单递给斯大林。在这些名单中有许多惨死在卡廷的军官的名字。西科尔斯基想通过这种方式或是了解他们的命运，或是刺激一下斯大林（当时人们一致认为，这些军官是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

人员杀害的)。

“好吧，我们审查一下这些名单。”斯大林回答道。

西科尔斯基在与斯大林会见之后视察了波兰部队，对部队状况非常满意。

第二天安德尔斯将军在会见最高统帅之后与《真理报》记者谈话时说道：

“我的莫斯科之行得到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同红军最高统帅和苏联领袖斯大林先生的会见。这些会见是我一生中的大事。斯大林的每一句话都意义深刻，每一个想法都十分明确、根据充分。我们是带着决定我们事业成败的问题来找斯大林先生的。对于我这样一个渴望战斗的士兵来说，这些问题事关生死存亡。随着斯大林心平气和的回答：‘这将做到’，‘这个障碍我们将铲除’，我对我们的事业必将胜利的信心不断增强，我相信，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波关系将是美好的，而在我们共同努力和坚持到底的决心之下困难将被克服。我们要尽快投入战斗，以便尽早回到波兰，回到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家园，然后继续向西挺进直到胜利。”

然而在随后的全部工作中安德尔斯将军却竭力阻挠波兰部队与红军共同战斗。

六 斯大林个人的不幸

1941年7月20日，德国电台和《人民观察家报》报道说，斯大林的儿子雅科夫被俘。不难想像，对于作为父亲和最高统帅的斯大林来说，对于他这样一个所谓的受到世界瞩目的人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他感到痛苦的无疑不仅仅是儿子被俘和命在旦夕这一事实本身，而且还有对雅科夫落入敌人手中之后表现的担心。

关于雅科夫的俘虏生活和他的死亡人们写得很多，而各种各样的传闻更多。

我从各种出版物（主要是文件）中摘取一些片断，我希望，这些片断与我所收集的其他材料最终将使读者对雅科夫的被俘和死亡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有助于读者在这个问题上不再受各种各样的推测的影响。此外，我国情报机关弄清了雅科夫被俘的细节，甚至还搞到了德军俘虏他后审问他的笔录。

下面是经过删节的斯大林儿子第一次受审笔录的抄件，这次审讯是

在集团军司令部进行的，主持审讯的是克卢格将军、赫尔特斯少校和勒斯勒大尉，时间为1941年7月18日。

“您叫什么名字？”

“雅科夫。”

“姓什么？”

“朱加施维里。”

“您是人民委员会主席的亲属吗？”

“我是他的长子。”

“您会说德语吗？”

“我10年前学过德语，还记得一些。”

“您的军衔？在哪个部队服役？”

“上尉。在第14坦克师第14榴弹炮团服役。”

“您是怎么被俘的？”

“我，说实在的，不是我，而是我们师的余部，我们被打败并被包围。”

“您是自愿向我们投诚的还是战斗中被俘的？”

“不是自愿的。我是被迫的。”

“我们的士兵对您怎么样？”

“他们把靴子给我扒了。总的来说，我应当说，还不错……”

“军队中为什么设政治委员？他们的任务是什么？”

“鼓舞士气……他们进行政治教育。”

“士兵、指挥员、军官对此怎么看呢？”

“您要知道，如果政治委员工作时动脑筋，那么他就会受到爱戴和尊敬；但他若是利用自己的权力开始对士兵施加压力，那么很明显，士兵就会表现得规规矩矩，例如在开会时，在任何地方都会如此，但可能在内心深处他并不尊敬政治委员。”

“您听说没听说过部队排斥政治委员的事？”

“暂时还没听说过。”

“那样的话，也许您想知道我们这里的情况，战俘营里的情况，士兵们对政治委员持极端否定的态度，我们不得不对政治委员加以保护，以使他们不致被自己的士兵们打死。”

“您要知道，一切取决于这是些什么样的红军战士。”

“这里说的是过去的富农。”

“富农是过去的富裕农民。”

“难道他们对现行国家制度不满意吗？”

“他们当然不满意。”

“他们为什么对它不满意？”

“因为……请问，您了解党的历史吗？俄国的历史呢？总的来说，富农是维护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的。”

“您是否认为，富农在前俄罗斯帝国维护自己的财产，或者说德国农民现在维护自己的财产只是因为他还是私有者？在我们德国存在私有制，而在俄国已被取消。”

“是的，是的，是这么回事。您忘记了，富农是一回事，而他们的孩子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们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教育。在大多数情况下孩子们都不承认这样的家长。”

“您是否认为，与过去相比，近些年苏联的工人和农民得到了许多好处？”

“当然。请你们问问他们，在沙皇制度下怎么样。问问他们，他们会告诉你们的。在俄国建起了本国工业。俄国不依赖任何人，俄国有自己的一切，也许这是靠农民靠工人做到的。但也完全有可能，部分居民不满意。”

“现在，在您了解了德国士兵之后，您是否还认为红军有机会进行抵抗来改变战争的进程？”

“您要知道，我手头没有这种资料，因此我无法说有没有什么前提。但我个人始终认为，斗争还将继续下去。”

“您是否知道我们的军队现在在哪里？不是在这个具体地段，而是在北方和在南方。您是否知道我们已经占领了基辅？在您看来，如果我们不久进入莫斯科，将出现怎样的形势？”

“我知道，你们现在离莫斯科不远。”

“您自己刚才说您知道我们在莫斯科附近，在通往莫斯科的要道上；您应当能想像到莫斯科落入我们手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我直言不讳地回答你们：我不能想像这种情况。”

“您认为这是可能的吗？”

“可以向您反过来提一个问题吗？要是你们被包围呢？”

“您在战争期间听说过这样的情况吗？”

“您要知道，依我看，这是可能的，也就是说目前我没有任何资料。至于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那么有事实为证，即你们冲在前面的几个军被包围并被消灭了。这样的事情是有过的。”

“您知不知道德国国家社会党对犹太人的态度？您知不知道，现在的红色政府主要是由犹太人组成的？俄国人民是否会反对犹太人？”

“所有这些都是胡说八道，无稽之谈。它们没有任何影响。相反，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亲口告诉你们，俄国人民一向仇恨犹太人。”

“为什么仇恨政治委员和犹太人呢？在我们经过的城市和乡村，人们常常说：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

“我应当回答你们什么？关于政治委员我一会儿再说。关于犹太人我只能说，他们不会工作，犹太人和茨冈人是一丘之貉——他们不想工作。在他们看来，主要的是做买卖。生活在我们国家的一些犹太人说，他们最好呆在德国，因为德国允许做买卖。打击吧，只要允许做买卖。我们国家的犹太人不想当工人或农民，因此他们得不到尊敬……你们是否听说过，苏联有一个犹太自治州，首府在比罗比詹？实际上那里没有一个犹太人，居住在犹太自治州的全是俄罗斯人。”

“您是否知道，您父亲的第二个妻子也是犹太人——卡冈诺维奇？”

“不对，不对！这都是谣言。胡说八道。第一个妻子是格鲁吉亚人，第二个是俄罗斯人，阿利卢耶娃。其他的全是谣言、胡说八道。”

“6月22日父亲与您分别时最后说了什么？”

“去打仗吧！”

“他是否知道，我们找到的一些信件中说，朋友们希望今年夏天再次见面，如果今天秋天计划中的柏林之行不能实现的话？”

（雅科夫读信。在这封两位俄罗斯军官的往来信件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作为一名预备役少尉正在接受考验，我打算秋天回家，但只有在今年秋天不去柏林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一愿望。”署名：维克多。1941年6月11日）

“您对这封信是怎么看的？”

“你们想说，从这封信中似乎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况是，苏联打算在德国进攻之前宣战，是吗？是否应当这样理解这封信呢？”

“这样说有根据吗？真的有这样的打算吗？”

“不，我不这样认为。事实终究是事实。因为是你首先进攻的，对不对？不是苏联先进攻德国，而是德国先进攻的！有人跟我说，斯大林在一次讲话中说，如果德国不先进攻，那我们就这样做。我从没听过这样的说法！从来没听过！”

“您已婚还是单身？”

“我结婚了。”



“您有孩子吗？”

“有一个女儿。她三岁了。”

“您想不想让我们通知您的妻子，说您被俘了？”

“不要……如果你们想满足我的请求，就不要告诉她。”

“您是否认为家里人会因此而感到痛苦？当俘虏是士兵的耻辱，对吗？”

“我感到羞愧！我愧对我的父亲，因为我还活着。”

“但要知道不仅愧对父亲，而且愧对妻子！”

“是的，她对我来说并非无关紧要。我非常敬重她，非常爱她。”

“您的妻子会不会和红色政府一起逃出莫斯科？您的父亲会不会把她带在身边？”

“也许会，也许不会。”

他们建议雅科夫给父亲写个条子。他写了。字条送到了斯大林手里，一直保存在他的保险柜里。

“1941年7月19日

亲爱的父亲：

我被俘了。身体很好。不久我将被送往德国的一个军官集中营。对我还好。

祝您健康。问大家好。雅沙”

斯大林的儿子后来的情况如下：俘虏被按要求送到了柏林。他被关在普罗斯特肯茨集中营，在这里审讯继续进行，他们试图劝雅科夫“说心里话”，但朱加施维里的回答很简单或是沉默不语。

乌任斯基大尉当时也被关在这座集中营内，他回忆说：

“当朱加施维里被送来集中营时，他的气色很不好，仿佛大病初愈。他两颊凹陷，脸色灰白。他穿着苏军士兵的制服：小牛皮靴，士兵裤，船形帽和一件比他身材大的灰大衣。他的伙食和所有人的一样——五六个人一天给一个面包，用冬油菜做成的清汤寡水的菜汤，茶，有时候晚饭给一些带皮的土豆。雅科夫苦于没有烟抽，有时拿自己一天的口粮跟人家换来一撮马哈烟。

他们每个月都要对他进行几次细致的搜查，还往他的房间派了暗探……集中营当局允许朱加施维里在座落于军官宿舍底层的小



工厂里劳动。这里有6~10名战俘用骨头、木头和麦秆制作烟斗、玩具、匣子、象棋。囚犯们在煮从食堂得到的骨头时，也为自己准备了‘额外口粮’。

雅科夫的手艺不错，他用一个半月做了一副骨头象棋，后来用这副象棋与士官卡茨曼换了一些土豆。后来一位德国少校用800马克买走了这幅象棋。”

1941年4月末，将雅科夫重新送往盖世太保中央监狱的一纸命令突然打断了他相对还能凑合的生活。而在1943年2月，根据希姆莱的手令，雅科夫被送往臭名昭著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起初他被关在集中营监狱内，后被转往集中营“A”区的隔离监区。这个单独的监区与集中营本部之间用一道高高的砖墙隔开并用带有高压电流的铁丝网围起来。担任警卫的是党卫军。

1945年战斗行动结束之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几名工作人员——希特勒匪徒被美国人俘获。根据苏联统帅部的请求他们被交给了“除奸部”。他们关于朱加施维里的口供自然引起了我侦查员的注意。

集中营主任、党卫军旗队长坎特尔说：

“雅科夫·朱加施维里是由德国帝国安全五处舒尔采博士送到集中营的。经常从柏林来看望这位战俘的另一名党卫军是帝国安全刑事警官施特卢克。

当时许多人都知道，希姆莱本人对朱加施维里的情况很感兴趣。他显然是想在与苏联进行单独谈判时利用斯大林的儿子讨价还价或是用来交换被俄国人俘获的重要纳粹分子。”

不排除为达到这一目的，莫洛托夫的外甥瓦西里·科科林（后来查明，这个人只是冒充莫洛托夫的外甥）被关在雅科夫的隔壁房间里，而在另几个房间中则关着丘吉尔的外甥汤姆·库钦、法国总理的儿子勃鲁姆大尉及其他重要俘虏。

1943年4月14日，雅科夫·朱加施维里自杀身亡。

据另一种说法，雅科夫·朱加施维里是被杀害的。

党卫军分子康拉德·哈维希供认：

“1943年4月14日，晚20时许我来换岗。除雅科夫·朱加施维里以外，所有俘虏都在宿舍里，只有他一个人仍躺在宿舍外边并用树枝抽打地面。我注意到他当时情绪非常激动。20时卫队长带

着钥匙来给俘虏住的宿舍上锁，而我则去给分隔宿舍的铁丝网门上锁，此时雅科夫·朱加施维里仍躺在宿舍外面。我要求他站起来进宿舍去，对此他回答我说：‘不，随便你怎么处置我，但我绝不进宿舍。我要跟主任谈话。’

卫队长容林克向瞭望塔走去，以便给集中营主任打电话，但还不等他走开，雅科夫就走过我面前，突然急速向地面铁丝网‘障碍’冲去，越过之后冲我叫喊道：‘哨兵，开枪呀！’我说：‘您疯了，从铁丝网后面出去，到宿舍去，睡觉去，明天一切都会解决的！’对此他回答我说：‘德国哨兵是胆小鬼。俄国哨兵立刻就会开枪！’

我暗自思忖：我要让他清醒过来，让他平静下来。我走过去40来米，一回头看到他两只手抓住带高压电的铁丝网。在这之后我不得不按照条例使用了武器。在距离大约6~7米的地方我用枪瞄准了他的头部并按动了扳机。我击中了他。枪响之后他立刻松开了双手，整个身子向后倒了下去，头朝下挂在了铁丝网上。”

1943年4月，雅科夫·朱加施维里的遗体被火化，骨灰盒被送到了柏林，送到了帝国安全总局。后来骨灰盒落到了哪里，谁也不知道……

在这些供词中有两点明显矛盾之处：哈维希离开40米，回头看到朱加施维里用双手抓住铁丝网。哈维希怎么会在离这个地方40米处“在距离6~7米的地方”向朱加施维里的头部射击并“击中了他”呢？！如果他在40步远的地方看见雅科夫“用两只手抓住铁丝网”，那么朱加施维里会在那一瞬间被高压电击中而丧生。

但这名党卫军分子断言：“枪响之后他立刻松开了双手，整个身子向后倒了下去，头朝下挂在了铁丝网上。”这就是说，枪响之前雅科夫还活着，致他于死地的不是电流而是党卫军分子。如果铁丝网通了电，就没有任何必要向朱加施维里射击了。

总之，希特勒匪徒的解释不能自圆其说。极有可能是他们杀害了雅科夫，因为他没有同德国人做任何交易，既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发表广播讲话，也没有在传单上署名等等。他不与人来往，而这是盖世太保所不需要的。

在我看来，还有一种说法比较可信。

从柏林来的盖世太保多次对朱加施维里进行审讯。盖世太保勒斯勒在桌布下面放了一个麦克风，录下了谈话内容，然后对录音进行了别有用心剪辑，使雅科夫成了斯大林制度的揭露者。



这盘录音带在前沿阵地上通过扩音器反复播放，于是苏联士兵听到了雅科夫的声音，而德国飞机则在他们头顶上撒传单，鼓动他们听从斯大林儿子的劝告投降作俘虏，“因为对德军的任何抵抗都是徒劳的”。为了使人相信斯大林的儿子确实是在他们手上，德国人冲洗了一组照片：朱加施维里在德国军官的簇拥下，一会儿交谈，一会儿喝茶。不言而喻，所有这些都登在了报纸杂志上。

当斯大林得知这一情况后，依照法律（第227号令规定对与德国人合作的俘虏家属进行惩罚）下令根据通常办法将雅科夫的妻子尤利娅作为叛徒的妻子予以流放，但将孙女留在了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身边。斯大林希望不给人口实，似乎他庇护投诚德国人、进行反苏宣传的儿子的家属。斯大林没有违背法律，尽管他是最高统帅，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与所有人一律平等。

1943年，当弄清德国人对雅科夫使的是卑鄙的反间计，他不是叛徒之后，尤利娅被解除监禁并回到了家中。

雅科夫从新来的战俘口中得知了德国人的反间计。他们向雅科夫讲述了有他的署名并号召苏军士兵投降的传单，讲述了朱加施维里手握酒瓶与德国军官交谈甚欢的照片。

雅科夫在被俘期间表现英勇，没有给德国人的宣传提供任何口实。他自杀是为了证明他没有参与法西斯分子的肮脏勾当，是为了不让他们以后利用他的名义。也许他想以此向父亲表明自己的清白。

在彻底弄清雅科夫在监狱和集中营的被俘生活和英勇行为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77年（在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逝世25年后）发布命令，授予雅科夫·约瑟福维奇·朱加施维里一级卫国战争勋章（追授）。

遗憾的是，无疑由于这一漫长的悲剧而痛苦万状的父亲在生前没有看到儿子的昭雪。

* * *

生活中常常发生惊人的巧合：未来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的儿子列昂尼德·赫鲁晓夫像雅科夫·斯大林一样，也作了德国人的俘虏，只是时间稍晚一些——在1943年3月。情况只有这一点是相同的，而被俘前后所发生的一切则截然不同：列昂尼德和雅科夫在性格、行为和信念方面是根本不同的人。

让我们从头说起。关于列昂尼德·赫鲁晓夫（就像关于雅科夫·朱加施维里一样）有许多传闻，关于他在平时和战时的行径有各种传说。《有此一说》周刊2000年的三期上（第23、24、29期）以《叛徒还是英雄？》为题刊登了大量材料，详尽叙述了尼基塔·赫鲁晓夫先是试图

救儿子后又（在当上总书记之后）歪曲事实、从档案中抽出不利材料的情况。父子俩干了许多卑鄙下流的事。我不想耽误读者过多的时间，《有此一说》没有明确回答提出的问题：列昂尼德·赫鲁晓夫到底是什么人——是英雄还是叛徒？让我们用我认为熟知内情的人的讲述来回答这个问题。

从1941年7月1日至1942年3月，列昂尼德在古比雪夫治病（在飞机着陆时他伤了脚，并不急于上前线），玩得很痛快。

斯捷潘·米高扬（也是飞行员）回忆说：

“在古比雪夫我常去门诊部治疗，在那里结识了两位伤后也去那里进行门诊治疗的上尉：鲁边·伊巴露丽（著名的西班牙共产党领袖多洛雷斯·伊巴露丽的儿子）和列昂尼德·赫鲁晓夫。列昂尼德·赫鲁晓夫是善良的好同志。我同他一起呆了两个多月，几乎天天见面。可惜他嗜酒成癖。在古比雪夫一家旅馆里住着他的一个来某个企业出差的同志，此人在烧酒厂有‘路子’。他们在那里买来够喝一个星期的酒，经常在旅馆客房里狂饮。我虽然几乎滴酒不沾，却常去他们那里。去的还有其他客人，其中包括姑娘们。列昂尼德即使喝得酩酊大醉也从不闹事，他变得更加温和并很快就进入梦乡。当时我们还结识了疏散到古比雪夫的大剧院两名年轻的芭蕾舞女演员并和她们交上了朋友，她们是瓦利娅·彼得罗娃和利扎·奥斯特罗格拉茨卡娅。当我离开古比雪夫之后，那里发生了一起悲剧，我是后来听到莫斯科来的列昂尼德的一个朋友讲的，后来这一说法又得到了瓦利娅·彼得罗娃的证实，这位朋友在事发之后立即告诉了她。据他说，有一天聚会时有一个来自前线的水兵。当时大家都醉得‘一塌糊涂’了，闲谈中不知是谁说到列昂尼德的枪法很准。水兵打赌，提出让列昂尼德用手枪打掉他头上的酒瓶。列昂尼德一再推托不干，但后来还是开枪打掉了瓶颈。水兵说这不算，非得打中瓶子才行。列昂尼德又开了一枪，击中了水兵的前额。列昂尼德·赫鲁晓夫被判在前线服役8年（当时对被判刑的飞行员都采取这种办法）。他不等脚伤治好就去了前线，改学驾驶雅克-7B型歼击机……”

训练结束后团里对这位高干子弟非常照顾，团首长在列昂尼德死后给他父亲的唁函中谈到了这一点：

“团里指派最优秀的战斗飞行员、曾击落13架敌机的扎莫林上

尉负责您的儿子的空战训练。在多次考核中……列昂尼德·尼基托维奇·赫鲁晓夫总取得优异的成绩，表现出了天才歼击机飞行员所特有的技巧、坚定和勇敢精神。但尽管如此，团首长继续安排他训练，以各种借口不让他参加作战行动。

您的儿子一再坚决要求（他感到非常委屈的是为什么“拖了这么久”），他出色的驾驶技术和参加空战的本领成了批准他执行战斗任务的根据。他参加了一个有6~9架飞机组成的编队，由扎莫林负责观察和监督。扎莫林在最初的协同空战中并没有亲自参加战斗，而是保护自己的学生和观察他的行动……”

团首长减轻赫鲁晓夫丧子之痛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害怕遭到“没有保护好”的指责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不能背离真相，依据文件（作战起飞记录本）我们认为：1943年3月11日是飞行员列昂尼德·赫鲁晓夫作战工作的第一天也是最后一天。一清早他就和一批歼击机起飞了，扎莫林“没有亲自参加战斗，而是保护自己的学生和观察他的行动”。实际上那一天并没有进行战斗，而是整个飞行编队进行了一次训练飞行。

在第三次起飞期间，在那一天，大概是在午饭和休息之后，“赫鲁晓夫没有从空战返回”。

不管是飞行员还是团首长都从未说过列昂尼德·赫鲁晓夫牺牲了，人事卷宗中写的是“失踪”。这是1943年3月11日的事情。从这一天开始出现了各种传言和说法，赫鲁晓夫上尉的人事档案中的材料一再被涂改和调换。原因何在？为什么？我认为，在反间谍机关工作了37年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军瓦·乌季洛夫可以对这些问题作出最全面最可信的回答，因为他比其他人更了解内情。他的回忆录谈到了列·赫鲁晓夫一案，发表于1998年2月17日的《独立报》和2000年8月的《有此一说》上：

“列·赫鲁晓夫多次受到司法机关处理。早在战前他在基辅就同匪徒有勾结，匪徒被抓获并按照法院的判决被枪决，而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儿子却奇迹般地逃避了惩罚。古比雪夫事件之后赫鲁晓夫请求斯大林宽恕他的儿子。请求达到了目的。在第一次战斗中列·赫鲁晓夫驾驶歼击机飞往德方并消失得无影无踪。后来的情况我是从苏共中央行政机事务部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口中得知的（很久之前）。赫鲁晓夫的儿子不知是出于个人自愿还是由于被迫降落而成了德国人的俘虏。不知是由于他认为自己受苏维

埃政权欺凌，还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他同德国人勾结在一起。于是斯大林下令抓捕赫鲁晓夫的儿子，实施这一行动的可能是当时由阿巴库莫夫上将领导的反间谍机关‘除奸部’以及参与在国外干掉托洛茨基的人，战时这些人受苏多普拉托夫中将的领导。帕维尔·阿纳托利耶维奇在逝世前不久告诉我，说他的部下可能参与了对列·赫鲁晓夫的抓捕，但他没有透露细节。赫鲁晓夫的儿子被押送到莫斯科。‘除奸部’收集了有关列·赫鲁晓夫罪行的书证。莫斯科军区军事法庭判处他极刑——枪决。

可以想像尼基塔·赫鲁晓夫当时的心态。前不久他两次请求贝利亚、谢罗夫以及斯大林本人从宽处理他的儿子。他得知军事法庭的判决后，致信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请求撤销严厉的惩罚。令人奇怪的是，斯大林立即表示同意。关于列昂尼德·赫鲁晓夫命运的问题被提交政治局审议。

于是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阿巴库莫夫介绍了案情和军事法庭的判决后离开了会场。在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莫斯科州委和市委书记谢尔巴科夫（他还兼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和政治局候补委员）。

第一个人的发言决定着许多东西，首先是讨论的方向。谢尔巴科夫强调必须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指出，不能一方面宽恕犯有罪行的高干子弟，另一方面对其他人严加惩处，那样人民会怎么说呢？谢尔巴科夫主张维持原判决。

随后发言的是贝利亚。他提醒说，列昂尼德·赫鲁晓夫已经得到了两次宽恕。

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意见一致：维持原判决。

斯大林最后一个讲话。他的长子雅科夫也被德国人俘虏，斯大林的决定似乎事先就签署了对他的判决。‘尼基塔·赫鲁晓夫应当自律并赞成同志们的意见。如果这样的事出在我儿子的身上，我将接受这个公正的判决，尽管作为父亲会非常痛苦！’据人们跟我说，斯大林就这样在结束会议时作出了结论。”

需要再加评论吗？也许只要举出一句话就够了，这句话表明小赫鲁晓夫案给斯大林本人带来了什么后果。这句话是老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前夕对其亲信说的：

“列宁当年向沙皇一家报了杀兄之仇，而我要向斯大林报杀子之仇，尽管他已经死了。”

多库恰耶夫将军听到了这句语含威胁的话，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因为他曾担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保卫总局副局长。

两个父亲，两个儿子，两种命运——他们是多么的不同，他们各有各的不幸！

七 在敌人一方

(1941年7~8月)

高音喇叭播送的军歌响彻整个德国，仿佛全国都参加了远征作战似的。人们沉浸在节日的喜悦之中。戈培尔慷慨激昂地祝贺同胞们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兴高采烈地宣布德军占领的一座又一座城市的名字。

希特勒的大本营里也是一派节日气氛，所有的人都和颜悦色，笑逐颜开。担心、疑虑和动摇全都被抛到了脑后，所有的人都对元首怀着无比崇敬之情。当然该这样，是他战胜了法国、波兰，而如今又几乎征服了俄国！

当元首在场的时候只能小声说话，只有他才能放开嗓门大声疾呼，以胜利者的口吻讲话。大家都明白和习惯了这一点。他有这个权力！

7月3日，即战争爆发后第12天，哈尔德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总的看来现在可以说，粉碎西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西岸俄国陆军主力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再往东我们只会遇到个别军群的抵抗，从人数来看它们不会对德国军队的进攻造成重大的阻力。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俄战局在14天内取得了胜利。当然，这一战局还没有结束。”

而希特勒在7月4日的例行会议上意味深长地说：

“我始终设法设身处地从敌人的角度考虑。实际上敌人已经输掉了战争，好就好在我们一开始就粉碎了俄国的坦克部队和空军。俄国人再不可能重整旗鼓。”

不要以为希特勒匪徒都是些冒失之徒，要是把他们想像成我国报纸有时写的那样滑稽可笑，那就太天真了。德军领导人有着相当充分的理由心花怒放。

希特勒因前两周的战斗取得的胜利而欢欣鼓舞，正在考虑法西斯德军结束东方战局后的军事行动。他十分相信他的意图可以实现，所以早在进攻苏联之前他就下达了相应的指示，于是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制定了第32号训令。希特勒1941年6月11日签署了这一训令。

该训令着重强调了法西斯德军实现“巴巴罗萨”计划之后的作战任务。训令规定，歼灭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力量后，“鉴于东征胜利完成后将出现的局势，可以向军队提出在1941年秋末和1941~1942年冬完成的以下战略任务……”接着指出了这些任务：在北非占领图卜鲁格和进攻苏伊士运河；从外高加索派遣机械化军进入伊朗和伊拉克；通过占

领直布罗陀封锁西地中海的人口等等。

但是除了雄心勃勃的计划之外，还有着现实的形势和在继续战斗的现实的部队。现实情况是，在夺取斯摩棱斯克的战斗中伤亡惨重的“中央”集团军群的右翼有落在后面的“南方”集团军群，而我们的西南方面军对挺进的“中央”集团军群的后方构成威胁，并有可能进行有力的反突击，如若组织得当，甚至可能切断“中央”集团军群的突前部队。

于是元首开始担心起来了：部队接下来该向哪个方向推进，是向南还是向北呢？对于为何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谁促使想这样的问题，希特勒左右的人不知怎的习惯于不作讨论。一出现问题，元首就预先以为自己的抉择是英明的，装模作样地预言说：“这将是这场战争中最艰难的一个抉择。”看来他自己私下里也明白，闪击式突击的打算落空了。战争爆发前制定的东方战局的所有方案都要求，不能让红军部队撤退到苏联境内纵深的后方，所有的部队都应当在第聂伯河以西就被包围和歼灭。但是这一点显然没有做到。

希特勒表面上泰然自若，趾高气扬，但是内心却忐忑不安，预感到大祸临头。对这一点今天可以用他下达的一些训令来加以证实。当时他下达了一连串的训令，而且是一个接着一个，一个修正一个，甚至一个撤销一个。

7月19日，希特勒由于担心“中央”集团军群的命运，不得不下达了第33号训令。顺便说一下，这是继战争爆发时签署的具体规定军队进一步行动的“巴巴罗萨”计划之后的第一个训令。

根据这一训令，“北方”集团军群暂停进攻。“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博克奉命整顿其部队，特别是恢复坦克兵团的战斗准备状态。龙德施泰特（“南方”集团军群）奉命竭尽全力消灭苏联部队，阻止他们向东后撤，渡过第聂伯河。

希特勒对于不得不下达这样的训令感到十分不满，因为这样的暂停进攻无论如何不是他，也不是法西斯德军最高统帅部原本的打算。希特勒左右的许多将军想方设法怂恿元首继续不顾一切地进攻莫斯科，可是希特勒本人尽管始终在寻找机会实现其原本的打算，却突然不顾事态的逻辑，于7月23日对第33号训令作了补充，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提出的任务，这大大出乎司令们的意料。

现在，莱布的“北方”集团军群应当在得不到坦克军补充的情况下攻克列宁格勒，博克的“中央”集团军群应当攻克莫斯科，此外，“中央”集团军群管辖的第3坦克集群奉命向伏尔加河推进。而南方的龙德施泰特得到增援后应当穿过哈尔科夫和顿巴斯，深入高加索，实现



第32号训令预定的进一步的计划，即向伊拉克和伊朗推进。

可见希特勒不顾前线的形势，试图通过主观的施压来实现他心驰神往的意图。为什么要等待？敌人已经被歼灭了，敌人已经摇摇欲坠，只要再推一把就行了！因为几天前大家都已明白战争胜利了。

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和总参谋长哈尔德清楚希特勒在这些新训令中提出的任务完成不了。他们谈了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们的论证不足以让人信服。

当时西方向的斯摩棱斯克战斗仍在继续。苏联部队在亚尔采沃、叶利尼亚和斯摩棱斯克地区和莫吉廖夫合围圈积极作战，这些战斗的结局难以预料，苏联部队作战的胜利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于是7月30日希特勒不得不再下达一个例行训令，即第34号训令。该训令实际上撤销了他的上一个训令，再次下令部队转入防御。

“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博克对这一命令十分不满，因为他仍然相信，他可以坚决猛攻莫斯科，击退苏联部队并占领其首都。

战争结束后希特勒的将军们指责他们的元首一味冒险，缺乏战略素养。但是将希特勒和他中央方向的司令的行动加以比较，却恰恰说明情况完全相反。当时希特勒担心苏联部队的进攻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命令博克暂时停止前进，打退敌人的进攻，对队伍进行补充，加以整顿之后才能恢复进攻。但是博克不愿听元首的话，他说：“我们在丧失大好时机……不要管后方形成的包围圈，必须向前，向维捷布斯克推进。”他对总司令布劳希奇说：“现代战争的原理要求我们继续向莫斯科推进。我们已经击溃了敌人的大部分兵团。”布劳希奇较为谨慎，他对博克说，后方还有实力强大的苏联部队，暂时应当转入防御。但是博克仍然一意孤行。

希特勒为彻底搞清楚当时的形势并作出结论——究竟谁说得对，是博克还是布劳希奇——于8月4日飞抵博里索夫“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已迫在眉睫、急待希特勒作出决定的主要问题是，把主要兵力集中在什么地方，是进攻莫斯科，还是攻克基辅。

会议开始时由博克作关于“中央”集团军群前线态势的报告。他勾画了军队的态势、现状和物质保障。

古德里安在报告他的第2坦克集群前线态势时特别强调指出说：

“要继续作战，就必须弥补军官、士官和士兵的减员以及装备损失。要是运来必需数量的新发动机，则可将坦克的纵深作战能力恢复70%。要是集群得到的发动机少，则只可进行有限的作战行动。”

接着霍特报告了第3坦克集群的前线态势，他也特别强调指出，要是运不来新的发动机，他的集群接下来只能进行有限目标的作战



行动。

其他与会者也发表了意见，总的来说，他们的观点归结为一点：“中央”集团军群必须继续向莫斯科进军。

希特勒似乎要加以总结，但他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只是边考虑边说：

“现在不可能确定英国的计划。他们有可能在比利牛斯半岛登陆，也有可能在西非登陆。为击退这种登陆企图以及其他目标，必须让高度机动灵活的预备队作好准备。为此国内有两个坦克师和重新组建的坦克兵团生产出来的发动机主要配备给这些坦克兵团。可是我们再考虑考虑，我希望我们有可能为第2和第3坦克集群拨出哪怕400台新发动机。”

古德里安插了一句：

“单是第2坦克集群就需要300台发动机。”

希特勒没有回答古德里安的插话，继续议论说：

“要就继续作战作出决定，决定性的任务是，拿下敌人生死攸关的重要地区。首先要拿下的目标是列宁格勒和俄国波罗的海沿岸一带，因为这一地区有大量的工业企业，而且惟一一家超重型坦克生产厂就在列宁格勒，还因为，务必把俄国海军赶出波罗的海。我们希望在8月20日之前达到这一目标。之后‘北方’集团军群的大部分部队将由‘中央’集团军群管辖。”

希特勒继续说：

“最近几天南方形势发展很好，预计那里将消灭敌人的大量兵力。敌人也因同‘南方’集团军群此前的作战而精疲力竭，敌人的战斗力不能说很高……可以推断，俄军近期不可能进行大战役和保持完整的战线。可以证明敌人伤亡惨重的是，从古德里安上将关于进攻罗斯拉夫利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敌人在最近的战斗中投入了他们的精锐的无产阶级兵团……给人的印象是，那里可以全面突破，罗斯拉夫利以东门户大开。”

希特勒洋洋自得，乐观地说：

“总的来说，东线战役到目前为止比预期进展得顺利，即使我们遭遇了比预期多得多的坦克和飞机的阻击……英国人高兴地叫喊说，德国人停止了进攻。务必通过我们的报刊和广播答复他们，提醒他们，我们已推进了很大的距离。步兵昼夜的行程超过了迄今能达到的里数。我甚至打算，‘中央’集团军群到达第聂伯河—西德维纳河地区后，就地暂时转入防御，可是形势如此之好，必须迅速看清形势并作出新的决定。”

接着希特勒发表了他对总的形势的判断，说：

“敌人第二重要的是南俄地区，尤其是自哈尔科夫地区起的顿涅茨煤田。俄国经济的整个基地都在那里，控制这一地区必然会使俄国人的整个经济破产……因此，我以为东南方向的战役是当务之急，至于东进行动，则最好暂时转入防御。气象分析家和专家报告说，在俄国，南方的秋雨期一般从9月中旬开始，而莫斯科地区到10月中旬才开始，因此，我们结束南方战役后，在雨季到来之前还来得及向东即向莫斯科方向继续进攻……”

博克明白希特勒还是更倾向于将主力集中在两翼，也就是北翼向列宁格勒方向进攻，南翼向基辅方向进攻。博克等到希特勒稍作停顿时仍然试着提醒他说：

“可是向东即向莫斯科方向进攻会遭遇敌人的主力部队。歼灭这些敌军事关战争结局。同时也要意识到，要进行这样的决定性进攻，就要认真备战，供应必需的装备和弹药。”

希特勒在这次会议上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向哪个方向集中东线主力的问题悬而未决。

希特勒从“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飞往龙德施泰特的“南方”集团军群。这里的情况更麻烦。龙德施泰特完全陷入与米·彼·基尔波诺斯指挥的西南方面军部队的交战中。龙德施泰特头头是道地向希特勒报告说，只有消灭了乌克兰东部的敌人，“中央”集团军群向莫斯科作最后的、决定性的突击才能得到翼侧的保障。在乌克兰的死结被解开之前，不能向莫斯科方向突击。

希特勒听完龙德施泰特的报告、了解了这里的态势后，再一次确信，必须“挥师南下”，因为，如果不消除南线对“中央”集团军群的威胁，那么就谈不上继续向莫斯科进攻以至全线向东推进。

可是“挥师南下”并非易事。斯摩棱斯克激战正酣，古德里安的坦克集群正与弗·雅·卡恰洛夫中将的集群交火。这一集群尽管陷入包围之中，却十分顽强，牵制住了敌人的大批兵力。而在博克战线的北翼，霍特的坦克集群也不能挥师南下，因为他的身后有奥·伊·戈罗多维科夫上将的骑兵集群在活动。大卢基地区也有我们被包围的第16和第20集团军的部队在积极活动，它们正在向东突围。两翼的态势就是这样的。

8月8日我军转入进攻，突击博克集团军群的中央，楔入其先遣部队。8月17日朱可夫指挥的预备队方面军开始进攻，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后面还会讲到。朱可夫在这里用叶利尼亚战役为斯摩棱斯克交战写下了分量很重的、也许是有决定意义的一笔。

* * *

希特勒 1941 年 8 月 22 日的新训令就是在他的军队处于这样复杂紧张的态势下出笼的。训令的开头是这样说的：“陆军司令部关于从 8 月 18 日起在东部继续作战的想法与我的计划不符……”希特勒彻底推倒了原来作出的决定，老实说，这是苏联部队的行动迫使他这样做的。他前不久还在第 34 号训令中命令博克在冬季到来之前占领莫斯科，而现在却下令“中央”集团军群停止行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的将军们以及其他国家军队的战略家写文章说，希特勒停止进攻莫斯科是个错误。如果客观地讲，那么应当承认，希特勒当时是正确的。但是得作这样一个说明：不是他决定停止进攻莫斯科，而是苏联部队制止了这一进攻。如果继续进攻下去，那么德军就会遭到更惨重的失败。下面是希特勒给他的将军们的解释：“只有消灭了阻止完成进攻莫斯科行动的苏军大量兵力后才可以继续这一进攻。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务必消灭这些苏联部队。认为我们因此会浪费时间，进攻莫斯科会拖得太晚，或者坦克兵团会由于技术原因无法完成这一任务，这种反对意见是没有说服力的。这是因为消灭了威胁‘中央’集团军群右翼的俄国军队后，进攻莫斯科才会更容易，而不是更困难。”

接着希特勒又合乎逻辑地分析道：“眼下我们有了战时少有的良机。部署在纵深近 300 公里突出部的敌军，被德国的两个集团军群从三面包围。”

情况的确如此。西南方面军的部队被德国兵团从北边和南边包围。此外，希特勒强调指出，在德军挥师南下以及占领乌克兰和顿巴斯后，苏联将丢掉煤、铁和石油，而德军将得到这一切，这对取得最后胜利至关重要。

8 月 23 日坦克集群司令被召到“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这里根据希特勒的上述训令命令他们如何进一步行动。参加这次会议的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显然因元首的这一决定而感到沮丧，因为他是进攻莫斯科计划的主要制定者之一。

由于希特勒对司令部将军们的反对意见置之不理，博克就建议古德里安这位前线的将军再去见希特勒，试着说服他改变已作出的决定。

古德里安与哈尔德一起飞往东普鲁士的大本营。古德里安在这里首先去见了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元帅，对他讲了此行的目的和将与希特勒谈的话题。布劳希奇回答他说：

“我不允许你在元首面前提起进攻莫斯科的问题。你接到的是在南方发起进攻的命令，只能谈谈怎么完成这一命令。”

“那么请允许我飞回我的坦克集群，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与希特勒无论谈什么都毫无意义。”

元帅反对道：“不，你去见元首，向他报告你的坦克集群的情况，但是不要提到莫斯科！”

古德里安去见了希特勒。他在凯特尔、约德尔、施蒙特等人在场时报告了他的坦克集群的前线态势以及部队现状和物质保障状况。

希特勒问道：

“您是不是觉得您的部队依靠当前的战斗力还能作出一个大贡献？”

“如果部队有着每一个士兵都明白的真正目标时，那就不成问题！”

“您指的当然是莫斯科吧？”

“是的。既然您提到了这一话题，那就允许我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吧。”

希特勒同意了，于是古德里安又详细向他说了一遍自己的理由。他说，在关键方向取得军事胜利和歼灭敌人的主力后，控制乌克兰重要的经济地区会变得容易得多，因为占领了莫斯科（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会使俄国人把部队从北方调到南方难上加难。他还提到，“中央”集团军群的部队已完全作好进攻莫斯科的战斗准备，而拟议中的对基辅的进攻还必须花去很多时间来变更部队的部署。他又强调指出，南方战役可能旷日持久，那么因天气恶劣，今年对莫斯科进行决定性突击为时已晚。

希特勒静静地听取古德里安的报告，一次也没有打断他。但是当古德里安停了下来，以为他的热情洋溢的话语已经说服了元首时，希特勒突然坚决地说：

“我命令立即转向进攻基辅，这是我们最近的战略目标。”

然后希特勒又老调重弹，说了大本营的训令中已经谈到的关于突击列宁格勒工业区、必须占领在苏联阻止德国利用罗马尼亚石油的斗争中扮演航空母舰的克里木的想法以及其他“经济理由”。

八 西南方面军是“阿喀琉斯的脚踵”^①

西南方面军不仅使莫斯科避开了“中央”集团军群的直接突击，而且使“闪击战”计划破产了。

^① 阿喀琉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他的母亲忒提斯女神为使他长生不死，把他浸在冥河中，只有她提着的脚踵没有浸到水。后来阿喀琉斯被帕里斯用箭射中脚踵而死。现将“阿喀琉斯的脚踵”比喻为致命的弱点。——译者注

西南方面军右翼的部队顽强地顶住了敌人对基辅的猛攻，但是敌人在左翼把第6和第12集团军压向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并在乌曼地区最后完成了对这些部队的合围。

斯大林听到以集团军司令穆济琴科和波涅杰利内为首的数十万红军战士和指挥员在乌曼地区被围后，心情十分沉重。而且这发生在不久前的白俄罗斯失利之后。但是意识到在基辅地区又一个包围圈正在逐渐形成使他心情越发沉重。

斯大林打电话命令基尔波诺斯说：

“立即与方向总司令和南方面军司令一起拟订对赫尔松—卡霍夫卡—克列缅丘格一线及以北（包括基辅）构建防御的计划。尽快构建这一防线，藏进地里去，从后方抽调预备队，特别是炮兵。在这一线上与后撤的部队会师。在8月5日12时之前提出建议。”

基尔波诺斯回答说：“您的指示将被立即执行，我们采取一切措施守住基辅。请求补充兵员和装备。我们奉总司令之命从8月6日早晨开始从科尔孙地区向乌曼方向组织突击，支援被围的部队。想听听您对此的意见……”

斯大林说：“我们同意，大本营不但不反对，而且完全支持一切援助被包围的同志们的进攻行动。但不要忽视防御线。应当时刻既作好的打算，也作坏的打算。这是不陷入困境的惟一办法。至于援助，援助会到位的，但如果以为现成的东西会送给你们，那就不明智了。要学会自己供应和补充自己。就在集团军中制造备件，让一些工厂生产步枪和机关枪。好好动动脑筋，就会发现，在乌克兰就可以为前线创造许多条件。列宁格勒就是这么做的，列宁格勒利用它的机器制造厂和机器制造基地做了许多事。乌克兰也可以这么做。列宁格勒生产出了火箭炮的火箭发射器。这是个非常有威力的武器，它能大力杀伤敌人。为什么你们就不能这么做呢？”

“斯大林同志，您的所有指示都将被立即执行。遗憾的是，我们不了解火箭发射器的构造。请您下令给我们送来一个带图纸的样品，我们就自行生产。”

“您说什么？图纸你们那里就有，样品也早就有了。但如果您这么不经心，那我就给你们配备一个火箭炮连、图纸和生产设计师……祝一切都好，赢得胜利。”

为使基辅军队集团不被包围，斯大林组建了布良斯克方面军。

为给新组建的方面军提出任务，斯大林将叶廖缅科上将召到莫斯科。他对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态度很好。他在接见叶廖缅科时与他亲切交谈，并询问了他的健康状况。叶廖缅科感到了这种好感，表现得很自



信，这也给最高统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前线的形势十分糟糕，全线溃败，需要一位可以依赖的可靠人物，叶廖缅科当时就是斯大林认为的这种意志坚强的、可靠的人物。

斯大林勾画了苏德前线的形势，给叶廖缅科提出了任务。他认为古德里安的第2坦克集群是这一方向上的主要突击集团，他说这支力量很有威胁力，这个方向非常关键。斯大林还提到，古德里安集群有可能突击西南方面军的右翼，但他还是指出，布良斯克方面军部队的主要任务是竭尽全力歼灭古德里安的部队。

叶廖缅科听完斯大林的话后，十分自信地说，他在最近一段时间一定歼灭古德里安这个坏蛋。

最高统帅十分欣赏叶廖缅科的这种自信，斯大林在叶廖缅科离开后对他办公室里其余的人说：

“这就是我们在这种复杂形势下需要的人。”

斯大林在叶廖缅科离开后向沙波什尼科夫口授了给西南方面军的训令，命令要千方百计守住基辅。

随后几天斯大林和总参谋部研究消除北面对西南方面军威胁的问题。他们加强了这一方向上的兵力，首先用他们的预备力量（坦克、炮兵、兵员和装备）加强了布良斯克方面军，调来相邻方面军的航空兵、总司令部的预备队以及远程轰炸航空兵部队。

但是布良斯克方面军的战斗行动并不能让人感到乐观。

8月20日在乌涅恰地区防线被突破了。第13集团军第45步兵军陷入包围之中，遭受重创的第13集团军全部撤向苏多斯季河。

沙波什尼科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又一次试着说服斯大林作出从基辅筑垒地域撤走部队的决定。斯大林平静地听他们说完后决定：

“撤走中央方面军第21集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第13集团军以消灭中央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之间的缺口。不过两个方面军的接合部要有强大的预备队作保障。不要考虑撤退，要考虑如何挽回局势！”他结束谈话时生气地说。

又过了四天。形势每况愈下。沙波什尼科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又在作例行的形势报告时建议：

“叶廖缅科很难与中央方面军协同行动。两个方面军兵员都不多，但指挥机关过于庞大。总之，我们建议合并两个方面军，由叶廖缅科统一指挥。”

谈话进行了很长时间，但是直到凌晨斯大林才认同，合并两个方面军是合理的意见。

他说：“那好吧，你们动手拟订训令，但我必须先和叶廖缅科商量



一下。”他对沙波什尼科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说：“你们不要走。”

斯大林专门把他们留下来，希望再一次表明他想与方面军首长商量。他给叶廖缅科挂了个电话。

“是我！斯大林同志！”

“您好，叶廖缅科同志！我有几个问题问您。是否应该解散中央方面军，把第13集团军和第21集团军合并归您指挥？我们可以在最近几天（明天，最迟后天）给您派来两个有一定数量反炮台炮队的坦克旅和两三个坦克营，您是否急需？如果您承诺歼灭古德里安，那么我们可以再给您派几个航空兵团和几个火箭炮兵连。请回答。”

“关于解散中央方面军，我的意见是：由于我想歼灭古德里安，并且一定会歼灭他，所以南线需要有力保障。这就意味着要与从布良斯克地区出发的突击群大力协同动作，因此我请求让中央方面军的两个集团军归我的指挥。斯大林同志，我很感谢您给我增援坦克和飞机，只是请求您尽快把它们派过来，我们非常非常需要它们。至于古德里安，我们一定尽力歼灭他，您提出的任务一定尽力完成。我再没有问题了……”

斯大林满意地咳嗽了一声。

“瞧，你们听见前线将士的意见了吗？他决心痛击古德里安，你们给部队拟订训令吧。”

斯大林当天晚上看也没看就签署了这一训令。他刚与伏罗希洛夫交谈过，心情非常恶劣。敌人已兵临列宁格勒城下，已经出现要炸毁从塔林艰难撤回列宁格勒的波罗的海舰队军舰的问题。最近几昼夜，他在来回考虑基辅和列宁格勒的问题，而且莫斯科的形势也岌岌可危。

而现在他的面前又坐着筋疲力尽、疾病缠身的沙波什尼科夫和由于睡眠不足而面色发青的华西列夫斯基。

斯大林说：“列宁格勒的形势非常糟糕，西北方向总指挥部已经解散，伏罗希洛夫在指挥列宁格勒方面军，可是有什么用呢。叶廖缅科那里也没什么让人欣慰的消息。今天就给他下达训令，责令布良斯克方面军部队转入决定性进攻，歼灭古德里安的集群，继续追击，9月15日之前抵达彼得罗维奇—克利莫维奇—新济布科夫一线。”

布良斯克方面军在航空兵的大力支援下开始进攻，航空兵的行动由工农红军空军副司令彼得罗夫少将指挥，但是始终不能击退或者哪怕是阻止穿透力极强的古德里安的坦克集群。

9月2日深夜斯大林打电话给作战部的华西列夫斯基：“拿上本子，记下给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的指示……”

斯大林口授道：

“大本营对您的行动仍然不满意。虽然航空兵和地面部队采取了行动，但是波切普和斯塔罗杜布仍然在敌人手里。这说明您稍微把敌人揪了一下，但还没有把他赶走。大本营要求地面部队与航空兵协同动作，把敌人从波切普和斯塔罗杜布地区赶走，狠狠加以歼灭。在没有达到这一目的之前，关于完成任务的种种议论都是空话。大本营命令，彼得罗夫原地不动，指挥所有航空兵团支援地面部队取得决定性胜利。古德里安及其整个集群应当被彻底歼灭。在没有完成这一任务之前，您的关于取胜的种种保证毫无价值。我们等待您歼灭古德里安集群的消息……”

但是最高统帅没有等到这样的报告，前线却传来方面军司令叶廖缅科腿部受重伤的消息。他很快就被送到莫斯科的一家医院，后来又转至古比雪夫。这倒使这位将军基本上躲过了斯大林对他怒气冲冲的指责，因为这时西南战线已濒临崩溃。

9月7日西南方向总指挥部军事委员会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报告说，德国人先后在科诺托普、切尔尼戈夫、奥斯乔尔和克列缅丘格方向突破。不仅是第5集团军和第37集团军，而且整个西南方面军都受到被包围的威胁。

最高统帅又一次得到应该放弃基辅的报告。

沙波什尼科夫并不是第一次见识斯大林的怒火。

斯大林生气地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说：“总参谋部是什么玩意儿？真不想听您的话。我们等着您歼灭敌人的建议，而您一股劲儿地说，放弃基辅，放弃基辅！您明不明白放弃基辅意味着什么？您就像布琼尼那样，走尽少作抵抗的路子。不是去迎击敌人，而是避开他们。你们可是元帅，将军！去吧，去干活吧！好好考虑考虑！”

随后两个昼夜谈话大致都是如此。9月9日沙波什尼科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又出现在了最高统帅的面前。斯大林在电话里不知对谁厉声呵斥：“瞧瞧，又一个惊慌失措的人……”斯大林骂了一句，撂下了话筒。

“伏罗希洛夫打来的，他请求用年轻一点的人代替他。他让德国人打到了列宁格勒城下，自己却想溜了。我们当然会解除他的职务。我们把朱可夫派到列宁格勒去，他已经被从前线召回。我们还要换掉布琼尼，他的位置由铁木辛哥代替。好吧，知道你们为什么来。你们要是不会打仗，那就让位。我批准第5集团军和第37集团军的右翼部队撤过杰斯纳河，但是基辅登陆场必须坚守到最后。别再给我说基辅什么了。我自己对基尔波诺斯说去。”

古德里安以部分兵力对付行动不力的布良斯克方面军，以此为掩

护，让主力继续深入西南方面军部队的后方。9月10日其先遣部队攻进罗姆内。

这时在南方形成了有利于法西斯分子突击西南方面军的态势，因为我们南方面军的部队被挤压至第聂伯河东岸。德国“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以这一宽阔的水面作掩护，只在那里留下了不多兵力作屏护队，而把第17野战集团军和克莱斯特的第1坦克集群的主力攥成一个铁拳，投入与古德里安的集群的会师。

费克连科将军的第38集团军英勇奋战，它的残部对克莱斯特的翼侧实施反突击，但由于兵力悬殊，克莱斯特绕过第38集团军，前去与古德里安会师了。

西南方面军司令部向大本营建议，把部队撤到第聂伯河东岸，以避免全部被包围。

9月11日夜1时15分，斯大林与基尔波诺斯谈话时说：

“您建议立即撤走部队，可是您没有预先在普肖尔河设防，也没有在布良斯克方面军的配合下猛攻科诺托普的敌人军群。我再说一遍，没有这些保证，您关于撤走部队的建议是很危险的，可能招致灾难。总之，请停止寻找撤退地区，还是去寻找抵抗的办法吧……还有，没有大本营的允许，不许放弃基辅，就是桥也不许炸……”

亚·米·华西列夫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一提到要无情地放弃基辅，斯大林就怒不可遏，马上失去自制力。”

但是前线的形势可不管斯大林的意愿，它是在无情的战斗进程决定下形成的。

9月14日3时25分，西南方面军参谋长瓦·伊·图皮科夫少将主动致电总参谋长和西南方向总指挥部参谋长，他在阐述了前线部队的艰难处境后，用如下几句话结束了对他的观点的陈述：“你们清楚，灾难的开始是这一两天的事。”

这是痛苦的真理。第二天，从北方发动进攻的德国第2坦克集群与从克列缅丘格登陆场突破的第1坦克集群部队在洛赫维察地区会师。对第5、第21、第26、第37集团军和第38集团军部分部队的包围圈合拢了。

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形势十分严峻，但是尽管如此，总参谋长在给图皮科夫的电报中仍然不得不作出斯大林给他口授的如下答复：

“致西南方面军司令

抄送：西南方向总司令

图皮科夫少将向总参谋部提供了一个令人惊慌失措的报告。相



反，形势要求各级指挥员保持极端冷静和沉着。不能惊慌失措，要采取一切措施守住所在的位置，特别要牢牢保住两翼。要迫使库兹涅佐夫（第21集团军）和波塔波夫（第5集团军）停止后撤。要让方面军全体人员懂得必须顽强战斗，一往无前。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斯大林同志9月11日给您的指示。

1941年9月14日5时0分

鲍·沙波什尼科夫”

古德里安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这几天的记述如下：“9月16日我们把我们的前进指挥所迁至罗姆内。对俄军的包围继续顺利进行。我们与克莱斯特的坦克集群会师了……从开始夺取基辅的战斗起，第1坦克集群抓获俘虏4.3万人，第6集团军俘获了6.3万人。在基辅地区抓住的俘虏总数超过了29万人。”

但是包围圈里还有我们的四个集团军！

基尔波诺斯向总参谋部报告说：“方面军在被围和交通线完全切断的情况下转入战斗。我把惟一一个可以指挥部队的指挥所迁至基辅。请采取必需措施，通过空中运输工具向前线部队输送弹药。”

9月16日新任（代替布琼尼）西南方向总司令铁木辛哥在办公室里接见了从基尔波诺斯那里飞来的西南方面军副参谋长巴格拉米扬，在办公室里的还有军事委员会委员尼·谢·赫鲁晓夫。铁木辛哥考虑后对巴格拉米扬说：

“我们现在竭尽全力支援前线——我们把一切可以召集的力量都集结到罗姆内和杜布纳，包括得到坦克加强了了的别洛夫的军和三个坦克旅。过几天鲁西亚诺夫和利久科夫的师将抵达我们这里，我们尝试用这些兵力前去接应被包围的方面军部队。我们认为，我们不可能粉碎法西斯两个已突破的坦克集团军，但是我们会打开缺口，让被包围的部队通过这些缺口撤出来。这就是我们突击的目的。我们相信，最高统帅在当前的态势下会允许西南方面军撤至普肖尔河，因此决定马上下令组织突围。我们今天再次尝试同莫斯科谈谈。我希望我们可以说服大本营。暂时我们将进行谈判，基尔波诺斯及其司令部应当利用敌人还没有完全合围这一时机。”

正如巴格拉米扬在他的回忆录中写的那样，他觉得铁木辛哥元帅在说这些话时还没有下决心下达更明确的撤退部队的命令，但是他在作出这一部署的过程中认识到了形势的复杂性和将不可避免地遭到的巨大损失，似乎已经下了决心并已经坚定地说：

“巴格拉米扬同志，请向基尔波诺斯将军报告，在目前的态势下，西南方向总指挥部军事委员会认为，对西南方面军部队来说，有组织地

撤退是惟一合理的决定。请向方面军司令传达我的口头命令：放弃基辅筑垒地域，在第聂伯河沿岸以少量兵力作掩护，立刻开始把主力撤至后方防御地区。主要任务是在我们的预备队的支援下歼灭突入方面军部队后方的敌人，接着转入防御普肖尔河地区。让基尔波诺斯发挥最大的主动性，更加坚决地向罗姆内和卢布内方向突击，而不是坐等我们把他救出包围圈。”

由于天气不好，巴格拉米扬未能在当天就飞往基尔波诺斯方面军的司令部，他第二天才历经艰险到达了那里。巴格拉米扬在军事委员会委员在场时转达了总司令给基尔波诺斯的命令。基尔波诺斯长时间坐着沉思，方面军参谋长图皮科夫忍不住说：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这一命令完全符合形势，没有任何理由再犹豫不决。请准许向部队下达命令好吗？”

司令没有回答参谋长，却问巴格拉米扬道：“您带来书面的撤退命令了吗？”

“没有，元帅命令我作口头转达。”

基尔波诺斯长时间一声不吭地在屋里踱来踱去，然后说：

“在没有收到文件之前，我不能下达任何命令。问题至关重要。好，散会。”

出现了令人难受的沉寂。参谋长刚想说什么，可是基尔波诺斯打断了他：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请拟好给大本营的无线电报。报告总司令的命令，并询问我们该如何行动。”

从这一短短的插曲中可以看出，即使是高级军事首长，相互关系也十分复杂，每个人都十分害怕对由于采取可能不符合斯大林意见和意愿而会遭到严厉追究的行动负责。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这迫使基尔波诺斯没有采取坚决行动，甚至也不能执行常言说的口口相传的即由铁木辛哥元帅通过巴格拉米扬将军下达的直接命令。

9月17日晚上方面军给莫斯科发去了一份无线电报，电文如下：“铁木辛哥总司令通过方面军副参谋长下达了一个口头指示：主要任务是把方面军部队撤至普肖尔河地区，并粉碎罗姆内和卢布内方向敌人的快速集群，留下最少的兵力掩护第聂伯河和基辅。总司令的书面训令完全没有指示要撤向普肖尔河地区，而且只准许从基辅筑垒地域抽调部分兵力。这两个命令显然有矛盾。到底应完成什么任务？我认为把方面军部队撤至普肖尔河地区是正确的。可是如果这么做，那就必须彻底放弃基辅筑垒地域、基辅和第聂伯河。急盼您的指示。”

苏联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雅·叶·恰达耶夫（对Г. А. 库马涅



夫) 讲述了莫斯科当天白天发生的事:

“9月17日白天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召开了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鲍·米·沙波什尼科夫元帅报告了前线的战况。接着是斯大林讲话,他说,我们在基辅附近的部队无论如何要坚守,虽然这非常艰难。可是驻扎在莫斯科附近的部队更难,我们应当采取一些必需措施支援基辅的保卫者。为改善他们的处境我们已经采取了不少措施:新组建了布良斯克方面军,由这一方面军负责粉碎古德里安部队,不让他挥师南下。布良斯克方面军战士英勇奋战,大大改善了基辅保卫者的处境。”

斯大林问沙波什尼科夫说:

“也许有必要从大本营预备队抽调一部分兵力补充西南方面军?请马上同基尔波诺斯取得联系,了解这时的形势。”

“是!”沙波什尼科夫说,他马上去了机房。

他很快就回来报告说,敌人暂时还不能战胜基辅保卫者的顽强抵抗。敌人正在变更他们部队的部署,敌人正面攻击不成,开始迂回前进并在寻找苏联部队防御的薄弱地段。

斯大林说:“也就是说,大本营的命令继续有效,不放弃基辅?”

沙波什尼科夫肯定说:“完全正确。但是基尔波诺斯还是非常担心西南方面军的左翼——敌军正在对我军猛攻的克列缅丘格地区。基尔波诺斯一再请求撤出遭到突击的我们的部队。”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您觉得这么做有没有必要?”斯大林问道。

“我还是老意见,战斗到底,不能放弃基辅。”沙波什尼科夫回答说。

“好吧,我们就这么定了吧?”斯大林又问道。

大家都默认了……

9月17日后西南方面军部队的处境非常危急。西南方面军第5、第37、第26集团军和第21、第38集团军部分部队陷入包围之中。他们开始慌乱地突围,而第37集团军部队还在继续进行基辅保卫战。

9月18日夜红军总参谋长向乌克兰首都传达命令:“大本营批准放弃基辅筑垒地域,让第37集团军部队在无重大伤亡的情况下渡到第聂伯河左岸去。”

雅·叶·恰达耶夫讲道:

“基辅沦陷后的第二天我去了波斯克列贝舍夫那里得知，斯大林因西南方面军的灾难大发雷霆。

波斯克列贝舍夫说：‘斯大林刚刚与赫鲁晓夫进行了长谈，斯大林冲着赫鲁晓夫说，就凭您的冒失行动，就该把您送交革命法庭审判。’波斯克列贝舍夫又补充道：‘可是我以为，事情还没到这个份上。’

‘也就是说，斯大林暂时还顾不上看我的文件？’我问道。

波斯克列贝舍夫走进了最高统帅的办公室，转身出来说：

‘进去吧，时间不要太长。’

我走进了办公室，立即朝斯大林正俯身观看西南方面军地图的桌子边走去。

‘如果起草的东西无误的话，我就签字。’斯大林瞥了我一眼说，然后开始看国防委员会的决议草案。

这时波斯克列贝舍夫走进来报告说，铁木辛哥元帅打来电话。斯大林抓起话筒就问部队向新地区转移的情况。

我站得离斯大林握话筒那一侧很近。铁木辛哥扯着他的大嗓门说话，我几乎完全可以听清楚谈话的内容。

‘一切正常。’话筒里传来元帅的声音。

‘伤亡情况呢？’

‘我们边打边撤，因而有伤亡。’

‘不要无谓地逞蛮勇，您的伤亡已经够大了！’

‘我不明白。’

‘这没有什么明白不明白的。您有时很乐意无谓地逞蛮勇。您要明白，愚蠢的蛮勇一文不值。’

‘听您的意思，我只会干蠢事？’

‘嘿，原来好汉还没有绝迹！天才不会被埋没……’

‘我发现您对我不满。’传来铁木辛哥低沉的声音。

‘而我发现您太容易发火和失去自制力。’

‘既然我在您的眼里太差劲，我请求解除我的职务。’

斯大林把话筒从耳朵上拿开说：

‘这个家伙大喊大叫，他也不想他简直把我的耳朵震得发聋。说什么？您请求解除职务？您要明白，我们这里不是请求解除职务的，而是由我们自行安排解职……’

‘如果您认为这样好的话，那就请亲自安排吧。’

‘我们在必要的时候会安排的，但是现在劝您不要太激动，这是让人瞧不起的意志薄弱的表现。’

静了一会儿，然后听见铁木辛哥说：

‘斯大林同志，对不起，我对您发火了。’

斯大林明白，形势危急，同志们的神经往往紧张到了极点。一个领导人在怒火中烧时或在危急时刻时往往大发雷霆。斯大林对这种‘爆发’很理解，他经常用自己的平静使一些火过了头的助手冷静下来。但是更多的时候他好像不仅制止了这种人的怒火，也对他们失去了信任，而且立刻撤掉了他们的职务。

铁木辛哥火过以后，平静地、公事公办地报告了他将部队转移到哪个地区。谈话结束时斯大林说：

‘明天再亲自向我报告。’

他不安地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可以看出，他在为与元帅粗暴的通话感到难过，他显然在元帅身上发泄了他因失利而产生的不快。斯大林一声不吭地在决议草案上签了字，然后点头示意我可以出去了。”

部队突围并不容易和轻松，所有的集团军、军和师都同围困他们的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基尔波诺斯决定，要不失时机，从9月18日早上起立即让为突围组建的突击群从几个方向突击，把方面军部队撤出重围。

保卫基辅的第37集团军的将士表现出了高度的英勇精神，他们不断组织反突击，使敌人进不了城。巴格拉米扬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不能指责基辅保卫者，他们恪尽职守。基辅仍然不可征服，敌人始终不能在公开的战斗中攻克基辅。只是由于西南方面军部队形势的不利，我们的战士才根据大本营的命令离开了他们亲爱的城市，并坚信他们一定会回来的。”基辅因这一英勇保卫战而被授予“英雄城”称号并非偶然。

第37集团军炸毁了第聂伯河上的桥后，且战且退，撤退的速度缓慢，但一往无前地向自己的部队靠拢。许多人在这次撤退中牺牲了，但是大部分将士还是冲破了敌寇的重围。

读者在战后出版的书籍中，包括在我引用的伊·赫·巴格拉米扬的回忆录中，找不到指挥基辅英勇保卫战的第37集团军司令弗拉索夫将军的名字。为什么呢？或许因为他后来投靠了希特勒匪徒。我又提到了他，因为我们还要分析“弗拉索夫现象”这一怪现象。这一现象比弗拉索夫将军个人的叛变问题更广泛。这个问题随着后面事态发展到时候再来谈。

西南方面军司令部且战且退，不断击退从四面扑来的和企图切断方

面军退路的敌人。但是希特勒匪徒最终还是包围了方面军司令部，从伊·赫·巴格拉米扬的讲述中来看，最后的战斗是这样的：

“敌人从三面围攻小树林。坦克上的机关炮和机关枪不断扫射，后面跟着冲锋枪手。隆隆枪炮声中夹杂着我们的大炮稀疏的声音，因为大炮数量很少，而且必须珍惜每一颗炮弹。坦克向小树林的东边突进。拿着手榴弹和汽油瓶的军官与坦克交战。敌人的两辆坦克着火了，其余的后撤了。

方面军司令、军事委员会委员图皮科夫和波塔波夫将军开始商量下一步行动：要么呆在小树林里等到晚上，要么现在就冲出去。但是这时新一轮的进攻开始了。乘汽车来的德国步兵一下车就马上排成散兵线，在坦克炮火的掩护下冲向小树林。德国步兵冲到小树林边时，以基尔波诺斯、布尔米斯坚科、雷科夫、图皮科夫、波塔波夫和皮萨列夫斯基为首的被围部队展开了反冲击。希特勒分子顶不住肉搏战，便后撤了。

基尔波诺斯将军在反冲击时腿部负伤，他被抬到了沟底泉水处。身受重伤和震伤的集团军司令波塔波夫也被抬到了这里。他的作战参谋长皮萨列夫斯基将军英勇地倒在了战场上。

师政委级雷科夫和图皮科夫将军与格列博夫中校一起走遍树林边，与战士们交谈，鼓舞士气。

晚6时30分左右基尔波诺斯、布尔米斯坚科和图皮科夫与指挥员们一起讨论趁夜色降临时突围的方案。这时敌人开始用迫击炮密集射击。一颗炮弹在司令员的身旁爆炸了，基尔波诺斯没来得及喊一声就倒在了地上。同志们急忙扑向了他，将军的胸部和头部受了伤，两分钟后他牺牲了。司令的副官格涅内少校含着泪水从将军的军服上取下了金星奖章和勳章……”

战争结束后沟底的泉水旁竖起了一块大理石板，上书：“西南方面军司令米·彼·基尔波诺斯上将于1941年9月20日在此地牺牲。”1943年基尔波诺斯和图皮科夫将军的遗骸被运到基辅。他们被安葬在“不朽”公园里靠近无名烈士墓的方尖碑旁。

应当承认，造成这一灾难的原因之一是叶廖缅科将军的失利。给了他不少兵力，但是他指挥不当。顺便说一句，叶廖缅科后来还在他的回忆录中为自己的行动辩解。他完全忘了“歼灭古德里安这个坏蛋”的承诺，完全忘了古德里安的部队正是在那时向南推进并包围了西南方面军部队，而布良斯克方面军并没有阻止这一行动。现在叶廖缅科元帅试

图说服大家，说他圆满地完成了斯大林亲自交给他的任务，他说：“我们可以说，布良斯克方面军部队认真地完成了大本营给我们提出的主要任务，没有让古德里安集群通过布良斯克扑向莫斯科。”但是古德里安当时并没有向莫斯科进军，而是沿着第聂伯河推进去与克莱斯特会师，包围了西南方面军。叶廖缅科的话在今天显然不足为信，因为他“保卫”莫斯科免遭的突击当时并没有实施。

大家非常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几个集团军的部队被截住了。

九 斯大林与朱可夫的冲突

（叶利尼亚战役）

可以说，是西南方面军部队的英勇顽强拯救了国家，希特勒的司令部即使在主要方向上大获全胜后也不敢对莫斯科进行最后的突击，就是因为楔入部的底部有着西南方面军这样强大的军团。

西南方面军顽强持久地战斗，寸土必争，利用一切机会实施反突击，坚守在敌人大后方的第聂伯河右岸。从作战的角度看，希特勒匪徒决定在第聂伯河右岸包围西南方面军部队，从而避免“中央”集团军群经常受到来自南方的突击威胁，从而能在莫斯科方向自由行动，这是完全正确的。

战争进入第二个月。斯大林意识到，计划在此前歼灭红军并占领莫斯科的希特勒军队并没有完成提出的任务。敌人在各个方向上损失惨重，希特勒匪徒以为他们不会遇到红军如此顽强抵抗的看法错了。他们的部队越深入我国境内，战线就拉得越长。希特勒的军队已兵力不足，主要是在各个战略方向上行动的预备队力量不足。斯大林以为通过在现在坚守的地段上继续顽强抵抗，可以阻止德国人向莫斯科推进。但是希特勒匪徒毕竟还拥有很大的实力，特别是拥有擅长实施强力突击的强大的装甲集团和航空兵。

总参谋部预料到敌人会突击我们西南方面军的后方，认为必须使自己的部队突出重围，渡过第聂伯河，在这一天然适宜于防御的地区组织防御。大自然给我们的部队提供了他们目前还可以藉此脱身的屏障。朱可夫也认为，应当利用莫斯科方向上的敌人部队削弱（因其一部分兵力挥师南下）之机，就在这里对他们实施突击。

朱可夫7月29日给斯大林打电话，请求斯大林接见他，说他有紧急事情要报告。斯大林说他等待朱可夫的到来。

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带上标明战略态势和部队部署的地图以及一切必要的参考资料去见斯大林。但是在接待室里他见到的却是波斯

克列贝舍夫。波斯克列贝舍夫说：

“请坐一会儿，命令要你等一下。”

（没错，斯大林的助理对部长、学者、元帅和将军们都以“你”相称。他认为他处在领袖的身边，有这样的权力！）

15~20分钟后，马林科夫和梅赫利斯走进了斯大林的办公室，然后才请朱可夫进去。为什么斯大林不想与朱可夫单独谈，而且请的不是军事专家而是这两位忠心耿耿、一贯对他绝对支持的人呢？看来他对朱可夫坚持要进行的重要谈话有所疑虑。斯大林尽管权力无限，但仍然一贯关心给官方历史会留下什么印记。他预料到谈话很重要，所以这一次也请了见证人。

“来吧，谈谈您那里的情况吧！”斯大林说。

朱可夫把地图摊在桌子上，详细地讲述了前线的态势和他的结论以及关于当前应马上采取的行动的建議。他非常详细地讲述了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及其性质。梅赫利斯听到这里插话说：

“您从哪里得知德军将如何行动的？”

朱可夫回答说：“我不清楚德军的行动计划。但从形势分析看，他们只能这么行动，别无选择。我的推断是建立在对德军首先是对他们的战略战役中起主导作用的机械化装甲集群的现状和部署的分析基础之上的。”

“请往下说。”斯大林插了一句。

朱可夫接着报告说：

“德国人在莫斯科战略方向上近期看来不会进行大战役，因为他们在这一方向上伤亡极其惨重。他们没有用以保障‘中央’集团军群左右两翼的战略大预备队。德国人在列宁格勒方向上不补充部队是发动不了攻占列宁格勒和同芬兰人会师的战役的。在乌克兰，主要交战可能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克列缅丘格地区某地进行，因为敌人‘南方’集团军群的装甲坦克部队主力已抵达此地。我们防御最薄弱的地段是中央方面军地段，掩护乌涅恰和戈梅利方向的中央方面军部队兵员太少，装备也不够，德国人会利用这个弱点向扼守基辅地区的西南方面军翼侧和后方突击。”

“您建议怎么办？”斯大林警觉地问道。

“首先加强中央方面军，至少给它补充三个有炮兵加强的集团军。从西方向总指挥部、西南方面军和大本营预备队各抽一个集团军。另外任命一位经验更丰富、精力更充沛的方面军司令。库兹涅佐夫素养不够，他在战争爆发之初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不能果断地指挥方面军。具体地说，我提议由我的第一副手瓦图京担任司令职务。”



“瓦图京我另有用处。”斯大林反对道，然后他接着说：“您究竟建议怎么办？削弱莫斯科方向吗？”

“不，我没有这样建议。我认为敌人暂时不会在这一方向前进。而12~15天后，我们可以从远东调来至少八个战斗力很强的师，其中包括一个坦克师。”

“那我们把远东送给日本人吗？”梅赫利斯挖苦道。

朱可夫没有回答他的讽刺，继续说道：

“西南方面军必须全部撤过第聂伯河。在中央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接合部后面，至少集中五个加强师的预备队。”

“基辅怎么办？”斯大林问道。

“基辅不得不放弃。”朱可夫沉默了一会儿回答道。他明白作出这样的决定对于这个城市、对于国家来说是多么的困难，可是他当时发现，解救继续作战必不可少的部队已无其他可能。“在西方向需要马上组织反突击以收复叶利尼亚突出部，因为敌人会在合适的时候利用这一登陆场突击莫斯科……”

斯大林打断朱可夫的话，生气地大声吼道：

“哪里还有什么反突击！胡说些什么？经验证明，我们的部队不会进攻……您怎么会想起把基辅让给敌人呢？”

有不少人说，朱可夫只是在战争后期，即在他有了巨大的统帅威信后才开始反驳斯大林的意见的。可以同意这一说法，但是要补充一点，朱可夫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提出他的论据时更加坚决，但是这位元帅仍然害怕进行直接争辩。难道他胆怯吗？不，这可不是朱可夫的性格！他明白，斯大林会横下一条心蛮干，把事情通通搞砸，而这是会误事的。而我为了作这一说明而中断了的他们的谈话表明，朱可夫为了总体的利益，可以不顾个人的安危。关键是斯大林在这次谈话前给西南方面军司令部发去了一份措辞极其严厉的电报。电报全文如下：

“基辅 赫鲁晓夫同志 1941年7月11日

得到可靠消息，说你们所有人，从西南方面军司令到军事委员会委员，都惊慌失措，想把部队撤至第聂伯河左岸。

我警告你们，如果你们走出一小步，把部队撤至第聂伯河左岸，不去为保卫第聂伯河右岸的筑垒地域战斗到最后，那么等待你们所有的人的，将是对怕死鬼和逃兵的严惩。

国防委员会主席
约·斯大林”

朱可夫当然知道这份电报，因为这份电报是通过总参谋部的通信枢纽发出去的。可是朱可夫明知这样十分严厉的警告和预先告知的“严惩”，还一口一个“不得不放弃基辅”。不难想像，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在决心这么说时心里有多大的波澜。但是他下了决心，要坚决地、令人信服地说出他的意见，因为这事关前线的命运和防御战役的下一步行动。

依我看，朱可夫预料到了说出这种让斯大林不快的话的后果。接下来的谈话表明了这一点。斯大林火冒三丈地说完气话后，朱可夫脸红了，他一度想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但是没能控制住，他回答道：

“如果您认为我这个总参谋长只会胡说八道，我在这儿也没什么可干的了。我请求解除我的总参谋长的职务，派我到前线去，我在那里显然可以为祖国多做些有益的事。”

“您别急。没有列宁我们都挺过来了，没有您我们照样可以挺过去……去干活吧，我们在这里商量一下，然后再叫您进来。”

40分钟后，朱可夫又被叫进了斯大林的办公室。朱可夫走进办公室后发现，除了先前到会的梅赫利斯和马林科夫，又多了一个贝利亚。这可是不祥之兆。贝利亚的出现不会预示什么好事。

斯大林看也没看朱可夫一眼，冷冷地说：

“好吧，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免去您的总参谋长的职务。这一职务我们将派沙波什尼科夫担任。他身体确实不太好，不过没关系，我们会帮他。”

“您命令我去哪里？”

“您想去什么地方？”

“我可以完成任何工作。我可以去指挥一个师、一个军、一个集团军或一个方面军。”

“别急，别急。您刚才说要在叶利尼亚附近组织反突击，那您就于这件事吧。我们派您做预备队方面军司令。您什么时候能出发？”

“一小时后。”

“沙波什尼科夫马上会到总参谋部来，您给他办移交后再动身。您要知道，您还是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成员。”

“可以走了吗？”

“请坐下来，和我们一起喝茶，”斯大林想稍微缓和一下气氛，“我们再谈谈别的事情。”

朱可夫在桌旁坐下，有人给他倒了茶，但是他和斯大林的情绪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就是所有到会的人在这间办公室发生的事过后也感到不自在。谈话谈不下去了。



十 战略外交

9月底苏联部队的处境越发糟糕。德国人歼灭了在基辅被包围的我们的部队。“中央”集团军群（77个师）开始向莫斯科方向进攻。古德里安指挥的第2坦克集群（包括5个坦克师、4个摩托化师和4个步兵师）向奥廖尔猛扑。

“南方”集团军群转向哈尔科夫和苏梅方向进攻，顿巴斯防御战役开始了。

克里木的第51集团军后撤至伊顺阵地，开始把敖德萨的部队撤至克里木。

斯大林在这样极其紧张的形势下也不得不表现得十分镇静，面露笑容，甚至举杯致热情洋溢的祝酒词，因为他还肩负着外交活动的领导工作。就在这几天莫斯科召开了苏联（斯大林，莫洛托夫）、美国（哈里曼）和英国（比弗布鲁克男爵）的会议。

斯大林宣布开会，他阐述了苏德前线的形势，他当然着重强调的不是希特勒匪徒的大举进攻，而是苏联部队的顽强防御。接着他说：

“造成我国部队最大困难的是德国人的坦克。德国的步兵是不如我们的，可是他们现在是坦克带着步兵挺进。我们非常需要反坦克武器、高射炮、中型轰炸机和带刺的铁丝。”斯大林对比弗布鲁克男爵说：“英国人能够非常迅速地进行援助，你们比美国近，你们有现成的师团，如果很难开辟第二战场的话，那么这些师团就可以参加在乌克兰的战斗。”

比弗布鲁克男爵马上建议说：

“英国驻扎在伊朗的师团可以进驻高加索。”

斯大林记得英国人想夺取巴库油田这一夙愿，早在十月革命期间他们就试图实现这一夙愿。斯大林非常严厉地回答比弗布鲁克说：

“高加索没有战争，战争在乌克兰。”

比弗布鲁克似乎同意他的看法说：

“为了更好地使用我们共同的力量，苏联和英国的总参谋部应当交换意见。”

哈里曼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措施：

“我们想了解西伯利亚机场的状况，我们可以通过阿拉斯加提供飞机。”

“您会得到这方面的情报的。”斯大林答应说。

第二天谈判继续进行。斯大林由于前线形势恶化而心情不好，他整



夜都在研究部队的形势。他一开始就不客气地指责盟国说：

“苏联部队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我们把德国人在西欧的主力吸引过来，这些德军本来会入侵英国的。战争的主要重担落在我们的肩上。可是，先生们，你们却提议援助少量的物资和装备。”

比弗布鲁克和哈里曼保证说，他们在当前的形势下已尽了最大的努力。谈判中断了。

斯大林必须立刻前往大本营，前线的形势更趋紧张。

当晚6点钟会议继续进行。在中断的这几个小时里获悉，柏林已得知莫斯科进行的谈判的内容，柏林的电台播报了这条新闻，并作了如下结论：“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从来不会与布尔什维克达成协议。”

斯大林继续中断了的会谈，告诉盟国这条新闻，并补充道：

“现在该由我们来证明，戈培尔在撒谎。”

盟国在斯大林的压力之下变得好说话了，他们扩充了清单，增加了近期提供援助的数量。

10月1日召开了闭幕会议，莫洛托夫在会上作了内容详尽的报告。盟国代表也作了发言。

不好说话的比弗布鲁克男爵在斯大林的威望和个人魅力的影响下转变了他对俄国问题的观点和态度。在他写给哈里·霍普金斯的信中明显可以看到这些转变：

“我1941年10月中旬前后从俄国回来后提出了开辟第二战场支援俄国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的军人、领导人总是表示不愿进攻。我们挺进伊朗，这是一个小战役……我们进行的屈指可数的战役就是轰炸德国西部和用歼击机袭击法国，这丝毫帮不了俄国，在当前的危机形势下也不会伤害德国……”

当前其实只有一个军事问题，那就是如何援助俄国。而总参谋部的人就这一问题只会说什么也办不到。他们总是说困难，却不提出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任何建议。

断言我们不能为俄国办什么事是毫无意义的。一旦我们决定放弃我们仍然抱有幻想、而俄国遭受进攻时已经过时的不切合实际的长期计划，我们就可以做到。

俄国的抵抗给了我们一个又一个机会。俄国的抵抗看来会吸引走西欧的德国驻军，使‘轴心国’不能在其他地方采取进攻行动。俄国的抵抗使每一个被德国人占领的国家趋于发生爆炸性形势，使西欧沿海地区成为容易受到英国军队进攻的薄弱地带……”

参谋长们想要我们再等上一等，说要等到我们用于进攻的最后



一个士兵军服上的最后一枚扣子钉好。他们完全忽视了眼下已经出现的机会……”

下面是斯大林外交努力的实际成果。

丘吉尔先生给斯大林先生的私人信

我很高兴从比弗布鲁克男爵那里获悉莫斯科三国会议的成功。“给得快的等于给了两倍”（拉丁格言。——本书作者注）。我们准备组织一系列连续不断的运输队，每隔10天出发一队。以下物资正在途中并将于10月12日抵达阿尔汉格尔斯克：20辆重型坦克、193架歼击机（10月前的定额）。以下物资将于10月12日海运，10月29日抵达：140辆重型坦克、100架“鹞式”飞机、200辆“布朗式”机关枪拖车、200挺反坦克枪和弹药、50门42毫米口径的大炮和炮弹。以下物资将于10月22日海运：200架歼击机、120辆重型坦克。以上表明10月份飞机定额总数和280辆坦克将于11月6日抵达俄国。10月份的“布朗式”机关枪拖车、反坦克枪和42毫米口径的反坦克炮定额全部将于10月份抵达。20辆坦克已经由波斯运去，另外15辆坦克即将从加拿大经符拉迪沃斯托克运去。

这样运去的坦克总数将是315辆，比我们的全部定额少19辆。缺少的数目将于11月份补足。上述计划并不包括美国的供应。

我们在安排这种定期的连续工作的运输队时，打算依靠阿尔汉格尔斯克来接卸大部分供应的货物。我想这部分工作已经开始进行。

1941年10月6日

而美国总统罗斯福对斯大林的努力作出这样的反应：

“我已得知莫斯科会议记录的内容，而且代表团成员也与我讨论了会议的详细情况。我已批准所有军用物资和各种武器，并命令尽快供应原料。我已命令立即供应这些物资，并以尽可能多的数量供应。为消除可能出现的财政上的困难，我将立即采取措施，凭租借法案提供物资。如果苏维埃政府同意这一点，我愿意对由此产生的债务不收取任何利息，苏维埃政府负担的债务可在战争结束五年后再开始偿还，并在此后十年内还清。我希望您的政府将制定专门措施，根据协议向我们出售你们有的而美国可能急需的原材料和商品（这些出售所得货款都将存在苏联政府的账上）。我利用这一机

会向您转达美国政府对您和您的同事们就供应问题迅速召开莫斯科会议的感激之情，并向您保证，我们将完全履行根据这次会议规定的一切义务。我希望您在需要时毫不犹豫地直接与我联系。”

斯大林在回信中感谢了罗斯福和丘吉尔。

斯大林在1941年11月6日的庆祝大会上的报告中谈到了有英国和美国代表参加的莫斯科会议成功举行的情况，并表示相信，与这些国家结盟是“现实的事”。

斯大林就是这样为对粉碎希特勒德国起重大作用的盟国合作奠定了基础。把前不久还是苏维埃国家死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都集中用于实现他的军事意图上来，这就是斯大林的战略努力和成果的明证。

美国和英国有望提供援助，但是在西方这件事做起来却十分困难，因为德国占领了挪威和斯匹次卑尔根群岛。芬兰是德国的盟国，德国的潜艇在北方海域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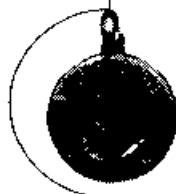
伊朗南部的不冻港和从这些港口出发贯穿伊朗全境至苏联边境的铁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苏联同伊朗的关系很友好。但是希特勒有计划把他的军队开进伊朗和印度，为此已做了必要的准备工作。伊朗有德国的情报机构和各种各样的商行（实际上就是那支“第五纵队”）在活动。

沙赫对德国人有好感。斯大林在南方和列宁格勒方向激战正酣的时候找机会采取措施，肃清了伊朗交通线以及伊朗全境内德国人的“第五纵队”。

1941年8月25日苏联向伊朗政府发出了一个很长的照会。照会提到了十月革命后与伊朗的友好关系，提到了1921年2月26日的共同条约，根据这一条约，原属于沙皇俄国的大量财产，包括铁路、港口建筑物、电话电报线和贴现贷款银行都移交给伊朗，伊朗对俄国的一切欠款和债务都被免除了。条约第六条规定，一旦受到第三国威胁，（以下是原文）“如果波斯政府在苏俄政府发出警告后认为自己没有能力预防这一危险，则苏俄政府有权派遣本国军队进驻波斯境内，采取必要的军事措施进行自卫。一旦这一危险被消除，苏维埃政府保证立即把本国军队撤出波斯。众所周知，在1921年条约生效的20年中，苏维埃政府从未认为有必要动用1921年条约的第六条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从希特勒德国开始背信弃义地进攻苏联起，法西斯德国阴谋团体在伊朗境内从事的敌视苏联和伊朗的活动具有了威胁性。混进伊朗50多家机关担任重要公职的德国间谍们想方设法在伊朗引起不稳和骚乱，破坏伊朗人民的和平生活，挑唆伊朗反对苏



联，使伊朗卷入对苏联的战争……

上述情况在伊朗造成的局势有着非常大的危险。这要求苏维埃政府严格按照1921年条约第六条立即采取一切它为了自卫不仅有权采取、而且有义务采取的措施。

苏维埃政府在德国进攻苏联后曾三次（6月26日、7月19日和8月16日）提请伊朗政府注意德国间谍在伊朗的颠覆和间谍破坏活动造成的危险……

遗憾的是，伊朗政府拒绝采取措施制止德国间谍在伊朗境内蓄意制造的不稳和骚乱，反而鼓励这些德国间谍为非作歹。因此苏维埃政府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立即行使1921年条约第六条赋予苏联的权力——暂时让苏联部队进驻伊朗境内以实行自卫……

一旦这一威胁伊朗和苏联利益的危险被消除，苏维埃政府将按照1921年苏伊条约履行自身的义务，立即把苏联部队撤出伊朗。”

英国政府在与斯大林商定后也发出了几乎相同的照会。

此后，苏联部队驻扎在伊朗北部，而英国军队驻扎在伊朗南部。1942年1月30日，苏联、英国和伊朗签订了条约，条约肯定了伊朗的主权和独立以及盟国军队在战胜德国后将撤出伊朗境内。

斯大林在给丘吉尔的信中指出：“对伊事宜处理得确实不错。英国和苏联部队的共同行动决定了结局。既然我们的军队将共同行动，那么今后也会如此。但伊朗只是个小插曲，战争的命运当然不会在伊朗决定。”他对开辟第二战场的暗示十分明显。斯大林一直在推行自己的方针！

十一 列宁格勒防御

9月9日叶利尼亚战役结束后斯大林召见朱可夫。像往常一样，斯大林的召见总是意味着有紧急事，当然也是棘手事。

朱可夫到了克里姆林宫后，弗拉西克在接待室里迎接他，领着他去了楼上斯大林的住所。

斯大林正与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谢尔巴科夫以及其他一些领导人在用晚餐。他与朱可夫打过招呼后，请朱可夫就座，仿佛他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争执一样轻松地说：

“您在叶利尼亚突出部干得不错。”斯大林毕竟明白朱可夫还记得那次后来因此被派往叶利尼亚的不快的谈话，他继续说道：“您当时说得对。我没有完全正确地理解您的意思。”从斯大林的嘴里听到这样的话可不是寻常事。这句话显然像是在道歉。斯大林大概是想尽快转换不

快的话题，说：“西南方向总指挥部战况不佳，布琼尼不能胜任那里的工作。您认为谁可以代替他？”

朱可夫起初以为斯大林也许是想派他担任西南方向总司令，但他没有提这事，回答道：

“我认为铁木辛哥元帅最合适担任那里的司令，他非常清楚乌克兰的战区 and 作战的各种可能性。他最近在组织战斗行动方面有大量的实践，再说他是乌克兰人，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我建议派他去。”

斯大林想了想，看了看桌边坐着的人，但是他们中谁也没表示反对，也没表示赞成。斯大林说：

“好吧，您说得对。那么派谁去代替铁木辛哥指挥西方面军呢？”

朱可夫又完全有理由认为斯大林把他当作人选，但是他这一回又装作不明白暗示，回答道：

“我觉得现在指挥第19集团军的科涅夫中将适合担任西方面军司令。”

斯大林对朱可夫的这一建议没有作任何回答，他马上走过去打电话给沙波什尼科夫，请他把铁木辛哥元帅召回莫斯科，并准备下达派科涅夫担任西方面军司令这一职务的命令。

斯大林回到桌旁，仿佛继续着寻常的、没有什么特别要求的谈话，问朱可夫道：

“您认为下一步干什么？”

朱可夫耸了耸肩，说了一句他认为在他的处境下最正常的话：

“我回我的方面军去。”

斯大林想了一想，仿佛出声地考虑说：

“现在列宁格勒的形势非常严峻，甚至可以说是灾难性形势……”

斯大林显然还在挑选一个强调列宁格勒方面军态势严峻的词，最后他说：“我甚至可以说，是毫无指望的形势。丢掉列宁格勒后果将不堪设想，莫斯科会受到来自北面的突击的威胁。”

朱可夫明白了，斯大林的意思是，消除列宁格勒的灾难也许非他朱可夫不可。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明白斯大林已决定派他去处理这一“毫无指望的事”，他说：

“好吧，既然那里的形势这么严峻，我愿意前去担任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

斯大林像是在试着洞察朱可夫的心情，目不转睛地盯着朱可夫，又重复了一遍那句话：

“这可是毫无指望的事呢？”

朱可夫对斯大林又说了一遍这句话感到很惊奇。他明白斯大林这么



说不会是平白无故的，但是出于什么原因，他说不清楚。原因确实是有的。

早在8月底列宁格勒的形势就岌岌可危，于是斯大林派由尼·尼·沃罗诺夫、帕·费·H加列夫、阿·尼·柯西金、尼·格·库兹涅佐夫、格·马·马林科夫和维·米·莫洛托夫组成的联共（布）中央和国防委员会的工作组前去列宁格勒。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个工作组很有代表性，拥有很大的权力。工作组花了大力气来动员现有部队和资源以及组织顽强的防御。但是这还不够，工作组离开后列宁格勒的形势并未好转。敌人继续向城区推进，任何人和任何事也不能阻挡敌人。伏罗希洛夫显然对此无能为力。斯大林意识到他采取的措施没有彻底扭转形势，因此他的脑海里才翻腾着这句令人不快的大实话：“形势毫无指望”。朱可夫成了最后的希望，斯大林对此几乎毫不隐瞒。

“我去后就地研究研究，看看形势也许还不至于这么毫无指望。”朱可夫回答说。

“您什么时候可以去？”斯大林认为问题定下来了，问道。

“我认为还是马上去那里。”

“不能马上去。先必须安排歼击机护送您去，别忘了列宁格勒现在四面被包围。”

这也是斯大林对朱可夫不同寻常的态度，他现在很关心朱可夫。

斯大林走到电话机旁，下令报告天气情况。对方很快给了他回答。斯大林搁下话筒，对朱可夫说：

“天气很糟糕，但是对您来说却是好消息，飞越战线会容易些。”

斯大林走到桌旁，拿了一张纸，写了个便条：

“致伏罗希洛夫

国防委员会任命朱可夫大将担任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您把方面军移交给他，并乘该机返回。

斯大林”

斯大林把这张便条递给朱可夫，朱可夫看完，把纸对折后装进兜里，问道：

“可以走了吗？”

“别急。您对敌人下一步的计划和可能的行动有什么估计？”

最高统帅与他最敬重的一位统帅进行了一次例行的务实的谈话。斯大林在战斗最激烈的关头时常抽时间与各级军事首长、设计师、厂长甚至艺术工作者（关于后者后面再谈）不慌不忙地交谈。这些谈话无疑

会带来很大的实际的和有教育意义的好处。

1941年9月10日，朱可夫与米·谢·霍津中将和伊·伊·费久宁斯基少将一起飞往被封锁的列宁格勒。

朱可夫在起飞前对他挑选去列宁格勒方面军工作的将军们说：

“我们将穿越战线前去列宁格勒。德军打到了拉多加湖，完全包围了这座城。在通往城市的接近地上战斗十分激烈。斯大林对我说：要么守住城市，要么与军队在那里一起牺牲，您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朱可夫沉默了一会儿，逐一看了一眼每一位对话者的脸，最后说了一句：“同意的人，请上飞机。”

所有在场的将军都是经验丰富的军事首长，他们不止一次面对过死亡，就拿那位费久宁斯基来说，他就与朱可夫一起参加过哈拉哈河战斗。他们并没有说他们同意的豪言壮语，只是径直走向飞机的舷梯。

谁也没有在列宁格勒迎接前来的将军们，虽然朱可夫飞往那里的消息不可能无人知晓。他们随便拦了一辆车，去了斯莫尔尼宫。

朱可夫没有脱大衣和军帽，就走进伏罗希洛夫元帅的办公室。这时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正在办公室里开会，参加会议的有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库兹涅佐夫以及军事委员会其他一些委员。他们正研究如何炸毁城里十分重要的目标的问题（因为当时已经认为几乎没有可能守住这座城），研究什么时候、如何准备炸毁军舰，不让它们被敌人夺去。

朱可夫找了一把椅子坐下来，听了一会儿正在进行的谈话。话题越来越使他激动。他来列宁格勒是为了守住这座城，而这个会上却说要放弃它。他把斯大林任命他的便条递给伏罗希洛夫。元帅看完这张便条，不知怎的蔫了，一句话也没有对开会的人说。朱可夫不得不自己说，他被任命为方面军司令。他简短地建议结束军事委员会会议，压根不讨论放弃城市的问题，而是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守住城市。他最后说：我们为保卫列宁格勒，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朱可夫任命霍津担任方面军参谋长，命令费久宁斯基将军立即前往第42集团军交战最激烈的正面地段——普尔科夫高地和乌里茨克附近，就地弄清楚那里的态势。

* * *

下面是敌人对列宁格勒态势的估计。

哈尔德在朱可夫飞抵列宁格勒的那天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北方’集团军群在进攻列宁格勒的战线上节节胜利。敌人开始被削弱……”

哈尔德在9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在列宁格勒取得大捷。可以说，我们的部队已完全抵达筑垒地域的内廓。”

“北方”集团军群的总司令是冯·莱布元帅。他是一位经验丰富、



十分精明的军事首长。他 1895 年入伍。1909 ~ 1911 年在普鲁士总参谋部担任过多种军官职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对芬兰的战斗中莱布指挥“C”集团军群。他完全按照希特勒的指示和总参谋部的计划大力实施闪击式突击。战胜芬兰后，1940 年 7 月希特勒给莱布颁发了骑士十字勋章，并授予他元帅称号。进攻苏联时冯·莱布指挥“北方”集团军群，占领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逼近列宁格勒。

不管是莱布还是希特勒都认为，攻克列宁格勒的问题已成定局。希特勒甚至给莱布的司令部派来一位军官专门负责立即报告军队进入列宁格勒的情况。

* * *

朱可夫不断要求不仅把现在的阵地坚守到最后，而且要实施反冲击。对于许多人来说，他这样的战术难以理解——兵力连防御都不够，他却不断把部队投入战斗，部队似乎在那些几近徒劳的反冲击中耗尽最后的力气。

冯·莱布一股劲地加强普尔科夫高地方向的兵力。

格·伊·库利克元帅指挥的第 54 集团军处于列宁格勒的包围圈外。斯大林给库利克提出的任务是，在姆加火车站地域突破封锁圈。沙波什尼科夫告诉了朱可夫这一行动，请求朱可夫组织迎击。

为了组织协同动作和商定共同作战行动的时间，9 月 14 日夜朱可夫与库利克通了话，他们简短地谈了谈。

朱可夫从库利克的话中所听出，库利克的集团军最近不打算进攻。

斯大林三番五次要求库利克加紧行动。库利克当然怕斯大林，尝试过组织必要的作战行动，但还是不能组织起第 54 集团军的突击，也不能打开通向朱可夫被围部队的一条窄窄的通道。

9 月 17 日，即朱可夫预先通知库利克并请求他实施进攻行动（他并没有实施）的那天，列宁格勒附近的战斗进行得空前激烈。冯·莱布为挽回他的面子和不惹得希特勒发火，纠集了六个以上的师实施强力突击——在狭窄的正面地段上使用久经考验的老办法，事先用航空兵对这一地段进行密集轰炸。

应该考虑到防御普尔科夫高地的残部正在浴血奋战，而这一突击正是对他们这些筋疲力尽的将士实施的。击退这一突击似乎非常人所能。

到了朱可夫在莫斯科起飞前对将军们说的“要么…… 要么……”这个关头了。而现在这个“要么”几乎是走投无路。如何拯救列宁格勒呢？城市上空有将近 300 架敌机在盘旋并不断轰炸城市，炮兵部队对住宅区进行猛烈的轰击。

朱可夫想凭他的坚决态度鼓舞被冲击地段的保卫者的士气，他一再



说“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这些地段。

下面是在战斗最危急的那一天下达的命令中的一段话：

“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命令向防御上述地段的所有的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士兵宣布，如若在没有方面军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书面命令的情况下放弃上述地段，则所有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战士都一律被立即处决。”

但朱可夫不仅通过守住每一米阵地来加强防御，他的积极抵抗原则在这里也起了决定性作用。他找到了办法：通过在另一个地方对敌人实施突击来削弱敌人的突击。他以此迫使莱布不得不从普尔科夫方向撤走部队来击退他在另一个地方实施的突击。朱可夫在很短的时间内（一昼夜夜间）组建了突击集团。说起来容易，可是他拿什么组建呢？到哪儿去找兵员呢？因为在第8集团军所在的地段上还是那几个防御那里的师。他只是紧缩了他们的战斗队形，竭尽所能来加强他们，9月19日他突击了莱布的进攻楔形队形的翼侧。

这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可以设想一下冯·莱布的心情，他内心已经在庆祝胜利，大概眼前已经浮现出被攻占的列宁格勒的街道。突然翼侧受到这一突击，突击确实扎在人的心窝口上！因为莱布纠集了所有的兵力投入对普尔科夫方向最后的、决定性的进攻，没有兵力在这一集团的翼侧击退朱可夫的突击，因此他不得不从可以预期取得成功和胜利的地段撤回兵力，而不能期待纵深处会来增援。莱布明白，在预备队尚未到达之前，朱可夫的部队会冲向后方，横扫一切，以致真的不得不撤离列宁格勒。

于是莱布下令撤回已作好准备突击预计将大获全胜的地段的机械化军，派这一军团去解救翼侧。

而这正是朱可夫的目的。普尔科夫地段的压力减轻了。第8集团军虽然并未深入敌人的驻地，但完成了它的任务。

双方都筋疲力尽，固守各自的地段。这对第54集团军来说是多么适合于实施突击的时机啊！

斯大林意识到了这一点，他9月20日致电库利克，这份电报在我看来与其说是命令，还不如说是促使元帅醒悟的恳求，电报说：

“21日和22日这两天，必须在敌人的正面打开缺口，同列宁格勒人会师，否则为时太晚。您的行动过于缓慢，必须补上失去的时间。反之，如果您还是磨磨蹭蹭，德国人会把每一个村庄都变成



要塞，那么您就永远也没法同列宁格勒人会师了。”

遗憾的是，就是最高统帅这份又是规劝又是命令的指示也没有起作用。库利克被解除了第54集团军司令的职务，第54集团军由朱可夫指挥，他任命米·谢·霍津将军担任集团军司令，同时兼任方面军参谋长职务。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当时他身边没有可以指挥集团军的将军。

哈尔德9月23日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们的部队在拉多加湖地区推进不多，看来损失惨重。这里的兵力进行防御足够了，但是彻底粉碎敌人则可能还不够。”而他9月25日在日记中这样写道：“9月24日这一天对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来说是最危急的一天。因为我们的第16集团军在拉多加湖地区的进攻失败了，遭遇到敌人的猛烈反攻，第8坦克师被击退了，涅瓦河东岸所占地段大大收缩。”

这一天对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来说之所以是危急的一天，不仅因为朱可夫组织的反突击，而且也因为希特勒对陆军最高总司令部大发雷霆。他对他的部队没有如预期那样迅速攻占列宁格勒，反而在那里被击退感到气愤。而他已经盘算用他的部队进攻莫斯科了。

斯大林在列宁格勒附近的反击打乱了元首的计划，使正在酝酿中的“台风”战役有夭折的威胁。希特勒不能容许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一定在咬牙切齿，仍然命令实施预定的变更部署。

列宁格勒方面军情报处长很快就报告说，他得到了有关敌人变更部署的情报。但是敌人这一次不是在战线内调动部队，而是把摩托步兵从列宁格勒调往普斯科夫。另外，有情报说敌人把坦克装上了平板车，把它们也调往莫斯科。

冯·莱布元帅意识到，灾难不仅降落到他的部队的头上，而且也降落到他本人的头上。希特勒对占领列宁格勒满怀希望，绝不许他打输这一仗。莱布给希特勒写了一份关于他攻占列宁格勒下一步行动的报告，其实这是在试图为他的失利辩解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对他的打击。但是希特勒对莱布非常生气。他在一次会议上气愤地说：

“莱布未能完成给他提出的任务，他在列宁格勒附近原地踏步，而现在他却请求给他几个师来强攻列宁格勒。可是这意味着削弱其他战线，破坏对莫斯科的进攻。而且他连通过强攻攻克列宁格勒也没有把握。如果不强攻，莱布便建议转入严密防御。这两种办法都不行，莱布不能领会和实现我关于尽快占领列宁格勒的意图。要通过饥饿，大力切断一切运输通道，连一只老鼠都不能溜进去，来整死这座城市，毫不留情地从空中轰炸，那么这座城市将像熬过了头

的果实一样掉下来……至于莱布，他显然老了，不能完成这一任务。”

斯大林在保卫列宁格勒的战斗中果断地协调包围圈内和列宁格勒之外的部队的行动。他用航空兵和其他战线的积极行动牵制住敌人的预备队来支援朱可夫。

他作为最高统帅决定把朱可夫派往列宁格勒，并不是偶然的，他非常了解他的部下，这一正确的选择有助于找到摆脱“毫无指望的形势”的出路。斯大林在这一战役中的远见起了重要作用。最高统帅坚定地 and 耐心地物色、起用和培养了一批现代战争的统帅。过不了多久，真正由他培养出来的人的响当当的名字（罗科索夫斯基、瓦图京、科涅夫、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崔可夫、雷巴尔科、卡图科夫、诺维科夫、库兹涅佐夫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就将熠熠生辉。

十二 “台风”威胁

我国部队在苏德战线南翼的严重失利，一方面使希特勒的司令部有可能步步进逼并直扑列宁格勒（这一点前一章已讲过），另一方面使她们有可能开始准备在主要方向上发动决定性战役。

希特勒在“狼穴”的会议上说：

“我们‘南方’和‘中央’集团军群在相邻翼侧取得的胜利为对铁木辛哥的集团军群^①进行决定性战役提供了机会并创造了前提，铁木辛哥的集团军群正在进攻‘中央’集团军群的正面，而且一无所获……在‘中央’集团军群所在地带应当作好战役准备，尽快即不晚于9月底转入进攻，在维亚济马的总方向上借助集结在两翼的强大的坦克部队的支援，通过双重包围来消灭斯摩棱斯克以东地区的敌人……”

陆军总参谋部也作了大量的进攻准备工作，召开了会议，采取了补充“中央”集团军群的部队和兵团的措施，这次进攻的最终目的是攻占莫斯科。希特勒9月6日为实施这一秘密代号为“台风”的战役签署了第35号训令。

战役预定在最短的时间内即在秋潦期和冬季到来之前进行，并务必

^① 这是德国人对我们的西南方面军的叫法。——本书作者注

全胜。这一意图也体现在希特勒自己想出来的代号之中，进攻部队应当像台风那样横扫进军莫斯科道路上的一切。

希特勒急于实现他的意图，他要求在他产生这一意图的8~10天后就发动进攻。但是哈尔德用精确的计算和合乎逻辑的论据说服了他，不能马上发动和实施如此大规模的进攻，因为第2集团军和第2坦克集群仍在挥师南下，而且“中央”集团军群在斯摩棱斯克以东长期作战后既需要补充兵员，也需要补充物资。希特勒最终十分不情愿地、如常言所说违心地同意了充分地、有计划地为这次进攻作好准备。

“中央”集团军群得到了15.1万兵员的大量补充，但是这还达不到它原来的编制，因为它在此前的战斗中损失了21.9万人。陆军参谋部把预备队中仅剩的三个师交给了它，而且最高统帅部根本再没有可以支配的预备队了。在此前的战斗中同样损失惨重的坦克集群，虽然补充了新坦克和修理了可以重新作战的坦克，但是满打满算才有将近60%的坦克可以投入战斗。作战和轰炸时汽车装备损失很大，许多牵引车和汽车都磨损坏和报废了。但是“中央”集团军群所拥有的兵力仍然足以实施十分强劲的突击。

为“中央”集团军群10月初的进攻作好准备的总共有将近200万官兵，编为三个集团军和三个坦克集群，共76个师。阿尔贝特·凯塞林元帅指挥的第2航空队提供航空兵保障。按希特勒司令部的想法，这些部队可以也应当承担起东方战局中最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场战役。

法西斯德军总司令部和总参谋部认为，秘密性和突然性对这次战役的准备意义重大。他们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保证胜利。他们下达了有关对准备保密的专门指示，命令部队转移只能在夜间进行，还规定了不少用假情报迷惑苏军司令部的措施。令人十分奇怪的是，尽管我们因6月22日遭到的突然进攻而吃了大亏，但敌人在进攻莫斯科时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突然出击。关于这一点，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遗憾的是，总参谋部没有确切预料到敌人在莫斯科方向上的行动意图。”

敌人在这一方向上的行动不仅可以预料到，而且通过相应的侦察措施就可以发现。况且这里即“中央”集团军群集结了大量的预备队——调来了第4坦克集群，从“北方”集团军群中抽调了两个步兵军以及从南方调来了第2集团军和第2坦克集群。兵员得到了大量的补充，每个师都达到1.5万人，运来了弹药、装备、燃料以及其他许多必需的保障资料。

9月24日“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在斯摩棱斯克召开了有关实施进攻的总结会。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和总参谋长哈尔德出席了会议。会



议决定，“中央”集团军群10月2日发动进攻，第2集团军和在右翼行动的古德里安的第2坦克集群，提前即于9月30日转入进攻。古德里安将军回忆说：“开始进攻的这个时差是根据我的请求确定的，因为第2坦克集群即将进攻的地区没有一条路面坚硬的道路。我想利用剩下不多几天的好天气，在雨季到来之前至少抵达奥廖尔附近的好路，控制从奥廖尔到布良斯克的道路，从而确保可靠的供应通道。此外，我认为，我只有比‘中央’集团军群的其余部队提前两天开始进攻，才会得到强大的航空兵支援保障。”

总之，古德里安的坦克集群和德第2集团军的“台风”9月30日突然袭击了布良斯克方面军的部队。由于没有遇到猛烈抵抗，古德里安直扑奥廖尔，对布良斯克方面军的第3和第13集团军构成合围的威胁。希特勒匪徒在右翼实施有力的突击，把我们司令部的注意力全都吸引到了这一方向上，10月2日对西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部队实施了更有力的突击。我们的三个方面军都投入了激战之中。

敌人成功地突破了我们部队的防御，在维亚济马方向上从南北两面夹击，使我们的第19、第20、第24、第32集团军以及第16集团军大部在维亚济马城以西地区陷入重围。

斯大林对这又一次的灾难是这样反应的。恰达耶夫讲道：

“我走进斯大林的接待室后，正好看到神情慌张的波斯克列贝舍夫。他握着话筒，简直是大声吼道：

‘喂，您什么时候能找到他？真见鬼！’

斯大林办公室的铃响了。

‘进去吧。’波斯克列贝舍夫点头示意。

我轻轻地走进办公室，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

斯大林在办公室里急匆匆地走来走去，火气越来越大。从他的步态和动作可以看出，他十分焦急。一下子就可以明白，他对战线被突破和我们的大量师团被合围感到难过。这一事件简直使他震惊。

‘真是蠢货，’斯大林小声嘀咕道，‘只有疯子才会错过这种机会……笨蛋！’

我还是一声不吭地站着，波斯克列贝舍夫进来报告说：

‘科涅夫司令打来电话。’

斯大林走到桌旁，生气地抓起话筒。

斯大林冲着司令就是一阵暴风骤雨。他不仅把司令‘撻了’一顿，而且还严肃警告道，要毫不留情地痛击敌人，带领部队冲出



重围。

‘每隔两小时向我报告一次，如果有必要的话，间隔时间还可以再短一些。时间！时间十分珍贵！’

然后斯大林给西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尼·亚·布尔加宁挂了电话，也训斥了他一通。布尔加宁开始解释这一非常事件的原因。（我后来从布尔加宁本人那里了解到）他向斯大林报告说，发生‘非常事件’是因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忽视了’敌人对尤赫诺夫的占领。预备队方面军司令谢·米·布琼尼元帅只是在第二天才得知德国人占领了尤赫诺夫，而且还是布尔加宁在通话时告诉他的。布尔加宁当时还向斯大林报告说，西方面军司令部也有很大的失误。

斯大林耐心地听布尔加宁说完后，态度稍微温和了一些，他嘱咐方面军领导人说：‘一秒钟也不要浪费……无论如何要带领部队突出重围。’

莫洛托夫进来了。斯大林放下话筒说：

‘或许还可以救出部队……希特勒扮演一条迫不及待扑向野物的猎狗，眼巴巴地等着枪响。可是元首不会如愿以偿的！’

莫洛托夫皱了皱眉头，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我马上明白了，我该出去。于是我走出了办公室……”

十三 莫斯科会战

10月5日17时30分，莫斯科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康·费·捷列金将军收到一份从波多利斯克送来的情报，小雅罗斯拉韦茨筑垒地域的守备司令叶利谢耶夫（旅级）报告：敌人的坦克和摩托步兵已经占领了尤赫诺夫，突破了小雅罗斯拉韦茨，正朝波多利斯克进发。从小雅罗斯拉韦茨到莫斯科大约100公里，而两地之间的公路完好，坦克能在两个小时之内走完这段路程。捷列金明白这一突破的危险，他向总参作战部报告了发生的情况后，让军区空军司令斯贝托夫上校核实这一情报，斯贝托夫几次派出经验丰富的飞行员飞往尤赫诺夫。总参谋部的人看来把这个情报报告了最高统帅，捷列金的电话很快就响了起来，他听出了贝利亚的声音，贝利亚严厉而干巴巴地问道：

“您从哪儿得到情报说德国人进了尤赫诺夫，谁向您报告的？”

捷列金报告了他的情报来源。

“听着，您怎么什么胡话都相信？您用的看来都是些危言耸听的人

和奸细的情报……”

捷列金要贝利亚相信，这些情报都是准确的，是一些可信的飞行员送来的。

“是谁直接向您报告这些情报的？”

“军区空军司令斯贝托夫上校。”

“好……”

过了一小会儿，斯大林打来电话。斯大林本人打来电话——这可是件非同寻常的事。捷列金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感觉像是“被开水烫了”。

“是捷列金吗？是您向沙波什尼科夫报告，说敌人的坦克已经突破了小雅罗斯拉韦茨吗？”

“是我，斯大林同志。”

“您这些情报是从哪里来的？”

“旅级叶利谢耶夫从波多利斯克向我报告的。我又命令空军立即派飞机去核实，我还通过对空情报哨位核实了……”

“这是奸细在搞鬼。马上下令找到并逮捕这个守备司令，送交肃反委员会，您担任这样的重要职位，要更严谨才行，不要相信那些凭空捏造的情报。”

“斯大林同志，我没有完全相信这些情报，我马上就采取了措施去核实，我还要求沙罗欣将军在得到新情报前不要向大本营报告。”

“好。但是今后这类情报要先核实后再报告。”

斯大林与捷列金通话的同时，红军特别部部长阿巴库莫夫召见了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尼·阿·斯贝托夫。阿巴库莫夫要求斯贝托夫马上到他那里去。斯贝托夫走进办公室，阿巴库莫夫粗暴而严厉地问道：

“您怎么知道德国的坦克正在朝尤赫诺夫行进。”

“这是通过空军侦察确定的，经过两次核实。”

“给我看照片。”

“执行任务的歼击机没有配备照相机，但是飞机上有敌人高射炮打的窟窿。侦查时的飞行高度很低，飞行员清楚地看到了坦克上德军的卐字标志。”

“您的飞行员都是胆小鬼，在危言耸听，跟您这个长官一样。尽管我们也和总参谋部一样经常收到这种情报，但我们不用。我建议您该承认自己给搞糊涂了，尤赫诺夫根本没有敌人的坦克，飞行员不负责任到了犯罪的地步，您马上调查这件事情，严厉地惩罚他们。”

“我不能这样办。飞行员们没有做错什么，他们都是经过战斗考验的，我为他们提供的情报作担保。”



“您凭什么来证明您有这个把握？您有文件吗？”

“请您叫防空歼击航空兵第6军军长克利莫夫上校来，他也许能证明。”

阿巴库莫夫派人叫来克利莫夫，在克利莫夫到来之前，斯贝托夫被扣押起来。克利莫夫来后，斯贝托夫又被叫到了阿巴库莫夫的办公室。

“飞行员报告说敌人的坦克占领了尤赫诺夫，您用什么能证明他们没有搞错？”阿巴库莫夫问克利莫夫。

“我没有军区飞行员飞行过的资料。”

于是，斯贝托夫要求叫航空兵军参谋长科马罗夫上校带着战斗行动日志来，指望日志中会有相应的记录。科马罗夫来了，他和克利莫夫一样，说军里不知道飞行员的这次行动，没有记录到战斗行动日志中去。阿巴库莫夫在令人难堪而压抑地沉默一阵之后，转身对斯贝托夫说：

“您去向莫斯科军区军事委员会报告，说您因为不称职应该被解除职务，并根据战时法律被审判。这是我们的意见。”

只是敌人的坦克真的到了尤赫诺夫这个事实才救了斯贝托夫。这部分德军没有从尤赫诺夫进攻莫斯科，而是转向了维亚济马，进攻预备队方面军和西方面军的后方，切断了他们退向莫扎伊斯克防御线的通路，敌人将预备队运来这一地区向莫斯科发动进攻，苏联的空军侦察机发现了敌人预备队逼近的迹象。

同一天，斯大林打电话给朱可夫，问道：

“朱可夫同志，您能不能马上飞到莫斯科来？由于预备队方面军的左翼，也就是尤赫诺夫地区的形势恶化，大本营想听取您的意见。”

朱可夫回答说：

“我请求同意我10月6日上午出发。”

斯大林同意说：“好，明天我们在莫斯科等您。”

但是，由于第54集团军所在地段出现了一些重要情况，朱可夫向最高统帅报告说，他10月6日不能去莫斯科了。

傍晚，斯大林又打电话来。

“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敌人有些什么新行动吗？”

“德国人的进攻放缓了。根据俘虏的口供，德军在9月的战斗中遭受重创，在列宁格勒附近转入防御。现在敌人在炮击列宁格勒，并从空中进行轰炸。”

朱可夫报告完情况后，问最高统帅，要求他去莫斯科的命令是否仍有效。

“有效！”斯大林回答说，“让霍津或者费久宁斯基将军代替您，您明天就飞来大本营。”



在莫斯科迎接朱可夫的是斯大林的卫队长弗拉西克将军。他说，最高统帅病了，在家里工作，他要他们马上过去。

当朱可夫走进房间的时候，贝利亚也在。斯大林正在结束同他的谈话。他说：

“你去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可能和条件……”

贝利亚走了。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起先并没有注意他听到的最后那句话。如他所说，他在很久以后才明白，斯大林说的是同希特勒分子签订停战协定的可能性。

……斯大林冷淡地迎接朱可夫，只是点了点头回应朱可夫对他的问候。他情绪激动、怒气冲冲地走近地图，指着维亚济马地区说：

“您看！这是西方面军司令部的成果！这里的形势非常严峻！我从西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得不到关于真实情况的详细报告。我们由于不知道敌人在哪里、以哪个军队集团推进、我军现状如何，没法作出任何决定。您马上到西方面军司令部去，好好弄清楚情况，您在那里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等您电话的。”

斯大林除了关心莫斯科附近的严峻形势之外，还关心其他战场的态势。他问朱可夫说：

“您认为，德国人最近会再次进攻列宁格勒吗？”

“我想，不会。敌人损失惨重，已经把坦克部队和摩托化部队从列宁格勒调往中央方向的某个地区。靠剩下的力量他们无力实施新的进攻行动。”

“那您认为，希特勒会把从列宁格勒撤走的坦克部队和摩托化部队用到哪里呢？”

“显然是用于莫斯科方向。但是，当然要在装备得到补充和整修之后。”

斯大林看了看西方面军的地图说：

“他们好像在这个方向活动。”

朱可夫与最高统帅告别后，去找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详细给他讲述了10月6日列宁格勒地区的态势。

沙波什尼科夫说：“最高统帅刚刚打来电话，他命令为您准备好西方面军的地图。地图马上就准备好。西方面军司令部就在8月叶利尼亚战役期间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的驻地。”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给朱可夫介绍了莫斯科方向态势的详细情况，然后交给他大本营的命令：

“预备队方面军司令、



西方面军司令：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大将朱可夫同志作为大本营的代表前去预备队方面军的作战地域。

大本营要求向朱可夫同志介绍态势。今后务必执行朱可夫同志有关使用预备队方面军和西方面军部队及指挥问题的一切决定。

受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委托 总参谋长 沙波什尼科夫

1941年10月6日19时30分”

* * *

形势是灾难性的。

本可以给敌人以猛烈突击的大量部队在维亚济马附近陷入重围。这当然是大本营和掩护首都的各方面军司令部的错误导致的后果。

在通往莫斯科的接近地抵抗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的有三个方面军：西方面军（司令是伊·斯·科涅夫将军）、预备队方面军（司令是谢·米·布琼尼元帅）和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是安·伊·叶廖缅科将军）。

这三个方面军的部队防御了将近一个半月，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准备和加强防御工程、构筑好火力配系以及搞好战术战役的协同动作。

数字是枯燥的，著作中都尽量避开数字；但同时，数字也是有说服力的冷冰冰的论据，数字不动声色、平心静气地说明交战双方什么时候有多少兵力。通过对比这些数字，可以清楚地看出哪一方哪种兵力更多。

如果读者有足够的耐心，那么就请研究这些数字，看看在莫斯科会战之前这两支大军的情况。如果读者不感兴趣，那么就请跳过这一页。

希特勒匪徒有3个野战集团军、3个坦克集群、16个步兵军、8个摩托化军。这些兵团共有76个师，其中有50个步兵师、14个坦克师、8个摩托化师、3个警卫师和1个骑兵师。还有3个独立旅：2个摩托化旅和1个骑兵旅。所有的师都是满员的：步兵师15200人，坦克师14400人，摩托化师12600人。“中央”集团军群将近200万人，超过入侵俄罗斯的拿破仑军队（60万人）两倍多。这只是在—个方向上，而战场从北海延伸到黑海。在莫斯科附近我军的3个方面军有15个集团军：西方面军有6个集团军，预备队方面军有6个集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有3个集团军。总共83个师，其中1个坦克师，2个摩托步兵师，9个骑兵师，13个坦克旅。我军各师的平均人数在10000~6500人之间。大炮和坦克很少。

因此，在兵团的数量方面，我军似乎多于敌人。但是，当弄清楚了这些数字的真实内涵、兵团实有的兵力时，就会看到，优势明显在希特勒匪徒一方。

还要看到的是，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总是兵力，使用兵力的本领，也就是统率军队的军事首长是否掌握军事学术也意义重大。

应该承认，在第一阶段，即在莫斯科会战的筹划过程中，军事技巧是在希特勒匪徒一方。他们不仅能在短时期内恢复在此前战斗中削弱了的各师的战斗力，而且还能巧妙地变更部署（我们竟然没有发现），并且在主要方向上组建强大的突击部队，我军在这些地段人数很少的分队无法遏制他们。就是因为我们的只是分队，即营和连，而不是师。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很简单。德国人密集集中兵力，而我们的指挥员们在构筑战线时几乎是给每个师平均分配公里数。例如，第30集团军每个师平均负责17.5公里战线，第19集团军每个师负责8公里战线。而在这些集团军的接合部，希特勒匪徒却投入了12个师！只是在一个接合部！这就意味着，敌人在这个地方的优势是绝对的。如果第30集团军的一个师守17公里，那么每个团就要守8~9公里（第一梯队中有两个团），而每个营就要守4公里（第一梯队中一个团有两个营）。而德国人在这4公里上却投入1~2个师！几个团进攻一个连！这么强大的力量谁顶得住？就凭我们战士的那些步枪和机枪吗？几百辆坦克朝他们开过来，而我们西方面军的战术密度是：每公里坦克1~1.5辆，反坦克炮1~1.5门，76毫米口径炮4.5门。就这么一点。就用这点兵力和装备怎么能抵挡那么一大群敌人呢！在非主要方向上，即德军兵力少的地方，我们的第16、19、20、24、32集团军顶住了敌人的压力，但希特勒匪徒也考虑到了这一点：突击集团在翼侧（在主要方向上）突破了我军防线，包抄并围住了这五个集团军，形成了维亚济马合围圈！

从战争之初开始，德军的突击能力就出乎我们的意料。德军在决定性方向上对我军的优势达六倍、八倍之多，也同样是出乎意料的。这就是战争初期我们遭受巨大损失的主要因素。

我们的统帅们和斯大林直到退至莫斯科时还没有明白敌人的这个战术，即使他们明白了，也不能与之对抗。“台风”战役一开始，这五个集团军迅速陷入重围，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

我军的线式防御没能经受住这种突击。如上所述，我西方面军的五个集团军和博尔金的战役集群因此落入包围圈。德军包围了布良斯克方面军的第3和第13两个集团军，这几个方面军的部分部队冲出包围，在遭受了巨大损失后，向当时态势允许的地方撤退。

西方向实际上已经没有了绵亘正面的防御。由于布良斯克方面军、西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都没有任何预备力量，那里形成了一个无法弥合的大缺口。连通往莫斯科的主要方向上都没有兵力加以掩护。所有通往莫斯科的道路实际上都是敞开的。从战争爆发以来，希特勒匪徒还从没有这么实际地接近于攻占莫斯科。

在西方面军的司令部里，朱可夫问司令科涅夫准备在这种困难的态势下采取什么措施。

“我已经命令第16集团军司令罗科索夫斯基带领部队经维亚济马，在维亚济马以东森林中集结，但是一些部队被敌人拦截，落入重围。罗科索夫基本人和集团军司令部成功脱身，现正在维亚济马以东的森林中。同第19集团军司令卢金和第20集团军司令叶尔沙科夫的联系中断了。我不知道他们的情况如何。同博尔金集群也失去了联系。我们同相邻方面军也没有联系。已经下令让损失较小的方面军右翼第22、第29和第30集团军退到勒热夫-瑟乔夫卡一线。我们方面军没有兵力封锁通往莫斯科的中央方向。”

10月8日凌晨2时30分，朱可夫给斯大林打电话，报告了西方面军的态势：

“现在主要的危险是莫扎伊斯克防御线的掩护兵力很弱。敌人的装甲部队因此有可能突然出现在莫斯科附近，应该尽快从各地抽调部队增强莫扎伊斯克防御线。”

斯大林问道：

“您想怎么办？”

“我马上去找布琼尼。”

“您知道预备队方面军的司令部在哪里吗？”

“我在小雅罗斯拉韦茨地区找找看。”

“好，去找布琼尼吧，到他那里后马上给我打电话。”

朱可夫好不容易找到了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布琼尼同他失散的部队没有联系。

“尤赫诺夫在谁的手里？”

布琼尼回答说：“现在还不知道，昨天那里有第33集团军的两个民兵步兵团，但是没有炮兵部队。我认为，尤赫诺夫已经落入敌人的手里。”

“哪些人在掩护从尤赫诺夫到小雅罗斯拉韦茨的道路？”

“我往这儿来的时候，”谢苗·米哈伊洛维奇说道，“在梅登除了三个警察一个人也没遇到。当地政权机关从梅登撤走了。”

“请弄清情况后向大本营报告方面军的现状。请向斯大林报告我们

会面的情况，说我到了尤赫诺夫地区，接着去卡卢加。我要弄清楚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朱可夫到达离尤赫诺夫 10 ~ 12 公里的地方被我军的战士拦住了，他们告诉他说，希特勒匪徒在尤赫诺夫地区，卡卢加地区正在进行战斗。

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向卡卢加方向进发。在那里他被告知，最高统帅命令他在 10 月 10 日傍晚前到西方面军司令部。而当时已经是 10 月 8 日傍晚了。

朱可夫再一次来到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在那里，他又被告知，上面命令他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但是他已经接到最高统帅要他在 10 月 10 日到西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朱可夫打电话问沙波什尼科夫，到底执行哪个命令？

沙波什尼科夫解释说：

“正在研究任命你为西方面军司令一事。请你在 10 月 10 日前弄清楚预备队方面军的态势，尽一切可能阻止敌人突破莫扎伊斯克 - 小雅罗斯拉韦茨防线以及谢尔普霍夫方向的阿列克辛地区。”

10 月 10 日早晨，朱可夫来到西方面军司令部，司令部这时位于距莫扎伊斯克西北方几公里远的克拉斯诺维多沃。

在司令部里，由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华西列夫斯基组成的国防委员会工作组正在研究西方面军部队失利的原因。

布尔加宁对朱可夫说：

“斯大林刚刚打来电话，命令你一到司令部就立即给他打电话。”

斯大林接了电话。

“我们决定解除科涅夫方面军司令的职务，西方面军出现这样的态势是由于他的失误造成的。决定任命您为西方面军司令。您有什么不同意见吗？”

“不，斯大林同志，在莫斯科危在旦夕的关头我能有什么反对意见。”

“那我们怎么处置科涅夫呢？”

“请把他留在西方面军做我的副手吧。我会让他领导加里宁方向的军队集群。那个方向太远了，必须有个辅助指挥机关。”

斯大林不无怀疑地问道：

“您为什么要保护科涅夫？他是您的朋友吗？”

“我在白俄罗斯军区工作的时候就认识他了。”

“好吧。预备队方面军的剩余部队，即驻扎在莫扎伊斯克防御线的部队也归您指挥。马上接手一切工作，开始行动吧。”



“我马上就执行命令，但我请求立刻调集更多的预备队，因为希特勒匪徒近期会加紧向莫斯科突击。”

朱可夫走进工作组所在的房间，传达了自己同斯大林的谈话。

“那么，现在如果工作组不反对，我请求你们停止工作，因为我们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第一，把方面军司令部转移到阿拉比诺去。第二，科涅夫同志带上必要的指挥设备，到加里宁方面去协调各军队集群的行动。第三，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在一小时后去莫扎伊斯克找防线司令波格丹诺夫，实地弄清莫扎伊斯克方向的态势。”

工作组同意了朱可夫的要求，中断了工作，返回莫斯科。

不必有很强的洞察力，就可以明白：上述情况很像是不久前在西方向发生的事，当时根据由梅赫利斯为首的一个级别不太高的工作组调查的结果，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大将、方面军参谋长克利莫夫斯基赫中将军和其他一些将官都被枪决了。朱可夫这一回实际上是救了科涅夫等人。因为西方面军的失利，斯大林对科涅夫的看法极为恶劣。差点没要了他的脑袋！朱可夫明白这一点，他以态势严峻为理由，要求科涅夫做自己的副手，巧妙地帮科涅夫躲过了灾难。（朱可夫不知道多年以后科涅夫会对这次救命之恩以怨报德！）

朱可夫开始指挥方面军两天之后，莫洛托夫打来电话，他们谈到德军继续挺进的一个方向。莫洛托夫提高了声调，他看来有德军坦克在这个地段上推进的直接情报，而当时朱可夫还不是非常了解情况。

莫洛托夫说：

“要么您顶住这危及莫斯科的进攻，要么您会被枪决。”

“请别吓唬我，我不怕您的威胁。我指挥西方面军还没到两整天，还不完全了解态势，不是非常清楚各处发生的事情。我正在了解情况，接手部队。”

莫洛托夫又提高了声调说：

“怎么会这样呢，两整天还没弄清情况！”

朱可夫回答说：

“如果您能比我更快地弄清情况，那您就来指挥西方面军吧。”说完就摔了电话。

当读者看到朱可夫去西方面军、寻找几个方面军的司令部的经过时，是否会产生存在着真空地带、无人地带的印象呢？朱可夫长途跋涉，却没有遇到我们的部队。为什么德军不向莫斯科推进，不占领莫斯科呢？显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朱可夫是在后方、在各个方面军司令部所在的地区内行进，在那里除了预备队当然不应该有部队，而当时西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都没有掌握预备队。

而在前线，在进攻的部队和退却的部队短兵相接的地方，战斗还在继续。我们对于这些战斗、对于这些在这里抗击敌人的勇士知之甚少，因为当时从各师司令部到最高统帅，都已经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斯大林对朱可夫说过：他搞不清楚前线发生了什么，谁被包围了，谁还在抵抗。如我们所看见的那样，各方面军的司令部都不了解各部队态势和现状。在这种艰难时刻，正是那些至今仍然不为人知的英雄们在建立功勋。

在前线和在包围圈中，一连连、一营营以及团和师的残部都在拼尽全力，尽可能遏制敌人的进攻。当时报纸上没有报道他们，也没有人给表现出色的人颁发奖状，因为当时谁都顾不上这样做，当时要阻止比守军多几倍的敌军席卷而来的惊涛骇浪。后来政治工作者和记者们会找到这些战斗英雄，但是，很可惜，只找到了那些幸存的人，他们才能讲述他自己做了什么，或他看见的其他人英勇奋战的情景。而那些在战斗中牺牲了、也许做出了最重要功绩的人呢？谁也无法再弄清他们的功绩了。何况，在节节失利的日子，在一退再退、城市和乡村一再失守之后也不该讲述什么英雄事迹的。如果几十公里、几百公里落荒而逃，还有什么英雄气概可言？牺牲那么多人、损失了那么多装备，还谈得上什么表彰战功的报告吗？

朱可夫在他的书中写道：“由于在维亚济马地区被围的我军部队的坚忍不拔和不屈不挠，我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来组织莫扎伊斯克战线的防御。被围部队的流血牺牲是有意义的。苏联军人在维亚济马附近英勇作战，从而为保卫莫斯科的共同事业作出伟大贡献，这一功绩将会得到应有的评价。”

战斗一刻也没有停止，夜以继日，但这只是从战术方面来看。至于从战役来看，那么这时候出现了间隙。这是因为希特勒匪徒包围了我们这么多军队后，本应把他们聚而歼之，但这要求他们拿出28个师以上的兵力，这意味着，要从那些开赴莫斯科以北和以南进攻莫斯科的突击集团、强大的突击力量中抽出这28个师，把它们留在后方。

德国统帅部尽管旗开得胜，但又如何设法摆脱他们遇到的困难呢？我们再来看看哈尔德的日记。他在10月6日写道：“从整体上看，可以说‘中央’集团军群进行的战役接近极点，彻底完成了对敌人的包围。”

10月7日的日记：“今天，霍普纳的坦克集群和霍特的坦克集群在维亚济马地区会师。这是为期五天的战斗中取得的一大胜利。现在必须尽快把霍普纳的坦克集群腾出来，到莫斯科防线的东南地段进行突击，迅速把第4集团军的步兵兵团调到维亚济马。”



从这段日记可以看出，敌人进攻出现间隙的原因是，坦克兵团刚刚靠拢，但野战军还没有跟上，所以进攻要暂停一下。

10月8日的日记：“在维亚济马地区对敌人集团的包围完成了，并且保证了外围敌人无法突击解救被围兵团。”

10月9日，尽管哈尔德的军人语言乏味而精确，他在日记中还是明显兴奋地写道：“在维亚济马地区对被围敌人集团的战斗简直就是经典战斗……”

这就是1941年10月9日的态势，这一天斯大林下令将西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合并为西方面军。

斯大林在如此危急的态势下还能做什么呢？大部分军队被包围了，那些在进攻的敌人面前节节退却的部队肯定抵挡不住敌人的推进。没有预备队，大本营手头没有现成的部队，而远东地区和其他地区的部队迟迟没有运到。如果斯大林在把朱可夫派往列宁格勒时说那里的形势是毫无指望的，那么，对于现在发生在莫斯科附近的情况，更有理由可以用这个说法。

斯大林在危急关头任命朱可夫为西方面军司令是非常正确的决定。

朱可夫迅速而现实地估计出现的态势，洞察敌人的战术。他认定，敌人现在不可能在开阔的战线上全线展开进攻，敌人的兵力不足以这样做，他们不得不把许多兵团用来歼灭被围的我军。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在莫斯科建立绵亘正面的防御。朱可夫了解敌人沿道路进攻、用坦克和机械化楔形部队实施突击的老一套，他决定，首先沿敌人为占领莫斯科必须进攻的道路也就是在沃洛科拉姆斯克、莫扎伊斯克、卡卢加公路一线组织起坚固防御。要在这里集中现有的所有部队，主要是炮兵和反坦克武器。把现有空军力量都派往这里。

最危险的是莫扎伊斯克方向。敌人的军队已经出现在博罗季诺接近地——1812年我们的先辈正是在这里与拿破仑大决战的。如我们所知，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正将兵力集中于莫扎伊斯克防御线。朱可夫同军事委员会委员尼·亚·布尔加宁去的正是这里，这个最危险的方向。

在这个方向指挥第5集团军和所有可以集合的将领是德·丹·列柳申科少将，他受伤后是列·亚·戈沃罗夫少将。

康·康·罗科索夫斯基中将受命保卫沃洛科拉姆斯克方向，他手下只有第16集团军的司令部，而我们知道，这支军队被包围了。朱可夫把所有突围部队交给罗科索夫斯基指挥，他知道这位将军能干而坚定，希望他能守住沃洛科拉姆斯克方向。

米·格·叶夫列莫夫中将带领的第33集团军集结在纳罗福明斯克方向，康·德·戈卢别夫少将的第43集团军负责守卫小雅罗斯拉韦茨



方向，伊·格·扎哈尔金中将的第49集团军掩护卡卢加方向，朱可夫派新被任命为他副手的科涅夫将军带着作战组去远离方面军司令部、敌我双方部队都独立行动的卡卢加方向。

朱可夫给陷入重围的部队也布置了战斗任务。他把所有被围部队交给第19集团军司令米·费·卢金上将指挥，命令他指挥战斗并带领部队突出包围圈。根据理论和实践上都早就形成的准则，应该把被围的地方部队分割后逐一歼灭。希特勒的军队在维亚济马地区也尝试这样做。但是，卢金将军看出了他们的意图，尽力不让敌人分割我们的部队，并在包围圈内组织了顽强的抵抗。被围部队在一周内以积极的行动吸引了敌人相当多的兵力，然后他们试图突围。最终只有少数人同自己的部队会合了，但是毕竟有一部分部队突围。

为了更切合实际地说明突围的部队是如何战斗的，我这里引用西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列斯捷夫（师政委级）11月17日写给一级集团军政委级梅赫利斯的总结报告原文（有删节）：

“关于部队的政治精神面貌和对突围指挥人员的评估。

根据西方面军兵员补充处的材料，突围的军官有6308人，下级军官9994人，列兵68419人。这还不是完整的材料，许多突围的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迅速回到了自己的队伍，还有一部分掉队的战士和指挥员带着武器组成了拦截队，开赴前进阵地、补充到各部队中去了……”

报告详细说明了—些战斗和有组织突围的例子：

“以有组织的战斗分队和部队突围的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继续依照红军有关条令活动，政治精神士气高昂。这些集团、分队和部队不是避开与敌人遭遇，而是寻找敌人、勇敢地投入战斗，歼灭敌人。

在被包围的复杂情况下，坚定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们保持了部队的完整，他们把溃散的战士和指挥员组建成新的战斗分队，在这些人中实行军人守则和纪律，这些部队和分队不断战斗，重创敌人后与主力会合。”

* * *

10月10日斯大林任命朱可夫为西方面军司令，同一天德国《人民观察家报》上整版都是这样的标题：“伟大时刻来临：东方战局已定”，

“布尔什维主义的军事末日……”，“苏联最后的战斗师团成了牺牲品”。希特勒在体育馆参加庆祝胜利大会时说：“我只能在今天这样说，因为今天我才能肯定地宣布：敌人已经被打倒，再也翻不了身！”

“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冯·博克被柏林如此闹哄哄的庆典吓坏了。他对布劳希奇说：

“难道您不知道现在的真实情况吗？在布良斯克和维亚济马被包围的苏军还没被歼灭呢。当然它们会被歼灭，不过还是请先不要报捷！”

总司令布劳希奇提醒这位陆军元帅说：

“不要忘了，希特勒打算11月7日进入莫斯科，在那里举行阅兵。我建议您加紧攻势。”

同一天，也就是10月10日，哈尔德在骑马溜达的时候摔了下来，锁骨脱臼。他被送进战地医院，所以他10月10日到11月3日之间没有记日记。哈尔德出院后的第一篇日记是在1941年11月3日写的，他在其中对他不在的这23天作了概括。我在这里不引用他写的关于其他战线的记录，只是看一下进攻莫斯科、同西方面军作战的“中央”集团军群的情况。在这些日子里，“台风”战役计划还在继续实施。哈尔德记录了这次战役的进程。他是这样写的：“‘中央’集团军群抽调第2集团军（得到快速兵团加强的）去库尔斯克，用于将来进攻沃罗涅日。但这只是在理论上如此。实际上，部队陷入泥泞中，只有借助牵引车才能保障给养的运输。古德里安的坦克集群缓慢而艰难地向前推进，（从奥廖尔）到了图拉。第4集团军在霍普纳坦克集群协同动作下从奥卡（在卡卢加地区）到莫扎伊斯克地段突破了敌人（掩护莫斯科的）的防御阵地。但是，由于道路难行，莱因哈特（接手了霍特的第3坦克集群）的坦克集群在这个地段以北向克林突破没能成功。第9集团军在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后得以稳定克林地区的形势，在自己的北翼建立起非常坚固的防御。”

可以看出，日记中不再有对战役经典式发展或者对攻克莫斯科的惊人推进的狂喜。进攻的速度明显降了下来，敌人的部队在20天内只推进了一点点，已经需要为这样的行动迟缓寻找借口了。他们说，这是因为道路泥泞难行（接下来就是大雪纷飞和严寒凛冽）。当然不能否认，道路泥泞和恶劣确实阻碍了希特勒军队的坦克、大炮和运输汽车的推进，但是速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仍然是我军对各主要方向上敌人进攻的抵抗。

斯大林和朱可夫在莫斯科接近地取得的胜利是：敌人的推进越来越慢了。

冯·博克在10月头几天最担心的是，不要让他的集团军群的坦克

部队去消灭被围的苏军，而是要继续前进，阻止苏军在通向莫斯科接近地建立新防线。

10月7日，博克命令古德里安的第2坦克集群攻下图拉，继续向科洛姆纳和谢尔普霍夫前进，第4坦克集群沿维亚济马-莫斯科公路向莫斯科进发，第4和第9集团军同第3坦克集群向卡卢加和格扎茨克，继而向莫斯科推进。向小雅罗斯拉韦茨进发的是“帝国”党卫军的一个师，紧随其后的是第57和第10坦克军。

迎战这个强大的机械化坦克集群的是波多利斯克步校和炮校的学员、第222高射炮团的炮兵连（它炮击坦克）和第17坦克旅的分队。这些优秀的士兵坚持了六个昼夜，打退了十分强大的坦克部队一次次的进攻。六个昼夜！难以设想年轻的学员们没有足够的武器却抗击坦克，他们不惜代价顶住，不让敌人靠近莫斯科！

这时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来到博克这里。他了解了情况后，坚持要求派第3坦克集群从北面，从列宁格勒-莫斯科铁路方向迂回绕到莫斯科后面。经验丰富的博克持反对意见，他警告说，在这种情况下莱因哈特和古德里安的坦克集群分得太开，但是布劳希奇终于争取到上面也给博克下达了相应的命令。

10月13日，进攻部队攻占卡卢加。10月15日，霍普纳的坦克集群继续向前跃进，突破了莫斯科的防线。霍普纳司令部的日志写道：“莫斯科的陷落指日可待”。

* * *

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斯大林曾打电话问朱可夫说：

“您确信我们能保住莫斯科吗？我这么问您时，心里很痛苦。作为共产党员，请您实话实说。”

朱可夫想了一会儿，这几秒钟对斯大林来说大概特别难受。朱可夫非常清楚，他作出任何肯定或否定的回答，都要为此承担责任。不作明确的判断可能容易些，但这不是朱可夫的性格。重要的是，他相信他已经采取一切可能和不可能措施来保卫首都，所以他肯定地说：

“当然能保住莫斯科。但是至少还要两个集团军和200辆坦克。”

“很好，您这么有信心。请给总参谋部打电话，跟他们谈好往哪里集结您要的那两个预备队集团军。这两个集团军会在11月底准备就绪，但眼下我给不了您坦克。”

1941年10月15日上午9时，斯大林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国防部的领导人、莫斯科市委书记谢尔巴科夫和莫斯科军区司令阿尔捷米耶夫将军也应邀参加。



斯大林神态安详，不苟言笑，全神贯注。他宣布说：

“在东部的预备队到来之前，德军在兵力上占据优势。战线可能被突破。必须防备敌人窜进莫斯科的情况出现。”

我在这里引用什捷缅科的回忆录中一个生动的场景。什捷缅科目睹了1941年10月斯大林工作的情形。

“……在敌军飞机轰炸最猛烈的时候……几十个探照灯像蓝色的利剑刺破黑暗。高射炮弹爆炸迸发的红色火光一刹那又熄灭了。炮兵阵地（战场就在附近）上的深红色火光照亮了天边。

对莫斯科的轰炸加强了……10月28日夜一个爆破弹落在我们大楼所在的院子（基洛夫大街上的总参谋部）。几辆汽车被炸毁，3个司机被炸死，15名军官（总参谋部的军官们。——本书作者注）受伤。总参谋部值班的中校И.И. 伊利琴科被爆炸波抛到房子外面。门从合页上脱落下来，浑身是血的人们从房间跑出来，碎玻璃在他们的脚下发出脆响声。人们主要被碎玻璃划伤了。华西列夫斯基也受了伤。

斯大林一次也没有下到他的地下办公室去。他在给他安排的那间厢房里工作，也就是在基洛夫大街上的总参谋部的院子里……”

莫斯科也不平静。不只是军事机关的人，几乎所有莫斯科的居民都知道德国军队正在发起新的进攻。所有人都听到了炮击和轰炸的声音。苏军总后勤部部长安·瓦·赫鲁廖夫将军后来回忆道：

“10月16日早晨，总参谋长鲍·米·沙波什尼科夫元帅给我打电话，传达了斯大林要求所有后勤机关迅速撤退到古比雪夫的命令。根据这个命令，大本营要转移到阿尔扎马斯。总参谋部命令我为斯大林同志撤退准备专列。当天晚些时候，我和斯大林通了电话，他证实了这个命令……”

国防委员会关于撤出莫斯科的决议重申了国家机关、总参谋部和本营撤退的决定，决议要求立即开始撤退政府、最高苏维埃、各人民委员部、外交使团和其他机关，运走克里姆林宫兵器馆内的珍宝和历史文物。一天夜里，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列宁的遗体被抬出陵墓，由专门人员护送，用专列送往古比雪夫。

莫斯科一开始大规模撤退居民和机关，后来被称之为“莫斯科恐慌”的大混乱就开始了，关于这场混乱，过去和现在都有很多传闻。许

多亲历者证实，事实上，城里有人开始抢商店、仓库的商品，老实说，甚至不是抢，而是经半官方许可见什么拿什么。

火车站上工厂和机关的专列在装物品。许多人沿公路步行——走向祖国的东部。

在这些夜里（由于匆忙，有时甚至在白天），贝利亚主管的部门手忙脚乱地在干。在押的人被匆匆处死，要带走的人另外挑出来。一些最“有价值的”在押人员本来要参加类似1937~1938年“军事阴谋案”的大审判案，这时被加强押送队解往古比雪夫。在这些人中有多次苏联英雄、总参谋长助理雅·斯穆什克维奇，前副国防人民委员、苏联空军司令、苏联英雄、空军中将帕·雷恰戈夫和他也是飞行员的妻子，国家防空部部长、苏联英雄格·施特恩上将……

10月18日，押解囚犯的火车刚刚到达目的地，内务人民委员、国家安全总委员贝利亚关于立即处决包括上述军事首长在内的25名在押人员的命令接踵而至。命令被马上执行，没有经过任何审判和侦查。

在莫斯科，逃兵和各种社会渣滓开始抢劫和制造混乱。

* * *

斯大林并没有打算离开莫斯科。恰达耶夫告诉库马涅夫说：

“在10月中旬人民委员会和办公厅的部分人员撤往古比雪夫的前夕，我走进警卫的房间和尼·谢·弗拉西克将军告别。那时候我们非常熟，两家人经常见面。

斯大林的卫队长听说我要撤退，非常悲伤。

他说：‘没什么，你很快就会回来的。’

‘是的，我想也是。’

‘斯大林同志也相信这样。’

‘有没有说过，在万不得已时他也会暂时到古比雪夫我们那里去？’

弗拉西克说：‘我知道，斯大林和日丹诺夫谈过这件事。“主人”非常坚决地宣布，这根本不可能，他会一直留在莫斯科自己的岗位上。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准备了一列小小的专列以备不时之需，这列火车随时都可以出发。’

‘斯大林同志当然还不知道这个专列吧？’

‘现在还不知道，但是，今天或者明天也许就会知道的。’”

后来，沃兹涅先斯基、加里宁、波斯克列贝舍夫等领导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斯大林确实从来没有打算从莫斯科撤离到别的地方去……

但是，撤离莫斯科的决定是他作出的。



1941年10月15日

国防委员会关于撤离苏联首都莫斯科的决定

鉴于莫扎伊斯克防线地域的形势不利，国防委员会决定：

1. 责成莫洛托夫同志通知外国使团，希望他们今天就撤往古比雪夫市（苏联交通人民委员卡冈诺维奇同志保证及时为使团提供列车，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同志组织使团的保卫工作）。

2.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今天就撤退，以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莫洛托夫同志为首的政府也要撤退（斯大林同志视情况明天或晚些时候撤退）。

3. 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海军人民委员部的机关立即撤往古比雪夫，总参谋部的主体撤往阿尔扎马斯市。

4. 一旦敌军出现在莫斯科附近，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贝利亚同志和谢尔巴科夫同志把不能撤退的企业、仓库和机关以及地铁所有的电气设备（除水管和管道）炸毁。

国防委员会主席
约·维·斯大林

下面是这些日子中发生的一件很能说明问题的事。

我的朋友、上了年纪的索契居民埃姆索尔·阿卡基耶维奇当时和斯大林的卫队很熟悉，他告诉我说：

“我的亲戚伊格纳托什维利将军是卫队长弗拉西克的副手，他在事隔多年之后讲了这件事，他说：

‘当莫斯科附近的形势十分危急，德国人已经到了克留科沃的时候，各个机关开始从莫斯科全速撤退。有一天，米高扬和马林科夫在桌旁对我说：“斯大林同志该去古比雪夫了。你去跟他说。”他们自己害怕跟他谈这件事。

我走进斯大林的房间，为了取得他的信任，我和他用格鲁吉亚语聊了起来。关于撤退的事我只字不提。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去古比雪夫要带些什么？”

斯大林看了我一眼，我觉得我身上的衣服都要被他的目光烧毁了。

“嘿，你这个该死的胆小鬼！在军队拼死战斗的时候，你竟敢

该逃跑！你说这种动摇军心的话，该把你枪毙了。”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魂不附体地回到派我去见斯大林的人的身旁的。

“怎么样？他决定了怎么办？”

我没法回答，斯大林烈火一样的目光还在灼烧着我。“枪毙”这个词在我的脑海中反复出现。斯大林可是说话算数的。我看到面前有一瓶白兰地，就抓起瓶子喝了一大口。

那两个人不依不饶地问道：

“喂，他到底怎么决定的呀？”

“他说，我说这种话是在动摇军心，要枪毙我。要真是这样的话，就是你们害了我……”

但是，感谢上帝，总算躲了过去。”

在1941年10月保卫莫斯科最艰难的日子里，有一天，斯大林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起来。斯大林不慌不忙地去接电话。斯大林在通话的时候从来不把听筒贴在耳边，而是与耳朵保持一段距离，因为对方的说话声音太大了，连在一旁的戈洛瓦诺夫将军全都听清了。后来他讲述了这一幕。

电话是空军军事委员会委员斯捷潘诺夫（军政委级）打来的。他报告说他在莫斯科以西不远的佩尔胡什科沃，在西方面军的司令部里。

斯大林问道：“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司令部担心，现在方面军司令部距离防御前沿太近。应该撤往东面，撤过莫斯科，大概是阿尔扎马斯地区。应该在莫斯科东郊建立指挥所。”

沉默了好长时间。

“斯捷潘诺夫同志，请问一下，司令部的人有没有铁锹？”斯大林没有提高声音说道。

“我马上就问。”又沉默一阵。“斯大林同志，什么样的铁锹？”

“什么样的都行。”

“马上……斯大林同志，有铁锹。”

“告诉同志们，让他们拿着铁锹给自己挖一个坟墓。方面军的司令部留在佩尔胡什科沃，而我也留在莫斯科。再见。”他说这些话时心平气和，没有提高声调，也没有一点发怒的迹象，不慌不忙地放下了烟斗。

* * *

10月18日，德国军队攻下了小雅罗斯拉韦茨和莫扎伊斯克。

10月19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召开国防委员会会议，党和苏维



埃的领导人应邀参加。莫斯科市委书记谢尔巴科夫首先汇报了当前的形势，莫斯科军区司令阿尔捷米耶夫报告了制止莫斯科恐慌和撤退的进展情况。

他说完后，斯大林站了起来。他没有走到讲台上，而是走到坐在大厅里的人中去。一阵令人惴惴不安的寂静，所有人都在等着听斯大林说出最主要、最重要的话来。而他专注地看着大家的脸，开门见山地问道：

“我们是保卫莫斯科还是要撤退？”

会场里的寂静更加令人惴惴不安了。当然谁也不能说要放弃莫斯科。

“我问你们每一个人。要负责地说。”

他走近坐在第一排的一位区委书记。

“您有什么看法？”

“不能撤退。”

下一个回答说：

“我们要为保卫每一栋房子而战。”

斯大林走了一圈，问到了几乎所有的与会者。他们都回答说决心要保卫莫斯科。

斯大林转向马林科夫说：

“请起草国防委员会的决议。”

马林科夫马上拿起笔来，俯身起草文件。他写得很慢，很缺乏信心。斯大林走到他的身边，越过他的肩膀看他写的东西。终于忍不住骂了起来：“黏黏糊糊的人。”他一把抓过纸来，递给了谢尔巴科夫，命令道：“你来写。”他开始口授。开头的話很特别，与平时官方的决定和命令不同，决定说“兹宣布……”

因为这个文件是斯大林本人起草的，所以我认为，读者可以更好地看出行文的严谨和措辞的精确简练，这就是斯大林起草的文件和口头讲话的特点。

国防委员会《关于从10月20日起在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实行戒严》的决定

1940年10月19日第813号

兹宣布，莫斯科以西100~120公里内的首都防御责成西方面军司令朱可夫大将同志负责，而莫斯科卫戍部队司令阿尔捷米耶夫中将负责在莫斯科接近地的防御。

为了莫斯科防御的后勤保障和加强保卫莫斯科的部队的后方，也为了肃清德国法西斯间谍、奸细和其他破坏分子的破坏活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1. 从1941年10月20日起在莫斯科市及其周边地区实行戒严。

2. 从夜里12时到凌晨5时，除了持有莫斯科市警备司令颁发的特别通行证的个人和车辆外，禁止任何个人和车辆在街上活动，在发布空袭警报后，居民和车辆的活动应遵照莫斯科对空防御部门核准并在报刊上公布的规定进行。

3. 莫斯科市警备司令西尼洛夫少将负责维持市内及其周边地区最严格的秩序，为此，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内卫部队、警察和工人志愿队归警备司令调遣。

4. 要迅速将破坏秩序分子送交军事法庭追究责任，就地枪决挑唆破坏秩序的间谍、奸细和其他敌人代理人。

国防委员会号召首都一切劳动者维持秩序和安定，全力支持保卫莫斯科的红军。

国防委员会主席

约·斯大林

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 * *

10月28日，斯大林召见莫斯科军区司令阿尔捷米耶夫将军和空军司令日加列夫将军，一个问题就把他们难住了：

“过10天就是十月革命纪念日了，我们要不要在红场上举行阅兵式？”

两位将军不知所措。莫斯科正处在慌乱的撤退之中，各个机关都在焚烧文件，全城烟雾缭绕，没有人想过要举行阅兵式。

“我再问一次，要不要举行阅兵式？”

阿尔捷米耶夫迟疑地说：

“但是形势……而且城里没有部队。炮兵和坦克都在前线。这合适吗？”

斯大林朝坐在桌子后面的政治局委员们点了一下头说：“但是国防委员会认为必须举行阅兵式。这不仅会对莫斯科市民，而且还会对全军和全国起到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

两位司令得到了指示，在绝对保密下筹备阅兵式。

在十月革命纪念日的前三天，斯大林同莫斯科党组织的领导人也进行了几乎同样的对话：



“你们打算在哪里举行庆祝大会？怎样举行？”斯大林问道。

这一次的回答同样是惊讶和沉默。谁也没有想过举行这项和平时期的传统活动。

斯大林解释在战时也要举行庆祝大会的原因。

“你们得忙活忙活，跑一跑了。没时间起草报告？如果你们不反对的话，我来作报告。”

11月6日举行了庆祝大会，这一次大会不是在大剧院里，而是在地铁“马雅科夫斯基”站的站台上举行的。站台上排列整齐的扶手椅，还设置了主席台，桌上摆满了面包片、小点心和清凉饮料。在会场的一侧是灯火通明的地铁列车。

应邀与会的人都乘自动扶梯下来，政府官员们乘地铁在另一侧站台到达。大会甚至比和平时期的集会都隆重。大家都明白斯大林通过广播向全国转播的讲话有着巨大的政治意义和动员意义。

斯大林在讲话开始时介绍了过去四个月战争的经过和结果。他解释了“闪击战”在西欧取得胜利、而在东方遭到失败的原因，然后分析了我军暂时失利的原因，并预言“德帝国主义者”必然灭亡的原因。他结束报告时喊的最后一句口号成了整个战争期间的号召和预言：“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①

斯大林作报告时语调平和、不慌不忙，和往常一样偶尔停下来喝一口水。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从前多次听过的领袖的讲话，不仅讲话的内容，而且讲话严谨而自信的风格激发了人们的信心——一切都会像斯大林同志说的那样发生。

第二天在红场举行的阅兵式不仅进一步地团结和鼓舞了人民和军队奋起同侵略者作斗争，而且简直把德军司令部击倒了，甚至击昏了！

这两个活动鲜明地证实了斯大林作为政治家和团结苏维埃国家各族人民的领袖的优秀品质。我还要指出他的勇气：如果德国人了解到苏联在筹备这次庆典并采取相应的对策，那就可能发生悲剧性的结局。

对全国来说，阅兵式都是意想不到的、振奋人心的大喜事。所以，我想要简单说说当时红场上的情景。那一天我还被拘押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劳改营中，在给加里宁写信，请求派我上前线去，所以我讲的不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尽管这是传统的阅兵式，但是很不寻常。这一次阅兵不只是军事的，还是政治性的、挑战性的，是藐视敌人的，给了他们一记耳光：给

^① 《斯大林文集》第310页。——译者注

你一下！你们叫嚣说攻下了莫斯科，可我们还在举行正常的节日阅兵式！

在敌人距离城市不到几十公里远的时候，举行阅兵式是十分冒险的。我再说一次，德国人要是知道要阅兵，就会以几十倍的地面和空中优势兵力，像一支利剑在狭窄地段突破防御线、直插红场。这当然是个假设，但是距离真实情况并不远。毕竟德国人曾不止一次以楔形部队在很短的时间内突破了我们纵深的防线。

但是这一回他们没有为突击作好准备。他们的情报部门没有打探到我们策划的这个意外行动。当阅兵式开始的时候，广播电台才开始向全世界转播。在柏林，在“狼穴”的人当然也都听到了，但是事出意外，难以置信，德国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德国人都害怕向希特勒报告这件事。他自己很偶然地打开收音机，听到军乐和士兵坚定的脚步声。元首起初以为是在转播德国的某个庆典，但是他听到了俄国话和俄语口令，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冲向电话机。他知道，现在不是骂情报人员和总参谋部的人的时候，什么都来不及了，所以他直接打电话给“中央”集团军群的司令部。

希特勒听到接线员的声音后努力保持平静，以免吓坏了人，他克制地说：

“我是希特勒，请给我接最近的轰炸机联队的指挥官。”

有一段时间，希特勒听到话筒中的只言片语和交换机上切换的声音。在这几秒的时间里，他怒火中烧，而且烧得越来越旺。

一个不安的声音在听筒里喊起来：

“元首在哪里，我听不见他说话。”

“我在这里，”希特勒说，“你是谁？”

“我是第12轰炸机联队的指挥员，将军……”

“你是头笨驴，不是将军。俄国人在我们的鼻子底下举行阅兵式，你还睡得像个死猪一样。”

“但是，元首、天气……不适于飞行……有雪……”将军的声音断断续续。

“好飞行员什么天气都能飞，将军，我给你一个小时来弥补这个罪过。你的所有编队都立即出动，你亲自带领，亲自！我等你们回来后向我报告。好了。”

几分钟后，这位将军已经飞在天上了。他看到，在他后面其他三架轰炸机一组的编队相继起飞。将军没能飞到莫斯科，他的飞机和其他25架轰炸机在远接近地被击落，其余的轰炸机掉头回来了。

我在描写事件的时候力求真实，下面我引用的是一个不仅参加了阅

兵式、而且还在1941年11月的报纸上撰文描写阅兵式的目击者的讲述。作家叶夫根尼·扎哈罗维奇·沃罗比约夫是我的老朋友，我刨根问底问他那次阅兵式的情况，尽可能多地弄清楚了很多细节。

“我当时是西方面军《红军真理报》的记者。参加这次阅兵式的报社记者都集中在列宁墓的左侧。战前阅兵时，这里通常站的是外交官和武官。这次阅兵式上已经没有外交人员了，大使馆都搬往古比雪夫了。我们站得非常近，我甚至都能听见斯大林走上列宁墓上的主席台（那里的风看来比我们在下面站着要大）时说的话：

‘风真厉害。’

后来，斯大林由于天气不好、敌人的飞机难于进攻而感到高兴，当雪越下越大的时候，他笑了笑对站在身边的人说：

‘布尔什维克真走运，连上帝都帮他们。’

谢·米·布琼尼检阅部队，帕·阿·阿尔捷米耶夫中将指挥阅兵部队。与传统的做法不同，今天讲话的不是检阅部队的人，而是斯大林。就是在这一天，他说出了让所有的人都永志不忘的话。

‘你们进行的战争是解放战争，正义战争。让我们的先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德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兹涅佐夫的英雄形象，在这次战争中鼓舞你们！让伟大列宁的胜利旗帜引导你们！……’^①

军事学校的学员、捷尔任斯基特种师的几个团和莫斯科海军支队参加了阅兵。

一些步兵营在敌人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被调到莫斯科来参加阅兵式。

跟着从前线下来的各部队和分队后面走的是民兵团——一支服装五颜六色的部队。短皮袄、短呢大衣、缝过的短棉上衣、（腰部带褶的）旧式棉大衣、军大衣，还有让人记起卡霍夫卡和察里津、卡斯托尔纳亚和彼列科普等战斗的军大衣。长筒靴、毡靴、带裹腿的半高腰鞋……带耳罩的软帽、布琼尼式军帽、带护耳的棉帽、带帽沿的便帽、平顶羔皮帽、羊皮高帽……步枪混杂着卡宾枪，很少的冲锋枪，没有反坦克武器。

应该承认，民兵战士的样子不够雄赳赳，不像受阅的样子。一个又高又瘦还被人叫作‘叔叔，给我抓个麻雀’的小伙子混在左

① 《斯大林文集》第313页。——译者注

翼，紧挨着一个个子矮又敦实的人一起行进。但是有谁会责备这些民兵战士队形不整呢？没有时间操练队列是他们的错吗？不够征兵年龄的和健康状况不佳的人在隆隆炮声的伴奏下学着齐步行进。

在节日的早晨，就像国内战争年代一样，阅兵式同时也是开赴前线的仪式。同和平时期的阅兵式不同，今天的步枪、机枪、大炮和坦克都是装着实弹的。这确实地标示：他们离开红场后不是回营房，而是开赴前线——参加阅兵的许多人都背着行囊。

接下来，大炮在红场上隆隆驶过。其中一些都是来自另一个时代——来自‘奥恰科夫和征服克里木时代’^①。这些大概都是功勋卓著的大炮，服役期已满，早就应该去博物馆颐享天年了。连它们都在列队中行进，那只能是因为需要能作战的大炮，前线急需，发射阵地也离不开。

接下来是坦克，坦克很多，将近200辆，其中还有不少重型坦克。坦克手们只是路过莫斯科。庆典的前一天，两个坦克旅在环城铁路的火车站的后面和站台上卸载。坦克从红场直接驶向出发阵地。可能是为了缩短路程，今天坦克没有像往常一样经过瓦西里升天大教堂开向滨河街，而是从宣喻台向左拐，经过伊里英卡大街和捷尔任斯基广场赶往列宁格勒公路、沃洛科拉姆斯克公路和莫扎伊斯克公路。

坦克、牵引车、装甲车和大炮长时间在莫斯科的大街上隆隆驶过，从城里向各郊区和周边市县……马蹄的得得声、步兵行进的脚步声、车队的轧轧声持续不断。上前线去！”

一头白发的叶夫根尼·扎哈罗维奇看了我一眼。一刹那我觉得他满头都是雪花，因为他正在1941年11月的红场上行进着……

十四 誓死抵抗

攻守双方的态势都非常严峻。统帅在态势十分严峻时似乎可以不择手段来完成他们的任务，也就是成功地实施进攻或防御。但这只是在理论上成立，因为统帅每一次都受制于许多条件和当时具体的态势。这从下面要提到的态势中看得尤其清楚。

冯·博克元帅无法用按照他最初意图组建的军队集团继续进攻。“台风”战役在发动之初取得成功后就受挫了。冯·博克现在想

① 指1787~1791年的俄土战争——译者注



的已经不是结束“台风”战役，而是实施被他称为“莫斯科的坎尼^①”的新战役。如大家所见的，又是一个“经典的样板”！尽管态势非常复杂，这位德军统帅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幻想。博克这一回决定只对莫斯科进行双重包围。由克卢格元帅的第4野战集团军形成对西方面军部队的第一个包围圈即内包围圈。坦克集群应该在伊斯特拉方向上从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发动进攻，而第4野战集团军在波多利斯克方向上从纳罗福明斯克-谢尔普霍夫地域发动进攻。他们应该在莫斯科把内包围圈合围。

第二个合围圈即外包围圈应该这样形成：莱因哈特的第3坦克集群从莫斯科以北向东、向克林和德米特罗夫突击，而正从南面向第3坦克集群靠拢的古德里安的第2坦克集群要从图拉地区向科洛姆纳进行突击。这两支坦克集群应该像钳子一样，在诺金斯克地域把外包围圈合围。

冯·博克元帅在作出这一决定并提出这些任务的时候考虑到了他前一个决定的不足，当时他的部队同在维亚济马被围的苏军作战而脱不了身，不得不一面对要突出重围的苏军主动出击，另一面还受到包围圈外反冲击的苏军从背后的突击。冯·博克这一次构成了双重包围之后，想以此来保障直接包围莫斯科和冲进城里的兵团。他认为，他们的后方有了这第二个包围圈即外包围圈的保障，就可以轻松地完成提出的任务。

这一战役的策划和实施要加快，才能不让苏联部队清醒过来，组织起防御。应该在苏军在维亚济马被围而出现的缺口还没有填补上时实施打击。

应该对希特勒的各司令部和部队的组织性和经验给予应有的评价，因为他们能在短时间内策划出这一复杂的新战役，迅速抽调预备队，给部队补充兵员和坦克，主要的是，在进行主要突击的狭窄地段形成了极大的优势。

冯·博克在莫斯科方向一共集结了51个师，其中31个步兵师，13个坦克师，7个机械化师。除了这些地面部队，“中央”集团军群还有一支有650多架战斗机的第2航空大队。这可不小的力量啊！这个大部队突击的危险是非常大的。冯·博克和陆军部队总司令布劳希奇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制定的“莫斯科的坎尼”战役应该能成功，兵力完全足够进行四次快速突击，包围和攻占莫斯科。况且他们认为，苏联方面没有对抗这一新的强大攻势的实际可能性。到11月15日，希特勒军

^① 坎尼是意大利东南部的村镇。公元216年8月2日，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汉尼拔率部在此包围并消灭7万罗马军队。——译者注

队已经作长驱直入的准备。

* * *

苏军司令部和斯大林也没有坐失时机。所有可以从各没有落入重围的部队中集合的兵力以及在莫斯科组建的几个民兵师、专业部队、军事学校——所有的兵力都集中在敌人可能进行突击的方向。

斯大林好不容易，几乎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构筑起主要方向上的防御，决定采取积极行动来遏制德军的进攻。他打电话给朱可夫。

“敌人现在情况怎样？”斯大林问道。

“敌人突击集团的集中接近完成，看来很快就会转入进攻。”

“您认为敌人会在什么地方实施主要突击？”

“古德里安的坦克集群可能会从沃洛科拉姆斯克绕过图拉向卡希拉实施突击。”

“我和沙波什尼科夫认为，应该用抢先反突击来粉碎敌人正在准备的突击。应向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域实施一次反突击，还要从谢尔普霍夫地域向德军第4集团军的侧翼实施另一次反突击。看来敌人在那里集结了大量兵力，准备向莫斯科突击。”

“最高统帅同志，我们使用哪些兵力实施反突击呢？西方面军没有机动的兵力，我们只有防御的兵力。”

“在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域可以使用罗科索夫斯基集团军的右翼各兵团、坦克师和多瓦托尔的骑兵军。在谢尔普霍夫地域可以使用别洛夫的骑兵军、格特曼的坦克师和第49集团军的部分兵力。”

“我认为，现在不能这样做。我们不能把方面军最后的预备队投入到没有把握取胜的反突击中去。一旦敌人的突击集团转入进攻，我们将无法加强各集团军的防御阵地。”

“您的方面军有六个集团军，难道这还少吗？”

“但是，西方面军部队的整个防线拉得很长，加上弯曲部目前长达600多公里。我们的纵深内，尤其是防线中央的预备队很少。”

“关于反突击的问题就这样决定了。请您今天晚上就将计划通知下去。”斯大林不满地打断了谈话。

过了15分钟，布尔加宁来找朱可夫，他说：

“我刚才也受到斥责了。”

“为什么？”

“斯大林说：‘您和朱可夫骄傲了，但是我们将设法管束你们。’他要求我马上来找你，让我们迅速组织反突击。”

* * *

于是，11月16日西方面军执行斯大林的命令，实施反突击。他们



拼尽全力和敌人厮杀。也是同一天上午，希特勒的军队转入进攻。

尽管伊·瓦·潘菲洛夫将军、阿·帕·别洛博罗多夫上校和彼·尼·切尔内绍夫将军的几个师，С. И. 姆拉坚采夫的学员团和米·叶·卡图科夫少将的坦克旅等部队顽强抵抗，但由于敌军都将兵力集中在一个狭窄地段上，所以仍然向前推进。

也就是在这一天，潘菲洛夫师的28名勇士抵抗敌人的突击，立了功。两天之后，11月28日，潘菲洛夫将军本人也牺牲在这里，在这个方向。

敌人虽然在兵力上占优势，但还是感到无法在沃洛科拉姆斯克方向推进。所以，德军在继续进攻这里的同时，把主要突击的方向转移到伏尔加水库以南。

罗科索夫斯基将军的第16集团军受到霍普纳强大的第4坦克集群的进攻，将军发现敌人沿沃洛科拉姆斯克公路的行动有所减弱，他相信，敌人一定在寻找新的地点实施突击。罗科索夫斯基在研究了地形和敌人进攻部队的部署后预见到，敌人最可能对水库以南实施突击，而我军在那里的形势是非常稳定的。罗科索夫斯基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水库、伊斯特拉河及附近一带是极好的地区，我认为，如果预先占据此地，就可以用很少的兵力组织起坚固的防御……我在全面考虑并和助手们仔细讨论后，向方面军司令（也就是朱可夫。——本书作者注）报告了自己的想法，并请求他准许我趁敌人还没有用强力把防御部队赶到那里并紧紧咬住他们、强渡伊斯特拉河和伏尔加水库时，把部队调到伊斯特拉地区。”

朱可夫没有考虑罗科索夫斯基的意见，命令他一步都不要后退，坚守所在地区。如我们看到，即使是朱可夫，有些时候也会不顾一切地蛮干，无视清醒理智，不考虑罗科索夫斯基这样经验丰富的指挥员的建议，固执己见。

罗科索夫斯基明白，如果第16集团军守不住这一地段，那么通向莫斯科的道路就会洞开，这使他这个集团军司令要承担巨大的责任，于是决定致电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在电报中说明自己的建议。他很快收到了回电，总参谋部批准他实施这个决定。但是罗科索夫斯基和他的司令部还没来得及给各部队下达相应指令，朱可夫就下达了气势汹汹的书面命令：“指挥西方面军部队的是我！我撤销把部队调往伊斯特拉水库对岸的命令，我命令坚守所在地区，寸步不退！大将朱可夫。”

这短短几行电文鲜明地展示了朱可夫的性格：他容易冲动，独断专行。但是这一回他是错的。部队没有守住水库的接近地。如罗科索夫斯基所预见的那样，敌人赶跑了这些部队，紧紧咬住后撤的部队，渡过伊



斯特拉河，在河东岸占领了登陆场。

读者在军事作品中可能不止一次见到过“紧紧咬住”这个不是军事用语的形象化说法。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一方部队在后撤，甚至在逃跑，他们已经不在壕沟里、在发射阵地上已经没有机枪和大炮，敌人用坦克碾轧他们，用机枪、大炮扫射轰击他们，直接冲进他们的战斗队形、冲进逃跑的人群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进攻一方实际上比后撤一方更早抵达下一个地区。

这正是水库地区出现的情况。要是朱可夫同意了罗科索夫斯基的建议，那么损失就可能会小一点，部队能先渡过河，在对岸设防并阻拦敌人的冲击。

11月29日，希特勒的部队在亚赫罗马地域突破了莫斯科—伏尔加运河。这非常危险，因为敌人已经突破了罗科索夫斯基的第16集团军藉以防御的水上防线。需要立即出动一切兵力来击退敌人的这一突破。

尽管各战场的情况都非常严峻，斯大林组建的预备队还是还是拯救了莫斯科。

斯大林责成朱可夫保卫莫斯科，把他当时所有的兵力都给了西方面军。但是他知道，这些兵力都还不够，莫斯科会战还没有到最激烈的时刻，斯大林在后方组建了战略预备队，共三个新的集团军：第1突击集团军、第2集团军和第30集团军。

斯大林按计划把这三个集团军集中在莫斯科附近，但是在最后关头、最危急时刻到来前不加动用。

当敌人渡过了伏尔加—莫斯科运河的时候，第1突击集团军所在地段上的危急时刻到来了。斯大林命令库兹涅佐夫说：

“敌人在亚赫罗马地域突破了防御并在运河东岸占领了登陆场，对莫斯科构成很大威胁。请采取一切措施对敌人突破防线的集团实施反突击。遏制住敌人的推进，歼灭敌人，把他们打回运河去。我责成您亲自领导反突击。”

库兹涅佐夫依靠着新的兵力完成了斯大林的命令：11月29日早8时，敌人被击败，退过运河去。

11月末又组建了一个新的集团军，即第20集团军。弗拉索夫（不错，就是那个弗拉索夫）中将被任命为该集团军的司令，列·米·桑达洛夫将军是该集团军的参谋长。这个集团军包括从东部军区来的两个新师、海军步兵旅、莫斯科防御地幅的两个步兵旅以及西方面军的两个坦克旅、一个炮兵团、两个近卫迫击炮营和一系列装甲列车。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集团军几乎没有炮兵。集团军司令部位于希姆基。

就在第20集团军和第1突击集团军集中的时候，敌人为突破莫斯



科在作最后的尝试，在这两个集团军之间的接合部实施突击，占领了红波利亚纳，前出至洛布尼亚车站及其以北地区的萨维罗夫斯克铁路。敌人的出现对于突前的第20集团军部队来说当然是没有料到的。但是，对于进攻的敌人来说，在这里遭遇到新成立的部队也是完全意想不到的。

12月2日，斯大林命令第20集团军所有已经集结完毕的部队在红波利亚纳方向实施反突击，这一命令立即得到了执行。在红波利亚纳地域，第20集团军的部队缴获了敌人运来要袭击莫斯科的几门大口径炮。

还有一个预备队集团军——第10集团军，这个由非·伊·戈利科夫将军指挥的集团军是由莫斯科军区的预备部队组建成的。其中包括重新组建的9个师，该集团军到达图拉附近的集中地域时，突围的第239步兵师和第41骑兵师也编入其中。因此，这个集团军中共有11个师，加强了在梁赞和图拉地区的莫斯科防御的南翼。全体官兵几乎都是从预备役征召来的，没有接受过很好的培训。集团军在三个星期之内组建完毕，其中的14~15天里，官兵们每天训练12小时。第10集团军是专门用来对付古德里安的第2坦克集群的。

* * *

冯·博克元帅知道，进攻难以为继。他是个久经沙场的高手，他感觉到，现在和德军作战的不只是原来的防御部队，还有一些新的兵力。他明白正在出现灾难。冯·博克几近绝望。就在这个时候，总参谋部作战部的豪辛格打来电话说：

“元首想知道，什么时候能宣布莫斯科被包围了。”

冯·博克没有和他讲话，而是要求总司令布劳希奇来接电话。

冯·博克和布劳希奇之间开始了一次有意思的对话。

博克：形势太严峻了。我把我所有的部队都投入了战斗，但是我没有部队可以用来包围莫斯科……我声明，“中央”集团军群的兵力用尽了。

布劳希奇：元首相信，俄国人正处在崩溃的边缘。他在等待您的确切报告：这一崩溃什么时候能变成现实？

博克：陆军司令部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

布劳希奇：但是要对战役的结局负责的是您。

博克：最高统帅部失算了。请报告元首，集团军群无法抵达预定地区。我们没有兵力。您听到了吗？

布劳希奇：元首想知道，莫斯科什么时候拿下？

冯·博克知道，布劳希奇要么是故意不听他的话，要么是害怕听到并向希特勒报告这个不好的消息，于是他在通话后给他发了同样内容的电报。

这就是“台风”战役的失败和不光彩的结局。

斯大林和朱可夫死死咬住敌人，不让他们有机会脱身、不给他们以喘息的机会、在中间地区站稳脚跟。从军事学术的角度看，这是非常精彩的反突击，因为我们并没有进攻所必需的优势兵力。斯大林拨出的三个新的集团军增加了西方面军的战斗力，但是在双方的力量对比中我方并没有因此具有必要的优势，希特勒军队的有生力量比苏军多 50%，大炮多 40%，坦克多 60%。

但是我们的部队，也就是那些在十分艰难的防御战中顶住敌人进攻的部队还是在前进。他们终于在这场战争中第一次向前推进了，整个部队和全体苏联人民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等了多久啊！



第四章

1942年的严峻考验

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姐妹们！
我们的陆海空军的战士们！我的朋友
们，我现在向你们讲话！

约·斯大林

1941年7月3日 37

大本营是战时的智囊团。大本营
说出的话能调动千军万马……

大本营根据需要，召见各方面军
的司令。大本营由最高统帅作最后决
策。最高统帅的命令和指示通常在斯
大林的办公室起草和作出……

格·朱可夫

一 反 攻

(对喘息时机的试探)

1941年11月29日，朱可夫给最高统帅打电话报告情况，请求他发布开始反攻的命令。斯大林听得很仔细，然后问道：

“您确信敌人已接近危机状态，不会再投入新的重兵集团吗？”

“敌人已十分虚弱。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不消除敌军楔入的危险，那德军将来可能从北方集团和南方集团抽调强大的预备队来加强在莫斯科地区的部队，那时局势就可能会严重恶化了。”

斯大林说，他要和总参谋部商量一下……

11月29日晚上，斯大林决定开始反攻，要求西方面军司令部上报作战计划。11月30日晨，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向大本营报告了对在地图上完成的、配有必要说明的反攻计划的考虑。

朱可夫在呈报这个计划的同时还给华西列夫斯基写了一张便条：“请尽快向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同志报告西方面军的反攻计划，并给予指示，以便能够着手进行战役，否则可能延误准备工作。”

这个图示计划附有进行反突击的说明。斯大林在计划上批示：“同意”，并签了名。

由此可以看出，提出反突击的是朱可夫，但是作出最后决策的是斯大林，所以，许多作者把莫斯科附近反突击的全部功劳都归朱可夫元帅是不对的。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大本营在准备反攻，在某个时候将举行反攻、为此要准备战略预备队（他们在准备之中）这个想法，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当然早就有了，但是，如果大本营根据自己的这一想法继续集中兵力，那么德军不是早已在占领的地区牢牢站稳了脚跟，就是从北方集团和南方集团抽调新的兵力。朱可夫的构想是要用现有的兵力立即转入反攻，同时他明白，通常进行的在整条战线上的全面反攻是不可能的，兵力根本不够，所以，他提出的反攻应该是（也确实是）非常特殊的。

实际上华西列夫斯基说的反攻和朱可夫说的反突击是一回事，但是



既然参加这次战役的有几个方面军和最高统帅部的空军，那么华西列夫斯基有理由把此称作反攻。但是，客观地评价当时实际发生的情况，最初毕竟并没有全面反攻，加里宁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只是在各自地段实施了一次反突击来支援西方面军。

华西列夫斯基回忆道，科涅夫听他谈到进攻的命令后声称，加里宁方面军没有兵力进攻。只是在华西列夫斯基长时间劝说后，科涅夫才答应在图尔吉诺沃实施突击，突破防御，进入敌军的后方。如我们看到的，这只是一次突击，为的是突入同朱可夫方面军作战的敌军后方，以此来动摇敌军。

莫斯卡连科元帅回忆参加反攻的西南方面军发生的情况时说：“说到在叶列茨地域对德国第2集团军进行反攻的特点，应该首先指出，反攻是从前一天晚上我军刚刚在防御战斗中撤出的地区开始的。换句话说，没有经过事先的准备和力量的集中，直接在战斗过程中开始的：头一天晚上还在防御，在后撤，今天就转入进攻。形象点说，我们昨天还在敌人的猛攻下退却，今天却要求我们转过身去攻打敌人。”

我认为，这些著名的军事首长的论断使我们趋向于赞同朱可夫的观点。问题不只是在用语的不同：朱可夫说是反突击，华西列夫斯基说是反攻；而是在于对这个概念的理解。

朱可夫依靠的一个因素就是出其不意。敌人没有预料到，苏联军队能够转入这么主动的行动。从博克、哈尔德及希特勒的其他将军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们认为红军没有兵力，所以打算安心地利用喘息时机来准备新的战役。而朱可夫却经斯大林赞同后给了他们一个意外的打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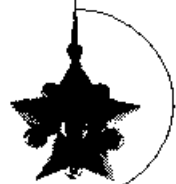
* * *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12月5日加里宁方面军（司令是伊·斯·科涅夫）实施突击、12月6日西南方面军（司令是谢·康·铁木辛哥）实施突击，同一天西方面军部队在朱可夫的指挥下对首都以北和以南敌人的主要集团实施了反突击，我军在激烈的战斗中向前推进。在一个月內，敌人被迫从莫斯科退到纳罗福明斯克—小雅罗斯拉韦茨—苏希尼奇—别廖夫一线。

1942年1月5日，大本营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讨论部队进入上述地区后接下来该怎么办。

大本营会议不作会议记录（这点和德国人不同，他们开会时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录在案）。我也没有找到任何关于这次会议的文件（除了命令）或者个人记录，所以，在这里只是略加压缩地转述会议参加者回忆的情况。

总参谋长报告了态势和拟实施的行动计划。他以他特有的审慎客观



地分析了形势，比较了双方的实力，并警告说，尽管希特勒匪徒从莫斯科后撤，但是还有能力实施强大的突击。

斯大林听着沙波什尼科夫讲话，明显感到很不满意。他看来对沙波什尼科夫的动作缓慢很恼火，斯大林认为，不只是沙波什尼科夫说话速度慢，而且总参谋部提出的行动进行得也慢。

斯大林终于打断了沙波什尼科夫的话说：

“德军由于在莫斯科附近的失利而不知所措，他们过冬的准备很差。现在正是转入总攻的最佳时机。敌人打算把我们的进攻拖到春天，这样他们就能积聚力量重新转入积极行动。他们想赢得时间，争取喘息时机。”

在座的人没有一个反对这个看法，斯大林继续他的讲话。

他一边习惯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一边说：“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了不给德国人喘息的机会，要不停地把他们往西赶，迫使他们在春天之前耗尽预备力量……”

他在“在春天之前”这几个词上加重了语气，稍停了一会儿，然后解释说：

“当我们有新的预备队时，德国人就不会再有预备队了……”

最高统帅接下来说明他是如何看待战争的前景的，并提出了各方面军的实际任务。他的想法就是这样。鉴于莫斯科附近反攻成功，他提出了在从拉多加湖到黑海各条战线上粉碎敌人的总攻目标。这次进攻应对“中央”集团军群实施主要突击；西南方面军、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左翼的部队实施对敌人的歼灭，从两面进行包围，接着在勒热夫、维业济马和斯摩棱斯克合围并歼灭敌人的主力；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西北方面军的右翼的任务是歼灭“北方”集团军群；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的部队要打败“南方”集团军群，解放顿巴斯；而高加索方面军和黑海舰队要解放克里木。要在非常紧的时间内转入总攻。

斯大林谈完自己的方案后，建议在座的人发表意见。

朱可夫要求发言，他说：

“在西方向，条件比较有利，敌军还没来得及恢复战斗力，应当继续进攻。但是为了取得进攻的胜利，必须补充人员和战斗技术装备，增加预备队，首先是坦克部队。我赞成加强西方向的各方面军，在这里进行更强的进攻。”

“我们现在还没有足以保障各方面军同时进攻用的物资。”沃兹涅先斯基支持朱可夫的看法说。

斯大林说：“我和铁木辛哥谈过，他主张在西南方向也采取行动。



要尽快打垮德寇，让他们无力在春天发起进攻。谁还想发言？”

没有人回答。

在我看来，大本营作出决策并组织实施的全面反攻正是从1942年1月5日大本营的这次会议开始的。再准确些说，甚至不是大本营，而是斯大林一个人作的决策，就像他从前很多次作过的一样。遗憾的是，斯大林在和平时期领导方式的惯性还在他的行为中继续起作用，而这是很令人痛心的，但是这一点我不能不说，否则我就不够客观。

朱可夫直截了当地指出：“在各个方面转入总攻整个这一意图当然不是总参谋部的，也不是作报告的沙波什尼科夫的。这绝对是斯大林个人的意图。”

1942年1月7日，各方面军的司令部收到了关于进攻的训令。而1月10日，各方面军的司令和指挥员们收到了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训令信。信中根据斯大林在1941年1月5日会议上讲话的精神对作战态势进行了评价，给各方面军下达了实际指示——使用突击集团采取行动和组织战略进攻。

这已经算是总攻了，斯大林为了实施反突击动用了第20、第10集团军和第1突击集团军这些战略预备队以及其他加强部队和整个空军。

在这里，我不去详细描述总攻的进程和结果，只引用两个十分熟悉情况的军事专家的意见。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说：“在1942年冬的总攻过程中，苏军消耗掉了秋天和初冬费了好大劲才组建的全部预备队，而预定的任务却没有完成。”

萨姆索诺夫院士说：“……在各主要战略方向上都转入总攻，却没有充分考虑到各个方面军的实际能力，因此失败了。”

我这么详细地谈反突击和总攻的区分这一问题，是要更清楚地表明，为什么首先是斯大林本人，后来是几乎苏联所有的军事史学家和理论家都把这两个概念“合成”为12月5日开始的反攻。

对斯大林这些行动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和平时期专制的惯性。应该说，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原因是存在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设法理解他和他的意图。斯大林不是那种不权衡“赞成”和“反对”种种意见就随便作出决策的人。

这一回他明白现实情况：希特勒的军队在多次战役，甚至是取胜的战役中损失惨重。朱可夫以现有兵力实施反突击后，希特勒的师团后退了，这就可以证明在争夺莫斯科的战斗中敌人已经筋疲力尽。有充足理由可以推断，在各方面军的总突击之下，敌人没有回旋余地，整个东线德军会迅速向西后撤，可能会一败涂地。所以斯大林设想要从波罗的海



到黑海发动总攻。这个判断有它的逻辑。但是问题在于，军事逻辑和哲学逻辑不一样，它有自己的特点、有其看不见的潜在危险。我只说一点：部队的士气和精神状态。力量对比可能对一方有利，在这种情况下逻辑说明优势在这一方，但是，部队士气不高（这正是个潜在危险）可能会导致较强大的一方失败。

在莫斯科附近反攻中，苏军的士气处在上升期，它在长时间失利后终于把希特勒的军队往回赶了。斯大林完全有理由指望这个因素。

这就是所有参加大本营会议的人都看到了的表面的东西，也是起草斯大林总攻决定的总参谋部领会到的东西。

但是，我不久前才弄清楚（我是在1999年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才看到这些文件的），斯大林还有他不为人知的、十分重要的战略打算。

斯大林以为由于苏军发动总攻，德国领导人会精神沮丧，他们看见他们的部队全线撤退会同意斯大林提出的和谈建议。

最高统帅没有就这个问题同他的统帅们商量过，甚至没有同政治局委员们商量过，所以，他们中谁也没有在口头回忆或正式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到过这一设想。

当时的形势非常像1918年签订布列斯特条约时的情景，当时列宁为了挽救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签署了屈辱性的和约。斯大林看到，德军已经打到莫斯科附近，红军损失巨大，没有预备队，只能用新的役龄青年组建新部队，但是没有武器给他们，因为一部分国防工厂在被占领区，大部分工厂在撤退中，只有从前内地的企业在生产数量不多的坦克、飞机、火炮和步兵武器，而这样的工厂也为数很少。要重建撤退到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新地方的工厂并组织生产尚需时日。

无论如何都要争取喘息时间。

斯大林下令情报部门设法与德国统帅部取得联系，以他斯大林的名义提出和谈建议，甚至更进一步（走得很远的计划）——提出根本扭转战争的格局。

当时存在着进行这些秘密谈判的现实可能性，因为早在1938年就签订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盖世太保之间合作的协议。对此现存的原件可以作证。

总 协 议

关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安全总局（盖世太保）之间的合作、互助和共同行动。

（接下来是《总协议》的九页文本，我跳过几页，只引用最后

一页。——本书作者注)

协议文本用俄文和德文各印一份，每一份都有同样效力，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盖世太保的代表签名盖章证明无误。协议的俄文文本由内务人民委员部保存，德文文本由盖世太保保存。

1938年11月11日15时40分于莫斯科

双方签名：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局长、一级国家安全政治委员级

拉·贝利亚

党卫军旅队长、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安全总局第四局（盖世太保）局长

赫·米勒

情报人员和德国“同事”接上了头，1942年2月20日双方在姆岑斯克会晤。姆岑斯克当时在希特勒军队占领区内。斯大林关于和谈的想法看来在反攻初期就有了，我方情报人员立即开始进行联系。我不知道这件事的前后经过。

斯大林亲自签署了《给德国统帅部的几条建议》。该建议一式两份，一份留斯大林那里，另一份给了进行谈判的人。这份文件看来并没打算交给德国人，这只是个大纲，列出了苏联代表作为依据的问题。但是双方看来此前曾进行过会谈，因为斯大林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像是对双方已经涉及的问题所作的反应。

给德国统帅部的几条建议

1. 从1942年5月5日6时起，战场全线停止军事行动。宣布休战到1942年8月1日18时止。

2. 从1942年8月1日到1942年12月22日，德国军队应该撤至图1标出的地区。建议按照图1标出的延伸线确定德国和苏联的边界。

3. 在双方部队变更驻地后，苏联武装力量准备在1943年底之前和德国武装力量一起对英国和美国采取军事行动。

4. 苏联愿意研究宣布两国和平、指责以英美两国为代表的各国犹太人挑起战火、在1943~1944年间实施进攻性联合战斗行动、重新安排世界空间（图2）的条件。

注：德军如果拒绝履行上述第1、2条的要求，将被歼灭，德

国作为一个国家也将从政治地图上消失。

要提醒德国统帅部应承担的责任。

苏联最高统帅（约·斯大林）

1942年2月19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的签名证明这些“建议”是由他起草的，而这些不是打印在国家机关或党机关公文用纸上的，而是打印在一张普通纸上的“斯大林式”的简短语句，既没有指明官方文书中不可缺少的执行人，也没有注明共复印几份，表明这只是个大纲。

请注意建议的日期，这正是苏军进行总攻的时候。斯大林以实力为依托同希特勒统帅部对话，还威胁一旦他们不同意将彻底歼灭他们。

但是他高估了从他认为已出现的有利军事和政治形势中捞取战略红利的可能性。德国人并没有惊慌失措。德军的代表、党卫军地区总队长沃尔夫并不像个处境窘迫的穷亲戚（这是斯大林在苏军总攻后的看法），而是信心十足，甚至表现出德国人特有的高傲。谈判持续了一个星期。最后，苏联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给斯大林呈上了如下报告。

苏联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

第1/2428号

1942年2月27日

给斯大林同志的报告

1942年2月20~27日在姆岑斯克与德国统帅部的代表、党卫队帝国长官私人参谋总部部长、党卫军地区总队长沃尔夫谈判的过程中，德国统帅部认为无法满足我方的要求。

他们向我方建议，以1942年底前现有战线为边界，停止战斗行动。

苏联政府应该立即消灭犹太人。为此，首先应该把所有犹太人迁移到远北地区，加以隔离，然后完全予以消灭。同时，当局要负责外围的治安工作和劳改营范围内严格的警卫制度。消灭（销毁）和利用犹太居民尸体的问题由犹太人自己负责。

德国统帅部不排除同我们建立反英美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沃尔夫同柏林商量后声明，如果苏联领导人接受德方的要求，德国可能在重新安排世界的过程中，把其在东方的边界作有利于苏联的收缩。

德国统帅部为了表示这些变化，愿意把国旗上卐字标志的颜色从黑色改为红色。

在讨论图2时出现了以下的立场分歧：


①拉丁美洲。应该属于德国。

②对“中华文明”的理解态度复杂。德国统帅部认为，中国应该被日本帝国占领，成为其保护国。

③阿拉伯世界应该成为德国在北非的保护国。

因此，应指出会谈出现了全面的观点和立场分歧。德国统帅部代表沃尔夫完全否认德国武装力量在战争中将被歼灭和打败的可能性。他认为，同俄罗斯的战斗还会持续几年，会以德国的完全胜利而告终。他们认为，主要根据是，俄罗斯两三年后，由于在战争中耗尽了人力和物力，不得不回到和平谈判上来，但是谈判条件将会更苛刻。

苏联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
梅尔库洛夫



斯大林是如何评价这一外交行动的？国际主义者斯大林同意勾结法西斯分子反对盟国，这种无原则的态度当然有待商榷。他本人认为，并且称这些建议对盟国是“不道德的”，就像他后来在珍珠港事件前所作所为一样。但是很显然，为了挽救祖国及全国各族人民，他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斯大林知道希特勒肢解苏维埃国家、把它变成殖民地、消灭“土著人”、“下等人”，腾出土地分给战胜国居民的意图。

斯大林没有出卖“自己的”犹太人，没有像法西斯分子那样消灭他们，尽管希特勒分子提出了非常优厚的交换条件——“建立反英美的统一战线”。希特勒匪徒“对犹太人格杀不论”的要求是斯大林不能接受的。（那些直到现在还认为斯大林是反犹太主义者的先生，请好好想一想！）

我认为，斯大林的让步和把战斗行动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进行反英美的联合战斗行动这个想法本身只是一种战术步骤，为的是赢得时间。变更部队部署和“在两国签订和平条约”后在1943~1944年间进行联合战斗行动的许诺，正如俄罗斯谚语所说的，“蜗牛蜗牛慢慢爬，总有一天会到家”。重要的是，现在要拯救国家不被侵略。两年之间，世事变化无穷，会有机会跟盟国作出解释的，不会进行针对盟国的战斗行动。我们现在主要的是稍事喘息、准备好武装力量和工业，如果德国人还胆敢继续进行战争，就更有效地击退希特勒的侵

略。总的说来，斯大林在耍手段，撒这个谎是为了拯救国家。在政治中这种做法是常见的……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明显是在投机。但是政治中的投机不是玩扑克牌时的投机或者刑事犯罪活动中的投机。政治中的投机是非凡的艺术。它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把故意展示的公开性和完全不知所以的真实的（秘密的）意图结合起来。表面上似乎很平常的行动，但是对手却看不明白。实际上这是个人的孤注一掷，是“刀刃上的”游戏，准备一旦失败就作出让步。政治家搞投机，是仍置身于可能之中来尽力争取不可能的目标。投机是建立在行为的不可预见性、不可预料性和稍纵即逝之上的，这样才能把对手逼上死路，投机者就是利用这一点为自己捞取好处。

这一尝试即使不能为斯大林固执地要求继续进攻作出辩解，也能对此作出一定的说明。他在谈判期间需要苏军千方百计地积极行动。

我们把这件事作为他的战略思维的又一个例证。尽管这是个不成功的例子，但是，如常言所说，他的意图是好的——是为了拯救祖国。

二 弗拉索夫

在莫斯科会战的日子里，开始萌生关于弗拉索夫将军的传说。在这场会战中他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相反，甚至因为生病几乎没有参加过这场会战。但是在弗拉索夫投入希特勒匪徒的怀抱，开始觊觎“俄罗斯各民族解放者”的角色之后，他就要有一个光彩的履历。于是有人开始为他杜撰爱国功绩。有一位非常有才能的编撰者写了一本关于他的书，其中把他写成莫斯科的主要保卫者。

我想，既然我们将不止一次涉及这个人物，那必须在杜撰神话一出现时就把情况说清楚。

我第一次听说弗拉索夫是在战前，当时我还是塔什干列宁步兵学校的学员。在苏芬战争失利之后，新任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元帅发布了进行战斗训练的命令，其基本思想是培训在战场上、在接近于战斗环境的条件下所必需的素质这一原则。这意味着，我们很大一部分学习和生活时间将在野外度过。

学员们开始了无休止的训练，挖掘掩体，长距离的日夜行军，在野战条件下独自煮食物（粥）或一连几昼夜只吃干粮。纪律像螺帽一样被拧到了不能再紧的程度：请假外出迟到几分钟就被关禁闭，迟到几个小时就送军事法庭。甚至在我们这样的从事培训的军校里，一些学员也受不了这种近似于非人折磨的严格要求，自杀的事时有发生。

在这种非人的条件下，弗拉索夫将军以残忍闻名。在红军部队秋季检查时，他的第99步兵师被认为是陆军中最好的部队……

也许不难想像，在那种极端艰苦的训练条件下得以闻名的将军会是个什么样的人。

当时弗拉索夫获得了列宁勋章。弗拉索夫在演习中的严格要求让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深受感动，当场就奖给他一个金表。《红星报》刊登文章，赞扬和宣传这位最好的师长恪守不渝的严格要求。第99步兵师得到了工农红军的流动红旗。

当时认为弗拉索夫出身像水晶般十分纯洁，是党内的模范军官。其实他有过一个污点：他年轻时候曾打算做神父，在下诺夫哥罗德的两年制正教小学毕业，然后进了正教中学，在那里又学了两年。但是谁会因这一点指责这位将军呢？总书记斯大林本人也曾经是正教中学的学生。这个相似点可能对弗拉索夫的威信只有好处。各种评语和鉴定都着重指出他在政治上成熟和对党忠诚。他本人在自传中写道（就在1940年）：

“我于1930年加入联共（布）……多次当选为学校 and 团的党委委员。做过校报编辑。积极参加社会工作，曾被选为军区军事法庭成员。”

值得注意的是，镇压最严酷的年代（1937~1939年）他在军事法庭工作。我没有这位未来的反布尔什维主义斗士具体判决并处死了哪些因从事反苏活动的人的材料，但是也许人不会少，因为在那些年中判处极刑——枪决是很平常的事（因为我没有时间，手头也没有文献，寻找档案和说明弗拉索夫的这个活动侧面留待其他研究者去做）。

弗拉索夫在结束对他的党内活动的描写时说：

“我没有受过党内处分。从来不是也没有参加过其他党派和反对派，从来没有过动摇。我一贯坚定地维护党的总路线，并为之奋斗。从来没有被苏维埃政权机关审判过。从未出过国。”

总之，他是个水晶般纯洁的、绝对忠诚的共产党员。关于“从未出过国”这一点，弗拉索夫没说真话。他曾经在国外呆过，在中国呆了一年多，即从1938年9月到1939年12月。

关于这一点，我有一份很有意思的文件：

秘密

证 明

内务人民委员部情报处对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上

校出国工作的候选资格做了审查。现收到1938年8月11日第167号审查报告，没有表明他不合格的材料。

一处处长

鲁勉采夫上校

1938年9月21日

弗拉索夫究竟执行了什么任务，这一点要留待其他作者去查明。在结束谈弗拉索夫生平中这件事时，我只想指出，他曾签名保证不外传，所以他法律上有权不谈执行什么任务。但是，我要补充一点，请读者自己思考。情报处用了弗拉索夫一次后，为什么没有把他留下当骨干，而是给他写了一个对党忠诚的好鉴定，如常所说平心静气地送他回部队去了。鉴定的结论是这样的：“弗拉索夫同志在出差期间能胜任工作。”

我在这个受人尊敬的部门任职不止一年，所以我知道，进入这个情报局是非常难的，但是离开就更难了。当一个军官经过最初考验后被送回部队，这之后等着他的可不是什么好事。

我谈这一点，并不是因为通常都是这样描写叛徒的，不，不是的。事实本身会说明弗拉索夫为什么会在情报机关中呆不下去了。

我们再回头看他在部队任职的情况。鉴定介绍说，弗拉索夫将军被任命为第4机械化军军长，然后是为保卫基辅进行艰苦战斗的第37集团军的司令。

因此，弗拉索夫不能抱怨说他职务晋升困难。相反，这是令人眩目的飞黄腾达：指挥一个师不满一年（1940年1~10月），指挥一个军不满一个月（1941年6月22日~7月13日），从1941年9月开始指挥第37集团军直到基辅陷落。然后突出包围圈，在11月被任命为西方面军所辖保卫莫斯科的第20集团军司令。

西方和我国的出版物关于这一时期弗拉索夫的“统帅活动”写得很多。

我不想连篇累牍地去驳斥这些子虚乌有的传闻，只引用几个文件来一笔勾销这些倾向性严重的臆造。当时任第20集团军参谋长的桑达洛夫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弗拉索夫只是被任命为司令，但实际上在莫斯科保卫战的第一阶段他并没有指挥该集团军，而是远离前线，躺在战地医院里。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自然会询问上级机关：司令什么时候到任？下面就是其中的一个复电：

致红军总干部部部长

弗拉索夫少将由于中耳持续发炎，动身不会早于11月25~26日。

西南方面军参谋长 博金

西南方面军军事卫生部 别利亚克

桑达洛夫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任命他为第20集团军参谋长的时候，他问沙波什尼科夫元帅说：“那谁担任集团军司令呢？”

“由不久前突围的西南方面军第37集团军司令弗拉索夫将军担任，”沙波什尼科夫回答道，“但是，请注意，他现在生病。最近一段时间他来不了，您得自己……”

因此，1941年11月，即在莫斯科会战的防御阶段，弗拉索夫实际上没有指挥第20集团军。集团军在这个月中刚刚组建，还留作大本营的预备队。

沙波什尼科夫说弗拉索夫“最近一段时间”来不了，实际上这拖了很长时间，一直拖到整个莫斯科反攻时期。

桑达洛夫将军这样描写弗拉索夫第一次到集团军司令部的情景：

“科罗利师、列米佐夫和卡图科夫的军群突击迅猛，使敌人遭受重创，他们击溃了敌人的防御部队，迫使他们后退。

Ф. П. 科罗利的第331师在紧逼向沃洛科拉姆斯克撤退的敌人的同时，用滑雪队突击敌人的翼侧，于12月19日上午接近沃洛科拉姆斯克东郊。

12月19日中午，集团军开始在契斯美纳村建立指挥所。当我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库利科夫在通讯枢纽里查找部队的最新位置时，集团军司令的副官进来报告我们说司令来了。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一个戴墨镜的高个子将军从停在房子旁边的汽车里走出来。他穿着毛皮的旧式男大衣，领子竖着，穿着皮底的细毡靴。他就是弗拉索夫将军。他走进通信枢纽，在这里我们第一次见了面。我在地图上指出部队的位置，报告说，方面军司令部对集团军进攻速度缓慢非常不满意，把第16集团军的卡图科夫所部派到沃洛科拉姆斯克来支援我们。库利科夫补充说，朱可夫大将说集团军司令指挥部队不力，要求司令本人在作战文件上签字。弗拉索夫一声不吭，双眉紧锁，听着报告。他让我们重复了几次，推说由于耳朵有病他听不清楚。然后，他脸色阴郁地向我们嘟囔说，他现在感觉好一点了，一

两天后就完全管起集团军……

晚上，列米佐夫将军所部和海军旅占领了普什卡里的城郊，前出至沃洛科拉姆斯克的西北郊。稍晚些，科罗利的第331师的西伯利亚士兵在卡图科夫将军所部坦克手的协同动作下逼近了城市的东郊和东南郊区。夜里开始了对该城的强击。”

从上面可以看出一点：弗拉索夫和攻克沃洛科拉姆斯克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他根本没有在那里，也没有指挥过集团军。

至于说后来被归功于弗拉索夫的解放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据桑达洛夫将军说，这是在弗拉索夫12月19日第一次到来并迅速离开之前很久的事，这个城市是在12月12日被解放的。

可能有人会反驳我说，弗拉索夫将军因为保卫莫斯科的战斗被授予红旗勋章！这是真的。这是因为：所有集团军司令都因为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被列入授勋名单。这个名单中有弗拉索夫并不是因为他的功绩，而是因为他的职务。

而这个名单中却没有朱可夫，他没有因为保卫首都的光辉胜利以及后来的决定性反攻而被授勋。（名单中没有他。——本书作者注）

朱可夫作为西方面军司令，起草了这个集团军司令的名单，他不能把自己的名字写进去。

最高统帅斯大林也没有因为取得这个伟大战斗的胜利而被授予勋章。显然，当时顾不上……

三 挑选能干的战友

斯大林在反攻的日子里依靠朱可夫、沙波什尼科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但与此同时，他也在寻找新的强人。叶廖缅科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妨想一想斯大林在派叶廖缅科解救被围的西南方面军时说的话：“这就是我们在这种形势下需要的人！”

但是，斯大林显然看错了叶廖缅科。在挑选安德烈·瓦西里耶维奇·赫鲁廖夫担任武装力量后勤部长的时候，斯大林如常言所说正中靶心了！

在当时的情况下，在进攻减弱的时候，最合理的就是在已占领的地区站稳脚跟，转入严密防御，拖垮敌人，集聚自己的预备力量。何况在这个时候，不只是许多国防工厂已经从被占领区撤退至西伯利亚和中亚，而且还在重建。这些工厂开始生产新组建部队非常急需的装备。

赫鲁廖夫将军是斯大林在这个复杂而又非常重要的工作中的最亲密

战友，他的名字和后勤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

选中他不是偶然的。斯大林通常长时间观察一个人，主要是在工作中考核他，然后接近他，把他放进自己的班子里，给予他极大的信任。

斯大林在战争过程中观察、提拔和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统帅：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和巴格拉米扬等人，他们全都是他亲自提拔的。斯大林支持他们，不计较他们的过失，对成绩给予奖励，但是一直对他们严格要求。

赫鲁廖夫就是这批人中的一个。他这样回忆自己仕途生涯中转折性的一天：

“我请求斯大林说，是否可以不让我干。他问我为什么我不接受这个建议，对此我回答说：‘由于梅赫利斯已认定要千方百计铲除我，他会利用这一点，开始中伤我。’

斯大林笑了笑，说道：

‘瞧，没有比猫还凶的野兽了。’

‘每个人都有他害怕的野兽，而对我来说，梅赫利斯就是可怕的野兽。’我对斯大林说。

于是他开始问我，为什么我认定梅赫利斯一定会整我。

我是这样回答的：

‘去年您在政治局研究我的问题时，梅赫利斯大发雷霆，使劲游说其他人，说我涉嫌军事法西斯阴谋。您建议我讲清自己在这方面的活动。但是由于我没什么好说的，大家就都相信我是个正直的人，就劝梅赫利斯和叶若夫放过我。后来，在我动身前去找梅赫利斯时，他对我说：“感谢伏罗希洛夫吧，他以自己的威望保护了你，不让我做我该做的事，但是我告诉您，我会尽一切所能实现我的（就是梅赫利斯的）愿望。”’

于是斯大林针对我的怀疑和不同意见说道：

‘那好吧，如果我和您一起跟梅赫利斯斗呢，您认为，我们能对付得了他吗？’

我坦诚地说：

‘按逻辑说似乎能行，但是您要知道，梅赫利斯可是那种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人，任何情况下他都能摆脱困境。’

斯大林冷笑说：

‘他能把我和您一起都打败吗？’

‘他不能打败您，但能打败我。’

但是决定还是作出了。任命我为红军供应部长……”

天才的军需组织者赫鲁廖夫在整个战争期间出色地履行了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的职责，保障了部队所有必需的供应。

赫鲁廖夫是个有学养的知识分子，他对斯大林工作的观察对我们很有用。

下面是他的回忆：

“大本营是什么？大本营就是斯大林（不包括他的秘书处中的任何人）、总参谋部（他经常召见带上地图的总参谋长或其助手）和整个国防人民委员部。这实际上就是大本营。

他召见某个方面军的部队司令说：

‘我们希望给你们下达实施某一战役的训令。为此你们需要什么？’

那个人回答说：

‘请允许我和司令部商量一下。’

‘请去打高频电话。’

斯大林掌握的通信手段就是一部电话，但是一切都连接在这部电话上，包括高频通信。他的办公室里没有无线电台、电报站，什么都没有。电报在总参谋部和邮电人民委员部里，总参谋部还有无线电台，但是斯大林从来不去什么地方用这种设备。他根本哪里也不去。比如，他下午4点来到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开始召见人。他提出一个名单，要召见哪些国防委员会委员。他没有事先召集他们，他来了之后，波斯克列贝舍夫才开始一个个打电话。

您也许以为是斯大林召开会议，提出议程，开始讨论这一议程等等。根本不是这样的！一些问题是他本人提出的，另一些问题是他在讨论过程中想起的，他马上就召见人，这个问题跟赫鲁廖夫有关，把他叫来；这个和雅科夫列夫有关，把他找来；这个涉及到佩列瑟普金，把他叫来。然后给所有人分配任务。此外，所有的国防委员会委员都负责一定的工作范围。例如，莫洛托夫管坦克，马林科夫管飞机，米高扬负责给养军需供给和燃料供给，他还管租借法。

在一天的时间内作出几十个决定。国防委员会从来不是逢星期三或星期五开会，只要斯大林来了，每天的任何时间都开会。整个国家机关和军事机关的生活都非常繁杂，所以没有人离开自己的岗位。

例如，斯大林可能在4点来，也可能8点来。今天他晚上11点结束工作，而第二天早晨8点就来上班了。



我在高尔基大街的办公室里有一部克里姆林宫的‘机子’。晚上电话响起，你也得接电话。

‘您怎么还没睡觉?’

我回答说：

‘对不起，您打电话，就是说您认为我应该还没有睡。’

所有人都一直在自己的岗位上。所有的人都被组织得能迅速获知情况。

在会议上不作任何速记记录、记录，也没有技术人员。不错，后来斯大林指示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雅·叶·恰达耶夫作一些记录，开始请他参加会议。

斯大林经常看都不看就签署文件，直到你在某件事上做错了为止。一切都建立在巨大的信任之上。但是一旦他确信这个人是个骗子，他骗过人，耍过心眼，那么这个人的命运就决定了。

我给斯大林签署过几千份文件，但是起草这些文件时每个字母都要斟酌。

还要指出的是，如果你有非常重要、不能耽搁的事情，可以未经邀请直接到斯大林的办公室去。我这样做过不止一次，从来没有被他赶出来过。他也没有赶过别人。

你得坐着听他说。他稍一停顿，我通常就会说：

‘我有一个问题。’

‘请坐。’（这就是说，他准备研究这个问题。）

经常有一些意外事情。空军要求220万吨高辛烷值汽油用于骨干培训，而我们最多只能拨给他们70万吨。国防人民委员部燃料供给局的B. B. 尼基京上将证明说，赫鲁廖夫给的汽油太少，我们没法完成国防委员会批准的培训飞行员的计划。我向斯大林报告说，我们的汽油储备不允许给他们超过70万吨的汽油，此外，我们已经确定了汽油分配计划，上面写的就是70万吨，而现在我们就得重新研究计划。

斯大林什么也没有说，他叫来波斯克列贝舍夫，说：

‘好吧，把米高扬叫来。’

米高扬来了。斯大林对他说：

‘飞行员们要求220万吨高辛烷值汽油，而赫鲁廖夫同志只给了他们70万吨，我们能满足飞行员们的要求吗?’

‘能。’

我马上对米高扬说：

‘拿什么给?’



‘我还有。’

‘不，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再也没有了。我把我们计划能从美国得到的全部汽油都列入了计划，15%~20%的油船出事，被德军击沉了。我这一切都计算过。’

斯大林插进来说道：

‘你们吵什么，米高扬管这件事，他清楚。’

我回答说：

‘不，斯大林同志，他不管这件事，不了解情况，我现在就跟他解释他办不到。’

斯大林问道：

‘实际情况怎么样？’

我解释说：

‘在这个计划中大本营有50万吨储备。您可以分配大本营的储备。’

‘这么说，我就没有储备了？这不行。’

我们就各自离去。这次谈话后，米高扬叫来燃料供给局局长М. И. 科尔米利岑：

‘请增加50万吨汽油。’

后者回答说：

‘我一点都增加不了。’

米高扬说：

‘您给赫鲁廖夫打电话，让他去办。’

‘用不着给赫鲁廖夫打电话。’

科尔米利岑回来后，到了我这里，讲了前后经过：

我说：‘如果他命令你，你就办。’

我没有看到过有谁反驳斯大林说这样做不行，但是我反驳他的时候，他说：

‘这个人怎么这样，真是死脑筋，总是固执己见。’”

斯大林早在战前就看中了赫鲁廖夫，在进行我上面所说的不成功的反攻的时候，斯大林就依靠他提拔上来的这个人，力图扭转形势。

“波斯克列贝舍夫把能找到斯大林的电话给我，建议我亲自跟他通话。我给斯大林打了电话，他对我说，他是因为情况紧急，也就是因为铁路运输的形势危急才把我从前线召回。他马上告诉我说，为研究铁路工作的问题成立了由国防委员会委员组成的委员



会，他认为要把我也纳入这个委员会。我请求不要把我也纳入，至于说参加委员会的工作，我可以完成任何任务，但不是作为委员会的委员。但是，一个小时后我收到了国防委员会（这是在3月14日）的决议，其中说：‘增补米高扬和赫鲁廖夫参加交通人民委员部五人领导小组。’”

赫鲁廖夫继续说：

“在谈关于我参加委员会一事的时候，斯大林一次也没有提过拉·莫·卡冈诺维奇的工作，他尽力跟我讲他对铁路交通的现状、运输现状的看法。说起雅罗斯拉夫尔铁路、北方铁路和喀山铁路被列车阻塞时，看来他对情况已经非常了解了。而斯大林格勒、奔萨、古比雪夫、梁赞-乌拉尔、南乌拉尔等铁路几乎处于瘫痪边缘，不发出也不接收火车。

铁路交通中的危急状况是因为铁路工作逐月恶化造成的，只不过交通人民委员卡冈诺维奇看来没有报告已酿成的危机，实际上铁路交通确实已经瘫痪。但这不是因为人们不会工作，也不是他们不明白甚至不想明白正在发生的情况。

铁路运输工作急剧恶化，主要是因为交通人民委员不采纳交通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任何建议。而这些工作人员提出了不少摆脱困境的宝贵建议。对运输工作人员的这些建议，卡冈诺维奇除了歇斯底里发作，没有别的回答。

在国防委员会的这个委员会工作期间，我看到了卡冈诺维奇、贝利亚、马林科夫和其他委员之间的争吵。而卡冈诺维奇的论据只有一个：‘你们根本不懂铁路运输工作，给不了我什么好建议……’在委员会工作期间斯大林找过我两次。第一次是建议我出任交通人民委员，因为这对军队有好处。我尽力推辞这个建议，说军队没有人担任交通人民委员也可以为自己提供保障，而斯大林回答说：‘您没明白这个问题的实质。’

第二次谈话更坚决、更具体了。当委员会的人都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里，在同委员会成员之一的第一副交通人民委员Б.Н.阿鲁秋诺夫谈保障铁路燃料问题（他主管这个问题）时，晚上8时左右，阿鲁秋诺夫办公室的电话响了。斯大林本人让我接电话，他对我说，今天他在政治局里建议任命我为交通人民委员。我再一次请求他不要这样做，因为我的威望不高，管不了铁路大军，我很难应付得了这么大的部门。如果卡冈诺维奇作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防

委员会委员都还不能胜任这项工作，那我怎么能胜任呢。

斯大林开始说服我，他说，您只要好好工作，就什么都会得到，而且他保证会帮助我，还问我：

‘怎么，您不相信我会帮助您？’

我回答说，这些我都相信，但是还是请不要任命我担任交通人民委员，对此斯大林说：

‘您认为，我会同意用贝利亚一直使劲推荐的阿鲁秋诺夫吗？我从来没有同意过这一人选，但是我认为，您拒绝我的建议是不尊重我。’

我接着请求斯大林不要再考虑任命我为交通人民委员这个想法了，斯大林用很生气的语气再一次说道：

‘也就是说，您不尊重我……’

我再找不到拒绝和反对任命我为交通人民委员的借口了，我问斯大林说：

‘谁来做红军的后勤部长呢？’

他回答说：

‘您还是后勤部长。因此您做交通人民委员才合适。您同时也做后勤部长，可以利用人民委员的权力来首先保障作战部队。’

同一天，也就是1942年3月25日，12点整，我收到了任命我为交通人民委员的决定。也几乎是同时卡冈诺维奇打电话来，要求我马上到交通人民委员部他那里去。我来到交通人民委员部，接收了桌子的钥匙和交通人民委员坐的椅子，没有任何仪式就任了新的职位。整个交接程序在15分钟内完成了。

我就任交通人民委员后，斯大林邀请我去他的别墅，政治局委员们几乎都在那里。我找个时机，走到斯大林身边对他说：

‘我不太清楚1938年时对我的态度。梅赫利斯和另一些人要求逮捕我，而现在把我任命为交通人民委员。反差太大了吧！’

他大致是这么说的：

‘梅赫利斯在1937年底一来到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就叫嚷说您是敌人，说您参与了军事法西斯阴谋。夏坚科起初维护您。那个库利克紧跟着说：“我不相信。我认识这个人好多年了，我不相信他参与了什么反苏反革命事件。”但是您知道我的处境：梅赫利斯叫喊“敌人！”夏坚科后来也附和他，他说，您还记得政治局解决这个问题时的情况吗。我问伏罗希洛夫怎么办，伏罗希洛夫说：“现在就是这种时候，今天这个或者那个人受到怀疑，跪着哭，发誓没有参与任何阴谋，没进行过任何反苏和反党的活动，明天就在

笔录上签字画押，承认一切……”’

我后来把整个谈话告诉了伏罗希洛夫，他生气说：

‘不是这样的。要是我当时犹豫了，您早完了。’

我知道，如果在任命我为交通人民委员这种重要职务前没有提出这些问题，梅赫利斯就会说：‘你们把谁放到了人民委员的位子上？他是个叛徒、敌人，他会利用把他放到这个高位的机会，把国家置于危难境地。’

我的处境怎样呢？给了个重要职务，还留任红军后勤部长，有人会说：您两面都管。而当时国内经济状况非常糟，加之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国内我的声望都非常低，谁也不知道我。

我也对斯大林说了这一点。他回答道：

‘好吧。中央委员会会做让您获得相应声望的必要的事。’

顺便说一句，当我否定梅赫利斯，认为他进行了大量反对伏罗希洛夫的活动的时候，我是有充分理由的。

在苏芬战争结束后，召开了党中央委员会全会，总结战争，讨论我国武装力量的现状。在这次全会上，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作了军队现状的报告，把红军的现状描绘得令人非常悲观。他得出结论说，这都是他伏罗希洛夫的过错，所以请求党中央委员会解除他人民委员的职务。可是他已经领导国防委员会15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任何人都可能失去敏锐的接受能力，工作中的不足是普遍现象。

在伏罗希洛夫讲话后，梅赫利斯接着发言，开始向他发难：‘不，同志们，我们不能让伏罗希洛夫就这样脱身，应该严厉地惩罚他。总之，哪怕是逮捕也不为过……’

当时斯大林保护了伏罗希洛夫。”

四 1942年的冬季战局

战争头六个月两军都筋疲力尽：德军从边境一直推进到莫斯科，苏军在同一区域进行防御战。

1941年6月22日，冯·博克元帅率领强大的“中央”集团军群踏上苏联领土，集团军群有51个师，其中有9个坦克师和6个机械化师，而12月3日，这位元帅从炮队镜里观察莫斯科，请求元首哪怕给他补充几个有战斗力的营……

苏军也已竭尽全力，只凭一股高昂的斗志挡住了敌人的猛攻。



最高统帅斯大林对能否守住莫斯科曾经有过疑虑，但在反突击成功的影响下又雄心勃勃，甚至决心发动从拉多加湖到黑海的总攻。

但冬季进攻并没有取得重大成果，斯大林指望的停战也没有达成，但却成功地使日本保持中立，避免了在东部开辟第二战场。

到1942年4月前，各个方面军都停止了积极的作战行动。

斯大林在总攻失败后对苏军的行动有怎样的全面战略意图呢？

斯大林确信我们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兵力和武器开展大规模的进攻战役。他认为近期内应只限于作积极的战略防御。他同时认为必须在克里木、哈尔科夫地区、利戈夫-库尔斯克方向和斯摩棱斯克方向以及列宁格勒和杰米扬斯克地域进行一系列进攻战役。

可以认同最高统帅的战役战略预测，但他预定的我方面军进攻战役的数量却引起我们的怀疑：这么多战役毫无特殊成效却会消耗掉我们的预备力量，并因此使我军难于为夏季战局的下一次总攻作好准备。

应该指出的是：最高统帅被莫斯科附近的胜利所鼓舞，仍指望在某一方面击溃德军，把局部胜利发展成大规模的进攻。

* * *

现在简单地提一下斯大林预定的这四次局部战役的结局。

关于克里木的战斗我在《统帅》一书中作了十分详细的介绍。克里木战役开始很顺利，登陆兵先后在刻赤、费奥多西亚和叶夫帕托里亚、苏达克上陆。在短时间内组建了由第44、第51和第47三个集团军组成的克里木方面军。这无疑让斯大林很高兴。

在克里木与苏军抗衡的是施波内克伯爵指挥的第42军和曼施泰因的第11集团军，后者全神贯注于强攻塞瓦斯托波尔。

希特勒由于第42军放苏军登陆兵在克里木登陆而把施波内克送上法庭，法庭判处他死刑（不过后来取消了）。元首坚决要求曼施泰因在克里木重整秩序。

曼施泰因不愧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将领。在如此危急的情势下他对局势作了正确和客观的评估：

“1942年1月头几天对在费奥多西亚登陆和从刻赤进逼的敌军来说，实际上已打开通往第11集团军的生命线，即占科伊-辛菲罗波尔铁路的道路……如果敌人利用这一有利形势，迅速追击从刻赤撤出的第46步兵师，并痛击随后从费奥多西亚撤出的罗马尼亚人，那么不仅对这一新开辟的东线地段来说局势毫无指望，而且也将决定整个第11集团军的命运……但敌人未能抓住有利时机。敌人指挥部或者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时的优势，或者不敢马上利用



这些优势。”

于是，曼施泰因掌握了主动。他首先建立了战线，遏制了我军的进攻，而后看到我军指挥官无所作为，于是显露峥嵘，取得了不少胜利。曼施泰因对发生这一切的背景作了如下评价：

“敌人在刻赤战线依然保持着第44和第51两个集团军。到4月末其总数达到17个步兵旅、2个骑兵师和4个坦克旅，即总共26个大兵团。第11集团军司令部能与之抗衡的德军不超过5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师……由于罗马尼亚兵团（不足三个师。——本书作者注）只可有条件地用于进攻，在策划的代号为‘捕鸮’的战役中兵力对比实际上更差。何况在帕尔巴奇地峡只能从正面进攻。两片海域排除了一切翼侧机动的可能性。另外，敌人组建了纵深很长的梯次配置的防御。怎么能够在这些条件下和在敌我兵力对比为2:1的情况下歼灭敌人的两个集团军呢？”

为了公正起见，必须加以纠正的是：这里有我们的三个、而不是两个集团军：С. И. 契尔尼亚克中将指挥的第44集团军、К. С. 卡尔加诺夫少将指挥的第47集团军和利沃夫将军的第51集团军。

曼施泰因明白他在黑海和亚速海之间狭长的地峡从正面突击众多的敌军部队将一事无成。此时需要发挥军事学术水平，找到某种出人意料的决定，依靠他所拥有的某些因素。这一切他都找到了。

首先，出敌不意。克里木方面军司令部由于在兵力上占优势，不相信德军可能进攻。其次，曼施泰因在地峡南部，沿黑海海岸发起佯攻，而对中部的一个集团军的突出阵地实施主要突击，实际上是沿正面以坦克师的兵力击破整个防御，直插亚速海。第三，曼施泰因利用的不仅是出敌意料，还有自己部队的机动性和良好的可控性。曼施泰因在5月8日到18日的10天里肃清了刻赤半岛上的敌人，歼灭了苏军三个集团军，只有坚守阿吉姆乌什凯采石场的指战员从1942年5月16日到10月31日英勇地进行了防御。

应该明确指出，斯大林对克里木惨败并没有过错，是那些无能蠢材让他大为恼火，尽管在兵力上占压倒优势，他们却抵挡不住曼施泰因少得多的兵力的进攻。斯大林也对这些罪人给予了应得的惩罚。

有两份很有说服力的文件保存了下来。其中一份是梅赫利斯1942年5月8日发给最高统帅的电报：

“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但我必须报告，好让大本营了解方面军司令。科兹洛夫在5月7日，也就是敌人进攻前夕，召集军事委员会讨论未来夺取科伊-阿桑的战役方案。我建议搁置这个方案，并马上就敌人可能的进攻对各集团军作出指示。

方面军司令签署的命令有几处指明，敌人可能在5月10~15日进攻，命令在5月10日以前制定完毕集团军防御计划并交全体指挥人员、兵团司令和司令部研究。而此时当天的一切情况都表明敌人会在早晨发动进攻。在我的坚持下方面军纠正了错误的时间表述。科兹洛夫还阻挠向第44集团军地段补充兵力。”

这位大本营代表推卸责任的企图没有躲过斯大林的眼睛，他回电说：

“您的立场很奇怪，成了对克里木方面军失败不负责任的旁观者。这一立场非常方便，但糟糕透顶。您在克里木方面军不是旁观者，而是对方面军一切成败负有责任并有责任就地纠正司令部错误的大本营负责代表。您与司令部一起为方面军左翼如此不堪一击承担责任。既然‘一切情况都表明敌人会在早晨发动进攻’，而您却没有采取一切措施组织反击，只限于消极的批评，那么这对您更糟。也就是说，您还不明白，您不是作为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而是作为大本营的负责代表被派到克里木方面军去的。

您要我们用兴登堡一类的人来替换科兹洛夫。您不应该不知道，我们可没有预备什么兴登堡。您在克里木的事并不复杂，您自己满可以对付得了。如果您不把强击航空兵用在次要方面，而是对准敌人的坦克和有生力量，敌人就不会突破方面军，坦克也不会通过了。在克里木方面军呆了两个月，用不着成为兴登堡，也能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

由于刻赤惨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梅赫利斯被撤销副国防人民委员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降至军政治委员级；方面军司令科兹洛夫中将和师政治委员级沙马宁被撤职并各降一级；方面军参谋长被撤职；集团军司令契尔尼亚克中将、卡尔加诺夫少将和方面军空军司令尼古拉延科空军少将都被降为上校。

冬季战局的第一次局部进攻战役就这样结束了。

* * *

最高统帅策划的下一个局部战役是通过形成特殊的坎尼，即从南边



的巴尔文科沃和北边的沃尔昌斯克两个方向突击包围哈尔科夫的敌军集团，以解放哈尔科夫。

1942年3月末一次有沙波什尼科夫、铁木辛哥、伏罗希洛夫、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赫鲁晓夫参加的大本营例行会议进行得相当激烈。沙波什尼科夫谈起必须只限于积极的防御，不应把主要的预备队投入战斗，而应将其集中于中央方向和沃罗涅日方向。

他转而谈主要问题，说：“至于西南方向的进攻战役，总参谋部坚决反对。首先是没有足够的预备队打这场仗，并且从巴尔文科沃突出部这个战役包围圈发动进攻也相当冒险。”

斯大林打断他的话说：“那我们就抄起手来防御，坐等德国人首先实施突击。我们自己必须在宽大的正面实施一系列先敌突击，摸清敌人的准备情况。朱可夫建议在西方展开进攻，而在其他方向上实施防御。我认为这是个治标的办法。”

铁木辛哥站起身来，充满信心、非常清晰地说道：

“我军现在有能力并绝对应该在西南方向上对德军实施先敌突击，打乱敌人对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的进攻计划，否则将重蹈战争初期的覆辙。我也支持朱可夫的建议。这会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伏罗希洛夫立即表示支持铁木辛哥，朱可夫则支持沙波什尼科夫，坚持只能由西方面军发动进攻。

斯大林越来越恼怒，他对进行哈尔科夫战役的坚决要求也开始具有命令的形式。但他不想独自作出这种决策。

“华西列夫斯基同志要对我们说些什么呢？”他转向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说。

“我的看法和沙波什尼科夫元帅所说的总参谋部的看法一样。我只想强调指出从巴尔文科沃突出部进攻有危险。”

斯大林不满地说：“好吧，很难听到沙波什尼科夫学派另外的声音，方向指挥部还坚持发动战役吗？”

“我们坚持并强烈请求。”铁木辛哥和赫鲁晓夫说道。

“好。就到这里。总参谋部在一天后起草好所有建议，以后战役算方向指挥部的内部事务，不得进行干预。铁木辛哥和赫鲁晓夫同志，你们只能靠自己的兵力了……”

华西列夫斯基在4月30日向斯大林呈送了《1942年4~5月西南方向部队作战计划》，计划对歼灭哈尔科夫敌军集团以保障南方面军部队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下一步作战行动以及南方面军在巴尔文科沃-斯拉维扬斯克-伊久姆地区建立牢固防御作出部署。

斯大林问道：“您还是不同意方向指挥部的意见吗？要是铁木辛哥



打胜了，您会觉得怎样？”

“我会为此感到非常高兴。要是打败了呢？”华西列夫斯基反问道。

“我和您都要来防止失败。要干得更多，而您的气色又不好。您过得怎么样？”

“我在格拉诺夫斯基街有一套挺好的房子。”

“您在哪里休息呢？”

“休息也在那里，但更多是在大本营楼里的总参谋部。我的办公室旁边有一间不错的休息室。”

“您在郊外没有别墅吗？”

“战前两年家里人夏天住过国防人民委员部在孔采沃的别墅，我没去那里住过……”

（以下我转述C. 库利奇金《总参谋部预计……》一书中的情节。）

几天后波斯克列贝舍夫传达了斯大林的命令，查看谢通河畔的沃伦别墅区并从中挑选一座别墅。当天他们就出发前往别墅区，那里位于距市中心仅15分钟车程的风景胜地。不远处是斯大林的别墅。绿树环绕的舒适小屋宛如童话里的一般，出奇的寂静和安宁可以让人得到真正的休息。华西列夫斯基尽管明白自己未必有福享受，却也掩饰不住喜悦。别墅区管理员当即装上新锁，交了钥匙，交代了一番警卫信号和通行证制度。

“祝您休息得愉快。请常来。”他低声说道。

“那倒是好。”华西列夫斯基不无怀疑地说。

他的怀疑完全应验了。他依旧大部分时间昼夜呆在总参谋部里。4月的一个晚上他总算决定去别墅过夜。他知道斯大林不会在早上10点钟以前起床，便不慌不忙，喝起乡村的奶茶来。电话铃响了起来。

“斯大林同志找您。”电话里响起了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声音。最高统帅立刻插话说：

“华西列夫斯基同志，您在别墅里还没有住熟，就已经呆着不想动了，这不合适。晚上您可以在别墅里睡觉，工作时间请到总参谋部来。我们有一项重要任务要交给您，您能不能马上过来？”

“是！”华西列夫斯基不好意思地回答说，一边低声骂着，一边迅速收拾起来。

“你干嘛要这么难受？”妻子安慰他说，“不过在别墅里过了一夜……”

“这才窝囊呢，只呆了一夜就被抓住了。去他的别墅吧。不来这儿就好了……”

在这个春天里还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成为华西列夫斯基仕途中



的一件大事。

斯大林在国防委员会会议和其他会议上不止一次地代表大本营建议华西列夫斯基领导总参谋部。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又病得很重，也不止一次请求辞去职务。

有一次，沙波什尼科夫又病倒了，铁木辛哥、赫鲁晓夫和巴格拉米扬也在场时谈起了这件事——要不是空袭迫使他们下到防空洞去，也许不会有这次谈话——赫鲁晓夫在路上抱怨身体不好，容易疲劳，斯大林好像想起来什么似的。至少他一进防空洞就对华西列夫斯基说：

“赫鲁晓夫同志是对的，健康是领导人有效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病得很重，他很难受，我们应该体谅他。政治局和国防委员会提名您为总参谋长人选。”

“斯大林同志，就这个问题我已向您汇报过，现在也坚决请求不要这样做。我已熟悉副总参谋长的职能并将全力以赴地从各方面帮助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

斯大林转向其他人说：“瞧，大本营坚持，而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却坚决推辞。这难道是党性的表现？”

“我正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来报告的，我认为自己对接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还没有作好准备。”

“那谁作好了准备？”斯大林生气地问道，“您推荐谁来担任这一职务？”

“比如，朱可夫或者梅列茨科夫。”

“他们已经干过这个职务，展现过自己，他们在前线的用处会更大。你们是怎么想的？”他再次转向其他人问道。

巴格拉米扬第一个说道：“我认为，这个人可以是苏联元帅铁木辛哥，他领导过国防人民委员部，十分了解总参谋部的工作内容。”

铁木辛哥立刻说道：“我不同意，我推荐戈利科夫将军担任这一职务，他既是卓越的将领，又是优秀的政治工作者……”

他的话立刻得到赫鲁晓夫的支持，斯大林却只笑了一下，又把话题转到华西列夫斯基的身上。谈话变得紧张起来，最高统帅觉察到这一点，就把话题转到方面军的事务上，他说他还会回过来谈这个重要的干部问题的。

斯大林在4月24日打来电话说：

“华西列夫斯基同志，鉴于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的病情，您被任命为代总参谋长。”

* * *

哈尔科夫局部进攻战役的战事发展如下。

在西南方向指挥部举行的军事委员会闭幕会上铁木辛哥元帅（他也是方面军司令）说道：

“由于我们在冬季战局中挫败了法西斯德军，红军掌握了作战主动权……我们可在近期内调集大批兵力歼灭敌人……”

在这次会议上西南方向参谋长巴格拉米扬将军对态势作了详细分析。他得出结论说：

“哈尔科夫的敌军集团在得到大批兵员和物资补充、恢复部队的战役布局 and 大批战役预备队到达之前，无法开始积极的战斗行动。敌人只能在天气变暖后开始积极行动。”

军事委员会委员赫鲁晓夫在对会议作总结时也说：

“最高统帅斯大林亲自向方面军部队提出这项任务，仅此一点就是胜利的保障。”

总之，委员们对胜利充满了信心。而此时军队也有取胜的能力——在突破地段集中了22个师，2860门大炮和5600辆坦克。此外，有2个坦克军、3个骑兵师和1个摩托步兵旅可投入突破。西南方面军司令还有2个步兵师、1个骑兵军和3个独立坦克营作为预备力量。

另外，相邻的南方面军抽出3个步兵师、5个坦克旅、14个统帅部预备队炮兵团和233架飞机以增强兵力。

1942年5月12日，大队人马在一小时的炮火准备后向前猛扑，想从南北两面包围哈尔科夫，在该城以西形成合围之势。部队在五天内向前深入了20~30公里。

但是……这里又冒出了这个倒霉的“但是”。原来希特勒匪徒正在这一地段策划了代号为“弗里德里希斯I”的局部进攻战役，为此在这里集结了强大的突击集团。我们的司令部——总参谋部、西南方向指挥部、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司令部——对敌人的这些意图都毫不知情。

5月17日5时30分，希特勒匪徒在炮火准备和航空火力准备后对巴尔文科沃方向我军部队的楔形底部实施突击。一小时后他们已深入第9集团军后方10公里！

西南方向指挥部对此作何反应呢？铁木辛哥和赫鲁晓夫认为敌人的这一突击是正常的堵窟窿的想法。他们受自己从前对敌人完全错误的估计（“敌人没有兵力”、“敌人什么也干不成”）所支配，决定继续进攻，夺取哈尔科夫。

华西列夫斯基（代替生病的沙波什尼科夫的代总参谋长）建议立即停止进攻，并采取措施粉碎敌人包围向哈尔科夫突进的我军的尝试。

斯大林不喜欢改变自己的决定。他在与铁木辛哥商量后，对总参谋



长说，西南方向指挥部所采取的措施足以打退敌人对南方面军的突击，因此西南方面军将继续进攻……

即将发生的惨败看得越来越清晰——德军坦克捣毁进攻哈尔科夫的集团军的后方。而哈尔科夫如常言所说近在咫尺。铁木辛哥和赫鲁晓夫大概以为，一旦他们攻克哈尔科夫，所有难题都将一扫而光——对胜利者不作审判！攻克哈尔科夫后就可以派部队迎战从后方反冲击的敌人。

朱可夫证实了西南方向指挥部的这一顽固做法：

“这一天我在大本营碰巧听到约·维·斯大林和西南方面军司令的一次谈话。我清楚记得最高统帅当时已明确向谢·康·铁木辛哥表示非常担心敌人会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地区取胜。

5月18日傍晚，最高统帅就这个问题与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尼·谢·赫鲁晓夫有过一次谈话，后者也表达了与西南方面军司令部相同的见解：来自克拉马托尔斯克敌人集群的危险被严重夸大了，没有理由停止战役。最高统帅以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提出的必须继续进攻的报告为理由，驳回总参谋部的考虑。有关南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曾向大本营告急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我能证明这一点，因为最高统帅谈话时我在现场。”

铁木辛哥派普利耶夫将军的骑兵第2军和骑兵第5军去对付反冲击的德军。以骑兵对坦克——这才叫对情况彻底无知！请设想这样一幅画面：骑兵挥舞着马刀潮水般冲向坦克师！堵住突破走廊的德军集团中有第3摩托化军、第44和第52步兵军，其中有11个师（包括2个坦克师），并且敌人所有部队都已补足兵员（新的预备队）。

除了骑兵大战坦克外，方面军还干了一件蠢事（请原谅：我找不到别的用词）。在5月17日敌人坦克捣毁我军后方时，方面军司令部把坦克第21军和坦克第23军投入战斗。但不是去对付有截断向哈尔科夫进军的我军部队危险的敌人，而是跟着向前深入的自己部队，按预定计划去哈尔科夫自投罗网！

正如这场交战的参加者莫斯卡连科元帅所说：“自己钻进包围圈，送进敌人的嘴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5月17日、18日和19日。

我军部队被包围的危险正在变成现实，5月22日包围圈合拢了。不是我们、而是德军形成了坎尼。我军整个集团除小股部队外几乎全军覆灭。据德军文献，有24万名指战员被俘。参加过这次战役的所有将领事后都会在他们的回忆录中断言，他们曾及时地试图制止和撤回进攻部队。并且他们中谁也不会提到策划进攻时由于对敌人的对抗兵力全然



不知而造成的最初失算。在这种兵力对比下根本就不能实施这一战役！

但是，像这种情况下通常做的那样（这次也是如此），大家互相推诿责任，最后一起把责任推给了斯大林。

到了“肃清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时候。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和评价开始随着政治形势的影响而变化——起先是个别人的谎言开始疯狂地变本加厉，而后是对价值观的普遍重新评价席卷而来。大家都知道令人触目惊心的例子：身居高位的政治活动家、学者、作家几乎一刹那间都改持截然相反的见解和信仰，从“火热的”共产主义者变成了同样老牌的持不同政见的民主派。

* * *

最后要谈谈斯大林预定的在北方即列宁格勒和杰米扬斯克地域进行的最后两次局部战役。我不打算对这两次战役的战斗过程进行详细分析，而只想指出，两次战役都以失败告终：西北方面军部队在杰米扬斯克地域包围了德军集团，但却未能将其歼灭，希特勒匪徒救出了自己的被围部队。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进行了几次艰难难缠、旷日持久的战役。其中柳班战役的结果使得突击第2集团军插入敌军驻地，并在那里陷入森林和沼泽地中。春季解冻时突击第2集团军几乎全军覆灭，集团军司令弗拉索夫中将投降。

关于弗拉索夫以及他组建俄罗斯解放军和领导俄罗斯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活动不仅有人写了文章，而且还有人写了整本整本的书。这和我们的话题直接有关，因为它首先具有反斯大林的倾向。

既然这些著作印数巨大，并且被说成是反映了战争年代实际发生的事件真相，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向读者介绍真实的文献和事实，以便读者自己辨别真伪。我们会在叙述过程中按时间先后的顺序谈及“弗拉索夫现象”，以便彻底澄清这段混乱的、甚至是捏造的历史。

这里谈一谈弗拉索夫被俘的情况。

应该承认，突击第2集团军落入重围，并不是弗拉索夫将军的大错。他是在1942年4月16日集团军已经被围时，代替在失败的柳班战役结束阶段生病的尼·库·克雷科夫将军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的。

粮断弹绝的集团军在泥泞的沼泽地中坐以待毙。几次突围都未获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剩下最后一种可能——分成小股悄悄潜回我军。

以下是被围部队的祖博夫少校的报告记录片段：

“……6月25日12时突击第2集团军司令部和第46步兵师司令部在林中的一个地方。

第46步兵师师长切尔内同志告诉我说，我们马上要突围，但

弗拉索夫司令却警告说不要有多余的人……于是，我们总共有突击第2集团军司令部的28人和第46步兵师司令部的差不多相同数量的人。我们在没有给养的情况下向扎莫什科耶走去，25日和26日走了两天。晚上我们发现一头被打死的驼鹿，把它吃了，27日早上突击第2集团军参谋长在和弗拉索夫商量后，决定分成两队，因为这么多人一起走是不可能的。”

后来跟弗拉索夫走的一队中的一个人说，他们中由于有人对后续行动的不同建议而发生争吵，队伍散了。

方面军司令梅列茨科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描写了他为寻找和营救弗拉索夫采取的措施：

“据第327步兵师师长И. М. 安丘费耶夫后来说，突击第2集团军司令部在6月24日早上下令：分成小组各自随便设法突围。这一命令瓦解了部队的士气，使队伍彻底失去了控制。各师和各旅的分队由于没有集团军司令部的领导，四散向出口逃去，暴露出翼侧。个别战士由于连续作战和没有食物而筋疲力尽，有的处于半昏迷状态，倒在地上。

集团军领导人又在哪里呢？他们的命运如何？我们采取一切措施来寻找突击第2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和司令部。6月25日早上，一些突围出来的军官报告说，他们在窄轨铁路一带看见过弗拉索夫将军和其他高级军官，我立刻派坦克连和步兵以及我的副官М. Г. 博罗达大尉前往那里。选择博罗达大尉事出有因。我相信这个人会克服一切障碍。

博罗达带着一支由五辆坦克组成的队伍开进德军后方。四辆坦克被地雷炸毁或被敌人击毁。但是，博罗达从一辆坦克转到另一辆坦克，最终乘第五辆坦克到达突击第2集团军司令部所在的位置。那里却人迹全无。几位勇士回来向我报告时，大本营代表亚·米·华西列夫斯基在场。我们知道集团军司令部携带无线电接收机，便定期通过无线电台发送突围命令。当天傍晚前我又派出几个侦察小组寻找并救援集团军军事委员会。这几个小组同样完成了部分任务，到达指定地区，但也无功而返，连他们也没能找到弗拉索夫……

我给安·亚·日丹诺夫打电话，请他命令奥列杰日游击队队长Ф. И. 萨赞诺夫寻找弗拉索夫将军及其同伴。萨赞诺夫同志派三个游击小组搜查了波杜比耶方圆几公里的整个地区。哪里也没有弗拉

索夫。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游击队终于传来消息说，弗拉索夫在皮亚特尼察村向希特勒匪徒投降了。”

现在来看一看德军文献，这个文献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

原第4航空师通信主任考普特曼·维利希·哈尔特说：

“弗拉索夫身着没有军衔标记的服装隐匿在丘多沃以南莫斯特卡村附近的澡堂中。村长发现了他并向路过村子的德国军官报告。人们打开房门，命令他‘举起手来’，弗拉索夫喊道：‘别开枪，我是弗拉索夫将军——突击第2集团军司令。’”

1942年7月15日德军第18集团军司令部审讯了弗拉索夫，按照惯例，从俘虏口中得到的情报以第1379-42号情报信分发给各部队。

以下是对弗拉索夫第一次审讯记录的概要。

“他说，他1930年为了能得到提升加入了联共（布）。原突击第2集团军司令在抱怨了一阵和基·阿·梅列茨科夫大将难以相处后，详细介绍了沃尔霍夫方面军的构建情况，谈了军事失败的原因，称赞了德军炮兵和空军的表现，估计自己集团军死亡和被俘的人数为近6万人。（弗拉索夫的这段供词带有辩解性质。他显然是在抬高自己，告诉别人一切都是由其他人的不负责任的行为造成的。——本书作者注）

……据弗拉索夫中将的供词说，军事解围列宁格勒的计划依然生效。计划的实现取决于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各师休养生息的程度以及援兵到来的情况。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在现有兵力下不能向列宁格勒方向发动任何进攻，这些兵力充其量只够守住沃尔霍夫战线和基里希与拉多加湖之间的战线。

……春天往南调了几个人数众多的师，不再注意北方的几个方面军。沃尔霍夫方面军再没有得到增援……

……朱可夫在中部地区可能再次从莫斯科发起大的进攻，他有足够的预备队……”

如我们看到的，弗拉索夫提供的情报无疑是军事机密，我们的许多落入希特勒匪徒手中的军官，甚至在受到严刑拷打后也没有泄漏一些不太重要的军事秘密，而弗拉索夫作为一位有经验的、充分掌握情报的将

军，在第一次审讯时就明显想以自己的供词来博得敌人的好感，帮助敌人打胜仗。

我不想对弗拉索夫的这一行为作过多评价，只想引用他的档案中的一段话：“1939年2月作了军人宣誓”。

其中说：

“……我宣誓并庄严保证……严守军事机密和国家秘密……

如果我蓄意违反了我的这一庄严誓词，愿意接受苏联法律的严厉惩罚，遭到众人的痛恨和劳动者的鄙视。”

后来被称为“弗拉索夫现象”的一切作为就是这样开始的。

五 高加索会战

斯大林没有忽略顿河流域的战斗和希特勒部队向北高加索的进逼。但他并没有赋予这一方向以希特勒计划所赋予的重大意义。斯大林认为南方面军已经进行和在1942年夏季可能展开的战斗与所有其他非主要方向上的战斗是一样的。他认为希特勒军队最可能的主要突击方向是莫斯科。

总参谋部没有看到高加索和巴库油田面临的危险，它对于由于这一忽视而引起的诸多灾难负有全部责任。

这对于喜欢批评斯大林的人来说这又是一个实际机会，无须寻找他的莫须有的罪名，失算、对敌人的兵力和能量估计不足以及对1942年夏季敌人的主要发力方向判断失误——不仅是总参谋部的过错，也是作为最高统帅的斯大林的过错。这几乎导致毁灭性的惨败（如果德军占领高加索产油区的话）。

错就错在这里！斯大林本人后来也明白了自己的这一失算。人总是不愿谈论自己的过失的，斯大林也不喜欢回忆高加索艰苦卓绝的战斗，回忆谁错了，谁在当时以什么方式拯救了我国。

说到这里，我也许不该光空发议论，而是该用可靠的文献来证实我说的话了。

安·安·格列奇科元帅写道：“大本营在判断敌人在1942年夏天的意图时认为，夏天主要战事将在莫斯科周围展开，敌人正是会在这个方向上实施主要突击。”

假设格列奇科当时不了解整个情况，他那时还不是元帅，只指挥一个集团军——尽管需要指出的是，他在写回忆录时已是元帅和国防部



长，理所当然地掌握全部文献。但这一切不过是假设而已……

那么我就引用一个几乎天天与斯大林见面的人，马·什捷缅科将军的证词：

“应该说，以约·维·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战略领导集团确信敌人或早或晚会再次对莫斯科发起突击。最高统帅的这一深信不疑不仅源于来自勒热夫突出部的威胁。国外有情报说，希特勒统帅部尚未放弃夺取我国首都的意图。约·维·斯大林设想了敌人的各种行动方案，但最终认为，无论如何法西斯德国军队的战役目标和他们的进攻总方向都会是莫斯科。大本营其他成员、总参谋部和多数方面军司令都持这一看法。

由此认为，事关以后战争进程的1942年夏季战局的命运将在莫斯科附近决定，因此，中部方向即莫斯科方向将成为主要方向，而其他战略方向在这一战争阶段将起次要作用。

后来证明，大本营和总参谋部的预测是错误的。”

如果失算仅限于就这个话题进行争吵和辩论，那灾难还不小。但这一失算导致对苏联武装力量不符合既成态势的支配。安·格列奇科元帅直接证实了这一灾难：“然而，尽管有我方侦察机关的一些报告说，敌人春天进攻的重心将放在南方，但大本营却没有向这段战线派去足够的预备力量。”

西方向的各方面军紧挨着莫斯科，保卫着通往首都的接近地，其兵力将近占整个苏军的一半。高加索却只有全部师的5%~6%，坦克这一现代化战争的决定性突击力量仅占3%！

我们试想一下，是什么使得斯大林在莫斯科附近屯驻重兵。我以为，除战略上的原因外，还有纯粹心理上的原因。大本营的所有人都对敌人在短时间内几乎越过我国一半的欧洲领土扑向莫斯科而心有余悸。我想，斯大林在1942年春战斗还在距首都不远处进行时，担心咫尺之遥的敌人再次试图攻占首都，不敢把部队从莫斯科附近撤走并把预备队派往南方。至于南方濒临危险的侦察情报，则已多次被认定不够准确、言过其实甚至是错误百出的。这会不会是敌人使用的虚拟情报，指望把苏军从莫斯科引向南方？南方离得很远，而希特勒坦克的隆隆声在这里、在莫斯科城下就能听到！

总之，不管怎样，事实是敌人在1942年得以准备就绪，以重兵对高加索实施突击。前面所说的失算对于防御通往高加索接近地的部队来说，演化成了巨大的困难和人员伤亡。

* * *

希特勒完全相信新一轮进攻会取得胜利，他不打算与任何人分享预料之中的胜利桂冠，因此，如上所述，他呆在文尼察特意为他修建的大本营里，尽量靠近战区。

顺便说说，这座大本营是德国军事工程师用军官疗养院的名义花几个月时间建起来的。整个建筑区四周设有岗哨，围着铁丝网。几千名在那里劳动的战俘，甚至一些德国人——装修师傅——都猜出这里建的不是表面上说的疗养院，为了不使他们的这些猜测泄漏出去，参加建设的人在竣工后都被党卫军杀害了。

如上所说，为保障完成夺取高加索和掩护“A”集团军群左翼的主要任务，法西斯对伏尔加河和斯大林格勒城方向实施了突击。法西斯部队在7月12日进入斯大林格勒州境内。希特勒部队推进顺利，因此希特勒在1942年7月21日的第44号训令中说：

“战役出人意料地迅速和顺利展开……使我们有理由指望，很快将会切断苏联与高加索，从而与主要产油区的联系，并使英国和美国军事物资的运输受到严重阻碍。由此以及由整个顿涅茨克工业的丧失带给苏联的打击将产生意义极其深远的后果。”

希特勒十分相信他的部队会在伏尔加河和斯大林格勒地区取得胜利，以致从“B”集团军群抽出坦克第4集团军加入“A”集团军群，用于对格罗兹尼和巴库方向实施突击。

7月17日，斯大林格勒方向的苏军接到训令：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由您本人负责火速组织强有力的先遣支队，并将其派往从切尔内什科夫斯基到河口处的齐姆拉河地区，尤其要牢牢守住齐姆良斯卡亚，在这里与北高加索方面军部队取得联系。”

就在这一天，德军第6集团军一个师的前卫部队在顿河转弯处的奇尔河和齐姆拉河地区，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根据这一训令派遣的第62和第64集团军先遣支队遭遇了。

这一天被认为是伟大的斯大林格勒会战的开始，而会战中的第一场战斗就是这些先遣支队与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的遭遇战。

这些先遣支队顽强地战斗了6天，迫使德军第6集团军展开主力。敌人感到在这里遇上了一支新部队，指望在斯大林格勒方向上的轻易进



攻为时过早。希特勒在 7 月 23 日的例行训令中已对苏军兵力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评估：

“铁木辛哥集团军只有不多兵力可以逃脱包围并且抵达顿河南岸。要考虑到这股兵力会因高加索部队的补充而得到加强。敌人的另一集团正在斯大林格勒地区集结，敌人看来打算进行防御。”

希特勒计划以“B”集团军群的兵力切断伏尔加河西岸地区，将高加索方向与莫斯科乃至我国整个欧洲北部领土分开。

“A”集团军群左侧得到这样可靠而切实的保障，似乎可以继续进攻高加索了。然而驻扎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苏军集群对扑向巴库的德军翼侧构成威胁；解除来自北面的威胁这一重要的战略问题如不解决，则无从保障整个高加索方向的稳定。

希特勒现在明白，即使他本人没有明白，他的战友们看来也已十分有说服力地向他证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结局关系到能否实现他为夏季战局所制定的整个南方计划，首先是关系到能否夺取高加索。

有鉴于此，希特勒把一个又一个新的兵团投入斯大林格勒附近的战斗。就在不久以前他还指望保卢斯的第 6 集团军能够轻而易举地独立完成任务，而过了两个星期他不得不把缺一个军的坦克第 4 集团军从高加索方向调往斯大林格勒方向。

希特勒很想在开始进攻北高加索以前就攻克斯大林格勒，但没能做到。7 月 22 日德军第 6 集团军开到距城 12 公里处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主要防御地带的前沿。

但希特勒急于实现他的计划。加之他有足够的兵力，并且知道，在高加索与他抗衡的苏军疲于应战，得不到中部地区的供给。希特勒急不可待，因此“A”集团军群在 7 月 25 日对高加索实施了突击。法西斯在头几天的进攻异常迅猛，以至陆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豪辛格将军在 7 月 27 日就对“A”集团军群参谋长格莱芬贝格将军说：

“不要从桥头堡向南逼迫罗斯托夫过紧，以防敌人在被向前推进的集团军群左翼包围以前开始撤退。”

对高加索的进攻进展得十分顺利，以至于如上所说，希特勒正是在这些大中，批准把坦克第 4 集团军调到尚未攻下城市的斯大林格勒方向。

可以说，从把坦克第 4 集团军抽调到斯大林格勒后，用非正式和非学术的用语来说，突击已经不再是攥紧拳头、而是叉开五个手指打敌人了。这一决定也说明希特勒本人是一个举棋不定的战略家：元首作出决



策，提出重大任务，为此集中了必要的兵力，然而却在第一阶段就开始分散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把这种突击叫作叉开五个手指的突击了，这一说法隐含着对组织这种突击的人的贬责。

然而这一切晚些时候才能显露出来，而眼下利斯特元帅送走了坦克第4集团军，继续进攻高加索。第17集团军直扑克拉斯诺达尔并于8月9日将其占领。坦克第1集团军经阿尔马维尔扑向迈科普和陶普塞，意欲包围豪辛格惟恐从即将包围的地区“逼跑”的苏军集群。坦克第1集团军部队于8月7日和10日相继占领阿尔马维尔和迈科普。希特勒和他的许多战友都欣喜若狂。迈科普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第一个油田。

意军总参谋长卡瓦莱罗元帅在他这些天的日记中写道：

“利斯特的部队后面跟着10000名准备在夺下迈科普后恢复油井的专家和熟练工人。据估算，为使油井重新投入使用需要4~5个月。”

被南方胜利所鼓舞的希特勒期待着新盟国加入战争，土耳其和日本答应他从各自边界积极予以配合。

希特勒特意抽出一个精良兵团——一个尚未动用的师来补充在格罗兹尼-马哈奇卡拉方向推进的坦克部队和摩托步兵部队，用他本人的话说是“为了向巴库进军”。希特勒本人对这个师关怀有加，下令尽快给它补充燃料，以便它加足油后直奔巴库。

希特勒认为胜利指日可待。整个德国彩旗飘扬，广播中进行曲和祝词不绝于耳。欢庆的理由充分有力：厄尔布鲁士山上升起了卐字旗！

柏林报纸叫嚣说：“征服厄尔布鲁士山是圆满结束了对高加索的征服！”在画报和新闻纪录片中到处是格罗特大尉和他的山地步兵的形象。希特勒为征服厄尔布鲁士山授予格罗特最高奖赏——骑士十字勋章，授予他手下的士兵铁十字勋章。柏林电台为“民族英雄”歌功颂德。

莫斯科也能听到这些报道，斯大林自然因此怒火中烧，其后果是……我还是来转述安·安·格列奇科元帅的话吧：

“由于8月23日国防委员会委员贝利亚到达苏呼米，方面军指挥部和第46集团军司令部加强高加索山系主脉的防御工作更趋困难。贝利亚没有给予第46集团军指挥人员和司令部所需要的具体帮助，反而撤换了包括集团军司令B.Φ.谢尔加茨科夫少将在内的一批集团军和方面军机关的负责人员。

然而不是粗暴的行政命令，而是方面军和集团军司令部耐心细



致的组织工作使第 46 集团军新任司令康·尼·列谢利泽少将能掌握起部队的指挥权并派兵歼灭从山口潜入的敌军。”

“A”集团军群有由山地战专家、山地兵将军 P. 康拉德指挥的山地步兵第 49 军这一特种部队。过后得知，许多参加夺取大高加索山系主脉山口战斗的“火绒草”师的军官，在 30 年代曾以旅游者的身份游历过高加索，攀登过高加索山峰和高山山口，在深谷中跋涉过。现在，他们在强攻大高加索山系主脉时对这些地区非常熟悉……

我在 1978 年，在这些战事过去许多年后，在克拉斯诺戈尔斯克中心军事医院遇到伊·弗·秋列涅夫大将：我们的病房挨着。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病得很重，但在病情稍轻时，他喜欢一边休息，一边聊天，回忆往事，痛苦地、带着深刻自责地讲述司令部在指挥争夺山口战斗中的失利。我记不得他确切的原话，由于这些话涉及批评之类的严肃事情，我最好引用秋列涅夫本人就此问题写下的文字：

“现在分析敌人占领这些重要山口的原因时应该指出，这里面有外高加索方面军指挥人员和司令部不小的过错。他们轻率地以为山口本身是敌人难以逾越的。我们中有人认为方面军部队的主要任务是防御黑海沿岸地区，在那里部署了第 46 集团军的主力。集团军又错误地组织了山口的防御，白白把它们‘丢掉了’。应该在山坡上迎击敌人，而不是等他们爬上来。”

总之，“火绒草”战役计划接近尾声，有超过三分之二计划夺取的土地被占领：几乎整个北高加索、库班大地和萨尔草原、迈科普产油区、大高加索山系主脉山口和厄尔布鲁士山都被插上了卐字旗。

在通往巴库的道路上剩下捷列克河这最后一个地区以及红军在高加索的最后兵力——包括少将伊·叶·彼得罗夫指挥的集团军在内的三个集团军。

8 月 31 日，希特勒命令利斯特元帅：“坦克第 1 集团军的主要任务是歼灭捷列克河河湾的敌兵……以现有全部兵力、首先是快速部队继续进攻格罗兹尼，占领油矿区。”

9 月 2 日，希特勒匪徒的坦克第 1 集团军着手执行命令，步兵和坦克开始强渡捷列克河。

彼得罗夫不只是占据捷列克河对岸的防御阵地，进行了反击。他利用敌人渡河之机，派遣部队在渡口突击敌人翼侧。这自然引起敌军的混乱。近卫第 11 军战士从另一侧以同样的机动实施反冲击。敌人大股兵

力渡河失败。

希特勒在捷列克河河湾歼灭苏军的命令因此没能完成。此外，我们的反突击成了德军进攻失败的原因。

战役的这一意外结局自然不能不造成后果，“A”集团军群没有完成既定目标。应当找出“火绒草”战役失败的罪魁祸首，当然，希特勒自然绝不会承认这个人就是他自己。

1942年9月10日，利斯特元帅被撤去“A”集团军群司令职务。这难道不是正式承认“火绒草”战役以及与之相关的希特勒意图的失败吗？就算他认为利斯特是罪魁祸首，但“火绒草”战役终究破产了。我军顶住了！

希特勒为了表示在如此复杂的局势下坚定不移的决心，决定亲自统率“A”集团军群。不过，他并未前往集团军群司令部所在的斯大林格勒，而是从他在文尼察的大本营进行指挥。他在一个月时间里试图获得转机，但未能如愿，便任命克莱斯特为这一集团军群的司令。

1942年9月25日，克莱斯特上将为了对希特勒表示感谢，让他高兴，称自己终究会在巴库为元首的健康干杯。克莱斯特是一位相当有经验的指挥官，他绝不会食言，而是以相应行动来兑现说过的话。他把主要突击对准所谓的埃利霍托沃山口，即通往格罗兹尼和奥尔忠尼启则的山间谷地。克莱斯特怕被元首看成只不过是吹牛的人，为了务必履行诺言而在这一狭长地段集结了约300辆坦克。克莱斯特一贯主张实施强大的坦克突击，应该说，这一战术在捷列克地区以前战无不胜。希特勒想为自己的爱将助一臂之力，批准把党卫军一支精良的摩托化师——“海盗”从图阿普谢方向抽调给克莱斯特。

于是克莱斯特向埃利霍托沃山口扑去。敌机几乎把整个谷地翻了个遍，接着炮兵的火力把谷地上的一切生命都化为灰烬。在山间通道这样狭窄的地段似乎每一发炮弹、每一枚炸弹都命中目标。克莱斯特等经过这番狂轰滥炸，冒烟的山谷变成他所想像的无人的自由通道后，向那里投入成群结队的坦克和冲锋枪手。山谷对于这一集群来说过于狭窄，以致坦克排成拥挤的长队。大地在钢铁的庞然大物的沉重碾压下颤栗，群山轰鸣，回荡着无数发动机的隆隆声。四周弥漫着尘雾、硝烟和灰烬。任何事物，任何人似乎都不能制止这一巨大的撞击！

但是，幸存的人们从被翻过的土地下站了起来。平凡的、普通的、不是钢铁铸成的人——是血肉之躯。他们抖掉轰炸和炮击时落在身上的尘土，整理好枪支，稍加修复好战壕，迎着汹涌扑来的坦克而上。他们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迹。他们强过这支钢铁大军！

这可能吗？莫不是后来的历史学家杜撰出来的故事？

我没有必要编造什么。我不是在写英雄壮烈战斗的场面。我是在讲述实际发生的事情，不带任何渲染。我在讲严酷的实情。当然，人，如果不过是一些普通人的话，是经受不住这么多坦克的猛攻和炮火扫射的。但在这里誓死抵抗的不只是人，而是战士！战士受过在地下藏身的训练，懂得在这样猛烈的炮火下该怎么办，他们坚定不移，既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丧失斗志。

这场人与坦克的大搏斗持续了一整天。希特勒匪徒推进了几公里，但始终没能突入奥尔忠尼启则和格罗兹尼。傍晚前谷地上堆满冒烟燃烧的坦克和尸体。

克莱斯特看着这一切，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还从未在哪里见过这样的战斗、这样可怕的伤亡和这样不值一提的战果。

但祝元首健康的香槟酒还是要干杯——许诺过要夺下巴库……不，此时折磨克莱斯特的不是骑士的高傲。他一想到现在会怎么收拾他便不寒而栗。克莱斯特无路可走，只好指望苏军力量不会无穷尽，又接连几天逼着手下各师向前挺进。他孤注一掷，现在他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

但是到10月初“A”集团军群彻底丧失了进攻能力。在这个方向上再也没有预备队，其他部队被斯大林格勒附近的战斗缠住脱不了身。对格罗兹尼和巴库的进攻停了下来。

我们的战友们——将军们、师长们、部队和分队的指挥员们、各兵种的军士和普通战士们——完成了既定的任务：没有让希特勒匪徒进入石油产地。他们消除了我们祖国遇到的巨大危险。

* * *

文献证明，盟国在1942年夏（甚至在莫斯科保卫战胜利之后）还不相信我们能坚持住。还有材料说，盟国对我国采取了双重政策。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来证明。

美国和英国在战争的这一危急关头考虑的是自己自私的目的。罗斯福总统在派他的代表威尔基去莫斯科时坦率地说：

“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您到开罗时正好碰上开罗陷落，而您到俄国时也可能赶上俄国垮台。”

罗斯福指的是隆美尔部队攻取开罗，而在苏联则指希特勒军队可能攻下巴库。

1942年8月，丘吉尔在高加索山前地带激战正酣时飞抵莫斯科。他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这些天作了如下记述：

“我思索着此番出使这个阴沉的、令人忐忑不安的布尔什维克

国家的事，当初我曾经固执地想把它扼杀在襁褓之中，而且直到希特勒侵犯之前我都一直认为它是文明自由的死敌。我现在该对他们说些什么呢？具有文学才能的韦维尔将军把所有这一切归纳到他在昨天晚上给我看的诗里。这首诗由几段四行诗组成，每一段的最后一句都写道：‘1942年不会开辟第二战场。这反正是往北极圈运大块冰。’”

丘吉尔在他的日记里提到的韦维尔的诗是多么刻薄甚至是出言不逊！因为他不是一个随便爱讲笑话的人，他是一位无论对世界形势，还是对他所恶毒嘲笑的苏联现状都了如指掌的将军。

盟国没有履行写在他们所签署的有关条约里的承诺。

正是在8月份，战斗在通往巴库的最后一道防线——捷列克河上打响的日子里，盟国在莫斯科举行的谈判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不会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

1942年9月30日，丘吉尔在高加索战斗最激烈时致信斯大林，表示他要帮助苏联的愿望。而实际上他所关心的完全是另外一些长远计划。这封绝密的私人信函特别提到说：“希特勒已经任命了一个海军上将负责里海的海上战斗。他们选择了马哈奇卡拉作为主要的海军基地。包括意大利的潜水艇、鱼雷艇和扫雷舰在内的将近20艘舰艇只要铁路一开通就用火车从马里乌波尔运往里海。由于亚速海结冰，潜水艇将在铁路完工以前装运。”

丘吉尔就这样设法吓唬斯大林，想让他相信，这一地域的主要战事问题将在希特勒匪徒抵达里海后解决。他接着说道：

“我认为，我对您讲过的关于我们在美国的帮助下以20支英美航空大队加强里海和高加索战区苏联空军的计划因此具有更大的意义。”

英国人就这样念念不忘他们的夙愿——乘着激战方酣之机将高加索产油区据为己有。

侵占高加索的愿望远不止是一个幻想——英军早已制定了代号为“条绒”的专门计划。

根据这一计划，英军第10集团军被用于入侵高加索。

* * *

我不打算详细描写接下来的战斗行动，只引用一份文献对希特勒匪徒进攻巴库作一总结。

这份文献反映了斯大林统帅的才具：他能纵观大战区，说得出地区、城市、兵团编号和将军姓名，向部队提出任务，在他筹划的机动中使用这些部队。

而这一切都是由他本人口授的，没有由别人起草的方案，对此激情奔放的语言和典型的斯大林句式都可以加以证明。

斯大林在1943年1月4日口授了以下给外高加索方面军司令秋列涅夫大将的指示：

“第一，敌人从北高加索撤退，烧毁仓库并炸毁道路。马斯连尼科夫的北军队集群变为预备集群，任务是乘胜追击敌人。把敌人撵出北高加索对我们不利，对我们更有利的做法是拖住敌人，以便通过黑海军队集群的突击包围敌人。因此外高加索方面军的作战重心转移到黑海军队集群地区，而这一点无论马斯连尼科夫还是彼得罗夫都不明白。

第二，立刻把步兵第3军从北军队集群地区运走，并火速运往黑海军队集群地区。

马斯连尼科夫可以把牠作为预备队的第58集团军投入战斗，这会为我方的顺利进攻带来很大好处。

黑海军队集群的第一项任务是前出至季霍列茨卡亚，从而阻止敌人向西运送装备。第51集团军，可能还有第28集团军会在这方面支援您。

您的第二项任务也是主要任务是从黑海军队集群抽出一支强大部队占领巴泰斯克和亚速，从东面插入罗斯托夫，从而堵住敌人北高加索军队集群，将其俘虏或歼灭。南方面军左翼——任务是前出至罗斯托夫以北的叶廖缅科会在这方面支援您。

第三，命令彼得罗夫如期发动进攻，一个小时也不要拖延，不要等待预备队的到来。彼得罗夫老是在防御，没有太多的进攻经验。要给他讲明白，他应该珍惜每一天和每一个小时。

第四，立即前往黑海军队集群地区并保障本训令的落实。”

于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避免了可能由希特勒占领巴库油田而造成的灾难。在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其他产油区只进行了勘探，尚未开工。没有巴库石油（没有燃料），我们的坦克、飞机和汽车将变成一堆空罐头盒似的废铁。

我国的军事出版物对伟大的莫斯科会战、斯大林格勒会战和库尔斯克会战的决定性意义作了许多（并且是公正的）论述，但据我所见，把高加索会战排除在这一荣誉榜之外有失公允。这场会战的战略性胜利决定了整个战争的进程和祖国的命运。斯大林对这一胜利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和在上述所有大会战中一样。我想应该指出（并且觉得该在这里指



出)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硬加给历史的话纯属谎言,他说:“斯大林靠地球仪指挥战争。是的,同志们,他抓起地球仪,在上面指点战线。”

在代表全党、全体苏联人民的代表大会代表面前如此胡说八道的,该是多么无耻、多么丧失原则的人啊!

六 事事关心

斯大林在通往斯大林格勒接近地的战斗行动中格外注意到希特勒匪徒坦克部队灵活机动甚至十分猖獗:坦克在这些战斗和以前的战斗中一往无前地带着步兵向前冲。最高统帅把它们的表现和本国的坦克兵的战术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认为坦克部队没有发挥自己的潜力,而诸兵种合成兵团的司令没有利用敌人的经验,没有学会如此顽强地作战。斯大林不止一次地反复思考,终于作出彻底改变坦克部队战术的决定,并为此采取措施培训指挥人员和坦克分队本身。1942年9月3日,最高统帅在通往斯大林格勒接近地的战斗正酣之际,命令汽车装甲坦克总局副局长 Н. И. 比留科夫将军组建两个坦克兵培训营,一个设在萨拉托夫地域,另一个设在科斯捷廖沃和诺金斯克地域。在那里制定严格的培训制度,教习现代坦克战术。

斯大林在7月份下令组建40个坦克旅,并对25个已组建的坦克旅作了分配。高尔基州和莫斯科州的各2个坦克旅以及萨拉托夫的8个坦克旅被调往莫斯科(仍旧担心敌人进犯首都),在莫斯科附近组建教练营,进行培训;另有8个坦克旅留在萨拉托夫补足兵员、进行训练。每个旅有45辆坦克,其中有5~7辆KB型坦克。这些旅算作他的预备力量,他还计划到9月份再组成27个坦克旅。

斯大林知道,坦克厂到当年年中可生产出不到4000辆新型坦克和超过2000辆老式坦克。

斯大林与当时一位经验十分丰富和十分内行的坦克兵指挥员卡图科夫将军的一次谈话能够证明他十分关心坦克部队以及他得出的结论性意见。斯大林在9月17日把卡图科夫请到他在孔采沃的别墅里,以便在安静的环境下研究如何使用坦克部队的问题并就此作出重大决定。

卡图科夫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主要突击的矛头》中对这次会见作了如下描述:

“现在的读者可能不会明白这种激动。但当时对我们这些前线军人来说,斯大林的名字让我们无限崇敬。一切最神圣的事物——

祖国、胜利的信心、对我国人民英明坚强的信念、对党的信念——都与这个名字连在一起。

波斯克列贝舍夫领我进了一间不知是接待室还是餐厅的房间，把我一个人留下片刻。我本打算按条例规定像军人那样向最高统帅报告，侧门却出人意料地打开了，我听到了斯大林的声音：

‘您好，卡图科夫同志！请到我这里来。’

我只顾说了一句：

‘您好，斯大林同志！’脑子里想好的报告词全都忘光了。

我跟在斯大林身后走进他的办公室。最高统帅握了握我的手，说道：

‘请坐，请抽烟。您别看我，我不喜欢坐着。’

他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一盒‘黑塞哥维那弗洛尔’牌香烟。从烟盒里抽出两根，从里面取出烟丝，装进烟斗，吸了起来。

‘您怎么不抽？’他一边在房间里来回踱着，一边问我。

不知道是由于激动，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我不想抽烟。斯大林吐出一团烟雾，接着说道：

‘您不想抽烟，那就一样一样地讲讲，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您的军队在 frontline 如何？摩托步兵和我们的坦克作战情况如何？’

我尽量简短地讲述了布良斯克方面军最近的战事以及我们的坦克兵和步兵的表现。斯大林一边在办公室里踱步，一边又向我问道：

‘您以为我们的坦克好不好？请直接说，不要绕弯子。’

我回答说，T-34型坦克在战斗中表现出色，我们把主要希望放在这些坦克上。而KB重型坦克和T-60、T-70型战斗车辆部队不喜爱。

斯大林站住了一下，不解地耸了耸眉毛，问道：

‘是什么原因呢？’

‘斯大林同志，KB型坦克非常笨重，也就是说不灵活，它们很难逾越障碍。而同样的障碍对于T-34型坦克则不在话下。而且KB型坦克还损毁桥梁，总之带来许多额外的麻烦。KB型坦克上的武器装备是和T-34型坦克上一样的76毫米口径炮。试问，重型坦克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战斗优势呢？’

我还把T-60轻型坦克大大批评了一番……

斯大林刨根问底地问我我们的坦克战术技术性能有哪些优缺点，因此我已经明白最高统帅想仔细地、所谓彻底地搞清我们1942年的装甲坦克技术的优缺点。不难猜出，他的问题与1942年



夏秋的战斗失利直接有关。斯大林想找出这些失败的原因……他问道：

‘坦克兵在行进中开炮吗？’

我回答说，不，不开炮。

‘为什么呢？’最高统帅盯着我问。

‘在行进中命中率低，舍不得炮弹，’我回答说，‘要知道我们对弹药的需求不能得到完全满足。’

斯大林停下脚步，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清楚地、一字一顿地说道：

‘卡图科夫同志，请您告诉我，冲击时应不应该攻打德军的炮垒？应该。首先是该谁？当然是被敌军大炮阻止前进的坦克兵。就算您的炮弹没有命中敌人的大炮，而是在不远处爆炸。在这种情况下德军能开炮吗？’

‘敌人炮火的命中率当然也会降低。’

‘这正是我想要的，’斯大林接过话头说，‘在行进中开炮，炮弹我们来给，我们马上会有炮弹……’”

斯大林正是这样利用敌人和本国的坦克兵团的经验来学习坦克部队的战术要义。他也是这样来培养本国的“古德里安”，成就了一大批杰出的坦克战将领的。

斯大林为什么会这么晚，到德军已兵临斯大林格勒城下时才开始认真关注敌人的坦克分队的战术呢？他为何邀请卡图科夫这位经验丰富的苏军指挥官呢？他为什么对在行进中开炮这样感兴趣呢？

这些问题不是平白无故提出来的，我认为这些问题表现出斯大林的远见卓识和杰出的组织才能。从伏尔加河实施反突击的主意油然而生，顺理成章。能否把远远突前的部队包围在看地图第一眼时就可以明白：德军楔入伏尔加河畔地区很深，正好可以从底部加以切断。可用什么来切断呢？退守城中、筋疲力尽的兵团无力实施强大的突击。就是说，应该组建新的、并非普通的、而是突击的快速兵团。斯大林因此才对敌人的坦克战术、对行进中开炮产生了兴趣。

我们看到，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斯大林在部队保卫城市的艰苦日子里组建了两个坦克集团军！用什么来武装它们呢？斯大林不分白天黑夜地打电话催促坦克厂、大炮厂和飞机厂的厂长们：尽快生产出更多的武器！而他们，这些可怜的人，在疏散后搬进的条件很差的厂房里还没有完全开工。有时他们先把机床往水泥地上一放就开始干活，然后再起围墙和盖屋顶。

但是必须，必须完成订货——前线需要，斯大林下了命令！

斯大林非常重视预备队的组建。他在多次战役中在紧要关头动用自己的预备队，从而取得了苏军在防御战役和进攻战役中的胜利。

但斯大林还不满意，他在寻找在决战以前的战役过程中，在战斗行动指挥的重担全都落在方面军和集团军司令的肩上时，左右交战胜利结局的办法。最高统帅明白这一点，想办法实际地和及时地帮助他们。

起初这种寻找是自发的：斯大林派大本营掌握的远程轰炸机团去支援指挥员们。后来他发现这样使用轰炸机的效果很好，于是决定组建由最高统帅掌握、而又能完成战术战役范围以外任务的远程航空兵。

斯大林决定和已具有完成类似任务经验的戈洛瓦诺夫将军商议此事。最高统帅把自己的意图讲给这个他所看重和尊敬的飞行员听。

戈洛瓦诺夫回忆与斯大林的谈话时说：“看得出来，斯大林寻找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已不是一天两天，他在把我们师直接交大本营管辖时已经在想组建远程航空兵了。现在这些构思要变成具体的组织形式，并且这项工作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在短时间内建立不起来这个庞然大物。这不仅因为要增加飞机和机组的数量，同时还需要弥补无法挽回的损失，因为在战争中不可能没有损失，而且这些损失不是能用一两位数来计算的。”

戈洛瓦诺夫说出了自己的考虑，但他所提的建议的规模不符合最高统帅的设想。斯大林不想扼杀对话者的主动考虑，于是很策略地问道：

“您不会反对我们把您的建议略加修改和扩大吧？”

“斯大林同志，这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但对于实际上怎样实现这一切，应该好好考虑。不可能一下子就都解决。”

斯大林回答说：“重要问题从来都不能一下子就解决。我会就组建远程航空兵颁布专门的决定，您也要参加决定的起草，您要针对空军专业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

“那么请让我与负责这件事的人见个面。我会把自己所有的考虑向他汇报，如果他同意的话，再一起报给您批准。”

“我现在正在和这个人谈话。”

“您是指我吗，斯大林同志？”戈洛瓦诺夫吃惊地问道。

“是的，就是您。”

戈洛瓦诺夫继续回忆说：

“尽管我本人当过飞行员，并且当了好几年最大的东西伯利亚民用航空管理局局长，机组在北方严酷的条件下穿越过几万公里的航线，但我依然不能想像我可以担负刚才谈到的这项责任重大的工作。我并不感到像以往接受任务时那么自信：我是否有权、而且是在战争期间，承担



这一任务呢？

‘斯大林同志，请允许我考虑一下。’我在相当长的沉默后说道。

‘您害怕了？’斯大林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我一下子脸红了，感到血在往脸上涌。

‘我从来不是胆小鬼，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平静地回答说：‘这我们早就知道。但您要学会自制，我们替您考虑过，您没有必要在这上面花时间。您最好考虑一下实际怎么做。不用着急，和您认为需要的人商量一下，两天后拿出自己的考虑来……’”

1942年3月5日国防委员会作出了关于组建远程航空兵的决定。

所有涉及远程航空兵保障和战斗行动指挥的原则性问题，不仅由国防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而且由斯大林亲自作出决策。

斯大林深入考虑所有的细节。这里面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交上来的决定草案提到，远程航空兵隶属于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因为当时认为“大本营附属航空兵”和“大本营航空兵”是同一个概念，所以斯大林删掉了“附属”一词，说：

“我们说好，远程航空兵是大本营的组织，而不是附属组织。如果想一个单位取得预期的结果的话，就要始终明确它的地位和任务。”

远程航空兵在1942年3月5日有飞机341架，其中171架可执行战斗任务，其余均不能使用；有机组367个，其中209个夜间飞行过。远程航空兵以这些人员和物力投入战斗。

后来才出现空军集团军和拥有几千架飞机，有自己的司令部、工程技术保障、后勤机关和机场服务的真正独立的远程航空兵。

有一个有力的指标可以证明远程航空兵的使用规模和效率：如果把红军空军向敌人投掷的炸弹数量算作100%，那么其中50%是远程航空兵投的。

一直担任远程航空兵总司令并获空军主帅称号的戈洛瓦诺夫对远程航空兵有一个简短而又十分准确的说法：

“最高统帅在主要方向上使用远程航空兵，可在任何时候在所需要的地方制造火力优势，而不必把时间花在调遣方面军空军上。远程航空兵成了战略预备力量。”

在整个战争期间只有斯大林向远程航空兵布置任务。远程航空兵不断被用于战斗，离不开最高统帅对空军的日常关心。我举一个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有说服力的例子。这也转引自戈洛瓦诺夫的回忆录：

“有一次斯大林把我叫去问道：

‘您把所有造好的飞机都及时从厂里拉走吗？’

‘我们在飞机造好后就拉走了。’

‘您有没有材料说明，是不是有许多飞机已由工厂交验、但未被军事代表接收而停在停机场上？’

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请求允许我搞清回答问题所必需的材料。

‘好吧。搞清楚后再给我回电话。’

我立即联系远程航空兵总工程师И.В.马尔科夫。他告诉我说，工厂停机场上没有已交验却未被接收的飞机。我马上打电话给斯大林作了报告。

‘您能不能来一下？’他问道。

‘能，斯大林同志。’

‘好吧，请过来。’

我走进办公室，看见一位将军——一位职位很高的空军将领（我不说这个人是谁，他已不在人世）——正在那里激烈地向斯大林论证着什么。我仔细听了一下，明白他们在谈有许多飞机停在工厂停机场上。据说这些飞机已交军方验收，但因当时所说的‘不能作战’而未被接收，就是说它们有各种技术故障，不排除这些故障，飞机就上不了天。将军最后说：

‘沙胡林（航空工业人民委员。——戈洛瓦诺夫注）在对您撒谎，斯大林同志。’

‘好吧，我们把他叫来。’斯大林说。他按了一下按钮，波斯克列贝舍夫走了进来。‘请沙胡林到这里来。’

斯大林又问了我一遍是不是确切知道厂里有没有已交验、但未被接收的用于远程航空兵的飞机。我报告说，远程航空兵总工程师告诉我说没有这样的飞机。

我补充说：‘他的材料也许不是今天的，但我们密切注意着每架飞机的生产。您知道，我们还在组建新的部队，可能会有一两架飞机停在什么地方。’

‘我们不是在谈一两架的问题。’斯大林说。

几分钟后阿·伊·沙胡林到了。

斯大林说道：‘这里有人对我们说，您所说的那700架飞机停在工厂停机场上不是因为缺少飞行员，而是因为它们不能作战才未被军事代表接收，飞行员已经等了几个月了。’

‘不是这样的，斯大林同志。’沙胡林回答说。

‘看到了吧，这是怎么搞的：这个说有飞机，但没有飞行员；那个却说有飞行员，但没有飞机。你们两个明不明白，700架飞机可不是7架飞机？你们知道前线需要飞机，而这里却够一整个集团军。我们该怎么办，应该相信你们中的哪一个？’

一片沉默。我好奇而又吃惊地听着这番谈话：就算不能作战或者因为缺少飞行员，有整整700架飞机停在工厂停机场上，这难道是真的？我从未听说过有这么多飞机停在工厂停机场上。我一会儿看看沙胡林，一会儿看看空军将军。谁是对的呢？

终于将军打破沉默说道：

‘斯大林同志，我向您报告，停在工厂的飞机不能作战！’

‘您说什么呢？’斯大林再次转向沙胡林。

他回答说：‘斯大林同志，这一点很容易查清。您这里有直达电报，请您下令让每位飞机厂厂长向您本人报告已造好的飞机数量。我们把这些数字加起来就会得到总数。’

‘好吧，很对。我们就这样做。’斯大林同意了。

将军插话说：

‘必须要让军事代表和厂长一起签署电报。’

‘这同样很对。’斯大林说。

他叫来助手，给他布置了相关的指示。空军将军请斯大林找来掌管工厂订货的H. П. 谢列兹尼奥夫将军。谢列兹尼奥夫很快到了，斯大林让他计算停在工厂停机场上的飞机数量。应该说，通信组织得很好，过了不大一会儿，工厂发来的由厂长和军事代表签名的电报就摆到了桌子上。此时谢列兹尼奥夫也计算完了。

‘工厂有多少架飞机？’斯大林问助手。

‘701架。’助手答道。

‘您的结果呢？’斯大林问谢列兹尼奥夫。

‘我的结果是702架。’谢列兹尼奥夫答道。

‘为什么不把它们开走呢？’斯大林又问谢列兹尼奥夫。

‘因为没有机组。’谢列兹尼奥夫答道。

他的回答，而主要是他的语调，不会使人对工厂缺少机组产生任何怀疑，这个问题大家早就知道了。

我不是作家，而且我认为，即便是作家，甚至是很有天分的作家，也无法描绘谢列兹尼奥夫将军的回答给人们所造成的印象。我找不到合适的比喻，因为甚至是果戈理喜剧中‘钦差大臣要到我们这里来’这句台词后面的著名场面也不能与我当时在斯大林办公室里看到的情景相比。这个情景不能用来比较，首先是因为这里发生

的是真实的、但却是可悲的事实。在场的所有人，包括斯大林在内，都僵在那里一动不动，只有谢列兹尼奥夫一个人不明就里地平静地看着我们大家。就这样持续了很长时间。不管谁，甚至是说得对的沙胡林都不敢继续说话。他如通常所说已经准备好作战斗，却显然也被这一回答的简单和确凿所震惊了。

这显然是从未发生过的事。往下会怎么样呢？我看了一眼斯大林。他面色苍白，睁大了眼睛看着空军将军，显然对所发生的一切感到不可思议。可以感觉到，令他震惊的不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飞机停在工厂停机场上，这一点他早已知道，而是将军在撒谎时那么肯定，那么信心十足。

斯大林的脸色终于泛起红晕，看得出来，他控制住了自己。他转向沙胡林和谢列兹尼奥夫，对他们表示感谢，让他们走了。我想跟他们一起走，斯大林却用手势制止了我。他慢慢走到将军跟前。他的手抬了起来。

‘滚！’他充满鄙夷地说道，把手放了下来。

将军急忙出去了。只剩下我们两个。

很长一段时间斯大林一言不发地在房间里踱步。

他把我叫来，让我看见刚才发生的一切是为了什么？是给我上一堂直观教学课？也许如此。这种场面会终生留在记忆里。他现在会拿将军怎么办？

‘试试看去和这种人一起打仗和工作。他连他管辖的地方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斯大林终于打断我的思绪说道……”

对斯大林的专横和冷酷无情有过很多描述，似乎在发生这件事后这位倒霉的将军的命运已经决定了，因为斯大林感到的不是气愤，而是真正的暴怒。只要一句话就足够了：“拉夫连季^①，办一下！”但这只是现在的揭露者们所描绘的斯大林。

斯大林能够体谅战争期间出现的错误和困难。不错，他惩处人，撤销高官的职务，但都做得公正。谁有过错，谁就接受惩罚。但这一次他尽管大发雷霆，却宽恕了将军，将军继续任职，获得奖赏（值得奖励时），甚至荣获空军主帅的称号。

既然亚历山大·叶夫根耶维奇·戈洛瓦诺夫没有提他的名字，我也不会这样去做。

^① 指贝利亚。——译者注



* * *

我仔细研究了1994年出版的一本印数很少的独特的书：《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秘密书札（一位苏联将军的工作笔记）》。它的作者是坦克兵上将Н. И. 比留科夫，他在整个战争期间担任红军装甲坦克和机械化部队总局副局长。这本书记载了几乎每周都有的斯大林的个人谈话和指示，斯大林在这些谈话和指示中始终领导坦克兵团的组建，亲自分配出厂的坦克，并不断通过厂长领导坦克厂的工作和设计师的坦克改良工作。这些记录证明了斯大林对坦克战术、装备和生产问题有深刻的了解。我们不可能从中引用太多的文字，但为了使读者对斯大林的这些指示有一些了解，我从比留科夫将军的记录中引用两三个例子。

1942年1月3日

斯大林同志的指示

转到组建机械化军上来。每支坦克军有两个全员的坦克旅。坦克旅分缩编旅（各46辆坦克）和全员旅（各93辆坦克）。每军有两个全员的坦克旅和两个摩托步兵旅，各有2500~3000人。每军要有187辆坦克。六个方面军各配备一个军，每个集团军各配备两个缩编旅。每个方面军应至少有两个机械化军。这些部队的组建是当务之急，即在2月份以前完成。

组建12个军。按照从前摩托步兵师的编制并加以缩编。配备大炮、高射炮和82毫米、120毫米口径迫击炮。

制定全员坦克旅和缩编坦克旅的编制并在今后不作改动。

尽快为南方面军配备机械化军。

挑选机械化军军长的人选并报斯大林同志批准。

对1942年1月3日谈话的说明

最高统帅在这一天两次给Н. И. 比留科夫打电话，一次看来是在早晨，另一次可能是在傍晚前。两次谈话都是他作指示。

比留科夫在1月3日作的两段记录补充说明了红军为1941~1942年冬总攻所作的准备，众所周知，历史学家认为这场总攻是从莫斯科附近的反攻“演化而来”的。

1942年7月4日

斯大林同志的指示

1. 仍由基洛夫厂生产KB型坦克，日产5~6辆、月产150辆。

2. 从1942年7月5日起停止T-60型坦克的生产。
3. 生产1800~2000辆T-34型坦克。
4. 为各旅配备轻型美式坦克代替T-70型坦克。
5. 在第37厂和第264厂组织生产T-34型坦克。在基洛夫厂也是如此。
6. 在7月份……
7. 组建：

在斯大林格勒组建6个连	} T-34型坦克补充连
在高尔基市组建5个连	
在新塔吉尔组建9个连	
共组建20个连	
在沃罗涅日以东	
8. 暂不给梅列茨科夫坦克。
9. 在7月份给工厂1350辆T-34型坦克、700辆T-70型坦克。
10. 给费多连科军队集群9个补充连，每连有10辆T-34型坦克。
11. 各坦克军要有预备的坦克。
12. 7月份第183厂要生产600辆坦克，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要生产420辆，第112厂要生产250辆，第174厂要生产50辆，高尔基汽车厂要生产450辆。

1943年5月14日0时10分

斯大林同志的指示

1. 6月5日前恢复坦克第3集团军。
2. 使西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中央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这五个方面军部队的坦克数量达到6000辆。
3. 分别为上述五个方面军的坦克和自行火炮配备15个加油站。
4. 起草向人民委员提交的关于为每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配备两个坦克团的报告和建议。
5. 在三个近卫步兵师的基础上组建三个机械化军，每军各有五个坦克团。
6. 授予坦克第12军、坦克第15军和坦克第179旅近卫军称号。

对1943年5月14日谈话的说明

在这次谈话时，西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中央方面军、沃



罗涅日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部队已完全作好打退敌人宣告库尔斯克会战开始的突击的战斗准备四个昼夜了。不管在前线还是在后方，从士兵、集体农庄庄员、工人到统帅和国家领导人，包括大本营、总参谋部和装甲坦克总管理局，所有人都在等待这一突击。最高统帅坐镇在他的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

斯大林命令西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中央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这五个方面军的坦克数量要达到6 000辆，从这些任务的性质当然不难猜出，在预期的会战防御阶段后将开始真正横扫一切的进攻阶段，因为6 000辆战斗车辆正是为这一打算而准备的。

斯大林平时也对空军、炮兵和其他兵种的供应作类似的指导。

“斯大林具有十分出色的、记得又牢又多的记忆力，能记住与讨论的问题有关的一切细节，绝不允许偏离已制定的决定或评价的实质。

他几乎知道直到厂长和师长在内的所有经济部门和武装力量的领导人的名字，记得有关他们本人以及他们分管工作情况最重要的材料。

他有从大量材料、情报和事实中提炼出最主要、最本质内容的分析型智力。

斯大林在表述自己的想法和决定时清晰简练，带有不可辩驳的逻辑性。他不喜欢也不说多余的话。

武器装备人民委员 德·费·乌斯季诺夫”

斯大林坚持不懈地对所有工业部门进行密切指导，以至每位部长都认为自己的工作斯大林首要关心的对象。我们从上面已经知道他对坦克的态度，以下是其他部长说的话：

“我觉得约·维·斯大林对炮兵和炮兵工业表现出最大的热情。

他确实十分关心所有的国防生产部门。例如，他经常过问航空工业。当时领导这个部门的阿·伊·沙胡林比其他人民委员都更频繁地去他那里，可以说几乎每天都去。斯大林研究生产飞机和飞机发动机的日报表，要求对每次偏离进度表的情况作出解释并采取措施，仔细研究与建造新飞机和发展航空工业有关的问题。他同样积极参与研究坦克工业和造船业工作的问题。

但尽管如此，仍能感到斯大林对炮兵和火炮工业的特殊喜爱。

这可能与他对他以前的军旅生涯的回忆有关，当时只有炮兵决定战斗进程，而其他种类装备尚未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取得的高水平发展。

约·维·斯大林在表达他对炮兵的看法时重复了一句名言：
‘炮兵是战神。’

弹药人民委员 鲍·利·万尼科夫”

应该说，斯大林是在交战过程中观察炮兵的使用尤其是在进攻战中的使用，得出必须完善炮兵战术的结论的。战役中通常在进攻前进行炮火准备，以歼灭和压制敌人在纵深2~3公里的前进阵地的火力点。炮火随步兵和坦克转入冲击后停止，如步兵和坦克进展顺利，炮兵则转换火力阵地，跟在部队后面前进。

在战争进程中防御得到完善，防御的几个阵地纵深达15~20公里。进攻前的炮火准备不能使在敌人防线深处的战斗得到保障。斯大林对他的结论作了如下表述：

“在我军步兵开始冲击前的炮火准备，也就是炮兵轰击敌人，不管延续半小时、一小时甚至是两小时，随我部队转入冲击而停止——这套办法早已过时并且应该抛弃。敌人拥有很深的梯次防御，不再像我们在莫斯科附近反攻时的‘锁链型’作战。炮火准备根本不足以摧毁这种防御，因为炮兵不能压制整个防御深度的敌人及其火力兵器。不是炮火准备，而是炮兵进攻——这才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炮兵应当与步兵一起进攻，这意味着步兵不应该在炮火准备结束后进攻，而应该与炮兵一起进攻，炮兵在护送步兵时应当压制敌人的所有火力兵器，直到敌人的防御被全线摧毁为止。迫使步兵在没有炮兵支持、在没有护送的情况下进攻，这不是进攻，而是犯罪，是对被迫作出无谓牺牲的部队的犯罪。”

除对部队的训令性指示外，斯大林对炮兵战术的建议被收入1942年批准的新《步兵战斗条令》。

* * *

苏军在1943年开始佩戴肩章。安德烈·瓦西里耶维奇·赫鲁廖夫受命设计既漂亮庄重、又简单方便的军服样服。各种样服制成后被送往

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一时间成了一个展厅。斯大林仔细察看展示的样服，末了问道：

“这里有没有旧俄军队普通军官穿的军服？”

原来真有这样的军服，但被放在一边，因此不引人注目。展示的这套样服非常朴素：带肩章的制服上衣加裤腿不塞进靴筒里的裤子是常服；带肩章的保护色军便服加裤腿塞进靴筒里的裤子是野战服。礼服也是这样，只不过绣了金线。斯大林让人介绍这种制服有多少年头了，经过哪些修改，他认真听取了后勤人员的回答。

“旧俄军队的改进制服用了多长时间？”斯大林问道。

“旧俄军队在其存在期间一直在改进制服。”人们这样回答说。

“那这里展示的其他制服呢？”

“这里展示的所有制服都是新的，刚刚设计制作出来的。”

“我们干嘛放着经过检验的不用，而去使用未经试验过的呢？”斯大林说。

于是部队就采用了早已使用的制服，它完全符合要求。

斯大林甚至在打仗期间也关心军队的外表。

* * *

斯大林的工作风格是完全精通业务，真抓实干。

“约·维·斯大林在决定重要问题时通常把直接执行人找来，听取他们的观点。顺便说一句，他喜欢在和别人商量后当着他们的面起草已作出的决定，向总参谋长或波斯克列贝舍夫口授将要发出文件的内容。

斯大林一贯要求向他提供有关每一讨论问题的详尽情报，绝不放过任何利用这些同志建议的机会……

斯大林喜欢有理有据、说服力强和经过周密考虑的报告内容。

海军人民委员 尼·格·库兹涅佐夫”

“斯大林最不喜欢忙乱。如果他作出决定、已经说过和交代过，就应该严格按照时完成，不能拖拉。他身边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斯大林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不惜采取最严厉的措施。

我不记得他什么时候手忙脚乱过。他对在他那里讨论的问题都能立即作出决定，像通常所说的，立等可取，不过这只是在经过必定有专家参与的全面讨论之后，专家的意见总能得到认真听取并常常起决定性作用，甚至是起初和斯大林本人的观点有分歧时也是

如此：

‘……如果您确信并能证明自己是正确的，那就任何时候也不要顾及别人的意见，而要凭理智和良心去做。

……您自己怎么想的，就请怎样回答，不要迎合。和我谈话不需要这样。如果您揣摩我的意愿，我们的谈话就不会有多大好处。不要以为如果您说的和我的意见相左会很糟。您是专家，我和您谈话是为了向您学一点东西，而不只是为了教训您。’

‘我想问，他懂行吗？’

‘是的，斯大林同志，他是一个诚实的人。’

‘收起您的这些修饰语吧——诚实的，合适的。诚实还不行，单凭诚实还不够，傻瓜也有诚实的。我们需要他不光是诚实，而且还懂行。’

‘每个人都有缺点和工作中的失误，圣人是不存在的。因此要宽容每个人工作中的小缺点，重要的是利大于弊。您以为自己没有缺点吗？’他用手碰了碰我的肩膀，‘您也有缺点。连我也有缺点，尽管我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这是我从报纸上知道的。’斯大林开玩笑地说。

飞机设计师 亚·谢·雅科夫列夫”

军事交通部部长、后来的苏联交通部长 И. В. 科瓦廖夫是这样说的：

“所有调运部队及其战斗技术装备的行动都是在最高统帅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斯大林对一切行动中、尤其是军事调运中保守机密格外关心并对违规者采取断然措施。

每一列军用列车和运输车都有自己的代号，它们的运行情况一天四次向军事交通站报告，一天一次把这些材料填到运行图上，在这张运行图上可以迅速找到任何一个运送的兵团或武器运输车的位置。军事交通站定期向斯大林汇报已完成的工作，他也经常亲自打电话去询问他关心的兵团的运送情况。军事交通站站长靠运行图几乎马上能回答出他的问话，指出军列首末车的所在地。军事交通站经常按斯大林的要求给这一或那一兵团一路绿灯放行。”

这是最高级的专业人员对斯大林活动的看法和评价，他们在许多年里日复一日地在他的领导下工作。

但无论斯大林是一位多么出类拔萃、才能非凡的领导者，一个人总



是难以胜任如此繁重的工作。斯大林本人比其他人都更明白这一点，因此他依靠在五年计划期间和他一道取得许多成就的忠实战友。良好的关系、对这些志同道合者的信任，是一件好事，但斯大林在党和国家事务上是一丝不苟、非常严格的，除在口头上为这些最亲密的助手分配职责以外，总书记为了加强（和激励）他们的责任感，在1942年2月4日通过国防委员会的决定来明确他们各自的责任范围。

“维·米·莫洛托夫同志：监督执行国防委员会关于坦克生产的决定并准备相关问题。

格·马·马林科夫和拉·巴·贝利亚同志：（a）监督执行国防委员会关于飞机和发动机生产的决定并准备相关问题；（b）监督执行国防委员会关于红军空军事务的决定（组建航空兵团并及时调往前线，组织问题和工资问题）并准备相关问题。

格·马·马林科夫同志：监督执行国防委员会关于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迫击炮部队司令部的决定并准备相关问题。

拉·巴·贝利亚同志：监督执行国防委员会关于武器和迫击炮生产的决定并准备相关问题。

尼·阿·沃兹涅先斯基同志：（a）监督执行国防委员会关于弹药生产的决定并准备相关问题；（b）监督执行国防委员会关于黑色冶金业的决定并准备相关问题。

阿·伊·米高扬同志：监督红军供应工作（物资供应、粮食供应、燃料供应、资金供应和炮火补给）并准备相关问题。

国防人民委员部各供应和运输机关受国防委员会委员米高扬同志的监督。批准雅科夫列夫同志为国防委员会委员米高扬同志在炮火补给问题上的副手。”

这项决定在斯大林同志总的领导下得到了严格执行，在需要时作过修改。例如，给沃兹涅先斯基增加了“监督黑色和有色金属、石油、煤炭和化学制品生产”，给马林科夫增加了“监督飞机和发动机生产以及组建空军部队”。



第五章

战略转折

红军……不只是从敌人手中解放苏联国土，而且通过实施堪称军事学典范的围歼敌军的重大战役而不让敌人活着逃出我们的国土……

最高统帅
约·斯大林^①

^① 《斯大林文集》第367页。——译者注

一 伏尔加河畔的大决战

这确实是历史上有过的一场大会战。不妨请读者自己作出判断：汉尼拔在坎尼附近的经典合围成了几乎全歼敌军的成功战役的典范和象征。参加那场战斗的罗马军队有63 000名步兵和6 000名骑兵，汉尼拔有40 000步兵和10 000骑兵。罗马步兵的密集方阵撞到汉尼拔摆的蹄铁形战斗队形上，钻入为他们设下的包围圈里。汉尼拔从后方调动骑兵堵住蹄铁形出口，太伦斯·瓦罗的罗马军队几乎全军覆灭。斯大林格勒会战也正是按这种方式来打的。

拿破仑抱着征服俄国的目的带领60万大军入侵俄国，而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仅德方就有100多万官兵参加，投入了675辆坦克，1万多门大炮和1 216架飞机；我方也有100多万人参加战斗，武器有15 500门大炮和迫击炮、1 463辆坦克和1 350架战斗机。他们共组成15个集团军，每个集团军的人数都超过坎尼交战中的罗马军队和汉尼拔军队。

另外还要加上空间规模。这场决战的战线绵延达500多公里。数十名赫赫有名的将领将其经验运用到这场会战的进程中，各级人员，从高级指挥官到普通士兵，创造了数以千计的英勇功勋。要对这一切进行总结和思索当然并非易事。

我翻阅了学术著作、档案文献以及不仅是我方、还有德方的这场决战参加者的回忆录，深知历史在生活中或是战场上只有过一回，而后来却随着当时政治倾向的变化而多次改写。

同样改变的还有评价。例如，1961年出版了六卷本的《1941~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我翻开第3卷，其中有一章是《斯大林格勒城下德国法西斯军队被歼》。这是很厚的一卷书——有650多页，其中斯大林格勒会战占了73页。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呢？在这73页中一次也没有提到斯大林！组织和进行斯大林格勒决战的创意权现在被说成完全是属于另外一些人的。以下是摘自这本书的原文：

“10月6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安·伊·叶廖缅科上将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尼·谢·赫鲁晓夫中将向大本营提出组织和进



行进攻的建议。”

叶廖缅科元帅在他的回忆录《斯大林格勒》中这样描述斯大林格勒战役计划产生的经过：

“1942年9月有一次我与约·维·斯大林同志通高频通话，末了，我又重提准备反攻的问题。尽管是高频通话，当然也要作相应的防范。

我对最高统帅说：‘斯大林同志，我们是不是该开始准备在北边和南边“挪动一下”了？这样做的条件正在成熟。’

约·维·斯大林回答说：‘好的，叶廖缅科同志，我们考虑一下准备挪动的问题……’

我立刻把刚刚与最高统帅通话的消息告诉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书是在1961年出版的，读者自然明白为什么在这里提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下面的引文也都是这个调子。——本书作者注）。

我们在谈话中对突击的方向、进攻的集中地域和出发地域、突击要对付的敌人部队、敌人预备队和部署等所有重大问题都详细进行了讨论。我们的计划就这样形成了……我们在作出十分明确的结论后决定写成文字并向大本营呈报。阐述如何在斯大林格勒附近歼灭希特勒军队的构想的文件就此产生。”

从这段引文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制定了反攻计划，因此所有的荣耀和胜利都属于这个司令部，也就是叶廖缅科和赫鲁晓夫。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想法是怎样产生的，是谁制定的又是由谁来实施的呢？

德国人策划对斯大林格勒实施的突击是辅助性的，用以保障实现其主要进攻目标——夺取巴库的军队集群左翼。然而对斯大林格勒的进攻在交战过程中变成了德军主要的着力点。希特勒想减轻完成夺取产油区任务的难度。因此他甚至把部队（主要是坦克第4集团军）从高加索方向调到斯大林格勒方向。希特勒匪徒深入我国领土，直抵伏尔加河，造成了把我国和战场分割成彼此隔绝的两部分的威胁，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实施对斯大林格勒的防御。

1942年8月27日，斯大林把朱可夫从西方面军召回莫斯科。斯大林当时心情不佳，他在打过招呼后说道：

“南方情况不妙，德国人有可能占领斯大林格勒。北高加索的形势也不太好，德国人越来越逼近巴库油田了。”

斯大林稍停了一下，踱了几步，缓和了一下语调，接着说道：

“朱可夫同志，国防委员会决定任命您为副最高统帅。国防委员会还决定把您派往斯大林格勒地区。现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马林科夫同志和马雷舍夫同志在那里，您什么时候能动身飞往斯大林格勒？”

朱可夫回答说：

“我需要一昼夜时间，斯大林同志。我要在总参谋部里研究态势，第二天就飞往斯大林格勒。”

“那好！您不饿吗？”斯大林冷不丁地问道，“不妨稍稍吃一点。”

没有某些人以为的丰盛菜肴和珍馐美味，而有人甚至编造为高级首长提供上等供应。送上来的是茶和十份夹肉面包。

斯大林在喝茶时讲了8月27日当天的态势：

“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以北逼近伏尔加河，现在试图沿河岸突击夺取城市。德军空军每天出动上千架次支援自己的部队。我从我的预备队中抽出第24和第66集团军从翼侧突击逼近伏尔加河的敌军。您必须采取措施使莫斯卡连科将军的近卫第1集团军在9月2日发动反突击，并在其掩护下使第24和第66集团军进入出发阵地。这两个集团军必须立即投入战斗，否则我们会丢掉斯大林格勒。”

朱可夫在第二天已来到伏尔加河畔。他见到华西列夫斯基，后者向他详细介绍了局势和最新战况。他们去近卫第1集团军指挥所找到莫斯卡连科将军，并打电话叫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戈尔多夫中将。大家一起制定并讨论了斯大林交代朱可夫立刻进行的近卫第1集团军的局部反突击计划。朱可夫在盘算各种可能性之后，考虑到所有部队都已集中和准备完毕，便打电话给斯大林，报告说实施反突击可能不早于9月6日。斯大林表示同意并请华西列夫斯基立刻飞回莫斯科。

朱可夫在9月3日收到斯大林的电报：

“斯大林格勒的局势恶化了，敌人距斯大林格勒三俄里。如北军队集群不马上支援，斯大林格勒可能在今明两天失陷。请下令位于斯大林格勒以北和西北的各部队指挥员立刻突击敌人，支援斯大林格勒的守兵。不得有片刻迟延，现在迟延就等于犯罪。应派全部飞机去支援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城中飞机很少了。”

朱可夫当时就给斯大林打电话报告说：

“我可以下令明天就发起进攻，但整整三个集团军的部队将不得不在几乎没有弹药的情况下开战，因为弹药不可能在9月4日傍晚以前送到炮兵阵地。另外，我们不可能在此之前组织好部队与炮兵、坦克和航

空兵的协同动作，而做不到这一点将一事无成。”

“您以为敌人会等您慢慢腾腾地弄好了再干吗？叶廖缅科断定，如果您不马上从北面实施突击，敌人只要一猛攻，就能拿下斯大林格勒。”

斯大林显然在发脾气。但朱可夫为了事业——为了不造成无谓的伤亡，并且主要是为了不削弱进攻而坚持自己的看法，他说：

“我不同意叶廖缅科的这一观点并请允许我按原定时间在5日发动进攻。至于航空兵，我现在就下令全力轰炸敌人。”

斯大林同意说：“那好吧！一旦敌人向市区发起总攻，您不要等到部队准备就绪，就立刻向敌人冲击。您的主要任务是把德军兵力从斯大林格勒引开，如果可能的话，还要隔开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的德军走廊。”

马林科夫正在近卫第1集团军司令部里。凌晨3时，斯大林给马林科夫打电话询问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部队转入进攻的准备情况。马林科夫讲述了在朱可夫领导下所做的大量工作。可见斯大林行事的原则是：“给予信任、但要检查”。他没有和朱可夫本人通话，但通过马林科夫还是对工作情况作了检查。

9月5日拂晓发起进攻。近卫第1集团军、第24和第66集团军在炮火准备和航空火力准备后向前推进。但进展并不顺利。敌人打退了所有冲击，第24集团军甚至没有离开自己的出发地位。

最高统帅在傍晚打来电话，他问：

“情况怎么样？”

朱可夫报告说：

“整整一天战斗非常艰苦。敌人不得不把从古姆拉克地区调往斯大林格勒以北的新部队投入战斗。”

“这已经不错了。把敌人从斯大林格勒引开。”

“我军部队进展不大，有些还停留在出发地区。”

“这是怎么回事？”

“我军由于时间不够没有来得及作好进攻准备，没有进行炮火侦察并搞清敌人的火力配系，因此自然不能把敌人的火力压下去。当我军转入进攻时，敌人就以其火力和反冲击阻止住我军进攻。此外，敌航空兵掌握着制空权，轰炸我军部队。”

我想，从这个报告中不难听出：朱可夫埋怨斯大林命令在缺少应有准备的情况下转入进攻。他似乎是说：“我早知道不会成功，因为没有相应的准备。”

但斯大林坚持己见：

“继续冲击。您的主要任务是把尽可能多的敌人兵力从斯大林格勒



调开。”

6日和7日，集团军的反复冲击依然未见成效。部队伤亡惨重。9月10日，朱可夫在又一次巡视集团军部队和兵团后，终于坚信以现有兵力无法突破敌军的战斗队形并肃清他们的走廊。他通过高频电话向最高统帅汇报了这一看法。

朱可夫在报告末尾作了如下结论：“以现有兵力和部署继续冲击是没有用的，而且部队必然要遭受重大的伤亡。需要补充部队和调整部署的时间，以实施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较为集中的突击。集团军突击不能打败敌人。”

读者是否发觉这句话中已流露出对规模更大的部署和策划更大的战役的暗示？是的，简直就是在直截了当地说：反攻需要部署的不是几个集团军，而是几个方面军。

斯大林很重视这一建议：

“还是您来莫斯科当面向我详细汇报这些问题来得好。”

9月12日白天，朱可夫已经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了，斯大林把总参谋长亚·米·华西列夫斯基也叫去了。

我觉得有种种理由推测，斯大林已经明白必须采取某些更坚决的措施，以摆脱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危急状态，否则斯大林不会急忙把朱可夫从前线召回。另外他也不是平白无故地把华西列夫斯基请来参加这场谈话的。最高统帅看来已准备在小范围内作出断然决策。

华西列夫斯基首先汇报了态势。他特别详细地讲到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两个方向。

斯大林总结说：

“敌人不惜一切代价地要夺取格罗兹尼的石油。好，现在来听听朱可夫的意见。”

朱可夫实际上重复了他在他最后一份密码电报中向斯大林报告的内容——以有限兵力进攻毫无意义，只能带来伤亡。斯大林仔细听完他的话后问道：

“要肃清敌人的走廊并且和东南方面军会师，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还需要些什么？”

“至少还需要一个战斗力强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1个坦克军，3个坦克旅和不少于400门榴弹炮。此外，作战期间必须补充集中至少一个空军集团军。”朱可夫答道。

华西列夫斯基完全支持朱可夫的看法和计算。

斯大林拿出自己的地图。上面除各方面军的态势外还标出了大本营预备队的集中地点。



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趁斯大林看地图时小声交谈，说所有这些都是治标的办法，必须找到能彻底扭转局面的另外的解决办法。

斯大林听到他们的谈话。他走过来问道：

“你们指什么样的另外的解决办法？”

“应该准备反攻，并给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敌人以有力突击，迅速使我国南方的战略态势变得对我们有利。主要突击应放在斯大林格勒敌军集群的翼侧上，它们已深深楔入我国领土腹地。”

斯大林想了一下，说道：

“你们去总参谋部，计算出时间，想想部队如何部署。”

第二天 22 时，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来向斯大林报告工作结果。

“好吧，考虑好了吗？谁来汇报？”

华西列夫斯基回答说：“您下命令吧，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最高统帅走到地图跟前问道：

“你们拿的是什么东西？”

“这是斯大林格勒地域反攻计划的初步方案。”华西列夫斯基解释说。

“谢拉菲莫维奇地域的这个部队集团是怎么回事？”

“这是新的方面军。建立这个方面军是为了对斯大林格勒地域活动的敌军集团的战役后方实施猛烈的突击。”

“现在兵力够用来实施这样大规模的战役吗？”最高统帅问了一句。

朱可夫报告说，45 天后，战役可以得到必要的兵力和兵器的保障，而且能充分准备完毕。

“只限于沿顿河由北向南和由南向北突击，是不是更好些？”斯大林问道。

“不，那样的话，德国人能够迅速从斯大林格勒撤回他们的装甲坦克师，抗击我们的突击。而我军在顿河以西实施突击，就使敌人由于河流障碍而不能迅速机动，也不能以其预备队抗击我军集群。”

“突击集团调动的距离不会太远吗？”斯大林不无疑虑地问道。

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解释说，战役分为两个主要阶段：（1）突破防御，合围斯大林格勒的德军集团，建立牢固的对外正面，以把这一集团与外围敌军兵力隔开；（2）歼灭被围敌军，打消敌人解围的企图。

最高统帅说道：“还要对计划再考虑考虑，计算一下我方资源。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守住斯大林格勒。除我们三个外，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内容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伏尔加河畔大决战的意图就是这样酝酿产生的。而叶廖缅科所说斯大林格勒战役计划是“我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商量了一下”制定

出来的，其实是不符合实际的。

为了不受人的弱点和自负所左右，最终确定究竟谁是计划的创意人，我们还是来看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总参谋部档案中保存着一幅大地图，最上端写着：“斯大林格勒地域反攻计划”。地图上标着我军和敌人部队的分布，从我军集团的标记、突击的方向和卡拉奇地域的会师地点，可以清楚地看到合围的意图。在“战斗要图纪要”中列举了参加这一战役的兵团和兵力、其他对加强手段的计算，明确了方面军和集团军近期和后期的任务。地图最下端是制定者格·康·朱可夫和亚·米·华西列夫斯基的签名，在最上边战役名称的左边，用蓝色铅笔写着“批准”的字样，并有斯大林的签名。

我以为，看过上面引用的文字、事实和文件后，对斯大林、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这三位杰出首长制定反攻计划并实施战役本身不应再有任何怀疑。

斯大林没有限于在小范围内制定计划。他在11月13日请来了政治局委员和国防委员会委员们，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对即将进行的战役计划作了十分详细的介绍和讨论。政治局委员和国防委员会委员们赞同这一计划。

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在讨论反攻计划时提请最高统帅注意，德军统帅部在斯大林格勒和北高加索地域一出现严重的局面，就会被迫从其他地域，尤其是维亚济马地域抽调部队来增援其南方集团。

为了防止发生这种情况，必须迅速在维亚济马以北地域准备和实施进攻战役，并且首先应歼灭勒热夫突出部地域的德军。他们建议由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面军部队来实施这一战役。

斯大林说道：“这很好，但是你们当中哪一位来负责这件事呢？”

朱可夫事先与华西列夫斯基已经商量好了，因此说道：

“斯大林格勒战役在各方面已经准备就绪。华西列夫斯基可负责协调斯大林格勒地域的部队行动，我可以负责准备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面军的进攻。”

斯大林同意了这一建议，他明白朱可夫在西方面军出现会立即引起德方情报机关的注意。德国人已经知道，哪里有朱可夫，哪里就会发动进攻。这非常有助于斯大林格勒的进攻，因为德国人不会把部队从朱可夫所在的地段上撤走。

但是，斯大林很看重朱可夫帮助部队作好进攻准备的能力，虽然同意他离开，却没有马上放他走：

“请您明天早上飞往斯大林格勒。再检查一遍部队和指挥人员的战役前准备，然后再去勒热夫。”



在制定反攻计划的这些天里，斯大林格勒城中一直在进行激战，全世界都在关注这场实际上关系到战争结局的大决战的进程。斯大林抽调了六个师来增援这两个集团军才使城市得以守住。战役中，第62集团军（司令是崔可夫）和第64集团军（司令是舒米洛夫）的指战员表现得无比坚毅。

此外，斯大林和总参谋部在这些艰苦卓绝的战斗中为即将发动的进攻组建了新的兵团。最高统帅格外关注两个坦克集团军的组建，按他的设想，这两个集团军应迅速包抄和实现合围。斯大林整夜不停地打电话，从坦克厂厂长那里“挤出”甚至是苦苦求来武装这两个集团军的坦克。工厂疏散到了新地方，还没有完全开工，但工程师和工人不睡觉不休息地组装坦克，否则不行——是斯大林亲自在要求！

争夺斯大林格勒的战斗打了三个多月。苏军的顽强震惊了整个世界。

大本营、总参谋部以及方面军和集团军的司令最终组建了强大无比的反攻军队集团：瓦图京的西南方面军，由近卫第1集团军、坦克第5集团军及空军第21和第17集团军组成；罗科索夫斯基的顿河方面军，由第65、第26和第66集团军组成，由空军第16集团军配合；叶廖缅科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由第62、第64、第57、第51、第28集团军和空军第8集团军组成。总共有110多万人，1463辆坦克、15500门大炮和1350架飞机。整个大军都要伪装起来，以免被敌人的侦察机发现。伪装工作做得非常好。此外，在按既定计划突击集中部队期间禁止使用无线电和电话交谈。

11月19日，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第65集团军在十分强大的炮火准备和航空火力准备后率先扑向敌人。他们穿透了战术地幅的筑垒阵地，第1、第26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便立即投入预定的突破口（纵深5~6公里），骑兵第3和第8军紧随其后。

不妨设想一下这只由装甲机械化战车和战马组成的重拳——几十公里的大地在它们疾驰下颤栗！敌人投入全部兵力来抵抗突击。一昼夜后，11月20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部队向前猛进，他们在第一天就打垮敌人并突破敌人防御。11月23日，西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实现合围，围住了多达33万名官兵的德军22个师！

指战员们如常言所说为——扫过去所有的失利扬眉吐气——希特勒匪徒在他们的痛打之下惊慌失措。

说到这里本应该讲一讲斯大林及其统帅们所擅长使用的出其不意这一军事学术元素，但我不想打断叙述过程。当天，11月23日，西南方面军的近卫第1集团军、坦克第5集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第51



集团军奉命追击溃敌的残部，并把他们往包围圈以西尽可能远的地方赶。

* * *

各级斯大林格勒保卫者，从方面军司令到普通战士，都表现出高超的技能和无所畏惧精神。限于篇幅，我不可能一一尽述所有小胜利中激动人心的情节——尽管正是由这些小胜利积成了大胜利——但我还是要讲述其中的某些情节，其中尤其体现出斯大林杰出的个人功勋。

除组建保障斯大林格勒会战取得胜利的预备队外，斯大林还实施了另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措施”。如果没有斯大林的这一助力，就可能不会出现现在闻名遐迩的斯大林格勒史诗。

历史惊人地造就了俄罗斯军人的功勋！功勋是那样的多，以至我们遗忘了看似微不足道、实则惊天动地的伟大英勇事迹和行为。非常令人奇怪和惊讶的是，无论在学术著作、还是在文艺作品中我都没有找到有关这一具体功勋的材料。只有亚佐夫元帅由于记忆力非凡对我讲起了这件事，并送给我一本大家都已忘了的关于铁道兵的书，我从这本书中借用了一些数字和情节。

功勋与功勋不同：有的只花了几秒钟，例如马特洛索夫^①；有的花几分钟，例如加斯捷洛^②；有的花几小时，例如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③；有的花几年，例如波克雷什金^④和卡尔贝舍夫^⑤；有的花毕生时间，例如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⑥。英雄事迹可以由一个人（如以上几个人）也可以由集体完成，这就是塞瓦斯托波尔、莫斯科和其他英雄城市的保卫者，而在我们今天则是不朽的车臣空降兵第6连或者是“库尔斯克号”潜艇官兵。

我这里要讲述的功勋是群众性的功勋，建立这一功勋的是从斯大林

-
- ① 马特洛索夫，亚·马·（1924～1943）——苏军列兵，苏联英雄。在战斗中用自己的身体堵住敌人土木发射点的射孔。——译者注
- ② 加斯捷洛，尼·弗·（1907～1941）——苏联飞行员，大尉，苏联英雄。他的飞机在战斗中被敌高射炮击中，他驾驶着火的飞机撞向敌人的坦克和油箱车，使敌人损失惨重。——译者注
- ③ 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卓娅·阿·（丹娘）（1923～1941）——苏联卫国战争的女英雄，游击队员，苏联英雄。她在执行任务时不幸被俘，宁死不屈。——译者注
- ④ 波克雷什金，亚·伊·（1913～）——苏联空军主帅，三次苏联英雄。在卫国战争时期先后个人击落敌机108架。他创造并使用了空战的战术方法并成功地组织指挥了许许多多次空战。——译者注
- ⑤ 卡尔贝舍夫，德·米·（1890～1945）——苏联军事工程师，科学家，工程兵中将，教授，军事科学博士，苏联英雄。在卫国战争初期在前线因重伤被俘，在集中营受尽折磨而死。——译者注
- ⑥ 奥斯特洛夫斯基，尼·阿·（1904～1936）——苏联作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作者。——译者注

到普通红军战士这千千万万人。

当希特勒匪徒对高加索及通往巴库油田的沿途以及后来对斯大林格勒方向实施突击时，斯大林明白一旦他们达到预期目标，苏联，也就是说还有苏军都会被拦腰截断，再也没有燃料，苏联欧洲部分领土上的全部铁路都将停运，由北向南和由南向北变更部队部署以及部队一切必需品的供应将会受到破坏。这尤其涉及到燃料供应，因为燃料当时主要来自高加索产油区。

斯大林在意识到这一点后下令紧急在乌拉尔建立石油储备。我本人在1942年还被拘押在塔夫达劳改营里，曾在距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不远处和其他“在押犯”一起修建过所谓的“石油坑”。工程专家选定深浅不一的沟谷，我们则修筑防止石油从沟谷中溢出的堤坝，并对沟谷的两面进行加工和加固。

载着贮油罐的列车不分白天黑夜地运来石油，石油从贮油罐流进这些临时修建的油库里。

有一个聪明人想到直接把贮油罐从高加索岸边投入里海（贮油罐不会沉，因为石油比水轻），然后把它们拖到克拉斯诺沃茨克或阿斯特拉罕。这极大地减轻和加快了石油运输。

斯大林指望，即使巴库和斯大林格勒失陷也会是暂时的，而所建立的石油储备有助于我国坚持下去，度过这一危急时刻。

对将在伏尔加河作战的大军的供应成了一个问题：在哪里和用什么运输工具和方式来运送他们需要的一切物品呢？各师刚刚撤往斯大林格勒，而斯大林就作出决定并下令铁道兵沿伏尔加河左岸向巴斯昆恰克湖和乌拉尔紧急修建一条铁路。

说到这里应该插上一笔，再举一个证明斯大林具有远见的例子。在1941年的艰难岁月，武装力量领导人中有人想取消铁道兵（因为没有要他们完成的修建铁路任务），把他们改成当时后撤的大军所急需的普通步兵部队。

11月成立了一个以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列·扎·梅赫利斯为首的委员会，受命起草国防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草案。委员会成员中有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的各中央管理局局长、副交通人民委员И. Д. 戈采里泽、军事交通部部长И. В. 科瓦廖夫中将和其他一些人。

委员会所有成员，除科瓦廖夫中将外，都赞成取消铁道兵，甚至连总参谋长鲍·米·沙波什尼科夫元帅也表示同意。科瓦廖夫称取消铁道兵是失败主义观点，他不会为此投赞成票。梅赫利斯在电话里把这番话告诉了斯大林。斯大林说：

“请把话筒交给科瓦廖夫。”接着斯大林问他：“为什么您认为取消

铁道兵是失败主义？”

“因为我们正准备在莫斯科实施反突击，稍后还将准备进攻，没有作为进攻战役工具的铁道兵和修复材料就不可能进攻。”

“对。请把话筒交给梅赫利斯。”

“您是失败主义者，委员会也是。解散委员会，把铁道兵留下！”

铁道兵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派上了用场！

时间因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修建铁路要尽可能快，战斗行动发展得异常迅猛。铁道兵为了加快进度，在宽大的正面同时开工：斯大林格勒地段从六个点向八个方向铺轨；萨拉托夫地段从六个点向七个方向铺轨；斯维亚日斯克地段从四个点向五个方向铺轨。一节节装配好的现成铁轨就用汽车和牵引车“从地里”向铺设点运送。斯大林下令从战前就开始修建的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拿来现成的轨节，还命令从运输不繁忙的附近二级铁路线上拆下现成铁轨。

道路靠了这种“速成方法”每昼夜延伸8~10公里。打路基、铺轨或挖土都由战士用手、独轮车和担架完成，没有挖土机。

建设指挥A.波贝日回忆说：“大家早就忘了工作日该多长时间。能干多少就干多少，谁没劲了就躺在地上休息一会儿，然后起来再干——推车、砍梁、立柱、铺轨和往枕木下填道渣。饭也就地做。”

这一切都在敌人不间断地轰炸下进行，敌人明白这条铁路的意义，想尽办法阻挠它的建成。

然而铁路最终有了生机，仅1942年8~10月就运送了23 000节车厢，16 000节油罐车；火车一列接一列地间隔800~1 200米行驶。

敌人空军越来越猛烈地轰炸，仅10月份对斯大林格勒地段就出动了1 026架次，投掷了3 232枚炸弹。

П.卡巴诺夫回忆战士们的工作环境说：

“它们（飞机）几个小时中就一下子破坏了几个车站的运转，深深的弹坑切断了道路。但我们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把毁坏的铁路修好了，火车不停地行驶，为斯大林格勒送去弹药和粮食。现在回想起来简单，而在斯大林格勒高唱英雄史诗的那些日子里，铁道兵的英勇精神是难以言表的。到处在扔炸弹，暗红色和黑色的扇形爆炸烟雾挡住了视线，混杂着有害气体和烟尘的空气使人难以呼吸，甚至几乎无法呼吸。但战士们还在干。”

为使铁路运输不致因轰炸中断，铁道兵组织了汽车流动修复队跟着列车行进——在距铁路300~350米处有一条平行的土路。每一支这



样的流动修复队都备有整套必备的铁道工具、列车备件和堵油罐车窟窿用的材料，一遇敌机空袭，它们便立即清除轰炸的后果。流动修复队把列车护送到相邻分队负责的下一站，他们在那里把列车交给相邻分队并从后者手中接过反方向行驶的列车。流动修复队的行动由值班参谋协调。

护送队在敌机空袭列车和列车受损的情况下立即采取措施抢救人员和贵重物资，防止弹药车和油罐车爆炸，恢复铁路的地面建筑和通信设施。

装燃料和润滑油的油罐车常被敌人飞行员用机枪扫射。铁道兵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的是简单而又可靠的堵窟窿办法：他们备有现成的木塞、布片和一桶桶泥浆，用这些材料迅速堵住往外滴出的燃料。一旦起火，他们就把列车断开，把没有烧到的油罐车从起火处移走。

指挥员们在铁道兵部队行动不灵活和机动有限的情况下还是找到了智斗的办法。德军飞行员在空袭时会轰炸那些在地图上清楚标明、从高空看得清清楚楚的车站，而铁道兵考虑到这一点，便任由车站去挨炸，自己却另修了绕过去的铁道。于是炸弹砸向德国人盯住的铁路枢纽，而列车却绕开这些枢纽而去。

在伏尔加河上架桥，更是一首响亮的英雄史诗。为使从阿斯特拉罕抵达左岸的列车过河必须修建这座桥，然而在当时情况下修建一座普通桥梁既没有时间和材料，也没有技术能力，于是有关部门决定用驳船造一座浮桥。相关负责人为此作了预算，结果表明，如果舷靠舷地把船连起来则驳船不够，于是决定把船首尾相连排成一列，在上面搭一座“带状渡桥”。架这样的浮桥在我国还是第一次。

战争逼得人去冒各种危险。因为必须保障军队供应，最高统帅下令无论如何要守住斯大林格勒。从桥上经过的可不是去别墅的轻便马车，而是装满弹药的重载车厢和装燃料的油罐车。

修桥人忘我地工作。Л. Я. 马列茨基中尉、В. А. 罗宁中尉和军事技术员 В. П. 姆切德利什维利的打桩队每班打桩 30~40 个，超过标准的两三倍。他们对所有驳船同时进行改装，在船与船之间搭了栈桥，安了排水装置，并把驳船用锚固定住，用钢索连起来。10 天后列车开上了浮桥！

П. А. 卡巴诺夫上将回忆说：“但浮桥很难把握，要密切注意，务必使桥面轴心线严格呈一条直线。”

专门有人在水泵旁昼夜值班，使驳船保持一定高度。他们根据河水涨落调节驳船的吃水深度。水成了压舱石，要根据需要有时往里加水，有时往外抽水。军事工程师制定了渡桥的技术操作规范，绝对禁止火车

司机超速行驶、在桥上刹车和踩回汽。

尽管驳船被牢牢拴住并严格遵守一切设计标准，桥轴还是像帆一样迎风摆动。然而摆动弧度无论如何不应超过一定的技术标准，这样列车才可适应曲线。德军飞机经常轰炸渡桥，渡桥不止一次失火，每一次战士们都奋不顾身地进行抢救。

建造和保护渡桥的是一些勇士，他们中有许多人荣获政府崇高奖赏，少校营长 H. A. 佩罗夫被授予红旗奖章。浮桥用了一年左右，后被临时桥梁取代，再后来那里建了坚固的大桥。

但这还没有完！

斯大林格勒会战最激烈期间一些铁道兵分队从负责进行技术防护的工事撤走，进入防御地区。例如，1942年9月5日，由 П. М. 舍因少校（代替牺牲了的 H. Д. 让达罗夫大尉）指挥的铁道兵第84营被方面军后勤副司令派给斯大林格勒卫戍司令——内务人民委员部第10师师长 A. 萨拉耶夫上校调遣去防御城市。

参加过这些战事的退伍上校 M. H. 格里先科回忆说：

“A. A. 萨拉耶夫上校给我们补充装备了反坦克枪、重机枪和手提机枪、手榴弹、燃烧瓶，用冲锋枪替下了我们手中老掉牙的步枪，命令我们守卫斯大林格勒市中心革命烈士广场边上的据点、阿斯特拉罕城市大桥、察里查河铁路桥以及国家粮仓。于是我们整个铁道兵第84营就这样手持武器保卫城市……”

原铁道兵第3连连长、退伍上校 Ф. B. 普里霍季科说：

“……我们连什帕纽克中尉的排率先投入战斗，他守卫察里查河铁路桥并听从步兵指挥员指挥。他所率领的排英勇顽强地搏斗，圆满完成了使命，只有几名重伤员返回连驻地，其他人，包括什帕纽克中尉在内都英勇牺牲了。”

这种情况不在少数。

战争年代曾任交通人民委员的 И. B. 科瓦廖夫中将写道：“如果国外认为我们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是伟大的奇迹，那么，对这场战略性战役的运输保障同样也是奇迹，有了它才使得运力薄弱、设施不齐、断断续续的路网变成了连续运行的大运输区，成为威力空前的反攻基地。”

铁道兵为这一奇迹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以下数字鲜明地反映出铁道兵在伏尔加河畔会战期间所做的巨大工作：铁道兵从1942年7月至

1943年1月1日向斯大林格勒地区运送了3269列军列和1052列装载弹药、武器、燃料、粮食、药品和其他器械的列车。

在作出包围并歼灭保卢斯的30万军队的决定后，为实施这一大战役需要组建战斗力强的新军队集团（并要在短时间内集中，好让敌人措手不及）以及在战役前和战役中保障这支突击集团的一切必需品。

不需长篇大论的论证即可看清：如果伏尔加河畔沿战线铁路没有修成，无论包围还是歼灭德军都无从谈起。

这正是斯大林远见的可贵之处，这也正是——不，不是人们功成不居，也不是人们漫不经心，而是我们为国捐躯者的功劳俯拾皆是，他们人数不知凡几，以致像他们的阵亡烈士公墓一样，甚至在战胜者一代还健在时都已长满忘事草。今后又会怎样呢？……

* * *

斯大林格勒会战打了200天。其间歼灭德军野战第6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罗马尼亚第3和第4集团军、意大利第8集团军。敌人死伤和被俘官兵（包括将军）总共几乎达到150万！

从这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会战后伟大卫国战争开始了转折，战略主动权从这时起转到苏军统帅部一方。

这场胜利表现出我军军事领导人的杰出才能和苏联军人出色的战斗力。苏联在反希特勒联盟成员国中的国际威望得到极大提高。德国战车被彻底震撼，德国的盟国——日本、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西班牙和土耳其对所发动的战争能否取胜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它们开始寻找机会脱离希特勒的控制。

相反，被法西斯占领的国家有了获得解放的希望，在这些国家中反占领者的解放斗争日趋活跃。

苏联人民扬眉吐气，挺直腰杆，对胜利的信心帮助他们克服了在以后交战中遇到的困难。

最高统帅斯大林从构思和制定计划时起到实现战役意图止，对实施这一出色的战略性战役作出很大贡献。他在交战中对战行动进程进行日常领导，在组建战略预备队并将其投入战斗方面所起的作用尤为显著，这不仅决定了关键时刻的胜利，而且决定了整个战役的胜利结局。

二 在敌人一方

（在斯大林格勒会战的日子里）

军事学术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统领军队甚至国家的统帅在制定作战计划或者某一大战役计划时，似乎已掌握了所有必要的情报。各种

星罗棋布的情报网，从潜伏在敌人内部的间谍到在敌人驻地上空对其兵力进行航拍的航空兵，都为他们工作。总参谋部是一个汇集最有才干和学养的职业军人的机构，他们所有人都是统帅最亲密的助手和顾问。统帅虽然似乎已掌握了所有必要的情报，但犯错误仍然要比取胜来得多。通过我们已经分析过的事例就可以确信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高级军事机关和国家机关长时间认真地研究“巴巴罗萨”计划，希特勒本人以及他最亲密的顾问几乎都把自己的才能和经验倾注于制定这一庞大的计划，然而一旦付诸实施，却仍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希特勒匪徒没有像所计划的那样马上占领莫斯科，而且战争也没有在几个月内胜利结束。后来，为包围并攻克莫斯科，希特勒又制定出一个专门的“台风”战役计划，而这一回，尽管所有计划完全是根据侦察情报、对我军兵力和防御能力以及其他一切影响实施这一战役的条件精确计算制定的，但是“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及希特勒军队的所有领导人还是都失败了。莫斯科没有被攻克，对首都进行包抄的进攻集团却被击溃，从莫斯科附近撤走了。

还有一个新的庞大计划也是根据可靠的侦察情报、对经过前几次交战后苏军剩余兵力的分析以及根据在我国后方可能组建预备队的培训情况制定出来的。这是一项新的计划——向高加索、向石油产地实施突击，还有向斯大林格勒方向实施辅助突击。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个计划尽管似乎制定得非常切实，但希特勒匪徒还是没能付诸实现。

在这里我想提醒读者的是，我军统帅和军事学者们在报刊上、讲台上许多次谈到希特勒匪徒的冒险战略，但我不同意这种论点。是的，希特勒匪徒的领导人及希特勒本人在政策和战略上表现出冒险主义，但并不是时时处处都是这样的。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希特勒在以闪击方式摧毁波兰、法国后就此止步，不再实行对欧洲的侵略政策，那么这些学者和理论家又会对“闪击战”说些什么呢？难道可以说希特勒军队的这些快速和所向无敌的行动是冒险吗？冒险主义是指手段与制定的目标不相符，而在我们所说的这些情况下，希特勒匪徒都取得了胜利。他们正是以自己部队和兵团的闪击式行动获得了胜利，他们制定的闪击战的理论被证明是正确的。

但是我已经说过，如果说在那些地区为完成提出的任务所使用的手段符合目标，那么在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方向上两者并不相符。

11月17日，在我军开始进攻的前两天，希特勒总愿第6集团军作坚决地最后一搏，他说：

“我知道攻克斯大林格勒一战困难重重，军队作战力量已经减少，但是，现在正值伏尔加河封冻期，俄国人的困难更多。如果我们利用这



段时间，就会在今后少流很多血。

因此我希望，领导人再次鼓起他们曾一再展示的干劲，部队以其常有的作战艺术尽一切努力向伏尔加河突破，至少要打到兵工厂和冶金厂附近并攻占这部分城区。”

这项命令向所有攻打斯大林格勒的指挥员宣读，保卢斯也在上面作了批示：“我相信，这项命令将再次激起我们英勇部队的热情。”

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两支突如其来的强大的突击力量迎面扑来，几天之内就会师了，围住了33万人的军队。

“B”集团军群司令魏克斯试图不让苏军合围。海姆将军指挥的坦克第48军（它还被称为“X”军）是惟一的预备队，它包括罗马尼亚坦克第1师和德军坦克第22师。

这个军被派往合围圈正在收拢的口子处，但马上溃不成军，不仅是被红军部队击溃了，而且是被自己的部队——乱作一团、仓皇逃窜的罗马尼亚军队和德国军队压垮了。这个军不仅没能完成任务，反而在拼命试图前插时增加了落入包围圈的俘虏的人数。

总参谋长蔡茨勒最先非常小心翼翼地希特勒提出在尚未合围前撤走第6集团军的建议。希特勒反对说：

“再等等看。海姆的军会成功——不会让他们合围。”

过了一段时间，同“B”集团军群保持经常联系的蔡茨勒报告说：

“正像我推测的那样，‘X’军没有完成它无法胜任的任务，它被击溃了，几乎全部陷入包围。”

希特勒气得面色发白并大声喊道：

“凯特尔，马上派人去把这个军长找来，撕下他的将军肩章，关进监狱！这全都是他的错！”

希特勒的命令得到了执行：海姆中将被带到大本营，由戈林（他像我们的梅赫利斯一样，是一个干这种事经验丰富的人）主持的特别法庭“进行了调查”并判处海姆死刑。法庭还下达了列举这个军长种种罪行及对其严惩的特别令（几个月后，海姆被赦免。因为希特勒认为，关于判处他死刑的命令已起到了应有的教育作用）。

尽管元首大发雷霆，蔡茨勒仍建议撤走第6集团军。然而希特勒暴跳如雷地喊道：

“我不会退出伏尔加河！将来要把在斯大林格勒被围的第6集团军命名为斯大林格勒要塞部队！”

11月22日，保卢斯向“B”集团军群司令部报告说：“军队被围……燃料储备不久即将告罄，坦克和重型武器在这种情况下动弹不了，弹药也十分紧缺……请允许在无法建立环形防御的情况下自由行



动。到那时，局势可能就会迫使我们放弃斯大林格勒和战线北段，集中所有兵力突击在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战线南段的敌人，在此与坦克第4集团军会师。西方向的进攻由于地形复杂并且有敌人的重兵把守而胜利无望……”

11月26日，希特勒在他最亲密的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开始组建集团军群，实施解救保卢斯第6集团军的进攻战役。被围的坦克第4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编入这个集团军群，曼施泰因元帅被任命为这个以“顿河”命名的集团军群的司令。希特勒非常希望他的这位十分有才干的将领能挽救局势，摆脱伏尔加河的危急局面。除上面所说的部队外，被围的第6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残部也编入“顿河”集团军群，应该稍晚到达的一个坦克师和两三个步兵师也调派给该集团军群。

在批准曼施泰因制定的战役计划的会议上，总参谋长蔡茨勒再次请求元首允许第6集团军自由行动，朝着曼施泰因的集团军群方向突围。希特勒断然拒绝了请求，反驳说坦克第4集团军和其他部队的兵力完全能够解救被围部队。元首也不允许从驻扎在高加索的“A”集团军群抽调部队营救保卢斯的集团军。

12月12日，曼施泰因以霍特的坦克集团军群实施第一次突击。这一集团军群的运动以在战线的狭窄地段上实施撞击式突击开始，但是坦克无法突进距斯大林格勒方向50公里处，实施反冲击的苏军在这里挡住了他们的运动。

蔡茨勒再次请求元首允许第6集团军从里面进行突破。元首又一意孤行地加以拒绝了。

曼施泰因请求哪怕从高加索方向的“A”集团军群抽调两个坦克师给他，仿佛这两个师能够改变态势！但是，就连这两个师元首也没有给他。他得到的答复是，这两个师在战斗中伤亡惨重，总共只剩下58辆坦克，把他们调过去也毫无意义。他们就是在那里、在高加索方向也是勉强守住既有的阵地。

高加索方向的危机已迫在眉睫，那里不多不少有将近70万人。应该指出，这时朱可夫元帅正在西方向上实施一次局部战役。总参谋长蔡茨勒极为害怕这次进攻，他对形势进行了这样的估计：“俄军司令部现在摊了牌。他打算先包围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德国第6集团军，然后对亚速海方向实施突击，消灭东部德军的南翼。”

朱可夫通过组织西方向的进攻使德军指挥部胆战心惊！

德军总参谋长根据这样的估计知道斯大林格勒集团的解围行动注定要失败，现在他考虑的已经是如何尽快把集团从高加索撤走——在



“A”集团军群还没有被包围时把它全部撤走。

蔡茨勒直截了当地对希特勒说：“如果您现在不下令从高加索撤走部队，那里就会又出现一个斯大林格勒。”

希特勒终于明白，他的整个庞大计划——夺取高加索产油区，攻入伊朗等计划已经失败。现在已经不是他的威望问题了，而是必须摆脱当前的困境。他在同他最亲密的助手——凯特尔、约德尔、蔡茨勒长时间商议后下达了又一个命令：“德国武装部队大本营1942年12月28日关于今后在东战场南翼战斗行动的第2号作战命令”。

这里，我再一次使用“冒险主义”这个令人难堪的词。新命令的第一条说：

“我的意图一如既往仍然是让第6集团军坚守要塞（斯大林格勒），创造脱身的条件（顺便应该指出，希特勒的固执己见非常令人吃惊。所有人都已确信并清楚，第6集团军必须突围，否则就会毁灭，而希特勒却一意孤行，不允许它突围）。

‘A’集团军群要保持，尤其是加强在沿海地区和山区的战线，在某些地段逐渐地、一步一步地撤往缩小了的地区……（接下来提到了这个地区的各个点。——本书作者注）‘顿河’集团军群仍然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持解救第6集团军的条件。”

希特勒无限信任曼施泰因的统帅才能。他在这个命令中实际上把东南战线的全部兵力都归曼施泰因指挥，并组成一个新的“南方”集团军群。“A”集团军群和“顿河”集团军群都编入其中。

在希特勒的大本营中，包括蔡茨勒和约德尔在内的一些高级领导人怯生生地表示了一个想法：既然军队眼看就要覆灭，那保卢斯为挽救军队，应不顾禁令，擅自作出突围的决定。但是仍然没有一个人敢于提出这样的建议。

保卢斯本人在有军长们参加的会议上，当独自采取突围决定的问题提出来时，也不敢承担这样的责任。

1月17日保卢斯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包围地区缩小了一半。尽管部队的处境困难，战斗还在按计划进行。指挥机关仍然在运转。”

我们要给德军士兵以应有的评价，尽管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也要反思，我军部队在战争初期陷入希特勒匪徒的许多包围圈中时没能组织应有的抵抗，陷入重围的指挥人员往往没有把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使掌握了，也为时不长。



三 “指环”战役

斯大林认为应当找到一种方法迅速歼灭斯大林格勒附近被围的敌人，于是，他制定了“指环”战役计划。12月19日，在经过最后的讨论后，斯大林批准了这个计划，决定任命炮兵专家沃罗诺夫将军为实施此次战役的大本营代表。因为在歼灭被围敌人时，炮兵和航空兵要担负主要任务，所以决定任命一位炮兵专家。斯大林的指示中有这样一条：

“责成大本营代表沃罗诺夫同志和副代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华西列夫斯基指挥了整个战役。——本书作者注）于1942年12月21日以前，向大本营提交突破斯大林格勒附近被围的敌军防御，并在5~6天内加以歼灭的计划。”

坦率地说，给的时间非常紧迫，因为在5~6天内歼灭一个集团是不现实的。被围的敌人决心死守，直到他们被解救为止。

斯大林急不可待，他想尽快取得战役的最后胜利。他在例行的一次会议上又一次征求意见说：

“歼灭被围敌人的任务应当交给一个人领导。现在有两个方面军司令在指挥，这会误事。最终歼灭敌人的任务交给哪一个司令呢？”

有人提议让罗科索夫斯基担任。朱可夫说：

“如果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交给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话，叶廖缅科当然会感到委屈。”

“现在不是谈委屈不委屈的时候。请给叶廖缅科打电话，向他宣布国防委员会的决定。”

当晚，朱可夫进行了这场不愉快的谈话。叶廖缅科生气地说：

“大将同志，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特别看重顿河方面军司令部呢。我请您向斯大林同志报告，我请求留在这里直到把敌人歼灭掉。”

“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你最好同最高统帅本人谈谈。”

“我已经打过电话了，但波斯克列贝舍夫说，斯大林同志吩咐让我与朱可夫谈这些问题。”

朱可夫答应了叶廖缅科的请求，给最高统帅打电话转告了他同叶廖缅科的谈话情况。但斯大林非常生气地说：

“我已经跟您说过一次，现在不是委屈的时候。请立即下达训令，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三个集团军交由罗科索夫斯基指挥。”



大本营代表沃罗诺夫将军为最后制定“指环”战役计划来到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司令部，找新任司令罗科索夫斯基。这个计划制定好后送给了大本营，但是没有马上得到批准，沃罗诺夫接到了以下指示：

“你们提出的‘指环’计划的主要缺点是，主要突击和辅助突击向着不同方向实施，根本没有形成合力，战役能否取胜因此值得怀疑。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认为，你们在战役的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切断并歼灭被围敌军的西部集团（接着指出这个集团所在的地区。——本书作者注），而另一个突击应与主要突击相向，这两个突击在卡尔波夫斯卡亚站地域会合。

此外，还应当组织第66集团军经奥尔洛夫卡向红十月村方向实施突击，而第62集团军则实施与这一突击相向的突击，目的是两个突击能够会合并从而切断工厂区的敌人与敌主要集团的联系。

大本营命令根据上述内容修改计划。大本营批准你们提出的战役发起的时间：战役第一阶段应于发起后的5-6天结束；战役第二阶段计划应于1月9日前通过总参谋部送呈，计划中应考虑到第一阶段的战果。

签名：约·斯大林、格·朱可夫 1942年12月28日”

这份文件清楚地表明斯大林的风格：对任务及如何执行的建议十分严谨、具体和明确。

我不知道沃罗诺夫出于什么缘故生了斯大林的气，这一点在他1963年出版的回忆录《服兵役》一书中可以看出来。

他如下的话清楚地表明了他的不满：“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中做了大量工作。他对进攻计划的准备工作进行了认真的周密思考，为保证计划在军事和政治方面更有效地实施做了大量的工作。”

沃罗诺夫的回忆录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发表，作者思想明显受到这次大会的影响，因为当时赫鲁晓夫是拥有无限权力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沃罗诺夫产生一个想法：在“指环”战役发起前向被围的敌军集团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放弃无谓的抵抗，放下武器。同时，他打算不仅向指挥人员发出这一最后通牒，而且还大量印刷成传单，用飞机散发，让传单也能落到士兵的手中，让他们每个人自己作出决定。当时已

经知道：敌人在被围官兵中正积极开展工作，要他们相信，援兵即将来到，元首不会抛弃他们；最主要的是还散布谎言说，他们一旦被俄国人俘虏，统统都将会被枪毙。

沃罗诺夫把他打算发出最后通牒的想法和印刷传单的请求向大本营作了汇报。

因罗科索夫斯基方面军所需的弹药和援军迟迟未到，所以沃罗诺夫再次亲自向斯大林请求允许把战役发起的时间推迟六七天。斯大林看来对沃罗诺夫的这一请求很生气，他除了“再见”什么话也没有说，就挂上了听筒。但沃罗诺夫很固执，在通话后立即向最高统帅发去了书面报告：

“按照您确定的期限实施‘指环’战役是不可能的，因为增援部队、运送给养的列车和运送弹药的汽车到达卸载地点要晚四五天……”

我们正确制定的计划被打乱的另一个原因是，给左翼的瓦图京同志运送东西的列车和汽车没有按时到达。罗科索夫斯基同志请求增加四天时间。他的所有计算都经过我的亲自审核。

所有这一切迫使我请求您批准推迟四天后发起‘指环’战役。请指示。

沃罗诺夫”

斯大林一收到这份密码电报就立即打电话给沃罗诺夫，没有问好，就对沃罗诺夫骂开了：

“你们就在那里坐等德国人把您和罗科索夫斯基俘虏吧！你们也不想，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我们必须尽快结束，而你们却有意拖延！你们电报里的‘四天后’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还需要四天的时间准备。我们请求1月10日，而不是1月6日发起‘指环’战役。”

斯大林气哼哼地简单回答说：

“批准！”然后扔掉了听筒。

1月10日早上，7000门大炮和迫击炮开始猛轰敌军驻地，持续了55分钟。部队在炮火准备后发起进攻，进攻持续了五个昼夜，但敌军进行了顽强抵抗。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包括粮食和弹药短缺，希特勒军队仍然继续在防御。

五天内，除战斗行动外，苏军还向敌人驻地投下150多万份传单并

通过广播向被围敌军进行了约 300 次的宣传，说他们如果停止这种无谓抵抗将受到人道待遇。


但敌方也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工作。从一名俘虏身上找到的一份命令就是这样写的：

“最近，俄国人多次企图同集团军及其所属部队进行谈判。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在进行投降谈判的过程中作出种种承诺来动摇我们抵抗的决心。我们都知道，如果军队停止抵抗，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我们大多数人将必死无疑，要么被敌人的子弹打死，要么在西伯利亚令人耻辱的俘虏营里因挨饿和受苦受难而死。但有一点是真的：谁投降作俘虏，谁就永远也看不到自己的亲人。我们只有一个出路：要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尽管寒冷和饥饿日益加剧。

因此，应当放弃进行谈判的任何尝试，不予回答，以火力驱赶敌方派来的谈判者。

我们今后仍将坚信，救援我们的部队离我们不远了。

总司令 保卢斯”



到 1 月 16 日，指环大大地缩小，德军集团被分割成几个小包围圈。罗科索夫斯基召开会议，明确任务并商定下一步的行动。一些指挥员提出休整两三天，积蓄力量，因为我军也有一些伤亡，而且弹药和其他物资的供应安排得也不是特别好。罗科索夫斯基通常都是心平气和的，但这一次显然记得斯大林因推迟战役而发火的事，于是简短地下令说：

“一刻也不能停下来！要继续进攻！不能让敌人清醒过来！要利用已形成的缺口，务必在炮兵、坦克兵、航空兵的支援下打败敌人。行了，全去执行命令吧！”

1943 年 1 月 18 日，沃罗诺夫视察完前沿阵地后正在休息，有人把他叫醒说，广播报道要实行“炮兵元帅”的新军衔，沃罗诺夫第一个获得了这一高级军衔。过了一会儿，莫斯科打来电话，祝贺他荣获新军衔，并让他考虑一下：他认为炮兵元帅应该穿什么样的军服。沃罗诺夫回答说：

“让专家们考虑吧。他们应该更清楚。”

有关这一点沃罗诺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既恼火又可笑。恼火是因为在战斗最激烈时刻用这些小事来打搅。”沃罗诺夫所说的小事指的当然是军服，而不是指授予他高级军衔这件事。

这几天，保卢斯看到抵抗已经毫无意义，就多次询问是否允许自由行动。他说的自由行动指的不是投降，而是组建突击集团，他试图借助突击集团与那些还能行走、手中还有武器的人突围出去。然而回答却没有改变：希特勒亲自要求——在要塞（他现在已经把斯大林格勒称作要塞）中坚守到最后一个人！

遵守纪律的保卢斯执行了命令，而且到最后时刻他仍表明他忠于元首。

1月20日是德国的节日：庆祝希特勒掌权十周年。保卢斯致电祝贺：

“在您获得政权的纪念日之际，第6集团军向自己的元首致敬。卅字旗仍然飘扬在斯大林格勒上空。让我们的战斗成为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榜样，让他们知道，即使在绝望情况下也不应投降。这样德国才能胜利。

万岁，我的元首！

保卢斯 上将”

希特勒立即回电：

“我的保卢斯上将：

现在全体德国人民都在极度不安地注视着这座城市。就像在世界历史上常有的那样，你们的牺牲不会毫无意义……德意志民族现在才开始意识到这场战争的艰难以及它所造成的惨重牺牲。

永远和您以及您的士兵在一起。

您的 阿道夫·希特勒”

就在领导人相互致电的时候，“包围圈”里的人正在苦苦挣扎。我认为，那些伤心而又真实的文献，即被围军人未发出信件的摘抄特别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些信件没有寄往德国是出于书报检查和政治方面的考虑，目的是不造成恐慌，不瓦解德国人民的士气。

“……我看了地图后，感到大为震惊：我们完全是孤立的，没有任何外援；希特勒把我们抛弃了。如果机场还在我们手中的话，你们就可以收到这封信……”

“……我们只有等待，其他一切都毫无意义。在国内，一些先生当然还在得意洋洋，兴高采烈，因为我们还坚守着阵地。报纸将刊登一些镶有粗黑框的辞藻华丽的文章，颂扬和赞美我们，但不要相信这些该死的废话！”

“你是一名德国军官的妻子，你应该理解我现在跟你讲的一切。你应该知道真相，关于在绝望处境下拼死战斗的真相。泥泞、饥饿、寒冷、崩溃、动摇、绝望、死亡……我不否认造成这一切有我自己的罪过，但它只是七千万分之一。这个比例很小，但罪过毕竟是有的。我不打算逃避责任，因此只想用自己的生命来抵偿这一罪过……”

1943年1月31日，保卢斯发来贺电的第二天，希特勒才醒悟，他怎么会疏忽了这一点，怎么没有立即表彰这位万分忠诚的军人！于是又一封电报被迅速发往斯大林格勒：元首授予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元帅这一高级军衔！

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鼓舞第6集团军司令的士气，另一方面是暗自有一个想法：希望陆军元帅不投降。

但是元首的打算落空了，因为就在授予这一高级军衔的当天，刚刚提升的陆军元帅投降了。

当希特勒得知这一消息后，差点没被气晕。他歇斯底里地发作起来，狂怒地大叫道：

“他怎么会向布尔什维克投降！……多么贪生怕死！……如果神经有毛病，那就只有说：‘我什么都干不了了’，然后开枪自杀……这很容易做到……现在，他却作出这样一个坏榜样。不能期待士兵们会继续作战……”

为了让士兵和德国人民继续战斗，德方隐瞒了陆军元帅及其95000名部下投降的事实。报纸和广播报导第6集团军全军覆没的消息说：

“斯大林格勒交战结束了。至死忠于自己誓言的第6集团军在保卢斯元帅的卓越指挥下，面对敌人优势兵力和种种不利的情况全部阵亡。最后一场战斗是在飘扬在斯大林格勒废墟最高处的卅字旗下结束的。将军、军官、军士和列兵一起并肩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

全国宣布志哀，带有黑条的帝国国旗降半旗，各教堂进行安魂祈祷。

* * *

我认为，叙述一下陆军元帅被俘的细节是非常有意思的。

保卢斯是由罗科索夫斯基审讯的。关于这一点后者在他的《军人的天职》一书中写有以下一段话：

“保卢斯被带到有我、沃罗诺夫和翻译所在的房子里。房间里灯火通明，我们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边，可以说是非常有兴趣地等待着这次会面。门终于打开了，值班军官走进来，向我们报告说被俘的陆军元帅已被带到，然后就闪到一旁，让他走进房间。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子高挑、身材瘦削、体态相当匀称、穿着野战服的将军笔直地站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请他坐下。桌上放着香烟，我递给他一支，自己也吸了一支。我们请他喝杯热茶，他欣然同意了。

我们的谈话不带审讯的味道，就谈谈眼前的问题，主要是关于被俘官兵的状况。元帅一开始就表示，希望我们不要强迫他回答那些迫使他违背誓言的问题。我们答应不涉及这类问题。”

沃罗诺夫掌握了谈话的主动权。他的军衔（炮兵元帅）和职务（最高统帅大本营代表）都比罗科索夫斯基高。沃罗诺夫在他的回忆录里详细叙述了这次审讯谈话。谈话是这样进行的：

“请您立即给您管辖的北方集团军群的部队下令，停止无谓的抵抗。”

保卢斯回避这个问题，推托说他作为一名战俘无权下达这样的命令。

沃罗诺夫干巴巴地说：“这关系到您的人道主义行为。我们拥有足够的兵力和能力，可以在一两天或许在几个小时内就歼灭您至今仍在抵抗的部队。他们的挣扎是徒劳的，因为这种挣扎只会导致您成千上万的官兵死亡。您作为集团军司令有责任拯救他们的生命。”

保卢斯仍然拒绝说：“即使我签署了这样的命令，他们也不会服从，因为我已成为俘虏，自然就不再是一个司令了。”

沃罗诺夫坚持说：“就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来讲，毕竟不能完全不考虑您个人的威望。”

保卢斯找不到其他的反对理由。他一会儿说，可能已经任命新的司令，而他保卢斯签署的命令将会无效；一会儿又说，第6集团军的部队不会相信是他本人签的字。

沃罗诺夫说：“元帅先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告诉您，如果您



拒绝签署投降命令，您将成千上万名您的部下和战友的生命而对德国人民和德国的未来承担重大责任。”

保卢斯沉默了。神经性抽搐使他无法安静下来，精神无法集中。沃罗诺夫了解保卢斯的心情，于是换了一个话题。

他问保卢斯说：“为您安排怎样的饮食？”

俘虏脸上露出十分惊讶的表情。他回答说，他不需要任何特殊照顾，他请求好好照顾那些受伤或生病的德国官兵。

苏军领导人同战俘保卢斯的第一次见面就此结束。

2月2日晚上，他们进行了第二次谈话。他们告诉保卢斯说，战役已经结束，苏联军队全歼他的集团军以及其他被围的德国军队和罗马尼亚军队。

罗科索夫斯基问道：“您这位有很好理论修养和丰富经验的将军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怎么会让您负责的大兵团陷入包围？”

保卢斯回答说：“对我来说，俄国人11月的进攻是完全出乎意料的。”

沃罗诺夫惊奇地问道：“怎么？您以相对狭窄的正面突入伏尔加河岸边，打算在已占领的地区平平安安呆上一冬吗？您就没有预料到苏联军队会发动冬季进攻？”

“没有。根据第一个冬季作战的经验，我知道，进攻是可能的，但我没有想到战役规模会如此大……”

“您认为，斯大林格勒会战对整个战争进程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被俘的元帅回答说，他早就没有关于战线其他地段的作战情况简报了，因此不能判断整个局势。沃罗诺夫当即命令把1943年2月2日各个战场的态势图拿给保卢斯看。元帅不相信地看了看地图，然后冷冷一笑，表示他不相信地图。他们向他说明，这张地图不是专门为保卢斯准备的，而是给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了解情况用的。

过后，沃罗诺夫问他说：“怎么样，您认为如何？”

保卢斯说：“你们也知道，士兵的命运瞬息万变……”

在谈了有关斯大林格勒会战重要性的几个问题后，保卢斯承认，可以把红军包围并歼灭他的军队的战役算作经典战役。

“但我方在被包围中进行的防御，时间这么长，条件这么恶劣（弹药、燃料、给养和冬季军服短缺），也可以算作经典战役。”他补充说。

沃罗诺夫是这样总结他同保卢斯的会面的：

“这个惊慌失措、失去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给我们留下了令人不快的印象。”

我不能同意沃罗诺夫元帅下的这个结论。我认为，保卢斯的思想完

全独立，他招供时要考虑到他可能会在元首面前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不要忘了，1943年才开始，这位陆军元帅并没有认为战争已经打输了，虽然他认为斯大林格勒会战是一次重大的失败，但德军部队毕竟离莫斯科以东的伏尔加河并不远。德国军队还可以（他相信这一点）挽回东战场的局势，而他保卢斯也可能面对元首火冒三丈的目光。

我想，读者都知道保卢斯后来的遭遇。他渐渐地彻底抛弃了纳粹的政治观点，参加了反法西斯的“自由德国”运动。他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就感到高兴。

这就是发生在被斯大林用武器的力量重新教育过来的这个人身上的令人吃惊的“改造”。这一根本改变实在令人吃惊——“巴巴罗萨”计划的制定者之一1953年10月24日获释回国时给苏联政府写了一封感谢信，信的结尾说：

“我在离开苏联前想对苏联人说，我曾经作为敌人盲从地来到他们的国家，现在我是作为朋友离开这里的。”

保卢斯于1957年2月1日去世，生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

四 让宗教为祖国服务

斯大林知道，国内所有教堂在礼拜时都在为俄罗斯士兵的胜利作爱国的祈祷。斯大林作为曾经的正教中学学生十分清楚教会和宗教在苏联生活中的作用，他决定支持神职人员为加强军队和人民的坚强不屈精神所做的有益事情。

1943年9月4日，斯大林召见了俄罗斯正教会事务委员会主席Г. Г. 卡尔波夫。卡尔波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记下了斯大林向他提出的问题：

“‘……（a）都主教谢尔吉的情况（年龄、身体状况、在教会中的威望、他对政府的态度）；

（b）对都主教阿列克西和尼古拉的简要评价；

（c）吉洪是什么时候和如何当选为牧首的；

（d）俄罗斯正教会与国外有什么联系；

（e）东正教总主教是谁，耶路撒冷正教会及其他正教会的牧首是谁；

（f）我所知道的关于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正教会领



导人的情况；

(g) 都主教谢尔吉、阿列克西和尼古拉现在的物质生活情况怎么样；

(h) 苏联正教教区的数量和主教团的数量。’

在我回答完上述问题后，他又问了我三个有关我个人的问题：

‘(a) 我是不是俄罗斯人；

(b) 哪一年入党；

(c) 我受过什么教育，为什么熟悉教会问题。’”

Г. Г. 卡尔波夫在回忆录中继续写道：

“后来，斯大林说：

‘需要成立一个负责同教会领导层建立联系的专门机构。您有什么建议？’

我说我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好考虑过，我建议成立一个直属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宗教事务局，我这个建议也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面有一个常设的宗教事务委员会这一事实提出来的。

斯大林同志纠正我的话说：

‘不，应当成立直属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宗教事务委员会或事务局。’

他想了一下说：

‘应成立直属苏联政府、即直属人民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会，名称叫作俄罗斯正教会事务委员会。责成该委员会负责苏联政府和牧首之间的联系工作。委员会不独立作决定，它只是接受政府的指示。’

随后，斯大林问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说，他是否应该接见谢尔吉、阿列克西和尼古拉三位都主教。他们认为应该接见。

斯大林对我说：

‘请代表政府给谢尔吉都主教打电话，转告他：“给您打电话的是苏联人民委员会的代表。政府想接见您以及阿列克西和尼古拉都主教，听听你们的需要，解决你们现有的问题。政府今天过一个至一个半小时就可以接见你们，如果这个时间对你们不合适，可以把接见安排到明天（星期天）或者下个星期的任何一天。”’”

卡尔波夫当着斯大林的面给谢尔吉打了电话。他自称是人民委员会的代表，在传达了上面那段话后说，如果都主教阿列克西和尼古拉现在

在谢尔吉都主教那里的话，请同他们交换一下意见。

都主教谢尔吉回答说：

“阿列克西和尼古拉感谢政府对他们的关注。我们希望今天就接见我们。”

斯大林从来不拖延可以马上做的事。

过了两个小时，谢尔吉、阿列克西和尼古拉三位都主教来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在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办公室里接见了他们，莫洛托夫和卡尔波夫参加了接见（下面将转述卡尔波夫作的近似谈话速记记录的内容）。

斯大林亲切地向都主教们问好，他说：

“苏联政府知道，教会从战争一爆发就做了爱国主义的工作；政府从前线 and 后方收到了大量信件，称赞教会对国家的态度。”

之后，斯大林请都主教们谈谈，牧首教座以及他们个人有哪些尚未解决的紧迫问题。都主教谢尔吉说：

“最主要和最迫切的问题是教会的中央领导问题。我当了近 18 年的代理牧首，而苏联从 1935 年起就没有正教院了。所以我认为政府应该允许我们召开高级僧正会议，由会议推选出牧首，并在教会首脑之下成立作为咨询机构的圣正教院，由五六名高级僧正组成。”

都主教阿列克西和尼古拉也都赞成成立正教院，并表示，他们认为由高级僧正会议推举牧首是合乎教规的，因为教会 18 年来实际上一直都是由代理牧首谢尔吉都主教在领导。

斯大林赞成谢尔吉都主教的建议，他问道：

“将如何称呼牧首？什么时候能召开高级僧正会议？要顺利召开会议，是否需要政府的帮助？有没有场所？需不需要交通工具和资金？”

谢尔吉回答说：

“这些问题我们之间事先已经讨论过，并认为政府应该准许牧首接受‘莫斯科和全罗斯牧首’的封号，这样做是对的。1917 年，临时政府时期当选的吉洪牧首也被称为‘莫斯科和全俄牧首’。”

斯大林表示同意，并说，这是对的。

都主教谢尔吉对第二个问题回答说：

“过一个月就可以召开高级僧正会议。”

斯大林笑了一笑，并对卡尔波夫说：

“不能拿出布尔什维克的速度吗？”

“如果我们为谢尔吉都主教提供相应的交通工具，以最快的速度（用飞机）把主教团送来莫斯科，高级僧正会议过三四天就可以召开。”



在经过短暂的交换意见后确定，高级僧正会议于9月8日在莫斯科召开。都主教谢尔吉回答第三个问题说：

“举行高级僧正会议不需要国家的任何资助。”

都主教谢尔吉提出了关于培训神职人员骨干的问题，都主教阿列克西对此进一步作了阐释，他们请斯大林准许开设某些教区所属的神学培训班。

斯大林对此表示同意，同时补充说：

“为什么你们只提出开设神学培训班的问题呢？政府可以准许成立神学院并在所有需要的教区开办正教中学。”

都主教阿列克西说：

“现在开办神学院的力量还非常不够，需要作相应的准备。至于正教中学，我认为，接受18岁以下的人入学是不合适的。我根据以往的经验知道，当一个人还未形成明确的世界观时，培养他们做牧师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淘汰量太大。也许当教会有了相应的办神学培训班的经验后才会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正教中学和神学院的组织形式和教学大纲必须彻底修改。”

斯大林说：

“好吧，那就随你们便吧，这是你们的事情。如果打算开办神学培训班，就开吧。但政府也不反对开办正教中学和神学院。”

谢尔吉提出组织出版莫斯科牧首辖区的杂志，每月出版1期，既刊登教会新闻，也刊登神学和爱国主义内容的文章、讲话和布道词。

斯大林回答说：

“需要而且应该出版杂志。”

接着谢尔吉都主教又谈到在一些教区开设教堂的问题，并说几乎所有教区的主教都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教堂太少，而且教堂已经很多年没有开放了。

同时，谢尔吉都主教说，他认为必须授予教区主教同行政当局就开放教堂问题进行谈判的权利。

斯大林回答说：

“有关这个问题，政府方面不会有任何阻碍。”

阿列克西都主教提出了一个相当微妙的问题，即释放一些尚在流放地、劳改营和监狱中的高级僧正。

斯大林简短地说：

“请提出名单，我们审核一下。”

接着谢尔吉提出了关于刑满释放的神职人员有权在苏联境内自由居住和迁徙并在教堂做祈祷的问题，也就是取消与身份证制度有关的种种

禁令，确切地说是种种限制。

斯大林建议卡尔波夫就这个问题进行研究。

他们又谈到了资金问题。

阿列克西都主教说，他认为，有必要赋予各教区权利，可以将教堂和教区一部分收入上交中央教会机关（牧首教座、正教院）作为经费。阿列克西都主教对此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叫连索韦塔·塔塔林采娃负责行政监督的检察员不准许提取这部分款项。

关于这个问题，他以及谢尔吉和尼古拉都主教都认为，有必要改变教会管理的现状，即有必要让神职人员有权成为教会执行机构的成员。

斯大林对此没有表示反对。

尼古拉都主教谈到了关于蜡烛工厂的问题，他说，现在教堂的蜡烛都是由手工业者生产的，售价太高，因此，他，尼古拉都主教，认为最好是让各教区都有权开办蜡烛工厂。

斯大林说，只要是与教会在苏联境内组织上巩固和发展有关的问题，教会都可以指望得到政府的全面支持。他对卡尔波夫说：

“必须保证教区有权支配教会的款项。不要给成立正教中学、蜡烛工厂等事情设置障碍。”尔后他又对三位都主教说：“如果现在或者今后需要的话，国家可以给教会中央以适当的资助。还有，卡尔波夫同志向我汇报说，你们的生活条件很差：住房窄小、在市场上购买食品、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因此，政府想知道，你们有什么需要，你们希望从政府这里得到什么。”

都主教谢尔吉回答说：

“我请求采纳阿列克西都主教提出的建议，把新圣母修道院中原院长的房子供牧首教座和牧首使用。至于说食品供应，我们会在市场上购买这些食品，但在运输方面请给予帮助，如果可以的话，拨给几辆汽车。”

斯大林说：“卡尔波夫同志看过新圣母修道院的房子，里面的设备不完善，需要大修，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使用，而且那里又冷又潮。要知道，这些房子建于16世纪。政府明天就可以分给你们一所设施完好、装备完善的房子，也就是契斯特胡同的那座三层独院楼房，这是原德国大使舒伦堡住过的地方。但这所房子是苏联的而不是德国的，因此，你们可以完全放心地住在那里。而且，我们把独院楼房连同其中现有的一切财物，包括家具全都给你们。为了让你们对这所房子有更好的了解，现在就给你们看看它的平面图。”

（斯大林显然对这次会面作了准备，因为他了解房子的现状，手上有平面图。）



几分钟后，波斯克列贝舍夫拿来独院楼房连同院内建筑和花园的平面图。当时商定，第二天，也就是9月5日，卡尔波夫让都主教们亲自去看这所房子。

斯大林再次提到了食品供应问题，他说：

“在市场上购买食品对你们来说又贵又不方便，而且现在集体农庄庄员很少在市场上出售食品。因此，国家可以按国家价格给你们供应食品。还有，我们明后天就给你们两三辆小汽车和燃料。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教会还有没有别的需要？……好吧，如果说你们现在对政府没有其他问题，那么以后也许还会有。政府打算成立一个专门的国家机关，称作俄罗斯正教会事务委员会，任命卡尔波夫同志为委员会主席。你们认为如何？”

这三个人都表示，他们十分感谢政府和斯大林同志本人所做的一切，非常欢迎任命卡尔波夫同志担任这一职务。

斯大林说：

“委员会将成为政府同教会之间的联系点，委员会主席应向政府报告教会的生活情况以及产生的问题。”

斯大林对卡尔波夫说：

“请挑选两三名助手建立起机关来，这些人也将成为您的委员会成员。不过要记住，第一，你们不是正教院总监；第二，要通过委员会的活动进一步强调教会的独立性。”

斯大林当着都主教的面，对莫洛托夫说：

“应当让居民都知道这件事，然后还要把选举牧首的事情告诉居民。”

莫洛托夫立刻开始为广播和报纸起草公报稿，并把斯大林以及都主教谢尔吉和阿列克西相应的意见、修改和补充都写了进去。

公报的全文如下：

“今年9月4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同志接见了代理牧首、都主教谢尔吉，列宁格勒都主教阿列克西以及乌克兰都主教、基辅和加里西亚都主教尼古拉，并与他们谈了话。谈话时，都主教谢尔吉告诉人民委员会主席说，正教会领导人打算召开主教会议，选举莫斯科和全罗斯牧首并成立隶属牧首的圣正教院。

政府首脑斯大林同志赞同这些提议，并表示政府方面对此不会设置障碍。

参加会谈的还有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该公报刊登在1943年9月5日的《消息报》上。公报稿交波斯克列贝舍夫送当天广播播发并送塔斯社供各报刊载。

接着莫洛托夫向谢尔吉提出了一个问题：

“以大主教约克斯基为首的英格兰圣公会代表团希望来莫斯科访问，什么时候接待更好一些？”

谢尔吉回答说，既然主教会议要在四天后召开，也就是说将推选牧首，那么英格兰圣公会代表团随时都可以接待。

莫洛托夫说，他认为最好一个月后再接待这个代表团。

会见结束时，谢尔吉都主教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对政府和斯大林同志本人表示感谢。

莫洛托夫问斯大林说：

“是不是要叫摄影师来照相？”

斯大林回答说：

“别叫了，现在已经是夜里两点，太晚了。我们下一次再照。”

斯大林同都主教们告别，并把他们送到办公室门口。

这次秘密接见是一次历史性事件。不用说这项由斯大林（别人谁都不敢这么做）亲自主持的“活动”对教会和神职人员的的生活和工作意义重大。也许应该提醒那些喜欢大肆渲染斯大林残酷无情的人，斯大林也做过这样一些好事。探索真相的人也不该忘记这件事。

五 突破对列宁格勒的封锁

大本营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结束后，在顿巴斯-哈尔科夫方向展开了进攻，准备实施奥斯特罗戈日斯克-罗索什的进攻战役。在这里，在苏德战线的南翼展开了最积极的战斗行动。西北方面军、加里宁方面军以及西方面军在杰米扬斯克、大卢加和勒热夫附近也同时实施了几次进攻战役。

战争已经形成有利态势，可以对列宁格勒实施突击，以使这座饱受苦难的城市摆脱封锁。

在这种情况下，大本营制定了代号名为“火星”的战役计划。

这一次，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所集中使用的兵力不仅有陆军，而且还有海军和游击队。

此次战役的意图是由两个方面军——戈沃罗夫大将指挥的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梅列茨科夫大将指挥的沃尔霍夫方面军实施遭遇突击，并与波罗的海舰队（特里布茨海军上将指挥）协同动作。

这两个方面军分布在12公里长的地带上。但这是一个怎样的地带啊！敌人在这里构筑了十分强大的防御工事：在几个地区绵延不断的堑壕、永备火力点、土木火力点、地雷场、铁丝障碍物。反坦克防御系统



包括筑垒的河岸和泥炭开采地、两座冰雪覆盖的堆筑而成的高壁垒。掩护这些地方的是强大的炮兵、航空兵和有作战经验的士兵，他们从战争的第一个月起就在这里设防固守。

斯大林在这场非常困难又极为关键的决战中的对手是陆军元帅屈希勒。后者企图通过封锁用饥饿来扼杀列宁格勒，他以为，快要达到目的了。斯大林必须要冲破封锁圈，赶走这位元帅的部队，让经过惊心动魄的围攻的列宁格勒人能够长出一口气，吃上一顿饱饭，治疗一下创伤。

当时格奥尔格·冯·屈希勒年事已高。他生于1881年，1901年开始服兵役，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有过总参谋部的工作经历。1936年，已是中将军衔的屈希勒在柯尼斯堡任军长；1939年，他指挥的第3集团军参加了对波兰的战斗；占领波兰后，他指挥第9集团军经丹麦入侵法国，把法英联军赶到敦刻尔克，并于1940年6月4日攻下该地。

在入侵苏联前，他秘密地把他的第9集团军重新部署到东方，编入莱布指挥的“北方”集团军群，向列宁格勒方向突破。但这一次没能闪击式地获得成功。然而希特勒认为造成这次失利的罪人是莱布元帅，因为“北方”集团军群在几乎两年的时间里没能攻下这个城市。希特勒解除了莱布的职务，任命冯·屈希勒接替莱布的职务，并授予屈希勒元帅军衔。

屈希勒虽然竭力想不辜负元首的信任，但也没能攻下列宁格勒。这一次他面对的是同斯大林和朱可夫将军（暂时还是将军）作战，不是辜负陆军元帅的称号，就是失宠于希特勒，这比在前线失利更可怕。

斯大林给在沃罗涅日方面军的朱可夫打电话说：

“大本营代表伏罗希洛夫现在在列宁格勒。国防委员会认为，您也要到那里去就地看看，为了‘火星’战役的顺利实施，他们是否尽了最大努力。我们还有时间，请在莫斯科逗留一下，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

在莫斯科谈了几分钟，最高统帅又交给朱可夫一项重要的任务，他说：

“飞到突击第3集团军去呆两天，他们正在大卢加-新索科利尼基-波列奇耶地区同被围的敌军集团进行激烈的战斗。去看看那里的事情安排得怎么样。”

这项任务并不是偶然的，不单是顺路去督战。在大卢加附近苏军仍然没能彻底击溃被围的德军集团。斯大林是想强化这段战线上我军的战斗行动，把屈希勒元帅指挥的“北方”集团军群的预备队吸引过来，这么做有助于“火星”战役获得成功（顺便说一下，结果是：屈希勒为了把第16集团军“从口袋里”解救出来，把七个师派往杰米扬



斯克)。

斯大林清楚这一点，因此才把敌人的兵力从列宁格勒调开。

在列宁格勒附近，两个方面军的指挥员不止一次地会面，在朱可夫的帮助下，详细筹划了各部队的协同动作。

罗曼诺夫斯基将军指挥的突击第2集团军实施了主要突击，这个集团军就是弗拉索夫的突击第2集团军。德国人曾大肆渲染这个集团军的覆灭，而我国的报刊则尽量避而不提。弗拉索夫的背叛行为给这个集团军投下了阴影，关于该集团军后来的战斗业绩都讳莫如深，官兵都得不到奖励和晋升。这其实是毫无道理的，因为集团军早被改编、得到了补充并出色地参加过很多次战役，取得了胜利。

而这一次，这个集团军将艰难地突破德国人用近两年时间构筑的防线。这不是一次出敌不意的行动，希特勒匪徒很清楚我军进攻的准备情况，甚至知道各个部队的部署。陆军元帅屈希勒知道，既然朱可夫已经来到列宁格勒，那就是说要出大事。

他估计得没错。1943年1月12日9时30分，在施吕瑟尔堡狭长地带的两侧数千枚炮弹、地雷和航空炸弹山崩地裂般地炸响。狭长地带的宽度共有15公里，因此，两个方面军的炮火一下子就覆盖了敌人整个防御的纵深地带。在每平方米的突破地段，就发射了两三枚火炮和迫击炮炮弹。

希特勒匪徒仍拼死抵抗，两个方面军不得不用整个一星期的时间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以实现会师（每个方面军的突破距离是七八公里）。

斯大林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使列宁格勒摆脱了可怕的封锁，挽救了成千上万居民的生命。胜利的欢呼声在全世界回荡，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军事事件，而且是一个政治大事。

在两个方面军会师的那一天，也就是1月18日，斯大林情绪很好，他与朱可夫共同分享了喜悦——早就应该因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表彰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了，但一直没有时间。这一次还有另一个原因：打破了对列宁格勒的封锁，这一持续了900天的封锁不仅使列宁格勒人，而且使全国和全军不堪重负。

斯大林打电话给朱可夫，以他特有的习惯简短地说：“朱可夫同志，最高苏维埃授予您苏联元帅的高级军衔。”甚至都没有表示“祝贺”，就切入正题：“应当帮助列宁格勒人，他们在封锁中经受了这么多的苦难。十月铁路还在敌人手中，我们要尽快修建一条新的铁路支线。我将给铁路职工下达指示。”

铁路修建工作立即开始，铁道兵旅跟随追击敌人的部队前进。



两个星期后，长度为 34 公里的铁路支线开始投入使用。货物被运送到城里，而伤员和病人从城里运出。

两个星期！只能如此，这是斯大林下的命令！建设者和部队知道，这条“胜利之路”对饱受苦难的人来说是必需的：有 642 000 人因饥饿和疾病死去，21 000 人死于炮击。

英雄城市终于可以更加自由地呼吸了（“斯大林的关照”）！德国人没日没夜地对铁路进行轰炸和轰击，而铁道兵分队把全线遭到破坏的地段迅速修好。无论怎样铁路都要保持畅通，给列宁格勒人的援助源源不断地运来，而且大家都知道：“斯大林下了命令！”

1944 年 1 月 14 日~3 月 1 日进行的列宁格勒-诺夫哥罗德战役中，“北方”集团军群被彻底击溃。希特勒因屈希勒元帅没有顶住苏军的进攻，撤了（在这场战役过程中）他的职务。任命林德曼上将接替他，但不久希特勒又用莫德尔元帅代替了林德曼，希特勒匪徒自己都认为莫德尔是一个“屠夫”，因为他残暴无情。

总之，斯大林在东战场的北翼不仅使德军的重要将领遭到麻烦，而且使希特勒本人作为指挥列宁格勒战斗行动的陆军总司令（在他撤掉布劳希奇后）大为恼火。斯大林使希特勒本人再也不能实现他在“关于封锁列宁格勒”的专门报告中阐述的意图，报告说：“首先我们要对列宁格勒进行封锁（严密封锁），以炮兵摧毁该城……我们将打入市内……凡是还剩下的统统运走……要把列宁格勒夷为平地，并把涅瓦河以北地区割让给芬兰。”

全都落空了……

六 沃罗涅日交战

歼灭斯大林格勒附近保卢斯第 6 集团军的战斗仍在继续。突破列宁格勒封锁的“火星”战役正在结束。所有这一切斯大林始终十分关心，与此同时他已经在琢磨西线了。可以认为第 6 集团军已被彻底解决，列宁格勒附近也大局已定，中央战线和南方的德军战斗队形不整。斯大林问华西列夫斯基道：

“如何利用这一有利态势呢？”

华西列夫斯基回答说：“先运送物资，运往南方的物流继续通过在斯大林格勒反攻前就修好的运河运送。而部队则大步向西推进，远离沿战线的道路。从斯大林格勒向西中转货物时还会遭到保卢斯的阻挠。我认为我们像需要空气一样需要沃罗涅日-米列罗沃铁路……”

斯大林打断他的话说：“不错，就是说我们将在沃罗涅日方面军所

在的地带准备战役。您觉得应当放在什么地方？”

“总参谋部已研究过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应当歼灭奥斯特罗戈日斯克-罗索什的敌军集团，恢复利斯基-坎捷米罗夫卡铁路的运行。一旦取胜，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向各方面军运送物资，而且可以使下一步行动前景看好。”

斯大林同意了华西列夫斯基的意见，下令筹划这一战役。

总参谋部与华西列夫斯基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戈利科夫一起制定了详细的计划。1月14日斯大林又仔细研究了这一计划并予以批准。

意图几乎与此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毫无二致：通过两个军队集团朝着相向的方向实施的突击形成包围圈；莫斯卡连科的第40集团军从南面突破战线，其胜利则由克拉夫琴科的坦克第4军进一步加以扩大；由雷巴尔科的坦克第3集团军和骑兵第7军组成的南方集群向西北方向实施包抄突击；中央方向上则由步兵第18军大力进攻。

敌人的兵力相当强大——有萨尔穆特上将的野战第2集团军的七个师。往南有匈牙利的第2集团军进行防御，再往南是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军。德国人把他们的部队放在接合部的后方，不过这总共才几个团，而且罗索什的意大利师中还夹杂着德国人。斯大林格勒的经验表明，应当就在这里即在“B”集团军群战线的中央实施进攻。匈牙利部队，更不要说意大利部队了，装备很差，对严冬气候准备不足，从客观上讲是希特勒匪徒防御最薄弱的一环。所有这一切都预先表明我们胜利在握。

筹划这次战役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这件事说明，斯大林不仅倾听他左右顾问的意见，而且倾听职位和军衔较低的指挥员的意见。

原来不仅总参谋部认为沃罗涅日-米列罗沃铁路对下一步战斗行动的胜利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而且第40集团军司令莫斯卡连科将军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同军事委员会委员们交换了意见，大家一致得出结论：问题十分重要，不能迟迟不决。

接下来我引用莫斯卡连科元帅（当时他还是中将）的回忆录：

“他们劝我说：‘你去给最高统帅报告，挂个高频电话，请求批准我们的部队实施进攻战役……’”

我考虑再三。其实为什么不打电话呢，因为这种进攻战役显然很快就势在必行，提前准备这一战役岂不更好。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菲·伊·戈利科夫中将当时正在左翼，在第6集团军所处的地带，第6集团军正在作与西南方面军部队一起进攻顿河中游的准备。

我考虑好后挂了高频电话，请求与最高统帅通话。和我一同去

的还有克赖纽科夫和格鲁舍茨基。我预料先是由他接待室里的某个工作人员来接电话，我必须论证这次谈话的必要性，而在那段时间里可以完全集中思想作报告。但是从话筒里突然传来声音说：

‘接电话的是瓦西里耶夫。’

我知道‘瓦西里耶夫’是最高统帅的化名。另外，我已经与斯大林通过电话，不难听出这就是他那带有特有语调的平静低沉的声音。我激动地报了姓名，问候了他。斯大林也跟我打了招呼并说：

‘是我，莫斯卡连科同志。’

同样很激动的克赖纽科夫和格鲁舍茨基迅速把沃罗涅日方面军作战态势图摊开在我的面前。作战地图我很熟悉，于是我马上简要地阐述说，第40集团军必须积极行动，以歼灭敌军集团并收复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进攻哈尔科夫和顿巴斯时部队供应必不可少的铁路区段。

斯大林听我说的时既没有打断我的话，也没有提问题。然后他说：

‘您的建议我明白了。两小时后给您答复。’

然后他没有道别就放下了话筒。

我们三个人在等待答复时又认真讨论了态势并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对第40集团军在近期积极行动的建议完全合情合理。

正好过了两小时莫斯科来电话了。我拿起了话筒：

‘我是莫斯卡连科。’

我听到的还是那个声音：

‘我是瓦西里耶夫。我赞成和支持您的主动精神。批准实施战役。大本营为进行战役用三个步兵师、两个步兵旅、一个炮兵师、一个高射炮兵师、三个坦克旅和两三个近卫迫击炮兵团加强第49集团军^①，稍后您会得到一个坦克军。这些兵力够不够您顺利实施战役呢？’

我回答说：‘最高统帅同志，拨给的兵力够了。感谢您用这么多的部队加强我们集团军。我们不会辜负您的信任的。’

‘祝您成功。’斯大林道别时说。

我放下了话筒，转过身看着克赖纽科夫和格鲁舍茨基，我从他们兴高采烈的面容断定，他们明白了主要意思：建议被大本营采纳了。我证实了这一点并告诉了他们最高统帅对我说的话……”

① 原文如此，似应为“第40集团军”。——译者注

我没有任何贬低莫斯卡连科作战上独立思考的意思，我想用这件事强调的是斯大林教育人和培养人的高超技巧。读者都已知道，进行沃罗涅日战役的决策已经作出，进行战役的计划也已经制定，但是斯大林不想打击集团军司令莫斯卡连科的积极性。他认为最好不要“挫伤他的斗志”，说一切都已经定下来了；而是要支持他，使他有信心并通过这种支持来拉近最高统帅非常需要的积极的将军与他的距离。

斯大林确定两小时后再答复，可能是要向总参谋部核实已预定加强莫斯卡连科第40集团军的手段。斯大林又非常策略和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切，他是一个精明的心理学家，他知道他的支持将会变为集团军司令本人和他的部队（政治工作人员一定会把最高统帅本人的祝福传达给部队）更大的积极性，激励他们在即将实施的战役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总参谋部和方面军司令在1月11日前结束了战役准备工作。大本营的代表们走进了观察所。斯大林等待着第一批报告。

莫斯卡连科的集团军积极地完成了任务。第40集团军的侦察分队行动十分果敢，白垩山冰冷的斜坡上冻僵了的匈牙利人不堪一击，傍晚时分敌军即后撤了七公里。

华西列夫斯基向斯大林报告说：

“德国人跑了！”

“就是说他们逃跑了？狠狠地揍他们！”斯大林高兴地说，并告诉华西列夫斯基说：“德军没有可调遣的预备队了。我们在继续攻击保卢斯。叶廖缅科压向罗斯托夫，我们在克拉斯诺达尔和斯塔夫罗波尔附近进攻。让雷巴尔科开始行动，祝您胜利！”

1月13日，第40集团军主力在强大的炮火准备后从斯托罗热沃耶登陆场投入战斗。一昼夜下来敌人的防御从正面被突破了50公里，纵深也突进了几乎同样多的距离。一切按军事学术的经典法则进行。雷巴尔科扩大了胜利。斯大林十分满意，因为我军终于学会揍德国人了！

意大利人也顶不住雷巴尔科坦克军的突击，从一开始就逃之夭夭。一天下来坦克兵向前推进了30公里。又过了一昼夜所有进攻部队都进入战役开阔地带。

索科洛夫的哥萨克追击后撤的意大利人，向瓦卢伊基挺进。第18军把在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和罗索什之间半包围圈内狼狈逃窜的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分割开来。莫斯卡连科和雷巴尔科的集团军已经建立了火力联系，炮兵从两面狠狠轰击敌人，协助彻底堵上剩余的10公里的走廊！

速战速决的战役（15天之内）使得敌人的防御从正面被突破了250



公里，纵深被突进了140公里。敌人的15个师被歼，86000名官兵被俘。

斯大林听完华西列夫斯基的报告后问道：

“实现进一步行动的明确计划需要多长时间？”

“我觉得至少需要五六天时间。”

“为了尽快歼灭敌人需要什么支援吗？”

“我将要求瓦图京以最快的速度把哈里东诺夫的集团军向波克罗夫斯科耶地区转移，然后挥师南下。至于进一步的行动，我们已经给您呈报了有关新一轮沃罗涅日战役的计划。准确地说，是沃罗涅日—卡斯托尔诺耶战役。”

“您是否可以简要地报告一下这次战役的意图？”

“意图归结为一点：通过相向的方向上向德国第2集团军两翼实施突击来包围并歼灭其主力，解放沃罗涅日和卡斯托尔诺耶，开放沃罗涅日—卡斯托尔诺耶和叶列茨—卡斯托尔诺耶铁路区段。我们调两个方面军的部分兵力参战。他们应在卡斯托尔诺耶地区合围。在其他方面这次战役跟上次战役极为相似，只不过在中央方向上将会一下子有两个集团军（第38和第60集团军）向沃罗涅日进攻——德国人毕竟跟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不一样。然后，一旦取胜，就可以向库尔斯克敌人的中央和南方战略集团的接合部实施突击，并在德军尚未集结大预备队之前突击哈尔科夫。”

“华西列夫斯基同志，我们制定如此长远的计划是不是着急了一点？兵力够不够？”

“够了。”

最高统帅当然听得出华西列夫斯基说得很委婉，并意识到他把一部分责任揽在了自己的身上。

他明确指出说：“我指的是莫斯卡连科的集团军，他在奥斯特罗戈日斯克战斗后兵力还够不够？”

“实际上我们还有三个步兵师、三个滑雪旅和克拉夫琴科整个一个军没有使用。只是请您用炮兵师、两个‘喀秋莎’火箭炮团、KB型坦克、T-34坦克和飞机加强方面军。我们计划于1月23日即在此前战斗后立即发动战役，因此现在已经开始准备。你是否批准我与司令们开始工作？”

“好，我考虑一下。明天给您答复。”斯大林停顿了一下，善意地笑了笑说，“但是现在要祝贺您打败了敌人和被授予大将军衔。人民委员会今天签署了决议。”

既然我们学会了打击希特勒匪徒，就可以而且需要表彰胜利者。斯

大林明白这一点，于是在一天之内授予朱可夫大将元帅军衔，授予华西列夫斯基大将军衔。

第二天斯大林批准了沃罗涅日-卡斯托尔诺耶战役计划。总参谋部马上根据最高统帅的指示开始制定代号为“星”的哈尔科夫战役的计划。

1月26日晚，在卡斯托尔诺耶地区实现了对德国人的包围后，华西列夫斯基同最高统帅通了电话，他毫不掩饰内心的喜悦，向斯大林报告了这一喜讯。斯大林也感到十分满意。

他说：“结束合围，除‘星’战役以外，准备向库尔斯克突击。普霍夫在攻下卡斯托尔诺耶后应向小阿尔汉格尔斯克-法捷日突击，保证从北面进攻库尔斯克。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右翼部队应当直接进攻库尔斯克。您对此以及南方的态势有何看法？”

“我们执行指示。总的来说，态势有利于我们。敌人在卡斯托尔诺耶-库尔斯克地段、快到库皮扬斯克的防线上出现了掩护极其薄弱的长约300公里的缺口。德军正在撤退，甚至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撤至第聂伯河西岸是为了在那里设防固守。”

斯大林仔细听完后补充道：

“瓦图京也这么认为。我批准他进行‘跃进’战役解放顿巴斯。大本营也认为德军最近不可能在第聂伯河左岸的乌克兰地区和顿巴斯实施大反攻行动。国家非常需要顿涅茨克的煤，况且占领巴赫斯克会完全孤立外高加索和黑海的敌军集团。”

“这个方案有可能实施。”华西列夫斯基说。

“为什么有可能实施？您有疑问吗？”

“我作为总参谋长不能不怀疑。敌人的预备队情况确实不妙，但是已经有消息说，已从西线调来党卫军的坦克第2军。这是法西斯德国军队最精良的坦克师——‘阿道夫·希特勒’师、‘骷髅’师和‘帝国’师，其先遣部队在奥斯科尔河畔。”

“正因此才要赶快。”

“斯大林同志，我们在赶快。但是‘星’战役纵深达250公里，必须占领像哈尔科夫这样的大中心城市。完成这一任务不仅要求部队得到大力加强，而且要求成倍的加强和纵深的战役布势。被战斗折磨得筋疲力尽的部队伤亡惨重，而且进攻时部队部署在一条线上。此外，一个方面军还要在另一个重要方向上即库尔斯克方向上实施突击。”

“您怎么啦？反对继续进攻吗？”

“绝不是这样的！不利用现有态势太不应该了，但是总参谋部不可能不说出哪怕一点点怀疑。必须既整顿好战略预备队，又整顿好战役预



备队。”

斯大林开玩笑地说：“总参谋部总有与众不同的意见。沙波什尼科夫的脾气缠着您不放。好吧，我们会采取措施，但是为战役预备力量负责的首先是方面军，所以我们要看看那里（方面军）如何利用国家和苏联人民提供的一切。可是总参谋长还是应当比有疑问的人更有信心。”

斯大林没有疑虑，他坚决果敢地实施了这些战役。应当说这些战役的客观前提已经存在。红军此前在伏尔加河和顿河、北高加索、沃罗涅日附近和列宁格勒及大卢基附近歼灭了敌人 102 个师，单是被俘的官兵就有 20 多万。千百万同胞重新获得了自由，大片国土摆脱了占领者的压迫。我们的部队仅在两个月内就向前推进了 400 ~ 500 公里，敌人望风而逃。种种迹象表明，敌人不得不撤过第聂伯河。

七 库尔斯克突出部

斯大林格勒交战开始后，苏军还在歼灭被围敌军集团时，便掌握了其他战线上行动的主动权。大家都知道，斯大林起初让西方面军在勒热夫附近进行了局部战役（这使得希特勒军队统帅部非常害怕）。北高加索的希特勒的大军队集团由于戈利科夫指挥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和瓦图京指挥的西南方面军的积极行动而受到了被包围的威胁。

斯大林想利用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这些成功行动——他决定以此来促进并推动其他方面军积极行动，便给南方面军司令叶廖缅科下达了这样的训令：

“敌人的抵抗被我沃罗涅日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右翼、顿河方面军和北高加索方面军部队成功的行动粉碎了，敌人的防御被从宽大的正面突破。敌人由于缺少纵深的预备力量不得不马上分散地编入可用的兵团，于是出现了许多由人数不多的支队掩护的空着的地域和地段。西南方面军的右翼部队威胁着顿巴斯，而占领巴泰斯克将导致孤立外高加索的敌军集团，在这种情势下出现了可以分批包围和歼灭敌顿巴斯和黑海集团的有利态势。”

1943 年 2 月 16 日苏联部队继续进攻，从北面 and 东面绕过哈尔科夫，占领了该城。当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发关于授予华西列夫斯基苏联元帅军衔的命令，此时华西列夫斯基正好在这一方向上协调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行动。斯大林高度评价了他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功绩以及现在顿巴斯和第聂伯河方向积极开展的进攻，决定既要表



彰他以往的功勋，也要鼓励他今后的积极行动。

希特勒的统帅部明白一旦苏联部队抵达亚速海沿岸地区和第聂伯河，将会形成又一个比斯大林格勒更大的“包围圈”的危险，于是他们把所有可以调动的预备队马上纠集起来交给曼施泰因元帅指挥的“南方”集群。现在态势本身已经使曼施泰因不要再为斯大林格勒集团解围，于是他把强大的坦克突击队集中起来于2月19日对我正在进攻的方面军的翼侧实施了有力的反突击。

这一反突击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正如多次发生过的情况那样，我们埋头进攻，却忽视了敌军的集结。可以说曼施泰因用这次反攻一笔勾销了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所有胜利，把他们赶回到出发阵地，德军甚至向前推进得更远，大有攻占别尔哥罗德之势。

斯大林打电话问朱可夫（他这些天正在西北方面军）他们那里现在态势如何。

朱可夫报告说：“过早到来的解冻天气使得洛瓦季河难以渡过，看来西北方面军部队暂时不得不停止在这一方向上的进攻行动。”

“那好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同意，让他们暂时停止进攻。”斯大林明白，紧张的战斗后，需要有喘息时机。

此外，最高统帅还和朱可夫商量了一些人员调动的问题。

“我们刚才决定派索科洛夫斯基担任西方面军司令。”

朱可夫说：“我建议由科涅夫担任这一职务，他指挥过西方面军，了解态势以及兵团指挥员。而铁木辛哥适合被派往南方担任大本营代表，协助南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司令。他也很熟悉那些地区，不止一次去过那里。况且那里的态势似乎对我军有点不利。”

斯大林同意说：“好吧，我通知科涅夫，给他下达指示。但是请您明天飞回大本营。必须讨论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态势。您甚至也许得马上飞往哈尔科夫地区。”

莫斯科进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有很多人参加的谈话。办公室里聚集了有关人民委员部、大型冶金厂、飞机制造厂和机床制造厂的领导人，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和许多设计师也参加了会议。

斯大林概括地勾画了前线的态势后命令工业部门负责人加大力度组织生产，支援正在进行大规模进攻战役且同时面临1943年复杂战局的各方面军。斯大林像以往一样，不仅处理军事问题，而且还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组建预备队、外交和党务工作。

会议晚上3时结束。斯大林朝朱可夫走去问道：

“您吃过晚饭了吗？”

“没有。”

“那好，去我那里吧，我们顺便再谈谈哈尔科夫地区的情况。”

朱可夫刚要吃饭，总参谋部负责方向的参谋就拿来了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态势图。他报告了那里出现的严峻形势：由戈利科夫上将任司令、赫鲁晓夫任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沃罗涅日方面军行动不力，以致给瓦图京部造成了麻烦，哈尔科夫面临威胁。

“为什么总参谋部不提醒？”斯大林问道。

参谋说：“我们提过建议。”“总参谋部本应干预方面军的指挥。”斯大林斥责道。然后他想了想，对朱可夫说：“不管怎么样您早上得飞往那里，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最高统帅马上给沃罗涅日方面军挂了电话。接电话的是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同志，您怎么忽略了敌人的反突击，不仅使自己，而且使友邻部队被动挨打？……”

斯大林训斥完赫鲁晓夫后，放下了话筒，对朱可夫说：

“总得把晚饭吃完。”

这当然已经不是晚饭，而是早饭，因为是早上4时多了。朱可夫对最高统帅说：

“我明白要马上飞过去，但是我要去国防人民委员部作飞往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准备。我要在那里获取现有的消息。”

当天朱可夫了解了态势后，打电话向斯大林报告了发生的情况。事态发展得比在斯大林那里吃饭时总参谋部那位参谋报告的还要糟糕。朱可夫报告说：

“哈尔科夫已被敌人的部队攻克，敌人由于没有遇到特别的抵抗，正向别尔哥罗德方向推进，占领了卡扎契亚洛潘。必须赶快把大本营预备队中可以调动的兵力都调到这里来，否则德军会占领别尔哥罗德。”

斯大林还来不及抽调必需的预备队——虽然他也想这么做，更确切地说，是预备兵团来不及执行他的指示——德军就在3月18日攻下了别尔哥罗德。

但是3月21日斯大林把第21集团军派往别尔哥罗德以北，于是朱可夫用这个集团军的兵力构建了相当牢固的防御。而斯大林把坦克第1集团军集中在奥博扬以南地区，以备对敌人实施紧急反突击之需。因此，斯大林用他的预备队扭转了这一十分危急的正面地段的局势。敌人的反攻被制止了，战线稳定了下来。

斯大林想预防出现类似的意外情况，于是命令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对中央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面对的敌情进行认真细致的侦察，并查明与我方面军对峙的敌军的情况。

应该说，我军在这些方向上的活动得到了游击队的大力支援——部



队已经接近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游击区。游击队员在铁路上实施突击——他们颠覆列车，而且还送来了许多关于敌人的情报。华西列夫斯基在为斯大林准备对敌军集团的侦察材料时使用的就是游击队员获取的情报。

斯大林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地区的战线稳定后开始平静地熟悉情况，研究了关于敌人的材料，他仔细推敲，反复斟酌，开始考虑未来的战役。

战后，在谈到斯大林格勒反攻计划的设计者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是谁提出的？是谁第一个提出的？谁构思了库尔斯克会战的意图？

斯大林4月11日仔细分析了1943年整个夏季战局的计划，然后又单独仔细研究了库尔斯克突出部地区的战役计划。

华西列夫斯基、安东诺夫和朱可夫根据斯大林的指示4月12日在总参谋部里干了整整一天，为给最高统帅的报告准备材料。当天晚上他们三人向斯大林报告了最后的方案。

斯大林意图的实质，归根结底也就是他所作决策的实质是，库尔斯克突出部的战役应当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有目的地稳固防御，击退正在进攻的敌人主力；第二阶段是坚决进攻和歼灭即将进攻库尔斯克突出部的敌军集团。

我们的部队的防御不是被迫的，而是有目的的，大本营审时度势，既不操之过急，也不久拖不决，选定了转入进攻的时机。

这一准备工作结束后斯大林命令华西列夫斯基和安东诺夫起草好所有的文件，也就是这次战役的计划，然后给部队下达了训令。

准备和组织部队在库尔斯克突出部行动的工作持续了几个月。在前线没有积极的战斗行动期间似乎可以在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和哈尔科夫紧张的战斗后稍微喘一口气，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不仅斯大林和本营的所有成员，而且方面军司令们在这一平静时期比战斗时神经更紧张。

各方面军构建了纵深达200公里的梯次防御，其堑壕体系中不仅藏着歼灭坦克的直接瞄准炮，而且还藏着许多就地轰击敌军坦克的坦克。炮兵对必要地域和地区进行了试射；部队进行了繁杂的变更部署，集结了大量的兵力。两个方面军（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中单是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就有6个，还有2个坦克集团军、1个空军集团军、22个步兵军、76个步兵师、4个独立步兵旅、4个独立坦克军、9个独立坦克旅、1个近卫“喀秋莎”火箭炮兵师和许多专业部队。上述部队都作好了战斗准备，他们等待敌人开始进攻……但是敌人却不进攻。

司令部开始胡乱猜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我们搞错了？还是我们在这里部署了如此密集的部队和战斗装备，而敌人却去突击前线其他的地段？敌人也许要向莫斯科突击？

他们三番五次通过侦察部门核实情报，而侦察部门证实没有出任何错，敌人在这里纠集了主要的突击集团进行决定性进攻，为了证实这一点还列举了兵团编号及其即将行动的方向。侦察部门证明不可能出错。但是希特勒的部队仍然不进攻。

斯大林派华西列夫斯基到前线协调沃罗涅日方面军和南方面军的行动，而责成朱可夫协调三个方面军（中央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方面军）的行动。

侦察部门终于报告说，敌人将于5月10~12日在奥廖尔-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奥博扬方向上转入进攻。大本营马上通知各部队，于是所有的部队都全神贯注，作好准备。但是敌人在这几天也没有转入进攻。

又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等待。又传来消息，说敌人将不晚于5月26日转入积极行动，但是这一次也没有开始战斗行动。方面军司令们和斯大林坐立不安，瓦图京建议最高统帅改变决策，主动实施先敌突击。但是斯大林犹豫不决，他对华西列夫斯基说，让总参谋部制定立即转入决定性行动的计划，但同时他又对华夏列夫斯基说：“我会就此事再作补充指示。”

7月2日侦察员们报告说，希特勒匪徒的进攻将不晚于6日开始。需要指出的是，我军侦察部门前几次也没有出错，他们根据德军自己预定的时间段准确地确定了预计开始进攻的日期，但是德军自己推迟和改变了这些日期，因此侦察员们的报告似乎显得不准确了。

7月4日16时敌人派小股兵力（共4个营，20辆坦克）进行战斗侦察。敌人当然没有楔入防线，但是我军从这个战斗侦察队中抓获了俘虏，那些俘虏供出，第二天将发动总攻。与此同时侦察员们也抓了“舌头”，后者也证实了这些消息。

于是现在我方面军司令们根据确凿无疑的有关即将发动进攻的情报决定实施（其实是早已计划好了的）炮火和航空火力反准备。不难想像炮兵疯狂的炮火和飞机的炸弹落向敌军集中好的部队时的情景。首先，德军部队因此伤亡惨重；其次，从精神上来讲这使敌人士气一落千丈。

但是希特勒匪徒4时30分仍然开始了他们的炮火准备，5时30分转入全线进攻。他们仅需两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就从如此强大的反准备中恢复了常态，有能力发动进攻。后来从俘虏的供述和对我们进攻后占

领的德军阵地的观察中查明，反准备虽然火力强大，但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准备发动得早了，敌人的分队还在掩体和避弹所里，坦克和装甲运输车还在侧防暗堡里，因此德军部队的伤亡并没有我方预计的那么大。反准备应当再晚一个半小时左右开始，那时德军的有生力量已经走出堑壕，处于开阔地上，而坦克已经开出掩蔽工事并准备向我军阵地方向推进。但是敌人还是遭受了巨大的伤亡，主要是被强大的狂风暴雨般的预警性炮火搞得丧魂落魄。

但是现在态势发生了180度的变化——德军炮兵和航空兵以十分强大的火力猛攻苏军阵地。炮兵和航空兵的这种狂轰滥炸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此后希特勒的步兵和坦克向前推进。他们决心要击退我们的部队。步兵的战斗队形中有新式兵器“虎”式坦克和“斐迪南德”式自行火炮，它们支援步兵的行动。敌军部队在准备期间进行了相应的鼓动士气的工作，德军就像战争爆发头几天那样肆无忌惮地投入冲击，磨拳擦掌，决心横扫前进道路上的一切。但是我方进行了几个月的强化军事和精神心理准备也大有成效：虽然希特勒匪徒气势汹汹，但他们的冲击被打退了。进攻部队卧地不动。此后炮兵又袭击了一次。德军又向前扑，但是冲击又被打退了。这样反复了四次。德军只是在第五次冲击后，在新的强大的炮兵和航空兵支援下才楔入了我军的防线，把苏联部队在不同的地段上逼退了3~6公里不等。

斯大林命令空军第16集团军司令鲁坚科让所有的飞机投入战斗，以削弱、有可能的话甚至制止希特勒匪徒在主要方向上的突击。鲁坚科给这里派来了150架轰炸机，由200架歼击机进行掩护。航空兵的突击起到了作用——德军的进攻暂时停止了。

普霍夫将军指挥的第13集团军的战士们遭受了敌人的第一次强力突击。现在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已经明确。步兵第17军也马上被部署到这里。

“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冯·克卢格不顾伤亡巨大，继续督促他的部队往前冲，三天下来他们已经向我们的防线纵深推进了10公里。但是战术纵深仍未被突破。冯·克卢格元帅意识到了这一点，7月7日早上又开始炮火准备和航空兵火力准备，下令继续进攻。到7月10日，希特勒匪徒的部队在这里连一公里也没能推进。我们的分队岿然不动，因为所有的预备工作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虽然45毫米口径大炮的炮弹不能击穿“虎”式坦克的钢甲，但这些炮队也派上了用场：他们照着履带射击，使那些“虎”式坦克停下来，然后一些勇士悄悄靠近这些钢铁怪物，向它们扔手榴弹或者把反坦克地雷偷偷塞在坦克底部，把已经停驶的坦克炸毁。

7月9日斯大林打电话问战事进行的情况。朱可夫报告说：

“在中央方面军地段上敌人的兵力已不足以突破我军的防御。我认为，为了不让敌人固守已占领的地区和组织将要被迫转入的防御，必须用布良斯克方面军的全部兵力和西方面军的左翼立即转入进攻。这将大大有助于中央方面军的行动，这样中央方面军就可以实施计划中的反攻。”

斯大林说：

“好吧，那您就到波波夫那里去，让布良斯克方面军开始行动……”

朱可夫当天就来到了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部，他在这里和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波波夫将军与西方面军司令索科洛夫斯基通了电话后，一起组织了这两个方面军对冯·克卢格进击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的翼侧实施反突击。

如果看看奥廖尔地区部队的部署情况，则在该城及以东方向的楔入部正是一个十分便于实施翼侧突击的阵地。斯大林正是组织实施了这一翼侧突击。

7月12日两个方面军（西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突击了希特勒匪徒楔入部的底部。

冯·克卢格元帅惶惶不可终日！他清楚对他部队后方的这一强力突击会造成的威胁。他甚至马上从主要方向上撤下部队，把他们派去对付反突击，试图借此挽回局势。斯大林从侦察部门那里得知这一情报后命令罗科索夫斯基的中央方面军立即转入进攻。主要方向上被削弱了的德军部队顶不住这一突击，开始慢慢后撤。

当奥廖尔方向上一切都已明朗时，斯大林打电话命令朱可夫马上前往沃罗涅日方面军，负责协调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部队的行动，特别是负责坦克交战异常惨烈的普罗霍罗夫卡方向。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库尔斯克突出部这一侧的司令曼施泰因元帅由于头三天总共才推进了八公里，决定在防御的战术纵深中直接包围我军部队，为此他纠集起了他的“南方”集团军群的近700辆坦克和“肯普夫”集群的近300辆坦克——总共近10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当曼施泰因实施这一突击时，华西列夫斯基与方面军司令瓦图京大将一起尝试通过反突击制止德军部队。于是这两大进攻集团于7月12日在普罗霍罗夫卡地区投入了遭遇战。

斯大林在这一危急形势下亲自指挥了部队。他把大本营预备队（扎多夫将军的近卫第5集团军和罗特米斯特罗夫中将的近卫坦克第5集团

军) 拨给华西列夫斯基。此外, 草原方面军中特罗菲缅科中将所部第27集团军也向这里移动。斯大林就是在这个时候命令朱可夫前往这一方向, 因为库尔斯克突出部爆发了主要的坦克交战。

我找不到任何话语和色彩来描绘发生在普罗霍罗夫卡附近的坦克交战的情景。请大家设想一下近2000辆坦克在一个不大的空间里交战的场面: 坦克相互倾泻着炮弹, 已经打坏的坦克冒着熊熊大火, 从这些滚烫的坦克里跳出来的士兵(德军的和我军的)立刻投入肉搏战……所有这一切持续了整整一天! 交战的激烈程度也可以从伤亡程度上看出: 希特勒匪徒的400多辆坦克和差不多数量的我军坦克在这个战场上烧毁或在坦克舱内的弹药爆炸后变成了一堆堆废铁。

下面我简单摘引这次交战的参加者们的回忆录。苏联英雄Г. 佩涅日科这么写道: “我们和敌人的坦克都聚集在一块大开阔地上。我们一看见坦克钢甲上的十字就照着坦克打。隆隆的炮声震破了耳膜, 以致耳朵里流出了鲜血。发动机持续不断的轰鸣声、金属碰撞的铿锵声、轰隆声、炮弹爆炸声、铁甲被炸裂的刺耳的响声不绝于耳。坦克对着坦克冲……我们失去了时间感, 感觉不到口渴和闷热, 甚至感觉不到对狭小的坦克舱的射击。只有一个想法, 一个念头——只要活着, 就打击敌人……从被炸毁的坦克里使劲爬出来的我军坦克兵在战场上寻找同样失去坦克的敌人的坦克兵, 用手枪打他们, 投入肉搏战。我们每一个人在普罗霍罗夫卡战场上都做了人力所能做的一切。”

这是我军士兵的感受。下面是在这里即在普罗霍罗夫卡被俘的上等兵沃伊特洪的感受。他说, 他所在的连100人中仅有3人活了下来, 而且这3个人也都被俘了, 不到12名伤员能爬回后方。审问这名俘虏的少校在材料中发现了一张照片, 便指着这张照片问沃伊特洪道: “这是谁?” 他回答说: “这是我。”但是照片上是一个长着一头浓密头发、一张朝气蓬勃的面的笑嘻嘻的面颊丰满的年轻人。“看来这是您很早以前的照片?” 俘虏回答说: “不是, 这是我去年休假时拍的。”然而站在少校面前的不是一个年轻人, 是一个满脸皱纹、头发斑白的老兵。少校掏出他每天早晨照着刮胡子的小镜子递给俘虏。俘虏在镜子里看了自己一眼, 简直惊呆了, 因为他看见自己变成了一个头发斑白、老态龙钟的人。“该死的战争啊! 我的头发可不是斑白的, 我记得很清楚。昨天, 就是这次战斗的前一天, 我刮了胡子, 我的头发还没有斑白。”

普罗霍罗夫卡大战是库尔斯克会战的转折点。

但是曼施泰因并不认为自己战败了, 他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交战达到了最高潮! 很快就应当分出胜败。冯·克卢格元帅



和我于7月13日应召前往元首大本营时的态势就是这样的。如果希特勒亲临两个集群，或者如果他认为总的局势不允许他离开大本营，因此给我们派来总参谋长，那么当然就更对了。但是整个东方战局很少能让希特勒亲临前线……

冯·克卢格元帅（在7月13日的会议上。——本书作者注）报告说，莫德尔的集团军不能继续前进了，已经损失了2万人。此外，集群必须调回第9集团军的所有快速部队，去堵住敌人在坦克第2集团军正面三个地方打开的纵深缺口。第9集团军已经由于这一原因不能继续进攻，以后也不可能再进攻了。（克卢格指的是斯大林组织的西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的反突击。——本书作者注）

相反，我报告说，如果说的是‘南方’集群，那么交战已经进入了关键阶段。在成功击退最近几乎投入其所有战役预备队的敌人的冲击后，胜利已经不远了。现在停止会战，可能意味着失去胜利！”

接着曼施泰因十分详细地阐述了他的歼灭苏军预备队和进入库尔斯克突出部集团军后方的计划。他写道，即使第9集团军不能进攻，那么他用他的部队在苏军没有完全合围库尔斯克突出部的情况下，甚至也会使苏军遭受重大伤亡，事实上“堡垒”战役将以胜利而告终。

曼施泰因本人在回忆录中对他的“南方”集团军群即将采取的行动作了这样乐观的阐述后写道：“遗憾的是，这些计划毫无成效。”

曼施泰因显然为了以某种方式在历史面前为自己辩解，故意表现得泰然自若。当他为他部队未来的行动制定胜利计划时，库尔斯克附近的普罗霍罗夫卡交战已经结束了，他的部队在这次交战中遭受重创，开始退回他们原来的阵地。

至于“中央”集团军群的战斗行动，其司令冯·克卢格元帅说，集群已经彻底没有能力继续进攻了，也不能击退苏军的突击了。

因此，三个方面军（西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北正面的反攻就以重创敌人而告终。这次战役是提前准备的，代号是“库图佐夫”。斯大林在这次战役中又大败先前在莫斯科附近与他交过手的克卢格元帅。当时克卢格指挥的第9集团军后撤至离莫斯科200公里处。但是希特勒在冯·博克元帅被解职后因克卢格有过一些功绩而任命他为“中央”集团军群司令。

库尔斯克突出部的南正面在普罗霍罗夫卡大战后也遭到有力的反突击，因此从这里发动的反攻以及敌军在别尔哥罗德地区的大量消耗，迫



使希特勒的统帅部不得不承认他们苦心筹划的“堡垒”计划破产了。希特勒的司令部为了避免全军覆没，决定把部队回撤至他们已开始进攻的防御地区。

德国部队刚一撤走，开始固守其出发阵地，朱可夫就认为在继续进攻前应先让部队稍作喘息、变更部署并补充已损耗的储备。但是斯大林认为不能停顿，他要求朱可夫继续进攻，并强调说敌人现在不会抵抗，要利用希特勒部队的张皇失措。

朱可夫关于这件事这么写道：“我和华西列夫斯基花了很大力气向他证明不能仓促开始行动，只有全面作好准备并在物资上得到保障时，才能发起战役。最高统帅同意了我们的意见。”

斯大林逝世后有人说，他从不听任何人的意见，独自作出军事政治决策。我们不能苟同这种说法。如果汇报人十分熟悉情况，他还是会听的，并且有时还会放弃他自己的观点和决定。结束库尔斯克突出部第二阶段交战的战役的发动就是这样的。

库尔斯克交战第二阶段的计划斯大林早在5月份就批准了。现在即在中央方面军7月12日、沃罗涅日方面军7月21日结束了第一阶段后必须对计划作相应修改，斯大林和总参谋部在协调各方面军行动时就在做这件事。

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北正面抵抗中央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方面军的是已被击溃的“中央”集团军群。我们在这里的进攻行动无疑会获得胜利。同时必须花费更大的力气来组织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的进攻。将整个草原方面军纳入行动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过去即在第一阶段草原方面军没有参战，虽然某些兵团由于局势危急而投入了交战，因此这个方面军在防御阶段就有伤亡；沃罗涅日方面军在第一阶段也遭受了重大的人员和装备损失。但是斯大林仍然保存了草原方面军的主力，他胜利地完成了第一阶段即防御阶段后，现在拥有相当多的兵力。

斯大林考虑到北突出部的条件较为有利，决定让中央方面军、西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的部队首先投入进攻。斯大林在这里开始了战斗行动并相信一切都会进展顺利，他于8月3日用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的兵力对库尔斯克突出部实施了强大的突击。8月5日草原方面军部队突入别尔哥罗德，继续向哈尔科夫方向推进。

当天北正面的奥廖尔城获得解放，各方面军司令们当然赶忙向最高统帅报告了这些战果。安东诺夫和什捷缅科当时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斯大林当时心情很好，问他们说：

“你们读军事史吗？”

将军们不知道如何作答。什捷缅科是这么说的：“我们这几天顾不上读历史书。”

斯大林却继续说道：“如果你们读过军事史，那么你们就知道，早在古代，当部队获胜后，要敲响所有的钟来祝贺统帅及其部队。我们不妨以什么更隆重的方式来庆贺胜利，而不是只颁发祝贺令。”他朝坐在桌旁的大本营成员们点了一下头说：“我们打算放礼炮和挂彩灯来祝贺立功的部队及其指挥官……”

获胜后放礼炮的主意就是这样诞生的，正是为庆祝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的解放在莫斯科第一次放礼炮，是用高射炮齐射曳光弹。但是当时放这第一响礼炮时这些高射炮弹的不少碎片落到了屋顶以及人们的头上。因此后来决定放礼炮时高射炮和其他炮发射空弹并施放烟火火箭。

库尔斯克附近的两次进攻战役都以完胜告终。这次战役在北正面叫“库图佐夫”战役，在南正面叫“鲁缅采夫”战役。8月23日草原方面军部队解放了哈尔科夫城，于是西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所解放的地区使我军可以制定和实施进一步向第聂伯河和希特勒匪徒在这条河上构筑的“东方壁垒”方向发动战略进攻的计划。

库尔斯克的胜利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德国的许多盟友意识到，希特勒匪徒在这场战争中必败无疑。而且希特勒的统帅部要稳定东线就必须紧急从西线调来14个以上的师，这当然有助于苏联的盟国开辟第二战场。

我想在这里引用希特勒在“堡垒”战役之前给他的部队下达的命令。我认为读者从这一命令中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到希特勒对这次战役抱有多大的希望和由于最高统帅斯大林指挥的我军胜利而巧妙的行动德国人吃了多大的苦头。

“我的指挥官们！”

我下达了进行今年第一次进攻会战的命令。你们和你们指挥的士兵的任务是要千方百计顺利进行这一战役。今年第一次进攻战役的意义非常重大。这一由德国人发动的新一轮战役不但会更加坚定我们本国民众的信心，给其他国家留下影响，而且首先会给德国士兵自身增添新的信心，更加坚定我们的盟国对最终取胜的信心，而中立国家将不得不谨慎行事，保持克制。如果苏联领导层对今后事态不施加任何决定性影响，那么这次进攻使苏联遭受的失败必将在近期剥夺苏联领导层的主动权。

用于进攻的部队配备了各种足以发扬德国人发明精神和德国人技术的武器，总兵员数达到了我军的空前规模。这次以及接下来的

战役都有充足的弹药和燃料保障。我们的航空兵集中其所有的兵力，摧毁敌人强大的空军，会协助夷平敌人炮兵的发射阵地和通过不间断的努力支援步兵，使他们的行动容易取得成功。

因此，我的指挥官们，我在这次会战前夕给你们下达命令。这是因为进入战争第四年，会战的结局比任何时候都更取决于你们即指挥官们，取决于你们的指挥，取决于你们前进的动力和愿望，取决于你们一往无前和不屈不挠追求胜利的意志，如果需要的话，也取决于你们个人的英雄行为。

我知道对你们在准备这次会战时的表现就已经应当表示深深的谢意，我为此感谢你们。但是你们自己应当明白，正是1943年这第一次大会战的胜利比任何普通胜利都具有决定意义。

指挥官先生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怀疑我可以信赖你们。

阿道夫·希特勒

这一命令在各师司令部宣读后销毁。”

但是这一切不但没有实现，而且听取了希特勒这一命令并向元首承诺竭尽全力实现这一命令的人中有将近一半官兵，我再说一遍，他们中将近一半人阵亡、负伤或致残了。希特勒部队的士气彻底被摧垮了，而希特勒本人精神受到很大刺激，他的手比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更抖，脚和头抽搐得更厉害。第9集团军司令莫德尔上将后来开枪自杀了，而“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克卢格元帅也不比他的部下活得长多久——他由于受到战斗中其他失利的折磨，也于1944年自杀身亡。他的集团军早在莫斯科附近就已被歼灭，而现在他在这里即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再次失败，这无疑对他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影响，毁掉了他作为希特勒的将军一度惯有的信心，最后才导致这种可悲的下场。斯大林在库尔斯克附近也使经验丰富的老对手曼施泰因元帅又遭受了一次失败。

库尔斯克突出部的交战展示了斯大林在各个阶段（准备防御战役阶段、迅速变更部署和转入反攻阶段以及娴熟地进行大规模总攻阶段）的成熟的统帅才能。斯大林在做这一切时坚决自信，展示了他在军事学术方面对在战场另一边与他对抗的德国统帅们的全面优势。

八 向第聂伯河进军！

库尔斯克突出部的战斗进行得很艰苦，但在交战过程中已经明显看出，我方将在这场大战中获胜。斯大林毫不拖延地投入了工作，加紧对

先前提出的1943年夏季战局计划进行研究和审定。

斯大林在战斗过程中曾两次邀请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将军（华西列夫斯基当时在前线）同他一起研究和修订近期作战计划。

斯大林懂得，希特勒匪徒在库尔斯克突出部这样的大战中失败后，势必在这里动用他们所有的预备队，出现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整个广阔战场上从几个方向实施突击的有利态势。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许多方面军并没有参加库尔斯克会战，它们有足够的兵力来发动战役。

斯大林的意图十分宏大。他设想的战役都得到了实施，如斯摩棱斯克战役和解放白俄罗斯的前期战役，把德国人赶出重要工业区顿巴斯，解放左岸乌克兰和切尔尼戈夫州，布良斯克战役（从中俄罗斯高地向杰斯纳河流域推进），以解放高加索为目标的新罗西斯克—塔曼战役，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从彼列科普方向前出至克里木地峡）和刻赤登陆战役（通过刻赤海峡在克里木登陆）。所有这些战役都按计划在不同的时间发动，一仗未完一仗又开始，使得敌人没有机会调动剩下的预备队。

斯大林给总参谋部和安东诺夫将军下达指示说：

“不要浪费时间去搞包围、变更部署和部队机动等复杂的战役组织工作。这样做会分散很多精力，也要花时间。要利用现在的有利态势，尽快把敌人赶到第聂伯河去，可能的话，把他们赶过第聂伯河。”

1943年8月25日，国防委员会召开例行会议。斯大林听取了情况汇报，就作战问题作了指示，与会者再次为他研究问题的广泛而叹服。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指示要为“第二个巴库”的投产加紧工作，以防止出现高加索方向在巴库油田险些失守时突然遇到的那种危险。斯大林为加紧开采已在西伯利亚和乌拉尔以东探明的油田花费了很多精力，就在这次会议上，他听取了那里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对如何做好这些工作进行了具体指导。他研究了加快新高炉、电站和矿井建设的问题。这时已疏散的工厂已经在新的地方全面开工，1943年生产了35 000架新式飞机、24 000多辆坦克和改进了的自行火炮。斯大林很在行地谈到更完善地组织生产，谈到设计人员为改进战斗技术装备质量进行的创造性工作，深入探讨了生产工艺，谈论起军工厂的流水作业。他可真是样样在行。

斯大林放走了文职干部，自己顾不上休息，马上开始处理军事问题。他听取了朱可夫关于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态势的简要报告，又请安东诺夫简要地报告了其他地段的情况。

斯大林听完安东诺夫的报告后说道：

“现在最主要的是组织向第聂伯河和莫洛奇纳亚河挺进，因为在追



击时趁势占领登陆场更容易。我请求尽快采取行动的另一个理由是：希特勒匪徒边退却，边在破坏顿巴斯的一切——矿井、工厂、城市，杀戮居民，妇女和儿童死于非命。应当阻止他们这么干，要尽快把德国人赶过第聂伯河。”

然而进攻行动的进展毕竟不像预期的那样快。斯大林再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他动用了自己的预备队——9月上半月，预备队中由雷巴尔科指挥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分别由普霍夫和切尔尼亚霍夫斯基指挥的第13和第60集团军被调往沃罗涅日方面军。近卫第52和第5集团军被编入草原方面军。

为在短短的时间内组建这些预备队，斯大林作出了非凡的努力！由于他的努力，我军才展开了更迅猛的进攻。两个方面军简直如摧枯拉朽般击溃了顽抗的希特勒军队，把它们赶到了第聂伯河边上。航空兵在这段时间里帮了大忙，就像那时希特勒航空兵打击我军一样，这一次我们的航空兵也轰炸了希特勒匪徒的辎重队和溃退的部队。

为鼓舞、调动和激发将官们的斗志，斯大林颁布了命令：谁能首先前出至第聂伯河、在对岸占领并守住登陆场，就授予谁苏联英雄称号。应当说这个承诺确实起了作用，许多官兵加倍努力地突击溃退的敌人，争相赶往第聂伯河、强渡第聂伯河，并努力去赢得这一殊荣。

9月23日，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的机械化部队首先渡过了第聂伯河，接着是奇比索夫集团军的部队从基辅以北渡河。总之，到9月底苏军已经从多处强渡了第聂伯河，占领了广阔的登陆场，开始是整团整团地，后来是整师整师地，再后是以整个集团军为单位，从这些登陆场通过。斯大林兑现了他的承诺：2500多名士兵、军士、军官和将军因成功强渡第聂伯河而荣获苏联英雄称号。

我记得，这么多的人获得如此殊荣曾引起一些议论，有人认为，未必所有地方和所有的人都配获得金星奖章，可是竟一下出了这么多的英雄！过去要想获得这个称号，一定要建立特殊的功勋，往往要献出生命，要做出几乎无法做到的、超常的事情；可是这一回却一下子出了两千多个英雄……

我认为必须指出，发表这种议论的人，都不明白当时强渡第聂伯河并固守对岸的意义。第聂伯河本来就是非常宽阔的水上屏障，首先到达河边的是一小股侦察兵，这是人数不多的小分队，他们超越了自己人和敌人，冲到了前面。他们的人数不多，不指望援兵，没有制式的渡河器械。他们渡河时是各显神通：有的人拆了村里的栅栏，有的人用圆木、木板或大圆桶扎成了木排，有的人找到了小渔船。他们试图利用这些所谓“应用器材”穿越十分宽阔的第聂伯河。我之所以说“试图”，是因



为有很多很多人没能到达彼岸。希特勒匪徒在第聂伯河西岸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地区并称其为“东方壁垒”。他们打算在这里长期设防，呆上几个月，以便整顿溃散的队伍。第聂伯河好似一道由工事加固的天然屏障，能够保证这一重大战略任务的完成。

然而斯大林也明白第聂伯河的作用，迅疾前出至第聂伯河正是为了不让希特勒匪徒筑成这座“东方壁垒”。

是那些用“应用器材”首先渡过第聂伯河、以小股兵力（也没有大部队）从防御阵地突击敌人的人，实现了斯大林的意图。这些人疲惫不堪、浑身透湿、没有足够的弹药，却完成了难以完成的任务。许多这样的勇士献出了生命。敌军懂得不能让强渡过来的人站稳脚跟，他们采取种种措施要把占领了小登陆场的人赶跑。然而不少机敏勇敢的士兵和下级军官抗击着敌人，攻下了河对岸一小块地方后，守住不放，在自己的部队到达之前击退了德寇一次次的疯狂反冲击。

不妨设想一下，一小股勇士异常艰难地坚守对岸一小块地方几个小时、甚至一昼夜的情景！勇士们遍体鳞伤，有时是血肉模糊，坚持到最后一口气，因为他们知道，这一小块河岸对于随后很快会抵达第聂伯河的人该有多么重要。因此第聂伯河的英雄是真正的英雄，他们建立了真正的功勋，应当给他们戴上金星奖章。每一个英雄与他们的英雄集体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们保住了几十万战友的生命。如果我们不在行进中强渡第聂伯河，不紧接着马上利用并扩大这些登陆场，就不能把德寇从第聂伯河赶走，就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为了所谓的按部就班地攻克水上天险而献出生命。德国人一旦守住了这座“东方壁垒”，就得用不止一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和实施强渡水上天险的大规模战略进攻战役。而且还不知道战役能否取得胜利，因为第聂伯河及其西岸的防御工事可以说的不比盟军几年都不敢渡过的拉芒什海峡小的天险！所以我军也需要做扎实和长期的准备。

迅疾前出至第聂伯河、在行进中占领长达750多公里战线上23个登陆场——对这一切无论作出怎样的估价都不会过高。值得惊讶的倒是斯大林的机敏和刚毅。他同各方面军司令和其他领导人，当然还有亲自占领和固守这些登陆场的士兵——执行者们一起，实施了一个作战艺术高超、战略意义重大的战役。

我军顺利占领第聂伯河登陆场的行动，不仅让希特勒军队的统帅部感到惴惴不安，而且坦率地说，是使他们大吃一惊。希特勒亲临前线来对部队施加影响，让它们守住可以说是东战场最后一个坚固的防御地区。所以说，这一次斯大林在第聂伯河上是与德国最高统帅本人直接较量。希特勒集结所有兵力进行反突击，试图让过了河的苏联部队葬身于



第聂伯河。但是苏军的几个师打退了敌军的反冲击，守住了基辅、切尔卡瑟、克列缅丘格、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扎波罗热地区大部分地段。

我军占领基辅地区的登陆场后，马上开始策划解放乌克兰首都的战役。距离基辅最近的是布克林登陆场，计划由沃罗涅日方面军从这一登陆场实施突击。斯大林听取并批准了朱可夫和瓦图京就实施战役所作的决策。

可是曼施泰因这一次识破了朱可夫的意图，他纠集预备队，打退了从布克林登陆场发起的突击。

朱可夫后来回忆说：

“我分析了我军登陆失利后的形势，得出结论，认为从布克林登陆场发起进攻未必能够成功。突击失去了突然性。敌军识破了我军的意图，加强了反击的力度。这一方向的地域极不利于坦克行动——沟坎太多，起伏太大，道路又少。我的结论是，必须把着力点移向柳捷日登陆场。我也向最高统帅报告了这一情况……”

可是斯大林要求朱可夫严格执行原来的决定，夺取基辅。

朱可夫又进行过两次尝试，但仍以失败告终。

朱可夫为斯大林的固执感到吃惊，这位元帅当时并不知道，三巨头——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很快要在德黑兰会晤，最高统帅想带着苏军胜利攻克基辅这样有力的证明前往德黑兰。

斯大林在确信从布克林登陆场发起冲击难以成功后，批准了新的夺取基辅的计划。

这一计划的实质是：假装全力固守布克林登陆场，实际上是从这里撤走近卫坦克第30集团军并将其重新部署到柳捷日登陆场，从那里出其不意地突击希特勒匪徒。

斯大林急不可待。他希望在德黑兰会议之前按照预定期限攻克基辅。

应当说，尽管这个意图不错，但是落实起来可没那么容易。设想一下坦克集团军的情况吧：这里有那么多人、坦克、辅助装备和保障支队；从一个登陆场转移到另一个登陆场有200公里的路程，而且这200公里都是沿着敌军前沿的道路。敌军一旦发现部队在变更驻地，那么一切意图、计谋全都会落空。除了坦克集团军外，炮兵突击第7军也得转移，以便为进攻部队的行动提供炮火保障。转移工作在大本营代表朱可夫元帅的严格监督下进行。他还组织了模拟向布克林登陆场正面积转

移的行动。

因此斯大林是在朱可夫的帮助下把强大的突击集团部署到了敌军意想不到的方向的。在这一方向驻有一个坦克集团军、一个独立坦克军、第38集团军和炮兵突击军。单是让德国人闻风丧胆的卡秋莎炮，这里就有500多门！地面部队的行动得到了空军第2集团军的支持。

斯大林非常着急，因此不惜动用他的预备队。

11月1日，第27和第40集团军开始在布克林登陆场（您猜对了！）发动进攻。曼施泰因认为这是主要突击，马上把余下的预备队，包括党卫军“帝国”坦克师都调往这里。

这正不出斯大林所料！一昼夜之后，苏军进攻部队与德方防御部队已经打得难分难解，这时乌克兰第1方面军才从柳捷日登陆场实施突击。对此希特勒分子当然始料不及！雷巴尔科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在11月5日凌晨切断了基辅-日托米尔公路，次日凌晨4时，莫斯卡连科上将的坦克和第38集团军冲进基辅并解放了这座城市。

朱可夫致电最高统帅斯大林。我想引用这份电报，因为它几乎不是一个公文，而是朱可夫元帅喜悦之情的流露：

“我们以极大的喜悦心情向您报告，您规定的占领乌克兰首都——我们美丽的城市基辅的任务，已由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完成了。基辅城中法西斯占领者已被彻底肃清。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正在继续完成规定的任务。”

斯大林收到情报，注视着强渡第聂伯河部队的行动，指出占领登陆场的部队不仅要设法向前推进，而且要扩大自己的阵地。有些地方的小登陆场要与相邻的登陆场连接起来。

军队中的谚语说得好：一个好的统帅不仅要教育他的部队，而且要向他的部队学习。斯大林从一些登陆场上小分队的行动中吸取了有益教训：不一定要再从别的地点强渡第聂伯河。即使使用运到的渡河器材，也很难渡河，伤亡将会很大。可以利用已强渡到右岸的部队的成果，利用它们的登陆场沿第聂伯河突击敌人，摧毁敌军的防御并进而扩大登陆场。

这种可能性在基辅、切尔卡瑟、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扎波罗热等地都已出现。

斯大林这一次认为草原方面军（战役开始前的名称）较适合于这一战役。

为了在下面的论述中不致出现混乱，我现在就作一个说明：从10

月20日起，沃罗涅日方面军、草原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分别改称乌克兰第1、第2、第3、第4方面军。所以说，科涅夫在这次战役开始时还是草原方面军司令，到战役结束时，已经成了乌克兰第2方面军司令。这次战役的准备也采取了注重防范、使用虚假情报的方法，为的是不暴露集结兵力从登陆场实施突击的意图。然而变更部署是一件复杂的事情。

总算一切准备就绪，10月15日晨，经斯大林同意，在强大的炮火准备和航空火力准备之后，由四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一个坦克集团军组成的装甲突击集团突然对第聂伯河右岸的希特勒军队翼侧实施突击！

曼施泰因把当时他手头的全部兵力投入了对突击基辅的反击，为了迅速打退苏军的这次进攻，他调用了大量航空兵来对付科涅夫的部队。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曼施泰因在回忆这次战斗时写道：“在整个10月，敌草原方面军（其司令部大概精力过人）把越来越多的兵力投入其在第聂伯河以南的坦克第1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结合部占领的登陆场。到10月底，草原方面军在这里部署了不下5个集团军（包括坦克第1集团军），在其编成中包括7个坦克军和机械化军、900多辆坦克。面对如此优势的敌军兵力，第1和第8两个集团军的内翼侧无法顶住并开始分别向东西两个方向撤退。”

简直可以说是草木皆兵！曼施泰因提到的集团军数量是对的，但是他谈到的7个坦克军和机械化军，是言过其实。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曼施泰因在列举苏军的这些军团和兵团时，却只字未提他“忽略了”这些军团、兵团的集中，只字未提对翼侧的这次突击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在这个方向上没有准备预备队，就是这方面的明证。

最高统帅策划的这次大战役（应当恰如其分地指出，这次战役的执行者和直接指挥者是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的结果是，没费太大气力就开辟出巨大的战略登陆场，如果靠强渡第聂伯河来解放这一大片土地的话，则要困难得多。渡河的部队冲破了敌军在第聂伯河沿岸宽大正面组织的防御并直插基洛夫格勒。

总之，斯大林为组织方面军大军团在行进中强渡第聂伯河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不是如常言所说的“两手空空”地去德黑兰，因为苏军收复了基辅、攻克了“东方壁垒”并胜利向西推进。

九 德黑兰会议

在这里我要稍微插一段题外话。我一直希望自己的叙述能接近于所写事件的发生地，并能以事变目击者或参与者的叙述为依据，因此我在

搜集本章资料时去了一趟德黑兰（1995年8月），在那里找到了有关德黑兰会议有价值的材料。

我察看了斯大林当时住的房子——使馆内的一座小楼，它现在是我国大使的府邸。德黑兰会议期间，作战部部长什捷缅科将军就住在这座小楼的一层。他当时与安东诺夫保持经常联系，斯大林也多次使用高频电话通话，了解战役的进程。他特别不放心的是基辅的局势。

经大使允许，我把整座小楼都看了个遍。斯大林当时住在二楼，这里有办公室、卧室、盥洗间和保卫人员居室。当时的家具没有保留下来。

后来我又去举行会议的使馆主楼（这是罗斯福总统搬出美国使馆后下榻的地方）转了一圈。总统搬出美国使馆是出于对安全的考虑。

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还谈到他抵达德黑兰时的情况：

“在我飞抵德黑兰时迎接我的情况让我感到扫兴。英国特使把我接上了他的汽车，我们一起从机场前往我国使馆。在前往市区近三英里的路途中，每隔50码就有一个波斯骑兵警卫。因此，任何一个歹徒都能明白来人很重要，而且能够知道客人行进的路线。而当时的情况若对两三个亡命徒开枪或扔炸弹行凶却毫无防备。

美国的安全机关在保障总统安全方面就做得更有头脑。总统的汽车由乘坐装甲车的加强护送队护送。同时，总统的飞机降落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总统在没有卫队护卫的情况下，沿着没有人能料到的大街小巷驶往美国使馆。”

苏联使馆与英国使馆相邻，两馆之间隔着一条不宽的马路。我结识了彼得·伊万诺维奇，他是一家汽车修理厂的老板，他的父亲30年代离开苏联并在伊朗定居。1943年，当彼得·伊万诺维奇还是个孩子时，常与别的孩子一起去看外国兵，他说：

“他们人很多，沿着使馆的围墙走来走去。卫队封锁了位于苏联使馆与英国使馆中间的街道。钢缆上挂着粗帆布，把两个院子围了起来，工作人员在这条街上可以自由走动。每当卫兵揭开粗帆布放工作人员或来访者通行时，我们就使劲儿地往院子里看。我们希望看到某一位国家元首，可是士兵总是赶我们走。”

据丘吉尔记载，当时的事情经过如下：

“由美国部队守卫的美国使馆位于半英里外的地方，这就意味着，在整个会议期间无论是总统、斯大林还是我都不得不每日两三

次地往返于德黑兰狭窄的街道。加之，比我们提前24小时抵达德黑兰的莫洛托夫介绍说，苏联情报机关破获了一起阴谋，有人试图刺杀“三巨头”（当时对我们的称呼）中的一个或几个人，因此一想到我们当中的某个人不得不经常乘车往返，他便感到不安。他说：“一旦出现此类情况，便会产生极坏的影响。”这一点无可否认。我千方百计地支持莫洛托夫请总统搬到苏联使馆居住的请求。苏联使馆比其他使馆大两三倍，占地很广，有苏联军警卫。我们都劝说罗斯福采纳这个明智的建议，第二天，罗斯福及其全体随行人员，包括快艇上厨艺高超的菲律宾厨师，都搬进苏联使馆辟给他们的宽大舒适的楼房。这样一来我们全都聚集在一个圈子里，可以安安稳稳地、不受干扰地讨论世界大战的问题。我舒舒服服地住在英国使馆，距离苏联使馆大楼只有几百码的路，苏联使馆可以说临时成了整个世界的中心。”

使馆工作人员安德烈·梅兹德里科夫给我详细地讲了那场未遂谋杀的情况，我与他关系非常密切，因为他年轻时生活在塔什干，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熟人。他让我看了一口井（暗渠）的出口，狙击手本应通过这个出口潜入。德国情报机关制定的非常切实可行的计划是这样的：狙击手顺着地下暗渠潜入使馆的中心地带，突然从地下出现在距三国首脑拍照的楼梯100米远的地方。这张照片是很有名的。

我在现在堵住暗渠出口的混凝土盖子旁边站着，我在想，在这样一个距离内，莫说是狙击手，就是随便一个枪法不错的人也能做到弹无虚发，而且会在卫兵分辨出子弹来路时完成三次射击。

然而幸好我们的肃反工作人员及时地破获了希特勒匪徒的计划，在这口井的周围设了埋伏并一举抓获了这伙恐怖分子。

我还要不无得意地告诉大家，是我的同事——我有幸供职多年的情报总局的军事情报人员救了三国首脑中的一个人或三个人。

最先摸到这次恐怖活动策划情况的是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他是著名侦察员，苏联英雄。他当时在罗夫诺州和利沃夫州一带活动，化装成西贝尔特中尉。他结识了几个希特勒军官，其中的一个名叫冯·奥尔德，此人酷似影片《侦察员的功勋》中的维利·波默尔（如果读者记得的话），不仅外表相像，而且行为也相像——喜欢散步、打牌。库兹涅佐夫常借钱给他，可是说到还账，他可没那么痛快。有一天他对库兹涅佐夫说，他很快会把账还上，因为他有了挣钱的机会。库兹涅佐夫好奇地问他：“怎么个挣法？”他神秘地回答说：“倒卖地毯。”库兹涅佐夫又问：“什么地毯？正在打仗，你到哪里去买地毯？”这位军官压低



了声音提醒说：“这是一个大秘密。我要与几个特殊人物一起去德黑兰。去的人都是这方面的大行家……不过，我得警告你，关于这件事，在任何场合对任何人都不能提一个字……事情办完后我买上著名的波斯地毯，能在柏林卖个好价钱。到那时我就可以与你清账。”

能相信酒后之言吗？但是库兹涅佐夫还是向总部报告了这次谈话的内容。后来这件事就由我国的反间谍人员接手处理。

1943年的会议解决了一个苏联特别感兴趣的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即进行“霸王”战役的问题。这一战役不应晚于1944年5月发动。

丘吉尔为推迟开辟第二战场提出了许多客观理由。他认为，最好不要从法国，而要从地中海攻入他所说的“德国人的软下腹”。

但是斯大林坚决主张越过拉芒什海峡进攻。为了做得更好，他又提出建议，又介绍经验。他指出：

“我认为，‘霸王’战役是一个大战役。如能得到来自法国南部的支持，战役就会容易进行一些，一定会取得战果。我本人主张这样的极端做法。我要在意大利转为防御，放弃攻占罗马，而在法国南部发动战役，把德军从法国北部引开。过两三个月后，我再在法国北部发动战役。这一计划可以保证‘霸王’战役的胜利，而且能使两支军队会师，壮大兵力……我们的作战经验告诉我们，从两个方向实施突击才能取得胜利，从一个方向发动的战役不会取得足够的战果。因此，我们一定要从两个方向向敌人实施突击，迫使敌人把兵力在两个方向调来调去。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从法国的南北两个方向来进行这场战役。”

斯大林为使这一主张得到肯定和落实，要求在这次会议上当场任命这次战役的指挥官。丘吉尔后来回忆此事时写道：

“后来斯大林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由谁来指挥‘霸王’战役？总统回答说，这件事尚未决定。斯大林直率地说，如果不责成一个人来承担战役的整个准备工作，这个战役就等于零。罗斯福解释说，准备工作已经有人在做。英美联合司令部由英国将军摩根负责，他已经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制定计划。”

丘吉尔接着写道：

“我当时说，最高统帅的任命问题应由三位政府首脑讨论决定，不宜在大会上决定。斯大林说，苏联政府并不奢望拥有对这项任命的表决权，而只是想知道这个总司令是谁。十分重要的是，要尽快地作出这项任命，让选中的将军不仅负责制定计划，而且负责计划的落实。我也同样认为，由谁来指挥‘霸王’战役的问题是需要解决的十分重要的问题之一，我说，最迟要在两个星期内解决这一问题。”

我在想像发生在使馆大厅里的事情及其参与者时，特别希望能够真实地再现许多亲身经历过此事的人在回忆中提到的这一庄严时刻。他们一定会提到两件事：斯大林亲吻了佩剑，而伏罗希洛夫失手滑落了佩剑。

丘吉尔是这样写的：

“预计4时开始的第二次全体会议开会之前，我遵照国王的委托授予斯大林荣誉佩剑，这支佩剑是国王陛下为纪念光荣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而专门定制的。大厅里坐满了俄国军官和士兵。我简单地作过说明后便把这件非同寻常的武器交给了斯大林元帅，他庄严地把佩剑拿到唇边并亲吻了它。然后他把佩剑递给伏罗希洛夫，伏罗希洛夫却失手滑落了佩剑。佩剑由俄国仪仗队隆重地护送出大厅。”

这次会议不仅决定开辟第二战场，而且要求苏联在打败德国后对日宣战，同时还决定了战后的其他合作问题。

丘吉尔在德黑兰庆祝了他的69岁生日。关于这件事，当然是他本人记述得最清楚：

“在此之前我们都是苏联使馆开会和用餐的。但是现在我宣布，第三顿午餐由我来招待，而且用餐地点是在英国使馆。对此没有人表示异议。按字母排列顺序来说，英国和我本人都排在前边，按年龄来说，我比罗斯福和斯大林都年长五岁左右。我说11月30日是我的生日。这些理由，特别是最后这个理由，起了决定性作用，我们的公使为这顿大约40人的午餐作了一切必要的准备……

这是我一生中值得纪念的日子。坐在我右边的是美国总统，坐在我左边的是俄国的主宰者。我们几个人实际上控制着世界上的所有舰队和四分之三的空军，统率着参加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战争的、大约有2000万人的大军。罗斯福送给我的礼物是一只精美的波斯

陶瓷花瓶；这只花瓶在我回国的途中被打碎，但又被奇迹般地修复，现在还被我作为珍品保存着。”

寿星丘吉尔没有写斯大林送给他的礼物是什么，但是其中有这样一件礼物。丘吉尔在喝咖啡闲谈时曾顺口说过他非常喜欢瓦季姆·科津演唱的俄罗斯抒情歌曲。

斯大林记住了这件事，指示这位歌唱家专程前来德黑兰。不难想像，当肃反工作人员找到这位演员并对他说“请准备上路”时，他会如何大吃一惊。也不难想像，在生日宴会上，科津本人的出现以及他的演唱对颇感诧异的丘吉尔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斯大林善于制造令人感到意外又高兴的礼物，善于表现自己无所不能。

丘吉尔接着说：

“午饭时我与两位尊贵的客人谈的尽是令人愉快的话题。斯大林再次提出了他在会上提过的问题：‘“霸王”战役将由谁来指挥？’我说，总统还没有最后决定……”

可见，斯大林甚至在非正式场合都不忘记自己的目的。他也确实达到了目的——问出了总司令的名字：艾森豪威尔将军，“霸王”战役不迟于1944年5月开始。

最后我还要介绍一下德黑兰会议召开前发生的一件趣事。斯大林率代表团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在斯大林格勒改乘飞机。空军司令亚·亚·诺维科夫和远程航空兵司令亚·叶·戈洛瓦诺夫到机场迎接代表团。停机坪上停放着几架Сн-47飞机。诺维科夫报告说：

“两架飞机作好起飞准备，一架由戈洛瓦诺夫上将驾驶，另一架由格拉乔夫上校驾驶。半小时后外交部工作人员乘坐的两架飞机将跟在我们之后起飞。由歼击机组成的三个九机编队护航。”

斯大林不客气地说：

“上将很少驾机飞行，我们最好还是坐上校驾驶的飞机。”

于是他请上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贝利亚和什捷缅科同他一起登机。

顺便说一句，格拉乔夫不是一般的空军上校，而是一位优秀的飞行员，因此是贝利亚的专用飞行员，斯大林选中的这架飞机也是贝利亚的“专用”机。

我去德黑兰的时候适逢庆祝卫国战争胜利 50 周年。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特列季亚科夫大使和武官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克里茨基上校与他们的同事一起为这个纪念日做了一件好事。

大家知道，在从印度洋的港口向北即苏联国土运送军事装备时，在伊朗曾驻有我国部队，当时这里曾出过车祸，也发生过恐怖行动，许多苏联军人牺牲了。他们像在前线一样被合葬或单独埋葬，墓穴前竖立着用胶合板制成的红星和写有阵亡者姓名的墓碑。由于日晒雨淋，阵亡者的姓名已不可辨认，用胶合板制成的墓碑也已腐烂。于是俄国使馆工作人员决定用自己的钱在俄罗斯的领土（使馆院内）上树立一座大理石方尖碑，并把他们发现的 48 位军人的遗骸迁葬到这里——这件事情他们做成了。墓碑落成时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亚历山大神父作了安灵弥撒。前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的几位大使和我们昔日的盟友——美国人和英国人献了花圈。

大使对我说：

“莫斯科有一个无名烈士墓，而我们这里有 48 位无名烈士。他们的名字我们一个都不知道……”

斯大林在大本营会议上没有详细介绍他的德黑兰之行。最高统帅只是简单地说：

“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坚决保证于 1944 年在法国展开大规模行动。我想，他说话会算数的。即使他自食其言，我们自己也有足够的兵力打败希特勒德国。”

十 国 歌

斯大林在艰苦的战争条件下想到了苏联没有国歌，只有一首非正式的国歌是《国际歌》，在隆重的大会上都奏《国际歌》。然而，《国际歌》是国际无产阶级的歌曲，共产国际解散后，这首作为反对剥削者的世界共产主义斗争象征的歌曲似乎也失去了它的意义。苏联有必要创作自己的国歌，以取代《国际歌》，国歌将反映国家的统一，在苏联则要反映众多民族的统一，而不是政党的统一。在战争条件下，这种全民的象征是非常必要的。

斯大林大概不止一次地考虑过这个问题，第一次大概是在他 1941 年 7 月 3 日讲话中呼喊“兄弟姐妹们！我的朋友们！”^①时。这样的提法反映的已经不是党的内涵，而是国家的内涵。

^① 《斯大林文集》第 288 页。——译者注

培养爱国主义意识、加深对祖国的热爱（特别是在祖国危急时）、铭记前辈的丰功伟绩——所有这一切从来都鼓舞人民的士气，加强国家及其军队的力量。斯大林懂得这一点，因此尽管他军务繁忙，仍抽出时间关注国歌的创作。政治局支持他的建议，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由伏罗希洛夫任主席，著名的作曲家和诗人参加了该委员会的工作。

委员会公开宣布征集国歌的词曲。一些最著名的诗人参加了这一活动：寄来歌词的有多尔马托夫斯基、杰米扬·别德内、别尔戈利茨、西蒙诺夫、苏尔科夫、阿谢耶夫、吉洪诺夫、施巴乔夫、安托科尔斯基和伊萨科夫斯基等。

工作人员对所有的歌词都进行了认真地阅读，对有些歌词还试配上乐曲，送到委员会的乐曲的数量也不少。这些作品被一一送给斯大林审听，他都不喜欢，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不够厚重，有的是没有爱国主义思想，还有的是音乐的旋律太像进行曲。

最后，是米哈尔科夫和埃尔-列吉斯坦写的歌词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

斯大林对伏罗希洛夫说：

“我们就对这首歌词做些加工吧。这首歌词像现在这个样子还不适用，但是它有爱国主义思想。”

这句话道破了斯大林主张创作国歌的主要目的：培养和强化爱国主义。他好像要突破党的利益和革命利益的局限。他现在正在寻求全民的、全国的爱国主义的支柱。

……命运又一次使我在创作时获得了一个好机会：谢尔盖·米哈尔科夫给我提供了帮助。谢尔盖·米哈尔科夫是我在作家协会工作时的老同事，是私交甚笃的好朋友。我多次去过他家，他除了赠给我其他的书籍外，还赠给我印数巨大的国歌的歌本，并写了亲切的题词。他当时还向我讲述过，他和埃尔-列吉斯坦是怎样与斯大林一起“使国歌达到标准的”。

现在，我在写作这一章的时候，再次拜访了米哈尔科夫，请他回忆创作国歌时的一些细节，因为好多情况我都忘了。

他的第二个妻子尤利亚（第一个妻子孔恰洛夫斯卡娅去世了）为我们备好了香茶，米哈尔科夫以他特有的幽默开口说道：

“夜里两点，电话铃突然响了。我正在想，是哪个蠢家伙这么晚打来电话？这时话筒里传来一个声音：‘我是波斯克列贝舍夫。’原来如此！原来是斯大林的秘书！我已经不知所措了。斯大林的秘书却说：‘斯大林同志要同您讲话。’说着就把电话转了过去，我

听到了斯大林的声音：

‘您好，米哈尔科夫同志。’然后他马上转入正题：‘我们听了几个候选的国歌稿，其中包括您写的。您写的国歌篇幅稍微短了些。应当写一个反复唱的副歌，还有一段歌词您没有写出红军的气势，没有表示出我们正在打击而且一定要打败法西斯匪帮。’

‘当然了，斯大林同志，我和埃尔-列吉斯坦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你们努力吧。请不要拖延。要在几天之内完成任务。’

这次通话的时间是1943年10月27日。

从这一天起一切都动了起来。在克里姆林宫给我和列吉斯坦腾出了一个房间，我们在这里写歌词。伏罗希洛夫把新写成的一稿又一稿拿给斯大林看，又把斯大林改过的稿子交给我们。斯大林改动了几个字，又补写了几行，光是斯大林的修改稿就有好几个。斯大林最后才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去，把他改过的稿子递给我们，直截了当地说：

‘你们看看吧，现在这一稿如何……’”

斯大林实际上是国歌歌词的作者之一，他对最后一稿作了很大改动。作者当然完全同意他做的修改并请求把这一稿给他们留作纪念：“这是历史啊，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意了。

接下来是以不同的演唱方式在大剧院对国歌进行过几次试唱，有合唱，有用交响乐队伴奏，有时用铜管乐队伴奏。斯大林每次必到。他边听边提出意见和建议，最终选了由萧斯塔科维奇、哈恰图良和亚历山德罗夫这三位作者创作的曲子。

在一次试听时，合唱队和乐队演唱（奏）了沙俄的国歌（“上帝呵，保佑沙皇吧”）和英美的国歌，以进行比较。斯大林选中了亚历山德罗夫创作的曲子和由米哈尔科夫和埃尔-列吉斯坦创作的歌词。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又在大剧院试听了一次，政治局委员和国防部的领导干部都应邀出席，贵宾们在政府包厢就座。国歌受到了大家的好评，斯大林对此感到很满意——他认为重要的和必须达到的目的达到了。

他高兴地说：

“哎，按照俄国人的习俗，应当为国歌的诞生举杯庆祝啊。去把词曲作者和指挥都请来。”

他对莫洛托夫说：

“由你来主持我们这个庆祝会。”

于是在包厢前面的房间里摆起了餐桌。斯大林让米哈尔科夫和列吉斯坦分坐在他的两边。第一杯酒，是为新国歌的作者们和新国歌的顺利诞生干的！

……米哈尔科夫谈到，斯大林当时请他朗诵他写的诗歌：

“我朗诵了《斯焦帕叔叔》和其他几首欢快的诗。斯大林笑得很开心。我也为自己的成功而感到幸福，一有人祝酒我就满满地干上一杯。突然斯大林低声地对我说：‘您怎么老是干杯呀？这样和您聊就没有意思了。’后来斯大林又问：‘您是党员吗？’我说：‘还不是。’他开玩笑地说：‘没关系嘛，我写诗的时候，也还不是党员。’

斯大林在席间谈戏剧，谈上演《苏萨宁》的必要性，谈电影，谈《库图佐夫》这部影片不恰当地把库图佐夫这个了不起的统帅塑造成患病的老头。我们还谈论战事，因为战争甚至不让参加庆功宴的人忘记它的存在。

将近半夜两点的时候，斯大林提议喝掉‘最后的收杯酒’。

分手的时候大家都兴致很高。1944年1月1日，国歌第一次交全俄广播电台广播。从这一天起，我们就开始与这首庄严雄伟的乐曲朝夕相伴。”

国歌的作者获得了奖金。

米哈尔科夫还谈到：

“我曾有幸两次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对国歌的歌词进行修改……埃尔-列吉斯坦于1945年去世。1977年经我修改的歌词与旧歌词的区别是，鉴于‘个人崇拜’受到谴责，建议我删去了歌中提到斯大林及其事业的词句，但是保留了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必胜的词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又得再次修改国歌。哪怕把亚历山德罗夫作的曲子保留下来也好嘛。不同的政党、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围绕新国歌的创作争得不可开交，这个情况瓦洛佳你比我了解得更清楚，因为这超出了你写的那本书的范围，我就不去谈了。”

创作国歌的必要性以及为确定国歌内容所作的耐心细致的工作，都再次证明斯大林目光远大，证明他对人民的精神道德状况的支柱和基础认识十分深刻。

国歌多少年来一直在鼓舞和团结着苏联人民。每当听到它，人们就为国家至上的想法而心潮澎湃，对伟大强国的自豪感就油然而生，对祖国幸福的未来就信心百倍。

国歌加深了对祖国的爱，加深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的友谊——正因为如此，在有必要（真的有这种必要吗？）创作新国歌的时候，那些把我们祖国搞得四分五裂的“外星人”吵成一团。为了诋毁国歌的旧词曲，媒体，特别是电视不知泼了多少污水，造了多少谣！但是人们自幼潜移默化感受到国歌的伟大，是国歌陪伴父辈、祖辈走过一生，走向胜利，他们不愿抛弃这首国歌。即便是修改了国歌中的某些词句，但是音乐的旋律还是让人们记起了旧歌词，激发起他们牢记的光焰万丈的歌词中流露出的对祖国的爱。

十一 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合围

占领了第聂伯河西岸的战略登陆场后，大战并没有停息。交战的目地，从我方来看，是要巩固战果和扩大地盘，为下一步的进攻准备出发阵地；从德方来看，是希特勒仍希望恢复第聂伯河西岸的“东方壁垒”。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突出部成了希特勒的统帅部，特别是元首本人的最后希望。驻扎在这一地段的希特勒部队——坦克第1集团军和野战第8集团军还控制着第聂伯河的右岸和相当辽阔的地带。顺便说一句，德寇的集团军中师的数量可不像我集团军中那么少。驻扎在第聂伯河右岸的两个集团军内含九个步兵师、一个坦克师和一个摩托化步兵师。

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突出部对于斯大林来说好似骨鲠在喉，这个突出部不让我军从容地继续向西，朝边境方向进攻，因为希特勒匪徒会随时从这个楔形地带向我进攻部队的后方发动突击。比如说，从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突出部和南部（黑海沿岸还驻有整个集团军群）发动的进攻可能切断大的部队集团，敌军在“中央”集团军的配合下从这一登陆场向北部实施突击也会给我们造成大麻烦。对于希特勒匪徒来说，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突出部是所谓的最后能指望的突出部。他们也确实在为发动反突击而进行准备，以期恢复其“东方壁垒”（关于这一点我们下面再详谈）。

1月11日，斯大林听取了朱可夫的打算，批准了包围并消灭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集团的计划，以便为下一步解放右岸乌克兰扫清障碍。

起草的命令规定“凭借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突出部底部实施两



个相向突击，责成乌克兰第1和第2方面军在兹韦尼戈罗德卡地域会合，包围并歼灭希特勒匪徒的这—大集团”。

乌克兰第1和第2方面军内含27个步兵师、4个坦克军、1个摩托化军和1个骑兵军。应当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在兵力上优于敌军集团，尤其是，我们的步兵是敌军的近2倍，炮兵是敌军的近2.5倍，坦克兵是敌军的2.5倍。

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战役实际上是1943年12月初的大本营和国防委员会会议讨论并经斯大林批准的那个—大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为这些行动确定的主要意图是，利用我军在这些主动行动中的优势不间断地继续突击敌人，不让他们在退却时占领的地区内立足，不让他们为反击我军突击而变更部署。

这一次与我军对阵的敌军统帅是“南方”集团军群司令——我们熟悉的曼施泰因元帅。“南方”集团军群包括坦克第1、第4集团军和野战第8集团军。坦克第1集团军和野战第8集团军恰好驻扎在位于沿第聂伯河正面120公里、纵深130公里处的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突出部。这就是卡在我军统帅部喉咙中的一块“骨头”。曼施泰因的右邻是我们也熟悉的克莱斯特元帅。“A”集团军群由他指挥，他的阵地从与曼施泰因的接合部起至黑海岸边。

国防委员会先前根据斯大林的报告予以批准的我军统帅部总的意图是，以四个方面军的兵力解放右岸乌克兰并前出至国境线和喀尔巴阡山。无论从交战的地域还是从兵力投入来看，事实上这是北起波列西耶，南至黑海，东自第聂伯河，西迄喀尔巴阡山的一场大战。首先要分割活跃在这个战区的敌军，然后再逐个地加以消灭。计划的第一部分恰好要求以乌克兰第1和第2方面军的兵力消灭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突出部的敌军，由朱可夫负责协调这两个方面军的行动。南方的乌克兰第3和第4方面军的行动则由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负责协调。斯大林任战役总指挥。

包围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集团的战役是在右岸乌克兰持续不断、异常艰苦的战斗过程中进行准备的。希特勒匪徒不仅固守着第聂伯河畔的这—突出部，而且非常主动地在其他地段组织反冲击，妄图收复“东方壁垒”的阵地。为了说明这场战斗的激烈程度，我只介绍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一个方向的情况：这一仗的参战部队数量众多而且战斗激烈，因此独立成为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战役。这一切都发生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在其司令瓦图京指挥下发动进攻的时期。

下面是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战役中的一个故事。就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展开进攻并开始十分积极地向前推进的时候，坚信自己策略正确

的曼施泰因决定到进攻集团的后方去“转上一圈”，他在克里木半岛会战中就是这样干的，效果很好。他把坦克第48军集中到别尔季切夫—卡扎京地区并对正在进攻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翼侧实施猛烈突击。然而这里的形势已不同于克里木。如果说在克里木统帅三个集团军的将领消极无能和惊慌失措，那么在这里统率部队的则是颇有经验的方面军司令瓦图京。而且还有斯大林，他如常言所说一直控制着这里的形势。

方面军的司令们在他们的回忆录中怀着自豪与崇敬的心情回忆了他们同斯大林的谈话。我不可能逐一加以引用，但是我要引用其中一次谈话，来说明斯大林日常指挥各方面军战斗行动的情况（也是为了再次批驳赫鲁晓夫散布的无耻谰言，说什么斯大林是靠地球仪指挥军队的）。

罗科索夫斯基的回忆录写道：

“我们还没来得及在新地方站稳脚跟，斯大林就给我打来电话。他说，瓦图京那里的情况不妙，那里的敌人转入进攻并占领了日托米尔。

最高统帅说：‘形势令人担忧。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希特勒匪徒可能会突击白俄罗斯方面军的翼侧。’

斯大林的声音中透露出气恼和担心。最后，他命令我代表大本营立即前往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部就地了解情况并采取一切措施反击敌人的进攻……

我正要出发的时候，接到最高统帅的电报指示：必要时可立即参与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指挥工作，无需等待补充指示。

我应当承认，这个指示让我感到困惑。为什么让我去处理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事务呢？但是已经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问题。

现在重要的是，尽快地了解情况并作出决定，不要急躁而要做到十分客观和公正。我到达目的地后就是这样做的……”

罗科索夫斯基与瓦图京一起分析了形势，扭转了局面，支援了友邻部队并向斯大林报告了执行他的命令的情况。

谦和的罗科索夫斯基能够理解斯大林不再信任的瓦图京的处境，因此在回忆录中很有分寸地写道：

“我们一起找到了扭转局面的办法。我提前说一下，瓦图京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他实施的突击一下子让希特勒匪徒尝到苦头，迫使他们急忙转入防御。

我通过高频电话向最高统帅报告了我对态势的看法和乌克兰第



1方面军已经采取的措施，还报告了瓦图京的情况，说他坚守岗位，指挥有方，请求允许我返回自己的部队。斯大林命令我用密码电报报告这一切，我当天就这样做了。第二天早晨我接到大本营的电报，同意我返回白俄罗斯方面军。”

斯大林就是用这种超常规的办法来扭转前线的危急局面，对最高层指挥官也不讲情面。

在进行这一艰苦战斗的过程中还完成了几次大的局部战役，斯大林组织两个乌克兰方面军为解放右岸乌克兰进行反攻作准备。

1月24日，反攻开始，战争史称这次反攻为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战役。科涅夫的乌克兰第2方面军首先开始行动，在兹韦尼戈罗德卡方向实施主要突击。瓦图京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在一昼夜后转入冲击。

1月27日，敌军对发动进攻的苏军翼侧实施疯狂反冲击，试图切断冲在前面的近卫第5集团军和坦克第6集团军的快速兵团与主力部队的联系，并堵住这个突破口。但是乌克兰第1和第2方面军司令部立即把炮兵部队、坦克部队和快速兵团调到翼侧，在航空兵的支援下打退了敌军的反冲击。

曼施泰因部队被乌克兰第1和第2方面军的第二梯队歼灭，乌克兰第1和第2方面军会师并合围了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集团。

曼施泰因在他的回忆录中不光就这次战役，而且就库尔斯克交战之后的全部战斗事实说出了颇有分量的恭维斯大林的话：“我们当然没有料到，苏方在这件事上和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方面会有如此高超的组织才能。我们遇到的是真正的多头蛇，砍掉它的一个脑袋，又会长出两个新脑袋来。”

这里不妨提醒曼施泰因回忆一下希特勒和德军统帅部在战争初期说过的话，他们当时向全世界高喊，红军已被消灭，红军的装备破坏殆尽，指挥兵团和部队的都是昏庸无能之辈，战争在几个星期后就会胜利结束。可是现在德军的一位重要统帅，甚至是一位最有才华的统帅却作了如此有意思的供认。

苏军的实力和工业的生产能力确实并没有因为连年战争而下降，相反却在不断增强，这一点在我们现在所谈的战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合围后对被围集团的歼灭就成了所谓的“技术问题”。指挥乌克兰第1和第2方面军的经验丰富的司令瓦图京和科涅夫做起来得心应手，在短短的时间内形成了内外两个包围圈，他们知道，敌军为了解救被围部队会千方百计地从包围圈内外实施突击。顺便说一句，被围的兵力不

在少数：有10个师和1个旅，总共近8万名官兵，160门火炮和230多辆坦克。指挥和组织突围的人也有的是，这里有2个军司令部、8个师司令部以及强大的党卫军“海盗”坦克师。

2月8日15时，苏方军使通过斯捷布列夫战斗地段首长福凯上校向被围敌军递交了最后通牒。

军使返回后传达说，德军司令部将于2月9日11时作出答复。

除递交最后通牒外，苏军还印制了许多传单散发给被围部队。但是德国人迟迟不投降。希特勒不允许被围部队投降，要求它们坚持到最后，不允许它们放弃现有的阵地，他仍希望利用这些阵地来恢复第聂伯河地区的态势。

一向一丝不苟的德国人在指定的时间对最后通牒作出了答复。被围集团的指挥官施滕麦尔曼将军宣布，他不接受这一最后通牒，他们也无意投降。

2月12日，大本营代表朱可夫向斯大林报告情况：敌军试图里应外合地实施突围，战斗进行得很激烈，敌军已突破外包围圈，推进到距离被围集团10公里处，两者之间现在的距离为12公里。

斯大林说：

“科涅夫建议由他指挥担任消灭敌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集群任务的对内正面部队；在对外正面上的部队则集中由瓦图京指挥。”

朱可夫就此回答说：

“彻底歼灭敌被围集群，不过是三四天的事，把第27集团军归乌克兰第2方面军指挥，可能会延长战役进程。”

斯大林说：

“好，就让瓦图京亲自负责第13和第6集团军在罗夫诺—卢茨克—杜勃诺地域的战役，您负责不让对外正面上的敌突击集群突破雷相卡地域。”

斯大林这一次没有考虑朱可夫的意见，过了几个小时大本营下达指令，其中说：

(1) 将与敌科尔孙集团作战的所有部队交乌克兰第2方面军司令指挥，其任务是在最短期间内歼灭德军科尔孙集团……

(2) 尤里耶夫同志（朱可夫的代号）不再负责监督歼灭德军科尔孙集团的工作，而应担负协调乌克兰第1和第2方面军部队行动的责任，任务是不让敌军由雷相卡和兹韦尼戈罗德卡方向突围，与其科尔孙集团会合……



瓦图京读过这个指令后非常难过，他委屈地对朱可夫说：

“元帅同志，别人不了解，可是您是清楚的，我一连好几个昼夜没有合眼，全力以赴地实施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战役。我也热爱我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也希望我们的首都莫斯科能为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战士们鸣放礼炮。”

朱可夫无疑也由于这件事而感到不快，但他还是对瓦图京说：

“尼古拉·费奥德罗维奇，这是最高统帅的命令，我和您都是战士，让我们无保留地执行命令吧。”

曼施泰因元帅不仅具有发动大的进攻战役的经验，而且具有营救被围部队的经验；正如大家所知，他曾在斯大林格勒组建过“哥特人”集群，内含四个坦克师、一个摩托化师和九个步兵师。但是，在斯大林格勒，他并没能救出保卢斯的军队。现在曼施泰因调动起他积累的全部知识，再次试图解救被围集团。这一次他掌握着更加强大的突击部队——九个坦克师和六个步兵师。希特勒给被围集团发来电报说：“可以像依靠石头墙一样依靠我。一定会把你们从合围中解救出来，可是目前你们要坚持下去，直至剩下最后一颗子弹。”

被围集团的行动的确非常积极。他们突破了申捷罗夫卡、新布达地域乌克兰第1方面军第27集团军所在的地段。2月12日半夜时分，斯大林给科涅夫打电话。他非常生气地问道：

“您那儿怎么给突破了？我们向全世界都宣布过，说敌军集团被包围在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地区，可是他们却从您那儿去同自己人会合。”

科涅夫元帅回忆说：

“从斯大林跟我通话时的生硬语调我知道，最高统帅很不放心，不放心的原因看来是由于听了什么人不确切的报告。

我向他报告说：

‘别担心，斯大林同志。被围的敌军是跑不掉的。我方面军采取了措施。为保证我方面军与乌克兰第1方面军接合部的安全，为把敌军赶回包围圈，我已把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和骑兵第5军调至敌人突破的地域。他们正在顺利地完成任务。’

斯大林问道：

‘是您主动这样做的吗？这可是方面军分界线外呵。’

我回答说：

‘是的，是我主动做的，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说：

‘非常好。我们大本营再商量一下，我会打电话给您。’



过了10~15分钟，斯大林真的又打来电话。

‘能不能把与敌被围集团作战的部队，包括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第27集团军，都交给您指挥，并由您负责歼灭被围集团？’

我没料到他会提出这样的建议，但马上回答说：

‘斯大林同志，现在很难将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第27集团军转隶给我。第27集团军在包围圈的背面，即我军部队的背面作战……不可能与它建立直接联系。该集团军兵力很弱，宽大正面拉得太长。它顶不住被围的敌军，它的右翼还受到敌军坦克部队从雷相卡方向合围对外正面实施突击的威胁。’

对此斯大林回答说，大本营要求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部向第27集团军传达我所有的命令和指示，但第27集团军的供给关系仍留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

我回答说，在态势多变时，这样的指挥形式不能保证迅速可靠地传达指示。而现在需要的是个人交往和亲密关系，所有的指示都可能得不到及时传达。我请求不要把第27集团军归入我这个方面军。

‘那好，我们再同大本营与总参谋部商量一下，然后再作决定。’斯大林就这样结束了谈话。

我坚持不愿接管第27集团军的另一个原因是：两个方面军之间的协同动作计划一旦被破坏，部队的转隶就会变得非常复杂。我是真诚地为交战的结局而担心。更何况让第27集团军归我指挥并不会增强它的实力。”

斯大林最后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我们从上文摘引的大本营的指令已经有所了解。

内包围圈收得越来越小。从外面发动反冲击的希特勒集团的实力消耗殆尽，而且最终也明显地看出不可能从外面突破，于是希特勒允许施滕麦尔曼将军靠自己的兵力组织突围。

2月16日深夜，施滕麦尔曼把所有被围部队集中到突围地域并把它们编成几个梯队，坦克和反坦克炮兵在前，司令部随后，步兵在翼侧掩护。他命令大家扔掉东西，销毁不需要的文件和受损的装备，喝干剩下的伏特加酒，吃掉应急的食品。夜里3时，密密麻麻的几个纵队（有点像罗马的方阵）在猛烈的枪炮火力掩护下开始了突围。

我军部队，尤其是受命歼灭敌被围集团的科涅夫司令，采取一切措施阻止敌军突围。关于交战的经过，最好还是听听目击者的说法。

一个俘虏的供词说：“干道上满是停着不动的和被销毁的交通工具，令人无法通行。在通往雷相卡的一小段路上，我看见许多被击毙

的德国人。大量辎重不仅占满了道路，而且占满了田野，令人难以前进。”

还有一位被俘的军官说道：“没有一个人逃出包围圈。交通工具堵塞了所有的道路，周围的情况混乱到了极点。所有的一切汇成一股洪流。大家都在跑，可是没人知道往哪里跑，为什么要跑。路上和路旁到处都是被毁的汽车、火炮、马车和几百具官兵的尸体。”

被围集团的司令施滕麦尔曼在这种异常的混乱中丧生。人们发现了他的尸体并根据证件确认了他的身份。科涅夫就此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允许德国战俘按照战时法律规定的礼遇安葬了他们的将军。”科涅夫还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采取了种种措施，不让一个希特勒匪徒逃出包围圈。”

关于这一点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2月17日的整个上午都在为歼灭德军突围纵队而进行激战，突围的德军基本上被歼灭和被俘，只有一部分坦克和将军、军官和党卫军分子乘坐的装甲车得以突围……不出我们所料，被围德军集团在2月17日被全部歼灭。据乌克兰第2方面军统计，俘虏敌18 000人，缴获了全部军事装备。”

关于此次交战的结局还有一种说法。曼施泰因的态度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他不希望他的统帅生涯中出现如此可悲的战役结局。他也许言过其实，但是对这位陆军元帅所写的东西不可完全不信。他这样写道：

“不难想像我们当时有多么期盼，有多么担心，我们在司令部的火车里等待突围是否成功的消息。2月17日清晨1时25分传来令人高兴的消息说，正在突围的几个军与坦克第3军的先遣部队取得了最初的联系。夹在这两支部队中间的敌军确实被击溃了。2月28日我们得知，有30 000~32 000人冲出了重围。因为被围的有六个师和一个旅，即使把每支部队的人数往少里算，那也占了能作战部步兵的大部分。让我们深感痛心的是，没能把突围的大部分重伤员带出来。施滕麦尔曼将军在战斗中阵亡。

所以说，我们没有让这两个军落得像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那样的下场。

在突围过程中大多数重型武器和火炮当然都陷在泥水中不能动弹……冲出重围的几个师不得不暂时撤往后方。因此，集团军群中的六个半师没有参加战斗，从而使形势变得更加困难。然而，与至

少是两个军的官兵得以逃生这一喜讯相比，这已算不上什么了……”

常言说得好，打猎和打仗时最容易撒谎。在这里谁说了真话，谁缩小、谁又夸大了事实，对此我们不予猜测。但是不妨听听貌似客观的一位德国历史学家库尔特·蒂佩尔斯基希的意见。他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一书中写道：“到2月15日，解围部队的进攻能力消耗殆尽，被围的军奉命在南方向突围，坦克第1集团军的坦克军应在这里接应。可是，作了充分准备的2月16日夜间的突围没能使突围部队与负责接应的坦克军会合，因为该坦克军本来就由于道路泥泞而行动缓慢，这时又被敌军阻截了……”

好了，没有必要再说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怀疑蒂佩尔斯基希缩小事实或夸大其词。然而这位貌似客观的历史学家还是没有不提德国人一贯强调的一个因素：请注意，是“道路泥泞”阻止了前来接应的兵团。瞧吧，在这位历史学家看来，不是苏联的陆军部队、航空兵和炮兵击溃了突围的德军，而是翻浆的道路成了主要的原因。

道路翻浆对此次交战的确产生了一定影响，所以我要详细谈谈这个问题。

曼施泰因元帅一直认为道路翻浆是德军行动失败的原因之一，他抱怨说：“……在突围过程中大多数重型武器和火炮当然都陷在泥水中不能动弹。”朱可夫就此也写道：

“由于乌克兰正值春季道路翻浆时节，这次行动（指进攻。——本书作者注）困难极大。尤其难办的是直接往各部队运送弹药、燃料和给养。

德军统帅部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苏军不可能发动进攻……我们也正是决定利用（他们的）这种毫无根据的推算，打击敌人……利用……战役的突然性……”

两位统帅，无论是朱可夫还是曼施泰因，都在谈论道路泥泞，他们谈的都是透过望远镜或是坐在轻型汽车里看到的情况。我当时是普通士兵，在前线亲身尝过这个苦头！士兵不仅要“背着弹药和给养”，而且要冒着枪林弹雨和飞机的轰炸向前冲。他们走在齐膝的泥水中，近处一有爆炸就得卧倒在这种污泥浊水中，出自保命的本能全身陷进去。他们爬起来后不仅要继续前进，而且要用背包带和绳子拉反坦克炮，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没有这些反坦克炮，敌人一反冲击，他们就会被坦克碾压

得粉身碎骨。在没膝深的泥水中拖拽火炮的滋味只有亲身尝过的人才能体会到。一直那么使劲地拖呀拉呀，简直像要把身上的血管都挣断了。拉拽加农炮不是简单地拉一拉，首先要用自己的双脚插在泥水中，等感觉踩到硬地时再用身体抵住加农炮，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炮班大家一起来，前来帮忙的人一起抵住，然后高声地、声嘶力竭地喊着号子开始拖炮，只有这样火炮才会听使唤，缓慢地向前挪动。如果使了大劲儿，火炮能滑行几十米。然后又得拼命去抵，直到累得你眼冒金星……我们就是这样拖着自己和加农炮赶路。坦克也要靠人开路。有时这个热得发烫的庞然大物净打滑，由于履带的作用它的侧倾斜装甲板以下部分全都陷在泥泞中，亲爱的步兵迅速前来协助，在坦克的前前后后挖上一阵，可怜的坦克才挪出了洼坑。坦克是无论如何不能丢的。前面就是机关枪，如果坦克不把它的火力压住，我们就会统统被放倒。坦克是我们的救星，它的履带能把一切碾为齑粉，只要机关枪一开火，坦克的大炮就能把它击毁。

所以说，坦克是步兵的好朋友。只要坦克能把我们送进肉搏战，我们就能大显身手。我们在翻浆路中艰难跋涉，憋了一肚子火。走在又稀又粘的翻浆路上，我们好像没了力气，力气全都丢光了，但是一瞥见近处希特勒匪徒的头盔和绿军服，心中又涌动起新的力量，不禁从心底里喊出“乌拉！”、“为祖国而战！”。母亲啊，上帝啊，全都想起来了！从德军战壕里迎面向我们飞来的子弹和手榴弹全都不能让我们止步。苏军的步兵只要冲到了德军掩体的胸墙前，就会所向无敌，无论什么样的军队都对付不了他。苏军士兵在肉搏战中一往无前，锐不可当，打起敌人来既机灵利落，又奋不顾身……

一番厮杀之后，抽上自制的卷烟，浑身是汗，气还来不及喘匀，只有到这个时候，他们才会环顾四周，带着得意的微笑暗自惊叹并说道：“罪有应得，谁让他们干尽坏事呢！”

这种在翻浆路上奔波，在几乎深达鼻翼的烂泥中跋涉的超极限的非人的本领，德国兵就不具备。

而我这个团专业侦察兵，除了经历上述这一切外，在进攻开始前，还得在夜间不是在泥泞中行进，而是在泥泞中爬行，去抓“舌头”或是寻找敌军防御中的薄弱点。那可真是名副其实吃够了泥泞的苦头。执行任务回来，连自己人都认不出你：从头到脚整个是一个泥鬼。

这就是我为了全面说明情况对曼施泰因所抱怨的翻浆路和我们利用这种路况搞突然袭击所作的补充。

2月18日，首都鸣放礼炮祝贺我军在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取得的胜利，同时还颁布了以下命令：

“最高统帅给科涅夫将军的命令：

乌克兰第2方面军经过连续14天的激战，于2月17日结束了战役，歼灭了被包围在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地区的德第8集团军的10个师和1个旅。

在此次战役过程中，德寇有52 000人丧命于战场，11 000名德军官兵被俘……”

命令接着列举了参战部队和指挥此次战役的将军的姓名，同时宣布授予这些部队和兵团荣誉称号。

斯大林从莫斯科打电话给科涅夫说：

“祝贺你们的胜利。政府打算授予您苏联元帅军衔，您对此有何看法？不反对吧？是不是该向您祝贺了？”

科涅夫回答说：

“谢谢，斯大林同志。”

“请您报送该奖励的有突出战功的指挥员名单。我们还打算设立装甲坦克兵元帅这一新军衔。您对此有何看法？”

“请把装甲坦克兵元帅这个新军衔授予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罗特米斯特罗夫。他在这一战役中表现突出。”

“我赞成。我认为，我们还应把这个军衔授予装甲坦克部队司令费多连科。”

科涅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第二天（斯大林）就派飞机把苏联元帅格·康·朱可夫寄给我的元帅肩章送到了我的手中。这既是关心，又是祝贺，也是无价的奖赏。”

仔细阅读这一章的人大概都会有些吃惊：为什么作为最高统帅的斯大林在他的命令中只提到乌克兰第2方面军和科涅夫。包围和歼灭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集团的可是两个方面军，即乌克兰第1和第2方面军，这两个方面军都是由朱可夫元帅指挥的。

作为最高统帅的斯大林在评价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战役战斗行动的命令中把胜利只归功于科涅夫指挥的乌克兰第2方面军，对此该作何解释呢？当然只能双手一摊，表示不解。这也许是应了俄国的一句俗语“不得而知”，意思是说，我们普通百姓不清楚上面做的事情，也许这就是对这件事的解释。或者说“这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

然而现在，已经过去很久了，所有的谜团和秘密早已解开，对斯大



林的这一行为也可以发表一定的意见了。我有意要强调指出，这正是斯大林一个人的行为，因为除了他之外，没有人能够作出这样的决定。这看来是他本人的主意。那么用意何在呢？

斯大林要多少教训一下朱可夫。这是最高统帅“教育”元帅们的政策。我们已经知道，他不止一次遏制高级将领或者说让他们放明白一点，不妨想想斯大林因为科涅夫让敌军集团突围而对他的斥责。也许斯大林与朱可夫也有过这样一次剑拔弩张的谈话？也许朱可夫不想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及这次谈话？这可不是我随便猜测，我有文件作为根据。

斯大林曾就被围的希特勒军队突围一事致电朱可夫，电文如下：

“致尤里耶夫（朱可夫的代号）同志 敌科尔孙集团之所以能从申捷罗夫卡方向的斯捷布列夫地域突围，是由于力量薄弱的第27集团军没有及时得到加强。（斯大林显然是在直接指责朱可夫，因为他手握重兵，却没有去加强力量薄弱的第27集团军。——本书作者注）

不曾采取果断措施执行我的指示——首先歼灭斯捷布列夫突出部的敌军，因为敌军最可能试图从这里突围……（看得出来，斯大林是在指责朱可夫没有直接执行他的指示。——本书作者注）

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左翼和乌克兰第2方面军的右翼拥有足够的兵力和物力来阻止敌军突围并消灭其科尔孙集团……（斯大林在这一点上再次指责朱可夫指挥不力；在朱可夫负责协调的乌克兰第1和第2方面军，兵力和物力都很充足。——本书作者注）

1944年2月12日16时45分。

签名：斯大林、安东诺夫”

大本营于同日即2月12日颁布的训令（也是由斯大林和安东诺夫签署）中有一条涉及朱可夫，显然是最高统帅的上述措辞严厉的电报的继续。请看大本营训令的第2条：“尤里耶夫同志不再负责监督歼灭德军科尔孙集团的工作，而负责协调乌克兰第1和第2方面军的行动，任务是不让敌军从雷相卡和兹韦尼戈罗德卡方向突围并与敌科尔孙集团会合。”

如果再次仔细地读读这一条，就会清楚地发现，它是在对朱可夫作某种惩处。它不再让朱可夫元帅指挥整个战役，只交给他一个局部任务——构筑对这一集团的外包围圈并阻止敌军从外部突破，向该集团靠拢。不妨回忆一下陆军元帅曼施泰因回忆录中的一段话，他说，有

20 000 ~ 30 000 人逃出了包围圈，他去看望了这几个师，向他们表示了谢意，并送它们去进行改编。

斯大林无疑是得到了情报机关的报告：有一部分军队突围，前来接应的坦克第3军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与突围部队会师。这就是说，无论我们有多么不情愿，但是朱可夫实际上是没有完成他的任务。曼施泰因的坦克军向被围部队突进并在途中接应他们。科涅夫也没有完成他在此次战役中承担的那部分任务，因为敌军集团中的部分人冲出了由他负责的内包围圈。

这里用不着去细说，我也不想给科涅夫抹黑。我不愿意做这种事情。科涅夫理应获得元帅军衔，在此次战役之前他就打过许多胜仗，显示出了统帅才能。

但是在对待实施此次战役的朱可夫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态度上，斯大林有失公正。对朱可夫提出指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整个方面军不该如此不公。

总之，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战役是由斯大林指挥几个方面军战斗行动而取胜的几个大战役之一。斯大林总是要求方面军司令员们和他的代表朱可夫迅速地对态势的变化做出反应。他作为最高统帅的经验和指挥艺术在当前的、瞬息万变的战斗中得到了表现，他本人预见并实现了这种多变——他派遣近卫坦克第5和第6集团军从两个方向包围敌军，迅速地合围。利用坦克兵而不用“行动缓慢的”步兵来构筑外包围圈，这不仅是一个创新之举，而且是一个冒险之举，但是斯大林积极利用航空兵来支持和保障坦克兵团的行动，以此来弥补步兵兵力的不足。空军第2集团军和航空兵第10军为封锁和消灭敌军提供了十分有效的支援，完成了11 500次战斗飞行。飞行员们还为坦克集团军运送燃料和弹药，为此，除了战斗飞行外还完成了1 200次“供应”飞行。斯大林关于抢时间继续向西全线推进的全部打算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为苏军向国境线进军创造了良好条件。

十二 在敌人一方……

应当指出，在德军的指挥机关，尤其是陆军总参谋部，不乏头脑清醒之人，他们能够正确理解和评价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态。新任总参谋长蔡茨勒本人在他主持出版的《总参谋部东战场态势评估通报》中谈了自己的观点：

“敌军对兵力对比作了正确估价，意识到他们现在有可能取



胜……会千方百计地把进攻战役继续进行下去，不会有大的战役间歇。红军有足够的兵力这样做……如不能在他们将要发动的突破战役开始之初便加以预防和遏制的话，按照苏军现有的兵力和战斗力，整个东战场有崩溃的危险。”

如我们所见，这个评价没有照顾自己人的面子，非常客观。这种态度给德军总参谋部增了光。

正如人们所说，在希特勒匪徒铁蹄的践踏下，战火不仅在东方大地，而且在地中海战区熊熊燃起。盟军先是登陆西西里岛，然后渡海登上欧洲大陆，意大利很快便退出战争，宣布投降。岂止是投降，新组建的意大利巴多格里奥政府还于10月13日对德宣战，这一下意大利就由盟国变成了敌国，同它也要兵戎相见。惟一让德国陆军总参谋部不太失落的事就是，它解除了意大利军队的武装，在24小时内俘虏了82位将军、13000名军官、402000名军士和士兵。因此，不久前是一支现实力量的盟军都成了战俘，当然还得给他们吃，还得看住他们。

英美部队经拉芒什海峡登陆法国越来越成为一种现实危险。可是希特勒却就此对戈培尔说：

“英国人无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希望欧洲变成布尔什维主义的欧洲……如果他们明白，只能在布尔什维主义和好说话的国家社会主义之间进行选择，他们一定会选择后者……丘吉尔本人是老牌反共分子，他今天与莫斯科的合作不过是出于是否合理的考虑。”

希特勒向他的同胞祝贺新年时对人民说：“国家社会党的领导人有足够的决心，会以极其执著的态度将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现在希特勒的报纸和广播暗自希望与盟国媾和，不断谈论的话题是：“第三帝国是反共堡垒”、“第三帝国是防止布尔什维克入侵的欧洲保卫者”。

希特勒的情报机关获取了有关德黑兰会议的大量情报，他们得知会议作出了英美军队在西欧登陆的决定。在右岸乌克兰即第聂伯河西边激战方酣的日子里，“西方”集团军群总司令龙德施泰特掌握了有关盟军准备情况的大量信息。希特勒统帅部十分担心入侵行动很快就会开始，甚至想过要收缩东线，就地固守，而将部分兵力西调以反击入侵之敌。“狼穴”在制定战略部队西调的计划，其中体现了希特勒的想法：狠狠打击入侵法国的盟军，让他们在长时间内不敢再作这样的尝试。然后立即调转部队向东，后撤至俄国战场并在那里加强防御，接下来也可能采取进攻行动。然而，形势却向相反方向转变。盟军没有登陆，苏联四个乌克兰方面军都转入猛烈的进攻。

1月4日，曼施泰因元帅乘飞机前往元首的大本营解决他认为最重

要的一些问题。其中的主要问题当然是收缩第聂伯河突出部的战线，不是拿要落入重围的军队去冒险，而是撤走它们并在另外的地方即更西的地区组织坚固的防御。曼施泰因在这一点上无疑是对的。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指出：“计划进行的反突击至多可以暂时消除迫在眉睫的威胁，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长久地巩固我军的地位。”

然而正如曼施泰因在他回忆录中所写的，希特勒不是那种认为在实施战役时必须作长远考虑的人。不仅如此，他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反对任何放弃第聂伯河突出部的主张：

“我们一旦离开第聂伯河突出部就势必丢掉克里木，这就意味着土耳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会脱离我们。我只能在打消了敌军登陆海岸的尝试后才把西边的部队调给您。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赢得时间来组建新的部队，并等待西部态势明朗。再说，盟国之间也存在不少矛盾，这个联盟总有一天会解体。所以，我再重复一遍，主要的问题在于赢得时间。”

曼施泰因明白，希特勒现在是被政治问题搞昏了头，他此行将一无所获。但是无论如何也要尽快解开这些疙瘩，因此他请求希特勒抽空亲自与他面谈，也可以请总参谋长参加。

希特勒心存疑虑，他并没指望同曼施泰因单独谈话能有什么好结果，但还是要求其他的人都离开办公室。所有的人，包括速记员，都离开了，只有蔡茨勒将军留了下来。曼施泰因说道：

“我的元首，请允许我非常坦率地谈谈看法。”

“请吧。”希特勒冷冷地说。

“我的元首，应当清楚地看到，我们目前所处的形势异常严峻，这不仅是由于敌军在实力上占有不争的优势，也是我们对军事行动的指挥所造成的结果。”

希特勒简直被这番话惊呆了，他看了曼施泰因一眼，那眼神让曼施泰因终生难忘。

曼施泰因写道：“我不记得我在其他什么时候还看到过能如此传达人的意志力的眼神……他用那样的目光盯着我，似乎想用自己的目光让我屈服。这正是所谓的无声的斗争，它持续了好几秒钟。我终于明白，他曾用这种目光吓倒过，或者用显然对这种场合不合适的说法是‘收拾过’不止一个受害者。可是我还是接着对他说，按照我们这种指挥武装力量的方法，将会一事无成。”

曼施泰因接着又向希特勒陈述了他曾多次（曼施泰因的说法）提出过的主张：由一个授予全权的将领来指挥整个战斗行动。因此，他没有明说，而是暗示希特勒不要再指挥各条战线的战斗行动了。希特勒对此

回答说：

“只有我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全部手段并能有效地指挥军事行动，只有我能够决定可以把哪些兵力派往哪一个战区并进而决定如何利用这些兵力实施战役。所有高级将领只服从我，而不会服从其他什么人，比如说戈林。没有人能有像我这样的威望。而有些元帅竟然不服从我的指挥！您是不是认为他们会更听您的指挥？必要时我可以解除他们的职务，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这种权力。”

曼施泰因没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没能让希特勒放弃这一职位以便改进东线战役指挥的问题。他一无所获地回到了“他的”第聂伯河突出部。

正如大家所知，战斗行动越来越吃紧。曼施泰因甚至没有兵力去实施经他周密策划的反击。他本人也承认，他只剩下了一些部队的番号，而已经没有实际的兵力。单独面谈失败后，曼施泰因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并通过总参谋长转交给了他。信中提出的基本上还是与元首倾心交谈时提过的那些问题。

1月27日，希特勒的大本营召开扩大会议，东战场集团军群的各个司令员、中央领导人和元首大本营的高级将领出席了会议。

元首在他的报告中谈到了战争的思想依据。报告又臭又长。主要是强调，所有军人都应当无限服从于国家社会主义。大家知道，希特勒甚至指责他不信任的高级指挥官，他说：“如果命运不让我们在这场殊死斗争中取胜，如果上帝要让这场战争以德国人民的失败告终，那么，将军和海军上将阁下们，你们……都应当为了德国的荣誉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阁下们，我要说，理应如此。”

希特勒稍停片刻，用目光审视了在前排就座的将军们。就在这一间隙，曼施泰因突然冒出一句话说：

“我的元首，会是这样的！”

曼施泰因的这句插话不仅使停顿的间隙更长了，而且使大家心情沉重。这是因为，许多与会者对此理解各不相同。一些人认为，曼施泰因的话是对希特勒的话表示支持，是爱国主义情绪的表露（“元首，我们大家要万众一心地为实现您的主张而献身”）；另一些人则相反，他们认为这句话是讽刺，他好像是在说，元首真的把我们弄得走上只能万众一心地去献身的境地。希特勒显然乱了方寸，过了一分钟才开口说话来打破僵局：

“谢谢您，冯·曼施泰因元帅！”

然后他就刹住话头，没再讲下去。宣布休会。

会间休息时，曼施泰因在总参谋长蔡茨勒的办公室里喝茶。电话铃响了，蔡茨勒拿起话筒简短地说了几句后对曼施泰因说：“请您到元首的办公室去一下。”

曼施泰因来到希特勒办公室的时候，希特勒不加任何铺垫地（看样子希特勒也是刚刚琢磨过曼施泰因的插话并最终明白了他的真正用意，因此才叫他过来）对他说：

“曼施泰因阁下，我不允许有人在我对将军们发表讲话时打断我。您本人自然也不会允许您的下属这样做吧。”

曼施泰因对这番话没有思想准备，也无言以对，因为他也的确不允许他的任何下属这样做。希特勒深感受到冒犯，不仅对这次插话提出批评，而且继续说道：

“您前几天交给我一份有关时局的报告。报告的用途显然是，它记入战斗行动日志后，有朝一日将向历史证明您是对的！”

这里暗含着对曼施泰因本人的侮辱，他明白了这一点并试图进行反驳：

“我寄给您本人的信自然不必记入战斗行动日记。我是通过信使请总参谋长将这封信转呈给您的。请您原谅，我现在要使用一个英文词：对于您的话我只能说，我是一个 gentleman^①。”

接下来是长时间的冷场，希特勒思索了好大一会儿，然后，由于找不到别的话好说，只说了一句：“谢谢您。”

同元首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曼斯泰因在两个场合——会上插话那一次和声明自己是 gentleman 这一次——似乎都占了上风。曼施泰因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他相信，希特勒不会这样轻易放过他。

十三 普罗斯库罗夫—切尔诺维策战役

1944年2月18~20日，斯大林和大本营成员就解放右岸乌克兰的下一步合适的行动作出决策。这一意图主要是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思想：对喀尔巴阡山方向实施决定性突击，前出至喀尔巴阡山脉并把战线南段一分为二，因为越过喀尔巴阡山，两个各自为战的方面军部队就很难也许是根本不可能进行联系和协同动作（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因此，这里的态势与希特勒匪徒进攻斯大林格勒时设想的态势相似。依我看，只要一前出至喀尔巴阡山，希特勒匪徒的处境就会更加困

^① 英文，意为“绅士，有身份的人”。——译者注

难，因为我们在伏尔加河对岸照样可以与我方集团保持联系，尽管条件十分困难（不妨想想根据斯大林的命令修建的铁路）。而在这里，只要一前出至喀尔巴山脉，就真的是被彻底地隔断了。

斯大林在仔细研究过朱可夫和总参谋部的报告后，表示同意他们的建议，并命令朱可夫乘飞机去前线，再次负责协调乌克兰第1和第2方面军为落实既定计划而采取的行动。

这时已是开春时节，道路又开始翻浆，许多指挥员都怀疑是否有必要在这样的条件下展开这么大的战役，因为坦克和炮兵以及整个装备的运动都会异常困难。能不能再等一等呢？可是斯大林不想等，他这样做也是对的：因为如果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实施战役，对敌军将是出其不意，应当利用这个因素。加之，在此前的战斗中受挫的敌军部队还来不及为抗击苏军的新进攻作充分的战斗准备。

2月28日，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瓦图京决定前往第60和第13集团军研究地面部队与航空兵的协同动作问题并再次与集团军司令们商定一切。

瓦图京结束了在第13集团军的工作后，于2月29日在司令部参谋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克赖纽科夫少将陪同下，与8名警卫人员一起前往第60集团军。晚8时，在距离米利亚滕村不远的地方，小小的司令部车队遭到班杰拉分子^①的袭击。班杰拉分子突然从埋伏处向汽车射击。卫队开始反击，可是瓦图京在交火中受伤，伤势好像不重（膝盖以上的腿部受伤），但是瓦图京在忙乱中和被送往附近村庄的途中失血很多。后来他被送到一家医院，又从这家医院转移到基辅。外科医生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抢救，做了几次手术来挽救他的生命，可是瓦图京还是于4月15日逝世。

斯大林任命朱可夫为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要求他为保证即将展开的战役的胜利负全责，而不再只负责协调乌克兰第1和第2方面军的行动。

乌克兰第1方面军实力强大，它拥有5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3个坦克集团军和1个空军集团军。

这里与乌克兰第1方面军对抗的是冯·曼施泰因元帅指挥的坦克第4和第1集团军。从这里简单罗列的双方的实力即可看出，朱可夫优势明显，他不仅可以因此掌握主动权，而且可以像常言所说的那样去强迫别人俯首听命。朱可夫在主要突击方向集中了两个集团军——第60集

^① 1943~1947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西乌克兰组织的法西斯军事恐怖组织的成员，因其领导人C. A. 班杰拉（1908~1959）的名字而得名。——译者注

团军和近卫第1集团军，为扩展战果又部署了两个坦克集团军即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和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作为第二梯队。为防止敌军调动预备队，位于左翼的其他集团军也同时转入了进攻。

3月4日，在强大的炮火准备和航空火力准备后，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发起了进攻。第一天就在第60集团军的地段取得胜利，朱可夫立即决定马上把两个坦克集团军投入这一方向。

坦克集团军向前推进，深深楔入曼施泰因的两个集团军中间，南面是坦克第1集团军，北面是坦克第4集团军。曼施泰因集结了一切可能集结的预备队，又从其他方向调来部队，以便歼灭这楔人的部队，不让它分割自己的战线。他组建了一支由9个坦克师和6个步兵师组成的突击队。应当说，它们都完成了各自的任务。尽管朱可夫在主要方向部署了强大的坦克集团军突击队，但是曼施泰因不但阻挡住了我进攻部队，而且把它们赶到捷尔诺波尔和普罗斯库罗夫以北一线。因此，曼施泰因保住了其后方的交通线，保证了两个集团军之间的联系。

朱可夫不得不忍痛暂时停止主要集团的进攻并下令转入防御。这场艰苦的防御战持续了一个多星期，朱可夫在击退和拖垮曼施泰因的集团军后，才决定恢复进攻行动。3月21日，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开始向前运动；3月24日，他们在行进中强渡德涅斯特河并利用已完全夺得的主动权极其迅速地逼近普鲁特河；3月29日，他们强渡普鲁特河并占领了切尔诺维策，同时将希特勒的东战场一分为二，因为这里已是喀尔巴阡山脉的山前地带。曼施泰因的坦克第1集团军留在了南段，坦克第4集团军则隔在了北段。

在此之前，乌克兰第2方面军根据斯大林命令在霍京方向实施了猛烈突击，乌克兰第1和第2方面军的部队在霍京这个居民点会师。因此，敌军的23个师，其中包括10个坦克师，在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克地区陷入重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巩固这一胜利便成了当务之急。

等我们一起再去“看看”德军司令部的情况时，我再详细介绍曼施泰因是怎样解救了这一被围集团的。

能让朱可夫和我们稍微引以为慰的是，朱可夫部不仅包围了，而且全歼了捷尔诺波尔地区的另一个敌军集团。

总的说来，普罗斯库罗夫-切尔诺维策战役是伟大卫国战争中的一个大战役。它与其他战役的区别在于，第一次在主要方向部署了达3个坦克集团军之多的强大集团。

乌克兰第1方面军推进350公里，前出至喀尔巴阡山脉的山前地带，分割了敌军的战线，完成了斯大林下达的全部任务。至于说希特勒



的军队还是突围了，斯大林认为这不是朱可夫的错，因为在制定战役计划时本来就没有提出包围和歼灭如此巨大的敌军集团的任务。斯大林的训令中要求完成的任务都完成了。我军取得了又一个大胜利，顺利地完成了对德军东战场的战略分割。

莫斯科鸣放礼炮祝贺朱可夫部的胜利，许多部队分别获得了“普罗斯库罗夫”、“文尼察”、“切尔诺维策”、“扬波尔”、“日梅林卡”、“乔尔特科夫”和“扎列希基”的荣誉称号，参加战役的许多人获得了个人嘉奖。这一次没有漏掉朱可夫，他荣获了“胜利”勋章，而且勋章的编号是第1号。

斯大林给朱可夫授予这个新的最高功勋章，不仅是表彰他在普罗斯库罗夫—切尔诺维策战役中的功绩，而且也是表彰他在一系列交战——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战役中的功绩，同时也是为了消除两人心中的隔阂：斯大林在前次的命令中只表彰了科涅夫，这无疑令朱可夫感到不快，斯大林可能也不会愉快。

十四 在敌人一方……

曼施泰因给蔡茨勒打电话报告第1集团军的危急处境——它已无法守住原有的战线。总参谋长就此回答说，希特勒并没有认识到目前态势的严重。

蔡茨勒无疑向希特勒汇报了他同曼施泰因通话的内容，因为蔡茨勒很快又打电话给曼施泰因，说元首让他到大本营去一趟。

曼施泰因乘飞机从利沃夫来到希特勒的山间别墅——风景如画的贝格霍夫，他在会上向元首报告说，坦克第1集团军无力抵抗在兵力上占优势的敌军，因为坦克第1集团军本身伤亡很大。苏军已经打到了坦克第1集团军的交通线。曼施泰因建议，由坦克第4集团军在自己一方组织突击来接应坦克第1集团军。为此曼施泰因请求给他援军，因为他的两个集团军都兵力不足。

希特勒听了曼施泰因的话后说道：

“我不可能再给您补充兵力去实现您的计划。我不能不防备西边敌军的人侵，西边的一个师我都不能动。如果把坦克第1集团军调出，我们的整个东战场就会垮掉，我们就会失去南部的一大片土地。”

希特勒一边否定曼施泰因的建议，一边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开始指责起曼施泰因元帅，说他很不善于使用希特勒不断调派给他的增援部队。

曼施泰因反驳说，增援部队都是分批派来的，而且必须马上投入战

斗完成具体的任务，不可能把这少量的预备队留在那里不用。元首哪怕有一次给过应急所必需的最少量的增援部队，也不至于出现目前这样的态势。

这时希特勒吼叫起来：

“您老是指望战斗机动。秋天的时候您说能守住第聂伯河，后来却让第聂伯河失守，我不得不同意您撤至河这边并在那里设防固守，结果您又说还得往后撤。您丢掉了基辅，然后又丢掉了右岸乌克兰。”

曼施泰因辩解说：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们根据您的命令先是固守顿巴斯，后来又固守第聂伯河地域，而我们本可以利用这些兵力来固守‘东方壁垒’。”

“空军侦察机关的资料证明，您的一些部队见到敌军的几辆坦克就后撤了，整个整个的团都逃跑了。您没有誓死坚守自己的阵地，却总是说必须后撤至新的阵地。”

“如果部队再也顶不住了，那就说明它们疲惫到了极点，耗尽了精力，兵团和部队自身减员。我不止一次地报告说，战线过长，部队状况不佳，总有一天会把部队的实力耗尽。您不能指责集群的司令软弱无力。我们一直在要求兵团的指挥员坚定顽强地指挥战斗，撤换了许多在我们看来丧失了斗志的指挥员。其实他们都是久经考验、作战勇敢的指挥员，在此前的战斗中不止一次地表现了自己的才能，可是现在，由于形势所限，他们的顽强精神也受到了削弱。”

曼施泰因很清楚，这场剑拔弩张的对话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但是还得去给第1集团军解围，于是他说道：

“我今天就下令去给坦克第1集团军解围。我再重复一遍：只有通过第1和第4集团军实施相向突击，我们才能形成强大的集团并重创包围坦克第1集团军的敌军。”

希特勒这一次又拒绝了曼施泰因的建议，并就此宣布休会。

曼施泰因走出希特勒的办公室后感觉稍微轻松了一些，他对元首的副官施蒙德将军说：

“如果元首不采纳我的建议，我认为我就不宜再继续指挥这个军队集群了。我请您转告他任命其他人担任集群司令。”

副官当然把曼施泰因的话向希特勒作了汇报，在晚间的会议上元首的态度明显缓和下来。他开口说道：

“我又权衡了所有的情况，同意您关于坦克第1集团军向西部突进的计划。我还不得不决定，让在西部新组建的党卫军坦克军（内含党卫军第9、第10坦克师和匈牙利山地步兵第100师）加入您提到的突击集团——坦克第4集团军。”

希特勒不想把他同曼施泰因的关系搞到破裂的程度，因为在几个元帅中，曼施泰因毕竟是最有经验和才华的统帅之一。

曼施泰因刚一回到司令部就作了必要的部署并组建了实施突击的军队集团，以便阻止朱可夫合围并歼灭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克地区的德集团军部队。

可是在希特勒的大本营里，不仅在照常指挥着战斗行动，而且在酝酿着一场阴谋。我这里指的是戈林和希姆莱对曼施泰因不怀好意、十分嫉妒。这两位帝国高官显然是在希特勒弥合了同曼施泰因的关系裂痕后对元首吹起了“耳边风”，说什么元首对曼施泰因过于迁就、曼施泰因本来就是在滥用元首的善意、曼施泰因表现张狂、公开打断元首的话并迫使元首做出对他本人有利的决定。

这场阴谋很快就有了结果。总参谋长蔡茨勒打电话给曼施泰因并通知说，已派希特勒的专机“安第斯神鹰号”去接他，命令他立即从利沃夫飞往元首的大本营。飞机刚一在利沃夫机场降落，曼施泰因就看见冯·克莱斯特坐在里面：原来飞机先去接了坦克第1集团军司令。

飞机在贝希特斯加登降落后，两位高级将领马上到蔡茨勒将军处了解情况。总参谋长悄悄地向他们介绍说，曼施泰因最后一次与元首见面并与其发生争执后，戈林和希姆莱讲了许多关于曼施泰因的坏话，并促使元首决定与曼施泰因和克莱斯特决裂。

然而等待着他们并不是不愉快的谈话、抱怨和指责。元首会见曼施泰因时心平气和，表面上很高兴，除了授予他“骑士十字”勋章外还授予了所谓的荣誉佩剑，对他以前建立的功勋表示感谢，但是决定把他指挥的几个集团军交给另一位将军负责。

希特勒接着说道：

“在东方实施大战役的时候过去了，当然元帅您对那些大战役特别适合。但现在那里不过是应该坚守阵地，所以要由新人来开始对部队采用新的指挥方法，因此我决定更换军队集群的司令，甚至要改变集群的番号。我想着重强调的是，我们之间没有一丝一毫的不信任，就像当年解除布劳希奇元帅的职务一样。我完全信任您，我一直赞同您的决策和您的战术。在过去的一年半中，您作为该集群的司令，当然由于重任在肩而十分疲劳，因此让您休息一下我认为是完全应该的。您是我们最有能力的统帅之一，因此我希望将来还能用上您。但是眼下东方还没有能够用得上您的大任务。我再次向您声明，这里没有一点不信任的意思。我过去和现在一直记着您的功绩，您胜利地完成了对法国的西征，正确地通过一次突击保证了西征的胜利。”

曼施泰因回答说：

“我的元首，我对您的决定不能表示丝毫的反对，因为这样做是为了改善态势。”

希特勒同曼施泰因握手告别时，曼施泰因元帅不失时机地说了一句刺激希特勒的话：

“我的元首，希望您今天的决定不是错误的。”

希特勒同曼施泰因谈完后，以同样委婉的态度同克莱斯特将军分了手。曼施泰因和克莱斯特离开元首的办公室后，莫德尔上将和肖奈尔将军很快被请到那里。希特勒任命莫德尔为“南方”集群司令，并当场向他授予了元帅军衔。

曼施泰因元帅回到“南方”集群司令部，同他的工作人员、司令和军官们一一告别，并于1944年4月3日回到德国。

曼施泰因元帅与斯大林和朱可夫之间在战线这一地段进行的一对一的较量就这样结束了。冯·曼施泰因在屡遭惨败后解甲归田，而斯大林却在不断积累战斗经验，增长统帅才干，投入了准备并实施新的大战略战役的工作。



第六章

彻底歼灭

1944年，斯大林组织了10次突击将德国侵略者逐出苏联领土，于是最高统帅提出了最后的任务：“把法西斯野兽打死在它自己的洞穴里，在柏林上空升起胜利的旗帜。”^①

^① 《斯大林文集》第432页。——译者注

一 在“巴格拉季昂”战役之前

1944年4月苏德战线的态势是这样的：在南方，苏军的几个兵团已前出至罗马尼亚边境，并且把自己的突击方向对准了布加勒斯特。他们右翼的友邻部队已将第聂伯河一带的希特勒匪徒击退并逼近喀尔巴阡山脉的山前地带，将德军的东战场分割成两部分。在北方，苏军完全解除了对列宁格勒的封锁，已开始向楚德湖、普斯科夫和新勒热夫推进。因此，在向西深入推进的两翼之间形成了一个向莫斯科方向的大突出部，当时称之为“白俄罗斯平台”。这个沿维捷布斯克—罗加乔夫—日洛宾一线构成的突出部的前端离莫斯科并不太远。

在这个突出部，希特勒的军队（就是拥有60多个师的“中央”集团军群）阻断了苏军西进的道路。此外，法西斯的统帅部由于控制了那里发达的铁路和公路网，可以迅速机动，对从这一突出部以南和以北发动进攻的我军的翼侧实施打击。敌空军也从这个突出部对位于以南和以北的我军集团实施轰炸。不排除还可能对莫斯科实施空袭。

同时，处在突出部的德军，由于这样的态势而受到我军南北翼侧突击并有落入重围的威胁。但是要实施这样规模的包围，需要投入大量的兵力，为此我军要歼灭波罗的海沿岸的“北方”集团军群和乌克兰的“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在这以后才能从双向对“中央”集团军群实行合围。

那还是在1944年4月末，斯大林在安东诺夫将军的参与下与朱可夫商量夏季战局的计划。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说：

“要特别注意在白俄罗斯的敌军集团，这个集团一旦被歼，敌人整个西战略方向的防御就会崩溃。”

斯大林表示同意，并补充说：

“要从南面，由乌克兰第1方面军更深入地包围敌白俄罗斯集团，把敌人的预备力量从中央方向吸引过来。”

安东诺夫说道：

“最好先从北面发起，然后再在南面展开，这样敌人就无法在相邻的方面军之间实施机动。此后再进行对‘中央’集团军群的战役，以



解放白俄罗斯。”

斯大林说：“我再与华西列夫斯基商量一下，请给各方面军司令打电话，让他们把各方面军对近期行动的想法报上来。而您，朱可夫同志，请与安东诺夫拟个夏季行动计划。等你们搞好了，我们再商议。”

朱可夫见到了华西列夫斯基，他们一起，凭着共事的经验，着手拟订白俄罗斯战役的作战方案。

有关工作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为了不让敌人发觉我军后方的变动，战斗行动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倒加强了。

谢·马·什捷缅科谈了这方面的情况，他说：

“完全了解这些计划的只有5个人：副最高统帅、总参谋长、第一副总参谋长、作战部部长和一个作战部副部长。严禁在通信中以及在电话或电报中谈及这方面的情况，对此实行了极其严格的检查。各方面军的作战意见也是由两三个人拟定的，而且通常是用手写的并由方面军司令亲自上报……”

4月下半月，总参谋部对所有关于夏季战局的意见进行了汇总。这个战局被设想为在波罗的海沿岸到喀尔巴阡山脉之间广阔地带展开的战争史上一系列规模极大的战役。应该至少有5~6个方面军几乎同时投入积极行动。”

斯大林审查了这些建议，把夏季战局中解放白俄罗斯的行动命名为“巴格拉季昂”战役。按照这一作战计划，拟定用4个方面军的纵深突击歼灭“中央”集团军群的主力，解放白俄罗斯并为此后进攻乌克兰西部地区、波罗的海沿岸、东普鲁上和波兰创造条件。要实现这个意图必须同时在6个地段突破敌人的防御，分割敌军并予以各个击破。同时，白俄罗斯第3和第1方面军的强大集团应在翼侧迅疾进攻，在明斯克地区会师，包围并消灭被我军正面突击赶至这里的敌军。

“巴格拉季昂”战役最初的意图大体上就是这样的。

5月20日，斯大林、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安东诺夫最后审定了拟就的夏季战局方案。这次会后，斯大林下令召见实施“巴格拉季昂”战役的各方面军司令——巴格拉米扬、罗科索夫斯基和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病了，所以来得比较晚，5月25日才到达。

在这次会议上发生了一件让许多将领议论纷纷的事。

在讨论罗科索夫斯基方面军的行动方案时，他建议在右翼实施两个主要突击。不知道是斯大林不喜欢这个建议还是想强调他对元帅们的权力，他突然命令道：

“罗科索夫斯基同志，请您到隔壁房间去好好想一想自己的建议。”

在场的人都很困惑，但仍然不动声色地继续讨论作战方案。

罗科索夫斯基返回斯大林办公室报告说：

“我们在方面军司令部已经仔细盘算过了，我依然认为必须实施两个主要突击。”

斯大林平静地说：

“再去好好想想吧。”

罗科索夫斯基又出去了，他不理解最高统帅为什么这样做。他再次返回后仍坚定地重复他此前作出的决定。

斯大林说：“方面军司令的坚定态度证明进攻的组织工作经过了周密的考虑。这是胜利的可靠保证。”

会上出现的紧张气氛一扫而空。斯大林再次显示出他的审慎和权力。

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证实了斯大林故意玩了这一“教育人的游戏”：

“在某些军界人士中流传一个说法，似乎康·康·罗科索夫斯基在最高统帅面前坚持要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兵力在白俄罗斯方向上实施‘两个主要突击’。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早在5月20日，即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来到最高统帅部之前，斯大林就根据总参谋部的方案预先批准了该方面军计划的两个突击。”

现在经验丰富的斯大林有时就是这样检验他的决策是否正确并顺便进行教育工作的。

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命令朱可夫负责协调白俄罗斯第1和第2方面军的行动，华西列夫斯基负责协调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行动。

这时需要进行复杂的变更部署：为了进行“巴格拉季昂”战役必须将5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2个坦克集团军和1个空军集团军调到新的地区。此外大本营还为各个方面军补充了4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2个坦克集团军、52个步兵师和骑兵师、6个独立坦克和机械化军、33个航空兵师、2849门火炮和迫击炮以及21万名补充兵员。

所有这些预备队都是斯大林亲自准备的！（说起来很简单——“亲自准备”，然而请设想一下，这是多么巨大的工作！）所有这一切都要秘密地进行，不能让敌人察觉和识破已拟定的进攻计划。

当时还给了敌人虚拟情报：造成了乌克兰第1方面军在南面策划突



击的印象。

在准备期间发生了一个无疑对鼓舞苏军战士士气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盟军终于开始强渡拉芒什海峡，开辟了第二战场！

二 第二战场

1944年6月6日，英美远征军在法国土地上登陆。这是“巴格拉季昂”战役开始前17天。

我在描写我们敌人的行动时力求客观，因此我认为在谈论我们的盟军时更要遵循这样一种态度。英美领导人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在战争最困难的日子让我们单独抗击强大的希特勒军队，这如常言所说，他们是问心有愧的。但是他们中许多人为战胜共同的敌人而捐躯，这里应该悼念在“霸王”战役中阵亡的122 000名将士，其中有73 000名美国人和49 000名英国人和加拿大人。

由德·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的诺曼底登陆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登陆战役，参战的有2 876 000人，近7 000艘舰船，近11 000架战机。这支舰队横渡宽度达32~180公里的拉芒什海峡。读者仅凭这些数字就能想像出在登陆法国时海陆空会战的规模。

希特勒统帅部已获得准备强渡海峡的消息，得知1944年6月盟军将变言词为行动。在法国、比利时和荷兰驻有希特勒的“B”和“D”两个集团军群，他们从属于以格·龙德施泰特元帅为首的“西方”集团军群。到1944年6月初那里总共还有德国法西斯的58个师，而与苏联作战的有239个师，其中有德国的181个师。法西斯当然集中主力对付我军。但是现在希特勒统帅部，甚至所有与我们对抗的法西斯军队都感到在他们背后，在西线开始了切实的行动。

我遵循自己的原则寻找我所描写事件的参加者，亲历发生过战事的地方。我曾不止一次前往英国，会见了“霸王”战役的参加者，并且尽可能广泛地接触战役的参加者：与陆海军各级军官和士兵进行了座谈。

我去了伦敦，去了丘吉尔的大本营。这是位于市中心一座大楼下面的防空用的地下室，顶部用粗大的方梁和树干（圆木）加固，狭窄的通道也是用这些木材支撑的。这里没有什么生活设施，只有一个公共厕所。丘吉尔在这里顶着德军的轰炸举行了100多次大本营会议。

这里仍保留着各部门的工作间和丘吉尔的办公室——第65a号房间，办公室里有一张大写字台，上面放着几部老式电话和一个罩着绿色灯罩的台灯；办公室的角落里摆放着一张宽大的铺好的床；玻璃展台里放着那个时期的地图和文件，在一个橱柜里放着丘吉尔早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期间使用过的笨重的旧手枪（他在这里把手枪放在枕下），手枪旁边是一个白瓷大夜壶，首相有了它就不必穿过狭长的通道去厕所了……

大本营所有钟的指针都指向盟军签署希特勒匪徒投降文件的时间——5月8日17时。

我还去了位于朴次茅斯海边的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西欧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这里直到今天还挂着一幅占了整个墙面的大地图，上面插有表示战舰及其在当时所处位置的插标。

我参观了蒙哥马利元帅野战司令部的综合指挥系统，它由几部专门装备的汽车组成：有办公室、会议室、卧室……我想起了那次我终生难忘的与元帅的短暂会面。我们是偶然相识的。这是在战后的莫斯科，当时蒙哥马利造访了伏龙芝军事学院。我1947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侦察系，通过了英文的毕业答辩。

那天我正在战术研究室学习。蒙哥马利在科涅夫元帅和其他军队首长的陪同下参观伏龙芝军事学院。他来到战术研究室在我的桌旁停了下来。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旁边挂着一幅科涅夫的画像。

“科涅夫，这是您吗？”蒙哥马利问道。

科涅夫微笑着说：“像吗？”

我站起来给首长敬礼。

蒙哥马利对翻译说：

“请问他在学什么。”

站在一旁的副院长博戈柳博夫上将告诉蒙哥马利说：

“您亲自问他吧，他的英语很好。”

“是吗？您懂英语？”蒙哥马利问我说。

“是的，当然。”

“您在学什么？”蒙哥马利继续问道。

“我在准备明天的战术课。”

“明天是什么科目？”

“明天我要代理团长作出决策。”

“您是什么军衔？”

“大尉。”

“您参加过战斗吗？不过我看到您已佩戴了战斗奖章。”

这时科涅夫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他是苏联英雄。您看，他佩戴的是金星奖章。”

蒙哥马利和我握了握手，又问道：

“您在哪儿学的英语？”

“在我们学院。”（我没有说我在总参谋部情报总局高等侦察学校学



习了3年的情况。)

“您英语讲得很好，”蒙哥马利在道别时说，“希望您指挥的不仅仅是学院课上的一个团，而是真正的一个团。”

蒙哥马利“一语道中”，我在总参谋部工作一段时间后，从1957年到1962年的6年间一直担任团长。

我们再回到英国。在“霸王”战役40周年之际朴次茅斯建起了一座“登陆日”陈列馆，这里除了一般陈列馆的展品，还在电影厅里放映关于登陆战役的纪录影片，在整个陈列馆的环形墙壁上悬挂着巨幅的表现海陆交战主要情节的手工壁毯。

我在伦敦郊区参观了“帝国军事博物馆”，那里有收藏十分丰富的文献库和图书馆。例如，我在那里看到了记者科林·维尔斯的连续采访报道，他随一艘舰艇强渡海峡，目击了夺取登陆场的战斗。

我到了不列颠军事学院。在学院的正面立着一块1958年11月29日从德国运来的石头，石头上铭刻着如下文字：“1945年5月4日德国统帅部代表团在这里向蒙哥马利元帅签署了德国驻本国西北部、丹麦和荷兰的陆海空军全体无条件投降书。”

这发生在1945年5月8日美英签字接受德国向盟军投降和1945年5月9日朱可夫和盟国接受希特勒军队全部投降之前，英国人这样做是在强调自己军队的胜利。

我参观了作战传统陈列室。学院的图书馆里还有许多苏联的出版物、战争年代的《真理报》和《红星报》合订本以及其他的许多资料和文献。

学院有自己的教堂。在这个教堂的纪念册上记载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阵亡的两万名军官的名字。纪念册上不仅记录了他们的军衔和姓名，还记录了每一位军官参加的战役和获得的奖励。

在这座小城的海边专门修建了一个“海军陆战队陈列馆”，在这个朴素的名称后面矗立着一座雄伟的建筑，里面藏有非常丰富的展品和文献，反映了海军陆战队从产生那一天即从海盗船的接舷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各个海域作战的整个历史。

不过对我来说最有意思也是最有价值的还是与仍然健在的这次战役的参加者的会面，他们是：格里茨海军上将（除了正式的会面，我还去了他的家——环境舒适的小城索尔兹伯里）、马尔顿将军、塔普将军、亚历山大·布里顿准将和詹姆斯·希尔准将。

我特别感谢“英苏协会”会长约翰·罗伯茨，他是我在英国的旅行和会晤的组织者，感谢诺曼底战役老战士协会主席巴里什先生，他使我认识了许多军界的朋友，并同他们进行了坦诚的军人式的友好谈话。

这些内容本该单独来谈，但考虑到会脱离主题，我想告诉读者，为了撰写这一章，收集可靠的资料，我花了不少精力，所以我只能根据描写开辟第二战场战役的需要来讲述这些内容。

我们的盟国一再解释说，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是因为这样的战役需要长时间的认真准备。在最初谈论并许诺登陆兵在法国登陆时，英国的港口还没有足够的军队和舰艇，参战部队的集结、训练和军需品补给占用了很长时间，登陆的日期也一再推迟。

1944年6月5日早上，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终于发布了发动战役的命令。庞大的舰队通过拉芒什海峡驶向法国海岸。战役的意图是这样的：使登陆兵和空降兵在法国西北部海岸登陆，占领登陆场，在战役展开20天内将其正面扩大到100公里，纵深深入100~110公里。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盟军投入了39个师、12个独立旅、10支“突击队”和“别动队”。据英国的有关材料记载，参加这次战役的有350万人（其中150万美国人），4126艘登陆船由1213艘战舰护卫，1600艘后勤保障船，3500艘快艇和滑艇。11500架战机在空中保障战役的实施，2个美国空降兵师和1个英国空降兵师进行空降登陆，整个登陆舰队要在第一天将15万登陆兵送往欧洲大陆。这个任务在第一天中用16~17个小时就完成了，登陆第一天的伤亡不大，不超过11000人。

在登陆的海岸上与盟军对峙的是隆美尔指挥的“B”集团军群，辖有38个师。不过希特勒匪徒以为盟军会在另一个地区即在加来海峡登陆，他们把主要集团部署在那里，而在盟军登陆的地方总共只有3个师。敌人调遣“西方”坦克军群前来阻拦登陆兵，但盟国的空军完全掌握了制空权，使坦克军群无法抵达登陆地区。

随着登陆部队向腹地推进，战斗趋于白热化，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战士们进行了英勇无畏的拼杀。许多人亲自向我讲述了战斗的场面。

在诺曼底战役老战士协会主席巴里什先生的住所，我们以酒代茶谈起了强渡拉芒什海峡和在岸边的战斗。

他们向我展示了战役开始前德国人的炮兵阵地和这些阵地被英国空军轰炸后遍布弹坑的照片。“我们把这里变成了鸡尾酒！”

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原来这些勇敢的军人当时根本不知道，在他们进行艰苦战斗的日子里，苏联军队也在进攻并且吸引了希特勒军队的主力。

“我们不知道这种情况，”巴里什说，“但我不认为这是特意搞的。登陆后有一段时间很混乱，我们两个星期没有收到信，也没有收到报纸。”



所有参加战役的人一致称赞法国人在诺曼底战役过程中提供的支持和帮助。

正如预计的那样，到7月25日，也就是第20天建立了战略登陆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规模最大的登陆战役胜利结束。

这次战役的主要特点是：巧妙运用战役伪装并以虚拟情报蒙蔽敌人，从而使希特勒匪徒对登陆地区和日期判断错误；海陆空大军行动熟练而协调；官兵们在与给欧洲各国人民带来如此深重灾难的希特勒法西斯的斗争中英勇无畏并对自己的正义行动充满信心。

* * *

在战争年代和战后时期，我国的报刊以及电台的报道都说，德军统帅部对盟军进攻法国的部队几乎没有予以抵抗，希特勒匪徒集中全力对付东战场，而在西线盟军面对的差不多是洞开的战场，那里几乎可以毫无阻挡地向前推进。这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德军统帅部把大部分武装力量部署在东战场反击苏军，这是事实，但是西线在最初几个月里也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战斗，双方的士兵都有伤亡。登陆部队在法国海岸登陆后，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组织了第一次进攻战役。这次战役的目的是，包围德军集团（人数众多，20多个师），在法莱斯市地域形成合围之势。所以这个战役在历史上被称作法莱斯战役。实施这一作战意图的是由布雷德里将军指挥的美国第1和第3集团军，他从南面包抄德军集团；而从北面实施包围的是蒙哥马利将军指挥的英国第2集团军和加拿大第1集团军，他们包围了莫德尔元帅指挥的“B”集团军群的德国坦克第5集团军和野战第7集团军。顺便说一句，这个人就是在乌克兰战线失守后替代曼施泰因的那个莫德尔。

艾森豪威尔这个计划的实施一开始非常顺利，落入法莱斯“口袋”中的德军有20个师，但盟军由于缺乏经验，行动非常迟缓，他们一昼夜才推进5公里，致使德军的大部分师逃出了“口袋”。盟军最终合围了德军的8个师，但由于在构筑内外包围圈上缺少经验，他们没能全歼这些被围的师。德军通过反突击从外围突破了包围圈，将他们被围的部队解救出来。然而这毕竟是盟军第一次取得的重大胜利，因为他们在这次战役中抓获了许多俘虏，将队伍推进至塞纳河，并沿着塞纳河继续向巴黎方向进攻。

因此，通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到，这里也进行了真正的战斗。我再举一个例子，说明双方形成的惊心动魄的局面。在盟军登陆和实施上述战役后，“B”集团军群司令克卢格元帅的处境十分困难。读者不应忘记在争夺莫斯科的战斗中的这位将领，他是斯大林的老对手，他指挥的第4集团军要在古德里安和霍普纳的坦克对莫斯科形成夹击之势后一举拿

下莫斯科。但斯大林打败了这位统帅，迫使这他不得不后撤。然而克卢格撤离莫斯科后又构筑了稳固的战线，组织了牢固的防御，顶住了苏军进一步的进攻，我们知道，这一进攻是按照斯大林的决策组织的。克卢格在防御战中显示出了他的才能，而在进攻战役中他表现不佳，正因为如此，希特勒获悉不久将不可避免地开辟第二战场后，把克卢格当作防御行家调到了这里，由他组织在法国沿岸对盟军登陆部队的反击。然而盟军不但实施了登陆，还成功地发动了第一次进攻。克卢格辜负了希特勒的期望，于是希特勒解除了他“B”集团军群司令的职务。克卢格元帅经受不住下台的痛苦，他在自杀前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

“我的元首，昨天莫德尔元帅亲手将您解除我的西线部队和‘B’集团军群司令职务的决定交给了我……当您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不在人世了……我无法接受说我采用错误战略致使西战场失利的严重指责，而我又不能剖白自己……所以我由此得出相应的结论并自愿去我的成千上万战友已去的地方。我从来不怕死。生命对我已没有任何意义，而且我已被列入战犯名单，要受到法庭的审判。

关于我的罪过问题请允许我作如下说明……”

克卢格接下来讲述了战斗的过程，提到了他作出的决策，企图为战斗行动失利辩解。他辩解的基本意思是，他在德军失利的问题上没有罪过。克卢格在信的结尾部分写道：

“我的元首，您应当作出停止战争的决定。德国人民遭受的这种无法形容的苦难该结束了。

可以采取各种方法和措施来结束战争，首先要阻止帝国落入布尔什维克的手中。您现在应当表现出您的伟大，如果必要，应停止进行毫无希望的斗争。我就要与您告别，我的元首，作为一个直到最后时刻仍在履行自己职责的人，显然对您比您所了解的更亲。

元帅 冯·克卢格”

克卢格这时寻找摆脱战争的其他方法以避免帝国落入布尔什维克手中的建议为时已晚。希特勒早就在寻找这些方法了。在他被行刺后，马上就查明，密谋者试图与西方国家进行停战和单独媾和的谈判，希特勒责成希姆莱仔细探究密谋者与英美建立联系的渠道。这不足为怪，不过

希特勒借鉴了密谋者们的意图。他亲自审阅了讯问密谋者的笔录，听取了录音磁带，主要是想弄清究竟他们是怎样建立的联系。他直接给希姆莱下达了寻求与西方敌国建立联系的任务，于是“忠实的亨利”试探着直接与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谈这件事。但是后者拒绝谈这个问题。

德国报纸吓唬苏联的盟国说，欧洲可能“赤化”，苏维埃有意并且有可能攫取整个欧洲。德国驻梵蒂冈大使魏茨泽克会见了前美国驻柏林大使威尔逊，吓唬他说，一旦第三帝国覆灭，苏军将攫取整个欧洲，劝说他尽快说服盟国与德国签订协议。例如魏茨泽克说了下面这样一句话：“德国不能取胜，不过它还能选择战胜自己的人。”

三 “巴格拉季昂”战役

1944年6月23日~8月29日，苏联集中4个方面军的兵力实施了白俄罗斯战役，这次战役除了要完成苏德战场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也有助于盟军取得成功，因为这一战役牢牢牵制住了希特勒统帅部的行动，使其无法调动部队去西线打击诺曼底的登陆部队。总的来说，这两个战役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我们的英美盟国应该如何采取行动。就这样同我们一起扑向法西斯分子，战争便会缩短，伤亡也会减轻。虽然盟国当然并没有作这样的努力，不管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

白俄罗斯战役是伟大卫国战争时期最大的、规模空前的战役，同时有4个方面军协调一致地行动，它们是：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巴格拉米扬大将）、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上将）、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扎哈罗夫上将）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罗科索夫斯基大将）以及不久前组建的波兰第1集团军（波普拉夫斯基中将）。这些方面军集合了强大的兵力：166个师，12个坦克和机械化军，21个步兵旅、坦克旅和机械化旅。总共140万人，31000门火炮和5200辆坦克，还有4个航空集团军共5000架飞机提供支援。

游击队在敌后展开了积极的活动。

这次战役不仅可以作为典型的部队协同动作的范例，而且堪称各方面军司令与最高统帅充分地相互理解的典范，最高统帅亲自指挥了1944年6月23日~8月29日两个多月不间断的战斗行动的全过程。

每当人们想强调某件事做得十分顺利、组织性很高时，往往都说：“好像在按照乐谱演奏”。在“巴格拉季昂”战役中正是这样的情况——斯大林、总参谋部和各方面军司令共同写作了“乐谱”，随后他们又共同演奏了一支出色的战斗“交响曲”——将法西斯分子逐出500~600公里，消灭敌人17个师和3个旅，敌人50个师伤亡过半。

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完成后（7月中旬），斯大林确信敌人已被击溃。紧接着他命令北翼的列宁格勒方面军、波罗的海第3和第2方面军及南翼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转入进攻。于是，战略进攻的战场从波罗的海扩大到喀尔巴阡山脉，我军终于在400公里的长度上越过了国境线。

战斗行动的变化之大、速度之快，甚至在过了半个世纪的今天，在当我写这段历史的时候，仍让我心驰神往，奋笔疾书的速度也比平时快得多。因为对我来说这个战役不仅仅是我现在反复观看的那些标在地图上的箭头，在我的脑海中会自然浮现出在那些日子里真实格斗和拼杀的场面——当然只是一个掩体里的中尉的印象。不过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也有共同的冲动、激情和对取得重大胜利的预感。当时我看到的已不是1941年时“雅利安人”狂妄的嘴脸，而是望风而逃、屁滚尿流的败类。

为了证实作战行动像在按照乐谱演奏一样，斯大林和各方面军司令充分地相互理解，我必须举出几个例子。

罗科索夫斯基出色地实施了他在与斯大林争论时一再坚持的两个主要突击。他在这两个方向上部署了5倍的优势兵力，在2小时的炮火准备后，一举突破了德军的防御。实施突破的近卫坦克第1军和坦克第9军在博布鲁伊斯克以西会师。

罗科索夫斯基牢记斯大林的指示，不要与被围敌人缠战（如同斯大林格勒战役那样），这样会使部队不再向前推进，并增加伤亡。罗科索夫斯基立即把他指挥的博布鲁伊斯克战役作为一份礼物奉献给了最高统帅：从6月23日到28日，他的部队突破了敌人的防御，围歼希特勒军队4万人，并缴获了全部武器和装备。仅用了4天的时间！莫斯科当然为庆祝这一胜利鸣放礼炮。罗科索夫斯基由于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以及此前的战绩被授予苏联元帅的军衔。

就在这几天，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巴格拉米扬）和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也进行了不能不说神速的维捷布斯克—奥尔沙战役，也是用4天的时间快速围歼了敌人近10个师。

在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右翼克雷洛夫指挥的第5集团军也顺利地实施了进攻。斯大林在决定实施白俄罗斯战役时留下罗特米斯特罗夫的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作为他的预备队，以便在战役进行中在需要的地方用来扩大战果。因此，当大本营代表华西列夫斯基刚一向斯大林报告克雷洛夫那里已形成突破之势时，最高统帅便立即命令调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加强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这一命令由华西列夫斯基予以实施。

但起初罗特米斯特罗夫的坦克兵们行动不够积极，于是大本营发出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大本营要求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坚决迅速地采取符合战场态势需要的行动。”



7月26日，莫斯科为解放维捷布斯克的部队鸣放礼炮。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司令切尔尼亚霍夫斯基被授予大将军衔。

朱可夫元帅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受斯大林的委托协调各方面军的行动。他们每天（准确地说是每天晚上，有时是每天深夜）向最高统帅书面报告战斗行动的进程。斯大林综合各方面的报告，对战斗行动的进程作出必要的纠正。除了这些书面联系，斯大林还在一天当中（也是夜里）不止一次地同他的代表们和各方面军司令进行电话联系，时刻关注着这次大战的动态。

[我说的这些情况不是毫无根据的。在我的桌子上放着朱可夫每天报告的复印件，这些复印件是我多年的老朋友苏联元帅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亚佐夫给我的。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当了国防部长以后，同我也没有疏远，也没有避开老同事和老朋友。在我编写关于朱可夫元帅的三部曲时，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帮助我查找到许多档案文献，其中就有我上面说的朱可夫每天给斯大林的报告（他寄来了复印件）。我非常感谢亚佐夫元帅帮助我查找文献，非常感谢他审读这部书的手稿，并提出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斯大林已连续工作了几天几夜，他不能容忍任何人有丝毫的懈怠或谈话时说废话。我只举一个例子。

斯大林非常尊重华西列夫斯基，对他总是很客气、很关心，因此在他第一次出现失误的时候，斯大林发出了这样一封电报：

“致华西列夫斯基元帅

现在已经是8月17日3时30分，可是您还不向大本营报告8月16日的战果和您对态势的评估……我警告您，如果您再有一次忘记自己对大本营承担的责任，您将被撤销总参谋长的职务并被从前线召回。

约·斯大林”

围歼战役通常都是采用包围与我军对峙、在共同的战线上和我们直接接触的敌军集团的办法。实施包围的部队的钳形攻势从对峙的敌方防御阵地中切下一大块地区以及驻守在这里的敌军。白俄罗斯战役的第一阶段正是按照这样的模式实施的包围。

对维捷布斯克附近的敌坦克第3集团军和博布鲁伊斯克附近的第9集团军的包围刚刚形成，朱可夫（他将这个情况报告给斯大林，斯大林批准了他的决定）立即利用已出现的缺口，迅速调白俄罗斯第1和第2

方面军进行追击，直插敌人的纵深防御，在纵深 200 ~ 250 公里处收网，在明斯克附近包围了撤退的敌军和莫德尔元帅的预备队（后来就是他们被押解着列队走过莫斯科的街道）！

还从来没有人在防御纵深处并且在追击过程中构筑如此大的包围圈。

“巴格拉季昂”战役是军事学术方面的一个典型战例。在这次战役中，最高统帅约·维·斯大林，副最高统帅格·康·朱可夫，天才的军事首长亚·米·华西列夫斯基、康·康·罗科索夫斯基、伊·达·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伊·赫·巴格拉米扬、格·费·扎哈罗夫，波兰军队第 1 集团军司令斯·吉·波普拉夫斯基，许多将军、军官和几十万军士及士兵，都显示出了高超的指挥和作战才能。“巴格拉季昂”战役使多年来不屈服于法西斯分子淫威的白俄罗斯获得了解放。我军向前推进了 500 ~ 600 公里，前出至波兰领土和东普鲁士的边界。在这次战役中被包围的敌人的几个集团无一漏网。

* * *

我的中篇小说《统帅》（1985 年）出版后，收到了许多来信，读者在信中要求详细讲一讲我个人的情况。这个诱惑是很大的，不过这要写另外一本书了，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开始做这项工作。在这本书里，正如已经构思和承诺的那样，我描写的是斯大林的生平和活动，有的时候也会涉及我在前线的经历，如果这与描述的战役有关的话。

在白俄罗斯战役开始之前，发生了一件让我难忘的事情。那时我已是一名经验丰富的部队侦察员了，下面我要引用了解我在前线情况的作者的文字。

1982 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关于祖国的思考》的书中，瓦西里·罗曼诺维奇·博伊科将军善意地提到了我：

“第 134 步兵师第 629 团侦察排长弗·瓦·卡尔波夫中尉以出色的战绩而著名……”下面是他描写的具体的事。

我再从前第 39 集团军侦察处长马克西姆·阿法纳西耶维奇·沃洛申将军著的《侦察兵永远在前》一书中摘引一段话。从他的话中可以很好地理解当时白俄罗斯第 3 方面军的状况，理解为什么把重要的任务交给我。

沃洛申写道：

“‘熊壁垒’，一些书常常会另外叫作‘东方壁垒’，法西斯分子在 1943 年 8 月就宣布要构筑这道壁垒。我还是主张要使用‘熊壁垒’这个名称，它是‘东方壁垒’连接维捷布斯克的一段。战



时习惯用这个叫法……

侦察兵的战斗任务非常复杂，但他们的技能已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不想描述细节，但是我要说，他们不仅能够深入敌后奔袭，而且能够直接在敌人占领下的维捷布斯克展开行动。例如，我在前面不止一次提到过的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就去过那里几次。他穿了德军的军服潜入城市，与地下人员取得联系，从他们那里获得重要文件的复制件后返回。

这方面的情况我就不详细讲了，因为此时卡尔波夫已经在执行方面军侦察处长下达的任务。有一次侦察处长打电话让我挑选一名经验丰富的侦察军官去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我不假思索地说出了卡尔波夫的名字。”

下面是 A. 沙里波夫在《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一书中的描写。还是让作者来说吧：

“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在为部队进行解放白俄罗斯的决定性战役作准备时，特别重视研究敌军集团的情况。按照他下达的任务，方面军侦察处长阿廖申少将在第 39 集团军地段准备到敌后搞一次重要的侦察偷袭。他把这个任务直接交给了卡尔波夫上尉。阿廖申向卡尔波夫下达了指示后警告他说：

‘方面军司令非常重视您即将获取的侦察情报。他想和您谈谈。’

……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在指挥观察所接见了他们……

‘有人在维捷布斯克等你们。我们的侦察员已经准备好了很有价值的摄有敌人防御工事的胶卷，但无法转交给我们（地下工作者能够拍摄到‘熊壁垒’的平面图和地形图，但是当然不可能通过电台把平面图传过来。——本书作者注）。从防御阵地的前沿到城市大约 18 公里，这是纵深战术地幅，到处都是德军，跳伞是不可能的，侦察小组潜入也很困难，’切尔尼亚霍夫斯基解释说，‘所以您要一个人去……’

卡尔波夫上尉在夜里顺利地通过了德军阵地，好不容易到达了维捷布斯克。他找到了要找的人，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派他去取的情报。在城里，巡逻兵对卡尔波夫产生了怀疑。他们想扣留他，但是他逃脱了……夜里，卡尔波夫已到了离德军前沿阵地不远的地方。勇敢的侦察员通过了敌人的所有阵地，只是在通过最后一道堑壕的时候碰上了德军的哨兵。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伤了他……他失去了

知觉，但最终还是鼓足力量穿过了带刺的铁丝网，向前爬去……”

我知道，关于“熊壁垒”的侦察情报交给了与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相邻的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伊·赫·巴格拉米扬元帅记述了这个情况：

“……我任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司令时，在侦察报告中见到了上尉卡尔波夫的姓名。就是那个剽悍勇敢的侦察员，现在是著名的作家……”

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不仅在我指挥的方面军里战斗过，还在友邻的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里积极地参加过战斗行动，我知道，他受到方面军司令伊万·达尼洛维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器重。”

白俄罗斯战役最后抓获了大量的俘虏。战胜者对这些俘虏表现出了高尚的气度和伟大的人道主义，没有报复，没有侮辱和殴打，而是给他们上了直观的教育课。俘虏们被押解着穿过莫斯科，就是戈培尔曾反复对德国空军强调要将其消灭的莫斯科。

这一切都是按照斯大林本人的指示做的。这一天我在莫斯科，下面我就详细地讲一下当时的情景。

报纸发表了公告：

“莫斯科市民警局局长通知 莫斯科市民警局对公民通知如下：7月17日白俄罗斯第1、第2和第3方面军的红军部队最近抓获的部分德军战俘57600人将路经莫斯科被押往战俘营。

为此，7月17日从上午11时起，对战俘队伍途径的下列路线实行交通管制：列宁格勒公路、高尔基大街、马雅可夫斯基广场、环行路、梅先斯克第一大街、卡兰切夫斯克大街、大卡卢加大街、斯摩棱斯克大街、卡利亚耶夫大街、新斯洛博茨克大街、集体农庄广场、红门广场、库尔斯克站前广场、克里木广场、斯摩棱斯克广场和库德林斯克广场。

公民必须遵守民警维持的秩序，不准对战俘作出任何过激行为。”

那些天我在潜入维捷布斯克时受的伤已痊愈，我出院后在侦察军官进修班边疗养边学习。在押解的俘虏经过莫斯科之前我被叫到司令部，司令部负责人让我从早上开始呆在值班室里，拍摄新闻纪录片的人要来



找我。原来他们已决定将战俘在莫斯科大街上行进这可悲又有教育意义的情景拍摄下来载入历史。这部纪录片拍成了，司令部要求在马雅可夫斯基广场上以战俘为背景来拍摄我。照片上没有写我的名字，因为我那时还在做侦察工作。我只是站在那里（当然是佩戴着勋章高傲地挺着胸），背景是一大群穿绿军服的希特勒匪徒，那一刻他们像是面目模糊不清的幽灵。

德国的将军们步伐凌乱地走在前面。他们什么样的都有，有的骨瘦如柴，有的脑满肠肥，有的圆脸，有的长着鹰钩鼻子。他们的红领章上金色的符号闪闪发光，歪歪扭扭的肩章就像蛋糕上凸起的奶油花，胸前佩戴着各种颜色的绶带。希特勒匪徒们都目不旁视，边走边低声地交谈着。一个矮个子用手帕擦了擦像甜瓜似的长脑袋上毛发硬硬的灰白平头；另一个身体壮实的人，冷漠地看着莫斯科人的脸，好像他看的不是人，而是路边的灌木。

走在将军后面的是排列不整齐的军官队伍。这些人显然在极力表现出一种当了俘虏还不服气的神态。一个身材魁梧的军官，胡子刮得很干净，他凶狠的目光和我的眼光相遇后，迅速挥舞了一下粗大的拳头。我立刻回敬了他：用手指在脖子周围一比划，就像套上了绳索，再往天上一指。就是告诉他说，瞧着吧，只能给你这样的回报！这个法西斯分子几次回过头来，而且还在挥拳头，露出一口抽烟抽黄了的牙，看来是在骂娘。“这个败类，”我在想，“可惜没在 frontline 把你揍死。”

在军官后面行进的是士官和士兵。他们的人数非常多，20人一排，挤满了整个高尔基大街，一批批接连不断地走过。

押解俘虏的押送队是挎着明晃晃的马刀的骑兵，他们之间也有端着枪的步兵。

莫斯科的市民都站在人行道上。人们都沉默不语，脸色阴沉地看着敌人。挤满了人的街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安静，只能听到几万人的脚步声。

我望着德国人，心里在想：他们中间也许会有我和我的侦察兵战友抓的“舌头”吧？他们很可能就在这里。他们还能往哪儿躲呢？

在准备进攻白俄罗斯的时候，我们抓获了7个“舌头”。他们中有几个我好像在敌后遇见过。我在那里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可不是这种垂头丧气的样子，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却以主人自居。在这些战俘队伍中就有我从维捷布斯克返回穿越前线时险些置我于死地的那些人，如今在我眼前某个地方走着的就是那个在暗处自己不明就里用突击步枪向我射击的人。

直到今天，一想到被俘的希特勒匪徒在莫斯科行进的情景，我的眼



前便浮现出一大群像绿霉一样蹒跚而行的人，在他们中间有一个军官，脸刮得净光，齜着黄牙，一副凶相，握着肮脏的骨节粗大而突出的拳头。

不过这种感受是后来出现的，当时我只顾站在摄像机前得意洋洋、十分自豪地摆姿势拍照。还记得我的情绪与观看战俘的莫斯科市民的态度不甚相符。他们都很严肃，而我却充满幸福感。我能活着站在莫斯科，站在马雅可夫斯基广场，胸前佩戴着几天前在克里姆林宫里授予我的金星奖章，怎能不高兴、不感到幸福呢。我不隐瞒，直到今天我还自豪而得意地回忆起和其他官兵一起参与战绩辉煌的“巴格拉季昂”战役……

那么斯大林是如何庆祝这一胜利的呢？华西列夫斯基在他的书中写道：

“我军解放了明斯克之后，斯大林的情绪很好。一天晚上，他邀请一些将领到他的住所去庆祝这一重大事件。谢·米·布琼尼带着手风琴来参加约·维·斯大林的招待会，这为招待会创造了无拘无束的节日气氛。斯大林首先对客人表现出坦诚和友好的态度。干杯，唱歌，还有人跳起舞来。斯大林高兴地观看了跳舞者的表演，并为之加油，然后他同所有人拥抱，甚至还亲吻了几个人。在我军失利时，他饱经忧患，现在他对各方面军事行动的进程都非常满意，不想掩饰自己的感情。”

四 同保加利亚的和平之战

1944年8月23日，斯大林没有过多地解释就对朱可夫说：

“您必须马上飞往乌克兰第3方面军司令部，使这个方面军作好对保加利亚作战的准备。在基什尼奥夫战役中，我们已逼近边界。由于保加利亚政府破坏了它已正式声明的中立立场（尽管我们已不止一次发出警告），继续帮助法西斯德国，而实际上是与它合作，我们不得不向保加利亚宣战。您必须和托尔布欣一起使乌克兰第3方面军的部队作好实施与保加利亚军队作战的准备。您在飞往前线前一定要去见一下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他非常了解情况，无论是总的态势，还是国内的情况，他还可以告诉您保加利亚军队的现状及这个国家游击运动的情况。”

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向朱可夫讲述了下列情况：

“我认为，虽然您将前往乌克兰第3方面军的任务是使部队作好与

保加利亚作战的准备，但可以肯定任何战争都不会发生。保加利亚人民正迫不及待地盼望着红军来帮助他们推翻保加利亚国王的政府，建立人民解放阵线的政权。保加利亚人民不会同苏军作战，相反，他们将按照古老的友好传统，按照斯拉夫的习俗用面包和盐迎接苏军。至于政府的军队，他们也未必敢冒险同强大的红军作战。据我掌握的情况，几乎在保加利亚国王军队的各部队里都有我们的人和我们的地下工作者在进行大量的工作。在山区和森林中有我们大批的游击队，他们也将是你们的有力助手。现在他们也不会袖手旁观，他们会下山来支援你们，支援人民的起义。”

朱可夫感谢季米特洛夫同他进行了非常有益的谈话，尽管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断言说不会发生战斗行动，但朱可夫还是去了总参谋部，了解一旦保加利亚的问题仍不能和平解决，计划将进行哪些战役。

朱可夫做完了这些准备工作后便飞往苏联元帅费·伊·托尔布欣指挥的乌克兰第3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费捷斯季市。铁木辛哥元帅也在方面军司令部，他受托协调乌克兰第2和第3方面军的行动。朱可夫理解，他的特殊任务是执行某种半外交使命。如果说大本营代表铁木辛哥在这里是协调两个方面军的战斗行动，那么朱可夫则是国防委员会的代表。

但局势尚未明朗，朱可夫说道：

“我们是军人，接受了政治领导人的任务后，应当一丝不苟地加以完成。”

因此他请方面军司令向他详细介绍这里的态势。托尔布欣报告说，他指挥着3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空军第17集团军，黑海舰队和多瑙河区舰队也归他指挥。进攻战役拟定的参战兵力为3个集团军，近卫机械化第4和第7军也将保证在西方向上快速推进。

1944年9月5日，苏联政府正式对保加利亚宣战。次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通过电话命令乌克兰第3方面军开始军事行动。

9月8日早上，这是预定开始进攻的时间，朱可夫和方面军司令已在观察所。部队已做好了进攻的准备，炮兵部队也做好了进行炮火准备的工作。然而朱可夫觉得情况有些不大对头。朱可夫在炮队镜里没有看到保加利亚境内有敌军部队。那里来往的只有一些和平居民、马车和汽车，在前沿阵地上根本没有部队。他和托尔布欣商量后决定不用炮火准备，让先遣队向前推进，然后主力部队跟进，因为先遣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下面是第57集团军司令的第一个报告：

“我们正在向前推进，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而在纵深处，保加

利亚军队的一个师在路旁举着旗帜列队欢迎我们，他们还奏着庄严的乐曲。来自其他方向的部队指挥员报告说，那里也出现了类似的场面。到处是保加利亚的军队在列队欢迎我军。”

斯大林指示：立即停止在保加利亚境内继续推进。9月9日21时苏军停止了前进，他们作为卫戍部队驻扎下来。

这大概是双方进行的第一场不流血的战争。斯大林消灭了保加利亚反人民的政府；由于对保加利亚军队如此宽大（保留了他们的武器，不进行任何镇压），保加利亚军队全部投向保加利亚新政府方面。

五 南斯拉夫之结

在红军部队到达南斯拉夫边境之前，在这里活动的有几股对抗势力：德国占领军，与他们作战的由铁托率领的南斯拉夫人民军，还有米哈伊洛维奇领导的由南斯拉夫叛徒组成的塞塔队^①（他们与德国人合作，同铁托的军队作战）。铁托司令部有苏联代表 H. B. 科尔涅耶夫将军和英国代表菲·马克林准将。这两个盟国都试图说服铁托接受他们各自国家的保护。舒巴希奇（英国傀儡）政府装出爱国的样子，但没有实际战斗力。而流亡国外的南斯拉夫国王彼得二世关心的却是恢复君主制，因为英国人，尤其是丘吉尔支持他这样做。

为争取国家摆脱德军占领、获得解放而战的主力是铁托的军队。

希特勒匪徒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决定消灭铁托，为此希特勒进行了经过周密策划的空降战役。在对德瓦尔这座小城进行猛烈轰炸后从滑翔机上空降了一支强大的空降兵，他们经过仔细搜索，在城内没有发现铁托，于是希特勒匪徒奔向一个岩洞，铁托和他的司令部都在那里。铁托本人是这样描述的：

“德国人在寻找我。在那些日子里，德瓦尔的一个裁缝为我缝制了一身元帅服。空降兵们除了这套炸烂了的制服，什么也没有找到。人们表现得非常勇敢，德瓦尔的所有市民都知道我在哪里，而每一个空降兵都有我的照片，他们走到一个又一个市民面前，一边出示照片，一边问：‘铁托在哪里？’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而这一切我们在上面都看到了。除了通过一条山间小溪的河道，无法

^① 1941~1945年间参加南斯拉夫大塞尔维亚民族运动和其他反人民集团的反动组织成员。——译者注

走出岩洞。我们一个担任传令兵的同志，一个非常好的小伙子，想走出来，但立即被打中了头部……我拿起突击步枪想射击，但同志们阻止了我。我看到空降兵在下面抢走了我的吉普车，驾着它急驰而去。”

将近 10 时，铁托决定离开岩洞。他们用吊伞绳编了一条结实的粗绳，拆掉了远处一个房间的地板，铁托和与他一起在岩洞里的人在瀑布的掩蔽下顺着这条绳子滑了下来。

德国人发现了他们，开始扫射。

然而铁托和他的同伴们迅速沿着干枯的河道向山里冲去，离德瓦尔越来越远，这时赶来的达尔马提亚第 1 旅的部队在德瓦尔与空降兵进行了战斗。

法西斯分子组织了对铁托的追捕。爱·卡德尔、亚·兰科维奇以及以 H. B. 科尔涅耶夫为首的苏联军事代表团的成员在波托茨村与铁托会合。

西方盟国代表团成员也到了这里。这些事件的目击者和参加者 H. B. 科尔涅耶夫在 1972 年讲述了如下情况：

“党卫军的讨伐部队一连 10 天追赶我们。白天他们跟踪逼近我们，夜里我们又走远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已失去了对军队的指挥，因为通信联络遭到了破坏，已经 3 天没有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巴里根据地和莫斯科取得联系。情况很危急。”

科尔涅耶夫将军的专用电台已无法使用。莫斯科方面因联系不上也感到很担心。

安东诺夫将军向斯大林报告说：

“南斯拉夫方面没有任何消息。”

“立即查明情况，给铁托以帮助。”斯大林命令说。

科尔涅耶夫终于和莫斯科取得了联系，他报告了铁托和司令部所处的位置，然后按照斯大林的命令立即派出飞机去救援铁托。

飞机驾驶员 A. C. 绍尔尼科夫后来回忆道：“天气阴沉沉的，南斯拉夫的海上和岸边的山上下起了雨，电光闪闪……我们不断地曲折穿行，来回盘旋，但还是没有看到信号。我们确定了云层移动大致的速度和方向，开始等待出现便于观察地面的大‘窗口’。我们盘旋飞行了 30 多分钟，云层开裂时没有发现约定的信号。于是我们非常困难地将这架重型飞机迫降在一处河沟纵横、遍布砾石的陌生场地上。”

过了半个小时，铁托、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成员们以及盟国军事代表团代表出现在临时机场上。A. C. 绍尔尼科夫报告说飞机作好起飞准备，决定载走20个人。其中有约·铁托、爱·卡德尔、亚·兰科维奇、И. 米卢季诺维奇、H. B. 科尔涅耶夫和英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维维安·斯特里特以及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成员。22时，A. C. 绍尔尼科夫驾机飞离库普列斯克的田野，并于6月5日凌晨将这些乘客安全运抵巴里。

约·铁托在巴里停留了3天。6月5日，他在这里会见了菲·马克林。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派驻地中海英美军司令部的军事代表团团长B. 韦列比特已在6月2日与菲·马克林会谈时提出，希望伊·舒巴希奇能在铁托安顿好后去维斯拜访他。约·铁托对菲·马克林重申了这一点，并说“他绝不会反对伊·舒巴希奇”，“如果舒巴希奇能去维斯，他将很高兴与他讨论他感兴趣的问题”。同时他又告知，他在维斯停留的时间要看局势允许他回国而定。6月7日，温·丘吉尔和伊·舒巴希奇致信铁托，表示愿意促成铁托与伊·舒巴希奇的会见。与此同时菲·马克林又一次会见了铁托，向他转交了英美军队地中海战区司令G. 威尔逊请他去卡塞塔（意大利）商谈军事问题的邀请信。

6月6日深夜到7日，约·铁托乘英国“布莱克穆尔号”雷击舰前往维斯岛。铁托在岛上住下来后，通报莫斯科说他已“秘密”转移到维斯，“在另一个解放区没有建好根据地”之前，他就留在这里。

6月20日，斯大林高度评价了救援铁托的飞行员的功绩。A. C. 绍尔尼科夫、B. T. 卡林金、П. H. 亚基莫夫被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而铁托元帅则授予了他们南斯拉夫人民英雄的称号。

斯大林在与当时正在莫斯科的米·吉拉斯谈话时谈到了他对南斯拉夫和盟国的战略。谈话是在孔采沃的别墅里进行的。莫洛托夫参加了谈话。

斯大林首先谈到了铁托的安全问题：

“他应该为自己和最高司令部找一个可靠的地方，要指挥大规模的战斗行动，指挥机构所处的环境必须安静、安全。”

随后，斯大林对莫洛托夫说：

“请立即与盟国达成协议，加紧向南斯拉夫军队提供武器和给养，我们要在他们的巴里基地建立我们的运输机空军基地。”

接着，斯大林对吉拉斯谈了南斯拉夫领导人和西方盟国之间的相互关系：

“你们不要用要建立共产主义国家来吓唬英国人，现在没必要引起他们的不安。丘吉尔希望实行他的路线，就让他希望去好了，你们只管



去做自己的事。”他还劝告说：“为什么你们要在帽子上戴红星呢？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是啊，红星暂时还不需要！”

吉拉斯提出不同意见说：

“我们不能放弃红星，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是在这个标志下战斗的。”

斯大林安慰他说：

“请别以为我们已是英国人的盟友了，你们忘记了丘吉尔是什么人！只不过是在这个阶段为了不让他们对你们做太多坏事，请不要让他们对在你们身上有所收获感到失望。铁托应当同意和舒巴希奇甚至和丘吉尔见面。不要同他们谈分歧，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打算，听听他们想干什么。要同他们达成妥协。”

斯大林如此消息灵通让吉拉斯感到吃惊，铁托与舒巴希奇会晤还在商议中，斯大林就已经知道了，还提出了建议，而这些建议对南斯拉夫人以至与盟国的关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斯大林在去餐厅的时候，在一幅地图前停了下来，地图上苏联的领土涂上了红色：

“他们绝不会容忍这么大的面积涂上红色，绝不会！”

吉拉斯注意到斯大林格勒被蓝色的铅笔圈上了：

“没有苏联的工业化就不可能经受住这场战争。”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发生了争执。”斯大林说。

吃晚饭的时候丘吉尔给斯大林发来一封电报，他通报了明天盟军将在法国登陆的消息。斯大林不无嘲弄地评论这封电报说：

“他们总是受到什么干扰！这次很可能又是雾太大，或者他们突然在法国沿岸发现了几个德国人，于是就不登陆了！再一次像往常那样违背诺言。”

斯大林与吉拉斯分手时请他将一把金马刀转送给铁托：

“这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赠送的。”停了一下，他又补充说：“也是我赠送的。”

吉拉斯在维斯岛上向政治局委员们详细报告了他会见斯大林的情况。正像铁托指出的，斯大林的建议使他更加坚定了在即将与盟国进行的复杂谈判中的立场，顺便说一句，盟国认为，铁托在他们手里对他们非常有利。他们认为，这是利用南斯拉夫领袖的“弱势地位”并迫使他让步的“天赐良机”。

6月15日和16日，铁托和舒巴希奇举行了谈判。铁托按照斯大林的建

议去接近这个英国傀儡，签订了“关于在反对占领者的斗争和重建国家的事业中合作”的协议。



但是铁托对于南斯拉夫最终的国家制度没有做任何承诺，他声明这将取决于人民意愿的自由表达。

正如历史学家J. 埃尔曼所说，到1944年夏天，英国人对南斯拉夫的影响达到了顶点。菲茨罗伊·马克林感到满意的是，在整个南斯拉夫担任军事顾问的英国军官的人数增加了。丘吉尔认为，为了加强影响他必须亲自和铁托会晤。马克林向铁托元帅通报了这种情况，铁托表示同意。

会晤于8月12~13日在那不勒斯举行，铁托在菲·马克林的陪同下乘飞机前往。谈判在首相下榻的别墅里进行。丘吉尔谈了一些军事问题后，开始进入主题，他问道：

“大部分塞尔维亚农民大概都对实行共产主义制度不满意吧？”

铁托回答说：

“我们没有硬要实行这种制度的意向。这一点我已讲过不止一次。”

“我想听听您本人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您能公开确认这一点吗？”

“如果我现在在英军司令部的辖区，有您在场时发表这样的声明，这会让人觉得我是在您的压力下做的。不过如果找到合适的形式，我准备发表这样的声明。”

在同一天，1944年3月12日，丘吉尔向铁托发出一份正式的备忘录，要求“建立由与敌人作战的所有南斯拉夫人参加的统一的南斯拉夫政府，塞尔维亚人民和人民解放运动实现和解”；同时还发表了一个宣言，称不仅要承担不把共产主义强加给南斯拉夫的义务，而且还要承担“不使用该运动的军事力量影响人民对国家未来制度自由表达意愿的”义务；丘吉尔同意铁托会见彼得国王，并最好在南斯拉夫境内。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答应约·铁托向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增加军事供应。

约·铁托同温·丘吉尔会谈达成了如下协议：约·铁托和伊·舒巴希奇一同前往维斯，在这里几天后将同时发表宣言。至于约·铁托同彼得二世国王会见一事，“将予以考虑并在适当的时候进行”。

约·铁托和伊·舒巴希奇于8月14日离开那不勒斯经巴里抵达维斯。他们商定各自的宣言后，分别予以发表：约·铁托8月17日在维斯发表，伊·舒巴希奇8月20日于伦敦发表。约·铁托在宣言中解释说，“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实质上是全民的民族民主运动”，它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与占领者及其走狗进行斗争，建立南斯拉夫民主联邦，而不是建立敌人硬说我们要建立的共产主义”。

英国人似乎如愿以偿，获得了“天赐良机”：铁托受到了西方盟国的影响。但是……在写“但是”之后发生的事情之前，我不是要插叙



往事，而是要“提前说说”80年代的事。

20世纪80年代，我除了写作和履行职务（《新世界》杂志主编、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书记），还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其中包括当选为苏联卢森堡友好协会会长，后来又当选为苏英友好协会副会长，经常为了进行议会间的接触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和最高苏维埃国际关系委员会委员的身份（有时甚至率领苏联代表团）前往英国。

我现在已记不清是在哪里和怎样认识的菲茨罗伊·马克林了（就是上面说到的那一位）。

他年事已高，不再从事积极的外交活动（我想还有情报工作）。您得承认，当年曾站在对立面的两个侦察员有可以谈论的话题。这也是写作上走运，命运就安排了这样十分有意思的会面。

我和菲茨罗伊·马克林不仅谈过多次，还成了朋友。现在，我们两个已上了年纪的职业情报人员，彼此不再搞什么圈套，也不再掌握任何国家机密，我们的友谊是真正的友谊，双方都感到很愉快。马克林和妻子维多利亚到过我在佩列杰尔基诺的别墅作客，而我同妻子1987年有一次在他在苏格兰的城堡中呆了三天。当时我被授予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名誉文学博士的称号，马克林在隆重的学位授予典礼之后邀请我和妻子到他家做客，我们一起过的复活节。他的妻子维多利亚是天主教徒，马克林则信仰英格兰圣公会，上午，大家分头去了各自的教堂，我妻子叶夫根尼娅与维多利亚在一起，我同马克林在一起。晚上大家聚在一起过节。维多利亚是一个很善于交际、喜欢热闹的女人，马克林常常戏称她“十分贝太太”。

马克林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住在一个古老的三层城堡里。战前，他曾在伊朗、阿富汗、埃及工作，1937年到1939年间，他在英国驻莫斯科使馆工作，出席了对“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审判。他的俄语讲得非常好。

早上，我们一起去散步，我看见一个精心照料的非常好的足球场，一群孩子在上面踢球。

“多么好的场地！”我赞叹道。

“这是我的运动场，我允许当地的孩子在这里玩。”

“城堡周围的花园和树林也是你的吗？”

“不，弗拉基米尔，不仅是这些，你看得见远处的山吗？到那些山脚下都是我的土地。”

不过我这段插叙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要说明为什么在上面那段文字结束时要加一个“但是……”。

这是因为，我在与马克林交谈时听到了下面的内容：

“当时我们，特别是丘吉尔认为，铁托已接受我们的影响，我和铁托来到维斯岛后的第二天，突然发现铁托元帅不在他的司令部里。他失踪了！谁都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

虽说已过去了许多年，马克林在讲述这段往事的时候仍然非常激动：

“弗拉基米尔，您明白我的处境，我是专门被派来照管铁托元帅的，可是他却突然不见了！也许他被德国人抓走了？这样的事像斯科尔采涅这样的专家做起来轻而易举。我当时简直绝望了！铁托从9月19日离开，直到9月28日才露面。但是在他出现之后我没有能立即同他谈话。我们终于见面了，我问他：‘发生什么事了？’他回答说：‘出于军事和国务的考虑我才离岛。’当我提及我们已达成的协议，开始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对他施加压力的时候，铁托冷冷地解释道：‘我们是独立的国家，我作为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主席和最高统帅，我的行为和活动是为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不受任何人的约束。’这对我，对整个英国代表团，特别是对丘吉尔是兜头一盆冷水。”

马克林送我一部1950年写就的回忆录《东方的道路》，并作了亲切的题词。下面我就从中摘引一段与本章结尾部分有关的内容：

“我下决心让铁托知道他秘密离开维斯岛惹得我们很恼火……我告诉铁托说，丘吉尔因为他离开而很生气……他没有告诉我们他要动身便悄悄离去的做法，危害很大……铁托回答说：‘前不久丘吉尔前往魁北克会见罗斯福总统，这个情况我也是在他回来之后才知道的。然而我一点都不生气。’”

如今，好多年过去了，马克林面带微笑地回忆起这段往事，但不难想像，1944年秋他的处境是如何窘困。他还向我讲述了这方面的情况。

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呢？铁托请求斯大林会见他，帮助他分析复杂的军事和政治局势。斯大林派专机来接铁托。

要了解斯大林和铁托都说了些什么，我看最好还是看看铁托自己是怎么讲的：

“当时我是生平第一次与斯大林会面，进行交谈。在此之前我



都是从远处看到他，如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这一回我见了他有几次，两三次，都是在他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有两次他请我到 he 家里用晚餐。我们讨论的首要问题之一，是我们两国军队联合作战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是在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谈的。我请求他派一个坦克师帮助我们部队解放贝尔格莱德……斯大林同意了 my 请求，他说：‘瓦尔特（在莫斯科大家都这样称呼我），我不是给您派一个坦克师，而是一个坦克军！’”

铁托继续讲道：

“接着我们又商定，通过共同努力解放南斯拉夫的哪一部分，确定了他们军队和我们军队的行动地域以及他们部队在我国驻扎多长时间。我们约定，他们将派出一个坦克军帮助解放贝尔格莱德，贝尔格莱德解放后，他们的部队撤离南斯拉夫，以便在进攻布达佩斯的时候加强他们左翼的力量。我们就此交换了意见后，又为报刊起草了一个公报，对上述协议作了更加明确的说明……”

总的来说，这第一次的见面非常冷淡。我想主要是因为我在战争时期发出的几份电报，特别是有一封电报的开头有这样一句话：‘如果你们不能帮助我们，那最好不要妨碍我们！’这一点季米特洛夫也证实了，因为我第一次同斯大林谈话后刚好马上遇见了他。季米特洛夫对我说：‘瓦尔特呀，瓦尔特，主人对您的这封电报非常恼火……他气得直用脚去跺地板。’季米特洛夫这是想让我知道，实际上他在斯大林面前已替我说了话。

第一次与斯大林会面的气氛很紧张，几乎在所有讨论的问题上都发生了不同形式的争论。

我不习惯这样谈话，所以出现了一些很尴尬的场面。例如，斯大林对我说：‘瓦尔特，请您注意，塞尔维亚的资产阶级是很强大的！’我平静地回答他说：‘斯大林同志，我不同意您的看法。塞尔维亚的资产阶级是很弱的。’斯大林不再作声，脸色阴沉起来，而在座的其他人——莫洛托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贝利亚都惊恐地注视着这一切。斯大林开始询问南斯拉夫某些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的情况，想知道他们在哪里，在做什么，我回答说：‘这是个卑鄙的家伙，叛徒，同德国人合作。’斯大林又问到了几个人。我都是这样回答的。于是斯大林大发雷霆说：‘瓦尔特，到您这里全都成了卑鄙的家伙！’而我回答他说：‘对，斯大林同志，每个出卖自己祖国的人都是卑鄙的家伙。’斯大林的脸色又阴沉起来，而



马林科夫、日丹诺夫等人都在皱着眉头看我。

谈话在非常紧张的气氛中继续进行。斯大林开始说服我要让国王彼得恢复王位。我的血直往头上涌，他怎么能劝我做这种事！我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回答他说，这是不可能的，这会激起我国人民的反抗，在南斯拉夫，国王是背信弃义的体现，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抛下人民逃跑了，卡拉乔治维奇王朝腐化堕落、搞政治恐怖，遭到人民的痛恨。

斯大林沉默了一会说：‘不是永远恢复王位。是暂时的，以后找适当的时机再把他干掉……’

斯大林请我到他的别墅吃晚饭。一位系着白围裙的妇女把盛装各种美味食品的带盖容器放在餐桌上，每个人自助用餐。在这里大家不断地举杯祝酒，一直到深夜。我不习惯饮酒，这对我来说是受罪。我找个机会出来了，感到很不舒服……”

从这段叙述可以看出，这次会见很冷淡，不仅由于斯大林的过错，从铁托讲述的语气来看，他本人对斯大林，对发生的一切，也不友好。

不过斯大林尽管态度冷淡，却给予南斯拉夫很大的支援。随着红军前出至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的边境，苏联建立了转运站，通过这些转运站向铁托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给养。在8月到10月期间组建并移交了一个配备65辆T-34坦克和500名坦克兵的坦克旅，组建并移交了几个歼击和强击航空兵团以及500名飞行员和机械师。

1944年9月22日，苏联向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统帅部移交了近卫强击航空兵第10师和歼击航空兵第263师以及可装备12个步兵师和2个空军师的武器装备；为了改进铁托的司令部和他部队的通信联络，苏联为他们培训80名南斯拉夫无线电兵并送去了新的无线电台；苏联还为南斯拉夫建立和装备了7个后送医院和4个野战医院；苏联尽管自己有困难，仍向南斯拉夫居民提供粮食援助5万吨，修复铁路和修建跨越贝尔格莱德近郊多瑙河的桥梁。这一切（还有其他许多方面）都是在斯大林指挥其他方面军进行艰苦战斗的过程中完成的。

1944年10月5日，乌克兰第3方面军司令托布尔欣元帅向斯大林报告了与南斯拉夫统帅部共同拟订的贝尔格莱德战役计划。斯大林批准了这个计划。拟订参战部队为乌克兰第3方面军的第57集团军、坦克机械化第4军、空军第17集团军，南斯拉夫军队的5个军和保加利亚3个集团军。

10月22日，南斯拉夫首都获得解放。苏军统帅部让南斯拉夫部队首先开进贝尔格莱德。



铁托向斯大林发了致谢电。

贝尔格莱德成了中心，南斯拉夫最高政府机关和军事机关都设在这里，铁托的威望得到很大提高。

丘吉尔害怕“巴尔干布尔什维克化”。用他的话说，红军到达贝尔格莱德，然后进军布达佩斯，这“对中欧和南欧来说有着最可怕的政治后果”。

丘吉尔企图阻止他十分害怕的共产主义向西方推进的进程——最好能召开三国首脑会议来应对这种局面。但由于组织这样的会晤需要时间，而又不能等待下去，丘吉尔决定立即去莫斯科，同斯大林推心置腹地谈谈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

为防止发生意外，丘吉尔将他的莫斯科之行预先通知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则告知斯大林说：“英国首相没有被授权代表美国说话，我们三人，只有我们三人一起才能就未达成协议的问题找到解决的办法。”

斯大林回答罗斯福说：“我以为丘吉尔先生来莫斯科是同您在魁北克商量好了的，然而我的这个推测看来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我不知道丘吉尔先生和艾登先生来莫斯科要解决什么问题，对此他们二人至今谁都没有告诉过我。丘吉尔先生在写给我的信中表示，如果我方不反对的话，他希望能来莫斯科，我当然回答说同意他来，这就是关于丘吉尔来莫斯科的情况。我等和丘吉尔先生见面后把事情搞清楚，再向您通报。”

斯大林和丘吉尔的首次会晤是在10月9日22时。会晤一开始丘吉尔就提到了巴尔干问题并提出“划分巴尔干势力范围”的建议。他表示：“让我们来协调我们在巴尔干的事务。您的军队驻守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那里也有我们的利益，有我们的公使馆和代办机构，我们不要因鸡毛蒜皮的小事闹僵了。至于英国和俄国，您是否同意你们在罗马尼亚占有90%的优势地位，而我们在希腊占有90%的优势地位，在南斯拉夫我们各占一半？”

丘吉尔趁翻译在翻译他的话时，拿起半页纸写道：

罗马尼亚

俄国 —— 90%

其他国家 —— 10%

希腊

英国（同美国商妥） —— 90%

俄国 —— 10%

南斯拉夫 —— 50%/50%

匈牙利 —— 50%/50%

保加利亚

俄国 —— 75%

其他国家 —— 25%

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把这张纸片交给了当时已经听完翻译的斯大林。这时出现了一个不长的停顿。然后他拿起蓝铅笔在纸上划了一个大钩，又把纸片还给了我。解决这个问题所需要的时间并不比写这个问题的时间长。

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用铅笔写的那张纸片放在了桌子中间。最后我说道：‘对于这些对几百万人生死攸关的大问题，我们就这样随便决定了，这未免有点不是味儿？把它烧掉吧。’‘不，您把它留着吧。’斯大林说。”

为斯大林和温·丘吉尔这次会晤作翻译的瓦·米·别列日科夫是这样复述斯大林的回答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我把它烧掉。这本来是您的纸，是您带来的，还是您留着吧。”

可见，斯大林并没有去考虑丘吉尔提出的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蓝色的钩不是签名，它可能就是表示“已阅”的意思，但丘吉尔在少数人的圈子里却将此看做是斯大林同意“50/50”的交易。这个场面有点像希特勒建议划分欧洲和亚洲势力范围。当时斯大林不同意这种划分。但后来还是签署了一个关于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比萨拉比亚和波兰的一部分划分给苏联的秘密议定书。斯大林和丘吉尔对话后，无论是口头上，还是书面上都没有同意他提出的“50/50”的方案。在1944年10月20日发表的斯大林与丘吉尔会晤的公报中一致声明：“南斯拉夫人民战后自己解决本国未来制度问题的权利，当然是不可剥夺的。”

这首先符合斯大林同铁托所达成的协议。

但尽管斯大林从各方面给予支持，铁托仍然表现出某种怨天尤人、刚愎自用的毛病。这位元帅身边暗藏的敌人便抓住这一点不放，火上浇油。例如，他们把苏联军官做的某些丑行报告给铁托，让他掀起轩然大波。



1944年10月29日铁托亲自就这个问题直接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铁托在说明了问题的实质后，解释道：“

我军和我国人民为红军个别官兵的种种劣迹感到难过，因为他们热爱红军，把它当作理想……我担心，形形色色的敌人会利用这一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即反对苏联和我们的人民解放运动。”

他强调说：

“重要的是从政治上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我们认为，红军司令部不应当干涉南斯拉夫的内政问题。”

铁托在信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我和我的同志们认为，我们的首要责任是尽一切努力不让任何势力破坏我国各族人民对苏联的热爱和信任。”

斯大林没过多久便写了回信。他在1944年10月31日回复约·铁托的信中说道：

“我理解您在解放贝尔格莱德后的困难处境。您应该清楚，苏联政府尽管牺牲巨大，伤亡惨重，还是尽一切可能来帮助你们。但使我感到吃惊的是，你们竟然把红军中个别官兵的个别事件和过失归结并扩大成整个红军的行为。帮助你们赶走德国人、在同德国侵略者的战斗中流血的军队是不能忍受这样的侮辱的。不难理解，家中难免有丑儿，但因为有一个丑儿全家人都要受到凌辱，这岂不是咄咄怪事。如果红军战士们知道，吉拉斯同志和那些不制止他的人都认为英国军官在道德方面要好于苏联军官，那他们会因为这种不公正的侮辱而大叫起来。”

毫无疑问，这种书信往来使铁托感到不快，因此他没有按照事先的约定与舒巴希奇一起去莫斯科见斯大林。对此最高统帅有充分的理由感到生气。

斯大林在他多年的各方面的实际活动中解开了很多复杂的结子，但是同南斯拉夫的结子直到战争行将结束时也未能解开，反而越结越紧。不过我们将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在后面再来谈这个问题。

六 斯大林为什么饶了希特勒一命

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战争中（甚至在和平时期），敌对双方都试图消灭对方的国家领导人和统帅，其目的在于使对方国家和军队群龙无首，在敌人营垒中制造恐慌。

这种行动往往是绝对保密的，是经过国家（或军队）领导人的同意或按照他们的指示进行的，执行者是秘密部门最可靠的工作人员。

伟大的卫国战争也不例外：斯大林和希特勒相互追杀。不要因此责备他们，在战争中，当需要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去争取胜利的时候，采用这些方法是符合逻辑的，是很正常的。

第一次策划暗杀希特勒早在1942年，当时侦察机关有充分根据地推测，元首像拿破仑一样，在军队占领莫斯科后肯定会来到我们的首都。有消息说，德军要在红场举行阅兵式，甚至拟定了参加阅兵部队的名单，印好了请帖和通行证。

于是我们的侦察员已准备将在这里向元首送上一份意外的礼物。他们成立了专门行动小组，制定了多个行动方案。

但是，希特勒没有拿下莫斯科。

另一次暗杀希特勒的尝试也是在1942年，当时已了解到希特勒去了文尼察，这里专门为他修建了野战大本营“韦尔沃尔夫”（“百变金刚”）。希特勒在这个司令部里呆了很长时间，从4月到10月。

当时委派在德国人后方的一个破坏行动队队长，即经验丰富又有才干的侦察员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后来成为了苏联英雄）去实施这次暗杀，但没有得手。

最接近成功的是一次经斯大林同意由有经验的肃反工作人员苏多普拉托夫和伊林组织的复杂的、像下棋那样要走许多步的行动。

前面我已经讲了我认识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而我对国家安全委员维克多·伊林更熟悉，他在从克格勃退役后，担任莫斯科作家协会的组织书记20多年（1956~1977年，直到退休），即便是退休了，他仍同作家协会保持联系（1990年去世）。而大家都知道，我是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书记（1986~1991年），不过在我任书记一职之前，当1970年我要从塔什干调到莫斯科的时候，我经常同伊林见面：他作为组织书记接待我进行登记，安排住所和其他事情，应该承认，他对我这个老侦察员十分关照。后来我们因作协的事务经常打交道，或者在一起就餐、谈话。

我写这些仅仅是因为想再次指出我在写作本书时极力想得到通常所



说的第一手信息和事实。

维克多·伊林正是参与策划暗杀希特勒的人员之一。行动计划是这样的：找到接近希特勒的途径——通过他周围的人进行。第一个环节是苏联著名女演员布卢门塔尔-塔马里娜的儿子弗谢沃洛德。他也是一名演员，虽然没有他母亲那样的天资，但相当自负。他看来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器重，因此投向德国人，同他们合作，在广播电台对红军战士进行反苏宣传。谢沃洛德·布卢门塔尔-塔马林娶因纳·拉希利娜为妻，而她的弟弟列夫·拉希林又娶演员奥古斯塔·米克拉舍夫斯卡娅为妻，她有一个已经成年了的儿子，叫伊戈尔。他在部队服过役，曾经是列宁格勒军区拳击冠军。

伊林产生了一个冒险的、但是非常可行的想法——准备对伊戈尔培训后把他派到德国去，就当做侄子去投奔姑父弗谢沃洛德·布卢门塔尔-塔马林，而弗谢沃洛德认识他这个侄子，定会把他作为亲属收留。然后伊戈尔再利用其他接近希特勒的渠道。

伊林用了半年的时间训练伊戈尔去完成这项责任重大的任务，之后伊戈尔“穿越了”前线。到了那边后，他说他有亲戚并表示愿意像他姑父一样同德国人合作。德国人当然不相信他，把他视为派来的间谍。但是从另一方面考虑，他的姑父是自己人，是可靠的，而为什么这个小伙子真的不想过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呢？

他们对他进行了非常残酷的严格考验，用鞭子抽打，用美食引诱，甚至要把他拉出去枪毙，但伊戈尔挺住了。最后他们让他去见他的姑父布卢门塔尔-塔马林和姑姑因纳，他们待他很好，伊戈尔很快就融入了新的生活。他拜访了“东方委员会”，同弗拉索夫分子交往。特别是拳击帮助了他，伊戈尔在拳击场上胜了几次，德国民族为之骄傲的世界拳击冠军马克斯·施莱林格很赏识伊戈尔，并把自己亲笔签名的照片送给他。这个事实就说明相信他并承认他是自己人。

总之，伊戈尔·米克拉舍夫斯基稳稳地取得了合法地位，尔后他便去找伊林提供给他地址即接近希特勒的渠道，前面这样复杂的连环计就是为希特勒设计的。在这个地方居住着世界著名的女演员、影星奥莉加·契诃娃，她是希特勒、戈林、戈培尔等“第三帝国”名流喜爱的演员。1921年她来到德国，在这里走红。于是“小亲戚”伊戈尔便光临了她的住所。

关于奥莉加·契诃娃是否是我们侦察机关的工作人员，有不同的说法。但我认为，对这个问题不可能有另外的看法：国家安全部向伊戈尔提供了她的地址，而她没有出卖伊戈尔，还试图帮助他，这些事实本身就说明问题。

不过说到这里我不得不中断有关策划暗杀希特勒的惊险情节的叙述，因为斯大林本人制止了这一暗杀进程。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伊戈尔定期通过“邮箱”报告他的生活及接近“目标”的进展情况。当他似乎走到最后一步的时候，已经到了1943年，肃反工作人员决定向斯大林报告，说既定目标有可能实现。

斯大林在孔采沃别墅接见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和苏多普拉多夫。他听取了他们的报告后，简短地说道：

“不必再做了。”

苏多普拉多夫说他对此大惑不解：为什么斯大林改变了他原先批准的行动呢？不过他知道不该向最高统帅提出这样的问题，尤其是涉及这种“微妙”事情的问题。

为了对付万一出现的需要，伊戈尔的工作和实施决定性打击的准备工作继续进行。1944年肃反工作人员又提起了这件事，但斯大林还是说：

“不要干掉希特勒。”

这一次梅尔库洛夫鼓足了勇气问道：

“为什么？”

斯大林解释说：

“为了彻底战败德国我们需要希特勒。只要他活着，他就不会单独同西方签订协议；而只要希特勒掌权，美国和英国就不可能同他搞交易。但如果希特勒不在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戈林或巴本可能上台，西方大国就可能同他们达成协议，而这对我们不利。我们即将彻底战胜德国，不要动希特勒。”

斯大林正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饶了希特勒一命。伊戈尔·米克拉舍夫斯基由法国安全回到祖国，被授予红旗勋章。战后奥莉加·契诃娃到了莫斯科，写了一部回忆录《我毫无隐瞒》。她很长寿，生于1887年，1980年去世。

而这个极其危险的行动的组织者之一维克多·伊林的命运同苏多普拉多夫一样，非常悲惨。1943年他不知为什么得罪了苏军“除奸部”的头头阿巴库莫夫，于是阿巴库莫夫把国家安全委员伊林关押在卢比扬卡的地下室里，他在这里从1943年呆到1947年，此后又在监狱里度过了5年。1951年政府突然要他交代阿巴库莫夫叛国活动的证据，并告诉他说阿巴库莫夫已被逮捕。伊林无法相信这一切，他认为这是反间计并拒绝谈阿巴库莫夫的事。这时侦查员把伊林带到监狱楼道一间屋子的门前，让他往“监视孔”里看。大惑不解的伊林看见阿巴库莫夫被关押在单人囚室里。



伊林还是受到了审判，被处以9年监禁，他服满了刑期。获释后伊林住在梁赞，当了一名装卸工。直到1956年人们又想起了他。早年他在莫斯科工作，1933年起任内务人民委员部政治保密局第三处处长，主管创作知识分子的工作。正像常言所说，他无所不知，无人不识，中央不可能有比他更合适的莫斯科作家协会（这里需要有自己的耳目）组织书记一职的人选。伊林在历尽坎坷后开始在作家协会工作。他在同我的谈话中讲述了他从前工作中遇到的一些趣事。

生活中常会发生一些令人感到惊讶的意外事件，我这样感叹，不仅仅为上面所写的那件事，还为下面我要讲述的这件事。

正是无巧不成书：当斯大林想干掉希特勒、后来又出于战略上的考虑饶他一命的时候，希特勒也下令干掉斯大林！

德国人挑选了前苏联军官，一个名叫彼得·塔夫林的连长来完成这次行动。他还在应征入伍前，就涉嫌触犯刑律（偷了公家的钱去赌并输光了）而隐姓埋名，躲了起来。于是在前线他决定投靠德国人，以免被抓（“除奸部”的工作人员已经发现了他的踪迹）。

塔夫林在俄罗斯解放军中很受重视，得到了赏识。他进入阿伯韦尔间谍学校学习。阿伯韦尔也看中了这个机灵、勇敢的学员，于是就挑选了他。他同意去暗杀斯大林。

于是开始在侦察和破坏活动特别行动队中对塔夫林进行单独的专门训练，由队长奥托·克劳斯亲自领导。非常有经验又屡屡得手的希特勒侦察员斯科尔采涅多次对塔夫林给予指导。

他们还还为塔夫林和他的妻子、无线电报务员利季娅（她也是为这次任务被挑选上的）虚构了个人经历：塔夫林是“除奸部”少校，苏联英雄（这样的证明很容易取得合法身份），身负重伤后正在休养（德国医生在他的身上搞了几处真的新伤疤）。在德国间谍（一个在国防人民委员部干部管理局工作，另一个在预备部队司令部任职）的帮助下，他合法地呆在莫斯科。无论这些间谍还是“俄罗斯军官联盟”都会帮助塔夫林混进斯大林将出席的重大会议或活动，塔夫林将利用这些场合用有毒的子弹搞暗杀，只要被这种子弹打中，就必死无疑。另一个方案是在大街上暗中等待斯大林的轿车出现，用专门设计的装有威力巨大的小型榴弹的掷弹筒干掉斯大林。

1944年9月5日，少校彼得·塔夫林（工作证上记载是第39集团军“除奸部”副部长）和特别处少尉利季娅·希洛娃乘专机飞往斯摩棱斯克州。飞机准备降落时发生了意外，飞机被我们的高射炮兵击中，不得不实行迫降。塔夫林和希洛娃乘坐摩托车逃离了事故现场。但当地居民发现了他们，于是打电话报告了内务人民委员部。这一对逃跑者在

第一个村镇卡尔马诺沃被当地一个部门的处长韦特罗夫发现并抓获。

在逮捕这对夫妇时发现了7枝手枪、2枝特制步枪、微型掷弹筒及弹药。

塔夫林当即承认了所有的一切，并说他同意与德国人做交易，为的是能够回来向祖国请罪。

这似乎是真话，因为在逮捕他时他尽管有这么多武器，却没有反抗，并很高兴地同意改换门庭。于是同德国人做了一个代号叫“雾”的无线电游戏，希洛娃定期发报联络，散布“烟幕”，于是派来支援塔夫林的德国间谍和一批破坏者——暴露。游戏一直持续到1945年4月9日，阿勃韦尔一直在等待塔夫林的佳音，没有怀疑他早就暴露。

希特勒对斯大林的追杀就这样收场了。

在和平时期，直到1952年，我们的反间谍工作人员始终在等待幸存下来的德国间谍会同塔夫林联系。但再也没有人出现过。

鉴于这种情况已不再需要塔夫林和希洛娃这对德国走狗了，于是便把他们枪毙了。本可以考虑一下他们真心实意的悔过和提供的帮助，但是侦察机关和反间谍机关的那些不成文的法规是无情的，以至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驳回了赦免的申请：竟然想杀掉斯大林，真是罪大恶极！

七 华沙起义

新闻局消息：

“……近日国外报刊援引波兰流亡政府的报刊和电台，纷纷报道了根据在伦敦的波兰流亡者的命令从8月1日开始并至今仍在继续的华沙起义和战斗的有关消息。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的报刊和电台同时还提到，华沙的起义者可能同苏联的统帅部取得了联系，但统帅部没有向他们提供必要的援助。

塔斯社授权声明，国外报刊的这些论调和说法要么是出于误会，要么是蓄意中伤苏联统帅部。塔斯社获悉，对华沙事件负有责任的伦敦波兰人士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及时通报苏军统帅部并协调华沙的行动。因此华沙事件完全要由侨居伦敦的波兰人士负责……”

斯大林委派朱可夫就地查明那里发生的情况，弄清后报告能为帮助华沙起义者做些什么。

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遵照最高统帅的命令，曾给布尔-科马罗夫斯基派去两名伞兵军官，以便取得联系和协调行动，但他却不



愿接待他们。”

谈到这个问题，我不仅可以利用第一手材料，还可以利用朱可夫说的那项任务的执行者本人的讲述。因为朱可夫提到的一个军官就是伊万·科洛斯，当时是大尉，他是我的老朋友、在侦察机关工作的战友，现在还住在莫斯科。就在前不久我还和他以及其他同志一起“喝酒祝贺”终于在胜利日50周年纪念日把这个来得太迟的俄罗斯英雄的崇高称号授予了他。

科洛斯不止一次地向我讲述了这次艰难而极其重大的任务。顺便说一下，他写了《完成中央的任务》一书。科洛斯是一名有经验的侦察员，整个战争期间他都在侦察机关工作，在这本书中他叙述了他完成的许多任务，其中包括方面军司令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亲自给他下达的特殊任务。

我拨通了伊万·科洛斯的电话，对他说：

“我想利用一下你讲述的关于华沙起义和你如何完成方面军司令交办的任务的内容。”

“好吧，谢谢你没有把我忘掉。讲吧，讲吧，让大家，特别是让年轻人都知道，我们的胜利来之不易。”

我们还谈到了与下面的叙述无关的一些事情，然后我挂上了电话。科洛斯在他的书中这样写道：

“在维捷布斯克和博布鲁伊斯克地区发起的总战役的最初阶段，应当在布格河一线结束。迅速歼灭在白俄罗斯境内的敌人使得我们的司令部有可能制定下一步渡过布格河和解放卢布林的作战计划。这已经是夏季战役的最后阶段，今后面临的任务是重新集中兵力、缩短过长的交通线。”

我想提醒读者的是，科洛斯谈到的最初阶段正好与我在维捷布斯克执行的任务有关，当时我带来了所谓的“熊壁垒”的筑垒工事的照片。因此，正像科洛斯所说的，这个阶段对我来说正在结束，而他却要为一个新的大战役去执行任务。巧的是科洛斯遇到的事件同我在维捷布斯克遇上的事件很相似。他被急速召到司令部。下面我引用科洛斯本人的一段话：

“在司令的办公室有罗科索夫斯基和军事委员会委员捷列金中将。罗科索夫斯基非常热情地欢迎我，向我问候，请我坐下并问道：‘您知道华沙起义的事吗？’我回答说知道。然后，他注视着

我的眼睛问道：

‘您是否愿意去执行一项困难的任务？’

‘是的！’

‘是这样。我们将用飞机为华沙的起义者运送药品、武器和粮食，但不知道这些物资会落到谁的手里。因此，委派您明天乘飞机在被包围的华沙跳伞着陆，弄清这座城市的情况，同起义司令部取得联系，然后通过无线电向我们报告那里的局势，报告是希特勒什么部队在华沙地区行动。同您一起飞的还有无线电报务员，您的老朋友德米特里·斯坚科。’

我站了起来，说实在的，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已经做好了执行委派给我任务的准备。司令握了握我的手，非常亲切地说：

‘祝您胜利归来！’”

为完成司令指派的任务，科洛斯和无线电报务员季莫在深夜进行了低空跳伞。他们乘坐两架叫作“玉米机”^①的飞机，因为每一架只能携带一名搭乘者。由于是低空跳伞，当科洛斯打开降落伞时，已经快要着陆了，因此，他重重地摔到了地上。其实，他并没有摔到地上，而是掉在了废墟上，掉在一堆砖头和某个建筑物的残垣断壁上。他摔得很重，失去了知觉。后来才知道，他的手受了伤，得了轻微脑震荡。起义者找到了他，非常幸运的是，他们是波兰人民军战士：他们不是受伦敦的旨意行事的，而是同我们合作的。这支部队是由塞恩克少校领导的，后来科洛斯就同他们一起相互配合行动。至于瓦尼亚·科洛斯在执行任务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我就不再转述了，只强调一点：他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他做的甚至比委派他的还多。他通过无线电和司令部保持经常联系，向我们的司令部报告华沙发生的情况，协调我们的部队和起义者的行动。

还是看看伊万·科洛斯本人是怎么说的：

“同伦敦代表领导人见面可不那么容易。但由于我的执著，还是达到了目的。在一个指定的日子，先是布尔-科马罗夫斯基的副手蒙特尔将军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当我和他交谈时，门打开了，两名身穿便服的人由一名副官陪同走进了办公室。蒙特尔将军站了起来，我们也跟着站了起来。副官请进来的人在两把圈椅里坐下。他们和我默默地互相点头示意。

①：苏联卫国战争中使用的—种轻型夜袭低飞教练机。——译者注

‘现在我们听您讲。’蒙特尔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

我简短地讲述了我们要解放华沙的想法。

‘得等一等再答复您，’蒙特尔说，‘我有责任提醒您，苏联同居住在卢布林的一伙冒名的人保持着某种可疑的联系。这引起了很多人的警觉。’

‘不知道将军先生说的是哪些人，游击队员，还有很多国家军军官对苏联就像对待其他盟国一样，非常信任。现在我们谈的是起义者、苏联军队和波兰军队共同努力解放华沙的事。’

一个带眼镜的人生气地打断了我的话（他就是布尔-科马罗夫斯基）：

‘除了在这里作战的，不存在任何波兰军队！’

所有在场的人都不吭声了。最后蒙特尔将军说道：

‘我看就谈到这儿吧。请稍等。’

除了副官外，所有的人都走出了房间。过了一会儿蒙特尔回来了，他说：

‘近几天会给您最后的答复。’

但是这‘最后的答复’始终没有兑现，伦敦的傀儡们继续实行分裂路线。不久他们便接受了希特勒匪徒向他们提出的投降条件。所有起义者和游击队员自愿放下武器，希特勒匪徒把他们关进普鲁什科夫集中营（华沙附近），而为布尔-科马罗夫斯基提供了飞机，他先是飞往瑞士，后来又去了伦敦。”

共产党员领导的起义者和游击队继续抵抗，直到最后，伊万·科洛斯和他们一起走完了这段可歌可泣的历程。

朱可夫弄清了所发生的一切，在研究了这里复杂的局势后写下了他自己的感受：“我不理解这次使我军精疲力竭的进攻的战役目的。康·康·罗科索夫斯基同意我的意见，但最高统帅却要求第47集团军在莫德林—华沙地段上前出至维斯瓦河，并扩大纳雷夫河的登陆场。”

经过一段时间，朱可夫再次确信，我军经过艰苦而且屡遭失利的战斗后兵力损失严重，却没有取得任何战绩，便给斯大林打电话说：

“请您允许停止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地段上的进攻战斗，这种战斗是毫无希望的。请您命令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右翼部队和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的左翼部队转入防御，以便使它们得到休整和补充，哪怕是稍事休息也好。”

然而斯大林对态势的了解比在前线的朱可夫要全面。因为许多西方报纸和电台，甚至我们的盟国围绕着华沙起义失败议论纷纷，指责苏联



统帅部态度消极，说什么它不但不能支援起义者，反而考虑到这次起义是由伦敦流亡政府发动的，故意不采取积极的进攻行动，让这次起义遭到希特勒匪徒的镇压。他们实际上是指责最高统帅部和斯大林本人背信弃义，因此，斯大林被搞得心神不安，要求朱可夫继续进攻，仍然向起义者提供帮助，当朱可夫相当有说服力地（不止一次）报告说不能再继续进攻的时候，斯大林大发雷霆，他知道通过电话和朱可夫商量不会有结果，于是在放下话筒前命令说：

“明天您同罗科索夫斯基一起飞回大本营。我们当面谈。”

在莫斯科接见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的不是斯大林一个人，在他的办公室里还有安东诺夫、莫洛托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斯大林非常冷淡地同元帅们打了招呼，便说道：

“好，你们汇报吧。”

朱可夫摊开了地图，开始讲述态势和他对事态的看法。

我认为，在这里该引用朱可夫的话，因为这些话反映了他对事态发展的感受：

“这时我发现斯大林焦躁不安，他一会儿走到地图跟前，一会儿又走开，过一会又走过来，忽而盯着我看，忽而又盯着地图看，忽而又盯着康·康·罗科索夫斯基看，他甚至把烟斗搁在了一旁——当他开始失去冷静，对某件事不满意的时候经常这样做。

‘朱可夫同志，’维·米·莫洛托夫打断我的话说，‘当精疲力竭的敌人已无法阻挡我军攻击的时候，您却建议停止进攻，您的建议合理吗？’

‘敌人已经建立起防御，调来了必要的预备队，敌人现在正在顺利地击退我军的冲击，而我军却在遭受毫无意义的伤亡。’

‘朱可夫认为我们大家都想入非非，不了解前线的情况。’贝利亚挖苦地冷笑一声，插话说。

‘您支持朱可夫的看法吗？’斯大林转向康·康·罗科索夫斯基问道。

‘是的，我认为在长期紧张战斗后，应该给部队以休整时间。’

‘我认为，敌人对休整时间会比你们利用得更好，’最高统帅说，‘如果派空军支援第47集团军，并用坦克和大炮予以加强的话，它能不能在莫德林和华沙之间前出至维斯瓦河呢？’

‘很难说，斯大林同志，’康·康·罗科索夫斯基答道，‘敌人同样可以加强这个方向。’

‘您是怎么想的，朱可夫同志？’



‘我认为，这种进攻除了伤亡，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从战役观点来看，我们并不特别需要华沙西北地域。应该从西南面进行迂回，同时用向罗兹—波兹南总方向上实施强大的分割突击的方法来攻取华沙。目前前线还没有采取这一行动的兵力，但是应该集中必要的兵力。同时柏林方向上的各友邻方面军也应作好共同行动……’”

斯大林看来因为这位统帅战略家的固执而完全失去了自制力。他不客气地打断了朱可夫的话说：

“请你们出去再想一想，我们在这里商量商量。”

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到了隔壁房间，又摊开了地图。

朱可夫问罗科索夫斯基，为什么不再坚决点否定斯大林的建议，因为他非常清楚，无论在什么样情况下第47集团军的进攻都不会带来好结果。

“难道你没发现，他们对你的看法态度多么恶劣？”罗科索夫斯基回答道，“难道你还没有感觉到贝利亚在给斯大林火上浇油吗？老兄，这不会有好结果。我可是知道贝利亚能干出什么来，我在他的刑讯室里呆过。”

大约过了15~20分钟，贝利亚、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走进房间。

“怎么样，又想出什么点子了？”马林科夫问道。

“我们没有想出什么新方案来，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朱可夫答道。

“对，”马林科夫说，“我们支持你们。”

但是他们都还没来得及准备好，就又被叫到了最高统帅的办公室。

他们走进办公室，站在那里听斯大林讲话。

“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同意我军转入防御，”最高统帅说，“至于下一步计划，我们晚些时候再讨论。你们可以走了。”

斯大林讲这番话的时候语调并不友好，几乎对元帅们看都不看。

最高统帅非常不喜欢同他有分歧，但这一次可以理解他。他很想摆脱和平息外国媒体对苏军不援助华沙起义者这些激烈的指责，而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不是政治家，不想为了他们不太明白的政治利益再做出牺牲和继续他们认为不能获胜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利益和军事利益是不一致的。

面对最高统帅，还有在场的同样对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步步紧逼的三名政治局委员，要坚持自己的意见，证明在前线不宜再做出牺牲，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这本身就是对当今那些断言朱可夫不顾伤亡，只



为胜利而战的人独特的回答。在这种情况下最简单的做法是，举手行个军礼，迎合最高统帅的想法，说：“您的指示将被执行。”然后继续进攻……但朱可夫并没有这样去做，他不想在继续这种他坚信完全是徒劳无益的军事行动中做不必要的牺牲。

朱可夫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中出现了同1941年十分相似的情况——当时斯大林因朱可夫这样坚持自己的看法解除了他总参谋长的职务——而且连一些细节也重新出现。当时斯大林也对朱可夫说：“请您出去再想一想，我们在这里再作决定……”当时朱可夫也是刚刚摊开地图准备思考问题，就又被叫回办公室去。当时斯大林说：“没有您我们照样也能行。”就这样解除了他总参谋长的职务，任命他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派他到叶利尼亚附近去组织进攻，其实这次进攻是朱可夫建议的。

现在今非昔比，斯大林已不是当年的模样，朱可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武装力量，甚至在斯大林本人那里已赢得了威信。现在，简单而粗暴地对待他是不行的，斯大林明白这一点。但无论他怎样缓和这一“争执”，无论用怎样的必须变动的“理由”来加以掩饰，问题的实质还是改变不了：事实上，就在那次谈话后，斯大林还是解除了朱可夫的职务。

我们在前几章已经谈到，斯大林对朱可夫深孚众望产生了嫉妒心。随着战争行将胜利结束，完全可以推测最高统帅的意图：战争头一年屡遭失利后（无疑“败坏了”他的名声），必须更积极地过问节节胜利的战事才能逐步恢复自己的威信。

为证实这种推测的可能性，下面我引用事隔不久斯大林同朱可夫的一次谈话：

“今后各个方面军都由大本营直接领导，您认为怎么样？”斯大林问道。

请注意斯大林不想解释他要独揽军事领导权的原因和情况。从法律上讲，他才是最高统帅，他有什么必要事无巨细地过问战事呢？

朱可夫是这样回答斯大林的：

“是的，方面军的数目减少了，整个战线的宽度也缩短了，领导各个方面军已经比较容易，现在完全可以由大本营来直接领导各个方面军。”

朱可夫实际上就是这样，从全局出发来论证斯大林想做出的变动。如果是由斯大林本人说出这种理由的话，那么我对最高统帅本人自负的种种猜测都可以说一文不值。但斯大林本人接下来的话更增强了我的推测：



“您不会是因为赌气才这么说吧？”

这也就是说，约瑟夫·斯大林征求朱可夫的意见时，考虑的不仅仅是战略领导上的改变，而且也是人事上的改变：朱可夫如何对待最高统帅取消了他作为大本营代表对各方面军大型战役的领导权，简单地说，是如何对待他独揽军权的呢？

朱可夫平静地答道：

“有什么可赌气的呢？我想，我和华西列夫斯基不会失业。”

朱可夫在《回忆和思考》中对这些话加了注，他写道：“……我是开了个玩笑。”但仔细想想，这个“玩笑”里有着什么样的潜台词。斯大林都已经谈到了“赌气”，而朱可夫是有分寸的人，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会对给他气受的人说：哪能呢，哪能呢，您放心吧，我不会赌气。这就是说，斯大林还是给了他气受。赌什么气呢？就是最高统帅不让他插手重大的事务。朱可夫很清楚这一点并让对话者也明白他很清楚，这在他说的“我想，我……不会失业”的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一切都说清楚了：自斯大林宣布的这一决定起，朱可夫元帅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都已“失业”，但是朱可夫希望能摆脱“失业”的状态。

这时谈话被打断了。但斯大林显然又考虑了他的这一步棋，认为赌气的成分毕竟存在，而他不想和朱可夫争吵，因为他确实很尊重和器重这位元帅，于是请他上他这里来，以“掩饰不快”：

“今后您还是我的副手。”

最高统帅为表示真心对朱可夫敬重，干脆利用起了这位统帅的自尊心，说：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位于柏林方向，我们想派您去这个方向工作。”

这就是一张王牌：我掌管一切，把希特勒首都——柏林征服者的桂冠让您戴。对朱可夫这位统帅和“军魂”来说，这样的前景自然是正合心意、无上光荣和聊以自慰的。

斯大林在更大程度上是想利用这次任命在将领的心目中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因为这些将领认为对朱可夫的这一任命是公正的，是理所应当的一步。如果不是朱可夫，谁能攻克柏林呢？这正是斯大林，还有热爱和尊敬朱可夫元帅的全军将士给予他的这个崇高的荣誉。

所有的人都认为斯大林的这个决定是他英明的表现。实际上，不能不承认他思维的缜密：达到他想达到的一切——独自领导结束战争的整个必胜的战局。

只有罗科索夫斯基一人感到委屈，他已经预感到征服柏林的荣耀，但是他的命运突然发生了逆转，不得不把方面军交给了朱可夫。

多年来罗科索夫斯基和朱可夫仍是朋友，但罗科索夫斯基内心终生感到不是滋味。这种不快不但始终存在，有时也会流露出来（关于这一点后面将会谈到）。

八 克里米亚会议

美国总统罗斯福首先提出需要举行三国首脑的例行会晤。1944年7月19日他在致斯大林的信中写道：“鉴于事态发展得如此迅速和成功，我认为，您、首相和我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举行一次会晤。”

7月20日丘吉尔也向斯大林提出了类似建议。7月24日他在来信中已经谈到拟议中的会晤的一些细节：

“您无疑已收到了总统提议我们三人大约在9月的第二个星期在苏格兰北部再次举行会晤的电报。我没有必要指出英国陛下政府和我个人是怎样由衷地希望您能够光临。我很清楚您的困难，也很了解您的行踪必须取决于前线的态势，但我要提请您注意的是，三方会晤将会有极大的好处，将会使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变得容易处理，在德黑兰会议之后就是如此……”

9月份苏格兰北部及西北部的天气通常是最好的，不过在这件事上我不能给您任何保证。同时我将为总统和我本人做准备，因为他已通知我说他打算来。请将您的想法与愿望告诉我。”

1944年7月26日斯大林回复丘吉尔说：

“我很高兴从您的来信中得知8月份护航队的情况，正如您所写的，在8月份护航队之后新的一组护航队必须跟着而来，我们确实非常需要它们。”

至于说您在7月24日的来信中提到的您、罗斯福先生和我之间的会晤一事，我认为，这样的会晤是适宜的。但目前，当苏军在如此广阔的战场上进行战斗、攻势越来越猛烈的时候，我不能离开苏联，不能放弃指挥军队，哪怕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也不行。依我所有同事的看法，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随后“三巨头”之间的通信进一步明确了会晤的地点、时间以及需要讨论的问题。

最终商定1945年2月3日在克里木的雅尔塔会晤。



在抵达克里木之前，美国代表团和英国代表团于1945年1月30日~2月2日在马耳他岛举行了会议。此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确定西欧盟国的战略计划。在马耳他每天都举行的参谋长会议（罗斯福和丘吉尔2月2日出席了最后一次这样的会议）上通过了在德国最后阶段军事行动的计划，按照这一计划将在西战场北段鲁尔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卡塞尔方向实施辅助突击。这一次盟国想趁俄国人在东战场的进攻尚未彻底击败德军之前就尽快发动战役。

西方盟国对一些政治问题的讨论同样很重要。1945年2月1日美英外交部长召开会议，会上几乎就所有打算在克里米亚会议上讨论的政治问题商定了双方的立场。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此次会议进程中曾说：“俄国人会提出非常重大的要求；我们能够提供给他们的不会很多，但我们应当从他们那里得到很多。因此我们应当商定把所有我们想要得到的和我们不得不给予的东西汇总在一起。这同样也适用于远东。”

1945年2月3日，罗斯福和丘吉尔以及他们的陪同人员一起抵达克里木。他们被安置在雅尔塔附近尚未被匆忙撤离的希特勒匪徒破坏的宫殿里。罗斯福在利瓦吉亚宫下榻，丘吉尔在阿卢普卡的沃龙佐夫宫居住，苏联代表团则暂驻科列伊兹的尤苏波夫宫。

1945年2月4日三巨头举行了第一次会议，由罗斯福主持。

接下来的所有工作就像这第一次会议一样都是在利瓦吉亚宫内进行的。这是因为美国代表团被安置于此，罗斯福因活动不便，更适合在这里工作。

第一次会议听取了有关军务、战斗行动和各战场前景的报告。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将军就苏军态势作了详细的报告。

乔治·马歇尔将军报告了在西线战区和意大利战区的态势。

2月5日会议研究了政治问题，其中包括德国战败后的命运问题。给报界的最后文件说道：“在德国尚未被彻底击溃之前，这些条件不予发表。”

“三巨头”的秘密协议商定了德国无条件投降和盟国中任何一国不与其单独媾和的问题，决定将德国分成几个占领区以及将柏林分块管理。

在战争赔偿问题上斯大林与丘吉尔发生了异常激烈的争吵。这一问题是由斯大林提出的，他提出了专门计划，计划规定：

——战争赔偿应不用货币，而用实物赔偿（根据上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当时是以货币来赔偿的，结果几乎一无所获，因为德国没有什么可用于偿付的）；

——德国应以工厂、战舰、坦克等实物支付加上每年提供商品；

——战争赔偿的期限为10年，并在战争结束后2年内没收国家财产；

——无法精确统计德国给苏联造成的损失，不过大致的统计数字是26000亿卢布。苏联清楚，德国不可能清偿如此庞大的数目，所以同意接受每年不低于100亿美元的物资供应，这只是苏联物质损失的极小一部分。

丘吉尔听了这一计划后，开始进行反驳，他说：

“俄国的牺牲无疑要比其他国家的大！”接着他列举了英国所遭受的破坏并大声喊道：“德国能怎么样？我们面对的是闹饥荒的德国幽灵及其8000万人！归根结底不还是得由盟国来养活德国人吗？要骑马，就得喂它干草和燕麦。”

斯大林厉声说：

“马不该扑向我们。”

“我的隐喻不恰当，我们用汽车来代替马，汽车是要汽油的。”

斯大林反驳说：

“这同样不能类比——德国人不是汽车，是人。”

罗斯福倾向于支持斯大林。苏联代表团还有一个令人折服的理由：

“应当考虑到的是，战后的德国将摆脱军备开支。而战前它每年用于军备开支的数额达到60亿！”

连丘吉尔都叫了起来：

“不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

斯大林终于达到了目的——那些在这场战争中蒙受损失最重的国家将首先得到战争赔偿，战争赔偿委员会设在莫斯科。

丘吉尔开玩笑说，他在讨论战争赔偿问题时太好说话了，议会有可能不赞成这么做，甚至有可能会要赶他——丘吉尔下台。

斯大林和气地给他的争论对手打气说：

“胜利者不会被赶走！”

在8天的时间里首脑们还解决了其他一些问题：建立维护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组织；建立自由独立的波兰（在成立政府问题上他们干了一仗，但斯大林坚持己见，只在将侨居英国的一些波兰人吸收进新政府问题上作了让步）。

斯大林同样费力但最终顺利地（对苏联来说）解决了南斯拉夫问题，在南斯拉夫确立了以铁托为首的政权，缔结了将战俘引渡给其原籍国家的协定，协定还涉及将囚犯从德国集中营遣送回国的的问题。

会议还解决了一些领土问题。斯大林不失时机地将柯尼斯堡和紧邻它的东普鲁士（现在的加里宁格勒州）以及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归属



苏联（好像是对苏联同意参加对日作战的补偿，尽管这个问题早在德黑兰会议的文件中就已约定）。

“三巨头”利用晚上和会议休息时间聚在一起吃午饭或晚饭。我觉得他们在酒宴上说的话与正式发表的意见同样令人感兴趣，同样重要。

不妨看一下丘吉尔的回忆录。

“这个下午我们大家和斯大林一起在尤苏波夫宫吃午饭。午饭时讲的话都作了记录，所以可以在这里引用。顺便说一句，我当时说：

‘我既无意于夸大其辞，也无意于天花乱坠地吹吹拍拍，但我要指出，我们认为斯大林元帅的生命对我们的希望和我们的的心灵来说是最宝贵的财富。历史上有许多征服者，但他们中只有少数人成了国务活动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遇到战后接踵而来的种种困难后，逐渐把他们的胜利果实化为乌有。我真诚地希望，元帅要为苏联人民而活着并帮助我们大家走向比不久前的悲惨少得多的时代。当我意识到我与这位伟人关系友好而亲密时，我在这个世界上行走就更大胆、更充满希望，他的英名不仅传遍整个俄国，而且传遍整个世界。’

斯大林对我报以溢美之词。他说：

‘我为不列颠帝国的领导人、为世界上最大无畏的、既政治经验丰富又军事指挥有方的首相干杯。当整个欧洲准备对希特勒俯首称臣的时候，他却声明说英国绝不动摇，即便没有盟国，英国也会单独抗击德国。他说，哪怕是现在的和可能的盟国纷纷弃英国而去，英国也仍将继续战斗。我为这个一百年来可能只出生一个并勇敢地举起英国大旗的人的健康干杯。我所说的是我的感受，是我的心里话，也是我坚定不移的想法。’

之后我谈到了较为严肃的话题：

‘我应当指出，在整个战争时期，甚至是在黑云压城的时期，我也从来没有一次感受过像现在这次会议上感受到的如此重大的责任。现在，根据元帅指出的各种理由，我们明白，我们已经登上山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马平川。我们不会低估困难。过去，战后过了5~10年，共同战斗的各国人民都分道扬镳了……我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杰出的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斯大林元帅的身上，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和平的斗士，他们在击溃敌人之后将带领我们同贫困、无序、混乱、压迫作斗争。我寄希望于此并以英国的名义声明，我们绝不会在共同努力时落后，我们将毫不松懈地支持你们的



努力。元帅谈到了未来，这是最主要的，否则汪洋大海般的鲜血就白流了，就白白糟蹋了。我为取得胜利的世界的灿烂阳光干杯。’

斯大林致了答辞。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开诚布公。

他说：‘我是在以一个老人的身份讲话，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讲那么多。不过我想为我们的联盟、为它不失去其亲密无间的性质、不失去观点的自由表达而干杯。我不知道外交史上是否有过像这个联盟一样的如此亲密的三大国的联盟，在联盟里各盟国都能如此开诚布公地陈述自己的观点。我知道，一些人会觉得这样的看法很天真。

在联盟中各盟国不应当相互欺骗。或许这是天真的想法？有经验的外交官会说：“我为什么不欺骗我的盟友？”但是我，作为一个天真的人认为，最好不要欺骗自己的盟友，哪怕他是个傻瓜。我们的联盟之所以如此牢固或许正是因为我们不相互欺骗；或者，或许是因为不容易相互欺骗？我为我们三国联盟的牢不可破而干杯。愿它更加强大和稳固，愿我们更加坦诚……’

他接着说：

‘为只有在战争时期才得到承认，而战后他们的功绩很快会被忘得干干净净的人干杯。当战争进行的时候，不仅是像他们一样的男人，连妇女也一样，热爱他们，对他们敬重有加。战后他们的威望下降，妇女们也不再理睬他们。我为军事领导人干杯。’

斯大林对我们将面临的困难不抱任何幻想，他说：

‘欧洲历史在这些天里发生了变化——根本性的变化。战争期间主要大国结成联盟是对的，没有这样的联盟是无法赢得战争的胜利的。但是结盟反对共同的敌人——这是显而易见、理所当然的，而更为复杂的事是——建立保障和平和保住胜利果实的联盟。我们共同作战是对的，而且这也并不是那么困难；另一方面，这些天始于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工作在这里结束了，从而奠定了保障安全和巩固和平的法律基础——这是一项重要成果。这是个转折点。

我为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顺利结束干杯；为我们诞生于战火之中并在战后更趋巩固和完整无损的联盟干杯；为我们这些国家不只埋头于本国的事务，而且记得除了他们本身的问题外还有共同的事业以及在和平时期他们应当以战时那样的热情来维护统一的事业而干杯。’

2月10日轮到我主持我们的最后一次午宴。在斯大林到达前的几小时一排俄国士兵来到沃龙佐夫宫。他们锁上了举办午宴的接待厅两侧的门，布置了警卫，谁也不得入内。随后他们进行了全面



检查——查看了桌子下面，敲打了墙壁。我的手下只得离开大楼，从办公室回到自己的住房。当一切准备就绪时，元帅来了，态度极为和蔼可亲，稍后总统也到达了。

在尤苏波夫官午餐时斯大林为国王健康祝酒的方式令我不喜欢，尽管他是想以此来表达友好和敬意。斯大林说，总的来说，他从来反对国王并站在人民的一边，而不是站在哪一个国王的一边，但在这场战争中他学会了尊重和珍视英国人民，而英国人民尊重和崇拜本国国王，因此他想为英国国王的健康干杯。我不满意这种说法，就请莫洛托夫告诉斯大林，他可以不说得这么细，今后就为‘三国首脑’的健康干杯就可以了。既然对此达成了一致，我马上就采用新的提法：

‘我祝三国首脑——英国国王陛下、美国总统和苏联主席加里宁身体健康。’

倦容满面的总统回答说：

‘首相的祝词引起了我许多回想。1933年我的妻子参观了我国的一所学校。在一间教室里她看到了一张有一大块空白的地图。她问这一块为什么是空白的，人们回答她说因为这块地方的名称不准使用。这就是苏联。这件事成了促使我向加里宁主席提出请求派代表到华盛顿来讨论建交问题的一个理由。我国承认俄国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现在该我为斯大林元帅的健康祝酒了。我说：

‘我为此已经干过几次了。这一次我带着比以往会晤时更亲切的感受来喝这杯酒，不是因为他开始取得更大的胜利，而是因为他由于俄国军队取得的伟大胜利和辉煌现在变得比在我们所经历的艰难时期更友善了。我认为无论在这些问题上分歧有多大，英国都是他的好朋友。我希望俄国在未来能拥有光明幸福的生活和繁荣。我会竭尽全力给予帮助，我相信总统也会这样做。元帅曾经对我们不那么友善过，我记得我本人有时对他也出言不逊，但是我们共同的危险和共同的忠诚消除了这一切。战火把以往种种不和烧得一千二净。我们感觉到他是个朋友，我们可以相信他，所以我希望他依然能对我们保持这份情感。我祝他长寿，能够看到自己心爱的俄国不仅在战争时期十分荣光，而且在和平时期也格外幸福。’

斯大林以极好的情绪作了回答，我印象中他认为对我们‘三巨头’的会晤来说‘三国首脑’的提法非常适宜。我没有他讲这段话的记录。我们加上翻译统共不过10个人，而且按照程序我们三三两两地交谈。我已经提到过，希特勒战败后联合王国将进行大

选。斯大林发表意见说，他的立场是一贯的，‘既然人们明白他们需要领导人，那么谁会是比赢得胜利的那个人更出色的领导人呢？’我解释说，英国有两个政党，我只属于其中的一个。‘要是有一个政党——这就会好得多。’斯大林深信不疑地说……

整个下午就在这样轻松自然的交谈中愉快地过去了。当元帅准备离开时，英国代表团的许多代表都聚集到了宫殿的前厅里，于是我大声说：‘高喊三次斯大林元帅“乌拉”！’大厅里亲切地响起了三呼乌拉的声音。

我们在雅尔塔逗留期间，当一切都还没顺畅时曾发生过另外一件事。罗斯福在一次他招待的早餐上说，他和我在密电中总是管斯大林叫‘朱大叔’。我提出，让他在私下交谈时跟斯大林提起这件事，但他却当着大家的面拿这件事开玩笑。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了。斯大林生气了，‘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这张桌子？’他气愤地问道。伯恩斯用一句妙语扭转了局面，他说：‘要知道你们毕竟在叫“山姆大叔”，那么为什么叫“朱大叔”会使您如此生气呢？’这之后元帅平静了下来，而且后来莫洛托夫也要我相信，元帅明白了这个玩笑。他已经知道，国外许多人都叫他‘朱大叔’，而且他也明白，给他起这个绰号是出于友好，表示好感。

第二天，2月11日，星期天，是我们在克里木逗留的最后一天。总统忙着回国并打算途中去趟埃及，同中东国家的统治者们商谈中东问题。斯大林和我同他一起在利瓦吉亚宫过去的台球房里共进早餐。早餐时我们签署了最后一批文件和正式公报。现在一切都取决于贯彻文件的气氛。

2月27日我建议下院批准克里米亚会议的结果。

我认为我应当表明自己对苏联认真负责的态度有信心并希望能保持这样的信心。斯大林的举止也鼓励我这么做。

我说：

‘克里木之行和其他会晤后我形成的印象是，斯大林元帅和苏联的领袖们希望与西方民主国家友好平等相处。我还认为，他们是自己言论的主人。我不知道哪一个政府能比苏俄政府更精确地履行自己的义务，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我坚决拒绝在这里参与有关俄国人是否认真负责的争论。显而易见，这些问题关系到全球的未来。在西方民主国家与苏俄之间一旦产生可怕的分裂，人类命运将确实是黯淡无光的。’

议会总的反应是无条件支持我们在克里米亚会议上采取的立场。”

斯大林就是这样一个战略家、外交家，所以他的国际威望才会如此崇高。

九 最后的战局

斯大林负责直接指挥各个方面军后，无疑要把不少时间花费在研究当时整个态势图上。

他认为苏军及反希特勒盟国军队的战略态势已接近完成歼灭法西斯德国的任务。我军的突击与西欧盟国的行动完全协调一致。实际上，苏军与英美联军已占领了对德国重要中心城市进行决定性进攻的出发阵地。现在要做的是进行最后的快速猛攻并在短时间内彻底消灭敌人。

苏军取得了决定战争结局的胜利。苏德战线斗争注定将以我军取得胜利宣告结束，彻底歼灭敌人的时刻已经到来。我们不仅在部队数量上，而且在部队素养、技术装备上都超过了敌人。后方的井然有序的工作完全保障了战斗行动，后方给予前线越来越大的支援。

在柏林方向上实施直接的决定性突击的兵力是足够的，但为此要付出巨大的伤亡。德军肯定会像我们当年在莫斯科城下时一样拼命死守柏林。

战争结束前更应当爱护人，他们经历了整个战争并应该活下去。伤亡肯定是不可避免的，但要将伤亡降低到最低限度。为此必需要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以迷惑住敌人，使其产生错觉，不把主力集中到我们将实施决定性突击的地方去。但是看着地图可以想出什么办法呢？地图上喀尔巴阡山脉把部队分成两个方面军群。

敌人自然要加强和集中柏林方向上的部队，这是我军进攻帝国首都最便捷的途径，必须削弱敌人在这一方向上的防御。但怎么才能做到呢？

可以散播关于在其他方向准备进攻的虚拟情报，但是希特勒能信吗？而且怎样才能做到呢？也可以不要虚拟情报而在翼侧的某个地方实施辅助突击并将敌军预备队吸引到那里去，但是借助杀伤力不大的突击是无法引开希特勒统帅部的，它经验丰富，懂得这类机动，是不会把部队调离柏林方向的。

或许用正面突击的方式吓唬吓唬，再实行大规模夹攻，从北边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从南边经布达佩斯、维也纳迂回包抄整个德军的残部？让德军呆在柏林方向上的筑垒工事里，而我军则绕过它们并在柏林会师。如果希特勒匪徒为了击退这些翼侧突击而投入自己所有的预备队，那也可以在柏林方向上实施突击。

斯大林跟总参谋长安东诺夫谈了自己的想法并请他与有经验的总参谋部参谋们一起权衡并计算一下这些方案。

关于这项工作什捷缅科将军回忆说：

“事先在阿·因·安东诺夫那里非常仔细地讨论过这一意图。除安东诺夫本人外，参加这次讨论的还有：作战部部长 A. A. 格雷兹洛夫和作战部副部长 H. A. 洛莫夫以及相关方向的一些首长。这里提出的所有设想过后都在作战部被进一步修正。作战部还计算了兵力和兵器，研究了战役的所有其他因素。最后，这一意图被绘成了图，各种计算及依据都被一一标在地图上，然后再次进行了可以说是吹毛求疵的讨论。和以往一样，初期战役被规划得极为详细，而各方面军下一步的任务只是大致作了拟定。

我们行动总的指导思想先是在创造性的探索过程中萌生，然后才彻底形成。我们认定苏德战线的中心地段是关键性地段，因为从这里突击能使我军沿最短的方向向德国的重要中心城市挺进。但是这里的敌军集团最密集。为了给我军的进攻创造最有利的条件，认为应当使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中央集团向两边延伸。为此我们应当最大限度地加紧在战略战线的翼侧进行活动。这里说的不光是匈牙利和奥地利，还有东普鲁士。对布达佩斯及维也纳的强攻要与对柯尼斯堡的进攻相配合。

我们很清楚，东普鲁士和匈牙利的敌人异常敏感。在强大的进逼下他们必定会将自己的预备队和不受冲击的战线地段的部队调到这里来。这样一来，拟定要发生决定性事件的西方向就会严重削弱。”

因此斯大林的意图在总参谋部得到了图示体现和理论论证。

这次什捷缅科还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斯大林亲自独立领导了整个战役的准备工作 and 实施：

“大本营在酝酿 1945 年战局的意图时，没有像以往那样（比如制定‘巴格拉季昂’计划时）召集司令们开专门会议。这次只是把司令们分别叫到总参谋部去，和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商讨该方面军战役的所有细节，然后再将已协商一致的意见呈报给大本营……

计划没有作实质性的修改。商定 1945 年 1 月 20 日在主要方向上开始进攻，不过战役计划暂时还没有批准也没有向各方面军下达训令……

最高统帅亲自负责协调柏林方向上的四个方面军的行动。”

斯大林亲自向各方面军司令下达了战役准备的指示。朱可夫回忆道：

“11月底以前，以米·谢·马利宁为首的方面军司令部就已制定出方面军进攻计划，并准备好了需向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提出的补充部队和物资的申请书。方面军司令部、方面军后勤司令部和各兵种司令们为计算当前战役所需的兵力、兵器付出了极大的劳动。”

关于这点科涅夫元帅写道：

“……1944年11月底以前，我应召带着方面军司令部制定的战役计划到莫斯科去。在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我向斯大林作了报告，在场的有国防委员会的委员们。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斯大林仔细地研究了这份计划。他尤其仔细地在地图上查看了西里西亚工业区。这里聚集着众多的企业、地上设备雄厚的矿井、各种工业设施。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就构成了部队进攻时机动行动的巨大障碍。

即便是在地图上西里西亚地区的规模和实力也令人印象深刻。我很清楚，斯大林在强调指出了这一情况后，用手指着地图，沿这一地区画了一个圈说：

‘金子呀。’

话说得很清楚，实际上不需要再多作解释了。

对我这个方面军司令来说，不用解释也已经清楚，收复栋布罗瓦-西里西亚工业区的问题需要按特殊方式解决。

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尽可能保住它的工业潜力，尤其是这些自古以来属于波兰的土地在解放后应归还给波兰。所以按照我们的计划，各部队的突击都绕开这一地区，在它以北和以南实施。不过，说实在的，当斯大林如此坚定有力、如此意味深长地说出‘金子’的时候，我想到，应当更认真深入地研究不仅解放、而且拯救栋布罗瓦-西里西亚工业区的所有可能性。

大本营对计划没有不同意见，表示完全赞同。我没有耽搁时间，返回了前线，开始准备战役。”

11月6日在纪念十月革命庆祝大会上，斯大林在他的报告中对过



去一年的战斗进行了总结。他正是在这一报告中描述了被历史学家和政论家称之为“斯大林突击”的十次突击的特点。

斯大林在谈到国内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时指出：

“在战争第四年，我国工厂制造的坦克、飞机、火炮、迫击炮和弹药比战争初期要多几倍。在恢复农业方面，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在我国收复顿河与库班河一带的肥沃田地以后，在解放乌克兰以后，遭到严重损失的我国农业正在迅速恢复。苏联铁路运输部门担负起了其他国家的运输部门未必能担负得起的重担。这一切都说明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基础较之敌国的经济有无比的生命力。

十月革命所产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给了我国人民和我国军队以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尽管苏维埃国家担负着战争的重担，尽管德军暂时占领了我国经济上极重要的广大地区，然而苏维埃国家在战争进程中，对前线的武器和弹药的供应并没有减少，而且是一年比一年增加。现在红军所拥有的坦克、火炮、飞机，不是比德军的少，而是比德军的多。至于说到我们的技术兵器的质量，那要比敌人的优良得多。正像红军在单独进行的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中，在军事上战胜了法西斯军队一样，苏联后方的劳动者，在同希特勒德国及其帮凶进行的单独战斗中，也在经济上战胜了敌人。（暴风雨般的掌声）苏联人放弃了许多必要的东西，自觉地忍受物质上的严重困难，以便给前线更多的东西。这次战争中空前未有的困难不但没有摧毁、反而更好地锤炼了苏联人民的钢铁意志和英勇精神。我国人民理应赢得英雄人民的荣誉。”^①

当各部队及司令部准备最后战役的时候，莫斯科呈现出一种暂时的平静，于是斯大林在战争年代第一次决定庆祝新年，他邀请了自己的战友。下面引用的是什捷缅科的回忆录：

“聚集在斯大林别墅里的有：亚·亚·诺维科夫、尼·尼·沃罗诺夫、雅·尼·费多连科、安·瓦·赫鲁廖夫、谢·米·布琼尼、阿·因·安东诺夫、谢·马·什捷缅科。

12时之前几分钟，政治局委员们全都到齐了，与他们同时到达的还有一些人民委员。

聚集在这里的有25个男人和惟一的1个女人——当时在场的

^① 《斯大林文集》第425页。——译者注

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帕·陶里亚蒂的妻子。

斯大林坐在他平时坐的桌子侧面的位子上，和往常一样，右手边放着一个清水瓶。没有任何服务员，所以每个人都是自己往盘子里放想要吃的东西。随着钟声的敲响，最高统帅发表了简短的讲话，祝贺为了击溃希特勒军队和使我军胜利时刻早日来临而竭尽可能的苏联人民。他举杯祝贺苏联的武装力量并祝贺我们大家：

‘新年快乐，同志们！’

大家相互祝贺并为在已经来临的1945年中战争胜利结束干杯。起初感到的一些拘束很快便消失了，大家开始交谈起来。主人没有严守礼仪：在干过几次杯之后从桌旁的座位上站了起来，抽起了烟斗并开始同客人交谈。其余的人不失时机地利用自由，分成几堆，笑声响了起来，嗓门也开始变高了。

布琼尼从前厅拿来了随身带来的巴扬手风琴，坐在椅子上拉了起来。他娴熟地拉着。他拉的大多是俄罗斯民歌、华尔兹舞曲和波尔卡舞曲。他和任何一个真正的巴扬手风琴演奏者一样，将耳朵贴在乐器上。看得出，这是他最喜欢的消遣。

伏罗希洛夫坐到谢苗·米哈伊洛维奇的旁边。随后其他许多人都都围了过来。

当布琼尼拉累了的时候，斯大林上了留声机的发条，并亲自挑选了几张唱片。客人们本打算跳舞，但因为只有一位女士，舞自然跳不成了。这时房屋主人从一摞唱片中抽出了《芭勒娘舞曲》这张唱片。布琼尼坐不住了——跳起舞来。他豪放地跳着，蹲着跳，双手拍打着膝盖和长统皮靴。大家都发自内心地为他鼓掌。

最精彩的音乐节目是亚·瓦·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录唱的军歌。这些歌大家都熟悉，于是就随着齐声唱了起来。

夜里3时左右大家离开了孔采沃。战争期间第一次不是在办公的情况下欢庆新年引起了大家的思考。所有人都觉得战争即将结束，呼吸已变得轻松起来，尽管大家清楚，最近即将开始一场新的大规模进攻，前面还有不止一次的艰苦交战。”

对我们的盟国来说新年可不是喜庆的，新年酒宴后头痛不已。希特勒给他们送来了一件令人非常不快的意外礼物。

为了对所发生的事了解得更清楚，不得不倒回几个星期去谈谈。

希特勒外交官和秘密代表通过多种渠道力求与西方单独媾和的一切努力都没能奏效。盟国当时仍信守先前签订的协定，所以不同意与希特勒单方停火。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得出如下结论：“在军事上遭受重创

的时候希望谈判成功是幼稚的，谈判只能在军事态势有利时进行。如果能令西方国家遭受军事失败的话，它们就会更愿意和平与和解。”

总之，为了让盟国变得更好说话，希特勒决定教训教训它们。他把凯特尔、约德尔、陆军总参谋长古德里安和空军司令部代表克赖佩将军请到他那里。他讲了自己的意图：

“我决定：我们将在阿登高原发起进攻。”他指着地图上的这个方向说：“强渡马斯河，然后是——安特卫普！我们实施这一突击后，英国人会变得好说话些。”

应当说，希特勒拟订的计划是非常有效的，而且能给德国带来战略上和政治上的好处。希特勒匪徒通过这一突击，前出至海边，就可以切断深入法国腹地的盟军，夺取安特卫普的大量弹药和其他物资储备并包围英美不少于25~30个师。如果考虑到在此之前盟军在法国已驻扎有62个师的话，那么其中将会损失近一半，主要是英军，按德国人的意图，这将会导致态势发生有利于德国的根本转变。而且按希特勒的意图，迅速歼灭盟军将使德军有可能立即把部队由西线调往东线，以击退俄军的冬季攻势。

希特勒以其特有的干劲去实施这一想法。10月12日他审看了由约德尔制定的在阿登地区发起进攻的计划。该计划规定在盟军4个师驻扎的100公里长的地段上实施突击。而对这4个师的突击由党卫军坦克第5、第6集团军实施。凯特尔建议将这一战役称作“圣诞玫瑰”，但希特勒不同意，说圣诞节前一切都该结束，于是就把这次战役叫做“莱茵河值更”。

这时龙德施泰特元帅和莫德尔元帅向希特勒提出了局部进攻战役的计划。希特勒没有批准这些计划，并召见他们向他们说明他为什么没有批准他们的计划：

“从军事角度讲你们的计划或许是合理的，但我所想要实行的战役与其说是具有军事性质，不如说是具有政治性质的。你们回想一下腓特烈大帝：在莱滕和罗斯巴赫附近他打败兵力比他多一倍的敌人。阿登地区将会成为我的罗斯巴赫和莱滕。因此这一史无前例的历史事件的结果是非常肯定的：第三帝国敌人的阵营将四分五裂。”

11月10日希特勒签署了给各部队的命令，命令强调指出了战役的政治倾向。战役的目标是：争取在西战场的军事行动过程中，也可能是整个战争的过程中出现决定性的转折。



元首为了让所有的高级指挥官领会他的思想并一往无前地、彻底地执行他的命令，下令召集包括师长在内的高级指挥人员开会。

12月12日，他们被召集到龙德施泰特的大本营。自从不久前发生过行刺事件后，希特勒就采取了特殊的防备措施。所有将领不仅交出了武器，而且交出了公文夹、公文包和文件。几乎每一位将军的背后都站着—个党卫军军官。据坦克师师长德尔兰回忆说：“党卫军卫队恶狠狠地监视着每一位将军，以致这些人吓得都不敢伸手到口袋里掏手帕。”希特勒在他两小时的讲话中说，这一战役的胜利将振奋德国人民的士气并对盟国的舆论产生影响，西战场的稳定将使德军有可能将部队调往东线并在那里阻止俄国人的进攻。

“世界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像我们的敌人那样的由如此异类成分与如此对立个体组成的联盟……现在他们各自的目标已日趋分歧……他们之间的矛盾正与时俱增。如果现在接连实施两次强有力的突击的话，那么随时可以期待这一人为保持的统一战线将在震耳欲聋的隆隆雷声中土崩瓦解。”

不难看出，这场大规模进攻战役的政治倾向被摆在了首位。

希特勒在拟定军队行动计划的同时，开始采取措施来破坏盟国的后方。他叫来了读者们熟悉的曾执行过其他许多特殊任务的党卫军分子斯科尔采涅并命令他将会讲英语的列兵和军官编成特殊旅，让他们都穿上美国军装，配备缴获来的武器和运输工具，在敌后活动时实施破坏行动，消灭有生力量。为保障德军的迅速推进，尤其应当注意夺取马斯河上的桥梁。除此之外，希特勒还命令斯科尔采涅破坏敌军各司令部的工作，在肉体上消灭敌军重要军事领导人；还要求伞降兵降落在英美联军纵深防御的道路上，以阻止援军接近突破地段；在坦克第6集团军各部和居民中有意散布谣言，说这些部队很快将奔赴东线。希特勒在突破地段形成了优势，兵力是英美军队的2倍，坦克是1倍，火炮差不多5倍。

1944年12月16日，希特勒的这一“寄予极大希望和期望的突击”打响了。它是毁灭性的。一位目击者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美军第1集团军没有料到会有突击，因此被消灭在他们很不坚固的筑垒阵地上。它损失了所有的燃料储备和弹药。”与此同时，斯科尔采涅进行破坏活动的特工乘坐缴获来的吉普车，在美军后方制造惊慌和恐惧。美国记者英格索尔写道：“敌军如同决坝的水一样涌向突破口。而美军士兵为了躲避他们沿着所有西去的道路没命地逃跑。”



在德军此次进攻之前盟国的漫不经心简直令人吃惊。12月16日凌晨，所有人像往常一样蒙头大睡。当晚美军指挥官中没有一人料到德军会大举进攻。第12集团军群司令布雷德里将军准备第二天一早到巴黎附近的盟军大本营去，以庆贺艾森豪威尔被授予五星上将这个美军的最高军衔。12月15日晚英军司令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表示，德军再也不能大举进攻，因此他请求艾森豪威尔准许他在英国家里过圣诞节。

不难想像德方的得意和狂喜。报纸和广播在描述德军激动人心的胜利时简直是欣喜若狂。希特勒得意洋洋，为了特别庆贺这一他如此期待的战略性的胜利，他颁发了新的最高奖赏——“金柞树叶骑士十字勋章”。1945年1月1日他将第一枚这样的勋章授予了著名的王牌飞行员鲁德尔。

但是希特勒并不满足于这一胜利。他说：

“只有进攻才能使我们还有机会把西线战事朝着有利的方面转变。”

他绝对相信，盟国现在肯定已经变得好说话些了。

艾森豪威尔同样清楚，在阿登地区的进攻绝没有完：“德军正在作出最大的决定性的努力，为的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取得西线的胜利。我认为，阿登会战只是一个插曲，所以我们应当料到，敌人还会在其他方向上实施突击。”

1月8日，在取得这些激动人心的胜利之后，希特勒突然紧急给西线战场司令龙德施泰特打电话，命令他立即将部队调至出发阵地。于是所有不久前继续向西进攻的兵团都被调往相反的方向，开始向东撤。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必须返回到东线，返回到苏德战场。

十 维斯瓦河 - 奥得河战役

按照斯大林的意图，计划在1945年1月20日开始进攻，并拟在波罗的海沿岸和南方提前几天实施翼侧突击，以便将柏林方向上的敌军预备队吸引至这里。

但由于新年后盟军患了“阿登头痛症”，态势发生了变化。

1945年1月6日斯大林收到了丘吉尔的“私人绝密信件”，信中写道：

“西线正在进行异常艰苦的战斗，因而最高统帅部随时都有可能需要做出重大决定。您本人根据您的经验一定知道，在暂时丧失主动权后不得不防守极为广阔的正面时形势是多么的危急。艾森豪



威尔将军非常希望而且也十分需要大致了解您的打算，因为这必将会影响到他及我们的所有最重要的决定。如您能告诉我，我们是否可以期待在1月中和在您或许愿意顺便提及的其他任何时候，在维斯瓦河正面或其他什么地方俄军将大举进攻的话，我将不胜感激。我不会向任何人透露这一十分机密的消息的，除布鲁克元帅和艾森豪威尔将军外，而且只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我认为事情很紧急。”

如果去掉委婉的外交辞令和掩饰的话，那这纯粹就是求救的呼叫——求给予“紧急援助”，即“俄国大举进攻”。

这很好理解，读者们清楚德军在阿登地区实施了多么猛烈的突击。斯大林即刻同样给盟国一封“亲收”的“绝密”回信：

“我于1月7日晚收到了您1945年1月6日的来信。

遗憾的是，空军主帅特德阁下尚未抵达莫斯科。

利用我们炮兵和空军上的优势来对付德军是非常重要的。但使用这些军种需要有利于空军的晴好天气和没有妨碍火炮瞄准射击的地面雾气。我们正在准备进攻，但现在的天气不利于我们进攻。不过考虑到我们盟国在西战场上的处境，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决定加快结束准备工作，并在不考虑天气的情况下，不晚于1月下半月开始在整个中央战场上展开反击德军的广泛进攻行动。您不必担心，我们会竭尽全力来支援我们光荣的盟军。”

斯大林为了履行这一诺言，改变了开始进攻的时间，将其提前了一个星期，即从1月20日提前到1月12日。

各部队和司令部是非常需要这8天时间来作准备的，而且预计在下旬天气会更好。但我们不是几年里一再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的盟国，我们马上就实施了救助。

1月12日，强大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开始实施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在南面发起了突击。

仅在进攻的第一天，乌克兰第1方面军就突破了敌人的防御并推进了20公里。科涅夫将雷巴尔科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和列柳申科的坦克第4集团军投入战役空间。

德国将军库·蒂佩尔斯基希在他关于维斯瓦河会战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这些交战：

“突击是如此猛烈，不仅击溃了我第一梯队各师，而且击溃了



按希特勒的绝对命令已调至前线附近的大批快速预备队。后者在俄国人的炮火准备中受到伤亡，后来又由于全体退却而根本未按计划使用。”

1月12日，乌克兰第4方面军在克拉科夫方向转入进攻——西喀尔巴阡战役是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的一部分。

1月13日，白俄罗斯第2、第3方面军在北面转入进攻。

斯大林的估计得到了证实。由于苏军在南北面的进攻，敌人在东普鲁士集中了26个师（其中有7个坦克师），在距匈牙利首都很近的地方集中了55个师（其中有9个坦克师）。正如大家后来所知道的，希特勒当时认为，苏军不会在柏林方向上、而是通过匈牙利和捷克实施主要突击，因此帝国的主力都集中到了那里。德国统帅部这一次不得不“服从于斯大林的意志，在我们的主要正面地段上只留了49个师，其中只有5个坦克师”。

1月14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以其全部巨大兵力在柏林方向上发起猛攻。

朱可夫方面军突击的结果是，两天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各部队就赶上并超过了先前前出的左右友邻部队。

为了不花费太多时间去叙述交战中的种种细节，这里引用德国将军蒂佩尔斯基希书中的一段话：“1月16日傍晚，在从尼达河到皮利察河的地段上，已不存在绵密的、有机联系的德军防线。仍在华沙及华沙以南的维斯瓦河进行防御的第9集团军部队面临着极严重的危险。再也没有预备队了。”

朱可夫远远地超越了他的友邻部队，斯大林不得不制止他：

“你们前出至奥得河，脱离了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翼侧有150多公里。目前不能这样做。等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结束东普鲁士战役并将其兵力渡过维斯瓦河后再说。”

“这需要多长时间？”朱可夫问。

“大约10天左右。您要注意，乌克兰第2方面军目前无法继续推进并从左面来保障你们，因为他们需要花一些时间来肃清奥珀伦—卡托维兹地域的敌人。”

朱可夫心里清楚，敌人现在斗志涣散，没有能力进行顽抗，所以他坚持己见说：

“我请求不要停止方面军部队的进攻，因为过后我们攻克梅泽里茨筑垒地区将更难。为保障我方面军右翼，只要再加强一个集团军就足够了。”



“A”集团军群司令约·加尔贝没来得及撤走留守在第一道防线的部队，而希特勒也没能及时从纵深处调出预备队。

方面军主力在确定的方向上实施突击并冲破了梅泽里茨筑垒地区。朱可夫马上再次调先遣支队去抢占奥得河渡口及登陆场。

苏军出现在距柏林70公里处的地方令德军大感震惊。当支队冲进基尼茨城的时候，德军士兵还在大街上不慌不忙地散着步，饭馆里挤满了军官。往返基尼茨—柏林的列车还在按时刻表运行，通信正常进行。

先遣支队的勇士们不得不艰难地坚守已夺取的登陆场。希特勒匪徒们明白，我军楔入奥得河对岸，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挽回的灾难，他们本想将此处变成柏林前面无法逾越的最后防线。

先遣支队做到了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们守住了登陆场，直至主力的到来。在这些战斗中许多人牺牲了，许多人成为了苏联英雄。

但是随着主力的到来，紧张的局面并未缓解。相反，希特勒匪徒新的预备队也在到来，于是交战越发激烈。

斯大林与希特勒、朱可夫与“A”集团军群司令约·加尔贝将军及德军第9集团军司令吕特维茨将军之间的象征性决战以斯大林和朱可夫的胜利宣告结束。希特勒撤了加尔贝和吕特维茨的职务，改由布塞将军接替加尔贝，费·肖奈尔将军接替吕特维茨（很快他又将肖奈尔晋升为陆军元帅）。

我们在给予斯大林和朱可夫以应有的评价时当然明白，战役的顺利实施不仅仅是他们的功劳。但遗憾的是，不可能描述士兵们所克服的困难以及各级指挥员（从军士到将军）在数以万计的士兵和装备对抗中遇到的种种复杂的、有时是危急的情况。我们的战士是在战争年代经受战火、洪水和伤病考验，擅长地球上十分艰苦的军事行动的经验丰富的能手。过去他们曾不止一次地亲身感受过死神冰冷的气息，现在则亲手将死神送给万恶的敌人。

* * *

随着我军进入邻国境内，“游击态势”似乎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现在由希特勒统帅部组织、武装并提供供应的敌对势力在我军后方展开了积极的恐怖破坏活动——这是班杰拉分子、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分子、国家军分子（由波兰流亡政府指挥的前国家军官兵）及其他一些盗匪队伍。

从下面这些报告中可以看出，他们给苏军的战斗行动和供应造成很大的困难：

“致红军总参谋长 1944年10月28日9时，贝斯特里察站

(卢布林以北 15 公里) 空军航空炸弹库在卸载弹药列车时发生爆炸, 爆炸持续到 1944 年 10 月 28 日 14 时。

据初步统计, 爆炸共炸毁 300 节弹药车厢和 10 多吨柴油, 炸死 100 人, 炸伤 200 ~ 300 人, 主要是当地居民……

爆炸原因尚未查明……”

空军第 6 集团军是用来支援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各部队的, 在损失了 300 节车厢炸弹后, 它对进攻部队的航空火力支援自然会明显减弱。

摘自另一份报告:

“1944 年 10 月 13 日国家军分子在波兰第 7 步兵师第 31 团组织暴动。暴动后 1 661 名士兵和 81 名军官躲进森林。暴动者打死了俄国军官。他们号召其他波兰部队投向他们, 并命令和平居民逃避动员并加入国家军。

国家军瓦解波兰军队的活动因波兰军队各分队及司令部中混入国家军奸细而变得容易了……”

许多报告都提到党务工作者被害、民警机关和苏维埃机关被破坏的事。恐怖活动规模很大, 医院、军队纵队、后勤机关的仓库和司令部都被袭击过。

在这种情况下, 斯大林不满足于只采取临时措施, 他认为, 必须要建立后方警卫及与盗匪进行斗争的专业勤务部门, 他就此对贝利亚作了指示。

贝利亚着手领导并报告说:

“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机构和部队正在采取军队的和肃反的措施来消灭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匪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斯特罗卡奇中将在罗夫诺州和沃伦州、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科布罗夫同志在白俄罗斯西部各州领导与盗匪活动的斗争。

对铁路桥梁及路基的警戒已得到加强。

目前采取的措施保障了消灭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盗匪活动任务的完成, 首先是保障了前线交通线和军事目标不受恐怖破坏活动破坏任务的完成。

拉·贝利亚

1944 年 12 月 23 日 第 533 号”



我军既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又救援了盟国，德军停止了在阿登地区的进攻，开始将部队调往东战场。

但这时又出现了其他困难，这些困难正是在斯大林为夺得奥得河登陆场而感到高兴并准备向柏林胜利进军的时候出现的。

事与愿违，一切都可能风云突变，部队不仅有可能会失去已夺得的登陆场，而且还可能会陷入重围。希特勒匪徒准备给我军来一个类似斯大林格勒那样的合围。

德军统帅部的意图就实施而言十分简单而又切实可行，它由总参谋长古德里安精心制定，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天才的德军统帅。

朱可夫的军队突前很远，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落在后面。朱可夫集团的右翼有几百公里是暴露的，不妨想想，斯大林曾就这一危险警告过朱可夫，但是最高统帅在预见到危险时并没有派出朱可夫请求给他的掩护翼侧这一空间的集团军。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部队不仅完成，而且超额完成了斯大林提出的任务，继续进攻并在行进中突入柏林的机会出现了。朱可夫看到，希特勒匪徒在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进程中遭受到毁灭性打击后已然不知所措，在柏林城下他们已没有人数众多的预备队。

1月27日，斯大林批准了朱可夫关于从奥得河登陆场继续进攻柏林的建议，开始了一场战役的准备工作。

德军上将古德里安谈到他的意图时是这样写的：“德军统帅部打算趁俄国人还没有把大批兵力调到前线或是趁他们还没有识破我们的意图的时候，借助‘维斯瓦’集团军群的兵力以闪击般的速度发起强大的反突击。”

“维斯瓦”集团军群有近40个师，同时在斯德丁驻扎有坦克第3集团军。假如这些兵力在朱可夫方面军的后方发起突击的话，势必会造成大灾难。突前很远的苏军部队这时已将燃料、弹药、给养储备消耗殆尽，所有的保障勤务部门又都落在后面。敌人的突击正好对着他们。悲剧性的结局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斯大林在这些看似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即便是大本营派出预备队，怕是也来不及救援了），表现出了非凡的机智，决定孤注一掷。当然这一步是建立在精确的计算之上的。最高统帅常说：“冒险是应该的，但不能太冒失。”

斯大林明白：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的最后结局和在战役中取得的胜利目前都取决于歼灭东波美拉尼亚的德军集团。可以用部分兵力掩护来保障朱可夫翼侧的安全，但他们能经受住“维斯瓦”集团军群的猛烈突击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靠计算，而按“或者……或者……”



的原则行事的话将会是一种冒险。

斯大林作出了一项非同一般的决定——向受到威胁的方向配置四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两个坦克集团军，与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一道在短时间内歼灭“维斯瓦”集团军群，然后在敌人在这里组建能实施反突击的集团之前部队迅速回师柏林方向。

将部队转到新的方向，说起来很容易很简单。但请设想一下，六个集团军有多少人，调动这样一支庞大兵力，将其突击力量由西往北调、指向波罗的海沿岸方向是多么艰难啊！

但这一切都做到了：我们的集团军不仅改变了方向，还突击了希特勒的“维斯瓦”集团军群，并在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部队的合力下将其彻底歼灭。遗憾的是，我不能描述那里所发生的浴血恶战——交战持续了近2个月，于1945年3月底以我军的胜利宣告结束。

在这场变幻莫测的交战中，斯大林对手是“维斯瓦”集团军群司令、党卫军帝国长官希姆莱。

* * *

每一种艺术形式——绘画、雕塑、戏剧——都会以其特殊的方式引发观众的好感：对技艺的赞叹，接触天才后的满足，对如此完美的惊讶，还有对观看创作的人精神上，甚至是意识形态上的影响。

那么军事艺术呢？如果它确实是艺术的话，它就也应该产生这样的影响并引发类似的好感。乍一看，军事艺术不会引起这样崇高的感受和兴奋。军事艺术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体现在相互杀戮的人与装备残酷野蛮的搏斗中。血流成河、尸体成堆，似乎谈不上什么艺术。但我要再次指出，这只是最初的、表面的、肤浅的、外行的看法。

军事艺术具有甚至超过其他艺术的一切引人入胜的方面。

请看证明。以一个胜利战役为例。就拿由斯大林和朱可夫实施的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来说吧。我们将其与观看过画家希什金的画《松林之晨》（我举的也是最闻名遐迩的例子）的人的视觉印象作一比较。普通观众会默默地发现：画得很美，很像，熊像活的一样，树跟真的似的。比较内行的会发现阳光的闪烁并赞叹画家的技巧，他能够将油画色变成光。还有什么呢？还有其他许多细微处只能是专业评论家或是画家同行才能够懂得：布局、内容、主题、远近配置等等。

军事艺术同样可以这样说。

军事大师们在创作中同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自己的手法，自己的特点。无论是整个军事艺术，还是其每一件作品，都会像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引起某种感受——好感或反感（喜欢或不喜欢，成功或失败）。这



一切在评价统帅们的创作成果时都会有。

但也有只有军事艺术才会引发的感受：这就是对敌胜利、战争行将结束带来的喜悦，为我们的统帅战胜并征服给苏联人民造成如此深重苦难的该死的法西斯匪徒而产生的自豪。最后，还有一种为死难的亲人们复仇这种痛苦而又甜蜜的感觉。

而且所有这些感受是全民的大感受。绘画、雕塑、舞台演员能使成百上千亲眼目睹这些巨匠艺术作品的人为之赞叹；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军事艺术对所有同胞都具有十分广泛的影响，使他们产生了激情、自豪感、培养了爱国主义，增强了信心，增加了与敌人继续斗争的力量。回想一下，当斯大林和朱可夫在莫斯科近郊歼灭德军时人民是多么欢欣鼓舞啊！还有斯大林格勒合围、库尔斯克突出部、行进中渡过第聂伯河——“东方壁垒”！

不错，不是斯大林一个人策划并实施了这些战役，我军其他优秀的统帅为了这些战役的实施也付出了许多智慧和精力，但几乎所有这些战役最初的动机、思想的萌芽、合理决策的精髓，都是由斯大林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提出来的。这一点，是一知半解者，而且不只是一知半解者，还有职业评头论足者，无论怎样费尽心机地散布谎言和歪曲真相，都无法回避、隐瞒、讳言和歪曲的。

再回过来看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这一战役令我，甚至令每一位军事专家对其出色的意图以及更为出色的实施赞叹不已。

在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中，斯大林在没有通过大本营代表这些调理员的情况下，亲自指挥了5个方面军的战斗行动！战役正面长达500公里，我军一举驱敌深入500公里，战役持续了25个昼夜。实施战斗行动的有331个师、26个旅（步兵、坦克兵、骑兵、空降兵），除此之外，参加战斗的还有：波兰军队第1集团军——5个师、罗马尼亚第1、第4集团军——10个师、捷克斯洛伐克第1军——3个旅。（5个方面军）总计4 385 200名官兵及将军。

德军60个师被歼，25个师丧失战斗力。波兰获得解放。我军进入了德国境内并前出至奥得河，占领了通往柏林要冲上的登陆场。

不妨比较一下：参加大规模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共有3个方面军、74个师、34个旅、1 113 500名官兵。

胜利日十周年（1955年）前夕，总参谋部军史局受托（除了其他工作外）判定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军事艺术上最杰出的战役。军事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再次仔细研究并评价了1941~1945年的战斗行动进程，最终判定，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是统帅技能最杰出最优秀的战役。



只是当时并没有指出这一大会战是由斯大林指挥的。在此之前斯大林已经去世，将他抛到九霄云外，对他抹黑的时期已经开始。

十一 在敌人一方

(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期间)

德军总参谋长古德里安从一开始就已经大体上明白了我军的进攻计划。关于此次进攻的准备情况，他也同样从各情报机关的情报以及由他们抓获的我方被俘人员的口供中有了清楚的了解。因此他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到1月14日，俄国人的计划已经清楚。”

古德里安明白，苏军将会在华沙—波兹南—奥得河方向实施主要突击。他向在西战场的希特勒报告了大规模进攻已经开始的情况并请他立即到柏林来，希特勒照办了。希特勒在听取了古德里安的报告后下令西战场各地段转入防御，将各预备队，而且不只是预备队，而是所有可能动用的兵力全部从西战场调往这里——调往东战场。

但当希特勒下令将由西战场前来的第6集团军派往匈牙利，而不是柏林方向时，古德里安惊呆了。古德里安试图证明在目前态势下如此使用坦克集团军是不合适的，但是希特勒并没有考虑他的理由，而是固执己见。

希特勒在论证他的决策时说：

“匈牙利的石油储备和炼油厂对我国的工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敌人会用空袭来摧毁我们的化工厂。如果你们没有了燃料，你们的坦克就开动不了，你们的飞机就飞不起来，这点你们应该承认吧。可是我的将军们却对军事经济一窍不通。”

古德里安建议希特勒在前“A”集团军群（从1月25日起改称“中央”集团军群）和前“中央”集团军群（现称“北方”集团军群）之间的地区组建新的集团军群。这个集团军群应当在该地区重新组织防御并暂时停止进攻敌人。古德里安建议将陆军元帅魏克斯男爵指挥的在巴尔干的集团军群司令部调到这里来，以便他能够依靠现成的组织核心马上着手指挥战斗行动。然而希特勒不同意这一建议：

“陆军元帅冯·魏克斯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疲惫不堪的人，我不相信他能够完成这项任务。我任命党卫军帝国长官希姆莱担任这一集团军群司令。”

古德里安的回忆录说：

“这一大错误使我极度恐慌。我摇唇鼓舌，就是为了让不幸的东战场摆脱这一荒唐主意。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希特勒肯定地说，希姆莱能



够很好地完成他在上莱茵河上的任务。他手边有预备军团，很快就能加以使用，所以，他会比任何人都能为新战场提供兵员和装备。就连将魏克斯运行良好的司令部转交给党卫军帝国长官的尝试也失败了。希特勒命令希姆莱亲自为自己挑选司令部。”

当时我军使用上面提到过的那些势如破竹的突破方式实施拟定的计划。德军总参谋长在他的笔记中谈到了这点：“到1月27日，俄军的进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灾难的日子在越来越快地到来。”

当先遣支队快速前出至奥得河并夺取了河西岸的两个登陆场后，古德里安给希特勒提了一个他在当时情况下认为应采取的最合理行动的建议：他请求希特勒放弃进攻匈牙利，把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撤离的兵力集中起来，利用苏军主力滞后的态势，开始进攻朱可夫部队的翼侧，即突入奥得河的楔形部队的翼侧。因此，他想切断朱可夫突前的先遣兵团。古德里安在解释他的用意时这样说道：“我希望借此来加强对帝国首都的防御以至加强对整个国家领上的防御，争取时间对与西方大国进行停战谈判来说是必要的。”（请想一想，斯大林预见到了这一点！）

希特勒在大体上并不否认这一意图，但并不同意停止在巴尔干的战斗行动，不同意将部队的残部从意大利、挪威、波罗的海沿岸调回。怒气冲冲的古德里安明白这是最后的机会，开始非常强烈地坚持自己的建议：

“您不要以为我坚持放弃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是由于我固执己见。我实在是看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组建预备队的可能，而没有预备队我们是无法保卫帝国首都的。我不过是在为德国努力！”

希特勒气得浑身发抖，说：

“您怎么敢跟我这样说话？您以为我不是在为德国而战吗？我的整个一生都在为争取德国的利益而斗争。”

戈林为了让元首平息这种盛怒，拽着古德里安的衣袖把他带到了隔壁房间。过了一会儿，古德里安又被叫到元首那里，但他依然没有看到别的摆脱处境的出路，于是又开始坚持自己的建议，要求集中一切可能集中的预备队，尤其是来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兵力，作对柏林防御的准备。房间里再次出现暴跳如雷的场面。最好还是引用古德里安本人的描述吧：“他挥舞着拳头站在我的面前，而我好心的参谋长托马勒则拽着我军服的后襟，生怕我们动手打起来。”

希特勒不同意这些理由，于是总参谋长在这次会议后对当前态势再次进行了评估并计算了将其他方向上的预备队集中到这里后出现的种种可能，然后得出结论说：“据我根据盖伦将军获取的关于敌军的情报计算，俄军有可能每天往奥得河调集近4个师的兵力。由此看来，必须趁

俄军没有调来大批兵力或是趁他们还没有识破我们的意图时以闪击般的快速实施进攻，这样的进攻才有意义。”

在例行会议上，古德里安更加坚持向希特勒说明实施这样的战役（突击翼侧）是必要的。谈话时在场的有“维斯瓦”集团军司令、党卫军帝国长官希姆莱、坦克第6集团军司令莱普·迪特里希及副总参谋长文克将军。古德里安不指望由对纯军事问题不十分在行的希姆莱能实施这样的反突击，他建议将自己的副手文克将军暂派到希姆莱的司令部去。希姆莱开始证明说，这一反突击暂时无法实施，因为尚未运来足够数量的弹药及燃料。而古德里安明白，时间正在流逝，他的整个意图很快就会不为任何人所需要，于是他开始坚持自己的主张：

“我们不能等卸完最后一桶汽油和最后一箱炮弹才动手。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俄军会变得更加强大。”

希特勒插话说：

“我不许您指责我，说我在有意等待！”

“我没有对您进行任何指责，但要知道等待所有补给品卸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要知道我们有可能失去进攻的合适时机。”

“我刚刚已经跟您说过了，我不希望听到您指责说我有意等待！”

“我也刚刚跟您报告了，我并不想对您进行任何指责，我只是不希望等待。”

“我不许您指责我有意等待。”

“应当暂派文克将军到帝国长官的司令部去，否则的话，进攻的胜利没有任何保证。”

“帝国长官有足够的兵力，能自己完成任务。”

“帝国长官没有能够独立实施进攻的作战经验和良好的司令部。文克将军必须在场。”

“我不许您跟我说帝国长官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还是不得不坚持将文克将军暂派到集团军群司令部去，以便由他来对战役进行合理的领导。”

对这场只配在公用厨房里进行的吵嘴，古德里安作了如下评论：“希特勒气得满脸通红，挥舞着拳头站在我的面前，因狂怒而全身发抖，完全失去了自制力。每一次发怒后他都开始在地毯上来回地跑，然后停在我的面前，几乎是脸挨着脸，对我进行新一轮指责。这时他高声大叫，连眼睛也鼓出来了，太阳穴上胀起的静脉清晰可见。”

在这样的吵嘴之后，希特勒跑到屋角的壁炉前，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喘了口气。然后他返身过来，几乎平静地对帝国长官说：

“好吧，希姆莱，今天夜里文克将军到您的司令部去，负责指挥



进攻。”

然后他转向文克命令说：

“文克将军，我命令您马上到‘维斯瓦’集团军群司令部去。”

希特勒讲完后坐到椅子上，并请古德里安并排坐下，甚至微微笑了笑，说：

“请继续您的报告。今天总参谋部获胜了。”

但是文克并非肯定不会辜负古德里安的信任。2月16日，劳斯上将的坦克第3集团军突击了朱可夫的翼侧，2月17日，文克为了报告这次进攻的战果，来到希特勒的大本营。但文克由于在组织这次反突击时过分劳累，而且在去希特勒那里的路上以及在向希特勒报告时也耗费了不少精力，感到非常疲倦。他在坐车返回斯德丁的时候发现，他的司机由于没有睡够几乎东倒西歪了。文克心疼司机，就自己开车，但没过一会儿他自己也睡着了，汽车撞在了桥上的障碍物上。文克被撞成重伤，在医院里躺了几个星期。古德里安任命陆军元帅莫德尔的前任参谋长克雷布斯接替文克的工作。克雷布斯是一位典型的参谋，几乎没有在前线的战斗中指挥过兵团，可是古德里安手头又没有其他人选，只得任命他。老练的参谋克雷布斯在给希特勒的第一份报告中极巧妙地描述了正在扩展的反突击的战果，希特勒因此授予他“柞树叶十字勋章”。

但是，众所周知，任何妙笔生花的报告都无法改善前线的状况，反突击没有获得胜利，辜负了对它所寄予的希望。而来自“维斯瓦”集团军群司令部的报告变得越来越少。经验丰富的克雷布斯现在看来不大敢报告有关军队行动中的失利情况。古德里安用无线电也联络不上，为了得到详细的信息，他决定亲自去“维斯瓦”集团军群司令部。

希姆莱的参谋长拉默丁将军也是党卫军分子，他在例行问候之后告诉古德里安的第一件事是：

“您不能解除我们司令的职务吗？”

“这是党卫军的事。他是你们的帝国长官。顺便问一下，总司令在哪里？”

“帝国长官病了，他现在住在赫勒亨疗养院。他的私人医生格布哈特教授在那里为他治疗。”

古德里安来到这个疗养院，令他吃惊的是，希姆莱只是患了感冒之类的小病，却离开自己的部队，在危急之际对自己如此在意。希姆莱的这种行为使总参谋长对他更不尊重，于是他不加掩饰地对帝国长官说，他兼职太多：德国警察局局长、帝国内务部部长、预备队集团军司令、“维斯瓦”集团军群司令……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很多时间、精力和健康，这一点希姆莱大概已再次确信不疑了。古德里安感到希姆莱本人为



前线的失利丧魂落魄，很乐意辞去司令一职，于是便建议说：

“我觉得，您应当放弃集团军群司令的职务而专心履行自己的其他职责。”

“这件事我不能跟元首说。他不会同意的。”

“那就让我去跟他说好了。”

希姆莱同意了。就在这天的晚上古德里安说服了希特勒，使他相信希姆莱指挥“维斯瓦”集团军群不很成功，许多失败的发生都只是因为在军事上不在行。希特勒同意撤换他。海因里希上将被任命为集团军群司令。

又一次要攻克苏军在屈斯特林地域登陆场的战役以失败而结束。希特勒为失利而指责第9集团军司令布塞将军。布塞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希特勒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佛兰德，也是这样一场战役，消耗的炮弹比这次要多几倍。”

古德里安试图为布塞将军辩解，说：

“可是布塞没有那么多弹药，因此消耗的弹药不可能超过他所拥有的弹药。”

“那您就该对这事上点心！”

3月28日，古德里安到希特勒那里报告战况，布塞将军也被召见。希特勒命令布塞将军第一个作关于态势的报告。但他还没来得及讲几句，希特勒就马上打断他的话并开始指责他失利，再次说，弹药消耗量小是失利的原因之一。

古德里安忍不住说：

“请允许我打断您的话。昨天我口头，后来还书面作了详细报告，说布塞将军对进攻屈斯特林失利没有过错。第9集团军使用了它所拥有的全部弹药，部队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他们的伤亡巨大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我请求不要再指责布塞将军。”

出现了冷场，过了一会希特勒打破沉默说：

“除上将外，我请大家都离开房间！”

大家很快离开了希特勒的办公室。元首继续说道：

“古德里安上将！您的健康状况说明您需要立即休假六个星期！”

古德里安举手行了一个纳粹礼并一字一顿地高声说：

“我去休假！”然后向门口走去。但是当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希特勒说：

“在报告没结束前还请您先留下来。”

古德里安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会议的其他参加者也被请了回来，于



是关于态势的报告继续进行。希特勒再也没有抨击布塞将军。希特勒为了缓和气氛并表明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所讨论的问题几次征求古德里安的意见。

会议结束后古德里安、凯特尔、约德尔和布格德费尔留在了办公室里。希特勒试图平息争执说：

“请多考虑考虑恢复健康的事吧。六个星期内态势会变得很危急，到时候我会非常需要您的。您打算去哪儿？”

凯特尔建议说：

“去巴特利本斯坦吧。那儿多美呀。”

“美国人已经在那儿了。”古德里安生气地嘟囔了一句。

“那就去哈茨，去巴特萨克谢尔吧。”关怀备至的陆军元帅若无其事地建议说。

“谢谢您，陆军元帅。我自己会挑选休假地方的。而且得是敌人在48小时内不能占领的地方。”

古德里安再次举手行礼之后走出了元首的办公室。

我们一个较量多年、极富经验的对手的仕途就此结束。他再也没有参与指挥战斗行动。5月10日签订无条件投降书后，古德里安成了美国人的俘虏。

这场战争中最后交战——柏林战役——的时刻即将来临。

十二 胜利前夕

斯大林获悉，盟国利用希特勒匪徒在西战场不进行顽抗的时机——因为所有兵力都投向东线对付俄军——决定先行攻下柏林，尽管按雅尔塔协定，柏林已被纳入苏军占领区。

丘吉尔致信罗斯福说：

“俄国军队无疑将占领整个奥地利并进入维也纳。倘若他们再占领柏林的话，他们是否会不适当地得出印象，好像他们对我们共同的胜利做出了绝大部分贡献，这种印象是否会使他们产生一种给未来造成极为严重困难的情绪？因此，我认为从政治观点来看，我们应尽可能地向德国东部推进，如果柏林在我们可达距离范围之内的话，我们无疑就该加以占领。从军事观点来看这也是合理的。”

斯大林决定以两个方面军——（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兵力来迅速实施柏林进攻战

役。他指示总参谋部按他的意图着手制定战役计划。

什捷缅科写道：“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在总参谋部仔细研究过有关柏林战役的所有基本想法。”

应当指出，斯大林在作出这一决策后，下令召见朱可夫。

朱可夫元帅在他的书中，在谈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前的一章里谈到：“1944年10月底和11月初，我曾执行最高统帅的委托，仔细研究了最后战局的主要问题，首先是柏林方向上各个战役的计划。”

朱可夫是副最高统帅，所以他以他的职务身份，受斯大林的直接委托同总参谋部一起制定了这一方案。

3月7日，斯大林再次把朱可夫从前线召回。他们在斯大林的别墅里会面。最高统帅向朱可夫讲述了雅尔塔会议的情况。但他把元帅从前线召回主要为的是另一件事：

“斯大林对我说：‘您到总参谋部去和安东诺夫一起检查一下关于柏林战役的计算，明天中午13时我们再在这里见面。’”

我和阿·因·安东诺夫在我的办公室里一起度过了这一天白天余下的时间和半个夜晚……

我们再次检查了将有三个方面军参加的柏林战略性战役的计划草案和计算。由于这一问题在大本营和总参谋部已讨论过不止一次，这次我们只是根据东普鲁士、但泽地域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战役进展缓慢的情况作了一点修改。

第二天早晨，最高统帅打电话给阿·因·安东诺夫，告诉我们不是在13时，而是在20时到他那里去。

晚间，国防委员会的许多委员也参加了柏林战役问题的讨论。阿·因·安东诺夫作了报告。

最高统帅批准了我们的所有建议并命令向各方面军下达必要的对柏林战略方向上的决定性战役进行全面准备的指示。”

但是在制定柏林战役计划时，斯大林并不局限于这一问题。过了一段时间，朱可夫又在他的书中写道：

“3月29日，我应大本营的召唤，带着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柏林战役计划再次返回莫斯科。这个计划是由方面军司令部及方面军领导人在3月份制定的，一切原则问题基本上都事先与总参谋部和大本营商议过。这就使我们能够呈送一份很细致的计划给最高统帅部审批。”



当天深夜，斯大林把我叫到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去。当时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他刚刚同国防委员会委员们开完会。

他默默地同我握过手后，像往常一样，似乎是在继续不久前中断的谈话似地说道：

‘西线德军已经彻底崩溃了，但是看样子希特勒匪徒并不想设法阻止盟军的推进。然而他们在同我们作战的各个重要方向上，却在加紧部署兵力。您瞧瞧这张图上关于德军的最新情况。’

最高统帅抽着烟斗，继续说道：

‘我想，将会有一场恶战……’

然后他又问我如何估计柏林方向上的敌人。

我取出自己的前方侦察图放在最高统帅面前。于是斯大林就仔细察看德军在柏林战略方向上的战役战略部署……

‘我军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进攻？’斯大林问道。

我报告说：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最迟于两个星期后就可以开始进攻。乌克兰第1方面军大致到那时也能作好准备。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从各种情况看，将拖到4月中旬才能彻底肃清但泽和格丁尼亚地域的敌人，因而不能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同时从奥得河展开进攻。’

‘好吧，’斯大林说，‘只好不等罗科索夫斯基方面军的行动就开始战役了。即使他晚几天问题也不大……’

……他走到写字台前打电话给阿·因·安东诺夫，叫他马上过来。

15分钟后，阿·因·安东诺夫来到最高统帅的办公室。

‘罗科索夫斯基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阿·因·安东诺夫报告了但泽和格丁尼亚地域的态势和作战情况，接着最高统帅又询问了亚·米·华西列夫斯基在柯尼斯堡地域的情况。

安东诺夫报告了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情况。

最高统帅对阿·因·安东诺夫说：

‘您给科涅夫打电话，命令他4月1日带着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战役计划到大本营来，而这两天您同朱可夫再对整个计划作些研究。’”

科涅夫是4月1日到达大本营的（当时战役计划已制定完毕），可是几十年后他却说他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制定柏林战役的计划。假如科涅



夫元帅不知道朱可夫和斯大林几次见面，不知道朱可夫作为副最高统帅制定柏林战役计划的工作，那或许可以把他回忆录中写的东西看作是令人遗憾的不了解情况。但糟糕的是，科涅夫的书是在1969年朱可夫元帅的回忆录发表后于1972年出版的，所以上面所引用的所有朱可夫元帅书中关于柏林战役计划制定情况的文字科涅夫自然是读到了的。

那么用什么来解释科涅夫的所作所为呢？可以用对1957年十月全会后《真理报》上发表的他的一篇极其不成体统的往朱可夫身上泼脏水的文章来解释。

科涅夫元帅把个人对朱可夫的恶感（顺便说说，朱可夫曾不止一次救了他，使他没有被处决）、自己的自负置于历史真相之上，这种做法并未给他带来荣誉。但我绝非想以此来贬低他作为统帅的战功。我只不过是想通过这个例子来再次强调指出，所有在斯大林去世后有关斯大林的和1957年以后有关朱可夫的文字都取决于作者是否光明磊落。

在简短的叙述中没有可能，甚至也没有必要描述结束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超大规模的战略战役的作战进程。

斯大林密切关注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顺利进攻，它比右邻友军更快地逼近柏林。斯大林有意让朱可夫和科涅夫的自尊心发生冲突，促使他们产生竞争心。

* * *

交战双方都在准备进行决定性的最后一战。希特勒统帅部将一切可以调动的兵力都调到柏林方向上：48个步兵师、4个坦克师、10个摩托化师、37个独立步兵团、98个独立步兵营及其他的部队。这些部队被编成两个集团军群——“维斯瓦”集团军群（包括坦克第3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中央”集团军群（包括坦克第4集团军和野战第17集团军）。在这些兵团中总共有100多万人、1500辆坦克和强击炮、3300架飞机。雷曼中将被任命为防御柏林的卫戍司令，希特勒任命他最亲近的人——戈培尔担任对首都防御负主要责任的最高委员。

1945年3月9日，雷曼将军颁布了帝国首都防御准备的特别命令。

戈培尔以他特有的干劲着手组建国民突击队，为了同苏军坦克作战给它们配备了长柄反坦克火箭弹。他甚至开始着手组建妇女营，断言许多爱国妇女将纷纷写申请，要求为保卫首都贡献全部力量。戈培尔认为，当前的态势就像希特勒军队准备攻占莫斯科时苏军所处的态势。他决定利用苏军的经验，为此他召见了一位“莫斯科保卫者”——弗拉索夫将军。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戈培尔询问了如何更好地保卫柏林的建议，于是弗拉索夫就出了一些主意。

后来戈培尔向希特勒讲了他与弗拉索夫谈话的内容，希特勒称赞了



他利用俄国人保卫首都的经验的做法，赞成他组建妇女营的想法。希特勒说：

“我们现在的任务应当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必须坚持住。尽管敌人阵营的危机已有相当大的增长，但问题依然是在我们尚能防御之前未必会发生爆炸。而这正是胜利结束战争的前提条件。要让危机在我们被击溃之前炸毁敌人的阵营。”

在进攻莫斯科战斗时期，希特勒统帅部和戈培尔对苏军将领评价不高，他们称苏军将领无能，认为战争即将结束，而且这些将领这么快就被打败了，刚好证明了他们的无能。而现在，戈培尔在准备柏林防御时，却要求提供有关苏军将军的材料，他在看了提供给他的材料后在他的日记中作了如下笔记：

“总参谋部向我提供了有苏联将军和元帅传记及照片的专案文件……这些元帅和将军几乎都不到50岁……他们革命政治经历丰富，是坚定不移的布尔什维克，精力异常充沛，而且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有良好的人民基础……总之，不得不得出令人不快的结论，即苏联军事领导人来自比我们优秀的阶级。”

因此，就我军将领这件具体事而言，戈培尔的评价相当客观。在战争初期，他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因为他们让敌人打到了莫斯科，而现在他给予他们十分高的评价，是因为他们历尽艰难，将自己无往不胜的军队带到了柏林城下。

戈培尔明白希特勒的处境非常困难，所以他竭力试图支持希特勒日益低落的斗志。为此他向希特勒讲了希特勒热爱的历史人物腓特烈大帝经历过的情势。例如，他给希特勒描述了腓特烈大帝一生中最危急的时刻。当时腓特烈由于屡遭失败而准备自杀，这时他的一位亲信对腓特烈说：“稍等一等，你苦难的日子就将过去，你幸福的阳光被乌云遮住了，但很快就会照耀到你的身上。”预言果真应验了。俄国女皇伊丽莎白突然去世，这才使腓特烈没有在七年战争中可耻地彻底毁灭。戈培尔给希特勒讲这段历史是为了支持他对某种奇迹的期待，实际上是希特勒本人臆想出来的奇迹：期待盟国很快失和，德国因此得救。

真是无巧不成书：这次谈话后几天果真发生了“历史奇迹”。戈培尔兴高采烈，笑逐颜开，跑进希特勒办公室高兴地叫道：

“我的元首！我祝贺您。奇迹发生了！罗斯福总统去世了！”



希特勒的大本营里像是在过真正的节日。大家喝着香槟，祝贺元首料事如神，因为大家都认为罗斯福之死就是希特勒不止一次说过的转折点。元首给各集团军司令、其他高级官员打电话，为的是将这一令人高兴的消息立刻告诉他们，希望也能鼓舞他们更加积极地行动。

希特勒高兴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杜鲁门当政确实预示着局势会向比较好的方面转变。在德国流传着杜鲁门早在1941年6月讲过的话：“如果我们发现德国获胜，我们就应当帮助俄国，而如果俄国获胜，我们就应当帮助德国，这样就可以让他们厮杀得更厉害……”

就在罗斯福葬礼后的第二天，杜鲁门召开了军事领导人和金融巨头出席的会议。杜鲁门说，为了保住德国，必须改变罗斯福的政策并寻求某种妥协。他非常担心，苏联胜利结束战争将使欧洲变成共产主义的大陆。杜鲁门宣称：“要很快让俄国人头脑清醒起来，美国将领导世界沿着该走的路运动。”然而杜鲁门并不能立即着手具体实施他的这一新方针。关于这一点美国历史学家托兰德说得好：“即使是杜鲁门有这样的打算，比如说更坚决地反对俄国，但这一点实施起来却会异常困难，因为绝大多数美国民众是赞成罗斯福的与俄国友好的政策的。”另外美国还要艰难地结束对日战争，这一点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因为按照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苏联承诺在击溃希特勒德国后对日宣战。而为了不失去自己盟国的这一强大而实际的力量，杜鲁门被迫暂且秘而不宣他对苏联的不友好态度。

* * *

于是决定性交战的一天来到了。

4月16日夜，朱可夫来到近卫第8集团军司令崔可夫将军的观察所，朱可夫决定在这里指挥部队作战。朱可夫在来的路上顺便去了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司令卡图科夫将军那里，再次确信该集团军已为完成任务作好了充分的准备。之后朱可夫又去了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司令波格丹诺夫将军那里，这里也已一切就绪。元帅抵达崔可夫的指挥所后，通过电话再次确信各部队已为交战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就像朱可夫所回忆的那样，最后的时刻是非常难熬的。尽管将军们为了缓解情绪喝着茶，但他们内心的激动是很容易就能想像得出来的。

凌晨5时，刹那间仿佛天崩地裂，万炮齐鸣，爆炸声震天动地：火炮准备就此开始。过了一会，航空兵兵团一批接一批地出现在这片隆隆作响、火光四射、泥石翻起的土地上空。不计其数的炮弹（只要指出运来的弹药有2450车皮就足够了）在30分钟内倾泻到敌军的阵地上。火炮一共发射了1236000次。敌柏林集团中的每一个防御者几乎都摊到一发炮弹。



朱可夫在注视火炮准备，没有发现敌人火力还击，于是决定将火炮准备缩短到30分钟。这一决定被执行了。接着徐进弹幕射击开始向敌军防御纵深延伸，步兵和坦克发起冲击。这时相隔200米一盏的140盏探照灯突然同时亮起，朱可夫希望这出其不意的一片海似的灯光亮起，不仅会使敌人眼花缭乱并给苏军照亮道路，而且主要是要对敌人的心理造成影响，因为这样的强光使人莫名其妙，不知所措，以为是一种新式武器，应当吓倒并在精神上压垮敌人。我想，朱可夫决定使用这些探照灯，是在运用他在哈拉哈河战斗的经验。那里曾发生过令人非常难堪的事，当时日本坦克在冲击时开着前灯和另外加安在炮塔上的探照灯，在夜战中这种强光照射令我军感到莫名其妙，出乎意料，日本人取得了非常有利的心理效果。我军防御部队陷入慌乱之中，放弃了阵地。是朱可夫将坦克旅投入反冲击，才恢复了局面。但朱可夫也记住了心理作用的效果并决定在这里、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使用这种方法来压垮敌人，减少自己部队的伤亡。

然而军事专家们对使用探照灯的评价各有不同。一部分人认为，它们确实能在精神上压垮敌人，使敌人眼花缭乱；另一部分人则说，这种光不会带来应有的效果，因为在火炮准备时地面扬起的尘土、烟雾形成一道密不能透的厚墙，探照灯的光是无法穿透它的。朱可夫本人以欣赏的口吻写下了自己的印象：“……强光照亮了战场，晃得敌人眼花缭乱，从黑暗中显露出我军坦克和步兵所冲击的目标。这种场面给人留下非常强烈的印象，可以说，我一生从未有过类似的观感！”

随着双层徐进弹幕射击，我军步兵和坦克于黎明前占领了敌军第一阵地。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我军没有发现预料的在如此猛烈的炮火之下应出现的大量尸体。敌人预料到火炮准备强大，将其主力撤到了防御纵深地区。这不仅非常出人意料，而且对朱可夫来说是件不愉快的事。部队继续向前推进，但是遇到的抵抗越来越大。我军在前出至泽劳弗高地后停止了前进。

后来查明，敌人的主要防御地区正构建在这里即泽劳弗高地上。这一高地的陡坡是非常难以通过的障碍，首先是对坦克，对步兵也是如此。而高地后的一大片台地隐藏着在纵深处的敌军构筑的防御配系和敌炮兵阵地。朱可夫写道：“到13时，我已完全明白，敌人在这里的火力防御配系基本上还是完整的，倘若我们仍保持开始冲击和进攻时的那种战斗队形，要攻克泽劳弗高地是不可能的。”

朱可夫觉得他的意图落空了，没有做到连续不断、不停顿地向柏林方向运动，冲击在头几公里处就中止了。不过朱可夫明白他拥有大量兵力，这些兵力能够突破任何防御，便决定在交战第一天即投入两个坦克



集团军，尽管本来计划是在敌人的战术防御被突破、坦克可以在战役纵深深处行动后才动用坦克集团军的。朱可夫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承担了在无法突破的敌人阵地防御的条件下使用坦克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伤亡的责任。

加之，朱可夫没有向最高统帅报告就决定将两个坦克集团军投入战斗。他担心如果报告了这件事，斯大林会不许他把这些集团军投入战斗的。但是朱可夫不能允许自己落在左邻科涅夫的后面。这一点在他交战的第一天即冒险使用坦克集团军的决定中起着不小的作用。

下午3时朱可夫才向斯大林报告说：

“敌人的第一、第二防御阵地已被突破。方面军部队推进了6公里，但是在泽劳弗高地一线遇到敌人的顽抗，看来敌人在该处的防御基本上还是完整的。为了加强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的突击，我已把两个坦克集团军投入交战。我认为到明天白天结束时我们将突破敌人的防御。”

斯大林听了这一报告后平静地说：

“科涅夫那里敌人的防御比较弱。他不费力气就强渡了尼斯河，向前推进时也没有遇到特别的抵抗。您要用轰炸航空兵来支援各坦克集团军的突击。晚上您再打电话给我，看你们那儿的情况如何。”

不难看出，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讲科涅夫部队的顺利推进是在刺激朱可夫的自尊心。

争夺泽劳弗高地的战斗仍然没有取胜，部队无法攻克这一重地。随着两个坦克集团军投入战斗，部队在大路上集结，而且由于没有预先规定在最初阶段投入这些集团军，所以与步兵部队和步兵兵团的协同行动被打乱了。步兵第79军军长佩列韦尔特金将军在他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1945年4月18日，在梅格森地域聚集了三个坦克旅。1945年4月18日19时30分我来到这一地域；21时我下令准备冲击敌人的炮火和步兵。我通过坦克第9军坦克第23旅参谋长卡特尔洛夫向旅长传达了让该旅作好准备并与步兵协同击溃敌人、开始突破的命令。

旅长莫罗佐夫没有执行我的命令，所以，尽管步兵整宿都在冲击敌人，进攻并推进了5公里，但坦克却没有投入突破。

凌晨2时，我再次下令找一个旅长来。4时，找到了近卫坦克第9军坦克第65旅旅长马克西莫夫中校，他拒绝到我这里来协调协同动作的问题。

在三昼夜战斗中步兵不间断地战斗，推进了26公里，而坦克在此期间却始终在步兵战斗队形的后面磨蹭。”

晚上，朱可夫遵照最高统帅的命令，向他报告了那一天的战果。那是令人不快的结果：泽劳弗高地没有攻下。但是朱可夫保证第二天傍晚攻下这一地区。

斯大林这一次同朱可夫说话时已不太冷静了：

“您没有按大本营的要求去做，让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在近卫第8集团军的地段上投入交战，结果毫无益处。你们明天有把握攻下泽劳弗地区吗？”

朱可夫尽量坚定地回答说：

“明天，4月17日，白天结束之前泽劳弗地区的防御将被突破。我认为敌人为迎击我军在这里投入的部队越多，我军攻克柏林就越快，因为在开阔地里比在城市里更容易消灭敌军。

我们打算命令科涅夫把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的两个坦克集团军从南面调来，命令罗科索夫斯基加速渡河并从北面对柏林实施迂回突击。科涅夫的两个坦克集团军完全能够迅速推进，应当让他们突击柏林，而罗科索夫斯基在4月23日之前不可能展开进攻，因为他在渡河时还会耽搁。”

斯大林没再和朱可夫说什么，也没给他提出任何任务，只是干巴巴地说了声：“再见”。然后挂上了话筒……

科涅夫打电话给斯大林报告战斗行动进程。

斯大林打断他的话说：

“可是朱可夫那里的战斗进展困难。至今还在突破防线。”

斯大林讲了这句话后不再作声。科涅夫也不再说话，等着他继续往下讲。斯大林突然问道：

“可不可以调动朱可夫的快速部队，让他们通过你们方面军所在的地段上已形成的突破口进攻柏林？”（斯大林希望不伤朱可夫的自尊心！）

科涅夫听完斯大林的问题后，报告了自己的意见：

“斯大林同志，这会花很多时间的，而且会引起很大的混乱。坦克部队没有必要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往我们已完成的突破口调动。我们这里事态发展良好，兵力充足，我们能够调我们的两个坦克集团军去进攻柏林。”

科涅夫讲了这点后，进一步明确了两个坦克集团军将要去的方向，说是柏林以南25公里处的小城佐森方向。

“您是按多大比例尺的地图报告的？”斯大林问道。

“二十万分之一。”

斯大林在短时间停顿（这时他想必是在地图上找佐森）后回答说：



“很好。您知道吗，希特勒总参谋部大本营就在佐森。”

“是的，我知道。”

“非常好，”斯大林重复道，“我同意。把两个坦克集团军调往柏林。”

谈话至此结束。

斯大林在当时的态势下所作的决策大概是惟一正确的决策。

十三 在敌巢里

4月16日、17日，苏军进攻暂停，德军统帅部大本营因此十分高兴。希特勒兴奋地说：

“我们击退了这次突击。俄军在柏林城下将遭到最惨痛的失败！”

元首发表了致部队的特别呼吁书。他在呼吁书中根据反击苏军进攻的第一天所取得的战绩说，这是取得未来胜利的征兆，这场战争的决定性转折正在到来。

希特勒和他最亲密的战友们疯狂地努力挑起盟国之间的争执，设法与英美联军单独媾和。4月18日，沃尔夫来到大本营，汇报了他同杜勒斯会面和达成初步协议的情况。希特勒高度评价沃尔夫的成就，当场任命沃尔夫为大队长这一党卫军高级职务。沃尔夫得到指示，继续接触并尽快同英美统帅部达成协议。

沃尔夫返回意大利后，与杜勒斯进行了会晤，继续就单独媾和及德国战后重建问题进行谈判。苏联统帅部获悉这一情况后，发表声明表示抗议。因此，美国政府指示杜勒斯停止单独媾和的谈判，但是他无视这一指示，继续进行接触。

德军统帅部由于考虑到与英美的幕后谈判进展顺利，所以，实际上已经停止在西战场的战斗行动。丘吉尔，现在又加上杜鲁门，竭力敦促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尽快向东挺进并抢占更大的地盘。丘吉尔更是尽心竭力，他想方设法使盟军先于苏军进入柏林。

而在东战场上，这时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争夺泽劳弗高地这场血战格外艰难。朱可夫的部队终于攻破了这道防线，摧毁了敌人的抵抗。到4月18日，泽劳弗高地被攻克。敌人为了夺回失去的阵地，投入了所有的预备队。但是，苏军由于在炮兵方面，甚至兵力上占有优势，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反扑，打垮了他们的一次次冲击，不断向前推进。到4月19日，这里的所有防线都被突破。朱可夫的坦克兵团终于有了作战行动的自由。他们勇猛地从东北方向包抄柏林，而那些配属到部队的坦克军和坦克旅继续同步兵一道挤压敌人，直接朝城市方向进



攻。希特勒匪徒将其残部调到柏林外部环形防御线。朱可夫如愿以偿：将敌人的主力歼灭在野外！

下面我要叙述发生在敌方的事件。这些事件广为人知，不止一次地被书刊描述过，但是这些事件常常是在“第一时间”被报道的，许多情况还没有搞清楚，不少都是虚构和传闻。我现在描述的希特勒大本营在最后日子里所发生的事件，对以往的描述作了纠正和补充，这些内容也许不为广大读者所知。

4月20日，希特勒过了他的生日。从前，这一天是盛大的节日，要举行盛大的游行和阅兵。不仅柏林，而且全国都彩旗招展，广播里响彻对元首丰功伟绩的赞颂。今天，希特勒是在地下暗堡的一个小房间里接受生日祝福的。他最亲密的战友们来到这里，用传统方式表达自己的祝贺。他们中有戈林、希姆莱、博尔曼、戈培尔和里宾特洛普，他们都是长期与希特勒朝夕相处的将领。

这时的希特勒已经衰弱不堪，他的手脚和脑袋都在颤抖。他在接受祝贺时，双眼低垂，低声答谢，对眼前所发生的事无精打采。

希特勒青年团的独臂领导人阿克斯曼按照青年领袖的惯例，慷慨激昂地向元首表示祝贺。他告诉元首说，希特勒青年团在元首生日之际给他呈送一份礼物。然后，阿克斯曼邀请希特勒走出暗堡。这里列队站着两排扛着长柄反坦克火箭弹的十五六岁的男孩。

这是希特勒最后一次走出防空洞。他耷拉着肩，步履蹒跚地检阅着队伍。他拍拍一些孩子的肩，又抚摸一下其他人的面颊。孩子们仍陶醉于元首往日的荣耀和声望中，他们挺起瘦骨伶仃的胸脯，兴高采烈地注视着领袖。

这天的其他生日礼物难以令人感到欣慰。海因里希将军报告说，沿奥得河的泽劳弗高地防线完全被攻破，苏军正向柏林挺进。总参谋长克雷布斯报告说，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也紧随其他方面军转入进攻，他们正从东北方向向柏林迂回。约德尔将军的通报同样令人心灰意冷，他说，坦克（科涅夫元帅的坦克）已经到达希特勒军队总参谋部各部所在地佐森地域。约德尔由于不想让元首伤透心，因此有一点没有告诉希特勒：德军高级领导人仓皇逃窜，连总参谋部的办公楼和防空洞都没有来得及炸毁。

在生日庆典和香槟酒招待会后，召开了高级领导人会议。这是戈林、希姆莱、里宾特洛甫和其他许多高级纳粹分子最后一次参加的会议。会议讨论了一个问题——下一步怎么办？许多人都明白，柏林的命运早已决定，守不住了，应该在首都之外的某地设立军队指挥机关。只有帝国首都城防委员戈培尔十分固执地坚持认为，应该坚守柏林到最后

一个人。他认为，同英美统帅部的接触有望很快发生转折。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决定将军政领导机构一分为三。希特勒与戈培尔、博尔曼留在柏林，同他们一道留下的还有作战指挥部和陆军总参谋部的部分军官；第二部分领导机构设在巴伐利亚和奥地利，代号为“阿尔卑斯山城堡”，任命凯塞林元帅为最高领导人，他的基本任务与其说是指挥战斗行动，不如说是协助沃尔夫，他同样应该想方设法在与英美统帅部媾和方面取得具体成果；第三个指挥部设在德国北部，由海军上将邓尼茨领导。

会后，所有当日参加生日庆典的人都尽快地乘坐自己的汽车离开柏林。

在希特勒生日这一天，给他送来最后一份，也是最有分量的一份“礼物”的是斯大林的炮兵。这一天，苏军炮兵第一次轰击帝国办公厅地域。希特勒给空军参谋长打电话，要求他用航空兵打击炮轰暗堡区的敌方远射程炮队。但是，空军参谋长科勒都没敢向元首报告，现在炮轰暗堡的已经不是什么要用航空兵打击的远射程炮队，而是从柏林郊区打来的普通的野战炮。

十四 子虚乌有的运动

在奥得河的战斗中，我军第一次与弗拉索夫分子交火。更确切地说，是始终没有建立起来的弗拉索夫集团军的第1师，也是弗拉索夫惟一的一个师参与了一场争夺登陆场的小冲突。在当时交战的大背景下，这件事微不足道，斯大林甚至都不知道这件事。朱可夫元帅的书对通往柏林接近地战斗中的弗拉索夫分子只字未提。

我由于上面已涉及这个话题，而且也承诺过要彻底谈谈弗拉索夫试图建立的“解放运动”，因此不得不讲述这段历史中最后几件事。

德国情报部门在达本多夫成立“东方宣传特科”后，弗拉索夫及其最亲密的助手主要编写传单和培训宣传员。这些宣传员从事鼓动苏联士兵向希特勒匪徒投诚。

为了“从内部”动摇苏军的意识形态基础，德陆军司令部的情报部在弗拉索夫出现之前就试图组织反对派运动。斯摩棱斯克“市议会”编造出一个“俄罗斯各民族解放委员会”并向希特勒作了报告。希特勒不喜欢这个主意。委员会连回音也没听到，打算落空了。

法西斯情报部门的领导人有意扩大自己工作的范围，在弗拉索夫出现后，他们试图复活“斯摩棱斯克方案”。弗拉索夫及其亲信想利用这次机会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他们试图以“俄罗斯各民族解放委员会”



的名义发布呼吁书。

呼吁书印了上百万份。但是……他们收到了极其严格的指示：“这些传单只能扔到敌方领土上。”

希特勒统帅部从来不准许提什么“解放运动”，他们感兴趣的只是瓦解苏军和增加投诚者的数量。斯大林格勒这场大灾难让希特勒的领导集团惊慌失措，盖伦将军的情报人员决定借这次灾难实现他们的利益。他们再次尝试强化创立“解放运动”的想法。这些人安排弗拉索夫将军去“北方”集团军群进行宣传。他在战俘营演讲，呼吁战俘们自愿参加由其组建的“俄罗斯解放军”。这位将军迫不及待，竟然制定出所谓的“光明行动”计划。计划建议，动用志愿军力量占领列宁格勒附近的奥拉宁包姆和喀琅施塔得。情报部长盖伦将军准备支持这一行动，因为这会提高他所领导部门的威信。但是……又是这个“但是”：一方面，这个“但是”让盖伦逃过了失宠的下场，因为他还没来得及去请求实施“光明行动”；而另一方面，这个“但是”让弗拉索夫从他白日梦的高山顶上跌落尘埃。

原来是这样一回事：“北方”集团军群的反谍报人员报告说，这位俄罗斯将军在他的演说中提到什么“自由俄罗斯”和俄罗斯军队，说这支俄罗斯军队将来是德军的“盟军”。总之，这位厚颜无耻的俄国人觉得自己已经是独立俄国的统治者了。

所有这一切都让元首十分震怒。从此，他坚决禁止弗拉索夫从事政治活动。

1943年4月17日，凯特尔发布了专门命令：

俄罗斯被俘将军弗拉索夫的“北方”集团军群之行是在元首和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鉴于他在此行中发表了没有被授权的、肆无忌惮的言论，现在，我命令将其立即单独押回俘虏营，不准其外出。元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意听到弗拉索夫的名字，除了在搞纯宣传性质的活动时，也许会需要他的名字，但不是他本人。弗拉索夫本人再露面时，应该采取措施将其交秘密警察处置，使其不能造成危害。

元帅 凯特尔

这个命令令我格外重视。谈论组建“解放军”一事的文字不知有多少，但都没有提及这个命令。弗拉索夫想组建“解放军”，而事实上希特勒匪徒却不许他实现他的打算。他实际上是盖伦将军情报部的工作

人员，他们不准他干更多的事。

根据元首的命令，1943年后，所有由俄罗斯族和少数民族组成的部队被调往西战场，并以“第四营”的名义加入德军各团。他们被用于与丹麦、意大利、挪威和其他国家游击队和起义者作战。领导他们的是德国的黑尔米希将军和后来的克斯特林将军。他们被称为“东方部队将军”，后来又被称为“志愿军将军”。

弗拉索夫从来都没被允许领导这些部队。而且“志愿军将军”克斯特林向负责监视弗拉索夫的施特里克弗尔特宣布：

“对于元首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先生们来说，弗拉索夫只是一个稻草人。因此，我不想履行我真正的士兵义务和人的义务时与弗拉索夫发生联系。最好不认识他……假如将来我们不得不借助某个俄罗斯知名人物时，我们也应该另找他人。”

这又一次证明，俄罗斯解放军和“解放运动”不过是由讲述这件事的人编造的神话而已。不能无中生有！

请看由弗拉索夫非常亲密的人之一、他的精神导师亚历山大·基谢廖夫大司祭就此提供的证言。我和他是1988年1月在纽约相识的。他住在百老汇边上一座小房子里。在我们通常的想像中，百老汇是霓虹灯的海洋，那里满目广告，精品店、剧院和娱乐场林立。然而穿过市中心来到郊区，尽管是同一个百老汇，却已变成非常普通的街道。街道上到处是啤酒罐、冰激凌包装纸和香蕉皮等城市垃圾。

大司祭住在胡同拐角处的第二栋或者第三栋房子里。房屋的一层是家庭教堂，来这里做礼拜的人是过去的弗拉索夫分子和一些俄罗斯移民。

迎接我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留着浓密白胡子的神父。我告诉他，我是苏联作家，想和他谈一谈弗拉索夫。

大司祭首先把我请到位于一层的家庭教堂，给我看了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圣像。

“这就是那个圣像吗？”

“对。我在给弗拉索夫部队做祈祷时就举着这个圣像，祝福他们去解放俄罗斯。我将这件圣物保存了下来，并带到了这里。”

然后，我们上到二楼的大司祭房间里。一位老太太殷勤地欢迎我们，她请我们喝茶并品尝她自制的果酱。

墙上挂着许多留着胡子的宗教人士的照片。那里还有皇帝尼古拉二世的肖像，当然，也有弗拉索夫将军的。

亚历山大神父自我介绍说：

“我是1933年开始做神父的，曾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居住过，然后



迁居德国，在柏林的一座教堂做普通神父。”

“那您什么时候同弗拉索夫认识的？”

“我被请到家中给新生儿施洗礼。在施洗礼时，教父教母们要朗诵‘我相信’这篇祈祷文。我根据经验知道没有人记得住这篇祈祷文的话。因此，我在朗诵祈祷文时声音很大，在场的人跟着我说。在朗读‘我相信’时，我突然听到一位高个子将军低沉的声音超过了我。他就是弗拉索夫，他在正教中学读过书，记得祈祷文的内容。此后我们常见面。我成为弗拉索夫军司令部正式听取忏悔的神父。”

“您在斯摩棱斯克发表宣言时做过祈祷吗？”

“不，那时我们还不认识。我们的关系是在布拉格宣言时期才密切起来的。”

“但是，这已经是1945年了，到了解放运动的最后阶段。”

“是的，很遗憾，德国人不允许运动发展下去。他们认识不到通过这个运动去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的潜力。因此，他们失败了。假如他们早一点明白，整个结局可能会颠倒过来。他们没有运用伟大的俄罗斯力量，他们害怕这支力量，不然的话，伟大的俄罗斯力量就会把越来越虚弱的德国人挤到次要的地位，俄罗斯就会成为没有斯大林和希特勒的自由国度。”

我同亚历山大大司祭谈了很多。主要的一点是他证实了运动没有成立起来。“弗拉索夫运动完了不是弗拉索夫分子的过错造成的。它是被共产党人、纳粹分子和民主派一起扼杀的。”

亚历山大神父告别的时候送我一本他的著作，名为《安·安·弗拉索夫将军肖像》。

1988年，神父已80高龄。这位高大、强壮、头发斑白的老人把我送到百老汇。在那里，我叫住了一辆出租车，我们就此告别。

溺水者要抓住救命稻草。到1945年，对希特勒匪徒来说，这根稻草就是企图成立俄罗斯解放军的弗拉索夫。

我已经讲过，弗拉索夫曾就柏林防御给戈培尔提过建议。早在苏联国土在法西斯分子的铁蹄下燃烧的时候，他们就决定更广泛地利用“俄罗斯士兵资源”。

希特勒转怒为爱，允许希姆莱与弗拉索夫见面。而希特勒本人却一次都没见他。关于谈话的情况及其结果，最好由参加了这次会面的党卫军分子德阿尔肯来叙述。我有他个人的笔记，现在我略加删节，引用如下：

“弗拉索夫身材魁梧，仪表堂堂，声音低沉，这一切都给希姆

莱留下了印象。

‘我们犯了许多错误，’希姆莱说，‘我知道有些错误涉及到您。因此，今天我想同您开诚布公地谈一谈。’

（希姆莱对他们之间的嫌隙轻而易举地巧妙地一笔带过，抹平了事，这使德阿尔肯大为惊讶。）

‘推迟我们约定好的首次会面，这不是我的错，’希姆莱温和地继续说，‘原因您清楚，我所肩负的重担您也清楚。我希望您了解和理解所有的一切！’

希姆莱结束他的开场白后，弗拉索夫沉默了一会，然后，他平静地、一字一顿地开始讲话（好像要翻译容易译一些）：

‘部长先生！感谢您的邀请。请您相信，我现在感到很幸福，因为我终于同德国真正的领袖之一会面了，并向他阐述我的想法……部长先生，您是当今第三帝国政府中最强的人。在向您阐述我的纲领前，我应该强调以下几点：我憎恨那个将我培养成人的制度。但是，这不会影响我作为俄罗斯人的自豪感。我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因此，我会爱自己的祖国、土地，就像德国农民的儿子所做的一样。我相信，部长先生您确实愿意在极短时间内给我们以帮助。倘若击中要害，注定灭亡的斯大林体制就会像纸牌搭的房屋一样必定垮台。但我要强调的是，为了保证成功，你们应该在完全平等的原则下同我们一起工作。我因此才愿意像您一样，同您开诚布公地谈……’

希姆莱慢慢地点了一下头表示同意，沉默了一会说：

‘将军先生，该我提一个直率的问题了，现在，俄罗斯人民确实会支持您推翻政治制度的尝试并承认您是他们的领袖吗？’

弗拉索夫的戒备心消失了。他感到自己的基础稳固，于是他平静而又有力地回答说：

‘我可以诚实地对您说：“是的”，条件是你们必需要履行一定的义务。部长先生，我知道，即使今天我都能够结束反对斯大林的战争。假如我拥有由我国公民组成的突击部队，我就能够打到莫斯科，于是，只要在电话里同正在为对方战斗的我的同志们交谈一下，战争就结束了。以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为例，您以为，像他这样的人能够忘掉在监狱里受审时被人打掉的牙齿吗？这些人是我的战友，是我的祖国的儿女，他们知道过去和现在这里发生的事情，而且他们不相信德国人的承诺是诚实的。但是，假如出现一支代表民族和自由思想的真正的俄罗斯解放军，除那些恶棍之外，俄罗斯人民群众，那些在内心里反共的群众就会相信，解放的时刻已经到



来，此时，在通往自由的大路上只有斯大林和他的集团才是绊脚石……

……部长先生，我从来都没有想到，今天的会面让我不得不等了这么久……然而，虽说受过侮辱，有过失望，我仍然坚持只有同德国合作才能找到解放俄罗斯道路的观点。命运本身和斯大林的战绩也许使这次会面提前了。部长先生，我不是乞丐，我不是两手空空来见您的。请您相信，拯救和解放我的祖国才能拯救德国！’

（“到目前为止，哪个人敢对希姆莱说拯救德国呢？”德阿尔肯想道。他无论如何都不明白，是什么让希姆莱不动肝火地认真听完弗拉索夫的话。）

弗拉索夫继续说：

‘请给我所需的俄罗斯力量！我始终反对将由我的同胞组成的许多营投到法国、西战场和其他任何地方去。现在，他们受到英美的进攻浪潮冲击。他们应该去战斗，然而他们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去战斗。他们已支离破碎，溃不成军。您本来可以立刻将他们集中起来，由我来指挥，以此为基础建立庞大的解放军！’

……部长先生，现在还不晚。现在还不晚！用现在在德国的俄罗斯人完全可以组建一支一百万人，甚至一百多万人的军队。’

希姆莱显然故意要使气氛更紧张，等了好一阵，然后才不动声色地说：

‘将军先生，我同元首谈过。从现在起，您可以把自己当作这支部队的总司令，军衔为上将。您有权按自己的意愿组建军官队伍，军衔可以一直到上校。至于您的将军们，我要请您将您的建议报给德军人事长官。您对我所讲述的一切，高层都会感到兴趣。’

希姆莱又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

‘我听了您的话后，现在也认为，组建军队的可能性当然也存在。我作为后备队总司令，拥有用来做这件事的经费。但是，很遗憾，这些经费有限。您也许能找到足够的人，但是，我们不该忘记，那些急着加入您部队的人，将造成我们工厂工作岗位空缺的局面。我们不敢减少工业产量！然而武装的问题终究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我可以批准先组建两个师。假如我今天许诺你们太多，然后，又减少自己的承诺，那就很不地道了。上将先生，我提议现在只组建两个师，对此您满意吗？假如您满意的话，我马上发布相关的命令。’

弗拉索夫的脸变得阴沉起来。他从他追求的高度跌落下来。将



军的眼中明显地流露出失望，但是他控制住了自己。

‘部长先生，’他深深叹了一口气说，‘我注意到现有的障碍。但是我没有失去希望，两个师只是一个小小的开端，因为您自己也知道，仅由你们是不能用脑袋冲破壁垒的，因此，扩大部队规模符合我们双方的利益。’

‘当然，当然！’希姆莱急忙近乎高兴地大声说，他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困难和不快全都过去了。

弗拉索夫继续说：

‘尽管在法国的俄罗斯部队已支离破碎，溃不成军，我认为有责任再强调一遍，必须将他们集中起来和进行改造……’

希姆莱急不可待地回答说：

‘当然，当然，这理所当然……’

‘我对您的话表示感谢，’弗拉索夫用低沉的声音说，‘但是与此同时要保证不再分散在德国的俄罗斯族的力量。假如“东方部”继续随心所欲，将我们的力量分成各种分立的小组和委员会，那么，我们要想战胜斯大林也是不可能的。这些小组由那些追名逐利之徒掌管，对他们来说，为他人的利益而斗争是无所谓的……假如你们真诚地要求得胜利，那你们应该撤销对我与所谓“民族分子”代表谈话的禁令。您有这个权力。在假设的存在于反共斗争全过程中的联邦制的基础上，您可以将所有的分散力量联合起来。总之，我不对您隐瞒，我一次次地失望后，不想再浪费精力，去进行一伙人反对另一伙人的毫无目标的、无谓的斗争。我现在就想只同一个德国权威人士进行直接谈判……’

希姆莱一直不中断他的话，听着。希姆莱听到这里便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您已经认识了这两位坐在我旁边的人。地区总队长贝格尔将代我解决一切与您有关的问题，您将和他紧密合作。除此之外，我任命克勒格尔博士为联络员……’

‘谢谢您，部长先生，’弗拉索夫鞠了一个躬说，‘我甚至都没有指望这一点。但是，我还没讲完。我应该再讲一些实际情况。我们要取得对斯大林的胜利，不能只靠建立一支解放军，还要建立统一的政治中心，这个中心有权在国内公布新制度的纲领。’

‘关于这一点我已得到了通报，’希姆莱急切地说，‘关于中心，我有一个总体设想，就像关于解放军一样。我提议，您同时也是这个中心的首脑……’

‘既然我们今天已抽出这么多时间谈论所有的问题，那么，请

允许我向您报告已经制定出来的关于军队和政府的方案。出于谨慎，我们先将军队和政府称之为“委员会”。

希姆莱坐不住了。他的目光迟疑甚至惊慌。他含糊地低声说：
‘谢谢！我将发布命令来研究您的建议……’

弗拉索夫继续说：

‘有关“委员会”的问题我还没讲完。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请求将方案扩大，所有居住在德国的我的同胞和俄罗斯国民都应听命于这个委员会。’

当希姆莱开始讲话结巴、词不达意、闪烁其辞时，一般说来，会见结束了。

希姆莱站了起来，弗拉索夫也站了起来，希姆莱作为好客的主人邀请弗拉索夫共进午餐。大家跟着他们来到了餐厅。

从谈话开始到午餐结束，共用了六个小时。

当弗拉索夫辞别后，希姆莱对监督弗拉索夫的党卫军分子说：

‘你们不要忘记，他是一个斯拉夫人。我现在命令你们时时刻刻要保持警惕，要立刻向我报告他所有超出今天约定范围的活动。我要时时刻刻戒备着。斯拉夫人就是斯拉夫人……’”

因此，从1944年9月起，弗拉索夫从情报部转归党卫军帝国长官希姆莱管辖。情报部的施特里克弗尔特是负责常年监视弗拉索夫的，他这样描述这种变化：

“位于达本多夫的德军司令部现在完全退到了次要地位……党卫军部队的军官和各种各样的特派员来了，他们都担负着与正在组建或者已经运作的俄罗斯各部门的联系职能。”

就是施特里克弗尔特本人也被党卫军总部的常设代表、党卫军总队长克勒格尔接替。党卫军地区总队长贝格尔被任命为未来俄罗斯解放军的总负责人，由他组建俄罗斯第1师。关于组建俄罗斯解放军第1师的命令是由希姆莱签署的，因此，在1945年3月之前，所有关于俄罗斯解放军的议论都是说说而已，因为，惟——一个的第1师仅仅在战争快结束时才出笼，第2师直至希特勒匪徒投降还完全没有组建。

德国人（而不是弗拉索夫）任命布尼亚琴科上校为第1师师长，此人于1945年2月还被德国人授予少将军衔。

布尼亚琴科上校曾任红军师长，根据1942年7月28日第227号令受到降职处分并被编入惩戒部队，此后，他向德国人投降。1944年夏

天，他在西战场指挥一个俄罗斯团，并由于指挥得当而受到了表彰，这个团也就成为了俄罗斯解放军俄罗斯第1师的基础。这个师还编入了其他几支俄罗斯部队，例如，俄罗斯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旅。这个旅过去是由卡明斯基指挥的，根据德国文献记载，这个旅“彻底肃清了库尔斯克和奥廖尔之间广大地区的游击队”。

1944年，俄罗斯人民解放军共有5个团，2万人。由弗罗洛夫中校指挥的团参加了镇压华沙起义。整个俄罗斯人民解放军十分腐化，大肆“敲诈勒索、掳掠抢劫”，以至德国野战军事法庭判处其指挥员、“陆军准将、波兰族人”卡明斯基枪决。

就是这些人加入到了布尼亚琴科的俄罗斯第1师。

弗拉索夫本人负责建立“俄罗斯各民族解放委员会”。根据他的设想，这个委员会应该在他的指挥下将各少数民族部队和“反布尔什维克力量”联合在一起。但是这些“力量”百般抵制，不想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哥萨克将军克拉斯诺夫拒绝服从“前红军将领”。党卫军领导人镇住了乌克兰人、高加索人、中亚各共和国的人及其他一些人，将他们统统纳入弗拉索夫领导的“俄罗斯各民族解放委员会”。

“各民族代表”在布拉格通过的《宣言》发表了（按照弗拉索夫的愿望，这个文件应该诞生在斯拉夫土地上）。由于那时在德国占领区里已经没有一个苏联的城市，因此，选择了斯拉夫人的布拉格。

宣言的通过，被宣传成是解放运动的一大胜利，但是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改变，所有的东西都是纸上谈兵。

为了阻挡红军的推进，希特勒统帅部用尽全力。红军的兵团已经前出至奥得河。

党卫军领导人决定在行动中考验一下俄罗斯部队。布尼亚琴科师被调归第9集团军司令布塞将军指挥。弗拉索夫同意这么做。

布尼亚琴科请求能让他的师独立作战，以证明俄罗斯人不靠德国人的帮助也能在作战中展示自己的英勇气概。德军统帅部给了他这样的机会，委派他们去击退奥得河一个小登陆场上的苏军。

他们制定了代号为“四月风”的战役计划。计划规定从南北两个方向实施突击，歼灭苏军并肃清登陆场。冲击定于4月13日早5时15分进行。

4月12日晚，俄罗斯分队进入出发地位。冲击前半小时，德军炮兵向登陆场开火。阿尔捷米耶夫中校的第2团从北面冲击；亚历山德罗夫-雷布措夫中校的第3团从南面冲击。布尼亚琴科用炮队镜观察着作战进程。俄罗斯人步调一致地迅速发起进攻，德国空军的26架强击机也给予他们支援。



结果怎样呢？为了完全客观起见，我引用希特勒军官和弗拉索夫分子自己的看法：“到8时……夺回了500米阵地。”“两个团陷入了敌军的翼侧火力之中，他们的前面是苏军的野战筑城工事和坚固的铁丝障碍物。”

这些文字描绘出一幅十分可悲的画面：冲击者夺回“500米”，即走过了中立地带，在“铁丝障碍物前”被苏军用机枪打死。

可见，冲击者不但没有投入到争夺登陆场的战斗，而且没有从苏军那里夺回一米阵地。

布尼亚琴科认识到这场战斗将以他的两个团被歼灭而结束时，下令退回到出发阵地。

德军统帅部代表诺茨中校报告说，“后撤时极其混乱，战场上丢弃了许多机枪、突击步枪和喷火器等武器”。

第9军司令布塞将军试图追究布尼亚琴科没有执行命令的责任，但是这位俄罗斯将军竟然都没有去德军司令部作说明。

他声明说，他收到冲击一次的命令。尽管冲击很快就失败了，现在，他在“执行命令后”，又重隶弗拉索夫。布尼亚琴科集中全师，行军100多公里，来到布拉格。

德军司令部谈论有关“不守纪律”、“追究责任”、以至“解除该师武装”的信函不断，但是这一切都不了了之，因为苏军部队已于4月16日在柏林方向上转入坚决进攻。布尼亚琴科师，甚至弗拉索夫本人，也许试图向已经逼近的苏军示好，他们支持在布拉格起义的捷克人，不允许德国人破坏城市。但是这都是垂死挣扎。

弗拉索夫担心受到惩罚，因此命令布尼亚琴科师和还没组建好的兹韦列夫第2师向西撤并向美军投降。弗拉索夫本人也向西转移，但是在途中被苏军侦察员俘虏。

我认为，从以上所述来看，可以得出最后的和完全客观的结论：弗拉索夫将军试图建立的“俄罗斯解放运动”没有成功，“俄罗斯解放军”实际上也不存在。弗拉索夫作为一个叛徒，先是在德国情报长官盖伦将军领导下活动，后来又受党卫军帝国长官希姆莱领导。尽管所有对弗拉索夫抱有好感的人上努力给他穿上“爱国者”甚至是“解放者”的高贵外衣，但是文献和事实无法对此加以证实。在改革时代，“民主派”和持不同政见者都极力赞美弗拉索夫的行为，他们说弗拉索夫的梦想和他们的“民主”改革如出一辙。我觉得，他们说对了。毫无疑问，对祖国和俄罗斯人民的背叛将他们联到了一起。

军事法庭的判决书记载了叛徒将军的可耻下场。

十五 攻克柏林

4月21日，苏军突入柏林，到达柏林的东北郊；而坦克兵团绕过城市向西推进，也逼近柏林南郊。因此，即将在柏林以西合围的钳形攻势已清晰地呈现出来。

柏林就像海绵吸水一样，将部队吸进自己的街区。要保持控制力，不失去指挥战斗进程的能力，是非常困难的。

部队尽管经过了长年累月的战争，却没有在这样的大城市里进行过巷战。高楼林立、街巷纵横，吞没了好几个集团军。交战演变成成千上万场争夺每一座楼房、每一层楼和每一个地下室的分散的战斗。

指挥员们甚至在主要方向上也见不到自己的部队。而且主突击方向又在哪里呢？在坦克集团军为形成合围而迂回急进的地方？还是在通往国会大厦要冲上为争夺每一座房屋进行肉搏的地方？

在这里，以前习惯概念中的战线已经不复存在。在某些地段，战线是垂直的，竖了起来，因为战斗是在高层楼房中逐层展开的。而在相邻的街区，前沿阵地深入地下，在地下室、排水井和地铁隧道里延伸。

但是，不管战斗在哪里进行，斯大林、朱可夫和科涅夫都能感受到战斗的紧张程度，他们清楚，哪支部队正在推进，哪支部队的战斗进程受阻。电话线和看不见的无线电波，就像几千根神经将元帅们同所有进攻的兵团连结起来。他们同指挥员通话。他们听得见斯大林坚定而自信的声音。不见身影的斯大林处处和他们同在，他对人多方激励，对人严加督促，有时也对人破口大骂。就像常言所说，各取所值，该什么，就给什么！

* * *

为了打破对首都的封锁，希特勒暗堡中的人采取了一切措施将就近的部队调入柏林，同时动用尚存的大军队集团。4月21日清晨，大本营召见“中央”集团军群司令肖奈尔。他执行任务最精确，即使在德国人中间都以一丝不苟甚至要求严酷著称。由于他对下属残酷无情，因此，士兵们送给他一个外号叫“屠夫”。

元首命令肖奈尔带领他的集团军群冲破重围来救柏林。肖奈尔将军鞋跟一碰，雄赳赳地回答说，元首的命令将一丝不苟地得到执行。为了给自己的救星打气，希特勒将肖奈尔晋升为元帅，而且马上召集暗堡里的将领和服务人员，向他们介绍这位新晋升的元帅，大家祝贺肖奈尔荣获高级军衔。

肖奈尔的晋升仪式结束后，总参谋长克雷布斯以及约德尔在向希特



勒报告战场态势时，谈到了施泰纳战斗集团。这个集团人数不多，是由党卫军施泰纳将军指挥下的残部组成的。

“维斯瓦”集团军群司令想掩护自己的右翼，希特勒马上抓住这个报告，命令施泰纳集团通过从南面实施突击，截断正在包围柏林的楔入部队。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希特勒命令坦克第56军迎着施泰纳集团进行反攻。

整个这一天和第二天，人们等待有关施泰纳集团完成任务情况的报告和消息。

在暗堡举行的会议上，克雷布斯和约德尔报告了态势。约德尔已经习惯了不让希特勒伤心，于是这一次还是试图详细地叙述部队在萨克森和意大利取得的某些局部战绩。希特勒打断了他的话说：

“您为什么用这些鸡毛蒜皮来讨好我！施泰纳到底在哪里？”

将军们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和不知所措，不得不报告事情的真相：施泰纳集团没有成功，事实上已被歼灭。希特勒歇斯底里地嚷了起来：

“德国人民不理解我的目标！他们在认识和实现我的目标上表现得非常浅薄！假如我命中注定要完蛋，那就让德国人民也完蛋，因为他们辜负了我！”

希特勒将柏林卫戍司令雷曼叫来，命令他说：

“请您集合所有兵力，绝不让敌人突入市中心，保证对政府驻地的掩护！”

为了执行元首的命令，雷曼将32000名柏林警察投入战斗，与此同时，监狱中的刑事犯都被释放出来投入战斗。雷曼将这些最后的预备力量、溃败部队的士兵（约8万人）和几个营的国民突击队集中起来，“组建了”达30万人的一个集团。为了完成元首的命令，他竭尽全力。

凯特尔又向元首建议他认为非常有效的一个措施：撤出西战场的部队，让他们来打破对柏林的封锁。凯特尔说，这个措施当然会削弱我们同英美谈判的立场，但是别无出路。另外，英美军队向东推进并与苏军会师越快，他们之间冲突得也越快。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他们打算马上调动西战场的文克第12集团军，因为这个集团军距柏林最近。约德尔支持凯特尔的建议，并且要元首相信，文克和他的集团军有能力突入柏林并打破对柏林的封锁。希特勒经过一阵思索，下令从西战场撤回所有部队，调他们来拯救柏林。为了完成这道命令，凯特尔离开了希特勒的大本营。他会见了文克将军并向他宣布：“从现在起，我们只打东方，而不打西方。”

现在，在希特勒的大本营中出现了新的希望。大家等待文克的集团军到来，他们想方设法要坚持到这一集团军抵达柏林。戈培尔总是精力充沛，对元首忠心耿耿，他要人相信，他作为柏林的最高委员，要让每

一个居民去同苏军搏斗。大本营紧急印刷了几万份传单，并在全城张贴。帝国委员在这些传单中赋予了每一个居民“保卫自己的房屋、自己的住宅”的责任。凡是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不管年龄大小，都被算作应征入伍了。长柄反坦克火箭弹配备到12岁的男孩。所有这些指示、传单和命令中都有一句话：对不执行命令者将处以枪决。

戈培尔认为，雷曼将军组织城市防御不力，因此任命克特纳上校取代雷曼为新的柏林卫戍司令。

戈林担心博尔曼在同同盟国谈判时占了先机，那么德国投降后就得由他来领导，于是戈林决定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戈林鉴于他曾正式被宣布为希特勒死后的接班人，决定利用自己的这种地位——尽管不无担心会引起希特勒的愤怒。戈林为了保险起见，在4月23日致电希特勒：

“我的元首！”

鉴于您已决定留守柏林，您是否同意，我根据您1941年6月29日的法令作为您的接班人，马上接管帝国全部领导权，在国内充分自由地采取行动？我如果在今晚10时还没有收到回电，将认为您已经失去为了我国和人民利益采取行动的自由。您知道我在一生中这严重时刻对您的感情难以言表。愿上帝保佑您，使您能克服一切困难迅速来此。

您的忠诚的 戈林”

博尔曼早就对戈林切齿痛恨并寻找机会要干掉他，于是决定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他对元首暗示说，戈林如此背叛，应处以枪决。希特勒尽管怒火中烧，但是认为这样的处罚太过分。希特勒马上同博尔曼拟就一份电报，电报说：“1941年6月29日的法令生效时间由我本人决定。我没有失去行动的自由。我禁止您在您提到的方面有任何举动。”

与此同时，希特勒向保安部门头目弗兰科尼和冲锋队大队长弗兰克口授命令，鉴于戈林犯有叛国罪，马上将其逮捕。希特勒的命令得到了执行，戈林被逮捕，前第7航空队司令冯·格莱姆将军取代他被任命为空军司令。

4月22日，希特勒发布了最后一道命令：

“请你们牢记：凡宣传甚或只是赞同动摇我们坚定立场命令者，均为叛徒！应立即处以枪决或绞刑！本命令对以区长、部长、戈培尔博士以至元首名义发布的命令同样有效。

阿道夫·希特勒”

广播不断宣布，元首仍在首都，而且说，元首在哪里，哪里就有胜利。

4月21日，希特勒转移到刚刚专门为他修建的一个更深的新防空洞里。这个防空洞就在以前帝国办公厅大楼下的那个防空洞旁边，它的上面有8米厚的水泥层。这座“元首暗堡”比以前的那座低40个台阶，这里还有供元首最亲近的要人使用的房间。元首请忠于他的戈培尔及其全家住进新的暗堡里。

在暗堡里指挥部队变得越来越困难，通讯经常中断，指挥上的混乱更加严重。

* * *

于是，斯大林命令科涅夫将坦克集团军调往柏林。

唉！要让这样两支坦克大军来个几乎90度的急转弯，可不简单。而且完成任务的时间是有限的，更准确地说，要在几个小时内立刻完成！由帕·谢·雷巴尔科上将指挥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受命在4月18日凌晨强渡施普雷河，扩展对柏林南郊迅猛进攻，并于4月20~21日夜间攻入市区。由德·丹·列柳申科上将指挥的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应在此时占领波茨坦和柏林西南部分。

我不止一次地到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到过雷巴尔科坦克集团军完成这次急剧转折并从南插入柏林的地域。我走过并坐车经过这个地域、这里的小城镇和田野，尽力设想当时的情景。这片潮湿、泥泞（4月份！）的土地是如何地动山摇，几百辆坦克是怎样隆隆轰鸣，坦克手是怎样努力在陌生地方机动，而且是在夜间！他们是怎样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切！他们经历了一场艰苦的大规模战争，有着丰富的经验。他们驾驶着当时世界上最精良的坦克参战，这些坦克是由精疲力竭、食不果腹的人民制造的，是正在等待他们胜利的人民制造的！胜利即将来临。我想像得出，在这个夜里，那些烟熏火燎、浑身肮脏不堪的坦克手作战时，带着怎样的切齿的劲头、喜悦的心情和振奋的精神。他们已经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却不感到疲劳。我见过他们是怎样边行驶边消灭路上出现的希特勒匪徒，向前飞驰，朝着敌人的巢穴飞驰。

我也曾到过佐森的郊区。4月20日，雷巴尔科的坦克兵突入这里，他们向元首献了一份够意思的礼物。也许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4月20日是希特勒的生日。这份“礼物”非常有象征意义，希特勒军队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就设在佐森，就是在这里制定了“巴巴罗萨”计划。这是多么令人震撼的结局，苏军摧毁了炮制这场战争的罪恶渊藪，是在元首生日这一天。

我望着这些建于战前的灰色小楼。针叶林中这一座座二三层的楼房绮丽如画，给欧洲各国人民和德国人民带来无数苦难的人却舒舒服服地居住在这块幽静而美丽的地方。

我想像得出，这些人互相登门作客，为祝贺攻占一座座城市，甚至攻占波兰、法国、比利时、丹麦、希腊等一个个国家举杯相庆，他们的妄自尊大是怎样使他们膨胀，他们又是怎样要人相信他们是特殊的主宰的种族。

在这里，在这些楼房里，地图上已经标明进军路线，部队攻入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和印度的运行表。

我，一名掩体里的中尉，能想像到有朝一日将会在佐森城下，在希特勒大本营楼群之中穿行吗？连做梦都没有梦到过！

在楼房主人从这里溜走快半个世纪后，我来到过这里。他们从这里溜走是因为害怕被捕，是因为害怕追究他们所犯罪行的责任。

当他们在这块精心照料的草地上狼奔豕突的时候，当他们匆匆焚烧那些写有罪恶计划的文件的时候，当他们逃跑的时候，他们明白已经无处可逃，但是他们还是离开了，悄悄溜掉了，千万不要被逮住，被认出他们是总司令部的工作人员。

我保留着一张旧的剪报，上面登载着鲍里斯·波列伏依的文章。文章引用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文献，它让人了解在最后时刻这里所发生的事情：

“我手头有几页希特勒陆军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的通信枢纽与德国南部将领最后通话的译文。

埃德尔魏斯：请你们马上面交克雷布斯将军。由于没有情报，我不得不根据英国广播来了解态势。请通报态势。请通报下一步行动。签署人：A-15。

回答：现在叫谁都不可能。都埋进坟墓了。我不再转达。

埃德尔魏斯：开什么愚蠢的玩笑？你是谁？马上把上级长官叫来。A-15。

回答：他已经溜了。所有长官都溜了。闭嘴，我已经烦了。

埃德尔魏斯：哪一个喝醉了的畜牲在值班？马上把值班长官叫来！

回答：请你去……吻自己的祖母吧！白痴。

埃德尔魏斯：我现在是在A-16处。万分紧急。

回答：请慢一点上绞刑架。

埃德尔魏斯：不明白，请重复。



回答：臭白痴。全都跑了。伊万们就在我们这里转悠。他们还没有到达你那里吗？”

* * *

斯大林要求朱可夫元帅和科涅夫元帅在4月24日之前完成双重包围：第一个包围圈围住柏林，第二个包围圈包围法兰克福—古本军队集团。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部队切断了所有从柏林通向西面的道路，并于4月25日在波茨坦西北同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会合，这样，就完成了对柏林的全面包围。

在同一天，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在易北河与盟军的部队会师。

斯大林于1945年4月27日就这一历史事件发布命令。命令说：

“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和我们的英美盟军部队从东西两方夹击，截断了德军的战线，于4月25日13时30分在德国中部托尔高市地域会师。这样一来，德国北部的德军和德国南部的德军就被分割开来。”^①

28日，克雷布斯转发了最后一道绝望的命令：

“所有在易北河和奥得河之间作战的兵团应采取一切措施，尽快顺利地完成正在进行的拯救帝国首都的围攻。”

但是，无人响应。已经被歼灭的德国武装部队已救不了任何人和事了。

魏德林在晚间报告说，柏林的卫戍部队已经走投无路，他说，惟一的出路是尝试突围。他当场详细地阐述了他制定的计划。希特勒沉默了许久，最后他声音很低微地说：

“就算是突破本身能取得成功，那我们也是从这个包围圈陷入另一个包围圈。我将在野地里栖身，或者在农舍或哪家的地下室里等死。我最好还是留在帝国办公厅吧。”

之后，希特勒最后一次暴跳如雷。他唾沫四溅地叫喊，说所有的人都背叛了他，德国人民全是废物，并说这不是普遍的背叛，就让大家与

^① 《斯大林文集》第449页。——译者注

他一起完蛋吧！他做出了留在柏林并自杀的最后决定。

但是希特勒走进自己的房间后，又不得不解决埃娃·布劳恩提出的另一个意义不小的问题。

她对元首说：

“我不想以情妇的身份去天国。我是你的妻子，我想以这个身份同你一道去天国。”

就在遭到炮火轰击的暗堡里，在隆隆的大炮轰鸣声中，发生了一件荒唐事情：希特勒宣布他与埃娃·布劳恩结婚并在这里举行婚礼和婚宴。大家赶忙去找主持婚礼的神父。然而，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哪里能找到神父呢？戈培尔终于找到了他的下属瓦尔特·瓦格纳，他是宗教事务员。他来到防空洞主持婚礼时，穿着军服，戴着国民突击队的臂章，因为他没有带神职人员的圣衣。

希特勒费劲地在结婚证上签了字，因为他的手剧烈地颤抖。而埃娃·布劳恩先写了埃娃·B.，然后，她把写了的划掉，又签上了她的新姓氏——埃娃·希特勒。婚礼后，在希特勒的住房里举行了婚宴。参加晚宴的有戈培尔夫人、戈培尔、希特勒的两个女秘书和新婚夫妇。

然而在这个新婚之夜后，4月29日，苏军攻下了安哈尔特火车站，沿着威廉大街冲向帝国办公厅大楼。防守暗堡和附近要冲的指挥官蒙克报告说，他竭尽全力才遏制住苏军的进攻，这些苏军现在距离暗堡500米。博尔曼、克雷布斯和其他高官在婚礼晚宴上喝得酩酊大醉，甚至在炮击的轰鸣声中沉沉入睡。这时，希特勒正向他的秘书们口述遗嘱。遗嘱共有两份：一份是“政治”遗嘱，另一份是“私人”遗嘱。

党卫军特使将遗嘱复制件一份送给肖奈尔元帅，一份送给海军元帅邓尼茨。

4月29日12时，希特勒请博尔曼、戈培尔、布格德费尔、克雷布斯及助手和副官们来到他的办公室。他们已经失去同外界的联系，完全不知道地面上发生的事情。希特勒仍然尝试着发布一些命令，约德尔和克雷布斯传达了这些命令，这些命令当然是传不到部队那里的。

4月30日，克雷布斯向希特勒报告说，苏军已经占领动物园和波茨坦广场，进入帝国办公厅对面的伏斯大街。希特勒仍然没有下决心自杀。

但是，当希特勒终于明白他已别无出路并有可能被活捉时，决定迈出一生中最后的一步。他先给自己的爱犬勃隆狄和它的小崽喂了毒药。毒药立刻起了作用，狗死了。门外站着博尔曼、戈培尔、阿克斯曼、根舍和侍从林格。侍从林格已经奉命去弄了200升汽油来火化尸体。大家在等待着。



4月30日3时半，他们稍微打开一点门，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希特勒仰面靠在沙发上，埃娃·布劳恩脸色惨白地坐在另一角。他们已经一命呜呼。

当时的报纸说，希特勒是开枪自杀的。这是最后一次给元首戴上骑士光环。他不仅不是自己用枪自杀，而且也没有让其他人帮忙。他的脚下扔着的是装毒药的小瓶，而不是子弹壳。

侍从林格和医生施图姆费格用军被把希特勒的尸体裹上，在办公厅警卫队的帮助下，从紧急出口将尸体抬到帝国办公厅的花园里；紧接着，他们又将埃娃·布劳恩的尸体抬出来。当时，苏军的炮兵正在炮击帝国办公厅周围的街道和房屋。

下面引用希特勒私人司机埃里希·肯普卡回忆录《我火化了希特勒》中的一小段。尽管这些文字很多人都看过，但是我认为，把这一段作为结束希特勒一生的最后一幕是十分恰当的。希特勒渴望统治整个世界，却卑微地狗彘不如地在一个土坑里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我将汽油浇在两具尸体上。死者的衣服在没有被汽油浸透和由于汽油的重力作用而裹紧前，在风中轻轻地飘动。炮弹掀起的尘土散落在我们的身上。我强压死的恐惧，把一桶桶没开封的汽油拽过去。（……）炮火如此猛烈，我们吓得不敢从暗堡的前廊出去。（……）戈培尔博士、博尔曼和施图姆费格医生同我们一起站在出口处。外面是真正的地狱在肆虐！”

但是，我们用什么方法点燃汽油呢？我没有听从使用手榴弹的建议。我的眼光偶尔落在暗堡出口处一块与消防水龙头放在一起的破布上。根舍将这块破布抓过来，撕成几块。他麻利地将油桶盖打开并将破布塞进油桶。我将油桶侧转过来，破布完全被汽油浸透。‘火柴！’戈培尔博士从兜里掏出一盒火柴递给我。我划了一根火柴并扔进那块破布里，然后，高高地抛向淋满汽油的尸体上。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躺在花园里的尸体。熊熊的火焰即刻冲天而起，一缕缕黑烟飘向天空。在燃烧着的帝国首都映衬下，黑烟柱构成了一幅骇人的图景。”

* * *

我认为，有必要叙述一下柏林会战的几个特点。这是伟大卫国战争的最后一场交战，它最终解决了苏联与法西斯德国之间的军事和政治上的矛盾。

柏林战役在制定战斗计划时，第一次既要考虑到敌人的兵力、部署

和可能采取的行动，又要考虑到英美盟军的行动。而且这里指的不是相互支援和协同动作，如盟军在法国登陆、德军在阿登反突击、甚至是我们的“巴格拉季昂”战役时期那样。

在柏林战役中，盟军的任务是先于苏军夺取柏林，他们从苏军的盟友变成了竞争对手。这一点也是柏林会战的一个特点。

斯大林打算早日攻克柏林，他催促元帅们加快挺进，但是正像作战进程所展示的一样，他的做法不仅产生正面影响，也造成了负面后果。朱可夫急于求成，因此造成了不必要的伤亡。

科涅夫同样“使劲”催促部队，不惜伤亡，只要赶在朱可夫之前就行。

这又是柏林战役的特点之一，它没有给我们这些最卓越的统帅们——斯大林、朱可夫和科涅夫增添光彩，因为对自尊心的挑动是以许多条生命为代价的。

朱可夫是否希望不要科涅夫的援助独立攻克柏林呢？他当然希望！这是他的性格。否认竞争因素是在歪曲真相，但也不能任意夸大。

真相并不是像某些作者不惜歪曲事态的进程硬说的那样，他们说朱可夫不爱惜部队，一味催促他们往前冲，不惜任何代价要赶在科涅夫的前面。

不，朱可夫绝对不是这样浅薄地认死理的人！嫉妒和自负当然是有的，但是这位元帅非常清楚，在当时的情况下，一定不能蛮干，不能一哄而上。对形势细微处作冷静的计算和深入的分析，才是朱可夫在同左邻友军竞争中取得成功的原因。

那些批评朱可夫在柏林战役中的表现和“过早”动用坦克集团军问题的人，不知为什么忽视了敌人防御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当时，朱可夫的方面军是“正面”进攻，没有机动作战的纵深空间，根本没有“战役的自由空间”，因为从奥得河到柏林的几道防线完全是经典意义上的绵亘战术防御。

在其他战役中，假如突破了头几道防线，敌人的反抗就减弱了，然而柏林战役却与此相反，敌人的反抗更加激烈！并且部队在完成野外的战斗行动后，遇到的是柏林这个铁桶似的防御大堡垒。

朱可夫清楚这一点。在这场战役中，朱可夫的军事学术表现为，他“打破常规”，决定用坦克集团军消灭前几道防线中的敌人主力。投入一切兵力，将敌人的部队击败、打垮和歼灭在野外！这样，夺取柏林这座堡垒就要容易些。德军假如在争夺泽劳弗高地的战斗中伤亡并不惨重，而且有组织地撤回城里，就会像我们在斯大林格勒一样，可以在一座座楼房城堡中抵抗几个月。而朱可夫通过野外实施强大突击来歼灭敌



人，压垮敌人，使他们失去斗志，撤退进城的残敌也成了失去控制的部队。在两周时间内突破了60公里的防御，接着在几天之中又攻下柏林这个庞然大物，这是一场十分辉煌的胜利。

争论持续了许多年。一些人只看到柏林战役的不足，而另一些人只看到这一战役的长处，而且，双方由于受到当代世界主义派别争论的影响，都忘记了争论的是历史事件。对它进行客观评论时不能采取片面态度，这是因为将各种标准变成主观公理，将使所讨论的问题从学术（历史学）变成宣传闹剧和胡言乱语，人们早就知道这是错误的、卑劣的和不正派的表现。

很遗憾，参与这场政治交锋的都是一些有学位的人，他们的著作还陈列在图书馆的书架上。

他们中一些人特别强调说夺取柏林的战斗中白白遭受巨大的伤亡，却完全没有考虑这一战役的许多特点。除上面已经提到一些特点外，还可以再指出与伤亡有关的几个特点。

在整个战争中这是第一次由整个方面军在一个大城市里作战（假如不考虑从北面包抄柏林的兵力）。以前，当大居民点处于方面军进攻地带时，常常是绕过这些居民点。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战斗也是在城区进行，但是当时我们部队实施的是防御行动。

几乎整个方面军完全进入一个大的城市作战，这样的交战还没有过。

柏林交战是最后一次交战，希特勒匪徒没有任何退路，因此进行了殊死抵抗。这一点说明了希特勒匪徒拼命抵抗的原因。这场交战只能同我们誓死相拼的莫斯科保卫战或者斯大林格勒会战相比。

不知为什么，一些研究者能够理解我们在莫斯科和斯大林保卫战中表现出的顽强精神，却不考虑敌人在柏林战役中所表现出的类似的疯狂抵抗的程度。而最后这场交战的这个特点正好说明了我们伤亡巨大的原因。在这场战役中当然存在不足和差错，即在泽劳弗高地停滞不前和对使用探照灯不同的评价。人们当然希望在最后的交战中没有人牺牲，因为胜利即将到来，那些经历了整个战争的官兵这时牺牲让人感到难过和惋惜！

但是，马尼洛夫^①们不单单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而战争就是战争，没有伤亡的战争是没有的。

这里要指出我们官兵所表现出的特殊的英雄主义：在战争的最后一

^① 马尼洛夫是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无所事事、耽于空想的地主。——译者注

天，甚至最后一刻去冲锋陷阵，这是非常不简单的行为。

柏林战役的最后一个特点是战斗进行的时间极短。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进行了几个月，而攻克柏林用了9天！4月21日，部队突入柏林郊区，而4月30日21时50分叶戈罗夫中士和坎塔里亚下士就将红旗插上国会大厦。突击第3集团军司令库兹涅佐夫将军向朱可夫报告说：

“红旗已经在国会大厦上飘扬！乌拉，朱可夫同志！”

朱可夫也动情地回答说：

“亲爱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衷心祝贺您和全体战士们取得的辉煌胜利。苏联人民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这一历史功勋。”

* * *

从4月16日起，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格·康·朱可夫）和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康·康·罗科索夫斯基）一道积极参加这场结束战争的柏林战略进攻战役。但是，对科涅夫和他所率领的部队而言，战争还没有结束。当方面军的许多兵团，首先是坦克兵，前出至柏林西南郊，同从西北方向进攻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会师后强攻柏林时，莫斯科来了电话。斯大林说：

“科涅夫同志，您好！”

“斯大林同志，您好！祝您五一节快乐！”

“也祝您节日快乐，科涅夫同志。您现在好吗？在柏林怎样过节呢？”

“斯大林同志，一切顺利。盛大的五一节。”

“好样的。请向您的部队转达我的节日祝贺。”斯大林沉默了一会，又说：“喂，科涅夫，您知不知道布拉格正在准备起义？”

“不知道，斯大林同志。”

“应该帮助我们的兄弟。我希望就由您去夺取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明白吗？”

“斯大林同志，明白。马林诺夫斯基比我们远……”

“这和马林诺夫斯基有什么关系？”斯大林反驳说。

“我是说，我们比我们的朋友距离近。”科涅夫在说到我们的朋友时加重了语气。他是让斯大林明白，他指的是盟军，他们同样企图尽快进入捷克斯洛伐克。

“我等待你们解放布拉格的作战计划。”

作战计划几个小时就制定好了，第二天就上报莫斯科。

斯大林半夜打电话通知说，计划已通过，现在可以着手实施这一计划，但是他同时警告说：



“不能轰炸城市。应该将这座古老的都城完好无损地保护下来。”

5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开始发生居民同占领军的冲突。而5月5日，布拉格爆发了起义。法西斯总督弗兰克和“中央”集团军群司令肖奈尔元帅决定镇压这场起义。德国法西斯部队从三面向布拉格集结。起义者通过广播向俄罗斯人求援，援军立刻就到了。近卫第3和第4集团军的坦克兵只用了三天半就完成了从柏林到德累斯顿的急行军，然后在没有任何专门准备的情况下，马上占领了通往克鲁什内山脉的山口，打退了德军屏护队，并从东北和西北方向包围了布拉格，从而使这座起义的城市不会遭到华沙的悲惨命运。5月9日拂晓，苏军坦克兵同步兵团一道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

金色的布拉格得救了，城市没有遭到破坏，布拉格的居民也没有遭到普遍的杀戮。

十六 受降。胜利！

苏军战士在柏林打击希特勒匪徒时又准又狠，使目空一切的法西斯将军们终于讨饶了。

关于这个方面的第一个信息是5月1日3时50分传来的：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克雷布斯将军来到了第8集团军的指挥所。他报告了希特勒自杀的情况并面交了戈培尔致苏联最高统帅部的信：

“遵照已故元首的遗嘱，我们对克雷布斯将军授权如下。我们通知苏联人民的领袖，今天15时50分，元首已自愿辞别人世。元首根据他法定的权力，在他留下的遗嘱中，已把权力移交给了邓尼茨、我和博尔曼。我全权委托博尔曼与苏联人民的领袖建立联系。这一联系是遭受最大伤亡的两大国之间进行和谈所必需的。

戈培尔”

随信附有希特勒的遗嘱，其中有新的帝国政府组成名单。遗嘱上有希特勒的签字和见证人的签名。

这是个非常事件。尽管时间已晚，朱可夫还是给斯大林打了电话。斯大林在别墅里，值班将军接了电话，他说：

“斯大林同志刚刚躺下睡觉。”

“我请求叫醒他。事情很紧要，不能等到早上。”

斯大林接了电话。朱可夫向斯大林报告了希特勒自杀的消息和戈培

尔提出停战建议的来信。

斯大林回答说：

“这个无耻之徒，终于折腾死了！可惜没能抓到活的。希特勒的尸体呢？”

“据克雷布斯将军说，已经火化。”

最高统帅说：

“只能是无条件投降，不进行任何谈判，不同克雷布斯谈，也不同其他希特勒匪徒谈。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天亮前就别打电话给我了。我想休息一会儿。”

请留意情势的相似：当德国于1941年6月22日夜发起进攻时，斯大林正在睡觉，是朱可夫请求值班员将他叫醒的；现在战争即将结束，德国人乞求媾和，又是朱可夫把最高统帅从床上叫起来。

克雷布斯只谈停战，不谈无条件投降，是在耍滑头。

朱可夫说：

“假如到10时，戈培尔和博尔曼还不同意无条件投降，我们将实施强大的突击，他们将永远打消抵抗的念头。让他们再想一想无谓的牺牲吧。”

克雷布斯被送回德国人处。10时，没有得到答复。朱可夫命令炮兵开火，炮轰的重点是帝国办公厅地域。18时30分，部队发起对希特勒统帅部最后一个掩蔽部的强击。

5月2日6时30分，魏德林将军投降就俘。他向部队发布了停止抵抗的命令。

许多人不知道，在侦察兵坎塔里亚和叶戈罗夫将胜利的旗帜插到国会大厦的圆顶上后，战斗在这个大楼里又持续了两个昼夜。

5月2日中午，希特勒匪徒在柏林的抵抗停止了。

乌克兰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通过出色的协同行动，全歼柏林东南被围的希特勒军队集团。为此，最高统帅颁布了给朱可夫和科涅夫这两位光荣军事将领嘉奖的命令。

最高统帅还有一个命令，就在这一天，即5月2日，再放一次礼炮，以庆祝我们的胜利。为了区分这两次胜利的礼炮，上面说的第一次是在21时放的，用了224门炮；第二次在23时30分放，用了324门炮。在伟大卫国战争的历史上，第一次使用这么多门大炮鸣放礼炮。应该指出，这个事件意义非凡，因为庆祝的不是别的什么事件，而是攻克柏林！

曾觊觎统治整个世界的希特勒军队已经溃不成军。希特勒的专职司机埃里希·肯普卡从暗堡出来时所见到的情景就是明明白白的。这个党



卫军分子同元首的亲信们一起在暗堡中度过了最后的一段时光。

“……我们眼前是一片惊心动魄的场面。劳累不堪的士兵和伤员们无人过问，难民们躺在墙下、台阶和平台上。他们大多数人再也不想逃了，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

结果就是：在栅栏下，墙下和柏油路上到处躺着士兵和难民，就是当年那些目光贪婪、队列整齐、步伐一致地向东进军的人以及那些举手行法西斯礼时，嘴里发出“万岁！”这种刺耳的疯狂喊声的人。他们曾梦想得到东方的土地和大量的战利品，而现在却“再也不想逃了”。

已经无路可逃！一切计划、意图、幻想、追求，总之一切的一切，全都破灭了……

5月7日，斯大林打电话通知朱可夫说：

“今天，德国人在兰斯市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在这场战争中担负了主要重担的是苏联人民，而不是同盟国。因此，投降书应该在反希特勒联盟所有国家的最高统帅部面前签署，而不能只是在盟军最高统帅部面前签署。我不同意不在柏林这个法西斯侵略中心签署投降书。我们已与各同盟国商定，把在兰斯签署投降书一事只当作投降仪式的预演。明天，德国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和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将赴柏林。苏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由您担任。维辛斯基明天将去您处。在投降书签署后，他将留在柏林担任您的政治助理。”

战争结束了，“政治陛下”将一展身手。

在所有同盟国面前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问题，是在雅尔塔会议上决定的。

下面摘引杜鲁门于1945年4月26日致斯大林的信，他在信中重申对投降问题的正确看法。

“1. 美国驻瑞典公使通知我，在希特勒据说是因病不能视事期间，希姆莱以德国政府的名义向瑞典政府提出关于包括挪威、丹麦和荷兰在内的西战场的全部德国武装力量投降的建议。

2. 美国政府按照我国与英国和苏联政府的协议，认为，惟一可以接受的投降条件是在所有战场上向苏联、英国和美国无条件投降……”

但是，1945年5月7日，杜鲁门还是批准了盟军统帅部在兰斯单独接受希特勒匪徒的投降。

斯大林立刻对违反协议这一事实作出了反应。

“1945年5月7日

约·维·斯大林致杜鲁门总统先生的私人密信

5月7日关于宣布德国投降的来电收悉。

红军最高统帅部并不确信，东战场的德军部队会执行德军统帅部关于无条件投降的命令。因此我们担心，如果苏联政府在今天宣布德国投降，我们将陷入窘境，误导苏联的舆论。应当指出，德军在东战场的抵抗不但没有减弱，而且根据截获的无线电消息判断，很大一批德军明目张胆地宣称，他们将继续抵抗和不服从邓尼茨关于投降的命令。

因此苏军统帅部希望等到德军的投降生效，把三国政府宣布德国投降的时间推迟到莫斯科时间5月9日晚7时。”

就在此时，朱可夫和他的司令部正在为德军统帅部签署最后一份最终的正式投降书作一切必要的准备。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后勤部长尼·亚·安季片科将军做了不少工作。

我同安季片科很熟。有一次，他来到我在佩列杰尔基诺的别墅，将军的心情不好，因为他的回忆录经过修订和补充后却“打不通”再版这一关。尼·亚·安季片科失去了再版的希望，将回忆录手稿的复印件送给了我。我在本书中当然引用了一些同安季片科的谈话及其回忆录中的内容。

安季片科将军受命负责保障签署投降书仪式的相关事宜。

首先，签署的地点定在了柏林郊区卡尔斯霍尔斯特。从前，这里曾是工程学校的食堂。为德国代表选定的楼房离这里不远。

安季片科说：

“我们是第一次负责这种‘供应’的。每一个人当然都非常清楚，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精神感受和造成的物质困难是什么。在当时，似乎顾不上举办宴会……但是，毕竟这场规模空前的战争结束了！战胜国的代表们第一次这样隆重集会。

应该盛情款待来宾。

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是5月8日白天到达的，他们是：美方



的美战略空军司令卡尔·斯巴兹、英方的英国空军元帅阿瑟·特德和法军总司令让·德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

从这些人的职位和姓名可以看出盟军对签署投降书的态度，确切地说，他们持鄙视的态度，也就是想贬低这次签署投降书的意义。参加仪式的本应是盟军统帅部的一把手——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只有教养良好的法国人由总司令作代表。

朱可夫相机行事。他没有去滕佩尔霍夫机场迎接客人，因为来宾的地位与他的身份不等。迎接他们的是朱可夫的副手索科洛夫斯基大将。

对希特勒匪徒就更简单了。凯特尔元帅、冯·弗里德堡海军上将和施图姆普弗空军上将是在英国军官的押解下到达同一个机场的。

据说，凯特尔乘车路过柏林街道时说：

‘城市所受破坏的程度让我感到极为震惊！’

我们的陪同军官问他：

‘元帅先生，当您下令摧毁数以千计的苏联城市和村庄时，当数以百万计的人，包括儿童压死在这些城市和村庄的废墟中时您感到过震惊吗？’

凯特尔不习惯对他的这种态度，脸色变得煞白。他耸耸了肩膀，什么也没有回答。

举行正式仪式的时间到了，而莫斯科还没有下达必要的指示。”

尽管过去了许多年，安季片科在讲到这件事时还是激动不已：

“事态出现麻烦。午餐安排在5月8日15时，可是签署投降书的时间一再推迟。天色已晚，关于召集人们进入会议厅的命令仍然没有下达。我去了朱可夫元帅那里几次，告诉他我担心饭菜变质。但是，仪式推迟并不取决于他，其中有高层的外交上的原因，因为莫斯科、华盛顿和伦敦在受降程序上无法达成一致……厨师们不关心谈判，他们只担心一点，千万不能丢脸，要将俄罗斯的厨艺出色地向尊贵的欧洲人展示。”

安季片科去过凯特尔的房间两次。凯特尔坐在桌子后面，桌上的饭菜要简单些。英国军官站在他和其他德国代表的身后。凯特尔一副宠辱不惊的样子，他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他随时等着叫他到会议厅去，在那里，他将在全世界面前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这份文件将把德

国军国主义者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他戴着单片眼镜，挺着脖子，高傲地坐在那里。

朱可夫、盟军代表、维辛斯基、捷列金和索科洛夫斯基在即将举行签署仪式的会议厅边上的办公室里等着。

莫斯科的“上层”终于把一切磋商完毕并发来了“指示”。24时，同盟国代表进入会议厅。他们在桌后坐下。这些人的身后是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国旗。军事人员和大量的媒体代表坐在摆放成字母H形（如安季片科所说）的桌后。他们中有西蒙诺夫和波列伏依等。他们每一个人各自在文章中记录下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我有一份当晚的速记记录。它不长，但是准确地反映出当时的情景。

大家落座后，朱可夫说：

“先生们：

在这里，在这座大厅里，红军副最高统帅、苏联元帅朱可夫受红军最高统帅部的委托和盟军远征军副总司令、空军元帅特德受盟军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委托，相聚在一起。

作为见证人出席的有：

美军斯巴兹上将。

代表法军的是法军总司令德拉特尔·德·塔西尼；代表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来这里无条件投降的，是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全权代表凯特尔元帅、冯·弗里德堡海军上将和施图姆普弗上将。

他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授权已被确认。

我提议签订仪式开始，请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来无条件投降的全权代表入场。”

朱可夫停顿了一会，他是让译员翻译他的话。

接着，朱可夫吩咐将德军统帅部的代表请进大厅。

他们被带了进来。凯特尔尽量保持着平静，他风度翩翩地举起拿着元帅杖的手向与会者致礼。但是朱可夫让他明白自己的身份，简短地命令他说：

“坐下！”

速记记录中就是这样记的，不是“请坐下”或者简单的“请坐”，而是：“坐下！”

“你们的手里有没有德国无条件投降书？你们研究过了没有？是否有权签署这个文件？”

这个问题是空军元帅特德用英语提出的。

凯特尔嘶哑地回答说：



“是的，我们研究过了，准备签署投降书。”

朱可夫站起来说：

“我建议德国代表团到这里来，到这张桌子前面来。你们就在这里签署德国无条件投降书。”

凯特尔猛地站了起来，眼睛冒着仇恨的怒火。但是，当遇到朱可夫严厉的目光后，他垂下了眼睛，顺从地朝桌子走去。他的单片眼镜掉了下来，挂在镜绳上。元帅满脸通红。施图姆普弗和弗里德堡同他一起走过去。凯特尔坐在椅子上，然后戴上单片眼镜，用颤抖的手在五份投降书上签了字。朱可夫清晰地说：

“德国代表团可以退场。”

他们被带出大厅。

朱可夫继续说：

“先生们：我宣布，会议到此结束。我向特德空军元帅、美军斯巴兹上将和法军总司令德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表示祝贺，祝贺对德战争胜利结束。”

这真是彻头彻尾的军人！换上一个政治家，整个程序和讲话就要拖上几个小时。

朱可夫用了40分钟：从1945年5月9日零时开始，到零时43分结束。

安季片科将军对我推心置腹地说：

“我在我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到这一点，而将这一点告诉您是对历史的交代。维辛斯基为朱可夫准备了一个几页长的讲话稿，让元帅在受降开始或结束的时候宣读。我不知道确切的受降程序，但是朱可夫将这篇讲话稿‘遗忘’在他办公室的保险柜里。我想他是故意这样做的，因为他不喜欢政治上的夸夸其谈。”

速记稿证实了安季片科将军的假设，朱可夫在会议上既没有致开幕词，也没有致闭幕词，只记录了元帅确实讲过的话。

维辛斯基毫无疑问向斯大林报告了朱可夫的自作主张，也许总书记当时就有了该把元帅除掉或冷落起来的想法（在1946年就这样做了）。

正式仪式结束后，宴会在同一个大厅里举行，只是把桌子摆成字母“III”形（如安季片科所说）。

朱可夫似乎变得温和起来。他和在场的人寒暄时，热烈地祝贺大家取得的胜利，并提议为苏联战士干杯，为同盟国的战士干杯，为所有在



场人的健康干杯。

庆祝宴会持续到早上6时。

我认为，这一章结束时有必要引用《投降书》的全文。这是这场战争最后的一个文件。

德国武装力量军事投降书

(1945年5月8日)

1. 我们，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的签字者，同意德国一切陆、海、空军武装力量和现时由德国控制的一切部队，向红军最高统帅部，同时向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无条件投降。

2. 德军最高统帅部将立即命令德国一切陆、海、空军事当局及德国控制下的一切部队，于1945年5月8日23时01分（中欧时间）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留在此时所在的阵地，并完全解除武装，将他们的武器和军事装备移交当地盟军最高统帅部代表所指定的盟军指挥官或军官。无论大小舰船或飞机，其发动机、机体、设备、机器、装备、器械以及一切用于作战的技术器材，均不得损坏。

3. 德国最高统帅部立即派出有关将领，保证红军最高统帅部及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今后所发布的一切命令的执行。

4. 这一军事投降书，不妨碍用联合国或以它名义签署的适用于德国和全体德国武装力量的总的投降文件来取代。

5. 如遇德军最高统帅部或任何在其控制下的武装力量未能依照这一投降书行动时，红军最高统帅部及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将采取他们认为必要的惩罚措施或作其他处理。

6. 本投降书用俄、英、德三种文字制成，仅以俄、英文本为正式文本。

1945年5月8日 签于柏林

德国最高统帅部代表：凯特尔、弗里德堡、施图姆普弗

在场的有：苏联红军最高统帅部代表、苏联元帅 格·朱可夫

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代表、空军元帅 特德

最高统帅在我们祖国的首都发布最后一道命令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整个战争期间，我们前线战士浴血奋战，建立功勋，历尽苦难长达四年，都在等待这个命令。因此，我想同样全文引用这个命令。

最高统帅给红军和海军部队的命令

1945年5月8日，德国最高统帅部代表在柏林签署了德国武装力量无条件投降书。

苏联人民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结束了。德国完全被击败了。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军官、将军和元帅同志们，我向你们祝贺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结束！


为了庆祝对德国的彻底胜利，在今天，5月9日，胜利日，22时，我们祖国首都莫斯科以祖国的名义用1000门炮齐鸣礼炮30响，向获得这次辉煌胜利的英勇的红军部队和海军舰艇部队致敬。

在保卫我们祖国的自由独立的战斗中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战无不胜的红军和海军万岁！

最高统帅

苏联元帅 约·斯大林^①



举国欢腾。欧洲各国人民，包括德国人民终于放松了下来。莫斯科用礼炮向胜利者致敬，部队也用礼炮向自己致敬。在鸣放礼炮的时刻，发射的不只有莫斯科的火炮，凡是手中有武器的人，都在发射，大家边喊着“乌拉！”边发射，到处都感受到胜利的喜悦！

十七 几位胜利者的速写

岁月流逝，参加伟大卫国战争的许多人已经不在人世。他们是多么优秀的人啊！我有幸认识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我只谈谈和他们几次见面的情景。这几次见面都与战争中的最后历史时刻直接有关，而且这些人本身也成了历史人物。再过一些年，我也会离开这个温暖的世界，但是我想，我们的子孙会心怀感激之情阅读有关我们的文字。我们曾经生活在庆祝胜利那个遥远而幸福的日子。

我从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安东诺夫开始来讲述杰出胜利者的故事。我和他于1959年相识在帕米尔山麓的奥什城。当时，我在那里指挥独立高山步兵团，而安东诺夫中将作为吉尔吉斯首都伏龙芝一所院校的军事教研室主任，带领学生来我们团见习。

^① 《斯大林文集》第457页。——译者注

就在那些日子里，他向我讲述了有关攻克柏林的故事。他在战斗中指挥的是第301步兵师。中将还送了我他的一本著作《通向柏林之路》。

他的师攻打盖世太保的主楼、航空部、卡尔斯霍尔斯特（后来在这里签订了投降书）、特雷普托公园和其他一些重要设施。

安东诺夫师强攻帝国办公厅大楼，并夺取了希特勒的最后一座避难所——元首的暗堡。安东诺夫说：

“5月1日的夜晚和早晨，我们都在为最后的强攻做准备。上午10时，军长罗斯雷将军打来电话，他向我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并下令在11时实施攻击。

炮火攻击后，各团突入花园里。透过烟尘，在花园北部可以看到一座巨大的水泥建筑。我们那个时候不知道，这是元首的暗堡。德军特种部队和希特勒警卫队的党卫军分子进行了疯狂的抵抗。就在暗堡前，他们像恶狼一样投入冲击，我们同他们展开了一场殊死的肉搏战。帝国办公厅的花园像地狱里的大锅在沸腾。在烟尘中，我看不清花园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给见过世面的团长古梅罗夫中校打电话，他回答说：

‘花园里发生的事是令人难以想像的！那里的肉搏战打得难分难解。’

暗堡门里的机关枪在扫射。恰好季莫申科中士和他的‘45毫米口径炮’就在这里。炮很小，但作用大。中士向机关枪巢直接射入几发炮弹后，佩斯科夫中尉排的战士立刻冲向暗堡的门。

第1054团在花园的肉搏战中战胜了党卫军分子！

清晨，罗斯雷将军来了。我和他一起进入暗堡。我给他看了我们的战利品——‘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元首旗。当时我当然还不知道，这面旗子将在庆祝胜利的阅兵式上被抛到通向列宁墓台基座的那条石路上。

集团军司令别尔扎林很快也来了。我向他转交了标有最后战况的希特勒个人用的地图。

别尔扎林看到挂在墙上的象征希特勒匪徒的鹰，立刻命令说：

‘把这些玩意儿拿下来！’

我师各个团获得了加封‘柏林’二字这一光荣称号。第301师被授予苏沃洛夫二级勋章。”

我给读者介绍的下一个人物是强攻国会大厦的著名的第150师师长沙季洛夫上将。

瓦西里·米特罗法诺维奇·沙季洛夫晚年住在老广场的一所房子里，它的对面是当时的苏共中央大楼。地点和楼房都很著名，这里曾住过许多名人。沙季洛夫的住所就在那个阶梯广场上，战前，叶戈罗夫元帅也曾住在那里。

我多次去过沙季洛夫的家，他向我讲述了强攻国会大厦和将胜利的旗帜插上屋顶的细节。

沙季洛夫笑着说：

“战斗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差一点就在国会大厦问题上出了差错。我将夺取国会大厦的任务交给了津琴科团长，他给我打来电话报告说：

‘我们面前有一座灰色大楼，它挡住了国会大厦。我不想在这里耗费兵力，从右边绕过去，后面才是国会大厦。’

我看了看地图，没有发现在该团进攻的地带上有什么灰色大楼。他指的是什么呢？我问他：

‘请你搞清楚，你面前的楼房是什么？是可罗尔剧院吗？不可能，它位于你的西南侧。’

后来才弄清楚了，原来那座灰色大楼就是国会大厦。真是的，我们差一点在战火的硝烟中绕过国会大厦。战斗进行得很吃力，每一寸土地都要用战斗去夺取。真舍不得那些战士，离战争结束只有几个小时，有些战士还是献出了生命！

津琴科报告说：

‘斯亚诺夫连正接近正门。营长涅乌斯特普耶夫去那里催促他们快一点。’

‘军事委员会的旗帜在哪里？’我问道。

‘在旁边我的观察所里。’

‘只要突进去，就马上将红旗插到楼顶上。’

‘将军同志，战斗打成这样，哪有人去干这件事！’

我决定吓唬他一下说：

‘好吧！既然你没有时间，那我把红旗交到普列霍达诺夫团。他会派一些合适的人的。’

津琴科马上醒悟过来，也不管战斗了。师长想取走红旗，这怎么行！他对着话筒喊道：

‘将军同志，我已经找到所需的人了，瞧，他们就在我这里，他们是勇敢的、经验丰富的侦察兵叶戈罗夫中士和坎塔里亚中士。我现在就向他们布置任务。’



‘好吧，正该如此！’我笑了笑说。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下发了9面红旗，进攻市中心的师各有一面。谁第一个夺取国会大厦，谁就将红旗插到大厦上面。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将它称作胜利的旗帜……”

有关侦察兵和红旗在通往国会大厦的路上所遇到的其他一些波折，我就不再叙述，我就讲从津琴科团长那里了解到的事情。我们不仅相识，我还为在中央电视台主持了好几年的“功勋”栏目给津琴科拍摄了一部电视片。

苏联英雄津琴科和他的团一起夺取了国会大厦，并被任命为国会大厦第一任卫戍司令。

“无论是在通往大厦的路上，还是在大厦里面，争夺国会大厦的战斗都进行得很艰苦。大厦很大，几千名希特勒匪徒不顾死活地抵抗，战斗逐层进行，还在地下室里进行。希特勒匪徒被消灭在大厦里，带着红旗的坎塔里亚和叶戈罗夫同样要用突击步枪为自己扫清道路……”

但是，关于旗手在战斗中发生的一些故事情节，我是听坎塔里亚说的。

我问津琴科说：

“是谁想出来的，又是谁开始在国会大厦的墙上签名的呢？也许是您的战士刚刚走到国会大厦的墙边，就开始记录这一历史时刻的？”

“不可能，我们还在大厦里作战时，签名就已经开始了。我从国会大厦出来一看，整个底部已经写满了。大家互相踩着肩膀，越签越高。后来，有人从地下室找到了梯子，把它拽来。于是一直签满整个大楼，直至它的房檐。”

“朱可夫也签了吗？”

“是的，他也签了，随行的将军们也签了。”

“经过是怎样的？”

“第一个见到朱可夫的是我的一个营长涅乌斯特鲁耶夫大尉，后来，一通知我说方面军司令来了，我就马上过去了。朱可夫一边读着墙上的签名，一边微笑着，他很满意。他问道：‘是怎样爬上挨着天花板的地方去的？’我说了一下情况，并让他看了看梯子。他问涅乌斯特鲁耶夫道：‘那您当然是第一个签名的啦？’‘元帅同志，不是的，’大尉回答说，‘当时我们正在楼里消灭德国人，这时已经有人在签名了。’”

朱可夫和同他一道围着国会大厦看的战士们谈了一个多小时，然后，他自己也在一面墙上签了名……

我是在1968年去国会大厦的，里面的第一层已被德国人辟为展厅。



大厦还没有进行大修，但是外墙已经进行过粉刷，包括朱可夫签名在内的全部字迹都已被涂掉。

同坎塔里亚的谈话内容留在本章的结尾。起先我造成了一个令他不开心的误会，那是在1980~1986年我担任《新世界》杂志主编期间，在有一期杂志里，一位倒霉的作者（我不记得他的姓名了，而我手头上又没有那些年杂志的合订本）在他的文章里提到了坎塔里亚，却说坎塔里亚在战后已经去世。

文章发表后，很快有人打来电话：

“我是坎塔里亚，就是你们给埋葬了的那位……”

不难想像我十分惊讶，然后感到羞愧难当。我相信了这个作者，并认为他知道英雄真正的命运。

总之，应该马上更正这个错误。不仅当面对坎塔里亚道歉，还应在杂志上公开道歉。

我立刻去莫斯科饭店，会见了梅利通·瓦尔拉莫维奇·坎塔里亚，并代表编委会向他道歉。就在下一期，即1982年的第7期杂志上，发表了我们的谈话。下面引用的是这篇文章的全文，未作修改和补充。

“坎塔里亚中等身材。尽管已经62岁，但活泼好动。他没有留格鲁吉亚人传统的胡须，脸刮得很干净。他明亮的眼睛带着笑意，和蔼可亲。他善于交际。可能由于我们都是侦察员出身，年龄又相仿，加之我们的胸前都佩戴着金星奖章，因此，一见如故，马上以‘你’相称。

坎塔里亚说话带有天生的悦耳的口音。他开始流畅地欢快地讲述起来：

‘战后我是怎样过的？亲爱的，你自己也知道，那时候很不容易。我回到奥恰姆奇里，我就是从那里应征入伍的。我的归来让人悲喜交加，喜的是胜利了；悲的是我的同村人有61人奔赴前线，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牺牲了。’

‘生活安顿得怎样？’

‘很好！我娶了库班哥萨克姑娘安娜·伊拉里奥诺夫娜，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叫列佐和绍塔，女儿叫齐耶拉。儿子们是司机，女儿已经出嫁。我早就当爷爷了！我有6个孙子！’

‘而你在退伍后从事什么职业？’

‘我的职业是最好最美的。战后我回到故乡的土地，种了5年地，在特克瓦尔切利矿山干了5年，之后，又在建筑工地上当了16年木匠。应该工作，我喜欢工作，工作使我获得了尊敬。由于

劳动出色，我被授予列宁勋章，并当选为阿布哈兹最高苏维埃代表。亲爱的，情况就是这样。’

‘在战后你同战友们失去了联系没有？通信吗？’

‘怎么可能与朋友失去联系呢？！不仅是通信，他们还来苏呼米很多次，都是到我这里做客。他们是我们师长瓦西里·米特罗法诺维奇·沙季洛夫、团长津琴科、营长涅乌斯特鲁耶夫和侦察兵叶戈罗夫。全都来过。他们全都是苏联英雄。他们还会来苏呼米，还会到我这里做客。你也要来做客，你也是我的朋友，请你记下地址。’

‘梅利通，你自己经常旅行吗？’

‘太经常了！莫斯科我常来，去民主德国不下10次。因为我是柏林市的荣誉公民，德国朋友授予我一枚卡尔·马克思勋章。这次来莫斯科就是应共青团的邀请参加代表大会的。要知道，当红旗插上国会大厦时，我还是一名共青团员。我是后来入党的，我登上大厦圆顶时是一名共青团员。’

‘当你接过红旗，把它带到代表大会礼堂时，你想的是什么？’

‘非常激动，想了很多！非常非常……遗憾的是叶戈罗夫已经去世。我回想起，我们是怎样冒着硝烟炮火登上国会大厦的。四周子弹呼啸，弹片纷飞，而我却毫发无损！我在这之前4次负伤，而那一次竟然躲过去了！我很幸运，亲爱的！对，我还回忆起年轻时代。我是穿着军装参加代表大会的，我特意缝制了新军装，戴上下士肩章。’

‘你现在的军衔是什么？’

‘下士。’

‘但是战后列入预备役后，你的军衔应该得到晋升。’

‘我个人请求不晋升。’

‘为什么？’

‘我登上国会大厦时是下士。所有的文章都这样记载的。就让我永远做大家的坎塔里亚下士。’

‘你现在身体怎样？伤对你没什么影响吧？’

‘身体没问题，很健康，我告诉你，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坎塔里亚麻利地指着自己的胳膊、大腿和背说，‘反正我很健康！亲爱的，近卫军是不生病的！’

我们还谈了许多。坎塔里亚很高兴，开着玩笑，有力地做着手势。我一边望着他，一边想，在战争年代，在胜利阅兵式上，他都是这个样子。我回忆起自己的战友，不由得想道：所有部队侦察员都有某些相似之处。我在战场上见到他们中很多人，他们来自不同



的民族：有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鞑靼人和其他民族，虽然他们外表不同，但是那时他们都亲如兄弟，有着一种共同的气质。也许就是像坎塔里亚身上所体现的这种坦荡的胸怀、乐观的性格和为朋友甘愿付出一切的秉性。军人中专业各不相同，无论是飞行员、坦克兵还是水兵，难怪他们中有一句话是对人的最高评价：‘我愿意和他一起去侦察。’

坎塔里亚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是一位忠实、可靠、善良和情感专一的人！”

这就是我和至今幸存的英雄——胜利者们令人幸福、愉快和对作家很有助益的会见。



第七章

伟大的强国

……这个阴沉的、令人忐忑不安的布尔什维克国家……当初我曾经固执地想把它扼杀在襁褓之中，而且直到希特勒侵犯之前我都一直认为它是文明自由的死敌……对于俄罗斯万幸的是，在它经受艰难考验的年代里领导它的是天才而且坚韧不拔的统帅约·维·斯大林。斯大林接受的是还在使用木犁的俄罗斯，而他留下的却是装备了原子武器的俄罗斯。

温斯顿·丘吉尔

一 初见和平

(秘密行动)

真叫人不敢相信，战争结束了。在一段时间里，潜意识里依然像电荷一样脉动着暗自的戒备心、对危险的担心和投入战斗的决心。

接踵而来的就是欢乐。一种无边无际、轻松自在、美滋滋的欢乐，可是在心灵深处仍然隐藏着一丝疑虑：真的是一切都结束了吗？！

这只是个人的感受。我不敢断言所有身处前线的人（连那些后方的人也在内）都有相同的感受，可是无疑都有大体相似的感觉。然而从历史和国家而言，风云激荡的20世纪开始了一个新阶段。啊，我们遭遇的也是一个严酷的世纪！仅仅在20世纪的上半叶里就发生了两场最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

我们这一代人知道，战争是怎样开始的，它怎样在冷酷无情的磨盘里把千百万人碾成齑粉。我们亲身体会了“战争是政治使用另一种（武装）手段的继续”这句话的含义。我们平静地回顾并且懂得了我们究竟干了些什么。一位哲人曾经说过：“历史就是转化成过去的政治。”又是政治！可是这两种政治我们都品味过了，而现在开始的又是什么样的政治呢？战争结束了，可是开始的又是什么呢？这一切，教科书、书籍、影片、博物馆的画藏都告诉了我们。过去战争是怎样结束的？人们是怎样迎来和平的？掠夺、分赃、为死去的亲友复仇、胜利者家家纵情宴饮、强奸妇女、趁火打劫以及军队逐渐腐化。在一切时代里，战胜者都掠夺、破坏、纵火焚烧被侵占的城市。远古时代的居民要么死于非命，要么沦为奴隶。请读者原谅我举这些老生常谈的例子，因为根本没有其他的例子可举。

比如说，公元前147年，罗马人在三年围困之后，用强攻占领了迦太基，他们不仅彻底摧毁了这座当时最美丽的城市，而且将它夷为平地，为的是使它永远不能再建立起来！迦太基的居民都被卖为奴隶。

拿破仑进入莫斯科后，莫斯科就成了一片废墟。不错，在烧毁首都这一点上爱国者们也帮了法国人的忙，可是不管怎么说，敌人去后，这座古都只剩下不曾燃尽的木头和几座烧得黢黑的石质建筑。

不过也有另一种情形——俄国军队赶走了波拿巴，进入巴黎之后，并不像法军在我国土地上干过的那样，他们没有伤害法国居民，不曾为自己死难的同胞施行报复，没有破坏，也不曾掠夺，而是宽恕了他们。

按希特勒的打算，占领莫斯科后，必须把它夷为平地，而且用洪水把它淹没。城市原先所在的地方应当变成汪洋大海，让俄国人民的首都永远也不可能重建起来。它的每一个居民，无论男女老少，都不得离开莫斯科，因为所有的人都应当格杀不论！元首显然是想超过迦太基的占领者！

俄罗斯士兵（德国人把所有的苏联战士，不问其民族一概称之为俄罗斯士兵）再度显示了自己先辈的高尚品质。他们进入柏林后，没有掠夺，没有破坏，也不曾进行报复，我军表现出了伟大的人道主义和高尚品格。这是很不容易，也是很简单的。即便是发生过类似远古占领者干过的那些行径，也只是例外，而且已经受到惩处。

德国人怯生生地从地下室里朝外面张望，他们等待着希特勒的宣传机器妄言的血腥镇压。可是让人猜不透的俄国人却开始……清理街道，扑灭火灾。后来，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向朱可夫提了一个问题：

“世界上许多人都闹不明白，苏联士兵赶走了在我国土地上制造骇人听闻罪行的敌人，进入柏林之后，怎样才得以强压怒火和报复情绪的呢？”

朱可夫回答说：

“说实话，当战争还在进行时，我们大家，也包括我在内，都决心对法西斯分子在我国土地上的罪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可是我们强压住怒火。我们的思想信念和国际主义情感不允许我们盲目复仇。在这里起了巨大作用的是教育工作和我国人民所具有的博大胸怀。”

是的，表现出我们一贯的高尚品格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问题不仅在于内心的感受，强压怒火只是事情的一半，真正的高尚品格还表现在付出的巨大劳动中。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是人和动物的尸体，在按照希特勒的命令灌水淹没了的地下铁道里，隧道中和站台上推满了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尸体。

炎热的天气眼看着就要来了，传染病不可避免地会迅速蔓延，必须拯救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留在断垣颓壁中的400万居民得不到饮水，也得不到食物，必须使他们有吃有喝。饥饿、衰弱（有许多人受了伤）的人们躺在废墟和地下室里，有些人很难分辨是死是活。

斯大林下令部队帮助柏林的居民。他们开设了饮食站，野战军就在十字路口用灶做饭，而且就地发放面包。士兵和不久前还是敌对的居民一起清理街道，运走伤者，掩埋死者。过了几天城里的卫生状况就改观了，沿着清理过的街道已经可以不断运送食品了。

不久以后，医院、学校和电影院就修复了，而且开始工作了。

奥托·格罗提渥写道：“历史上何曾有过这样的占领军？它在战争结束后五个星期就使被占领国的居民能够建立政党，出版报纸，拥有了集会和言论自由。”

这些巨大的努力当然绝不是仅仅出于我军官兵的善良和意愿，要做到这些必须有明确的组织安排和相应的物质保障。斯大林允许拨出所需的一切。

为了维持秩序，朱可夫领导下的军事委员会在城里设立了卫戍司令部，第一任柏林卫戍司令是别尔扎林上将，他是出色地从法西斯分子手中解放柏林的将领之一。其他城市里也设立了卫戍司令部。

斯大林考虑到春天将临，下令提供帮助，于是苏军司令部组织了播种工作，为居民拨出了拖拉机、燃油、种子，为恢复经济做了所必需的一切。

* * *

而法西斯帝国侥幸活下来的那些领导人并没有失去保全自己并保全纳粹国家的希望。我们知道，希特勒自杀之前写下了两份遗嘱——一份是私人遗嘱，另一份是政治遗嘱。海军元帅邓尼茨履行元首的意志，组成了政府并且把它放在英国占领区内的弗伦斯堡市。

我觉得我和读者都很走运，因为我见到了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特鲁索夫将军。他和一些军官受斯大林的委派，参与逮捕了法西斯德国以邓尼茨元帅为首的最后一届政府。在柏林战役期间，他是朱可夫司令部的侦察处处长。

无条件投降书的签署结束了战场上的交战，记录了希特勒军队的彻底被歼灭。我将要讲述的这个行动并不是一场交战，而是一个政治行动。可是这件事情战斗性强、十分危险，对于它的参与者而言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读者，特别是参加过这场战争的人，大约会苦思冥想——作者指的是哪一次战役呢？这次让人一时想不起来的、谜一般的行动是什么呢？

的确，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最后搏斗，当时知道它的人也为数不多。斯大林在采取这个行动时恪守保密的原则。也许正因此，即使在行动顺利完成之后，也很少有人知道，很少有文章谈及它，战史学家和新闻记者的著作关于这次行动通常都是一笔带过。我不能说自己是第一个



发掘这件事情的人，可是我也不想贬低自己所做的工作，何况我的这份劳动得到了著名的历史学家、教授、科学博士、许多部广为人知的书籍的作者格·列·罗扎诺夫客观的评价。这位教授在《第三帝国的覆亡》（我认为，这本书不仅是一本文学—政论作品，而且是一部历史研究的基础性著作）中谈到我将要讲述的这次行动时，做了这样的注释：“1982年5月尼·米·特鲁索夫中将向苏联知名作家弗·卡尔波夫详细介绍了他去弗伦斯堡的使命。本章中使用了后者发表在1982年5月18日《文学报》上的材料。”

我要指出罗扎诺夫为人正派，因为在我们的时代（而且也包括从前）某些作者常“扒下”别人说过的事实和思想，而且据为己有。我引用这段注释，还因为它证明在1985年以前，即事情过去了40年，连罗扎诺夫这样广见博闻的历史学家也不知道这次行动的细节。

好吧，书归正传。1945年5月16日，我国报纸上刊登了苏联新闻局的最后一份战报，说苏军已经完成了接受苏德战线全线德国法西斯军队投降的工作。

因此在我们一方已经完全恢复了秩序，我们履行了对盟国的义务和投降书的条件。可是据斯大林得知，在盟国的占领地区，秩序还远未恢复，甚至与之相反，出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

在英占区内有大约100万德军官兵没有被解散，也没有被当作战俘处置，却反而对他们进行战斗训练。此外，改称为“北方”集群的缪勒集团军群保留着自己的司令部和各有兵员10万多人的两个军。希特勒匪徒依旧穿着自己的制服，佩带着各种奖章，仍然以纳粹的举手礼互相致敬。惟一的变化是呼号声：因为希特勒已经死了，所以现在只喊一声“万岁”，而有些人已经把它添加成“邓尼茨万岁”了。怎么会出现这些事呢？

希特勒在自杀之前，规定自己的接班人是海军元帅邓尼茨，而且任命了他的政府部长。政治遗嘱规定了这个政府的行动纲领。邓尼茨当时驻在弗伦斯堡，在基尔运河的北边。英军在战斗中前进时，并没有占领这片土地。邓尼茨执行元首的遗嘱，担当起领导全局的责任，组成了政府，宣布自己是德国惟一合法的政府。

邓尼茨向同僚们发表的第一次简短讲话的录音保存下来了：

“朋友们，我们大家都应该很清楚，我们完全处在敌人的掌握之中。我们今后的命运是悲惨的。我们不知道他们会怎样对付我们，可是我们非常清楚我们自己应当怎样做。我们应当遵循的政治路线很简单，很明显，我们应当和西方诸强国走在一起，在被占领

的西部地区同它们合作，因为只有借助同它们的合作，我们日后才能指望从俄国人手里夺回我们的土地。”

丘吉尔后来在回忆录里并不掩饰自己对“俄国人”的背叛（它是盟国）意图。我只引用他给蒙哥马利的训令中的一小段话，这段话已经广泛流传了：“把德国的武器仔细收藏起来，以便在苏联继续进攻、而我们不得不和德国士兵合作时，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武器分发给德国士兵。”

蒙哥马利心领神会，后来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从俄国人手中逃脱了的德国军事领导人心甘情愿地成了英国人的朋友，履行我们的一切要求。可是作为对这种合作的回报，他们期望把他们作为英国人反对俄国人的盟友。”

我国的情报部门干得很出色，斯大林的办公桌上放着关于盟国占领区里发生的一切的情报。正像大家知道的那样，最高统帅是一个果断而坚决的人（何况又取得了震惊世界的胜利），于是他迅速而坚决地采取了行动。

这次行动的准备和开始是这样的。

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朱可夫来到最高统帅的办公室。斯大林说：

“我们把德军官兵全部解除了武装，送进了战俘营，可是英国人却保留着完全处于战斗准备状态的德国部队，而且同他们合作。以原先的指挥官为首的德军司令部至今享有充分自由，按照蒙哥马利的指示收集、整理自己部队的武器和战斗技术装备。我想，英国人努力保存德军部队是为了日后使用，而这是直接违反盟国政府首脑关于立即解散德军的协议的。”

斯大林转向莫洛托夫，对他说：

“必须赶紧派出我国代表团到盟国管制委员会去。代表团应当坚决要求盟国逮捕邓尼茨政府的全体成员、德国将军和军官。”

莫洛托夫回答说：“苏联代表团明天就出发去弗伦斯堡。”

斯大林接着通报了各盟国成立对德管制委员会的决定，参加委员会的有全部四个盟国的代表：代表美国的是艾森豪威尔上将，代表英国的是蒙哥马利元帅，代表法国的是塔西尼将军。

斯大林说：“我们决定委任您，朱可夫同志，担任苏联对德管制的总司令。除了总司令的参谋部之外，还需要成立苏联的军事行政机构。您需要一个负责军事行政的副手。您打算让谁担任您的副手？”

朱可夫提出索科洛夫斯基将军。斯大林同意了。

最高统帅批准由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侦察处处长特鲁索夫将军任逮捕邓尼茨政府的苏方代表……

下面我们还会一再提到特鲁索夫将军。我们两人在退休以后成了朋友，他为了《统帅》这本书，对我讲了许多事情。1942年时，他是伊·叶·彼得罗夫指挥的北高加索方面军侦察处处长。现在，为了我下面将要讲述的这次行动，他又给了我许多帮助。下面是他来信中的几句话：

“尊敬的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

寄上对你来信中提出的四组问题的分别回答。如果这些简单的回答能够于你有所裨益，我会感到非常满意……

顺致敬意！

特鲁索夫

1983年3月14日”

我在一次和特鲁索夫谈话后，给他留下了一些问题，他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没有忘记答复我。

在我看来，最可信的莫过于那个遥远的1945年5月各种事件亲历者的讲述了。现在特鲁索夫已经辞世，不过我不打算修改我们谈话的记录，就让读者感受到他依然是一个活生生的交谈者吧。

我们坐在长春藤大街上特鲁索夫的家里，他的妻子，也是他终生的忠实伴侣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为我们准备了香喷喷的茶。

“每个事件，要么是之前有一个准备过程，要么是各种因素的巧合导致而成。”特鲁索夫开始谈，“希特勒在自杀的前一天，4月29日，在他所谓的‘政治遗嘱’上签了字。过了几天这份遗嘱就到了我的保险柜里。这份遗嘱任命了德国的新政府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按照遗嘱，职位是这样分配的：邓尼茨任总统，戈培尔任总理，博尔曼任党务部长，赛斯-英夸特任外交部长，吉斯勒任内政部长，汉克任警察总监，肖奈尔元帅任陆军总司令。”

我问道：

“希特勒任命邓尼茨元帅为自己的继承人是出于什么考虑？为什么选中了他？早先不是正式任命了戈林为希特勒一旦去世时的继承人吗？”

特鲁索夫微微一笑说：

“说是戈林辜负了元首的信任，他背着希特勒擅自行动，准确些说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和财产，同美国人开始谈判。这还是德军仍旧在

和从西面进攻的盟军作战，或者是装模作样地作战的时候。勃然大怒的元首认为这是背叛，于是出现了新继承人的问题。选中邓尼茨元帅并非偶然，他不仅是纳粹的忠实信徒，而且同金融巨头有联系，他是百万富翁、工业巨擘埃德蒙德·西门子的亲戚。炮声越来越少，开始了悄没声息的行动。邓尼茨元帅不仅对于德国和西方各国的金融界和工业界的代表而言，而且对于苟全性命的法西斯头目而言，都是恰当的人选。1945年4月30日18时30分，邓尼茨在普伦市收到一封发自柏林、由博尔曼签署的电报。”

特鲁索夫笑着看了我一眼，说：

“我读过这封电报，所以记得它的确切日期和时间。电报说：‘海军元帅，元首任命您为自己的继承人，取代早先的帝国元帅戈林。书面的全权证书即将送达。从现在起您应当根据目前的局势采取必要的措施。’

邓尼茨的回电说：‘我的元首，我对您的忠心是不可动摇的。我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缓解您在柏林的处境。既然命运使我作为您的继承者，成了德意志帝国的第一人，我必将以德国人民空前绝后的英勇斗争所要求的方式结束战争。’

邓尼茨转移到弗伦斯堡市，开始了积极行动，组成了政府，指望它能够代表整个德国，并着手执行它战后的基本政策。这个政府最心向往之、不可告人的愿望之一，不消说，就是让获胜的盟国之间发生争吵。”

特鲁索夫停顿了一下，好像是在回忆那些日子，然后接着说：

“我们知道有一个邓尼茨政府，也知道它在干什么。丘吉尔对这个政府给予很大的希望，这个政府在英占区内成立这一事实就是证明。英国人庇护邓尼茨，我想并非出于偶然，也不仅仅是出于一时的考虑。”

将军面带善意的狡黠看了我一眼，问道：

“不知道您怎么看，这同邓尼茨1918年下半年和一艘沉没潜艇的部分艇员一起被英国人俘虏有关系吗？一艘英国驱逐舰在海面上把他们救了起来。一年以后，也就是1919年的下半年，邓尼茨才回到德国。此外，大家都知道，原海军元帅邓尼茨在纽伦堡法庭上可以说没有受到指控，而是受到英国的庇护。英国的代理主检察官并不要求将邓尼茨处以极刑，而是要使他受到最轻微的惩罚。海军元帅邓尼茨是纽伦堡法庭上惟一只被判处十年监禁的被告，虽然他犯下的反人类战争罪行并不比其他入少，他是纳粹的著名人物之一，完全应当为法西斯主义的残暴罪行负责。而且我还要提醒您，在原希特勒的海军元帅邓尼茨去世时，伦敦《泰晤士报》于1981年用了半个版面刊登讣告。讣告用最尊敬的语调赞扬了他的功绩、天赋、军事知识，而只字未提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对人类犯下的罪行。”

特鲁索夫沉湎于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最高统帅批准我担任逮捕邓尼茨政府的苏方代表。从莫斯科来了几名军官，参加我的小组。我奉命在行动期间直接同莫斯科联系，为此我带了一部电台和必需的密码本。给我的命令是：挑选一个由20~25名军官组成的小组，5月17日必须到达弗伦斯堡并尽快完成任务。

到英占区我们是去了，可是假如我们十分坚持，我们还能不能从那里回来呢，再说假如我们知道了一些英国人不愿意公开的事情呢？他们可是最善于迫使他们不喜欢的人闭上嘴巴的了，这方面的证明材料在他们历史的任何一页上都可以找得出来。

总之，我把一切都准备好了。肃反委员会派来参加我的小组的同志们也及时从莫斯科飞来了。他们的组长是我一眼就喜欢上了的、沉稳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戈尔布申。他是列宁格勒人，和我一样，一开始在基洛夫工厂当工人。战前就已经是机械车间的技师了，由市委派到国家安全部门工作。戈尔布申经历了列宁格勒被包围的日子，然后一直打到柏林。

我们到了基尔运河的北边，在那里仿佛置身于战前的法西斯德国：随处可见的是街道的旧名称、法西斯的各种指南和索引、到处是纳粹的党徽、纳粹的举手礼——还有许许多多德国军人，身着陆军、党卫军和海军制服，佩带着勋章和等级标志。这里显然还完全继续存在希特勒的秩序，起作用的是法西斯的法律。

弗伦斯堡还维持着市内交通，商店也都继续营业，街上车来人往，很是热闹，管理交通的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警察，他们穿的还是希特勒时期就穿的那种制服。

港口里停靠着许多德国军舰。舰上人员的生活一如既往——离舰上岸，休假完了再回舰。舰上还是每隔半小时敲一次钟，德国的卐字旗依旧在飘扬。

以统帅部总参谋长约德尔上将为首的法西斯德国最高统帅部驻在弗伦斯堡并继续在运作。

仿佛既没有战败，也没有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我们当时的感觉是，这一块土地是故意留给纳粹分子的，使其能够保存骨干，熬过这个‘阴雨天’。这可以说是一个博物馆，不过陈列的不是蜡像，而是活生生的人，不仅仅是人，还有法西斯的秩序和生活方式。

先于我们到达弗伦斯堡的是以鲁克少将为首的美国代表团和福



特准将率领的英国代表团。我们到达的当天，5月17日，就和他们见了面，而且就以后的工作开了会。

福特准将吓唬苏联代表团和美国代表团，说是如果我们立即着手取缔邓尼茨政府，那么他不能排除弗伦斯堡德国海军学校武装闹事和党卫军暴乱的可能性。

福特在英占区内是熟悉情况的主人，他试图把事情描绘成这样：我们在弗伦斯堡工作的结果应当是向各自的政府“说明”，在对德管制的现阶段上邓尼茨集团还有用，目前还不应当取缔它。

我们想立即执行任务确实是不可能了，必须谨慎行事，判明局势，找到出路。英国人作为主人，向我们代表团提出了几种安置方案：住在旅馆里、住在市里或郊外单独的房屋里。考虑到环境，还有本地报纸已经报道了我们的到达，而且使用了显然并不友好的语气，所以安排我们小组时必须考虑安全，甚至一旦遭到攻击，能够自卫。因此我决定把我们小组放在“娜特丽娅”号客轮上。它停靠在栈桥旁，只有一条跳板和陆地相连，一旦出现危险，我们可以或者开进大海，或者用自己的力量还击，不让进攻的人踏上跳板。英国和美国代表团也决定住在这条船上，这多少有些出乎我们意料。他们这样做表面上是出于同盟国团结一致的感情，便于共同工作，不过我的理解是：企图把我们置于经常的监督之下，了解我们小组所有军官的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在船上安顿完之后，特鲁索夫一分钟也不敢耽搁就开始行动。他给小组全体成员规定了具体任务，自己则在短时间内做了许多事。下面是他的报告的摘录：

“5月18日和德军上将约德尔谈了话。

在凯特尔被捕后，约德尔担任德军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长。最高统帅部分为两部分，大约60%的人在弗伦斯堡，大约40%的人在彼得加登，统帅部的详细名单我用飞机送达。统帅部两个部分之间除了明码无线电报外，没有其他任何联系。”

特鲁索夫接着报告了统帅部指挥的实际兵力，英美之间非法瓜分德国舰艇使他深感不安。

特鲁索夫在下一封密码电报中报告了他查明的舰队情况：

“①……现已查明，德国人在基尔运河区，包括丹麦在内……”



共计移交给盟国 2 600 架陆基飞机和 66 架水上飞机。

有关向盟国移交飞机的文件我用飞机送上。

②……投降后，英国人在波罗的海和北海水域夺取了下列德国军舰：轻重巡洋舰 9 艘，驱逐舰 12 艘，潜水艇 195 艘（以下列举了多种军舰）。总计战斗舰只 258 艘。此外还有商船 951 艘。

送上关于船舰的文件资料……

根据与美英军官谈话所得材料，英国人不打算分给苏联一定百分比的德国海军舰艇和商用船只。

美国人不反对给苏联分配一定比例的德国海军力量……”

特鲁索夫的报告打印份数十分有限，仅仅分送给斯大林、莫洛托夫、朱可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安东诺夫（他当时任总参谋长）。

特鲁索夫接着说：

“福特准将极力反对我同邓尼茨会见。据说邓尼茨会按三方代表的共同要求用书面回答一切，然后回答的副本由英国人转交给各方代表。我坚持要求会见邓尼茨。经过长时间拖延和一再说服我放弃会见的要求之后，福特准将总算让我见到了邓尼茨，条件是我不得做审讯笔录，而只是向他查询涉及他作为按照希特勒 1945 年 5 月 29 日遗嘱成立的政府首脑的活动的若干问题。

在我方的 B. H. 斯米尔诺夫上校和福特准将陪同下，我走进邓尼茨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很大，布置着古老的木制家具，墙上挂着希特勒的照片。我们进去时，邓尼茨站起身来，想用希特勒匪徒传统的手势向我们致意，可是看见我们不满意的脸色，就尴尬地垂下了手，指了指办公桌边的几把椅子。

邓尼茨身着海军上将军服。他已经 53 岁了，看上去是一个精神抖擞的军人，中等身材，头发梳得很整齐，鬓角已经斑白。邓尼茨的目光不很专注，眼珠转来转去，尽管他表面上显得很平静，他的举止却显出一些犹豫不决。我问邓尼茨，政府成员都有谁。您自然能够理解，我感兴趣的不是今天政府成员是哪些人，而是希特勒的遗嘱中指定参加政府的那些人现在在哪里。我已经得知，元首提到的那些头目并不在政府里。那他们到哪里去了呢？

关于政府的活动邓尼茨回答得很勉强，不错，他说了政府的全体成员，谈了许多组建政府的困难，因为希特勒遗嘱中提到的那些人都不在本地。

我问他：‘为什么弗伦斯堡的政府里没有博尔曼和帝国的其他

领导人?’邓尼茨说，他一再试图查明这些人——包括博尔曼——在哪里，并试图同他们取得联系，可是没有成功。邓尼茨接着说，希姆莱找过他，建议同他合作，要求当第二把手。他拒绝了希姆莱，希姆莱就走了，也没有说到哪里去。

在整个‘接见’过程中，邓尼茨一直盯着福特准将，仿佛是等待他赞许自己的回答。

我国代表团坚持逮捕应当按照我们核准的名单同时进行。可是应当说，名单很长——我们在联席会议上定下的名单有200多名纳粹的大头目。我们最后总算谈妥了，规定逮捕在1945年5月23日实施，按照我们已经知道的地址同时采取行动。”

我要请读者注意，特鲁索夫将军不仅完成了斯大林关于“逮捕邓尼茨政府”的直接任务，而且还主动抓住了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全体人员。我强调“全体人员”，为的是说明连复活的点滴希望都不存在了。

这位积极的将军还给自己找了额外的工作，而且也报告了莫斯科：“我们关于成立一个委员会并登记档案的建议已经被接受了。”

这些档案在纽伦堡审判中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啊！多亏特鲁索夫将军十分主动，否则这些极其重要的文件有许多就可能被希特勒匪徒销毁了或者在统帅部的德国人员被逮捕后散失了。

在具有决定意义的那一天，确切地说是那个夜晚，特鲁索夫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他的小组有25个人，而逮捕将由英国官兵来执行。为了进行监督，并在必要时抓住不放，特鲁索夫把他的军官分派到英国的各个小组里去，并对他们做了相应的指示。在采取行动的前夜他们得到情报，要求他们紧急采取积极行动，而且不仅仅在弗伦斯堡。

现在请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戈尔布申来谈谈。他说道：

“我和伊夫列夫中校查明，德国人关于苏联军队的侦察文件统统被英国人从弗伦斯堡运到比利时的丁斯特市去了。我报告了特鲁索夫将军，请求就将这些文件移交给我们进行谈判。英国人同意了我们的论据，委派了一名军官陪同我和伊夫列夫中校到丁斯特去。”

（当时决定，戈尔布申和伊夫列夫在实行了逮捕行动之后再赴丁斯特。）

5月23日拂晓，行动开始了。各小组按照预定地址分头出发。各盟国代表团的领导人召来了德国非法政府的总统兼军事部长邓尼茨元帅、指挥作战的总参谋长约德尔上将和海军总司令弗里德堡海军上将。

三方——苏联、美国和英国——代表宣布，从即刻起解散所谓邓尼茨政府，他们三人被拘押，所有政府机构终止存在，全体政府成员和政府机关的官员也都被拘押。

整个说来，行动按照预定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只是由于英国警戒部队的疏忽，弗里德堡海军上将在被捕后去了盥洗间，在那里用他随身携带的氰化钾自杀了。

亲历了下面这次重大事件的戈尔布申继续他的讲述：

“此后不久英国人通知特鲁索夫将军，党卫军帝国长官亨利·希姆莱在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在吕讷堡市自杀了。因此决定我在去丁斯特时，顺路去吕讷堡一趟。

5月24日清晨，我和伊夫列夫中校在一名英军少校陪同下从弗伦斯堡出发。在吕讷堡郊外的拦路杆旁有一名英国军官在等我们，他向我们指明了去停放希姆莱尸体的房屋的道路。我们走进这座房子就看见希姆莱，这个帝国最嗜血如命、最残忍的人，这个党卫军的帝国长官、秘密警察的首脑、内政部长躺在地上。

我们从与英国军官的谈话中得知希姆莱自杀的经过。

5月的一天，英国巡逻队在吕讷堡街上扣押了三个违反戒严令的人，把他们送到市郊的平民营里。事后才知道，这三个违反戒严令的人遇见的不是英国人，而是两个俄国士兵：伊万·西多罗夫（萨拉托夫州人）和瓦西里·古巴廖夫（梁赞人）。这两个人被德国人俘虏了，英军把他们从战俘营解救出来，建议他们在英军占领区里执行巡逻任务。

希姆莱被送到吕讷堡的英军司令部，上校吩咐对他进行搜查。希姆莱被脱去衣服，并被命令张口。执行搜查的医生看见他嘴里有一个玻璃小瓶，想把它取出来，可是希姆莱把它咬破了。

英国军官是这么说的。

我请上校给希姆莱的尸体照相并且把他死亡的情况写出来。上校满足了我的请求，晚上他通过联络军官转交给我两张照片，还有一份他的下属写的说明以及从希姆莱衣裳里找到的三小瓶氰化钾中的一瓶。

5月26日我们继续前进。在鲁尔地区住了一晚，一天以后抵达丁斯特的战犯营。战犯营的警备长事先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来意，他当即吩咐把德国人“谈俄国人的文件”（这是他的说法）拿来。给我们拿来的是三大箱文件。用俄文和德文书写的文件包括了希特勒帝国各个部门和机构侦察活动的材料。



我和伊夫列夫在战犯营没有多呆就往布鲁塞尔去了。”

特鲁索夫将军小组的使命到这里还没有结束。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特鲁索夫发现英国人夺走了海军舰艇和民用船只，他做了许多工作，使美国人站到我们一边，向他们证明，更公平的办法是由各盟国平分船舰。

关于这一点特鲁索夫是这样报告莫斯科的：

“美国政府无论对德国的战舰，还是潜水艇或者商船都不感兴趣。它同意原则上将舰队分成四部分——苏联、英国、美国、法国。

为了尽快解决分割德国舰队的问题，美方认为必须在最近期间成立苏联、英国和美国的海事委员会。

必须由朱可夫元帅或者最高统帅部向艾森豪威尔将军提出申请，才能召开由上述各委员会参加的会议。

美国人将不和英国人持同一立场，相反，将支持我方获得三分之一德国舰队的要求。”

特鲁索夫不是海军专家，所以建议至少任命一名海军中将担任分割舰队委员会主席，并请求当天答复是否同意所提措施。他说到这里，微微一笑说：

“你看，我‘狂妄’到了什么程度：居然要求斯大林本人立即答复。”

最后我要说，由于特鲁索夫小组的积极主动，我国没有放过德国海上舰队中的许多战利品。读者中如果有人曾经乘坐“俄罗斯”号内燃机船在黑海上航行过，那就是特鲁索夫小组曾经住过的“帕特利”号。

特鲁索夫在结束我们的谈话时，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们是带着完成使命的自豪感离开弗伦斯堡的。邓尼茨政府不复存在了，逮捕纳粹高级官员有助于组织纽伦堡审判。我们在弗伦斯堡拿到了重要的德国文件，我们带回来德国总参谋部的很大一部分档案，其中的材料被用于纽伦堡审判，并揭示了希特勒对欧洲和苏联的侵略战争的准备和发动过程。我们在弗伦斯堡还拿到了海军司令部的德国地图，上面有整个波罗的海水域的布雷情况，这些



地图大大减轻了我国海军清除波罗的海水雷的工作，使许多国家的人民和船只免遭厄运。这就是斯大林在战争刚结束时亲自交给我去完成的任务。

如果说希特勒的武装力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记录了‘陆上、海上和空中’停止战斗行动，那么逮捕邓尼茨政府就是划上了最后一个句号：取缔了纳粹政府——‘第三帝国’作为一个国家不仅事实上，而且正式地在法律上也不再存在了。

在逮捕海军上将邓尼茨时，在他的公文包里发现了希特勒遗嘱的原件。后来这些遗嘱公开发表在几百种各类出版物中，从报纸直到国务活动家的回忆录。”

二 会见霍普金斯

1945年5月，受到美国总统特别信任的哈里·霍普金斯拜访问了斯大林。

斯大林认为，霍普金斯是一个杰出人物，他为加强美国同苏联之间的商务联系做了许多工作。顺便说一句，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41年7月，当时希特勒匪徒正向莫斯科突进，几乎没有人怀疑德军很快就能取胜。美国总统希望知道真实情况，他派出了霍普金斯，仿佛是为了研究美国向苏联供货的问题。可是他的主要任务是搞清楚——“俄国人能支持多久”。霍普金斯从斯大林的谈话里确信，俄国人将战斗到取得胜利，他也使罗斯福总统相信了这一点，从而无疑影响了总统制订援助苏联的完整计划的决策。

霍普金斯对我国的确很友好，他对美国总统和政府的影响，在巩固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和在战争的艰难年代里向我国提供物质援助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他为通过租借法案也尽了不少力。

斯大林对这个友好的美国人很尊敬。新总统杜鲁门派霍普金斯来同斯大林进行谈判也不是偶然的。战后盟国之间的关系变坏了，西方国家力图阻挠我国巩固在欧洲的地位。斯大林执行自己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所以在旧金山会议上想逼苏联就范的尝试失败（莫洛托夫在会议结束前就退席了）后，杜鲁门就决定派霍普金斯来，因为他是“斯大林的朋友”，同他比较谈得来。

霍普金斯已经年迈多病，当时已经辞去了国家职务。可是一听到杜鲁门的建议，他就像“一匹战马”似的一跃而起，精神抖擞地同意执行这项崇高的使命。

我的藏书里有霍普金斯同斯大林谈话的完整记录，可是这份材料篇幅太大，所以我只引用其中直接涉及斯大林的地方。

第一次谈话是在5月26日晚上8时，参加的人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巴甫洛夫（译员，我曾同他多次交谈）。代表美方的是霍普金斯、哈里曼（美国驻苏大使）、博伦（美国助理国务卿）。

斯大林热情地接待了霍普金斯。两人满意地回忆了1941年7月那些令人忧心如焚和危急万分的日子里的第一次会见，两个人都对他们共同尊敬的罗斯福赞不绝口。转入正题后，两人谈了许多当时很尖锐的政治问题。霍普金斯告诉斯大林，艾森豪威尔将军已被任命为对德管制委员会的美方代表。斯大林还不知道这件事，他当即决定，要任命一个同样重要的人物：

“朱可夫元帅将被任命为管制委员会的苏方代表。”

斯大林毫不怀疑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可是他明白必须完成法律程序，所以补充说：

“这个任命将在最近期间公布。”

应当说一下，斯大林在决定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时，依靠的是特鲁索夫将军业已进行了的工作。

这发生在5月27日第二次会见时。霍普金斯谈到了分割德国舰的问题，斯大林正像俗话说的那样，早已成竹在胸：

“据我们得知，对俄国人作战的一些德军兵团极力想向西方盟国投降。至于德国海军，它已经投降，而且全部留在你们的占领区里，没有向俄国人移交过一艘船。我曾经给总统和首相发过几封电报，要求至少将三分之一的德国军舰和商船移交给苏联，其余部分可以按照英国和美国的意愿来处置。既然认为我们有权取得一部分意大利舰队，那苏联就更有权获得德国舰。我们得到一些情报，使我们有根据认为美国 and 英国打算拒绝苏联的要求；我必须说明，如果这个情报属实，那是非常令人不快的。”

霍普金斯向斯大林保证说：

“我已经就这个问题同金海军上将谈过，我可以声明，美国丝毫没有扣留一部分德国军舰的打算，而只是想从新发明和技术革新的角度仔细考察一下这些军舰。之后我们打算把分配给我们的那部分军舰凿沉，我们用不着这些船只。我也同意您的意见，德国的舰队应当在同盟国之间进行分割。我想，这个问题在即将举行的三国政府首脑会议上会这样解决的。”

第二次会见结束前，二人就租借法案艰难地争论了许久，然后谈到了波兰的命运，因为盟国打算把米科瓦伊奇克的流亡政府塞进波兰，从

而把它变成一条同共产主义隔开的“防疫线”。谈完这一切之后，疲惫的（健康情况也不妙的）霍普金斯认为必须再回到昨天谈过的一个题目上来。

“我们非常希望斯大林元帅能够尽快发表任命朱可夫元帅为对德管制委员会的苏方代表的公告，使这个机构能够尽快着手工作。”

斯大林向客人保证说：

“我准备明天，或者后天发表朱可夫元帅的任命，总之是你们认为恰当的时间。”

第三次会见也谈了很长时间，商谈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什么时候开始对日本作战。斯大林说这个问题必须要同中国讨论，不过他承诺苏军在8月份开始战斗行动。

不论那些想给斯大林抹黑的人写了什么，可是即便从同霍普金斯的会见中也可以看出他巨大的国际威望和维护祖国利益时的坚定不移。在所有的问题上，甚至在他同意霍普金斯的建议，因此也是同意杜鲁门的建议时，归根结底都是斯大林的立场、我国的利益占了上风。

例如，苏联有义务按照和盟国签订的条约开始对日作战。所以在同霍普金斯会见时，斯大林认为这件事早就决定了，同时又附带提出了一个新的、简直可以说是非同小可的论点：

“我认为，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俄国应当参加对日本的实际占领，所以它希望同英美两国就划分占领区问题达成协议。”

第三次会见结束时，霍普金斯再次提醒斯大林，迄今为止还没有正式发表对朱可夫的任命。

我至今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他们为什么如此执著地要任命朱可夫元帅。战斗行动已经停止了，朱可夫在管制委员会里的威望只会压倒其他委员，使他们更难于捍卫自身的利益。为什么霍普金斯坚持要任命他呢？

我觉得，对朱可夫惟一不利的解释就是，他们熟悉的朱可夫是一个“行伍出身的人”，是一个直率的军事指挥官，而不是一个政治家，更不是外交家。如今是唇枪舌剑的时期了，而我们知道，一个外交家应当说的是一套，心里想的是另一套，而实际做的又是一套。朱可夫显然不擅长这套把戏。也许因此他们才打算把他拉开，使他脱离他熟悉的军务？

不管怎么说吧，霍普金斯在第三次会见时又一次请求斯大林解决朱可夫的任命问题。斯大林不习惯这种紧追不舍，不过上次他已经答应了的事情，他大概也觉得不能言而无信。

第二天报纸上出现了一条消息：

“关于占领德国管制委员会

根据盟国政府间达成的协议，不日即将成立由苏联、英国、美国 and 法国最高统帅部的代表组成的管制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占领期间将执行各盟国的最高权力。

兹任命苏联驻德占领军总司令、苏联元帅格·康·朱可夫为苏联最高统帅部驻管制委员会代表。

1945年5月31日”

请读者注意：这条消息没有说是谁做出的决定，没有任何人的署名，也没有指明任何官方机构。我不知道发布这条消息的原因何在，也许是加里宁病了，或是外出了？可以证明我的假设的是：出席莫洛托夫5月31日招待会和斯大林6月1日宴会的政府成员名单中没有加里宁。不过斯大林说了要发表，这就足够了，应当让贵客放心嘛。

他们第三次会见时还谈到各盟国首脑下一次会见的地点。霍普金斯想起罗斯福从雅尔塔会议回国途中曾经设想，下一次会见应当在柏林，这对于盟国将要取得的胜利具有象征意义。

斯大林支持这个意见：

“我记得，我们甚至为下一次在柏林会见而干过杯。”

就这样事先决定了三个同盟国首脑下一次会议的地点，这次会议以波茨坦会议的名称载入史册。

三 胜利阅兵式

必须举行胜利阅兵式的想法是斯大林首先提出来的。会议已经接近尾声了，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在报告将部队集中到远东，准备对日作战的打算。办公室里有海军上将库兹涅佐夫、红军后勤部长赫鲁廖夫，还有将要为东方的大战做实际准备的几位将军。

问题已经决定了，大家都不再说话，斯大林忽然谈起了同前面的话题不相干的事：

“我们是不是应当在莫斯科举行一次战胜法西斯德国的胜利阅兵式，邀请最优秀的英雄——士兵、士官、军官和将军们参加呢？”

在场的人对斯大林的任何建议本来都会支持的，何况这个建议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这个想法仿佛一直萦绕在心头，人人都想用一种什么办法欢快地、隆重地庆祝胜利。是啊，已经庆祝过5月9日胜利日了：游了园，干了杯，莫斯科和其他英雄城市鸣放了礼炮，而且在那些日子

里一般说来游乐和饮酒都不少——盛大的欢乐是不会立即消散的，可是始终让人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现在明白了，原来（正像一再指出过的那样，一切英明的东西都是再简单不过的）是需要一次胜利阅兵式。从那一天起，一切都转起来了，动起来了，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做了计划，邀请哪些人，住在什么地方，怎样着装，怎样安排饮食，怎样安排娱乐，是的，连娱乐也考虑到了。

至于谁来检阅，谁来指挥检阅的问题当时并没有讨论。可是人人都认为应当是最高统帅来检阅。

总之，这个问题并不曾提出过，也没有讨论过，盛大节日的准备工作在全速进行。

按照总参谋部制订的方案，每个方面军组建一个混合团，海军和空军各自分别组建一个混合团。什么叫混合团呢？它是一个临时的组合，由方面军的各部队选拔而组成。赢得胜利的最当之无愧的前线人员——军官、士官、列兵，不论属于哪个兵种——步兵、炮兵、坦克兵等等，过去在一起作战的，阅兵式上就并肩前进。被选中的首先就是苏联英雄、三个等级光荣勋章的获得者，然后是战斗中表现突出的人，按获得奖章的数目多少排列。

这些混合团先要在方面军驻地进行队列训练，然后再送到莫斯科继续训练。在操练期间阅兵式的所有参加者都发给或是缝制一套新的检阅服和一双新鞋。

晚上阅兵式的参加者就去剧院、音乐厅和马戏团。这些日子里安排他们和工厂工人、学者和作家、大中学生会见，访问各种团体和组织，向人们讲述他们是怎样走向胜利的。

还在总参谋部拟定方案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些团队按照什么顺序正步走过政府成员站立的陵墓上的检阅台呢？有一个建议似乎是顺理成章的——阅兵式应当由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打头，因为是它拿下了柏林。可是立即就出现了另一个同样合理的问题——乌克兰第1方面军也拿下了柏林。如果要谈胜利，那它是所有的方面军和伟大卫国战争的全体参加者，从1941年6月22日首先遭遇敌人的边防军开始，共同取得的。

于是为了不使任何人感到难堪，决定按照战场上的排列顺序行进，也就是最右翼的卡累利阿团，然后是列宁格勒团、波罗的海团等等。这是公平的，消除了各种偏见和曲解。每团大致是1000人，每列20人。队列前面是担任旗手的苏联英雄，他们要高举最杰出的363支部队的战旗。走在旗帜前面的是以方面军司令为首的司令部成员。元帅不和自己的团队一起训练，领导训练的是军阶稍低的将军。方面军团队的后面是



莫斯科卫戍区的部队：军事院校，还有赢得普遍赞赏的苏沃洛夫军校学员和纳希莫夫军校学员。

我们在中央机场（现在这里已经是航空港了）上就按这个顺序进行演练。飞行场准确地按照红场的尺寸和阅兵的顺序划好了白线。临时搭起了一个木制检阅台，蒙上红布，代替陵墓。我们的训练都在夜里进行：3时起床，洗漱着装之后就直奔机场。到莫斯科市民上班的时候，我们已经结束训练回来了。

现在我尽可能地回想纯属个人的感受，希望读者不致见怪。

当时我是总参谋部高级侦察学校的学员。这是一所很正规的学校，学制四年（不妨比较一下——我日后就读过的伏龙芝学院学制是三年）。在我们这所专门学校学习的全是经历过战争的血与火考验的侦察军官。都是一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我现在一想起他们就充满了敬爱和钦佩之情。他们什么样的任务不曾执行过啊，而且不仅仅在战时，也在战后——大家知道，侦察工作是没有和平时期的。

我有幸担任了我们侦察纵队的旗手。我右边的护旗手是著名的游击旅司令、苏联英雄格里申，左边的护旗手也是苏联英雄、沃龙丘克上尉。我当时的军衔是大尉。

一想到我曾经在由这些非同一般的人组成的纵队担任过旗手，我就掩饰不住自己的自豪感。

离阅兵式只有几天了。6月12日，加里宁在克里姆林宫授予朱可夫第三枚金星奖章——“……因为在指挥柏林地域的作战中，模范地完成了最高统帅部的战斗任务”。授勋之后，最高统帅把朱可夫召到别墅去。他当然祝贺了朱可夫三次获得苏联英雄的称号，他们为这次获奖干了杯。就在这次别墅的宴会上，斯大林问道：

“您骑马的技术是否已经生疏？”

“没有，没有生疏。”

“是这么一回事，您将检阅这次胜利阅兵式。阅兵总指挥由罗科索夫斯基担任。”

朱可夫回答说：

“感谢给我这样的荣誉，可是由您来检阅不是更好吗？您是最高统帅，就权利和义务来说都应由您来检阅。”

斯大林说：

“我检阅已经太老了。还是您来吧，您比我年轻。”

他在告别时指出（我觉得是有所指的）：

“我建议您骑着白马检阅，布琼尼会带您去看马的。”

是品格高尚吗？是谦虚客气吗？还是对朱可夫敬重有加呢？如果没

有别的内情，这一切就都是对的了。斯大林打算阅兵，而且也和所有的伟大统帅一样，要骑白马。这些都是事后从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那儿得知的。瓦西里在他酒肉朋友中间道出了他父亲的秘密。

事情（按瓦西里的说法）是这样的。斯大林知道，他上了岁数，而且从遥远的国内战争时期起就不曾骑过马，即使在当年，他也很少骑马，而多半是在车厢里指挥。所以他决定练习练习，免得在红场上在部队面前出丑。按照他的命令，夜间把他打算骑着阅兵的白马带到了练马场（就在克里姆林宫旁边，当时还不是展览馆，而是名副其实的练马场）。斯大林熟知历史，胜利者骑的就应当是白马。

这天深夜，当莫斯科和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们都沉沉入梦的时候，斯大林在他最信任的人、他的私人警卫长弗拉西克的陪伴下到练马场去了。这天晚上，死乞白赖地缠着父亲的瓦西里正在斯大林的住处（要不是他，我们就不会知道领袖生活中的这个故事了，弗拉西克是会守口如瓶的）。

练马场上灯火通明。离入口不远处有饲养员牵着的一匹白马。斯大林走到马的跟前，试了试马鞍，不无困难地把一只脚伸进了马蹬。弗拉西克赶上去，想帮他骑上马，可是斯大林阻止了他：“不用，我自己来。”然后他右脚用力一蹬，沉重地落在马鞍上。马匹因为这笨拙的骑法惊得竖起耳朵，四蹄不停地倒腾。斯大林努力维持着坐在马鞍上，为了不摔下来，他两腿夹得更紧了。白马按它自己的理解，一发力侧着身子跑开了，马鞍因此而歪向一侧，朝下滑落。饲养员、弗拉西克、瓦西里赶过去帮忙，不让斯大林摔到地上。可是他仍然掉下马鞍，落在他们手上。

斯大林站起身来，气恼地晃晃肩膀，摆脱了搀扶着他的人，气呼呼地嘟哝着：“你们走开。”他是很固执的人！他心头升起一股无名火，决定要让这头暴躁的牲口领教一下自己的决心。他再一次把脚伸进马蹬，然后飞身上马。他对饲养员说：“给我。”然后从饲养员手里接过缰绳。斯大林恶狠狠地拉紧缰绳，两腿夹紧马肚。训练有素的马匹不明白骑者要做什么：拉紧缰绳是让它站在原地不动，而夹紧马肚则是要它朝前跑。白马“跳起舞来”，倒腾着四个蹄子，再一次侧着跑了起来。斯大林又一次像骑兵所说的两腿夹了一下马肚，白马就换成了颠簸的小快步。斯大林骑了半圈，想直起腰来，让姿势更威武些，可是他大约是用鞋跟刺痛了马匹，白马突然后腿直立起来，斯大林当即被甩出了马鞍。

身边的人们赶紧跑去帮他。他们把他搀扶起来，为他掸掉衣裳上的锯末。斯大林捂着肩膀，他摔得不轻。

“不行，我干不了。”斯大林说着一摆手就回家去了。

准备工作全部完成之后，召开了一次会议，各方面军司令都应邀参加了。报告完检阅的仪式后，只剩下一个问题没有解决：胜利阅兵式由谁来检阅，谁来指挥？

元帅们一个接一个发了言，一致提议：

“应当由斯大林同志检阅胜利阅兵式。”

斯大林一如既往地，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听着大家的发言，微微皱起眉头。他走到桌边说：

“检阅胜利阅兵式的人要骑着马到红场上去。我太老了，不能骑马了。”

大家都强烈地表示反对：

“为什么一定要骑马？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是最高统帅，可是他乘着车阅兵。”

斯大林一笑，说：

“罗斯福是另一回事，他双脚瘫痪，可是我，感谢上帝，两条腿是健康的。我国有这样的传统：应该骑着马上红场。”他再次强调说：“这是传统！要骑白马！”他停顿了一下，看了看在场的人，又说道：“我们有两个当过骑兵的元帅：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就让一个来指挥胜利阅兵式，另一个来检阅好了。”

1945年6月22日，发布了最高统帅的命令：

“为庆祝伟大卫国战争中对德国的胜利，定于1945年6月24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作战部队、海军部队、莫斯科卫戍区部队阅兵式——胜利阅兵式。

参加阅兵式的队伍，是各方面军混合团、国防人民委员部混合团、海军混合团、各军事院校和莫斯科卫戍部队。

胜利阅兵式由我的副手苏联元帅朱可夫检阅。

胜利阅兵式由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指挥……”¹

阅兵那天天气不好，下着小雨，乌云密布。不过大家的情绪还是很热烈的，并没有感觉到阴沉的天气。红场上空飘扬着数不清的红旗，接受检阅的人仿佛穿上了黄金的铠甲，勋章和奖章闪闪发光。朱可夫骑着白马，在克里姆林宫的自鸣钟敲响10时的钟声时，从救世主塔楼下出来。他一如既往地准时。在队列中央迎接元帅的是阅兵指挥罗科索夫斯

1 《斯大林文集》第462页 ——译者注

基，他报告说：

“苏联元帅同志！参加胜利阅兵式的部队已经列队完毕！”他迅速取出队列报告，递交给检阅人。

啊，这两名职业骑兵多么英姿飒爽——背脊笔挺，坐在马鞍上一动不动，仿佛是铁铸的一般，昂首挺胸，勋章闪闪发光……

朱可夫巡视过部队后，轻快地跑上检阅台（连呼吸也不显急促），同斯大林握手为礼，用洪亮而清晰的嗓音开始讲话。我不记得他的讲话了，甚至在报上读过他的讲话之后也没有记住它。我是期待着在这个隆重的历史时刻朱可夫会说一些非同一般的言辞。然而，看来在为元帅写这篇讲稿时，执笔人斟酌了国际上的反应，而且还得想到斯大林本人；也许这篇讲话甚至在政治局的会上经过逐字逐句的斟酌推敲。总的说来，这篇讲话关于战争、胜利，该说的都说到了，可是感觉不到哪怕是在斯大林的即兴讲话中谈到俄罗斯人民的那种动人心弦的热忱。

不过这不能怪罪朱可夫，因为从行文上看得出来，这不是他的用词，不是他的风格，是那些心有余悸的官员们把元帅的讲话搞成干巴巴的官样文章了。

据说，在朱可夫讲话时，不时瞥一眼元帅的斯大林脸上的肌肉老在抽动。我不知道，没有看见，主席台离我们太远，而当我们通过陵墓时，哪里还顾得上这些事情。我用余光看见了斯大林和政府其他成员，可是看不清他们的面孔——他们仿佛只是侧面的身影。我们要注意看齐，保持距离，用一定的姿势握住旗帜，还要迈好正步的步伐，在条石路上敲出火星。

节庆之后，我不止一次看过胜利阅兵式的纪录片，当然是首先寻找自己。可是当银幕上出现斯大林的特写镜头时，我没有看见他脸上的肌肉抽动。

在训练时，一直有长长的几排人拿着棍子和我们走在一起。我们当时很纳闷——他们在干什么？拿着长长的棍子，然后把棍子扔在地上就走了。只是到了阅兵式上，我们才恍然大悟。阅兵式上，各方面军的团队走过之后，在他们和莫斯科卫戍区的队列之间是这些士兵，他们拿着的不再是棍子，而是希特勒的军旗。他们拿着这些作为各方面军战利品的军旗，让它们垂向地面，在陵墓附近轻蔑地把它扔在地上。这样做的时候，一直敲着急速的鼓点，就像古时候执行枪决或绞刑时那样。士兵们把被歼灭的希特勒师团的军旗，也包括希特勒本人的元首旗，像一片片破布一样扔在地上，然后转身走向自己的队列。

然后上千人的军乐队又奏响军乐，我们跟在方面军的纵队后面庄严行进。

波兰军人是惟一有幸参加了有历史意义的胜利阅兵式的盟军。

检阅战斗技术装备时，进入红场的是载着高射炮分队的汽车，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威武雄壮的火炮。每列12门、队列整齐的反坦克炮分队走过去了，然后是大口径火炮——德国“虎式”、“豹式”坦克和“费迪南德”大炮的克星——喀秋莎近卫火箭炮、重炮。

胜利者技术装备检阅的高潮是展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精良的坦克——T-34和ИС。装备检阅的最后是自行火炮装置。

因为下雨，劳动群众的游行取消了……

新时代来临后，关于斯大林会有人撰文提出许多公正的指责，也会给他胡乱抹黑。可是当时，在举行胜利阅兵式的时候，所有的人对最高统帅都满怀最崇高的尊敬之情。

斯大林看着盛大的胜利阅兵式时，在想什么？他内心当然得意洋洋——是他培育了这支胜利者的军队。可是让他操心的事情还有许多。

阅兵之后，斯大林立即把布琼尼请到自己的办公室。在接待室里，波斯克列贝舍夫拿着公文夹朝他们走来，可是斯大林请他们在他们结束谈话之前不要打扰他们。

“谢苗·米哈伊洛维奇，您知道为什么请您来吗？我想您不会知道。我今天本来不打算破坏您的节日的好心情，可是情况迫使我不能拖延解决紧要问题。我要谈的是撤销作为苏联武装力量一个兵种的骑兵。”

斯大林专注地看着布琼尼——对他的话有什么反应？

布琼尼表面上很平静，可是心里对这些话感到极大的不安。

斯大林接着说：“这是因为现在国民经济需要畜力。战后国家遭到破坏，农业处境十分艰难，要把这些事情搞好，只能让部队中年龄偏大的军人复员，重新装备和改编骑兵部队才行。这可以在最短期内向国民经济移交大约25万匹役畜，而解散一些机械化部队就可以向国民经济提供几万台汽车和拖拉机。”

布琼尼明白，这一次是要和骑兵永远告别了。既然斯大林做出了这个决策，那就是要这么办了。

而斯大林已经说了：

“红军骑兵司令部不久就会起草一个在各个方面军中作战的全部骑兵军，还有后备骑兵旅、后备骑兵团以及其他骑兵分队变更驻地并被调往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详细计划。就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实施改编，而将役畜移交地方当局。这样我们就可以对这两个共和国中在战争和希特勒占领时期苦难最深的各州和区给予一定的帮助。”

布琼尼几乎没有听见斯大林在说什么。他已经明白了要害所在——骑兵完蛋了！

撤销作为一个费用昂贵而又过时的兵种的骑兵的尝试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可是那时布琼尼得到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等人的支持，他们拿出了对骑兵有利的有力论据。而现在面对斯大林，他拿不出这样的论据来，因此明白反对是毫无意义的。

斯大林仿佛看出了他的心思，也讲到了这一点：

“我们曾经长期为支持骑兵而斗争过。我们做得对。图哈切夫斯基1934年提议撤销骑兵，建立大坦克兵团和机械化兵团，从理论上说是对的，可是实际上实现不了。我们的工业做不到这一点，而且不仅在当时，甚至在以后的年代里建立了一定的坦克工业基础后也做不到。那时需要的是汽车、拖拉机、车床，还有其他许多东西，这样苏联人民才会有饭吃，有衣服和鞋子穿。”斯大林稍作停顿，又接着说道：“我们从来也不曾忘记过国防。可是如果我们听从了图哈切夫斯基一再坚持的建议，撤销了骑兵，那我们会是什么状态呢？我们就只有亲爱的步兵了……”

“可是我们怎么能没有骑兵呢？斯大林同志，您自己最初支持过它的建立，知道它的历史和战斗历程。”

斯大林回答说：“别难过，谢苗·米哈伊洛维奇，我们不会让您无所事事的。我们需要发展养马业，这是很有价值的事业，您一定会喜欢它的。必须从德国、南斯拉夫、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把骑兵军抽回来，着手改编。请您同总参谋部商量一下这些问题，就开始干吧。可以把一两个顿河哥萨克师保留两三年，其余的就算已经定了吧。”

布琼尼元帅明白，接见结束了，于是起身告辞。他向斯大林保证立即执行命令，并就实施情况提出报告。但是，布琼尼当时的心情我们却不难猜测。

之后斯大林召来波斯克列贝舍夫，还有他那个厚厚的文件夹——等着处理的还有同样重要的公事呢。

* * *

1945年6月24日，为招待胜利阅兵式参加者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盛大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除了军人之外，还有党政要员、学者、艺术家、著名劳动者——共计2500人。

举办宴会的格奥尔吉大厅从来不曾如此辉煌灿烂过。巨大的枝型吊灯把大厅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客人制服上的勋章和奖章闪烁得更加明亮，勋章和奖章数不胜数，发出的光辉如此明亮，以至难于分辨究竟是枝型大吊灯反映在灿烂的金光里，还是勋章在水晶里闪烁。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受斯大林委托主持盛大的宴会：



“我们今天欢迎胜利阅兵式的参加者。通过他们，也向我们光荣的陆军和海军、我们苏联人民和一切在前线和后方为锤炼我们的伟大胜利做出了贡献的人致敬，而首先是向身为苏联伟大的统帅和天才的领袖、一贯领导着我们的整个事业、锤炼了我们的胜利的人致敬。我提议，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

全体起立，向斯大林欢呼。

我不能描述整个宴会和所有的祝酒词，那会占据太多篇幅。在这次盛会上为每个方面军司令干了杯，为学者，而且提到了每位学者的姓名——也就是说，几乎提到了所有在前线和后方创造了胜利的人，祝了酒。

所有愿意同最高统帅接触的人都走到斯大林身边，同他碰杯，干杯，说一些欢乐的话和善良的祝愿。他心情很好，很客气也很慈祥。

宴会上斯大林也举杯祝酒：

“你们别以为我要讲一些不平凡的话。我的祝词是最普通的，最平常的。我想为那些头衔小、名位不足称道的人的健康干杯；为那些被认为是伟大国家机器的‘螺丝钉’的人干杯。因为没有他们，我们大家，元帅们和方面军、集团军的司令员们，说得粗俗一点，就一文不值。只要有一个‘螺丝钉’坏了，就都完了。我举杯祝贺那些普通的、平凡的、质朴的人们，祝贺那些使我们伟大国家机器在科学、经济和军事各个部门都能积极活动起来的‘螺丝钉’。他们的人数非常多，他们的名字数不胜数，因为这是几千万人。这是些质朴的人。关于他们谁也没有写过什么，他们没有名位，头衔很小，但是，他们就像基础支持着顶端那样支持着我们。我为这些人，我们的可敬的同志们的健康干杯！”^①

在场的人为他的祝酒辞长时间热烈鼓掌。

此前一个月，也就是1945年5月25日，曾经为红军部队的司令们举行过一次招待会。当时斯大林发表过一个祝酒辞，它将被同胞们永远铭记在心。不知为什么人们却认为那一次祝酒辞是在6月24日的胜利阅兵式参加者招待会上讲的了。就其价值、重要性，而主要是就其公正性而言，那次的祝酒辞确实非常适宜作为欢庆胜利的总结，因此我把它引用在这里（何况我此前不曾提到过5月25日的第一次招待会呢）。下

^① 《斯大林文集》第463页。——译者注



面是斯大林的讲话：

“同志们，请允许我最后再一次举杯。

我想举杯祝我们苏联人民，首先是俄罗斯人民健康。（经久不息的热烈鼓掌，‘乌拉’的欢呼声）

我喝这杯酒，首先祝俄罗斯人民健康，因为他们是加入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

我举杯祝俄罗斯人民健康，因为他们在这次战争中被公认为苏联各族人民的领导力量。

我举杯祝俄罗斯人民健康，不仅因为他们是起领导作用的人民，而且因为他们有清晰的头脑和坚忍不拔的性格和耐性。

我国政府犯过不少错误，我们在1941~1942年曾经历过危急万分的关头，那时我军实行退却，离开了我们亲爱的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列宁格勒州、波罗的海沿岸、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的乡村和城市，那时离开这些地方，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如果是旁的人民，他们也许会对政府说：你们辜负了我们的期望，请走开吧，我们要另立一个能同德国媾和并保障我们的安宁的政府。但是俄罗斯人民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政府的政策正确，而甘愿承受牺牲，以保证把德国击溃。俄罗斯人民对苏联政府的这种信任，成了我们打败人类公敌法西斯主义而取得历史性的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感谢俄罗斯人民的这种信任！

祝俄罗斯人民健康！”^①

* * *

参加盛会的人们注意到，最高统帅没有勋章！他只有战前获得的一枚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金星奖章。

而现在他们却佩戴着许多勋章在这里干杯，有些人甚至有两三枚苏联英雄的金星奖章，而为了胜利比任何一个在座的人做出的贡献都要大的斯大林却没有军功章！招待会上许多人提到了这种不公，而在招待会后他们向中央委员会和最高苏维埃提出，希望表彰斯大林的特殊功绩。

政治局审议了这些要求，斯大林表示反对，说他不够英雄的称号，不符合最高奖励的条例——不过这一次政治局没有尊重他的意见。

盛大招待会后又过了一天，1945年6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

^① 《斯大林文集》第459~460页。——译者注

席团颁布了两项命令：一项命令是授予约·维·斯大林大元帅的称号，另一项是颁发给他苏联英雄的金星奖章。这是他得到的第一枚，也是惟一的一枚金星奖章，我提到它是要表明他的谦虚，也是对他的继任者的谴责，他们既无权利又无功劳，却把一枚枚金星奖章像装饰品那样挂满胸前。

这是斯大林性格中又一个乖张之处。他仿佛是一个擅权的人，“树立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可是他并不曾得到金星奖章，也不曾在隆重的场合颁发给他，这枚奖章就一直躺在最高苏维埃授勋部的红色盒子里。

画家和摄影师把这枚金星奖章添加在他的肖像上。可是只有在举行葬礼的那天，人们才记起了这枚最高奖章，把它和表明已故者功绩和一生总结的其他各种奖章一起别在小衬垫上。

四 波茨坦会议

胜利阅兵式后，斯大林立即着手准备即将召开的战胜国首脑会议。好像是什么都不成问题——整个首都柏林，而且不仅是首都，整个国家都任凭战胜国支配。

可是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为了少费唇舌，我只引用斯大林抵达柏林时对朱可夫说的话（顺便说一下，我引用的是元帅的笔记，因为出版他的书时，这些话被删除了）：

“我感到，我军对柏林的修理很‘讲究’。我一路过来，只看见十来幢完整的房屋。

应当说，除了我们的部队之外，盟国空军的修理也一样‘讲究’。它在最近这段时间里已经见不到德国歼击机的攻击了，可是仍然用了几百架轰炸机分外认真地修理了苏军占领区的城市。我只举德累斯顿做个例子，在我们的部队开进这座城市之前，英美空军用1400多架轰炸机对它狂轰滥炸。一共分成三个攻击波：第一波是在夜间，投下的主要是燃烧弹；第二波是三小时后，投下大量各式各样的炸弹，为的是阻止扑灭火灾和其他救援行动；第三波是在八小时以后，已经是白天了，视野开阔，彻底摧毁了这座城市和居民，而且除了重型轰炸机之外，歼击机还用机枪扫射居民。结果如何？有134000多人被打死!!! 35470座房屋被摧毁！”

现在应当打上三个问号——为什么呢??? 回答只有一个——别让



城市完整无损地归了俄国人。对柏林及其郊区的处置也大致相同。总之，经济工作者在这里有极其艰巨的工作要做。这项工作的种种细节是朱可夫负责后勤的副手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安季片科中将告诉我的。

我还要补充一个细节：我自己曾经很仔细地参观了举行会议的塞西林霍夫城堡的所有房屋——当然是在较晚的年代，这时旅游者们已经把斯大林的座椅摸过不知多少遍了，都想拿走哪怕是一小片木屑做个纪念呢。

安季片科将军和房屋管理处处长科索格里亚德上校好不容易才找到距柏林不远的一处房屋：塞西林霍夫太子的城堡——一座四方形的房屋，有176间房间和一个内部的小院子。这是选定的会址。作为住处选了巴贝尔斯贝格的三幢别墅，离塞西林霍夫五公里。所有的房屋都需要修理，配备家具，四周的公园和花园也需要整理。来检查的盟国代表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建立同他们本国的可靠联络，按他们的意愿粉刷住所（美国人要天蓝色，英国人要玫瑰色）。法国没有派人来。对于斯大林的住处自然要特别关照：它被刷上了白色，各个房间里铺了那么多地毯，挂了那么多油画，摆了各种家具，以致斯大林的警卫长弗拉西克将军看到这一切时，不禁惊呆了：

“你们怎么啦，发疯了吗？主人可不喜欢这样。统统拿走！不要大块地毯，用长条粗毯子就行了。不要这张双人床，放一个小沙发床就可以了。”

会议桌也费了很多心思。有人提出一个想法——应当用圆桌，不要有棱角，使大家都处于同等地位，而且一般说来，棱角意味着争吵，而圆形表示和谐。

大圆桌在德国没有找到。于是向莫斯科柳克斯工厂紧急订货。那边做好以后，空运到柏林。

7月10日，一切准备就绪。

斯大林出发前给朱可夫打了电话说：

“您不要搞什么仪仗队、军乐队的欢迎仪式。您自己，再带上您认为必要的人到车站来就行了。车站的警卫工作让弗拉西克将军处理。您什么也不用管。”

7月15日，杜鲁门从安特卫普乘飞机抵达。他是乘“奥古斯塔”号舰在巡洋舰“费拉德菲亚”号的护送下航行了一周到达安特卫普的。丘吉尔也在同一天抵达。

由于斯大林还没有到，他们两人就利用这一天参观了帝国办公厅和国会大厦。在柏林会议（后来被称为波茨坦会议）之前，美国以疯狂



的速度进行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杜鲁门认为，如果实现了第一次爆炸，他就拥有了影响苏联的强大手段。总统说：“只要它一爆炸……我就得到了用来打击这个国家的大棒。”

7月16日，朱可夫在车厢旁迎接了斯大林。斯大林微微抬起手向前来迎接他的维辛斯基、安东诺夫、库兹涅佐夫、捷列金、索科洛夫斯基、马利宁致意。他一般很少和人握手。他不紧不慢地走到汽车旁，上了车，然后又打开车门，邀请朱可夫上车。

斯大林看完别墅，问道：

“原先这是谁的别墅？”

“是鲁登道夫将军的。”

弗拉西克是对的：斯大林不喜欢家具，即使经过警卫人员的“清洗”，他还吩咐拿走一些东西。

朱可夫也像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一样，不是政府代表团的团员。他是军事顾问。

会议从1945年7月17日一直开到8月2日。

7月16日，会议开幕的前夕，陆军部长向杜鲁门报告了一封密电：“今晨进行了试验。调查尚未完成。但结果似令人满意，已超出预期……格罗夫斯医生十分满意，他明天回来。进展情况将及时报告。”

回电称：“向大夫及其病人表示祝贺。”

专门信使乘专机将格罗夫斯的报告送给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他立即交给了杜鲁门。

这份报告对杜鲁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丘吉尔在回忆录里有记载：“杜鲁门十分积极而坚定地反对俄国人，于是我明白了：他受到一件事情的鼓舞。等他读完（格罗夫斯的）报告，来到会场时，他好像变了一个人，对俄国人说话的态度强硬，而且总的说来，在这次会议上占了上风。”

这次会后，杜鲁门向丘吉尔详细介绍了收到的消息。

7月25日，由于丘吉尔要回去参加选举而休会。从7月28日起，与会的就是英国新首相艾德礼了，因为丘吉尔没能再度当选。不可能在这里叙述会议上讨论过的所有问题，而且这也不是我们的话题。我只讲一讲朱可夫闹的一个笑话。

丘吉尔在离去前举行了一次招待会。他在祝酒时，也提议为朱可夫干杯。元帅不愿意欠下这份人情，也举杯祝酒，可是习惯成自然，他不假思索地说：“为丘吉尔同志干杯！”他立刻明白自己说走了嘴，掩饰道：“他是战场上的同志。”斯大林自然察觉了朱可夫的口误，后来一再和他开玩笑说：“您这么快就给自己找了个同志，而且是多好的同志



呀！”

8月2日零时30分，一直主持会议的杜鲁门说：

“我宣布会议闭幕。下次再见，我希望很快就会再次会晤。”

“上帝保佑！”斯大林说。

首脑们决定：德国的最高权力由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的武装力量总司令在各自的占领区内执行；对于涉及整个德国的问题，他们应当作为管制委员会的委员共同行动。宣布的占领目的是：

完全解除德国武装并实现非军国主义化——取消德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党卫军、冲锋队、保安处、盖世太保及其一切组织、司令部（包括总参谋部）、机构和学校；

清除全部军事工业或加以管制，销毁全部武器及装备或移交盟国；

在民主的基础上改造德国的政治生活，包括消灭法西斯党及其分支机构、受其控制的组织和团体，使之不能以任何方式复活；

将战犯以及一切参与策划和实施纳粹暴行的人交付法庭审判；

将所有积极的纳粹分子开除公职及半公职；

根据民主原则重组教育、司法及地方自治体系；

允许并鼓励各民主政党的活动；

就设置德国中央行政部門（财政部、运输部、交通部、外贸和工业部）达成协议；

关于战争赔偿的专门协议规定遭受过德国侵略的民族有权获得赔偿，并规定了获取赔偿的来源。各代表团决定，四个盟国将从各自的占领区以及德国的海外投资中获得赔偿；

决定了波兰的西部边界。将不归属苏联的东普鲁士的一部分以及原“但泽自由市”（格但斯克）的土地划归波兰。由于斯大林的坚持，美英两国不得不无条件承认波兰的民族团结临时政府。柏林会议决定将哥尼斯堡市（1946年更名为加里宁格勒）及其附近地区划归苏联；

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讨论了德国舰队的处置问题，决定将德国的全部水面舰艇（应在1946年2月15日前移交）和商船由苏联和英国两国平分。根据英国的提议，决定凿沉德国的大部分潜艇，剩余部分也平均分割。

最有趣的事情发生在7月25日由于丘吉尔的离去而宣布休会时。英国首相再三请杜鲁门在他离开之前把原子弹的消息告诉斯大林。丘吉尔很想知道，这个惊人的消息会对斯大林产生什么影响。他们讨论了各种方案——用书面方式还是口头通知，在会上谈还是单独谈，在会议中间还是在会议结束之后谈。在宣布休会两天、大家纷纷走出会场时，只见杜鲁门按照他最后选定的方案，走到斯大林身边，仿佛是漫不经心地

通过译员巴甫洛夫说：

“我们美国制造了一种威力极大的新型炸弹。”（他没有说是原子弹，虽然指的就是原子弹。）

斯大林对这个消息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据事后国外的报导，在传递这条信息时，丘吉尔紧盯着斯大林看，观察他的反应。可是斯大林不动声色，仿佛从杜鲁门的话里没有听出什么大不了的事来。

丘吉尔在汽车旁问总统：

“他有什么反应？”

“他一个问题都没有提。”

“据我看，他不明白您说的是什么。”

可是斯大林非常明白。有朱可夫的话为证：

“约·维·斯大林当着我的面告诉维·米·莫洛托夫他同哈·杜鲁门的谈话。莫洛托夫当即说：

‘他们是在给自己抬高身价。’

斯大林笑起来说：

‘让他们抬吧。今天就应当和库尔恰托夫谈谈，要加紧我们的工作。’

我明白了，说的是造原子弹的事情。”

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对这件事是这样记载的：

“因此我可以肯定，斯大林在那一天，对于英美两国长期以来所从事的这项庞大的研究过程并不了解，也不知道美国在生产原子弹这一豪迈的冒险事业上曾花费了4亿多英镑。”

首相先生是大错而特错了。他如果知道斯大林了解情况的程度，大约会大吃一惊。斯大林不仅明白谈的是什么，而且还有苏联情报人员搞到的美国人进行试验的完整情报。

他早就在关注制造原子弹的问题。他来柏林开首脑会议之前，读了国家情报总局关于这方面工作进展的例行报告。斯大林像一贯处理这类情报时那样，吩咐让库尔恰托夫看看这些材料。下面的材料表明斯大林早就十分了解情况，甚至知道杜鲁门企图用来吓唬他的这次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时间。



“绝密，

‘He’ (High explosive) 型炸弹。

预料今年7月将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炸弹的构造。这颗炸弹使用的裂变材料是94号元素，而没有使用铀-235。用5公斤钚制成的圆球中心安置着所谓核点火装置——阿尔法粒子的钹钋发生器（……）装载这种爆炸物的炸弹外壳的内径是140厘米。炸弹总重量，包括各部件及外壳，约为3吨。

预计炸弹的爆炸力等于5000吨梯恩梯（效率为5~6%）（……）

裂变物质的储备量：

(1) 铀-235。今年4月时有25公斤铀-235。目前其开采量是每月7.5公斤。

(2) 钚（94号元素）。2号营地有6.5公斤钚。提取工作业已完成，开采计划能够超额完成。

爆炸预计在今年7月10日进行”。

这份文件上有批注：“库尔恰托夫同志已阅。1945年7月2日。”

随着原子武器的出现，军事方面发生了一场真正的革命：军事学说改变了，几天前才签署的和平合作宣言变成了一张废纸。这一切全都成了空话。

7月24日以后，仍能听到关于就欧洲战后生活安排的热情洋溢的讲话，而总统从波茨坦向美国却已经发出了这样的训令：

“8月3日以后，只要天气条件允许进行目视（应当读作：瞄准。——本书作者注）轰炸，第20空军集团军第509混成团就应当向下列目标之一投下第一枚专用炸弹：广岛、小仓、新潟、长崎。”

1945年8月6日，天气允许瞄准投弹：8时15分2秒广岛被夷为平地。

8月9日11时8分，“天气允许”对长崎再干一次。

超级武器的无限能力令它的拥有者陶醉了。在波茨坦通过了盟国的义务、口头的誓言以及保证友好和共同努力维持世界和平的祝酒辞之后过了三个月，华盛顿拟定了一项计划，根据这项计划，美国和英国将对苏联的20座城市实施原子弹袭击。这份名单包括：莫斯科、列宁格勒、高尔基、古比雪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萨拉

托夫、喀山、巴库、塔什干、车里雅宾斯克、下塔吉尔、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彼尔姆、第比利斯、新库兹涅茨克、格罗兹尼、伊尔库茨克、雅罗斯拉夫尔……

就这样开始了全人类的一个悲剧性的（就其可能的后果而言）原子能时代！

我认为必须让读者了解一个同我国出现原子武器和斯大林在这件事上的作用相关联的、非常重要的信息。这在下一节里面谈。

五 斯大林怎样使美国的原子“裂变”

关于我国和美国在那些岁月里事态的材料，我是从不同来源收集到的，而有一些文件则是经国家情报总局允许才使用的。

有好几个国家早就同时在进行原子和原子能的研究了。俄罗斯1919年由德·谢·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组织了有计划地研究原子物理。从1921年起，研究中心是阿布拉姆·费多罗维奇·约费院士领导的物理-技术研究所，他把许多年长的和年轻的学者团聚在自己身边。1933年召开了全苏第一次原子核物理学会议，领导组织委员会的是伊·瓦·库尔恰托夫，1940年以前共计召开过五次这样的会议，研究工作的总方向是和平利用原子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德国和美国都产生了制造原子弹的想法，这些国家就制造原子弹开始了实际的工作。美国比其他国家开展得更深入、更为迅速，也更有成效，而且具有真正的美国规模。后来英国同美国开始合作。美国制造原子弹的工作是保密的，名称是“曼哈顿计划”。“曼哈顿计划”的主管是工程部队上校莱斯里·格罗夫斯。他毕业于西点军校，修建过军用城镇和基地，五角大楼也是他修的，而且工期较预计缩短了一半！

我去过五角大楼，对那些认为五角大楼只不过是国防部的一幢大楼的人，我想告诉他们，这是一幢别具一格的五角形工程建筑。它的层数并不多，好像总共只有五层，而且它的整个结构也是由五幢封闭的五角形建筑组成的（一幢里面套着一幢），彼此之间用走廊和通道连接。它地下有什么，我不知道，可是地面上的这个庞然大物简直就是一座迷宫。秉性幽默的美国人给我讲了这样一个笑话。有一次一名中士走进五角大楼，要呈送一份报告。他在房间和走廊的迷宫中摸不着头脑，他被不停地从一个科推到另一个科，等到一周以后他从另一面出来时，他的军阶已经是上校了。还有一个笑话。一名妇女在五角大楼的走廊里要分娩了，别人对她说：“夫人，你既然有孕在身，何苦到这儿来呢？”她



回答说：“我走进五角大楼时还没有怀孕呢。”

格罗夫斯只用了规定时间的一半就建成了这个家伙！你们一定记得我国那些胡子工程，我国的工程师不把预定的工期拖长3~5倍，大约是建不成一个工程的。我这样说是想强调格罗夫斯精力充沛，而且坚毅顽强。关于他，美国人自己是这样说的：智力不太高，是一个标准军人，坚毅而古板，习惯于照章办事。

1942年秋天，在任命时找他谈话的人对他说：

“领导学者比指挥士兵要困难一些。不过为了你的威望，我们可以授予你将军衔。”

格罗夫斯并没有故作谦虚，径直宣称：

“最好是先授给我军衔，然后才介绍我和参与计划的人们见面。别让他们以为，我是靠他们拉扯成将军的。我是他们的头儿，而不是他们反而为我的恩人。不管多么奇怪，这些长头发的知识分子还很看重头衔呢。”

格罗夫斯的这些“长头发的”下属中，有现代物理学的顶级人物，如罗伯特·奥本海默、尼尔斯·玻尔、恩里科·费米等人。格罗夫斯在短期内在田纳西河谷中建起了奥克里治市，有80 000名工人和职员。另一座也是保密的城市——汉福特位于哥伦比亚河畔的荒原上，有60 000居民。

各个课题的理论研究分别在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伯克利大学进行。

1943年春天，分散在各地的研究中心都被集中到遥远而便于保密的洛斯阿拉莫斯来了。读者不妨想一想，建设这么多罕见的综合体，容纳150 000人工作，其中包括几百名最高级别的专家，这要花多少钱。可是政府不惜花钱——一旦成功，原子弹就预示着控制世界！

我如此详细地谈格罗夫斯，谈他的优点和他创建的强大基地，都不是偶然的。当格罗夫斯的一切正在全速推进时，在我国，德军正逼近莫斯科，却有一个人几乎是从零开始，在组织能力上全面超过了格罗夫斯，而且还是一位大学者——这就是库尔恰托夫。不过关于他，我们后面再谈。

美国人制定了一个复杂而强大的保密制度，以防止情报泄漏和外国间谍混入。领导这一套反间谍体制的是鲍里斯·波什上校，他是美国东正教会都主教的儿子。

格罗夫斯后来写道：“我们在保密方面的战略很快就确定了（他接着列举了这套制度的要点），其中之一就是——我们的发现以及我们的计划和工厂的细节要对俄国人保密。”

尽管他们兢兢业业，防范严密，但无论格罗夫斯，还是细心狡诈的波什上校都没能保住机密！

我国谍报人员终于搞到了最最机密的情报！

第一份情报是1941年秋天从伦敦发到国家情报总局的：英国人正在制造具有巨大破坏力的原子弹。这个信息没有令我们不安，反而让我们高兴：英国人是盟友，如果他们能够搞出点名堂来，即使不开辟第二战场，也可以用原子弹狠揍德国！

1941年12月，红军情报局从伦敦又得到一份关于铀的、有40页的报告。

莫斯科城下激战正酣。1942年1月又来了一份秘密报告，有150页，谈英国物理学家的工作进展情况。情报局决定给苏联科学院特别部的负责人M. 叶夫多基莫夫写一封信，因为他能够就怎样使用关于铀的情报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这封信在1942年5月7日发出。信中说：

“送上关于国外将铀原子核裂变产生的能量用于军事目的的研究情况的报告，恳请告知我们，这些报告的可信度如何，目前这个问题对于实际研究利用铀原子链式反应下产生的核能是否具有切实的基础。同时请告诉我们，您拥有的关于哥本哈根尼尔斯·玻尔实验室的情况。”

一个月后，1942年6月10日，国家情报总局局长收到维·格·赫洛平的信。这位院士在信中说：

“回复您1942年5月7日来信。关于国外的实验室利用铀原子裂变时释放的能量的研究进展情况，科学院并不掌握任何资料。不仅如此，最近一年中，我们接触到的学术刊物几乎完全不发表涉及这个问题的文章。我觉得，这种情况只能使我们认为，相应的工作引起了重视，所以只在保密状态下进行。

至于苏联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它们曾经进行过的这方面的工作都由于‘这些研究所从列宁格勒撤退……’而暂时停顿了。”

苏联驻英武官、伦敦情报站负责人、坦克兵少将H. A. 斯克利亚罗夫奉命“注意获取铀问题的情报”。1941年和1942年初，从伦敦得到的材料全都送给了国防委员会科学方面的全权代表C. B. 卡夫塔诺夫。

1942年10月末，伊戈尔·库尔恰托夫被召到莫斯科。他从喀山



来，因为原先研究铀的重原子分裂机制的中心之一——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撤退到了喀山。请他来的是 C. 卡夫塔诺夫。C. 卡夫塔诺夫交给教授一大包关于英国研究铀问题的材料。这些文件来自红军情报局。卡夫塔诺夫请库尔恰托夫对军事谍报员获得的资料做出评价……

卡夫塔诺夫给库尔恰托夫在莫斯科旅馆开了一个房间，他就在那里研究军事谍报机构获得的文件。这些文件放在三个卷宗里。第一个卷宗里是 1942 年 8 月 17 日从军事情报局得到的 138 页材料，第二个卷宗里是 8 月 24 日、25 日军事情报局送来的 139 页材料，第三个卷宗则是 9 月 2 日情报局送来的 11 页材料。

库尔恰托夫教授专心致志地对这些材料研究了一个多星期，这些材料显示了英国学者就铀原子的链式反应进行的工作。教授决定立即给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写一份报告。1942 年 11 月 27 日，他完成了这份报告。库尔恰托夫详细评价了军事情报部门获得的这些文件的内容，做出了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结论。结论总共是六条，下面是其中的一部分：

“①在铀的研究方面，苏联科学界大大落后于英国和美国的科学界，它目前拥有的进行试验的物质基础也小得多。

②苏联对铀问题的研究目前不如战前时期那样着力，而英美则加紧了研究……

③可是取得做出这个结论所必须的资料非常困难，甚至是无法克服的困难，由于不能排除在战争中使用像铀弹这样可怕的武器的可能性，我认为苏联必须广泛开展铀问题的工作，并吸收最权威的苏联科学和技术工作者参加这一工作。除了现在已经在研究铀问题的那些学者之外，希望阿·伊·阿里汗诺夫教授及其小组、尤·鲍·哈里顿教授和雅·鲍·泽利多维奇教授、伊·康·基科因教授、阿·彼·亚历山德罗夫教授及其小组、亚·约·沙利尼科夫教授也能参加。

④为了领导这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必须在苏联国防委员会下设立一个由您领导的专门委员会，可以由阿·费·约费院士、彼·列·卡皮察院士、尼·尼·谢苗诺夫院士代表科学界参加这个委员会。”

库尔恰托夫教授把报告又读了一遍，签了字，填了日期——1942 年 11 月 27 日。

这份报告是库尔恰托夫在开始制造我国原子武器时期的第一份报



告。库尔恰托夫写出这样一份报告得力于军事谍报人员在英国获得的那些材料……

莫洛托夫读完库尔恰托夫的报告之后，做了批示：“致斯大林同志请读一下库尔恰托夫的报告。维·莫洛托夫 11 月 28 日”。

库尔恰托夫教授的建议听起来有些出人意料，尽管前线战事吃紧，它还是让人们注意到了“铀问题”。

斯大林命令立即召集原子科学家。这时发现其中有许多人在作战部队中战斗：K. A. 彼得扎克是侦察兵，格·尼·弗廖罗夫是地勤维修技师，伊·瓦·库尔恰托夫和阿·彼·亚历山德罗夫在海军——在探寻船只避开磁性水雷的方法。到斯大林那儿开会的是因年龄而免服兵役的老人，还有几个暂时免征的人，其中有阿·费·约费院士和弗·伊·韦尔纳茨基院士。

斯大林提出的第一个，也是主要的问题是：

“德国人或者我们的盟国能不能造出原子弹来？”

科学家们不知道这种工作在国外处于什么阶段，可是并不否认正在进行这样的工作。

斯大林生气了：

“请看，初级技师弗廖罗夫中尉从前线写来报告，说是应当立即着手制造原子弹，可是你们这些专家、学者却一声不响！（格奥尔吉·尼古拉耶维奇·弗廖罗夫战前和库尔恰托夫一起工作过。——本书作者注）造原子弹需要多少时间，要花多少钱？”斯大林追着问道。

约费院士明白，让斯大林生气是很危险的，可是欺骗他也同样危险，于是他回答说：

“它的花销几乎和战争的全部花销相等，我们在研究上落后了好几年。”

不过斯大林懂得，问题不仅仅在于炸弹，还在于战争的胜败和国家的命运。凡是斯大林亲自抓的事情，都有相应的规模和必要的保证。

他命令贝利亚说：

“这个问题全部由你本人进行监督，由你本人负全责。”

1942 年 4 月^①，莫洛托夫邀请了时任化学工业人民委员和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米·格·别尔乌辛，向他通报了斯大林会见学者的情况及关于开展工作的决定，并强调指出：

“这是斯大林同志亲自委托我向你转达的。你是电气工程师，更能理解这件事。”

^① 原文如此，时间似有误。——译者注



莫洛托夫交给别尔乌辛一个大卷宗，里面装的是有关原子问题的文件和资料。

1942年春天，我国的原子（“曼哈顿”）计划就是这样开始的，也就是杜鲁门和丘吉尔在波茨坦用原子弹吓唬斯大林、而且认为他对此毫不知情的三年前。

我国的情报人员在这些年里干得很出色。他们定期获得并向莫斯科送出美国学者的许多研究成果（公式）。克里姆林宫里有一间秘密的专用房间，库尔恰托夫——而且只有他一个人——就在那里阅读我国情报人员获得的材料。

是谁揭开了伯明翰大学的秘密？是谁保持着和英美物理学家的接触、使军事情报部门获得原子问题的情报？

克劳斯·富克斯的名字现在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了，他是一名天赋很高的学者，当时在美国“曼哈顿”计划科研工作的负责人、著名物理学家奥本海默的领导下工作。他还是我国最有价值的情报人员之一。可是今天实际上谁也不知道，是谁，用什么办法吸收了克劳斯·富克斯同苏联情报部门合作。

他进入核物理领域的道路是曲折的，不过他有杰出的禀赋，使他得以成为世界十名主要物理学家之一。他的学术生涯始于1930年，当时他就读于莱比锡大学。富克斯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学生。那时他就已经是德国社会党党员，后来则是共产党党员。

在希特勒取缔了左翼政党并开始逮捕其成员以后，富克斯上了盖世太保的黑名单，他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因此他在1933年9月登上航行于英法之间的渡轮，来到他父亲已经定居的伦敦。

在那段纷扰不定的日子里，他结识了柏林大学原经济学教授尤尔根·库钦斯基。库钦斯基在德国侨民圈子里是一个著名人物。他得知富克斯在哪里工作之后，就建议他和苏联代表分享自己的资料。富克斯同意了。尤尔根是红军情报局的情报人员，他把富克斯介绍给陆军武官的秘书谢苗·克雷默上校。后者是驻伦敦谍报机构中最有经验的情报员。

就这样开始了克劳斯·富克斯在苏联情报机构中的“前程”。谢苗·达维多维奇·克雷默上校同他保持联系。他同富克斯见过四次面，从他那里总共拿到了大约200页文件。

1942年10月，库尔恰托夫教授在莫斯科旅馆里研究了富克斯的材料。其中还有军事情报机构从另一名英国学者那里获得的文件。关于他我们后面再谈。

1942年7月，克雷默离开了伦敦。以后同物理学家见面的就不再是陆军武官斯克利亚罗夫机构中的人，而是一名红军极其隐蔽的情报员

了。这是一名面目姣好、体态匀称的英国妇女，在红军情报局中她的代号是索尼娅，她的真名是乌尔苏拉·库钦斯基。

索尼娅1932年由里哈德·佐尔格吸收参加军事情报部门工作。这是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当时在上海工作的美国女作家、新闻记者阿格尼斯·史沫特莱介绍佐尔格认识了库钦斯基，索尼娅积极完成了在中国、波兰和瑞士的军事情报部门的各种任务。1941年2月她来到伦敦。

乌尔苏拉·库钦斯基是经验丰富的情报员。关于自己的秘密工作，她在1977年柏林出版的《索尼娅报告》一书中讲了一些。可是她的回忆录里只字未提她1942年10月~1943年10月和克劳斯·富克斯见面的事。

……1942年10月的一个星期天，她来到伯明翰，找到了富克斯，恢复和他中断了的联系。初次见面物理学家就交给索尼娅有关“合金管”计划的85页文件，一个月后这些文件就到了莫斯科。不过关于索尼娅同富克斯见面的事，中央得知要早得多。因为索尼娅有她自己同中央联系的电台。从1942年10月起，和富克斯接触就成了她以后一年内的主要任务。

索尼娅本来可以完成中央的各种指示，可是在一次同富克斯见面时，富克斯告诉她，他和另一些专家年底将被派往美国和美国人一同工作。稍后得知，富克斯不仅去了美国，而且也由情报局转归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第一局（国外侦察局）。

这是怎么回事，我以后再谈。现在像我答应过的那样，先向读者介绍其他情报员。

* * *

我先引一段俄军情报总局的文件（1999年）：

“古代中国对优秀情报员的评价极高，称他们是皇冠上的钻石。

我们的军事情报员詹就是他们中很走运的一个。他直到今天也仍然被认为是军事情报部门最优秀的行动人员之一，他吸收了20多个十分有价值的军事—技术情报员同我们合作。其中有些人同情报总局合作了30年，甚至更长久。詹的工作的主要优点是没有一个自愿同他合作的人落入过欧洲各国反谍机关的视野。据专家估算，詹的情报工作的经济效益达到几亿美元。因此詹完全有权被称为‘约·斯大林大元帅的一粒钻石’。”

詹的本名是扬·彼得罗维奇·切尔尼亚克，“詹”是他在红军情报局中的代号。他于1909年4月6日出生在当时属于罗马尼亚的布科维纳，曾在巴黎高等技术学校、柏林工业学院学习过，是德国共产党党

员。从1930年起，他和红军情报部门合作。

詹到过大多数欧洲国家，学会了在最复杂的条件下进行情报活动，他从来没有违反过保密规则，取得了德国及其他科学中心有关制造最新式的火炮系统、航空炸弹、电子和雷达仪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以及装甲坦克技术的珍贵资料。仅在1944年中央就收到詹送来的12500页技术文件和60个各种军用设备的模型。

1942年上半年，詹正在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席卷的一个欧洲国家中工作，这时他收到了中央的指示，让他立即去往英国，吸收剑桥大学卡文迪什秘密实验室的一名物理学家参加军事情报部门工作。从克劳斯·富克斯的材料中情报局得知，这个实验室里有一个由X·霍尔班教授领导的小组在研究分裂铀原子和制造原子弹。詹受过良好的技术教育，也是经验丰富的招募高手。中央从情报员塞斯尔处得知，这名物理学家持“左派”观点。

詹于是去了伦敦。在英国期间，他和这名物理学家建立了联系。这名物理学家的名字是阿兰·纳恩·梅。

我国对于这个人实际上一无所知，因此我想稍稍说几句。梅于1911年5月出生在伯明翰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毕业于爱德华国王学校和剑桥大学。

阿兰·梅是一个天才的物理学家。1933~1936年他在剑桥的卡文迪什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1936年他得到了物理学博士学位。1936~1942年他是伦敦皇家学院的物理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学院撤退到布里斯托尔。1942年4月，X·霍尔班教授邀请阿兰·梅去他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参加研究铀课题的学者小组。

詹很快就找到了和阿兰·梅的共同语言，说服他必须帮助苏联物理学家研究原子问题。梅也认为苏联科学家必须赶在也在积极制造原子武器的德国学者的前面。詹同阿兰·梅见过几次面。这位情报员从英国物理学家那儿得到了有关剑桥铀课题各个研究方向的文件资料。后来梅又将分裂铀的同位素的原理、获取钚的过程、“铀反应堆”的图纸及其工作原理的文件交给了詹。詹总共从梅那儿得到了大约130页文件，其中一部分在1942年10月交到了库尔恰托夫手中。

詹同阿兰·梅的合作时间不长。1943年1月，梅和霍尔班教授的一个12人小组一起转到了加拿大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的蒙特利尔实验室。

詹在和梅（在红军情报局中代号为“阿列克”）告别时，请他在出差回来后写一份详细的工作报告，并和他商定了在加拿大恢复接触的可能性。这是准备在万一需要时用的，因为当时苏联和加拿大还没有建立



外交关系，詹不知道军事情报部门在加拿大是否有谍报网。事实上当时还没有，不过詹拟定的联系条件被军事情报部门两年以后用上了，那时在渥太华设立了苏联大使馆和武官处。

詹和阿尔·梅的人生道路此后就不曾相交过。而如果交叉过，那詹就可能遭遇悲惨的命运了……

阿尔·梅于1943年1月抵达蒙特利尔。同年8月，帕维尔·安格洛夫上尉到了加拿大。安格洛夫上尉是在加拿大建立的军事情报站的负责人、武官扎博金上校属下的工作人员。他和梅建立了联系，从他那儿获得关于制造原子弹进程的报告。

梅交给安格洛夫美国学者恩·费米关于铀反应堆的结构和工作原理的报告、它的草图以及铀-235的样品（铂箔上的氧化物，总重量162毫克）。铀的样品由“格兰特”的副手彼得·莫季诺夫中校从加拿大带到莫斯科。

1945年6月，阿列克写完了关于原子弹制造进程的报告并交给了巴克斯特（安格洛夫）。报告说到，“英国人打算独自着手搞自己的原子计划。这些计划对美国严格保密”。

梅报告说，英国政府秘密决定恢复自己制造原子武器的想法。伦敦到1945年年中时，终于明白美国人把一切有关原子的秘密牢牢地捏在自己手里，而不打算和任何人分享这些信息……

据国家情报局证实，梅的这份报告、原子弹爆炸的原理、获得富铀的原理以及铀-235的样品于1945年7月11日被送给了“苏联元帅贝利亚同志本人”。

为什么情报局要把材料送给“贝利亚元帅”呢？而且不仅仅是情报，还有自己最优秀的干部和情报员。

这是按斯大林本人的指示做的。他命令把“一号计划”的全部情报工作都集中到贝利亚手中（上面已提及）。

1945年9月10日，密码译电员占津科中尉从加拿大军事情报站逃跑了。他带走了秘密材料，将它们交给了加拿大反间谍机关。他的全部资料当然也落入了美国联邦调查局手中。美国人从这些文件中得知，苏联领导人了解他们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工作。不过他们不知道阿列克是何许人，于是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下令要尽一切努力查清这个阿列克的真实姓名。很可惜，在叛徒交给美国反间谍机关的一封无线电报里提到阿列克即将到英国去。这可是一条重要线索。回伦敦去的是一批英同学者。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反间谍机构经过努力，逐渐认为，阿列克就是物理学博士阿尔·梅。

扎博金上校在加拿大建立的情报站被破坏了。



这使斯大林怒火中烧。不单是情报人员的生命受到威胁，而且关于原子弹的情报可能中断，从而延误我国科学家的工作。可是耽误是不行的！制造原子弹的竞赛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所以斯大林才下令整顿这件极其重要的工作，把一切全都集中到贝利亚手中。

中央采取了紧急措施来控制这次重大的失败。考虑到阿兰·梅回到伦敦后应当和詹见面，情报局长紧急指示詹不要去伦敦……

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对这些并不知情。他很想抓住苏联的原子间谍。因此美国和英国的反间谍机构规定在伦敦对阿兰·梅实施昼夜监控。他们计划在梅转交秘密文件时逮捕他，同时抓住苏联情报员。可是没有人到大英博物馆去同梅见面。

反间谍机关没有阿兰·梅向别人转交秘密情报的直接证据，可是仍然请他去接受询问。有一次在例行“谈话”时，侦查员向物理学家提了一个狡猾的问题：

“您从俄国人那儿拿了多少钱？”

学者不认为这个问题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回答说：

“我没有拿过钱。”

这句话被法庭认为是认罪，于是梅被判处10年监禁，因为“向一个不知名的人传递情报”。现在可以这样说了，不知名的人有两个——扬·切尔尼亚克和帕维尔·安格洛夫。

* * *

国家情报局决定将获取铀弹情报的工作交给在这些国家隐藏得很深的地下情报人员。在美国，其中之一就是阿希尔。用这个化名在北美长期工作的是阿尔图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亚当斯。他是一个有传奇经历的人，他在加拿大接受教育，毕业于多伦多大学机械系，在福特汽车厂工作过，在美军中服过役。1920年他回到俄罗斯，当过莫斯科汽车厂的厂长，在航空工业总局担任过重要职务。1935年他成了红军情报局的干部，领导在美国的地下情报网。

1944年2月，他吸收了一名美国科学家，在国家情报局里登记的化名是肯普。

阿希尔送交中央的文件中有：

——挤压工厂结构的说明和图纸——36张照片；

——关于恢复未经加工的产品“49”号的报告，克林顿实验室的材料——34张照片；

——维尔明顿讨论会上关于美国铀生产进展情况的报告——19张照片；

——使用恩·费米链的发散结构的实验材料的总结报告——34
张照片。

阿希尔下一次和肯普见面时，得到了供他翻拍的关于原子计划的2500页内部材料和新样品。

一个胶卷通常是36张，阿希尔在他的秘密住所为了给文件拍照，用了69个胶卷！

除了阿希尔，军事情报部门在美国还有其他地下情报员。为了获得“第12号课题”的资料，情报部门动用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所属的在美国的强大侦察和谍报网。它们也渗进了“曼哈顿计划”。不过他们工作的细节，我就不得而知了。

情报部门获得的资料对于科学有什么意义呢？

我举一份文件为例。

1943年3月，情报人员送来了新材料。库尔恰托夫研究了这些材料后，写了一封信：

“致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米·格·别尔乌辛同志

获得这些材料对于我们国家和科学界具有重大的、不可估量的意义。现在我们对于今后的科学研究有了重要的方向，我们可以绕过研究铀问题的许多非常费力的阶段，知道解决问题的科学和技术新途径……

（库尔恰托夫接着分三节谈了这些材料的科学价值。——本书作者注）

……4. 获得的材料让我在许多问题上重新审视我们的观点，而且为苏联的物理学决定了三个新的工作方向……

还必须指出，整个材料向我们指明，在比不了解国外这个课题进展情况的我国科学家设想的期限要短得多的时期内，解决全部课题在技术上是有可能的。

……这封信将由您的助手瓦辛同志转交，他手上有应予销毁的草稿。

实验室主任、教授

伊·库尔恰托夫

1943年3月7日于莫斯科

仅此一份”

情报人员不断送来材料，而且都是谈库尔恰托夫提出的那些问题的。

库尔恰托夫的同事对于他思想的丰富和敏锐都感到惊异，他有时不经过实验检验就把一些理论方法投入生产，而且一切顺利！例如，就在1945年春天，当波茨坦会议还在进行时，库尔恰托夫和他的同事们就已经着手拟定工业反应堆的结构了。1946年12月25日，实现了铀分裂的可控链式反应，这在苏联和欧洲都是第一次。一批科学家在库尔恰托夫的领导下（斯大林的经常关注自然是很重要的推动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做了宏伟的（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字眼）工作。1947年11月6日官方宣布，原子弹的秘密对苏联已不复存在了。

要说这是一粒苦药丸，那这就是给五角大楼咽下的一粒药丸！甚至不是药丸，而是让它清醒的兜头一盆冷水。

苏联科学家实际上完成的是科技方面利用原子能问题中的重大工作。

至于我国情报人员的收获，那是出于保密的需要而不便多说的。

尽管获得的情报含有重要的思想、不合常规的计算和应当遵循的发展方向，具有潜在的价值，可是它本身仍旧是没有生命的。直到找到了库尔恰托夫本人要求的证明，肯定情报人员的“收获”不是错误的，也不是假情报。

库尔恰托夫亲自进行十分重要的实验（或者参与它的制定）。他是一个善良、有魅力、同时又异常负责、坚定、要求严格的人，他把研究和实际工作中的种种风险都自己承担起来，遇到失败时，从不指责别人。他自己建造了铀—石墨反应堆，拟定分裂铀的同位素的方法，在回旋加速器里做实验。

斯大林对科学家在每个阶段的杰出劳动都给予慷慨的褒奖，从而激励他们努力夺取下一个胜利。在较短时期内，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库尔恰托夫和安德列·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三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阿纳托利·彼得罗维奇·亚历山德罗夫四次获得国家奖，一次获得列宁奖；尤利·鲍里索维奇·哈里顿三次获得国家奖，一次获得列宁奖；雅科夫·鲍里索维奇·泽利多维奇四次获得国家奖，一次获得列宁奖；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维诺格拉多夫两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三次国家奖，一次列宁奖）；伊萨克·康斯坦丁诺维奇·基科因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五次国家奖，一次列宁奖和许多其他奖）；格奥尔吉·尼古拉耶维奇·弗廖罗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三次国家奖，一次列宁奖）；瓦西里·谢苗诺维奇·叶梅利亚诺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两次国家奖；阿布拉姆·伊萨科维奇·阿里

汗诺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三次国家奖。

所有的称号和奖励都是当之无愧的，只要指出这些科学家的工作使我们避免了多么危险的灾难：美国对苏联实施原子弹袭击的“扣球”计划规定向苏联的70座城市投下300颗原子弹。

原子科学家的成就，还有对他们的褒奖，这一切都很好。可是在情报员的胸前看不到闪闪发光的金星奖章时，我总是感到有些不自在。库尔恰托夫在自己人的圈子里说过：造出原子弹有一半应当归功于情报部门。

我们不妨看看科恩夫妇——莫里斯·科恩和列昂京娜·科恩。他们是最早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里“分裂”美国原子秘密的人。1961年他们在英国被捕，每人被“奖励了”20年监禁。1969年苏联政府用被捕的外国间谍换回了他们。目前科恩夫妇住在莫斯科。

物理学家克劳斯·富克斯自愿为苏联情报机构服务。他出于思想信仰，没有领取报酬，提交了许多有关制造原子弹的秘密。1949年英国法庭“奖励”他14年监禁。

国家安全委员会系统的职业情报员列昂尼德·克瓦斯尼科夫领导纽约的情报网（1943~1945年），打探“曼哈顿计划”的秘密。这方面勇敢而成效显著的情报员还有阿纳托利·亚茨科夫、B. 巴尔科夫斯基、A. 费克利斯托夫。直到1996年，他们才终于被授予俄罗斯联邦英雄的称号。

而国家情报局的情报员、“斯大林的钻石”扬·切尔尼亚克是1994年才被授予这个崇高称号的。授予他金星奖章时，他已卧病在床，不久就与世长辞了。

那时我去医院探望过他，很可惜他离开了人世，带走了人们再也不会知道的那些让人头晕目眩的、震撼人心的功勋。他没有留下回忆录。

国家情报局的一位领导人说过：“切尔尼亚克做的那些事情比电影中施季利茨做的要复杂而危险得多。”

* * *

前面已经说过，我没有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系统对原子弹工作的材料。1977年莫斯科奥林波斯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弗·奇科夫的《地下工作者》，分上下两卷。作者在前言中说，他严格遵循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初次解密的第13676号卷宗里的事实和文件，其中有情报人员和科学家为制造苏联原子弹工作的情况。

奇科夫是职业的反间谍人员兼新闻记者（毕业于乌拉尔大学新闻系）。他在写这两卷书的时候，费了不少劲，也很有成效，可惜他也没有逃过恶意攻击斯大林的病毒感染（时尚如此！如“就狡诈和背信弃



义而言，无人能与各族人民的领袖相匹敌”这类词句只会降低这部书的价值)。不过这本书里有不少真实的文件，我（为了使叙述更加全面）也将引用其中的一部分，特别是那些涉及我的话题（斯大林）的文件，只是略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情报人员在获取“一号计划”的材料时的细节和技术。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100 000人死亡，37 000多人重伤，235 000人受到伤害）。8月9日，美国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

斯大林明白了：现在美国将利用自己的优势来达到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他们手中的原子大棒变得越来越危险，可能导致战争，而且取得可以预料的胜利。必须尽一切努力在最短时间剥夺美国人对原子武器的垄断地位。

8月18日，斯大林召集一些人开紧急会议，准备把这件关系重大的事情托付给他们。详细讨论之后，通过了苏联国防委员会《关于国防委员会下属的专门委员会》决定（第9887号绝密/特别卷宗）。下面是这份文件中的若干要点：

“……责成国防委员会下属的专门委员会：

——领导利用铀原子核能量的全部工作；

——开展该领域的科学研究；

——广泛开展地质勘探并建立苏联的铀原料基地，同时利用国外（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的铀矿；

——组织铀加工、生产与利用原子能有关的专用设备和材料的工业；

——修建原子能装置，研制和生产原子弹。

……责成贝利亚同志采取措施组织在境外获取有关铀工业和原子弹的更完整的技术和经济情报的工作，责成他领导这方面由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红军情报局等）进行的全部工作。

国防委员会主席

约·斯大林”

在鲍·利·万尼科夫领导下开始建立新的工业部门——原子工业部，按照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其他人民委员部的一些研究所、设计局、建筑机构和工业企业转交该部并开始转产。

成立了学术委员会，根据斯大林的提议，其成员有：阿里汗诺夫、

万尼科夫、约费、扎韦尼亚金、卡皮察、基科因、库尔恰托夫、哈里顿、马赫涅夫。

“委员会应当是真正的、学术的、有益的，而不说空话。”斯大林是这样界定学术委员会的。

斯大林经常注意并帮助科学家的工作，关于“说空话”他还是很有远见的，有一次他就消除了行政人员和学者之间的严重冲突。

卡皮察院士就这个问题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贝利亚、马林科夫、沃兹涅先斯基等同志在特别委员会里的表现仿佛是一些超人。尤其是贝利亚同志。不错，他手里有指挥棒，这不是坏事，不过在他之后演奏第一小提琴的还应当是科学家。贝利亚同志的主要弱点在于一名指挥应当不仅仅挥舞指挥棒，而且要懂得总谱。贝利亚在这方面差一些……他有一个缺点——过于自信，其原因看来在于不懂得总谱。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您不懂物理学，那就让我们学者来判断这些问题。’他却回答我说我不懂得人。总的说来，我们的谈话不是很客气。我曾经建议教他物理，让他到我的研究所来。因为，比如说，并不需要使自己成为一名画家才能懂得绘画……

……我和贝利亚总是搞不好。我在前面已经说了，他对学者的态度我完全不能接受。

……所有像贝利亚这样的领导同志都应当让自己的下属感到，在这件事上学者是主导力量，而不是辅助力量……他们（领导同志）以为，既然他们知道二二得四，他们就掌握了数学的全部奥秘，可以做出权威的判断了。这就是不尊重科学的根本原因，而不尊重科学是应当根除的，因为它妨碍工作……

我希望贝利亚同志能看看这封信，因为这不是打小报告，而是有益的批评。我本来可以亲自把这一切都告诉他，可是同他见面实在太难了……”

斯大林给院士回了信。他召来贝利亚，给他看了卡皮察的信。不难想像，这封信使权力无边的“国家安全元帅”火冒三丈。

但是斯大林说：

“你知道就行了，同他讲和吧。”

贝利亚到研究所去看了卡皮察，送给他一支珍贵的猎枪。

不谙世事的院士在谈话时把自己对贝利亚的看法又一次和盘托出。他还说，只有学者是专门委员会的主力、而其他所有的人都只是帮助他

们的辅助力量时，他才同意在委员会里继续工作。

贝利亚表示完全同意院士的意见。可是他如果对卡皮察不怀恨在心，也就不成其为贝利亚了。他一点一点地、日复一日地在斯大林耳边“吹风”，说这个院士不可靠，有反苏情绪，可能成为叛徒。贝利亚终于得逞了。斯大林说：

“我让他离开委员会，可是你，拉夫连季，不许碰他。不准逮捕，也不准搜查。”

卡皮察被排挤出了委员会，平静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他活得比贝利亚长——1984年才去世，两度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45年、1974年）……

1949年8月29日清晨6时，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上爆炸了苏联第一颗原子弹。

关于准备工作的种种细节都用高频电话报告了斯大林。当一切都准备停当时，他表示了祝福。

美国的原子垄断就此结束。原子弹，还有能够将它们送到大洋彼岸的火箭都可以大量生产了。斯大林这一次也达到了目的——他从美国的原子大棒下拯救了自己的国家，也拯救了全人类。

六 击败日本^①

还在筹划对德国的最后几次战役时，斯大林就初次提到了对日作战。在攻占柯尼斯堡之前，斯大林对华西列夫斯基说：

“我们在雅尔塔谈妥了远东对日作战，现在就应当准备调几个精锐集团军到远东去。我们抽调的地区也包括东普鲁士，我希望由您选定这些部队，大本营打算委任您来指挥对日的战斗行动……”

这是华西列夫斯基不曾料到的，他脸上自然流露出困惑。斯大林觉察到了。

“您怎么啦，不满意吗？”他警觉地问道，“还是认为自己不配承担这个任务？”

“是不配。我作为总参谋长，自然研究过远东的战区，可是我从来不曾远东服过役，不熟悉这个地域的特点，不曾和日本人作过战。据我看，我们有许多将领，他们不仅长期在那边服过役，而且参加过战斗。比如说，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马

^① 本节使用了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回忆录以及C.库利奇金《总参谋部预计……》一书中的某些段落。——本书作者注

利诺夫斯基、波波夫……”

“好了，华西列夫斯基同志，这些我们都知道。可是大本营认为，能够担任如此规模的战役的总司令的要么是朱可夫，要么是您。朱可夫在德国，事情大概少不了，再说，他在哈拉哈河作战时也不了解远东。现在您的经验要多得多，您攻占过强大的筑垒地域如塞瓦斯托波尔，即将攻占柯尼斯堡，而日本人在满洲修建了坚固的筑垒地带。也许您只愿意在总参谋部工作？”

“斯大林同志，绝不是这样的。说到总参谋部，我现在就想请求解除我的职务。最近两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前线，领导总参谋部的实际上是安东诺夫将军。我建议批准他担任这个职务，而保留我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

“这样的决定不会让您感到委屈吗？”斯大林问道，他转身问站在一旁、满脸通红的安东诺夫：“您有什么想法，安东诺夫同志？”

“我不同意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的意见。他作为总参谋长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嗯，好吧，这都是跟沙波什尼科夫学的。彼此谦让。我们考虑您的建议，华西列夫斯基同志。但总不能这样随便降低您的职务吧，现在您先抓东普鲁士吧。您什么时候可以到前线去？”

“如果你允许，明天早上。”

斯大林不想像希特勒那样用突然袭击开始对日作战，他命令时任外交部长的莫洛托夫通过外交活动酝酿气氛。

4月5日，莫洛托夫召见日本大使佐藤，代表苏联政府声明废除苏日中立条约。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消息对于日本大使不算什么意外，不过仍旧令他吃惊。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边擦去额上的汗珠，边低声说：

“部长先生能告诉我废除的原因吗？日本一贯尽力保持中立。”

“声明全都说了。”莫洛托夫下巴巴地说。

声明指出，签订中立条约是“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前，在日本和英美之间发生战争之前。从那时以来，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德国进攻苏联，而日本作为德国的盟国帮助它对苏作战。此外，日本正在同苏联的盟国美英作战。在这种情况下，苏日之间的中立条约已经失去了意义，延续这个条约已经不可能了……”

日本大使玩弄手腕，几乎是赌咒发誓地声称日本人是恪守中立的模范。在战争的最困难年代里，日本一直在苏联的远东边界上保持着将近百万的精锐关东军，只是法西斯德军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城下以及库尔斯克突出部的计划落了空，他们才没有找到恰当的时机在苏联的滨海



边疆区和外贝加尔地区投入交战。

* * *

莫斯科在准备胜利大阅兵，各方面军的混合团在进行训练，在缝制新的检阅服，而华西列夫斯基正埋头于思考远东的战斗行动，总参谋部在进行复杂的计算。首先就是铁路运输。这方面真是困难重重，铁路线很少，卸载站也很少，而转运上百万士兵和好几千辆装备必须秘密进行。为什么必须保密？日本人当然知道战斗行动即将开始。可是“即将”是一个伸缩性很大的概念。比如说，东方的雨季在8月份开始，那就是说战斗将在9月份开始吗？可是如果是违反常规呢？如果在雨季来到之前，甚至在雨季中实施突击呢？这是日本人料不到的。从1904年起，他们就习惯于按部就班的战斗行动了，在这场战争里他们也准备进行长期的防御战。他们习惯地以为，敌人一定会选择良好的天气条件，事先进行长时间的、猛烈的炮火准备，空军轰炸，然后才……

华西列夫斯基总司令正是考虑日军的这种保守观念，才准备给予出其不意的、迅雷不及掩耳的综合突击。因此他加紧工作，命令一部分部队和炮兵，总之是一切有车轮的部队，不在乔巴山市地域的惟一卸载站下车，而是在赤塔和卡雷姆斯科耶之间的任何一个车站下车，然后自行走过500、700、800公里，到达展开地域。他十分注意谨慎从事，亲自下令限制部队参加转运和卸载的人数，严格控制通信线路上的各种谈话，部队只有在总参谋部的代表在场时才能下车。

斯大林几乎整个5月都没有打扰他。他当然定期听取战役准备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只是到开始讨论指挥干部的人选时，他才实际参与其事。这次谈话是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的庆祝胜利招待会前不久才进行的。

“嗯，华西列夫斯基同志，据安东诺夫将军报告，您已经最后确定了各方面军部队集团和司令部的问题了？”最高统帅问道，一面仔细地看地图。

“是的，斯大林同志。远东的所有部队编成3个方面军：外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1和第2方面军。最强大的是外贝加尔方面军，由马利诺夫斯基指挥，辖第17、第36、第39和第53诸兵种合成集团军，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和空军第1集团军以及苏蒙骑兵机械化联合集群。梅列茨科夫的远东第1方面军也很强大，它是在滨海军队集群的基础上扩编而成的。它辖红旗第1以及第5、第25和第35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丘古耶夫战役集团、机械化第10军和空军第9集团军。普尔卡耶夫的远东第2方面军辖红旗第2以及第15和第16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独立步兵第5军、堪察加防御区和空军第10集团军。尤马舍夫海军上将的

太平洋舰队有 427 艘战舰，其中巡洋舰 2 艘、潜艇 78 艘，飞机 1 500 架。阿穆尔分舰队有 200 艘战舰，70 架飞机……”

“好的，华西列夫斯基同志，”斯大林打断他说，“各方面军参谋长都是谁？”

“马利诺夫斯基的参谋长是扎哈罗夫大将，梅列茨科夫的参谋长是克鲁季科夫中将，普尔卡耶夫的参谋长是舍甫琴柯中将，他是我们总参谋部的人。”

“我们原来还打算推荐扎哈罗夫同志当总指挥部的参谋长呢。”

“很难找到更合适的人选了。马特维·瓦西里耶维奇我早就认识，不过没有同他谈过话。还有库拉索夫将军……”

“好的，你看着办吧，同他们仔细谈谈再报告一下。总指挥部应当是一个权威机构。我们会把海军人民委员、空军总司令、各兵种的主要负责人都派到您那儿去。还有各集团军和各军的司令部安排了吗？”

“我们尽量掺进去一些有作战经验的人员，斯大林同志。除了那些带着自己的部队过来的人，我指的是柳德尼科夫、克雷洛夫、马纳加罗夫、克拉夫琴柯、普利耶夫，还打算派另一些同志去。鲁钦斯基中将去外贝加尔的第 36 集团军，别洛博罗多夫上将去滨海的红旗第 1 集团军，奇斯佳科夫上将去第 25 集团军，扎赫瓦塔耶夫中将去第 35 集团军。他们都是战斗经验丰富的指挥员。原来的司令都留给他们做副手。”

“对！这很重要，因为老手非常了解敌人的战区情况。必须更好地抓一下各地的所有指挥环节。”

“等莫斯科的各种事情办完，做出决定之后，我立即去前线。”

“哎，华西列夫斯基同志，您就是离不开‘前线’这个字眼。决定将在相应的时间做出，莫斯科也确实有事要办。您准备参加胜利阅兵式吗？”

“是的，斯大林同志。裁缝已经搞得人心烦了，非要赶在今天的招待会之前。”

“怎么样，新制服漂亮吗？您从前就是军官，能不能比较一下？”

“我认为，如果不算带穗肩章，旧制度时期军服没有现在漂亮。”

“有过这样的建议，那还是在 1943 年，不过我们没有接受。顺便说一句，招待会不一定要穿制服，阅兵就必须穿。”

6 月 26 日，斯大林批准了在满洲、朝鲜、库页岛和千岛群岛歼灭日军的计划。一天之后，训令就发到了陆军和海军。

6 月 27 日，梅列茨科夫去远东，7 月初是马利诺夫斯基，紧跟着他的是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们离开时都严格保密。从证件和表面看，他们都不是元帅。梅列茨科夫被说成是马克西莫夫上将，而且按照斯大林的



命令，几乎完成了当年契卡洛夫的跨越飞行。当时他用了36小时到达伏罗希洛夫—乌苏里斯克，而且其中几乎29小时都在飞行。马利诺夫斯基变成了莫罗佐夫上将，不过走得轻松一些——他乘的是专列火车。华西列夫斯基按证件上说是副人民委员瓦西里耶夫上将，斯大林留他在莫斯科多呆了一天。谈话很简短，可是最高统帅认为它十分重要。

“现在许多事情都取决于您，首先就是部队的直接训练，”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要到柏林去开会。问题都是很复杂的：划分德国、战争赔偿、欧洲的新秩序。从种种迹象看，盟国不指望近期内击败日本，他们想把我们拖进这场战争。我们信守自己的承诺，要参战，不过作战必须很坚决，用最短的时间取得胜利。世界应当明白，没有苏联，要想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不可能的。迅速就能保证今后我们在远东、中国、朝鲜、也可能是在整个地区的影响力。陆海军部队必须在三星期之内达到充分的战备状态。也许您还要等待一段时间，这要看谈判的进展情况，不过我想不会太久。您是否已经决定了总指挥部的参谋长人选了？”

“扎哈罗夫和库拉索夫都拒绝了。”

“还有别的人吗？”

“有，伊万诺夫上将。托尔布欣坚决推荐他。”

“好吧，就要伊万诺夫吧——祝您一路顺风。路上有您要思考的事情、要干的活儿。”

8月3日，斯大林从波茨坦回到莫斯科，华西列夫斯基立即和他取得了联系，详细报告了备战的情况。

“您实际上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进攻？”斯大林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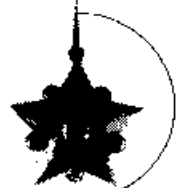
“外贝加尔方面军的柳德尼科夫和马纳加罗夫两个集团军已经前出至集结地域，他们距国境线50~60公里。克拉夫琴柯的坦克兵已经到了出发阵地，两天以后方面军就能够开始进攻。两个远东方面军已经两昼夜处于准备冲击状态。”

“您很快就会得到训令，滨海集群改称远东第1方面军，普尔卡耶夫的方面军，像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改称远东第2方面军。舰队的情况怎样？”

“8月5~7日，舰队就可以达到充分战备状态。不过我请求立即派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来远东，他必须协调我们和海军的行动。”

“好的。给库兹涅佐夫的指示立即发出。这就是说，我们走在时间表的前面了？”

“不单单是这样，斯大林同志。我相信，作战开始的时间应当不迟于8月9~10日，以便利用有利的气候条件。此外，侦察表明，满洲和



朝鲜的日军有变更部署的迹象。关东军在增加，师的数目从19个增加到23个，飞机从450架增加到850架，正在加强滨海方向。我担心日本人会猜到我们的意图。他们当然知道会有战争，不过我希望让他们还像原先那样，以为我们要到9月份才开始进攻。”

“对，看来只好开始了。杜鲁门一直在吹嘘什么炸弹，可是打垮日本人还是要靠俄国士兵。不几天您就会收到训令……”

8月6日，美国人在广岛爆炸了原子弹，开始了人类疯狂的新世纪。不过人们当时还没有认识到这惟一的一次爆炸造成的全部灾难。至少给远东部队总司令部印象深刻得多的是8月7日莫斯科时间大约17时收到的斯大林的训令，要求外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1方面军8月9日开始战斗行动。而且给日本人留下更深刻印象的也是8月8日晚上通过驻莫斯科大使收到的苏联政府的声明。

这份文件说：“希特勒德国溃败和投降后，日本是主张继续作战的惟一大国。

三大国——美国、英国和中国今年7月26日要求日本武装力量无条件投降，遭到日本拒绝。

……苏联政府声明，从明天，即8月9日起，苏联将认为自己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

8月9日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投在长崎。美国人认为这是日本投降的主要原因。可是对原子弹轰炸之前的事态，尤其是对其后的事态的分析推翻了这个说法，导致了其他的结论。

首先，对轰炸广岛，帝国大本营的反应只是派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去广岛研究原子弹爆炸的后果。日本领导人更担心的是苏联的立场。等到8月9日苏军转入进攻，这才根本改变了局势。

苏联对日宣战使日本统治集团倍感沮丧，手足无措。正因为如此，日本领导人才在8月9日早晨原则上决定必须投降。日本首相铃木大将在紧急最高军事会议上坦陈：“今天早晨苏联参战将我们彻底置于绝境，不可能继续作战。”外相东乡在同一次会上也说已经丧失了取胜的任何希望：“战争越来越没有希望了。目前的局势十分危急，排除了任何取胜的希望，因此我们应当立即接受波茨坦的条件……”

使用原子弹并非出于军事的必需，因为日本的失败实际上由于法西斯德国被击败和苏联即将参战（美国领导人很清楚苏联即将参战）而已经决定了。如果认真看待美国资产阶级历史学界的说法，认为1945年8月初“日本事实上已经被击败了”，美国人只需要“安排签署投降书的仪式”，那么扔原子弹就更没有必要了。

可是为什么要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呢？为什么将近50万和平

居民要被原子火焰烧死或者遭受弹伤、灼伤和放射线的痛苦折磨呢？既然投原子弹不是出于军事的需要，那就应当从美国的政策中寻求答案。日本历史学家公正地指出，“美国使用原子弹并不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个军事行动，而是作为反对俄国的‘冷战’的第一次大交战。”它不仅是对日本的突击，而主要是对苏联的讹诈。

我们说了，斯大林命令 1945 年 8 月 8 日开始对日的战斗行动。

那天早晨华西列夫斯基在远东第 1 方面军司令部。进攻的准备已经就绪，然而远东的自然界却突然发了威——下起了倾盆大雨。

“真让我们等着了！”梅列茨科夫气恼地啐了一口。

华西列夫斯基也有些懊丧：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天气和我们开玩笑这又不是第一次。”

“我去报告最高统帅。”华西列夫斯基说。

和斯大林没有谈成，确切地说，他等了几个小时。接电话的波斯克列贝舍夫告诉他，斯大林请他过一会儿再打电话。两小时以后，他终于和最高统帅联系上了，统帅平静地听完他的报告，当华西列夫斯基说到暴风雨时，斯大林甚至说了句笑话：

“暴风雨是给日本武士下的！”

“我指的是真正的暴风雨，”华西列夫斯基说，“天气越来越坏了。”

“我说的也是真正的暴风雨呀，华西列夫斯基同志。难道我们的军队——红军战士、飞行员、坦克兵、炮兵、海军——对日本人来说不是暴风雨吗？红军就像一场风暴，突然摧枯拉朽般扑向关东军。它的突破就是一场横扫一切的倾盆大雨，把地上最后一点战争瘟疫冲洗得干干净净……”

现实证实了最高统帅的预言。暴雨如注，雷声隆隆，仿佛是战前的炮火准备。雨不是一般地下，而是倾盆而下。水流从小山包上向山谷汹涌直下，冲毁了最后的道路，灌得坑满洼平，提高了河流、山溪和湖泊的水位。

深夜 12 时半，梅列茨科夫决定了：

“我想不等炮火准备，就在倾盆大雨中开始冲击。这也算一点‘新意’吧。”

“上帝保佑！”华西列夫斯基祝福说，他感到分外平静。“每两小时向我报告一次。不过重要情况要立即报告！我要去休息一下了。”

对于胜利他已经习以为常了，从苏德战场上过来的他的下属也习惯了。他们之中没有人——从普通士兵到司令——怀疑过最后胜利，也没有怀疑过胜利在即。可是未必有人想到过进攻会以这样的速度立即展



开。到正式签署投降书，战局持续了24天，然而实际上，10天之内，充其量两周之内就统统结束了。

清晨，从前线来的第一份报告中华西列夫斯基总司令就知道，主力部队在各个方向，甚至在不能通行的原始森林以及因暴雨而泛滥的阿穆尔河和松花江上（这里的水位已经涨到4米）都推进了10~15公里。先遣支队越过了可能想像的和不可想像的障碍，推进得还要远，已经展开了争夺主要筑垒地域的战斗。外贝加尔方面军传来的报告简直让人吃惊。克拉夫琴柯的坦克兵以两个平行的纵队推进，一口气跃进了150公里，傍晚时已经到达大兴安岭的山口。普利耶夫的骑兵机械化集群甚至在缺水的戈壁里，在灼热的阳光炙烤下，绕过被下了毒的水井，推进了将近60公里。空军第9集团军的强大轰炸机从清晨直到深夜轰炸了长春和哈尔滨。

斯大林得到华西列夫斯基的第一份报告后，并不感到惊奇，不过他自然是满意的。

“嗯，暴雨的情况怎样？”他诙谐地问道。

“您指的是哪一场暴雨，斯大林同志？”

“您是什么意思？有许多暴雨吗？”

“正是这样。一场在天上，一场在地上。克拉夫琴柯进攻的速度是一昼夜超过150公里，他已经前出至大兴安岭了，这比我们预期的要快得多了。三个方面军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按计划展开进攻，已经前出至主要筑垒地域了。”

“这才是对实际准备的检验。您认为现在已经可以谈论胜利了吗？”

“暂时还不行，不过5天以后情况就完全明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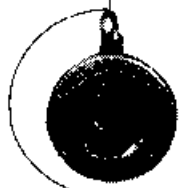
过了5天，外贝加尔方面军越过了大兴安岭，克拉夫琴柯的坦克兵在满洲平原上突入关东军的后方——扑向沈阳和长春，紧随其后的是马纳加罗夫的摩托化步兵。进攻在全线展开，两个远东方面军推进了50~200公里，展开了独特的、攻占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空降作战。现在非常清楚，日军司令部已经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不能组织顽强的抵抗。日本的满洲战场被切成几段，只有出现奇迹，才能挽救日本人不被彻底击败。

“这就是说，您的预想实现了？”听完华西列夫斯基的报告后，斯大林问道。

“正是这样，斯大林同志。现在最要紧的是不能降低进攻速度。”

“好的。不过还要加快速度。这方面您还有什么建议？”

“建议把空降兵投向大城市：哈尔滨、长春、吉林、沈阳。在所有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内以及克拉夫琴柯的部队内建立快速的先遣支队。”



“您知不知道，日本政府已经正式宣布投降了？”

“正是这样的。侦察和截听无线电都证实了这一点。不过，投降得很奇怪。日本总参谋部给关东军司令部的无线电命令说：‘按照天皇的命令，销毁旗帜、天皇的肖像、天皇的诏书和重要的秘密文件……’可是没有停止抵抗的命令。日本人在拼命战斗，进行反冲击，有许多自我牺牲的例子。我军的推进完全不是轻轻松松的散步，损失也很大。我刚同梅列茨科夫通过话……”

“我也是这样想的，”斯大林打断他说，“明天我们在报刊上发表一个官方声明，您就开始空降行动吧。”

8月16日，苏联各报刊登了由安东诺夫大将署名的红军总参谋部的正式声明，其中说：

1. “8月14日日本天皇关于日本投降的通告只是无条件投降的一般性宣言。

让武装力量停止战斗行动的命令并未颁布，日本的武装力量仍在继续抵抗，因此日本武装力量实际上并未投降。

2. 只有日本天皇发布命令，让他的武装力量停止战斗行动，放下武器，而且这个命令得到实际执行，从这时起才可以认为日本武装力量已经投降。

3. 鉴于上述各点，苏联武装力量将在远东继续对日本的进攻作战。”

敌人在抵抗，而投降的过程毕竟开始了。一股自杀的浪潮蔓延开来了。8月11日，前首相东条，这个发动战争和日本战败的罪魁祸首，朝自己胸部开枪自杀，成了这条锁链的第一环。8月15日，陆相阿南自杀。紧随其后的是最高战争指导委员会成员筱塚中将，最后一届内阁大臣小泉、星田、桥本将军和滨田将军。真正的武士不仅切腹自杀，也有开枪和服毒的。很难说这事对关东军司令部产生了什么影响，可是8月17日15时，东京电台播报了关东军司令部的声明：

“为了尽快执行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我关东军司令部今晨发布命令，运载我方代表的飞机将于8月17日10~14时（东京时间）之间前往下列城市：牡丹江、密山、穆棱，以便与红军司令部接触。关东军司令部希望这项措施不致引起误会。”

梅列茨科夫向华西列夫斯基报告：“这好像是开始投降了。”

“眼下仅仅是好像。他们还会和我们拖延好长时间呢。部队继续进攻！”

等待的时间确实让人心烦。直到 17 时，方面军司令部才接到关东军司令官的无线电报。山田将军通知说，他已经下令部队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向苏军缴械。侦察兵拿来了日机投下的两个空投信袋，通告停止战斗行动：

- “①关东军已经彻底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被迫投降。
- ②所有部队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停留在原地。
- ③同苏军有接触的部队，应按苏军司令部的指示缴械。
- ④严禁任何破坏。

关东军司令官”

“前沿阵地上的实际情况如何？”华西列夫斯基问梅列茨科夫。

“实际情况是战斗在继续。我刚才得到报告说，虎头要塞对第 35 集团军的战斗队形和乌苏里江的渡口猛烈开火。”

“全明白了。”华西列夫斯基命令作战处长波塔波夫将军，“请记一下给各方面军的命令。”他开始口授：

“由于日军的抵抗已被摧毁，而路况极糟，妨碍我军主力部队在完成任时迅速推进，为了尽快占领长春、沈阳、吉林和哈尔滨，必须使用特别建立的、装备精良的快速支队。应将这些支队以及类似的支队用于完成以后的任务，而无须担心它们和主力部队严重脱节……”

命令向上述各城市以及大连、旅顺投下空降兵。

8 月 19 日，日本第 4 军司令官秦被带到华西列夫斯基处。元帅没有多发议论，径直说道：

“我要求日军司令部命令立即放下武器。”

俘虏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就要困难一些了——他还掌握着很多部队，而且呆在遥远的后方长春市。满洲国的总理张景惠也在那里。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决定派出军使，携带最后通牒去找他们。阿尔乔缅科上校不仅仅是军使，在他后面飞向日本机场的还有大约 500 名空降兵。

机场上乱哄哄，像是一个蚂蚁窝，可是苏联士兵刚在飞行场上出现，人们就都安静下来了。

在警备司令部里迎接军使的是关东军司令部的代表草地大佐，几分钟后关东军副参谋长松冈将军带着几名军官也到了，这时才得知，山田收到了马利诺夫斯基的电报，松冈不停地微笑着，露出他已经残缺不全

的牙齿。

“军使阁下是否愿意休息一下？山田将军先召开一个会，然后就接待你们。”

窗外响起了吉普车的鸣笛声。

“我不愿意！”阿尔乔缅科打断他说，“去长春！”

长春虽然远处后方，可是已经准备进行防御。入城的路口都修了拦阻碉堡，十字路口架设了大炮和机枪。阿尔乔缅科情不自禁地冷冷一笑，看了看自己的五人小队。

关东军司令部正在开会，阿尔乔缅科的到达终止了会议。一个剃光头的上了年纪的将军，身着军礼服，高踞在会议桌的顶端。他就是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大将。他无精打采地问候了这些不速之客，不过阿尔乔缅科并不因此而生气。

“你念一下最后通牒。”他对翻译季塔连科大尉说。

“在前线的所有地段上立即停火，停止抵抗，”山田疲倦地微闭着眼睛，听见季塔连科在念最后通牒，“放下武器，立即让所有部队撤出首都及其附近地区，开到我指定的地域，签署无条件投降书……”

山田非常清楚末日到了，可是武士道的规矩，还有在军队中多年的服役经历不允许他就这样简单地向这一小撮连将军都不是的俄国军官投降。张景惠悄悄走进房间，尴尬地在圆桌边坐下。

“马利诺夫斯基元帅阁下还有什么要求吗？”山田终于开口问道。

“您应当发表广播讲话，号召部队放下武器。”阿尔乔缅科皱起眉头说。他又转向张景惠说：“而您应当对满洲人民讲话。”

“是，是。”日本人点着头，而张景惠站起身来，深深地鞠了个躬。

山田长篇大论地说起武士道的荣誉，要求特殊对待日军官兵，事先宣布停战。阿尔乔缅科不为所动，只是重复一句话：“只能无条件投降！”

值日军官走进办公室才结束了这场争辩。他向山田报告道：

“阁下！大批俄国的重型飞机在歼击机掩护下正在逼近首都。我方的飞机不能升空，机场已被俄国歼击机封锁。”

“军使阁下！”惊吓不已的山田转身问阿尔乔缅科，“我作为部队和你们所在地区的军事长官，想问问您，这是怎么回事？我想，您能解释一下？”

“正是这样！”阿尔乔缅科不动声色地回答说，“这些飞机是我召来的，以便保证谈判的进行。如果我在约定时间内不能向自己的司令部做出肯定的报告，长春市及其郊区将遭到轰炸。”

阿尔乔缅科非常清楚，根本谈不上什么轰炸，可是山田却不由自主

地把俄国军使的声明当成确有其事了。

“上校阁下，”他坐立不安地问道，“还有时间来防止轰炸吗？如果您能控制，我请求您这样做！”

阿尔乔缅科同机场上自己的值班军官取得了联系，用平静的语调命令道：

“立即向运输机发出降落信号，命令轰炸机在城市上空作巡逻飞行，等待我的信号，如果在约定时间内没有我的信号，就执行司令的命令……通话完毕。”阿尔乔缅科大声说。

山田迅速站起身来，解下自己的佩剑，呈递给苏联军使。他部下的佩剑也可当作响。

“佩剑可以留在身边，”阿尔乔缅科说，“请到桌边来。先生们，放下剑，拿起笔来。”

苏联英雄、近卫军少校阿夫拉缅科打来电话，报告说，他的空降兵全部安全着陆，取消了机场警戒并着手解除日军的武装。办公室里一片静寂。山田和张景惠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傍晚时分，关东军司令部楼顶的日本国旗降下了，代之升起的是一面鲜艳的红旗。

三天以后，空降兵在大连和旅顺着陆，一切都按照既定的剧本走了一遍：成千的日军官兵向几个苏联空降兵小组投降。将军们忘记了武士道的神圣规矩，交出了佩剑，然后再领回佩剑，规规矩矩地登上运输机，飞向遥远的西伯利亚战俘营……

关于沈阳的空降兵还要多说两句。

空降兵的突击步枪手出乎意料地降落在日本人所在的地方。日本人不曾料到苏军部队会出现，在机场的办公区的办公桌上还摆着文件，放着一瓶啤酒。

就在我军部队占领沈阳的同一天，方面军的代表立即前往日本人的英美战俘营。这是一次动人的会见。战俘在院子里站好了队，当我军军官们走进战俘营的院子时，队伍顷刻间瓦解了，人们迎着苏联军官跑来，用各种语言喊着问候的话语。

苏军司令部代表普里图拉将军走上临时搭起的讲台，发表了讲话：

“今天早晨，我们的部队占领了沈阳。我奉命告诉你们，从现在起，这座战俘营的所有美国的、英国的以及其他盟国的战俘都自由了。”

被解放的人中爆发出一阵狂热的欢呼，这种热烈的场面很难用文字表述出来。船型帽、手绢一起抛向天空，人们互相亲吻，喜极而泣。“自由”一词被各种语言重复着。几百名美英战俘用俄语狂喊着：“自由，自由，自由！”



普里图拉将军接着说：“我代表苏军司令部向你们祝贺盟军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

又是一阵暴风雨般的欢呼。人们把苏联军官抬起来，一面说着笑话，一面向天上抛。人们欢呼着：

“啊，俄国人是好样的。俄国人真强大。我们是你们的朋友。”

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集会。美国人亚历山大·巴比跑上台阶。他用英语热情地说：

“是俄国军队给我们带来了自由！我们在日本监狱里受了三年半折磨。成千的人死于饥饿和拷打。在这段时间里，只有四个人从战俘营脱逃，可是他们也被日本人抓住而折磨至死。日本政府对我们的侮辱真是一言难尽。我是一名普通的美国士兵，我向我们的俄国战友表达热忱的感激和挚爱。我们谁也忘不了今天这个日子。我们终生都是你们最忠实的朋友，而且这份友谊我们将传给子孙后代。”

从听亚历山大·巴比讲话的人的脸色来看，他确实是代表他们大家在讲话。

我军司令部的代表宣布，日本武装警卫队将被缴械，犯有拷打和侮辱战俘罪行的日本人将被逮捕。他责成美国和英国将军在苏军部队到达以前，暂时管理该营。

沈阳战俘营里军阶最高、年龄最大的是派克将军。他又高又瘦，面色苍白。他的脸色是真正囚徒的脸色——纸白色，脸上布满青筋。他通过译员说，他非常幸运看见了俄国人，他对苏军的飞速前进表示敬佩。

派克将军应邀暂时担任营主任。他对我国军官的信任表示感谢。

战俘营里有英国空军少将莫尔特比，琼斯将军和夏普·切诺维奇将军是美国的军长，弗托菲尔、皮尔斯、方克、奥里克、斯蒂文斯·洛夫·毕比等将军是师长，著名的荷兰新闻记者若埃洛姆是1942年被俘的。他说：

“我也要写你们这些俄国人，你们是来我们监狱的天使！”

苏联代表到达之后半小时，全体日本人面对战俘列好队，放下了武器。美国人和英国人非常有组织地分发了武器，建立了自己的岗哨，取代日本的岗哨。派克将军占据了战俘营主任的办公室，其他盟国的将军都到那儿去开会。

苏联的历史学著作以及远东战斗参加者的回忆录很少讲到占领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战斗。而在解放这些非常遥远的土地时，曾经进行过顽强的战斗，牺牲了我们许多战士。遗憾的是我也不能讲述自己同胞的英雄业绩，因为我的讲述原本就已经够长的了。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战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书的签字仪式。这是



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它标志着持续了6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那天来到“密苏里”战舰上的有麦克阿瑟将军，然后是各盟国代表团，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的军事指挥部的代表，还有为数众多的新闻记者和客人。

在整个仪式的准备完成之后，用小艇载来了日本代表团，共有11人。全体在场的人都一声不响，外务大臣重光和日本参谋总长梅津将军在一些外交和军事官员的陪伴下走到桌旁。日本代表团在战舰上各盟国代表严峻目光的注视下足足站了五分钟。

在庄严的静寂中，麦克阿瑟将军发表了讲话。他强调说：

“我们，主要参战国的代表们，聚集在这里，为了签署一项庄严的协定，有了它和平才能恢复。招致理念和思想对立的那些问题已经在全世界的战场上解决了，因此不再是我们讨论和争辩的题目。”

麦克阿瑟讲完之后，摆摆手让日本代表走到桌边。

重光走得很慢。他尴尬地履行了自己难堪的职责——签上自己的姓名，然后谁也不看就走到一边去了。梅津将军仔细地签了字。

日本人走向自己的位置。

麦克阿瑟走向桌上摊开的卷宗，他邀请两名美国将军——几天前才从日本战俘营获得解放的温赖特和珀西瓦尔陪伴着他。

继麦克阿瑟之后签字的是中国代表，然后是英国海军上将弗雷泽。

苏联代表团是大家注意的中心。在场的人都认为它代表着强大的苏联，而苏联粉碎了法西斯德国之后，又加速了日本的投降。

得到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授权签字的是K. H. 杰列维扬科中将，陪伴他的是H. Ф. 沃罗诺夫空军少将和A. M. 斯捷岑科海军少将。继杰列维扬科将军之后签字的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和新西兰的代表。

投降书签字完成了。签字的各代表团和麦克阿瑟一起到尼米兹海军上将的客厅去了。

日本代表孤零零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有人将放着已签字的投降书的黑色卷宗交给重光。日本人顺着软梯下了船，有一艘小艇在那里等着他们。

* * *

对斯大林心怀恶意的人们断言，在战胜德国之后，斯大林就不再领导武装力量了。事实恰好相反，从上面的讲述可以看出：斯大林参加了三位元帅——华西列夫斯基、马利诺夫斯基和梅列茨科夫筹划和实施远东地区所有战役的工作。

斯大林是战略家，他除去了在东方经常悬挂在我们头顶上的侵略的



达摩克利斯之剑。

斯大林收回了被日本割据的俄罗斯土地——千岛群岛（1875年）和南库页岛（1905年）。

斯大林迫使盟国——美国 and 英国——在克里米亚会议上确认，上述土地“在战胜日本后”“必须无条件地”归属苏联。这一条实现了！

七 斯大林的错误

1945年3月7日，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建议，约·铁托组成了南斯拉夫民主联邦临时人民政府，这个政府在3月份内得到苏联、英国和美国的正式承认。政府的大部分职务（28个中的22个）由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的代表担任：约·铁托任部长会议主席兼国防部长；伊·舒巴希奇任外交部长；部长会议副主席是代表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的爱·卡德尔和代表流亡政府的战前民主党的首领米·格罗尔。南斯拉夫民主联邦政府发表宣言，阐述了自己的施政纲领。

苏联率先——1945年3月12日——任命了驻新政府的大使，同时着重指出今后也将给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以尽可能的援助和支持。

铁托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也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头顶胜利者的光环，身着元帅服访问了其他国家，受到热烈欢迎。

我的英国友人非茨罗伊·马克林是这样写的：“铁托利用自己的出行和回访来讨论双方感兴趣的各种问题并签署协议，并非都要取得莫斯科的赞同。例如，议论过巴尔干联邦的问题。生性多疑的斯大林不喜欢自己附庸国的这种行径……”

的确，国际形势复杂，斯大林认为必须谨慎小心，瞻前顾后，他对于在国际事务中步调不一致总有一种病态的反应。当他认为苏联不得不面对既成事实时，他并不掩饰自己的不满。

例如，8月2日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发表了两国签订互助、友好和合作条约的消息。而且季米特洛夫声称：“这个条约是没有期限的。”

斯大林得知后，给铁托发了一封电报：

“……苏联政府认为，两国政府无视苏联政府的预先警告，在和约未曾生效前就签订了条约，而且是没有期限的条约，是犯了一个错误。苏联政府认为，两国政府仓促行事是帮了英美反动分子的忙，为他们加紧对希腊和土耳其事务的军事干涉、反对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提供了又一个借口……”

为了协调对国际问题的认识，三方决定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莫洛托夫向铁托和季米特洛夫发出邀请，请他们不晚于2月8~10日到达。

铁托没有去莫斯科，借口身体不适。代替他出席是爱·卡德尔、米·吉拉斯和B.波波维奇。从保加利亚来的是格·季米特洛夫、瓦·科拉罗夫和特·科斯托夫。

同斯大林会见是2月10日在他的办公室里进行的，由莫洛托夫主持。他对于促成这次会见的原因作了一般分析，斯大林打断了他，说道：

“不管季米特洛夫说什么，也不管铁托说什么，国外都认为是得到我们准许的。”

季米特洛夫试图解释，说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在布列德并没有公布条约文本，只是在公报里说两国就有必要签订这样的条约达成一致。他又补充说，保加利亚正在经历巨大的经济困难，同其他国家合作就不可能发展。

可是斯大林却对季米特洛夫说：

“您就像一名共青团员似的，跑得太快了。您想让世界大吃一惊，仿佛您仍旧是共产国际的书记。您和南斯拉夫人什么也不告诉我们，我们是靠道听途说才知道的。您让我们面对既成事实！”

卡德尔支持季米特洛夫：

“也许保南条约搞得匆忙了一点，可是它的草案是及时发给了苏联政府的，苏联政府没有提出任何意见，只是建议不要像最初的草案规定的那样，签订‘永久’的条约，而是以20年为期，有权延长（这个建议已经被接受了）。所以我看不出南斯拉夫和苏联的政策有什么分歧。”

斯大林反驳说：

“废话！就是有分歧，而且是重大分歧！关于阿尔巴尼亚您有什么可说的？关于把自己的军队派往阿尔巴尼亚，你们根本没有和我们商量过。”

卡德尔辩解说：

“可是阿尔巴尼亚政府同意了。”

斯大林又一次打断他说：

“事实就是事实。把南斯拉夫的几个师派往阿尔巴尼亚一事，你们没有和我们商量过。这件事可能导致国际局势的严重麻烦。”

作为这次莫斯科会谈的结果，签订了“就对外政策问题进行协商”的协定。

仿佛是什么都谈妥了，可是南斯拉夫客人离去时的情绪，有吉拉斯的话为证：“大清早就把我们带到了弗努科沃机场，没有举行任何送别

仪式就把我们塞进了飞机。”

向铁托通报会谈情况也用的是同样的语调。经常有人挑唆铁托和斯大林发生冲突，而南斯拉夫的这位领袖不仅脾气暴躁，而且非常自负。

后来，到了1974年，有人问铁托说：“哪个决定对你更困难些，是战争年代同希特勒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呢，还是后来由于斯大林的立场而做出的决定？”他承认：“决定开展反对希特勒的斗争并不困难，我们必须采取这个决定。由于斯大林的立场而必须做出的决定要困难得多，因为我是一个守纪律的共产党员—国际主义者，我很难迈出这一步。可是我当时做出了这个义无反顾的决定。这就成了一个转折点，这是反对向斯大林的专制独裁屈服的决定。”

约西普·布罗兹·铁托从1948年3月1日听取从莫斯科返回的南斯拉夫代表汇报的政治局会议起，开始执行这个决定。

铁托对交换意见做了这样的总结：

“南斯拉夫在对外政策方面同苏联没有分歧。问题涉及党的统一。我们党的力量在于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南斯拉夫肯定了自己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俄国人对于自己的作用持另一种看法。应当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问题。是我们正确还是他们正确？我们正确。他们对民族问题的见解和我们不同。如果有损于某种新观念，遵守共产党的纪律就是错误的……我们不是棋盘上的一颗小卒子。只要还不清楚整个形势怎样定型，联邦就不可能实现……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

这次会议的参加者——财政部长、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人民阵线总书记斯·茹约维奇不同意这样的方针，悄悄向苏联驻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大使 A. И. 拉夫连季耶夫报告了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问题的性质。

茹约维奇以后也定期向苏联大使报告铁托和南斯拉夫政府的各种决定；发生的种种事件的实质可以归结为脱离苏联的倾向，甚至是开始贬低苏联。南斯拉夫开始对苏联专家不友好，对他们不信任，甚至限制他们在合作工程中接触技术文献。

斯大林对这些攻击做出了可以预期的强烈反应，他下令从南斯拉夫的黑色冶金部、有色冶金部、化学工业部、卫生部召回苏联专家，甚至召回军事顾问。这就是彻底决裂了。

双方交换过几封信件，不过只是加深了分歧。5月9日，南共中央全会讨论了业已形成的局势，通过了由约·铁托和爱·卡德尔签名的一封信：

“致约·维·斯大林同志和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我们收到了你们1948年5月4日的来信。不消说，这封信也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沉重的印象。它使我们相信，虽然我们力图证明，甚至是用事实证明对我们的种种指责都是出于错误的情报，但我们的努力全都是徒劳无益的……

我们希望解决问题并在实际上证明，对我们的指控是不公正的，就是说，我们正在坚定地建设社会主义，而且仍旧是忠于苏联的，忠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的。未来会如过去已经证明了的的那样证明，我们一定会做到向你们的承诺。”

这次全会批准了调查斯·茹约维奇和安·赫布朗行为委员会的报告，他们两人都被开除出南共中央委员会并被开除出党。南斯拉夫人民议会主席团发布命令，解除斯·茹约维奇的财政部长和安·赫布朗的轻工业部长的职务。

吉拉斯在回忆录里写道：“逮捕斯·茹约维奇和安·赫布朗的问题在中央委员会没有讨论过。是铁托擅自做出的决定。”

冲突演变成了一场大闹剧。

斯大林得知茹约维奇和赫布朗被捕后，于1948年6月9日让莫洛托夫转告铁托下面这些话：

“联共（布）中央获悉，南斯拉夫政府宣布赫布朗和茹约维奇是出卖祖国的叛徒。我们对此是这样理解的：南共中央政治局打算从肉体上消灭他们。联共（布）中央声明，如果南共中央政治局实行自己的这个打算，联共（布）中央将视南共中央政治局为刑事杀人犯。联共（布）中央要求，审理赫布朗和茹约维奇向联共（布）中央提供所谓错误情报一案时，应有联共（布）中央的代表参加。请立即答复。”

南共中央针对这种没有先例的质问，于6月18日向莫斯科发出以下内容的答复：

“南共中央从来不曾打算杀死什么人，包括赫布朗和茹约维奇在内。他们正受到我国政府的调查。南共中央认为联共（布）中央提出的问题是错误的，应义愤填膺地驳斥把我们党的领导人说成是‘刑事杀人犯’的尝试。根据这一点，南共中央认为，联共（布）中央的代表参加审理赫布朗和茹约维奇一案是不可能的。”



为了“教育”南斯拉夫共产党员，斯大林决定召开情报局（它现在取代了共产国际）会议。这次会议于1948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附近召开，议程是“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的形势”。

日丹诺夫在这次会议上的报告是斯大林审定的。其中有一些非常激烈的措辞：“他们的方法来自托洛茨基的武器库”、“在共产党内……可耻的、土耳其的恐怖主义制度”、“我们有证据表明，铁托是外国间谍”。

会议参加者（南斯拉夫的代表缺席）通过的决议要把南斯拉夫逐出社会主义阵营。建议把腐化变质分子从南共中开除出去，提拔忠于马列主义的、健康的新生力量。几乎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支持情报局的决议。南斯拉夫处境孤立。

赫鲁晓夫捏造的、斯大林从来不曾说过的那句话：“只消我动一动小指头，铁托就完蛋了”，就是属于这个时期。

1948年7月21日，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持续了八天）。铁托的报告长达八小时！报告分析了自古以来和俄罗斯的关系史。铁托谈到党时说，党教育人民和党员要热爱苏联，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弱小民族的保卫者，可是他把情报局的决议称为：“骇人听闻的指责！”铁托在报告结尾处还为斯大林欢呼。

与会代表热烈鼓掌，高声喊着：“铁托——斯大林！斯大林——铁托！”

然而实际上两国关系却在继续恶化。在南斯拉夫和苏联的报刊上，彼此进行着粗暴而恶毒的侮辱。南斯拉夫逮捕了同情俄罗斯的人，而苏联则迫害那些不赞成和南斯拉夫断绝关系的人。

总的说来，这场冲突给两国都造成了许多伤害。正如俗话说的，针尖对麦芒。两个国务活动家，斯大林也好，铁托也好，都放纵了自己性格中的坏毛病——自负、不让人，甚至是任性。

同南斯拉夫的这段插曲是斯大林的重大错误之一。我不能用其他的说法，因为客观性不允许我这样做。

八 朱可夫遭贬黜

关于斯大林的不光彩行为已经写得很多了。他的那些行为有时被说成是出于政治上的狡猾，有时则是和对手斗争中的奸诈。这类指责中，大多属于无中生有。它们都是根据“民主派”丑化斯大林的总方针抛出来的。

不过这绝不是说，斯大林不曾有过使他的经历蒙羞的事情，而且由于我已经承诺要写出真实情况，我不禁想到对朱可夫难堪的、甚至难以

解释的处置，而在战争期间斯大林曾经同朱可夫分享过多少艰难和欢乐！

我觉得，这种处置的原因不是出于政治动机，而纯粹是由于某些人挑动的个人的、心理的、情绪上的因素。

斯大林也和大家一样，有他自身的缺点，其中之一就是病态的多疑，这种多疑是在多年来同反对者、同昔日亲密好友的背叛的斗争中形成的。这个病态的缺点就恰好被朱可夫的仇敌利用了。

在和平的岁月里，国家安全委员会总得要用一些大案件来有所表现。从德国传来信息，说是一些将军滥用运出“战利品”的机会来谋取私利。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头目阿巴库莫夫决定亲自处理这些信息。他到了柏林，也确实发现了刑事犯罪，于是开始抓人。

朱可夫对此是这样写的：

“他没有向我报告此行的目的，却开始了激烈的行动。

我得知阿巴库莫夫在逮捕将军和军官之后，下令立即召见我。我提出两个问题：我是总司令，为什么抵达后不来见我？为什么背着作为主管首长的我逮捕我的下属？

他的回答在我看来是不合理的。我命令他：释放所有被捕的将军和军官。本人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如果不执行命令，我就派人押送他回莫斯科去。”

坦率地说，朱可夫对待阿巴库莫夫不仅很严厉，而且非常莽撞。权力无边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首长从来不曾遇到过这样无理的对待。

不难设想，阿巴库莫夫对朱可夫如何怀恨在心！

后来（在法庭上）阿巴库莫夫声称，对朱可夫的种种卑劣行径他都是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做的。不过完全可以认为，被屈辱地赶出柏林是报复的巨大动因。要惩办朱可夫，只凭阿巴库莫夫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不够的，他寻找各种借口使斯大林也参与他的报复行动。

阿巴库莫夫不久就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借口，他利用一件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开展调查的大案来为朱可夫设下圈套。

1946年4月23日，空军主帅、两次苏联英雄亚·亚·诺维科夫被捕了。此前不久被捕的有航空工业部部长阿·伊·沙胡林、空军领导人列平将军和谢列兹尼奥夫将军，还有中央委员会的三名负责干部：希曼诺夫、布德尼科夫、格里戈良。

在苏联军事总检察院，我（1992年）阅读了指控这一批“大暗害分子”的材料。指控的实质是：据说航空工业部生产了一批质量低劣的



飞机，而空军领导部门接收了这些飞机，用于配备空军部队，以致常常发生飞行事故，甚至造成飞行员死亡。

我找到了本案被告中的幸存者尼古拉·巴甫洛维奇·谢列兹尼奥夫中将，他当时任空军装备订货总局局长。他已经不再年轻了，1992年时，他85岁。他在卢比扬卡呆过五年！竟然没有把他送到劳改营去。

我不说我们谈话的全部内容了，那得单独来谈。我弄清的主要一点是：进行暗害活动的指控纯属捏造。

“战争就是战争！那时顾不上细节，主要的是保证作战性能，”谢列兹尼奥夫说，“我是负责接收飞机的，所以每次都登记工厂的缺陷。可是正是最高统帅斯大林，特别是主管航空生产的马林科夫对我们又催又逼，要求不要揪住枝节问题，不要耽误向前线提供飞机。顺便说一句，战争期间记录在案的，由于技术原因，而且是在战时仓促生产的条件下，造成的飞行事故低于同期内容许的损毁‘定额’。由于这样的指标，我们本该受到褒奖，而不是惩罚！……”

我同谢列兹尼奥夫谈话后确信：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在这个案子里是“超额”完成任务了。等轮到他头上，而他也蹲在同一个卢比扬卡的一间囚室里时，阿巴库莫夫也是这样说的。阿巴库莫夫在任国家安全部长时写下的，而且保存至今的有关逮捕和侦查情况的报告中，试图把责任推给斯大林，声称一切都是按斯大林本人的指示做的。

即便逮捕航空人员确实得到了斯大林的批准，那么把朱可夫牵扯进这个案件就是出于阿巴库莫夫的主动和报复心了。

请看空军主帅诺维科夫在审判阿巴库莫夫本人的法庭上讲了些什么。我只引一小段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的笔记；为了简明起见，我略去了涉及航空案件实质的细节，而只选择有关捏造罪名指控朱可夫元帅的情节。

“我因空军案件被捕，而审问的却是其他的事情。”

“我到阿巴库莫夫处不下7次，有时在白天，有时是夜晚，可以从监狱的传唤记录里得到确认。”

“我是他们手中的工具，用制造伪证的办法来搞臭苏联的一些著名人士。我直到很晚的时候才认识到这一点……空军的问题只不过是一个借口。”

“侦查员利哈乔夫说：‘你算个什么元帅，你是恶棍、混蛋。你永远也别想出去……我们要枪毙你……去见鬼吧……我们要把你全家都抓起来。逼你把一切都交待出来，我们全都知道。你说说，你是怎样向朱可夫元帅诉苦的，他也跟你一样，是混

蛋……’”

“从4月22日直到30日，每天都审问，然后从5月4日到8日。”

“我精神上崩溃了，被不公正的指控搞得绝望了，夜里不能睡觉……根本无法入睡，灯光一直照在眼睛上……不单单是审问和精神紧张，还有疲劳过度、冷漠、把什么都看开了，一心只想摆脱——所以才签了字——我胆怯了，意志被摧毁了。把我搞到要自杀的地步。

有时候我什么也不明白……我就像患了谵妄症，胡说一通，某人要加害于某人。”

关于指控朱可夫元帅的声明，诺维科夫向法庭解释说：

“指控朱可夫是出于我的主动？这简直是骇人听闻的假话……我要负责地声明，我没有写过这个声明，是他们把打好的材料拿给我的……

事情是这样的：利哈乔夫把我带到阿巴库莫夫那儿。我不记得文件是谁拿着的……（像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在上面所描写的状况，哪里还谈得到记忆力。——本书作者注）阿巴库莫夫说：你看一下，签个字吧。‘声明’已经打好了……我抗议，可是没有被接受……

后来就逼我……这是在利哈乔夫的办公室里，持续了7~8个小时……

我热得难受，憋闷得慌，泪水和抽搐噎得我开不了口……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份声明。”

指控朱可夫的材料就是这样搞出来的。

最后阿巴库莫夫呈送给斯大林诺维科夫九页纸的“声明”，空军主帅指控朱可夫把制订和实施许多获胜战役的功劳攫为己有，而对最高统帅斯大林极不尊重。

阿巴库莫夫知道，搞出这份“声明”会触怒斯大林的哪些病态情感。

斯大林得到了对朱可夫这样有根有据而且严重的指控，觉得不能擅自决定这位功勋卓著的元帅的命运，他是国防部长，“声明”是写给他的，于是下令召开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

1946年6月1日，最高军事委员会开了会。应邀参加会议的还有苏



联元帅和一些兵种元帅。

斯大林进来时脸色阴沉——即将进行的谈话当然是不愉快的。斯大林的着装也证实了他的情绪恶劣：他没有穿军服，而是一身便服，不带肩章。

斯大林走到军事委员会秘书什捷缅科将军身边，在他前面的桌子上放下一个卷宗，他说道：

“什捷缅科同志，请您把这些文件向我们宣读一下。”

什捷缅科将军打开卷宗，高声朗读起来。这就是诺维科夫的证词。

诺维科夫元帅的“声明”读完后，会场上一片令人窒息的沉默，持续了足有两分钟。首先说话的是斯大林。他建议全体与会者就对朱可夫提出的指控的实质提出意见。

发言的有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格·马·马林科夫和维·米·莫洛托夫。他们两人都努力使与会者相信朱可夫有罪。

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之后讲话的是苏联元帅伊·斯·科涅夫、亚·米·华西列夫斯基和康·康·罗科索夫斯基。他们讲了朱可夫性格中的一些缺点和工作中的错误，同时他们表示坚信，朱可夫不可能搞阴谋。装甲坦克兵元帅帕·谢·雷巴尔科的讲话分外鲜明而有说服力。他最后说：

“斯大林同志！政治局委员同志们！我不相信朱可夫元帅是阴谋家。他有缺点，正如其他任何人一样，可是他爱国，而且在伟大卫国战争的战斗中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

斯大林没有打断任何人的讲话。他建议停止讨论这个问题。然后他走到朱可夫身边说：

“朱可夫同志，您能对我们说些什么呢？”

元帅用坚定的语调回答说：

“斯大林同志，我没有什么好辩解的，我一贯忠诚地为党和祖国服务。我没有参与过任何阴谋活动。我衷心请求查明诺维科夫的证词是在什么情况下得到的。我很了解这些人，和他们在战争的严酷条件下一起工作过，因此我深信，有人强迫他们写这些谎言。”

斯大林平静地听完朱可夫的讲话，盯着朱可夫的眼睛，对他说：

“不过您，朱可夫同志，还是不得不离开莫斯科一段时间。”

军事委员会会议的结果是发表了由斯大林签署的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1946年6月9日第009号命令。

下面引用这个命令的前几段：

“苏联部长会议本年6月3日决议批准最高军事委员会6月1

日关于解除苏联元帅朱可夫陆军总司令职务的建议，同一个决议还解除朱可夫元帅武装力量部副部长的职务。

事情的原委可以归结如下：

原空军司令诺维科夫不久前向政府提交了一份指控朱可夫元帅的声明，其中报告了朱可夫元帅对政府和最高统帅部采取的恶劣和有害的行为。

最高军事委员会于本年6月1日的会议上审查了诺维科夫的声明并查明，虽然政府和最高统帅部给予朱可夫元帅很高的地位，他仍旧感到委屈，表示对政府决定的不满，在下属中散布敌视政府的言论。

朱可夫元帅丧失了起码的谦虚，沉溺于自负的感觉，认为他的功绩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同下属的谈话中，把筹划和实施伟大卫国战争的所有主要战役，甚至连一些同他毫无关系的战役都归功于他自己。

不仅如此，朱可夫元帅不但自己心怀怨恨，还试图把一些心怀不满的、失意的、被解除工作的将领团聚在自己身边，保护他们，从而将自己置于与政府和最高统帅部对立的地位……”

还有两页半纸使用的也是这种指责的语调，命令最后任命朱可夫为敖德萨军区司令。

战友们，尤其是装甲坦克兵元帅帕·谢·雷巴尔科对朱可夫的支持多少让斯大林感到震惊。不过惩治的飞轮已经启动，在中央全会上，朱可夫被清除出苏共中央委员会。

一年以后，一个以国防部长布尔加宁为首的委员会从莫斯科被派往敖德萨，决定进行一次突然的检查，事先不通知任何人。这一天朱可夫在进行野外训练。

委员会并没有发现什么缺点，相反，部队的训练和状况都改善了。可是州委书记基里钦科抱怨元帅不仅在军事问题上，而且在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住房分配等问题上过于独断专行。总之，他太骄傲了，书记恳请将朱可夫调到别处去。

布尔加宁向斯大林详细汇报了委员会检查的结果，他也没有忘记基里钦科的请求。朱可夫看起来是挺委屈的，他甚至没有到车站来迎接委员会（只字未提突然检查的意图）。布尔加宁还补充说：

“同土耳其的国境线就在边上，可别出什么乱子，他要是跑到国外去了，那会怎么样呢？”

阿巴库莫夫也没有睡觉，他向斯大林汇报了元帅夫人有一个据说是



从不离手的“珍宝箱”（后来查明是谎报）。他定期送来窃听元帅住宅内谈话的材料。

斯大林这一次也听凭不怀好意的人摆布。朱可夫被调到远离国境线的地方，任司令部设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乌拉尔二级军区司令。

不过几年以后，斯大林终于所谓良心发现了：朱可夫当选（根据“上头”的建议。除了斯大林，谁也不敢这么做）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0月10日，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元帅又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种种迹象表明，斯大林打算任命朱可夫为国防部长，但由于他的去世而不曾实现。

可是斯大林总算在某种程度上向自己的战友承认了错误，而且为消除自己的不公正做了一些事情。

九 复 兴

斯大林到柏林会见各盟国首脑是乘火车去的。他看见了车窗外满目疮痍的城市，在村子里像烧焦了的没有叶子的树木一样耸立着成千上万个烟囱。

这一切都直观地证实了国家特别委员会^①关于德国侵略者在被他们占领的土地上造成的物质损失的详细报告。

下面只引用这份报告中的几段：

“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完全或部分破坏了600万幢房屋，使2500万人失去栖身之地。遭受最严重破坏的城市中有最大的工业中心和文化中心：斯大林格勒、塞瓦斯托波尔、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教德萨、斯摩棱斯克、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奥廖尔、哈尔科夫、沃罗涅日、顿河畔罗斯托夫等许多城市。

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毁坏了曾经拥有将近400万工人的31850个工业企业；销毁或运走了239000台电动机、175000台金属切削车床。

破坏了65000公里铁路线，4100个铁路车站，36000个邮电局、电话局和其他通信设施。

摧毁或破坏了40000家医院及其他医疗机构，84000所中学、技校、高校、科研院所，43000座公共图书馆。

^① 苏联确定和调查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罪行国家特别委员会。——译者注

掠夺了 98 000 个集体农庄、1 876 个国营农场和 2 890 个机器拖拉机站；宰杀、抢夺或赶到德国去 700 万匹马、1 700 万头牛、2 000 万头猪、2 700 万只羊、11 000 万只鸡。”

这一切都有待恢复。

没有钱，没有建筑材料，几百万最强壮最年轻的建设者牺牲了。而 5 115 709 个从德国战俘营回到祖国的人都受尽了折磨，精神和身体都受了伤害。他们需要得到住所、饮食和医疗的援助。

苏军从德国战俘营解救出来的盟国的公民也需要紧急援助和遣返，他们人数也不少：732 378 人，其中美国人 20 949 名、英国人 23 744 名、法国人 291 903 名、比利时人 32 789 名、荷兰人 30 958 名、卢森堡人 1 308 名、挪威人 1 040 名等等。

斯大林在 1946 年得到一次休假，这是从 1937 年以来的第一次。他乘汽车去了克里米亚。当时还没有现在的公路干线，道路破坏得很厉害，沿途是城市和乡村的断壁残垣、一片废墟和火场的遗迹。

建设的进展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造成的破坏之后一样。为夺取胜利而付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之后的精疲力尽以及巨大的重建工作足以使人心灰意冷、意志消沉。

又是斯大林和党成了一股把全体人民团结起来的强大力量，它召唤苏联各族人民，发动他们，把他们组织起来，让他们去创造史无前例的、新的劳动功勋。我没有能力把握和描述战后恢复国民经济、重建城市、恢复普通的人的生活的过程；虽说我本人也参加了这个伟大的高潮，亲眼看见了一切，可是直到今天也感到惊奇：我们是怎样战胜这一切的！

疲惫的、瘦弱的、食不果腹的人们靠凭证供应的少量食品维持生命。关于购货证有过不少牢骚和怨言，可是这么说的人只是从表面看问题，或者心怀恶意。假如没有这些购货证，没有社会主义的登记和分配原则，饥荒就会置人于死地，死亡的人数就会比战场上还要多。凭证供应虽说数量不多，可是能够得到必需的东西，而且全国都一样，正是靠了它，我们才活过来了。

当然有过供应中断，有过盗窃、欺诈，可是这是个别缺点（应当受到惩罚的缺点），整个说来，国家和人民正是由于坚定的全国供应制度才度过了难关。

我国的领导人规划在新的五年计划中恢复国民经济。

斯大林 1946 年 2 月 9 日向选民发表演说时，号召人民创造劳动功勋。这个号召很像他 1941 年 7 月 3 日的讲话，他当时动员苏联各族人



民起来进行反对德国侵略者的伟大战争。

斯大林在演说中总结了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他说：“战争并不只是一件可诅咒的事情。它同时又是考验和检查人民一切力量的伟大学校……是对我们苏维埃制度，对我们国家，对我们政府以及对我们共产党进行的一次考试……”

他接着说，按照这些指标我们通过了考试，而且战胜了非常强大的敌人。

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和平建设中面临的困难，这难道还用怀疑吗？

斯大林一如既往，讲得很平静，不慌不忙。他的演说很有说服力，我听着（全国都在听广播）他的演说，心头升起一股内在的力量、激情、信心，相信他说的一切都一定会实现。

“新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我国遭受战祸的区域恢复起来，使工农业恢复到战前水平，然后较大地超过这个水平。至于近期就将废除配给制就更不用说了，将来要特别注意扩大日用品生产，用不断降低所有商品价格的办法来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广泛建设各种科研机构，使科学能够发挥它的力量。

我不怀疑，如果我们对我国的科学家们给以应有的帮助，他们在近期就不仅会赶上、而且会超过国外科学的成就。

至于较长时期的计划，党打算掀起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高潮，使我们能够把我国工业水平提高到，譬如说，战前水平的三倍。”^①

今天我重温这些文字时，并没有产生当时直接收听斯大林演说时感受到的那种激动和热情。也许这不仅取决于领袖的说服力和权威，还取决于我们大家都在期待这样的言辞，大家都在希望，都需要这样一股力量——一股在我们看到满目疮痍、哀鸿遍野，而自己又极端疲惫，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还有足够的力量的时候，能够点燃希望，把大家团结起来、鼓动起来的力量。

于是人们相信了斯大林的话，也相信了自己的力量。

作为证明，下面要引用一份很有意思的、客观的、真实的文件。除了日常关于工作进程、人们的情绪和言论的公开报道之外，还要汇集，而且向上报告人们在不必担心由于自己的坦率而可能遭受迫害时，都有什么议论、什么想法。

提供这些最隐秘的想法的来源之一就是人们在最高苏维埃代表选票

^① 《斯大林文集》第474页、第483页。——译者注

上所作的批注。他们走进填票室，到了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可以毫不担心地匿名写下他想写的一切。

下面就是我提到的那种文件的摘录。

**联共（布）莫斯科市委组织指导部
关于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时
选票上批注情况的通报**

1946年2月12日

……还有这样的批注：“我投斯大林同志一票，祝他长寿，造福于人民。”“我投票赞成亲爱的斯大林，赞成美好的未来，赞成人民的幸福。”“光荣属于伟大的斯大林。”“我的一票投给冰清玉洁的人，投给伟大的斯大林。”“全心全意地赞成斯大林同志和致选民信中阐述的中央的纲领。”

用乌克兰文写的批注说：“愿生身的父亲、从德寇的奴役下解放了乌克兰的斯大林同志长寿。我赞成斯大林同志。祝他长寿，愿他英明的目光为我们照亮道路，愿他慈祥而善良的心能够长久跳动，为祖国谋福利。斯大林万岁！”

第44选区（无产阶级区）的一个选民做了下面的批注：“我到过许多国家，非常了解什么叫资产阶级民主。我赞成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俄罗斯人民、苏维埃道德、我们的民主、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斯大林……”

“我高高兴兴地投票赞成马林科夫同志和布尔加宁同志，他们都是斯大林派的共产党员。我爱斯大林同志胜过自己的生命，所以珍惜亲近斯大林同志的一切。我们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了胜利。我们英明的领袖万岁。”

一批军官代表写下这样的批注：“亲爱的斯大林同志，我愿意为您付出的不仅是一票，而且是自己的生命。”

还有对我们党发出的呼吁。一位选民写道：“我是非党人士，可是相信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另一些选民写的是：“我们胜利的组织者——布尔什维克党万岁。我是第一次投票，我赞成共产党员与非党联盟的候选人。”

“我投共产党、人民的幸福和共产主义一票。我欢迎为进一步改善我们生活而奋斗的布尔什维克党。愿党与非党联盟更加巩固！”

“我赞成各族人民友好、平等的国家。请大家爱惜和保护我们苏联各族人民以及全体进步人类的亲密友人、我们伟大的斯大林同

志的健康。”

我要打断这些感情的倾诉（这种倾诉非常之多），再一次请大家注意，这些人是真挚地、发自内心地写下这些话的。没有人强迫他们，也没有人迫使他们。通报里的另一类批注可以证明我的话是可信的：

“我的请求是尽快改善消费品的供应。对衣服、鞋子和内衣的需求是很大的。”“请注意管理机构的成本。管理机构越小，工作就越顺当。”

“我赞成祖国的优秀儿女，同时请求更多地关怀牺牲战士的家庭。我的亲人们，我向你们提出一个请求，请你们多考虑一下改善居住条件。”另一个批注说：“有人到了40岁还不能成家，仅仅因为他们没有住房。”

“让区执委会更多地关心工人的住房、设施和生活问题吧。让他们更接近劳动者。我们这儿离婚的越来越多了——应当巩固家庭，招呼那些道德败坏的人守规矩。”

“应当开展对工作中各种缺点的批评。”“代表同志们，加强同公共饮食业中的盗窃者、破坏社会秩序的人——抢劫犯、流氓以及机构中和生活服务中的裙带关系作斗争。”

“解散集体农庄，把犹太人从商业机构中赶出去。”

“我投赞成票，条件是要到国外去了解其他民族。让我们搞自由选举吧。”

在加里宁选区，打开票箱时发现有这样的批注：“这一出超民主的喜剧——人民的苦难什么时候才结束啊，它比奴役还要坏。”“人民投票时一声不吭，可是他在说：‘多一些衣服、面包、肉类，如果你们做不到，你们就丧失了起码的信任。’”“请开放自由贸易，让大家都过得很好，孩子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挨饿。”“我们这儿只有当权派才生活得很好，普通百姓却奄奄一息。”

一个在战场上失去儿子的母亲写道：“真心诚意地给祖国优秀儿女投下一票，希望他们好好地为人民幸福而工作。别忘了那些在为了全人类幸福的战斗中牺牲了的人遗留下的孤儿寡母。”

恢复工作进展得很艰难，什么都不够，可是斯大林仍旧不断地寻找减轻人民生活负担的可能性。也许是考虑到上面这些信息（选票上的批注），选举以后过了不几天就通过了决定，再次降低物价：面包降低58%，谷物降低53%~63%，面点降低将近50%，通心粉降低55%，

砂糖降低 33%，伏特加和果酒降低 25%。

莫斯科新开了一些面包店，出售 44 种面包和点心。

餐馆和小吃店也根据食品店的价格相应降了价。

下面再引用对这一决定的反应。

量具厂的车工库兹涅佐娃说：“斯大林说话算话，降低了商店的食品价格，很快也会取消购货证了。如果在不久的将来再降低日用品的价格，那我们的生活就会更愉快了。”

还有许多类似的议论，不过也有这样的议论：“降低商店的物价给工人带来的好处不大。反正只有那些高工资的人才能够买东西。”

不管怎么说，供应是改善了，而恢复工作所必需的资金也流进了国库。降价形成了传统。1947 年取消了凭证供应制——而且是在农业遭受了 50 年来最严重干旱的条件下！

恢复工厂、医院、学校、农业的艰巨工作在进行。

但是……在苏联人走向平静、正常的劳动生活的路途上，又第三次出现了这个让人诅咒的“但是”。

斯大林也疲倦了，也上了年纪，在艰难地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他不得不再次研究军事战略问题。而且是全球战略！

十 对左翼的关注

战后斯大林巩固了苏联总的地缘政治地位。他在欧洲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它们按照社会主义的公式（带有某些民族特色）建设自己的生活。

东方——我们国家的左翼——仍旧是敞开的。强大的日军被击败之后，这里出现了有利的局面：中国在开展强大的民族解放运动，它的一部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领导的，民族解放力量的另一个集团则由蒋介石领导。

朝鲜被对立的双方一分为二，北部由共产党人金日成领导。在他的领导下，朝鲜人民为摆脱美国殖民主义者及其南朝鲜仆从而斗争。

美国（苏联的主要对手）现在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巩固自己在欧洲的地位。斯大林决定利用这一点来帮助朝鲜和中国的兄弟党。1949 年 3 月，斯大林告诉波斯克列贝舍夫说：

“应当更深入地了解金日成同志，和他一起解决东方的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邀请金日成到莫斯科来。”

朝鲜领袖很快就和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将军一起来到我国首都。

斯大林立即接见了他们。谈话时决定了对两国都很重要的问题。

这里发表的他们的部分谈话告诉我们，他们谈的是什么问题。

斯大林问：“美国在朝鲜有很多部队吗？”

金日成答：“将近 20 000 名官兵。”

更了解情况的什特科夫订正说：“大约是 15 000 ~ 20 000 人。”

“南朝鲜有没有自己本国的军队？”

金日成回答说：“有，人数大约是 60 000 名。”

斯大林微微一笑，问道：

“你们怕他们吗？”

金日成一本正经地回答说：

“我们不怕他们，不过我们没有军事装备和海军。”

斯大林承诺说：

“这我们可以支援你们。特别是飞机，使美国人不能掌握制空权。除了巩固自己的军队，还要采取措施来削弱敌军。你们这方面做得怎么样？你们是否派遣自己的人打入南朝鲜军队？”

“我们的人在做秘密工作，只是目前还不很积极。”

“做得对，应当谨慎小心。不过也别忘了提高警惕，南边也派人打入你们的军队……”

1949 年 12 月，毛泽东来到莫斯科。他是来参加斯大林 70 寿辰庆典的。这次庆祝活动集聚了许多国家政府和党的负责人，可是斯大林特别关注毛泽东。从斯大林安排毛泽东下榻克里姆林宫就可以看出来，因为没有其他人享受到这样的待遇。最尊贵的客人通常也是住在宾馆里、自己的大使馆或者是苏联的国家别墅里。

对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当然不仅仅是考虑到他的威望，斯大林要同毛泽东决定今后许多年内地缘政治的一些问题。20 世纪两位最重要的政治领袖在这几个星期自然谈论过，讨论过，也就许多问题达成了共识。

除了个别的会见，也有政治局委员出席的正式会见。这方面最可信的是译员费德林（后来是方志学者、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的讲述。这里引用几段他的回忆录。

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会见和谈话通常是在孔采沃的别墅里，时间总是在深夜。一张长桌子的顶端坐着斯大林，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坐在两边。毛泽东和主人并排坐着——如果不算在他们之间坐着的译员。中国同志挨着他们的领袖就座。

桌子总是按就餐布置的：每个座位前都有一套餐具、酒杯、矿泉水、几瓶格鲁吉亚干葡萄酒。没有伏特加。桌子上还有温室蔬菜和

青菜。

大桌子的末端是一张小餐具桌，各人按自己的喜爱挑选食物。室内没有服务员，只有一个女服务员不时送来一道热菜，向主人展示一下，然后放到餐具桌上。酒是每个人自己斟，不过喝得很少，多数人不过是做出喝酒的样子。大家好像都宁愿只是抿一抿。

桌子当中放着一瓶白兰地，到了祝酒的时候，这瓶酒就传一圈。

斯大林通常是从他自己的高脚水晶杯子里啜一两口干葡萄酒，他把放在他右手边的、供他专用的两瓶红白葡萄酒掺在一起喝。

费德林回忆说：“有一次也像通常那样在莫斯科近郊别墅会见时，毛泽东（我就坐在他身边）悄悄问我，为什么斯大林把红白葡萄酒掺和着喝，而其他同志不这样做。我说，我很难回答，最好是问问斯大林本人。可是毛泽东坚决反对，说这样太失礼了。

就在这时响起了斯大林的声音：‘你们嘀嘀咕咕在说什么呢？’

‘毛泽东同志问，为什么您把红白葡萄酒掺和着喝，而其他同志不这样做。’

‘这不过是我的老习惯。每一种葡萄酒，尤其是格鲁吉亚的酒，都有独特的味道和香气。我把两种酒掺和起来，就好像丰富了它的味道，而主要是仿佛用草原的野花编成了一个花束。’”

话题是各种各样的，并没有严格的议程。谈话实际上是在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进行，不过在无拘无束的谈话中，双方就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问题交换了意见。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原则性观点正是这样达成的。

条约各条款的内容则由以阿·伊·米高扬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具体商谈。

时光飞逝。12月过去了，1950年1月也过了，2月的日子——签订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在一次例行会见时，毛泽东请求道：“斯大林同志，我们想在签订条约之后安排一个不大的招待会。”

“这是很自然的。”主人说。

“不过不在我们下榻的克里姆林宫，而在另一个地方，比如说，大都会饭店。”

“为什么不在克里姆林宫呢？”

“是这样的，斯大林同志，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国宴的地方，对于我们一个主权国家来说，不太合适……”

“对，可是我从来不到宾馆或者外国使馆去出席招待会。从来不去……”

“斯大林同志，我们的招待会没有您出席……不，不，简直不能设想。我们请您，恳请您。”毛泽东坚持着。

停顿了一会儿，斯大林没有急于回答。他仿佛在聚精会神地考虑着。毛泽东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等待他的同意。

“好吧，毛泽东同志。既然您希望，我就出席。”斯大林说完就转换了话题。

2月14日，中国主人和客人在预定时刻汇聚在大都会饭店的宴会厅里。

保卫人员建议译员到前厅去迎候斯大林。

不久正门就打开了，斯大林站在门口，仿佛是一张嵌在镜框里的全身相。他迅速地扫了一眼前厅，看见了译员，就不慌不忙地朝他走去，好像他是一个熟悉的坐标。

斯大林走近衣帽间时，开始解开大衣的钮扣，殷勤的衣帽间服务员快步走到他跟前，说：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请允许我来帮您……”

斯大林看了他一眼，彬彬有礼地同他打了招呼，略带戏谑地说：

“谢谢，不过这事好像连我也能做……”

他脱掉大衣，走到衣架前，把大衣挂上，把军帽放在架上，就着镜子照了照，把头发整理一下，对译员说：

“这儿怎么样，人都到齐了吗？”

“是的，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国同志早就到了，都在等您呢。”

“既然是这样，那就带我进去吧。”

宴会厅用雷鸣般的掌声和响亮的欢呼来迎接他。这是全体欢乐的时刻——无论是阴郁的悲观主义者，还是谨小慎微的乐观主义者。

斯大林稍稍停住脚步，看了看大厅里的人群。他向站在“主席团”的长桌边上的毛泽东走去。他们握了手，彼此问候，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中国同志由周恩来率领着走到斯大林身边，同他握手致意。大家都很兴奋。稍远一些站着他的班子：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什维尔尼克、苏斯洛夫、布尔加宁。

开始了干杯、祝酒。

大家都焦急地等待着最主要的节目——斯大林讲话。只有他才能说出大家内心深处的、表现时代真理和历史事件深刻含义的话语。这个时刻到来了。

他提议为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就干杯。

关于朝鲜，毛泽东同意用军事手段促成这个国家南北两部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



斯大林履行了对金日成的承诺，朝鲜军队得到了军事技术装备方面的巨大援助。北朝鲜人的力量有了巨大增长，以至他们有时，像俗话说的那样，耀武扬威，在前线表现出一些积极行动。

斯大林明白，一旦发生战斗行动，美国人就会立即把自己的力量投到东方，这只能使朝鲜人自己的斗争复杂化，而无助于实现巩固东翼的战略。于是他给什特科夫发去了一封警告性电报：“曾经禁止过您不经中央同意就向北朝鲜政府建议对南朝鲜人采取积极行动……您必须做出解释……”

然而事态并不总是如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发展。

1950年6月25日清晨，平壤电台宣布，“南朝鲜傀儡政府的军队突然进攻北朝鲜的领土……敌人入侵的深度达到1~2公里。”

可是以什特科夫将军为首的我国顾问在军事训练方面搞得更好。南朝鲜的屏护队被扫除了，北朝鲜人迅速而有组织地朝对马海峡冲去。美国人暂时还只能用猛烈的空袭来还击，并从日本向朝鲜半岛调遣部队。

斯大林警告过，苏联公民不得参加军事行动。可是金日成希望尽快扩大战果，于是请求什特科夫把我们的军官直接派到进攻的朝鲜部队中去。什特科夫一时冲动就答应了，而且向中央提出请求。

斯大林用他一贯的风格立即做出回答：

“您错了，不经请示我们就答应向朝鲜人派出顾问。您必须记住，您是苏联政府，而不是朝鲜政府的代表。”

我方顾问应按所需人数，以《真理报》记者的身份，着便服派往方面军和军队集群的司令部。您个人应当负责不使他们被俘。

冯希

（这是斯大林的化名）”

美军司令部越过大洋，派出了得到海空军加强的远征军。美军部队得到占绝对优势的强大海军和空军的支援，压倒了北朝鲜人，攻到了他们的土地上，而且向北方急速推进。战争逼近了苏联和中国的边境。

怎么办？把我们的部队投入朝鲜？——这又将是一场战争。

斯大林决定让中国把他们的军队派到朝鲜去。将近一年以前双方就曾经达成了原则性协议，不过现在情况变了……斯大林坚持，而他的威望非常高，毛泽东不能拒绝。斯大林终于在10月13日通知：

“平壤 什特科夫转金日成同志

刚收到毛泽东的电报，他通知我们，中共中央再次讨论了局势，仍旧决定向朝鲜同志提供军事援助。

冯希”

中朝军队共同努力把美军赶回到北南边界上。战线在这里稳定下来，开始了旷日持久的阵地战。

强大的美国空军毫不留情地摧毁北朝鲜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经过了海上和空中的反复狂轰滥炸之后，朝鲜的所有城市，连最小的城市在内，都被彻底毁灭了，变成一片废墟。

这时斯大林采取了一个重要决策：在靠近朝鲜的中国领土上设置机场，部署了几个苏联空军师。飞行员都身着中国军装，飞机上画的是中国标志。斯大林严令绝对禁止我军飞机越过战线，排除我军飞行员被俘的任何可能性。就这么办了：在北朝鲜的空战中，我军飞行员击落了几百架美军飞机，自己也损失了319架。可是没有一个飞行员被俘！

还在斯大林生前就开始了朝鲜人之间的停战谈判，他逝世后不久，实现了停火。这样一来，朝鲜和中国有效地巩固了自己的国际地位，开始和平地建设摆脱了占领者的、自由的新生活。

这两个国家是可靠的友好邻邦。斯大林达到了目的——他牢牢地，仿佛是永久地巩固了自己国家的左翼。

然而只不过是“仿佛”而已。赫鲁晓夫上了台，他使斯大林的种种努力化为乌有，使苏联同中国发生争吵，出卖了朝鲜人民，不履行早已达成的协议。

十一 探索新战略

1946年春季，英国前首相访问了美国。他在富尔顿威斯敏斯特学院（密苏里州）发表演说时，强调他只代表自己，而不代表任何官方机构。可是丘吉尔的讲话并不是一次例行讲课，也不是一次忆旧的晚会，这是一个纲领性的讲话，它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拟定了以后若干年的政策。难怪美国总统杜鲁门花费了不少时间，不惜行程千里去聆听丘吉尔的演说。如果剥去丘吉尔讲话的外交辞令和伪装，他讲话的实质就是建议创建一个“各英语民族的兄弟联盟”——也就是最货真价实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军事同盟。

英美军事同盟是针对谁的呢？丘吉尔指的绝对准确，他声称，铁幕已经把欧洲大陆一分为二。“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的古



老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丘吉尔接着描绘了一幅极其危险的前景：“没有人知道，苏俄及其共产主义国际组织打算在最近的将来干些什么以及它们扩张倾向的止境在哪里，如果还有止境的话……”

丘吉尔建议赶快建立英美军事同盟，因为“……在远离俄国边界，遍布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里，共产党第五纵队已经建立。它绝对服从来自共产主义中心的指令，完全协调地工作着”。

为了公正，我们必须指出：丘吉尔的观察力是很敏锐的，不久前公布的、苏共为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拨付活动经费的文件证实了这一点。

美国总统杜鲁门和英国政府实际上采纳了丘吉尔在富尔顿阐述的纲领。

苏联被战争折磨得筋疲力尽，它没有进行新战争的经济实力，而美国拥有原子弹——这就是一股推动力量，它鼓舞着美英军事同盟尽快（在还不算晚的时候！）利用有利条件，“在东欧各国和苏联的土地上，以大无畏的声调宣扬自由人权的原则”。

苏联领导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认为：共产主义在全球的传播不是靠武力，而是由历史决定了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种老朽的、陈旧的制度注定要灭亡。苏共正式的公开宣传就是这样说的，而在地下，党则向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或者如丘吉尔的叫法，自己的“第五纵队”不断输送理论和经费来加速这个历史进程。

总之，两种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都提出了控制世界的任务。社会主义制度不使用武力——“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缺乏把大家团结起来的意识形态，决定趁着为时不晚，用武力消灭社会主义阵营。双方都想压倒对方，拼命叫嚷自己热爱和平，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花去了不少精力和资金。

丘吉尔的演说在新闻界引发了一场大喧嚣，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和评价。斯大林读了丘吉尔演说的全文。情报部门关注了这件事。同原盟国的关系如此急剧地尖锐化让斯大林产生了什么想法呢？

丘吉尔的讲话非常重要，因此斯大林立即做出了反应。大家知道，斯大林很少接受采访，而这一次却只过了一星期就有了回音。

1946年3月13日，《真理报》的一名记者请斯大林（毫无疑问是按他本人的指示）“说明与丘吉尔演说相关的一些问题”。

世界进入了原子时代。人类眼看就要遭遇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些年来斯大林已经成了一个经验丰富的战略家、外交家、国务和党务活动家。他仔细分析了丘吉尔的纲领性声明，在答记者问中实际上对国际新



形势和英美同盟做出了评价。这是斯大林对以后许多年的战略遗嘱。他当时还没有料到自己的逝世（而他只能再活7年了），他大约是准备自来实现这个战略的。而我也相信，假如他活着，历史，特别是我们国家的命运就会完全不同。当然也就不会发生我们今天看到和经历的一切。

我在大段引用（只能如此）斯大林对《真理报》记者的回答之前，要指出的是：所有的讲话、演说、文章，也包括这次的答记者问在内，斯大林都是自己准备的，没有借助顾问或者助手，他们只是提供一些参考资料。

答记者问发表于1946年3月14日。

问：是否可以认为，丘吉尔先生的演说会损害和平和安全的事业？

答：无疑是的。实际上，丘吉尔先生现在是站在战争挑拨者的立场上，而且丘吉尔先生在这里并不是孤立的，他不仅在英国有朋友，而且在美国也有朋友。

应当指出，丘吉尔先生和他的朋友在这方面非常像希特勒及其同伴。希特勒干他发动战争的勾当，是从散布种族论开始的，他宣布只有讲德语的人才是最优秀的民族；丘吉尔先生干他发动战争的勾当，也是从散布种族论开始的，他硬说只有讲英语的民族才是最优秀的民族，负有决定世界命运的使命。德国的种族论使希特勒及其同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德国人是惟一最优秀的民族，他们应当统治其他民族；英国的种族论也会使丘吉尔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讲英语的民族是惟一最优秀的民族，应当统治世界上的其他民族。

实际上，丘吉尔先生和他在英国和美国的朋友，向不讲英语的民族提出了类似最后通牒的东西：自愿承认我们的统治吧，只有这样才能万事大吉，否则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各民族在五年残酷的战争中流血牺牲，是为了本国的自由和独立，而不是为了以丘吉尔之流的统治来代替希特勒之流的统治。因此，完全可以设想，那些不讲英语而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民族，是不会同意接受新的奴隶制度的。

丘吉尔先生的悲剧就在于，他这个死硬派托利党人不懂得这一普遍而明显的真理。

毫无疑问，丘吉尔先生的方针是进行战争的方针，即号召同苏联开战。同样明显的是，丘吉尔先生的这种方针是同现有的英苏同

盟条约不相容的……

问：在丘吉尔先生的演说中，有一部分是攻击那些和我国相邻的欧洲国家的民主制度，批评这些国家与苏联之间建立的睦邻关系的，您怎样评价丘吉尔先生演说的这一部分呢？

答：丘吉尔先生演说的这一部分，是诽谤成分、粗鲁和毫无分寸的成分混合起来的。

丘吉尔先生硬说，“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这些著名的城市 and 这些城市区域的居民，都是处于苏联势力范围以内，并且他们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被置于苏联的影响之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服从于日益增强的莫斯科的控制。”丘吉尔先生把这一切说成是苏联无限制的“扩张倾向”。

用不着特别费力，就可以说明丘吉尔先生在这里是蛮横无礼地诽谤莫斯科和上述苏联邻邦。

第一，说维也纳和柏林完全受苏联的控制，这是十分荒谬的，在维也纳和柏林都设有四国代表组成的盟国管制委员会，苏联只占四分之一的票数。有时有些人不能不造谣诽谤，可是总应当有个限度。

第二，不要忘记以下的情况：德国人入侵苏联是经过芬兰、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德国人所以能够经过这些国家侵入苏联，是因为这些国家当时存在着敌视苏联的政府……苏联为了保证自己将来的安全，力求在这些国家内能有对于苏联抱善意态度的政府，试问，这有什么奇怪呢？假使没有发疯的话，那怎么会把苏联这些和平的愿望看作是扩张倾向呢？……

丘吉尔先生不满意波兰使自己的政策转变到与苏联友好和建立同盟关系方面去……波兰，现在的民主波兰再也不愿成为外国人手里的玩物。我觉得正是这一情况使得丘吉尔先生大发脾气，使得他粗鲁地、毫无分寸地攻击波兰。不让他再坐收渔利了，这可不是开玩笑……

当丘吉尔先生谈到共产党的影响在东欧日益增长时，他是在接近真理。可是还须指出，他说的不完全准确。共产党的影响不仅在东欧增长起来，而且几乎在欧洲一切以前被法西斯主义统治过的国家（意大利、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芬兰），或者被德国、意大利、匈牙利侵占的国家（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丹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希腊、苏联等），都增长起来了。

不能认为共产党人的影响的增长是偶然的，这完全是一种合乎规律的现象。共产党人的影响之所以增长，是因为在法西斯主义统治欧洲的艰难年代里，共产党人是反对法西斯制度、争取各国人民自由的可靠的、勇敢的、奋不顾身的战士……共产党人是完全值得人民信任的。共产党人在欧洲的影响，就是这样增长起来的。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这样。

当然丘吉尔先生不喜欢事情这样发展，他正在敲响警钟，诉诸武力。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也不喜欢在俄国出现苏维埃制度，他当时也曾经敲过警钟，组织过“14国”讨伐俄国的进军，目的是想使历史车轮往后倒退。但是，结果是历史比丘吉尔的干涉更强大有力，丘吉尔先生的唐·吉珂德式的行为，使他当时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我不知道，丘吉尔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否能够组织新的进军来讨伐“东欧”。但是，如果他们能够组织起来——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千百万“普通人”都在保卫和平事业——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将像26年前一样被击败。^①

当然，无论是斯大林，还是他领导下的共产主义制度并不准备“自愿投降”，于是……开始了战争。这就是那场第三次世界大战。关于这场战争，人们今天有不同的说法：一些人说已经打完了，另一些人说还在打，还有人说眼看着就要爆发。我倾向于认为，当英美同盟宣布开战时，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已经开始了。战争中出现了新战略，它成了这场战争的主要内容。今天我们在我国看到的、经历的就是这场战争的一个阶段。

丘吉尔去催促杜鲁门显得有点多余，因为早在1945年9月，即在总统签署广泛传播的波茨坦会议关于和苏联友好并共同采取措施使德国非军国主义化、巩固和平的各种文件之后一个月，总统本人就领导了新的原子弹屠杀的准备工作。

美国已经拟定了一份备忘录（1945年9月4日第329号），其中规定：“在苏联及其控制的土地上选择大约20个适合施行原子弹战略轰炸的最重要目标。”

国家安全委员会1948年3月7日的备忘录也十分明确而肯定地说，所指的正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粉碎由苏联领导的世界共产主义的势力对于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采取防御政策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因

① 《斯大林文集》第497~502页。——译者注

此，美国应当承担起组织全球反攻的领导责任……”

美国为了实现这个全球纲领先后（随着原子弹数量的增加）制定了好几个消灭苏联的计划：“烧灼—1947”、“游击队员—1948”、“Cronkshaft”、“半月”、“履带—1948”、“海洛因”、“Ofteks—1949”等。还有1950年制定的、如今已广为人知的“扣球”计划。

考虑到1941年的惨痛经验，斯大林非常注意情报部门的材料，关注美国军方领导人的观点和计划。下面将要谈到的一切，斯大林都是及时得知的。

他拥有（我和读者今天也有了这种可能性）非常重要的文件——美国对苏联的作战计划——“扣球”计划。就像当年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计划规定了战争分几个阶段一样，“扣球”计划也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用300颗原子弹突然袭击苏联的大城市：莫斯科、高尔基、古比雪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萨拉托夫、喀山、列宁格勒、巴库、塔什干、车里雅宾斯克、下塔吉尔、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彼尔姆、第比利斯、新库兹涅茨克、格罗兹尼、伊尔库茨克、雅罗斯拉夫尔等——共计70座大城市。除此之外，战略轰炸机还要对100座城市投下29000吨炸弹。这次突击应当摧毁苏联85%的工业。

第二阶段：以250个师的兵力，得到继续进行轰炸的7400架飞机和运送登陆兵的750多艘战舰的支援后，入侵苏联及其盟国的领土。

第三阶段：用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各国的武装力量夺取苏联及其盟国的领土。第三阶段强调：“本战局的重点是从肉体上消灭敌人。”

第四阶段：占领苏联领土，将苏联一分为四，在前苏联及其欧洲盟国的要害城市部署美军部队。

斯大林逝世时，苏联和美国正以前所未见的规模展开军备竞赛。在双方战略家看来，原子武器以及将原子武器运送到潜在敌人的领土上的运载工具的数量和质量，不仅将决定战争的结局，而且将决定两种对立的政治制度之一的存亡。

斯大林辞世时，我国及其武装力量和美国是旗鼓相当的，他创造的原子潜力的储备和质量使我国既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也足以进行回击。

然而苏联进行的原子弹（后来是氢弹）试验，特别是制成了洲际导弹表明，美国人不可能实施自己的计划而不受到惩罚。美国人明白了这一点，并因此而改变了战略。可以作证的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48年8月18日通过的20/1号指令《美国对俄作战的目标》。下面是这份文件的摘录。

“为了目前开展的政治战，政府不得不现在，在和平时期，就拟定对付俄国的更为确定的战斗目标。

我们对俄国的主要目标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两点：

- (a) 将莫斯科的实力和影响削弱至最低限度；
- (b) 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根本改变俄罗斯现任政府执行的外交政策。

我们为使莫斯科接受我们的纲领而做的努力等于是宣称：我们的目的是推翻苏维埃政权。按照这个观点，可以说，不进行战争是不可能达到这些目标的，因此我们也等于承认：我们对苏联的最终目标是，开战并用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

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达到并保持苏联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精神上弱于处在它控制范围以外的外部势力。

我们的出发点首先是：完全占领苏联全部领土并在其上建立我们的军事管制制度对我们并不是有利的，也不是切实可行的。这既是由于领土辽阔，也因为人口众多……换句话说，不应当指望在俄国领土上完全实现我们的意志，犹如我们曾经试图在德国和日本做过的那样。我们必须明白，最终的解决应当是政治的解决。

那么，对于因为战争而在俄国部分或全部领土上可能出现的任何非共产主义政权，我们应当寻求什么目标呢？应当着力强调指出，不论任何一个非共产主义制度的思想基础如何，不论它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口头上赞扬民主和自由主义，我们必须实现根据上述要求得出的我们的目标。换句话说，我们应当创造一种自动的保证，使非共产主义的、名义上和我们友好的制度：

- (a) 不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 (b) 经济上强烈地依赖外部世界；
- (c) 对于主要的少数民族不拥有重大的权力；
- (d) 不建立类似铁幕那样的东西。

如果这样的制度表示与共产主义为敌，而对我们友好，我们就必须注意不用侮辱或轻蔑的办法把这些条件强加给它。不过我们有责任千方百计地使它接受这些条件以保卫我们的利益……我们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避免在苏维埃制度垮台以后，为决定由谁来管理俄罗斯而承担责任。对于我们而言，最好的出路是允许全体流亡在外的人尽快回到俄罗斯，并尽我们的力量使他们在从政方面获得大体相等的权利……”

怎样实现这些庞大的计划呢？实现计划需要怎样的策略呢？关于这

一点，“冷战”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之一阿伦·杜勒斯有过非常形象、通俗，而且简直是厚颜无耻的坦率说明。应当客观地说，他极其生动的预言在随后的10年中完全实现了：

“战争一结束，一切都好歹能够解决，能够安顿下来。我们就抛出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的全部黄金和物质力量来愚弄人，欺骗人……人的头脑，人的意识是善于适应变化的。我们在那儿播下了混乱，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把他们的价值观换成了虚假的价值观，而且迫使他们相信这些虚假的价值观。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将在俄罗斯找到自己的同伙、自己的盟友。一出规模庞大的悲剧——最不肯屈服的民族的死亡、它的觉醒的彻底而不可逆转的熄灭——就会一幕一幕地演出……”

比如说，我们逐步从文学艺术中抽去它们的社会本质，使艺术家们不再愿意描绘……研究在人民大众的深层次中发生的那些进程。文学、戏剧、电影都将描写和歌颂人的最卑劣的情感……我们将全力支持和抬高那些向人们灌输对性、暴力、残忍行为、叛变的崇拜——总之，崇拜各种道德沦丧的所谓艺术家……我们将在国家管理中制造混乱和纷扰。我们将令人难以觉察而又积极地不断促进官吏的蛮横专制、贪污受贿和丧失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将被说成是美德……诚实和正派将遭到嘲笑，不被任何人看重，而变成旧时代的残余。粗野和放肆、谎言和欺骗、酗酒和吸毒、彼此之间都怀着动物的恐惧、肆无忌惮、叛变……各民族之间的民族主义和敌视，首先是对俄罗斯民族的敌视和仇恨——这一切都会像罌粟花一样绽放……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极少数的人能够识破，甚至懂得正在发生的事情。不过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状态，把他们变成笑料，设法诽谤他们，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我们要挖出精神的根源，丑化并消灭精神道德的基础。我们要从儿童时代、少年时代就着手抓住人，主要的赌注要下在青年身上，要使他们堕落、腐化、道德败坏。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恬不知耻的人、卑劣的人、世界主义者。”

不难理解，实现这样一个奸猾的纲领需要依仗“第五纵队”和有反苏维埃情绪的本土居民。而指令加以巧妙伪装的主要突击力量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必须使俄国“对于主要的少数民族不拥有权力”。那么我国“主要的少数民族”是什么人呢？大约就是那些现在希望在护照中不指明民族属性的人，那些希望不被指明为瓦解俄罗斯的“主要力

量”的人，那些力求不怀疑确定这股“主要力量”作用正确的人。我再提醒大家注意指令中两行简短而十分重要的文字：“……允许全体流亡在外的人尽快回到俄罗斯，并尽我们的力量使他们在从政方面获得大体相等的权利……”

什么人从苏联大量移居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然后又大量（按前面引用过的文字）返回俄罗斯呢，我想，不必指明了。我只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许多返回的人已经具有了双重国籍——有备无患，为了保护自己——这就是说，他们知道他们的事情并不怎么光彩，所以或许需要逃避法庭的审判和人民的愤怒。

……这一次领导“冷战”的是专业人士：政府、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的政治活动家，各种形式传媒的老板。

斯大林去世后的事态发展表明：我国的新领导人（着便服的战略家）不懂得潜在敌人的图谋。勃列日涅夫及其亲信继续军备竞赛，破坏了国家的经济，使人民的物质状况恶化，招致了人民的不满，从而在同日趋繁荣的资本主义进行的积极斗争中，丧失了抵抗力。“活尸”契尔年科对国家的命运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尤里·安德罗波夫虽然认识到了许多问题并打算组织政治防御，然而在国内当家作主的已经是“权势的代理人”了。这些人感到安德罗波夫是一个危险的对手，给他安排了不治之症。赫鲁晓夫，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打着争取和平的口号，使武装力量完全萎缩了，为美国广泛的政治侵略和思想占领苏联打开了种种渠道。

由斯大林及其战友们，还有苏联人民创建起来的一个伟大的强国苏联，在历史范围内存在了不算长的70年，就可悲地结束了。

十二 斯大林殒命

我不能把这一章称为“斯大林之死”，因为死亡通常是在疾病之后，由于年老或是其他原因。据我掌握的文件和见证人的叙述，根据这次可悲的弃世之前的情况来看，斯大林的逝世不是正常的结局。尽管斯大林的健康在战争期间由于精神上 and 体力上的超负荷而受到严重损害，衰老逐渐明显而且突出。他工作能力下降始于1950年。根据波斯克列贝舍夫的接待来访者日志记载，1947年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工作136天；1948年122天；1949年113天；1950年73天。从1951年起工作日的数量更为减少。下面是1951年按月份的统计：1月10天，2月6天，3月7天，4月8天，5月5天，6月3天，7月5天，8月4天。1951年8月10日~1952年2月11日是半年休假。

不过这并不是说斯大林完全脱离了工作，他只不过是平常来办公室，可是继续在孔采沃和索契的别墅里接待我国的和外国的来访者。

从1950年4月起，斯大林花了许多时间研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经常接见学者，进行讨论，向政治经济学的大师们——谢皮洛夫、列昂季耶夫、奥斯特罗维佳诺夫、尤金等提出建议。

编写小组的领导人、受命执笔的是谢皮洛夫。他在进入中央工作之前，是一个专业学者。我和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相知多年，他对我讲过教科书的编写情况，对斯大林在经济问题上的真知灼见深表敬佩。斯大林两次读过学者们的草稿，退还给他们修改时，稿子上写了许多原则性的意见和更正。

作为这份巨大工作的结果，斯大林自己撰写了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夕出版的《苏联经济问题》^①一书。

所有熟悉斯大林的人都指出，他不仅日渐衰老，而且越来越多疑。斯大林已经病了，可是他躲避医生，对他们不信任。而斯大林的战友们仍然相信，斯大林不是死于疾病，而是由于一些预谋的影响而丧生。他们甚至明确地指出，是谁施加的影响。

可是，我们还是一一道来。首先就应当搞清楚，斯大林的死对谁是利害攸关的。

许多接近斯大林的人都说，有利害关系的人是拉夫连季·贝利亚。为什么？因为在贝利亚之前担任内务人民委员或部长（克格勃）的人全都据说是由于知道得太多而被处决了。贝利亚有根据认为现在轮到他了。他的确不仅仅知道很多事情，而且积累了政治局委员，其中也包括斯大林的“黑材料”。

贝利亚掌握着实权，甚至可能比斯大林的权力还要大。只要他说一句话，有人就会送命。斯大林当然知道这一点，他大约决定要削减一点这个同乡的权力，这个同乡是他作为忠诚可靠的仆人从格鲁吉亚召到莫斯科来的。

无缘无故就把贝利亚赶走（削减权力）是不可能的，因此当所谓“米格列尔人案件”出现时（顺便说说，这个案子是马林科夫搞的，起初贝利亚本人也支持处置他的这些同乡，因为他们对他太了解了），斯大林决定利用这个机会。

他召来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似乎是想了解一下米格列尔人的案件是怎么回事。

阿巴库莫夫讲了他知道的情况。这时斯大林仿佛无意地说了一句：

^① 原文如此。应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译者注

“你找一找最大的米格列尔人……”

阿巴库莫夫当然是一个机灵人，他什么都明白了。不过他认为现在应该设身处地地为自己想一想：怎么办？斯大林自然拥有无可争辩的权力，可是领袖已经老了，他正在失去这个权力，脱离工作，他疲倦了；而贝利亚正是年富力强，在政治局里他也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人人都在他面前发抖。

阿巴库莫夫看来是决定把宝押在贝利亚身上。后来的事态表明，阿巴库莫夫的这个决定葬送了他自己、贝利亚和斯大林。在这场搏斗中，每个人的结局都只有一个：死亡！

我明白，我这样说是很冒险的，可是我根据上述三个“必死无疑的人”的具体行动来演示一下，我这样推测是合理的……

阿巴库莫夫把斯大林的“暗示”悄悄地或者直截了当地告诉了贝利亚。贝利亚明白，在“米格列尔人案件”中，他被指定扮演“大米格列尔人”的角色并承担由此而产生的处决的后果。

斯大林、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都悄悄地开始采取措施来挽救自己，而消灭那个对自己有致命威胁的人。

1951年底，斯大林开始怀疑阿巴库莫夫在耍两面派，于是下令逮捕他。命令得到了执行。

很快就被捕的人有苏联国家全部重案侦查处处长 A. 列昂诺夫少将，三名副处长 M. 利哈乔夫上校，B. 科马罗夫上校和 Л. 施瓦茨曼上校以及国家全部秘书处处长 И. 切尔诺夫上校，副处长 Я. 布罗维尔曼上校。从起诉书的写法可以看出，他们是以阿巴库莫夫为首的犯罪集团，从事敌视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活动。借口是 M. 留明写给斯大林的一封信，留明在信中指控阿巴库莫夫背叛。

M. 留明得到提升，被任命为侦查处处长和国家全部副部长（不过，10个月后他也进了监狱）。

为了保护自己，斯大林决定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更新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人选，摆脱某些令他生疑的旧领导人。

1952年10月5~14日举行了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做总结报告的是马林科夫，他总结了自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以来13年内党的工作。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指令得到批准，联共（布）更名为苏共。

斯大林在10月14日作了简短的讲话，主要谈国际问题。领袖又一次表现了他宏大的战略思维和预见性。他仿佛预言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会发生的事情：

“从前，资产阶级敢于实行自由主义，维护资产阶级民主自由，

从而在人民中间为自己树立了声望。现在，连自由主义的影子也没有了。所谓‘个人自由’已经不再存在了——现在，仅仅那些拥有资本的人才被承认有个人权利，而其他的一切公民则被当作只适于供剥削的人料。人人平等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被践踏了，代替它的是少数剥削者享有充分权利而占公民大多数的被剥削者毫无权利的原则。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旗帜被抛弃了。我认为你们，共产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政党的代表们，必须举起这面旗帜，打着这面旗帜前进，如果你们想把大多数人民集合在自己周围的话。除了你们以外，再也没有人能举起这面旗帜。

从前，资产阶级被当作民族的领袖，它维护民族的权利和独立，被看得‘高于一切’。现在，连‘民族原则’的影子也没有了。现在，资产阶级出卖民族的权利和独立来换取美元，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旗帜已经被抛弃了。毫无疑问，你们，共产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政党的代表们，必须举起这面旗帜，打着这面旗帜前进，如果你们想成为本国的爱国者的话，如果你们想成为自己民族的领导力量的话。除了你们以外，再也没有人能举起这面旗帜。

这就是目前的情况。”^①

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党中央委员会。根据斯大林的提议，中央委员会扩大了一倍——选出了125名中央委员和111名候补委员。

列宁当初为了摆脱党的领导层中的机会主义分子，曾经给中央委员会注入了新的力量。

斯大林在1952年10月16日的中央全会上，向中央委员们说明了为什么必须更新政治局的组成人员〔顺便说说，斯大林在这次全会上极其重要的讲话没有发表过，因为它有损于老政治局委员们的声望。斯大林去世后，他们又重新获得了自己早先的形象（今天所说的），而希望忘掉斯大林揭露性的讲话〕。

由于斯大林的这篇讲话多年来一直没有人提到过（甚至没有速记记录），我在下面按照列·尼·叶夫列莫夫做的记录引用时，几乎没有做删节。此外，我还引用参加了代表大会的作家西蒙诺夫很有意思的评论。我认为，极其重要的不单单是斯大林讲的内容，而且还有他是怎样讲的以及在场人士的反应。

全会持续了将近两小时。斯大林的讲话大致占了一个半小时。

^① 《斯大林文集》第677-678页。——译者注



西蒙诺夫关于这次讲话是这样写的：

“他讲话自始至终一直很严厉，没有幽默，在他面前的桌上也没有放纸。他讲话时一直目不转睛地、死死地，有点呆滞地盯着全场，好像是要看透坐在他前面和身后的这些人在想些什么。

他的语调，他两眼盯着全场所讲的话——这一切使所有在座的人神态木然。”

下面是斯大林的讲话：

“现在我们开完了党的代表大会。会开得很好，许多人可能会觉得，我们有了完全的统一。可是我们没有这样的统一。有些人表示不同意我们的决议。

有人说，我们为什么要大大地扩大中央委员会呢？可是必须给中央委员会注入新的力量，这难道还不清楚吗？我们这些老头子，一个个都会死去，但是应当想一想，我们要把我们伟大事业的接力棒交给谁，交到什么人的手里，由谁来举着它继续前进？为此需要更年轻的、忠诚的人，需要政治活动家。而这是不是说，要培养政治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呢？而为此必须做出巨大的努力，培养出一个国务活动家需要10年，不对，整整15年。

而且，仅仅有这种愿望还是很不够的。只有在实际工作中，在实现党的总路线的日常工作中，在克服形形色色敌视我们的、极力阻碍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机会主义分子的反抗中，才能培养出思想坚定的国务活动家。我们党培养的、掌握了列宁经验的政治活动家必须在斗争中摧毁这些敌对的图谋，夺取实现我们伟大目标的完全胜利。

我们必须提高党及各级党委的作用，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列宁教导我们要改进党的群众工作，这难道可以忘记吗？这一切都要求有年轻的新鲜力量注入中央委员会——我们党的领导司令部。我们根据列宁的教导，就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们才扩大了中央委员会，而且我们党自身也扩大了一些。

有人问，为什么我们解除了一些著名党务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的重要部长职务。这方面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们解除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其他一些人的部长职务，用新干部取代了他们。为什么呢？根据什么呢？部长的工作是很吃力的事情，它需要有许多精力、具体的知识和健康的身体，因此我们才解除了某

些功勋卓著的同志现任的职务，任命了更熟练的、更有主动精神的新干部来代替他们。他们是年轻人，精力充沛，我们应当支持他们担任责任重大的工作。

至于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本身，他们仍旧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我们调他们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因此连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有多少个副手。

如果我们要谈我们事业的统一，那就不能不涉及某些著名政治活动家的错误行为。我指的是莫洛托夫同志和米高扬同志。

莫洛托夫对我们的事业很忠诚，只要你一号召，我毫不怀疑，他就会坚决地为党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可是不能因此对他不光彩的举动视而不见。莫洛托夫同志是我们的外交部长，在外交宴会上受到‘沙尔特摩斯甜酒’的作用，同意英国大使在我国出版资产阶级报纸和杂志。为什么呢？做出这样的同意有什么根据呢？难道不明白，资产阶级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在苏联人中发行资产阶级报刊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事情吗？如果走出这样错误的一步，它将对苏联人的思想和世界观发生有害的负面影响，削弱我们的共产主义思想，加强资产阶级的思想。这是莫洛托夫同志的第一个政治错误。

莫洛托夫同志主张把克里米亚交给犹太人的建议付出了多大代价？这是莫洛托夫同志犯的大错误。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莫洛托夫同志这样主张的根据是什么呢？我们有犹太族自治，这难道还不够吗？就让这个共和国发展下去好了。莫洛托夫同志不应当替犹太人对我们的苏维埃克里米亚的非法要求辩护。这是莫洛托夫同志的第二个政治错误，莫洛托夫同志作为政治局委员，他的行为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坚决拒绝他胡乱想出来的建议。

莫洛托夫同志十分尊重自己的妻子，以致我们还来不及就某个重大政治问题通过决定，而热姆丘任娜同志却很快就知道了。事情成了这样：仿佛有一根看不见的线把政治局和热姆丘任娜同志和她的朋友们联系起来，而她身边的朋友是不能信任的。政治局委员的这种行为显然是不能被容许的。”

（西蒙诺夫评论说：“这些话的口气都很硬，有些地方不仅是硬，而是近乎凶狠……这完全出人意料，所以我一开始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是听错了或者没有听懂……关于莫洛托夫，他讲得很长，而且不留情面……全场是一片可怕的寂静……政治局委员们个个都神色紧张，一动不动……”）

斯大林接着讲下去：

“现在说说米高扬同志。请看，他反对提高向农民征收的农业税。我们的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他究竟是什么人？他有什么不明白的呢？农民是欠我们情的人，我们和农民有牢固的联盟。我们把土地永远地交给了集体农庄，他们必须向国家应尽的义务。因此不能同意米高扬同志的立场……”

（西蒙诺夫：“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脸色苍白，毫无表情。当他们两人先后走下来，站在方才斯大林站过的讲台前，还是那样脸色苍白、毫无表情。”）

阿·伊·米高扬在讲台上为自己辩护，说是出于某些经济上的打算。

斯大林（打断米高扬）说：“请看，米高扬是新出现的布鲁姆金。他自己搞糊涂了，还想在这个明明白白的原则问题上把我们也搞得晕头转向。”

维·米·莫洛托夫在讲台上承认自己的错误，为自己辩解并声称自己始终是斯大林忠实的学生。

斯大林（打断莫洛托夫）说：“胡说八道！我没有什么学生。我们大家都是伟大导师列宁的学生。”

斯大林提议解决组织问题，选举党的领导机构。取代政治局的是大大扩充了的主席团，还有苏共中央书记处——共计36人。

斯大林说：“名单里有除了安·安·安德列耶夫之外的原政治局全体委员，受人尊敬的安德列耶夫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他耳朵聋了，完全听不见声音，不能工作了，让他安心养病吧。”

会场上有人喊道：“应当选举斯大林同志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斯大林：“不行！请解除我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

〔西蒙诺夫：“我从马林科夫（他站在桌子边主持全会）的脸上看到一种可怕的表情，说不上是惊吓，不，不是惊吓，而是一个意识到杀身大祸的人的表情……马林科夫的面部表情、他的手势、他那高举的双手，简直是在恳求所有在场的人立即坚决拒绝斯大林的请求……场内也喊声四起：“不！这不行！我们请求留任！”〕

马林科夫（在讲台上）说：“同志们！我们大家应当全体一致地请求我们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同志继续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斯大林（在讲台上）说：“中央全会上用不着鼓掌。应当不带情绪

地、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我请求解除我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我老了，文件也不看了，请大家另选一位书记吧。”

铁木辛哥说：“斯大林同志，人民不会理解的。我们大家一致选举您为我们的领导人——苏共中央总书记。不可能有另一种决议。”

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支持铁木辛哥。斯大林站了很长时间，看着会场，然后一摆手坐下了。

（叶夫列莫夫的评论：“斯大林声称党的领导层中缺乏完全的一致，这在他去世后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证实。重新占据主要地位的集团不顾党和苏维埃民主制的准则，急剧压缩了领导机构的组成人员，并努力摆脱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提拔起来的、熟练的年轻力量。”）

不过斯大林来不及利用自己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取得的胜利。贝利亚搞了许多危险的、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准备行动，来排除对斯大林忠诚的负责干部。

1953年2月17日，克里姆林宫警卫长、生气勃勃的年轻将军科森金“夭折”了，他负责斯大林的安全，是被斯大林亲自从自己的警卫人员中提拔出来担任这个职务的。

为排除最接近斯大林、也是对他最忠心耿耿的弗拉西克和波斯克列贝舍夫，贝利亚使用了他固有的奸诈和狡猾手段。这两个人不是贝利亚自己提出个什么借口就能搞掉的，因为斯大林并不信任贝利亚。他采用了好几步棋（借用象棋术语）的迂回手法。

财政部长兹韦列夫再三请求斯大林接见他，说是事情重要，而且紧迫。斯大林接见了她。

在贝利亚设计的布局中这是第一步棋。兹韦列夫当然不是自己主动要求见斯大林的，贝利亚不仅迫使他求见，而且替他准备了关于斯大林的服务人员和警卫人员的“黑材料”。

兹韦列夫领导我国十分复杂的财政工作已经20多年了，斯大林很器重他，也信任他。

兹韦列夫打搅斯大林的事情有些出人意料——他报告了警卫的花销很大，而且从事警卫的人滥用职权。我们知道，斯大林个人的需求是很简朴的。他得知自己所信任的人胡作非为，非常生气，于是立即下令任命一个委员会来查处这些丑闻。

很快这个委员会成立了，成员有：贝利亚、马林科夫、兹韦列夫和另外几个人。这是贝利亚的第二步棋——现在他掌握了自己设计的布局往后的发展了。委员会自然肯定了兹韦列夫的报告，而且又发现了许多不仅是违法，而且是犯罪的行为。

贝利亚的第三步棋。由于这一切都公开了，斯大林不得不同意先速

捕弗拉西克，然后是波斯克列贝舍夫。

最后是贝利亚这个狡猾布局中的第四步棋：弗拉西克和波斯克列贝舍夫被送到了卢比扬卡。在这里他又给弗拉西克增加了泄露国家机密和同“间谍”斯滕贝格（负责在节日里装饰红场的艺术家）勾结的罪名。有了如此严重的指控，斯大林对弗拉西克真是爱莫能助了。

给波斯克列贝舍夫罗织的罪名是丢失秘密文件，而他将近20年来一直是斯大林忠诚可靠的秘书。用来取代他的是“贝利亚的人”马林。

贝利亚为了显示自己是斯大林安全的卫士，炮制了“医生案件”。根据他的指示，克格勃的秘密工作人员季马舒克写了一封信，控告克里姆林宫医院的医生有危害和暗杀国家高级干部的行为。

贝利亚逮捕了这些医生，借此不仅证明他自己对斯大林忠诚，而且把他自己在医务界的代理人安插在斯大林身边。然而斯大林识破了贝利亚的这步棋，于是利用医生案件来处置贝利亚。

1953年1月13日，各报刊登了一则“塔斯社综述”（经过斯大林审定）。综述说，国家安全机构揭露了“一个医生组成的恐怖集团，其目的是通过治疗时下毒来缩短苏联重要人物的生命”。综述还说，“医生一暗害者”是根据两个外国间谍机关的任务活动的：一个是美国间谍机关（医学教授M. C. 沃夫西、B. B. 科甘、A. И. 费尔德曼、A. M. 格林施泰因、Г. Я. 埃廷格尔、Г. И. 马约罗夫），一个是英国间谍机关（B. H. 维诺格拉多夫院士、医学教授M. B. 科甘、П. И. 叶戈罗夫）。全体被捕人员，除维诺格拉多夫和叶戈罗夫之外，都是犹太人。他们全是克里姆林宫门诊部的医生，同时也就是政治局委员、政府要员和高级将领的“御医”。第一小组的犹太人全都是通过冒充慈善团体的犹太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国际组织“乔因特”而被“招募”进美国间谍机关的，而维诺格拉多夫小组的成员则“早已是英国间谍机关的间谍了”。

“综述”说到医生们承认他们“用加害的治疗方法”杀害了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和谢尔巴科夫，他们还打算杀害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戈沃罗夫元帅、科涅夫元帅、什捷缅科将军、列夫琴科海军上将。据说沃夫西教授还对侦查人员声称，他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乔因特”得到了“消灭苏联领导干部”的指令。

同一号《真理报》还发表了一篇文章：《戴着医学教授面具的卑鄙间谍和杀人犯》。文章没有署名，但是文章的风格和它的指向无疑表明它的作者是斯大林。这篇文章的要害是：斯大林指出是谁的过错，是谁疏忽了新的人民公敌的这些罪恶活动：（1）“我们的某些苏维埃机关及其领导人丧失了警惕性，染上了粗枝大叶的毛病”；（2）“国家安全机关没有及时揭露医生中的暗害恐怖组织”。

贝利亚明白这些话的潜台词是什么，他促使自己政治局中的朋友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积极行动起来。这三个人早就被贝利亚警觉的目光盯上了。赫鲁晓夫在贝利亚的别墅里是自己人，喝多了酒往往就在那儿过夜。在政治局会议上支持贝利亚的是莫洛托夫（他在妻子热姆丘任娜被捕后就失宠了）、伏罗希洛夫（他的妻子也作为间谍被捕了）、卡冈诺维奇（他心里有鬼——支持过在克里米亚建立犹太共和国），还有历来是谁强就支持谁的米高扬（他有两个儿子被捕）。

斗争的双方都想利用“医生案件”为自己谋利益。早在1951年就冒出来一个侦查员M. 留明中校，他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告密信，控告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在侦查过程中帮助恐怖分子医生，并隐瞒季马舒克早在1948年就曾经发出的有关暗害者（医生）的信息！被捕的弗拉西克将军证实，他收到过这样一封信并转给了阿巴库莫夫。

这场布局复杂的暗斗结局如下。

我引用一些亲历者，也许还是杀害斯大林的共谋犯的讲述。

摘自沃伦斯科耶（孔采沃）别墅 警卫长助理彼得·洛兹加切夫的回忆录

“2月28日夜至3月1日晨值班的是赫鲁斯塔廖夫、洛兹加切夫、图科夫和布图索娃。

斯大林大约在24时到达孔采沃别墅。拉·贝利亚、格·马林科夫、尼·赫鲁晓夫和尼·布尔加宁不久也来了。我们只上了葡萄汁。至于水果，桌上的盘子里向来就放着的。清晨4时多，客人都走了，带班的赫鲁斯塔廖夫上校关好门。赫鲁斯塔廖夫说，斯大林对他说了：‘大家都睡吧，我什么都不需要了，你们没事了。’我们也就心满意足地睡了。我们一直睡到上午10时。

从清晨5时到上午10时赫鲁斯塔廖夫都干了些什么，我们就知道了。

上午10时，另一个带班的人——M. 斯塔罗斯京接替了他。

上午我们大家都在料理自己的事情。这时斯大林的昼夜贴身警卫换了班。斯大林通常是10~11时起床。我看看钟，已经12时了，可是斯大林房间里一点动静也没有。

斯大林最贴身的警卫逐渐感到不安了，纷纷猜测：斯大林为什么不起床，又不召唤什么人？

下午4时，斯塔罗斯京说：‘我们该怎么办？’

我通常在发觉斯大林已经起身时，就给他送去文件。而现在我们却坐在办公室里想：该怎么办？我们等到傍晚6时，可是斯大林



房间里仍然没有动静。我对斯塔罗斯京说：‘你进去吧，你是带班的。’斯塔罗斯京回答说：‘我害怕，还是你拿着文件夹去吧。’（我的职责就是给斯大林送收到的文件信函。）

到了18时30分，斯大林房里终于出现了灯光。大家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可是时间过去了，而斯大林还是没有召唤任何人。

22时30分，送来了斯大林亲收的信件。我这才有了机会。我从信使手中接过信件，迈着重重的步伐向斯大林的住处走去。我穿过了一间屋子，看了看盥漱间，又看了大客厅，可是哪儿都没有斯大林。我从大客厅出来，进了走廊，才注意到小餐厅的门开着，门里透出一缕灯光。我朝里面看了一眼，看见了一幅悲惨的景象：斯大林躺在桌子边的地毯上，好像是用肘部支撑着。我惊呆了。是谋杀、中毒还是中风？

我赶紧跑到他身边说：‘斯大林同志，您怎么了？’我听到一声：‘嗯’，就再也没有声音了。地毯上有一块第一钟表厂生产的怀表、一张《真理报》，桌子上有一瓶矿泉水和一个玻璃杯。我立即用内部电话叫来了斯塔罗斯京、图科夫和布图索娃。他们来了就问：‘斯大林同志，是不是把您放到卧榻上去？’

他好像是点了点头。大家把他放到卧榻上，可是卧榻太小了，必须把他转到大客厅的长沙发上去。我们四个人把斯大林同志抬进了大客厅。他只穿着一件士兵的衬衫，显然是受冻了。他看来是从19时起就处于昏迷状态，意识在逐渐丧失。

斯大林被放在长沙发上，我们给他盖了一条毛毯。

我们赶紧给国家安全部长C. 伊格纳季耶夫打了电话。他胆小怕事，让斯塔罗斯京报告贝利亚。我们给格·马林科夫打了电话，报告了斯大林的危急状态。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嘟哝了几句听不清的话就挂断了电话。过了一小时，马林科夫自己打来电话，回答斯塔罗斯京说：‘我没有找到贝利亚，你们自己找吧。’

斯塔罗斯京跑来跑去，一边嚷着：‘洛兹加切夫，打电话。’可是既然大家都已经知道斯大林病了，还要给谁打呢。又过了一小时，贝利亚本人才来了电话：‘斯大林同志病了的事，不要给任何人打电话，也不要说。’他也是立即挂断了电话。

病人身边就剩下我一个人。孤立无援的处境使我沮丧，眼泪涌上了眼眶。可是医生一个也不来。深夜3时，别墅边上有汽车沙沙的响声。我以为是医生来了，可是进来的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医疗救助的希望落空了。贝利亚高昂着头，夹鼻眼镜的镜片闪闪发

光。他动静很大地走进客厅，朝仍旧躺在壁炉边、盖着毛毯的斯大林走去。马林科夫的新皮鞋咯吱咯吱地响。他在走廊里脱下皮鞋，夹在腋下，向斯大林走去。两人离患病的斯大林远远地停下脚步，斯大林发出病态的呼哧呼哧声。

贝利亚说：‘洛兹加切夫，你大惊小怪干什么？你看，斯大林同志不是好好地睡着嘛。别来打搅我们，也别折腾斯大林同志。’

这两个战友站了一会儿，离开了客厅，尽管我给他们报告说，斯大林同志病得很重。

我于是明白了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叛卖行径，他们指望斯大林同志早点死。

患病的斯大林身边又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每一分钟都显得比一个小时还要长。挂钟敲过了早晨的4时、5时、6时、7时，而医疗救助却连影子都看不见。

这太可怕了，也让人闹不明白：斯大林同志的战友们是咋啦？

7时30分，尼·赫鲁晓夫来了，他说：‘医生马上就到。’3月2日上午9时，医生们到了，其中有：卢科姆斯基、米亚斯尼科夫、塔列耶夫等。医生开始为斯大林做检查，但他们的手都在发抖，我们只好帮他们把斯大林身上的衬衫剪开。

他们检查完了，确诊是脑溢血，于是开始治疗。放上了水蛭，给患者用上了氧气袋。

就这样，斯大林患了病，却有大半天时间不曾得到医疗救助。”

* * *

1953年3月4日，由于发表了关于斯大林病情的政府公报，莫斯科和全罗斯牧首阿列克西给各教区主教发出如下电报：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突患重病的政府公报唤起全体俄罗斯人心中深切的悲痛。我们全体教徒的责任首先就是向上帝祈祷，愿我们所有人亲近的患者康复。

愿全体教区的所有教堂都为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的健康做祈祷。我们教会不能忘记我国政府和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本人对教会的友善态度，他采取了许多措施来保护我们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利益和荣誉，因此教会应当用相应的方式，即热情的祈祷来回答我国人民经受的考验——我们全体亲爱的领袖和人民幸福的英明创造者的疾患。”

摘自科学院院士

亚·列·米亚斯尼科夫教授的回忆录

“1953年3月2日深夜把我找去了。斯大林的样子是：五短身材，稍显肥胖，面部抽搐着，右手右脚像鞭子似的一动不动。他的呼吸沉重，时弱时强（陈氏呼吸）；血压210/110mm/Hg；心律不齐，白血球将近17 000；体温很高，超过38度；对心脏的听诊和叩诊没有发现特别异常，肺部的侧面和前区没有发现病变。

诊断：由高血压和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大脑左半球溢血。

我们每个人都在病人的床边轮值。病人身边始终有中央政治局的某人在场——通常是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米高扬。

3日早晨，会诊应当回答马林科夫关于病情预测的问题。我们的答复只能是负面的——死亡不可避免。马林科夫暗示我们，他等待的就是这样的结论……

必须指出，在发病以前——大约有三年的时间——斯大林没有找医生看过病，至少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局长是这么说的。

看来，他在莫斯科总躲着医生。在他孔采沃的大别墅里，甚至没有一个盛放最必需的药物的小药箱，而且连硝酸甘油都没有。假如他发作了心绞痛，他就可能因为突然发作而死亡，而这种突然发作本来用两滴药物就可以消除。

他从什么时候起有了高血压——也没有人知道（而且他从来不曾治疗过）。

斯大林的呼吸很沉重，不时发出一声呻吟。只有一个瞬间他似乎用有意识的目光扫了一下身边的人们。于是伏罗希洛夫俯下身，对他说：‘斯大林同志，我们，你忠诚的朋友和战友，都在这儿。你感觉怎么样，亲爱的？’

可是目光已经不表示任何意思了。……夜里，我们有许多次感到他正在死去。

第二天，3月4日，有人忽然有一个想法：会不会还有心肌梗塞呢。医院派来一个女医生，一个黄毛丫头，她做了心电图，用一种不容置辩的口吻宣布：‘没错，是心梗。’

一片惊慌。‘医生案件’中已经有过先例了：说是故意不给被他们谋害的国家领导人做出心肌梗塞的诊断。

现在大概是我们……因为到这时为止，我们在医学诊断中还不曾指出过有心肌梗塞的可能性。而这些诊断已经是尽人皆知的

了。斯大林已经失去了知觉，他自然不能诉说心肌梗塞的典型症状：心口疼痛。可是白血球增多和体温升高也可以说明患有心肌梗塞。

5日早晨，斯大林忽然咯血：咯血导致脉搏衰减，血压下降。这个现象让我们犯了难：该怎么解释呢？

为了维持下降的血压，就不停地给他输入各种药物。所有参加会诊的人都围在病人身边或聚在隔壁屋子里忧心忡忡，胡乱猜测。……代表中央值班的是尼·亚·布尔加宁……他站在长沙发边，对我说：‘米亚斯尼科夫教授，他咯血是怎么回事？’我回答说：‘可能是胃壁血管的少量出血——由于高血压和中风。’……5日一整天我们不停地注射药物、写医疗日志、草拟公报。……

对胃肠道出血的解释记入了医疗日志，也填进了每天结束时的医案总结，当时患者还有呼吸，不过死亡已经逼近了。……死亡终于在3月5日21时50分来到了……

3月6日上午11~12时，在花园路和胜利路口莫斯科第一医学院生化教研室所在大楼的附属建筑里，对斯大林的遗体做了解剖。会诊小组出席的只有我和卢科姆斯基。……做解剖的是莫斯科第一医学院的A. H. 斯特鲁诺夫教授，在场的是尼·尼·阿尼奇科夫（医学科学院院长）、生物学家谢·鲁·马尔达绍夫教授（他要对遗体做防腐处理）和病理解剖学家斯克沃尔佐夫教授、米古诺夫教授、鲁萨科夫教授。

解剖过程中我们自然是忐忑不安——心脏有问题吗？怎么会出现咯血？

一切都得到了证实。没有心肌梗塞（只找到了溢血的病灶）。”

* * *

医生们并没有发现心肌梗塞，他们自己也弄不明白：“咯血是怎么回事呢？”——可是我们这些普通人，虽说不是医生，却根据自己的日常经验可以说：中毒往往伴有咯血。

可是医生们在贝利亚冷峻目光的逼视下害怕说出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他们写下了贝利亚需要的（对于他们自己则是救命的）“结论”和“医案总结”。

现在让我们来逐步分析事态的进程。

他们的晚餐一直持续到清晨5时。别墅里有四个极有可能的共谋犯：贝利亚、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是谁决定的这几个共同进餐的人呢？大约是贝利亚，因为他当时可以凭自己的意愿决定几乎所



有的事情。参加晚餐的人中，会不会有人给斯大林的杯子里下毒呢？完全可能。他们会不时站起身来，抽抽烟，去盥漱间。最可能的下毒者就是贝利亚，因为迈拉诺夫斯基的特别实验室就归他管，而迈拉诺夫斯基就是研究毒药的，并且实际运用它来杀害不合心意的人。这是一些特殊的毒药，在解剖尸体时不会查出任何痕迹。

也可以设想另一种可能：客人散去，斯大林送他们出去时，赫鲁斯塔廖夫在矿泉水里下了毒——斯大林倒在桌旁，桌子上有“一瓶矿泉水”。这样设想有什么根据呢？正是赫鲁斯塔廖夫（而不是斯大林本人）以斯大林的名义对警卫人员说：“大家都睡吧，我什么都不需要了，你们没事了。”在这之前，谁也没有听到过斯大林如此奇怪的吩咐。相反，斯大林在睡觉前有时会疑心重重地问警卫人员：“你不想睡觉吗？”所以说，是赫鲁斯塔廖夫上校伪造了斯大林的吩咐，让大家都去睡觉。为了什么呢？这不难料到：贝利亚正是让他给斯大林的矿泉水里下毒。也许贝利亚在下令时告诉过他，毒药不会立即发作，因此让大家都去睡觉，没有人走动，毒药肯定发作，到清晨时，一切就都搞定了。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肯定这种设想——过了不久，赫鲁斯塔廖夫上校……死了！这个孔武有力的健壮警卫悄没声息地死了，死因不明。典型的杀人灭口……

贝利亚自己（或者一名警卫按照他的指示）毒死了斯大林，我这样说不是空穴来风。肯定这种说法的事实很多。下面就是一个，而且很有说服力。

在贝利亚的亲自领导下，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一个秘密的毒物实验室，主任是格里戈里·莫伊谢耶维奇·迈拉诺夫斯基。他中学毕业后，于1917年入梯弗利斯医学院，就在那里加入了犹太人的社会主义组织“崩得”（犹太工人总联盟）。后来迈拉诺夫斯基转到巴库，他的一个兄弟是那里“崩得”的领导人。

在我前面讲过的犹太政党党员大规模转入俄共（布）时，迈拉诺夫斯基成了一名布尔什维克。迈拉诺夫斯基的实验室用那些被法庭或特别会议判处极刑——枪决的人来做毒物试验。实验室距卢比扬卡内务人民委员部主楼不远，就在瓦尔萨诺菲耶夫巷里。

供试验用的待决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卫长B.布洛欣送来。

下面是布洛欣1953年9月19日供词的摘录：“我的任务是把被捕的人送到特别囚室。整个工作都归贝利亚或是他的副手——梅尔库洛夫和科布洛夫领导。他们给第一特别科或‘A’科提出任务：从被判处枪决的犯人中挑出（按健康状况）强壮的或衰弱的人，（按年龄）年轻的或年老的人，（按体态）胖的或瘦的人。根据这些任务，第一特别科或

‘A’科从被判处极刑的人中挑选相应的人，然后把写着这些人的姓名的命令交给我，我再把犯人送交迈拉诺夫斯基。”

至于实验室是干什么的，同它有业务关系的人后来是这样作证的。

亚历山大·格里戈罗维奇：“迈拉诺夫斯基在大约100~150个在押者身上做了毒物试验。我或是谢戈廖夫只是秤毒药，而由迈拉诺夫斯基把毒药搅在食物里，通过特别小组的人给在押者食用。如果毒药不能致命，迈拉诺夫斯基再亲自用注射器注入致死的剂量。此外，也采用将含毒的子弹射入身体的非要害部位进行毒药试验……”

谢尔盖·穆罗姆采夫：“迈拉诺夫斯基、格曳戈罗维奇、菲利蒙诺夫和特别小组的人在特别实验室里不停地酗酒。迈拉诺夫斯基对待在押者野兽般的残忍态度令人吃惊。有些药物让他们非常痛苦。我不得不找到布洛欣，含着眼泪求他让我离开这个工作……”

纳乌姆·艾廷贡：“我在迈拉诺夫斯基实验室参加过毒药试验。接受试验的是四个被判处极刑的人，他们的血管里被注射了箭毒素。药物几乎是立即生效，过了不到两分钟他们就死了……”

1953年8月28日，迈拉诺夫斯基本人在受审时供认，他试验过的有“大约100个被判刑的人，其中大半因试验而死亡”。而1953年9月1日，苏多普拉托夫在作证时说：“这样的记录不少于150份，也就是说，在150多个被判处极刑的人身上进行过这样的毒物试验。”

9月23日受审时，迈拉诺夫斯基对侦查员说：“试验时，我们给毒物的办法是通过食物和饮料，也通过注射，利用手杖、把手和其他专门制造的锐器。也把毒药喷涂在皮肤上，通过皮肤渗透给药。”

现在请大家注意迈拉诺夫斯基1953年4月21日给贝利亚本人的一封信！事情已经做成了：斯大林被毒杀了。贝利亚要消灭痕迹。迈拉诺夫斯基被关进了卢比扬卡的地下室，除了贝利亚之外，谁也不能下令逮捕他的这名亲信！迈拉诺夫斯基在信里提醒贝利亚说：

“……我在国家安全机构中组织特别的、以科学为基础的部门根据的是您的指示。我在您亲自传授的全新基础上研究特别技术的方法。

在着手为情报部门组建有科学根据的特别实验室时，我提出的原则是：必须用人来进行研究和检验工作，目的在于检验各种毒药和催眠—麻醉物品的效应。这个原则得到了您本人的支持。

您批准了这个特别实验室的原则和准许进入这个实验室的极少数人，只有他们才知道这个实验室的存在。这些试验的计划和总结都是您或者B. H. 梅尔库洛夫批准的。



我恳求您宽大为怀：原谅我犯下的罪恶的过失，给我一个不过寄生生活的机会，因为全国都在进行宏伟的、创造性的共产主义建设，虽然敌人——美帝国主义恨得咬牙切齿，因为每一分钟都值得珍惜。我仍然是共产党员——布尔什维克。我受过良好的教育。我决心为了我们亲爱的祖国而执行您的一切任务……

格·迈拉诺夫斯基

苏联内务部弗拉基米尔监狱

1953年4月21日”

迈拉诺夫斯基没有得到回信，于是他又给贝利亚写了一封信。他暗示说，他日后也会有用的，因为他有（比过去使用过的！）更有效的办法：

“……我建议某些新物质：许多催眠的，还有致命的物质——来实现您向我提出的、完全正确的方针：我们在食物和饮料中使用药物的办法已经陈旧了，必须寻找通过吸入的空气产生效应的新途径。

所有这些尚未实现的工作，我都决心按照您的指示随时移交出去。

格·迈拉诺夫斯基

布特尔监狱

莫斯科，1953年7月17日”

这些信并没有帮上忙，国家全部特别会议判决格里戈里·莫伊谢耶维奇·迈拉诺夫斯基犯有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93条第17项“A”款及第179条规定的罪行，判处他10年监禁。

可是宣判之后，迈拉诺夫斯基还继续给贝利亚写信：

“敬爱的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

我全部自觉的生命都献给了惟一的目标：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青年时代（17~18岁时）我偶然上当，误入了‘崩得’组织，不过只是名义上加入，并没有什么活动。这一点我从来不曾隐瞒过。我在弄清楚了它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纲领后，就抛弃了这身‘脏衣裳’，就在加入联共（布）后，从1920年起就积极从事党的

工作，坚定不移地执行布尔什维克党的列宁—斯大林总路线，积极同形形色色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等等）的挑衅活动作斗争。我亲手处决了好几十个苏维埃政权的死敌，其中就有各种民族主义分子（包括犹太民族主义分子……）”

迈拉诺夫斯基知道正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中清洗托洛茨基分子和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所以他特别强调自己“亲手”消灭了“犹太人”。

我只想指出贝利亚这名亲信的道德伦理水平等于零，还是让我们看一看贝利亚本人关于这件罪行说了些什么。

在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 1953 年 12 月 18 ~ 23 日的秘密审判中，审判员米哈伊洛夫问贝利亚说：

“被告贝利亚，在预审中您曾经供认：‘我承认，迈拉诺夫斯基证明的是一件可怕的血腥罪行。是我交给迈拉诺夫斯基在被判处极刑的人身上做试验的任务。’这些供词您还肯定吗？”

贝利亚：“是的，我肯定。”

接着贝利亚肯定了有关秘密实验室工作中的种种令人发指的细节。

不知为什么，当时法庭的组成人员中没有人想到贝利亚参与毒害斯大林的问题，虽然这种怀疑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终于有了最强有力的证据——贝利亚本人供认杀害了斯大林！

这是莫洛托夫讲的。我不止一次想详细地问问他斯大林神秘死亡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老下不了决心，因为这个问题太“敏感”了。不过在我们持续了几年的谈话之后，在莫洛托夫开始信任我，甚至请我安排他和朋友们的“秘密”会面之后，我有一次决定谈谈这个问题。起初不是开门见山地谈，而是一步一步地引导：

“听说斯大林不是正常死亡？”

莫洛托夫没有立即回答。他想了想。

“是的，这样的怀疑是有根据的。”

“有人甚至指出了具体的谋杀者——贝利亚。”

莫洛托夫又是很长时间不开口。

“这也是很可能的。也许，甚至不是他本人，而是通过手下的肃反工作人员或是医生。”

我感到莫洛托夫有话没有说完，可是我不敢对他施加压力。我觉得，他什么也不会再说了。可是看来他内心有斗争。很可能他认为自己已经老了，用不着把这么大的秘密带进坟墓里去。

我并没有再提问题，他却忽然开始回忆起来，仿佛不是为了我：

“1953 年 5 月 1 日，在列宁墓的主席台上有过这样一次谈话。当时



贝利亚攫取政权的意图已经接近实现了。他自己，而且我们大家也都认为他是政治局里最有势力的人了。大家都怕他。身边的警卫全都是他的人，他可以随时消灭我们。不过他懂得，这么干是不行的，人民不会相信我们全都是敌人，把我们变成他的同伙对他更为有利。于是贝利亚仿佛是在提醒我们，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后的全会上斯大林想要收拾我们的情况，他在列宁墓的主席台上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可是声音大到站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都可以听见：

“我救了你们大家……我非常及时地把他搞掉了。”

莫洛托夫可信吗？贝利亚说过这样的话吗？

我想是可信的。莫洛托夫是个大人物，他懂得这些话的价值，而且一般说来，他在各种岗位上始终懂得每个词的分量和价值。这不是厨房里的闲聊。他明白他在谈什么，他谈话的对象是什么人。这句话不会白说的，它会留在我的记忆里，而我是一个作家，有朝一日我会把它发表出去，而它令人害怕的含义将载入史册。

可以证明莫洛托夫决定如此坦率地让人们知道真相的还有他同作家丘耶夫的谈话。丘耶夫公布了他同莫洛托夫就这个题目的谈话。这次谈话中使用了别的词语，不过含义是相同的：贝利亚“搞掉了”斯大林。

* * *

当独特的夺权行动发生时，斯大林还不曾辞世。实际上这是三名党的最高领导人——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搞的阴谋。

贝利亚明白，领袖的时日屈指可数，他在孔采沃的别墅里把自己的同谋——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找到一起。

为什么是这三个人呢？

我说说自己的看法，它确实没有得到文件的证实。

即便是有过某些这方面的文件，我怀疑的那些人在掌权之后，当然也会把它们全都销毁。

不过虽然没有文件，事实本身也容许做这样的推测。事实如下：贝利亚始终在各方面都支持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他在职务上和党内都一贯提拔他们。他利用自己接近斯大林的机会，向领袖报告他这些同伙的忠诚可靠，而对于他们的竞争对手，则用一些让人汗颜的报告把他们挤到一边去。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也经常支持贝利亚，而且满足他的种种愿望。这使我们有根据认为，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在没有成为大人物之前，也就是还在走向重要职位的门槛上，就被克格勃机关招募了。这在当年是很普遍的做法。在国家和党的各级机构中都建立了情报网。

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不仅在情报系统内和贝利亚有勾结，他们之间的私交也很密切，他们是贝利亚别墅的常客，常常喝到酩酊大醉，就在

那里留宿。

不用说，吸引他们密切交往的不单单是嗜酒如命和佳肴盛宴，这里还决定着政治和经济问题：马林科夫是中央书记，领导整个干部工作；而赫鲁晓夫是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握有处理首都全部事务的大权。

现在到了紧急时刻，这三个人就聚到一起，像阴谋分子通常做的那样，按他们的意图决定谁该干什么，怎样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方面我是有文件为证的。我认识马林科夫的秘书处主任苏哈诺夫，他在这个职位上干了18年！他很受信任，保管着中央委员会的图章和马林科夫的签名章，他可以随心所欲地盖章证明由他本人起草的文件正确无误。

苏哈诺夫对我讲了三驾马车的“秘密的晚宴”，而且在自己的保险箱里保存着马林科夫在他们分配职位时做的笔记：赫鲁晓夫当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马林科夫当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当副主席兼任同克格勃合并之后的内务部长。

贝利亚对自己的同谋评价不高，他认为，智力平平的赫鲁晓夫将是他手中唯命是从的玩偶（顺便说说，他是大大地失算了），马林科夫意志薄弱又俯首帖耳（他们在他们之间被称为“小糊涂”），也会乖乖地听从指挥。贝利亚独揽大权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惩罚机关牢牢地掌握在他手里，多年来贝利亚凭一己的好恶就把成千上万不中意的人送上了西天。

“三驾马车”的这次勾结打算取消斯大林采取的扩大中央委员会人数的做法和他设立的由25人组成的中央主席团。他们决定还是回到旧等级体制去：设立一致的主席团（像原先的政治局），人数不多，易于控制，让根据斯大林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提议而被开除了的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回到主席团来。

乘斯大林眼下还有呼吸，可以利用他的威望，赶紧把这一切都办完，正式决定下来。为此阴谋分子决定第二天，即3月5日，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联席会议按时在克里姆林宫的斯维尔德洛夫大厅召开，首先由卫生部长A. 特列季亚科夫通报了斯大林的健康状况。然后发言的是马林科夫，他说：

“大家都明白，领导国家的重任现在落到了我们大家头上。大家都懂得，国家的领导一小时也不能中断。正因为如此，党中央主席团常委会才召开了这次联席会议……我受委托向大家报告安排党和国家领导机构的一些措施。”

接着他再次引证常委会（根本不存在什么常委会！）的委托，说明必须进行他提出的改组和干部调动：

“保证对整个国家生活进行不间断和正确的领导……要求领导层最



大限度的团结，不出现任何不协调或是惊慌失措。”

谁也没有反对采取这些措施，于是“三驾马车”实现了他们在“秘密晚餐”时计划的一切。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分别被任命担任他们策划好的职务。

取消了由25人组成的中央主席团，只留下了“自己人”——格·马林科夫、拉·贝利亚、尼·赫鲁晓夫、尼·布尔加宁、克·伏罗希洛夫、拉·卡冈诺维奇、马·萨布罗夫、米·别尔乌辛。返回主席团的是维·莫洛托夫和阿·米高扬。

伏罗希洛夫被任命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维·莫洛托夫担任外交部长，尼·布尔加宁任国防部长，阿·米高扬任对内和对外贸易部长。

他们太匆忙了：25个部长职务中有17个还没有任命。不过主要的事做完了——权力转到了“三驾马车”手中。联席会议之后过了1小时50分钟消息传来：斯大林去世了。

* * *

切斯诺科娃医生叙述说：

“复苏学家涅戈夫斯基和我带着复苏器械于3月2日被送往斯大林的别墅。

在我们安置器械时，贝利亚高声而且威严地对我们说：‘你们现在说说，都带来了什么器械，打算怎么做，我要认真听你们说说。’

警卫人员始终在监视着我们。

星期一12时，斯维特兰娜和瓦西里来了。瓦西里喝得醉醺醺的，高声嚷嚷：‘有人谋杀斯大林！’他们没有让他走进父亲躺着的客厅。这间屋子里坐着政治局委员们，他们进来，坐下，走出去，再回来，彼此低声交谈着。只有贝利亚在别墅里跑来跑去，高声地发布命令，皮鞋咯吱咯吱地作响。

斯大林躺在沙发上。脸色非常苍白，双手紧握成拳。

斯维特兰娜在旁边放了把椅子，悄悄地坐下，哭泣着。

3月5日晚上，医生会诊确定——该采取复苏措施了。20时，我们着手紧急复苏。斯大林的呼吸已经时断时续，忽然他睁开眼睛，可是眼睛里没有意识。他抬起左手，不过立刻就垂下了，这是临死的挣扎。不一会儿他的呼吸停止了。我和涅戈夫斯基开始做心脏按摩，可是一切都是徒劳的——脉搏已经没有了。斯大林去世了。这是1953年3月5日21时50分。

伏罗希洛夫痛哭失声。马林科夫表现得很平静。只有贝利亚继续走来走去，高声命令着：‘找一找制服，还有勋章。准备汽车！’

政府成员们离开了客厅。剩下了斯维特兰娜，她求我陪陪她。我帮她给父亲梳了头，使他的眼睛闭得更紧一些。

贝利亚带来几名警卫，高声命令道：‘我命令你们保护斯大林同志的遗体。你们要拿性命担保它的安全。如果有闪失，我要你们的命！’”

会诊结论

3月5日中午12时

3月5日清晨，病情急剧恶化。呼吸衰竭程度加重，3月4日后半夜和3月5日凌晨尤其明显。8时刚过，病人出现咯血，血量不多，但导致严重虚脱，经过抢救病情略有好转。11时30分，几度咯血之后又出现虚脱，大量出汗，冠状动脉的搏动消失；经过注射樟脑、咖啡因、毒毛旋花子甙等药物，病人好不容易脱离了衰竭状态。

上午11时做的心电图表明，冠状动脉血流严重受阻，主要在后心壁上有病灶。

会诊认为，咯血的原因是胃壁粘膜受到血管—营养损害。

21时50分，约·维·斯大林同志逝世。

特列季亚科夫、卢科姆斯基、塔列耶夫、
科诺瓦洛夫、米亚斯尼科夫、菲洛莫诺夫、
格拉祖诺夫、特卡乔夫、伊万诺夫

没有任何疑点，也没有任何法学—医学鉴定——只是单纯的记录事实。贝利亚下令立即将斯大林的遗体运往列宁墓的实验室，做长期防腐处理。

别墅的警卫和服务人员收集了斯大林的个人用品，并登记在案。

斯大林同志个人财产登记表

1953年3月5日22时30分，我，近郊别墅警卫长奥尔洛夫、贴身卫士长斯塔罗斯京、助理图科夫、工作人员布图索娃，根据贝利亚同志的指示，登记了约·维·斯大林同志的个人财产。

1. 灰色皮封面便条本一个；
2. 红色皮封面笔记本一个；
3. 分别书写在零散纸张和纸片上的个人笔记和批注。编号总计67（六十七）页；

4. 红色封面普通笔记本（里面有札记）一个；
5. 烟斗5个。另有：4个烟盒及专用器具、烟草。

斯大林同志办公室：书籍、文具、办公用品、纪念品未登记入册。

卧室及衣帽间：

6. 白色上衣2件（两件衣裳上都别着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金星奖章）。

7. 灰色上衣，日装，2件；

8. 深绿色上衣2件；

9. 长裤10条；

10. 内衣放在2号盒子中。

3号盒子里放的是：6件上衣、10条长裤、4件大衣、4顶宽沿帽。

1号盒子里放的是：便条本、笔记本、个人札记。

沐浴用品放在4号盒子里。

属于斯大林同志的其他财产未做登记。

登记表及文件的完成时间——1953年3月6日0时45分。

在场人员：奥尔洛夫（签字）

斯塔罗斯京（签字）

图科夫（签字）

布图索娃（签字）

在卧室里发现了一个存折，有900卢布的存款。这就是斯大林的全部财产。住宅是国家的，现在那儿是总统档案馆，别墅是国家的，转给了其他人使用。

斯大林同志治丧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号）

1. 委员会认为在弗·伊·列宁陵墓的特别实验室里对斯大林同志的遗体进行解剖并作长期防腐处理是恰当的。

2. 在治丧委员会的伴送下将斯大林同志的遗体运送到工会大

厦圆柱大厅。

3. 规定斯大林同志的遗体在入殓时应着军装（非礼服）。上装上佩带苏联英雄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奖章及各种胸标。

由斯皮里多诺夫同志负责。

4. 由克鲁平同志负责准备灵柩。

5. 由亚斯诺夫同志负责定制花圈并监督花圈的质量。

6. 吸收雕塑家马尼泽尔制取石膏面模。

7. 批准斯大林同志的灵柩停放在工会大厦的通告文本（见附件）。

8. 工会大厦圆柱大厅的准备问题：

a. 由戈尔金同志、亚斯诺夫同志和斯皮里多诺夫同志负责工会大厦圆柱大厅的准备工作。

大厦和圆柱大厅的装饰由别斯帕洛夫同志、伦金同志、格拉西莫夫同志和沃尔科夫同志负责。

b. 工会大厦的保卫以及周边地区秩序的维持由苏联国家安全部负责（戈格利泽同志、里亚斯诺伊同志）。

9. 责成阿尔捷米耶夫同志和西尼洛夫同志提出组织守灵仪仗队的建议。

10. 责成别斯帕洛夫同志提出在圆柱大厅内做速写的画家名单。

11. 责成博利沙科夫同志提出摄制影片的建议。

12. 责成亚斯诺夫同志起草修建伟人堂的决议草案。提出草案的期限是3月6日。

13. 责成建筑学家波索欣提出列宁—斯大林陵墓上铭文的草案。

执行第5条⁽¹⁾时，出现了困难——找不到苏联英雄的金星奖章。原来这枚奖章还在最高苏维埃的授勋部，没有向斯大林颁发这枚奖章。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将领们在盛大招待会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应当授予他苏联英雄称号。他们是他的下属，有些人已经获得了两次英雄称号，而他却没有这个称号，虽然胜利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的。太不公平了！斯大林当时说，英雄称号是凭战场上的功勋来授予的，而按他的地位是不能得到这样崇高的称号的。将领们吵吵嚷嚷地坚持着。斯大林摆了摆手，不再争论了。授予斯大林苏联英雄称号的命令发布了，可是他没有接受这枚

(1) 原文如此，有误，应为“第3条”。——译者注

金星奖章。只是在举行葬礼时人们才发现了真相，于是从授勋部取来他的那枚金星奖章，和为数很少的其他勋章一起别在一个鲜红的小垫子上。

1953年3月6日，斯大林的灵柩安放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里。

人民向领袖的告别持续了三天。成千上万的人来向这个为他们和他们的祖国做出了伟大业绩的人鞠躬致敬。

想看一看斯大林的人太多了，通向圆柱大厅的所有街道都挤满了人。民警和战士挡不住汹涌的人流，甚至有人被挤压而死。人们从全国各地赶往莫斯科。为了阻止人流，去往首都的客车和电气列车都停开了，可是人们步行着向首都前进。莫斯科市中心人山人海，人们昼夜站着，仅仅是为了能够走进悼念厅。

3月9日，红场上举行了葬礼，举行了群众大会。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相继发表了讲话。透明的水晶棺被安放在陵墓里，和列宁并列在一起。

* * *

在1953年那些悼念的日子里，牧首阿列克西给苏联部长会议发去了这样一封信：

“我代表俄罗斯东正教会以及我本人对我国人民幸福的伟大缔造者、令人难忘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逝世表示深切而真挚的悼念。

他的逝世是我们祖国、我国的各族人民的深切悲痛。俄罗斯东正教会沉痛地悼念他的辞世，我们教会永远不会忘记他善待教会需求的态度。

对他美好的记忆将永远保存在我们心中。

教会怀着永不磨灭的特殊爱意永远纪念他。”

十三 “历史”公案

几乎所有的党代表大会都被称为“历史性的”，意在强调大会讨论和决定的那些问题规模宏大。

历史并没有把这一切都照单全收，于是这些修饰语就只是留在纸上。不过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确是历史性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次大会彻底揭露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由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具有这样的特殊意义，我们必须详细地来谈谈它，以此来提醒那些年事已高的人（那些当年30来岁，如今已经年

过70的人，他们当年在报纸上读到过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报道），告诉青春年少的人——他们通常对这次代表大会一无所知。作为验证，我曾经问过几个年轻人，关于这个二十大他们都知道些什么。有一个人（25~30岁）回答说：“大会撤了斯大林的职！”“得了，年轻人，快别搅和了，那时候斯大林已经死了。”“是吗？”他真诚地大吃一惊。年龄相仿的一位妇女回答说：“斯大林因为搞镇压，遭到谴责，被揭露为人民公敌。”这个回答好像接近真实，不过说斯大林被宣布为人民公敌的话让人感到苦涩。

还是让我们打开文件吧：《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1956年2月14~25日）。速记记录》。我通读了厚厚的两大卷（1100页）。从最初的几页起，我就感到奇怪。我有一个真正的“发现”：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议程里根本没有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问题！1099页的速记记录完全没有谈到这个问题（请注意，我把记录的篇幅减少了一页。这一页另外再谈）。与此同时（这简直令人吃惊！）在会上发言的126个人中，没有一个人提到斯大林的名字，一次也没有，也没有为他欢呼，而在此前的历次代表大会上，所有发言都是用为斯大林欢呼而结束的。大家不用去找这本速记记录，不必浪费时间，请相信我的话。秘密何在，我们稍后再做分析。

第一个问题是苏共中央的总结报告。报告人是中央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第二个问题是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就第六个五年计划做的报告，报告人是尼·亚·布尔加宁。^① 第四个问题是选举中央机构。

就是这么多。没有规定就个人崇拜进行任何讨论或是通过决议。整个第一天都被赫鲁晓夫的报告占用了。（真受得了！）

我不用长篇大段的引证来折磨读者了（不过我承认，有些东西今天听起来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我只引用几段战略性的原则声明：

“我们时代的特征就是社会主义越出了一国的范围而变成了一个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已经无力阻挡这个全世界的历史进程了（赫鲁晓夫真该看到资本主义今天在我国是如何堂而皇之地前进的！——本书作者注）。当我们说，在两种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竞赛中，社会主义制度将取得胜利时，这并

① 原文如此，有误。应为：第二个问题是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莫斯卡托夫作的总结报告。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报告人是尼·亚·布尔加宁。——译者注

不是说，社会主义各国将用武装干涉资本主义各国内政的方法取胜。”

赫鲁晓夫接着叙述了马列主义理论关于资本主义注定要灭亡的论断。现在我们知道，除了这个关于注定灭亡的理论外，苏联共产党还不断给自己的同志们千百万外汇的补贴，来推翻世界上数以十计的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

真有这样的巧合：我在这个地方休息了一下，坐下来喝一杯茶，而电视的一档节目里恰好在报道：“战后年代里，从1947年起直到戈尔巴乔夫，所有的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们签字拨出4亿美元来援助其他国家的共产党。”

在我停下来喝一杯茶之前，我本想用痛心和揭露的语调来谈谈我国党内的大亨们胡乱花费了多少钱，损害了国家利益，这些钱实际上是打了水漂了。可是我突然听到这笔钱只不过是4亿美元，把它和今天那些生意人和贪官污吏在“民主”制度下盗窃的几十个亿比一比，我决定不再评论那些比起今天的规模来是微不足道的小花销了。能说的只有一点：他们太吝啬了，花得太少，所以资本主义制度才战胜了我们。

我们党的领导人在正式的言论中往往像俗话说的那样，“写的是一套，想的是另一套”。赫鲁晓夫之后发言的是苏共中央书记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谢皮洛夫，他主管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问题。他在讲话中预言，社会主义制度不仅仅必将在理论上、也将在历史上确立在全世界的统治地位。他还说了这样的话：“……在存在着资产阶级专政的强有力的反动官僚机构的国家里，在存在着发达的军阀主义的国家里，剥削阶级将对劳动人民在新的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社会的斗争进行拼命的抵抗，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得不用暴力手段来摧毁这种抵抗。”

中央书记就是这样——公开地、明确地从克里姆林宫的讲坛上，通过电台的转播和报刊的登载——宣布的。谢皮洛夫谈到了和平输出革命的种种形式，它们或多或少都是可以接受的。不过毕竟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领导全党这方面活动的中央书记关于可能用暴力摧毁资本主义的言论，不曾受到任何人的批驳，也没有人加以纠正。相反，大家都鼓了掌！

我读着速记记录，决定用老办法——同当事人和目击者谈谈，来澄清一些不清楚的地方。速记记录后面附有代表名单，共计1356人，许多人是我认识的，可以随意交谈。但是那次代表大会以后，已经过去了37年了，过了这么多年，很多人已经离我们而去。不过好在还有可以见面谈谈往事的人。

据我所知，有一位特别代表还健在，在大约 15 年的时间里，我们经常见面。我们是在克拉斯诺戈尔斯克的军医院里结识的。正在康复的人有的是时间，我们当时海阔天空地聊了昔日的各种事情，也对未来做过预测。他很健谈，是名副其实的饱学之士。他是科学院院士，有许多学术著作，特别是政治经济学著作。而且我们还是战友，他拥有中将军衔，战后是最著名的党务工作者，甚至是领导人之一。你们猜出来他是谁了吗？我再提供一点资料：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开头是这样几句话：“上午 10 时。主席团座席中出现了尼·亚·布尔加宁、克·叶·伏罗希洛夫、拉·莫·卡冈诺维奇、阿·伊·基里钦科、格·马·马林科夫、阿·伊·米高扬、维·米·莫洛托夫、米·格·别尔乌辛、马·扎·萨布罗夫、米·安·苏斯洛夫、尼·谢·赫鲁晓夫、潘·孔·波诺马连科、尼·米·什维尔尼克、阿·鲍·阿里斯托夫、尼·伊·别利亚耶夫、彼·尼·波斯佩洛夫、德·特·谢皮洛夫以及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的领导人。代表们热烈鼓掌欢迎他们。全场起立。”

上面列举的 17 个人中，16 人已经作古，剩下的一个就是我们下面的交谈者——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谢皮洛夫（这是我 1992 年写下的）。他当过苏共中央书记，还当过苏联外交部长，还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他因为“追随”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因为在决定把他们开除出党时，他不慎说出了自己的怀疑：莫洛托夫终究是布尔什维克党处于地下时期就入党的党员呀。于是他就“追随”了这个集团。谢皮洛夫没有被开除出党，他被打发到吉尔吉斯的首都伏龙芝市去当了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他们保留了他的学衔和将军的军衔，只是他原来的住宅被收走了。赫鲁晓夫退休后，谢皮洛夫回到莫斯科。到同我谈话的时候，他和妻子玛丽亚娜·米哈伊洛夫娜住在一幢很好的砖楼里的一套两居室的舒适住宅里，距“狄纳莫”运动场不远。

我放下了整理手稿的工作，给谢皮洛夫打了电话，约好了见面，就乘车去他那儿。他热忱地接待了我，按照俄国人的方式拥抱了三次。虽说他已经 88 岁了，可是依然高大、健壮、结实。他是大脸盘儿。总之是个大人物！大人物！只是眼睛不怎么好，不久前右眼动了手术，可是不太成功。

“我真想把回忆录写完，只差两章了。就是担心眼睛不行。”

“那您写完的有多少？”

他显出明显的自豪感，打开了书桌下面两个小柜的门。柜子里面紧紧地摞着一个个用带子捆着的卷宗。“请看。大约有 2 000 页吧。我的全部动荡生活和经历。要知道我是许多事件的亲历者，在斯大林时期我



开始担任《真理报》主编。后来，还是在那个时期，我当过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也是他撤了我的职。我以为我很快就会给搞到卢比扬卡去了，我每天夜里都等着，可是总算过去了。”

“为什么他要这样对待您？”

“如果您还记得，我国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改造自然的人，不对，也许不应当说改造自然的人，而是改造科学的人——李森科。”

“嗯，怎么会不记得他呢，是他揭露了、而且摧毁了魏斯曼学派和摩尔根学派。”

“对了，正是这样，摧毁了。我看到——这导致了而且还会导致我国农业更大的灾难。我和尤里·日丹诺夫（安德列·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的儿子）谈了，他是中央科学部部长。他对李森科的胡闹也持否定态度。我们决定召开一个意识形态干部和学者的会议。尤里·安德列耶维奇要做一个报告，我们要摘去这个科学界的暴发户和骗子头上的桂冠。我应当说明一下，在这次事件之前，尤里和斯维特兰娜·斯大林娜结了婚。所以我相信他在家里，在家庭的气氛中会把我们的意图同岳父、同父亲讲清楚。尤里的报告很出色——把伪科学家李森科批得体无完肤。可是李森科是很滑头的——他参加了我们的会议。他不是党员，不知是他的哪个朋友把他带进了会场。他听明白了我们谈的问题，就立即跑去找自己最要好的朋友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就去找斯大林。而斯大林除了赫鲁晓夫之外，不知道还有农业方面的其他行家。他听完发生的事情后，立即召集政治局开会，议程只有一项，就是他自己提出的：

‘是谁不经中央同意就召开意识形态干部会议？是谁允许打击李森科的？’

没有人开口。斯大林看看安德列·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日丹诺夫耸耸肩膀说：‘我什么也不知道。’看看苏斯洛夫，苏斯洛夫简直说不出话来，只是摇了摇头。嗨，我一看，我的上级领导人都一个个都泄了气，就站起来大声说（我天生的大嗓门）：

‘斯大林同志，是我允许的。’

斯大林走到我身边，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我说：

‘您知不知道，整个农业都要靠李森科？’

‘斯大林同志，您获悉的是错误情况。李森科不曾给科学做出过点滴贡献，根据他的理论没有培育出一个新品种。您可以处分我，可是该分清是非了。李森科把许多大学者都说成是思想上与我们为敌的摩尔根分子。’

斯大林像一条眼镜蛇似的盯着我，眼睛一眨不眨。他对这样的不屈不挠感到惊奇。我也惊慌失措，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斯大林发怒意味着什么！由于惊慌，也由于承受不住斯大林的眼神，我坐下了。原本就是死一般的静寂。现在静寂里仿佛掺进了更紧张的气愤。斯大林转过身去，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大家都不开口。他也沉默了很久。最后他意味深长地说：

‘背着中央召开全国性的会议是不行的。我提议成立一个委员会，由马林科夫任主席，委员是赫鲁晓夫、苏斯洛夫。’他停了一会儿，补充道：‘日丹诺夫。’又停了更长时间，来回走了几步，突然说道：‘还有谢皮洛夫。应当搞清楚，召开一次农业科学院的专门会议。支持李森科。’

委员会不曾开过一次会。他们既没有召唤过我，也没有邀请过我，只是开始了对学者的镇压。瓦维洛夫起初被流放，后来被处死；李森科当上了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我被解除了所任的职务，有两个月我都在等着被逮捕。忽然有一天，我应作曲家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邀请正在观看他的轻歌剧《最珍贵的》的首演，波斯克列贝舍夫打电话到剧院找我。

‘请您立刻按……号码打一个电话。我知道您那儿没有内部电话。’

我拨了他给我的市内电话号码，立刻听到了斯大林的声音。我说：

‘斯大林同志，我是谢皮洛夫。’

‘您在哪儿？’

‘我在歌剧院……’这样直说似乎有些尴尬，因为经过了上次的挨训，现在忽然跑到轻浮的歌剧院去了。可是斯大林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过似的，径直问道：

‘有什么好戏吗？离开剧院，您不会感到可惜吗？您到近郊别墅来找我吧。我要和您谈谈。’

我当即飞快地赶到孔采沃的别墅。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我们谈了两小时。谈话的实质是斯大林明白了：我国的国民经济情况不妙，因为没有经济学科的起码知识。人们不知道怎样正确地管理经济。

‘必须赶快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是供宣传鼓动用的小册子，而是货真价实的行动指南。这件事就交给您了。您认为哪些学者合适，就让他们给您做助手。’

他当即十分内行地对我列举了必须在教科书中阐述的一些问



题，而且引证了列宁的著作。他走到书架前，取下书籍，不是一页页翻着寻找，而是立刻打开所需的页码。显然这项委派是经过他深思熟虑的。

过了两天，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又把这项委派重复了一遍，而且补充说：

‘必须为这个小组创造工作条件，不要让他们分心，谁也不要妨碍他们。最好是到郊外去，到别墅去，给他们找一处好房子。规定这样的工作制度：每周都工作，星期六和星期天回家团聚。一年以后教科书必须放到这儿，放在桌子上。’

他就这样亲自为我恢复了名誉。我们分章节撰写教科书。我向斯大林呈送过四章，他亲自修改，而且就每一章和我深入交谈。不管人们就斯大林写了些什么，而且他也确实有许多过错，但是他的理论修养是很高深的。教科书在斯大林去世后，于1954年出版，发行几百万册，人们说它很有用……”

谢皮洛夫讲了这一段饶有趣味的故事后，我着手调查自己的问题。我先读了速记记录开头的几句话：代表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略去了所有领导人的姓名，说道：

“欢迎谢皮洛夫同志。”

他知道我在开玩笑，微笑着说：

“是呀，有过那样的时刻！”

然后我问道：

“我们是否迫使过资本家们起来保卫自己，抵抗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平静的革命呢？您担任过几年外交部长，您是怎样执行这种政策的呢？嘴上说的是和平、裁军，可是心里却明白，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我那时是真诚地相信这一点的，就是现在我也不否认社会主义制度是更进步的制度。我们犯过许多错误，这是我们的不幸，可是生活表明，对于人民而言，有计划地、科学地进行经济活动比起资本主义的无法无天来更为合理可靠。”

我打开他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拿给他看：

“您在这里不仅对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甚至对我们今天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凋敝不堪的状况都作了很有意思的说明。这个说明不是您做的，而是出自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中坚人物。这是您的报告中的几行：‘在1950年出版的现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所著的《战争还是和平？》一书中我们读到：“我国发生了一种不好的事情……我们缺乏正



确有推动力的信念。没有这种信念，其他一切东西对我们就很少有帮助。不论多么能干的政治家，不论多么有远见的外交家，不论多么有发明天才的科学家，不论破坏力多么大的炸弹，都不能补救这种缺点。”您，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用这段引文佐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思想。可是资本主义非但没有灭亡，相反，却在不断取得胜利。”

谢皮洛夫微微一笑说：

“全都是表面现象，不必深究。是的，资本主义来到了我们这儿，它也带来了同样的精神空虚、缺乏思想支柱、缺乏信仰，因此我国的一切才都在坍塌。早先的理想不复存在了，又没有出现新理想、人们将会长时间地在黑暗中痛苦地徘徊。革新家们、冒险家们和真诚的迷路者干了太多的蠢事。可是归根到底，一切都会恢复原状，也就是恢复历史的进程。社会主义制度经过某些修正、补充和更改，总是要占上风的。没有别的出路，这是公理。”

我也就代表大会议程中的奇怪现象问过谢皮洛夫，我指的是议程上没有以主要问题载入史册的个人崇拜问题。

“既然在议程上没有个人崇拜问题，那它是怎样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来的呢？全体代表仿佛是商量好了似的——没有一个人在发言中提到斯大林，甚至不曾像习以为常的那样提一下。哎，如果这发生在做出了反对个人崇拜的决定之后，那倒也可以理解。可是他们在发言时，并不知道要讨论这个问题呀。”

谢皮洛夫宽容地笑了笑说：

“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您知道中央在准备采取一些措施时的做法，更何况这是党代表大会。代表的所有发言都要经过审查和修改，连很受尊敬的外国领袖的发言提纲也要事先看过，而且提出修改的建议。既然是中央的建议，谁还会反对呢？”

“在筹备时，确实没有提出过个人崇拜和党代会上是否讨论的问题吗？”

谢皮洛夫认真地思索着，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特别郑重其事地说道：

“我不希望您错误地理解我将要对您说的话，不要错误地以为我想要夸大自己的作用。上帝保佑！尤其是现在更没有这个必要了。您是听我如实叙述的第一个人，我在回忆录里有详细的叙述，可是离回忆录出版还早着呢，既然您想搞清楚，那我就对您说说。”

他的讲述如下：

“我不知道，速记记录是否反映了赫鲁晓夫和我有两天没有出席大会。事情是这样的。赫鲁晓夫不止一次在政治局委员中说，应当找个办



法谴责斯大林的镇压行动，把党从镇压活动中摘出来。在大会的一次会间休息时，他走到我身边，对我说：‘我想，现在是提出斯大林问题的最佳时机了。这里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党的精英，我看近期内不会再有这样合适的时机了。’我支持他的想法。他问我：‘您能不能帮我赶出一份报告来？’‘那还用说吗，您不必担心。’‘我们走吧，说干就干。’我们就在他的办公室里一口气干了两天，只是睡觉才回家。2月25日，等报告已经写好并打印出来之后，我们才回到大会去。赫鲁晓夫头一天已经通知，要开一次秘密会议，新闻记者和各种客人都不得参加。”

我感到奇怪：“他甚至没有和主席团委员们商量一下吗？”

“没有。没有主席团的决定。赫鲁晓夫只是在会场的侧厅里，在主席团的休息室里说过：‘这个问题我们谈过多次了，现在应当将真实情况告诉党员了。’”

……赫鲁晓夫的报告令人震撼。可是代表们批准了他的报告。根据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全体一致通过的决议总共只有九行，而且如我们所看到的，斯大林的名字，无论是报告的题目，还是决议都没有提到。

这就是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个人崇拜”问题的情况，它在议程中不曾被提及，然而却的确得到了历史的共鸣。

十四 个人崇拜

崇拜在一切时代、一切国家都是盛行的，而且被认为是正常现象。它没有受到过谴责，而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有的罗马皇帝，也包括其他国家的皇帝，都受到口头的和书面的赞颂。东方统治者——苏丹、谢赫——的宫廷里有专职诗人，他们用词藻最华丽的蹩脚诗句把这些统治者捧上了天。

议论个人崇拜，谴责个人崇拜发端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赫鲁晓夫。他揭示的“崇拜”一词的含义是什么呢？对一个爱听赞颂之词，鼓励而且欣赏对他唱赞歌的人的过分的讴歌。我要强调的是“过分的”。

赫鲁晓夫的报告就是这样描绘斯大林的。赫鲁晓夫甚至还断言，斯大林不仅喜欢颂扬，而且亲自鼓吹、提倡这种崇拜。

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里不仅谴责了“个人崇拜”，而且也暴露了他自己的叛徒嘴脸。多少年来他一直以斯大林志同道合者的伪装掩盖自己，他在1939年3月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展示的

一个阿谀逢迎之徒的“最高技巧”足以为证——他在20分钟里，居然把领袖恭维了32次！

下面摘引他的发言（有删节）。

“同志们！在我们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听取了关于我们苏维埃国家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全体劳动者在我们的天才领导者、领袖、我们伟大的斯大林的领导下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总结报告。（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转为欢呼声。全体起立）

斯大林同志在总结报告中指出了我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在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击溃了敌人的反抗，歼灭了敌人，粉碎并消灭了他们，继续胜利地向共产主义迈进。

但是，争取共产主义的胜利斗争，不应当削弱我们对敌斗争的意志和坚强精神。我们应当牢记伟大的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包围所说的话。我们的成就应当使我们更加提高警惕，把我们的武器磨得更锋利，去无情地消灭敌人……

……我们能顺利地和胜利地粉碎法西斯的代理人——所有这些卑鄙的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首先应归功于我们的领袖，我们伟大的斯大林本人。（热烈欢呼声）

斯大林同志在他的总结报告中充分说明了……

……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和巩固。它同列宁斯大林党的一切队伍有血肉联系，并钢铁般地团结在斯大林的中央委员会和敬爱的领袖——伟大的斯大林的周围！（经久不息的欢呼声）

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对斯大林同志的爱戴，反映了全体乌克兰人民对伟大的斯大林的无限信任和爱戴。

同志们，斯大林同志在总结报告中指出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共产主义的胜利……

……乌克兰人民消灭了敌人和叛徒以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党和我们的领袖、我们伟大的斯大林的周围。（掌声）

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在联共（布）斯大林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不论在联盟直辖工业或在共和国工业发展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下面的事实可以说明我们工业的高度发展：在第二个斯大林五

年计划期间，乌克兰的生铁产量增加了一倍多，仅马凯耶夫卡的基洛夫冶金工厂一个厂的生铁产量就比波兰所有冶金工厂的生铁产量多一倍。这一点应该使某些人想到苏维埃乌克兰的力量。在第二个斯大林五年计划期间，钢产量几乎增加了两倍……

……由于农业劳动这样高度的机械化，我们乌克兰人就能响应斯大林同志提出的号召，分出一部分集体农庄庄员到工业部门去工作。

……这是乌克兰集体农庄布尔什维克化的结果，这就是行动中的斯大林的旨在使集体农庄庄员富裕起来的路线……

……从乌克兰高等学校毕业的苏维埃专业人员逐年增加。在第一个斯大林五年计划期间毕业生共 39 000 人，而在第二个斯大林五年计划期间就有 64 000 人……

……只有列宁斯大林民族政策的胜利，斯大林同志对乌克兰文化发展的特殊关怀，才使我们在文化发展方面取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

这就是为什么乌克兰人民要竭诚地、亲切地、热情地和庄严地欢呼：‘亲爱的斯大林万岁！’（暴风雨般的掌声，转为欢呼声。全体起立。高呼：“斯大林同志万岁！”“斯大林同志乌拉！”）

现在，我们乌克兰像整个苏联一样，布尔什维克队伍空前地团结一致，劳动者空前地团结在我们布尔什维克党的周围，团结在乌克兰人民的领袖、导师和朋友斯大林同志的周围。（掌声）

一切法西斯侵略者都要在我们团结一致的队伍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只要布尔什维克党发出号召，只要斯大林同志发出号召，乌克兰人民便万众一心，奋起保卫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掌声）

让喀尔巴阡山乌克兰的主子们，也就是斯大林同志所说的那些小人的主子们知道，乌克兰人民决心给予一切企图用自己肮脏的皮靴践踏自由苏维埃乌克兰神圣的社会主义国土的敌人以坚决的回击。（掌声）

同志们！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我们伟大的斯大林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指示，用强大武器武装了苏联和全世界的劳动者去为共产主义而斗争。斯大林同志关于受资本主义包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说，斯大林同志在报告中就苏维埃知识分子问题提出的极其深刻的新论点，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的极大的贡献，标志着列宁主义的更高发展阶段。

……引导我们胜利地走向共产主义的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我们亲爱的斯大林万岁！（暴风雨般的掌声，转为欢呼声，



全体起立，高呼：“乌拉！”、“伟大的斯大林万岁！”“斯大林同志乌拉！””

还需要评论吗？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崇拜”。我们根据的是事实。事实的确证实了报刊上、讲坛的发言中和日常谈话中，每天都在歌颂斯大林。早在20年代，斯大林的一名忠实仆从——梅赫利斯开始了这种崇拜。他是《真理报》的主编，起初谨慎地、后来就大声地讨好总书记。《真理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它的文章被所有的共和国级、州级和地区级的报纸转载。因此，“个人崇拜”肇端于新闻界，它是那些指望用歌颂来博得领袖欢心的人的喉舌。换句话说，这种现象的基础是阿谀逢迎。它膨胀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确实变成了一种不健康的、病态的崇拜。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创下鼓舌如簧的记录的不是别人，正是莫斯科党组织的书记赫鲁晓夫。

总而言之，个人崇拜是个人野心家和溜须拍马之辈的杰作，这是一些小人、卑鄙龌龊的小人的创造。

斯大林本人怎样对待个人崇拜？文件表明，他在原则上认为这是有害的、不能容忍的。斯大林1938年2月16日就出版《斯大林童年时代的故事》一书给儿童读物出版社写了一封信：

“我坚决反对出版《斯大林童年时代的故事》这本书。

在这本书里有大量不符合事实、歪曲、夸大和过分颂扬的地方。作者被童话爱好者、扯谎者（大概是“善意的”扯谎者）、阿谀奉承者弄迷糊了。作者是值得怜悯的，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

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在于这本书有一种倾向，即在苏联儿童（以及一般人）的意识中培植对个人，对领袖和绝对正确的英雄的崇拜。这是危险的，有害的。‘英雄’和‘群氓’的理论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理论，而是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社会革命党人说：英雄创造人民，把他们从群氓变为人民。布尔什维克回答社会革命党人说：人民创造英雄。这本书是在为社会革命党人张目……将危害我们整个布尔什维克的事业。

建议把这本书烧掉。”^①

有一次，斯大林在来信中发现了一封谈某个集体农庄工作的很切合

① 《斯大林文集》第196页。——译者注

实际的信，斯大林很欣赏这封信和事实，可是在便笺里吩咐《真理报》主编梅赫利斯去掉信中的某些地方。

“梅赫利斯同志！

附上一个集体农庄很有教益的故事，请予刊登。我勾去了信中说斯大林是‘党的领袖’、‘党的领导人’等等词语。

我想，这些称颂的修饰除了害处，不会（也不可能）有什么好处。发表这封信时，应当删去这些修饰语。

致共产主义敬礼！

约·斯大林”

军事史学者 E. 拉津上校把自己的手稿呈送给斯大林。斯大林就课题谈了自己的意见，然后给作者泼了冷水：“对斯大林的赞誉之词很刺耳——读起来让人不舒服。”

总书记的私人档案里，许多正式文件的草稿和私人通信含有“崇拜”的建议。所有这些文件上都有斯大林的批示：“反对。约·斯·”、“我坚决反对……”、“不合适。约·斯·”。

例如，内务人民委员尼·叶若夫 1938 年向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提出建议，天花乱坠地论证应当将“莫斯科”改名为“斯大林诺达尔”：“……我深信，我们时代地球上的全体人类以及未来时代的全人类都会心满意足地、欢天喜地地接受将‘莫斯科’更名为‘斯大林诺达尔’……”

加里宁在致最高苏维埃的一份正式说明中指出：“斯大林坚决反对更名。”

1949 年 12 月 21 日是斯大林诞辰 70 周年。在庆祝的日子里，赞颂的建议达到了高潮。莫斯科成立了由什维尔尼克任主席的专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审查来自各方的建议，它本身也提出许多庆祝的办法。这一切都报告了接受祝贺的人，又全都被他推翻了。

下面我举几个例子。

在莫斯科修建一座胜利纪念碑，献给胜利的缔造者斯大林。

在莫斯科设立“斯大林生平纪念馆”。

在沃洛比约夫山上的大学校舍前建一座宏伟的斯大林塑像。

规定斯大林的生日为每年的全民节日。

设立斯大林勋章。

授予斯大林“人民英雄”称号，按级别应当高于苏联英雄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

在斯大林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时期参与过战斗的那些城市里建立斯大林纪念碑。在最高统帅发布命令表彰过的城市里修建纪念碑，刻上命令的文字和斯大林的浮雕像。

还有许多其他建议，对此斯大林通过莫洛托夫告诫委员会说：“谦虚一点为好。”

为了纪念战胜德国（警示德国的后代），决定在柏林修建一座纪念碑，并宣布征集设计方案。在选出了最被看好的一些方案之后，邀请了斯大林来参观，当然是想听听他的决定性意见。

斯大林走了一圈，仔细地观看了所有的模型。其中大多数都是最高统帅的各种姿态，这也很自然，仿佛是对这场获胜战争的总结。

斯大林看了看雕塑家们，许多人从他的眼神里捕捉到一丝嘲笑，因此感到非常奇怪。

斯大林指了指种种方案，问道：

“你们不讨厌这个蓄一撮胡须的人吗？”

雕塑家们简直惊呆了。他们甚至不敢笑出来。大家都不开口。

斯大林看见武切季奇设计的一个士兵抱着一个小女孩的塑像。他走到跟前，仔细看了看，说：

“这才是应当要的。”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不过把突击步枪拿掉，让他手里握一柄惩罚之剑……”

方案就这样定了下来。直到今天在柏林耸立着的是一个士兵，他健壮的手里握着“斯大林的惩罚之剑”，脚下是残破的卐字旗，胸前紧紧地偎依着一个小女孩，她象征着被解救的欧洲人民和他们自由的未来。

谢·马·什捷缅科见到的一个小插曲也很有意思。

他和阿·伊·安东诺夫一起带着报告来到克里姆林宫，在接待室里看见苏军总军需官 П. И. 德拉切夫上将。他穿着绷得紧紧的一身军服，缝制考究：上衣按库图索夫时代的样式剪裁，高高的立领，裤子是现代的，不过裤缝镶着很宽的金色彩带。

办公室里，政治局委员都在，总后勤部长安·瓦·赫鲁廖夫在汇报。汇报之后，赫鲁廖夫请求准许展示一下新军服。斯大林没有反对。

德拉切夫走进办公室。斯大林看见他，脸色一沉，问道：

“您打算让谁穿这身制服？”

“这是大元帅服，斯大林同志。”



“给谁预备的？”

“给您，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让德拉切夫退出办公室，然后不顾有那么多人在场，就狠狠地训斥总后勤部长。他强烈反对抬高自己，说是万万不曾想到赫鲁廖夫会做出这种事来……

在大庆（1949年是70华诞）的那些日子里，报纸上充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对斯大林的祝贺和祝福。其中大部分是真诚的，但也有过分阿谀和奉承的。不过斯大林确凿无疑地享有尊敬和热爱。下面我引一些作家的话，对于这些作家的正派和诚实，我想是谁也不会怀疑的。

安娜·阿赫马托娃写道：

愿世界永远记住这一天，
愿这一刻永远留驻在心间。
传奇说的一个英明的人，
是他拯救我们摆脱死亡。
从古老的萨马尔汗，
到北极圈里的摩尔曼斯克，
还有两度被斯大林拯救的列宁格勒……
全国都在琥珀色的朝霞里庆祝，
沉浸在无垠的欢乐中。

米哈伊尔·伊萨科夫斯基热忱而温情地写道：

感谢您，在严峻考验的年代
是您帮助我们站稳了脚跟。
对于您，斯大林同志，我们是如此地信任，
或许超过了信任自己……

亚历山大·维尔京斯基走遍了全世界，他是一个不肯接受革命的演员，是白卫流亡分子饭店和室内酒宴的宠儿，还在回国以前，他就在巴黎唱道：

他头发斑白，像一株银灰色的杨树，
接受着阅兵式。
他为塞瓦斯托波尔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为斯大林格勒又付出了多少？……

当强盗接近我们先辈古老的都城时，
他从哪儿找到那些将军，
还有那些传奇的士兵？
是他培育了他们。为了教育他们，
他长期日夜操劳。
啊，他们训练有素，
足以应付如此致命的考验！
在保卫祖国的严峻战斗里，
为维护他公正的言论，
为了他伟大的真理，
他们面对死亡，毫无畏惧。
他使一个大国高高跃起，
为了自己的祖国
他给苏联各个友好民族创造了多大的力量
和多少光荣。
还是那样的目光，还是那样简明的讲话，
还是那些英明而质朴的言辞。
正是这张支离破碎的俄罗斯地图
让他熬白了头。

肖洛霍夫以他惯有的善良和热忱说道：

“12月份，不计其数的对亲爱的斯大林的祝贺，宛如片片雪花，从世界各个角落纷纷飞向白雪皑皑的莫斯科，从各地给他送来礼品、热爱和忠诚的浪潮在全国涌动、奔腾……

……12月21日，我们将把目光投向克里姆林宫，可是这一天我们也不会忘记另一件事：我们的思绪会飞到第比利斯的郊外，登上大卫山，怀着深切的悲伤和炽热的感激之情，在静默中俯首悼念一位矮小、质朴的格鲁吉亚妇女的亡灵，是这位圣洁的母亲70年前把日后成了人类最伟大的大丈夫、我们的领袖和父亲的人送给了全世界……

斯大林的战士将用略显粗鲁的男子汉的力量拥抱自己的领袖，把祖国和斯大林的形象永恒地融为一体，他肯定会借用俄罗斯大诗人米哈伊尔·伊萨科夫斯基的诗句：

我手中紧握着枪支，

见识过不少国家，
然而最大的悲伤
莫过于远离故土。
在遥远的异国他乡，
我和朋友们有过各种思想。
然而最大的责任
莫过于执行你的意志。
虽说我曾在泥沼中挣扎，
虽说我曾在冰雪中冻僵，
只要你再一次发出召唤，
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
我的愿望和追求
同你、同你严峻又明亮的，
令人羡慕的命运
永远紧紧相连……”

总结前面说过的和写到的，我们可以诚实而客观地断言：对，有过个人崇拜，可是他毕竟是一个人物啊！

* * *

1961年10月，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问题”有了独特的继续和结局。И. 斯皮里多诺夫代表列宁格勒党组织提议将约·维·斯大林的遗体迁出陵墓。代表大会支持这项提议并通过了相应的决定。

毫无疑问，这项“措施”是在“最高层中”，而且是在极小的范围内酝酿的，而它的倡议人就是尼·谢·赫鲁晓夫。

代表们以为，是他们解决了这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却不知道幕后发生的事情（在通过决定之前）。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九局原局长 H. 扎哈罗夫将军是这样说的：

“赫鲁晓夫把我和克里姆林宫警卫长韦杰宁中将找去了。他说：‘今天大约会决定斯大林迁葬的问题。成立了一个以什维尔尼克为首的五人小组：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扎瓦纳泽、格鲁吉亚部长会议主席贾瓦希什维利、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列平、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杰米契夫和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德盖。陵墓警卫长知道在哪儿掘墓。’

后来什维尔尼克把我们找去，提醒我们怎样秘密安排迁葬——

封锁红场，不许任何人通过。

对工作进程总的监督由我的副手 B. 切卡洛夫将军负责。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警备局特别独立团团长沙涅夫奉命用上好的干木料做一口棺材，挑选掘墓的士兵和八名抬出斯大林遗体的军官。”

克里姆林宫团原团长 Ф. 科涅夫的回忆：

“个人警卫局副局长 B. 切卡洛夫上校把我叫到政府大楼去，命令我准备一个连来把斯大林迁葬到新圣母公墓去（这就是说，赫鲁晓夫还曾经有过这个方案。——本书作者注）。

后来他打了一个电话，又说，是迁葬到列宁墓后面的克里姆林宫墙旁。

已经是下午了。红场上聚集了許多人。他们一群群地走来，走到陵墓和观礼台附近，想看看陵墓后面在做什么。

当天 18 时，几队民警清理了红场，关闭了所有入口，借口是莫斯科卫戍区的部队要对 11 月 7 日阅兵式上的技术装备进行排练。

天黑以后，决定掘墓的地点被胶合板围了起来，用探照灯照明。大约 21 时，士兵们掘好了墓穴，运来了 10 块 100×75 厘米的钢筋水泥板，用它们做成一个类似棺槨的东西。陵墓警卫处的人员和科学工作者从透明的罩子下面取出斯大林的遗体，转放进用红布包着的木制棺材里。斯大林军服上的金质钮扣被换成了黄铜钮扣，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金星奖章也被取下了。士兵用黑纱盖住了遗体，只露出了面部和半个胸膛。棺木停放在陵墓悼念室隔壁的一间屋子里。

22 时，以什维尔尼克为首的迁葬小组到达（姆扎瓦纳泽除外，他飞回格鲁吉亚去了，没有参加迁葬。——本书作者注）。没有亲属在场。可以感觉到大家的情绪都很压抑，特别是什维尔尼克（他和贾瓦希什维利并不掩饰自己的眼泪）。

等到要盖上棺盖时，才发现没有钉棺盖的钉子。这个失误很快就由 B. 塔拉索夫上校（管理处长）弥补了。然后请来了团里的八名军官，他们抬起棺木，从侧门走出陵墓。

这时，汽车排着整齐的队列通过红场，为阅兵式做准备。

22 时 15 分，棺木到达墓穴边，被放上了托架。墓穴底部用八块水泥板做成一个独特的槨。静默 1~2 分钟后，棺木被小心地放进了墓穴。原来打算再用两块水泥板盖在上面，可是 B. 塔拉索夫上校建议不盖水泥板，而只是填上土。



按照俄罗斯的习惯，军官里有人（包括我在内）偷偷地撒了一撮土，士兵们填平了墓穴，放上一块刻有斯大林生卒年月的墓碑，这块墓碑一直存在到树立雕像（半身像）为止。”

可怜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他当初是否料到，在他的名字传遍全球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这位“各族人民的领袖”会在夜间，瞒着人民，不举行葬礼，而由一些普通士兵草草掩埋了事！

十五 总 结

（附言）

我们来粗略地概括一下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全部活动。他是什么人？他的同时代人，那些同他见过面，一起讨论过、决定过国家大事的人对他是什么评价？我不援引我们同胞——从士兵到元帅，从普通劳动者到部长的意见，大家对斯大林的评价都是正面的、很高的，这些评价足以汇编成一本书，但这看起来会是片面的、有倾向性的。

我将引证外国活动家、作家、军人的议论：在我看来，他们的见解特别客观而且不偏不倚。正如俄罗斯谚语说的那样：“旁观者清”。

我们从丘吉尔开始，他本人在回忆录中承认：“……这个阴沉的、令人忐忑不安的布尔什维克国家……当初我曾经固执地想把它扼杀在襁褓之中……认为它是文明自由的死敌。”

在战争年代对斯大林有进一步深刻了解的丘吉尔是这样写的：

“对于俄罗斯万幸的是，在它经受艰难考验的年代里领导它的是天才而且坚韧不拔的统帅约·维·斯大林。

他是一位杰出的人物，赢得了他所生活的我们这个残酷时代的敬仰。

斯大林精力过人，博学多识，意志坚定，无论处事还是谈话，他总是果断、坚决、毫不留情，连我这个英国议会培养出来的人也不能提出什么反对意见……他的著作有一股磅礴无比的力量。这股力量在斯大林身上是如此巨大，以至在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的领导人中，他仿佛是无与伦比的……他对人们的影响是不能抗拒的。当他走进雅尔塔的会议厅时，我们大家就像是听到了命令似的，站起身来。而且，真是怪事，两手下垂，放在裤缝边。

斯大林具有深刻的、逻辑性极强的、清新的智慧，绝不会惊慌

失措。他是无人能比的大师，能够在困难时刻找到摆脱绝境的出路……他是一个能够假敌人之手消灭敌人的人，他迫使我们这些被他公然称为帝国主义者的人去同帝国主义者作战……

斯大林接受的是还在使用木犁的俄罗斯，而他留下的却是装备了原子武器的俄罗斯……”

昂里·巴比塞，

作家（法国）：

“他的经历就是战胜不断袭来的闻所未闻的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从1917年起，他年年都完成足以让任何人流芳百世的伟业。这是一个铁人。他的姓就告诉我们他的形象：斯大林就是钢铁。他像钢铁一样不屈不挠。他的力量在于他的无可比拟的健全思想、广博的知识、惊人的专注、对条理清晰的追求、锲而不舍的精神、坚决果断的决策、对选拔人的一贯关心。

如果说斯大林相信群众，那么群众也相信他。在新俄罗斯存在对斯大林真正的崇拜，不过这种崇拜的基础是信任，而且植根于基层。这个在红色宣传画上其侧面像和卡尔·马克思及列宁并列的人，是为每一件事、每一个人而操心的人；是创造了已有的一切，还将创造未来的一切的人。是他拯救了大家。是他还在拯救大家。

……是具有学者的头脑、工人的面庞，而身着普通士兵制服的人。

斯大林是从莫斯科向全世界发射出光辉的一切的中心和心脏。”

科尔德尔·赫尔，

战时任美国国务卿：

“斯大林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人物。他拥有非凡的才干和智慧，并善于抓住实际问题的本质。他同罗斯福和丘吉尔一样，是肩负着未来500年内没有一个人会承受的如此巨大责任的领袖之一。”

埃夫里尔·哈里曼，

美国驻苏大使：

“他知识渊博，明察秋毫的能力让人难以置信，思维活跃，对人的性格体察入微……我发现，他信息比罗斯福灵通，比丘吉尔更讲求实际，在一定意义上是军事领导人中最有成效的一位。”



尤·库·巴锡基维，
芬兰总统：

“斯大林是现代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使自己的名字牢固地载入苏联史和世界史。在他的领导下，古老的俄罗斯改变了，面目一新，焕发了青春，成了当今的苏联。他把苏联提升成一个世界强国，使它比从前存在过的以及可能达到的俄罗斯更加强盛。

斯大林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缔造者之一。斯大林对芬兰同情和友好，因此他的逝世在我国人民心中唤起了真诚的悲哀。我有幸多次会见斯大林大元帅并同他会谈，对这些会见我保留着最美好的回忆。”

哈里·霍普金斯，
美国总统特使：

“再也不会会有第二个斯大林了。他说话如同他的军队射击一样——准确无误，直截了当。他用简短迅速的几个俄语词向我致意，他短暂、有力而友好地握了握我的手，他亲切地微笑着。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一个动作或是表情。你会觉得自己仿佛是在和一架非常稳定的机器、一架理性的机器谈话。

约瑟夫·斯大林知道他要的是什麼，俄罗斯需要的是什麼，而且他认为你也是知道的。第二次拜访时，我们谈了将近四小时。他的问题都是明确、简洁而直截了当的。尽管我很疲倦，我也用同样的语调回答。他的回答很迅速，不模棱两可，而且说的时候，仿佛是经过了多年的深思熟虑。”

赫里斯托费尔，
亚历山大宗主教：

“斯大林元帅……是我们时代的最伟大人物之一，对教会很信任，也很尊重……斯大林元帅是最高统帅，领导着规模空前的军事行动，拥有足够的神赐和祝福，俄罗斯人民在伟大领袖的天才领导下以最崇高的牺牲精神给自己的世仇以毁灭性的打击。”

帕布洛·聂鲁达，
诗人（智利）：

“……我的观点是：个人崇拜时期的阴暗面我多年来并不知情，不过它们并不能从我的记忆中排除最初就形成了的斯大林的形象——一个对自己如隐居者一般苛求的人、俄国革命的大力捍卫者的形象。总而言之，战争成就了这个个头不高、蓄一撮胡须的人；红

军士兵高呼着他的名字，扑向希特勒的堡垒，把它们夷为平地。

回忆录。莫斯科，1978年”

如此等等，回忆录非常之多，全部引用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同胞中，我只引证一个人。他是最受尊敬的、最白璧无暇的人，谁也不会怀疑他的客观性。

阿列克西一世，
莫斯科和全罗斯牧首：

“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与世长辞了。一股伟大的力量、社会力量消失了。我国人民曾经在这股力量中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在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和活动中依靠过这股力量，在许多年中由于有这股力量而感到快乐。没有一个领域是伟大领袖深邃的目光不曾看透的……他是一位天赋极高的人，他在每件事中都能发现平凡智慧看不到、也不可能看到的新事物。

1953年”

* * *

最后，我要引用斯大林对我们说的一段话。

斯大林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预言家。1939年，即在我国后来发生的事件之前半个世纪，他就预言（女革命家亚·米·柯伦泰记下了他的话）：

“……我们党和人民的许多事情都会遭到歪曲和诬蔑，首先是在国外，国内也一样。

追求世界统治地位的犹太复国主义将因为我们的成就而报复我们，它依旧把俄罗斯看成是一个野蛮国家和供应原料的附属国。我的名字也将遭到咒骂和诽谤，许多暴行会都会强加于我。

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将尽全力来摧毁我们的联盟，使俄罗斯再也不能站立起来。

苏联的力量在于各族人民友好。敌人攻击的矛头应当首先指向破坏这种友谊，指向使周边地区脱离俄罗斯的企图。在这方面，应当承认，我们做得还不是尽善尽美。

民族主义将特别严重地兴起。在一定时期内，它将压倒国际主

义和爱国主义，不过时间不长。各个民族内部都会出现许多猥琐的领袖和叛徒。

整个说来，未来的发展道路将更加复杂，甚至疯狂，转折将是最急剧的。结局将是东方翻腾起来，同西方也会出现尖锐的矛盾。

不论事态如何发展，一段时间之后，子孙后代的目光仍将关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活动和胜利。后代人将举起自己先辈的旗帜，他们将按照自己过去的榜样来建设自己的未来。”

附言

一位希腊哲人早在公元前7世纪就颇有感悟地说过：

“Vox popule-vox dei! 人民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

而人民也就是你们，尊敬的读者。我这本书的首页上：“作者的话”中说，你们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从电视、报纸、书籍等等中获得的信息来评价斯大林的所作所为的。也就是说，拥有这些信息资源的人，都是在自身政治的、思想的、道德的信仰的影响下来评价他的。

现在，我指望，我和你们对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生平有相同的认识 and 评价。因此我们是志同道合的人，我们不会分手，而是一起生活在我们的家里——你们有你们的事业和操心，而我则呆在书房的某个地方。有时候你们看到书脊上的书名《大元帅》时，也许会想：“他是非常英明而坚强的人。是的，有过个人崇拜，可是他毕竟是一个人物啊！唉，我们灾难深重的俄罗斯母亲今天恰恰缺少这样一个物！”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卡尔波夫

(作者简历)

1922年7月28日生于奥伦堡一个职员家庭里。塔什干的一个中学毕业，1939年进入塔什干列宁军事学校。学习期间发表了第一篇诗作，练习拳击，是中亚军区和中亚的冠军。

毕业前夕(1941年2月4日)被捕，并被军事法庭根据刑法第58条因反苏鼓动判刑。1942年10月前在塔夫达劳改营服刑。1956年被平反。

从1942年10月起在加里宁方面军惩戒连服役，后来是列兵、军士、第134师第629步兵团步兵侦察排中尉。参与捕获79个“舌头”，因此多次获政府奖励，包括获最高奖励——苏联英雄的称号。

第三次负伤并在野战医院治疗后被派往总参谋部高级侦察学校学习。1947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在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毕业。1954年前在总参谋部工作。在这期间毕业于高尔基文学研究所夜校部(帕乌斯托夫斯基讲习班)。

1954~1965年在中亚克孜勒阿尔瓦特、马雷、库什卡服役。先后任团长、副师长和塔什干军事学校副校长。

服役25年后退役，是苏联作家协会会员(从1962年起)，出版过一些作品。

1973~1975年是《十月》杂志第一副主编。1979~1981年是《新世界》杂志第一副主编。

1981~1986年任《新世界》杂志主编。

著有许多著名的中篇小说：《永恒的战斗》、《元帅杖》、《活捉》、《不只是利剑》、《统帅》、《朱可夫元帅》(三部曲)、《被处决的元帅们》、《军官们早生白发》等。

1986年在作家协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书记，一直领导苏联作家协会至1991年(苏联解体为止)。曾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和苏共中央委员。

曾荣获国家奖和国际奖。

英国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文学博士，联合国国际信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军事科学院名誉院士。



参 考 书 目

《斯大林全集》第1~17卷，斯大林的讲话、访谈录、书信。

托洛茨基，列·：《托洛茨基收藏文件集》第1~4卷，莫斯科“捷拉”出版社1990年版。

托洛茨基，列·：《革命家们的肖像》，莫斯科1999年版。

《斯大林传略》。

俄共（布）、苏共第7~27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洛克哈特，布·：《内幕故事。一个英国间谍的回忆录》，莫斯科1991年版。

叶戈罗夫，亚·：《粉碎邓尼金（1919年）》，莫斯科1931年版。

巴扎诺夫，鲍·：《斯大林秘书回忆录》，莫斯科1990年版。

《苏联的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莫斯科1983年版。

《关于反苏“右派—托洛茨基集团”一案的法庭总结。1938年3月2~13日速记记录》。

福伊希特万格，莱·：《1937年》，莫斯科版。

塔克，罗伯特：《斯大林走向权力之路》，莫斯科1997年版。

苏韦尼罗夫，O.：《1937~1938年工农红军的悲剧》，莫斯科1998年版。

孔克韦斯特：《大恐怖》，莫斯科1980年版。

罗戈温，B.：《1937年》，莫斯科1996年版。

阿利卢耶娃，斯·：《致友人的20封信》，莫斯科1990年版。

别列日科夫，瓦·：《在斯大林身边》，莫斯科1998年版。

斯大林，约·：《伟大卫国战争时期最高统帅的命令》，莫斯科1975年版。

斯大林，约·：《论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莫斯科1948年版。

朱可夫，格·：《回忆和思考》，第1~3卷，莫斯科1995年版。

华西列夫斯基，亚·：《毕生的事业》，莫斯科1975年版。

什捷缅科，谢·：《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莫斯科1969、1975年版。

- 科涅夫，伊·：《方面军司令员笔记》，莫斯科1991年版。
- 巴格拉米扬，伊·：《我们这样走向胜利》，莫斯科1977年版。
- 罗科索夫斯基，康·：《军人的天职》，莫斯科1997年版。
- 萨姆索诺夫，A·：《第二次世界大战》，莫斯科1985年版。
- 苏多普拉托夫，帕·：《情报工作和克里姆林宫》，莫斯科1996年版。
- 苏多普拉托夫，帕·：《特别行动》，莫斯科1997年版。
- 米高扬，阿·：《通过斗争之路》，莫斯科1971年版。
- 米高扬，阿·：《往事如此》，莫斯科1999年版。
- 库马涅夫，Г·：《在斯大林身边》，莫斯科1999年版。
- 吉连科，Ю·：《斯大林—铁托》，莫斯科1991年版。
- 丘吉尔，温·：《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3卷，莫斯科1991年版。
- 《斯大林同丘吉尔和罗斯福的通信集》，第1~2卷，莫斯科1976年版。
- 库利奇金，С·：《总参谋部预计……》，莫斯科1995年版。
- 雅科夫列夫，亚·：《生活的目标（一个飞机设计师的札记）》，莫斯科1968年版。
- 《伟大卫国战争时期苏联的外交政策》，第1~2卷，1946年版；第3卷，1947年版；第4卷，1949年版；第5卷，1952年版。
- 梅列茨科夫，基·：《在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莫斯科1968年版。
- 库兹涅佐夫，尼·：《把握航向，驶向胜利》，莫斯科1975年版。
- 戈尔巴托夫，亚·：《战争岁月》，莫斯科1965年版。
- 戈里科夫，Ю·：《克里姆林宫，大本营，总参谋部》，特维尔1995年版。
- 《伟大卫国战争（1941~1945）中的铁道兵部队》，莫斯科1995年版。
- 《胜利的武器》，莫斯科机械制造出版社1987年版。
- 《俄罗斯战争档案（不同年代的论文集）》。
- 《军事史杂志》，莫斯科1939~2000年。
- 《军事思想》杂志，莫斯科1940~2000年。
- 茹赫赖，B·：《斯大林：真相和谎言》，莫斯科1996年版。
- 西蒙诺夫，康·：《我这代人的见证（关于斯大林的思考）》，莫斯科1990年版。
- 涅克拉索夫，B·：《13个“钢铁般的”人民委员》，莫斯科1995年版。

科瓦廖夫, B. :《斯大林的两个人民委员》, 莫斯科 1995 年版。

《史料》杂志: 历史文献/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通报, 莫斯科 1996 ~ 2000 年。

《苏共中央通报》杂志, 莫斯科 1989 年。

克里沃娃, H. :《1922 ~ 1925 年间的政权和教会》, 莫斯科“20 世纪俄国社会研究者联合会”出版社 1997 年版。

托尔奇诺夫, B. 、列昂秋克, A. :《在斯大林周围》, 国立圣彼得堡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扎列斯基, K. :《斯大林王朝 (人物百科词典)》, 莫斯科, 2000。

叶戈尔申, B. :《大元帅们》, 莫斯科, 1994。

阿布拉莫维奇, A. :《在决定性的战争中 (犹太人在苏联反对纳粹的战争中的参与和作用)》, 特拉维夫, 1981, 圣彼得堡, 1999。

哈尔德, 弗· :《军事日记(1939 ~ 1942 年)》, 第 1 ~ 3 卷, 莫斯科 1969 年版。

古德里安, 海· :《一个士兵的回忆》, 莫斯科 1954 年版。

《1939 ~ 1945 年世界大战 (德国将军论文集)》, 莫斯科 1957 年版。

《解密: 苏联武装力量在战斗行动和军事冲突中的伤亡 (统计资料研究)》, 莫斯科 1993 年版。

乌拉尼斯, B. :《战争伤亡史》, 圣彼得堡和莫斯科 1998 年版。

施特里克 - 施特里克费尔德, B. :《反对斯大林和希特勒》, 播种出版社 1981 年版。

基谢廖夫, 亚· (大司祭): 《弗拉索夫将军肖像》, 纽约 1988 年版。

《1939 年的苏联—德国 (文件资料)》, 第一册, 维尔纽斯 1989 年版。

《1939 ~ 1941 年的苏联—德国 (文件资料)》, 第二册, 维尔纽斯 1989 年版。

安季片科, 尼· :《在主要的方向上》, 明斯克 1982 年版。

谢马诺夫, C. 、卡尔贝舍夫, B. :《约瑟夫·斯大林的生平和遗产》, 莫斯科 1997 年版。

格拉宾, 瓦· :《胜利的武器》, 莫斯科 2000 年版。

利西奇金, B. 、谢列平, 兀· :《第三次世界信息心理大战》, 莫斯科 1999 年版。

《在家人怀抱里的约瑟夫·斯大林》, 莫斯科 1993 年版。

布尔拉茨基, Ф. :《毛泽东》, 莫斯科 1976 年版。

格罗莫夫, 叶· :《斯大林、权力和艺术》, 莫斯科, 1998 年版。

科瓦廖夫, B. :《斯大林的两个人民委员》, 莫斯科 1995 年版。

《史料》杂志: 历史文献/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通报, 莫斯科 1996 ~ 2000 年。

《苏共中央通报》杂志, 莫斯科 1989 年。

克里沃娃, H. :《1922 ~ 1925 年间的政权和教会》, 莫斯科“20 世纪俄国社会研究者联合会”出版社 1997 年版。

托尔奇诺夫, B. 、列昂秋克, A. :《在斯大林周围》, 国立圣彼得堡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扎列斯基, K. :《斯大林王朝 (人物百科词典)》, 莫斯科, 2000。

叶戈尔申, B. :《大元帅们》, 莫斯科, 1994。

阿布拉莫维奇, A. :《在决定性的战争中 (犹太人在苏联反对纳粹的战争中的参与和作用)》, 特拉维夫, 1981, 圣彼得堡, 1999。

哈尔德, 弗· :《军事日记(1939 ~ 1942 年)》, 第 1 ~ 3 卷, 莫斯科 1969 年版。

古德里安, 海· :《一个士兵的回忆》, 莫斯科 1954 年版。

《1939 ~ 1945 年世界大战 (德国将军论文集)》, 莫斯科 1957 年版。

《解密: 苏联武装力量在战斗行动和军事冲突中的伤亡 (统计资料研究)》, 莫斯科 1993 年版。

乌拉尼斯, B. :《战争伤亡史》, 圣彼得堡和莫斯科 1998 年版。

施特里克 - 施特里克费尔德, B. :《反对斯大林和希特勒》, 播种出版社 1981 年版。

基谢廖夫, 亚· (大司祭): 《弗拉索夫将军肖像》, 纽约 1988 年版。

《1939 年的苏联—德国 (文件资料)》, 第一册, 维尔纽斯 1989 年版。

《1939 ~ 1941 年的苏联—德国 (文件资料)》, 第二册, 维尔纽斯 1989 年版。

安季片科, 尼· :《在主要的方向上》, 明斯克 1982 年版。

谢马诺夫, C. 、卡尔贝舍夫, B. :《约瑟夫·斯大林的生平和遗产》, 莫斯科 1997 年版。

格拉宾, 瓦· :《胜利的武器》, 莫斯科 2000 年版。

利西奇金, B. 、谢列平, 兀· :《第三次世界信息心理大战》, 莫斯科 1999 年版。

《在家人怀抱里的约瑟夫·斯大林》, 莫斯科 1993 年版。

布尔拉茨基, Ф. :《毛泽东》, 莫斯科 1976 年版。

格罗莫夫, 叶· :《斯大林、权力和艺术》, 莫斯科, 1998 年版。